爸爸尼赫鲁写给我的世界史

[印度]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著　熊笛　孙匀 译

Glimpses of World History

文明的建立、中世纪的世界、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爸爸尼赫鲁写给我的世界史

作者：[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ISBN：9787508660073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事实上，这本书是专门为我写的。

但对印度和全世界的年轻人和青少年而言，它是人类历史最好的介绍性读物。

——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

尼赫鲁的独生女，曾两度担任印度总理

原版前言

我不知道这些信将会在何时何地出版问世，或者它们是否会被出版，因为当今的印度是一个奇怪的国家，难以预测。但是，在我受到阻止之前，我抓住了机会，写下了这些文字。

对这一系列的历史信件，我需要表达我的歉意，并做一些解释。费神读完这本书的读者们，也许会发现它们。尤其重要的是，我恳请读者阅读最后一封信。在这个颠倒的世界里，也许从最后一封信开始读，也是挺好的。

我写给女儿的信在不断增加。对此，我本无计划，也绝没料到会有如此之多。大约6年前，我女儿10岁的时候，我给她写了几封信，是关于世界初期的一些简短描述。这些早期的信件后来出版成书，受到了热烈欢迎。因此继续写下去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但是我的繁忙生活充斥了很多政治运动，信件的书写被一再搁浅。监狱生活给了我需要的机会，我也牢牢抓住了这个机会。

监狱生活的优点是清闲而且不受干扰。但缺点也是很明显的。监狱既不给犯人提供图书馆，也不提供参考书。在这种条件下，关于任何主题的写作，特别是历史，是草率鲁莽的。我收到了一些书，但都不能保留下来。这些书得到了又失去了。然而，12年前，我和我的同胞们一样，开始了监狱里的朝圣之旅，我养成了边阅读边做笔记的习惯。我的笔记本逐渐增多，在我写作之时，它们就成了我的救命稻草。当然，其他书籍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其中帮助最明显的则是赫伯特·乔治·韦尔斯（H. G. Wells）的《世界史纲》（*Outline of*

History）。但是，事实上，好的参考书非常匮乏，因此，我写作中的叙述有时轻描淡写，有时干脆就把某些特殊时期跳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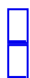
这些信都是私人性质的，亲情弥漫于字里行间，对我孤独的女儿而言，意义重大。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信，因为很难把信带出监狱。所以，我保留着这些信件，不让其他人触碰。

由于身体缺乏运动，我常常陷入自我反省，情绪变化也非常明显。我担心这些情绪变化在信中会非常明显地显现出来，而如何解决信中的情绪问题，则不是历史学家的目标。我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历史学家。这些信只是一个不恰当的混合物，里面既有供年轻人阅读的非常初级的写作内容，也有对成年人的观点进行的讨论。里面重复的地方也非常多。其实，信中的瑕疵也不少，数不胜数。这些信只是由一根细线串起来的肤浅草图。某些事实和观点来自零散的书籍，因此也许一些错误就悄然而至了。我原打算请一位有能力的历史学家修订这些信件，但在我出狱的短暂时期里，我一直没有时间来安排这件事情。

在写信的过程中，我经常积极地表达我的观点。我坚持这些观点，但是，当我写信时，我对历史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如今，如果让我来重写这些信，我的书写的内容可能会有所不同，或者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我不能撕掉我已写好的信件，我也无法重新开始。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1934年1月1日



第一卷
文明的建立

0 ——生日贺信

致英迪拉·普里雅达希尼的13岁生日
奈尼中央监狱

你已经习惯了在生日当天收到漂亮的礼物和美好的祝福。今年的生日，你仍然会收到满满的祝福，可我在奈尼监狱（Naini Prison）送什么礼物给你好呢？我的礼物可能不是物质的或有形的，它们也许只是空气、思想或精神，就好像美丽仙女对你的赐福那样，是一些连监狱的高墙也阻挡不了的东西。

你知道的，我的小宝贝，其实我非常不喜欢说教和劝告。每当我忍不住这样做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曾经读过的一个故事：《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也许，某一天你自己也会读到这个故事。1300年前，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从中国来到了印度，要寻求智慧和知识。这个人叫玄奘。他抱着极大的求知欲，从北方来，穿过沙漠，翻过高山，勇敢面对了种种危险，克服了重重障碍。在印度的数年里，他不仅努力学习，还传教于他人，尤其是在著名的那烂陀（Nalanda）大学里。这所大学坐落在一座城市的附近，这座城市以前被称为华氏城（Pataliputra），现在被称为巴特那（Patna）。玄奘学识渊博，被称为“法师”，这是佛法中的称呼。在那段遥远的日子里，他的足迹遍布了整个印度，他细心观察和深入研究了这个伟大国家的人民。此后，他写了一部游记。那个时常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故事，就是出自这部游记。主人公是一个南印度人，他来到了羯罗拿苏伐剌那国（Karnasuvarna），这个小国就位于今天的比哈尔邦（Bihar）的帕格尔布尔（Bhagalpur）附近。这个人手里拿着一根棒子，腰里缠绕着一圈铜板，头上顶着一个燃烧着的火炬，摆出了一副既骄傲又高高在上

的姿态。他穿着这身奇怪的装束四处行走，当有人问他为何如此装扮时，他就说自己智慧超群，如果不腰缠铜板，就担心智慧太多，会胀破他的肚皮。他之所以举着火炬，是因为他对生活在黑暗中的无知民众，内心充满了同情。

好吧，我很确信，我不会因为智慧过多而胀破肚皮，所以我没必要缠着铜板或穿着铠甲。我的智慧，就是我现在拥有的这些智慧，我希望它不是存储在我的肚子里；无论智慧存在哪儿，都会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更多，不会出现没地方存储智慧的情况。如果我智慧有限，我怎么能自认为是一个聪明人呢？又怎么能给其他人好的建议呢？所以，我一直认为找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其最好的办法不是通过说教，而是通过交谈和讨论，有时真理就在讨论中一点点地出现了。我很喜欢和你交谈，我们彼此之间也讨论过很多东西。但是世界是如此广阔，在我们的世界之外，还有其他很多精彩神秘的东西。所以，就像玄奘故事里的那个愚蠢又自负的南印度人一样，我们不必感到厌倦，或者也不必认为自己已经学会了一切值得学习的东西，自己因而变得非常聪明了。也许，我们不那么聪明，这也挺好的。因为如果真有这样聪明的人，也就没有什么需要学习的了，那他们肯定会觉得很难过，因为他们会失去探索和发现新事物的乐趣，而我们所有人都想经历这样的探险乐趣。

所以我一定不能说教。但是我该怎么办呢？信件是几乎不能代替交流的，它充其量也只是单方面的。因此，如果我要说点听起来像是好建议的话，请别把它当成难以下咽的药片。我认为，我只是给你一点建议去思考，就好像我们正在交谈一样。

我们在历史书里读到了关于伟大国家的伟大时期，伟大的人民和伟大的事迹，有时候在梦里，我们想象自己回到了那些年代，我们勇敢的行为就像旧时的英雄一样。女儿，你还记得吗？当你第一次读到关于圣女贞德（Jeanne d’Arc）的故事时，你是那么着迷，多么想成

为贞德那样的人啊。然而，通常情况下普通人是不会成为英雄的，他们想到的只是面包、黄油、子女、家务等日常琐事。但是，当整个民族对一项伟大事业充满信心的时候，这个时机就到来了，即使是最普通的男人和女人都能成为英雄，也都能震撼人心，做出划时代的功绩。伟大的领导者能激励整个民族，带领他们成就伟大的事业。

你出生于1917年，这是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在这一年里，一位内心充满了对苦难民众的热爱和同情的伟大领袖，带领广大人民写下了一页卓越而难以忘怀的篇章。恰巧在你出生的那个月里，列宁（Lenin）领导了“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让俄国和西伯利亚（Siberia）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当今的印度，也有一位对苦难的人民抱有深切同情和热爱的伟人，他就是巴普吉（Bapuji）㊟。他渴望帮助人民脱离苦海，同时也激励着民众不怕牺牲，积极献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只有这样，被剥削压迫、忍饥挨饿的人民才能挣脱枷锁，获得自由。虽然甘地身在监狱，但他的言行和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千百万印度人民，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都纷纷挣脱枷锁的束缚，成了印度的自由战士。在印度，今天我们正在创造历史，你和我都有幸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并能投身于这一伟大的事业里。

在这场伟大的运动里，我们该怎么去做呢？我们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不敢说我们具体肩负的责任是什么。但是无论怎样，我们要记住，我们一定不能做任何给我们的事业抹黑或者使人民蒙羞的事。如果我们成了印度的战士，那我们就要牢牢守护印度的荣耀，而这个荣耀是一种神圣的信任。有时，我们也许会很疑惑，不知道该做什么，也难以决定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你还记得吗？每当你心存疑虑的时候，我总会让你做一个小小的测验，这也许能对你有所帮助。那就是，永远不要偷偷摸摸、藏头藏尾地做事，也不要去做你想极力隐藏的事情。因为，隐瞒秘密就意味着你害怕恐惧，而恐惧对你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勇敢一点吧，其他的事情就会迎刃而解。如果你

很勇敢，你将不会害怕，也不会做出任何使自己蒙羞的事。你很清楚，甘地领导下的伟大的自由运动是光明正大的运动。我们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也毫不担心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我们进行的事业是光明磊落的，即使是在日常的私人生活中，我们的行为也是坦坦荡荡的，绝不会偷偷摸摸。当然，我们也许有，也应该有自己的隐私，但这与保密是完全不同的。我亲爱的孩子，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无论未来会发生什么，你都会成长为一个光明磊落、无所畏惧、泰然自若的人。

我写给你的这封信已经很长了，但是我还有很多话想告诉你。一封信怎么可能装得下这么多内容呢？

我要说的是，你很幸运，因为你能亲眼见证我们国家的这场为了自由而进行的伟大奋斗。而更幸运的是，你身边有一位非常勇敢、美丽、娇小的女性，她就是你的妈妈。如果你心存疑虑或者身陷困境，她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再见，我的小宝贝。愿你成长为一名为印度事业而奋斗的勇敢战士。

送上我对你全部的爱与祝福。

---

1. 巴普吉，指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

1 ——新年礼物

两年多以前我写给你的信，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你在穆索里（Mussoorie），我在阿拉哈巴德（Allahabad）。你说你喜欢这些信。我经常在想，我是否应该继续写下去，继续告诉你关于这个世界的更多东西？但是，我犹豫不决了。想想这个世界的历史，想想曾出现过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迹，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阅读历史书籍是件好事，但是更有趣、更吸引人的则是创造历史。你知道的，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创造着历史。印度虽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却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中迷失了方向。印度曾经历过令人悲伤和痛苦的时期，对此我们都感到羞愧和难受。但是，总体而言，印度的历史是辉煌的，我们应该感到自豪，感到高兴。然而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追忆过去了。我们的脑子里充满了对未来的展望，我们正在创造未来，而现在需要我们投入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在奈尼监狱，我有足够的时间去读我想读的书，写下我想写的东西。但是，我的思绪总会飞到外面，想着监狱外正在进行的伟大斗争，想着其他人在干什么，如果我和他们在一起，我会干什么。现在和以后，我都会有足够的时间去追忆往昔。然而，我觉得我这么想是错的。此时，既然我不能在监狱外进行斗争，那为什么我要担心呢？

但是，我可以悄悄告诉你吗？为什么我会推迟写信，其实是另有原因的。因为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知识可以传授给你。你成长得这么快，正在成长为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所以我在中学和大学以及之后所学的知识，对你而言，也许已经不够了，可能也过时了。再过一段时间，你也许都可以当我的老师了，可以教给我很多新的东西！我之前告诉过你，在你刚过的生日那天，我给你写了一封信。信

里提到了“一个智慧超群的人”，他行走在外时腰里会缠绕着一圈铜板，是为了防止肚子里的知识装得太多而胀破肚皮，可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人。

当你在穆索里的时候，我可以轻松地写一写关于世界之初的历史。关于那个时期的知识，我们是模糊的，也是不确定的。但是，当我们走出那个非常古老的时期后，历史就逐渐开始了，世界各地开始有了人类活动。在某个时期里，人类活动有时候是理智的，但更多的时候是疯狂愚蠢的，追寻这些人类活动的足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有书籍的帮助，那倒可以试一试。但是奈尼监狱里没有图书馆，所以，恐怕我没法告诉你关于世界史的种种联系了，事实上，我本来是很想告诉你的。我非常不喜欢青少年只了解某一个国家的历史，也很不喜欢他们通过背诵日期和史实的方式来学习历史。历史是一个由各个不同部分组成的整体，如果你不知道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也就不可能了解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我希望你不是狭隘地去学习历史，仅局限于一两个国家，而是能够通观全世界。你要记住，我们应该认为不同的人之间是没有多大差异的。在地图上，不同的颜色标明了不同的国家。毫无疑问，人与人之间是彼此不同的，但也是非常相似的。我们最好牢牢记住这一点，同时，我们也不能按照地图上的颜色或者国家的疆域来区分不同的人。

我告诉你的，不能是我所选择的历史，要不你就可以看其他历史书籍了。但是，有时候我在信里告诉你的是关于过去发生的历史，关于那些生活在曾经岁月里的人们，关于谁曾在世界的舞台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我不知道，我的信是否能让你有兴趣，并激发你的好奇心。事实上，我也不知道你何时能看到这些信，或者能不能看到它们。奇怪的是，我们本应该离得很近，却又相隔如此遥远！在穆索里，虽然你我相距数百英里，但是我可以随时给你写信；想看看你怎么样了，我就可以去你那儿。但是现在，我们就在亚穆纳河（Jumna River）的两岸，彼此相隔不远，而奈尼监狱的高墙却将我们远远分开

了。每两周，我可以写一封信；每两周，我可以收到一封信；每两周，我还有20分钟的探监时间。这些对我的限制可真是不错啊。我们很少珍惜容易得到的东西。我现在开始认为，在监狱里待一段时间是一个人极其宝贵的学习经历。幸运的是，现在我们的国家有数万人正在经历这个过程。

我不敢说，你看到这些信就一定会很喜欢，但我还是决定继续写下去，我很乐意这么做，因为这些信能让我觉得离你很近，就像在和你面对面交谈一样。我经常想着你，特别是今天，你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因为今天是新年。清晨我躺在床上，仰望繁星，我想到伟大的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带着全部的希望、痛苦和喜乐，带着所有伟大而勇敢的英雄事迹。我想到了还待在耶拉伏达（Yeravada）监狱里的甘地，他那如同魔法一般的魅力使我们腐朽的国家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我还想到了我的父亲[注]和很多其他人。尤其重要的是，我想到了你妈妈和你。在凌晨时分传来了消息，你妈妈被逮捕并被投进了监狱。这可真是给了我一个令人高兴的新年礼物。我早就料到了这迟早会发生，毫无疑问，你妈妈也会感到非常高兴和满足。

但是，你肯定很孤独。每两周，你可以探视一次妈妈；每两周，你可以探视一次我；你可以帮我们彼此传递消息。然而，我会拿着纸和笔坐下来，边写信边想着你。在信里你会离我很近，我们可以在一起谈论好多事情。我们会一起回忆过去，找到一个能使未来更加美好的办法。所以，在新年的这一天，让我们坚信，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我们一定能一步步走向我们梦想中的光明未来，并在印度的历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

1. 指英迪拉的祖父，潘迪特·莫迪拉尔·尼赫鲁（Pandit Motilal Nehru）。

2 ——历史经验

我该写点什么呢，亲爱的？从哪里开始写起呢？我一想到过去，大量画面就纷纷涌入我的脑海里。而我最喜欢的某些画面会停留更长的时间。我回味着这些画面，几乎是无意识地把过去发生的和现在正在发生的进行了比较，试图找出其中的经验教训来指导我的生活。但是，人的脑子里总会奇怪地乱成一团，充满了各种毫无关系的想法和错乱排列的画面，就好像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图库。然而，错也许不全在我们。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可以在脑子里对事件进行更好地排序。但是，有时候，事件本身就是奇怪的，很难进行任何形式的组合排列。

我想，我曾在信里告诉过你，学习历史让我们知道了世界是如何缓慢但又必然地向前不断发展的，最初的简单生物是如何被更复杂、更高级的生物代替的，人类最终是如何成为万物的主宰的，人类又是如何通过智慧战胜了其他生物的。人类从愚昧到文明的发展，就是历史发展的主题。在一些信中，我试图向你展示集体合作的理念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的理想是如何为了共同利益而齐心协力的。但是有时候，看着这幅历史长卷，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理想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且我们已经非常文明、非常先进了。如今，既有相互间的互利合作，又有某个国家或个人自私地攻击或压迫他人，还有某个群体剥削另一个群体。如果在数百万年的进步之后，我们仍然是如此地倒退和落后，那我们将要花多长的时间才能成为举止文明、懂道理的人呢？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似乎比我们现在更好，更有教养，甚至更文明，这不禁让我们开始怀疑，我们的世界到底是在前进还是在后退。我们的国家曾有过伟大辉煌的历史，在各个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现在。

事实上，许多国家都有过光辉灿烂的历史时期，比如印度、埃及（Egypt）、中国、希腊（Greek）和其他国家。很多国家也经历过倒退和落后。但是，这些都不会让我们失去信心。这个世界是如此之大，任何国家一时的起起落落，是不会给整个世界带来很大变化的。

现在，很多人在吹嘘我们伟大的文明和科学创造的奇迹。科学确实能带来奇迹，伟大的科学家也确实值得我们尊敬。但是这些自吹自擂的人不是伟大的人。我们最好记住，在很多方面，和其他动物相比，人类并没有取得多大进步。在有些方面，某些动物仍然比人类高级。这也许听起来很愚蠢，不了解的人可能会嘲笑这种说法。但是，只要你读一读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Maeterlinck）的《蜜蜂的生活》（*Life of the Bee*）和《白蚁的生活》（*Life of White Ant*），你肯定会惊叹这些昆虫的社会组织。虽然我们看不起这些生物界最底层的昆虫，但是，即使是最小的生物也懂得集体合作，也会为了共同利益而牺牲自我；就这一点而言，它们比我们人类更优秀。当我看了《白蚁的生活》，知道了白蚁可以为同伴牺牲生命的时候，我内心的某处变得柔软了，充满了感动。如果文明的考验是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能做到相互合作和牺牲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说在这一点上，白蚁或蚂蚁都远远超过了人类。

在一本古老的梵文（Sanskrit）书籍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个人为了家庭而牺牲，家庭为了集体而牺牲，集体为了国家而牺牲，整个世界则为了精神而牺牲。"几乎没有人知道到底什么是精神，而我们每一个人对精神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但是，这段梵文告诉了我们关于团队合作和为更大利益而牺牲的道理。在印度，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忘记了走向真正伟大的独立主权道路应该是为了人民，所以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又再一次面临了这样的机会，现在整个国家都群情激昂了。无论男女老幼，都微笑着迈步投身于印度的革命事业，不惧痛苦，不惧艰险，这多么振奋人心啊！他们微笑着，高兴着，因为他们所进行的这一伟大事业，就是他们自己的事

业，他们也乐意为它去牺牲，去奉献。今天，我们努力使印度获得自由。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但是，更伟大的则是人类事业。因为我们的斗争仅仅是人类结束苦难的伟大斗争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我们能够推动世界的前进，哪怕只有一点点。

此时此刻，你在安纳德巴旺（Anand Bhawan）[注]，你的妈妈在马六甲监狱（Malacca Gaol），而我在奈尼监狱。我们彼此深深地思念着对方，难道不是吗？但是想一想我们三人重新相聚的那一天吧！我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这份期待将会照亮我的内心，使我欢欣鼓舞。

---

1. 安纳德巴旺，作者位于阿拉哈巴德的住宅。

3 ——革命万岁

普里雅达希尼（Priyadarshini）注——你如同我眼睛般珍贵，假如我没有了眼睛，你仍是我视如珍宝的女儿！今天，我正坐着给你写信，此时耳边渐渐传来了模糊的呼喊声，如同遥远的惊雷。一开始，我不知道这声音是什么，但听着是那么熟悉，我的内心深处似乎也在做出回应。逐渐地，这声音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很快，确信无疑的是，这声音是：“革命万岁！”（Inqilab zindabad!）“革命万岁！”伴随着呼喊声，整个监狱的人都激动万分，我们的内心都在欢欣鼓舞。我不知道是谁在监狱外发出了战斗的呐喊，离我们是如此之近，也许他们是来自城市里的男女，或者是来自农村的农民。我也不知道这呐喊为何会出现在今日。但是，无论他们是谁，我们都异常振奋。虽然对于他们的呼喊，我们只能沉默以对，但是我们所有人的内心都送上了深深的祝福。

为什么我们要高喊“革命万岁”？为什么我们要进行革命？为什么我们要寻求改变？的确，今天的印度需要一次大变革。但是，即使我们期盼的巨大变革已经到来，并且印度也已经独立了，我们也不能停滞不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能够保持静止不变的。自然万物每分每秒、每天每夜都在发生着变化，只有死亡才能阻止改变，才能静止不动。洁净的水是奔流不息的，如果你阻止了它，它将会污浊腐臭。人类的生命和国家的命运亦是如此。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会慢慢老去。婴儿成长为小女孩，小女孩长大成人，成长为成熟的女性，进而成为年老的妇人。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些变化。但是，很多人拒绝承认世界在改变。他们的思想守旧禁锢，不接受任何新思想。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去思考和接受新思

想。结果是什么呢？世界不断地向前发展，把他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他们或者像他们一样的人无法适应这个世界的改变，所以他们不断地被这个世界抛弃。大革命出现了，例如140年前的法国大革命，以及30年前的俄国革命。我们的国家也同样如此，我们现在正处于革命的浪潮中。当然，我们想要独立，但我们想得到更多。我们想在各地能清洗干净所有腐臭的池塘，然后灌入洁净的活水。我们一定会把污垢、贫穷和苦难通通赶出我们的国家。我们也一定会清除掉很多人脑子里如同蜘蛛网般的守旧思想，在我们的伟大事业里，这些守旧思想会阻碍人们思考和团结。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时间才能完成。但至少让我们每一个人推动着它前进吧——革命万岁！

我们正处于革命的起初阶段，我们不知道未来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但是现在，我们的付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看看印度的妇女们吧，她们那么自豪骄傲地走在了战斗的前列！她们是温柔可人的，又是勇敢不屈的；看看吧，她们带领着其他人在阔步向前。还有，面纱，它曾经遮盖了美丽勇敢的妇女们，也是对她们和国家的一种诅咒，而现在，它在哪里呢？它是不是该快点躲在博物馆的架子上，待在这个我们用于保存旧时代遗物的地方呢？

再看看孩子们吧，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无论他们是叫瓦纳·斯纳斯（Vanar Scnas）或巴尔（Bal），还是叫巴里卡·萨巴哈斯（Balika Sabhas）。[注]这些孩子的父母也许曾是懦夫或奴隶，但是，谁敢怀疑我们的后代仍将遭受奴役和压迫，仍然懦弱胆小呢？

所以，变革的车轮正在滚滚向前，曾经被压迫的人民将会站立起来，曾经压迫人民的人将会被打倒。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这样的变革，但是我们还要推动它继续向前，它的前进无人能挡。

革命万岁！

---

1. 普里雅达希尼，英迪拉的第二个名字，意思是“如眼睛般珍贵”。

2.　　这些名字代表了印度的种姓制度。——译者注

4 ——亚洲与欧洲

我在上封信里谈到了一切都在不断地变化着。事实上，如果历史不是对变化的记录，那历史又是什么呢？如果在过去的岁月里发生的变化微不足道，那么可供书写的历史就会非常少。

通常来说，我们在中学或大学里学的历史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我不清楚其他人的情况，我只知道我自己在学校里学到的很少。我只学习了一点印度史——很少的一点点，还学习了一点英国史。然而，我学的印度史，要么是错误的，要么就是被歪曲的，完全是由那些轻视我们国家的人编写的。对于其他国家的历史，我知道得更少。只有我离开了大学后，我才读了一些真正的历史书。幸运的是，监狱生活给了我一个增长知识的机会。

在前几封信里，我告诉了你关于印度的古老文明，还有达罗毗荼人（Dravidians）和雅利安人（Aryans）的入侵。而雅利安人之前的历史，我着墨不多，是因为我也不太了解。但是，会让你有兴趣的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在印度西北部、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附近，发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文明遗迹。人们挖掘出了大约6000年以前的遗迹，还发现了木乃伊，类似于古埃及的木乃伊。想想吧！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数千年前，远远早于雅利安人的入侵，而那个时候的欧洲还是一片荒芜。

如今的欧洲国力强大，欧洲人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文明、最有教养的民族。他们瞧不起亚洲各国和亚洲人民，他们来到亚洲并掠夺了亚洲各国的财富。时过境迁了！让我们来看一看欧洲和亚洲吧。翻开地图册，我们可以看见欧洲只有一小部分和亚洲大陆（Asiatic

Continent）接壤，看起来欧洲似乎是亚洲大陆的延伸。你读过历史书就会发现，在历史的广袤长河中，亚洲曾处于主导地位。亚洲人民曾经不断地前往欧洲，并征服了欧洲。他们掠夺欧洲的同时，也教化了欧洲人民。雅利安人、斯基泰人（Scythians）、匈人（Huns）注、阿拉伯人（Arabs）、蒙古人（Mongols）和土耳其人（Turks），他们都来自亚洲，并遍布了整个亚洲和欧洲。亚洲人像蝗虫一样在欧洲大陆上大量地繁衍生息。事实上，欧洲曾经就像亚洲的殖民地一样，当代欧洲的很多人都是亚洲入侵者的后裔呢。

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亚洲的延伸扩张就如同一头巨大而又笨拙的怪兽。虽然欧洲面积狭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亚洲因面积宽广而伟大，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欧洲。领土的大小是不能作为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是否伟大的依据的。我们很清楚，虽然欧洲是面积最小的大陆，但如今实力非常强大。我们也知道很多欧洲国家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在欧洲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的发明创造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使数百万人民的生活变得便利。在他们中间，有伟大的作家、思想家、艺术家、音乐家和实干家。不能认识到欧洲的伟大之处，是非常愚蠢的。

但是，同样，遗忘了亚洲的伟大也是非常愚蠢的。我们很容易被欧洲的熠熠光辉所蒙蔽，而忘记了我们自己的历史。让我们牢记吧，在亚洲，曾出现了伟大的思想领导者，他们也是世界主要宗教的伟大奠基者，他们对世界的影响也许超过了任何一个人。现存于世的最古老的伟大宗教印度教（Hinduism）起源于印度。同样来自印度的另一个宗教佛教（Buddhism），现在已遍布了中国、日本、缅甸（Burma）和锡兰（Ceylon）注。犹太教和基督教（Christianity）也是发源于亚洲的宗教，因为它们的起源地在亚洲西海岸的巴勒斯坦（Palestine）。帕西人（Parsis）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诞生在波斯（Persia）。你知道的，伊斯兰教（Islam）的先知穆罕默德（Mohammed）出生在阿拉伯半岛的麦加

（Mecca）。克利须那（Krishna）、释迦牟尼（Buddha）、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古伊朗语为Zarathushtra）、基督（Christ）和穆罕默德，还有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孔子和老子，亚洲伟大思想家的名字你可以写满一纸，亚洲伟大实干家的名字你也可以写满一纸。我可以在很多方面向你展示，我们古老的亚洲大陆曾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多么伟大而且极其重要。

时代已经改变了！但是，我们又一次目睹了时代正在发生着的巨大变化。历史总是在数个世纪之间缓慢流淌，虽然它有时候会激流汹涌、跌宕起伏。然而，现在，亚洲正飞速地发展着，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沉睡后，这片古老的大陆终于苏醒了。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视着这片土地，每一个人都很清楚，亚洲将在未来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

1. 这个部落与中国古代的匈奴是否有血缘关系或系同一民族，尚无定论，因此本文采用了欧洲文献的称呼。后同。——译者注
2. 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译者注

5 ——古老的文明与我们的继承

在监狱里，我们可以通过一周看两次印地（Hindi）报纸来了解外面的消息。昨天，我看了一份梵文报纸，并从报上得知，你的妈妈在马六甲监狱没有得到妥善的治疗，将要被送往勒克瑙监狱（Lucknow Gaol）。看到这个消息，我既生气，又担心。也许，用梵文写的谣言里是没法找出真相的。但是，甚至最好也不要对此抱有怀疑，否则就太容易让人内心不安了，吃亏的总是自己啊。不过，这对每个人而言，也许是一件好事，不然的话，我们或许会越来越软弱。但是，一想到我们至亲至近的人正遭受着不幸，我们内心仍会感到难受和不安，尤其是在我们对此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因为心存疑虑，这个报纸上的消息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使我很担心你妈妈的情况。她是那么勇敢，内心犹如狮子般强大，但是她身体柔弱，我不希望她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尽管我们勇敢坚强，但如果健康状况不佳，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如果我们想做好任何一件事，那么我们必须有一个健康强壮的好身体。

也许，你妈妈被转到勒克瑙监狱是一件好事。在那里，她或许会感到更加舒适和高兴，因为那儿有一些伙伴。她一个人待在马六甲监狱，可能会感到孤单寂寞。一想到她离我的监狱仅四五英里远，我就特别高兴。但是，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因为两座监狱都被高高的围墙所隔绝，彼此相距5英里或150英里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今天，我高兴地得知，我的爸爸回到了阿拉哈巴德，并且他的健康状况也好多了。更让我高兴的是他去马六甲监狱探望了你妈妈。也许，幸运的话，明天我就可以看见你们了。因为明天是我的探监日，这个日子可是监狱里的好日子。我几乎两个月没有看见爸爸了。我希

望能看到他，不过让我高兴的是能看到他健康状况真的有所好转。在经过了漫长的14天后，我也想看看你，你会给我带来一些关于你和你妈妈的新消息。

嗨嗬！我在写一些傻事，我坐下来写信本来是想告诉你过去的历史。让我们暂时忘记现在，回到两三千年前吧。

在前几封信里我谈到了一点历史，是关于埃及和克里特岛（Crete）的克诺索斯（Knossos）的。我告诉过你，古老的文明深深地扎根在这两个国家，也扎根在现在的伊拉克（Iraq）或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还有中国、印度和希腊。或许希腊文明比其他文明要发展得晚一点。所以，印度文明、埃及文明、中国文明和伊拉克文明并驾齐驱，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古老的希腊就像是它们的小妹妹一样。这些古老的文明都发生了什么呢？米诺斯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已经不存在了，事实上，它已消失了近3000年了。虽然希腊文明发展较晚，但是希腊人入侵并毁灭了克诺索斯。在持续了数千年的璀璨历史后，古老的埃及文明也消失了，除了伟大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Sphinx）、木乃伊和雄伟庙宇的残骸以外，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当然，埃及，这个国家仍然存在；尼罗河（Nile）仍奔流不息，流过历史的岁月；人民仍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就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但是，现代埃及人和他们国家的古老文明之间，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

在伊拉克和波斯，无数的帝国一个接着一个地崛起兴盛，又随之在历史中被遗忘湮没！人们谈到的仅仅是最古老的巴比伦王国（Babylonia）、亚述王国（Assyria）和迦勒底王国（Chaldea），还有伟大的城市巴比伦（Babylon）和尼尼微（Nineveh）。《圣经》（*Bible*）的《旧约全书》（*Old Testament*）中对这些历史有着详细的记载。此后，在这片孕育了古老文明的大地上，其他帝国不断地崛起和衰落。这就是巴格达（Baghdad）——《一千零一夜》（*Arabian*

Nights）中的一座神奇的城市。无数的帝国兴起之后又覆灭了，最伟大、最骄傲的帝王们曾趾高气扬地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但这一切在历史中只停留了短暂的一瞬。只有文明才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然而，在伊拉克和波斯，古老的文明已经完全消失了，就如同古埃及文明一样。

希腊在历史中曾经是那样的伟大和辉煌，它的荣耀至今还让人们惊叹不已。看着美丽的大理石雕像，我们发出啧啧的惊叹声；读着流传至今的古老文学的残篇，我们满是崇敬与惊愕。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在某种程度上，现代欧洲人是古希腊人的后裔，所以欧洲深受希腊思想和希腊文明的影响。但是，荣耀只属于曾经的希腊，那么现在呢？岁月流逝，古文明已消失不再，其他的文明已经取而代之，今天的希腊仅仅是位于欧洲东南部的一个美丽的国家而已。

埃及、克诺索斯、伊拉克和希腊，它们都在历史的长河里消失了。它们的古文明，如同巴比伦和尼尼微一样，也已不复存在了。那么，其他两个古文明又怎么样了呢？——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与其他国家一样，这两个国家也经历了无数帝国的兴衰与更迭，也曾被大规模地侵略、摧毁、洗劫或掠夺。有的朝代统治了数百年后，又被别的朝代所替代。这一切也同样发生在印度和中国，情形和其他国家一样。但是，除了印度和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地保持了文明的延续。尽管也存在着更替、战争和侵略，但是，古老的文明始终在这两个国家里一直延续着。当然，这两个国家当年的辉煌已经不复存在，长长的岁月给古老的文明蒙上了厚厚的尘埃，甚至有时是肮脏不堪的污秽。但是，它们仍然经受住了考验，古印度文明仍然是当今印度的基石。

现在，世界发生了新的变化。汽轮、铁路和大工厂的出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也许，甚至很有可能，它们将改变或者正在改变着印度的面貌。然而，令人更加兴奋的是，印度的文化和文明从历史

之初一直延续发展至今，经过长长的岁月，最终传承到了我们的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数千年印度文明的继承者。也许我们和祖先们一样走在了同一条道路上。我们的祖先们翻越了西北部的群山，来到了欢乐的平原，众所周知，这里曾是婆罗门（Brahmavarta）、雅利亚伐尔塔（Āryāvarta）[注]、婆罗多（Bharatavarsa）和印度斯坦（Hindustan）等国的旧土。难道你看不见他们在艰苦跋涉中翻过了高山，来到了这片未知的土地上吗？他们无所畏惧，敢于冒险；他们勇往直前，不计后果。哪怕面对死亡，他们也毫不畏惧，微笑面对。但是，他们也热爱生活，清楚地知道享受生活的唯一方式就是勇者不惧，不怕失败，不畏艰难险阻。因为失败和困难只会远远地绕开那些无所畏惧的人。想想他们吧，我们的祖先们，他们不断地前进，一直抵达了奔流入海的神圣的恒河（Ganga）岸边。他们雀跃万分！因此他们对恒河顶礼膜拜，不吝赞美之词，也是不足为怪了吧？

我们是所有这一切的继承者！这的确让人兴奋。但是，我们不能骄傲自满，因为如果我们是历史的继承者，那么我们既继承了荣耀，也同样继承了腐朽。在如今的印度文化遗产里，充满着腐朽和罪恶，这一切使我们在世界上落后倒退，使我们由高贵走向了贫瘠，也使我们国家成了其他国家手中的玩物。但是，难道我们不能决定停止这一切，使之不再继续了吗？

---

1. 雅利亚伐尔塔是印度的别称，意为“雅利安人居住的国土”。——译者注

6 ——古希腊人

今天没有一个人来探望我，这次的探监日让我感到空虚茫然，也让我非常失望。更糟糕的是，探望时间被推迟了，是因为爸爸的健康状况出了问题。而关于他的详细情况，我们却一无所知。好吧，当我得知今天的探监被取消了的时候，我重新回到了纺车前，继续纺纱。我发现，纺纱能让人心情愉悦，也能让内心平静下来。所以，当内心疑虑不安时，我们就纺纱吧！

在上一封信里，我们对亚欧的异同做了比较。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古老的欧洲吧，原本也应该从这个地方开始谈起的。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包括环绕着地中海（Mediterranean）的一些国家。对于那个时期的欧洲北部国家，我们没有任何记载。过去地中海地区的人们认为在德国、英格兰和法国居住着一群野蛮未开化的部落。的确，在一开始，文明被认为是出现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你也知道，埃及（应该是在亚洲，而不是在欧洲）和克诺索斯是第一批走向文明的国家。逐渐地，雅利安人从亚洲而来，向西方扩张，侵略了希腊和邻近国家。他们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雅利安希腊人（Aryan Greeks），也是我们现在所敬仰的古希腊人（Hellenes）。一开始，我以为他们和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没有什么不同，也许雅利安人进入印度的时间还要早一些。但是，变化肯定是悄然而至的，逐渐地，雅利安种族的这两个分支变得越来越重要。印度雅利安人（Indian Aryans）受到了更早期的印度古文明的巨大影响，这个古文明来自达罗毗荼人，其文明的遗迹也许就是我们如今在摩亨佐达罗看到的废墟。雅利安人文化和达罗毗荼人文化相互交融，最终形成了印度的共同文化。

同样，雅利安希腊人在希腊本土上发现了更加古老繁荣的克诺索斯文明，并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但是，虽然受其影响，他们仍然消灭了克诺索斯，也摧毁了它的大部分外来文明，并在一片废墟上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文明。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在早期，雅利安希腊人和雅利安印度人（Aryan Indian）都非常粗暴野蛮，并且崇尚武力。他们精力充沛，四处征战，对所到之处的更加弱小、文明程度更高的国家和人民，要么进行了毁灭，要么进行了融合。

所以，差不多在基督诞生的一千年前，克诺索斯就被毁灭了。新的希腊人在希腊和周边岛屿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他们坐船航行，到达了小亚细亚（Asia Minor）的西海岸、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Sicily），甚至还到达了法国南部。法国的城市马赛（Marseilles）就是由他们建立起来的。但是也许在他们到来之前，腓尼基人（Phoenicians）已经在此定居了。你要记住的是，腓尼基人是小亚细亚的一个了不起的航海民族，他们远渡重洋，寻找贸易机会。在那个时期，他们甚至还抵达了英格兰，而那时的英格兰还是一个野蛮的国家。他们远洋跋涉，航行穿过了直布罗陀海峡（Gibraltar），这是一段多么危机四伏的旅程啊。

在希腊，著名的城市拔地而起：雅典（Athens）、斯巴达（Sparta）、底比斯（Tebes）和科林斯（Corinth）。早期的希腊人也被称作古希腊人，他们的事迹被记录在两部著名的史诗《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中，并一直被后世传颂着。你对这两部史诗应该有所了解，就某种程度上而言，它们的地位相当于我们国家的两大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和《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那两部著名史诗是由盲人荷马（Homer）所著。《伊利亚特》向我们讲述了帕里斯（Paris）王子是怎样将美丽的海伦（Helen）带回他的城邦特洛伊（Troy）的；之后，希腊的国王和其他城邦邦主们是怎样围攻特洛伊并抢回海伦的。《奥德赛》讲述的故事是，在特洛伊的围攻结束后，奥德修斯（Odysseus）或者叫作尤利西

斯（Ulysses）是怎样四处漂泊、历经险阻，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乡的。这座小城特洛伊就矗立在小亚细亚，离海岸线不远。虽然这座城市早已不复存在，在时间的长河中湮灭了，但是一位诗人用他的才华使之成为不朽。

当古希腊人或希腊人正快速发展到短暂而辉煌的成熟期时，有趣的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另一支力量正在悄然兴起，随后它征服并取代了希腊。据说罗马城（Rome）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几百年来，罗马城没有在世界的舞台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是，这座伟大城市的建立值得一提，它曾在数个世纪里屹立于整个欧洲世界，也曾被称为“世界霸主”和“永恒之城”。关于罗马城的建立有着无数奇妙的故事，还有很多故事是关于罗马城的奠基者雷穆斯（Remus）和罗慕路斯（Romulus）的；据说兄弟俩被抛弃在荒野里，一头母狼喂养了他们。也许你知道这个故事。

在罗马城建立或者建立之前的那个时期里，古老世界的另一座伟大城市出现了。它就是位于非洲北海岸、由腓尼基人建立的迦太基（Carthage）。它逐渐发展，拥有了海上霸权，并与罗马发生了无数次激烈的竞争和惨烈的战争。最终，罗马取得了胜利，迦太基被完全消灭了。

在我结束这一封信之前，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巴勒斯坦吧。当然，它不在欧洲，也没有什么历史重要性可言。但是很多人对它的古老历史很感兴趣，因为在《旧约全书》中有它的记录。这是一个关于犹太人（Jews）的某些部落的故事，这些犹太人居住在一片小小的土地上，周围的邻居则是强大的巴比伦王国、亚述王国和埃及，他们之间的纷争一直不断。如果这个故事不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历史的一部分的话，可能几乎没有人会知道这个国家。

在克诺索斯被毁灭的那个时期里，扫罗（Saul）是古以色列（Israel）的国王，这个王国曾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之后是大卫王

（David），然后再是所罗门王（Solomon）。我之所以提到这三个人的名字，是因为你肯定听说过他们，或者在书里读到过他们的故事。

7 ——希腊城邦

在上一封信里，我谈到了希腊人或古希腊人。让我们再来看看，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当然，对于我们从未见过的某些事和某些人，我们很难有一个真实可靠的观点。我们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因此很难想象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然而，无论是印度、中国，还是希腊，古老世界是完全不同于现代世界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借助于他们的书籍、建筑和其他遗迹，推测出那个时期的人的大致情况。

关于希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显然，希腊不太像一个大的国家或帝国，它有点像小城邦，也就是说，每一座城市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有点像共和国，城市位于中心，城市的周围是一片片用于供应食物的土地。你也知道，共和国是没有国王的。这些希腊城邦也没有国王，而是由富有的公民进行统治和管理。普通老百姓在政府里是没有话语权的，广大的奴隶和妇女在政府里也没有任何权利。所以，在希腊的城邦里，仅仅只有一部分人是公民，并且能够对公共问题进行投票表决。让公民们进行投票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他们所有人可以聚集在一个地方。这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希腊，因为希腊由一个个小城邦组成，并不是由一个政府来进行统一管理的大国。想想看，印度的选民们，或者某个省邦的选民们齐聚一处，如孟加拉（Bengal）和阿格拉（Agra），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呢？！这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在以后，其他国家都遇到了这个难题，因此一个解决方法出现了，这就是“代议制政府”。它的意思是为了避免让一个国家的所有选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解决问题，他们选出了“代表”，让“代表”们聚集在一处，共同商讨有关国家的各项问题和制

定相关法律、法规。通过这样的方式，普通选民可以间接地参与本国政府事务。

但是，这个方法没有出现在希腊。希腊避免这个难题的办法就是不出现任何大于城邦的行政体制。我告诉过你，希腊人不断地向外扩张，其势力遍布了希腊、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和其他地中海沿岸国家，但是他们并没有建立一个帝国，也没有建立一个政府来进行统一的管理。他们仅在所到之处建立起了一个个独立的城邦。

你会发现，在早期，印度也出现过小的共和国或国家，它们类似于希腊人的城邦。但是，这种情况显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这些小国逐渐被合并成一个更大的国家。然而即使如此，长期以来，我们的村务委员会（Panchayat）还是拥有很大的权力的。也许，古老的雅利安人造成的第一个影响就是，无论他们到哪儿，他们都建立起了一个个小的城邦。但是，由于地理环境，还有与其他更古老文明的接触和交融，他们在很多定居之处逐渐地放弃了这种做法。尤其是在波斯，我们发现大型的城邦和帝国逐渐出现了；在印度，形成更大王国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但是，在希腊，城邦制持续了很长的时间，直到出现了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希腊人，我们都清楚地知道他是第一个试图征服全世界的人，他就是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我在后面会谈到他。

所以希腊人不愿意把小的城邦合并成一个更大的城邦、王国或共和国。他们不仅保持独立、各自为政，而且彼此总是纷争不断。城邦之间经常发生大的竞争和对抗，有时候还会出现战争。

然而，一些共同点却让这些城邦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宗教。他们的宗教里有着许多美丽的男神和女神，还有着大量神奇美妙的神话传说，就像我们的古印度神话一样。他们对美好的事物顶礼膜拜。现在我们还能看见一些由大理石和其他石头雕刻而成的雕像，它们是多么精美啊，让人惊叹不

已。希腊人崇尚拥有健美的体魄，为此，他们组织了各种竞赛和运动会。在希腊的奥林匹亚（Olympia），时常举办大规模的运动会，希腊各地的人们都会汇集于此。你一定听说过现在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吧，这个名字就来自奥林匹亚的古希腊人运动会，现在指的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赛和锦标赛。

所以，希腊人的城邦是各自为政的，只有在比赛和打仗的时候，希腊人才会聚集在一起。但是，当出现了外来的巨大危险时，他们就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比如，波斯入侵希腊的战争，我会在后面来讲述这段历史。

8 ——西亚的帝国

昨天能看见你们，真是太好了。但是，让我震惊的是爸爸生病了，他看起来是那么虚弱。好好地照顾他，让他尽快好起来。昨天，我几乎没能和你好好说说话。在这么短短的见面时间里，又能干什么呢？我只好通过写信来弥补我们之间缺少的见面和交谈时间。但是，这些信是多么贫乏的替代品啊，把写信假装成见面是持续不了多长时间的。但有时候玩一玩“假装”的游戏也是挺好的。

让我们回到古代吧。我们最近一直在谈论希腊。那么，其他国家在这段时间里都发生了什么呢？关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不必如此费心。我们不知道，或者至少我不知道此时的欧洲发生了哪些有意思的事。欧洲北部的气候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导致了新环境的出现。你也许还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整个欧洲北部和亚洲北部都极其寒冷，这被称作“冰河时代”（Ice Age）。巨大的冰川一直覆盖到了中欧（Central Europe）地区。那个时候，人类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如果有人类存在，可能他们更像动物而不是人类。你也许想知道，我们现在是如何得知那个时期有冰川的。当然，没有任何书面的记载，因为那个时期还没有书籍和作家。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大自然这本书。我想，大自然以它独有的方式，在岩石上留下了历史的痕迹，任何人想了解的话，都可以看一看那些岩石。这就像一本自传，记录下了大自然的历史。现在，冰川用它的方式留下了特有的存在标记。一旦你了解了这些标记，你就不可能弄错。如果你想研究它们，那么你要做的就是去喜马拉雅山脉（Himalayas）、阿尔卑斯山脉（Alps）或者其他地方看一看现在的冰川。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Mont Blanc）附近，你可以亲眼看见冰川，但是也许没有人能给你指出这些

特殊的标记。在克什米尔（Kashmir）和喜马拉雅山脉的其他地方也有大量的冰川。离我们最近的冰川是平达里（Pindari）冰川，距离阿尔莫拉（Almora）大概有七天的路程。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比你现在还小，我去过那个地方，那段经历我至今都还记得很清楚。

我怎么浑然不觉地谈论着冰川和平达里，而不是谈论曾经的历史岁月呢？也许这就是“假装”的游戏吧，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亲口告诉你，就像你在这儿一样；如果我能这么做的话，我们一定会时不时地去冰川等地远足游历的。

因为我提到了冰河时代，所以我们就谈一谈冰川吧。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冰川曾覆盖了中欧和英格兰，因为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些地方发现冰川特有的标记。人们在古老的岩石上发现了这些标记，这让我们确信，曾经的欧洲中部和北部地区是非常寒冷的。然后，气候越来越温暖，冰川逐渐融化了。研究地球历史的地理学家们告诉我们，当气候比现在的欧洲还要温暖时，寒冷期就过渡到了温暖期。由于气候温暖，欧洲逐渐出现了茂密的森林。

雅利安人四处漂泊，来到了欧洲的中部地区。在这个时期，他们似乎没有留下任何值得注意的历史记录，所以让我们暂时忽略他们吧。在希腊和地中海地区，文明而有教养的人们可能把欧洲中部和北部的人们看作野蛮人。但是，这些“野蛮人”身体强健，在森林和村落里过着好战的生活。不知不觉中，这些人准备着在某一天凶猛而来，推翻和颠覆那些在南部地区更加文明的政权。但是这将在很久以后发生，我们现在不必提前谈论。

如果我们对欧洲北部知之甚少，那么对于在这个大陆和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什么，我们就会一无所知。美国被认为是由哥伦布（Columbus）发现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哥伦布到来之前，这里就不存在文明，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文明的遗迹。但是不管怎样，对于此时谈论的美洲早期，我们却一无所知。我们不了解非洲大陆，

当然埃及除外，也不了解地中海沿岸地区。在那个时期，埃及可能已经处于伟大的古老文明的衰落期了。但即使如此，在那个时候，埃及仍然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国家。

让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亚洲此时正在发生的事情吧。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此时出现了三个古老的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中国文明。

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小亚细亚，无数的国家一个接着一个地在历史的长河里兴起、强盛和衰落，出现了亚述王国、米提亚王国（Median）和巴比伦王国，然后是波斯帝国。这些国家是如何彼此纷争不断，如何一时和平共处，又是如何相互毁灭的呢？我们实在没必要详细探讨这些细节。你会注意到希腊人的城邦制和这些西亚帝国之间的不同之处。从很早的时候开始，这些国家似乎就出现了形成一个更大城邦或者帝国的趋势。也许这是因为他们有着更古老的文明，又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吧。

有一个名字也许能使你感兴趣。你肯定听说过，他就是克罗伊斯王（Croesus）。“像克罗伊斯王一样富有”，这句话如今成了一句有名的英语谚语。你也许读过关于克罗伊斯王如何富有、骄傲又如何谦逊的故事。克罗伊斯是一个叫作吕底亚（Lydia）的国家的国王，这个国家位于亚洲西海岸，就是现在的小亚细亚。由于这个国家临近大海，因此有很多的贸易往来。在克罗伊斯统治时期，波斯帝国（Persian Empire）在居鲁士（Cyrus）的统治下日益发达，并越来越强大。克罗伊斯和居鲁士之间爆发了冲突，最终居鲁士打败了克罗伊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记录下了这场战斗，也记录下了骄傲的克罗伊斯是怎样由于他的自作聪明而失败的。

居鲁士统治下的帝国疆域不断扩展，可能一直延伸到了东边的印度。但是，他的继任者大流士（Darius），再次将帝国的疆域扩展到了更加遥远的地方，埃及、中亚（Central Asia）的一小部分区域和

印度河（Indus River）附近的部分印度地区都被纳入了帝国版图。据说，当时这个印度省份出产的大量砂金，都被当成贡品献给了大流士。在那个时期，印度河流域（Indus Valley）一定有很多砂金，然而，现在已无处可寻了。事实上，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了一片荒原。这也向我们展示了气候是如何变化的。

你在阅读历史书的时候想一想过去，然后再来和现在比较，其中最让你感兴趣的就是发生在中亚的变化。在整个中亚大陆，当时曾有无数的部落或成群的男女。在过去，这个地方曾出现过伟大而强盛的城市，可以和现在欧洲国家的首都相媲美，有着富裕而众多的人口，这些城市的规模远远超过了现在的加尔各答（Calcuta）和孟买（Bombay）。在这些城市里，曾经随处可见繁花似锦的花园和郁郁葱葱的树木。气候温暖宜人，既不太冷也不太热。这里曾有美好的一切。但是，数百年后，如今的这个地方却变成了一个地表裸露而荒凉的国家，几乎成了一片沙漠。撒马尔罕（Samarqand）和布哈拉（Bokhara），这两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城市如今依然存在，它们的名字给人们带来了遥远的回忆，但留下的也只是曾经的影子。

但是，我又一次提前谈论了。我们讨论的古代历史里是没有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这些都是后来才出现的。它们被未来的面纱遮掩了，而中亚的伟大和衰落也是后来才会出现的。

9 ——古老传统的负担

我在监狱里养成了一些怪习惯，其中一个习惯就是我起床很早，比曙光出现的时间还要早。我从去年夏天开始就这样了，因为我想欣赏黎明的降临，看着黎明是如何慢慢地遮掩住群星的。你看见过黎明前的月光吗？看见过黑夜如何慢慢变成白昼吗？我经常欣赏着月光和晨曦之间的较量，最终的胜利者往往是晨曦。在半明半暗的暮色中，很难分辨这到底是月光还是晨曦。然后几乎是一刹那间，毫无疑问，新的一天来临了。暗淡的月亮在与晨曦的较量中惨败退场，渐渐在天边消失了。

按照我的习惯，今天我醒来的时候天空中仍是群星点点。晨曦初现之前，天边总会出现一抹奇异的颜色，我们可以凭此猜测，清晨正在来临。当我坐着读书时，自远处而来的喃喃细语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了。我想起来了，今天是桑格拉提节（Sankranti），是佛浴节（Magh Mela）期间的第一个重要日子。数以万计的朝圣者徒步来到桑伽姆（Sangam）进行晨浴，这个地方是恒河、亚穆纳河和已经干枯的萨拉斯瓦蒂河（Sarasvati）的交汇地带。他们边走边齐声高歌，时而赞美神圣的母亲河恒河——“啊，恒河啊，母亲！”——他们的声音越过了奈尼监狱的高墙，传入了我的耳朵里。我聆听着，不禁想到是信仰的力量吸引着大量的人们来到了河岸边，使他们暂时忘却了贫穷不幸的生活。我想到了，年复一年，数千百年以来，朝圣者们是怎样来到这三河交汇的神圣地带桑伽姆的。人们来来往往，周而复始；政权和帝国一时地兴起、称霸，然后又泯灭于历史的长河中。但是，古老的传统仍然延续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传统面前俯首帖耳。传统有着非常美好的一面，但有时也是一种

可怕的负担，它使我们难以向前发展。我们阅读那些写于1300年前的诗歌时，会令人着迷地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束缚中，这种束缚连接着那暗淡而遥远的过去。即使在那时，这些诗歌的内容也是一种古老的传统。但是，当我们想迈步向前时，这种束缚以它特有的方式，紧紧地禁锢着我们，使我们几乎成了无法挣脱传统枷锁的囚徒。我们应该保持过去的传统，但是当传统阻止了我们前进的步伐时，我们也应该打破它的束缚。

在前三封信里，我们一直试图勾勒出一幅发生在2500——3000年之间的世界概貌。我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日期。我不喜欢这么做，也不想让你过于纠结这些日期。事实上，我们也很难清楚地知道那些古代事件发生的确切日期。在后面的信里，也许有时候给出或记住某些日期是有必要的，这可以帮助我们在脑海里能清楚地记得事件发生的顺序。然而目前我们只是了解一下古代世界的大体情况。

我们大致回顾了希腊、地中海沿岸地区、埃及、小亚细亚和波斯的历史。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吧。要学习和了解印度的早期历史是非常困难的。早期的雅利安人或者叫印度雅利安人并没有留下任何历史记录。我们在前几封信里谈到了他们在各方面是如何了不起的。他们中的某些伟人著书立说，留下了《吠陀经》（*Vedas*）、《奥义书》（*Upanishads*）、《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等著作。这些书和其他资料有助于我们学习和了解过去的历史。它们告诉了我们印度曾经的风俗习惯，还有我们祖先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但是，这些记录也不是确切的历史。由梵文记载的唯一真实的历史是关于克什米尔历史的，它出现的时期较晚。这部关于克什米尔诸王的历史是由凯尔哈那（Kalhana）所著，被称为《罗阇塔兰吉尼》（*Rajatarangini*），也被称为《克什米尔诸王编年史》（*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Kashmir*）。你一定会感兴趣的是，在我给你写信的这段时间里，兰吉特·S.潘迪特（Ranjit S. Pandit）㊟正在翻译这本关于克什米尔伟大历史的梵文书籍。他已经完成了一半左右的翻译

工作。这可是一本篇幅很长的书。当全部翻译工作结束后，我们肯定会迫不及待地去读这本书，不幸的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认识梵文，没法去阅读原著。我们应该好好地去读一读这本书，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本好书，而且是因为它会告诉我们大量的历史，特别是克什米尔的历史。你也知道，克什米尔可是我们曾经的故乡啊。

雅利安人来到印度的时候，印度已经出现了文明。事实上，在位于西北部的摩亨佐达罗发现了遗迹，由此可以肯定，远在雅利安人到来之前，这里就出现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伟大文明。但是，我们对此了解不多。也许在未来的几年里，当专门研究历史古迹的考古学家们挖掘出所有的遗迹时，我们可以了解得更多一点。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知道，在印度南部地区或许还有北部地区，达罗毗荼人也曾有过灿烂的文明。他们的语言不是雅利安梵文（Aryan Sanskrit）的分支，而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语言，留下了优美的文献资料。这些语言是泰米尔语（Tamil）、泰卢固语（Telugu）、卡纳拉语（Kanarese）和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所有这些语言现今仍在印度南部地区广泛使用。你也许知道，与英国政府不同的是，我们的国会是按照语言的分布情况来划分印度的行政区域的。把说着同一种语言和有着相似风俗习惯的人划分在同一个省级区域里（即“邦”），这种做法会更好。国会在南部地区划分出了安得拉邦（Andhra），这是由马德拉斯（Madras）北部的泰卢固语地区组成的。在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居住着使用泰米尔语的泰米尔人；位于孟买以南的是卡纳塔克邦（Karnataka），官方语言是坎纳达语（Kannada）或卡纳拉语；喀拉拉邦（Kerala）与马拉巴尔（Malabar）大体相同，官方语言都是马拉雅拉姆语。毫无疑问，在未来的印度行政区域划分上，应更多地关注语言的地区分布情况。

此刻，我不妨多讲一讲印度的各种语言。在欧洲和其他地区，有些人认为印度有数百种语言。这种说法极其荒谬可笑，任何有这种想法的人只会暴露出他们的无知。诚然，像印度这样的一个大国，存在

着众多的方言，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语言的地区性变化。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里，很多山地部落和其他小部落都有着自己特有的语言。但是，当你把印度视为一个整体时，那么这些情况也就不太重要了，只有在人口普查时才会非常重要。我在前面的一封信里曾提到过，印度的语言来源于两个民族，一个是之前谈到的达罗毗荼人，另一个是印度雅利安人。印度雅利安人主要使用的语言是梵文，如今在印度使用的所有印度雅利安语言都是梵文的分支。它们是印地语（Hindi）、孟加拉语（Bengali）、古吉拉提语（Gujrati）和马拉地语（Marathi）。这些语言也出现了其他的语言变异。在阿萨姆邦（Assam）主要使用的语言是阿萨姆语（Assamese），在奥里萨邦（Orissa）或乌特卡尔（Utkal）使用的是乌尔都语（Urdu）。乌尔都语是印地语的一种语言变异。“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一词在过去的意思是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因此，在印度主要使用的语言只有10种：印度斯坦语、孟加拉语、古吉拉提语、马拉地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卡纳拉语、马拉雅拉姆语、乌尔都语和阿萨姆语。在这些语言中，印度斯坦语是我们的母语，在印度北部地区使用非常广泛，如旁遮普（Punjab）、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比哈尔（Bihar）、中央省（Central Provinces）、拉杰普塔纳（Rajputana）、德里（Delhi）和印度中部（Central India）。在这一大片区域里居住着大约1.6亿人。所以你会看到有1.5亿人在说印度斯坦语，虽然它也存在一定的变异。你也知道，印度大部分地区的人们都懂印度斯坦语，它有可能成为印度的通用语言。但是，诚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前面提到的其他主要语言就会消失掉。它们一定会被作为主要的使用语言而被保留下来，它们也留下了丰富而优秀的文献资料，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一个民族使用他们已经发展完善的语言的权利。一个民族能够成长，他们的后代子孙能够学习，其唯一的方式就是使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在当今印度，所有的一切都是七颠八倒的，我们大量使用的语言是英语。我现在给你写信使用的也是英语，

而且我还要继续使用，真是太荒诞了。所以，我希望我，以及我们，能尽快地改掉使用英语的习惯。

---

1. 兰吉特· S. 潘迪特，作者的姻亲（无法确认此人是作者的姐夫还是妹夫），此时正和作者关押在同一座监狱里。

10 ——古代印度的村落共和制

关于过去历史的回顾，我们怎样才能有所进展呢？我总是留下一条主线，然后又转到别的话题上。在上一封信里我正要准备谈谈主题的时候，却转去谈论印度的语言了。

让我们回到古代印度吧。你也知道，如今的阿富汗（Afghanistan）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印度版图的一部分。印度的西北部曾被称为犍陀罗（Gandhara）。大量的雅利安人定居在印度河和恒河平原上，遍布于整个北部地区。迁徙而来的雅利安人可能掌握了建筑艺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雅利安人定居点，在那个时期，这两个地方已经出现了大城市。在雅利安人定居点之间有很多森林，尤其是在印度北部和南部之间有一大片森林。大量的雅利安人穿过这片森林到南部定居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肯定不少人独自穿过了森林，到达了南部地区，不仅与南部地区的人们有了贸易往来，还带去了雅利安人的文化和传统。古老的传统告诉我们，第一个到达南方的雅利安人是圣人阿加斯提亚（Rishi Agastya），他把雅利安的宗教和文化传播到了德干（Deccan）地区。

印度和其他国家之间已经大量出现了繁荣的贸易往来。南部地区的胡椒、黄金和珍珠吸引外国商人跨海而来。大米也可能成了出口的商品。在巴比伦王国（Babylonia）的古代宫殿里还发现了来自马拉巴尔的柚木。

雅利安人在印度逐渐发展了他们的村落体系，将古代达罗毗荼人的村落和雅利安人的新思想融合了起来。这些村子几乎是相互独立的，由村民们选举出的村务委员会进行管理。村落的王公或首领有时

是选举产生的，有时是世袭的，在他们的管理下，一些村落或小城镇联合在了一起。有时候，不同的村落联盟彼此合作，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会集合起来一起修建道路、客栈和用于灌溉的运河，还有其他一些公共项目。虽然王公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是首领，但他们似乎也不能随心所欲。他们要服从雅利安人的法律和习俗，不然就可能被村民罢免或罚款。在我之前提到的“朕即国家”（L’état，c’est moi）的地区或国家里是不可能发生这类事情的。因此，在雅利安人定居点出现了某种民主的现象，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雅利安定居者能够控制政府。

把印度雅利安人和雅利安希腊人相比较，可以发现很多不同之处，然而也有一些共同点，他们定居的地方都出现了某种民主。但是，让我们记住吧，这样的民主几乎仅限于雅利安人。奴隶，或者被他们认为是低等种姓的人，是没有民主和自由的。我们都知道，种姓制度以及相应的无数区分，在以前是不存在的。在那个时期，印度雅利安人被分成了四种类型或四个种姓：第一个种姓是婆罗门（Brahmans），包括学者、神职人员和智者；第二个种姓是刹帝利（Ksha riyas），一般是统治者；第三个种姓是吠舍（Vaishyas），包括商人或从事贸易的人；最后一个种姓是首陀罗（Shudras），指的是体力劳动者和工人。这些划分取决于人们从事的不同职业。种姓制度的出现可能是因为雅利安人想与被征服的民族之间保持距离。雅利安人非常骄傲自负，看不起其他民族，也不想和其他民族往来融合。梵文中表示种姓的词是“瓦尔纳”（varna）或颜色。这也说明雅利安人比印度原住民更白皙、更漂亮。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牢牢记住，雅利安人一直让劳动阶级处在最下层，不允许他们共享民主；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能享有更多的自由。他们不允许国王或首领有行为不端；如果首领一旦行为不轨，就会立即被废罢。国王通常是由刹帝利担任。但是，有时候在战争时期或困难时期，如果首陀罗或者最低级的种姓中有能力卓越的人，那么

他也有可能成为国王。在以后的日子里，雅利安人越来越腐败堕落，他们的种姓制度越来越僵化。太多的种姓划分使国家日益衰退。他们也忘记了当初的自由思想。据说在过去，雅利安人是绝对不会当奴隶的，他们宁可选择死亡，也不会让自己的雅利安名字蒙羞。

无论是城镇还是村落，雅利安人的定居点都不是随意建造的，而是有规划地进行发展的，其中运用了大量的几何学原理，这一点可能会让你感兴趣。事实上，几何图案也被运用到了雅利安人的宗教礼仪中。即使在现在，许多印度教家庭在不同的礼拜仪式中仍在使用这些图案。如今几何学与房屋和城镇的建设有着紧密的联系。古代雅利安人的村落起初可能是一种具有防御性的营地，因为那时人们总是害怕出现外来的攻击。即使是没有敌人进攻的危险，仍然是根据可防御性来进行规划建设的。这种房屋建设规划一般呈方形，四周高墙环绕，有四个大门和四个小门。在高墙内，房屋和街道是按照特殊顺序而修建的。村落的中心地带是村务委员会的处所，村里的老者就聚集在此处。在小村落里，可能没有村务委员会的处所，取而代之的是一棵大树。每年村里的所有自由人就会聚在一起，选举出他们的村务委员会成员。

过去很多有学识的人常常隐居到靠近城镇和村落的森林里，过一种简单的生活或者是安静地学习和劳作。孩子们通常聚集在这些人周围，逐渐地形成了以教师和学生为主的新居住点。我们可以把这些居住点看作大学。虽然没有好的居所，但是寻求知识的人们还是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进行学习。

在安纳德巴旺的对面是巴拉德瓦杰（Bharadwaj）修行的处所，这是你知道的。你或许也知道，在《罗摩衍那》那个时代，巴拉德瓦杰被认为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据说在他流放期间，罗摩占陀罗（Ramachandra）曾拜访过他。有人说数千名孩子和学生同他一起居住和生活。那儿肯定曾有过一所大学，巴拉德瓦杰就是校长。当时，这

个修行的处所位于恒河岸边。这是很有可能的，虽然现在这条河已经退到距此大约一英里之外了。在有些地方，我们花园的土壤含沙量较高，也许这儿曾是恒河河床的一部分。

这一段早期历史是雅利安人在印度的伟大时期。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这个时期的历史记录，只能依赖于我们目前知道的那些非历史书籍。在那个时期有很多的王国和共和国：摩揭陀（Magadha），在今南比哈尔（Bihar）；韦德巴（Videba），在北比哈尔；古国贝拿勒斯（Benares），也叫迦尸（Kashi）；拘萨罗（Koshala），都城是阿约提亚（Ayodhya），即当今的法扎巴德（Fyzabad）；般遮（Panchalas），位于恒河和亚穆纳河之间。在般遮有两座主要的城市，分别是马图拉（Mathura）和曲女城（Kanauj）。这两座城市在以后的历史中都非常有名，它们至今都还在。曲女城也叫作羯若鞠阇（Kanyakubja），位于坎普尔（Cawnpore）附近。过去的乌贾因（Ujjain）古城如今是瓜廖尔（Gwalior State）的一座小镇。[注]

城市毗舍离（Vaisali）位于巴连弗邑（Pataliputra）或巴特那附近。印度早期历史中的一个著名宗族梨车族（Lichchhavi）就聚居在这里。这个邦曾是一个共和国，由一群贵族和选举出来的一位首领进行统治和管理，这位首领被称为“导师”（Nayaka）。

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形成了大型城镇和城市。贸易往来增加了，能工巧匠的艺术和手艺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些城市成了大型的交易中心。学识渊博的婆罗门和学生们曾居住过的、坐落在森林里的修行所也慢慢地发展成了大型的大学城。在这些学习中心里教授的，都是当时各学科领域的知识。婆罗门还教授学生有关战争的科学。你应该记得，《摩诃婆罗多》里提到了一名婆罗门人德罗那（Dronacharya），他是班度族（Pandavas）的伟大教师。他除了教授其他知识，还教学生如何作战。

1. 路易十四曾说过："朕即是国家。"——译者注

2. 瓦尔纳，意指印度的四个传统社会等级中的任一级。——译者注

3. 这句话和现在的情况不符。乌贾因是印度中央省西南部城市，瓜廖尔是中央省西北部城市，也是瓜廖尔专区的中心城市。——译者注

11 ——中国的一千年

监狱外传来了消息，这个消息既使人焦虑悲痛，又使人欣喜自豪。我们听说了发生在肖拉普尔（Sholapur）的事情。通过这个悲伤的消息，我们也大概知道了全国各地发生的事件。当我们的年轻人正在奉献他们的生命时，当数以千计的男女同胞直面野蛮残暴的警棍时，我们很难心平气和地待在监狱里。但是，这是对我们的一种历练。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找机会去最大限度地磨炼自己。我们的人民英勇地冲在最前面，面对痛苦毫不退缩；敌人每一次使用武器和拳头之后，我们的人民会更加强大，更加坚定地进行抵抗；这一切都让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今天的消息塞满了我们的脑子，我们很难再去想别的事情。但是，空想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们想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工作，我们就一定得控制好自己的思绪。因此，让我们回到过去，暂时远离这些烦扰吧。

让我们看看印度在古代史上的姊妹——中国吧。在中国和亚洲东部的其他国家，如日本、朝鲜（Korea）㊟、中南半岛（Indo-China，印度支那）、暹罗（Siam）和缅甸，我们不必再谈雅利安人。在这儿，我们要谈谈蒙古人种（Mongolian）。

大约5000年前或更早的时候，中国经历了一次来自西面的入侵。这些入侵的民族来自中亚，有着较为先进的文明。他们掌握了农业技术，会饲养大批牲畜，还会修建房屋，社会相对较发达。他们在黄河流域附近定居，并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几百年来，他们的势力不断在中国范围内扩张，同时他们还提高了手工艺水平。绝大部分中国

人都是农民，首领通常就是族长，在前面的信里我也提到过类似的情况。[注]六七百年后，大约距今4000多年前，一个叫尧的人称帝了。但是，尽管他是一位国王，但事实上他更像是一位族长，与埃及国王或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是不一样的。这段时间的中国仍然以农民为主，过着农耕生活，没有一个中央集权制的政府。

我之前给你讲过，在过去，族长是由族民选举产生的，后来才发展成了世袭制。我们发现，这样的情况同样也发生在中国。尧的儿子没有继承王位，尧任命了一个被公认为最有能力的人为王位继承人。然而，不久之后，王位的继承就演变成了世袭制。据说夏朝统治了中国400多年。夏朝最后一个国王非常残暴，因此人民爆发了起义，推翻了他的统治。此后，另一个被称为商或殷的朝代掌握了政权，统治了中国近650年。

在这个简短的段落里，我用两三句话就向你展示了中国1000多年的历史。面对时间跨度如此巨大的历史，我们能做些什么呢？这难道不让人很欣喜吗？但是你要知道，我写的这一小段并没有缩短中国这1000年或1100年的历史。我们习惯了用日期、月份或者年份为单位来思考问题。对你而言，要弄清楚100年内发生的事情就已经很困难了。你才13岁，100年的历史对你而言就意味着很多了，不是吗？每过一年你就长大一岁。你又怎样才能在脑子里记住1000年的历史呢？这可是一段长长的时间啊。一代又一代的人出生然后又死去了；城镇发展成了大城市然后又被毁灭了，新的城市又在原址上拔地而起。想一想过去1000年的历史吧，也许你就会对这段时间有个大概的了解。这1000年在世界上发生了多少令人惊叹的变化啊！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历朝历代每个都持续了500年或800年或更长时间，这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啊。

想一想我在上个段落里谈到的中国在这1100年的时间里发生的缓慢变化吧。宗法家长制逐渐消失了，中央集权制政府得到了发展。一个管理有序的国家出现了。中国在古代就出现了书法艺术。但是，你也知道，中国文字与我们的文字以及英语和法语都是不同的。它不是表音文字，而是象形文字，长得像符号或图画一样。

商朝在经过了640年的统治后就被诸侯起兵推翻了，一个新的朝代西周建立了新的政权；西周的统治时间超过了商朝，持续了867年。正是在周朝的统治下，中国成了一个组织有序的国家。在这段时间还出现了两位伟大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和老子。我们会在后面谈到他们。

西周灭商之后，商朝遗臣箕子宁愿被朝廷放逐也不愿意做西周的臣民。因此他带着5000名追随者离开了中国，长途跋涉抵达了朝鲜半岛（Korea）。他称这个地方为“朝鲜”（Chosen），意为“日出之地”。朝鲜位于中国东边，所以由此可见，箕子是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一路向东的。也许他认为他到达了最东边的国家，因此他给这个地方取了“朝鲜”这个名字。约公元前1100年，箕子开启了朝鲜的历史。箕子把中国的手工艺术、房屋修建、农业灌溉和丝绸制作等技术带到了朝鲜。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追随着箕子来到了朝鲜。箕子的后人统治了朝鲜900多年。

当然，朝鲜并不是最东边的国家。我们知道在朝鲜东边的国家是日本。但是，当箕子到达朝鲜时，日本是什么情况呢？对此我们一无所知。日本的历史没有中国历史那么古老悠久，甚至也不如朝鲜。日本人认为他们的第一个统治者叫神武天皇（Jimmu Tenno），他在公元前统治了日本六七百年。日本人认为神武天皇是太阳神的后裔，因为太阳在日本被视为神明。现在的日本天皇被认为是神武天皇的直系子孙，因此很多日本人也认为天皇是太阳神的后裔。

你知道，在我们国家，拉杰普特（Rajput）人也有同样的认知，也认为自己是太阳神和月亮神的后裔。他们有两个主要的世系：日系（Suryavanshi，the Race of the Sun）和月系（Chandravanshi，the Race of the Moon）。乌代布尔（Udaipur）的玛哈拉纳（Maharana）是日系的首领，他将自己的血统谱系追溯到遥远的过去。拉杰普特人是非常优秀的民族，关于他们的英勇和侠义的故事都在广为流传。

---

1. 此时的朝鲜应指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译者注

2. 这里尼赫鲁介绍的是中华文明“西来说”。该学说在20世纪初流行，认为中华文明源于中亚。后来，随着更多考古证据被发现，“西来说”逐渐被“本土起源说”所取代。——译者注

12 ——历史的呼唤

我们大致回顾了一下2500年前的古代世界。篇幅非常简短，也非常有限。我们只能谈谈那些发展相对比较先进的国家或者有确切历史记载的国家。

我们之前提到了埃及的伟大文明，有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其他一些我们现在尚未知晓的古迹。这个伟大的文明曾经灿烂繁荣过，但在很早的时候就走向了衰落。克诺索斯文明也走向了覆灭。

我们回顾了古代中国发展的浩瀚历史，在这个时期中国逐渐发展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还发明了文字、丝绸织造和很多其他美丽的事物。我们还简单回顾了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发展情况。在印度，我们发现了古代文明的踪迹，它就是现在位于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遗迹。在达罗毗荼文明时期还出现了对外贸易。最后，我们还谈到了雅利安人。

我们谈到了雅利安人在当时所写的几部有名的著作：《吠陀经》、《奥义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我们沿着雅利安人的足迹，横跨了印度北部地区，一直深入到南部地区。雅利安文明和古代达罗毗荼文明相互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文明和文化，其中包含了一部分达罗毗荼文明，但是雅利安文明占据了主导地位。特别是我们知道了雅利安人的村落是如何发展成了以民主为基石的城镇和城市的，还知道了森林里的修行所是如何发展成了大学的。

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我们只是简单地提到了帝国的兴衰更迭。在晚一些的帝国当中，有一个是国王大流士统治的帝国，它的疆

域一直延伸到了印度河流域。我们还谈到了在巴勒斯坦的希伯来人（Hebrews），这个民族虽然人口不多且居住在世界的一个小小的角落里，但吸引了众多的目光。世人记住了他们的大卫王和所罗门王，而其他的君王早已被世人遗忘了，因为《圣经》提到了这两位国王的名字。在希腊，我们知道新雅利安文明是在克诺索斯古文明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城邦制出现了，并得到了发展，希腊的殖民地遍布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伟大的博尔纳（Borne）注和它的死对头迦太基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我们只能简单地回顾一下这些古老的文明。现在我要告诉你以前没有提到过的几个国家，如北欧和东南亚诸国。甚至在那个时候，南印度（South India）的航海家们已经冒险穿过了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来到了马来半岛（Malay peninsula）及其南部岛屿。但是，我们必须要在这里画条线，然后就此打住，要不然我们就没法展开后面的叙述。

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些国家被认为是属于古代世界的。但是，我们要记住，相隔遥远的国家之间在当时是没有任何联系和往来的。敢于冒险的海员们航行穿越了大海，而有些人为了贸易和其他目的则在陆地上长途跋涉。但是这些情况也鲜有发生，因为路途中总是充满了各种危险，对地理环境的了解也极其少。在那个时期，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而不是圆的。所以，除了临近的国家以外，没有人知道其他任何国家的情况。因此，希腊人就几乎不知道中国或印度，而中国人或印度人对地中海地区的国家也是知之甚少。

如果你能找到古代世界的地图，那就好好看看吧。古人对世界的某些描述和绘制出的地图，让人觉得很有意思。在这些地图里，许多国家的形状都非常特别。现代人准备的古代世界的地图对我们的帮助更大，我希望你读这个时期的书时，能时常留心一下古代的地图。地图真的很有用。离开了地图，我们就没法知道历史的真实面貌。的

确，要学习历史，就得拥有尽可能多的地图和图片，那些时代的古老建筑物、废墟以及其他古迹的照片，这些图片让干枯的历史架构变得丰满起来，历史便能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如果我们要从历史中学到东西，历史在我们的头脑中就必须是一系列生动的图像，这样一来，我们在阅读历史的时候，就能感觉历史似乎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这就像一出扣人心弦的戏剧，有时候是喜剧，而更多时候则是悲剧；舞台就是整个世界，剧中的演员就是以前的伟大人物，有男的，也有女的。

面对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图片和地图对开阔我们的眼界有一点点帮助。孩子们都应该看看这些图片和地图。但是，比起看图片和地图来，更佳的方式就是去古代历史的废墟和遗迹中亲自游历一番。当然，不可能把每一处古迹都游览一遍，因为它们分布在世界各地。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界足够开阔，我们总能轻易地发现某些古迹。大博物馆里总会收藏小型的遗迹残骸。印度有着丰富的古代历史遗迹，但是更古老的遗迹就极其稀少了。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Harappa）可能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仅存的最古老的遗迹了。很多非常古老的建筑也许在如此炎热的气候里早就崩塌，归于尘土了。然而，更有可能的是，很多古迹仍然沉睡在地下，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和挖掘。我们在挖掘古老的遗迹和铭文时，我们国家的历史画卷就会徐徐地向我们展开，从这些石头、砖块和灰泥上我们可以知道远古时期的祖先们是怎样生活的。

你去过德里，在这座现代城市的附近，你曾见过一些遗迹和古代建筑。当你再次见到它们的时候，想一想过去吧，它们会把你带回到古代，向你讲述过去的历史，这远远地超过了任何一本书的内容。根据《摩诃婆罗多》的记录，当时生活在德里或附近的人们曾经给这座城市取了很多名字，例如天帝城（Indraprastha）、哈斯蒂纳普尔（Hastinapur）、杜格拉卡巴德（Tughlaqabad）和沙杰汗纳巴德（Shahjahanabad）等，当然我也不可能知道所有的名字。历史告诉我

们，在德里曾有七座城市，位于七个不同的地方。因为亚穆纳河变化无常，所以这座城市总在不断地迁徙。我们现在能看到，在国家统治者的命令下，第八座城市已经拔地而起了，它就是芮希那（Raisina）或新德里（New Delhi）。无数的帝国在德里相继兴起、繁荣，然后又衰落下去了。

去贝拿勒斯或者迦尸吧，那可是最古老的城市，让我们聆听它的喃喃低语吧。难道它不是正在向你述说着那远古的历史吗？难道它不是在向你讲述它是怎样穿越了历史的长河，而在这期间无数帝国相继衰落湮灭了吗？难道它不是在告诉我们，释迦牟尼曾带着新的宗教教义来到了这座城市，古往今来数百万民众来到此处寻求内心的平静和慰藉吗？古老陈旧、衰败不堪又肮脏恶臭，但充满了勃勃生机和时代的力量，这就是贝拿勒斯。迦尸则充满了神奇的魅力，因为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曾经的印度，在潺潺的流水声中你能听见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历史的声音。

或许让我们走得更近一点，来到坐落在阿拉哈巴德的阿育王石柱（Ashoka Pillar）吧。阿育王下令建造了这些石柱，看一看石柱上雕刻的精美图案吧，你几乎能听到他那穿越了2000年的声音。

---

1. 博尔纳，指古罗马。下同。——译者注

13 ——财富去哪儿了？

在我寄往穆索里的信里，我尽力向你展现了不同阶级的人民是如何随着人类的进步而发展变化的。早期的人们甚至获取食物都非常艰难。他们日复一日地打猎和采集果实，为了获取食物而从一个地方寻觅到另一个地方。部落逐渐形成了，因为群居比独居更加安全，所以大家庭开始聚在一起生活和狩猎。农业的出现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由此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人们发现，通过各种农业技术在土地上种植农作物，比四处狩猎更容易，也更方便。耕地、种植和收获都意味着要靠土地来生存。人们不必像以前那样四处寻找食物了，而是要居住在离土地不远的地方。所以，村落和城镇逐渐形成，并逐步发展起来了。

农业也带来了其他的变化。土地上出产的食物不是一次就能吃完的，人们把多余的粮食储存起来。和过去的狩猎相比，生活开始变得有点复杂了，不同阶级的人们在田间地头和其他地方从事着不同的劳动，有的人负责管理和组织工作。慢慢地，管理者和组织者的权力越来越大，变成了族长、统治者、国王和贵族。一旦权力在手，他们就可以获得生产出的大量剩余食物。因此，他们变得越来越富有，而在田地里劳作的人们只能获得仅够生存的食物。一段时间过后，这些管理者和组织者变得越来越懒惰，或者已经没有能力做事了，甚至组织管理方面的工作也做不了了。他们什么都不干，但很关心如何从劳动者生产的食物中占据较大的份额。他们开始认为，他们完全有权力依靠他人的劳动生活，而不用亲自做任何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农业的出现给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获取食物的技术得到了提高，获取食物的方式也变得更加容易，由此农业改变

了整个社会的基石，它使人们拥有了闲暇的时间。不同的阶级就这样形成了。每一个人不再为了食物而忙忙碌碌，所以有的人开始从事其他的工作。不同种类的手工业出现了，由此形成了新的职业。然而，权力仍然主要掌握在管理阶级的手中。

你还会发现在以后的历史里，新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人们对其他物品的需求量，也开始变得和对食物的需求量一样多了。所以，任何生产方式的变化都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改变。给你举一个典型例子吧：当蒸汽动力被应用于工厂的生产和铁路、轮船的运输时，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就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蒸汽工厂的生产速度远远高于手工业者徒手或使用简单工具进行生产的速度。大型机器就是一个巨大的工具。铁路和轮船能很快地将食物和工厂的产品运往遥远的其他国家。你可以想象，这让全世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在历史上，更新更快地生产食物和其他物品的方法不断地涌现出来。当然，你会认为如果有更好的方法用于生产出更多的物品，那么世界就会变得更加富有，每一个人就会拥有更多的财富。你说对了一半，也说错了一半。更好的生产方法的确让世界变得更加富有了。但是到底是哪一部分的世界变得更富有了呢？很显然，我们国家仍然存在着贫穷和苦难，但是即使在像英国那样的富有国家里也肯定存在着这种现象。这是为什么呢？财富去哪儿了呢？尽管创造出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但是穷人依然贫穷，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些国家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同创造出的新财富相比，这样的变化还是微乎其微的。然而，我们能很容易地看清楚这些财富的大体去向。这些财富大多流入了管理者或组织者的手中，这些人一定会设法让自己占据其中的最大份额。更奇怪的是，有些人甚至不用劳动就可以占有其他人的劳动成果中的最大份额，而这样的阶级构成却一直在

发展！你能相信吗？这种阶级还受到了尊敬和仰慕，甚至还有一些愚蠢的人认为以工作谋生是一件可耻的事！这可真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在田间地头劳动的农民生产了食物，在工厂里工作的工人创造了财富，他们却穷困潦倒，这难道不让人吃惊吗？我们谈论着要为国家争取自由，但是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除非是推翻这个颠倒的世界，除非是辛勤工作的人们能获得全部劳动的果实。一些篇幅又长又厚的著作讲了政治和政府的管理艺术，还讲了经济和国家财富是怎样分配的。学识渊博的教授们举办了这些话题的讲座。但是，人们在交流讨论的时候，埋头工作的人们仍在承受苦难。200年前，著名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曾这样评价这些政客：“他们开创的“精巧”的权术使得那些在土地上耕耘、为他人生产维持生命的食物的农民们反而因饥饿而死。”

古代的人们不断取得进步和发展，逐渐蚕食着大自然。他们砍伐森林，修建房屋，耕种土地。从某种程度上讲，人类被认为是征服了大自然。人们讨论的话题也是如何征服大自然。然而，这完全是信口开河，大错特错了。我们最好认为人类才开始了解自然界，人们知道得越多，才能越有能力与大自然合作，才能根据自身的目标来利用大自然。古时候的人们是惧怕大自然和各种自然现象的。他们对着大自然顶礼膜拜，奉上贡品以求平安，而不是竭力去了解大自然，好像大自然是一头需要被安抚满足的野兽。因此，雷电和传染病都会使人们心生恐惧，他们认为只有奉上祭品才能平息这一切。许多无知的人们还认为日食或月食是可怕的灾难。他们不去想办法了解这一简单的自然现象，而是对此毫无理由地激动兴奋，通过斋戒和沐浴的方式来保护太阳或月亮！太阳和月亮是完全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我们实在不必为此忧心忡忡。

我们谈到了文明和文化的发展，也看到了人们在村落和城镇里定居，由此出现了文明的开端。人们获取食物的数量越多，也就越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因此人们才能思考其他问题，而不再只关注于狩猎和

饮食。人们的思想发展了，艺术、手工艺和文化也相应地得到了长足发展。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的社会生活变得越加紧密。他们不断地相遇会面，并且开始了贸易活动。如果人们聚集在一起生活，那他们就必须相互体谅，避免做出一些也许会伤害同伴或邻居的举动，要不然就不可能出现社会集体生活。以一个家庭为例，家庭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如果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体贴照顾，那么家人才能在一起幸福地生活着。对家庭而言，要遵守这个规则并不难，因为家庭成员之间有情感联系的纽带。尽管如此，有时候我们也会忘记彼此体谅，也会做出不文明、缺乏教养的行为来。在比家庭更大的集体里，无论是和邻居，和同一个城市的人们，和我们的同胞，还是和其他国家的人，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所以，人口的增长会带来更紧密的社会生活，也要求有更多的约束和对他人的体谅。文化和文明是很难界定的，我也不打算定义它们。但是，在构成文化的诸多要素里，无疑包含了对自我的约束和对他人的体谅。如果一个人没有自我约束，就不会体谅他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的。

14 ——公元前6世纪和宗教

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继续前行吧。我们来到了2500年前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就是在公元前600年左右的时候。切不可以为这是一个确切的时间，我只能给你一个大概的时间段。在这段时间内，在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等国家出现了许多伟人、大思想家和宗教奠基人。这些人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完全相同的时间里。但是，他们生活的时期非常接近，公元前6世纪因而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伟大时期。当时一定出现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思想浪潮，这是一场不满于现状、对更好事物充满了希望与渴求的浪潮。伟大的宗教奠基者总是在寻求更加美好的事物，竭力改变人民的生活现状，使他们进步并减轻他们的苦难。他们一直是革命志士，总是以大无畏的精神向现有的弊端发起冲锋。当旧时的传统出了问题或者阻碍了未来的发展时，他们势必会毫不畏惧地推翻陈规陋习。总之，他们为芸芸大众树立了崇高的榜样，榜样代代相传，成了理想的标杆和激励人们前行的动力之源。

公元前6世纪，印度诞生了释迦牟尼和摩诃毗罗（Mahavira），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波斯诞生了琐罗亚斯德[注]，希腊的萨摩斯岛（Samoa）诞生了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你以前也许听说过这些名字，只是有可能关联的内容不同罢了。学校里的孩子们大多认为毕达哥拉斯只是一名数学家，因为他证明了一个几何学定理，现在的孩子们可不太乐意学习这个定理。这个定理证明了直角三角形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欧几里得（Euclid）几何学和其他几何学采用了这个定理。但是，除了在几何学上的发现以外，毕达哥拉斯还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我们对他的了解不多，事实上有些人甚至怀疑是不是真有其人。

据说，琐罗亚斯德教的创始人是波斯的琐罗亚斯德，但是我不太肯定称呼他为该教派创始人是否合适。也许更恰当的说法是，他为波斯的旧思想和旧宗教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和一种新的宗教形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波斯境内几乎没有这个宗教。很久以前从波斯来到印度的帕西人将琐罗亚斯德教带到了印度。从此以后，琐罗亚斯德教便在印度传开了。

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这两位伟大的人物。孔子的英文拼写是“Confucius”（孔夫子），正确的写法应该是“Kong Fu-Tse”。但是就“宗教”这个词的字典意思而言，这两个人其实都不是宗教的创建者。他们制定了道德准则和社会行为规则，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他们去世后，中国人修建了无数的庙宇来纪念他们，他们的著作也受到中国人的推崇和膜拜，就如同印度教的《吠陀经》和基督教的《圣经》一样。孔子教育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使中国人成了世界上最彬彬有礼、举止最文明和最有教养的民族。

印度的宗教伟人是摩诃毗罗和释迦牟尼。摩诃毗罗被认为是耆那教（Jain）的真正创建者(注)，人们至今仍在信仰这个宗教。他的真名是筏驮摩那（Vardhamana），摩诃毗罗是尊称，意思是“伟大的英雄”。耆那教教徒大多生活在印度西部和卡提瓦半岛（Kathiawad），如今也常和印度教教徒（Hindus）混居在一起。在卡提瓦半岛和拉杰普塔纳的阿布山（Mount Abu）上有美丽的耆那教寺庙。耆那教教徒是非暴力主义的忠实信徒，反对可能伤害万物生灵的任何行为。就这一点而言，或许你会有兴趣知道，毕达哥拉斯是一名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他甚至坚持要求他的学生或门徒都成为素食者。

我们现在要谈谈乔答摩（Gautama）了，即释迦牟尼。毫无疑问，你肯定知道他的种姓是刹帝利，他原是一位王室的王子，悉达多（Siddhartha）是他的本名。

他的母亲是王后摩耶夫人（Queen Maha Maya），古代编年史中是这样描述摩耶夫人的："（她）受到所有人的爱戴，犹如初升的月亮般美丽，意志如大地般镇静，心灵纯净得如同莲花，她就是伟大的摩耶夫人。"

乔答摩由父母抚养长大，过着舒适而奢侈的生活，他的父母竭力使他远离一切苦难或烦恼。但这是不可能的，传说他亲眼看到了人们的贫穷、苦难和死亡，他深受触动，心里充满了忧伤；虽然他有奢华的生活、年轻而漂亮的妻子，但他无法在宫廷里获得内心的宁静，人类的苦难一直在折磨着他。

他渴望找到消除这些苦难的方法，这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生根发芽，直至有一天他再也无法忍受了。在一个寂静的夜晚，他悄悄地离开了王宫，离开了亲人，独自一人走进茫茫的世界，去寻找那困扰他已久的问题的答案。他寻求答案的路程极为漫长，让他疲惫不堪。据说多年后，终于有一天，他坐在加雅岛（Gaya）的一棵树下，忽然开悟了，并立即变成了佛，这就是所说的"顿悟"。这棵树就是世人皆知的菩提树，即"觉醒之树"。在古老的迦尸国附近有一个鹿野苑（Deer Park），那时也被称为"仙人鹿园"（Isipatana），即今天的萨尔纳特（Sarnath）。释迦牟尼成佛后便开始在此处讲法传道。他向世人指明了一条"美好生活之路"。他反对向神灵奉上各种形式的祭品，他认为我们必须向神灵忏悔我们的愤怒、仇恨、妒忌和恶念。

释迦牟尼出生时，印度盛行的是古吠陀教（Vedic）。但是，在那时这个宗教已经发生了变化，早已没有往日的声望了。婆罗门祭司们带来了各种形式的宗教仪式、礼拜和迷信，因为礼拜仪式越多，祭司们就会越兴旺。种姓制度越来越严苛，普通百姓们都惧怕征兆、符咒、巫术和骗术。祭司们通过各种方法来控制普通百姓，挑战刹帝利统治者的权威。在刹帝利和婆罗门之间出现了相互敌对的状态。释迦牟尼以伟大的宗教改革者的身份出现在了世人面前。他抨击了已在古

吠陀教里悄然蔓延的祭司专制和所有的恶行。他关注百姓们的幸福生活，同时广施善行，也不参加任何宗教礼拜仪式。他把追随自己的僧侣和尼姑召集起来，组成了佛教僧伽会（Buddhist Sangha）。

曾有一段时间，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在印度的传播并不广泛。后面我们将看到佛教是如何在印度传播的，以及在印度如何走到几近消亡的状态的。佛教征服了从锡兰到中国的那些遥远的国家，而在自己的诞生地——印度，佛教却被融入了婆罗门教或印度教。但是它对婆罗门教的影响巨大，而且至少摒弃了婆罗门教或印度教的某些宗教仪式和盲目迷信。

如今的佛教是世界上拥有教众最多的宗教。同样有着众多追随者的其他宗教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除此之外，还有希伯来人的宗教、锡克人（Sikhs）的宗教、帕西人的宗教和其他民族的宗教。各种宗教和其宗教创始人给世界历史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影响，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一定不能忽视这一点。但是，我发现要把这个话题写清楚还是比较困难的。毫无疑问，伟大宗教的奠基者们都是来自世界上最伟大、最高贵的阶级，但是追随他们的徒弟和信徒大多来自社会等级较低的阶层。我们经常在历史书中看到，宗教本该启发民众、教化民众，使民众变得更好、更高贵，却使得民众变得如同野兽一般。宗教没能开启人类的智慧，反而让人类陷入了黑暗；宗教没能开拓人们的视野，反而使我们目光短浅、愚昧无知。在宗教的名义下出现了很多伟大的善举；同样，也是在宗教的名义下，千千万万的人惨遭屠戮，还犯下了其他种种罪行。

那时的人们与宗教有什么关系呢？对某些人而言，宗教意味着另一个世界：天堂、天国或其他类似的名字。那些希望死后进入天堂的人对宗教是非常虔诚的，并且愿意为宗教做某些事情。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孩子，他循规蹈矩就是希望能被奖励一块果酱泡芙或炸甜圈！如果这个孩子总是想着果酱泡芙或者炸甜圈，你就不会说这个孩子得到

了合理的训练，对吧？你也不会赞成孩子们为了泡芙或其他美食而愿意做任何事情。那么，我们又怎能去评价有着同样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成年人呢？毕竟，果酱泡芙和去天堂的想法在本质上是没什么区别的。人都是自私的，只是程度不同罢了。但是，我们要尽力培养我们的孩子们，尽可能让他们成为无私的人。无论如何，我们的理想应该是完全无私的，这样才能无愧于他人。

我们都期望获得并看见自己行动的成果。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是仅仅关心自己的幸福呢，还是关心更大群体的幸福，即社会的幸福、国家的幸福和人类的幸福呢？毕竟，更大群体的幸福也包括了我们个人的幸福。几天前，我在信里告诉你了一段梵文，意思是个人应该为了家庭而牺牲，家庭应该为了集体而牺牲，集体应该为了国家而牺牲。现在我要告诉你另一段出自博伽梵信仰（Bhagavata）的梵文，说："我期望的不是极度的幸福及其八种完美的状态，我也不期望停止重生。愿我能带走受苦受难的万物生灵的哀痛，并走进他们，使他们能远离悲伤。"

一个宗教信徒说的是这样，而另一个宗教信徒说的是那样，他们彼此之间却经常把对方当成蠢货或骗子。

谁是正确的呢？当他们说着无法看见或无法证明的事情时，我们是很难平息争执的。但是，他们双方都相当自以为是，都非常肯定自己的说法，并绞尽脑汁地去证明。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目光短浅，也不太聪明博学。但是我们能假装自己明晓一切真理，并强迫我们的邻居接受吗？也许我们是正确的，但也许我们的邻居也是正确的。如果你只看见树上的一朵花，你就不会认为这是一棵树，而是一朵花。如果另一个人只看见了树上的一片叶子，还有一个人只看见了树干，那么每个人看到的都只是树的一部分而已。如果他们各执己见，各自坚持说这棵树是朵花，是叶子，是树干，并为此打架斗殴的话，这是多么愚蠢啊！

我恐怕不会对另一个世界感兴趣的。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我在这个世界里应该干点什么。如果我能看清楚我前方的道路，我就很满足了。如果我能清楚地知道我在这个世界的责任，我就不让自己去操心另一个世界的问题。

你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有宗教信仰的人，反对宗教的人，或者不关心宗教的人。大教会和大宗教组织拥有大量的财富和权力，它们有时候行善，有时候也会作恶。你在以后会发现，有的宗教信仰者心地善良且举止高贵，有的却是披着宗教外衣、行抢劫和欺骗之事的无赖恶棍。因此你得自己去思考，去判断。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人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但是只有当自己亲身体验或亲自找到答案时，才会有巨大的收获。有些问题只能自己亲自去寻找答案。

不要急于做决定。在你决定大事或极重要的事之前，你要先训练自己，教会自己如何去做。人们应该自己为自己思考，自己为自己做决定。但是他们必须有做决定的能力才行。你不能让一个新生儿去做任何决定！很多人虽然年纪不小，但就其思想而言，几乎就如同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今天的这封信比以往的信要长很多，也许你会觉得冗长乏味。但是，对这个话题，我有一点自己的看法。如果你现在无法理解也没有关系，不久你就会明白了。

---

1. 琐罗亚斯德大约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

2. 原文直译是“摩诃毗罗开创了耆那教”。其实摩诃毗罗是耆那教的第24代祖师，虽不是耆那教的创始者，但被尊为真正的创建者。——译者注

15 ——波斯和希腊

我今天收到了你的来信，知道你和你妈妈相处得很愉快，这真让我高兴。但是，我希望我爸爸不要再发烧生病了。他辛苦工作了一辈子，甚至现在都不能得到安宁，也不能好好休息。

你从图书馆里借了很多书来阅读，还想让我给你推荐几本。但是，你没告诉我哪些书是你已经读过的。阅读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对于那些很快就能读完很多书的人，我却心存疑惑。我怀疑这些人并没有认真阅读，只是匆匆地浏览了一遍而已，读完之后也就忘了。如果一本书值得好好地阅读，那么就应该认认真真地从头读到尾。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的书是不值得一读的，选出几本好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也许该告诉我，如果你从图书馆里选几本书来读的话，那这些书应该是好书，要不我们为什么要选它们呢？好吧，好吧，继续阅读吧，我会在奈尼监狱里尽可能地给你一些帮助。我经常都在琢磨你在身体和心智方面的成长速度。我是多么想和你待在一起啊。当你收到我的回信时，也许你已经长大成熟得不需要它们了吧。我想，到那时钱德（Chand）[注]也已经长大了，可以读这些信了。无论如何，总会有人喜欢读它们的。

让我们回到希腊和波斯来看一看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吧。我在之前的一封信里谈论了希腊城邦制和波斯帝国，希腊人称当时的波斯帝国的统治者为大流士。大流士治下的波斯帝国疆域辽阔，行省众多，从小亚细亚到印度，还包括埃及的部分地区和位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这个大帝国毗邻海湾，修建了道路，并在沿途设置了驿站。出于某种目的，大流士决定征服希腊各城邦。在与希腊的几场战争中，出现了几场在历史上极为有名的战役。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录并描述了这几场战争。希罗多德生活的年代离他记录的那几场战争很近。当然，虽然他偏袒希腊人，但是他的描述还是非常有趣的，我会在这封信里节选一部分他对这段历史的记载。

波斯人第一次进攻希腊没能取得成功，因为在漫长的行军途中，波斯士兵不仅染上了疾病，还缺少足够的食物。波斯军队甚至还没有抵达希腊，就不得不返回了。对希腊的第二次进攻发生在公元前490年。这一次波斯军队由陆路改为了海路，登陆地点在离雅典不远的一个叫马拉松（Marathon）的地方。由于波斯帝国威名远播，因此雅典全城都做好了武装准备。雅典人还是惧怕波斯大军的，于是就打算和宿敌斯巴达人（Spartans）重修旧好，并向他们求助，希望一起来抵御外敌。但是，在斯巴达人到达雅典之前，雅典人民就成功地击退了波斯大军。这就是发生在公元前490年的著名的“马拉松战役”。

令人好奇的是，一个小小的希腊城邦居然击败了一支强大帝国的军队。但是，这样的结果也许并不奇怪。希腊人为了保家卫国是在本土作战，而波斯大军长途跋涉远离故土。这支军队的士兵们来自波斯帝国的各个地方，成分很混杂。他们愿意打仗是因为有报酬可拿，对于是否能征服希腊则完全不感兴趣。相反，雅典人是为了自由而战，他们宁死也不愿失去自由。不管出于何种理由，宁死不屈的人是几乎不会被打败的。

所以大流士国王在马拉松战役中失败了。大流士在波斯逝世以后，薛西斯（Xerxes）继位。薛西斯同样也有征服希腊的野心，为此他积极扩军备战，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远征。此刻，我将带着你步入希罗多德所描述的那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薛西斯的叔叔阿塔巴诺（Artabanus）认为波斯军队远征希腊存在很大的危险，他试图劝阻他的侄儿薛西斯放弃进攻希腊的意图。希罗多德告诉我们，薛西斯是这样回答的：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你没有看见危机四伏，也不能预估每一个风险。如果你凡事都要先衡量一下，那么你将一事无成。总是保持乐观并能勇于承受一半的危险，这远远好过于凡事悲观无望，也比不敢承担任何风险的行为更好。如果你只是反对每个提议，而不向我们指出正确的道路，那么你也将和那些你反对的人一样悲痛忧伤的。天平的两边是均衡的。一个人怎样才能确信哪条路行得通，哪条路行不通呢？但是成功通常青睐那些付诸行动的人，绝不会垂青那些胆小怯懦、凡事都要瞻前顾后的人。你看看波斯帝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吧。如果我的那些王位上的祖先和你观点一样，或者采纳了像你一样的其他人的意见，那么你眼前的这个国家绝对不会这样强大。正是因为敢于冒险，才有了现在的我们，只有经历了巨大的风险，才能取得伟大的胜利。

我之所以节选这么长的一段话，是因为他的话语使我们明白了，波斯帝王的伟大是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巧合的是，阿塔巴诺的建议是正确的。波斯军队再次败给了希腊。虽然薛西斯战败了，但是他的这番言辞却是正确的，对我们所有人而言它包含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如今，当我们试图实现伟大的事业时，记住在达到目标之前，我们必须经历巨大的危险。

薛西斯是“王中之王”，他率领大军穿过了小亚细亚，越过了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抵达了欧洲，这个海峡在当时被称为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据说，在行军征途中，薛西斯顺道去了特洛伊遗址，这曾是希腊的古代英雄们为了海伦而战的地方。为了让波斯大军渡过去，他们在赫勒斯滂海峡上架起了一座大桥。军队在通过大桥的时候，薛西斯就坐在附近山顶的大理石王座上，远眺这座大桥。

希罗多德描述道：

看着赫勒斯滂海峡布满了船只，阿比多斯（Abydos）的海岸和平原上人头攒动，那时的薛西斯曾宣称自己是个快乐的人，然后他却开始哭泣。他的叔叔阿塔巴诺——就是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个人，他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劝诫薛西斯不要长途远征希腊——看见薛西斯在哭泣，就用深沉的声音问道："哦，我的国王啊，你现在的样子和刚才差别好大啊！你说你是一个快乐的人，而此时为什么要哭泣呢？"薛西斯说道："哦，因为在我一番思量之后，我一想到人的一生是多么短暂时，我内心就充满了悲伤。看看这些人吧，百年之后都将归于死亡，没人可以例外。"

波斯大军从陆路向前挺进，同时大批船只由海路随行。但是在希腊附近海域，大部分船只都被海上大风暴摧毁了。面对波斯大军的到来，希腊人惊惧万分，他们抛开了彼此之间的争执，联合起来一起抵御侵略者。他们在波斯大军面前向后撤退，试图在一个叫"温泉关"（Termopylae）的地方阻止波斯大军的前进。这是一条非常狭窄的通道，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因此只需一小部分人就能守住这个通道。列奥尼达（Leonidas）国王亲率300名斯巴达勇士誓死守卫这个地方，直至全部战死。仅在马拉松战役的10年后，勇敢的人们又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日子里英勇奋战，报效祖国。他们拖住了波斯大军的主力，掩护希腊军队向后撤退。在这条狭窄的通道里，不断有人倒下，又不断有人冲上去，波斯军队根本无法前进。列奥尼达和他的300名勇士最终全部倒在了温泉关战场上，之后波斯军队才得以继续向前推进。这场战役发生在公元前480年，距今已有2410年了，即使在今天，人们一想到斯巴达勇士们视死如归、不可战胜的勇气，内心都会不住地发颤。甚至是在今天，造访温泉关的游客们也许会泪眼模糊地凝视着篆刻在石头上的称颂列奥尼达和他的勇士们的文字：

过客啊，去告诉我们的斯巴达人，

我们矢忠死守，在这里粉身碎骨。

视死如归的勇气是多么令人惊叹啊！列奥尼达和温泉关永垂不朽！即使我们身在遥远的印度，但一想到他们，我们内心就会激荡澎湃。想想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祖先，还有印度的子女们，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他们微笑着嘲弄死亡，宁死也不愿受辱或被奴役，宁愿推翻暴政也不愿对其卑躬屈膝。想到这里，我们该说些什么呢？又该有怎样的感受呢？想想奇图尔（Chitoor）和它那无与伦比的历史吧，想想拉杰普特人民那令人惊叹的英雄主义吧！再想想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同志们像我们一样热血沸腾；为了印度的自由，他们绝不会在死亡面前后退半步。

温泉关暂时抵挡住了波斯大军的前进，但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希腊人在波斯军队面前撤退逃离了，甚至有的希腊城邦向他们投降了。然而，骄傲的雅典人民宁愿抛弃这座心爱的城市，让它毁于战火，也不愿屈膝投降。因此，所有的雅典人都弃城远走了，大部分人坐船离开了家园。波斯军队进入了这座被遗弃的城市，并将雅典城付之一炬。但是，雅典人虽然逃离了，但并没有被打败。在萨拉米斯岛（Salamis）附近爆发了一场伟大的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波斯军队的船只全部被摧毁，心灰意冷的薛西斯只得返回波斯。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波斯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但是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海战是波斯帝国衰落的转折点。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帝国是如何衰落的。对于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们而言，看着这个庞大的帝国摇摇欲坠是多么令人惊讶啊。希罗多德深思熟虑后从中总结出了一个规律，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包含三个阶段：取得胜利；由胜利导致自大和不正义；由自大和不正义导致衰落。

---

1. 钱德，英迪拉的小表妹，全名为钱德拉莱哈·潘迪特（Chandralekha Pandit）。

16 ——荣耀属于希腊

希腊人战胜波斯人后导致了两个后果：波斯帝国逐步走向了没落，国力日益衰弱；而希腊则步入了历史上的辉煌时期。就国别史而言，这段时间并不长，总共不到200年。它并没有像波斯帝国或没落的其他帝国那样发展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然而后来，希腊出现了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时期，他在位时间虽短，但他的东征西讨震惊了整个世界。不过，在这封信里我们暂且不谈论他。我们要谈论的是在希波战争和亚历山大大帝出现之间约150年的历史，即从温泉关的马拉松战役到萨拉米斯海战开始这一段时间。波斯的入侵使希腊各城邦团结起来，结成了联盟。但是，当波斯对希腊的危险被解除后，希腊再次陷入分崩离析、各自为政的局面，不久之后又出现了纷争。尤其是雅典城邦和斯巴达之间简直就是死敌。但是，我们不必担心他们之间的争斗，这一点并不重要。我们要记住这段历史的唯一原因就是当时的希腊人在其他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

对于这个时期的希腊留存下来的只有几本书籍、几尊雕塑和几处残迹。虽然存数不多，但已足够让我们钦佩、赞美希腊人民在多个领域里取得的伟大成就。他们需要多么才华四溢的头脑、多么敏捷娴熟的双手，才能创造出如此精美绝伦的雕像和建筑啊！菲狄亚斯（Phidias）是这个时期的著名雕塑家，此外还有很多人也颇有名气。他们的戏剧作品，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至今仍是戏剧界最杰出的作品。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埃斯库罗斯（Aeschylus）、欧里庇得斯（Euripides）、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品达（Pindar）、米南德（Menander）、萨福（Sappho）和其他作家，目前对你而言，只不过是一串名字罢了。但是等你长大以后，还是应该

读一读他们的作品，我希望你能知道这些作品所获得的荣耀是属于希腊的。

这个时期的希腊历史对我们是一个警示，它告诉了我们应该怎样去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如果我们仅仅关注希腊各城邦境内的小战争和所有其他的小战役，我们又怎能真正了解他们呢？如果我们想充分了解他们，我们就一定要去了解他们的想法，并尽力体会他们的所感所为，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历史本质。正是这样的历史才使得当代欧洲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古希腊文化。

令人觉得既奇异又着迷的是，如此璀璨的时期是怎样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出现又消失的呢？在这个时期里，曾有那么一段时间，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国家和人民都拥有了创造一切美的能力，人们似乎都充满了灵感和创造力。我们的国家也曾有过这样的辉煌时期。在我们已知的最早期的繁荣时期里诞生了《吠陀经》、《奥义书》和其他一些典籍。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留下那段历史的任何记载，很多美丽而伟大的作品已经消失了，或者也许在等待着人们去发现。但是，我们可以向世人展示古代印度人的伟大思想。在以后的印度历史里，印度再度出现了灿烂繁荣的时期，也许当我们在历史长河中畅游的时候，我们会在不经意间发现它们的熠熠光辉。

在这个时期，雅典是最为有名的城邦。它的统治者是一位政治家，他就是伯里克利（Pericles），执掌了雅典30年。这个时期的雅典是一座宏伟的城市，有着精美的建筑、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思想家。甚至在现在，我们只要一谈到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我们就称它为“伯里克利时代”。我们的朋友、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生活在这个时期的雅典。他思考了雅典的发展，他善于从道德角度进行阐释，由此他得出一个寓意。他在《历史》一书中是这样说的：

> 雅典的实力与日俱增，随手都可以找到证据来证明自由是个好东西。当雅典人民受到专制统治时，他们在与邻邦的战斗中就会处于下风；但是当他们推翻独裁者后，他们的实力就会远远超过邻邦。由此可见，当雅典人受到奴役时，他们是不会发挥自己的才干的，只不过是在给主人服役而已。但是，当他们成了独立的自由个体时，他们就会尽全力维护自身的利益。

我曾提到过那个时期里的一些伟人的名字，但是其中有一个名字我从来没有提到过，他就是苏格拉底（Socrates）。苏格拉底是一位哲学家，他用尽了毕生精力去寻找真理。对他而言，唯一值得拥有的就是真知。他经常和他的朋友们还有熟人们辩论各种问题，通过辩论，他也许就得到了真理。他有诸多门徒和追随者，其中最了不起的就是柏拉图（Plato）。柏拉图写了许多著作，并且流传到了今天；正是通过柏拉图的著作，我们才充分了解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显然，政府是不喜欢人民总是在努力寻找和探求真理，他们自己也不喜欢去寻求真理。伯里克利时代之后，雅典政府不再认同苏格拉底的思想；苏格拉底遭到了审判，并被判处了死刑。他们告诉苏格拉底，如果他承诺不再与人们讨论各种问题，同时改变他的主张，他们就能饶恕他。但是苏格拉底拒绝这么做，他宁愿饮下一杯夺走他生命的毒药，也不愿放弃他的使命。在弥留之际，他对着起诉者、法官和雅典人民说道：

> 如果你们要让我放弃对真理的探索才能赦免我无罪的话，我就会说：我谢谢你们，哦，雅典人民，但是我将服从赐给了我使命的上帝，而不是服从你们。只要我还能呼吸，还有力气，我就绝对不会放弃我的信念和主张。无论我遇见谁，我都将继续传播我的理念，并且告诉对方：“你一心追求财富和荣誉，丝毫不追求智慧和真理，也不净化你的灵魂，你难道不觉得羞愧吗？”我不知道什么是死亡，也许这是一件好事，我也绝不惧怕死亡。但

是，我清楚地知道，放弃自己的信念是错误的；我宁愿做一件好事，也不愿做一件坏事。

苏格拉底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探索真理和真知的伟大事业，他的死亡更好地诠释了他的追求。

现在，你可以经常读到或听到关于各种问题的讨论和争论，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其他的主义。整个世界承载着太多的苦难与不公，人们对此强烈不满，并在积极寻求改变。柏拉图曾思考过有关政府的各种问题，并对此写了不少东西。因此，即使在那个时期，人们也在思考着如何构建一个国家的政府和社会体系，以此给人民带来更大的幸福。

柏拉图在逐渐老去的时候，另一个有名的希腊人站在了历史的前沿，他就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他曾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私人教师，亚历山大对他的事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样为各种哲学问题所累。他更感兴趣的是观察自然，了解自然的各个方面；人们称之为“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或者现在也被称为“科学”。因此，亚里士多德可以算是一位早期的科学家。

我们一定要谈谈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了解一下他那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但是，这个话题要明天再谈了，我今天已经写了很多内容了。

今天是预示春天来临的春日节（Vasanta Panchami）。短暂的冬天过去了，空气里没有了刺骨的寒冷。越来越多的鸟儿飞翔在天空，纵声高唱。也就是在15年前的今天，我和你的妈妈在德里结婚了！

17 ——一个著名的征服者，却又是一个自负的年轻人

在上一封信里和以前的信中，我提到了亚历山大大帝。我曾说过他是希腊人，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实际上他是马其顿人（Macedonian），他的国家马其顿位于希腊北部。马其顿人在很多方面和希腊人相似，你也许会认为他们是希腊人的旁支。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二世（Philip II）是马其顿的国王，他能力卓著，使这个小国日益强大，还建立了一支高效的军队。亚历山大被称为“大帝”，并且在历史上很有名气。但是实际上，腓力二世的励精图治为亚历山大日后的伟业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是否是一个伟人，这是个颇有争论的话题。他肯定不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但是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名震两大洲，并且被认为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征服世界的人。在遥远的中亚的中心地区，人们至今还在以“伊斯坎达尔”（Iskandar）这个名字纪念他。不管亚历山大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他的名字所带来的魅力永远地留在了历史上。许多城市都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有的城市至今仍然矗立着，其中最伟大的城市就是位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

亚历山大在年仅20岁的时候就登基当上了国王。他雄才大略，一心想要成就帝国的伟业，渴望率领大军远征宿敌波斯。他的父亲已为他建立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希腊人既不喜欢腓力二世，也不喜欢亚历山大大帝，但他们的赫赫威名和强盛的国力使希腊人备感威胁，所以他们认可了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作为希腊各城邦军队的总指挥，而这支军队将远征波斯。希腊人因此向这个冉冉升起的新势力低下了头。希腊城邦底比斯拒不服从亚历山大的统治，于是亚历山

大以残忍野蛮的方式攻陷了底比斯，摧毁了这座有名的城市；底比斯的大量建筑物被拆毁，大批底比斯人惨遭屠杀，还有数以千计的底比斯人被卖作奴隶。他的这番野蛮残暴行径震慑了希腊其他城邦。但是，亚历山大在一生中所犯下的种种野蛮暴行并不会让我们感到钦佩和赞赏，反而让我们感到恶心和厌恶。

亚历山大率领大军，毫不费力地征服了波斯王统治下的埃及，并打败了波斯王薛西斯的继任者大流士三世（Darius III）。此后，他再次远征波斯，再次打败了大流士三世。据说，出于对薛西斯焚毁雅典城的报复，亚历山大毁掉了“王中之王”大流士三世的精美宫殿。

近公元1000年，波斯诗人菲尔多西（Firdausi）用波斯文写下了一本古老的史书——《列王纪》（*Shahnamah*，又名《王书》），是一部关于波斯诸王的编年史。这本书以梦幻般的文笔描述了亚历山大和大流士三世之间的种种战役。书中描写了大流士三世在一次战役失败后向印度求援的事情。他给印度西北部的一位国王波罗斯（Porus）“送去了一匹有着风一般速度的骆驼”，但是波罗斯没有向他提供任何援助。不久以后，大流士三世只得独自面对亚历山大军队的猛攻。我们可以有趣地发现，在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一书中，有大量文字叙述了波斯王和贵族们使用印度制造的刀剑和匕首的情形。由此可以证明，在亚历山大时期，印度已经能利用优质钢材锻造出刀剑，并在其他国家大受欢迎了。

从远征波斯伊始，亚历山大东征西伐，先后攻陷了赫拉特（Herat）、喀布尔（Kabul）和撒马尔罕，一直到了印度河的上游。他在这里遇到了第一个起兵抵抗的印度统治者。希腊历史学家们按照希腊惯例，称这个印度王为“波罗斯”，他的真实姓名可能与这个名字相似，但我们无处考证。据说，由于国王波罗斯英勇善战，亚历山大的军队无法轻易攻克这个国家。波罗斯身材高大，风度翩翩，他的英勇和风度给亚历山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在他战败后，亚历山

大仍让他负责管理他的国家。但是，自从波罗斯归顺后，他就成了一名管理希腊城邦的总督。

亚历山大率领部队经西北的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进入了印度，穿过了位于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以北的塔克西拉（Taxila）。如今，你还能看见这座古城的遗迹。在打败了波罗斯后，亚历山大似乎想朝着恒河向南进发，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沿着印度河流域返回了自己的祖国。让人感兴趣的是，如果亚历山大向印度腹地继续深入的话，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会继续常胜不败吗？又或者印度的军队能战胜他吗？也许像波罗斯这样处于印度边境前沿的其他国王也会奋力抵抗亚历山大吧。位于印度中部地区的那些更强大的国家也许完全有实力抵抗亚历山大的进攻。但是，无论亚历山大的想法如何，他的士兵们替他做出了决定。士兵们已疲惫不堪，厌倦了多年来四处征伐。也许是印度士兵的骁勇善战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不想再度承受失败的危险。无论原因是什么，这支军队坚持要返程，亚历山大也只得同意收兵。然而，由于军队严重缺乏食物和饮水，返程之路变成了一条灾难之路。不久之后，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3年在巴比伦离开了人世。从开始远征波斯一直到去世，亚历山大都没能再次见到他的故乡马其顿。

亚历山大死时年仅33岁。这位“大帝”在其短暂的一生里成就如何呢？他赢得了几场漂亮的战役，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将领。但是他自负虚荣，甚至有时残暴无道。他几乎把自己当成了神。在一时激愤或心血来潮的时候，他杀死了几位挚友，还和城市居民们一起共同摧毁了好几座伟大的城市。他没有给他的帝国留下任何有形的财产，甚至连畅通的道路都没有。他的出现和去世就像天边的流星一样稍纵即逝，除了世人的纪念以外，什么都没有留下。在他死后，他的家人相互残杀，他的帝国也分裂了。他被称为世界的征服者，据说他曾坐下来放声痛哭，因为对他而言，已经没有可以再征服的地方了。但是，

除了印度西北部那一小片地区以外，亚历山大并没有征服整个印度；在那个时候，中国是一个强国，亚历山大根本就没有靠近过中国。

亚历山大的部将们在他死后瓜分了他的帝国。大将托勒密（Ptolemy）接管了埃及，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府，开启了一个新王朝。由此埃及成了一个强国，亚历山大港是它的首都；亚历山大港成了一座以科学、哲学和教育而著称的伟大城市。

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的部分地区落入了另一位将军塞琉古（Seleucus）的手中。他还统治了亚历山大曾经征服过的印度西北部的部分地区。但他无法继续统治管理这片地区，在亚历山大死后不久，希腊占领军就被赶出了印度。

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来到了印度。他的到来仅仅是一次突袭，对印度的影响微乎其微。有人认为亚历山大的入侵有利于开启印度和希腊之间的联系。但事实上，早在亚历山大到来之前，就已经有了连接东方和西方的交通大道。印度和波斯还有希腊长期保持着交流和联系。当然，由于亚历山大的到来，也加速了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和往来，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融合。

由于亚历山大的入侵和离世，在印度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帝国，这就是孔雀帝国（Mauryan Empire），这是印度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期。我们在后面将展开篇幅来谈谈孔雀王朝的历史。

18 ——旃陀罗笈多·孔雀和《政事论》

我在之前的一封信里提到了摩揭陀国，这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位于现在的比哈尔邦境内。这个国家的首都是巴连弗邑，即现在的巴特那。在我们目前谈论的这个时期里，统治摩揭陀国的国王们都来自难陀（Nanda）王朝或难陀家族。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印度西北部时，一名难陀王正统治着巴连弗邑。提到这位国王就不得不谈到一个年轻人，他叫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旃陀罗笈多非常聪慧，精力充沛，且有着雄心壮志。难陀王认为他过于聪明，且不喜欢他的所作所为，于是将他驱逐到了国外。旃陀罗笈多一路向北来到了塔克西拉。他前往此处的原因也许是受到了亚历山大大帝和希腊大军的故事的吸引。与他随行的是一名具有卓越能力的婆罗门，他的名字叫维斯努笈多（Vishnugupta），他也叫考底利耶（Chanakya）。这两个年轻人旃陀罗笈多和考底利耶可不是愿意向命运低头的温顺谦卑之辈，在他们身上一切皆有可能发生。他们的脑子里装满了雄心勃勃的计划，他们想一直向前，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也许，旃陀罗笈多心醉神迷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荣耀，也想效仿他。而考底利耶就是帮助他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完美的朋友和幕僚。这两个年轻人睁大了双眼，非常小心谨慎地观察着塔克西拉的局势。终于，他们等到了时机。

不久，他们的机会就到了。亚历山大大帝逝世的消息一传到塔克西拉，旃陀罗笈多就知道行动的时机到了。他组织了一支起义大军，很快向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希腊驻军发起了进攻，并把他们赶出了塔克西拉。占领塔克西拉后，旃陀罗笈多和他的联军又向南挺进，直至巴连弗邑，打败了难陀王。此时正是公元前321年，也就是在亚历山大大帝逝世五年以后。从此以后，印度进入了孔雀王朝执政时期。我们

不太清楚为什么旃陀罗笈多被称为孔雀。有人认为是因为他母亲的名字是“Mura”（穆拉），与“Mauryan”（孔雀）发音相似；还有人认为是因为他的外祖父是替国王饲养孔雀的管理员，而且“Mauryan”一词就来自梵文“mayura”。无论“孔雀”一词有何来历，世人都知道他的全名是旃陀罗笈多·孔雀（Chandragupta Maurya），以此与另一位有名的旃陀罗笈多相区别，而后者是数百年后印度历史上又一名伟大的统治者。

《摩诃婆罗多》和其他古老的书籍与传统故事告诉了我们关于统治整个婆罗多（Bharata）注的伟大帝王们——查克拉瓦蒂诸王（Chakravarti Rajas）注的事迹。但是，我们并不十分清楚那个时期的历史，也无法知道当时的婆罗多或印度次大陆（Bharatavarsha）的疆域范围。流传至今的故事有可能夸大了古代统治者们的能力。然而，也许在印度历史上，我们发现的第一个建立了强大且幅员辽阔的帝国的君主就是旃陀罗笈多·孔雀。我们会发现，那是一个非常先进且强盛的国家。显然，这样的一个政府和国家是不可能突然出现的，它一定是经过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多样化发展过程，这不仅是一个合并了诸多小国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融合了先进的统治管理理念的过程。

在旃陀罗笈多统治期间，亚历山大大帝的部将塞琉古继承了帝国的部分地区，统治的疆域范围从小亚细亚诸国一直延伸到了印度的部分地区。塞琉古亲率大军横渡印度河侵入了印度。很快他就会为他的鲁莽行为感到后悔。旃陀罗笈多重创了塞琉古率领的军队，迫使他沿来时的路退了回去。此次入侵，塞琉古不仅一无所获，还被迫割出部分疆域给旃陀罗笈多，包括犍陀罗的部分好地，即现在的阿富汗，还有喀布尔和赫拉特。旃陀罗笈多还迎娶了塞琉古的女儿。由此，他的帝国疆域覆盖了整个北印度和阿富汗的部分地区，从喀布尔到孟加拉，从阿拉伯海（Arabian Sea）到孟加拉湾，只有南印度还没有被纳入他的统治范围。这个伟大帝国的首都就是巴连弗邑。

塞琉古派遣了一名使节代表他前往旃陀罗笈多的宫廷，这名使节就是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他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关于他出使孔雀王朝的有趣记录。但是，我们还有另一些更有趣、更翔实的关于旃陀罗笈多的记录资料，这就是考底利耶（Kautilya）的《政事论》（*Arthashastra*）。这位考底利耶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在上文提到的那个人维斯努笈多。《政事论》一书名字的梵语意思是“财富的科学”。

《政事论》包罗万象，对多个领域展开了论述和讨论，内容极为丰富，我很难给你做详细的讲解。它系统阐述了国王的权责、大臣和幕僚们的职权、政府各部门和委员会的职能、各级城镇和乡村政府的职能，还深入探讨了贸易与商业、法律法规和法院权责、社会习俗、妇女权利、孤老残障人士的救助、结婚与离婚、税收政策、陆军和海军军务、战争与和平、外交政策、农业政策、纺织制造、手工业、通关政策，甚至还涉及了监狱等。我可以继续向你逐一列举出这本书涉及的每一个主题，但我不想让这封信全是考底利耶著作的章节目录。

国王在加冕礼上从人民的手中接过王权的那一刻起，就要宣誓为人民服务。他必须向人民发誓：“如果我压迫你们，我的人民，我将被天上神灵、被万物生灵、被后代子孙所抛弃。”国王被赋予了处理日常事务和国家事务的权力。他必须时刻准备着处理紧急事务，因为公共事务是不能延误的，也不能等着国王心情愉悦时才去处理。“如果国王精力充沛，他的臣民也会干劲十足。”“国王的快乐得建立在臣民的快乐和福祉之上。国王不能把那些只能愉悦自己的东西当成好东西，他应该把那些让臣民高兴的东西看成是好东西，不管它们是什么。”国王们正在我们的世界里慢慢消失，所剩无几，仅存的君主们也将很快地消失了。然而，让人感兴趣的是，古印度的王权理念是为人民服务的。国王没有神授之权，也没有专职皇权。如果国王言行失当，那么他的人民就有权推翻他，并推举新的国王。这就是当时的治

国思想和理念。当然，也有很多国王没有贯彻实施这个完美的理念，还愚蠢地把不幸和灾难带给了他们的国家和人民。

《政事论》还同样强调了“雅利安人绝不为奴”这一古老的原则。显然，当时仍有来自国外或者是本国的奴隶。但是，就雅利安人而言，他们绝不会成为奴隶，而且还受到了精心的保护。

孔雀王朝的首都巴连弗邑是一座宏伟壮丽的城市，沿着恒河延绵长达9英里。城市有64个主要城门和数百个小城门。房屋建筑主要是用木材建成，为了防止火灾而采用了精心设计的预防措施。主要街道上总是摆满了装满水的器皿。每一个家庭也要让这些器皿时刻装满水，以便火灾突发时能及时派上用场，还要准备好梯子、挂钩和其他必要的工具。

考底利耶制定了一条针对所有城市的规则，这个肯定会让你感兴趣的。无论谁在街上扔垃圾，都将被罚款。如果有人在街上泼洒泥浆和污水，也要被罚款。如果这些规则得以强制实施，那么巴连弗邑和其他城市一定会很干净、整洁、卫生。我希望我们的市民们也能遵守这些规则！在巴连弗邑，市议会负责管理城市的各项事务，委员由人民选举产生。共有6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有5名成员，委员人数共30人。这些委员会负责管理城市的工业和手工业、游客和朝圣者的组织安排、出生率和死亡率（为了征税）、制造业和其他事务。整个市议会负责管理卫生、财政、供水、园林和公共建筑。

村务委员会负责管理司法和上诉法院。同时还实施了针对饥荒救助的特殊措施，全国所有的仓库里时刻有一半的物资是为饥荒时期而准备的。

这就是2200年前在旃陀罗笈多统治和考底利耶辅佐下的孔雀王朝。我在前面也提到了考底利耶和麦加斯梯尼。这段历史会让你对那个时期的北印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个帝国到处都是充满活力的人

民，从首都巴连弗邑到其他大城市，再到数以千计的城镇和乡村。全国各地之间都修建了交通大道，彼此相连。还修建了主要的“御道”（Rajapatra），即国王的专用通道，这些通道横贯巴连弗邑，直抵西北边境。还设有专门的灌溉部门，负责管理运河，航运部门负责管理港口、渡轮和桥梁以及大量来往于各地的各类船舶。在当时，已经有船舶跨海远航，到达了缅甸和中国。

旃陀罗笈多卒于公元前296年，一共统治帝国24年。我们将在以后的信里继续讲述孔雀王朝的故事。

---

1. 婆罗多，这里指古印度。——译者注
2. Raja，拉甲、罗阇（指印度的酋长、王公或贵族，也指马来、爪哇等地的酋长、首领等）。——译者注

19 ——三个月啊！

自上一封信到今天，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了。大约有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三个月里充满了悲伤、困难和压力；在这三个月里，印度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我们家发生的变化。印度已经暂时停止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Satyagraha，Civil Disobedience），但是要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依然非常困难。我们的家庭已经失去了一位至爱的领袖，他给予了我们力量和鼓励，在他的庇护和关爱下我们茁壮成长，并学会了为印度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他就是我的父亲。

我清楚地记得在奈尼监狱的那一天。那天是1月26日。和往常一样，我坐下来给你写信，打算谈谈过去的历史。就在那一天前，我写信告诉你关于旃陀罗笈多和他建立的孔雀王朝的历史，我当时向你保证我会继续写孔雀王朝和旃陀罗笈多·孔雀的继任者的故事，还有众神的宠儿阿育王（Ashoka the Great）的故事。阿育王的出现像印度夜空里一颗闪耀的明星，他的逝去给世人留下了不灭的回忆。一想到阿育王，我就不由得思绪万千。我的思绪被拉回到现在，不禁想到了1月26日。那天，我拿着纸和笔坐下来准备给你写信。那一天对我们而言是伟大的一天，因为一年前的那一天是印度宣布独立（Purna Swaraj）的日子。整个印度，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举国上下都在共同欢庆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的到来，数百万民众宣誓着、高喊着独立了。从那时起，一年过去了，在过去的一年里印度经历了斗争、磨难和胜利，又再次欢庆这个伟大的节日。我坐在奈尼监狱的第6号监舍里，我想到了整个国家到处是人民的集会和游行，还有警棍的殴打和军警的逮捕。想到这一切，我内心充满了骄傲、愉悦和悲痛，突然我的沉思被打断了。监狱外传来了消息，爸爸病得很严重，我被

立即释放，前去探望他。我忧心忡忡，忘记了之前在想什么，把刚起笔写的信放在了一旁，马上离开奈尼监狱，前往安纳德巴旺。

在父亲离世前，我在他身边陪伴了10天。整整10天，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们一直看着他忍受病痛的折磨和痛苦的挣扎，看着他勇敢地与死神搏斗。他在一生中经历了无数的战斗，多数时候都是以胜利告终。他不知道什么是投降，甚至敢于直面死亡，从不放弃。当我看着他这最后一次与病魔战斗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巨大的痛苦和悲伤，却无力给我深爱着的人任何帮助。此时，我想起了很久以前读过的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写的一个故事，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人若无意志薄弱之缺陷，则绝不会臣服于天使，也不会屈服于死神。"[注]

2月6日凌晨，父亲离开了我们。他的遗体被裹上了他最心爱的国旗，我们将他的遗体从勒克瑙抬到了安纳德巴旺。短短的几小时，父亲的遗体就被烧成了几捧灰烬，恒河之水将这珍贵的骨灰带进了大海。

数百万民众为他哭泣悲痛，但是，作为他的孩子，他的肉中肉、骨中骨的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新的安纳德巴旺同样作为他的子女，像我们一样也受到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它又该做些什么呢？它看上去多么寂寞和荒凉啊，它的灵魂仿佛都已经消失了。我们沿着长廊轻轻地走着，害怕惊扰了他，心里默默地怀念着建造了长廊的父亲。

我们为父亲的离去感到很悲伤，每走一步都要思念父亲。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哀痛之情似乎没有丝毫的减退，他的离去还是让我们难以忍受。但是，我想父亲是不希望我们这样的。他一定不希望我们沉溺在悲伤之中，而是希望我们能够直面哀痛，就像他直面并战胜一切困难一样。他希望我们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当伟大的事业还需要我们并召唤我们的时候，当印度的自由伟业还需要我们去努力争

取的时候，我们又怎能放任自己沉溺于这无用的悲痛之中呢？父亲为这一伟大事业而离开我们了，但我们应该继续活下去，继续奋斗，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应为之做出牺牲和奉献。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他的子女，我们的血液里充满了他的激情、力量和决心。

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眼前就是深蓝色的阿拉伯海，一眼望不到头。在遥远的阿拉伯海的对岸，就是印度海岸了。我不由得想到，这是一片广阔得几乎无法估量的疆域啊，而我目前却处在这座有高高围墙的奈尼监狱的一间小小的监舍里。我给你写的那些信都是在这座监狱里完成的。远处的地平线轮廓是那么明显，仿佛海天连成了一线；但是在监狱里，犯人目光所及的地平线却是四周环绕的墙头。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也曾在监狱里待过，而今天却能够走出去，呼吸着外面更加自由的空气。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同伴仍然待在狭小的监舍里，看不到大海、大地和地平线。印度仍然处于桎梏的囚笼中，自由还没有到来。如果印度没有自由，那我们的自由又有什么价值呢？

---

1. 译文引自《爱伦·坡短篇小说集》，陈良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译者注

20 ——阿拉伯海

我们要乘坐克拉科维亚号（S. S.“Cracovia”）从孟买到科伦坡（Colombo），这真是奇怪！我还清晰地记得大约四年前我在威尼斯等待克拉科维亚号抵达的情形。当时爸爸在那艘船上，我去威尼斯见他，把你一个人留在了瑞士的贝克斯（Bex）的学校里。几个月后，爸爸又乘坐着克拉科维亚号从欧洲返回了祖国，我在孟买见到了他。爸爸在那趟旅程中的一些旅伴现在和我们在一起，他们有很多关于我爸爸的故事。

我昨天写信告诉了你过去三个月里发生的种种变化。我想让你记住最近几周发生的一件事，因为整个印度将会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记住这件事。不到一个月前，一位英勇的印度战士在坎普尔市（Cawnpore）牺牲了。他就是加内什·申卡·维迪雅迪（Ganesh Shankar Vidyarthi），他为拯救他人生命而牺牲了自己。加内什是我的亲密朋友，是一位品德高尚、大公无私的同志，能与他一起共事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上个月在坎普尔市爆发了疯狂的骚乱，印度同胞们相互残杀。加内什冲进了骚乱的人群，他没有与任何一个同胞打斗，反而是去营救他们。他救下了数百名同胞的生命，却没能救下自己的性命。他毫不关心自身的生命安危，却正是死在了那些他全力拯救的同胞的手中。坎普尔市和北方邦失去了一颗耀眼的明星，我们很多人失去了一位睿智的亲密朋友。但是，他死得荣耀，因为他平静地面对着暴徒的疯狂，没有丝毫地退缩，即使身处危险和死亡之中，他唯一想的就是如何拯救他人！

充满变化的这三个月啊！在浩瀚的时间长河里，这只是沧海一粟；在一个国家的历史里，这也只是短暂的一瞬。仅仅在三周前，我

还前往了印度河流域的信德省（Sind），参观了摩亨佐达罗的遗迹。这一次你没有与我同行。我看到了这座重现天日的伟大城市，这座城市里有坚固的砖房和宽敞的大路，人们认为它是在6000年前修建的。我还看到了被挖掘出土的美丽珠宝和陶器。我几乎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男人和女人都穿戴着艳丽的服饰，盛装打扮地走在街头巷尾；孩童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尽情玩耍；集市上货物琳琅满目，人们在尽情地做买卖，寺庙里回荡着悠扬的钟声。

5000年来，印度一直在不断地发展，见证了许许多多的变化。有时我在想，我们的祖国母亲是如此古老又如此年轻美丽，当它看见它的孩子们急躁、忧虑、高兴和悲伤的情绪仅仅维持了一天就消失了的时候，它是否会对此一笑置之？！

21 ——一个假期和一个梦幻之旅

从我在奈尼监狱里开始给你写信讲述过去的历史算起，已经过了14个月的时间了。3个月后，我在阿拉伯海又给你写了两封短信。然后，我们乘坐克拉科维亚号着急地赶到了兰卡（Lanka）(注)。我在写信的时候，浩瀚的大海展现在我的眼前。我的双眼如饥似渴地注视着它，看也看不够。后来我们来到了斯里兰卡，在这里我们度过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假期；在这一个月里，我们尽力去忘记我们的烦恼和忧虑。我们来往于几个最美丽的岛屿，想领略其极致之美，欣赏丰富的自然美景。康提（Kandy）、努沃勒埃利耶（Nuwara Eliya）和阿努拉德普勒（Anurdahapura）等地有不少古老而伟大的遗迹和文物。一想到我们旅行去过的这几个地方，我的内心就无比地愉悦！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喜欢一边用一千只眼注视着你，一边畅想着那凉爽的热带雨林及其缤纷的生命：那美丽的槟榔树，是那么纤细、挺拔和真实；那数不清的椰子；那长满了棕榈树的海滨，那一片美丽的祖母绿与碧海蓝天交织在一起；那闪闪发光的海水嬉戏拍打着海岸，微风拂过棕榈叶发出的沙沙的声音。

这是你第一次在热带地区旅行，我也是第一次，但是我在很久之前曾有过短暂的停留，记忆中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了，所以这一次对我而言也是一次新的体验。因为我怕热，所以在以前我是不愿意来这儿的。我更喜欢高山、大海，尤其是积雪和冰川。但是，通过这次短暂的锡兰之旅，我感受到了热带地区的迷人魅力。我甚至渴望再次回来，希望能再次和他们交朋友。

我们在锡兰的假期很快就结束了。我们穿过了一处狭窄的海域，来到了印度的最南端。我们曾经去过肯亚库玛利（Kanya-Kumari），

你还记得吗？据说，处女女神（Virgin Goddess）就居住在那里，她守护着那个地方，但是西方人天才般地扭曲和讹用了本来的名字，称这个地方为科摩林角（Cape Comorin）。我们坐在印度母亲的脚下，看着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的交汇处，想象着它们这是在向印度表达由衷的敬意啊！这儿有着如此不可思议的平静，我思绪纷飞，不由得飞到了几千里外的印度的另一端。那儿是终年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脉，那儿也是一片平静安宁的处所。但是，位于这大海与冰川之间的地区却是纷争冲突不断，到处充满了苦难和贫穷。

我们离开科摩林角，向北继续旅行。

我们穿过了特拉凡戈尔（Travancore）和科钦（Cochin），经过了马拉巴尔的海洋回流区。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啊，我们的船在月色中沿着树林茂盛的海岸慢慢地向前滑行着，就像在梦中一般！然后，我们先后经过了迈索尔（Mysore）、海得拉巴（Hyderabad）和孟买，最后抵达了阿拉哈巴德。此时已经过去了9个月，正值7月。

但是在这段日子里，印度境内的所有大道都指向了同一个终点；所有的旅程，无论是梦境的还是现实的，终归是以监狱为终点！所以，我又回来了，又回到了这个我熟悉的高墙内。虽然你也许没法收到我的信，但是我又有了充足的时间来想念你，继续给你写信。斗争又开始了，我们的人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将继续前进，为了自由而战，为了革除这个国家贫穷的诅咒而战。但是，赢得自由是很难的；自由就像神灵一样，会一如既往地要求它的追随者们为之牺牲、奉献。

今天，我在监狱里已经度过了整整三个月了。正好是在三个月前的今天，也就是12月26日，我第6次被捕入狱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重新开始给你写信，但是你要知道当脑子里装满了现在发生的事情时，有时候就很难想到遥远的过去。我需要花点时间才能在监狱里静下心来，不去担心外面发生的事情。我应该定期给你写信。但是，我现在

被关在另一座监狱里，我不喜欢这样的变化，它有点妨碍我的写作。我看到的地平线比以往更高。我眼前的监狱围墙至少在高度上和中国的长城有某种联系！这个围墙大概有25英尺高，每天上午太阳要多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才能越过高墙，照耀在我们身上。

监狱的高墙暂时限制了我们的视野。但是，只要想到蔚蓝色的大海、起伏的群山和延绵的沙漠，以及10个月前你、你的妈妈和我在一起度过的那一段梦幻般的旅程，我就会高兴不已，现在看来是多么不真实啊。

---

1. 兰卡是锡兰的旧称。

22 ——人类的生存斗争史

让我们重拾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回顾一下曾经的岁月吧。那是一张交织纠缠的大网，很难轻松解开，也很难看清楚整体。我们很容易在某一个具体的结点上迷失了自己，对这些历史点的关注程度，往往超过了它应该受到重视的程度。相比其他国家的历史而言，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国家的历史远比其他国家的历史更加辉煌灿烂，更值得去研究和学习。我曾经提醒过你，现在再提醒你一次，人们是很容易陷入这样的思维陷阱里。事实上，我给你写这些信就是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然而，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正在犯这样的错误。

如果我接受的教育本身就是有缺陷的，如果我学习的历史本身就是颠倒混乱的，那我能怎么办呢？在这与世隔绝的监狱里，我希望通过更多的学习来纠正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许做到了。但是，我的脑子里装满了青少年时期学到的各种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知识，就像挂满了图画的艺术长廊，我无法将它们从我的脑海中彻底摒除。这些不完整的知识扭曲了我的历史观，也束缚了我的思想。因此我写信的时候就会经常犯错误。我在信中写下了很多不重要的历史事件，却忘记了把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写下来。但是，这些信件是不能代替历史书籍的。这些信件只是充当了我们之间交流的桥梁，即使我们相隔1000英里，即使高高的围墙也不能将我们分开。至少我是这么想的，这也让我心情非常愉快。

我情不自禁地写信告诉了你很多在历史书中占据了较长篇幅的历史名人。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有趣经历，帮助我们了解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但是，历史不仅仅记载伟人的事迹，也不仅仅记载帝王将

相们或者此类人物的事迹。如果历史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历史也许就不再是历史了，因为那些曾在历史舞台上趾高气扬的君主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事实上，真正的伟人并没有要求登上宝座或戴上桂冠或佩戴珠宝或授予头衔，以此来向世人炫耀自己。而帝王诸侯们除了他们的君主身份、头衔和地位以外，其实是一无所有的，他们只有穿戴上了代表他们自己身份的服饰才能掩盖其赤裸裸的本质。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被这些外在表象欺骗和蒙蔽了，都犯下了这样的错误："将头戴王冠的人看成高贵之人，他只不过是一位国王而已。"

真正的历史不应只是零星分散的几个人物的历史，而应是构成一个国家的人民的历史，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了生活必需品和财富，他们以上千种不同的方式在生活，同时也在影响其他人。包括了普通大众的历史才是真正有吸引力的历史。历史是人类经历漫长岁月的一部抗争史，人类与大自然及自然万物搏斗，与野兽和丛林搏斗；最后一点，也是最困难的一点是，人类还要与那些为了自身利益去压迫剥削他人的少数人展开搏斗。

历史也是人类的生存斗争史。为了生存，当天气寒冷时，某些物品如食物、住所和衣服就成了必需品，因此控制必需品的人就能成为其他人的统治者。统治者之所以有权力，就是因为他们占有或控制了某些生活必需品，这种控制使他们拥有了用饥饿来使他人屈服的权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相对数量较少的小部分群体可以剥削数量较多的大众群体；同时，少数人可以不劳而获，而多数人却劳而无获或者少获。

原始人先是独自狩猎，然后逐渐形成了家庭，整个家庭一起劳作。很多家庭在一起合作劳动，就逐渐形成了村落，然后不同村落的劳动者、商人和工匠联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手工业者群体。社会组成单位就这样逐渐形成发展起来了。一开始，社会组成单位只是个人，

只是以个体为单位的原始人，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然后，家庭构成了较大的社会组成单位，进而是村落，再者是村落群。为什么这样的社会组成单位能够发展呢？答案是为了生存。生存的压力推动了社会组成单位的发展和合作，因为合作可以抵御共同的敌人，在战斗中集体合作明显比个体防御或个体进攻更加有效。甚至在劳动中，集体合作的作用也更大。相较于个体劳动而言，人们可以通过集体劳动生产出更多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这种劳动合作就意味着经济个体得到了发展和进步，从只为自己狩猎的个体原始人发展到了较大的群体。事实上，经济体的发展可能源自人们为了生存而不断奋斗的动力，最终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组成单位的发展。穿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发展交织着几乎无止境的冲突和苦难，甚至有时候还会倒退。但是，不要认为这样的发展就必然意味着世界一直在飞速进步，或者说世界已经发展成了一个使人更加幸福的世界。也许，如今的世界相较于以前要好一些，但是离完美仍有相当长的距离，世界各地仍充满了苦难。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贸易和商业往来越来越多。物物交换取代了相互赠予，然后货币的出现给各行业的交易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很快，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为金币或银币这样的支付手段使交易变得容易了。之后，甚至货币也不再经常使用，人们开始使用某种象征物作为交易手段。人们认为用一张能够承诺付款的纸就是很不错的选择。因此出现了纸币和支票。这就意味着出现了凭信用进行的交易。信用的出现使贸易和商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你也知道，支票和纸币现在已经使用得非常广泛了，聪明人是不会随身携带大量金银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历史的发展走出了晦暗的过去，人们生产的物品越来越多，出现了专业的生产分工，人们相互交换货物，从而促进了贸易的发展。我们还看到，更新更好的交通运输方式也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蒸汽机出现之后的近百年时间里。随着生产的发展和

世界财富的增加，至少有些人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我们所谓的文明就这样得到了发展。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人们在吹嘘我们这个开明而进步的时代，吹嘘现代文明的奇迹和伟大的文化科学。然而，穷人依旧贫困潦倒，苦不堪言；大国之间仍在相互征战，数百万生灵涂炭；同我们国家一样的大国遭到了外来民族的统治。如果我们在自己家里都不能拥有自由，那么对我们而言什么才是好的文明呢？但是，我们现在正在争取我们的自由。

生活在如此动荡的时代里，我们是多么幸运啊！我们每个人都能投身于这场大冒险之中，能目睹印度和全世界的变化发展过程！你是一个幸运的女孩，你恰好出生在推动俄国迈入新纪元的革命时期。现在，你能亲眼见证你自己国家的革命，不久的将来你也许还会参与其中。全世界到处都是灾难和变革。在远东（Far East），日本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在西方，事实上应该是全世界，旧制度摇摇欲坠，到了崩溃的边缘。口口声声说要裁军的那些国家却在相互猜疑，各自加强军备。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暮色，它在全世界作威作福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当它消失的时候，因为它注定要消失的，与之并存的一切邪恶都将一起消亡。

23 ——回顾

在历史的旅途中，我们已经走了多远了呢？我们简要谈论了埃及、印度、中国和克诺索斯的古代历史。我们看到了埃及那历史悠久且令人惊叹的文明，它缔造了埃及金字塔，后来却逐渐腐朽衰落了，现如今成了一个空落落的影子，给世人仅留下了一些遗迹和符号，其昔日的辉煌已不见踪迹。我们还看到来自希腊大陆的种族毁灭了克诺索斯文明。我们粗略了解了印度和中国那模糊而遥远的历史开端，由于资料有限，我们无法获得更多的信息。但是我们知道，这两个国家在那个时代已有高度发达的文明了。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它们都在文化上与自己数千年前的古老传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美索不达米亚，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帝国兴盛繁荣一时，随后又消于无形了。

我们还谈到了公元前五六世纪年时出现在各个国家的许多伟大思想家。印度的思想家有释迦牟尼和摩诃毗罗，中国有孔子和老子，波斯有琐罗亚斯德，希腊有毕达哥拉斯。我们看到释迦牟尼反对印度旧吠陀教的僧侣特权和现有体制，因为他发现各种迷信仪式和宗教礼拜欺骗迷惑了民众，他还反对种姓制度，宣扬众生平等。

然后我们来到了西方，在亚洲和欧洲的交界处，了解了波斯和希腊相互交织的一段历史时期，了解了“王中之王”大流士统治下的波斯帝国是如何把疆域一直扩张到了印度的信德省的；波斯帝国试图吞并小小的希腊，但令人惊讶的是，希腊小国奋起反击抵抗，最终取得了胜利。之后，我向你讲述了古希腊璀璨而短暂的历史，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众多天才和伟人，他们创作出了最具美感的文学与艺术精品。

希腊的黄金时期并没有持续太久。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征伐中将希腊的盛名广为传播，但是随着他的四处征伐，希腊文化却逐渐没落了。亚历山大大帝灭掉了波斯帝国，甚至以征服者的姿态跨过了印度边境。无疑，他是一名伟大的将领。但是历史围绕着他的名字杜撰出了无数的传说和故事，他因而在历史上获得了本不应得的声望。只有博览群书的人才知道苏格拉底、柏拉图、菲狄亚斯、索福克勒斯和其他伟大的希腊人物，但是又有谁不知道亚历山大大帝呢？

相比较而言，亚历山大大帝做的事情并不多。波斯帝国本就垂垂老矣，摇摇欲坠，几乎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亚历山大大帝来到印度实际上是一次掠夺，没什么历史意义。如果亚历山大能活得更久一点，他也许会做一些更实际的事情。但是，他英年早逝，随后他的帝国立刻就土崩瓦解了。虽然他的帝国存续时间很短暂，但他的英名流传至今。

亚历山大大帝对东方的远征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加深了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大批希腊人来到东方，定居在旧城市里或者是建立新的殖民地。其实在亚历山大之前，东西方之间已经出现了贸易往来。但是，在他之后，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亚历山大大帝的侵略（如果真有其事）所造成的另一个可能的影响就是给希腊人带去了极大的不幸。有学者指出，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士兵把疟蚊从美索不达米亚的沼泽地区带到了希腊的低洼地区，由此疟疾四处扩散，损害了希腊人的健康，希腊民族因而逐渐衰弱了。这是造成希腊衰落的原因之一吧。但是，这仅仅是一种说法而已，没人知道其真相。

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昙花一现，但是，在这片土地上又出现了好几个小帝国。其中有托勒密统治下的埃及，还有塞琉古统治下的西亚。托勒密和塞琉古都是亚历山大的部将。塞琉古企图蚕食印度，但是令他沮丧的是，他遭到了印度人民的英勇抵抗。旃陀罗笈多·孔雀

在印度北部和中部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前几封信里，我谈到了旃陀罗笈多和他的大臣考底利耶，一位有名的婆罗门人，还谈到了考底利耶的著作《政事论》。幸运的是，这本书向我们展现了一幅2200年前的印度历史的画卷。

至此，我要结束对以往信件内容的回顾，在接下来的信里，我将要讲述孔雀王朝和阿育王的故事。事实上，14个月前，也就是1931年1月26日，我向你承诺过会谈一谈孔雀王朝和阿育王，我现在就来兑现这个承诺。

24 ——众神的宠儿阿育王

关于众多君主和王子的历史，我往往是匆匆略过。因为在他们身上，我看不到值得我钦佩或尊敬的地方。但是，我现在要谈谈一个伟大且值得钦佩的人，尽管他也是一位君主。他就是阿育王，旃陀罗笈多·孔雀之孙。赫伯特·乔治·韦尔斯（你肯定读到过有关他的一些罗曼史）在其著作《世界史纲》中是这样评价阿育王的：

> 在历史上成千上万的君主庄严、优渥、恬静、尊贵，显赫一时，而阿育王的名字在其中闪闪发光，差不多是独自放射着光芒，是一颗闪亮的明星。从伏尔加河（Volga）一直到日本，他的名字至今仍受到尊敬。中国，甚至已抛弃了他的教义的印度，还保存着他的伟大传统。今天世界上怀念他的人比听说过君士坦丁（Constantine）或者查理曼（Charlemagne）的名字的人还要多些。注

这实际上是非常高的赞誉了，而且是实至名归。只要印度人一想到这段印度史，内心就充满了一种特别的情感和愉悦。

旃陀罗笈多卒于公元前300年左右，他的儿子宾头沙罗（Bindusara）继承了王位，在他25年的统治期间似乎风平浪静。他一直与希腊化国家保持着联系。在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曾派遣使者前往宾头沙罗的王廷；在西亚，君主塞琉古之子安条克也曾来过。据说，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对外贸易。埃及人过去常常印染布料，所使用的靛蓝染料就来自印度，还有，他们包裹木乃伊的平纹细布也出自印

度。在比哈尔发现的某些古老遗迹显示出，在孔雀王朝之前就出现了某种玻璃制品。

希腊使节麦加斯梯尼来到了旃陀罗笈多的王廷，这一点你可能会感兴趣。他用文字描述了印度人对华丽服饰和美丽事物的喜爱和追求，他还特别提到人们利用鞋子来增加身高，所以高跟鞋可不完全是现代的产物。

公元前268年，阿育王继任了宾头沙罗的王位，开始统治这个领土面积涵盖了整个北印度和中印度并一直延伸到中亚地区的伟大帝国。也许，阿育王想把印度东南部和南部地区纳入帝国的版图，因此在他即位第9年时，他开始征伐羯陵伽国（Kalinga）。羯陵伽国位于印度东海岸，哈纳迪河（Mahanadi）、哥达瓦里河（Godavari）和基斯特纳河（Kistna）三河交汇处。羯陵伽国的人民英勇反抗，但是在残酷的屠杀之下，最终还是屈服了。这场战争和杀戮深深刺激了阿育王，他开始厌恶战争和战争带来的种种恶果。从此以后，他停止了征战。自此，除了印度半岛最南端的一小部分地区外，几乎整个印度都在阿育王的统治之下。其实阿育王要征服这么一小块地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他克制住了征服的欲望。根据赫伯特·乔治·韦尔斯的描述，阿育王是历史记录上唯一一位在胜利后放弃战争的军事帝王。

幸运的是，我们保存下来了阿育王的敕令，它告诉了我们他的所思所为。大量的阿育王敕令被镌刻在岩石或金属上，他的思想流传下来了，传给了子孙后代。你知道的，在阿拉哈巴德就矗立着一根阿育王石柱。在我们居住的邦内还有很多其他的石柱。

这些敕令告诉我们，对于战争和征服所带来的杀戮，阿育王由衷地感到憎恶和悔恨。他认为，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征服是征服自己，是用达摩（Dharma）的教义来征服人心。但是，我想通过引用敕令中的一段文字来告诉你这些文字是多么令人痴迷，它们使阿育王离我们更近了。

敕令写道：

当天亲仁颜大王（His Sacred Majesty）注任圣职8年后，他征服了羯陵伽国。俘虏了15万人，屠杀了10万人，死亡者高达数倍于此。

在吞并了羯陵伽国后，天亲仁颜大王开始热心于信奉正法（The La，佛法）、热爱正法和灌输正法。自此，天亲仁颜大王为征服了羯陵伽国而深感悲痛，因为征服一个未曾被征服的国家，人民就会遭到杀戮、毁灭或者奴役。这使得大王深深地感到了悲痛和悔恨。

这段敕令讲述了在征服羯陵伽国的时候，大量的人民被杀戮和被奴役，哪怕被杀戮被奴役的人的数量只有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阿育王也无法再忍受了。

然而，所有人都误解了天亲仁颜大王，认为他完全能够承受这一切，至今也可能承受。天亲仁颜大王和蔼可亲，竭力使他人的思想步入正轨。如果他不这么做，对往事的悔恨之意又会浮上心头。他希望众生皆平安、自控、平静和快乐。

阿育王进一步讲述了真正的征服是用虔诚佛法征服人心，还讲述了他通过宣扬正法在自己国家和其他遥远的国家所取得的真正意义上的胜利。

敕令中反复提到的“正法”，指的就是佛法。阿育王成了一名虔诚的佛教教徒，他竭力宣扬达摩教义，但并不强迫他人必须信仰。他只是通过寻找佛教皈依者来赢得人心。宗教信仰者中几乎很少有人像阿育王那样胸襟开阔。为了使他人改变信仰转而信奉别的宗教，有些人几乎会毫不顾忌地使用强迫、暴力和欺骗等手段。整个历史充满了

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在宗教和上帝的名义下，流血超过了其他任何名目。所以，我们要好好记住，这位伟大的印度之子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作为强大帝国的君主，他用自己的言行来改变人民的想法，使他们接受佛教。奇怪的是，有人愚蠢地认为宗教和信仰得用刀剑架在他人脖子上才能强迫他人接受。

所以众神的宠儿阿育王被称为“天亲仁颜大王”，我们可以在敕令中看到这个称号。阿育王派遣信使和使节前往亚洲西部、欧洲和非洲诸国。你还记得吧，他还派遣了他的兄弟摩哂陀（Mahendra）和妹妹僧伽蜜多（Sanghamitra）㊟前往锡兰。据说他们从加雅岛带回了神圣的菩提树的一根树枝。我们曾在阿努拉德普勒的寺庙里看到过一棵菩提树，你还记得吗？有人说这棵菩提树就是从那根古老枝丫上长出来的。

佛教在印度迅速地传播开来，因为阿育王认为达摩教义不是反复地进行空洞的祈祷和举行礼拜仪式，而是教诲民众行善，提高社会道德水平。阿育王在全国各地修建了公园和医院，还挖井修路。他专门为妇女教育制定了相关条款。他建了四座大学城：一座在遥远的北方，位于塔克西拉，临近白沙瓦（Peshawar）；一座位于马图拉，现在被英国人拼写成了穆特拉（Mutra）；一座位于印度中部的乌贾因；一座位于比哈尔邦巴特那附近的那烂陀。这四座大学城不仅吸引了印度本地的学生，还吸引了其他遥远国度的学生，从中国到西亚，这些学生把学到的佛法带回了自己的祖国。全国各地还兴建了供僧侣居住、清修的僧院，也称为“精舍”（Vihara）。显然，在巴连弗邑或巴特那有很多这样的精舍，整个邦域因僧院精舍而闻名，这个邦就是现在的比哈尔邦。但是，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这些僧院精舍不久就失去了教诲传道和思考明智的宗旨，成了人们遵循某种宗教仪式和礼拜的场所。

阿育王保护生命的热情还延伸到了动物身上。他下令专门为动物建立了医院，还禁止用动物献祭。阿育王实施的这两件事情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我们当今的时代。不幸的是，动物献祭现在仍在某种程度上盛行，而且还被认为是宗教仪式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甚至，几乎没有哪个邦设有专门为动物治病的机构。

阿育王以身作则的榜样作用和佛教的传播让素食主义开始流行起来。在以前，印度的刹帝利和婆罗门普遍都食肉饮酒，后来这种现象就逐渐减少了。

阿育王在位38年，他竭尽全力惠及众生，造福百姓。他时刻准备好处理公共事务，“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论我是在就餐，在后宫，在寝室，在厕所，在轿舆，还是在花园，宫廷呈报员都应随时向我报告有关人民的事务”。如果有任何困难紧急的事件，呈报员可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立刻向他报告，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必须为百姓的利益而工作”。

阿育王卒于公元前226年。早在他去世之前，他就成了一名和尚。

孔雀王朝时期的遗迹留存于世的极其少。但实际上，我们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遗迹是印度的雅利安文明，此刻让我们暂时略过摩亨佐达罗古迹吧。在萨尔纳特（Sarnath），靠近贝拿勒斯的地方，你可以看见美丽的阿育王石柱，几头石狮子端坐在柱头上。

阿育王时期的首都是巴连弗邑，这座伟大的城市如今已销声匿迹了。事实上，早在1500多年前，也就是阿育王逝世600年以后，来自中国的旅行者法显来到了巴连弗邑。那时，这座城市繁荣昌盛，但是以石头筑成的阿育王宫殿早已成了一片废墟。这片废墟给法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旅行记录中提到这片废墟仿佛不是人类的杰作。

宫殿巨大的石块已经消失了，未留下任何踪迹，但阿育王一生的事迹在整个亚洲大陆留传了下去。他的敕令以一种我们能理解领会的语言在向我们述说，我们依然能从中获益良多。这封信很长，也许你读着有点倦乏了，但我想以阿育王敕令中的一小段话作为这封信的结尾：

> 所有的宗教派别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值得人们尊敬。因此，一个人应以自己的言行来树立宗教的形象，同时还应服务于其他教派的人民。

1. 译文引自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吴文藻等译，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译者注
2. 在敕令中阿育王通常自称为“天亲仁颜大王”。————译者注
3. 此二人应是阿育王的子女，而不是他的兄妹。——译者注

25 ——阿育王时代的世界

我们知道阿育王派遣了使节前往遥远的国度，由此印度和很多国家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和贸易往来。当然，你肯定记得，当我谈到那个时期的种种往来和贸易时，这与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现在的人们可以轻松地乘坐火车、汽轮和飞机前去洽谈、经商。但是，在那个遥远的时期里，每一次旅行都是危机四伏，路途漫漫，只有敢于冒险和能吃苦耐劳的人才能完成这样的旅行。因此，那时的贸易往来和现在的情况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阿育王提到的“遥远的国度”是指哪些国家呢？在他统治期间，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除了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地区，我们对非洲一无所知。对于北欧、中欧、东欧，还有北亚和中亚，我们也知之甚少。我们也不知道美洲的情况，但是很多人认为美洲大陆在很早的时候就存在高度的文明了。据说很久以后，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大约是在公元15世纪。而我们知道，在南美洲的秘鲁（Peru）和周边国家早就存在高度的文明了。所以，早在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统治印度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已经有文明人在美洲大陆居住和生活了，还形成了组织有序的社会群体。但是，我们没有具体的史料能证明这一点，猜测也没太大的用处。我提到这些是因为我们往往倾向于认为文明人仅仅生活在我们听说过和读到过的那些地方。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人认为古代史只是希腊、罗马和犹太人的历史。按照他们陈旧的思维方式，他们显然认为那个时期的世界其他地方都是蛮荒之地。之后，当他们国家的学者们和考古学家们告诉他们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历史时，他们才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狭隘。所以，我们一定

要警惕，一定不能认为我们有限的认知就可以囊括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和历史。

然而，我们现在也许会认为在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期的古老文明世界主要包括了欧亚的地中海国家、西亚、中国和印度。在那个时期，中国可能与西方国家，甚至与西亚都没有直接的交往和联系，但是关于中国的种种奇思妙想在西方世界普遍盛行传播。印度似乎成了连接西方和中国的桥梁。

我们看到，亚历山大大帝逝世以后，他的帝国便开始分崩离析，被他的将领们所瓜分。这个帝国主要被分成三个部分：（1）塞琉古统治下的西亚、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2）托勒密统治下的埃及；（3）安条克统治下的马其顿。前两个国家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你要记住，塞琉古曾是印度的邻居，他贪婪地想将印度的一小部分归入他的帝国版图。但是，在旃陀罗笈多统治印度时期，印度人民英勇地抵制了塞琉古的入侵，不仅把他赶回了自己的国家，还迫使他让出了部分地区，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

马其顿则没那么幸运了，它遭到了高卢人（Gauls）和其他北方国家的掠夺和蹂躏。在马其顿只有一个地区顶住了高卢人的侵略，并保持了独立，它就是小亚细亚的帕加马（Pergamum），位于今天的土耳其（Turkey）境内。帕加马是希腊的一个小城邦，但是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它成了希腊文明和艺术的汇聚地，精美的建筑拔地而起，还修建了图书馆和博物馆。这个国家虽然面积不大，却是亚历山大城隔海相望的竞争对手。

亚历山大城是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的首都。这座大城市在古代世界闻名遐迩。雅典的荣耀已光芒大减，而亚历山大城逐渐取代了雅典，成了希腊人的文化中心。大型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吸引了大批来自遥远国家的学生，他们一起讨论古代世界思想的各种知识，包括哲学、数学、宗教和其他领域的问题。你和其他伙伴们在学校读书时肯

定听说过欧几里得这个名字，他就居住在亚历山大城，和阿育王处于同一个时期。

你也知道，托勒密人就是希腊人，但是他们接受了埃及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他们甚至崇拜一些埃及古老的神灵。古希腊神话中的朱庇特（Jupiter）、阿波罗（Apollo）和其他男女众神经常出现在《荷马史诗》中，但他们和《摩诃婆罗多》中的吠陀神（Vedic）一样，不得不以另一种方式遮盖住本来的真实面目或者改变了原有的名字。古埃及众神，如伊西斯（Isis）、欧西里斯（Osiris）和荷鲁斯（Horus），和古希腊众神发生了融合，新的神灵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并受到了顶礼膜拜。至于人们弯腰鞠躬、顶礼膜拜的对象到底是谁，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神灵的名字是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人们能对着它们进行礼拜就可以了！在诸多新神灵中，最有名的就是塞拉皮斯（Serapis）。

亚历山大城也是一个大型的贸易中心，商人们从文明世界的其他地区纷纷前往此地。我们知道在亚历山大城里有一个印度商人的聚居处。我们还知道亚历山大城的商人们在南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也有一个定居点。

离埃及不远、横跨地中海的地方就是罗马。罗马开始发展壮大起来，它注定会成为一个更伟大、更强大的国家。与罗马隔海相望的对手或敌人就是位于非洲北海岸的迦太基。在我们对整个古代世界形成某种观点之前，我们将会用一定的篇幅来介绍这段关于罗马和迦太基的历史。

在东方，中国日益强大，在西方的罗马也是如此。在我们对阿育王时期的世界形成一个正确的观点前，我们还会再次谈到中国的历史。

26 ——秦和汉

去年，我在奈尼监狱里给你写的信中提到了中国早期的历史，谈到了人们在黄河流域定居，谈到了早期的夏朝、商朝或殷朝和周朝，还谈到了中国在漫长的时间里是怎样由诸侯国逐渐发展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周朝的统治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在当时，中央集权的进程尚处于停滞状态，出现了无组织的混乱局面。事实上，各个地区的诸侯列国纷纷独立，并且诸侯国之间战火不断。这样的局面持续了数百年之久——在中国似乎每一件事都能持续数百年或上千年之久。直到其中一个诸侯秦国公推翻了衰败没落的周朝。他的子孙建立的王朝被称为秦王朝，值得说明的是“China”（中国）一词就源自“Ch’in”（秦）。

秦国于公元前255年开始了统一中国的霸业。在此之前的13年前，阿育王开始了在印度的统治。因此，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这段中国历史与阿育王处于同一个历史时期。秦国的前三任统治者在位时间非常短。公元前246年出现了第4位继任者，他能力卓越，特立独行，此人名叫嬴政。此后，他自称“始皇帝”，意思是“第一个皇帝”，人们通常记住的也正是这个名字。显然，他对自己和所处的时代有很高的评价，对以前的朝代也不够尊重。实际上，他想让百姓们忘记过去，让他们认为历史是从他这里开始的——他才是第一位伟大的皇帝！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里，相继出现的君王对他来说都是不值一提的，甚至有关这些君王的记录也要彻底清除。不仅是秦王朝出现以前的君王们，还包括以前的历史名人，关于他们的所有记录都要通通抹去。所以，始皇帝下令将一切有关过去历史的书籍，尤其是历史典籍和孔

子的著述，通通彻底焚毁，只有医药和某些科技类的书幸免于难。他在敕令中这样说道：

> 凡尊古贬今者，其亲属家眷皆处以死刑。

他严格执行了自己的敕令。私藏爱书的数百名儒生遭到活埋。作为第一位帝王，他原本应是一位善良和蔼之人！我听到太多有关印度历史的溢美之词，但是我还是不带任何情感偏倚地记住了秦始皇。有些人总是喜欢回顾历史，总是颂扬赞美历史，总是在历史中去寻找激励人心之事。如果历史能促使我们成就伟大事业，那我们无论如何都会从历史中获得启发。但是，我认为总是追溯历史似乎对任何人或任何国家而言都不是一件好事。有人曾说过，如果一个人总是想回到过去，或者总是回头看，那么这个人的眼睛一定长在脑后。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学习历史，钦佩赞赏一切值得赞美的事物，但是我们的眼睛必须向前看，我们的步伐必须向前进。

毫无疑问，始皇帝以非常野蛮的方式烧毁了历史古籍，活埋了儒生。造成的结果是，几乎他所做的一切都葬送在了他自己手中。他是第一位帝王，接着应是第二世、第三世，直到永远。然而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纵观中国的所有朝代，秦朝是持续时间最短的朝代。我以前告诉过你，很多其他的朝代都持续了数百年。在秦朝之前就有一个朝代持续了867年之久。但是秦朝的兴起和强盛，进而统治了一个强大的帝国，然后衰败、没落和覆灭，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50年之间。始皇帝本想让他的后世子孙，自他开始代代当帝王；然而，公元前209年，秦始皇驾崩，仅在3年之后，他的王朝就结束了。不久之后，孔子的所有著述典籍又重见天日，重拾了昔日的荣耀地位。

作为一名统治者，始皇帝是中国最强大的帝王之一。他结束了无数诸侯割据的局面，终结了分封制，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

政府。他征服了整个中国，甚至还包括了安南国（Annam）。他修建了万里长城，这可是一个耗资不菲的浩大工程。显然，中国人宁愿耗费巨资来修建城墙以防御外敌，也不愿意出资维护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来进行防卫。这座长城几乎不能阻止大规模的外族入侵，它的作用仅仅是阻止小规模的侵袭。虽然中国十分强大，但是长城的修筑体现了中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中国人并不推崇战争的荣耀。

秦始皇驾崩后，中国就几乎再没有出现过第二个这样的王朝。但是自他起，中国就有了“统一”的传统。

秦朝灭亡后另一个朝代出现了，它就是汉朝，繁荣长达400多年。在汉朝早期统治者中出现了一位女皇帝。[注]汉武帝是汉朝第6任皇帝，也是中国最强大、最著名的统治者之一。他在位50多年，击败了长期侵扰北方的鞑靼人（Tartars）。从东边的朝鲜一直到西边的里海（Caspian Sea），中国的皇帝都有着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中亚各族都视他为最高统治者。看看亚洲的地图吧，你就会明白早在公元前一二世纪时，中国是多么强大，中国皇帝的影响力是多么深远。关于这个时期罗马帝国的强盛，我们知之甚多，有人一直认为罗马的光芒遮盖了整个世界，罗马曾被称为“世界霸主”。虽然那时的罗马很强大，而且实力还在不断增强，但中国是一个幅员更加辽阔、国力更加强盛的大国。

在汉武帝时期，中国和罗马可能就已经建立了联系。这两个国家通过帕提亚人（Parthians）建立了贸易往来。帕提亚人居住的地区就是现在的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后来，罗马和帕提亚之间爆发了战争，与中国的贸易也就随之中断了。此后罗马人试图通过海路重建与中国的直接贸易联系，事实上曾有一艘罗马船只抵达了中国。但是，这发生在公元2世纪，而我们现在仍要继续回顾公元前的历史。

在汉朝统治期间，佛教传入了中国。虽然在公元前中国就出现了佛教，但是佛教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是以后的事。据说在当时，有一个帝王做了一个好梦，梦到了一个高16英尺且头顶光环的人。因为他梦到的景象出现在西方，于是他派遣使者前往西方。这些使者带回了释迦牟尼的画像和佛教文献。印度艺术也随着佛教一起传入了中国，并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又通过中国传到了朝鲜，而后又传到了日本。

在汉朝，有两件值得一提的重要大事：第一件事是发明了木版印刷术，但是这项发明在大约1000年的时间内，都没有得到广泛使用。即便如此，中国也领先了欧洲500年。

第二件值得一提的事是出现了选举官员的科举制度。孩子们都不喜欢考试，对此我深表同情。但是在过去，中国任命官员的科举制度简直是非同一般。直到现在，在某些国家里，官员的任命主要是通过裙带关系，或者是出于对某一特殊阶层或种姓的偏爱。然而在中国，任何人只要通过了科举考试，就可以得到任命。这个制度虽然算不上完美，因为一个人也许通过学习儒家经传后通过了考试，但他也许不能成为一名好的官员。但是相较于裙带关系或其他关系而言，这个制度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它在中国延续了2000年，直到20世纪初才被废除。

---

1. 原文如此。中国汉朝没有女皇帝，此处应该是“出现了一位极有权势和影响力的女性”。此人就是吕雉。——译者注

27 ——罗马与迦太基之争

我们现在应该从远东来到西方，追溯一下罗马的发展历程。据说，罗马建于公元前8世纪。早期的罗马人可能是雅利安人的后裔，他们的一些定居点位于台伯河（Tiber）沿岸的七丘山上，这些定居点逐渐发展，最后形成了一座城市。

这个城邦在意大利不断发展壮大，也扩大了领土范围，直达墨西拿（Messina）的南端，面临着西西里岛。

你也许还记得希腊的城邦制。希腊人所到之处都带去了城邦制的治国理念。整个地中海沿岸到处分布着希腊的殖民地和城邦。但是，我们现在要谈一谈罗马的不同之处。也许起初，罗马同其他希腊城邦是一样的，但是不久它就击败了邻近部落，开始了扩张。因此，罗马不断发展壮大，吞并了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一个城邦不可能有如此大的面积。这些地方由罗马统一管理，由此古罗马建立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政府体制。

罗马既没有帝王或君主，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政体。尽管如此，这个政府实质上仍是一种共和国政体，由拥有土地的富有家族进行统治管理。元老院（Te Senate）管理着国家，而元老院的元老由两名被选出来的执政官（Consuls）任命。长期以来，只有贵族才能成为元老。罗马人被划分为两个阶级：富有的贵族阶级，通常是土地的所有者；平民阶级，即普通公民。罗马王国或罗马共和国长达数百年的历史就是这两个阶级的冲突斗争史。贵族拥有所有的权力，权力带来了大量的财富；而平民或老百姓则处于受支配的地位，既没有权力，也得不到经济利益。

平民们为争取权力而不断斗争，慢慢地，他们也获得了一些权力。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在长期的斗争中，平民们成功地采取了一种非合作的方式。他们全体一起离开了罗马城，在新的城市落脚定居。这样的做法吓坏了贵族，因为没有平民，他们什么也干不了，所以他们向平民们承诺，给予他们一小部分特权和优待。逐渐地，普通百姓就有机会获得政府官职甚至成为元老院的元老了。

我们谈到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我们往往认为其他人是不值一提的。但是，罗马除了这两个阶级以外，还有大量无权力的奴隶。奴隶不是公民，没有投票权，他们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就像狗或者牛一样。他们可以被主人任意买卖或惩罚。只有在特定条件下，他们才能获得自由；他们一旦自由了，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即自由人。在古老的西方世界，对奴隶的需求量一直很大。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大型奴隶市场应运而生。甚至有人远征遥远的地方，俘获男人、妇女和儿童，把他们变卖为奴。同古埃及一样，古希腊和罗马的荣耀和威严，是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奴隶制系统。

在那个时期的印度，奴隶制也同样盛行吗？这不太可能，中国也可能没有。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或中国就没有奴隶制。奴隶制是以家庭的方式而存在的。家里的仆人就是奴隶。印度和中国似乎没有劳动型奴隶，即在田地里或其他地方劳作的大量群体。因此，中印两国没有出现奴隶制中最丑恶的一面。

罗马在发展壮大，贵族们获得的利益也就更多，变得越来越富有了。同时，平民们却依然贫穷，且受制于贵族，而贵族和平民都压迫穷困的奴隶。

罗马在壮大，但是谁来管理这个国家呢？我说过，是元老院。元老院的元老由两名被选举出的执政官任命。而是谁选举了执政官呢？是公民。一开始，罗马的面积很小，像一个城邦，所有的公民居住在罗马城内或附近地区。公民们可以很容易地聚集在一起投票。但是，

随着罗马的扩张，很多公民居住在离罗马城比较远的地方，要聚集在一起投票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因此，现在的“代议制政府”在那个时期并没有得到发展或者实施。你知道的，现在是每一个地区或选区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或议会或国会，所以，小众群体就以这样的方式代表了一个国家。显然，以前的罗马人并不接受这种方式。所以，当居住在较远地区的选举人不能来投票时，他们就代为实施投票权。事实上，居住在较远地区的选举人很少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当时，没有报纸杂志和其他出版物，也很少有人能识文断字。所以，远离罗马城的人们即使有选举权，也没有实际性的作用。他们有公民权，但距离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

所以，你会发现，只有住在罗马城的选举人才能在选举和重大决定上有真正的一席之地。他们聚在一处被围起来的公开场所里进行投票，其中有很多选民是贫穷的百姓。想获得高官和权力的有钱贵族就得贿赂那些平民，才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因此，罗马的选举制同现代选举制一样，出现了行贿受贿和欺骗诡诈的现象。

随着罗马在意大利的扩张，位于北非（North Africa）的迦太基也逐渐强盛起来。迦太基人是腓尼基人的后裔，一直有着航海技术和海外贸易的传统。这个国家也是共和国，但它是富人的共和国，在这一点上更甚于罗马。这座城市共和国有着庞大的奴隶人口。

在早期，罗马和迦太基之间有希腊位于南意大利和墨西拿的殖民地。但是罗马和迦太基联合起来，成功赶走了希腊人。迦太基占据了西西里岛，而罗马则一直扩张，直到意大利“靴子形”版图的“靴尖”地区。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友谊和联盟并没有持续太久。不久两国之间就出现了冲突，并最终发展成了激烈的竞争关系。对这两个隔着狭窄海域相望的强国而言，地中海的面积显然不够大。这两个国家都野心勃勃。罗马正在发展壮大，国家年轻气盛，野心勃勃且信心满满。起初，迦太基也许有点轻视自命不凡的罗马，对于本国的制海权

有着极大的自信心。一百多年来，两国冲突不断，有时又保持短暂的和平。他们打起仗来就像野兽一样，给百姓们带来了悲痛。这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了三次大的战争，即“布匿战争”（Punic Wars）。

第一次布匿战争从公元前264年到前241年，持续了23年，以罗马的胜利而告终。22年后又爆发了第二次布匿战争，迦太基派出了一位名将，名叫汉尼拔（Hannibal），此人在历史上非常有名。15年间，汉尼拔进军罗马，对罗马人民进行了恐怖镇压。他以大屠杀的方式多次击败罗马军队，尤其是公元前216年的坎尼（Cannae）会战。整个征战主要由汉尼拔独立指挥完成，由于罗马人掌握了制海权，切断了汉尼拔与迦太基的联系，因此汉尼拔得不到任何支援。但是，尽管遭遇了失败和灾难，尽管受到了汉尼拔的长期威胁，罗马人民并没有放弃抵抗，一直在与他们痛恨的敌人战斗。罗马人担心与汉尼拔军队正面交锋，于是避开了面对面作战，不断从侧翼袭击侵扰汉尼拔的军队，并切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罗马将军费边（Fabius）尤其喜欢这种避免正面交锋的作战方式。因此，他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避免了与汉尼拔的正面交锋。我提及这个人的名字，不是因为他很了不起，值得我们怀念，而是因为由他的名字衍生了一个新的英语单词，即“Fabian”（费边式的）。“费边战术”就是指不采用强制手段谨慎推进事件的进程；避免战斗或危机，同时希望以缓慢消耗的方式赢得胜利。信仰社会主义的英国费边社（Fabian Society）就是不提倡以激进或突变的方式推行社会主义。

汉尼拔使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变得荒无人烟，但是罗马以坚忍不拔和顽强到底的精神最终赢得了胜利。公元前202年，汉尼拔在扎马战役（Batle of Zama）中被打败。他四处流亡，痛恨罗马对他穷追猛打。最终，他选择了服毒自杀。

此后，罗马和迦太基之间出现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迦太基对罗马俯首帖耳，几乎不敢再度挑战罗马的地位。即使如此，罗马也并

不满足，它向迦太基发动了第三次布匿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迦太基人惨遭屠杀，整个城市被彻底摧毁。甚至被誉为“地中海女王”的迦太基，这座骄傲的城市曾矗立过的地方，被开垦成了农田。

28 ——从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

迦太基最终战败并亡国以后，罗马在西方世界已无任何对手，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罗马已经征服了希腊各城邦，还占据了曾属于迦太基的领土范围。因此，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后，西班牙归属了罗马的统治。但是，罗马的统治范围也仅限于地中海国家。整个北欧和中欧仍然是独立的。

在博尔纳，胜利和征服带来了财富和享乐，大量黄金和奴隶从被征服的地区涌了进来。但是，这些东西去哪儿了呢？我以前告诉过你，元老院是罗马的管理机构，元老由富有的贵族家族成员构成。这个富人群体控制着罗马共和国的命运。随着罗马的扩张和强盛，这些富人的财富也与日俱增。因此，富人越来越富有，而穷人则仍然贫穷，或者实际上变得更加贫穷了。奴隶人口的数量也增加了。奢侈与穷困并驾齐驱。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会带来麻烦。令人惊讶的是，百姓们居然可以忍受这样的情况存在。但是人们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到了临界点的时候就一定会爆发。

为了缓和穷人们的境况，赢得他们的欢心，富人在圆形竞技场举行了竞技比赛。角斗士们被迫相互搏杀以取悦观众。我想，由战争带来的奴隶和囚犯大批地死于这项所谓的运动中。

但是罗马共和国的混乱局面仍然有增无减。在选举过程中出现了暴动、残杀、贿赂以及腐败。甚至在一名名叫斯巴达克斯（Spartacus）的角斗士的带领下，穷困而饱受蹂躏的奴隶们爆发了起义。但是，他们被残酷地镇压了。据说其中有6000起义者被钉死在罗马亚壁古道（Appian Way）两旁的十字架上。

投机者和将军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逐渐超过了元老院。内战频发，到处是荒地废墟，将领们之间也是纷争不断。公元前53年，在东方的帕提亚（Parthia，美索不达米亚），罗马军团在卡尔莱（Carrhae）战役中遭到了重创。帕提亚人打败了前来入侵的罗马军队。

在这些罗马将领中，有两个人的名字尤其引人注目，他们就是庞培（Pompey）和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你应该记得，恺撒征服了法国或高卢（Gaul，高卢为法国旧称），还征服了英国。庞培挥师向东，也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这两人是激烈的竞争对手。他们都野心勃勃且不能容忍对手的存在。没落的元老院已失去了昔日的地位和影响力，但仍能得到口头上和表面上的尊敬。恺撒击败了庞培，成了罗马世界的首领。但是，当时的罗马是一个共和国，所以在官方形式上恺撒不能成为国家的领导者。于是，他做出种种努力，企图加冕自己为一国之主。他非常想成为君王，但是共和国体制的悠久传统使他犹豫不决。事实上，这种传统的阻力非常强大，恺撒也最终被布鲁图斯（Brutus）和其他元老刺死在了元老院会场的阶梯上。你一定读过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戏剧《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剧中就重现了这一幕。

尤利乌斯·恺撒死于公元前44年，但是他的死并没有挽救罗马共和国。恺撒的养子兼甥孙屋大维（Octavian）以及他的朋友马克·安东尼为恺撒之死展开了报复行动。于是，王权再度出现了，屋大维成了罗马世界的“第一公民”（Princeps）或元首（Chief），共和国自此结束。元老院虽然在形式上还存在，但实质上已无实权。

屋大维成了“第一公民”或元首之后，被尊称为“奥古斯都·恺撒”（Augustus Caesar）。他以后的继任者都被称为“恺撒”。实际上，“恺撒”一词的本意就是对“皇帝”的尊称。“Kaiser”（皇帝）和“Tsar”（沙皇）这两个词都来源于“Caesar”。“Kaiser”

一词也是印度斯坦语，即“Kaisar-i-Rum”和“Kaisar-i-Hind”。如今的英国国王乔治（King George）的王号中就有“Kaisar-i-Hind”一词。现在已经没有“德国皇帝”（German Kaiser）、“奥地利皇帝”（Austrian Kaiser）、“土耳其皇帝”（Turkish Kaiser）和“俄国沙皇”（Russian Tsar）了。让人觉得有意思且好奇的是，现在只有英国国王享有尤利乌斯·恺撒这一王号，而恰恰正是恺撒自罗马而来征服了英国。

所以“尤利乌斯·恺撒”成了帝王显赫地位的代名词。如果庞培在希腊城邦法尔萨鲁斯（Pharsalus）大败恺撒，那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庞培有可能成为“第一公民”或皇帝，而“Pompey”（庞培）一词就成了“皇帝”的尊称。而此后就会出现“German Pompey”（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甚至英王乔治的王号就会变成“Pompeyi-Hind”。

在罗马由共和国转变为帝国的这段时间里，生活在埃及的一名女性注定以美貌而闻名于历史。她就是“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虽然她名声不太好，但她是少数以美貌改变了历史的女性之一。当尤利乌斯·恺撒到达埃及时，她还是个小女孩。之后她又成了马克·安东尼的情妇，但是她没有为安东尼带来一丝的好处。事实上，在那场大海战的中途，克利奥帕特拉背弃了安东尼，带着她的舰队离开了战场，弃安东尼于不顾。著名法国作家帕斯卡尔（Pascal）曾写道：“如果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再短一点的话，整个世界的面貌就会改观。”这显然有点夸张。世界是不会因为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而发生改变的。但是在恺撒到达埃及后，他可能开始认为自己就是皇帝，是像神一般的统治者。埃及不是共和制，而是君主制，其统治者不仅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还几乎被人们视为神灵，这就是古埃及的统治思想。希腊人托勒密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统治了埃及，接受了埃及人的大部分习俗和观念。克利奥帕特拉是托勒密家族的后代，因此她是希腊人的女王，而非马其顿人的女王。

在这个过程中，不管克利奥帕特拉是否起到了助推作用，埃及的“统治者即神”这一统治思想传播到了罗马，并找到了生根发芽的沃土。甚至在尤利乌斯·恺撒的一生里，虽然共和国繁荣兴旺，但世人对他个人的地位和声望推崇备至。以后，我们将会看到个人崇拜的推行成了罗马皇帝们的常见举措。

现在，我们来到了罗马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共和国的结束。公元27年，屋大维成了“第一公民”，被尊称为“奥古斯都·恺撒”。我们将在后面继续谈论罗马和罗马皇帝的历史。其间让我们看一看罗马共和国最后时期的疆域范围吧。

在西方，博尔纳（罗马）统治着意大利、西班牙和高卢（法国）。东方则是希腊和小亚细亚，你还记得吧，这里曾是希腊城邦帕加马的所在地。在北非，埃及是盟友，也是受罗马保护的国家。迦太基和其他地中海国家也处于罗马的统治下。因此在北方，莱茵河（Rhine）就是罗马的疆域边界。德国、俄国、北欧和中欧则不处于罗马的统治下，地中海东部地区也是如此。

在那个时期，罗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是很多欧洲人忽视了其他国家的历史，他们认为罗马主宰了整个世界。事实远非如此。你要记住，恰好在同一时期，中国汉朝统治的疆域横跨了亚洲并一直延伸至里海。在美索不达米亚，罗马惨败于卡尔莱战役，原因可能是帕提亚人得到了蒙古人的帮助。

罗马的历史，尤其是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对欧洲人而言尤为珍贵，因为欧洲人认为罗马是现代欧洲国家的祖先，从某种程度上说，事实的确如此。所以，在英语学校读书的学生们都要学习希腊史和罗马史，无论他们是否知道近代史。我记得，我曾读过尤利乌斯·恺撒描述征战高卢的拉丁文原著《高卢战记》（*De Bello Gallico*）。恺撒不仅是一名将领，还是一名文笔优美的作家。至今，欧洲仍有数以千计的学校在使用他的著作《高卢战记》。

在前不久的信里，我们不仅纵观了阿育王时期的世界面貌，还回顾了当时的中国和欧洲。现在，我们几乎站在了基督纪元的门槛前，然而我们还得回到印度，继续谈一谈印度史。阿育王死后，印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南部和北部出现了新的帝国。

我会努力让你把整个世界史看作一个连续不断的整体。但是，我希望你记住，相隔甚远的国家之间的早期交往是非常有限的。虽然罗马在很多方面比较先进，但是对地理环境知之甚少，也没有采取任何方法去学习相关知识。但是现在，连学校里的孩子们所知道的地理知识都远远多于当时的罗马伟大将领和智者们，虽然那些人自认为是世界的主人。就如同罗马的将领和智者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主宰一样，远在千万英里以外、横跨了亚洲大陆的中国统治者们也认为自己主宰了整个世界。

29 ——南印度超过了北印度

我们的旅程从远东的中国来到了西方的罗马，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印度吧。

阿育王去世后，孔雀王朝的统治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短短几年内，这个王朝就逐渐衰微了。北部各邦分崩离析，南部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力量——安得拉王国。阿育王的子孙们在约50年的时间里继续统治着这个日益没落的帝国，最后他们被另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赶出了王廷，这个人就是婆罗门种姓的弗沙密多罗（Pushyamitra）。他自立为王，据说在他统治时期，婆罗门教又重新兴盛起来。但佛教僧侣遭到了一定程度的迫害。但是，当你阅读印度史时，你会发现婆罗门教对印度教的迫害是极其微妙的。婆罗门教并没有对佛教进行赤裸裸的迫害和非难。虽然确实存在着对佛教的某种迫害，但这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宗教目的。佛教僧伽（Buddhist Sanghas）群体是一个强大的组织，很多统治者惧怕他们的政治力量，因此试图削弱他们。通过一定程度的同化、吸收和找地方安置等手段，最终婆罗门教几乎成功地把佛教驱逐出了这片诞生之地。

因此，新的婆罗门教不仅仅恢复了旧有的体制，它还彻底否定了佛教曾做过的一切。婆罗门教以前的首领们非常聪明，从旧有的宗教仪式中吸收、同化进而形成了本教仪式。起初，雅利安人到达印度后，吸收了达罗毗荼的文化习俗。在整个雅利安人的历史发展阶段，他们一直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吸收、同化异族文化。对佛教也同样如此。他们把释迦牟尼塑造成神的化身，使之成为印度万神殿中的众神之一。释迦牟尼成了众人崇拜、热爱的对象，而他的神示却被悄然搁置一旁。婆罗门教或印度教少有变化，一直延续着原有的宗教理念。

但是，让佛教婆罗门化的进程是非常漫长的，因为我们发现，在阿育王死后数百年内，印度境内依然存在着佛教。

我们没必要纠结于摩揭陀国的朝代和君王。阿育王死后约200年，摩揭陀国就不再是印度最强大的王国了，但即使如此，它一直是佛教文化的中心。

与此同时，印度的南部和北部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北部一直在遭受来自中亚不同民族的入侵，如巴克特利亚人（Baktrians）、萨卡人（Sakas）、斯基泰人、突厥人（Turkis）和贵霜人（Kushans）。我想我以前在信里告诉过你，中亚是如何成为人们繁衍生息之地的；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这些人又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走出中亚，迁徙分散并遍布了整个亚洲，甚至欧洲。在公元前的200年内，印度就遭到了好几次外来民族的入侵。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这些民族的入侵不是为了征服和掠夺，而是为了寻找栖身定居之所。居于中亚地区的绝大部分部落是游牧民族。随着他们人口数量的增加，居住的土地已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所以他们不得不向外迁徙并寻找新的土地。关于这些大迁徙更有说服力的一个理由是来自部落背后的生存压力。一个强大的部落或民族往往会驱逐其他部落，反过来，这些被驱离的部落就不得不去入侵其他国家。因此，以侵略者身份来到印度的这些民族恰恰是远离故土的逃难者。中国也同样如此，无论中国多么强大，比如在汉朝，中国就驱逐了那些游牧民族，迫使他们去寻找新的家园。

你还要记住，这些中亚的游牧民族并没有把印度视为敌对国。他们被称为“野蛮人”，与当时的印度相比，无疑他们的确算不上“文明人”。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虔诚的佛教教徒（Buddhist），对印度，这个释迦牟尼诞生之地，是心怀敬意的。

在弗沙密多罗时期，西北部地区遭到了来自巴克特利亚（Bactria，大夏古国）的米南德（Menander）国王的侵略，他也是一

名虔诚的佛教教徒。巴克特利亚的疆域跨过了印度的边境，曾是塞琉古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在后来这个国家独立了。虽然米南德的入侵被击退了，但他仍然统治着喀布尔和信德。

后来萨卡人（Saka）大举入侵印度，并且扩张到了整个印度北部和西部地区。萨卡人是游牧民族突厥人的一个大部落，他们被另一个更强大的部落贵霜人赶出了居住的草原。萨卡人侵占了巴克特利亚和帕提亚，逐渐在印度北部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尤其是在旁遮普、拉杰普塔纳和卡提瓦半岛这些地方。印度文化影响并教化了萨卡人，使他们放弃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

有趣的是，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巴克特利亚人和突厥人虽然统治了印度的部分地区，但是没有给印度社会带来太大的变化。这些统治者都是佛教教徒，遵循着佛教教会组织体系，而这一体系本身又是建立在古老印度雅利安人的民主型村落社会群体的基础上的。因此，即使印度处于这些外来民族的统治下，印度也仍然是中央集权下的自治村落社会群体或共和政体。在这段时间，塔克西拉和马图拉仍是佛教研习的中心，吸引了来自中国和西亚的大量学子。

但是，来自西北方向的一次次入侵和孔雀王朝的逐渐分裂造成了一个影响：印度南部地区成了古老印度雅利安体系最典型的代表。因此，印度雅利安政治中心移到了南方。由于侵略不断，大批有才干的人可能就从北方移居到了南方。以后你会看到，在1000年以后，当穆斯林入侵印度时，这样的情况又会再次重演。即使是现在，与北印度相比，南印度受到外来侵略和对外交往的影响还是要小一些。一些居住在北部地区的人受到了混合型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既融合了印度和穆斯林文化，还兼有一定的西方文化成分。甚至我们的语言也已经成了一种混合型语言，你可以称它为印地语、乌尔都语或印度斯坦语。但是，正如你亲眼所见的那样，南方仍然是纯粹的印度文化，印度正统占据了主导地位。数百年来，它一直坚持保护和维护着古老的

雅利安传统，竭力建立一个僵化死板的社会。甚至在今天，世人皆惊讶于它的固执。围墙是危险的同伴。也许有时候，它能够抵挡外部邪恶，赶走不受欢迎的入侵者。但是，它也能让你身陷囹圄，成为囚犯和奴隶。你要以自由为代价来换取所谓的纯洁和不受干扰。然而，最可怕的围墙是筑在人们脑子里的围墙，只要是为了遵循古老的传统，就绝不摒弃旧时的传统恶习，也绝不接受任何新思想和新事物。

但是1000年以来，南印度确实在维护印度雅利安传统上做出了真正的贡献，不仅是在宗教方面，还包括艺术和政治。如果现在你想看看古老印度艺术的样本，你就一定要去南印度。希腊人麦加斯梯尼带来了另一种政治制度，由此南方议会制的普遍实施抑制了君主的权力。

摩揭陀国走向衰败之时，学者、艺术家、建筑师、工匠和手工业者纷纷前往印度南部地区。南印度和欧洲之间的贸易繁荣兴旺起来了。珍珠、象牙、黄金、大米、胡椒、孔雀，甚至猴子，都被运到了巴比伦、埃及和希腊，之后还传入了罗马。甚至在更早的时候，马拉巴尔海岸的柚木还被运到了迦勒底王国和巴比伦王国。所有的贸易，或者说绝大部分贸易，是由达罗毗荼人驾驶着印度船只运送到其他国家的。这会让你充分认识到，南印度在古代世界中占据了前沿阵地。印度的南部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古罗马钱币。我告诉过你，在马拉巴尔海岸出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殖民地，而在亚历山大城出现了印度人的聚居地。

阿育王死后不久，位于南部的安得拉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你也许知道，现在的安得拉是一个邦，位于印度东海岸，在马德拉斯以北。安得拉邦的语言是泰卢固语。阿育王死后，安得拉王国的势力快速发展，从大海的这一端扩张到了另一端，横跨了德干高原。

自南部地区而来的殖民大扩张正在进行，但是我要在后面的信中才去谈论。

之前我提到了萨卡人、斯基泰人和其他民族，他们入侵了印度，并在北部定居下来，也成了印度的一个部分。北印度的居民不仅是雅利安人的后裔，也同样是这些外来民族的后裔。尤其是勇敢而貌美的拉杰普特人，他们的后裔就是强壮勇敢的卡提瓦半岛人。

30 ——位于交界地区的贵霜帝国

在上一封信里，我一再谈到了萨卡人和突厥人对印度的侵略。我还告诉了你，安得拉王国在印度南部发展壮大，地域疆界从孟加拉湾延伸到了阿拉伯海。在贵霜人赶走了萨卡人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开始在历史的舞台上活跃起来。公元前1世纪，贵霜人在印度交界地区建立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发展壮大成了一个帝国，它就是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它的领土范围南至贝拿勒斯和温迪亚山脉（Vindhya Mountains），北至喀什、莎车和于阗，西与波斯和帕提亚交界。因此，整个印度北部，包括联合省、旁遮普和克什米尔地区，还有中亚部分地区，都处于贵霜帝国的统治下。这个帝国延续了近300年，这个时期也正是安得拉王国在南印度繁荣发展的时期。贵霜帝国的首都起初设在喀布尔，之后迁到白沙瓦，后被称为布路沙布逻（Purushapura），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贵霜帝国在很多方面都让人颇感兴趣。它是一个佛教国家，其中一位著名的统治者迦腻色伽王（Emperor Kanishka）虔诚地信仰着释迦牟尼的教义。在首都白沙瓦附近是塔克西拉，这里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佛教文化的中心。我想我曾告诉过你，贵霜人实际上是蒙古人，或者与蒙古人属于同一种系。人们一直在贵霜帝国首都和蒙古人的家园之间不断往来，由此佛学和佛教文化被传播到了中国和蒙古。同样，西亚也更进一步地深入接触了佛教思想。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西亚一直处于希腊人的统治下，大量的希腊人将他们的文化传播到了此处。而现在，这个希腊化的亚洲（Greek Asiatic）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交汇融合了。

所以，中国和西亚都受到了印度的影响。但是，同样印度也受到了它们的影响。贵霜帝国像一个巨人一样横跨在亚洲大陆的后面，西边是希腊化的罗马（Graeco-Roman）国家，东边是中国，南边是印度。这个帝国仿佛是印度和罗马之间、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中转站。

也许你想到了，这个地处中心位置的帝国促进了印度和罗马之间的密切交往。贵霜帝国所处的时期正是罗马共和国的末期，当时尤利乌斯·恺撒还活着，并一直持续到罗马帝国（Roman Empire）建立后两个世纪。据说，贵霜王当时曾派遣大使前去拜访了奥古斯都·恺撒。陆路和海路贸易繁荣发展起来了。由印度销往罗马的物品有香水、香料、丝绸、织锦、棉布和宝石等。罗马作家普林尼（Pliny）曾抱怨罗马的金子通通流向了印度。他认为这些奢侈品每年花费了罗马帝国1亿塞斯特斯（sesterces，罗马钱币），大约价值1500万卢比或100万英镑。

在这段时间，佛教僧院和僧伽的集会中出现了激烈的辩论或争论。新思想或者是披着新外衣的旧思想从南方和西方传进来，佛教倡导的简朴思想逐渐受到了冲击。这个变化过程一直在延续，佛教最终分裂成两大派系：一派音译为“摩诃衍那”（Mahayana），即大乘佛教（Great Vehicle）；另一派音译为“希那衍那”（Hinayana），即小乘佛教（Litle Vehicle）。随着新思想和新理念的传入，对待生活和宗教的观点发生了改变，体现这些思想和理念的艺术和建筑也出现了变化。很难说清楚这些变化是怎样产生的。也许是来自两个主要的影响力，即婆罗门和希腊，它们使佛教思想偏离了原来的方向。

我告诉过你好几次了，佛教原本是为了反抗种姓制度、神职人员和宗教仪式的。乔答摩反对对神像的顶礼膜拜。他没有宣称自己是神，也不接受世人的礼拜。他认为自己只是释迦牟尼，一名觉悟者。依据这样的思想，在那个时期，在绘画和建筑中没有出现任何与释迦牟尼有关的神像。但是，婆罗门人想消除印度教和佛教之间的差异，

一直竭力把印度教的思想和符号象征融入佛教思想。来自希腊化罗马国家的能工巧匠们往往能塑造出诸神的形象来。因此，这些神像慢慢地进入了佛教的寺庙和神殿里。起初，这些神像不是释迦牟尼，而是菩提萨埵（BodhiSatvas，即菩萨）。在佛教传统里，菩提萨埵被认为是释迦牟尼的化身。这样的变化一直持续发展着，最终释迦牟尼本人的神像也被描绘或雕刻出来了，从而他的神像受到了世人的顶礼膜拜。

佛教中的大乘佛教赞成这样的变化，因此它更接近于婆罗门的思想。贵霜帝国的君主们接受了大乘佛教，并将其广泛传播。但是他们一点都不能接受小乘佛教和其他宗教。有人认为，迦腻色伽王还鼓励琐罗亚斯德教的传播。

有趣的是，学者们之间也出现了关于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孰优孰劣的大辩论。僧伽们也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对此展开了讨论。迦腻色伽王在克什米尔举行了一次僧伽最高宗教会议。关于这个主题的辩论或争论持续了数百年之久。大乘佛教占据了北印度，而小乘佛教占据了南印度，最终这两个教派在印度都被印度教吸收同化了。如今，大乘佛教盛行于中国和日本；而小乘佛教则盛行于锡兰和缅甸。

人们塑造的艺术往往能真实地反映他们的思想。所以，早期佛教思想倡导的简朴理念让位给了精美设计的符号象征，印度艺术变得越来越精美华丽。尤其是在犍陀罗国的西北地区，大乘佛教的雕像和装饰精致无比。甚至小乘佛教的建筑也受到了这种新观念的影响，逐渐地失去了其早期简朴保守的风格，雕刻和符号象征也走向了精美繁复的表现形式。

关于这个时期的历史遗迹，存世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其中最经典的就是阿旃陀石窟（Ajanta）的一些美丽壁画。

我们现在要对贵霜帝国说再见了，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一段历史。就像萨卡人和突厥人一样，贵霜人几乎没有侵略印度，也没有像其他统治被征服国家的外来民族一样对印度进行统治。宗教的纽带把贵霜帝国和印度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但是除此之外，贵霜帝国采纳了印度雅利安人的治国管理宗旨。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王国与雅利安人的社会体系极为相似，所以它能在长约300年的时间里成功地统治了北印度。

31 ——耶稣和基督教

位于印度西北部的贵霜帝国和中国的汉朝带领我们飞跃了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我们现在得回到之前的话题。到现在为止，我们回顾的历史都发生在公元前，即基督诞生之前的年代。现在，我们要步入基督纪元了，即公元后。这个时代恰如其名，是从所谓的基督诞生日开始计算的。事实上，基督可能早在四年前就诞生了，但这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人们已习惯了把基督诞生后的时期看作公元——上帝的年份，即拉丁文“耶稣纪元后”（Anno Domini）。继续使用这种已被广泛接受的纪年方法并无大碍。但是因为我们一直使用“BC”来表示“公元前”，所以我觉得使用字母“AC”来表示“公元”似乎更科学。我个人建议使用这个方法。

基督或耶稣的故事都是写在《圣经》的《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里的，你对此也有一些了解。《福音书》（*Gospels*）中几乎没有基督青年时代的任何描述。耶稣出生在拿撒勒（Nazareth），曾在加利利（Galilee）传道。在他30多岁时，他到了耶路撒冷（Jerusalem）。不久，罗马执政官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对他进行了审判和判决。在耶稣开始传教之前曾做过什么或到过什么地方，我们对此都不太清楚。在整个中亚、克什米尔、拉达克（Ladakh）、中国的西藏，甚至更远的北方，至今仍有人坚信耶稣曾到过这些地方。还有人认为他曾到过印度。但这些说法都没法得到证实。事实上，专门研究耶稣一生的很多权威专家认为，耶稣并没有去过印度或者中亚。但是，如果耶稣去过那些地方，这也没什么不可能的。因为在那个时期，印度的大学闻名四方，尤其是位于西北部的塔克西拉，吸引了大量来自遥远国家的莘莘学子，耶稣也许会为了求

学曾去过那个地方。耶稣的教义在很多方面和乔达摩的教义颇为相似，所以很有可能耶稣对佛教教义非常熟悉。然而，即使耶稣没有到过印度，因为那时的佛教在其他国家流传甚广，所以他也完全有可能知道佛教教义。

每一个在校女学生都知道，宗教导致了激烈的冲突和痛苦的挣扎。但是，去了解世界各宗教的起源，并比较它们的异同还是蛮有趣的。就其教义思想和传道说教而言，各个宗教都非常相似，所以有人很吃惊，为什么人们会愚蠢地为细枝末节和无关紧要的事而争论不休呢？但是，人们增添并扭曲了早期宗教的教义，我们现在已很难窥探其真实面貌。传教者被狭隘偏执的盲从者所取代。更多的时候，宗教成了政治利益和帝国权益的侍从。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为了利用广大民众，也为了使民众迷信而更容易进行统治，罗马的统治者们更是助长了宗教迷信。罗马贵族们也赞成利用这个高端哲学，目的是为了他们的个人利益，而不是为了百姓的利益。后来，一位有名的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写了一本关于政治的著作，他认为宗教的存在对政府的统治管理是很有必要的，统治者也许有责任支持宗教，哪怕这个宗教有缺陷。甚至在当代，我们也可以看到无数披着宗教外衣却主张帝国主义的例子。因此，卡尔·马克思写下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也就不奇怪了。

耶稣是犹太人。犹太民族是一个特殊且坚韧的民族。经历了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短暂荣耀时期后，这个民族步入了苦难的岁月。虽然这样的荣耀仅出现在小范围地区，但是在犹太人的心里被无限放大了，被视为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他们认为，当犹太人再次伟大和强盛之时，这样的黄金时代将会再次降临。虽然犹太人分散在罗马帝国和其他地区，但是他们团结在一起，并坚信光辉荣耀之日会再次来临，救世主弥赛亚（messiah）将会引领着他们前进。犹太人没有家园或庇护所，还不断地遭受无法估量的侵扰、掠夺和迫害，甚至经常被

杀害，但是他们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仍然保持了他们的民族性，还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这真是历史的一个奇迹！

犹太人期待弥赛亚的降临，也许他们曾寄希望于耶稣。但是，他们不久就失望了。耶稣用一种陌生的方式来反抗当时的社会现状和社会秩序。他尤其反对富人和伪宗教者，认为这些人使宗教变成了某种宗教礼拜仪式。与承诺财富和荣耀相反的是，耶稣倡导人们放弃所得，放弃所有，去追求虚无缥缈又神秘莫测的天国（Kingdom of Heaven）。虽然他讲的都是故事和寓言，但是他显然是一个天生的反叛者，不能忍受当时的社会现状，想站出来改变这一切。但这并不是犹太人所期望的，所以大部分犹太人反对耶稣，并把他交给了罗马当局。

就宗教发展而言，罗马人民是比较宽容的，罗马帝国包容了所有的宗教。甚至如果有人亵渎或诅咒神灵，也不会受到当局的惩罚。罗马皇帝提比略（Tiberius）曾说过："如果众神受到了侮辱，就让他们自己处理吧。"在耶稣出现之前，罗马执政官本丢·彼拉多并不担心宗教方面的问题。然而，耶稣被视为了一种政治力量，被犹太人视为了一个社会的反叛者，因此，他受到了审判和判决，最终被钉死在了各各他山（Golgotha）的十字架上。在耶稣最痛苦的时候，他的门徒们抛弃了他，背弃了他，门徒们的背叛使他承受了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因此，在他死前，他高喊出令人伤感的话语："我的神啊，我的神啊，您为何将我舍弃？"

耶稣被处死时非常年轻，仅30多岁。我们从《福音书》优美的辞藻中可以读到有关耶稣死亡的悲惨故事，并为之感慨万千。数个世纪后，基督教的发展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人们，虽然他们几乎没有遵循耶稣的教义，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巴勒斯坦以外的地区并不知道他的名字。罗马人民也对他一无所知，甚至本丢·彼拉多本人对此事也没有丝毫重视。

耶稣的直接追随者和门徒都被吓住了，都否认了耶稣的一切。但是在耶稣死后不久，使徒保罗（Paul）出现了，他并没有亲自面见过耶稣，却开始传播他理解的基督教教义。很多人认为，保罗传播的基督教和耶稣的教义有很大的差异。保罗是一位能力卓越且学识渊博的人，但是他与耶稣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并不是一名社会反叛者。然而，保罗成功了，基督教逐渐传播开来。一开始罗马人没有重视基督教的存在，他们认为基督教只是犹太人的一个宗教。但是，基督教教徒们越来越活跃，他们敌视其他的所有宗教，并完全拒绝膜拜君主圣像。对罗马人而言，他们不能理解这种意识形态，认为这是思想狭隘的表现。因此，他们认为基督教教徒是一群好战的、没文化的、敌视人类进步的狂热分子。

就其宗教而言，罗马人也许能容忍基督教的存在，但是基督教教徒们拒绝向君主圣像表示敬意，因此他们被视为叛逆不忠，并被处以死刑。然而基督教教徒们却强烈地批评这种有争论性的圣像崇拜。然后随之而来的是对基督教教徒们的迫害，他们不仅个人财产被充公查抄，还被投入了狮子笼里。你一定读到过关于这些信徒殉难的故事，也许还观看过关于他们的电影。但是，当一个人为了一项事业而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时，他的死亡无疑是无比的荣耀，更不可能去压制或镇压他本人和他所代表的事业。罗马帝国对基督教教徒们的镇压是完全失败的。事实上，基督教在冲突中走向了胜利。公元4世纪初，一位罗马皇帝皈依了基督教，由此基督教成了罗马帝国的合法宗教。这位皇帝就是君士坦丁大帝，他也是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建立者。我会在后面谈到他。

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兴盛，关于耶稣神性的分歧也出现了。你应该还记得，我告诉过你乔达摩是如何成了释迦牟尼的，他本人没有宣称自己是神，也没有让自己作为神祇和神的化身而接受世人的膜拜。与之相似的是，耶稣也宣称了自己的无神性。他一再地反复声称：他只是神的儿子，人的儿子，这并不意味着他自己拥有了神性或超越了人

类。但是人们总是喜欢将伟人们塑造成神，将之奉若神明，祭于高台，并远远地顶礼膜拜。600年后，先知穆罕默德创建了另一个伟大的宗教，他从这些先例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因此他明确地一再声明他是人，而不是神。

所以，基督教教徒不是去理解和遵循耶稣的教义，而是去争论耶稣的神性本质和三位一体（Trinity，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相互指责对方是异教徒，彼此迫害，甚至砍下了对方的头颅。不同的基督教派别之间曾爆发了关于圣子、圣父同体的大规模激烈论战，由此基督教被分为了两派：一派认为应在祷告中说“圣子与圣父同在”（Homo-ousion）；而另一派则认为圣子与圣父并非同一体（Homoi-ousion）。这样的分歧关乎耶稣是否具有神性。这两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大批的人惨遭屠杀。

基督教教徒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内部的分歧也随之产生了。这些分歧一直延续到了西方世界的近代。

你也许会惊讶地发现，在基督教传入英国或欧洲之前，它早就被传入了印度。在那个时期，基督教在罗马受到了轻视和排斥。在耶稣死后的百年里，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漂洋过海来到了南印度。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并得到了传播他们的宗教信仰的许可，这与他们在罗马的境遇完全不同。这些传教士不仅在印度改变了很多人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子孙后代迄今为止仍生活在印度。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信仰旧时的基督教教派，这个派别已经在欧洲消失了。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小亚细亚建立起了自己的宗教总部。

如今，基督教有着重要的政治地位，因为它是欧洲人民主要信奉的宗教。但是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反叛者耶稣倡导非暴力主义，他也反抗当时的社会秩序。然而，让我们来比较一下耶稣本人和现在那些大声疾呼的耶稣追随者，后者宣扬的是帝国主义，是武装和战争，是对财富的崇拜。耶稣的登山宝训（Te Sermon on the Mount）与现代

欧美的基督教教义相比，二者的差异简直太大了！毫不奇怪的是，很多人认为相较于当今西方世界那些所谓的耶稣追随者而言，圣雄甘地的思想与耶稣教义反而更为接近。

32 ——罗马帝国

亲爱的女儿，我有好几天没有给你写信了。从阿拉哈巴德传来的消息一直使我紧张不安，尤其是有关你祖母多尔艾玛（Dol Amma）的消息。我在监狱里过着相对舒适的生活，而我那孱弱的母亲却要忍受警察的警棍殴打，对此我十分恼怒。但是，我一定要集中精神，让思绪安宁下来，不能干扰我给你写信。

让我们回到罗马吧。在古老的梵文书籍里，这个国家被叫作“Romaka”（罗马）。你应该还记得，我们谈论过罗马共和国的结束和罗马帝国的兴起。尤利乌斯·恺撒的养子屋大维成了罗马帝国的第一位最高统治者，并被尊称为“奥古斯都·恺撒”。他并未公开称帝，部分是因为他认为授予他的头衔还不够至高无上，部分是因为他想让罗马对外继续保持共和国体制。所以，他称自己为“最高统帅”（Imperator）和“凯旋大将军”。由此，“imperator”一词成了最高级别的称号。你也许知道，英语单词“emperor”（皇帝）就源自这个单词。所以，早期的罗马帝国造就了两个单词。长久以来，这两个词是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梦寐以求且冠在头上的。它们就是“Emperor”（皇帝）和“Caesar”（恺撒）或是“Kaiser”（皇帝）或“Tsar”（沙皇）。起初，有人认为，在一个时期里只会出现一位帝王，一个全世界的霸主。因此，罗马被称为“世界霸主”。有些西方人还认为整个世界都笼罩在罗马的光辉之下。当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只能反映这些人对地理和历史知识的无知。在很大程度上，罗马只是位于地中海地区的一个国家，它的地域版图往东也没有越过美索不达米亚。疆域更大、国力更强盛、文化更灿烂的国家时常出现

在中国和印度。尽管如此，就西方世界而言，罗马是唯一的帝国，在以前的人们眼里，它是一种世界帝国的代表，享有赫赫威名。

最令人惊叹的是隐藏在罗马背后的思想，即统治世界的思想和成为世界领袖的思想。即使在罗马的衰落时期，这种思想也一直是这个国家的支柱和力量源泉。甚至当这一思想完全脱离了罗马，它也一直在延续。当罗马帝国已经消失，成了一个幻影，这个思想仍然存在着。我发现要写出罗马和继任者们的历史是有点困难的。选择哪些历史来告诉你也是不容易的。我在狱中读了很多古老的书籍，各种杂乱的知识汇集在一起，充斥着我的大脑。恐怕，我的脑子有点混乱了。事实上，如果不是待在监狱里，我也不可能读到一本关于罗马的名著。这本书很厚，在做其他事情的过程中很难找到充裕的时间去从头到尾地读完。这本书是由一位名叫吉本（Gibbon）的英国人所著，书名是《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这本书写于很久很久以前——大约150年前写成于瑞士（Switzerland）日内瓦湖（Lac Leman）的湖滨。但是，即使在今天，这本书也让人爱不释手、神魂颠倒。我发现，这本书辞藻华丽且音律优美，比任何一本小说都引人入胜。大约10年前，我在勒克瑙监狱读过这本书。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与吉本亲密做伴，深深地沉浸在他用语言描绘的历史画卷里。在我就快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被释放了。这种阅读的魅力顿时被打破了，我发现我很难再找到时间和心情重新回到古代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去阅读完那剩下的几百页。

但是，这是大约10年前的事了，当然，我也忘记了很多曾经读过的内容。然而，我的脑海里仍然充斥着那本书的只言片语，使我有点混乱不清了，希望这不会影响到你。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历尽沧桑的罗马帝国吧。以后，也许会有人能对这段历史做些补充。

在基督纪元前夕，奥古斯都·恺撒开启了罗马帝国时代。罗马的最高统治者也曾尊敬元老院，但是很快罗马共和国最后残存的痕迹就消失殆尽了。事实上，奥古斯都成了手握全权、独裁专制的君主，受到过分地崇拜和神化，几乎被人们视为了神祇。在生前，他被尊为半神；在死后，他被尊为神。在那个时期，在所有作家的笔下，早期罗马帝国的皇帝们都被赋予了一切美德，尤其是对奥古斯都。他们称这段时间为“黄金时代”和“奥古斯都时代”。那时的人们崇尚和颂扬一切美德，好的会受到褒奖，坏的要受到惩处。在专制国家，这就是作家的写作风格。显然统治者是喜欢这样的写作风格的。最有名的一些拉丁作家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如维吉尔（Virgil）、奥维德（Ovid）和贺拉斯（Horace），我们在学校里曾读过他们的作品。这或许因为，在罗马共和国最后时期，内战和灾难不断发生；在这之后，罗马帝国的建立带来了和平与安宁，贸易与教化得以发展、繁荣，这是莫大的慰藉。

但是，此时的文明是什么呢？它是富人的文明。这些富人完全不同于古希腊那些爱好艺术且机智敏锐的富人，他们只是一帮乏味愚蠢的人，主要工作就是寻欢作乐。他们享用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食物和奢侈品，大肆炫耀挥霍。甚至现在，这样的人也依然存在。圆形竞技场里举行着宏大的庆典表演、一系列华丽的列队游行和竞技比赛，还有角斗士的死亡格斗。但是，这些浮华的背后是百姓们的悲惨境况。重税主要落在百姓头上，而繁重的劳作则落在无数奴隶头上。甚至罗马的伟大医师、哲学家和思想家大多是来自希腊的奴隶！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当罗马人自认为是世界霸主时，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帝国皇帝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有贤君，也有恶主。慢慢地，军队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大，甚至能废立帝王。因此，出现了对军队的公开示好和拉拢。从百姓身上和被征服地区压榨和掠夺而来的金钱被用于贿赂军队，以赢得他们的欢心。其中一个最大的财富来源是奴隶交

易。在东方，罗马军队定期有组织地俘获奴隶。奴隶商往往随军同行，并当场买下所有的奴隶。提洛岛（Delos）曾是古希腊人的圣地，后来成了大型的奴隶交易市场，有时候甚至一天有多达1万名奴隶在此地交易。一位深受百姓爱戴的罗马皇帝曾在罗马斗兽场（Colosseum of Rome）里一次性投入了1200名角斗士来进行格斗，这些奴隶用生命向皇帝和民众提供了竞技表演。

这就是罗马帝国时期的罗马文明。然而，我们的朋友吉本在书中写道："如果让一个人说出，在世界历史中的什么时代人类过着最为幸福、繁荣的生活，他定会毫不犹豫地说，那是从图密善（Domitian）去世到康茂德（Commodus）继位的那个时期。"㊟——这是从公元96年到公元180年的84年时间。虽然吉本学识渊博，但是恐怕大部分人是不会同意他这番言论的。他所说的"人类"，事实上主要是指地中海地区的人民，因为他完全不了解印度、中国和埃及。

但是，也许我对罗马有点苛刻了。在罗马统治时期出现了令人高兴的变化，也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和平。虽然边境时常爆发战争，但是在帝国境内，尤其是在早期，出现了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即罗马和平时期。由此，安全的保障带来了贸易的发展。生活在罗马帝国内的百姓都是罗马公民，但是我们要记住，穷困的奴隶没有公民身份。我们还要记住，罗马皇帝掌握了全权，而公民拥有的权力微乎其微。任何关于政治的讨论都被视为对最高统帅的叛逆不忠。在上层阶级中存在着某种形式的统一政府和统一法律。对于那些经历了独裁残暴统治的许多百姓而言，这肯定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了吧。

逐渐地，罗马人变得越来越懒惰，甚至不适合参军作战。乡村里的农民们在重重剥削压迫下变得越来越穷，城里的居民也是如此。但是罗马皇帝却想着如何让城里人高兴，让他们别制造麻烦。为了这个目的，在圆形竞技场里向民众提供了免费的面包和竞技表演，以此来

取悦他们。因此，城里人的情绪得到了一定的缓和，但是这样的免费可能仅出现在几个地方而已，而且这样的做法是建立在奴隶们的凄惨和痛苦之上的。这些奴隶大多来自其他国家，如提供了免费小麦的埃及。

因为罗马人不愿意参军，所以罗马帝国以外的人们纷纷从军，这些人被称为“野蛮人”。大部分的罗马军队逐渐地由这些被罗马打败的“野蛮人”组成。在边境，这些“野蛮人”不断受到罗马人的压榨。随着罗马帝国日益衰败，这些“野蛮人”似乎越来越强大勇猛。尤其是在罗马帝国的东方，一直是危机四伏。因为这片边境远离罗马，不易守卫。奥古斯都·恺撒逝世300年后，一位名叫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的皇帝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他把帝国首都从罗马城迁往了东边。黑海（Black Sea）和地中海之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的海岸上有一座古老的城市拜占庭（Byzantium），君士坦丁在此处建了一座新城，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君士坦丁堡。这座新城也叫作新罗马（New Rome），此后成了罗马帝国的首都和中心。

甚至今天，在亚洲的很多地方，人们还在称君士坦丁堡为“罗马”。

---

1. 译文引自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黄宜思、黄雨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译者注

33 ——罗马帝国的分裂和最后的幽灵

今天，我们将继续回顾罗马帝国的历史。公元4世纪早期，即公元326年，君士坦丁大帝在古老的拜占庭旧址附近建立了君士坦丁堡。他把罗马帝国的首都从罗马城迁到了这里。看一看地图你就会发现这座新城君士坦丁堡矗立在欧洲的边缘，面朝着强大的亚洲，它是连接亚欧大陆的纽带。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许多大规模的贸易路线都要经过君士坦丁堡。对一个城市和一个首都而言，这可是极佳的地理位置。君士坦丁大帝选了一个好地方，但是他或他的继任者们不得不对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古老的罗马城距离小亚细亚和东方诸国有点遥远，然而这座坐落在帝国东部的新首都则距离西方国家就太远了，如高卢和英国。

为了暂时解决这一难题，出现了联合统治的君主，一个在罗马，另一个在君士坦丁堡。最终，这导致了罗马帝国分裂成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但是，以罗马城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不断遭到侵扰，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就瓦解了。它不能抵御那些所谓的“野蛮人”的入侵。日耳曼人（Germanic）的一支哥特人（Goths）入侵了西罗马帝国，接着是汪达尔人（Vandal），还有匈人，最终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你一定听过这个词“Hun”。在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常常用这个词来指称德国人，意指德国人极其残忍和野蛮。事实上，在战争期间，每一个人，几乎每一个人都失去了理智，忘记了学到的文明和礼仪，其行为举止都非常残忍、野蛮。德国人是这样的，英国人是这样的，法国人也是这样的。就这一方面而言，他们都是一样的。

“Hun”(注)一词成了一个用于谴责的可怕术语，另一个词“Vandal”(注)也同样如此。匈人和汪达尔人可能非常粗野和残忍，给

其他国家和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现在知道的关于这些部落的描述都源自他们的敌人罗马人，我们很难期望罗马人会有公正的叙述。总之，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匈人击败了像纸牌搭起来的西罗马帝国。为什么他们能轻易地取得胜利，其中一个原因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罗马农民生活凄惨，被课以重税且债台高筑，这些人热烈欢迎任何形式的改变。就如同现在贫穷的印度农民一样，他们在穷困潦倒的凄惨生活中也会欢迎一切改变的。

西罗马帝国覆灭了，但是在几个世纪后，它又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出现在了世人的面前。虽然东罗马帝国艰难地抵挡着匈人和其他部落的侵扰，但是它的统治仍然继续着。东罗马帝国不仅在战火洗礼中屹立不倒，还与阿拉伯人，继而与土耳其人不断交战，还延续了一个又一个的世纪。令人惊叹的是，它延续了1100年，直到公元1453年才灭亡。此时，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人（Otoman Turks，Osmanlis）占领。从此以后，土耳其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大约500年，这座城市现在叫作伊斯坦布尔（Istanbul）。自此，土耳其人不断向欧洲进军，一直打到了维也纳（Vienna）。在此后的数个世纪里，土耳其人慢慢地被欧洲人赶回了老家。大约十几年前，土耳其人在世界大战中被战败后，他们差点失去了君士坦丁堡。英国人占领了这座城市，土耳其苏丹（Turkish Sultan）成了英国人手中的傀儡。但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进行了英雄般的斗争，成功地拯救了他的人民。现在的土耳其是共和国政体，而苏丹已经消失在历史中了。凯末尔·阿塔土克成了土耳其共和国（Turkish Republic）的总统。㊟君士坦丁堡在长达150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帝国的首都，起初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然后是奥斯曼土耳其的首都，而现在只是土耳其的一部分，不再是首都了。土耳其人更愿意远离这座有着帝国烙印的城市，他们定都在安哥拉（Angora），即现在的安卡拉（Ankara），远离了小亚细亚。

我们一略而过了约2000年的罗马历史，跟随着一个又一个的时代变迁，从君士坦丁堡的建立，到罗马帝国迁都到新城市。君士坦丁大帝还做了另一件新奇的事儿。他成了一名基督徒，因为他是皇帝，那就意味着基督教成了合法的宗教。基督教的地位顿时发生了改变，从一个受迫害的宗教摇身一变，成了罗马的国教。这个变化在一时之间并没有给基督教带来多大的好处，因为基督教内部的各个宗派正争执不休。基督教最终被分裂成了两大宗派，即拉丁派教会和希腊派教会。拉丁派教会的总部设在罗马城，罗马主教被视为宗教首领，即后来的罗马教皇；而希腊教会的总部设在了君士坦丁堡。拉丁派教会遍布了整个北欧和西欧，也就是世人皆知的罗马天主教会。随着东罗马帝国的衰败，希腊正教（Orthodox Church，即东正教）主要在俄国（Russia）蓬勃发展起来了。但是，现在随着布尔什维克主义（Bolshevism）在俄国的出现，希腊正教或其他宗教已没有了昔日国教的地位。

我提到了东罗马帝国，然而它与罗马没有什么关系。甚至东罗马帝国使用的语言都是希腊语，而不是拉丁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东罗马帝国几乎被认为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帝国（Greek Empire）的延续。它与西欧几乎没有任何往来，然而长期以来，它不承认西欧国家有权独立。但东罗马帝国坚持保留了“罗马”一词，它的人民被称为“罗马人”，似乎这个词有某种魔力一样。更奇怪的是尽管罗马城已不再是帝国的首都，但是它并没有失去任何影响力。甚至当外来蛮族前来征服它时，也显得踌躇不前，对这座城市表现出了一种敬意和尊重。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名字和思想的力量啊！

虽然帝国消失了，但是罗马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帝国。据说耶稣的门徒彼得（Peter）来到了罗马城，成了那里的主教。因此在基督教教徒们的眼中，这座罗马城是神圣不可侵犯

的，也使罗马城这个主教所在地，被赋予了特殊的重要性。起初，罗马主教不同于其他主教，但是当罗马皇帝迁都君士坦丁堡后，他的地位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没有任何人能与他的地位相媲美。当下一任继任者继承了彼得的主教位置后，他就被视为所有主教的首领，此后，这些继任者就被称为了罗马教皇。你知道的，罗马教皇直至今日仍然存在，是罗马天主教会的首领。

令人心生好奇的是，罗马教会和希腊正教分裂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圣像崇拜。罗马教会提倡对圣徒圣像的崇拜，尤其是对耶稣之母——圣母马利亚（Mary）的崇拜；然而，希腊正教则强烈反对这种形式的崇拜。

虽然罗马城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地被北方部落占领和统治，但是这些外来者经常承认在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与此同时，作为宗教首领，罗马主教的权力日益增强，到后来主教已有足够的实力公然对抗君士坦丁堡。尤其是当出现了圣像崇拜之争时，罗马教皇决定将罗马城完全脱离开东罗马帝国的统治。在这段时间内还发生了很多事件，我们会在后面逐一谈到：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并发展了一个新的宗教——伊斯兰教；阿拉伯人遍布了整个北非和西班牙，直至欧洲的心脏；北欧和西欧建立了新的国家；东罗马帝国遭到了阿拉伯人的猛烈攻打。

罗马教皇曾向北方的一支日耳曼民族法兰克人（Frank）的伟大首领请求过援助。之后法兰克人的首领查理（Karl，Charles）在罗马城加冕称帝。虽然这是一个崭新的帝国或国家，但是人们仍称它为“罗马帝国”，之后称它为“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人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罗马的帝国。虽然这个皇帝被称为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或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与罗马没有丝毫关系，但他仍被尊称为“最高统帅”、“恺撒”和“奥古斯都”。这个新帝国被视为旧罗马帝国的延续，但在名字上有所不同，加上了

“神圣”（Holy）一词。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它是一个特有的基督教帝国，罗马教皇是它的教父。

你再一次看到了这种思想的神奇力量。在中欧的一名法兰克人或日耳曼人成了罗马皇帝！关于这个“神圣”帝国以后的历史会让人更觉得奇怪和费解。这个帝国成了一个极其神秘的影子。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一直以独立国家的形式存在着，然而西罗马帝国却在不断改变、消失和重现。事实上，西罗马帝国仿佛是一个幽灵般存在的帝国，在“罗马”这个名字和基督教会的威望下成了一个形式上的国家。这个帝国是想象中的帝国，不具有现实性。我想到了伏尔泰曾这样定义“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帝国既非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还有人这样定义“印度行政参事会”（Indian Civil Service）：“这个机构既非印度，也非行政，更非参事！”不幸的是，生活在印度的我们仍在遭受煎熬。

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形式，神圣罗马帝国以这个名字至少延续了1000年的时间，仅在100多年前的拿破仑（Napoleon）时代才彻底终结。这个帝国的结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事实上，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它实际上早已不存在了。但是，这个幽灵一直飘荡着，远没有销声匿迹。它总是披上了不同的外衣，如皇帝和沙皇，或其他类似的称呼，不断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即使是14年前结束的世界大战期间，这些称呼中的大部分还依然存在。

---

1. 此词原指匈人，后泛指野蛮人或破坏者。——译者注
2. 此词原指汪达尔人，后泛指野蛮人或破坏者。——译者注
3. 凯末尔·阿塔土克死于1938年。

34 ——世界国家的思想

我担心经常给你写信会使你感到厌烦和困惑。尤其是我在前两封信中谈到了一个个罗马帝国，会让你读起来很费劲吧。我的信前后囊括了数千年的历史，跨越了数千英里的国家和地区，如果我让你的脑子有些混乱了，那么错全在我的身上。请不要灰心丧气，坚持下去吧。如果你不能跟上我的思路，也不用烦恼，请继续读下去吧。这些信不仅仅是向你传授历史知识，而是让你对历史有一个宏观的了解，由此激发你的好奇心。

你一定对这些罗马帝国感到厌烦了吧，我承认我也是。但是，我们今天还得再忍耐一下，然后就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

你知道的，现在有很多人谈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也就是对祖国的热爱。如今在印度，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这种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是一个新鲜事物，也许我们会在以后的信里谈到它的起源和发展。在罗马帝国时代是几乎没有民族主义这样的情感的。罗马帝国被认为是统治着全世界的伟大帝国。然而，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帝国或国家能够统治整个世界。但是，由于对地理知识的无知和匮乏，长途交通运输和旅行的艰难险阻，古代人经常认为这样的国家是存在的。因此，在欧洲和地中海沿岸地区，罗马这个国家，甚至在成为一个帝国之前，也被那些弱小的臣服的人们视为一个超级大国。它的威名远扬，甚至连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如帕加马古国、小亚细亚的希腊化国家和埃及，都匍匐在罗马人的脚下，视他们为统治者，他们认为罗马无所不能，根本无法抵挡。然而，我告诉过你，无论是共和国时期还是帝国时期，罗马的统治疆域从来没有越过地中海国家。欧洲北部的“野蛮人”从来没有臣服于罗马，也对此毫不关

心。但是，无论罗马的威名如何，在其身后一直怀揣着“世界国家”（World-State）的思想。那个时期的西方国家大多接受了这个思想。正是这个原因，罗马帝国能够存在如此之长的时间，甚至这个帝国已没有了国家形式上的实体，但它的名字和威望依然能够影响深远。

一个大国主宰世界的思想并不是罗马所特有的。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和印度在古代也是如此。你知道的，中国幅员辽阔，疆域直达里海，远远超过了罗马帝国的版图。中国皇帝被称为“天子”，被中国人视为全世界最至高无上的统治者（Universal Sovereign）。实际上，在中国也有一些部落与之不睦，不服从皇帝的统治。但他们被视为“蛮夷”，就像罗马人称北欧人为“野蛮人”一样。

同样，在印度早期，你总会发现有类似的称呼来形容所谓的全世界最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如查克拉瓦尔蒂诸王。当然，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狭隘的。由于印度的疆域辽阔，所以在印度人的眼里印度就是全世界，他们认为统治了印度就仿佛就是统治了全世界。而疆域以外的民族则被称为“野蛮人”或“野蛮的外国人”。我们的国家被赋予了一个神秘的名字“巴拉特”（Bharat），即印度次大陆。按照传统，这个称呼被认为是查克拉瓦尔蒂的疆域。据《摩诃婆罗多》记载，坚战（Yudhishthira）和他的兄弟们为了争夺这个世界统治权，展开了厮杀。马牺牲（ashwamedha），即以马献祭，这是一种追求统治全世界的表现形式和标志。阿育王可能曾经志在统一世界，但由于陷入悔恨与自责，他停止了一切战争。以后，你会看到印度的其他帝国主义统治者，如笈多（Gupta）王朝的君主们，他们的目标也是统一世界。

因此，你将会看到，古代的人们常常想到这几个词，意指最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和世界国家。很久以后，出现了民族主义和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它们使这个世界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时至今日，我们再一次谈到了“世界国家”这个概念，它既不是一个帝国，也不是一种

最高统治权，而是一种世界共和国（WorldRepublic）的形式。它能够阻止一个国家剥削另一个国家、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这个概念或者类似的概念是否能出现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很难下定论。但是这个世界已误入歧途，似乎已没有别的方法来摒弃陋习了。

我一再提及北欧的“野蛮人”。我用这个词是因为罗马人是这么称呼他们的。这些人就像中亚的游牧民族和其他部落一样，没有邻国罗马或印度那样文明和先进。但是由于他们生活居住在开阔地带，所以他们更加精力旺盛、强健有力。后来他们成了基督徒，但是当他们征服了罗马以后，他们并不是以残暴的敌人的身份出现的。北欧的现代国家就起源于这些“野蛮人”部落，如哥特人、法兰克人和其他部落。

我没有逐一告诉你罗马皇帝们的名字。他们实在是太多了，除了少数几个人以外，其他的皇帝都糟糕透顶，其中还有一些是邪恶的暴君。你一定听说过尼禄（Nero）这位罗马皇帝，但是还有比他更加邪恶残暴的君主。有一个叫艾琳（Irene）的女人为了当上女皇，杀死了当朝皇帝的亲生儿子。这件事就发生在君士坦丁堡。

其中一位罗马皇帝跃然于众帝王之上。他就是马可·奥勒留·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他被认为是一名哲学家皇帝，关于他的思想和冥想的一本书是很值得读一读的。马可·奥勒留的儿子康茂德（Commodus）继承了皇位，然而康茂德却是罗马史上最恶劣的恶棍之一，和马可·奥勒留有着天壤之别。

在罗马帝国最初的300年内，罗马城是西方世界的中心。这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四处矗立着高大的建筑。全国各地的人们和外国人纷纷来到了此地。无数的船只从遥远的国家带来了各种珍品，如稀有的食物和昂贵的物品。据说每年有一支由120艘船舶组成的船队会从红海（Red Sea）的埃及港口出发，驶向印度。他们利用季风应时出海，这给长途航行带来了极大的帮助，通常他们的目的地是南印度。然后，

又在盛行风的帮助下，他们满载着珍贵货物返回埃及。各种商品又经由陆路和海路从埃及运抵罗马城。

但是，所有的贸易主要都是为了富人的利益。在极少数人奢侈享受的背后，是广大民众的苦难。在300多年的时间里，罗马城在西方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君士坦丁堡建立之后，也分享了这一至高无上的地位。令人好奇的是，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罗马城在思想领域没有取得任何伟大的成就，然而古希腊人却在短时期内做到了这一点。事实上，罗马文明似乎在很多方面都是希腊文明的一个影子。只有在一个方面罗马人被认为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那就是法律。即使是现在，西方国家的律师们都要学习罗马法（Roman Law），因为罗马法被视为欧洲现代法律的基础。

大英帝国（British Empire）经常被拿来与罗马帝国相比较——英国人通常这么做，由此得到极大的满足感。所有的帝国差不多都是相似的。它们都是通过剥削他人来发展自己。然而，罗马人和英国人之间有一个极为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他们都非常缺乏想象力！他们都自以为是、沾沾自喜，认为全世界都是以他们的利益而存在的，他们的一生都不会遇到任何不确定因素或困难。

35 ——帕提亚王国和萨珊王朝

我们现在要离开罗马帝国和欧洲，去看看世界的其他地方了。让我们看看亚洲正在发生的事情，继续谈一谈关于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在已知历史的同一阶段里还出现了其他国家，所以我们也要讲一讲这些国家的历史。事实上，只要我们一开始，那可真是有太多太多的地区和国家需要讲述了，多得我都想绝望地放弃了。

在之前的一封信里，我提到罗马共和国军队在帕提亚的卡尔莱战役中惨败了。当时我并没有继续讲述帕提亚人，也没有谈到他们是如何建立起一个国家的，也就是现在的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你应该还记得，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他的将军塞琉古和后代子孙统治了他的帝国，其领土范围位于印度到西方的小亚细亚之间。这个国家繁荣兴旺了约300年，直到被另一支中亚部落帕提亚人驱逐为止。正是这些生活在波斯或帕提亚的帕提亚人在罗马共和国的最后时期击败了罗马军队，就连以后的罗马帝国也不能完全打败他们。在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他们统治了帕提亚，直到国内爆发了革命，他们才被迫选择了离开。波斯人起义，反抗外来统治者，重新恢复了他们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这就是阿尔达希尔一世（Ardeshir I）和他的萨珊王朝（Sassanid Dynasty）。

阿尔达希尔一世是一名虔诚的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你应该还记得吧，这是帕西人的宗教。但是他非常不能容忍其他宗教的存在。萨珊王朝和罗马帝国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不断。他们还成功俘获过一位罗马皇帝。波斯军队有好几次都差点儿攻打到了君士坦丁堡；他们还一度占领了埃及。值得注意的是，萨珊帝国（Sassanid Empire）狂热地崇拜琐罗亚斯德教。当伊斯兰教在公元7世纪传到这里后，不仅灭亡了

萨珊帝国，还终结了这个宗教。由于政局的变化和惧怕遭到迫害，许多琐罗亚斯德教教徒被迫离开故土，来到了印度，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印度一直敞开着怀抱接纳前来寻求庇护的任何人。如今，在印度的帕西人就是这些琐罗亚斯德教教徒的后裔。

在对待不同宗教的态度方面，把其他国家和印度相比较是一件相当奇妙的事。在大多数地方，尤其是在欧洲，你会发现历史上曾出现了绝不容忍乃至迫害那些公开不信奉官方信仰的人的情况。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几乎都发生过这样的迫害行为。你一定读到过关于欧洲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和烧死所谓的女巫的故事。但是，在印度的古代，对宗教几乎是完全包容的。印度教和佛教之间的小分歧简直不能与西方宗派之间的暴力冲突相提并论。不幸的是，我们要记住，我们国家的不同教派团体之间在最近出现了纠纷和骚乱。有些人忘记了历史，认为这正是印度从古至今的历史命运。这完全是错误的。这些骚乱是最近才出现的。你会发现，自伊斯兰教出现以后，数百年来穆斯林们生活在印度各地，与其他宗教和平相处。当初穆斯林们来到印度是为了进行经商贸易，他们不仅受到了热烈欢迎，还被允许在此定居。但是现在，我只能期待宗教之间能再度和平共处。

所以，印度欢迎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们的到来。数百年前，即公元1世纪，印度也接纳了因宗教迫害从罗马逃亡而来的犹太人。

在萨珊王朝统治波斯期间，一个沙漠小国在叙利亚（Syria）的帕尔米拉（Palmyra）繁荣发展起来了，并有了短暂的辉煌时期。帕尔米拉是位于叙利亚沙漠中部的一个贸易交易中心。如今保存下的古迹废墟告诉我们，这里曾矗立着高大的建筑。这个国家曾经被一名叫季诺碧亚（Zenobia）的女人所统治。但是，她被罗马军队打败了，罗马人毫无风度地给她戴上了枷锁并带回了罗马。

叙利亚在基督纪元伊始曾是一片乐土。《新约全书》对此有所描述。尽管这个国家治理不善且实行专制统治，但出现了大型的城镇和

密集的人口，还有大型的灌溉水渠和繁荣的贸易往来。但是，持续不断的战争和暴政使这个国家在600年间几乎变成了一片荒芜之地——大型城镇所在地变成了沙漠，古老的建筑变成了废墟。

如果你乘坐飞机从印度到欧洲，你就会飞过帕尔米拉和巴勒贝克（Baalbak）的遗迹。你会看到这里曾是巴比伦和其他很多历史圣地的所在地，而现在则一片荒芜、了无踪迹。

36 ——南印度殖民地

我们已经旅行得太远了，让我们现在再次回到印度，看一看我们的祖先们在这个时期做了些什么吧。你还记得位于印度交界地区的贵霜帝国吧。这个伟大的佛教国家覆盖了整个印度北部地区和中亚部分地区，首都位于白沙瓦。你也许记得在这个时期，南印度出现了一个国家，领土面积从海的一头延伸到了另一头，这就是安得拉王国。贵霜帝国和安得拉王国繁荣了约300年。但在公元3世纪中叶左右，这两个国家就烟消云散了。印度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了若干小国。然而在100年内，另一个叫旃陀罗笈多的人出现在了巴连弗邑，他野心勃勃地开启了印度帝国主义时代。但是，在我们开始讲述被人们称作笈多王朝的历史之前，我们应该先看一看在南印度兴起的某些伟大的行业，印度的艺术和文化被传播到了东方遥远的群岛上。

你很清楚印度的地理形状吧，它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和两大洋之间，北部地区则远离大海。在过去，印度的统治者们主要关注陆地边界，因为敌人和入侵者常常越过边界来进犯印度。但是印度的东、西、南三个方向都有蜿蜒漫长的海岸线。海岸线越往东，印度的疆域面积就越狭小，与西方国家在肯亚库玛利（Kanya Kumari）——科摩林角接壤。临海生活的人们天生对大海充满了好奇，甚至有人期望他们中的很多人能成为航海家。我告诉过你，从最久远的时期开始，南印度就已经和西方国家有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因此，我们可以毫不惊讶地发现，从很早的时期开始，印度就出现了造船业，人们漂洋过海经商贸易，或者也许是为了冒险。有人认为，在乔答摩生活在印度的时候，维贾亚（Vijaya）从印度来到了锡兰，并且在锡兰建立了一个国家。我想，阿旃陀石窟记载的应该就是这段历史。维贾亚驾驶着船

只，满载着马和大象，漂洋过海到达了锡兰。他把这个岛屿命名为僧伽罗（Sinhala），即僧伽罗国（Sinhala Dweep）。“Sinhala”一词来源于“Sinha”（辛哈），意思是“狮子”。在锡兰至今仍流传着关于一头狮子的古老传说，但是我忘记这个故事了。我认为，“Ceylon”（锡兰）一词就衍生自“Sinhala”。

当然，从南印度到锡兰只是一次小小的横渡，算不上一个伟大的壮举。但是，我们有了关于造船业的大量历史证据，还有证据表明从孟加拉到古吉拉特（Gujrat）的海岸线上分布着许多印度的港口，人们从这些港口出发穿越了大海。我曾在奈尼监狱写信告诉过你，旃陀罗笈多·孔雀的大臣考底利耶在他的《政事论》中向我们讲述了关于海军的构想。希腊使节麦加斯梯尼曾到过旃陀罗笈多的皇宫，他也提到了这一点。所以，由此可见，在孔雀王朝初期，造船业在印度就已经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了。显然，建造船舶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用。所以，当时肯定有大批的人驾驶着船只出海。想到这里不由得让人觉得奇怪和有趣，但是同样让人感到奇怪和有意思的是，今天我们当中的有些人却害怕跨越海洋，还认为这种行为有悖于他们的宗教。我们不能认为这些人是历史的糟粕，因为，你已经看到了，过去的人们可比那些人更有头脑。幸运的是，这种离奇的想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几乎没有人再受它的影响了。

自然而然地，相较于北方地区而言，南方地区在地理上更多地临近大海。大部分的对外贸易都出现在南方。泰米尔人的诗歌中大量提到了“亚梵那”（yavana）美酒、花瓶和照明器皿。“亚梵那”主要是指希腊人，可能也泛指所有的外国人。公元2、3世纪的安得拉硬币上刻有大型双桅帆船，由此可见，当时的安得拉人热衷于造船和海外贸易。

因此，南印度在很多行业都处于领先地位，还在东边的群岛上建立了印度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式远行始于公元1世纪，持续了数百年。

印度人的足迹遍布了马来半岛（Malay）、爪哇岛（Java）、苏门答腊岛（Sumatra）、柬埔寨（Cambodia）和婆罗洲岛（Borneo），他们不仅在这些地方定居下来，还带去了印度的文化和艺术。在缅甸、暹罗和中南半岛出现了大型的印度殖民地。印度人甚至还借鉴了印度的地名，给这些新城镇和新定居点命名，如阿约提亚、哈斯蒂纳普尔、塔克西拉、犍陀罗等。历史的重现是一件多么奇异的事啊！到达美洲的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于是古代英国的城市名就出现在了今天美国的大地上。

毫无疑问，与其他所有殖民者一样，印度殖民者所到之处是不会彬彬有礼的。他们一定剥削和奴役了岛上的原住民。但是一段时间后，殖民者和原住民相互融合，因为殖民者很难保持与印度长期往来。他们在东部岛屿上建立了信奉印度教的殖民地，后来信奉佛教的统治者也来到这些岛屿。于是印度教教徒和佛教教徒之间就出现了统治权之争。这是一个漫长而引人入胜的故事，被称为“大印度”（Further or Greater India）。巨大的遗迹废墟向我们展示了曾经点缀在印度人定居点的伟大建筑和庙宇。这些伟大的城市都出自印度建筑者和手工业者之手，如真腊（Kamboja）、三佛齐（Sri Vijaya，又译作室利佛逝）、吴哥窟（Angkor the Magnifcent）和满者伯夷（Madjapahit）。

印度教国家和佛教国家在这些岛屿上统治了近1400年，有时为统治权相争，此消彼长，偶尔又会相互破坏。在公元15世纪时，穆斯林最终取得了统治权，不久以后就是葡萄牙人（Portuguese）、西班牙人（Spaniard）、荷兰人、英国人，最后是美国人。当然，中国一直以来都是这些地区的近邻，有时会干涉、调停，有时会征服、占领；但更多的时候是和睦相处、互惠互利；中国伟大的文化和文明也一直影响着这些地区。

位于东边的印度殖民地的历史也让我们颇有兴趣去做一番了解。其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些殖民地显然是由当时南印度的一个主要政权来统治的。起初只是很多个人探险者来到这些地方；然后，随着贸易的发展，很多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全家或成群结队地前往。据说，早期的定居者主要来自羯陵伽国，即奥里萨邦，以及东海岸地区。也许还有人来自孟加拉。甚至有人不断从古吉拉特而来，这些人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家园来到了这些岛屿，由此形成了一种惯例。但是，这些仅仅是推测。殖民者主要还是来自帕拉瓦（Pallava）——泰米尔（Tamil）的南部地区，由帕拉瓦王朝统治。这个王朝还统治了马来群岛（Malaysia）的殖民地。也许是因为北印度人的大批南迁造成了人口压力。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些殖民地广泛地分布在远离印度的诸多地方，定居点的精心设计和殖民地的建立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这些定居点分布在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婆罗洲岛、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和其他地方。所有这些地区都是帕拉瓦王朝的殖民地，它们的名字都具有印度地名的特点。在中南半岛，有一个殖民地叫真腊，即现在的柬埔寨，这个名字就源自位于犍陀罗国的喀布尔河流域（Kabul Valley）的真腊。

在长达400或600年的时间里，这些殖民地都信奉印度教。后来，佛教逐渐传播到了这些地方。很久以后，伊斯兰教传入了这些殖民地和马来西亚部分地区，有些人转而信奉伊斯兰教，有些人仍然信奉佛教。

在马来西亚，帝国和王国在不停地更迭交替。但是，南印度殖民扩张所带来的真正影响是印度雅利安文明被传播到了世界的这个角落。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现在的马来西亚人和我们一样隶属于同一个文明。当然，他们也受到了其他文明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文明的影响。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强大文明，即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里交织融合。有些方面更具有印度的特点，而有些方面则更具有中国的特征。在某些内陆国家和地区，如缅甸、

暹罗和中南半岛，中国文明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某些岛屿地区，如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和其他岛屿，印度文明的影响则较为明显，也有近代伊斯兰教的某些影响。

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是没有任何冲突的。虽然它们极为不同，但是如平行线般各自发展，互不影响。当然，无论是印度教还是佛教，都发源于印度。中国的宗教也源自印度。在艺术方面，印度对马来西亚的影响非常巨大。甚至在深受中国文明影响的中南半岛，岛上的建筑样式也完全是印度风格的。中国对这些大陆国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治国方式和人生哲学上。因此，相较于印度人而言，现在的中南半岛、缅甸和暹罗似乎更像是中国的近亲。当然，就人种而言，这些国家的人们更具有蒙古人的血统，所以就某种程度而言，他们的相貌和中国人很相似。

如今，爪哇岛的婆罗浮屠（Borobodur）佛塔群被认为是印度的能工巧匠所建造的伟大佛教寺庙。关于释迦牟尼一生的故事被雕刻在了建筑物的墙壁上，这是一座纪念释迦牟尼和当时印度艺术水平的独特丰碑。

印度的影响还传到了更遥远的地方，传到了菲律宾（Philippines），甚至还传到了中国台湾。这两个地方曾一度隶属于苏门答腊岛上以印度教为政体的三佛齐国（Sri Vijaya Kingdom）。很久以后，菲律宾落入了西班牙人的统治之下，现在则处于美国人的统治之下。不久前，一个新的立法机构大楼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Manila）落成了。建筑物的正面有四尊人物雕像，代表了菲律宾文化的源头。这四尊雕像分别是摩奴（Manu），古印度法典的缔造者；老子，中国古代哲学家；另两尊雕像分别代表了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和司法体系，还有西班牙。

37 ——笈多王朝下的印度帝国主义

印度南部的人们漂洋过海，在遥远的地方建立起了新的定居点和新的城镇，然而此时的印度北部地区却出现了奇怪的动乱。贵霜帝国日益衰微，已不复昔日的强盛，国土面积也越来越小，逐渐走向了没落。整个北部地区出现了许多小国家，其统治者大多是萨卡人或斯基泰人或突厥人，这些外来民族跨过西北边界来到了印度。我告诉过你，这些人都是佛教教徒，他们来到印度不是为了侵略掠夺，而是为了在此定居。他们遭到了中亚地区其他部落的无情驱逐，而那些部落又遭到了中国的驱离。这些民族一来到印度就接受了印度雅利安人的习俗和传统。他们将印度视作了宗教、文化和文明的母国。

贵霜人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印度雅利安人的传统。事实上，这就是他们能在如此长的时期里统治印度大部分地区的原因。他们竭力使自己的行为举止像印度雅利安人，他们想让印度人民忘记他们是外来者。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不是完全做到了，因为刹帝利对于外来统治者感到尤为恼怒。他们十分不满处于这些外来民族的统治下，于是国内动乱频发，人们的思想也变得混乱起来了。不满的人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者，在他的旗帜下开始了为争取雅利亚伐尔塔自由的“圣战”。

这位领导人名叫旃陀罗笈多。但请不要把他和另一位旃陀罗笈多弄混了，那一位是阿育王的祖父。这一位旃陀罗笈多与孔雀王朝没有任何关系。他恰好是巴连弗邑的一位国王(注)。然而此时，阿育王的后代们早就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了。你一定还记得，我们现在讲述的历史是公元4世纪初期的历史，即公元308年左右，这个时候距离阿育王逝世已有534年了。

旃陀罗笈多野心勃勃、才能卓越。首先，他争取到了北部地区雅利安部落首领们的支持，并与他们结成了联盟。之后，他与众所周知的强大部落梨车族的公主鸠摩罗提毗（Kumara Devi）联姻，由此获得了这个部族的支持。经过精心准备后，他向印度的所有外来统治者发出了“圣战”的声明。被外来统治者剥夺了权力和地位的刹帝利和雅利安贵族们成了这场战争的有力支持者。经过12年的战争，旃陀罗笈多成功取得了北印度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包括现在的联合省。之后，他加冕自己为“王中之王”。

于是，笈多王朝开始了长达约200年的统治，直到匈人的入侵使之土崩瓦解为止。在某种程度上，这段时间是激进的印度教和民族主义的时期。外来统治者，如突厥人、帕提亚人和其他非雅利安民族，统统被连根拔起且被强行驱赶了出去。因此，我们也看到了种族对立局面的出现。印度雅利安人的贵族们以本民族为荣，轻视那些蛮族和外国人。笈多王朝征服了印度雅利安诸国和统治者，并且善待他们，但是对非雅利安民族则毫不留情。

旃陀罗笈多的儿子叫沙摩陀罗笈多（Samudragupta），他更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好战者，尤胜于他的父亲。沙摩陀罗笈多是一位伟大的将军。在登基后，他便开始在国内四处征战，包括印度的南部地区，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他扩大了笈多帝国（Gupta Empire）的版图，占领了印度大部分地区。但是，他的君主地位在南方则有名无实。在北方，贵霜人被驱赶到了印度河的另一边。沙摩陀罗笈多的儿子旃陀罗笈多二世（Chandragupta II）也是一位好战的君王。他征服了卡提瓦半岛和古吉拉特，这两个地方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萨卡人或突厥人的统治下。他的王号是“超日王”（Vikramaditya），人们熟悉的也往往是他的这个名号。但是，这个名字就像“恺撒”一样，成了很多统治者的王号，因此常常使人困惑不已。

德里的古特伯高塔（Qutub Minar）附近有一根巨大的铁柱，你还记得吗？据说，这根柱子就是超日王下令建造的，它是“胜利之柱”（Victory Pillar），也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在顶部雕有一朵象征帝国的莲花。

笈多王朝处于印度帝国主义时期，出现了古老的雅利安文化和梵文学习的复兴。希腊人、贵霜人和其他民族曾影响了印度人民的生活和文化。然而在笈多王朝时期，古希腊和蒙古文化不再受到推崇。事实上，印度雅利安的文化传统重新得到了重视并逐渐有意地取代了上述外来文化传统。梵语成了官方宫廷语言。但是，即使在那个时期，梵语仍不是印度人民的通用语言。通用语言是一种古印度语普拉克利特语（Prakrit），与梵语近乎相似。虽然梵语在当时不是印度的通用语言，但非常活跃，出现了梵语诗歌戏剧和印度雅利安艺术的繁荣。在梵语文学史上，继出现了《吠陀经》和两大史诗作品——《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的伟大时期之后，这段时间也许是最繁荣的时期了。著名作家迦梨陀娑（Kalidasa）就生活在这个时期。据说，超日王的宫廷里星光熠熠，云集了最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你听说过超日王的后宫九大学者即“后宫九宝”（Navaratna）吗？据说迦梨陀娑就是其中之一。

沙摩陀罗笈多把帝国的首都从巴连弗邑迁到了阿约提亚。也许他认为对于他雄心勃勃筹划的印度雅利安宏伟蓝图而言，阿约提亚是更为合适的大后方。诗人跋弥（Valmiki）的叙事诗中有着歌颂罗摩占陀罗的不朽篇章。

在笈多王朝时期，雅利安主义和印度教的复兴并不有利于佛教的发展。一个原因是这场复兴运动是刹帝利首领支持的贵族运动，而佛教更多的是提倡民主；另一个原因是之前的北印度统治者贵霜人和其他外族统治者更推崇大乘佛教。但是，笈多王朝时期似乎没有出现迫害佛教教徒的行为。佛教寺院仍在继续发展，仍然是重要的教育场

所。同时，笈多王朝与佛教繁荣的锡兰有着密切友好的联系。锡兰统治者弥迦梵那王（Meghavarna）向沙摩陀罗笈多馈赠了昂贵的礼物，还在加雅岛为僧伽罗国的学生们建立了一座佛教寺院。

但是，佛教在印度仍然逐渐走向了衰落。这种趋势是必然的。我之前告诉过你，佛教衰落的原因不是由于婆罗门或当时朝廷的外部压力，而是由于印度教逐渐将其同化融合的结果。

在这段时间，一位有名的旅行者从中国来到了印度，他不是我以前提到的玄奘，而是法显。他是一名佛教教徒，为追寻佛教经典而来到了印度。他在著作中告诉我们，摩揭陀国的人民幸福富裕，统治者的管理温和公正，也没有死刑的处罚；加雅岛是一片荒芜之地；迦毗罗卫城（Kapilavastu）成了一片丛林；在巴连弗邑，人们“富有、繁荣且品德高尚”。那儿有很多富丽堂皇的佛教寺院。沿着主干道还有很多达哈马萨哈（dharmashala），旅行者们可以住在那里并享有供给公众的免费食物。在这个伟大的城市里还有免费的医院。

法显在印度四处游历后来到了锡兰，并在那儿度过了两年的时间。但是，他的同伴道整十分热爱印度，佛教僧侣的虔诚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决定留在印度。法显乘船从锡兰返回中国，经历了无数坎坷和多年的在外游历，他终于回国了。

旃陀罗笈多二世，即超日王，在位约23年。在他死后，其子鸠摩罗笈多一世（Kumaragupta I）在位40年。接下来的统治者是塞建陀笈多（Skandagupta），于公元453年继任。他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威胁，这个威胁最终毁灭了笈多帝国的元气。不过，这一段历史，我会在后面的信里讲述。

阿旃陀石窟和大厅圣堂的精美壁画是笈多王朝艺术的代表。当你看见这些杰作时，你就会意识到它们是多么美妙绝伦。不幸的是，这

些壁画正在缓慢地消失，因为在长时间的风吹日晒下，它们是不可能长存于世的。

在笈多王朝统治印度时期，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与旃陀罗笈多一世（Chandragupta I）处于同一时代的君士坦丁大帝建立了君士坦丁堡。在笈多王朝后期，罗马帝国分裂成了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而西罗马帝国最终被北方“蛮夷”部落取代了。因此，在罗马帝国走向衰落时，印度却是一个繁荣强盛的国家，有伟大的将领和强大的军队。沙摩陀罗笈多有时被称为“印度的拿破仑”。虽然他野心勃勃，但他没有去征服印度边界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笈多王朝时期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时期，是征服的时期，是胜利的时期。每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有很多类似的帝国主义阶段，但是就长期来看，它们在历史上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然而，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笈多王朝脱颖而出，成了印度历史上一段值得骄傲和纪念的时代呢？那是因为它见证了艺术和文学的辉煌复兴。

---

1. 根据史料记载，此时巴连弗邑的国王是格拉巴伐尔曼。——译者注

38 ——来到印度的嚈哒人

一个新的威胁越过了西北部群山，突然降临在了印度，那就是来自匈人的威胁。在我们谈论罗马帝国的前几封信里，我提到了匈人。在欧洲，他们最伟大的领袖是阿提拉（Atila），其赫赫声名多年来一直在威吓着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与这个匈人部落相似的是另一支部落，被称为嚈哒人或白匈奴人（White Hun）㊟，他们几乎同时来到了印度。嚈哒人也是中亚的游牧民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一直沿着印度边境游弋，长期骚扰印度边境地区。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或许是因为受到来自后方的其他民族部落的侵扰，他们开始有规律地侵犯印度。笈多王朝的第五任国王塞建陀笈多㊟就不得不面对嚈哒人的进犯，他亲率大军击退了敌人的入侵。但是，十几年后，嚈哒人再度来袭。逐渐地，他们占领了犍陀罗和北印度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对佛教教徒施以酷刑，无恶不作，令人毛骨悚然。

笈多王朝的人民为了抵抗入侵，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斗争，但是并不能完全将他们赶出印度。嚈哒人一波接着一波地不断进犯，势力范围逐渐遍布了整个中印度（Central India）。他们的领袖头罗曼（Toroman）自封为王。这个人凶狠暴虐，他的儿子摩醯逻矩罗（Mihiragula）更胜一筹，是个彻头彻尾的残暴无道的恶棍。在凯尔哈那所著的有关克什米尔诸王的历史，即《罗阇塔兰吉尼》一书中，向我们讲述了摩醯逻矩罗酷爱的一种消遣娱乐方式，那就是把大象赶到悬崖峭壁边上，然后使大象跌落到峡谷里。他的暴行最终唤醒了雅利亚伐尔塔人民（即北印度人民）。在笈多王朝的婆罗阿迭多王（Baladitya）和中印度的统治者耶输达曼王（Yashodharman）的带领下，他们打败了嚈哒人，俘获了摩醯逻矩罗。但是，与嚈哒人不一样

的是，婆罗阿迭多王是一名侠义正直的君主，他宽恕了摩酰逻矩罗，只是让他远离印度。摩酰逻矩罗逃难到了克什米尔。后来他背信奸诈地再次起兵攻打对他宽厚仁慈的婆罗阿迭多王。

然而不久以后，哌哒人的实力在印度日趋衰落。但是，他们的后裔留在了印度，并逐渐和雅利安人融合了。居住在中印度和拉杰普塔纳的某些拉杰普特人的身体里还流淌着哌哒人的血液。

哌哒人统治印度北部的时间非常短，还不到50年。随后，他们定居下来，休养生息，与当地居民和平共处。但是，哌哒人带来的战争和恐怖行径给印度雅利安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哌哒人的生活方式和政府体制与雅利安人完全不同。在很大程度上，雅利安人是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即使是国王也不得不服从人民的意愿。他们的村务委员会能行使较大的权力。但是，随着哌哒人的侵入、定居和与印度人民的融合，雅利安人曾经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体制发生了不小的改变，甚至还出现了倒退。

婆罗阿迭多王是笈多王朝的最后一任君主，卒于公元530年。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位君王的家族历来是虔诚的印度教教徒，但他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他的古鲁（Guru）注是一名佛教僧侣。尤为世人所知的是，笈多王朝复兴了对克利须那的崇拜，但是这似乎与佛教没有任何明显的冲突。

笈多王朝统治200年以后，我们再次发现印度北部地区出现了诸多独立于中央统治以外的国家。然而，在印度南部地区，此时一个伟大的国家正在形成并发展。一个叫普拉凯辛（Pulakesin）的统治者宣称自己是罗摩占陀罗的后裔，他在印度南部建立起了一个帝国，即遮娄其帝国（Chalukyan Empire）。印度南部人民与东部群岛的印度殖民地联系紧密，人们不断地来往于群岛与印度大陆之间。我们还看到印度船只频繁地将货物运抵波斯。遮娄其王朝与波斯帝国的萨珊王朝互

派使节，尤其是在萨珊王朝的伟大统治者库思老二世（Khusrau II）在位期间。

---

1. 根据史料记载，哌哒人曾自号匈奴，南下入侵笈多印度，他们实际上是汉代大月氏人的后裔，故也被误称为匈奴人或白匈奴人。为了与中国汉代的匈奴民族区别，本文采用了中国史学家的称呼，即“哌哒人”。后同。——译者注
2. 据史料记载，塞建陀笈多应是笈多王朝第六任国王。——译者注
3. 古鲁，指印度教等宗教的宗师或领袖。——译者注

39 ——印度对外国市场的控制

纵观我们所谈论的古老历史已逾一千多年了，我们发现印度的商业，西至欧洲和西亚，东抵中国，都出现了蓬勃兴旺的发展势头。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不仅仅是因为那个时期的印度有着优秀的航海员和成功的商人，当然他们也的确优秀；也不仅仅是因为印度的手工艺技术精妙绝伦。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印度商业的发展。但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印度在化工业，尤其是染织行业里取得的进步，使印度拥有了对海外市场的控制权。在当时，印度人似乎掌握了一种特殊的方法，即用不褪色的染料来印染布匹的工艺。他们还掌握了从植物中提取靛蓝染料的特殊工艺。你会注意到，“靛蓝”一词就源自印度。或许古印度人还知道如何使钢铁回火后具有适度的韧性，以便于制造出精良的铁制武器。你也许还记得，我告诉过你关于亚历山大大帝征战古波斯的故事，我曾提到过当时就出现了制作精良的刀剑或匕首，据说这些武器就出自印度。

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印度拥有更好的染织技术和其他物品，所以自然而然地印度就能占有更大的市场。从长远来看，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掌握了更好的工具，或者掌握了制造物品的更好更低廉的方法，那么这个人或这个国家就一定会把没有好工具或好方法的其他人或其他国家挤出市场。这就是欧洲能在过去的200年里领先于亚洲的原因。新发现和新发明给欧洲带来了崭新强大的制造工具和生产方式。在这些新工具和新方式的帮助下，欧洲占领了世界市场，变得繁荣富强起来。当然，欧洲的繁荣富强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是，此刻我希望你能想一想，拥有好的方法和好的工具是多么重要。一位伟人曾经说过，人类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从历史最早期开始到现在，人类的历

史就是一部拥有越来越高效工具的历史——从石器时代（Stone Age）的早期石料、箭镞和锤状物到现代的铁路、蒸汽机和大型机械。事实上，我们所做的几乎每一件事都需要使用工具。如果没有了工具，我们该何去何从呢？

工具是一个好东西，它能减轻工作负担。但是，工具也可能遭到误用。

锯子是一件有用的工具，但是小孩子也许会在使用锯子的时候误伤了自己。刀是你所用过的最有用的工具之一。每个人一定会有一把刀。然而，愚蠢的人也许会用刀去杀死别人。这可就不是这把可怜的刀的过错了，而是误用了这把工具的人所犯下的错。

同样，现代机械本身是好的，但一直以各种方式被滥用、误用。它没有减轻人民大众的工作负担，反而使他们的处境与以前相比变得更糟糕了；它没有给亿万人民带去幸福和安逸，而实际上是本应如此的；相反，它给人民带去了穷困和不幸；它让政府手中拥有了更多的力量，能在战争中杀戮千千万万的人民。

但是，过错并不在于机械，而在于对它的错误使用。如果大型机械不是由那些不负责任且一心想赚钱的人在操纵，而是由那些代表了普通民众且为民众谋取福祉的人所操纵，那么结果就会大不一样。

所以，与现在有所不同的是，印度在过去以制造工艺而位居世界的前列。所以，印度的布料、染料和其他货物被运送到了其他遥远的国家，受到了这些国家的欢迎和追捧。这样的贸易给印度带来了大量的财富。除此之外，南印度还出现了胡椒和其他调味品。这些调味品来自东部群岛，经印度传到了西方。胡椒在罗马和西方国家尤为受到重视。据说，一位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Alaric）于公元410年占领了博尔纳，掠走了约3000磅的胡椒。所有的这些胡椒要么是来自印度，要么是经印度运送出去的。

40 ——国家与文明的盛衰沉浮

距我们上次谈论中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现在让我们再次开始，继续讲述中国的历史吧，让我们看一看当罗马在西方日趋衰落和印度在笈多王朝的统治下重现生机的时候，中国正在发生着怎样的故事呢？罗马的兴衰起伏对中国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因为这两个国家相距甚远。但是，我以前告诉过你，中国的王朝把中亚的某些部落驱离了中国国境，而这些部落给欧洲和印度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些部落，或者是被他们驱离的其他部落，向西方和南方迁徙，给其他国家和地区带去了不安和骚乱。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东欧和印度定居了下来。

事实上，罗马和中国之间曾有过直接的往来，也曾互派过使节。据说中国史书中记载的最早遣使中国的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安敦（An-Tun），发生在公元166年。这个安敦就是我在前面的信里提到的马可·奥勒留·安东尼(注)。

罗马的衰落在欧洲是一件影响极为深远的事件，这不仅仅是一座城池或一个帝国的衰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堡存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帝国的幽灵在整个欧洲上空盘旋了大约1400年。但是，罗马的衰落代表了一个伟大时期的结束，也代表了希腊和博尔纳（罗马）的古代世界的终结。在罗马的废墟上，西方正冉冉升起一个新的世界、新的文化和新的文明。我们现在会被某些词所误导，因为我们发现这些词在以前曾被使用过，我们往往以为这些词有着同样的含义。博尔纳衰落后，西欧继续使用博尔纳的语言，然而在语言的背后却包含着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含义。人们认为，今天的欧洲传承自希腊和博尔纳。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的确是事实。但是，

这种说法也是一种误导。因为欧洲国家在某些方面与希腊和博尔纳是完全不同的。博尔纳和希腊的旧世界几乎已经完全倒塌瓦解，建立在这个旧世界基础上的千年文明已经衰败腐烂。于是，半文明半野蛮的西欧国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慢慢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文化和文明。他们大量学习罗马的经验，借鉴了旧世界的模式和思想。但是，这个学习借鉴的过程是困难而费力的，因为欧洲的文化和文明似乎在数百年间都在昏睡之中。这是一段无知而盲从的黑暗时代，所以这几个世纪被称为欧洲的“黑暗时代”（Dark Ages）。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世界会走向黑暗呢？为什么经过了数百年努力而积累的知识会消失或被遗忘了呢？这些问题太难回答了，即使是我们中最聪明的智者也感到非常苦恼。我也没法回答。印度曾是思想和行动的巨人，却衰落到了如此凄惨可悲的境地，甚至长期以来沦为一个被奴役的国家，这难道不奇怪吗？曾有过辉煌灿烂历史的中国却成了长期争斗下的猎物，这难道不奇怪吗？也许，人类通过一点一滴而积累起来的数千年的知识和智慧是不会消失的。但是，我们不知何故闭上了双眼，我们经常看不见外面的事物。窗户的紧闭带来了一片黑暗，但是外面的世界一片光明。如果我们一直紧闭双眼或关上门窗，这并不意味着光明就消失了。

有人认为，欧洲的黑暗时代得归因于基督教——这里说的基督教不是指基督耶稣的宗教，而是指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其合法地位后在西方繁荣发展起来的官方基督教。事实上，有些人认为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4世纪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就是“开启了千禧之年（即一千年）。在这一千年里，理性被禁锢，思想遭到控制，知识毫无进步”。这不仅带来了迫害、盲从和偏执，而且还使人们难以在科学或其他领域取得进步。“圣”书常常会成为进步的绊脚石。它们告诉了我们世界就是书中所写的样子，它们告诉了我们那个时期该有的思想和习俗。没有人敢挑战这些思想或习俗，因为它们被载入了“圣”书。所以，虽然世界也许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我们不允许

改变自己的思想和习俗来适应这个变化的世界。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无法适应变化的世界，这肯定就成了一个问题。

所以有些人指责，是基督教给欧洲带去了黑暗时代。但另外有一些人告诉我们，正是基督教和神父们在欧洲的黑暗时代里点亮了一盏启迪之灯，正是他们使艺术和绘画一直得到了发展，他们还小心地保存和誊写了很多有价值的书籍。

于是人们围绕这个话题争论不休。或许双方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说基督教应该对造成罗马衰亡的所有恶行负全责，那可简直是太荒诞可笑了。事实上，罗马的衰亡是由于其自身的种种罪恶造成的。

我又扯得太远了。我想对你指出的是，当欧洲突然出现了社会崩塌时，中国和印度却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在欧洲，我们看到了一个文明的终结，也看到了缓慢发展到现在的另一个文明的开始。在中国，我们看到了有着同样高度的文化和文明的延续，没有出现任何中断。这就是文明的沉浮，繁荣与兴衰的交替更迭，贤君与恶主的你来我往，朝代与皇廷的改姓易代。但是，文化的传承生生不息、永不中断。即使当中国分裂成若干个诸侯国且彼此争战不休时，艺术和文学仍得到了繁荣和发展，出现了出神入化的画作、精美绝伦的瓷器和美轮美奂的建筑物。印刷术被人们普遍使用，品茶成了人们争相追捧的对象，也得到了人们的吟诗称颂。这就是由高度文明发展而来的生生不息的中国的优雅魅力和艺术。

印度也同样如此。印度没有像罗马那样出现突然性的社会崩塌。当然，印度有繁荣和衰落的时期，有灿烂文学和艺术创造的时期，也有破坏和腐朽的时期。但是，它的文明还是沿着既定的模式在延续，并传播到了东方的其他国家。它的文明还同化和教化了前来掠夺的外夷蛮族。

请不要以为我在竭力赞美印度或中国，一味地贬低西方国家。关于印度或中国的现状，没有什么好值得夸耀的。甚至连盲人都能看出来，曾经有过灿烂历史的印度和中国现在已经倒退了，落后了。如果它们过去的文化未曾被中断，那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文化不会变得更糟。如果我们过去曾经辉煌过，现在却落后了，那么我们显然居于世界的末流。我们也许会欣慰于我们文化的传承延续，但是当文明本身已失去了活力的时候，那这样的欣慰就乏善可陈了。如果我们的文化曾被突然中断过，这也许对我们反而更好，也许会让我们重新振作起来，注入新的生命和活力。或许当今世界和印度正在发生的一切就是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的推动力，它能使我们国家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印度曾有的活力和毅力似乎孕育在了普遍的村落共和体制或自治村务委员会体制中。在过去，印度没有大地主和地税征收者，而现在却有了。过去土地是属于村务委员会的村社共有，或者属于耕种的农民。这些村务委员会有着极大的权力和权威。委员会的成员由村民们选举产生，因此这个体制有着民主的基础。虽然历代君王你来我往或者彼此争夺，但是他们都没有触及或干涉这种村落体制，也不敢剥夺村务委员会的特权。所以，当一个又一个的帝国在换代更替时，以村务委员会体制为基础的社会构架却一直延续着，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化。关于侵略、战争和统治者更替的记述让我们误以为这些影响了印度人民。当然，人民有时确实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在印度北部地区。但是就整体而言，可以这么说，尽管上层统治阶级出现了变化更替，但是人民大众对此并无担忧，社会构架也一直在延续。

长期以来加强了印度社会制度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印度本来就存在的种姓制度。那时的种姓制度并没有后来的那么僵化死板，也不由出身决定。这个制度使印度人民的群体生活维持了数千年之久。只能如此的原因不是为了阻止变化或发展，而是为了允许变化或发展的出现。古老印度对于宗教和生活的观点往往是一种宽容、尝试和变化的

态度，而这就赋予了印度力量。然而，不断的侵略和其他动乱逐渐使种姓制度变得越来越僵化，而越来越僵化的种姓制度使得印度的发展前景变得更加死板僵硬，更加难以改变。这个过程一直持续着，直到印度人民沦落到现在的悲惨境地，直到种姓制度成了每一个进步的敌人。种姓制度已不能使社会各阶级团结在一起，反而是把社会分裂成了数百个群体，使印度衰微不堪、同胞相争。

因此，种姓制度在过去有助于加强印度的社会制度。但是，它播下了腐朽的种子。它是建立在永远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基础之上的，而任何这样的做法都会以失败而告终。没有任何一个健全稳定的社会能建立在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基础之上，或者建立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基础之上。因为现在仍然有不公平的剥削，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到处充满了动乱和不幸。但是，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民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在为反抗剥削而努力奋斗着。

在印度和中国也是一样，社会制度的力量蕴藏在农村，蕴藏在千千万万拥有土地和耕种土地的农民身上。那些大地主身上并没有蕴藏社会制度的力量。宗教从未被允许进行教条化或变得偏执、狭隘。在全世界的所有民族中，中国人也许是一直以来并且仍然是最不盲信于宗教的民族。

你要再次记住，印度和中国没有像希腊、罗马和早期的埃及那样出现劳动型的奴隶。但是出现了身为奴隶的家仆，只不过这些人对社会制度的影响非常小。即使没有奴隶，这个社会制度仍会以同样的方式一直发展下去。但是，古代的希腊或罗马并不会这样，因为大批量的奴隶是这两个国家体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所有工作和劳动的重担都压在了奴隶们的肩上。埃及也是如此，试想如果没有劳动型奴隶，又怎会有伟大的金字塔呢？

我在这封信的开头是写中国，我本打算谈谈中国的历史。但是，我扯到其他话题上去了，对我来说这可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也许，在

下一封信里我将主要谈一谈中国的历史。

---

1. 奥勒留（公元161——180年在位），被称为“哲学家皇帝”，《沉思录》是其代表作。全名为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奥古斯都（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译者注

41 ——中国的盛世唐朝

我向你讲述过中国的汉朝、佛教的传入、印刷术的发明和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在公元3世纪，汉朝灭亡了，被分裂成了三个小国，因此这段时间被称为“三国”时期。这种分裂局面持续了数百年之久，后来中国再度统一，在一个新的朝代，即唐朝的统治下成了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这大约发生在公元7世纪初期。

在中国的分裂时期，尽管鞑靼人自北而来进犯中国，但是中国的文化艺术一直延续着。我们获悉，那时仍然出现了大型的图书馆和精美的绘画。一直以来，印度不仅对外出口美丽的布料和其他货物，还对外传播了它的思想、宗教和艺术。许多佛教僧侣从印度前往中国，带去了印度的传统艺术，印度的艺术家和能工巧匠可能也随之前往了中国。佛教的传入和印度新思想的到来给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当然，中国本身也是高度文明的国家。这并不能说明印度的宗教、思想或艺术就被传播到了一个落后的国家，甚至“占领”了这个国家。印度的文化与中国本身的古老艺术和思想发生了碰撞。二者相互影响的结果就是出现了既不同于中国也不同于印度的情况，即有着印度的烙印，但在本质上仍按照中国的传统，保有了中国固有的模式。因此，由印度传入的思想形态成了中国艺术和精神生活的推动力。

同样，印度佛教教义和印度艺术被传播到了更加遥远的东方，传入了朝鲜和日本。看看这些国家是怎样受到印度佛教和艺术的影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每一个国家根据本国的特点进行吸收和改变。因此，虽然佛教在中国和日本得到了发展，但是每个国家的佛教都有着不同的特点；同时，虽然佛教都是由印度传入的，但是中国和日本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同样，艺术也因为国家和人民的不同而发生了

改变。在印度，我们这个民族如今已经忘记了艺术和美。长久以来，我们不仅没能创造出伟大而美丽的杰作，而且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甚至已经忘记了如何去欣赏美。在一个如此不自由的国家里，美与艺术又怎么能繁荣呢？它们在屈服和桎梏的黑暗中枯萎凋零了。但是，随着自由在我们面前的出现，我们对美的认知正在慢慢苏醒。当自由来到我们面前时，你将会看到这个国家的美与艺术将再次复兴；我希望美将扫除我们的家园、城市和生活中的所有丑陋。中国和日本比印度更幸运，它们一直都保持了对美和艺术的认知和追求。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印度佛教僧侣前往中国，而中国僧侣们也来到了印度和其他国家。我向你提到过法显，你也听说过玄奘，他们从中国来到了印度。一个非常有趣的旅行故事记录了一位名叫慧深的中国和尚，他航海跨过了东部海域，于公元499年到达了当时的中国首都。他声称自己到访过位于中国东边数千英里以外的一个岛屿，他称这个岛屿为“扶桑”。中国和日本以东就是太平洋（Pacifc Ocean），可能慧深曾航行穿过了那片海域。他到访的地方可能是墨西哥（Mexico），因为墨西哥在那时也出现了古老的文明。

受到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吸引，印度佛教大师和禅宗创始人菩提达摩（Bodhidharma）漂洋过海由南印度到达了中国的广州。也许是因为佛教在印度的影响逐渐减弱了，才促使他前往中国的吧。当他于公元526年到达中国时年龄已经很大了。与他随行的以及在他之后还有很多印度僧侣前往中国。据说，当时仅在中国的洛阳就已经居住了3000多名印度僧侣和1万多个印度家庭。不久以后，佛教在印度出现了另一个复兴时期。作为释迦牟尼的诞生地，作为宗教经典的发源地，印度一直吸引着虔诚的佛教教徒们。但是，佛教的荣耀似乎已经离开了印度，如今，中国成了主要的佛教国家。

唐朝始于公元618年，开国皇帝是唐高祖李渊。他不仅统一了整个中国，还威服四海，南至安南和柬埔寨，西到波斯和里海。朝鲜的一部分也被并入了这个强大帝国的版图。唐朝的国都长安以其华美壮丽和灿烂文化名扬东亚。无数大使和使节团从日本和当时还是自由的朝鲜南部纷纷来到了长安，学习艺术、哲学和文明。

唐朝历任帝王都鼓励发展海外贸易和欢迎海外游客的到来，还针对来到中国或定居中国的外国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以便于在任何情况下，可以根据这些人的习俗来进行裁定。尤其是我们发现阿拉伯人约在公元300年时就定居在了中国的南部地区，位于广州附近。这早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也早于先知穆罕默德诞生的时间。在这些阿拉伯人的帮助下，阿拉伯和中国的船只便在中国和阿拉伯之间展开了海外贸易。

你会惊讶地得知，人口普查在中国是一项非常古老的制度，即通过计算全国人口得知人口总量。据说，这个制度早在公元156年就出现了。这时应该是中国的汉朝。人口计算过去是以家庭为单位，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每个家庭大约有5口人。根据这种计算方式，在公元156年中国人口数大约有5000万。这种计算方式并不精确，但是请记住这种人口普查在西方可是一件新事物。我认为，美国在大约150年前才开始有了第一次人口普查。

在唐朝初期，中国出现了另外两个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在西方被视为异端并遭到了驱逐，这个教派被称为聂斯脱利派（Nestorian）。我在前几封信里曾告诉过你，基督教派之间出现了分歧和斗争。这些分歧造成的其中一个结果就是聂斯脱利派被赶出了罗马。但是，它们在中国、波斯和其他很多亚洲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这个宗派的教徒们也来到了印度，他们一定程度上也成功地传播了该派教义。但是后来，基督教的其他分支和伊斯兰教吞并融合了聂斯脱利派，如今这个教派几乎已无迹可寻了。我非常惊讶地发

现这个教派在南印度的一个地方还有一处小小的的聚居地，我们去年曾到那儿旅游过。你还记得吗？他们的主教还招待我们喝茶，他可是一位令人喜爱的老人。

基督教传到中国颇费了一段时间。然而，伊斯兰教的传播速度则要快得多。事实上，在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出现在中国的前几年，也就是伊斯兰教先知在世时，伊斯兰教就已经传入了中国。中国唐朝皇帝以礼待友，欢迎伊斯兰教和聂斯脱利派的使者们的到来，并聆听他们的述说。他充分理解这些人的宗教信仰，并公平对待、一视同仁。阿拉伯人被准许在广州修建了一座清真寺。虽然已过去了1300年，这座清真寺至今仍然矗立着，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

唐朝皇帝还允许修建基督教教堂和修道院。这种包容的态度与那个时期欧洲的狭隘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据说，阿拉伯人向中国人学习了造纸术，然后又把它传到了欧洲。公元751年，在中亚的突厥斯坦（Turkestan）爆发了一场中国人和穆斯林阿拉伯人之间的战争。阿拉伯人俘虏了几个中国人，这几个中国俘虏就教会了阿拉伯人如何造纸。

唐朝灭亡于公元907年，其统治持续了300年。有人认为，这300年是中国最伟大的时期，不仅有高度的文化水平，老百姓还享有极大的幸福感。当时的中国早就掌握了西方国家在很久以后才知道的一些东西，比如我提到过的纸，还有火药。中国人是杰出的工程师，一般来说，在几乎每一个领域里，他们都远远领先于欧洲。如果中国人是如此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继续保持下去，并在科学和探索领域继续引领欧洲呢？但是不管怎样，欧洲逐渐迎头赶上了，像赶超老年人的年轻人一样，很快就在某些方面处于了领先地位。为什么在各国历史上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这是哲学家们思考的最大难题。你不是哲学家，所以不必思考这个问题，我也不必发愁。

自然而然地，中国在这个时期的伟大和辉煌对亚洲各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这些国家敬仰中国，赞美中国，视中国为艺术和文明的引领者。在笈多帝国灭亡后，印度这颗璀璨的明星已不再那么闪耀夺目。然而，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进步和文明带来了穷奢极欲和闲适安逸的生活。国家出现了贪污腐败，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赋税。所以，人民受够了唐朝君主的统治，最终推翻了这个王朝。

42 ——朝鲜和日本

当我们继续讲述世界历史时，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目光投向朝鲜[注]和日本，它们是中国的近邻，在很多方面也是中国文明的传承者。这两个国家位于亚洲一端的尽头，即远东，再往东就是太平洋。直到近几年，这两个国家也没有与美洲大陆建立任何的往来或联系。所以，它们唯一能交往联系的大陆国家就只有中国。它们向中国学习了宗教、艺术和文明。朝鲜和日本承受了中国太大的恩惠，也在某些方面受恩于印度。但是，无论它们吸收了什么样的印度文化，都是经由中国传入的，因此都被染上了中国文化的色彩。

虽然朝鲜和日本身处亚洲，但是他们对亚洲或世界的局势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它们远离局势的中心，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它们很幸运，尤其是日本。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轻松地忽略它们以前的历史，直至近现代。这并不会对我们去了解亚洲其他地区的历史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它，就如同我们没有忽视马来西亚和东部岛屿的历史一样。朝鲜，这个贫穷弱小的国家，今天几乎被世界遗忘了。日本已吞并了朝鲜，使之成了日本版图的一部分。但是，朝鲜人民仍梦想着自由，在为独立而战。现在，日本的意图非常明显，报纸上全是有关日本进攻中国的报道。当我写到这儿时，中国的满洲地区爆发了中日战争。所以，如果我们能清楚地知道朝鲜和日本的历史，那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现在的局势。

第一件要记住的是，朝鲜和日本长期以来都处于各自孤立的状态。事实上，日本的历史是一段未受侵略、孤立自由、极不寻常的历史。纵观日本整个历史发展进程，很少出现被其他国家侵略，也没有

任何被其他国家成功侵略的记录。直到现在，日本发生的所有动乱都源自本土的内部矛盾。曾有一段时间，日本完全中断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和联系。当时的日本人几乎不可能走出国门，而外国人，甚至是中国人，也几乎不可能进入日本。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避免了来自欧洲的外国人和基督教传教士进入日本。这是非常危险且愚蠢的做法，因为这就意味着把整个国家困入囚笼之中，从而彻底中断了来自外界的所有影响，无论好坏优劣。后来，日本突然打开了国门朝着欧洲飞奔而去，学习一切可学的知识。日本学习的意愿非常强烈，以至于在短短一两代人的时间内，日本就成了外在形式上颇似欧洲的一个国家，甚至还仿效了欧洲的一切恶习！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过去70年左右的时间里发生的。

朝鲜历史的开端要远远晚于中国，而日本历史的开端更是远远晚于朝鲜。我在去年的一封信里向你讲述了一位名叫箕子的流亡中国人，由于不支持当时中国朝廷政权的更替，他带领了5000名追随者一路向东而去。他定居于现在的朝鲜半岛，并把这个岛屿命名为“朝鲜”，即“日出之地”的意思。这发生于公元前1122年。箕子还带去了中国的艺术、手工艺、农业和丝绸制造工艺。箕子的后人统治了朝鲜约900年。经常有中国移民定居在朝鲜，因此朝鲜与中国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当中国到了秦朝始皇帝时期，大批中国人来到了朝鲜。你也许还记得这位中国皇帝，他与阿育王处于同一时期。他自称自己为“始皇帝”，焚毁了所有的古书典籍。由于受到了始皇帝的残忍迫害，很多中国人逃难到了朝鲜，赶走了箕子软弱无能的后人。此后，朝鲜分裂成了若干小国，长达800多年。这些国家经常相互征战不休。有一次，其中一个国家的国王向中国请求援助。这可是一个危险的请求。援军很快到了，但是他们拒绝返回中国！这就是强权大国的方式。中国人停留在了朝鲜，并把朝鲜并入了中国的版图。甚至数百年来，朝鲜的其他地区都承认中国唐朝皇帝的宗主国地位。

直到公元935年，朝鲜才成了一个团结独立的国家（高丽王国）。王建是这个国家的创建者，他的后人统治朝鲜约450年。

我用短短的两三个段落就向你讲述了朝鲜2000多年的历史。值得记住的是，朝鲜从中国受惠甚多。文字是由中国传入朝鲜的。你要记住，朝鲜人民1000年来都是使用汉字来表达思想的，而不是用字母。然后他们从中国汉字中发展出一种特有的字母符号，以更加适合本国的语言。

佛教经由中国传入了朝鲜，儒家哲学则来自中国。印度艺术的影响通过中国传播到了朝鲜和日本。由此，朝鲜创造出了美丽的艺术作品，尤其是雕刻。他们的建筑物仿效了中国的建筑物。造船技术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事实上，朝鲜曾一度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并侵略过日本。

有可能现在日本人的祖先就来自朝鲜半岛。还有一些人也许来自南方和马来西亚。你知道的，日本人属于蒙古人种。现在仍有一些日本人被称为虾夷人（Ainus），他们被认为是日本的原住民。这些人貌美白皙、毛发浓密，与普通日本人的相貌极为不同。阿伊努人被驱赶到日本岛屿的北部地区居住。

我们发现，大约公元200年时，大和国（Yamato State）注出现了一位神功皇后（Jingo）。大和是日本的原名，指的是这些移民之前居住地的一部分。我要着重讲一下这位皇后的名字“Jingo”。注巧合的是，另一位日本早期统治者也叫这个名字。“Jingo”一词在英语里有明确的含义，意思是一个狂暴傲慢的帝国主义者，或者我们说简单点，意思是一个帝国主义者或沙文主义者，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讲，每一个帝国主义者都是狂暴傲慢的。日本也患上了帝国主义或大国沙文主义的病症。最近几年，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简直是胡作非为。所

以，“沙文主义者”这个词成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统治者的名字[注]，这可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啊。

大和国与朝鲜保持了亲密的关系，中国文明经由朝鲜传入了大和国。中国文字于公元400年通过朝鲜传入了大和国，佛教的传入也是如此。公元552年，百济王国（Pakche，朝鲜半岛曾分裂为三个国家，百济王国是其中的一个）向大和国的统治者赠送了一尊释迦牟尼的金像，并派遣了佛教传教士携带经文来到了大和国。

日本古老的宗教是神道教（Shinto），“神道”是一个中国词，意为“万神之道”。它混合了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不理会来生来世、神秘事物和未解难题。它也是日本武士崇尚的宗教。日本人离中国人如此之近，受中国文明的影响如此之大，但是他们与中国人又完全不同。中国人在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倡导和平是中国人的文明和人生哲学。但是，日本人一直以来，直到现在，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日本武士的主要德行就是效忠于首领和袍泽。这不仅是日本人推崇的品德，还是他们主要力量的源泉。神道教还把这个品德传于世人——“膜拜众神，效忠于他们的子孙。”所以，神道教在日本一直延续至今，并与佛教并存。

但是，这算一种品德吗？忠于某个袍泽和效忠于某个事业的确是一种好品德。但是，神道教和其他宗教往往利用我们的忠诚，使统治我们的少部分群体从中得益。在日本、在罗马、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宗教都教导世人崇拜权威，你以后会发现这种做法对我们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

佛教传入日本以后，新出现的佛教与早已存在的神道教之间就出现了冲突。但是很快双方就达成了共识，解决了纠纷，所以两个宗教能一直在日本共存到现在。相较而言，神道教在日本仍是最广为接受的宗教。因为它宣扬对统治阶级的服从和忠诚，所以得到了统治阶级

的支持。然而，佛教却是一个有点危险的宗教，因为它的创始人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反叛者。

日本艺术的历史始于佛教。那时，日本或大和国开始发展了与中国的直接往来联系。不断有使节前往中国，尤其是在唐朝，当时的都城长安享誉整个东亚。事实上，日本人或大和国人建立了一个新的首都，取名奈良（Nara），并竭力使它成为长安的翻版。日本人似乎一直都具备复制和模仿他国的惊人能力。

纵观整个日本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大家族们彼此敌对，为权力而相互争斗。当然，你也发现在古代的每一个地方皆是如此。传统的宗族观念一直保留在这些大家族中。所以，日本的历史主要是大家族之间的斗争史。他们的皇帝日本天皇（Mikado）被认为是太阳神的后裔，是无所不能的半神化专制君主。神道教和祖先崇拜有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它使人民顺从天皇的独裁统治，还使人民服从于这片土地的掌权者。但是，日本天皇经常沦为没有实权的傀儡。实权和权威是属于一些大家族或宗族的，他们是天皇的拥立者，并且按照他们的想法来拥废国王或皇帝。

第一个出现在日本历史上并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大家族是苏我家族（Soga Family），它弘扬佛教，使佛教成了宫廷和官方的宗教。这个家族的其中一位首领是圣德太子（Shotuku Taishi），他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他也是一名虔诚的佛教教徒，有着极高的艺术修养。他从中国儒家经典中获取了灵感，试图建立一个以道德而非暴力为基础的政府。那时的日本到处是各种宗族，宗族首领们各自独立，相互争斗，不服从中央政府的权威。尽管当时的日本天皇有着至高的称号，但是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大宗族的首领而已。圣德太子着手改变这一局面，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他使不同的宗族首领和贵族诸侯服从于天皇的统治。这大约发生在公元600年。

但是，圣德太子逝世后，苏我家族覆灭了。不久之后，日本历史上另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就是中臣镰足（Nakatomino Kamatari）。他对当时的日本进行了诸多改革，还在很多方面效仿了当时的中国。但是，他没有采用中国特有的任命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现在，日本天皇已远非一位宗族首领，中央集权制国家也变得更加强大。

在这个时期，奈良成了日本的首都，但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公元794年，京都（Kyoto）成了首都，并延续了近1100年，直到不久前东京（Tokio）成了首都。东京是一个大型的现代化城市。但是，只有京都能告诉我们日本的灵魂，它承载了日本1000年的历史记忆。

中臣镰足是藤原家族（Fujiwara Family）的始祖，这个家族在日本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统治了日本长达200年，使天皇成了彻头彻尾的傀儡，还把自己家族的女性成员嫁入皇室。由于担心其他家族的能力卓越之人影响他们的统治，所以他们强迫这些人入寺院为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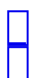
当日本首都在奈良时，中国皇帝曾派遣使者前往日本，宣布日本统治者为“天皇”。“日本”的意思是“伟大日出之国”，日本人更喜欢这个称号，听起来比“大和”更让人印象深刻。所以，他们开始称自己的国家为“大日本”（Dai Nippon），即“日出之国”。这也是日本的名字。“Japan”（日本）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从“Nippon”一词变来的。600年后，一位伟大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来到了中国。他从未去过日本，但在旅行游记中记录下了这个国家。他听说这个国家叫“Tai-Nyih-Pung-Kok”（大日本国），就在书中写下了“Chipango”（日本国），这就是“Japan”一词的由来。

我们国家是怎样被称为“印度”和“印度斯坦”的呢？我告诉过你没有？或者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两个名字源自印度河或信度（Indus

or Sindhu）注，这是印度的河流。古希腊人从“Sindhu”一词中把我们国家称为“Indos”（印度斯），从而衍生出了“India”（印度）一词。波斯人占领印度后，由“Sindhu”一词衍生出“Hindustan”。

---

1. 本文的朝鲜指当时在朝鲜半岛的国家，不是指朝鲜共和国。后同。——译者注
2. 大和国，古代日本令制国之一。——译者注
3. “Jingo”一词指日本皇后时，译为“神功”，但在字典上的意思是“沙文主义者”，为了与下文相符，此处用原文。——译者注
4. 据日本神话，神功皇后不是日本第一位天皇，而是神武天皇。——译者注
5. “信度”也是指印度河。——译者注



第二卷
中世纪的世界

43 ——曷利沙·伐弹那与玄奘

让我们再次回到印度。哝哒人大败后被驱逐离开了印度，但是其中仍有一些人留在了某些偏远的地区。婆罗阿迭多王死后，伟大的笈多王朝逐渐走向了没落，北印度出现了王朝国家林立的局面。普拉凯辛在南印度建立了遮娄其帝国。

小城镇曲女城位于离坎普尔不远的地方。现在的坎普尔是一座大城市，但却是一座充满了工厂和烟囱的丑陋难看的城市；而曲女城是一个朴实无华的地方，面积还没有一个村庄大。但是，在我谈论的这个时期里，曲女城是一座伟大的首都，以诗人、艺术家和哲学家而蜚声于世；当时的坎普尔还没有建成，甚至在以后的几百年内都没有出现。

曲女城是现在的称呼，它的真名是羯若鞠阇，意思是“伛偻曲腰的女子”。有故事记载，有一位古时候的仙人，自认为受到了轻视怠慢而愤怒不已，故恶咒国王的百名女儿，让她们弓腰驼背。自此，她们居住的这个地方就被称为了“伛偻曲腰女子之城”，即羯若鞠阇。

但是，我们还是简称它为曲女城吧。哝哒人杀死了曲女城的国王格拉巴伐尔曼，囚禁了王后拉芝修黎（Rajashri）。于是，拉芝修黎的哥哥罗阇·伐弹那（Raja- Vardhana）率军前来攻打哝哒人，营救自己的妹妹。他虽然打败了哝哒人，但遭到了谋杀。于是，其弟曷利沙·伐弹那（Harsha-Vardhana）出发寻找他的姐姐拉芝修黎。这个可怜的女子克服了艰难困苦，拼命逃进了深山，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据说在她殉夫自尽之际，曷利沙找到并救下了她。

在找到并救出姐姐后，曷利沙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兴兵攻打谋杀了他兄长的高达国王。[注]他不仅打败了高达国王，还征服了北印度诸国，疆域范围从大海的一头延伸到了另一头，南至温迪亚山脉。然而，位于温迪亚山脉另一侧的遮娄其帝国阻止了曷利沙的扩张。

曷利沙·伐弹那把首都设在了曲女城。曷利沙本人是一名诗人和剧作家，在他身边云集了大批诗人和艺术家，曲女城由此而闻名于世。曷利沙是一名虔诚的佛教教徒。[注]佛教是有着独立信仰的宗教，它的地位早就在印度被大大地削弱了，并逐渐被婆罗门同化融合。曷利沙似乎是印度最后一位伟大的信仰佛教的统治者。

在曷利沙统治期间，我们的老朋友玄奘[注]来到了印度。他在归国途中写下了一本游记，向我们讲述了大量关于印度和他前往印度时途经中亚诸国的所见所闻。玄奘是一名虔诚的佛教教徒，他巡礼了诸多佛教圣地，并带走了佛教经书。他穿过了戈壁沙漠，一路上到访了许多著名的城市——塔什干、撒马尔罕、大夏、于阗和莎车。他游历了整个印度，或许还去了锡兰。他在游记里记录下了种种奇异神秘的所见所闻，既详细描写了他所游历的不同国家，还绝妙地刻画了居住在印度不同地区的百姓们的特征，这些见闻甚至在今天读来似乎都是真实可信的；他在游记里还记下了他所听闻的奇妙故事和关于释迦牟尼和菩提萨埵的大量神迹。其中一个令人捧腹的故事就是那个腰缠着铜板四处行走的“智慧超群的人”，我在前面的信里曾告诉过你了。

玄奘在印度待了很多年，尤其是在伟大的那烂陀大学，这所大学坐落在离巴连弗邑不远的地方。那烂陀是佛教寺院和大学的综合体，据说曾有上万名学生和僧侣在这里学习、居住。它是伟大的佛教教徒的学习中心，也是贝拿勒斯的竞争对手，后者可是研习婆罗门教的中心。

我曾告诉过你，印度历史悠久、闻名于世，也被称为“月亮之国”！玄奘也在游记中提到了这个名字，还向我们描述了这个名字是多么适合印度。显然，中文拼音“In-Tu”（印度）就是指月亮。(注)所以，你接受这个中文名字应该是非常容易的吧！(注)

玄奘于公元629年来到了印度。他从中国启程开始印度之行时年仅26岁。古老的中国文献告诉我们，玄奘相貌英俊，身材高大。“他神情柔和，双眼灼灼有神。他的举止端庄肃穆，容貌似乎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和聪慧……他的威严如同流淌在大地上的千江万水，他的祥和与光辉如同水中盛开的莲花。”虽然中国皇帝拒绝了他前往印度的请求，但他仍独自一人，身着藏红色的佛教教徒僧袍，踏上了伟大的旅程。他穿过了戈壁沙漠，经历了严峻的生存考验，抵达了位于沙漠边缘的高昌国。这个沙漠之国是一个小小的奇异独特的文化绿洲，然而现在却是考古学家们和古文物研究者们挖掘历史遗迹的死亡之地。但是在公元7世纪，玄奘经过高昌国的时候，这里充满了勃勃生机，有着高度发达的文化。这个文化令世人瞩目，充分融合了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和波斯文化，甚至还有一小部分欧洲文化。梵文文献记录下了佛教的繁荣和印度的影响在这里留下的鲜明烙印。然而，高昌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借鉴了中国和波斯。也许有人认为他们的语言不是蒙古语，而是属于印欧语系（Indo-European），与欧洲的凯尔特语（Celtic）在很多方面都颇为相似。更为奇特的是，雕刻在石头上的壁画人物特征与欧洲人极为相似。这些壁画精美绝伦，刻画了释迦牟尼、菩提萨埵和其他男女众神。女神们的服饰往往展现出印度服饰的特征，或者是希腊头饰和服饰的特点，所以法国评论家M.格鲁塞（M. Grousset）说：“（它）完美地融合了印度的精美柔和、希腊的生动流畅和中国的迷人魅力。”

高昌至今仍然存在，你可以在地图上找到它的位置。但它现在已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了。在遥远的7世纪，灿烂丰富的各种文化自遥

远的地方而来，汇集于此，并和谐统一地融合在了一起，这是多么令人赞叹啊！

朝圣者玄奘离开了高昌国，前往了龟兹国。龟兹国在当时是中亚的另一个有名的文化中心，它有着丰富灿烂的文明，尤其是以享有盛名的音乐家和美丽迷人的女子而闻名遐迩。它的宗教和艺术都源自印度；伊朗（Iran）促进了龟兹国文化和贸易的发展；龟兹国的语言还涉及了梵语、古波斯语、拉丁语和凯尔特语。这可真是另一种奇妙迷人的融合！

玄奘继续踏上了旅程，途经突厥，突厥的大可汗是一名佛教教徒，统治了中亚绝大部分的地区；接着，他来到了撒马尔罕，这座古老的城市在当时还保留了亚历山大大帝约1000年前途经此地时留下的痕迹；然后玄奘经过了大夏、喀布尔河河谷和克什米尔，最后抵达了印度。

这时正是中国唐代的初期，长安是它的都城，也是艺术和学习的中心。此时的中国居于世界文明的领先地位。你一定还记得，玄奘来自这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他对其他国家的比较标准一定很高。因此，他对当时印度现状的描述是非常重要而且有价值的。他赞美了印度人民和当时印度的统治王朝。他说：“就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虽然天生轻率，却正直诚实，值得尊敬。他们在钱财上不施以诡计手段，在执法审判上宽厚慎重……他们的行为举止不阴险奸诈，还信守诺言。政府的规章制度非常公正清廉，同时他们的举止十分和蔼有礼。罪犯和反叛者的数量很少，只是偶尔制造点麻烦。”

他还说道：“政府的管理是基于温和宽厚的原则，所以行政管理方面就显得简单朴实……百姓们没有强迫性劳役。”“通过这样的方式，百姓们承担了很轻的赋税，被要求履行的个人劳役也比较温和适度。每一个人都能安全地保有自己的财产，所有人都要为生计而耕种

土地。那些耕种皇室庄园的人要将产量的六分之一作为贡税。从事贸易的商人们来来往往地进行着贸易活动等。”

玄奘发现当地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组织实施教育了。在学习了识字入门后，男孩和女孩在7岁的时候就被要求开始学习五种圣典（Shastras）。“圣典”一词现在是指纯粹的宗教书籍，但是在当时它们是指各种各样的知识。因此，这五种圣典的内容是：（1）语法；（2）艺术和手工艺；（3）医学；（4）逻辑学；（5）哲学。这些科目的学习要一直持续到大学，通常在30岁的时候才能全部学完。我认为能一直学习到30岁的人并不是很多。但是，似乎初等教育在当时相对比较普及，因为所有的僧侣和神职人员都是教师，在数量上非常充足。印度人民对于学习的热爱给玄奘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在整本游记中都在不断提及这一点。

玄奘向我们描述了般雅城（Prayag）举行伟大的印度大壶节（Kumbh Mela）的情景。㊟当你再次看到这个节日时，你要想一想玄奘在1300年前曾到访过此地，还要记住在当时这个古老的仪式来源于吠陀（Vedic）时代。与这座古老的城市相比，我们现在这座有着古老血统传承的城市阿拉哈巴德却已是明日黄花了。阿克巴（Akbar）在不到400年前建造了这座城市。般雅城则更加古老悠久，但更为古老的是，数千年来它年复一年地吸引着千百万人来到这个恒河和亚穆纳河的汇集之处。

玄奘还向我们讲述了曷利沙是如何前往参加这个特有的印度教节日的，虽然他是一名佛教教徒。曷利沙下达了皇帝诏令，邀请“印度五国”（Five Indies）的所有穷困百姓作为他的客人前来参加这个节日。这对帝王而言是一个勇敢大胆的邀请。毋庸置疑，很多人前往参加了大壶节。据说每天有多达10万人作为曷利沙的客人而受到款待。每五年曷利沙就在这个节日里常常向众人馈赠的财宝：黄金、珠宝、丝绸——事实上包括了他拥有的一切东西。甚至他还赠送了他的皇冠

和昂贵的衣物，他还从他姐姐拉芝修黎那里拿走了一件穿破了的普通衣服。

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教徒，曷利沙禁止宰杀动物而食。这可能并没有遭到婆罗门的极力反对，因为自释迦牟尼的教义传播以来，越来越多的婆罗门人逐渐地接受了素食主义。

在玄奘的游记里，有一个小趣闻也许会使你颇有兴趣。他告诉我们，在印度当一个人生了病，他会立刻禁食，斋戒7天。大多数人会在斋戒期内康复。但是，如果病痛仍没有痊愈，然后他们才会服药。在当时，生病可能不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且对医生的需求也并不高。

在当时的印度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统治者和军人非常尊敬有学识、有文化的人。在印度和中国都有意识地崇尚学识和文化，而不是崇尚暴力和财富，这种做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玄奘待在印度多年后启程回国，他再次跨越了北部群山，途中差点淹死在了印度河里，他的许多珍贵书籍还被河水冲走了。但是，他仍然竭尽全力带走了大量原稿，并花费数年时间把它们翻译成了中文。他回国后在长安受到了唐朝皇帝的热烈欢迎，这位皇帝还让他写下了旅行游记。

玄奘向我们讲述了他在中亚遇到突厥人的情形——这个新的部落在此后数年里一路向西，倾覆了很多王国。他还告诉我们，佛教寺院遍布了整个中亚，事实上是分布于波斯、伊拉克或美索不达米亚、霍拉桑（Khorasan）和摩苏尔（Mosul），一直到叙利亚的边境。玄奘向我们描述了波斯人，他们“不热衷于学习，但将全部身心投入到艺术中。他们所做的一切使邻国尤为重视”。

这就是当时了不起的旅行者啊！与这些古老的伟大旅行相比，如今到达非洲中心地带或北极、南极的旅行似乎显得是那么不足为道。

当时的旅行者们多年来不停地跋涉行进，翻越高山，穿过沙漠，与所有的朋友中断了联系。有时他们也许会有思乡之情，但是内心的高贵和尊严使他们不会轻易述之于口。然而，有这样一位旅行者站在遥远的土地上，思念着家乡、思念着亲人时，让我们能一窥他的思想情感。他的名字就是北魏的宋云，早于玄奘100多年就来到了印度。他住在了位于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国的山区地带。他告诉我们："柔和的微风轻拂，送来了清新的空气、鸟儿的鸣唱，浸染了春天之美的树木和飞舞于百花周围的蝴蝶——当他注视着这一遥远国度美丽动人的景色时，这一切不由得唤起了他的思乡之情；他如此忧郁惆怅，甚至因此生了一场大病。"

---

1. 据史料记载，高达国王设赏迦（Shashanka，约公元600——636年在位）谋杀了罗阇·伐弹那，所以此处补充完整。——译者注
2. 据史料记载，曷利沙不是佛教教徒，是婆罗门教徒，但他接受佛教并大力扶持佛教。——译者注
3. 玄奘的名字可以拼写为"Yuen Chang"、"Yuan Chwang"和"Hsuan taang"。
4. 现代中国人可能并不能看出"印度"与月亮的联系。其实，中文中的"印度"一名为玄奘首创，并取代了从前"天竺"、"身毒"等说法。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解释说："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印度者，唐云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称。言诸群生轮回不息，无明长夜，莫有司晨。其犹白日既隐，宵烛斯继，虽有星光之照，岂如朗月之明。苟缘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圣贤继轨，导凡御物，如月照临，由是义故，谓之印度。"——译者注
5. 英迪拉的昵称是"印度"。
6. 般雅城是阿拉哈巴德的旧称。大壶节是一个宗教集会。

44 ——南印度出现了众多国王和战士，还有一位伟人

国王曷利沙卒于公元648年。但是在他死前，一小朵乌云仿佛已笼罩在印度西北部边境的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上空——这朵乌云是一场席卷西亚、北非和南欧的暴风骤雨的前兆。阿拉伯半岛诞生了一位新的先知，名叫穆罕默德；他创建了一个新宗教，即伊斯兰教。阿拉伯人满怀着对新信仰的极大热情，信心十足地席卷了几个大洲，所到之处一路征服。这是一场令人惊叹的壮举，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看一看这个新生力量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但是，在我们审视这个新力量之前，我们得先去看看南印度，了解一下那个时期的南印度局势。早在曷利沙统治时期，穆斯林阿拉伯人就来到了俾路支斯坦，不久之后他们占领了信德。但是他们只是居住在那里，此后的300年里穆斯林并没有进一步侵略印度。事实上，对印度的侵略并不是来自这些阿拉伯人，而是来自另一些改信穆斯林的中亚部落。

让我们来到印度南部吧。遮娄其王国位于西部和中部地区，主要包括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地区，巴达米（Badami）是它的都城。玄奘盛赞马哈拉施特拉人，高度评价了他们的英勇无畏。他们“有着好战且自豪的精神，感激于恩惠，仇恨于邪恶”。遮娄其王国制约了北方的曷利沙统治的戒日王朝、南方的帕拉瓦王朝（Pallavas）和东方的羯陵伽国（奥里萨邦）。这个王国不断发展壮大，从海的一边扩张到了另一边，之后被罗湿陀罗拘陀王朝（Rashtrakutas）推翻。

因此，强大的帝国和王国在南部繁荣发展起来了——有时候会相互制衡，有时候某个国家又日益强盛且独秀于林。在潘地亚国（Pandyan）统治时期，马杜赖（Madura）是伟大的文化中心，城里云集了使用泰米尔语的诗人和作家。大部分泰米尔语的经典著作都始于基督纪元伊始。帕拉瓦王朝也曾荣耀一时，它的都城是建志补罗（Kanchipura），即现代的康捷瓦拉姆（Conjeevaram）。对马来西亚的殖民主要是由这个王朝实施的。

后来，朱罗王朝（Chola Empire，又译作注辇国）日益强盛，大约在公元9世纪中叶占领并统治了印度南部地区。这个国家是海军强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曾横扫了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主要港口是位于高韦里河（Kaveri）河口的格维里帕底那（Kaviripaddinam）。韦迦亚剌雅王（Vijayalaya）是第一位伟大的统治者。这个国家一直向北扩张，直到突然被罗湿陀罗拘陀王朝打败为止，但是不久之后，在罗阇罗阇一世（Rajaraja I）的统治下重新复苏崛起，再次重现了朱罗王朝的繁荣。这大约发生在公元10世纪末期，此时正是穆斯林入侵北印度的时候。诚然，罗阇罗阇一世丝毫没有受到遥远北印度局势的影响，继续进行着他的帝国扩张。他征服了锡兰，由此朱罗王朝统治了该地区约70年。他的儿子拉金德拉一世（Rajendra I）同样也是野心勃勃且崇尚武力。他征服了缅甸南部地区，还用船只运送他的战象。他来到了北印度，打败了孟加拉之王。自此，朱罗王朝的疆域幅员辽阔，成了继笈多王朝后最大的国家。但是，这一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拉金德拉一世是一名伟大的战士，但是他似乎残酷无情，对于所征服的国家和地区，他并没有去赢得民心。他的统治时间是从公元1013年到1044年，在他死后，朱罗帝国就四分五裂了，许多附属国纷纷起义反抗。

除了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以外，朱罗王朝因海上贸易而长期负有盛名。精美的棉制品颇受追捧，港口格维里帕底那也非常繁忙，满载着

货物的船只往来穿梭，不断地靠岸和启程前往远方。这里还出现了希腊人的一个定居点。甚至在《摩诃婆罗多》里也提到了朱罗王朝。

我试图尽可能简短地向你叙述关于南印度的数百年历史。可能这段描述过于简短，只会让你迷惑不解。但是，我们不能让自己迷失在不同国家和王朝的迷宫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全世界，如果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谈论世界的一个小角落上，哪怕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就没法继续讲述其他国家的历史了。

但是，比众多国王和四处征伐更为重要的是那个时期的文化和艺术记载。在艺术方面，南印度遗存的古迹远多于北印度。北部印度的大部分古迹、建筑物和雕塑都毁于战争和穆斯林入侵的时候。当穆斯林来到南印度时，人们纷纷四处逃散。不幸的是，北方数不清的美丽古迹遭到了损毁。穆斯林们——你要记住他们是中亚人，不是阿拉伯人——满怀对自己宗教的狂热，一心要毁掉其他宗教的崇拜物。但是，他们大肆破坏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古老的寺庙可以被用作堡垒和战斗的场所。南方的很多庙宇现在看来似乎与要塞堡垒颇为相似，如果遭到了攻击，人们可以在里面进行自卫防御。于是，除了宗教礼拜以外，这些寺庙还有着多种用途。它们可以是村里的学校、会场、村务委员会或者议会的场所，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能成为村里抵御外敌的堡垒。因此，村落里方方面面的生活都以寺庙为中心，自然而然地，寺庙里的神职人员和婆罗门就可以对人们发号施令。但是，寺庙有时被用作堡垒这一事实也许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入侵的穆斯林要毁掉它们。

在这段时间，朱罗王朝的统治者罗阇罗阇一世在坦焦尔（Tanjore）修建了一座美丽的寺院，在巴达米和康捷瓦拉姆也修建了精美的寺院。但是，我们现有的在那个时期里最令人惊叹的寺院是埃洛拉（Ellora）石窟的凯拉萨（Kailasa）神庙——这是雕刻在坚固岩石上的奇迹。它始建于公元8世纪下半叶。还有刻在青铜制品上的美丽

雕像，其中最有名的是“舞王”（Nataraja）——湿婆（Shiva）的生活之舞。

朱罗王拉金德拉一世在乔拉普兰（Cholapuram）建造了举世瞩目的灌溉用水利工程——这是一个实心砌体的堤岸，长约16英里。100年后，一名阿拉伯旅行者阿尔贝鲁尼（Alberuni）到访了此地，对此大为惊叹。他说：“我们的人民，当他们看到这个堤岸都会感到吃惊，也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像这样建造的工程真是少之又少。”

我在这封信里提及了一些国王和王朝的名字，它们的荣耀只是昙花一现，自然也就被世人遗忘了。但是，南印度出现了一名卓越非凡的人，他注定要在印度的历史上产生重要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所有的国王和帝王。这位年轻人就是有名的商羯罗（Shankaracharya）。他可能出生在公元8世纪末。他似乎极具天赋，想要复兴印度教，或者是印度教中一个特殊的有智慧的派系，被称为湿婆派（Saivism）——崇拜湿婆。他反对佛教——用自己的才智进行论战激辩。他建立了一套面向所有种姓的遁世者教规，就像佛教僧侣一样。为了传播这套遁世者教规，他在印度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别建立了四大中心。他在印度四处游历，所到之处都取得了成功。他以征服者的身份来到了贝拿勒斯，但只是思想上和辩论上的征服者。最后，他来到了喜马拉雅山脉的被永恒积雪覆盖的凯达尔纳特（Kedarnath），并卒于此地，年仅32岁或者更大一点。

商羯罗的记载非常引人注目。佛教早已从北方退到了南方，现在几乎在印度销声匿迹了。印度教，或者是印度教的变体湿婆教，在印度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商羯罗的教义、评述和论战在整个国家引起了思想上的动荡。商羯罗不仅成了婆罗门阶级的伟大领导者，还似乎吸引了民众的注意力。一个人主要是由于过人的智慧而成为一名伟大的领导者，同时这个人在千百万人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还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可真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情啊。

伟大的战士和征服者们似乎在历史上脱颖而出，要么大受欢迎，要么被人厌恶，有时候他们还影响了历史。伟大的宗教领导者能感动百万民众，燃起他们的热情，但是这一切往往是以信念为基础的。这种情感往往能被吸引，也会被感动。

要吸引思想和推动智慧的发展是比较困难的。不幸的是，大多数人不这么认为：他们的感受和行为是受他们的情感控制的。然而，商羯罗的吸引力体现在他的思想和智慧上，还体现在他的理性推理上。这不仅仅是古老书籍里教义的重复。无论他的辩论对错与否，现在都不重要了。有趣的是，他用理性判断的方式来思考宗教问题，不管这个方法如何，他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让我们能窥视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

也许你有兴趣知道，有一位印度教哲学家叫夏维卡（Charvaka），他鼓吹无神论，即世上没有神灵。如今，尤其是在俄国，很多人都不信仰神灵。我们不必在这儿探讨这个问题。但是，令人十分感兴趣的是，在古代印度出现了思想和著作的自由。这就是所谓的信仰自由。直至近代，欧洲是没有信仰自由的，甚至在今天也仍有诸多限制。商羯罗在短暂而艰苦的一生里还带来了另一个影响，那就是印度的文化统一。这似乎是整个印度古代史上公认的统一。你知道的，印度在地理上算是一个整体。在政治上，我们已经看到印度经常都是四分五裂的，虽然偶尔也出现了统一的中央政府。但是，从一开始印度在文化上就是一个整体，因为它有着同样的历史背景、传统习俗、宗教信仰、男女众神、古老的神话传说、学术语言（梵文）、遍布全国的宗教场所、村务委员会、意识形态和政治形态。对于普通印度百姓而言，整个印度就是一个“普恩亚布米”（punya-bhumi）——神圣之地——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则主要是野蛮人！然而，印度出现了一种普通的印度意识，它成功地战胜并且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印度的政治分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村务委员会的村落体系，无论印度的顶层阶级如何改变，它仍然一直延续着。

商羯罗为了传道说教选择了印度的四个方向，或者说是他宣扬湿婆教教规的四个总部，这充分表明他把印度看作一个文化整体。他在全国四处游走传道，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充分表明思想和文化浪潮可以迅速地从国家的一端传播到另一端。

商羯罗宣扬传播湿婆教教义，该教义尤其盛行于南部地区，许多古老的寺院都是湿婆教的庙宇。在笈多王朝统治时的北部地区出现了毗湿奴教（Vaishnavism）和克利须那崇拜的伟大复兴。这两个印度教教派的寺庙各有不同。

这封信已经很长了，但是我还要再谈一谈印度在中世纪时期的状况，这就留在下一封信里再说吧。

45 ——中世纪的印度

我告诉过你《政事论》，你应该还记得吧？这本书是由考底利耶所著，他是阿育王的祖父陀罗笈多·孔雀的首席重臣。这本书告诉了我们关于那个时期的人民和政府管理的所有事宜。它几乎就像一扇开启的窗户，使我们能窥视公元前4世纪的印度历史。与那些帝王和他们征战的夸张记述相比，这些详细描述了政府行政管理的书籍则更为有用。

还有另外一本书也能帮助我们了解中世纪时期的印度概貌，它就是苏克拉恰利亚（Shukracharya）的《政术精华》（*Nitisara* ）注。这本书虽然比不上《政事论》那么详尽有用，但是，凭借这本书的帮助和一些铭文，还有其他的记述，我们可以打开一扇通往公元9世纪或10世纪印度的窗户。

《政术精华》告诉我们："与婆罗门相符的精神既不是源于肤色，也不是源于祖先。"因此，根据这一个理念，种姓的划分不应该基于出身，而应该基于能力。它还说道："在任命政府官员时，应考虑品行和美德——而不是考虑种姓或家庭。"国王不应基于自己的意愿而行事，而应基于大多数人民的意愿。"民意的力量比国王更为强大，就好比是一条由无数纤维织成的结实的绳子，它足以拖动一头狮子。"

这些可是极好的普遍真理啊，即使是在今天看来，在理论上它们也是同样值得称道的。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它们并没有一一落实到实践中。一个人可以凭借自身的能力和美德脱颖而出。但是他怎么样才能获得能力和美德呢？如果给予一名男孩或女孩适当的教育和指

导，那么他或她就会非常聪明，也许能成为一名聪慧能干的人。但是，如果没有给予教育或指导，那么贫穷的男孩或女孩又会如何呢？

同样，什么是民意？谁的意愿能被视为人民的意愿？《政术精华》的作者可能并不认为广大的首陀罗劳动者享有拥有任何意愿的权力。他们几乎没有被考虑在内。民意也许只是上层阶级和统治阶级的意愿。

还有一件让人感兴趣的事情：中世纪时期的印度政治形态与以前是一样的，国王的独裁统治或君权神授没有一席之地。

另外，我们还知道，国王的国务院和高级官员委员会负责管理公共工程、公共场所和公共森林；负责组织城乡居民生活；负责桥梁、漕运、休养院、道路，还有城镇和乡村最重要的下水道。

村落的村务委员会全权负责整个村庄的各项事务，委员会的成员们受到了国王的官员们的极大尊重。村务委员会负责分配土地和收齐赋税，然后代表村落给政府缴税。似乎还有一个更大型的村务委员会或团体组织，专门负责监督这些下级村务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如果有需要的话，还可能干涉它们的工作。这些村务委员会还拥有司法审判权，可以作为法官审判百姓。

来自南印度的一些古老的铭文告诉我们，村务委员会的成员们是如何被选出来的，哪些是有资格的，哪些则是没有资格的。如果一个成员不能呈报公共资金的账目，他就会被取消资格。另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则似乎是，成员们的近亲是没有资格当选的。如果这条规则现在能在我们所有的委员会、议会和市级政府中实施，那可真是太好了！

这里还要提到一名女性，她是一个委员会的成员。所以，看来女性是可以在村务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中担任职务的。

村务委员会当选的成员就组成了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的时限为一年。如果有成员行为不端，就会立刻被取消资格。

这种村落自治政府体系是建立在雅利安政治形态的基础上的。正是如此才赋予了这个体系发展的动力。村务委员会的特权十分招人嫉妒，因此它规定士兵不允许进入村落，除非得到皇家许可。《政术精华》中还提到，当国民投诉某位官员时，国王“不应该站在官员这边，而应该站在他的国民这边”；如果很多百姓都投诉这位官员，那么他就该被免职。“因为，”《政术精华》中说，“当饮下官职浮华虚荣之酒时，谁又不会沉醉于其中呢？”这样明智的语言似乎尤其适用于我们现在这个国家里大批行为不端和管理不善的官员们。

在更大型的城镇里有许多手工业者和商人，由此形成了行业协会。于是，手工业行会、银行团体和商业协会纷纷出现了。当然也有宗教团体组织。这些组织拥有极大的权力来管理行业内部事务。

国王对人民的征税是比较轻的，以避免伤害他们或者使他们负担过重。国王征税的方式就好比是一个人需要从森林的树木上采集花朵和树叶来编织花环，而不是像一名烧炭工人那样大肆砍伐。

这就是我们能获知的关于中世纪时期的印度状况的零星信息。要寻找出书中记载的理论是如何应用于实践中的，有一定的困难。在书中写下好的理论和理想是很容易的，而付诸实施则比较困难。然而，这些书籍帮助我们认识了那个时期的人们的意识形态或思想观点，即使他们也许没有在实践中完全实施这些理论。我们发现，国王和首领远非独裁统治者。他们的权力受到了当选的村务委员会的限制。我们还发现，村落和城镇的自治体系是相当先进的，中央政府几乎无法进行干涉。

但是，当我谈到人民的意识形态或自治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印度的整个社会结构是建立在种姓制度基础上的。就理论而言，

正如《政术精华》所述，这个制度也许并不僵化，也许对有品德或有能力的人广开了大门。但事实上几乎是不可能的。统治阶级或统治种姓是婆罗门和刹帝利。有时候，他们会为了争夺统治权而发生冲突，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共同统治、相互协调。他们一起统治压迫其他种姓。逐渐地，随着贸易和商业的日益发展，商人阶级就会变得富有和重要起来。当商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的时候，他们就会被赋予一定的特权和自由来管理本行业的内部事务。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们也不能享有真正的国家权力。至于贫穷的首陀罗，他们一直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甚至还有其他人比他们的地位更低下。

来自较低级种姓的人偶尔会取得成功。我们甚至还知道有首陀罗当上了国王。但是这样的情况鲜有发生。社会阶级提高的更普遍方式是整个亚种姓上升一个台阶。新部落通常被融入到印度教的底层，然后他们再逐渐地发展和提高。

所以，你会看到，虽然印度没有像西方世界那样出现劳动型奴隶，但是我们整个社会结构是一种等级制——一个阶级高于另一个阶级。处于底层阶级的广大人民被最高等级的人们剥削和压迫。而位于顶层阶级的人们则关心如何长久地维持这个体制，不让处于社会底层的穷人们享有教育或培养的机会，以此来维护手中的权力。也许农民们在村务委员会中有一些话语权，也不会被忽视，但是很有可能的是一些聪明的婆罗门主管了村务委员会。

从雅利安人来到印度，与达罗毗荼人相互交流融合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谈及的中世纪时期，古老的雅利安政治形态似乎一直在延续。但是，它似乎逐渐走向了堕落和衰败。也许这个政治形态越来越陈旧不堪了，也许来自外部的不断侵扰会逐渐使它瓦解。

也许你有兴趣知道，古代的印度在数学方面是颇有建树的。在这些伟大的数学家当中有一名女子，名叫莉拉瓦蒂（Lilavati）。据说，莉拉瓦蒂和她的父亲婆什迦罗（Bhaskaracharya），也许还有另

一个人婆罗摩笈多（Brahmagupta），他们率先发展完善了十进制。据说，代数（Algebra）也源自印度，并从印度传入了阿拉伯半岛，进而传到了欧洲。“Algebra”一词就来源于“Arabic”（阿拉伯语）一词。

---

1. 原文如此。一般说《政术精华》的作者是卡曼达基（Kamandakiya）。——译者注

46 ——宏伟的吴哥窟和三佛齐

我们现在来简要回顾一下中南半岛——来自南印度的人们在马来群岛和中南半岛上建立起了殖民地和定居点。我告诉过你，这些定居点是被有意识地组织和建设的。不管怎样，它们不是简单的自然发展形成的。在当时，一定出现了频繁的跨海往来和对海洋的完全控制，才能在几个不同地方同时出现了有意识的殖民化建设。我还告诉过你，这些殖民地始于公元1、2世纪。它们是印度教的殖民地，都是以南印度的名字命名的。几个世纪后，佛教逐渐传播开来，直到后来，信仰印度教的几乎整个马来群岛都改信了佛教。

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南半岛吧。最早的殖民地被称为“象郡”（Champs），位于安南境内。在这儿，我们发现在公元3世纪时，奔陀浪（Pāndurangam，今藩朗）就在蓬勃发展了。200年后，大城市真腊也繁荣兴盛起来了。到处是石头建成的寺庙和其他大型建筑物。你会发现，所有的印度殖民地境内都出现了大型的建筑物。建筑师和工匠们一定是从印度被带到这些地方的，他们在修建的过程中融入了印度的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岛屿之间还出现了大量的建筑竞争，这种竞争的结果促进了高水平艺术的发展。

居住在这些定居点的人们天生就是航海能人。他们或者他们的祖先已经航行穿越了大海，来到这些地方，环绕在他们四周的都是大海。航海民族从事贸易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以，这些人都是商人，他们带着货物穿过大海，前往不同的岛屿，到达过西边的印度和东边的中国。因此，马来群岛上的不同国家主要是由商人阶级进行统治。不同国家之间常常会发生冲突、大战争和大屠杀。有时候一个印度教国家会向一个佛教国家发动战争。但是，在那个时期，诱发诸多战争

的真正动机似乎是贸易竞争。就同现在一样，大国之间爆发的战争是为了市场和他们生产的商品。

在大约300年的时间内，直到公元8世纪，中南半岛上并立着3个不同的印度教国家。公元9世纪时出现了一位伟大的统治者——阇耶跋摩二世（Jayavarman II，公元802——850年在位），他成功地将各地统一起来，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帝国。他可能是一名佛教教徒。他在吴哥开始修建都城。他的继任者耶输跋摩一世（Yasovarman I，公元889——910年在位）最终完成了吴哥的建设。这个柬埔寨帝国（Cambodian Empire）的统治持续了大约400年。像其他帝国的发展历程一样，它也有过辉煌强盛的时期。皇城吴哥城因“宏伟的吴哥窟”而蜚声东方。这座城市居住了上百万的居民，比罗马皇帝们统治时的罗马城还要大。吴哥城的附近就是吴哥窟，即吴哥寺。公元13世纪，柬埔寨遭到多个方向的攻打。安南人从东边发起进攻，本地部落则从西边进攻。北边的掸人（Shan）被蒙古人赶到了南方，他们发现无路可逃，就转而进攻柬埔寨。这个国家已疲于应付持续不断的战争，保卫自己的国家。吴哥仍然是东方最辉煌的城市之一。公元1297年，一位中国使节被派往了柬埔寨，他生动地描写了这座宏伟的城市。但是，可怕的灾祸突然降临了吴哥。大约在公元1300年，湄公河（Mekong）河口被淤积的泥沙阻塞。河水无法畅行，受阻淤塞后就泛滥成灾，淹没了城市周围的所有地区，大量肥沃的田地变成了无用的沼泽地。城里的大量百姓开始忍饥挨饿。人们无法在城里继续生活下去了，只得被迫离开家园，迁徙到别的地方。所以，“宏伟的吴哥窟”被遗弃了。丛林不断生长，逐渐掩盖了吴哥。精美的建筑物暂时成了野生动物的栖息之所；最终，一座座宫殿被淹没在了丛林之中，渐渐变成了废墟，丛林成了吴哥不变的统治者。

柬埔寨在这场灾祸中并没有幸存太久，它逐渐没落瓦解，成了一个行省区域，有时被暹罗统治，有时被安南统治。但即使是现在，透过伟大的吴哥窟庙宇遗迹，我们依稀能够窥见当时的盛况：一座骄傲

辉煌的城市就矗立在附近，吸引了无数带着货物远道而来的商人，市民和手工业者制作的精美物品又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其他国家。

跨过大海，离中南半岛不远的地方就是苏门答腊岛。公元1、2世纪时，来自南印度的帕拉瓦人在这里建立了最早期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逐渐发展起来。马来半岛最早成了苏门答腊国的一部分。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苏门答腊国的首都就是大城市三佛齐，位于苏门答腊群山的内陆地区，还在巴邻旁河（Palembang River）河口拥有一个港口。大约在公元15或16世纪的时候，佛教成了苏门答腊国的主要宗教。事实上，苏门答腊率先积极地进行了佛教的传教布道活动，最终成功地使信仰印度教的大部分马来西亚地区改信了佛教。因此，这个苏门答腊帝国也被称为“三佛齐佛教帝国”（Buddhist Empire of Sri Vijaya）。

这个三佛齐帝国不断发展，日益强盛，其统治疆域不仅囊括了苏门答腊和马来，还包括了婆罗洲岛、菲律宾、苏拉威西岛（Celebes）、一半的爪哇岛、一半的“福摩萨”（Formosa，中国台湾岛旧称，现在被日本抢占）和锡兰，甚至还有在中国南部靠近广州的一个港口。可能还包括了位于印度南端的一个港口，面朝锡兰。因此，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覆盖了整个马来群岛。商业、贸易和造船业成了这些印度殖民地的主要行业。这个时期的中国和阿拉伯作家们给我们列出了一份份隶属于苏门答腊国的港口和新殖民地的长篇目录。这些目录内容仍在增加。

今天的大英帝国在全世界进行扩张，世界各地都有它的海港和优良的装煤港：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主要处于英国的控制下）、亚丁（Aden）、科伦坡、新加坡（Singapore）、中国的香港等。在过去的300年里，英国成了一个贸易国，它的贸易和国力依赖的就是它的制海权。因此，它需要在全世界便利的地理位置拥有港口和装煤港。三佛齐帝国也是一个以贸易为基础的海上强国。因

此，你可以发现，无论它在哪个地方，哪怕只有面积最小的落脚点，它都设有港口。事实上，苏门答腊国定居点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们的战略价值——也就是说，这些定居点的位置都是精心选址的，由此可以控制附近海域。它们通常是成对互助，以便维持对海域的控制管辖。所以，现在的大城市新加坡起初只是苏门答腊殖民地的一个定居点。你应该注意到了，“Singapore”这个词是一个典型的印度名字：Singhpur。苏门答腊人还在海峡对面设有另一个定居点，面朝新加坡。有时候，他们拉起了一条横跨海峡的铁链，阻止所有船只通过，除非付给他们高额的通行费。

所以三佛齐帝国与大英帝国完全不同，虽然这两个国家的面积都非常小。但是，三佛齐的统治时间比大英帝国可能统治的时间要长得多。它发展的顶峰时期正处于公元11世纪，此时朱罗帝国正在南印度蓬勃发展。但是，三佛齐的统治时间远远长于朱罗帝国。这两个国家保持了长期的友好关系，但是它们都是野心勃勃的航海民族，有强大的海军和广泛的贸易联系。在公元11世纪早期，这两个国家之间出现了冲突，随即又爆发了战争。朱罗王朝的国王拉金德拉一世派出了一支海上远征军，打败了三佛齐。但是不久，三佛齐就从这次重创中复苏了。

公元11世纪初，中国皇帝向苏门答腊国王馈赠了一件礼物，这件礼物是一套青铜编钟。作为回礼，苏门答腊国王向中国皇帝赠送了珍珠、象牙和梵文典籍。据说，有一封信是用印度文字镌刻在一个金盘上的。

三佛齐帝国繁荣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从公元2世纪早期开始，到公元5世纪或6世纪时成了一个佛教国家，然后继续发展，一直持续到了公元11世纪。在其中300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一个伟大的帝国，控制了马来西亚的贸易和商业。最后，在公元1377年，它被另一个古老的帕拉瓦殖民地推翻。

我告诉过你，三佛齐帝国从锡兰扩张到了中国的广州，还囊括了中间的大部分岛屿。但是，有一个小地方没有被征服，它就是爪哇岛的东部，这里一直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里的人信仰印度教，拒绝改信佛教。因此，爪哇岛的西部地区处于三佛齐的统治下，而东部地区则是一个独立的王国。这个位于东爪哇的印度教国家也是一个贸易国，它的经济繁荣也是依赖贸易。这个国家一定用嫉妒的眼光注视着新加坡，因为后者由于极佳的地理位置成了一个大型的贸易中心。所以，三佛齐和东爪哇是竞争对手，并逐渐成了死敌。从公元12世纪开始，这个爪哇国一直在缓慢地发展，不断侵扰攻打三佛齐帝国。我在上面提到过，在公元14世纪，也就是公元1377年，它最终完全打败了三佛齐。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到处都是大肆的破坏。三佛齐市和新加坡都遭到了损毁。因此，马来西亚历史上的第二个伟大帝国——三佛齐帝国——结束了。在这个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第三个帝国，它就是满者伯夷。尽管在战争中，东爪哇人对待三佛齐人非常残忍野蛮，但是我们可以在很多书中发现，在那个时期的爪哇岛上，这个印度教国家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在建筑上，尤其是在寺庙的修建上，这个国家尤为擅长。它修建了600多座寺庙，据说其中不乏世界上最精美无比、最具有艺术样本特征的石头建筑物。这些大寺庙的大部分均建于公元7世纪中叶到公元10世纪中叶之间——即公元650年至950年之间。爪哇人一定从印度和其他邻国带走了大量的建筑师和能工巧匠，以帮助他们修建这些大型的庙宇。我们将继续追溯爪哇岛的历史轨迹，我会在以后的信里谈一谈满者伯夷。

在这儿我要提一下，婆罗洲岛和菲律宾通过早期的帕拉瓦殖民地向印度学习了书写艺术。不幸的是，留存于菲律宾的许多古老手稿都被西班牙人损毁了。

你还要记住，从早期开始，阿拉伯人在所有这些岛屿上都建立起了他们的殖民地，这远远早于伊斯兰教。他们是伟大的商人，只要有贸易出现的地方，就一定会出现阿拉伯人。

47 ——罗马再次坠入黑暗

我时常认为自己一点都不是一个好导师，不能很好地指引着你穿越过去历史的迷宫。我自己往往也会迷失其中，我又怎样才能正确地引导你呢？但是，我又认为也许我能给你提供一点点帮助，所以我要继续写下去。当然对我而言，这些信使我获益良多。当我一边写信一边想念你的时候，亲爱的，我会忘记树荫下的凉爽，忘记我正身处112华氏度（约44摄氏度）的高温中，还会忘记炎热的洗手间里的滚滚热浪。甚至有时，我忘记了我正在巴雷利（Bareilly）的区监狱里。

在上一封信中，我带着你来到了公元14世纪末的马来西亚。然而，对于北印度历史的回顾，我们还停留在曷利沙王的统治时期——公元7世纪；此外，我们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补充了解欧洲的历史。但是，想要同时回顾同一个时期世界各地的历史则是十分困难的。我试图这样做，但是有时，比如在讲述吴哥和三佛齐的历史时，我就超前了几百年，这样我才能完整地讲完它们的历史。但是，你要记住，当柬埔寨帝国和三佛齐帝国在东方繁荣发展时，印度、中国和欧洲正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你还要记住，我的上一封信只有短短几页，就涵盖了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1000年的历史。这些国家与亚欧国家历史发展的主流毫无关系，所以不太引人注意。但是，它们也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在功绩、贸易和艺术方面成就非凡，尤其是建筑——这一切都值得学习。印度人一定会对这些国家特别感兴趣，因为它们几乎就是印度的一部分；从印度来的男男女女穿过大海，带去了印度的文化、文明、艺术和宗教。

所以，虽然我们提前讲述了马来西亚的历史，但我们仍要回到公元7世纪。让我们到阿拉伯半岛看一看伊斯兰教的诞生，以及它给欧洲

和亚洲带来的巨大变化。我们将追寻在欧洲发生的历史事件进程。

让我们再次看一眼欧洲，稍微回顾一下它的历史。你应该还记得，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拜占庭的位置上建立起了君士坦丁堡，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岸上。他把帝国的首都从旧罗马城迁到了这座城市，即新罗马城。不久之后，罗马帝国被分裂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西罗马帝国，以罗马城为首都；一个是东罗马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东罗马帝国不得不面对巨大的困难和众多的敌人。然而，令人称奇的是，这个帝国延续了一个又一个世纪，长达1100年之久，直到突厥人将其彻底终结为止。

西罗马帝国早已不复存在了。尽管，“罗马”这个名字享有盛名，而罗马城是这个帝国的都城，它长久以来都在西方世界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这个帝国以非常明显的速度在崩溃瓦解。它无法抵挡来自北方部落的进攻。公元410年，哥特人阿拉里克率军攻入意大利，占领了罗马。此后，汪达尔人也洗劫了罗马。汪达尔人是日耳曼民族的一支，他们穿过了法国和西班牙，进入了非洲，在迦太基的废墟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他们从古老的迦太基旧址而来，横渡了大海，夺取了罗马。这几乎好像是一场对罗马取得布匿战争胜利的迟来的报复。

来自中亚或蒙古的匈人，在这个时期逐渐强盛起来。他们是游牧民族，定居在多瑙河（Danube River）以东和东罗马帝国的北边和西边。在领袖阿提拉的统治下，这个民族变得越来越野心勃勃。东罗马帝国及其皇帝长期生活在对匈人的恐惧之中。阿提拉恃强欺弱，欺负罗马人，让他们缴纳大量的金钱。阿提拉在百般羞辱了东罗马帝国后，决定进攻西罗马帝国。他侵略了高卢，摧毁了法国南部许多城镇。

西罗马帝国的军队不是阿提拉的对手，但是一些日耳曼部落，也就是罗马人眼中的“野蛮人”，害怕匈人的入侵，所以法兰克人和哥特人都加入了西罗马帝国的军队，他们联合起来与阿提拉领导的匈人在特鲁瓦（Troyes）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战役。据说，战死在沙场的士兵超过了15万人，阿提拉也战败了，这支蒙古匈人被赶了出去。这场战役发生在公元451年。但是，阿提拉虽然战败了，仍斗志昂扬。他率军攻入了意大利，焚毁和洗劫了意大利北部的许多城镇。不久之后，他便离开了人世，只留下了残暴无道且经久不衰的恶名。即使是今天，匈人领袖阿提拉几乎被视为残酷毁灭的化身。在他死后，匈人开始休养生息，安居一方，与许多其他民族融合在了一起。你也许还记得，这个时期大约正是㘔哒人入侵印度的时候。

40年后，一位名叫狄奥多里克（Teodoric）的哥特人成了罗马的皇帝，这几乎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结束。不久以后，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成功地把意大利纳入了帝国版图。他征服了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但是不久以后这两个国家又摆脱了他的统治。东罗马帝国仍然有足够的实力来保卫自己。

在几乎每一个部落选择进攻罗马帝国之前，这个帝国和它的君权统治就会迅速且轻易地被瓦解，这难道不奇怪吗？有人会认为罗马已经崩溃了，或者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这个观点可能是正确的。在漫长的时间里，罗马的国力奠定了它的威望。它曾经的历史使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把它视为世界的领袖，人们对它充满了敬仰，几乎还带有迷信的恐惧。所以，罗马一直延续着，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个帝国的强健有力的情人，但事实上它的背后没有任何支持力量。表面上是一片风平浪静的景象，剧院、竞技场和市场里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但是，它不可避免地正走向没落崩溃，不仅仅是因为它已衰弱不堪，而且是因为它是在人民大众的凄苦和被奴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富人的文明。在之前的一封信里，我向你提到了穷人的反抗和起义，还谈到了一名伟大奴隶的起义，最后被无情地镇压。这些

反抗向我们展示了罗马的社会结构是多么腐朽堕落。这个帝国是自己走向了毁灭，而北方部落——哥特人和其他民族——的入侵只是加速了这个进程而已，因此这些部落的入侵没有遇到丝毫抵抗。罗马平民们已经受够了悲惨凄苦的生活，欢迎一切变化的到来。对于穷困的劳动者和奴隶而言，他们的境况更加凄惨。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终结，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新兴民族走在了历史的前沿——哥特人、法兰克人和其他民族，我就不一一列举它们的名字了，以免你困惑不解。这些民族是今天的德国人、法国人等西欧人的祖先。我们看见这些国家在欧洲逐渐发展成形了。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缓慢的文明发展进程。罗马帝国的结束也是罗马浮华奢靡的结束，在罗马苟延残喘的肤浅文明几乎在一天之内就消失殆尽了，文明的根基早已腐烂不堪。因此，事实上，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类明显倒退的奇怪例子。印度出现过，埃及出现过，中国出现过，希腊出现过，罗马出现过，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都出现过。当知识和经验经过艰苦地积累后，当文化和文明被建立后，就会出现一次停滞。它不是停步不前，而是落后倒退。朦胧的面纱似乎遮盖了过去，虽然我们偶尔可以窥视其中，但是不得不重新攀爬知识和经验的高峰。也许每一次的攀登可以爬得更高一点，使下一次的攀爬更加容易。就如同一支又一支探险队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每一支后来的探险队就离顶峰更进一步，也许最高的顶峰将在不久之后被征服。

所以，我们看到了笼罩在欧洲的黑暗。欧洲的黑暗时代开始了，人们变得粗鲁无礼，几乎没有教养可言，战争似乎成了唯一的日常活动或消遣方式。的确，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似乎已远远离去了。

这就是西罗马帝国的历史。让我们来看一看东罗马帝国。你应该还记得，君士坦丁大帝使基督教有了合法地位。他的其中一个继任者朱利安皇帝（Emperor Julian）拒绝接受基督教。他一心想回到对古代男女众神的崇拜。但是，他没有成功，因为崇拜古代众神的时代已

经过去了，基督教的实力非常强大。朱利安被基督徒们称为“叛教者”，他也因此被载入了史册。

继朱利安皇帝后不久出现了一位与他完全不同的皇帝，名叫狄奥多西（Teodosius），他被称为“大帝”，我认为原因是他大量地毁掉了旧时代的庙宇和男女众神的雕像。他不仅仅是强烈反对非基督徒们，按照他的思维方式，他同样敌视非正统的基督徒。他完全不能容忍他不赞同的观点或宗教。狄奥多西曾一度合并统治了东西罗马帝国，并成为这两个帝国的皇帝。这发生在公元392年，在野蛮部落入侵罗马之前。

基督教在继续发展和传播。此时的斗争已不再是针对非基督徒们的斗争。一切争斗都来源于基督教内部不同派系的相互倾轧，他们彼此互不容忍，这简直令人惊异。整个北非、西亚和欧洲纷纷出现了许多战场，基督徒们用拳头、棍棒和类似温和劝说的方式来试图说服兄弟派系接受真正的信仰。

从公元527年到565年，查士丁尼是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我告诉过你，他把哥特人赶出了意大利，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曾一度属于东罗马帝国。后来，哥特人又恢复了对意大利的统治。

查士丁尼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了美丽的圣索菲亚大教堂（Sancta Sophi），至今它仍然是拜占庭风格（Byzantine）最精美的教堂之一。他还让能力出众的律师们整合编辑了现有的法律。早在我了解东罗马帝国和它的众位帝王们之前，我就从一本法律书上知道了查士丁尼这个名字，这本书的书名是《查士丁尼法学总论》（*Institutes of Justinian*），我以前还读过这本书。但是，虽然查士丁尼在君士坦丁堡建了一所大学，但是他关闭了研究雅典哲学的研究院或古老学院，这些可是由柏拉图创建的，已发展了1000年。对一切教条主义的宗教而言，哲学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它教会了人们思考。

因此，我们来到了公元6世纪。我们看见罗马和君士坦丁堡逐渐分离，各奔东西；罗马被北方的日耳曼部落占领；君士坦丁堡成了一个希腊帝国的中心，虽然它仍被称为是罗马的；罗马帝国逐渐崩溃瓦解，沦落到征服者低级文明的水平，而这些征服者曾在罗马的辉煌时期被称为“野蛮人”；君士坦丁堡在某种形式上一直延续着古老的传统，但是它的文明逐渐走向了没落；基督教各宗派之间为统治权而相互争斗；东方基督教已经传播到了突厥斯坦、中国和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即埃塞俄比亚），完全中断了与君士坦丁堡和罗马的联系。欧洲的黑暗时代开始了。到目前为止，求知是指对古典的学习——也就是学习希腊文或古拉丁文的文献（古拉丁文曾从希腊文中获取了灵感）。但是，这些关于男女众神和哲学的古老希腊典籍被认为不适合那些早期的虔诚敬神且心胸狭隘的基督徒去学习。因此，阅读这类典籍的行为并没有得到鼓励，古典文献的学习遭到了阻碍，许多艺术形式也同样如此。

但是，基督教也对知识和艺术做了一定的保护。例如佛教僧伽的寺院得以修建且传播迅速。有时，古老典籍在这些寺院里找到了容身之地。这也是新艺术形成的开端，它将在数个世纪之后绽放出所有的美丽。这些僧人只是竭力保存了烛火微澜的知识和艺术之灯。他们所能做的就是不让它熄灭。但是，这点灯火被局限在了一个狭小的地方，外面仍是一片黑暗。

在基督教早期，还出现了另一个奇怪的趋势。很多人满怀着狂热的宗教热情，隐居在沙漠和孤苦之地，远离人们的生息之所，他们生活在旷野里。他们还自我折磨，从不洗漱，往往是尽可能地忍受痛苦。这尤其盛行于埃及，许多隐士都生活在埃及的沙漠里。他们的观点似乎就是他们承受的痛苦越多，洗漱得越少，就会变得越神圣。其中有一位隐士多年来一直坐在一根柱子上！这些隐士已经逐渐消失了，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虔诚信仰基督教的人认为一切享受几乎就是一种罪恶。这种承受痛苦的观念能给基督教思想增光添

彩。在今天的欧洲，这种观点已所剩无几了！的确，每个人都好像醉心于狂热地东奔西跑，去拥有所谓的幸福时光。然而，四处奔波的结果往往是疲惫厌倦，也不会得到所谓的幸福时光。

但是，甚至在今天的印度，我们有时可以看见人们的行为举止在某种程度上就如同那些在埃及的基督教隐修士一般。他们高举着一只手臂直到手臂干枯萎缩，或者坐在长钉上，或者做出荒诞愚蠢的行为。我认为，有些人这样做只是为了欺骗无知的民众，骗取他们的钱财；另一些人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变得更加神圣！似乎只有让身体不适合任何体面的活动，才能让人感到满意。

我想起了一个释迦牟尼的故事，为此我再次想起了我们的老朋友玄奘。当释迦牟尼的一名年轻弟子正在苦修时，释迦牟尼问他：“亲爱的年轻人，当你是俗人时，你知道怎样弹奏鲁特琴吗？”弟子说：“我知道。”“好吧，”释迦牟尼说，“那么我要从中做一个比较。当琴弦很紧的时候，琴声就不会抑扬顿挫；当琴弦太松的时候，琴声既不和谐动听，也无迷人之处；但是当琴弦既不太紧又不太松的时候，琴声才会和谐悦耳。因此，对身体而言，也同样如此。如果过于严苛对待，那么身体就会疲倦困乏，精神也会倦怠低落；如果过于舒适，那么感官就会被姑息纵容，意志也会被削弱。”

48 ——伊斯兰教的到来

我们已经回顾了许多国家的历史和王国、帝国的兴衰史。但是，阿拉伯半岛还没有完全走进我们的故事里，我们只谈及了一个国家派出航海者和商人前往世界的其他遥远地区。看一看地图吧。西边是埃及；北边是叙利亚和伊拉克，还与波斯或伊朗东部的一小片地区接壤；再远一点，西北方就是小亚细亚和君士坦丁堡。与希腊相距不远，跨过大海的另一头就是印度。除了中国和远东，就古老文明而言，阿拉伯半岛处于非常中心的地理位置上。在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发拉底河（Euphrates）流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Damascus），在小亚细亚的安条克（Antioch），大型城市纷纷拔地而起。阿拉伯人既是旅行家又是商人，他们一定经常往返于这些城市。但是尽管如此，阿拉伯半岛在历史上并没有显著的地位。它似乎没有像邻近国家那样拥有高度的文明。它既没有征服其他国家，也没有轻易臣服于他国。

阿拉伯是一个沙漠国度，沙漠和群山养育出吃苦耐劳的人民，他们热爱自由，不轻易屈服。它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几乎不能吸引外国征服者和帝国主义者。在这个地方有两个小城镇——毗邻大海的麦加和耶斯里卜（Yathrib）。其他地区则位于沙漠之中，这个国家的人民主要是贝都因人（Bedouin）——“沙漠的居住者”。他们亲密的伙伴是敏捷的骆驼和出色的马匹，甚至驴子因有着非凡的忍耐力也被视为了忠诚的朋友。与其他国家一样，在这个国家里被比喻成驴子是一种赞美，而不是侮辱。由于沙漠国家的生活非常艰苦，因此与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相比，力量和耐力被认为是最珍贵的品质。

他们是沙漠之子，骄傲、敏感又喜口舌之争。他们以氏族和家庭为单位在一起群居，与其他氏族和家庭相互争吵。每年有一次他们会和平相处——前往麦加朝圣，他们信仰的许多神灵的神像就保存在那里。总之，他们崇拜的是一块巨大黑石——克尔白（Kaaba）黑石。

这是一种游牧式家长制的生活——在中亚或其他地区的原住民们在定居城市和拥有文明之前，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在阿拉伯半岛周边地区崛起的帝国经常将其纳入版图，但事实上有名无实。要想征服或统治这些沙漠游牧民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许你还记得，从前在叙利亚的帕尔米拉出现了一个小的阿拉伯国家，它曾在公元3世纪时期有过短暂的辉煌。但即使如此，这个国家也位于阿拉伯半岛以外。所以，贝都因人一代又一代地过着沙漠游牧生活，一艘艘阿拉伯船只外出，进行贸易活动，而阿拉伯半岛却一直没有任何改变。一些人成了基督徒，一些人成了犹太教徒，但是绝大多数人仍然信仰着麦加的360尊神像和黑圣石。

令人奇怪的是，这个阿拉伯民族长久以来一直悄无声息，显然与外界发生的一切中断了联系，但是它突然惊醒，焕发出巨大的能量，使整个世界都惊恐不已、一片混乱。关于阿拉伯人的故事，关于他们如何迅速扩散到整个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故事，关于他们如何发展高度文化和文明的故事，这些都是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伊斯兰教是一种新的力量或新的理念，它唤醒了阿拉伯人，使他们充满了自信和力量。伊斯兰教创始人、阿拉伯人的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570年出生于麦加。他并不急于传播这个宗教。他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深受同胞们的喜爱和信任。事实上，他被尊称为“艾敏”（Al-Amin），也就是忠实者。但是当他开始传播新宗教时，尤其是当他布道反对麦加的神像时，他遭到了强烈的抗议，最后他被驱逐出境，过上了逃亡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他强调只有一个神，而他，穆罕默德，就是神的先知。

穆罕默德被自己的人民逐出了麦加，他向在耶斯里卜的一些朋友和救助者寻求庇护。这次离开麦加的逃难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圣迁”（Hijrat），伊斯兰历就是从这个日期开始算起——公元622年。这个伊斯兰教纪元（Hegira）历法是一种阴历——也就是按照月球公转来计算日子的。因此，它比我们通常观测到的太阳年要短五六天，它的月份也没有固定在同样的一年四季里。因此，同样的月份在今年可能是冬季，几年后就可能是夏季。

有人也许认为，伊斯兰教始于公元622年的逃难——圣迁，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要开始得更早一些。耶斯里卜非常欢迎穆罕默德的到来。为表示对他到来的欢迎，这座城市更名为“麦地那-纳比”（Madinat-un-Nabi）——意思是“先知之城”——简称麦地那（Medina），也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这个名字。帮助了穆罕默德的人就被称为“安萨尔”（Ansar）——意思是“辅士”。这些辅士的后代们以此名为荣，时至今日仍沿用着这个称呼。

在我们开始讲述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的征途之前，先让我们来简要地回顾一下。我们看到了罗马的崩溃。古老的希腊-罗马文明结束了，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整个社会结构也倾覆了。北欧部落和宗族正逐渐处于领先地位。他们向罗马学习借鉴，真正地建立起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文明。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几乎还没有明显的迹象。因此，旧体系正在消亡，而新体系尚未取代其位置；所以欧洲正处于黑暗时代。的确，位于欧洲东端的东罗马帝国仍然欣欣向荣。此时的君士坦丁堡是一个辉煌壮丽的城市，也是欧洲最伟大的城市。圆形剧场里举行着体育比赛和竞技，还有大量的游行和表演。但是这个帝国仍然走向了衰落。它与波斯的萨珊王朝发生了持续不断的战争。实际上，波斯的萨珊王库思老二世已统治了东罗马帝国的部分地区，甚至宣称对阿拉伯半岛有名义上的最高统治权。库思老二世还征服了埃及，随后又剑指君士坦丁堡，不过后来被那里的东罗马帝国的希腊人皇帝希拉

克略（Heraclius）打败了。最后，库思老二世被儿子卡瓦德（Kavadh）谋杀。

所以，你应该注意到了，西方的欧洲和东方的波斯都处于一种糟糕的局面。此外，基督教各宗派之间的争执不和永无休止。一个非常腐败堕落且吵闹不休的基督教在西方和非洲繁荣发展起来了。在波斯，琐罗亚斯德教是帝国的组成部分，人民被迫信仰。所以，欧洲、非洲和波斯的普通百姓对现有的宗教信仰已经幻灭了。恰逢此时，公元7世纪初期，大瘟疫蔓延了整个欧洲，死亡了数百万人。

在印度正是曷利沙·伐弹那统治的时期，玄奘也在这个时期到访了印度。在曷利沙统治期间，印度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但不久之后，北印度就四分五裂，逐渐衰落了。在更东边的中国，伟大的唐朝已经开始了它的统治。

公元627年，中国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唐太宗开始统治中国，在他统治期间，中国的疆域扩大到了西方的里海。中亚大部分国家都认可他为宗主国国君，并向他纳贡。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可能并没有一个中央集权制政府。

这就是伊斯兰教诞生之时亚欧国家的情况。中国繁荣强盛，但地处遥远；印度在这个时期至少也足够强大，但是我们看见印度在以后的较长时期内没有出现冲突和纷争；欧洲和非洲当时非常衰弱，疲惫不堪。

在经历了7年的逃亡之后，穆罕默德以统治者的姿态回到了麦加。在这之前，他就在麦加向全世界的国王和统治者要求，承认一神论和他的先知身份。君士坦丁堡皇帝希拉克略收到了这个要求，此时他正在叙利亚征战波斯人；波斯皇帝也收到了；据说，中国唐朝皇帝也收到了。这些国王和统治者一定很想知道这个素昧平生的人怎敢如此命令他们！从发出的这些信息中，我们可以得知穆罕默德对于本人和他

的传教活动一定有着无比的自信。这个以前没有对世界造成任何重大影响的沙漠民族，在穆罕默德传播的自信、信念、激励和抚慰的支撑下，设法征服了已知世界的一半。他们的信心和信念是非常了不起的。伊斯兰教也给予了他们兄弟般的情谊——所有的穆斯林都是平等的。因此，一定程度上的民主展现在了人民的面前。与那个时期腐朽的基督教相比，这种兄弟情谊的传播一定有着极大的号召力，不仅吸引了阿拉伯人，还吸引了他们所到之处的许多国家的人民。

穆罕默德死于公元632年，即圣迁的10年后。他成功地联合了阿拉伯半岛上的许多好战民族，建立了一个国家，并成功地使他们以极大的热情为之奋斗不已。他的一位家族成员艾布·伯克尔（Abu Bakr）继承了他的位置，成了哈里发（Khalifa，Caliph）注。这种继位在过去往往是在公开集会上通过非正式选举产生的。两年后，艾布·伯克尔去世，由奥马尔（Omar）继任；奥马尔担任了10年哈里发。

艾布·伯克尔和奥马尔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为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伟业奠定了基础。作为哈里发，他们既是宗教领袖，也是政治领袖——集国王和教皇于一身。尽管他们有着很高的地位，国家也日益强盛，但是他们坚持平淡朴素的生活方式，拒绝奢靡浮华。伊斯兰教民主制度在他们看来是一个正欣欣向荣的事物。但是他们自己的官员和埃米尔们（emir）注很快沉溺于对丝绸和奢华生活的享受中，由此人们传颂着关于艾布·伯克尔和奥马尔指责和惩罚这些官员，甚至对奢侈挥霍痛哭流涕的种种故事。他们觉得他们的力量来自简朴艰苦的生活。如果他们过上了像波斯或君士坦丁堡宫廷那样的奢靡生活，那么阿拉伯人就会腐败堕落，就会衰弱消亡。

在艾布·伯克尔和奥马尔统治的短短几十年内，阿拉伯人打败了东罗马帝国和波斯的萨珊王朝。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圣城耶路撒冷被阿拉伯人占领，整个叙利亚、伊拉克和波斯成了新阿拉伯帝国（Arabian Empire）的一部分。

1. 哈里发，意为“安拉使者的继任者”。——译者注

2. 埃米尔，某些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的酋长、王公或统帅的称号。——译者注

49 ——阿拉伯人从西班牙到蒙古的征服

与其他宗教的奠基者一样，穆罕默德是反对当时现有社会习俗的一名反叛者。他的宗教宣扬简朴坦率，崇尚民主平等，因此吸引了邻近国家长期以来受到独裁专制的帝王和神职人员剥削压迫的广大人民。他们已经厌倦了旧有的社会秩序，为变革做好了准备。伊斯兰教给他们带来了这样的改变，受到了他们的热烈欢迎，因为这个宗教在很多方面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制止了很多旧有的虐待伤害行为。伊斯兰教并没有在传播过程中带来任何巨大的社会变革，这样的传教原本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结束对百姓们的剥削的。但是，就穆斯林而言，它还是减轻了剥削的程度，使他们觉得彼此是拥有同一种伟大的兄弟情谊的。

所以阿拉伯人能够在征服中大步前进。他们往往可以不用任何武力就取得胜利。在他们的先知逝世后的25年内，阿拉伯人征服了整个波斯、叙利亚、亚美尼亚（Armenia）和中亚的小部分地区，他们还在西面征服了埃及和一小部分北非地区。征服埃及简直是轻而易举，因为它早就受够了罗马帝国的统治和基督教各宗派的敌视。有一个关于阿拉伯人焚毁亚历山大港著名图书馆的故事，但现在据说是虚构的。阿拉伯人非常热爱书籍，不可能有这种野蛮、令人发指的行为。然而，君士坦丁堡的狄奥多西大帝——我在前面的信里提到过他——犯下了这场毁灭之罪，或者说犯下了部分罪行。在尤利乌斯·恺撒统治期间，这座图书馆早就被毁掉了一部分。狄奥多西大帝反对有关古希腊神学和哲学的古老的异教希腊文献。他是一名狂热的基督徒。据说，他曾将那些古典文献作为柴烧，用以为他提供沐浴用的热水。

阿拉伯人继续在征服东方和西方的途中一路前行。在东方，他们相继征服了赫拉特、喀布尔和大夏，然后来到了印度河流域和信德。但是，他们没有深入至印度内部地区，此后的几百年里，他们与印度的统治者一直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在西方，他们不停地前进。据说，他们的将军欧克巴（Okba）率军穿过了北非，一直来到了大西洋（Atlantic Ocean），抵达了现在的摩洛哥（Morocco）的西海岸。对于海洋的阻隔，他感到非常失望。他乘船驶入大海，尽可能深入到他能到达的海域，然后他对着真主安拉（the Almighty）表达了他极度哀痛的心情，因为在他面前的这个方向已经没有更多的土地能以真主安拉的名义进行征服了。

从摩洛哥到非洲，阿拉伯人跨过狭窄的海域进入了西班牙和欧洲——这段海岬被称为“赫拉克勒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是由古希腊人命名的。阿拉伯的将军率军越过海峡进入了欧洲，在直布罗陀海峡登陆。这个名字本身就会让人记住一位阿拉伯将军，他的名字应是塔里克（Tariq），直布罗陀海峡的真名应是“直布尔·塔里克”（Jabal-ut-Tariq），意思是指“塔里克的岩石”。阿拉伯人很快就征服了西班牙，随后大举攻入法国南部。所以，在穆罕默德死后的大约100年里，阿拉伯帝国从法国南部和西班牙跨过了北非，扩张到了苏萨（Susa），还跨过了阿拉伯半岛、波斯和中亚，一直延伸至蒙古边境。

印度除了信德以外，并没有被纳入阿拉伯帝国的版图。欧洲遭到了阿拉伯人的两面进攻——一面是对君士坦丁堡的直接进攻，另一面则通过非洲在法国境内进攻。在法国南部的阿拉伯人数量不多且距离故土非常遥远，因此，他们没法得到阿拉伯半岛的支援，因为阿拉伯半岛此时正忙于征服中亚地区。但是，这些在法国的阿拉伯人依然使西欧人民万分惧怕，他们结成联盟一起抵抗阿拉伯人。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是这支联盟军的领袖。公元732年，他在法国图尔（Tours）战役中大败阿拉伯军队。这场战役把欧洲从阿拉伯人手中救

了出来。一名历史学家说：“在图尔的平原上，阿拉伯人失去了几乎唾手可得的世界帝国。”毫无疑问，如果阿拉伯人赢得了图尔战役，那么欧洲的历史将会发生巨大改变。在欧洲将不会有任何人能阻止阿拉伯人的前进，他们可能会一直挺进到君士坦丁堡，所到之处他们将终结东罗马帝国和其他王国的统治。此后，伊斯兰教将取代基督教，成为欧洲的国教，各种形式的其他变化也许都会发生。但是，这仅仅是想象而已。事实上，法国止住了阿拉伯人进攻的步伐。然而，在此后的数百年里，阿拉伯人仍继续统治着西班牙。

从西班牙到蒙古，阿拉伯人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这些来自沙漠的游牧民族成了一个强大帝国自豪的统治者。他们被称为撒拉逊人（Saracen）[注]，也许源自“Sahra”和“nashin”——意思是沙漠的居住者。但是，这些沙漠的居住者很快就沉溺于奢华享乐的城市生活之中，一座座宫殿在他们的城市里拔地而起。尽管他们征战遥远的国家取得了胜利，但是他们仍不能摆脱彼此争执不休的旧习惯。诚然，有一些事情是值得争论的，因为拥有阿拉伯半岛的领导地位意味着对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所以，经常出现争夺哈里发一职的角逐。由小规模的争论发展到家族之间的论战，继而引发了内战。这些争执导致了伊斯兰教的大分裂，由此形成了两个宗派——逊尼派（Sunnis）和什叶派（Shiah）——这两个宗派至今仍然存在。

在最初的两位伟大的哈里发——艾布·伯克尔和奥马尔的统治后，动乱局面接踵而至。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Fatim）的丈夫阿里（Ali）曾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担任了哈里发一职。但是，冲突一直不断。阿里遭到了谋杀，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儿子侯赛因（Hussain）及其家人在卡尔巴拉（Karbala）的平原上也遭到了屠杀。穆斯林们，尤其是什叶派教徒，年复一年地在穆哈兰姆月（Muharram）[注]里哀悼这场卡尔巴拉惨剧。

现在的哈里发成了独裁专制的国王。在他身上没有任何民主或选举可言。他与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任何君主没什么两样。从理论上讲，他仍然是宗教领袖——“忠诚者的首领”（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但事实上，一些哈里发侮辱了伊斯兰教，他们本应该是伊斯兰教的主要捍卫者。

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哈里发一度由穆罕默德家族的一个分支担任，被称为“倭马亚家族”（Ommeyades）。大马士革成了倭马亚王朝的首都，这座古老的城市异常美丽，到处都是美丽的宫殿、清真寺、喷泉和凉亭。大马士革的供水系统非常出名。在这个时期，阿拉伯人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建筑风格，从此被称为撒拉逊式建筑。这类建筑物里没有太多的装饰，它们简洁、庄严而美丽。这类建筑物背后的思想理念就是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的优雅的棕榈叶。拱门、支柱、尖塔和圆顶使人们回想起棕榈林的拱形和林冠。

这种建筑风格也传到了印度，但是受到了印度思想的影响，由此发展出了一种混合式的风格。西班牙境内至今仍然保存着一些最精美的撒拉逊式建筑。

财富和帝国带来了豪华的生活、体育竞技和奢华的艺术。赛马成了阿拉伯人最喜爱的娱乐方式，还有马球、狩猎和国际象棋。对音乐，尤其是歌唱，有着时尚狂热的追求。整个首都到处是成队的歌者和追随者。

另一个巨大但又是非常不幸的变化逐渐发生了，即女性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在阿拉伯妇女并不佩戴面纱。她们既没有遭到隔绝，也没有被藏起来。她们可以在公共场所四处行走，可以去清真寺，参加讲学，甚至能举办讲学。但是，扩张的胜利使得阿拉伯人越来越效仿地处阿拉伯半岛两侧的两大帝国——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生活习俗。阿拉伯人打败了前者，结束了后者，但是他们自己也染上了这两个帝国的习俗。据说，尤其是因为受到了君士坦丁堡和波斯的影响，

阿拉伯妇女开始过上了被隔绝的生活。女眷们的生活范围逐渐开始被局限在了内室，男人和女人在公共场合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这种妇女的隔绝生活成了穆斯林社会的一大特点。穆斯林们来到印度后，印度也向他们学习了这个特点。令我感到惊异的是，有一些人还在容忍这种行为。无论何时，只要我一想到戴着面纱的妇女待在小屋子里与外世隔绝，我就一定会联想到犯人！如果一个国家一半的人口都被藏在像监狱一样的地方，那么这个国家如何才能进步呢？

幸运的是，印度正在迅速地撕掉这层面纱。甚至穆斯林社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这个沉重的负担。在土耳其，凯末尔·帕夏（Kamal Pasha）完全废除了这个习俗。在埃及，这个习俗也正在迅速消失。

再说一点我就结束这封信。阿拉伯人，尤其是在他们觉醒的初期，对他们的信仰充满了热情。然而，他们是一个宽容的民族，这种在宗教上的宽容态度有着无数的事例。在耶路撒冷，哈里发奥马尔（Khalifa Omar）阐明了这个观点。在西班牙，大量的基督徒曾有过最大的意识自由。在印度，除了信德以外，阿拉伯人没有统治过任何地区，还与印度保持着频繁的交流联系，这种联系是和睦、友好的。事实上，这段时间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宽容和欧洲基督徒的狭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1. 撒拉逊人，后期用语，泛指阿拉伯人。——译者注
2. 穆哈兰姆月，伊斯兰历的一月。——译者注

50 ——巴格达和哈伦·拉希德

让我们在谈论其他国家之前，继续讲述阿拉伯人的故事吧。

在上一封信里，我向你讲述了大约100年的历史，哈里发由先知穆罕默德的族裔倭马亚家族担任。他们定都在大马士革，开始了倭马亚王朝的统治。在他们统治期间，穆斯林阿拉伯人把伊斯兰教教义传播到了更广阔的地区。阿拉伯人一边在征服遥远的国度，一边又在国内纷争不止，内战频发。最终，倭马亚王朝被穆罕默德家族的另一个分支推翻，这个分支是穆罕默德的叔叔阿拔斯（Abbas）的后人，因此被称为阿拔斯人（Abbaside）。阿拔斯人的反抗是为了报复倭马亚人的残酷无道，但是当他们赢得胜利后，在残暴和屠杀方面更胜一筹。他们四处搜捕倭马亚人，并以野蛮残忍的方式处死了他们。

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开始长期统治阿拉伯帝国。这可不是一个令人感到高兴或幸运的开始，然而阿拔斯王朝却是阿拉伯历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但是，巨大的变化已经从倭马亚王朝开始了。阿拉伯半岛的内战动摇了整个阿拉伯帝国。虽然阿拔斯赢得了国内的胜利，但是在遥远的西班牙，阿拉伯总督是一名倭马亚人，他拒绝承认阿拔斯的哈里发。不久之后，北非或曾被称为西北非洲(注)的总督管辖地区也纷纷宣布独立。埃及也同样如此，事实上宣布了由另一位哈里发统治。

埃及距离阿拉伯半岛非常近，很容易受到威胁，被迫屈服，而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但是，西北非没有受到干扰；至于西班牙，由于相距遥远则不易对其展开任何行动。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阿拉伯帝国在阿拔斯王朝建立之际就四分五裂了。哈里发不再是整个伊斯兰教

世界的领袖，也不再是所有忠诚者的首领。伊斯兰教不再团结统一，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和阿拔斯王朝相互憎恶，甚至一方遭遇厄运的时候，另一方会拍手称快。

尽管如此，阿拔斯哈里发是伟大的统治者，他们的帝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像其他帝国的发展历程一样，征服了高山并像燎原之火一样传播的古老信仰和力量已经消失。简朴和民主已所剩无几，“忠诚者的首领”与那些被早期阿拉伯人打败的波斯君主和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相比，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先知穆罕默德时期的阿拉伯人拥有一种奇怪的生活方式和力量，这有别于国王军队的力量。在那个时期，他们居于世界的前列，无数的军队和国王在他们所向无敌的行军途中纷纷溃败。人民大众已经厌倦了这些君主，而阿拉伯人似乎给他们带来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和社会变革的承诺。

如今，所有这一切都早已发生了改变。这些沙漠的人民住进了宫殿，豪华的美食取代了过去的艰苦日子。他们过上了安逸享乐的生活，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去操心变化和社会革命呢？他们试图重现旧帝国的豪华显赫，还接受了旧帝国的许多恶习。

此时的首都由大马士革迁到了伊拉克的巴格达。首都的变化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巴格达曾是波斯帝国国王们的避暑胜地。与大马士革相比，巴格达离欧洲更远，从此以后，阿拔斯王朝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亚洲，而不再是欧洲。但是阿拔斯王朝仍多次试图占领君士坦丁堡，与欧洲列国也数次交战，但大多是防御性战争。四处征伐的时期似乎已经进入了尾声，阿拔斯哈里发们设法巩固加强这个王朝的统治，努力维持他们刚接手时的状态。即使没有西班牙和非洲，这个王朝也依然强大。

巴格达！你难道不记得了吗？你不记得哈伦-拉希德（Harunal-Rashid）、谢赫拉莎德（Shaherazade）和《一千零一夜》里奇妙精彩的故事了吗？在阿拔斯哈里发们统治下崛起的这座城市就是《一千零

一夜》里的那座城市。在这个大城市里有宫殿、官署、学校和学院，还有大型的商店、公园和花园。商人们与东西方国家进行了大量的贸易往来。成群的政府官员与这个帝国较为遥远的地区保持着联系和交往。政府机构变得越来越复杂，然后被划分成了许多部门。一个有效的邮政体系将帝国的各个角落与首都紧密连在一起。大量的医院也建立起来了。旅行者从世界各地来到巴格达，尤其是学者、学生和艺术家们，因为众所周知，哈里发热烈欢迎所有饱学之士和精通艺术的人。

哈里发本人过上了极度奢侈的生活，身边奴仆成群，妻妾们深居内宫。从公元786年到809年的哈伦-拉希德统治期间，阿拔斯帝国（Abbaside Empire）在表面上处于了荣耀的顶峰。中国皇帝和西方的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都派遣使节来到了哈伦的宫廷。除了阿拉伯西班牙（Arab Spain）以外，巴格达和阿拔斯王朝在政府管理、商业贸易和学术发展方面已远远领先于同时期的欧洲。

阿拔斯王朝之所以特别吸引我们的兴趣，是因为此时出现了对科学的新关注。你知道的，科学在现代世界是非常了不起的，大量的事物都归功于科学。科学不是简单地坐下来，向某些神灵祷告就可以产生，而是要去寻找探索事物发生的原因。它要经过反复的实验和试验，有时失败，有时成功——由此，一点一点地增加和丰富人们的知识。我们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或中世纪时期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巨大的改变主要得益于科学，因为现代世界是由科学缔造的。

我们没有在埃及、中国和印度的古人中找到任何科学方法，我们只在古希腊有零星的发现。在罗马则是毫无踪迹可寻。但是，阿拉伯人已经具备了这种探究科学的精神，所以他们也许被认为是现代科学之父。在某些学科领域，如医学和数学，他们大量地向印度学习。为数众多的印度学者和数学家纷纷来到了巴格达。许多阿拉伯学生来到了北印度以医学见长的塔克西拉大学学习。关于医学和其他科目的梵

文书籍被翻译成了阿拉伯文。阿拉伯人还向中国学习了许多技术，如造纸术等。但是，在向他国学习积累知识的基础上，他们有了自己的研究和几个重要的发现。他们发明了第一架望远镜和航海罗盘。在医学上，阿拉伯内科医师和外科医师在整个欧洲都很有名气。

毫无疑问，巴格达是所有知识活动的伟大中心。在西方，阿拉伯西班牙的首都科尔多瓦（Cordoba）则是另一个中心。阿拉伯世界里出现了许多其他的大学中心，知识得到了繁荣发展——如开罗（al-Qahira），阿拉伯语意为“胜利”，还有巴士拉（Basra）和库法（Kufa）。但是巴格达的名望远远超过了其他著名的城市。一位阿拉伯历史学家这样描述了巴格达：“（它是）伊斯兰教的首都，伊拉克的眼睛，帝国的所在地，美丽、文化和艺术的中心。”巴格达的人口超过了200万人，因此它比现在的加尔各答和孟买还要大得多。

你也许有兴趣知道，据说穿短袜和长袜的习惯就是在巴格达的富人们当中开始兴起的。它们被称为“mozas”，这个印度斯坦语的单词一定来源于此。还有法语词“chemise”（衬衣）来源于“kamis”。这两个单词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到了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再从这儿传到了欧洲。

阿拉伯人一直是伟大的旅行者。他们一直长途跋涉，跨过了大海，在非洲、印度的沿海地区、马来西亚，甚至在中国，都建立了他们的殖民地。其中一名有名的旅行者是阿尔贝鲁尼，他像玄奘一样，来到了印度并停留下来，写下了一本他的旅行游记。

阿拉伯人也是历史学家，从他们的书籍和故事中我们可以得知大量有关他们的历史。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写下了精彩的故事和浪漫的传奇。千千万万的人从未听说过阿拔斯哈里发们和他们统治的帝国，但是人们一定知道《一千零一夜》里的巴格达，这座充满了神秘浪漫色彩的城市。一个想象的帝国往往比现实的帝国更加真实，更加持久。

哈伦-拉希德死后不久，阿拉伯帝国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局面。社会出现了混乱，帝国各地纷纷宣布独立，省级区域行政长官出现了世袭接替。哈里发的权力日益衰微，直到有一段时间，哈里发只统治了巴格达和邻近几个村落。甚至还有的哈里发被自己的军队拖出宫殿处死了。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一些铁腕人物，他们统治了巴格达，使哈里发成了他们的附庸。

与此同时，伊斯兰教的团结统一已是遥远的过去。从埃及到中亚的霍拉桑到处都出现了独立的王国。游牧民族从更遥远的东方向西方迁徙。中亚古老的突厥人成了穆斯林，他们占领了巴格达。他们被称为“塞尔柱突厥人”（Seljuq Turk）。他们完全打败了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军队，使整个欧洲吃惊不已。因为欧洲曾认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们已经实力大减，正在逐渐衰弱。的确，阿拉伯人已经极大地衰落了，但是此时，塞尔柱突厥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扛起了伊斯兰教的大旗，向欧洲发起了挑战。

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挑战很快就开始了，欧洲的基督教国家组织远征军征讨穆斯林，再次占领了他们的圣城耶路撒冷。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了争夺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的统治权而纷争不断，双方都竭尽了全力而精疲力竭，这些国家的几乎每一寸土壤里都浸满了人们的鲜血。这些繁荣兴旺的城市失去了昔日的贸易和荣耀，这些充满了欢笑的土地也变成了一片荒野。

他们就这样彼此征战。但是，在他们的战斗结束之前，成吉思汗在亚洲的蒙古崛起了，他被称为“地球的蒙古撼动者”，事实上他将震动整个亚欧大陆。他和他的后代们最终结束了巴格达和它的帝国统治。当蒙古人倾覆了这座伟大而著名的巴格达城市时，这里几乎已是一片灰烬，200万居民中的绝大部分被杀死。这发生在公元1258年。

现在的巴格达又再度成了一座繁荣兴旺的城市，现在是伊拉克的首都。但是，巴格达只是过去的一个阴影，因为它并没有从蒙古人带

来的死亡和蹂躏中复苏过来。

---

1. 在阿拉伯征服之前，西北非被称作“Ifrikia”。——译者注

51 ——北印度从曷利沙到马哈茂德

我们现在要中断一下阿拉伯人或撒拉逊人的故事，放眼看一看其他国家的历史。当阿拉伯人日益强大、四处征战扩张而后衰落崩溃之时，印度、中国和欧洲国家正在发生什么呢？我们已经粗略回顾了其中一些——公元732年，查理·马特领导下的一支联合军队于法国图尔一役中大败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征服了中亚，来到了印度的信德。让我们首先把目光转向印度。

曲女城的曷利沙·伐弹那死于公元648年。随着他的亡故，北印度的政治衰退越加明显。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这种衰退一直在持续，印度教和佛教的冲突加速了这一进程。在曷利沙统治时期，这个国家在表面上呈现出美好壮丽的景象，但这仅仅是暂时的。在他死后，北印度出现了若干个小国家，有时出现了短暂的辉煌，有时又纷争不断。令人好奇的是，在曷利沙死后的30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艺术和文学却欣欣向荣，还修建了许多精良的公共工程。好几位著名的梵文作家就生活在这个时期，如薄婆菩提（Bhavabhuti）和王顶（Rajasekhara）；还有几位国王虽然在政治上没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他们很有名，因为在他们统治期间，艺术和知识得到了发展。其中一位统治者布加国王（Raja Bhoja）几乎成了国王典范的一种神话，甚至在今天，人民还经常提到他。

尽管有一些灿烂的亮点，但是北印度仍在继续衰落。南印度再次处于了领先地位，光环盖过了北印度。在前面的信里（即第44封信），我告诉了你当时南印度的一部分历史，谈到了遮娄其王国、朱罗帝国、帕拉瓦王朝和罗湿陀罗拘陀王朝。我还告诉过你，商羯罗在他短暂的一生里给全国的有识之士和无学问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几乎成功地使佛教在印度消失了。奇怪的是，尽管他使佛教消失了，但一个新宗教叩响了印度的大门，此后如洪水般征服很多地区，并挑战现有的社会秩序！

阿拉伯人很快抵达了印度边境地区，此时正是曷利沙统治时期。他们在边境短暂停留后，随即占领了信德。公元710年，一名年仅17岁的年轻人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Mohammad ibn Kasim）指挥一支阿拉伯军队，攻占了印度河流域，一直到旁遮普西部的木尔坦（Multan）。这是阿拉伯征服印度的范围。或许，如果阿拉伯人再坚持一下，他们可能会深入到更远的地方。因为此时的北印度衰弱无力，要征服它可能并不困难。但是，虽然阿拉伯人和邻国统治者之间的大量战争仍在继续，但是已经不能组织军队进行征战了。因此，在政治上，阿拉伯人征服信德算不上什么大事。穆斯林对印度的征服发生在数百年以后。但是，阿拉伯人与印度人民的文化交流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阿拉伯人与南印度统治者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尤其是与罗湿陀罗拘陀王朝。许多阿拉伯人沿着印度西海岸建立了定居点，还在定居点修建了清真寺。阿拉伯的旅行者和商人到访了印度的不同地区。大批阿拉伯学生来到北印度的以医学见长的塔克西拉大学。据说，在哈伦-拉希德统治时期，印度的学识在巴格达享有极高的地位，来自印度的医师们在这儿建立了医院和医学院。许多数学和天文学的梵文著作被翻译成了阿拉伯文。

因此，阿拉伯人学习了很多古老的印度雅利安文化。他们也吸取了大量的波斯雅利安文化，还有一些希腊文化。他们几乎就像一个新兴民族，处于精力充沛的最佳时期，充分利用周围一切可见的古老文化，向它们学习借鉴；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撒拉逊文化。从文化角度来看，这个文化存在的时间较短，但是也曾

出现过辉煌的时期；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映衬之下，撒拉逊文化更显得光芒四射了。

令人奇怪的是，我们发现，在与印度雅利安文化、波斯文化和希腊文化相互交流的过程中，阿拉伯人从中获益良多，然而印度人、波斯人和希腊人从中的收获却很少。或许这是因为阿拉伯人是一个新兴的民族，他们充满了活力和热情，然而其他民族是古老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已不太想做出改变了。令人好奇的是，岁月是如何给整个民族和这个民族的个人都产生同样的影响啊——它使民族和个人行动缓慢，身心僵化，墨守成规，惧怕改变。

所以，印度在与阿拉伯人的交流中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也没有产生很大的变化，这样的情况持续了数百年之久。但是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印度一定获取了新宗教伊斯兰教的某些信息。穆斯林阿拉伯人来来往往，修建了清真寺，有时候向人们传播他们的宗教，有时候甚至改变了人们的信仰。在那个时期，似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没有出现敌对、动乱和冲突的情况。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这两个宗教在以后的日子里却出现了摩擦和动乱。只有在公元11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才打着征服者的幌子，手握着刀剑来到了印度，从而引发了暴力冲突，传统的宽容让位给了仇恨和冲突。

带着烈火和屠杀来到印度并手握刀剑的凶徒就是加兹尼（Ghazni）的马哈茂德（Mahmud）。现在的加兹尼是阿富汗的一个小城镇。在公元10世纪，围绕着加兹尼逐渐形成了一个王国。我之前告诉过你，中亚在名义上处于巴格达哈里发的统治下，但是在哈伦-拉希德死后，哈里发的权力逐渐减弱，他的帝国分裂成了若干个独立的国家。这就是我们现在谈论的时期。大约在公元975年，一位名叫苏布克特勤（Subuktagin）的土耳其奴隶在加兹尼和坎大哈（Kandahar）周围建立了一个国家。他也对印度发动过袭击。在那个时期，拉合尔（Lahore）的国王是一位名叫亚伊帕尔（Jaipal）的人。他非常具有

冒险精神，率军来到了喀布尔峡谷，攻打了苏布克特勤，但是遭到了失败。

马哈茂德继承了父亲苏布克特勤的王位。他是一名杰出的将军，也是一位优秀的骑兵首领。他年复一年地突袭印度，劫掠了大批财宝和大量俘虏，还杀死了许多百姓。他先后入侵印度共17次，其中只有一次——袭击克什米尔——遭到了失败，其他侵略都大获成功，他使整个北印度都恐惧万分。他一路向南，攻入了巴连弗邑、马图拉和索姆纳特（Somnath）。据说，在塔尼什战役（Tanesh Wara）中，他掠走了20万俘虏和大批财宝。但是，他掠夺财富最多的地方是在索姆纳特。因为这里有一座最伟大的寺庙，几个世纪的供奉都积累于此。据说，当马哈茂德入侵时，数千民众在这座寺庙里避难，希望奇迹发生，希望他们崇拜的神灵能保佑他们。但是，奇迹很少发生，它只存在于教徒们的想象中。这座寺庙遭到了马哈茂德的破坏和洗劫，5万民众被杀害。这些人临死前还在苦苦等待奇迹的出现，但是奇迹并没有降临。

马哈茂德死于公元1030年。在那个时期，整个旁遮普和信德都在他的统治之下。他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伟大领袖，因为他在印度传播了伊斯兰教。大多数的穆斯林崇拜他，而大多数的印度人则憎恨他。事实上，他几乎算不上一名宗教徒。诚然，他是一名穆斯林，但那不是最重要的。总之，他是一名战士，一名出色的战士。他来到印度征战抢掠，与其他士兵做的恶事一样，无论他皈依哪个宗教，他都会犯下同样的恶行。使人感兴趣的是，他威胁恐吓了信德的穆斯林统治者们，只有当他们归顺投降并缴纳贡品后，他才饶恕了他们。他甚至以死亡来威胁巴格达的哈里发，要求得到撒马尔罕的统治权。因此，我们不能犯常识性的错误，不能认为马哈茂德只是一名成功的战士。

马哈茂德把大批印度建筑师和建筑者带到了加兹尼，修建了一座壮丽的清真寺，他称其为“天国的新娘”（Celestial Bride）。他非

常钟爱花园。

马哈茂德向我们展示了马图拉这座伟大的城市，使我们能一窥它的面貌。马哈茂德给加兹尼的地方官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马图拉）有1000座宏伟的建筑，像忠诚者的信念一样坚不可摧；要不是花费了数百万的第纳尔（dinar）[注]，这座城市不可能达到它现在的状态，在200年内也不可能再出现另一座这样的城市了。"

我们从菲尔多西的著作里读到了马哈茂德关于马图拉的这段描述。菲尔多西是一位了不起的波斯诗人，生活在马哈茂德统治时期。我记得在去年的一封信里我向你提到过他的名字，还有他的主要作品《列王纪》。有一个故事说《列王纪》是在马哈茂德的要求下撰写出来的，他向菲尔多西承诺，每写一句两行诗就付给他一个金第纳尔。但是，菲尔多西显然不主张简洁风格，他这部作品的篇幅极其惊人。当他把数千句两行诗呈递给马哈茂德时，马哈茂德盛赞了他的作品，但后悔在冲动下做出的佣金承诺。他想少付一些钱，但是菲尔多西非常恼怒，于是拒绝接受任何东西。

从曷利沙到马哈茂德，我们走过了一段长长的路程，在短短几个段落里就回顾了印度360年或更长时间的历史。我想，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但是，我只得忽视它们，因为保持谨慎的沉默对我而言更加安全。我要告诉你一些不同国王和统治者的历史，他们相互争斗，有时甚至在印度北部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如般遮王国；还要告诉你伟大城市曲女城的磨难，它是如何被克什米尔的统治者攻占的；接着是孟加拉的国王，然后是南部的罗湿陀罗拘陀王朝。但是这段历史的作用不大，只会让你困惑不解。

此刻，我们来到了印度历史上一个较长篇章的结尾处，一个新篇章将从这里开启。要把历史划分成几个部分是非常困难的，也经常容易出错。历史就像蜿蜒流淌的河水：它一直不断地流淌着。它一直在

发生改变，有时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这样的变化不是突如其来的：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就印度而言，我们只是看到了无休止的历史戏剧中一幕的结局而已。被称为印度教时期的这段历史正逐渐落下了帷幕，曾经繁荣了数千年的印度雅利安文化不得不与一个崛起的新兴文化抗争。

但是，你要记住，这样的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这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伊斯兰教随着马哈茂德来到了印度。印度南部长期以来没有受到伊斯兰教征战的影响，甚至孟加拉在大约200多年的时间里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在北部，我们发现奇图尔成了拉杰普特部落的聚集点，在以后的历史里它将因为不顾一切的勇敢无畏而颇负盛名。但是，伊斯兰教征战的浪潮毫无疑问而又不可阻挡地四处扩散开了，再多个人的勇气也无法阻止它。毫无疑问，古老的印度雅利安正在走向衰落。

印度雅利安文化无法阻止外来者和征服者，它于是采取了一种防御型态度。它竭力躲进一个壳里来保护自己。它创建了种姓制度，在当时还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但更多的是僵化和死板。它削弱了妇女的自由权利。甚至村落里的村务委员会也在慢慢变糟。然而，当印度雅利安文明在一个更加朝气蓬勃的民族面前走向没落时，它仍然以它的方式竭力影响和塑造了他们。这就是吸收进而融合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它成功地实现了对征服者的文化征服。

你一定记得，印度雅利安文明和高度文明的阿拉伯人的文明之间并没有出现你争我夺的局面。争战冲突发生在文明但衰微的印度和半文明的中亚部落之间，这些中亚部落有时候处于游牧状态，直到在我们最近讲述的历史时期才改信了伊斯兰教。不幸的是，将印度与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的，却是这种蛮荒状态和马哈茂德掠夺所导致的恐惧，还伴随着苦难的记忆。

1. 第纳尔，南斯拉夫、伊拉克及阿尔及利亚等国的货币单位。——译者注

52 ——欧洲国家已具雏形

我们现在可以去看看欧洲吗，亲爱的？我们上次追溯欧洲历史时，它正处于黑暗糟糕的时代。罗马帝国的倾覆意味着西欧文明的崩溃。除了东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部分地区以外，东欧的景况甚至更加糟糕。匈人王阿提拉四处扩张，焚毁和破坏了这片大陆上的大部分地区。但是东罗马帝国虽然衰落了，但仍然经受住了重重打击，甚至偶尔还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罗马帝国的没落带来了动荡和巨变，在这之后，西方世界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逐渐平静下来。这个过程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尘埃落定。但是，我们可以随着它的发展推断出新格局。基督教得以传播有时候得益于它的圣徒及和平人士的传教，有时候则应归功于来自崇尚武力的君主的刀剑。新王国纷纷建立。在法国、比利时（Belgium）和德国的部分地区，法兰克人（你一定不会和现在的法国人弄混淆的）在统治者克洛维（Clovis）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国家，克洛维的统治从公元481年一直到511年。他以他祖父的名字将王国命名为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但是不久，这个王朝的国王们的王权就被削弱了，实权落入了掌管宫廷事务的宫相之手。这些宫相成了手握重权且世袭的官吏。他们是这个王国真正的主宰，所谓的国王只不过是傀儡而已。

其中一位宫相名叫查理·马特。公元792年，他在法国图尔战役中击败了撒拉逊人的军队。通过这场战役，他阻止了撒拉逊人一路征服的浪潮，在基督徒们的眼里，他挽救了欧洲。通过此役，他获得了极大的威望和声誉，被视为抵御外敌的基督教世界的捍卫者。此时，博尔纳教皇（即罗马教皇）与君士坦丁堡皇帝（即东罗马帝国皇帝）关

系不睦。所以，他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查理·马特，希望得到他的援助。他的儿子丕平（Pepin）决定自立为王，废除了当时的傀儡国王，教皇当然欣然同意了。

丕平的儿子就是查理曼。教皇再次陷入了困境，于是他向查理曼请求援救。查理曼同意了，率军击退了教皇的敌人。公元800年的圣诞节，在罗马大教堂里举行了教皇加冕查理曼为罗马皇帝的盛大仪式。自此就开始了神圣罗马帝国时期，我在前面的信里曾提到过。

这是一个奇怪的帝国，它后来的历史也非常奇怪，因为它慢慢地消失了，就像《爱丽丝漫游仙境》（*Alice's Adventure in Wonderland*）里只会咧嘴大笑的隐身的柴郡猫（Cheshire cat）一样。但是，这段历史还没有走入我们的视线，所以我们不必在这里就窥探后面的历史。

这个神圣罗马帝国不是古老的西罗马帝国的延续，它和西罗马帝国完全是两回事。它自视为一个帝国，除教皇之外，该帝国的皇帝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在好几个世纪里，皇帝和教皇一直在较劲到底谁才是最高统治者。但是，这也要在后面才谈论。有趣的是，当这个新帝国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时，人们都期待它能复兴古罗马帝国，古罗马帝国可是被认为是世界霸主呢。但是，在此之上增加了一层新的含义：基督教和基督教世界。因此，这个帝国是“神圣”的。皇帝被认为是代表上帝在全世界的统治者，教皇也同样如此。一人负责政治事务，另一人则负责精神信仰。无论如何，这只是一种思想理念，但我认为正因如此，欧洲出现了“君权神授”的观念。皇帝成了“信仰的捍卫者”。你会有兴趣知道，如今英王仍然被赐予了“信仰的捍卫者”这一尊号。

我们来比较一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被称作“忠诚者的首领”的哈里发。首先，哈里发是真正的皇帝，而教皇需要与皇帝合作才行。我们看到，教皇后来只是名义上的领袖。

毫无疑问，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完全不认同西方新生的神圣罗马帝国。当查理曼被加冕的时候，一个名叫艾琳的女人也在君士坦丁堡称帝。这个女人杀死了亲生儿子，自己当上了皇帝；在她统治时期，整个东罗马帝国一片黑暗。这就是促使教皇通过加冕查理曼从而断绝与君士坦丁堡联系的原因之一。

此时，查理曼大帝成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领袖，代表上帝是全世界的统治者和神圣帝国的皇帝。这些头衔听起来多么华而不实啊！但是，它们的目的就是要欺骗和麻痹人民大众。借助上帝和宗教的名义，当权者可以愚弄百姓，巩固他们的权力。对普通民众而言，国王、皇帝、主教和高级神职人员成了一群模糊神秘的人，几乎像神灵一样，与平凡人保持着远远的距离。这种神秘让普通百姓心生疑惧。你可以把精心打造的宫廷符号、礼仪和仪式与同样精心打造的寺庙或教堂的礼拜仪式做一个比较。他们都是同样的打躬作揖，匍匐在地，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叩头。从孩提时起，我们就被以不同的方式灌输了这种权威崇拜。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恐吓，而不是为了爱。

查理曼大帝与巴格达的哈伦-拉希德处于同一个时期。他们两人有书信上的联系，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事实上查理曼大帝曾建议两人结盟，以此来打击东罗马帝国和西班牙的撒拉逊人。但是，似乎这个提议没有带来任何影响；虽然如此，它却很好地揭示了国王和政治家们的思维方式。想象一下，“神圣的”皇帝，同时又是基督教世界的首领，却和巴格达的哈里发联手对付一个基督教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你应该还记得，西班牙的撒拉逊人曾拒绝承认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他们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巴格达对此愤懑不平。但是，这两个国家相距甚远，很难发生冲突。君士坦丁堡和查理曼也是相互憎恶。同样，距离阻止了它们之间发生任何实际的战斗。然而，基督徒和阿拉伯人却提议联手对付另一群基督徒和另一群阿拉伯人。在这些国王想法的背后有着真正的动机，那就是获取权力、权威和财富，但是宗教往往为其披上了掩饰的外衣。这样的情况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

在发生。在印度，我们可以看见，马哈茂德以宗教的名义来从中捞取大量的好处。为此买单的，却常常是宗教的哭声。

但是，时代不同，人们的想法也会发生变化，我们很难去评判生活在很久以前的人们的想法。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显而易见的很多事情，在他们眼里却非常奇怪，然而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在我们眼里似乎也很奇怪。虽然人们在谈论崇高的理想、神圣帝国、代表上帝的统治者、天主教教宗教皇的时候，西方世界的情况却依然那么糟糕。在查理曼大帝统治后不久，意大利和罗马就沦落到了可耻的境地。不计其数的男男女女在罗马恣意妄为，任意废立教皇。

事实上，自从罗马帝国衰亡以后，西欧就陷入了无序混乱的状态，很多人于是天真地认为，如果罗马帝国再次复苏，局势就会好转。对很多人而言，这也成了一个关乎威信的问题：他们应该有一位皇帝。一位长期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作家说，查理是被推上皇位的，“以免异教徒攻击基督徒，如果基督徒没有了皇帝”。

查理曼大帝的帝国版图包括了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一半德国和一半意大利。西南方是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东北方是斯拉夫人（Slav）和其他部落；北方是丹麦人（Dane）和北欧人（Northmen）；东南方是保加利亚人（Bulgarian）和塞尔维亚人（Serbian），在他们的另一边就是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的东罗马帝国。

查理曼大帝卒于公元814年。不久之后，为了瓜分这个国家，动乱爆发了。他的后人们被称为加洛林王朝人（Carlovingian）[“Carolus”（卡洛斯）是“Charles”（查理）的拉丁文]，他们都没有什么建树，从他们中的一些称号就可以窥见一斑：“胖子”、“秃子”、“虔诚者”。我们可以从查理曼帝国的分裂中看出德国和法国正在逐步形成。人们认为德国是从公元843年才开始称为一个国家

的。据说，正是奥托大帝（Emperor Oto the Great，公元962——973年在位）使德国人成了一个独立的民族。法国也已经不再是奥托帝国的一部分了。公元987年，雨果·卡佩（Hugh Capet）赶走了软弱的加洛林王朝国王，夺得了法国的控制权。这样的控制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法国被分裂为几个大区域，每个区域都有独立的贵族领导，他们相互之间经常打仗。但是，和相互间的仇视相比，他们更惧怕皇帝和教皇，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抵制皇帝和教皇。雨果·卡佩统治下的法国开始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即使是在形成初期，我们仍可以看见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相互敌对状态，这种敌对情绪已经延续了1000年之久，一直到今天。奇怪的是，虽然这两个邻国和他们的人民都有着高度的文化和天赋，但是法国人和德国人世世代代都是仇敌。但是，也许这个错误与其说是他们自身造成的，还不如说是他们生活下的制度造成的。大约在这个时期，俄国也登上了历史舞台。据说，在公元850年，从北方来的留里克（Rurik）奠定了俄国的基础。我们发现，保加利亚人在欧洲东南部定居下来，而且攻击性越来越强；塞尔维亚人也同样如此。在神圣罗马帝国和新兴俄国之间的地区，马扎尔人（Magyar）[注]或匈牙利人（Hungarian）和波兰人（Pole）也开始形成了自己的国家。

与此同时，北欧人乘船来到西部和南部国家，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你一定读过丹麦人和北欧人来到英格兰掠夺和抢劫的故事。这些人被称为北方人或北欧人或诺曼人（Norman），他们来到了地中海地区，乘船沿着宽阔的河流而上，所到之处全是抢劫、屠杀和掠夺。此时的意大利正处于无政府状态，罗马沦入了悲惨凄凉的境地。他们洗劫了罗马，甚至威胁了君士坦丁堡。这群强盗和掠夺者占领了法国西北部地区，即诺曼底（Normandy），还占领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逐渐地，他们在这些地区定居下来，成了当地的领主和地主。强盗们有钱之后，通常都会这么干。公元1066年，来自法国诺曼底的诺曼人在被称为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的带领下征服了英格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时英格兰也正在形成。

此时，我们大致来到了欧洲的第一个千禧年末期，即公元1000年的末期。在这个时期，加兹尼的马哈茂德正在入侵印度，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们正四分五裂，塞尔柱突厥人在西亚复兴了伊斯兰教。西班牙继续处于阿拉伯人的统治之下，但是阿拉伯人已经完全中断了与故土阿拉伯半岛的联系，事实上他们与巴格达的统治者关系并不好。北非脱离了巴格达的实际统治。埃及不仅出现了独立的政府，还出现了独立的哈里发，埃及的哈里发曾在一段时间里统治了北非。

---

1. 马扎尔人是匈牙利的基本居民。——译者注

53 ——封建制度

在上一封信里，我们大体回顾了法国、德国、俄国和英格兰的起源，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但是，不要以为那个时期的人们对国家的看法和我们现在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国别的概念，有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概念，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国家视为家乡故土。这种对国家的情感在当今世界是非常清晰可见的。我们在印度为自由进行的抗争，也是为我们的“国家”抗争。但是，这样的国家理念在那个时期是不存在的。那时只有基督教世界的理念，也就是同属于基督教的某个团体或某个社群以共同抵制异教徒或穆斯林的理念。同样，穆斯林也有相同的理念，即他们都同属于伊斯兰教世界，和其他非穆斯林是相对立的。

但是，这些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的理念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并不能触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只有在特定的场合下，根据具体的情况，它们才会激发信徒的宗教狂热，一起抵抗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人与人之间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通过国家。这就是从所谓的封建制度中产生的封建关系。罗马帝国倾覆以后，西方世界的旧秩序已经崩溃，到处是混乱无序、暴力冲突的局面。强者占领了能占领的地区，并尽可能地坚守，只要更强大的人不推翻他们。坚固的城堡建立起来了，城堡的领主们率领着抢劫团伙洗劫乡野，有时候也和其他领主打斗。当然，以土地为生的穷困农民和工人遭受了最大的灾难。封建制度就在这个无序混乱的状态下逐渐建立并发展了起来。

此时，农民们没有被组织起来，也无法抵御强盗式贵族的劫掠，也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来保护他们。所以，他们只有做吃力

不讨好的事情，甘心屈服于搜刮他们的城堡领主。他们愿意缴纳耕种土地所获得的部分劳动果实，也愿意以某些方式为领主服务，只要领主不再抢劫和掠夺他们，并保护他们免受其他人的侵扰。小城堡的领主以同样的方式屈服于大城堡的领主。但是，小领主无法向大领主缴纳土地里的果实，因为他不是农民或生产者。所以，他承诺提供军事服务——也就是，无论大领主何时需要，他都会为他而战。反之，大领主向小领主提供保护以作为交换，而后者就成了领主的家臣。因此，一步一步往上就是更大的领主和贵族，最后就是居于封建社会结构顶峰的国王。但是，他们并不会在此停下脚步。甚至对他们而言，上帝管理的天堂因为有三位一体，所以也有一点封建制度的痕迹。

这个制度在无序混乱中逐渐发展，并在欧洲普遍盛行了起来。你一定还记得，在那个时期还没有出现实际意义上的中央政府，也没有警察或起震慑作用的人。一块土地的拥有者就是它的管理者和领主，也是这片土地上所有人的领导者。他就像一个小国王，应该保护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而人民向他提供服务和土地上的部分劳动产品作为回报。他成了这些人的君主，这些人则被称为农奴或奴隶。理论上，他从上一级领主手中获得了土地，成了上一级领主的家臣并提供军事服务。

甚至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也是封建制度的一部分。他们既是神父，又是封建领主。因此，在德国，近一半的土地和财富都在主教和男修道院院长的手中。教皇本身也是一位封建领主。

你会注意到，整个体制是一个等级阶级制度。没有平等可言。农奴或奴隶处于最低层，他们不得不承受整个社会结构的重担——小领主、大领主、更大的领主和国王。他们还要承受整个基督教的重担——主教、男修道院院长、红衣主教和普通牧师。无论是大领主还是小领主都不从事任何可能生产食物或其他财富的工作。这被认为是比他们阶级地位低下的人才做的工作。战争才是他们的主要工作，在没

有战争的时候，他们就四处打猎，或沉溺于模拟战争和骑士比武。他们多数粗俗鲁莽且大字不识，除了打仗和吃喝，其他消遣方式一概不知。因此，生产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整个重担就落在了农民和工匠肩上。整个制度的顶端就是国王，国王则被认为是上帝的仆从。

这就是封建制度背后的思想理念。理论上，领主们理应保护仆从和农奴，实际上他们却是独断专行。他们的上级或国王几乎不能遏制他们，农民过于弱小，也不能拒绝他们的要求。虽然他们并不是异常强大，但是他们能从奴隶手中最大限度地榨取财富，只给奴隶留下一小部分，勉强维持悲惨的生活。这一直都是土地所有者的行为，每一个国家皆是如此。这种土地所有权就产生了贵族。夺取了土地的强盗骑士建立了一座城堡，成了受世人尊敬的贵族领主。这种所有权还会产生权力，拥有者往往利用权力尽可能地从农民、生产者或工人手中夺取更多的财富。甚至，法律也在帮助土地的所有者，因为法律就是由他们和他们的盟友制定的。这就是许多人认为土地不应该属于个人而应该属于集体的原因。如果土地属于国家或集体，那就意味着它属于生活在土地上的所有人，没有人能够剥削他人或者从中获取不公平的利益。

但是，这样的思想还没有到来。在我们谈及的这个时期里，人们还不能沿着这个思路来思考。广大人民群众苦不堪言，但是他们并没有办法摆脱困境。因此，他们忍受着一切痛苦，一直过着毫无希望的劳动生活。他们被反复灌输要习惯服从的思想，一旦被灌输了这个思想，人们就几乎能忍受一切。所以，我们发现，一个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包括了封建领主和他们的仆从，另一方面则包括了穷苦大众。在领主用石头修建的城堡周围，聚集的则是农奴用泥石或木头搭建的小屋。这是两个相差甚远的世界——领主的世界和农奴的世界；贵族可能认为农奴就如同他们饲养的牲口。

有时候，一些较小的牧师试图保护农奴免于领主的剥削。但是，通常情况下，牧师和神职人员与领主都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事实上，主教和男修道院院长都是封建领主。

在印度，我们没有出现过这种封建制度，但是我们有与之类似的社会制度。事实上，在印度出现的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统治者、达官显贵和小贵族，这些国家仍然保持着许多封建习俗。印度的种姓制度虽然完全有别于封建制度，但仍然把社会分成了不同的阶级。我想我曾告诉过你，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形式的专制制度或特权阶级。通过古老的科举制度，中国向每一个人敞开了走入国家高级机构的大门。但是，在实际情况中，这一定存在着诸多的限制条件。

因此，在封建制度里是没有平等和自由的，只有权利和义务——也就是封建领主有权获得服务和部分劳动产出，并把这种权利视为提供保护的义务。但是，被记住的总是权利，而义务往往会遭到遗忘。甚至现在，在某些欧洲国家和印度，大地主们不从事一星半点的劳动生产，就从佃户手中搜刮了大量财富作为土地的租金，但是所有的义务都被长期遗忘了。

令人奇怪的是，欧洲古老的野蛮民族曾十分钟情于他们的自由，他们是如何逐渐转变、甘心接受完全拒绝自由的封建制度的呢？在过去，这些部落往往通过选举确定他们的首领，并能约束首领的行为。然而现在，我们却发现到处是专制和独裁，根本没有选举的踪影。我无法说明这个变化产生的原因。也许，教会传播了基督教教义，助长了非民主思想的扩散。国王成了上帝在世界上的影子，你能如何不服从或质疑全能的上帝的影子呢？封建制度似乎囊括了天堂和它笼罩下的整个世界。

在印度，我们还发现，古老的雅利安自由思想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它们越来越渺小，最后几乎完全被遗忘了。但是，我对你讲过，

在中世纪早期，印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自由思想，《政术精华》和南印度的一些铭文就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一些自由的思想以渐渐兴起的新形式慢慢地再次降临了欧洲。除了土地所有者和耕种土地的劳动者外，即领主和农奴以外，出现了其他的阶级群体——手工业者和商人。就其本身而言，这些人不是封建制度的一部分。在无序无政府状态，贸易活动非常少，手工业并不兴盛。但是，渐渐地，贸易活动增加了，能工巧匠和商人们的重要性提高了。他们越来越富有，领主和贵族也要向他们借贷。他们愿意出借金钱，但是他们坚持要领主授予他们某些特权。这些特权加强了他们的力量。所以，我们现在发现，农奴的小屋不再聚集在领主的城堡周围，所有的房屋都聚集在一所大教堂或小教堂或会馆的周围，由此小城镇正逐渐形成。商人和手工业者成立了会馆或协会，这些协会的总部发展成了会馆，之后发展成了市政厅。

这些发展中的城市，例如科隆（Cologne）、法兰克福（Frankfurt）、汉堡（Hamburg）和很多其他城市成了封建领主的敌对力量。新兴的商人阶级应运而生，商人和商人阶级变得十分富有，甚至足以公然反抗贵族。这是一场长期的斗争。由于惧怕贵族们的力量，国王往往支持城市新兴阶级。但是，我现在讲述的历史已经很超前了。

在这封信的开头，我告诉了你，在那个时期人们对国家没有情感。人们想到的是他们对上级领主的责任和忠诚。他们宣誓服务于领主，而不是服务于国家。甚至，国王都是一个很模糊的形象，离他们太遥远了。如果领主反抗国王，他的家臣只得追随他。这与很久以后出现的国家概念是非常不同的。

54 ——中国把游牧民族赶到了西方

我想，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信讲述中国和远东国家了——大约有一个月了吧。我们探讨了欧洲、印度和西亚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看到了阿拉伯人四处扩张，征服了很多土地，还看到了欧洲陷入了黑暗时代，并在努力挣扎着走出来。当然，这个时期的中国也在继续向前发展，通常情况下都发展得非常好。在公元7、8世纪，唐朝时期的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文明、最繁荣、最治理有方的国家。无疑，欧洲完全无法与之匹敌，因为在博尔纳（即罗马帝国）灭亡后，它沦入了倒退落后的境地。北印度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缓慢地衰退。它曾在曷利沙统治下有过辉煌的时期，但就整体而言，它还是逐渐在走下坡路。南印度无疑比北印度更加蓬勃兴旺；跨过大海就是南印度的殖民地——吴哥和三佛齐，此时正处于辉煌时期的前夕。在这个时期，唯一能与中国在某些方面相匹敌的是巴格达和西班牙的阿拉伯国家。但是，即使它们处于光辉荣耀的顶峰，这一时期也相对比较短暂。然而，让人觉得有趣的是，唐朝皇帝被赶下了台，向西域的回纥人寻求帮助。在他们的帮助下，皇帝重新获得了权力。

所以在那个时期，中国处于文明的前列，就某些方面而言，有理由认为当时的欧洲人还是半野蛮的民族。欧洲只是在它已知的世界里处于前列。我说的是已知的世界，因为我不知道当时美洲的情况。我们只知道，墨西哥和秘鲁还有它们的邻国的文明已延续了数百年了。在某些方面，它们也非常先进；在其他方面，它们又似乎十分落后。但是，我对这几个国家知之甚少，所以不敢妄加评论。然而，我想让你在脑子里记住它们——墨西哥和中美洲的玛雅文明（Maya Civilization）以及印加人（Inca）的秘鲁王国（Peruvian

State）。也许有比我更富有学识、更有智慧的人，他们也许能告诉你一些更有用的相关史实。我得承认它们的历史使我很着迷，但是我的着迷仅仅是因为我对它们的无知。

我还想让你记住另一件事。在写信的过程中我发现，中亚出现了很多游牧部落，他们一路向西前往欧洲，或突然进攻印度。匈人、斯基泰人、突厥人和许多其他部落一个接一个、一波接一波地不断涌现。你一定记得，嚈哒人来到了印度，匈人王阿提拉来到了欧洲。占领巴格达帝国(注)的塞尔柱突厥人也来自中亚。后来，突厥人的另一支奥斯曼土耳其人出现了，他们最终征服了君士坦丁堡，并一直打到维也纳的城墙下。可怕的蒙古人离开了中亚或蒙古，一路征伐直至欧洲的心脏，甚至也统治了中国；后来，蒙古人的一个后裔在印度建立了一个王朝和一个帝国，由此出现了一些有名的统治者。

随着中亚和蒙古游牧民族的出现，中国开始了无休止的战争。或者，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这些游牧民族总是给中国带来动乱和麻烦，中国被迫进行自卫。正是为了自我保护，中国才修建了万里长城。毫无疑问，它起到了某些作用，但是在抵御入侵、自我防卫上非常糟糕。一位又一位的皇帝都得击退游牧民族。在击退的过程中，中国的版图扩大到了西方，一直延伸至里海，我以前告诉过你这一点。中国人民并不过多地推崇帝国主义。当然，有一些中国皇帝是帝国主义者，也有征服的野心，但是，相较于其他民族而言，中国人爱好和平，不热衷于战争和征伐。在中国，有学之士往往比武士更能得到尊敬和荣誉。尽管中国的版图有时幅员辽阔，但主要是因为游牧民族的不断挑衅和入侵激怒了中国，使得中国把它们赶往了北方和西方。强大的帝王们把这些民族远远地赶到了西方，一劳永逸地彻底摆脱了他们。他们并没有永久性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至少得到了一些缓解。

但是，中国得到的平静是以损害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因为，被中国人驱赶出去的游牧民族攻打了其他国家。他们来到

了印度，还一次又一次地造访欧洲。由于中国汉朝皇帝的驱逐，匈人、鞑靼人和其他游牧民族被赶到了其他国家；唐朝又把突厥人赶到了欧洲。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抵御了游牧民族，保护了自己的国家。现在我们去他们失败的那个时候看看。

中国唐朝逐渐衰弱，出现了若干位无能的统治者，他们丝毫不具备先辈们的优点，只知贪图享乐；世界各地总会出现类似的王朝。国内贪污腐败滋生，沉重的赋税接踵而至，当然这些负担主要压在了穷人阶级的身上。人民的不满情绪高涨；终于，在公元10世纪初期，也就是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了。

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出现了一连串无关紧要的小统治者。然而，公元960年，中国另一个伟大的王朝诞生了，这就是宋高祖赵匡胤建立的宋朝。但是，无论是边境还是内地，动乱一直在中国持续着。苛捐杂税是压在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他们对此颇为不满。与印度一样，中国的整个土地制度对百姓而言一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除非这一切能得到彻底的改变，否则人民就会一直寝食难安，也不会取得任何进步。但是，要彻头彻尾地改变这种状况，往往又是比较困难的。处于社会顶层的人们是现存社会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当有人提出变革，就会遭到他们激烈的反对。但是，如果不能及时做出变革，变革往往就会不期而至，出乎意料地倾覆整个现有体制。

因为没有实施必要性的改革，所以唐朝灭亡了。也是这个原因，宋朝一直动荡不安。这时出现了一个也许能取得成功的人。他就是王安石，公元11世纪宋朝的宰相。我曾告诉过你，中国是受到了孔子思想影响和统治的国家。所有官吏必须通过以孔子典籍为基础的考试，没人敢反对孔子思想。王安石虽然没有反对它，但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去解读阐述了孔子思想。这就是聪明人克服困难的方式。王安石的某些思想十分具有现代特点。他主要的观点是减轻穷人的赋税负担，向富人增收赋税。他减少了土地税收，如果农民们觉得以钱币缴

税比较困难的话，允许他们以实物缴税，例如谷物和其他农产品。他还向富人征收所得税。这应该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税收方式，然而我们发现中国在900年前就提出来了。为了帮助农民，王安石主张政府应该借款给他们，然后收获的时候再偿还。另一个不得不克服的困难是粮食价格的涨跌。当市场价格下跌时，贫穷的农民从粮食中获得的经济效益就非常有限。他们卖不出去粮食，因此就没钱缴税，也买不起其他物品。王安石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建议政府应该买卖粮食，以便于在价格涨跌时平衡市场价格。

王安石还主张不应该强迫百姓为公共建设工程提供劳役，凡是参加劳役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全额的报酬。他还创建了地方民兵组织，被称为“保甲制度”。然而不幸的是，王安石太过于超前他身处的时代了，不久他的改革就被废止了。只有保甲制度被保留了下来，一直延续了800多年。

宋朝不敢大胆地解决眼前的问题，于是它越来越束手无策。北方蛮族契丹实力强大，宋朝无法把他们赶走，于是向西北方向的另一个部落——金人或女真人——请求援助。金人前来赶走了契丹，但是他们却停留了下来，并拒绝离开！这往往就是弱者或弱国向强者求援后的命运。金人成了中国北方的主人，建都北京。宋朝退至中国南方，在向前推进的金人面前节节败退。因此，在中国北方出现了金国，在中国南方出现了另一个宋朝，这个宋朝被称为南宋。宋朝在北方的统治时间是从公元960年到1127年。南宋在中国南部的统治时间长达150年；公元1260年，蒙古人灭亡了南宋。但是，中国同古老的印度一样，同化了蒙古人，使他们没有太大的不同。

所以，中国最后还是向游牧民族屈服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教化了这些游牧民族，所以，它并没有像亚洲其他地区和欧洲一样惨遭游牧民族的折磨。

在政治上，北宋和南宋没有像它们的前任唐朝那样强大有力。但是，它们延续了唐朝繁荣时期的艺术传统，事实上，艺术在宋代还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南宋统治下的中国南方以艺术和诗歌著称，还有美丽出色的绘画，自然景观方面的绘画尤为突出，因为南宋的艺术家热爱大自然。这时也出现了瓷器，艺术家们用双手制作出了精美的瓷器。瓷器发展得越来越美丽精致，直到200年后，明朝制作出了无与伦比的精美瓷器。甚至在今天，一个明朝的花瓶都是一件令人愉悦的稀世珍宝。

---

1. 巴格达帝国，即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译者注

55 ——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

从中国跨过黄海到访日本是很容易的，既然我们离日本较近，那么我们或许也能很容易地到达日本。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谈论日本吗？我们看到了大家族的兴起，他们为争取统治权而相互斗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逐渐形成。天皇从一个强大宗族的首领发展成了中央集权政府的领袖。首都奈良被作为中央权威的象征而建立起来了。此后，首都改迁至京都。日本借鉴了中国的政府管理方式，还从中国或向中国学习了很多东西，如艺术、宗教和政治等。甚至，这个国家的名字“大日本”也来自中国。

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强大的家族——藤原家族——掌握了所有的权力，把天皇当成了傀儡。他们统治日本长达200年，天皇们心生绝望，纷纷退位弃权，进入了寺庙。但是，尽管入寺为僧，前任天皇往往推举他的儿子称帝，借此能大量干涉政府事务。通过这样的方式，天皇在一定程度上竭力遏制了藤原家族的势力。这种方式相当复杂，但是无论如何，它成功削弱了藤原家族的权力。尽管一个又一个的天皇退位当了和尚，然而真正的权力仍在天皇手中。因此，这些天皇被称为“太上法皇”（Cloistered Emperor）。

然而，与此同时，社会发生了其他变化，出现了一个既是军人又是大地主的新阶级。这个阶级是由藤原家族造成的，它命令他们为政府收税，于是他们被称为“大名”（Daimyos），意思是“大名字”。令人好奇的是，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大名和英国人入侵前北方邦内一个相似的新兴阶级。尤其是在奥德（Oudh），一位懦弱的国王任命了税务官。这些税务官拥有一点自己的武装力量，便于进行强制收税，当

然，大部分的税收都留给了自己。他们在某些情况下成了有实力的税务官。

大名们日益强大，有了自己的家臣和较少的武装力量，他们相互争斗不休，根本不把京都的中央政府放在眼里。两个主要的大名家族是平氏家族（Taira）和源氏家族（Minamoto）。公元1156年，他们帮助皇帝镇压了藤原家族。但是，此后，这两个家族又开始互相攻打。平氏家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也许是为了确保源氏家族在未来不会再给它们制造麻烦，于是平氏处死了源氏。他们处死了源氏家族的所有主要成员，只留下四个孩子，其中一个12岁的男孩名叫源赖朝（Yoritomo）。平氏家族虽然想尽力铲除后患，却做得不够彻底。平氏家族以为源赖朝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于是赦免了他。但是，源赖朝长大以后，就成了平氏家族的死敌，一心想着要给家族报仇。他取得了成功，把平氏家族赶出了首都，并在一场海战中一举歼灭了平氏家族。

这时，源赖朝手握重权，天皇在公元1192年授予他一个高调而夸张的称号“征夷大将军”（Seitai-Shogun），意思是征服蛮夷的大将军。这个头衔可以世袭，有了这个头衔就有了统治管理军队的全部权力。幕府将军成了真正的统治者。由此，开启了日本的幕府时代（Shogunate）。幕府时代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大约700年左右；差不多到了近代，现代日本从幕府的封建蛋壳中破壳而出的时候，幕府时代才宣告结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源赖朝的后人在700年里是以幕府将军的身份统治日本的。由于幕府将军的出现，各个家族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内战不断，但是幕府将军成了真正的统治者，以天皇的名义管理着国家，而天皇几乎没有任何实权，这一现象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当幕府将军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许多官吏掌握了实权的时候，这样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源赖朝害怕生活在奢华的都城京都，因为他觉得舒适的生活会削弱他和同僚的意志。于是，他在镰仓（Kamakura）建立了军事化的都城，因此，第一个幕府时代被称为“镰仓幕府时代”。这个时代一直持续到公元1333年，将近150年的时间。在此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都处于和平时期。多年内战之后，和平大受欢迎，出现了繁荣昌盛时期。这时，毫无疑问，与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相比，日本更加繁荣兴旺，政府管理更加有效。日本是中国的一个聪明好学的学生，虽然这两个国家在观点上有着巨大的差异。我说过，中国在本质上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温顺国家，日本却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军事国家。在中国，军人往往被轻视，以打仗为职业的人并不十分体面；然而，在日本，位于社会顶层的则是军人，大名或好战的武士成了社会的理想典范。

所以，日本向中国学习了很多东西，但是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吸收、借鉴和塑造，以适应自己的民族特点。日本一直保持着与中国的紧密联系和交往，贸易也是如此，贸易主要是依靠中国的船只进行的。公元12世纪末期，中日交往突然中断了，因为蒙古人入侵了中国和朝鲜半岛。蒙古人甚至试图征服日本，但是他们被击退了。因此，改变了亚洲面貌和震动了欧洲的蒙古人却没有对日本造成任何显著的影响。日本一直沿着古老的传统继续发展着，与以前相比，它甚至更多地断绝了与外面世界的往来。

日本曾经的官方记录里有一个故事，讲的是日本第一次种植棉花的情况。据说，在公元799年，几个印度人在日本海岸附近遇上了海难，棉花种子因此被带到了日本。

后来，茶树种植也传入了日本。最早引进茶树种植是在公元9世纪，但是当时没有取得成功。公元1191年，一位佛教和尚把茶树的种子从中国带到了日本，很快茶叶就在日本广为流行开了。饮茶的出现促进了对精美瓷器的需求。公元13世纪晚期，一名日本陶艺工人前往

中国，学习了制瓷术。他在中国学习了6年的时间，回国后便开始制作日本瓷器。现在，茶道在日本成了一种优雅的艺术，还有着精致复杂的饮茶仪式。当你去了日本，你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方式饮茶，不然人们就会认为你的行为举止有点粗鲁不雅。

56 ——人类的征服

4天前，我在巴雷利监狱给你写信。就在那个夜晚，我被告知要收拾好我的物品，然后离开监狱——我不是被释放了，而是被转移到另一座监狱。所以，我向牢房里的狱友告别，我在这儿只待了4个月。我最后看了一眼24英尺高的围墙，当我长时间坐在墙下时，它给我提供了庇护。然后我走出了监狱，又一次短暂地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我们一共有两个人被转移。由于担心有人看见我们，所以他们没有把我们带到巴雷利车站，因为我们是“purdahnashin”[注]，是不能让人看见的！他们开着车，把我们送到了50英里外荒野里的一个小站。我很感谢这次行程。在经历了好几个月的隔离后，能感受到夜晚凉爽的空气，能在昏暗的夜色里看见树木、人和动物匆匆而过的掠影，这真是令人无比高兴。

我们被带到了台拉登（Dehra Dūn Jail）。凌晨时分，在抵达目的地之前，我们又一次被带出火车，坐上了汽车，以防窥视的眼睛看见我们。

现在，我坐在台拉登的小监狱里，这儿可比巴雷利监狱好多了。这里没那么热，温度不会像巴雷利监狱那样上升到112华氏度（约44摄氏度）。我们四周的围墙要矮一些，高过围墙的树木要绿一些。我的视线甚至能越过围墙，看见远方棕榈树的树冠，眼前的景色让我十分高兴，这让我想起了锡兰和马拉巴尔。在树林的另一边，不到几英里远的地方就是连绵的群山，穆索里就坐落在山顶。我看不见群山，因为树林遮挡了我的视线，但是我离它们如此之近，可以想象夜晚时分穆索里的灯光在遥远的地方闪烁，这真是太好了。

4年前，或者是3年前？你在穆索里的时候，我开始给你写信。在这三四年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你也长大了！虽然时断时续，还曾有过长时间的停滞，但我一直在给你写信，大多时候是在狱中。但是，我信写得越多，我就越喜欢我写的内容；我还突然感到害怕，担心这些信也许不能让你产生浓厚的兴趣，也许对你还是一种负担。那么，我为什么还要继续给你写信呢？

我原本想给你展现一幅又一幅生动的历史画面，让你体会到我们这个世界是如何一步步地变化、发展和进步的，有时候显然也出现了落后和倒退；让你看看古老文明的种种迹象，看看它们是怎样像潮水一样涌现和消退；还让你认识到历史的长河是怎样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不断向前流淌，虽然有旋涡、涡流和逆流，但它仍然向前，流入未知的大海。我原本想带着你沿着人类的足迹，从最早的时期开始追溯，那时的人们还几乎不属于人类，然后一直到今天，此时的人们扬扬得意于自己伟大的文明，自负而且愚蠢。你一定还记得，当我们待在穆索里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开始回顾历史的：我们谈到了火和农业的出现，谈到了人们在城镇定居，还谈到了劳动分工。但是，我们谈论得越多，我们夹杂的帝王和历史人物也越多，我们常常迷失了历史的踪迹。我们只得匆匆浏览历史的表象。我给你搭建了历史史实的架构，我希望我有能力用血肉使之丰满，让历史能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你的眼前。

但是，我担心自己没有那样的能力，你一定可以依靠自己的想象来创造奇迹。那么，当你能在众多好书里读到过去的历史时，我为什么还要写历史呢？然而，带着我的疑惑，我一直在写，而且我认为我应该继续写下去。我记得我向你承诺过，那么我就应该尽力实现我的承诺。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当我坐下来给你写信，想象着你就在我的身边，我们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时候，这种想你的念头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我在前面写下了人类发展的进程，从他们跌跌撞撞、低头垂肩地走出丛林开始，这是一条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漫长足迹。然而，如果你把它与地球的故事和年龄，还有人类出现前漫长的时间相比的话，这段历史却又非常短暂！但是，对我们而言，与存在于人类之前的大型动物相比，人类自然使我们更有兴趣；人类有趣的原因在于，人类带来了其他生物似乎没有的新鲜事物。那就是思想——好奇心——探究和学习的欲望。所以，从很早的时期开始，人类就开始了探索。你可以观察一个幼小的婴儿，看看他如何看待这个新奇精彩的世界，如何开始认识事物和人类，以及如何学习。看看一个小女孩；如果她健康敏锐，她就会对许多事物提出很多问题。正是如此，在历史发展的初期，人类无知而且幼稚，世界对他而言既新奇精彩又令人生畏的时候，他一定会观望和注视周围的一切，提出很多问题，但是他除了自己，又能问谁呢？没有人能给出答案。但是，他有一个奇妙的小东西——思想——在思想的帮助下，他缓慢而费力地不断丰富着自己的经验，并不断从经验中学习。所以，从最早期开始到现在，人类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他发现了许多事物，有很多事物迄今仍然存在。他在沿着轨迹前进的时候，发现在他面前延伸出了很多路径。这些路径告诉他，他离探索的终点还极其遥远——如果有终点的话。

人类的探索是什么？他的征程到了哪里？人类数千年来一直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宗教、政治和科学都在思考这些问题，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我不想让这些答案来烦扰你，因为我也不知道其中哪一个是最充足的理由。但是，总的说来，宗教一直在努力给出一个完整的教条式的回答，对思想却经常毫不关心，但是它力图以各种方式强迫人们服从它的决定。科学给出了一个怀疑和犹豫不决的答复，因为科学的本质不是教条主义，而是试验、推论，依赖的是人类的思考。我可以告诉你，我非常偏爱一切科学和科学方法。

我们也许不能确切地回答关于人类探索的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见探索本身有着两条轨迹。人们观察着人类以外的世界，也观察

着人类自身的世界；人们努力了解大自然，也在努力了解自己。实际上，这两种探索是完全相同的，因为人类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印度和希腊的古哲学家们都曾说过："认识自己。"《奥义书》记录了古老雅利安印度人不断令人惊叹地努力追求着知识。大自然的另一些知识属于科学的特殊领域，我们现代世界见证了它伟大的进步。事实上，科学正在展开它的翅膀（现在更加宽广了），接管了探索的两条轨迹，并将它们整合在一起。科学正满怀自信地注视着最遥远的星球，它还告诉了我们不断运动着的奇妙的小物质——电子和质子——所有事物都是由它们组成的。

人类的思想带着人类走过了长长的发现之旅。由于人类对大自然有了更深的了解，人类已经能够利用和驾驭大自然为自己服务了，因此人类就能获得更多的力量。然而，不幸的是，人类总是不知道如何利用这种新力量，人类往往是在误用和滥用。人类把科学主要用于制造可怕的武器，去屠杀他们的同胞，毁灭他们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文明。

---

1. 指生活在面纱背后的人。

57 ——公元后第一个千禧年的结束

在我们旅程的这个阶段，还是值得我们短暂停留一下，看一看周围的情况。我们走了多远了呢？我们现在在哪儿？世界是什么样子呢？那么，让我们坐上阿拉丁（Aladdin）的魔毯，去简单走访一下这个时期的世界各地吧。

我们已经走过了第一个千禧年，即基督纪元的1000年。相较于这个阶段，对于某些国家的历史，我们稍微提前讲述了一点，而另一些国家的历史，我们又有点滞后了。

在亚洲，我们看到中国正处于宋朝的统治下。伟大的唐朝灭亡了，宋朝不得不面对国内的动乱和来自北方蛮族契丹的进攻。宋朝坚守了150年，但是它国力衰弱，只好求助于另一个蛮族女真人或金人。金人来了以后就留下不走了，孱弱的宋朝不得不退缩至南方，于是被称为了南宋，南宋王朝也统治了大约150年。与此同时，精美的艺术、绘画和制瓷术得到了繁荣发展。

在朝鲜半岛，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分裂和冲突后，一个统一的独立王国于公元935年建立了，它的统治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大约450年。朝鲜人向中国学习了很多文明、艺术和治国之术。从印度传来的宗教和某些艺术通过中国人传入了朝鲜，也传到了日本。日本位于遥远的东方，几乎就像亚洲的哨兵，一直独自存在和发展着，与世界的其他地区差不多中断了联系。藤原家族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时的天皇只不过是宗族首领而已，被笼罩在藤原家族的阴影里。后来，幕府将军出现了，成了真正的统治者。

在马来西亚，印度的殖民地正在繁荣发展。柬埔寨正处于权力和发展的顶峰，它的都城就是宏伟的吴哥。在苏门答腊岛，三佛齐是一个伟大佛教帝国的首都，这个帝国统治了整个东部岛屿，在各个岛屿之间开展了广泛的贸易。在东爪哇有一个独立的印度教国家，不久它逐渐发展起来，与三佛齐展开了贸易竞争和贸易带来的财富竞争。它还向三佛齐发动了激烈的战争，与现代欧洲国家为了贸易所犯下的罪行一样。东爪哇最终征服并摧毁了三佛齐。

在印度，与以前相比，南方和北方中断了彼此的联系，往来变少了。在北印度，加兹尼的马哈茂德不断进攻突袭、破坏和掠夺。他掠走了大批财宝，还把旁遮普纳入了版图。在南印度，我们发现在罗阇罗阇一世和他的儿子拉金德拉一世的统治下，朱罗王朝实施了对外扩张，国家也日益强盛起来。他们统治了印度南方，他们的海军横扫了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他们还野心勃勃地远征锡兰、缅甸南部和孟加拉。

在中亚和西亚，我们看到了巴格达的阿拔斯帝国的遗迹。事实上，在新的统治者塞尔柱突厥人的领导下，巴格达仍然繁荣兴旺，权力与日俱增。但是，古老的帝国被分裂成了许多国家。伊斯兰教不再是一个绝对权威，它仅仅成了很多国家和人民信仰的一种宗教。在阿拔斯帝国的残骸上诞生了以加兹尼为国都的加兹尼王朝。马哈茂德统治了这个王朝，并从加兹尼突袭了印度。但是，虽然巴格达帝国覆灭了，但是巴格达一直都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吸引着遥远地方的艺术家和学者。很多伟大著名的城市也在这个时期的中亚繁荣发展了起来——如布哈拉、撒马尔罕、大夏等。在这些城市之间有着广泛的贸易往来，成群结队的车马带着商人们从一个城市来到了另一个城市。

在蒙古和附近地区出现了新的游牧部落，他们的人口日益增多，实力也越来越强大。200年后，他们横扫了整个亚洲。即使到现在，中亚和西亚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就来自游牧民族的发源地中亚。中国人把

他们赶往了西方，他们四处逃散，有的来到了印度，有的去往了欧洲。我们现在发现，被赶往西方的塞尔柱突厥人重现了巴格达帝国的繁荣，进攻并打败了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

这就是此阶段的亚洲历史。跨过红海就是埃及，它已经脱离了巴格达的统治。埃及的穆斯林统治者宣称自己是独立的哈里发。北非也处于独立的穆斯林统治之下。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在西班牙境内也有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教国家，阿拉伯人在科尔多瓦建立了酋长国。我会在后面告诉你这一段历史。但是，你已经知道了，阿拔斯哈里发当政后，西班牙拒绝服从他。从那以后，西班牙就独立了。很久以前，它试图征服法国，但被查理·马特打败了。现在轮到西班牙北部的基督教国家进攻伊斯兰教国家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战斗中越来越充满了自信。但是，在我们谈论的这个时期，科尔多瓦酋长国（Emirate of Cordoba）是一个伟大且野心勃勃的国家，它在文明和科学方面远远领先于欧洲国家。

除了西班牙以外，这时的欧洲被分成了若干个基督教国家。此时，基督教已经传遍了整个欧洲大陆，崇拜英雄豪杰和男女众神的古老宗教几乎在欧洲已经销声匿迹了。我们可以看见欧洲的现代国家已初现端倪。公元987年，雨果·卡佩统治了法国。公元1016年，因命令大海后退而闻名的克努特（Canute the Dane）统治了英格兰。50年后，征服者威廉从诺曼底来到了英格兰。

德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它显然正逐步形成一个国家，虽然后来分裂成了许多小王国。俄国正在东方扩张，它的舰队经常威胁君士坦丁堡。这就是俄国对君士坦丁堡长期有着奇怪迷恋的开始。1000年来，俄国一直对这座伟大的城市垂涎欲滴，它希望最后能在1918年结束的世界大战中夺取这座城市。但是，俄国革命突如其来，推翻了旧俄国的所有计划。

你还会在900年前的欧洲地图上看见马扎尔人居住的波兰（Poland）和匈牙利（Hungary），还有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王国。当然，你会看见东罗马帝国被众多的敌人团团围住，但是它仍然一直矗立着。它被俄国人进攻过，被保加利亚人骚扰过，长期以来还不断被诺曼人由海路进攻和掠夺，直到后来，最危险的是塞尔柱突厥人威胁到了它的生存。尽管有着众多的敌人和诸多的困难，东罗马帝国却一直没有崩溃，又延续了400年之久。君士坦丁堡地理位置的优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种令人惊叹的坚守。它的地理位置很好，敌人很难将其攻克。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希腊人发明了一种新的防御方法，被称为“希腊火药”；这种物质可以在水上燃烧。当进犯的敌军企图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时候，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就会借助这种希腊火药，纵火烧毁敌军船只，使敌军陷入大混乱之中。

这就是基督纪元1000年以后的欧洲版图。你还会发现，北欧人或诺曼人乘船而下，侵扰抢掠了地中海沿海地区的城镇和公海上的船舶。事实上，因为成功的抢掠，他们还受到了世人的尊敬。他们定居安顿在法国西部的诺曼底；他们从法国的定居点出发，征服了英格兰；他们从穆斯林手中夺取了西西里岛，把它并入了南意大利，由此成立了一个国家，被称为西西里王国。

在欧洲中部，在从北海到罗马的区域上，盘踞着神圣罗马帝国，该帝国由多个国家组成，皇帝是它们共同的领袖。在这个德国皇帝和罗马教皇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一直在持续。有时候，皇帝占了上风，有时候教皇占了上风，但是教皇的实力在逐渐减弱。教皇有一个可怕的武器，就是以逐出教会为威胁手段，也就是把某人驱逐出教会和剥夺他的公民权。事实上，有一位骄傲的皇帝就曾被当时的教皇威胁过，为了祈求原谅，他不得不赤脚站在雪地里，一直等在意大利卡诺萨（Canossa）城堡的教皇住所外面，直到教皇仁慈地准许他入内。

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在纷纷形成，但是它们与现在的样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尤其是它们的国民是不一样的。他们几乎不说自己是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穷苦的耕种者是不幸而凄惨的一群人，他们对国家和地理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他们是领主的农奴，必须照领主的吩咐行事。如果你要问领主是谁，贵族们会告诉你，他们就是这块土地或那块土地上的领主，也是上级领主或国王的家臣。这就是遍布欧洲的封建制度。

逐渐地，我们发现，大型城市在德国，尤其是在意大利北部出现了。那时的巴黎是一座著名的城市。这些城市是贸易和商业的中心，也是财富的聚集地。城里人不喜欢封建领主，两者之间总是爆发冲突，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金钱。通过向领主出借金钱，有钱人就可以凭此获取特权和权力。逐渐地，一个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的新兴阶级在城市里出现了。

因此，我们发现，根据封建模式，欧洲的社会被分成了不同的阶层，甚至基督教也认可和鼓励这个体制。这时还没有对国家的感情。但是，整个欧洲有一个共识，尤其是在上层阶级里，那就是基督教世界的思想理念，它有时可以团结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基督教帮助了这种思想的传播和扩散，因为它能巩固教会，加强罗马教皇的权力，无疑，罗马教皇现在是西欧的基督教领袖。你应该还记得，罗马已经脱离了君士坦丁堡和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仍然信仰古老的希腊正教，俄国的宗教信仰就是从东罗马帝国来的。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并不认可罗马教皇。

但是，在危急时刻，当君士坦丁堡被敌人环伺攻打，尤其是遭到了塞尔柱突厥人的严重威胁的时候，它忘记了它的骄傲和对罗马的厌恶，转而请求罗马教皇援助他们抵抗穆斯林异教徒。那时的罗马有一位伟大的教皇名叫希尔得布兰德（Hildebrande），即教皇格列高利七

世（Pope Gregory VII）。那位骄傲的德国皇帝就是在他的面前，赤脚站在了卡诺萨城堡外的雪地里。

另一件事激发了当时的基督教欧洲的想象力。许多狂热的基督徒认为，世界将在公元1000年突然毁灭。“millennium”（千禧年）的意思就是一千年，它来源于两个拉丁词：“mille”，意思是一千；“annus”，意思是年。那时的人们期望着世界末日的降临，千禧年的到来意味着会突然变成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我告诉过你，当时欧洲的境况非常糟糕，对千禧年的展望给很多疲惫不堪的人带来了抚慰。许多人卖掉土地，启程前往巴勒斯坦，他们要在世界末日降临之际，待在他们的圣地。

但是，世界末日并没有降临，前往耶路撒冷的成千上万的朝圣者遭到了突厥人的虐待和抢掠。他们带着满腔的愤怒和羞辱返回了欧洲，四处传播他们在圣地遭受的痛苦经历。特别是，有一位叫作隐修士彼得的著名朝圣者，手里拿着东西四处走动，鼓动人们从穆斯林手中拯救圣城耶路撒冷。基督教世界里出现了愤慨和激动的情绪；见此情形，教皇于是决定领导这次行动。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君士坦丁堡的求救声，请求抵抗异教徒。这时，整个基督教世界，包括罗马和希腊，似乎都站在了一起，共同对抗即将到来的突厥人。公元1095年，伟大的教会议会决定向穆斯林发动圣战，收复圣城耶路撒冷。于是，十字军东征（Crusade）开始了——这是一场基督教世界针对穆斯林的战争，也是一场十字架针对新月的战争。

58 ——对亚洲和欧洲的再审视

我们完成了对公元1000年末的世界的回顾，也就是对亚洲、欧洲和一部分非洲的回顾。但是，让我们再看一看亚洲。印度和中国的古老文明一直都在延续和繁荣着。印度文化传播到了马来西亚和柬埔寨，并带去了丰硕的文化成果。中国文化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还传入了马来西亚。在西亚，阿拉伯文化遍布了阿拉伯半岛、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在波斯或伊朗出现了古老的伊朗文明和新传入的阿拉伯文明的融合。中亚的一些国家也吸收了这个相互交融的伊朗-阿拉伯文明，同时还受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影响。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都出现了高度发达的文明；贸易、知识和艺术得到了繁荣发展；到处都是大城市；著名的大学吸引了远道而来的学生。只有蒙古、中亚的部分地区和北方的西伯利亚等地的文明相对比较落后。

与先进的亚洲国家相比，这时的欧洲还相对比较落后，处于半野蛮状态。古老的希腊-罗马文明只是遥远过去的一个回忆。知识不受重视，也没有太多的艺术成就，贸易发展远远滞后于亚洲。欧洲此时有两个亮点：一个是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延续了阿拉伯人伟大时期的传统；另一个是位于亚洲和欧洲交界线上的君士坦丁堡，即使是在缓慢衰落的时期，它仍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时常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在当时盛行的封建制度下，每一位骑士和领主便成了自己管辖的领地上的小国王。罗马城，这个旧时期的帝国首都，曾经一度还没有一个村庄的面积大，古老的罗马圆形斗兽场里栖居着野生动物。但是，它后来又再次得到了发展。

所以，如果你比较一下公元1000年后的亚洲和欧洲，这对我们还是很有帮助的。

让我们再看一看，尽力发现表象之下的本质。我们发现，一个肤浅的观察者也许会认为亚洲并不是那么万事皆好，印度和中国这两大古老文明的摇篮正处于困境之中。它们遭遇的困境并不仅仅是外来的侵略，而真正的困境更多是由内在活力和实力的耗损衰竭造成的。西方的阿拉伯人已走到了辉煌时期的尽头。诚然，塞尔柱突厥人日益强大起来了，但是他们的崛起只不过是他们好战的天性所致。他们并没有像印度人、中国人、波斯人或阿拉伯人那样能代表亚洲的文明，他们只是代表了亚洲好战的特点。在亚洲的每一个角落，古老的文明民族似乎都在萎缩。他们丧失了自信，处于防御状态。强大且精力充沛的新民族崛起了，他们征服了亚洲的古老民族，甚至威胁到了欧洲。但是，他们没有带来新的文明浪潮，也没有为文化带来新的助推之力。古老的民族慢慢地教化了和同化了这些征服者。

所以，我们看到亚洲正在发生巨大改变。古老文明还在延续，精美的艺术在蓬勃发展，奢侈享受变得越来越精致；与此同时，文明的脉搏却在减弱，生命的气息似乎也越来越微弱。它们还能延续很长的时间，没有出现明显的断层或终结；只是在阿拉伯半岛和中亚，由于蒙古人的入侵，才出现了文化断层。

中国和印度都出现了缓慢的衰退，古老的文明最终变成了类似绘画一样的东西，从远处看很精美，但没有生命；如果你靠近一点，还会看见上面布满了白蚁。

与帝国一样，文明的衰落不是由于外来敌人的强大，而是因为自身的缺点和腐朽。罗马的没落不是因为蛮族的到来，他们仅仅是推倒了已经死亡的躯壳而已。当手臂和大腿都被砍掉后，罗马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我们还看到这个进程的某些阶段同样也发生在了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阿拉伯文明的倒塌突然而至，甚至就和他们的崛起

一样迅速。在印度和中国，文明衰落的过程持续了很久，所以很难被发现。

早在加兹尼的马哈茂德来到印度之前，文明衰落的进程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可以看见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印度人们不再有创新的思想和事物，他们忙于重复和模仿已有的事物。虽然他们仍然思维敏捷，但他们只是忙于阐述和诠释很久以前的观点和作品。虽然他们仍然制作了精妙的雕塑和雕刻作品，但是他们关注细节和修饰，时常会混入一点奇异的风格。原创和大胆杰出的设计不见了。富人一直在追逐优雅的风度、艺术和奢华，他们几乎没有想办法去减轻人民的劳苦和苦难，也没有提高生产。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文明衰退的标志。一旦出现这些标志，你或许就能断定这种文明的生命力正在消失；因为生机与活力的标志是创新，而不是重复和模仿。

同样的过程也出现在了当时的中国和印度。但是，请不要误解我。我并不是说中国或印度由于这个原因而消失了，或者退化到了野蛮的原始状态。我的意思是说，中国和印度曾经拥有的创新精神的古老推动力已经耗尽了能量，已经停止了自我更新。它自身没有去适应变化的环境，只是在不断地重复。每一个国家和文明都发生过同样的情况，都出现过努力创新和繁荣发展的伟大时期，也出现过衰退枯竭的时期。令人惊叹的是，印度和中国的衰退和枯竭出现得如此之晚，即使如此，这个过程也从来没有完结。

伊斯兰教给印度带来了人类进步的一个全新的推动力。在某种程度上，它为印度输入了养分，也唤醒了印度。但是，它在印度的影响和作用小于它也许本该产生的影响。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伊斯兰教传播的方式有误。在加兹尼的马哈茂德入侵印度前的数百年间，伊斯兰教的传教士们就已经在印度四处游历传道了，而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带着和平而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当时人们几乎没有

对伊斯兰教表示反感和敌意。然后，马哈茂德带着战火与刀剑来到印度；他是以一个征服者、抢掠者和杀人犯的身份前来的，严重破坏了伊斯兰教在印度的声誉。当然，就和其他伟大的帝王一样，除了烧杀抢掠以外，他也对宗教毫不关心。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入侵掩盖了伊斯兰教在印度的光芒，使人们很难平心静气地看待伊斯兰教，而印度人本来是可以平心静气地看待伊斯兰教的。

另一个原因是伊斯兰教传入的时间较晚。伊斯兰教出现400年后才传入了印度，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伊斯兰教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衰竭，失去了大部分创造力。如果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发展的早期就来到了印度并开始传播伊斯兰教，兴起的阿拉伯文明也许会和古老的印度文明交流融合，这两者也许会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产生出伟大的文明成果。这两个文明的民族本该融合在一起的；众所周知，阿拉伯人对宗教抱有宽容和理性的态度。事实上，曾有一段时间，在哈里发的庇护下，巴格达出现了一个社团，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可以聚在这里，从纯理性的角度探讨和争辩各种问题。

但是，阿拉伯人来到印度的时机不对。他们停留在了信德，印度几乎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伊斯兰教是通过突厥人和其他部落民族传入印度的，这些民族既没有宽容的态度，也没有阿拉伯文化，他们主要是一群军人。

尽管如此，印度还是出现了推动进步和创造力的新力量。我们会在后面谈到它是怎样给印度注入了新的活力，又是如何逐渐显现的。

现在，印度文明衰落的另一个后果已经显而易见了。由于外部的攻击，印度给自己搭建了一个壳子，几乎把自己囚禁在里面。这又是一次软弱和恐惧的表现；修修补补只会让病情继续恶化。真正的疾病不是外来的侵略，而是自身的停滞不前。由于这种排他性，停滞、萧条在不断滋生，所有的发展途径都被中断了。此后，我们会看见中国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日本也是如此。生活在一个封闭得像壳子一样

的社会里是有点危险的。我们会僵化麻木，失去活力，还会不习惯新鲜的空气和崭新的思想。新鲜的空气对社会和个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亚洲就讲到这里吧。我们看见那个时期的欧洲很落后，而且纷争不断。但是，在所有混乱无序和粗鲁不文明的背后，你至少可以察觉出活力和生机。亚洲在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后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而欧洲却在挣扎着往上爬。但是，在欧洲接近亚洲的发展水平之前，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今欧洲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亚洲千辛万苦地在为自由而战。然而，让我们再次深入表面现象之下吧。你会发现亚洲出现了一种新的活力，一种新的创造精神和新的生机。毋庸置疑，亚洲再次崛起了。在欧洲，特别是在西欧，尽管仍处于伟大辉煌的时期，但已显现出了腐朽的迹象。再没有强大的野蛮人去摧毁欧洲的文明了。但有时候文明人本身也会野蛮行事，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文明也许会自我毁灭。

我谈论了亚洲和欧洲，但是，它们只是地理名词而已，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亚洲或欧洲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或全人类的问题。除非我们能为整个世界解决这些难题，否则未来仍会不断出现动乱和纷扰。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结束世界各地的贫穷和苦难。这也许会花上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必须以此为目标，没有比这更伟大的目标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拥有真正的文化和文明，任何国家或阶级才不会受到剥削和压迫。这样的社会将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先进社会，才能自身适应于变化的外部环境，才能建立在社会成员相互合作的基础上。最终，这样的社会一定会遍及全世界。再也不会像古老文明那样，出现文明崩溃或腐朽的危险了。

所以，我们在为印度的自由而战时，一定要记住伟大的目标是人类的自由，它不仅包括了印度人民的自由，同时也包括了其他国家人

民的自由。

59 ——美洲的玛雅文明

我在这些信里一直试图追溯世界史，所以我告诉你的也是世界史。但是事实上，这是亚洲的历史、欧洲的历史和北非的历史。我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讲述美洲和澳洲的历史。然而，我得提醒你，美洲在早期也出现过一个文明。我对此知道得不多，确切地说是非常有限。但是，我还是情不自禁地要告诉你一点关于玛雅文明的历史，那么你也许就不会犯下常识性的错误，以为在哥伦布和其他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这儿只是一个野蛮未开化的国家。

可能早在石器时代，人类还没有定居、还在四处游荡、以打猎为生之前，亚洲和北美就在陆地上有了交往。成群或成部落的人一定经由阿拉斯加（Alaska）从一个大洲到达另一个大洲。后来，这些交往就被切断了，在美洲的人们缓慢地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文明。你要记住，就目前我们知道的而言，美洲和亚洲或欧洲之间没有任何连接的途径。直到公元16世纪晚期所谓的“新大陆”发现之前，都没有关于它们之间出现过有效联系的记录。这个美洲世界是一个遥远而且不同的世界，没有受到欧洲或亚洲的任何影响。

这儿似乎有三个文明中心：墨西哥、中美洲和秘鲁。不太清楚它们是从何时开始的，但是与墨西哥历法开始时间相符合的是公元前613年。我们发现，在基督纪元早期，也就是从公元2世纪起，许多城市已经发展起来了。现在的美洲有石雕制品、陶器、编织品和非常精美的染色品，还有丰富的铜和黄金，但是没有铁。建筑艺术得到了发展，各个城市在建筑上展开了相互竞争。一种特殊的相当复杂的文字也出现了。艺术，尤其是雕刻，已经非常显著了，而且非常精美。

在每一个文明存在的区域，都出现了许多国家。这些国家中存在着若干种语言和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还有组织有序和强有力的政府，各个城市都有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社会。这些国家都有高度发达的法律体系和金融体系。乌斯马尔城（Uxmal）大约建成于公元960年，据说它很快就发展成了一座大型的城市，完全能与那个时期的亚洲大城市相匹敌。此外，还有其他大型城市，如拉布阿（Labua）、玛雅潘（Mayapan）、绰穆尔顿（Chaomultun）。

位于领先地位的三个中美洲国家结成了联盟，这个联盟现在被称作“玛雅潘联盟”（League of Mayapan）。这大约发生在公元1000年，我们对亚欧历史的回顾正处于这个阶段。所以，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中美洲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文明国家联盟。但是，所有这些国家和玛雅文明都处于神职人员的控制下。天文学是最受尊敬和推崇的科学，神职人员通过利用天文学知识，控制和利用了无知的人们：就像印度的数百万民众一样，他们在日食和月食的时候会沐浴和斋戒。

玛雅潘联盟持续了100多年。后来似乎爆发了一场社会革命，一支从边境而来的国外势力进行了干涉。大约在公元1190年，玛雅潘被消灭了。然而，其他大城市仍在继续发展着。在随后的100年里又出现了另外的一群人，他们是来自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Aztecs）。早在公元14世纪初期，他们就征服了玛雅；大约在公元1325年，他们建立了特诺奇提特兰城（Tenochtitlan）。不久以后，这座人口众多的城市成了整个墨西哥世界的首都和阿兹特克帝国的中心。

阿兹特克帝国是一个军事化国家，他们有军事殖民地和军事要塞，还有一个纵横交错的军事道路网。甚至据说，他们十分聪明地让附属国相互争吵。如果附属国处于分裂状态，就更易于统治它们。这是所有帝国惯用的政治手腕。博尔纳把它称为：“Divide el impera！”（“分而治之。”）

尽管阿兹特克人在其他方面聪明多谋，但他们也是由神职人员统治的；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宗教里有大量的活人献祭，每年都有数千民众以这个最可怕的方式被当作了祭品。

阿兹特克人以这种残暴的方式统治了帝国近200年。阿兹特克帝国表面上一片和平与安定，但是人民受到了无情的剥削，而且生活穷困。这样建立起来并维护统治的国家是不可能长久的。所以，变革发生了。公元16世纪初（公元1519年），当阿兹特克人在表面上正处于权力的顶峰时，整个帝国在一小部分外来强盗和冒险者面前突然崩溃了！这是帝国陨灭的最惊人例子之一。它的覆灭是由一个名叫荷南·科尔蒂斯（Hernan Cortes）的西班牙人造成的，他随行带来了一支小型军队。科尔蒂斯非常勇敢，而且足够大胆。有两件物品对他的帮助极大，即火器和马匹。显然，墨西哥帝国是没有马匹的，也一定没有火器。但是，如果阿兹特克帝国没有从内部腐败堕落的话，科尔蒂斯的勇气、枪支和马匹都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帮助。阿兹特克帝国的内部已经腐烂，只剩下了一个外壳而已，哪怕是最轻微地踢它一脚，也足以使它倒塌。阿兹特克帝国是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因此人民对它怨恨不已。所以，当它遭到攻击时，大部分人都希望看到帝国主义者的崩溃。通常情况下，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也就出现了社会革命。

科尔蒂斯曾被赶走过，他死里逃生才活了下来。但是，他又回来了，然后在一些当地居民的帮助下，最终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这不仅终结了阿兹特克人的统治，令人费解的是，整个墨西哥文明也随之崩溃了；巨大的帝国城市特诺奇提特兰也很快销声匿迹了。现在甚至连一块石头都找不到了；西班牙人在原址上修建了一座大教堂。另外一些大型的玛雅城市也土崩瓦解了，尤卡坦（Yucatan）的森林吞没了这些城市，最后连它们的名字也被世人遗忘了。由于附近村庄的名称，人们现在还能记住一些城市的名字。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消失了，只有三本流传了下来，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人能读得懂。

这个古老的民族和文明延续了约1500年之久，他们一接触到来自欧洲的新民族就突然消失了，要想清楚地解释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这种接触在本质上似乎是一种疾病，是把他们完全清除的一场瘟疫。他们在某些方面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但在另一些方面就极其落后。他们是混合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个令人好奇的综合体。

在南美洲的秘鲁还有另一个文明中心，由一个印加人统治。他是一位神圣的国王。令人奇怪的是，至少在晚期，秘鲁文明完全中断了与墨西哥文明的联系。这二者相隔并不遥远，然而彼此却一无所知。这本身就表明它们在某些方面十分落后。在科尔蒂斯成功征服了墨西哥之后不久，一位西班牙人也结束了这个秘鲁国家，他就是皮萨罗（Pizarro）。他于公元1513年来到了此地，背信弃义地俘获了那个印加人。“神圣”国王被俘了，他的人民都惊恐万分。皮萨罗以这位国王的名义曾在一段时间内统治了这个国家，还敲诈勒索了大批的财富。后来，西班牙人连这个借口都丢弃不用了，直接将秘鲁纳入了西班牙的统治范围。

科尔蒂斯第一次看到特诺奇提特兰城的时候，城市的雄伟壮丽让他非常震惊。他从未在欧洲看到过类似的城市。

许多玛雅艺术和秘鲁艺术的遗迹已经得到了修复，在美国的博物馆里，我想尤其是在墨西哥的博物馆里，可以看到它们。它们都展现出了精美的艺术传统。据说秘鲁的金匠非常杰出。被发掘出来的某些雕塑残片极为精美，尤其是石头上的一些蛇雕。显然还有一些是刻意让人恐惧的作品，它们也的确使人心生恐惧。

60 ——回到摩亨佐达罗

我一直都在阅读有关摩亨佐达罗和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书籍。有一本这方面的新书出版了，这本书讲述了到目前为止已知的这方面的历史。这本书是由负责挖掘工作的人们所筹备和编写的；随着挖掘的不断深入，他们目睹了摩亨佐达罗从大地母亲深深的土壤里重现天日的过程。然而，我还没有看到这本书，我希望我能尽快读到它。但是，我读了一篇有关它的评论文章，我想与你一起分享其中的某些引文。这个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真是不可思议啊，你了解得越多，它就会越让你惊叹不已。所以在这封信里，我要暂且中断一下对过去历史的讲述，回到5000年前，我希望你对此不要介意。

据说，摩亨佐达罗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了。但是，我们发现，它是一座精美的城市，是有教养的人和文明人的发源地。在它的背后一定有一段很长的发展过程。所以，负责挖掘这座城市的约翰·马歇尔爵士（Sir John Marshall）告诉我们：

> 在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这两个地方，有一点是非常清晰而且毫无疑问的：这两个地方迄今为止发掘出来的文明不是刚出现的文明，而是深深扎根在印度土壤里、年代久远且发展成形的文明，是人类数千年努力奋斗的结晶。因此，从此以后，一定要认识到印度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一样，是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

我想我还没有告诉过你哈拉帕的情况。这里和摩亨佐达罗相似，也发掘出土了古老的遗迹。它就位于旁遮普西部。

所以，我们发现，我们不仅追溯了印度河流域5000年的历史，而且回到了更早的时期，直到我们最终迷失在人类最初定居的古代遗迹的迷雾里。当摩亨佐达罗繁荣发展的时候，雅利安人还没有来到印度，然而，毫无疑问：

> 如果不考虑印度的其他地区，旁遮普和信德各自有着非常先进且统一的文明，与同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十分相似，但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加优秀。

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地区的挖掘工作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古老而迷人的文明。在印度的地底下还掩埋着多少遗迹啊！很可能这个文明在印度的传播极其广泛，不仅仅局限在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甚至这两个地方也相隔甚远。

这是一个“一直在使用石制武器和器皿，同时还有铜器和青铜器”的时代。约翰·马歇尔爵士告诉我们，与同时期的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相比，印度河流域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特点和优势。

他说：

> 因此，这里只谈几个要点。在这个时期，只有印度在纺织棉花，直到2000或3000年后棉纺工艺才传到了西方世界。还有，居住在摩亨佐达罗的百姓能建造完善的浴室和宽敞方便的房子。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史前时期的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或西亚任何地方是否也有能与印度媲美的上述设施。在那些国家，大量的金钱和想法都被大肆挥霍在为神灵修建宏伟的寺庙和为国王修建宫殿和陵寝上了，但是广大老百姓似乎表面上都心甘情愿地住在用泥砌成的不起眼的房子里。然而，在印度河流域情况完全相反，精致的建筑物都是为了人民的方便而修建的。

他还告诉我们：

> 同样，它的艺术和宗教有着特有的印度河流域的特点，还烙上了鲜明的个人色彩。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在这个时期的其他国家是否有任何类似风格的彩陶样式，如公羊、狗和其他动物，或者雕刻在图章上的凹雕技术。其中最出色的作品——著名的驼背短角公牛——特征是宏大的处理效果和几乎很难在饰品雕刻上被超越的线形和立体形；来自哈拉帕的以普拉特十世（Plates X）和普拉特十一世为原型的两个小人物雕像有着精美无比的流畅造型，直到希腊的古典时代才有可能出现能与之匹敌的作品。当然，印度河流域的许多人民都有宗教信仰，这同其他国家也许是一样的。每一个史前时期的宗教和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宗教都是这样的。但是，整体而言，他们的宗教有着鲜明的印度特点，很难与现在的印度教区别开来……

你也许不能理解这段引文中的某些词。彩陶是指陶器或瓷器；凹雕和饰品雕刻工艺是指在某些坚硬的物品上进行雕刻，通常是在珍贵的宝石上。

我希望我能看见在哈拉帕发现的小雕像，甚至还有它们的图画。也许，某一天，你和我会到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去旅游，大饱一番眼福。同时，我们还得继续下去——你待在浦那（Poona）的学校里，而我则待在被称为台拉登监狱的学校里。

61 ——科尔多瓦和格拉纳达

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亚洲和欧洲畅游，我们在公元1000年的末期停下来，然后又回头看了看。但是，不知何故，我们的讲述中遗漏了西班牙——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我们一定得回去，把它纳入历史的画卷里。

有些历史是你已经知道的，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公元711年，一位阿拉伯将军跨过非洲大陆来到了西班牙。他就是塔里克，他在直布罗陀海峡登陆（此处被命名为“直布尔·塔里克”，意思是“塔里克的岩石”）。阿拉伯人在两年之内就征服了整个西班牙，不久以后又占领了葡萄牙（Portugal）。他们不断前进，大军深入了法国，随后又扩张到整个南部地区。法兰克人和其他部落被彻底吓坏了，他们联合了起来，在查理·马特的领导下，竭尽全力阻止了阿拉伯人。他们取得了成功，在法国的普瓦捷（Poitiers）附近的图尔战役中，法兰克人一举击败了阿拉伯人。这是一场伟大的战役，终结了阿拉伯人企图征服欧洲的梦想。此后阿拉伯人与法兰克人，还有法国境内信仰基督教的其他人，相互交战了许多次；有时候阿拉伯人取得了胜利，攻入了法国，有时候他们在西班牙被击退。甚至查理曼大帝也攻打了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但是未能取得成功。然而，总而言之，双方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平衡，阿拉伯人统治着西班牙，但是无法把版图进一步扩大。

因此，西班牙成了伟大的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其疆域跨过了非洲，直至蒙古边境。但是，这个局面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你应该记得，阿拉伯半岛爆发了内战，阿拔斯家族推翻了倭马亚哈里发。西班牙的阿拉伯总督是一名倭马亚人，他拒绝承认新的阿拔斯哈里发。所

以，西班牙断绝了与阿拉伯帝国的联系，而位于巴格达的哈里发距离西班牙太过遥远，他自身也麻烦缠身，所以无法对此采取任何行动。但是，西班牙和巴格达之间一直嫌隙不和。这两个阿拉伯国家在各自陷入困境和麻烦的时候，不是相互帮助，而是互相拍手称快。

就某种程度而言，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中断了与故土的联系，这种行为是非常轻率鲁莽的。他们在一个遥远的国家，身处外国民族之中，敌人环伺四周。他们自身的人口数量并不多。一旦遇到危险和困境，没有人能帮助他们。但是，在那个时期，他们充满了自信，对这些危机丝毫不介意。事实上，尽管北方的基督教国家不断施压，他们也是单打独斗，但是他们取得了非比寻常的成就，他们统治了西班牙绝大部分地区，维持了500年之久。甚至在这之后，他们固守在西班牙南部地区，还统治了一个小的王国，又长达200年之久。所以，事实上，他们的统治时间比伟大的巴格达帝国还要长久；当阿拉伯人最后一次挥手告别西班牙的时候，巴格达这座城市早就湮没在尘埃之中了。

阿拉伯在西班牙部分地区的统治总共持续了700年，这足以使人惊讶不已。但是，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西班牙阿拉伯人[他们也被称为摩尔人（Moors）]高度发达的文明和文化。一位差点被激情冲昏了头脑的历史学说道：

> 摩尔人统治了令人惊叹的科尔多瓦王国，它是中世纪的奇迹。当整个欧洲正处于野蛮无知、冲突频繁的时候，它却独自举起了知识和文明的火炬，在整个西方世界面前光芒四射。

科尔多瓦在50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这个王国的首都，它的英语名字通常是“Cordoba”，有时是“Cordova”。我担心我会时不时地把这个城市拼写成不同的单词。但是，我试着固定用“Cordoba”这个词。这是一座有着百万居民的大城市，也是一座长达10英里的花园城市，

有24英里长的郊区。据说，城市里有6万座宫殿和大宅第、20万栋小型住房、8万间商铺、3800座清镇寺和700间公共浴室。这些数字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它勾勒出了这座城市的大致情况。城里还有很多图书馆，其中最主要的是埃米尔帝国图书馆（Imperial Library of the Emir），藏书量为40万册。科尔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Cordoba）享誉整个欧洲，甚至名声还远播到了西亚。还为穷人提供大量的免费小学教育。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说道：

> 在西班牙，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怎样阅读和书写，然而在基督教的欧洲，除了神职人员以外，甚至最上层的人士，也完全是文盲。

这“就是科尔多瓦，它可以与另一座伟大的阿拉伯城市巴格达一较高下”。它的名声享誉了整个欧洲，一位公元10世纪的德国作家称它是“为世界增添光彩者”。它吸引了来自遥远地方的学生们。阿拉伯哲学的影响传播到了欧洲的其他大学，传播到了巴黎、牛津和意大利北部的大学。阿威罗伊（Averroes），又名伊本·路世德（Ibn Rushd），是公元12世纪科尔多瓦著名的哲学家。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与西班牙埃米尔发生了冲突，于是遭到了驱逐。然后他去了巴黎，并在此定居。

同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西班牙也存在着封建制度。为数众多且实力强大的贵族日益壮大，他们与统治者埃米尔之间经常爆发战争。就是这种内战削弱了这个阿拉伯国家，其影响远甚于来自外部的攻击。同时，位于西班牙北部的一些小基督教国家逐渐发展强大起来，他们也一直不断地排挤着阿拉伯人。

大约公元1000年——也就是千禧年末期——这个埃米尔王国几乎囊括了整个西班牙。它的疆域甚至还包括了法国南部的小部分地区。但是，它不久就崩溃了，与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一样，也是由于内部的

衰弱。阿拉伯文明有着精美的织物、艺术、奢华和骑士精神，但终究都是富人的文明。饥饿的穷人们奋起反抗，劳工们也爆发了骚乱。逐渐地，内战蔓延，行省四分五裂，阿拉伯人的西班牙帝国土崩瓦解了。然而，虽然阿拉伯人分崩离析了，但他们的统治一直在延续，直到公元1236年，科尔多瓦才最终臣服于卡斯蒂利亚（Castile）王国的基督教国王。

阿拉伯人被驱赶到了南方，但是他们仍然在坚持。在西班牙南部，他们建立了一个小王国——格拉纳达（Granada）王国，并在此处据守。就国土面积而言，这个王国非常小，但是它小规模地重现了阿拉伯文明。著名的阿尔罕布拉宫（Alhambra）至今仍然矗立在格拉纳达，它有着美丽的拱门、圆柱和阿拉伯式的图案，它是过去时光的记忆。阿拉伯语最初称它为“阿尔哈姆拉”（Al-Hamra），意思是“红色的宫殿”。阿拉伯式的图案设计十分美丽，你经常会在阿拉伯或受伊斯兰教影响的其他建筑物上看到它们。伊斯兰教不提倡人物画像，所以，建造者们喜欢采用花哨别致、错综复杂的设计。他们经常在圆柱上和任何其他地方写下《古兰经》（*Quran*）经文，这些经文也成了美丽的装饰。阿拉伯字母是一种流畅的书写体，本身就容易成为一种装饰。

格拉纳达王国的统治持续了200年，它遭到了西班牙基督教国家的不断压迫和骚扰，尤其是卡斯蒂利亚王国，有时它不得不同意向卡斯蒂利亚王国纳贡。如果基督教国家没有各自为政的话，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持续这么长时间。但是，公元1469年，两个主要基督教国家的统治者费迪南德（Ferdinand）和伊莎贝拉（Isabella）缔结了婚姻关系，由此统一了卡斯蒂利亚、阿拉贡（Aragon）和莱昂（Leon）。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结束了阿拉伯人的格拉纳达王国。阿拉伯人英勇抵抗了数年，直到他们被围困在格拉纳达为止。公元1492年，饥饿难耐的阿拉伯人被迫投降了。

许多撒拉逊人或阿拉伯人离开了西班牙，前往了非洲。在格拉纳达附近，有一个俯瞰这座城市的地方，仍然沿用了以前的阿拉伯名字“El ultimo sospiro del oro”m，这是摩尔人最后的印记。

但是，大量的阿拉伯人留在了西班牙，这些阿拉伯人的遭遇是西班牙历史上一个极其黑暗的篇章。它充满了残暴和杀戮，曾向他们许下宽容以待的承诺被通通抛诸脑后。大约在这个时期，罗马教会在西班牙创建了宗教法庭，它是用来镇压所有不顺从教会者的可怕武器。撒拉逊人统治下的犹太人曾繁荣兴盛，这时却被迫改变了宗教信仰，很多人被活活烧死，妇女和儿童也没能幸免。“异教徒们，”（也就是撒拉逊人）一位历史学家说道，“被命令脱下自己美丽别致的衣服，戴上征服者的帽子，穿上他们的裤子，还要放弃自己的语言、习俗和仪式，甚至还要放弃他们的名字。他们还被命令说西班牙语，行为举止要仿效西班牙人，还要重新取一个西班牙名字。”当然，针对这些野蛮行径爆发了起义，但是，都遭到了无情镇压。

西班牙基督徒们似乎非常反对洗漱和沐浴。也许他们反对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西班牙阿拉伯人非常喜欢，阿拉伯人曾到处建立了大型的公共浴室。甚至基督徒居然颁布了“摩里斯科人（Moriscos）改革”的命令，摩里斯科人就是指在西班牙的摩尔人或阿拉伯人。命令是：“无论是他们自己，他们的女人，还是其他任何人，都禁止在家或任何地方洗漱或沐浴，必须推倒和毁掉所有浴室。”

除了视洗漱为罪恶外，还针对摩里斯科人公布了另一项重大的控诉，那就是他们对宗教的宽容。读到这里会让人感到非常离奇，然而这确实是主要控诉之一，它于公元1602年被记录在了巴伦西亚（Valencia）大主教起草的《摩里斯科人的判教和叛逆》（*Apostacies and Treasons of the Moriscos*）中，当时他建议把撒拉逊人驱逐出西班牙。为了引证这一点，他写道：“他们（摩里斯科人）对一切宗教的信仰自由没有进行任何的谴责，突厥人和所有其他

的穆斯林都可以享有信仰自由。”这可真是不经意间给予了西班牙的撒拉逊人最大的赞美啊，西班牙基督徒的视角可真是与众不同且心胸狭隘。

数百万撒拉逊人遭到强行驱赶，被迫离开了西班牙，大部分人前往了非洲，有些人去了法国。但是，你一定要记住，阿拉伯人曾在西班牙居住了数百年之久；在这段长长的时期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西班牙当地人。最初的阿拉伯人已经逐渐变成了西班牙人。晚期的西班牙阿拉伯人可能与巴格达的阿拉伯人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甚至在今天，西班牙人的血管里还流淌着大量阿拉伯人的血液。

撒拉逊人不得不迁徙到法国南部，甚至是瑞士，此时的他们不再是统治者，而是定居者。甚至在今天，我们有时候还能在一群法国人当中偶尔遇到一张有着阿拉伯人特征的面孔。

因此，撒拉逊人在西班牙的统治结束了，阿拉伯文明也结束了。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甚至在更早的时候，这个文明早就在亚洲崩塌了。它影响了很多国家和文明，留下了许多光辉灿烂的回忆。但是在以后的历史里，这个文明再也没有复兴起来。

撒拉逊人离开后，在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共同统治下的西班牙日益强大。不久以后，美洲的发现给西班牙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这个国家曾一时之间成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控制管辖了其他国家。但是，它又迅速地衰落，变得无足轻重了。当欧洲的其他国家在进步发展的时候，西班牙仍停滞不前，还做着中世纪时期的美梦，没有认识到世界从那时起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莱恩·普尔（Lane Poole）是这样描述西班牙的撒拉逊人的：

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曾是文明的中心，也是艺术与科学、知识与各种高雅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接近摩尔人的文明水平。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共同执政的时候和查尔斯帝国（Empire of Charles）都出现过短暂的辉煌，但它们没有如此长久不衰地闪耀光芒。摩尔人被驱逐了；基督教统治的西班牙曾闪耀一时，就如同借助了一点光明的月亮一样；然后月食降临了，从此以后西班牙坠入一片黑暗中。如今我们能看到的摩尔人留下的遗迹，已经是完全荒芜、没有人烟的大片土地，摩尔人曾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茂盛的葡萄、橄榄和黄灿灿的玉米；在这个愚蠢无知的民族中，智慧和知识曾得到了蓬勃发展；这个停滞落后的民族在其他国家的扩张中绝望地陨落了，得到了应有的羞辱。

这是一个严厉的审判。大约一年前，西班牙爆发了革命，国王被推翻了。现在的西班牙是一个共和国。也许，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会变得更好，将再次带领西班牙赶上其他国家的发展步伐。

62 ——十字军东征

在最近的一封信里（第57封）我告诉过你，教皇和他的教会议会宣布发动针对穆斯林的“圣战”，以收复耶路撒冷。塞尔柱突厥人的实力日益强大，使欧洲惊恐万分，尤其是君士坦丁堡，受到了最直接的威胁。基督教朝圣者前往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却遭到了突厥人的虐待，他们的遭遇唤起了欧洲人民，使他们激愤不已。所以，发出了“圣战”的宣言，同时教皇和教会号召欧洲的所有基督徒一起去拯救“圣城”。

于是，公元1095年，十字军东征开始了，这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十字架与新月之间的战争持续了150多年。虽然出现过长时间的和平，但战争几乎是持续不断的，一波又一波的基督教十字军加入了战斗，大部分人战死在了“神圣的”土地上。这场长时间的战争没有给十字军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他们曾一度攻占了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后来又回到了突厥人(注)的手中，并一直固守了下来。十字军东征的主要结果是把死亡和痛苦带给了数百万基督徒和穆斯林，并又一次使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浸染了人们的鲜血。

那么，这个时期的巴格达帝国是怎样的局面呢？阿拔斯家族继续着它的统治。他们仍然是哈里发，“忠诚者的领袖”。但是，他们只是有名无实的首领，几乎没有实权。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的帝国是怎样四分五裂的，省级区域的总督是怎样纷纷独立的。加兹尼的马哈茂德经常入侵印度，这个强大的统治者也威胁着哈里发，如果后者不按照他的意愿行事的话。甚至在巴格达，这些突厥人才是真正的主宰。此后另一支突厥人——塞尔柱人——迅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四处扩张，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直抵君士坦丁堡的城下。但是，哈里发仍

然是哈里发，虽然没有任何政治实权。他把苏丹的头衔授予了塞尔柱人首领，苏丹成了统治者。因此，十字军还与这些塞尔柱苏丹和他们的追随者们进行了战斗。

在欧洲，十字军东征强化了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即基督教的世界反对所有非基督徒。欧洲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和目标——从所谓的异教徒手中收复“圣地”。这个共同目标使人们热情澎湃，许多人为了这个伟大的事业而抛家弃子，许多人被这高贵的动机所驱使，许多人被教皇的承诺所吸引，这个承诺就是所有加入的人都会被宽恕自身的罪恶。十字军东征还有另外一些原因，罗马希望彻底成为君士坦丁堡的领袖。你应该还记得，君士坦丁堡教会有别于罗马教会，它自称希腊正教，它非常不喜欢罗马教会，认为罗马教皇是一个暴发户。教皇想结束君士坦丁堡的傲慢自负，将其纳入管辖之中。于是，在披着针对异教徒突厥人的圣战的外衣下，教皇想得到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这就是政治家们和自认为是政治家们的手段！我们最好记住这场发生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冲突，因为它不断地突然出现在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

十字军东征的另一个原因是商业原因。商人们，尤其是在威尼斯（Venice）和热那亚（Genoa）这些日益发展的港口的商人们，都希望十字军东征，因为他们的贸易正面临困境。塞尔柱突厥人封闭了多条前往东方的贸易路线。

当然，普通民众对这些原因是一无所知的，没有人会告诉他们。政治家们往往隐瞒了自己的真实目的，通常是大谈特谈宗教、正义、真理等此类的借口。这就是发生在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情况。现在仍是如此。那时的人们受到了欺骗，现在仍然有大多数民众被政治家们的甜言蜜语所欺骗。所以，大量民众聚集在一起，参加了十字军东征。他们中间有善良认真的人，但是也有很多人远非善类，掠夺的欲望吸引着他们。这是一群奇怪的组合，有虔诚的宗教信仰者，也有大批能

犯下各种罪行的地痞流氓。事实上，这些十字军们，或者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他们的高贵事业而远征，却犯下了最卑鄙、最恶心的罪行。在还没有靠近巴勒斯坦的一路上，他们就忙于四处抢掠，行径粗鲁而卑鄙。有些人一路上屠杀犹太人，有些人甚至屠杀基督教兄弟。有时候，基督教国家的农民受够了他们的野蛮粗暴，于是起来反抗，攻击他们，杀死了一些人，还赶跑了一些人。

最后，十字军在一个名叫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的诺曼人的率领下到达了巴勒斯坦。他们攻下了耶路撒冷，然后“大屠杀持续了一个星期”。这是一场可怕的屠杀。一位法国人目睹了这一惨状，他这样说道：“在清真寺的圆廊下，鲜血有膝盖那么深，浸湿了马勒。”戈弗雷成了耶路撒冷的国王。

70年后，埃及苏丹萨拉丁（Saladin）从基督徒手中夺回了耶路撒冷。这再一次刺激了欧洲人，数支十字军军队蜂拥而至。这一次，欧洲的国王和皇帝们亲自率军，但是他们几乎都失败了。他们为了各自的优先地位而相互争吵不休，还相互嫉妒。这是一个令人抑郁的故事，充满了可怕残酷的战争，还有卑劣低下的阴谋和肮脏不堪的罪行。但是，有时候，人类天性中好的一面会超越这种恐惧。当敌人彼此彬彬有礼又充满了骑士风度的时候，发生了几个小插曲。在巴勒斯坦的外国国王中，英格兰国王理查德一世（Richard I），绰号“狮心王”（Lion-Hearted），以力大无比和勇敢无畏而闻名于世。萨拉丁也是一名伟大的战士，以骑士精神而闻名遐迩。甚至，同他交战的十字军都欣赏他的这种骑士精神。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次，理查德一世生了一场大病，发了高烧。萨拉丁听闻此事后，派人给他送去了山上的初雪和冰块。我们现在都知道，在当时，冰冻的水是不可能由人工做成冰块的。所以，一定是敏捷快速的信使从山上取到了天然的雪和冰。

还有许多关于十字军东征的故事。也许你读过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的《护身符》（*Talisman*）。

一批十字军前往了君士坦丁堡，并占领了它。他们赶走了东罗马帝国的希腊人皇帝，建立了拉丁王国和罗马教会。在君士坦丁堡也发生了可怕的大屠杀，部分城市被十字军烧毁。但是，这个拉丁王国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东罗马帝国的希腊人虽然软弱，但是50多年后他们还是打回来了，并赶走了拉丁人。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又延续了200年，直到公元1453年，突厥人[注]才最终倾覆了这个帝国。

十字军攻占了君士坦丁堡，这使得罗马教会和教皇希望借机扩大他们在那里的影响力。虽然城里的希腊人曾在恐慌的时候向罗马求援以抵抗突厥人[注]，但是他们没有对十字军施以援手，也非常不喜欢他们。

但是，在所有十字军东征中最可怕的是所谓的儿童十字军。大量年幼的男孩狂热地离开了家园，决定前往巴勒斯坦，他们中的大部分是法国人，有些来自德国。他们中的许多人死在了路上，还有很多人失踪了。大多数人抵达了马赛，流氓恶棍们欺骗了这些穷苦的孩子，还利用了他们的热情。奴隶贩子以带他们去“圣地”为借口，把他们带上了船只，运往了埃及，把他们贩卖成了奴隶。

英王理查德一世在从巴勒斯坦返程的途中被他在东欧的敌人俘获，英国人付出了一大笔赎金才把他赎回来。一位法国国王在巴勒斯坦被俘，也支付了赎金。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溺死在了巴勒斯坦的一条河里。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十字军失去了所有的吸引力。人们对他们深感厌恶。耶路撒冷仍然在穆斯林的手中，但是欧洲的国王们和人民已不再愿意为了收复它而牺牲更多的生命和金钱了。从那时起，在长达约700年的时间里，耶路撒冷一直在穆斯林的手中。一直到了近代，世界

大战期间，即1918年，一名英国将军才从突厥人手中夺取了耶路撒冷。

在十字军东征后期，有一件非常有趣而又非同寻常的事。事实上，以“十字军东征”这个词的古代含义来说，它几乎算不上一次十字军东征。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二世（Emperor Frederick II）参加了十字军，但是他没有发动战争，而是拜访了埃及苏丹，他们达成了友好的共识！腓特烈二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在大多数国王还是文盲的时候，他就能通晓多种语言，包括阿拉伯语。他被称为“世界奇迹”。他根本不把教皇放在心上，于是教皇把他逐出了教会，但是这对他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因此，十字军东征没有取得任何胜利。但是，这场持续不断的战争削弱了塞尔柱突厥人。然而，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封建主义破坏了塞尔柱帝国的根基。封建大地主们认为他们可以实现独立，于是开始彼此争斗。有时候，他们甚至向基督徒请求帮助以相互对抗。正是由于突厥人内部的削弱，十字军有时候才能从中得利。然而，一旦出现萨拉丁这样的强大统治者，他们就无法取得任何进展了。

英国历史学家G. M.特里维廉（G. M. Trevelyan）最近提出了另一个关于十字军东征的观点（他就是你知道的“加里波第”丛书的作者）。这非常有趣。特里维廉认为：

> 就欧洲力量复兴而言，十字军东征是出于对东方的一种军事和宗教冲动。欧洲从十字军东征带回的战利品不是圣墓（Holy Sepulchre）的永久解放，也不是基督教世界的潜在统一，它的战利品是十字军东征的故事只是一个长长的否定。相反，它带回了更加精美华丽的艺术和工艺、奢侈品、科学和求知欲——这一切都是隐修士彼得最为鄙视的东西。

萨拉丁卒于公元1193年，古老的阿拉伯帝国的残余逐渐分崩离析了。西亚的很多地区由一些小封建领主统治，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中。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发生在公元1249年，由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IX）率领，但他被打败了，还沦为了囚犯。

与此同时，东亚和中亚正发生着重大的事件。蒙古人在一名强大首领成吉思汗的带领下，一直向前挺进，像一片巨大的乌云笼罩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十字军和防卫者们，基督徒和穆斯林们，都惊恐不已地看着这场侵略的到来。我们会在后面的信里讲述成吉思汗和蒙古人。

在我结束这封信之前，我想提一件事。在中亚的布哈拉居住着一位伟大的阿拉伯医生，他在亚洲和欧洲都很有名气。他的名字是伊本·西拿（Ibn Sina），欧洲人叫他阿维森纳（Avicenna）。他被称为“医王”。他卒于公元1037年，十字军东征开始之前。

我提到伊本·西拿是因为他的美名。但是，你要记住，在整个这段时间里，虽然阿拉伯帝国走向了衰落，但是阿拉伯文明一直在西亚和中亚的部分地区延续着。萨拉丁忙着与十字军交战的同时，也修建了许多学院和医院。但是，这个文明已处在突然崩溃和完全覆灭的前夕。蒙古人正从东方而来。

---

1. 这里指塞尔柱突厥人。——译者注
2. 这里指奥斯曼土耳其人。——译者注
3. 这里指塞尔柱突厥人。——译者注

63 ——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欧洲

在我的上一封信里，我们看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公元11、12和13世纪爆发了种种冲突。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在欧洲得到了发展，此时的基督教遍及了整个欧洲，最后一批到来的是东欧的斯拉夫人，即俄罗斯人（Russian）和其他民族。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我不知道它离真相有多远——在古老的俄罗斯民族成为基督徒之前，他们讨论了改变旧宗教信仰和接受新宗教的问题。他们听说有两个新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以，他们以一种非常现代的方式，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前去拜访了这两个宗教盛行的国家，观察审视他们，然后做出报告。据说，这个代表团拜访了伊斯兰教盛行的某些西亚地区，然后他们又前往君士坦丁堡。他们在君士坦丁堡的所见所闻让他们非常吃惊。希腊正教的仪式豪华绚丽，还伴有优美的音乐和歌唱。神职人员身着华丽的服饰，点燃了熏香。这个仪式给来自北方的这些思维简单、半文明的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伊斯兰教没有如此豪华绚丽的仪式，所以，他们决定主张信仰基督教，于是他们回国向国王做了汇报。因此，国王和他的人民就成了基督徒，因为他们是从君士坦丁堡吸收了基督教，所以他们信奉的是希腊正教，而不是罗马天主教。在以后的日子里，俄国都没有承认罗马教皇。

俄国的这个信仰转变发生在十字军东征很久之前。据说有一半保加利亚人曾一度成了穆斯林，但是后来，君士坦丁堡的吸引力占了上风。他们的国王与一位拜占庭公主联姻（你应该还记得拜占庭是君士坦丁堡的旧称），成了一名基督徒。同样，其他邻国民众也接受了基督教。

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欧洲正在发生着什么呢？你已经看到了，有些国王和皇帝出征前往巴勒斯坦，他们中的有些人在那里陷入了困境。同时，坐镇罗马的教皇发出了命令，号召发动一场针对“异教徒”突厥人的“圣战”。也许此时正是教皇权力的顶峰。我告诉过你，一位骄傲的皇帝是怎样赤脚站在了卡诺萨城堡外的雪地里，等待被教皇准许进入，向他祈求宽恕和原谅。这位教皇就是格列高利七世，他的原名是希尔得布兰德，他创建了一套教皇选举的新方式。在罗马天主教的世界里，红衣主教是拥有最高地位的神职人员。一个枢机主教团成立了——被称为神圣学院（Holy College）——由这个学院选举出新任的教皇。这个选举机制开始于公元1059年，一直持续到今天，也许其间做过一些调整和修改。甚至在今天，一旦教皇去世，枢机主教团就会立即召开会议，他们会坐在一个上锁的房间里，在选举结束之前，没有人能进去或出来。他们经常长时间地待在里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他们不能出来！所以，他们最后被迫达成一致，一旦教皇人选确定，就会立刻升起白烟，外面等待的人群就会得知消息。

教皇是由选举产生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同样由选举产生，但是他是由封建大领主选举产生。其中有7位被称为选帝侯。以这种方式，他们可以阻止皇帝总是来自同一个家族。然而，在实践中，一个家族往往会长时间地控制这些选举。

于是，我们发现在公元12、13世纪，霍亨斯陶芬王朝（Hohenstaufen）统治了这个帝国。我认为，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版图只包括德国的几个小城镇或小村落。这个家族原本来自他们取名的那个地方。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于公元1152年当上了皇帝，他就是腓特烈·巴巴罗萨，就是他在十字军东征途中溺死了。据说，他的统治时期是这个帝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候。对德国人而言，他一直都是英雄，一个半神话似的人物，有许多关于他的神话传说。据说，他睡在山上的一处深洞里，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就会醒来，然后走出山洞，去拯救他的人民。

腓特烈·巴巴罗萨针对教皇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斗争，却以教皇的胜利而告终，腓特烈只得弯腰服从。他是一位独裁统治者，但是他的封建大诸侯们制造了很多麻烦。一些大城市逐渐在意大利形成并发展起来了，腓特烈一世试图粉碎它们的自由。但是，他没有取得成功。在德国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大城市，尤其是在河流的两岸：科隆、汉堡、法兰克福和许多其他的城市。腓特烈一世在这些地方实施的政策是不一样的，他支持自由的德国城市，以此削弱贵族和封建领主的权力。

我好几次告诉过你什么是印度的王权思想。从古老的雅利安人时期到阿育王时期，从《政事论》到《政术精华》，国王必须服从民意的思想一直在不断地重复着。民众才是最终的主人。这就是印度的理念，虽然在实践中，印度的国王与世界各地的君主一样都是独裁者。我们把它与古老的欧洲理念比较一下。根据那个时期的律师所言，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威，皇帝的意愿就是法律。“皇帝就是地球上活的法律。”他们这样说。腓特烈·巴巴罗萨本人说：“给予诸侯法律不是为了人民，而是要服从他的命令。”

我们也把印度的观念与中国的观念比较一下。中国的皇帝或国王有一个夸张高调的头衔，如“天子”，但是这个一定不会误导我们。从理论上来说，中国皇帝的地位有别于手握全权的欧洲皇帝。中国古代的作家孟子这样写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然而，欧洲的皇帝被认为是地球上的至高无上者，由此出现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当然，事实上，他离至高无上的地位还相去甚远。他的封建诸侯们甚至一片混乱，我们看到，新的阶级在城市里逐渐形成，他们都要求获得某些权力。另一方面，教皇也宣称自己是地球上的至高无上者。凡是这两位“至高无上者”聚在一起的地方就一定会有麻烦。

腓特烈·巴巴罗萨的孙子也被称为腓特烈。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当上了皇帝，被称为腓特烈二世。他就是那个被称为“世界奇迹”的

人，也就是他前往了巴勒斯坦，与埃及苏丹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他与他的祖父一样，也公然反抗教皇，拒绝服从他。教皇将他逐出了教会以示报复。这是教皇古老而强大的武器，但是已经开始有点生锈腐蚀了。腓特烈二世毫不在意教皇的愤怒，世界也在发生着变化。腓特烈二世给所有的欧洲君主和统治者写了一封长信，指出教皇无权干涉皇帝，教皇的职责是负责宗教和精神事宜，而不是干预政治。他还叙述了神职人员的腐败。这是腓特烈二世与教皇之间最佳的争论。他的信非常有趣，因为这是现代精神出现在皇帝和教皇之间古老斗争的第一次迹象。

腓特烈二世对宗教非常宽容，阿拉伯和犹太哲学家们纷纷来到他的宫廷。据说，阿拉伯数字和代数（你应该还记得它们最初来源于印度）通过他传入了欧洲。他建立了那不勒斯（Naples）大学，在古老的萨勒诺（Salerno）大学里成立了了不起的医学院。

腓特烈二世的统治时间从公元1212年到1250年。随着他的驾崩，霍亨斯陶芬王朝对帝国的统治也结束了。事实上，这个帝国本身也结束了。意大利背弃脱离，德国四分五裂，可怕的无序混乱持续了数年。无主骑士和强盗四处抢掠洗劫，没有人能遏制他们。德国承受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巨大重担。在法国和英格兰，国王们逐渐巩固了他们的地位，镇压了棘手的封建大诸侯们。在德国，国王也是帝国的皇帝。他忙着与教皇或意大利城市做斗争，无法遏制他的贵族们。对于德王就是皇帝的这一荣誉使人心存疑虑，但是对此付出的代价是国内的软弱无能和分歧不和。早在德国统一之前，法国和英格兰就逐渐发展成了强大的国家。数百年来，德国一直有着无数的小诸侯。直到60年前，德国才实现了统一，即使如此小国王和小诸侯们仍一直存在。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才结束了这种局面。

在腓特烈二世死后的23年里，德国的局面一片混乱，没有选出一位皇帝。公元1273年，哈布斯堡王朝的伯爵（Count of Hapsburg）鲁

道夫（Rudolph）被推举为皇帝。现在一个新的家族——哈布斯堡家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它一直统治着这个帝国直到帝国结束。在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统治阶级的这个家族也覆灭了。在世界大战的时候，奥匈帝国（Austria-Hungary）的皇帝就是来自哈布斯堡家族，他名叫弗朗茨·约瑟夫（Francis Joseph）。他的年纪很老了，在位时间超过了60年。他的侄子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是王位的继承人，他和妻子于1914年在波斯尼亚（Bosnia，位于巴尔干半岛地区）的萨拉热窝（Serajevo）遭到暗杀。这场暗杀导致了世界大战的爆发，这场战争为很多事情画上了句号，其中就包括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

这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在这个帝国的西边，法国和英格兰经常处于相互交战的状态，更为频繁的是这两个国家的国王还要与国内的大贵族们开战。与德国的国王或皇帝相比，这些国王往往会打败他们的贵族，所以英格兰和法国发展成了越来越紧密统一的国家，统一增强了这两个国家的国力。

在这个时期，英格兰发生了一件大事，也许你曾读到过。英王约翰（King John）于公元1215年签署了《大宪章》（*Great Charter*）。约翰继任了他的哥哥“狮心王”理查一世的王位。他非常贪婪，却又十分软弱。他成功激怒了所有人。贵族们把他围困在泰晤士河（Tames）的兰尼米德（Runnymede）岛上，几乎是挥剑相向，迫使他签署了《大宪章》，其中包含了一个承诺，即他要尊重贵族和英格兰人一定程度的自由。这是英格兰在政治自由的长期斗争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进步。更重要的是，它规定国王在未经同级贵族依法审判的情况下，不能剥夺公民的财产和自由。由此出现了陪审制度，同级贵族被要求作出裁定。于是在英格兰，我们发现，国王的权力在早期就受到了限制。曾盛行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思想没有被当时的英格兰所接受。

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条在700多年前就被英国制定的法则并没有应用在1932年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今天，总督有权颁布法令、起草法律和剥夺人民的自由与财产。《大宪章》签署后不久，英格兰又发生了一件举世瞩目的事件。国家委员会逐渐发展起来，不同的乡村和城市派出骑士和公民组成了委员会。这就是英国议会（English Parliament）的开端。骑士和公民组成了下议院（Commons’House，又译平民院），贵族和地主组成了上议院（Lords’House，又译贵族院）。一开始，这个议会没有丝毫的权力，但是在逐渐发展。最终国王和议会之间关于谁是权力最高者的最后试验结果出现了，国王失去了他的领袖地位，议会成了无可争辩的主人。但是，这一切发生在大约400年后，即公元17世纪。

在法国也出现了一个议会，被称为“三级会议”（Council of the Tree Estates）。这三个等级分别是贵族、教会和人民。这个会议有时候会在国王的命令下召开。但是，它的召开并不十分频繁，它也没有取得像英国议会那样的权力。在法国，国王的权力被剥夺之前有一位国王还被砍下了头颅。

在东方，希腊人的东罗马帝国仍然维持着统治。从最早期开始，它就一直在和其他国家或民族打仗，它似乎经常处于崩溃的边缘。然而，它依然存活了下来，起初是北方蛮族的攻击，然后是穆斯林的攻打。从俄罗斯人到保加利亚人，到阿拉伯人，再到塞尔柱突厥人，在帝国所经受的所有攻击中，其中最致命的是十字军的进攻。与任何一个“异教徒”曾做的相比，这些基督教骑士给基督教君士坦丁堡带来了更大的伤害。东罗马帝国和君士坦丁堡再也没有从这场大灾难中恢复过来。

西欧世界对东罗马帝国一无所知，也对此毫不关心。东罗马帝国几乎不属于“基督教世界的范围”。东罗马帝国的语言是希腊语，而西欧的学术语言则是拉丁语。事实上，即使是在君士坦丁堡的衰落时

期，它也有着比西方世界更多的知识活动和文学作品。但是，这只是古老时期的知识，在其背后已经没有了任何活力或创造力。西方世界虽然不学无术，但它年轻且富有创造力，不久，这股力量就将在美丽作品的创造中迸发出来。

同在罗马一样，在东罗马帝国，教会和皇帝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也是独裁者，不可能出现任何自由。皇位是最强大者或最寡廉鲜耻者的战利品。通过谋杀和诡计，通过鲜血和罪恶，人们可以获得皇冠，人民愚蠢胆小地服从于他们。对于统治者而言，这似乎是一种无形的统治。

东罗马帝国像一名哨兵一样站在了欧洲的大门前，保卫着他们不受亚洲人的侵略。数百年来，它都获得了成功。阿拉伯人无法占领君士坦丁堡；虽然塞尔柱突厥人已经离得很近了，但并没有占领它；蒙古人绕过了它，一路北上直至俄国。最后到来的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公元1453年，这座帝国城市君士坦丁堡成了他们最大的战利品。随着这座城市的陨落，东罗马帝国也覆灭了。

64 ——欧洲城市的兴起

十字军东征时期是欧洲充满信仰、有着共同抱负和信条的伟大时期，人民在这种信仰和希望下，从他们每日的痛苦不幸中寻求着慰藉。此时没有科学，也几乎没有知识，因为信仰、科学和知识是不容易走到一起的。知识和学问使人们思考，怀疑和质疑很难成为信仰的同伴。科学的方法就是探究和试验的方法，它不是信仰的方法。我们会在以后看到这种信仰是如何被削弱，怀疑又是如何产生的。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信仰正在蓬勃兴旺地发展，罗马教会使自己成了“忠诚者的领袖”，还经常剥削他们。成千上万的“忠诚者”被派去参加了前往巴勒斯坦的十字军东征，却再也没有回来。教皇还开始宣布凡是在欧洲没有一切服从教皇的基督徒或组织，都要对其发动十字军的征伐。教皇和教会甚至通过颁布“特赦令”和经常出售“赎罪券”的方式来利用这种信仰。“特赦令”是指允许违背教会的某些法律或协议。于是教会制定的法律允许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被置之一旁。遵守这样的法律是不可能长久下去的。“赎罪券”则更为糟糕。根据罗马教会的说法，灵魂死后要进入炼狱，那是介于天堂和地狱之间的一个地方，灵魂要在这个地方为其在人世犯下的罪孽而承受痛苦，然后灵魂才能升入天堂。教皇向人民许诺，他们可以付钱逃脱炼狱，直接升入天堂。于是教会利用了无知人们的信仰，甚至犯下罪行，也就是所谓的罪孽，以此来赚取金钱。在十字军东征后，这种出售“赎罪券”的行为蔓延开来。它成了一个巨大的丑闻，这也是为什么有许多人反对罗马教会的原因之一。

奇怪的是，信仰单纯的人们，他们的忍耐力是如此巨大。这是因为在很多国家宗教成了最大最合算的生意之一。看看寺庙里的神职人

员吧，他们是多么努力地欺骗穷苦的拜神者啊。去恒河岸边吧，你会看见印度教学者拒绝表演某些仪式，除非不高兴的村民拿出钱来。无论一个家庭发生哪种情况——出生、结婚和死亡——神职人员都会走进这个家庭，索要金钱。

每一个宗教皆是如此——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琐罗亚斯德教。每一个宗教都有自己的方式从忠诚者的信仰中获取钱财。印度教的方式是显而易见的。在其他教里本来也是没有神职的，在过去，这并没能保护它的追随者免受宗教的剥削。但是，个人和阶级出现了，他们自称为宗教里的专业人士、学者、先生、大师等诸如此类的称呼。他们压迫剥削充满信仰的无知信徒。他们留着长长的胡须，或脑瓜顶上留有一撮头发，或前额上有一个长长的标记，或身着苦行僧的服装，或身穿遁世者黄色或赭色的衣服，这些都是通往神圣的通行证，这些就很容易地强加在了人们的身上。

如果你去美国，这个最先进的国家，你会发现那里的宗教是靠剥削来维持的大产业。

我已经远离了中世纪和信仰的时代，我们必须得回去了。我们发现，这种信仰已清晰可见，已具有了创造性的雏形。公元11、12世纪是一个伟大的建设期，大教堂纷纷拔地而起，遍布了整个西欧。一种欧洲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建筑出现了。通过灵巧的设计，沉重的屋顶的重量和压力被分散到了建筑物外面的扶壁上。令人惊讶的是，可以看见在建筑物的里面，纤巧精致的圆柱赫然支撑着巨大顶部的重量。这种穹顶借鉴了阿拉伯的建筑风格。在整个建筑物的上面，尖顶一直往上指向了天空。这就是哥特式（Gothic）的建筑风格，在欧洲逐渐形成和发展。这种建筑风格有着极其惊人的美丽，似乎代表了高涨澎湃的信念和渴望。它的确是代表了信念时代。只有那些热爱自己工作的建筑师和工匠，在伟大的事业上展开通力合作，才可能建造出这样的建筑物来。

哥特式风格在西欧的产生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情。在交织着无序混乱和无知狭隘的世界里居然能诞生出这样美丽的建筑物，几乎像是一位去往天堂的祈祷者。哥特式教堂几乎同时出现在了法国、意大利北部、德国和英格兰。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也没有人知道这些建筑师的名字。他们似乎更多地代表了所有人的共同愿望和努力，而不是代表某一位建筑师。另一个新事物则是教堂窗户的彩色玻璃。绚丽多彩的颜色在这些窗户上描绘出了精美的图案，光线透过窗户照进来，为整个建筑物增添了庄严敬畏的效果。

不久前，在我最近的一封信里对欧洲和亚洲做了比较。我们看到，在那个时期，亚洲远比欧洲有着更高水平的文化和文明。然而，在印度却没有出现太多的创造性作品，而我认为创造力是活力的标志。出自半文明的欧洲的哥特式建筑向我们展示了充满了勃勃生机的欧洲。尽管文明的混乱无序和倒退落后带来了种种困境，但是这种活力突然出现了，并找到了自我表现的方式。哥特式建筑物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随后，我们会看见这种风格也出现在绘画、雕刻和对冒险的热爱里。

你已经见过一些哥特式大教堂，我想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它们。你参观过德国科隆的美丽大教堂，在意大利的米兰（Milan）有一座非常精美的哥特式大教堂，法国的沙特尔（Chartres）也有一座。但是，我没法一一说出所有地方的大教堂。这些大教堂遍布了德国、法国、英格兰和意大利北部。奇怪的是，罗马却没有著名的哥特式建筑物。

公元11、12世纪是伟大建筑的时期，然而在这一时期也修建了一些非哥特式的教堂，如佛罗伦萨大教堂（Florence Cathedral），还有你见过的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St. Mark），它可能是拜占庭作品的典范，有着美丽迷人的镶嵌图案。信仰的时代衰落了，教堂和大教堂修建的数量也跟着减少了。人们的思想转到了其他的方向，转到了商业和贸易上，转到了市民生活之中。大教堂已经不再修建，取而代

之的是市政厅。所以，我们发现，从公元15世纪初开始，华美的哥特式市政厅或会馆在北欧和西欧建立起来了。在伦敦，英国的国会大厦（Houses of Parliament）就是哥特式的，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落成的。我有一个想法，最初的哥特式建筑物已经被焚毁，后来修建了另一座也是哥特式的建筑物。

这些出现在公元11、12世纪的伟大的哥特式大教堂都坐落在各个城镇和城市里。古老的城市正在觉醒，新的城镇正在形成。整个欧洲都在发生着变化，各地的城镇生活正逐渐增多。当然，在过去的罗马帝国时期，大型城镇则坐落在地中海沿岸。但是，随着博尔纳和希腊-罗马文明的衰落，这些城镇也衰败了。除了君士坦丁堡和阿拉伯人统治的西班牙以外，欧洲几乎没有一座大城市。在亚洲——印度、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大城市在这个时期却非常繁荣。但是，欧洲没有这样繁华的城市。城市、文化和文明似乎是相辅相成的。在罗马秩序倾塌后，欧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出现城市、文化和文明。

但是现在城市生活再次复苏了。尤其是在意大利，城市形成并得到了发展。它们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身边的一根刺，因为它们不愿意曾拥有过的某些自由遭到压制。在意大利和欧洲各地的这些城市代表了商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崛起。管辖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的威尼斯成了一个自由共和国，它像现在一样美丽，大海滚滚而来，沿着蜿蜒的运河，最后又流入了大海，据说在这座城市建立之前，这儿曾是一片沼泽地。当匈人王阿提拉带着火与剑入侵了阿奎莱亚（Aquileia）时，一些逃亡者竭力逃向了当时还是沼泽地的威尼斯。他们在那儿建起了威尼斯城，虽然这座城市位于东西罗马帝国之间，但它尽力地维持了自由。贸易从印度和东方来到了威尼斯，并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威尼斯建起了一支海军，成了海上强国。它是一个由富人组成的共和国，国家首脑称总督。这个共和国一直持续到了公元1797年；在这一年，拿破仑以征服者的姿态攻入了威尼斯。据说，当

时的总督年纪已经非常大了，他在沦陷的那一天倒地身亡。他就是威尼斯的最后一任总督。

热那亚位于意大利的另一头，是航海者的一个大型贸易城市，也是威尼斯的竞争对手。在这二者之间有博洛尼亚（Bologna）的大学城、比萨（Pisa）、维罗那（Verona）和佛罗伦萨（Florence），不久佛罗伦萨将培育出许多伟大的艺术家，将在著名的美第奇家族（Medici）的领导下放射出灿烂的光芒。米兰也位于意大利北部，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制造中心；而在南部，那不勒斯正在逐渐发展壮大。

雨果·卡佩把首都设在了法国巴黎，这座城市随着法国的发展而发展。巴黎一直都是法国的大本营和心脏地带。其他国家也有首都，但是在过去的1000年，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像巴黎主宰法国那样主宰自己的国家。法国还有其他重要的城镇，如里昂（Lyons）、马赛（Marseilles，曾是一个古老的港口）、奥尔良（Orleans）、波尔多（Bordeaux）、布伦（Boulogne）等。

德国与意大利一样，自由城市的发展最为引人瞩目，尤其是在公元13、14世纪。这些城市的人口增长了，随着它们实力和财富的累积，它们越发大胆，敢于与贵族抗争。有时候皇帝还会鼓励它们这样做，因为他想抑制大贵族的实力。这些城市为了自卫还组成了大型的商业联盟和协会。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协会或联盟有时候会发动战争以抵制贵族联盟。汉堡、不来梅港（Bremen）、科隆、法兰克福、慕尼黑（Munich）、但泽（Danzig）、纽伦堡（Nuremberg）和布雷斯劳（Breslau）是其中一部分正在发展的城市。

尼德兰（Netherlands，即今天的荷兰和比利时）的城市有安特卫普（Antwerp）、布鲁日（Bruges）和根特（Ghent），这些贸易城市的商业活动日益增加。当然，还有英国的伦敦，但是，它在城市面积、财富积累和贸易活动方面是不能与重要的大陆城市一较高下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作为学术的中心，其地位越来越重要。欧洲东部

城市维也纳是欧洲的古老城市之一；在俄国有大城市莫斯科（Moscow）、基辅（Kiev）和诺夫哥罗德（Novgorod）。

这些新城市，或者是其中的大部分城市，肯定和旧式的帝国城市是有区别的。欧洲新兴城市的重要性不是由于皇帝或国王，而是由于它们自己控制的贸易活动。因此，它们的力量不是来自贵族阶级，而是来自商人阶级。它们都是商业城市。所以，这些城市的兴起意味着中产阶级的兴起。我们会在后面看到，这个中产阶级的实力在不断壮大，最后它成功地挑战了国王和贵族，还从他们手中夺取了权力。但是，这发生在我们目前谈论内容的很久以后了。

我说过，城市和文明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城市的发展，知识会发展，自由的精神也会发展。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们零星分散，往往十分迷信。他们似乎受到了自然环境的支配，不得不努力工作，几乎没有闲暇时间，他们也不敢不服从他们的领主。在城市里，大批的人居住在一起，他们有机会过上更文明的生活，接受更开化的教育，更有教养地讨论和批判，也有机会去思考。

所以，自由精神不断地发展，与封建贵族代表的政治权威、与教会代表的精神权威背道而驰。信念时代衰落了，质疑的思想出现了。人们不会一直盲目地服从教皇和教会的权威。我们已经看到皇帝腓特烈二世是怎样对待教皇的，我们还会看到反抗精神的发展状态。

从公元12世纪开始，出现了知识的复兴。欧洲的有学之士通常使用拉丁语，人们为了探求知识，从一所大学游学到了另一所大学。伟大的意大利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出生于公元1265年。意大利的另一位伟大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h）出生于公元1304年。不久以后，英国伟大诗人的先驱乔叟（Chaucer）在英格兰成长起来了。

但是，比知识复兴更为有趣的是科学精神在错误中诞生了，它将在数年后的欧洲得到蓬勃发展。你应该还记得，我告诉过你阿拉伯人有这样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以此为依据进行劳动和工作。在中世纪，富有探究精神的开明思想和大胆试验是很难在欧洲生存下去的。教会对此是无法容忍的。但是，尽管有教会的压制，科学精神还是开始崭露头角了。在这个时期的欧洲，在第一批拥有这种科学精神的人当中，有一位是英国人，名叫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他生活在公元13世纪的牛津。

65 ——阿富汗人入侵印度

昨天我给你写信的时候受到了打扰。当我坐下来写信时，我会忘记监狱和周遭的一切，我的思想飞快地回到了中世纪时期的世界。但是，我被更快的速度拉回了现实，我非常痛苦地意识到我仍然待在监狱里。我被告知上面下了命令，禁止我一个月内与你妈妈还有我的母亲(注)见面。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原因。为什么要告诉一个囚犯原因呢？她们在台拉登待了10天了，正等待着下一次同我见面的日子，而现在她们的等待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她们只得返回。这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好吧，好吧，我们不必介意。这就是一天所有的工作，监狱就是监狱，我们最好也别忘记这一点。

被这粗鲁行为刺激后，我不可能忘记现在又回到过去的历史里。但是，休息了一晚上后，我今天感觉稍微好点了，所以，我又重新给你写信了。

我们现在应该回到印度了，我们已经离开得太久了。当欧洲试图挣脱中世纪的黑暗时；当那里的人们被封建制度的重担所压迫，到处是无序无政府的混乱局面时；当教皇和皇帝相互斗争，欧洲国家逐渐形成时；当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争夺统治权时：印度正发生着什么呢？

我们已经大体回顾了中世纪早期时候的印度。我们还看到苏丹马哈茂德从西北方的加兹尼而来，突然袭击了北印度的富饶平原地区，大肆抢掠和破坏了这些地区。虽然马哈茂德的入侵十分可怕，但没有给印度造成巨大或持久的改变。他们使这个国家大为震惊，尤其是北部地区，无数精美的纪念碑和建筑被他摧毁了。但是，只有信德和旁

遮普的部分地区沦为了加兹尼帝国（Empire of Ghazni）的一部分。其他北部地区很快就恢复了，南部地区则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孟加拉也是如此。在马哈茂德之后长达15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穆斯林或伊斯兰教在印度都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公元12世纪末（大约在公元1186年），印度西北方出现了一波新的入侵。阿富汗出现了一位阿富汗人首领，他攻占了加兹尼，结束了加兹尼帝国。他就是古尔的希哈卜丁（Shahab-ud-din Ghuri，古尔是阿富汗的一个小镇）。他攻占了拉合尔，随后又率军到达了德里。德里的国王是普利特维拉吉·乔罕（Prithwi Raj Chauhan），在他的领导下，北印度的其他首领一起抵抗并完全打败了敌军。但是，胜利持续的时间并不长。第二年，希哈卜丁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卷土重来，这一次他打败并杀死了普利特维拉吉。

普利特维拉吉仍然是一位受人爱戴的英雄，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和歌曲。其中最有名的是他和曲女城国王阇那旃陀罗（Jaichandra）的女儿私奔的故事。但是，私奔使他尝尽了苦头。这场私奔使他损失了最勇敢的追随者们的生命，还招来了一位强大国王的敌意。它播下了纷争倾轧和相互冲突的种子，因此，入侵者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

于是，在公元1192年，希哈卜丁取得了第一次大胜利，使穆斯林建立了在印度的统治。侵略者开始逐渐向东方和南方扩张。在此后约150年（到公元1340年）的时间里，穆斯林的统治覆盖了南印度大部分地区。然后，它开始在南部缩小了范围。新的国家出现了，有的是伊斯兰教国家，有的是印度教国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信奉印度教的维贾亚纳加尔帝国（Vijayanagar）。在某种程度上，伊斯兰教在200年的时间里逐渐失势，直到公元16世纪中叶，伟大的阿克巴即位，伊斯兰教才开始再次得以传播，几乎覆盖了整个印度。

穆斯林入侵者的到来对印度造成了许多影响。你要记住，这些侵略者是阿富汗人，不是阿拉伯人，不是波斯人，也不是有着文化和高度文明的西亚穆斯林。从文明这个角度来看，与印度人相比，这些阿富汗人比较落后，但是，他们精力充沛，比那个时期的印度人更加生机勃勃。印度人太过于墨守成规了，一直没有任何的改变和进步。它印度人坚持古老的方式，不愿做任何自我提升的尝试。甚至在战斗方法上，印度也极为落后，而阿富汗军队组织更加有效。所以，尽管古老的印度人有勇气、敢牺牲，但在穆斯林侵略者的面前溃败了。

一开始，这些穆斯林十分凶狠残暴。他们来自一个冷酷无情、不太欣赏“柔弱”的国家。此外，他们身处一个刚刚被征服的国家里，周围都是敌人，也许随时都会发生起义。害怕造反的心理一定是时时存在的，害怕往往就会导致残暴和恐怖行为的发生。于是，出现了使人民屈服的大屠杀。不是由于宗教信仰，一个穆斯林只杀死了一个印度教教徒，而是一个外来征服者试图粉碎被征服民族的精神意志。宗教几乎总是用来解释这些残暴无道的行为，但这是不正确的。有时候宗教被当成了一个挡箭牌，真正的原因却是政治或社会原因。来自中亚的人们侵略了印度，即使是在他们的家乡，即使早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他们也非常凶狠残忍。在征服了一个新国家以后，他们只知道用一种方式维持他们的统治——那就是恐怖政策。

然而，逐渐地，我们发现印度教化并软化了这些凶狠的武士。他们开始觉得自己似乎是印度人了，不再是外来的侵略者。他们与印度的妇女通婚，入侵者和被入侵者之间的差距逐渐减小了。你会有兴趣知道，据说，北印度史上最强大的破坏者加兹尼的马哈茂德是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者”的支持者。他有一支印度人军队，由一位名叫蒂拉克（Tilak）的印度将军指挥。他带领蒂拉克和这支军队回到了加兹尼，并利用他们镇压了反叛的穆斯林。所以，你会看到马哈茂德的目标就是征服。在印度，他在穆斯林士兵的帮助下打算杀死“偶像崇拜者”；在中亚，他在他的印度士兵的帮助下同样打算杀死穆斯林。

伊斯兰教震动了整个印度，它给整个毫无进步可言的社会带来了进步的活力和推动力。早已呈现出颓废和病态的迹象、过于关注重复和细节的印度艺术，在北方却正在发生变化。一种充满了勃勃生机和活力、或许被称为印度穆斯林的新艺术形式出现了。旧时的印度建筑大师从穆斯林带来的新思想里获取了灵感。穆斯林崇尚简朴生活的信条和观点影响了当时的建筑风格，简洁高贵的设计又回到了印度建筑当中。

穆斯林入侵造成的第一个影响是人们大批逃亡到了南方。在马哈茂德的入侵和大屠杀后，穆斯林用野蛮残暴和摧毁破坏的方式把他们与北印度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当新的侵略到来且无法阻止的时候，大批技艺精湛的手工业者和有学之士逃往了南印度。这给南方的雅利安文化带去了巨大的推动力。

我告诉过你一些南印度的情况。遮娄其王国从公元6世纪中叶开始，在往后的200年里一直都是西部的主宰力量和中心（马哈拉施特拉地区）。玄奘曾拜访过当时的统治者普拉凯辛二世（Pulakesin II）。后来，罗湿陀罗拘陀国打败了遮娄其王国，统治了南部200年之久，从公元8世纪开始到公元10世纪末为止。罗湿陀罗拘陀国与信德的阿拉伯统治者保持了非常友好的关系，很多阿拉伯商人和旅行者来到了罗湿陀罗拘陀国。其中一位旅行者记录下了他的旅程。他告诉我们，当时（即公元9世纪）罗湿陀罗拘陀国的统治者是全世界4位伟大的君主之一。他认为其他3位伟大的君主分别是巴格达的哈里发、中国皇帝、罗马皇帝（也就是君士坦丁）。这有趣地展现了当时在亚洲普遍流行的观点。因为当时的巴格达正处于荣耀和强盛的顶峰，一名阿拉伯旅行者把罗湿陀罗拘陀国同哈里发帝国相比较，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注]一定非常强盛或强大。

公元10世纪（公元973年）罗湿陀罗拘陀国再次被遮娄其王国取代，后者又统治了200多年（直到公元1190年）。有一首长诗是关于其

中一位遮娄其王国的国王的，它讲述了这位国王在一次公开的选婿大典(注)上被他的妻子选中。有趣的是，我们发现这个古老的雅利安习俗流传了如此之长的时间。

泰米尔国位于印度较远的南部和东部地区。从公元3世纪到9世纪，帕拉瓦人统治了约600年；从公元6世纪中叶起，他们统治了南部地区约200年。你应该还记得，这些帕拉瓦人派出了殖民远征队，远赴马来群岛和东部岛屿。帕拉瓦王朝的首都是建志补罗（即现代的康捷瓦拉姆），在当时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即使是现在，它也以其富有智慧的城市规划而闻名遐迩。

公元10世纪初，帕拉瓦王朝向野心勃勃的朱罗王朝屈服了。我向你讲述过罗阇罗阇一世和拉金德拉一世统治下的朱罗帝国的一些历史，他们建立了大型的舰队，远征了锡兰、缅甸和孟加拉。在我们所知的资料中，更有趣的是他们也有选举产生村务委员会的体制。这个体制从底层开始建立，村落联盟选举产生负责各项事务的委员会，也选举产生区联盟。几个区组成了一个省。在这些信里，我经常强调这个村务委员会体制，因为它是古老雅利安政治形态的支柱。

大约在阿富汗人侵略北印度的时候，朱罗王朝在南印度占据了统治地位。然而，不久它就开始衰落，附属于这个王朝的一个小国独立了并日益强大。它就是潘地亚国，马杜赖是它的首都，加异勒（Kayal）是它的港口。一名来自威尼斯的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分别于公元1288年和1293年来到了加异勒港口，我会在后面更多地谈到他。他是这样描述这座城镇的：“一座伟大高贵的城市”，到处是来自阿拉伯半岛和中国的船只，到处都是生意往来的嗡嗡叫喊声。马可本人也是从中国乘船来到此地的。

马可·波罗还告诉我们，最精致的棉布就出自印度的东海岸，它们“看起来像是蜘蛛网织成的织锦”。

马可·波罗还提到了一位女士——鲁达玛德维（Rudramani Devi），她是泰卢固（Telugu）的女王——泰卢固位于马德拉斯北部的东海岸，这位女士统治了泰卢固40年，马可·波罗给予了她高度的评价。

从马可·波罗那里我们还得知了另一条有趣的信息，那就是大量的马匹通过海路从阿拉伯半岛和波斯进口到了南印度。南方的气候不太适合马匹的饲养。据说，为什么侵略印度的穆斯林是更优秀战士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拥有更优良的马匹，他们控制了亚洲优良的饲养马匹的地区。

公元13世纪，当朱罗王朝衰落的时候，潘地亚国成了居于领导地位的泰米尔政权（Tamil Power）。公元14世纪初期（公元1310年），穆斯林的侵略步伐到达了南部地区，并攻入了潘地亚国，潘地亚国很快就覆灭了。

在这封信里，我回顾了南印度的历史，也许重复了我以前讲述过的内容。但是，主题稍显混乱，帕拉瓦王朝、遮娄其王国、朱罗王朝和其他地方的人们都混在了一起。然而，如果你把它们看成一个整体的话，你也许能在脑海里勾勒出一个大体的框架。你应该还记得，阿育王统治了整个印度（除了最南端的一小块地区）、阿富汗和部分中亚地区。在他死后，印度南方出现了安得拉政权，这个国家的面积跨过了德干高原，统治了400年之久。在这个时期，贵霜人在北印度的交界地区建立了一个帝国。随着泰卢固安得拉国（Telugu Andhras）的衰落，泰米尔帕拉瓦国（Tamil Pallavas）在东海岸和南部地区逐渐强大起来，统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在马来西亚建立了殖民地。在统治了600年后，他们向朱罗王朝屈服了；当时的朱罗王朝征服了不少遥远的地区，它的海军在大海上所向披靡。300年后，朱罗王朝从历史上消失了，潘地亚国脱颖而出，城市马杜赖发展成了文化中心，加异勒成了一个大型而繁忙的港口，与其他遥远的国家保持着往来。

这就是到目前为止印度南部和东部地区的历史。在西边的马哈拉施特拉地区，先是遮娄其王国，然后是罗湿陀罗拘陀国，然后又是遮娄其王国。

所有这些都仅仅是一个个名字而已。但是想一想，这些王国持续统治了这么长时间，并且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相较于欧洲国家，似乎是内在的力量给予了这些国家更多的安稳与和平。但是，这样的社会结构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安稳的状态早已消失殆尽。公元14世纪初，当穆斯林军队南下的时候，它很快地就被颠覆了。

---

1. 英迪拉的祖母。
2. 罗湿陀罗拘陀国的疆域主要是马哈拉施特拉地区，为避免歧义，故此处做了调整。——译者注
3. 在古代印度，这是一种习俗，国王的女儿会在一个集会上选择她的夫婿，所有符合条件的国王和王子都会被邀请参加。

66 ——德里的奴隶王

我和你说过加兹尼的马哈茂德的情况，也谈到了诗人菲尔多西，他在马哈茂德的要求下用波斯文写下了《列王纪》。但是我没有告诉你，在马哈茂德时期还有一位杰出的人物，这人跟随菲尔多西一起来到了旁遮普。他就是阿尔贝鲁尼（Alberuni），一位饱学之士和学者，他与当时凶狠狭隘的武士有着极大的不同。他游历了整个印度，努力去了解这个新国家和它的人民。他十分欣赏印度的观念，于是他学习了梵文，自己攻读学习相关书籍——主要是印度教典籍。他研习了印度的哲学和当时教授的科学和艺术。《薄伽梵歌》（*Bhagawad Gita*）是他最喜爱的典籍。他前往南方，到了朱罗帝国，对他所见到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极为赞赏。关于他在印度四处游历的记录是我们所拥有的古代最伟大的游记书籍之一。在破坏、屠杀和狭隘交织的一片混乱中，他非常引人瞩目，也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他仔细观察，认真学习，试图找到真理的所在。

阿富汗人希哈卜丁打败了普利特维拉吉，此后相继出现了一连串德里苏丹，他们被称为“奴隶王”（Slave King）。第一个奴隶王是古特伯乌德丁（Qutub-ud-din）。他曾是希哈卜丁的一名奴隶，但是奴隶也可以跻身于高位，他通过努力，成了德里的第一位苏丹。在他后面的其他几任苏丹最初也是奴隶，因此这个王朝被称为“奴隶王朝”。他们全都十分凶猛，四处征战，大肆破坏建筑物和图书馆，还同时大兴恐怖手段。他们也钟爱建筑，喜欢修建巨大的建筑物。古特伯乌德丁开始修建了古特伯高塔，你现在还能清楚地看到这座位于德里附近的高塔。他的继任者伊尔杜特米什（Iltutmish）完成了此塔的修建工作，还在其附近修建了美丽的拱门，这些拱门至今都还在。这

些建筑物的材料几乎都来自古老的印度建筑，主要是来自寺庙。当然，建筑师也都是印度人，但是，我告诉过你，他们极大地受到了穆斯林带来的新观念的影响。

从加兹尼的马哈茂德开始，每一个来到印度的入侵者都带走了大批印度的工匠和建筑师。就这样，印度建筑的影响在中亚传播开来了。

阿富汗人轻而易举地征服了比哈尔和孟加拉。他们勇敢无畏，完全使防守者措手不及，这就是大无畏精神经常得到的回报。征服孟加拉几乎与征服美洲的科尔特斯（Cortes）和皮萨罗一样，令人惊讶不已。

在伊尔杜特米什统治期间（公元1211——1236年），印度边境地区上空笼罩着一朵巨大的恐怖乌云，它就是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人。成吉思汗为了追赶一个敌人来到了印度河畔，但是他停了下来。印度逃过了劫难。大约200年后，他的一个后代帖木儿（Timur）侵入印度，展开了大肆的屠杀和破坏。但是，虽然成吉思汗没有侵略印度，但是很多蒙古人入侵了印度，甚至还来到了拉合尔。他们带来了恐惧，甚至苏丹也惊恐不已，有时候不得不贿赂他们。他们中的数千人定居在了旁遮普。

在这些苏丹中，有一名女性名叫拉齐亚（Razia），她是伊尔杜特米什的女儿。她似乎是一个能力出众的人，还是一名勇敢的战士，但是，她要面对凶猛的阿富汗人贵族和更凶残的蒙古人对旁遮普的入侵，为此她度过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

公元1290年，奴隶王的统治结束了。不久后，阿拉丁·卡尔吉（Ala-ud-din Khilji）用温和的方式谋杀了他的叔叔，也是他的岳父，登上了王位。他继续用同样的方式谋杀了所有他怀疑对他不忠的穆斯林贵族。他害怕蒙古人图谋不轨，于是命令杀掉领土内的每一个

蒙古人，这样的话，“这个种族里没有一个人应该活着留在大地上”。所以，有两三万人遭到屠杀，其中绝大部分人当然都是无辜的。

我担心，我一再提到这些大屠杀会让人感觉不舒服。从更宽阔的历史视角来看，它们也不是十分重要。但是，它们能帮助人们认识到，当时北印度的情况远非安全或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还倒退回到了野蛮时代。伊斯兰教给印度带来了一定的进步，穆斯林阿富汗人却带来了野蛮。许多人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但还是应该把它们分清楚。

阿拉丁也心胸狭隘，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但是，在印度的中亚统治者们的观点似乎正在发生着变化。他们开始把印度视为他们的家园。他们不再是这里的陌生人了。阿拉丁与一名印度女子结婚了，他的儿子也娶了位印度妻子。

在阿拉丁统治时期，他似乎努力营造了一个有效的政府体制。尤其是为了调动军队，保持了高效率的通讯线路，军队是阿拉丁特别看重的。他建立了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凭借这支军队，他征服了古吉拉特和南方的大部分地区。他的将军从南方带回了大量的财宝。据说，他带回了5万莫恩德（maunds）注的黄金、大量的宝石和珍珠以及2万匹马和312头大象。

奇图尔是浪漫和侠义之乡，充满了勇敢无畏的精神，但是他们墨守成规，作战方式陈旧，阿拉丁高效的军队彻底把他们击垮了。公元1303年，奇图尔被占领。但在这之前，城堡里的男男女女遵循了古老的习俗惯例，进行了可怕的“角哈祭”（jauhar）注。根据习俗，当失败迫近，又无其他出路之时，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更好的方式是男人们走出去，战死沙场，而女人们则自焚殉节。这是相当可怕的事情，尤其是对女性而言。如果女人们也能走出去，拿起武器，战死沙

场，那岂不是更好？但是，考虑到征服在那个时代的意义，战死沙场无论如何都比被奴役和落魄更可取。

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人民从信仰印度教慢慢地改信了伊斯兰教。这个过程不会很快。有些人改变了宗教信仰，是因为伊斯兰教吸引了他们，有些人是因为害怕，有些人则是因为天性使然，选择站在胜利者的一边。但是，改变信仰的主要原因还是经济。非穆斯林必须缴纳一种特殊的税，即人头税，也被称为“jezia”。对穷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很多改变宗教信仰的人就是为了逃税。阶级地位较高的人则是为了赢得当局的好感和获取高位，这才是他们改变信仰的巨大推动力。阿拉丁的那位征服了南方的大将军马利克·卡富尔（Malik Kafur），就是从印度教改信了伊斯兰教。

我一定告诉过你德里的另一位苏丹，一个最非比寻常的人，他就是穆罕默德·伊本·图格鲁克（Mohammad bin Tughlaq）。他同时在波斯语（Persian）和阿拉伯语上都极其博学且成就非凡。他研习过哲学和逻辑学，甚至还研习过古希腊哲学。他还知道一些数学、科学和医学方面的知识。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在他的时代，他就是尽善尽美的学习典范，是一个奇迹。可是，这个典范又是一个极其残酷的怪物，似乎是个十足的疯子！他杀死了他的亲生父亲，登上了王位。他有着征服波斯和中国的奇异念头。自然，这些念头给他带来了灾难。但是，他最出名的大胆行为是他决定毁掉德里，他自己的首都，因为城里有些人竟敢用匿名的方式批评他的政策。他命令首都从德里迁到南方的德瓦吉里（Deoghiri，现在的海得拉巴国）境内[注]。他称这个地方为道拉塔巴德（Daulatabad）。这个地方的居民们获得了一些房屋赔偿，然后每个人无一例外地被命令三天内必须离开这座城市。

绝大多数人离开了，有些人藏了起来。当他们被发现后受到了残酷的处罚，尽管其中有一个是盲人，还有一个是瘫痪的。从德里迁往

道拉塔巴德总共花了40天时间。有人认为，在这次迁徙途中，人们的境况一定非常糟糕，肯定有很多人倒毙在了迁徙途中。

德里这座城市变成什么样子了呢？两年后，穆罕默德·伊本·图格鲁克想重新移民德里，但没有成功。一位见证者告诉我们，他之前的所作所为已经使这个地方变成了“完美的沙漠”。一座花园要变成一块荒地是很快的，但是要想把荒地变成花园却不是那么容易。一位非洲的摩尔人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uta）跟随苏丹返回了德里，他说：“它是宇宙间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当我们步入首都，我们发现它确实是描述中的那个样子，空空荡荡，已被遗弃，只有很少的人口。”还有一个人描述了这座长达8或10英里的城市：“一切都被毁掉了，全都是废墟，城里的建筑物里、宫殿里或郊外连一只猫或一条狗都没有留下。”

这个疯子以苏丹的身份在位25年，直到公元1351年。无论统治者们是多么欺诈无赖、残酷无道和庸碌无能，人民居然还能一直忍受，这真是让人吃惊。但是，尽管人们奴性十足，但是穆罕默德·伊本·图格鲁克的帝国还是崩塌了。这个国家毁于他的疯狂想法和沉重的赋税。饥荒出现了，最后引发了动乱。甚至在他的有生之年，从公元1340年起，帝国的大地区都纷纷独立了。孟加拉也独立了。在南方出现了若干个国家，其中最主要的是建立于公元1336年的印度教国家维贾亚纳加尔；它在10年内就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在德里附近，你现在仍然能看见穆罕默德的父亲修建的杜格拉卡巴德（Tughlaqabad）的遗迹。

---

1. 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及某些中东国家使用的一种重量单位。——译者注
2. 一种集体自杀仪式。——译者注
3. 海得拉巴于公元1948年并入印度，作者写这封信时它还是一个国家。——译者注

67 ——成吉思汗震动了亚欧

在我最近的几封信里，我多次提到了蒙古人，惊厥于他们带来的恐惧和破坏。在中国，我们对宋朝历史的讲述停在了蒙古人来临的时期。在西亚，我们又一次遇到了他们，这时正是旧秩序结束的时候。在印度，奴隶王逃过了他们的视线，但是他们仍然带来了动荡和骚乱。整个亚洲似乎都被这些蒙古来的游牧民族带入了恶化衰落之中。不仅仅是亚洲，欧洲的一半地区也是如此。这些突然冒出来且震骇了世界、令人惊异的人到底是谁呢？斯基泰人、匈人、突厥人和鞑靼人——全部来自中亚——已经在历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其中有些人仍然表现突出，例如西亚的塞尔柱突厥人、中国北方以及其他地方的鞑靼人。但是，到目前为止，蒙古人还没有任何显眼的举动。在西亚，可能没有人对这个民族有太多的了解。他们来自蒙古境内许多不起眼的部落，隶属于曾征服了中国北方的女真族。

他们似乎突然就得到了某种力量，分散的部落联合起来，选出了一位首领，即大可汗，他们向他宣誓效忠和臣服。在他的带领下，他们攻进了北京，结束了金国的统治。他们又向西进发，一路上横扫了途中所遇到的各个大国。他们来到了俄国，并征服了它。后来，他们彻底摧毁了巴格达和它的帝国，一直进军到波兰和中欧。他们所向披靡，无人能挡。印度十分偶然地躲过了这场浩劫。你可以想象，面对这场火山爆发式的灾难，欧亚世界该是多么惊异。这几乎就像一次自然大灾难，比如地震，人们在它面前完全是束手无策。

这些来自蒙古的游牧民族，男男女女都很强壮，习惯了艰苦的生活，居住在亚洲北部广阔大草原上的帐篷里。但是，如果他们没有选出一位最卓越超群的首领，那么他们的力量和艰苦的磨难也许不会产

生多大的作用。这位首领就是成吉思汗（这个名字有很多种拼写：Genghiz、Jenghiz、Jengiz Khan）。他出生于公元1155年，原名铁木真。当他还是小孩时，他的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就去世了。顺便说一下，“把阿秃儿”是蒙古贵族最喜欢取的名字，意思是“英雄”。我认为“Urdu bahadur”（乌尔都阁下）一词就来源于此。

虽然他只是一个年仅10岁的小男孩，也没有人帮助他，但是他一直不断地努力奋斗，最终取得了成功。他一步步前进，直到最后，在被称为“库里尔台”的蒙古人集会上，他被推举为大可汗或皇帝。这发生在他被尊称为“成吉思汗”的几年前。

公元13世纪，有人写下了《蒙古秘史》（*A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 People*）一书，这本书于公元14世纪在中国出版，书中描述了这次选举：

> 所以，在元年丙寅(注)，居住在蒙古包里的所有后代子孙在一个权威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了，他们聚集在斡难河（Onon）源头附近，举起九纛（即九足白旗），授予了成吉思汗“可汗”的头衔。

当成吉思汗被推举为大可汗时，他51岁了，已不再年轻，大多数人在他这个年龄都想过上和平安静的生活。但是，他的征服霸业才刚刚开始。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大多数伟大的征服者是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他们的征途。这也提醒了我们，成吉思汗不是简单地因年轻气盛而纵横亚洲的。他已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中年人了，他做的每一件大事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和精心准备。

蒙古人是游牧民族，讨厌城市以及城市的生活方式。许多人认为，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所以他们一定是野蛮人。但这一观念是错误的。当然，他们对城市艺术了解不多，但是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

生活方式和复杂的组织形式。如果他们在战场上赢得了大的胜利，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数众多，而是因为他们的纪律和组织。总之，这要归功于成吉思汗杰出的统帅才能。毫无疑问，成吉思汗在历史上是最伟大的军事天才和领导者。亚历山大大帝和恺撒大帝在他面前似乎都显得微不足道。成吉思汗本人不仅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指挥官，他还训练出了很多将军，使他们成了杰出的指挥官。虽然远离故土数千英里，环视周围的是敌人和抱有敌意的人们，但是他们还能不断地打败占有优势的敌人，不断地取得战争的胜利。

当成吉思汗纵横亚欧时，亚欧的版图是什么样子的呢？位于蒙古以东和以南的中国早已四分五裂。在南方是南宋，南宋人一直在坚持抵抗；在北方是金人或女真族的国家，首都在北京，他们早就赶走了北宋人；在西方是一片戈壁沙漠，沙漠的另一头是西夏，也是一个游牧民族。在印度，我们看到了奴隶王正统治着德里。在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直到印度边境地区，有伟大的伊斯兰教国家花剌子模国（Khwarazm），又称希瓦国（Khiva），首都在撒马尔罕。这个国家的西边是塞尔柱人，还有萨拉丁的继任者统治下的埃及和巴勒斯坦。在塞尔柱人的保护下，哈里发统治着巴格达周边地区。

这时是十字军东征后期。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腓特烈二世被称为“世界奇迹”，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英格兰，《大宪章》事件正在接近尾声。在法国，此时是国王路易九世统治时期，他参加了十字军东征，被突厥人抓获，交付赎金后才被释放。俄国位于东欧，表面上被分裂成了两个国家，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和南方的基辅。在俄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中间是匈牙利和波兰。拜占庭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仍在繁荣发展着。

成吉思汗精心准备了他的征服计划。他训练了他的军队，尤其是训练了马匹和用于替换的新马，因为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没有什么比马匹更重要的了。然后，他向东挺进，几乎结束了中国北方的金国，

占领了东北地区（Manchuria）注，接着又攻陷了北京。他还使朝鲜屈服了。他似乎与南宋关系不错，南宋甚至还帮助他抵抗金人，但南宋人没有意识到自己也许就是下一个被征服目标。后来，成吉思汗还征服了西夏。

在取得这一连串的胜利后，成吉思汗也许想停下来了。他似乎无意侵略西方。他想和花剌子模的国王或称“沙阿”（Shah）注保持友好的关系。但是，这并没有实现。有一句古老的拉丁谚语，意思是这样的：凡是上帝想毁掉的人，他们自己就会首先发疯。花剌子模国的沙阿一心想自寻死路，他还尽一切可能做到了这一点。他的一名总督屠杀了蒙古商人。即使这样，成吉思汗也想要和平解决，他派出了使节团，要求惩罚这名总督。但是愚蠢的沙阿骄傲自大，只想着自己，他侮辱了这些使节，还处死了他们。这超出了成吉思汗的容忍范围，但是他并没有冲动。他做好了精心的准备，然后集结了大军向西挺进。

这次始于公元1219年的行军，使得亚洲和部分欧洲睁开了双眼，注视着这个新来的恐怖者，这个浪潮汹涌而至，不可阻挡，碾碎了许多城市和数百万人民。花剌子模国不复存在了。拥有众多宫殿和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布哈拉化为了尘土。首都撒马尔罕遭到摧毁，100万居民中只有5万人幸存了下来。赫拉特、大夏和许多其他繁荣的城市全部被毁，数百万人民被杀害。曾在中亚繁荣了数百年的艺术和手工业品全部消失了，文明生活似乎在波斯和中亚停滞了。成吉思汗所经之处都成了一片瓦砾。

花剌子模国统治者的儿子贾拉勒丁（Jalaluddin）英勇抵抗了这股浪潮。他撤退至印度河沿岸，被蒙古大军步步紧逼，据说他在马背上从30英尺的高度跳入了大河，游到了河的对岸。他在德里宫廷找到了庇护。成吉思汗认为不值得再继续追击他了。对塞尔柱突厥人和巴格达而言，他们是幸运的，成吉思汗和平地离开了他们，向北挺进直

入俄国。他打败并俘虏了基辅的大公。他返回了东方，镇压了西夏的叛乱。

成吉思汗卒于公元1227年，享年72岁。他的帝国从西方的黑海一直延伸到了太平洋沿岸，而且仍是朝气蓬勃，日益强盛。他的帝国首都仍是蒙古境内的小城镇哈拉和林（Karakorum）。虽然他是游牧民，但是他是一位能力卓越的组织者，他足智多谋，任命了能干的大臣协助他。他的帝国虽然是通过快速征服而建立起来的，但是在他驾崩时并没有四分五裂。

在波斯和阿拉伯的历史学家眼中，成吉思汗就是一个怪物——被称为“上帝之鞭”。他被描述成一个十分残暴无道的人。毫无疑问，他确实非常残暴，但是他与同时期的其他统治者相比，没有太大的差异。在印度，就小规模而言，阿富汗国王与他完全一样。公元1150年，阿富汗人攻占了加兹尼，为了报复曾有的血海深仇，他们抢掠和焚毁了这座城市。整整7天，“抢劫、破坏和屠杀一直持续不断。凡是被找到的每一个人均遭到杀害，所有的妇女和儿童全部沦为了囚犯。国王马赫穆德（Mahmudi King，也就是苏丹马哈茂德的后人）的宫殿和大型建筑物曾在世界上举世无双，但都被一一毁掉了”。这就是他们对待穆斯林兄弟的方式。这种行为与阿富汗王统治时发生在印度的情况，与成吉思汗在中亚和波斯的大肆破坏摧毁相比，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成吉思汗对花剌子模国非常恼怒，因为他的使节被沙阿处死了。对他而言，这就是族仇。他还大肆摧毁了其他地方。但是，也许在中亚，破坏的程度没那么大。在成吉思汗摧毁城镇的背后还另有动机。他有着游牧民的性情，非常讨厌城镇。他喜欢住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或平原上。曾经他考虑过毁掉中国所有的城市，但幸运的是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他的想法是把文明与游牧生活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个想法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成吉思汗这个名字，你也许会认为他是一个穆斯林，但他不是。这个名字是一个蒙古名字。成吉思汗对宗教抱以十分宽容的态度。事实上，他信仰的宗教是萨满教，崇拜“长生天”。他曾常常和中国的道家贤人长谈，但是他坚持信仰萨满教。当他面对困难时，他会向天空垂询。你一定注意到了，我在这封信的前面提到了成吉思汗是在蒙古人的集会上被“推选”为大可汗的。这个集会实际上是一个封建制的集会，不是普遍常见的形式，因此，成吉思汗是一个宗族的封建领袖。

他没受过教育，他的追随者们同样如此。他可能甚至不知道文字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信息是通过口头传达的，通常用寓言和谚语形式的诗文。令人十分惊叹的是，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里，以口头传递信息，商业居然能一直发展。当成吉思汗知道有文字后，他马上认识到了它的价值和有用之处，于是他命令他的儿子们和官员们学习书写。他还命令，蒙古人古老的习惯法必须用文字记录下来，还包括他自己的语录。他的观点是：这种习惯法是“不可改变之法”，人人必须服从它。甚至皇帝也要服从它。但是，这个“不可改变之法”现在消失了，甚至今天的蒙古人已经想不起来了，也没有这些习俗了。

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宗教都有自己古老的习惯法和成文律法，通常它会被认为这是“不可改变之法”，将会永远存在。有时候它被视为“启示录”——也就是神灵的“启示”——神灵的启示是不可能被认为会改变或昙花一现的。但是，法意味着要符合现有的情况，也意味着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更好。如果情况有变，旧法如何能适应呢？它们一定要随着变化的情况而改变，否则当世界在发展进步时，它们就变成了使我们止步不前的铁链。没有哪个法能成为“不可改变之法”。它必须以知识为基础，随着知识的积累，它必须随之而发展。

我不惜笔墨地向你讲述了很多关于成吉思汗的细节和信息。但是他本人使我非常着迷。像我一样热爱和平、非暴力又温和的人是城市的居住者，也是一切封建体制的厌恶者，但是我们深深着迷于这位游牧民族的凶狠残暴的封建领袖，这难道不奇怪吗？！

---

1. 据史实补。——译者注
2. Manchuria，该词意指满洲，但“满洲”一词出现在清朝皇太极时期，故此处略做调整。——译者注
3. Shah，旧时伊朗国王的称号，或旧时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地方统治者的称号。——译者注

68 ——蒙古人主宰了世界

成吉思汗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窝阔台成了大可汗。相较于成吉思汗和他在世时的蒙古人，窝阔台更加仁慈与温和。他总爱这样说："我们的可汗成吉思汗付出巨大的努力建立了我们的帝国。现在是让人民休养生息和国泰民安的时候了，是时候减轻他们的负担了。"从他的宗族角度来讲，请注意他是作为一名封建领袖来这样思考的。

但是，征服的时代还没有结束，蒙古人仍精力充沛地四处征伐。大将军速不台率军再次入侵欧洲。欧洲的军队和将军们完全不是他的对手。为了认真准备战场布防，他派出了间谍和先遣人员到敌国收集情报，由此他在进军前就很清楚地知道了敌国的政治和军事情况。在战场上，他就是战争艺术的大师，同他相比，欧洲的将领们就像是初学者。速不台径直向俄国挺进，因而没有去打扰位于西南方的巴格达和塞尔柱人。他在6年的时间里不断地向前，掠夺和摧毁了莫斯科、基辅、波兰、匈牙利和克拉科夫（Cracow）。公元1241年，在中欧的下西里西亚（Lower Silesia），一支波兰和德国联军在利格尼茨（Liegnitz）战役中被大举歼灭。整个欧洲似乎注定唾手可得。没有人能阻止蒙古人了。腓特烈二世虽被誉为"世界奇迹"，但他在这个来自蒙古的真正奇迹面前也会相形见绌。欧洲的君王和统治者们已经透不过气来了，这时意料不到的平静却突然降临了。

窝阔台死了，蒙古内部发生了继位之争。所以，在欧洲的蒙古军队虽然所向披靡，但是于公元1242年全部返回，一路向东回到了故土。欧洲再次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与此同时，蒙古人在中国大肆扩张，彻底灭掉了北方的金国和中国南宋。公元1252年，蒙哥成了大可汗，他任命忽必烈为中国的总管。一大批来自亚欧的人前往哈拉和林的蒙哥宫廷。大可汗仍然居住在帐篷里，遵循游牧民的生活方式。但是，帐篷内部雍容华贵，摆满了从其他地方掠夺来的财宝和战利品。商人们也来到了此地，尤其是穆斯林商人，他们发现蒙古人是慷慨的买主。艺术家、占星家、数学家和涉猎科学的人们纷纷聚集在了这个满是帐篷的城市里，这座城市似乎主宰了整个世界。在幅员辽阔的蒙古帝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和平与秩序，横贯大陆的众多商队路线上满是来来往往的人群。欧洲和亚洲之间出现了更加紧密的交往。

那时，在哈拉和林的宗教人士之间出现了一场竞争。他们都想让这些世界的征服者改变信仰，烙上他们宗教的印记。能成功使这些手握全权者支持的宗教就一定能成为最有权力的宗教，就一定能战胜其他所有人。罗马教皇从博尔纳（罗马）派出了使节团；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教徒来到了哈拉和林；穆斯林也来了；还有佛教教徒。蒙古人并不急于接纳任何新宗教，他们也不是一个非宗教民族。曾有一段时间，大可汗突然有了接纳基督教的念头，但是他不能承认教皇要求的权力。最终，蒙古人不知不觉地渐渐信仰了他们定居之处的宗教。在中国和蒙古，大部分蒙古人成了佛教教徒；在中亚，他们成了穆斯林；也许在俄国和匈牙利，有些蒙古人成了基督徒。

在罗马梵蒂冈（Vatican）的教皇图书馆里现在还保存了一封大可汗（蒙哥）写给教皇的信件原件。这封信是以阿拉伯文写的。似乎是在窝阔台死后，教皇派出了一名使者，警告新任可汗不要再次侵略欧洲。可汗回复说，他入侵欧洲的原因是因为欧洲人对他举止不恭。

然而，另一波征服和摧毁的浪潮发生在蒙哥统治时期。他的哥哥旭烈兀负责管理波斯。巴格达的哈里发因某事惹怒了旭烈兀，于是他向哈里发送去了一条口信，责备他不信守承诺，还告诉他以后要规矩

点，否则他就会让他的帝国消失。这位哈里发显然不是个聪明人，也没有什么经验。他的回复冒失无礼，蒙古人的使节们在巴格达受到了一伙暴民的侮辱。于是，旭烈兀的蒙古血液在此时沸腾了。他一怒之下向巴格达挺进，经过40天的包围后，他攻下了这座城市，终结了《一千零一夜》里的这座城市，掠夺了这个帝国500年来累积的所有财宝。哈里发和他的儿子还有近亲全部被处死。大规模的屠杀持续了数个星期，底格里斯河的河水都被鲜血染红了，长达数英里。据说，有150万人被杀害，所有的艺术珍宝、文学财富和图书馆全部被毁。巴格达完全成了一片废墟。甚至，旭烈兀还毁掉了西亚有着数千年历史之久的古代灌溉系统。

阿勒颇（Aleppo）、埃德萨（Edessa）和许多其他城市都遭受了同样的厄运，黑夜的阴影笼罩了西亚。那个时期的一位历史学家认为，这是“科学和道德严重匮乏的时期”。派往巴勒斯坦的一支蒙古军队被埃及苏丹拜伯尔斯（Baybars）打败了。这位苏丹有一个有趣的姓——“奔杜格达里”（Bandukdar）[注]——因为他的军队装备了火器。我们现在已步入了火器时代。中国很早就知道了火药。可能蒙古人就是从中国人那里知道了火药，也许火器帮助他们取得了无数的胜利。通过蒙古人，火器也被传入了欧洲。

公元1258年，巴格达遭到摧毁，残存的阿拔斯帝国也画上了句号。这是鲜明的阿拉伯文明在西亚的终结。远在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仍在延续着阿拉伯的传统，又延续了200多年，才最终陨落的。阿拉伯半岛的重要性迅速下降，它的人民在以后的历史里也变得无足轻重。后来，他们成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Otoman Turkish Empire）的一部分。1914——1918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人的策划下，阿拉伯人爆发了反抗突厥人的叛乱，从那时起，阿拉伯半岛就差不多独立了。

埃及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哈里发。埃及苏丹拜伯尔斯任命了末代阿拔斯哈里发的一个亲戚担任了哈里发一职。但是，他没有政治权力，

只是一位精神领袖。300年后，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苏丹从最后一任哈里发手中获得了这个头衔。于是，土耳其苏丹就一直担任了哈里发一职，直到几年前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废除了苏丹和哈里发为止。

我的故事离题了。大可汗蒙哥卒于公元1239年。在他死前，他征服了西藏。这时，中国的总管忽必烈成了大可汗。忽必烈长期待在中国，对中国颇有兴趣。因此，他把首都从哈拉和林迁到了北京，还把这座城市更名为“汗八里”，意思是“可汗之城”。忽必烈对中国事务的兴趣使他忽略了自己的帝国，逐渐地，蒙古的大总管们纷纷独立了。

忽必烈完成了对中国的征服，但是，他的征战有别于以前的蒙古人，少了一些残暴和破坏。中国使忽必烈变得温和而有教养了。中国人也善良地接纳了他，几乎视他为其中的一员。事实上，他建立了一个正统的中国王朝——元朝。忽必烈还把东京（Tongking）注、安南和缅甸纳入了他的帝国版图。他试图征服日本和马来西亚，但是遭到了失败，因为蒙古人不适应海战，不知道怎样造船。

在蒙哥可汗的统治期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出了一位有趣的大使拜见了蒙哥。路易九世提议与蒙古人和欧洲的基督教力量联盟，共同对付穆斯林。可怜的路易九世曾在十字军东征期间沦为了囚犯，度过了一段糟糕的日子。但是，蒙古人对这个联盟没有半点兴趣，他们也没有兴趣去进攻任何一个宗教民族。

为什么他们应该和欧洲的小国王和小王公们结盟呢？又为什么要对付他们呢？他们一点都不担心西欧诸国或伊斯兰教国家的战斗能力。西欧完全是出于偶然才躲过了他们的视线。塞尔柱突厥人对他们俯首帖耳，缴纳贡品。只有埃及苏丹打败过一支蒙古军队，但是，毫无疑问，如果蒙古人认真对付的话，他们是能够征服埃及的。强大的

蒙古帝国盘踞在亚洲和欧洲。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征服能与蒙古人的征服相提并论，历史上也没有第二个如此庞大的帝国。事实上，在那个时期，蒙古人仿佛就是世界的主宰。当时，印度侥幸躲过了蒙古人的征服，因为蒙古人没去印度。西欧只不过和印度差不多大，也在蒙古帝国的版图之外。但是，所有这些幸存下来的地区几乎都是出于蒙古人的宽容，只因蒙古人脑子里不想把它们吞并掉。这似乎就是公元13世纪的局势。

但是，蒙古人的巨大能量似乎在减弱，不断征服的动力也减退了。你应该记得，在那个时期，人们是靠步行或马匹来缓慢行进的，没有别的更快速行进的方法。对一支军队而言，从自己的家园蒙古来到欧洲帝国的西部边疆，这个行程本身就要花去一年的时间。当没有掠夺抢劫的机会时，他们是不会渴望去征服，去穿过自己的帝国跋涉在漫长浩大的行程中的。此外，在战争中不断取得的胜利和掠夺使得蒙古骑兵满载了丰厚的战利品。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还拥有了奴隶。所以，他们安静下来，开始过上了平静安稳的生活。人一旦拥有了想要的一切，都会倾向于和平与秩序。

庞大的蒙古帝国的行政管理一定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因此，它开始四分五裂了，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忽必烈卒于公元1292年。在他死后就没有了大可汗。这个帝国分裂成了五个大区域：

1.中国，包括了蒙古、东北地区和西藏。这是最主要的区域，也是忽必烈的后人统治下的元朝疆域。

2.在遥远的西方是由俄国、波兰和匈牙利构成的金帐汗国（Empire of the Golden Horde，这是当时蒙古人的称呼）。

3.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亚部分地区构成了伊儿汗国（Ilkhan Empire）——由旭烈兀建立，塞尔柱突厥人要向它纳贡。

4. 中亚的西藏以北的地区是大土耳其，也被称为察合台汗国（Empire of Zagatai）。

5. 在蒙古和金帐汗国之间是蒙古人的西伯利亚汗国（Siberian Empire）。

虽然伟大的蒙古帝国四分五裂了，但是这五个汗国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强大的帝国。

---

1. 拜伯尔斯原是一个突厥奴隶，其主子是一位弩炮队队长（bundugdār），因此他就以“奔杜格达里”（Bandukdar）为姓。——译者注
2. 东京，越南北部一地区的旧称。——译者注

69 ——伟大的旅行家马可·波罗

我向你谈到过哈拉和林的大可汗宫廷，成群结队的商人、手工业者、有学之士和使节团是如何纷纷来到这里的，他们被蒙古人的声望和胜利的魔力所吸引。他们来到这里的另一个原因是蒙古人鼓励他们前来。这些蒙古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在某些方面非常高效，而在其他方面却很幼稚。甚至，虽然他们的凶猛和残忍令人发指，但是又有着孩子气的一面。我认为，正因如此才使得这些凶狠的战士充满了吸引力。数百年以后，一个蒙古人征服了印度，印度人称蒙古人为莫卧儿（Moghal）。这个人名叫巴布尔（Babar），他的母亲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征服了印度后，他向往喀布尔和北方的凉风、鲜花、花园和西瓜。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君主，他写的回忆录使他显得非常具有人情味和吸引力。

所以，蒙古人鼓励旅行者从国外来到他们的宫廷。他们渴望知识，想从他们身上学到点东西。你应该还记得，我告诉过你，当成吉思汗知道有文字存在时，他立刻意识到了文字的重要性，于是命令他的官员们学习书写。他们具有开放和接纳的思想，愿意向他人学习。忽必烈定都北京，成了受人尊敬的中国君主后，他鼓励旅行者们从外国来到中国。有两位商人从威尼斯来到了中国，他们是两兄弟，名叫尼科洛·波罗（Nicolo Polo）和马菲奥·波罗（Maffeo Polo）。他们为了寻找商机来到了布哈拉，在这儿他们遇见了忽必烈派往波斯的旭烈兀的几名使者。他们受到吸引并加入了这支商队，于是他们来到了位于北京的大可汗宫廷。

尼科洛和马菲奥受到了忽必烈的热情接待，他们向他讲述了欧洲、基督教和教皇。忽必烈对此大感兴趣，似乎受到了基督教的吸

引。公元1269年，他派这两个人回到了欧洲，并给教皇带去了一封信。他要求教皇给他派遣100名学者，他们都要是“熟知7种艺术的聪明人”，还要能证明基督教是合理而且合法的。但是，这两个人回去后发现欧洲和教皇的情势非常糟糕，没有这样的100名学者。延迟了两年后，他们带着两名基督教修士或僧侣回到了北京。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带上了尼科洛的儿子，一个名叫马可（Marco）的年轻人。

这三个姓波罗的人开始踏上了惊人而漫长的旅程，通过陆路穿越了整个亚洲。这是多么浩大的旅程啊！即使是现在，跟随他们三人的行程路线都要花去大半年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沿着当年玄奘的路线行进的。他们经由巴勒斯坦来到了亚美尼亚，然后到达了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在这儿他们遇见了来自印度的商人。他们穿过波斯抵达了大夏，翻过高山来到了喀什，然后到达了于阗和罗布泊——游移湖。他们再次穿过了沙漠，然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回到了北京。他们随身携带了一张最高权力的通行证——大可汗亲自赐予的一块金牌。

这条路线是古罗马时期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一条路线。不久前我读了一篇关于斯文·赫定（Sven Hedin）穿越戈壁沙漠的旅行文章，他是一名瑞典探险家和旅行家。他从北京启程向西，穿过了沙漠，到达了罗布泊，然后前往于阗和更远的地方。他携带了所有现代便利的设备，然而他的探险仍不得不面对困境和痛苦。当三个姓波罗的人和玄奘走在那条路上时，700年前和1300年前的旅程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斯文·赫定有了一个有趣的发现。他发现罗布泊已经改变了位置。很久以前，也就是在公元14世纪，流入罗布泊的塔里木河改变了河道，沙漠的沙土很快就覆盖了原有的、被废弃的河道。以前矗立在此处的楼兰古城与外界中断了联系，原住民们离开了，留下了一片废墟。这个湖泊改变了它的位置，是因为这条河流、古老的商队路线和贸易路线也改变了路线。斯文·赫定发现，最近，也就是几年前，塔里木河又再次改变了它的河道，回到了以前的位置上，湖泊的位置也随之发

生改变。塔里木河又再次流过楼兰古城的废墟，也许这条已被废弃了1600年的古老路线会再次被启用，但是骆驼也许会被电动车取代。因此罗布泊被称为“游移湖”。我告诉了你塔里木河和罗布泊的移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观点：河流的改道可以改变大片的区域，从而影响历史。我们可以看见，古代的中亚有着大量的人口，一波接着一波的人们向西和向南征服。今天这些地方几乎是沙漠地带，几乎没有城镇且人口稀少。可能在以前这儿曾有丰富的水源，所以能够支撑众多的人口。气候变得越来越干燥，水资源越来越少，人口也就随之减少了。

在这些漫长的旅途中有一个好处，人们可以有时间学习一种或数种新的语言。这三个姓波罗的人花了三年半的时间从威尼斯抵达了北京，在这段长长的时间里，马可掌握了蒙古语，也许还学会了中文。马可成了大可汗的宠臣，服侍了他大约17年。他还被任命为总督，执行官方任务，巡视了中国的不同地区。虽然马可和他的父亲思念家乡，想回到威尼斯，但是要想得到可汗的同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后，他们得到了一个回家的机会。在波斯的伊儿汗国的蒙古统治者痛失爱妻，他是忽必烈的侄子。他想再迎娶一位妻子，但是他以前的妻子曾要他许下诺言，不能娶他们宗族以外的任何女子。于是，阿鲁浑（这位统治者的名字）派出信使，前往北京拜见忽必烈，恳请他赐婚一名宗族内合适的女子。

忽必烈选了一名年轻的蒙古公主，因为这三个姓波罗的人是经验丰富的旅行者，所以他们被选入了护送的队伍。他们由海路从中国南方出发，到达了苏门答腊岛，在那儿停留了一段时间。那时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佛教帝国繁荣昌盛，但是正在逐渐走向衰落。这支队伍从苏门答腊岛来到了南印度。我告诉过你，马可曾到访过繁华的加异勒港口，这个港口位于南印度的潘地亚国境内。这位蒙古公主和马可，还有这支队伍，在印度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似乎一点也不着急，花了两年时间才到达了波斯。但是，在这个时候，期待中的新郎已经

去世了！他等待得太久了。也许他的离世并不是巨大的不幸。这位年轻的公主嫁给了阿鲁浑的儿子，此人正好与她年龄相当。

三个姓波罗的人离开了公主，经由君士坦丁堡向着家乡进发。公元1295年，他们回到了威尼斯，距他们上次离开故土已过去了24年。没有人能认出他们，据说为了让他们的老朋友和其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举办了一次盛宴，当着客人的面撕开了破烂且塞满填充物的衣服。立刻，珍贵的珠宝——钻石、红宝石、绿宝石和其他宝贝——成堆地滚了出来，震惊了所有的来宾。但是，还是没人相信他们在中国和印度的冒险故事。他们认为，马可和他的父亲、叔叔是在夸夸其谈。他们只知道威尼斯这个小共和国，无法想象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面积和财富。

三年后，也就是公元1295年，威尼斯与热那亚都是海上强国，也互为竞争对手，它们之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海战。威尼斯人被打败，数千人沦为了热那亚人的囚犯。在这些囚犯中就有我们的朋友马可·波罗。当他身处热那亚的监狱时，他写下了或者是口述下了他的旅行。《马可·波罗游记》（*Travels of Marco Polo*）就以这样的方式诞生了。监狱可真是一个能好好工作的有用之地啊！

在这些游记里，马可特别描述了中国，讲述了他在中国境内的多次游历；在一定程度上，他还描述了暹罗、爪哇岛、苏门答腊岛、锡兰和南印度。他告诉我们，中国的大海港里挤满了来自东方诸国的船只，有些船舶大得可以容纳300或400人。他把中国描述成了一个微笑着的富饶国家，有许多的城市和地区；“衣服”是“用丝绸、黄金和细塔夫绸”制成；有“肥沃茂盛的葡萄园、田地和花园”；沿途给“旅行者”提供了“极好的客栈旅店”。他提到了一种特殊的信差，专为帝王传递消息。这些信差通过马匹接力的方式，以每24小时400英里的速度在传递信息——这的确非常有用。我们还知道，中国人从地下挖出黑色的石头代替了柴火。这显然是指他们开发了煤矿，用煤来

做燃料。忽必烈发行了纸币——也就是他发行了承诺以黄金支付的纸钱，与现在一样。最让人感兴趣的是他创造了一种现代信用方式。马可提到了一个基督教殖民地，由居住在中国的大祭司约翰（Prester John）统治，这令欧洲人大为兴奋和惊叹。他们有可能是生活在蒙古的一些旧时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教徒。

他还描写了日本、缅甸和印度：有些是他亲眼所见，有些是他听来的。马可的故事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本精彩绝伦的游记。对那些生活在小国家又带有几分嫉妒的欧洲人而言，这本书使他们大开了眼界，使他们了解了更加广阔世界的伟大、富有和奇迹。它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唤起了他们的冒险意识，诱发了他们的贪婪。它吸引着他们驶向大海的更深处。欧洲正在发展。这个年轻的文明正站稳了脚跟，奋力地挣脱中世纪的束缚。它精力充沛，像正要步入成年的青年人。后来，这种对海洋的强烈欲望以及对财富和冒险的追求，促使欧洲人前往美洲，绕过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来到了太平洋、印度、中国和日本。大海成了世界的交通要道，跨越大陆的商队路线的重要性逐渐降低了。

在马可·波罗离开不久，大可汗忽必烈就驾崩了。他在中国建立的元朝并没有比他更长寿。蒙古人的实力迅速衰落了，抵抗外来者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出现了。在60年的时间里，蒙古人就被赶出了中国南部，一个中国人在南京自封为王。又过了十几年——即公元1368年——元朝最终灭亡了，蒙古人被赶到了长城以外的地方。另一个伟大的中国王朝——大明王朝——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个王朝统治了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大约有300年，这段时间被认为是政治清明、繁荣昌盛而且文化灿烂。在这个时期，中国既没有对外征服，也没有进行帝国主义性质的冒险。

在中国的蒙古帝国崩溃了，中欧之间的交流也随之中断。这时的陆路交通已不再安全，而投入使用的海上航线还非常有限。

70 ——罗马教会变得好斗了

我告诉过你，忽必烈给教皇写了一封信，要求他派遣100名学者到中国。但是教皇没有这样做，他当时正陷入困境之中。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这个时期正是罗马皇帝腓特烈二世去世后，从公元1250年至1273年都没有皇帝在位。当时的中欧正处于恐怖骇人的局势之中，到处一片混乱，强盗骑士四处抢掠。公元1273年，哈布斯堡王朝的鲁道夫成了罗马皇帝，但局势并没有得到改善。意大利脱离了罗马帝国。

从罗马教会的角度来说，这不仅是政治上的混乱无序，也许还是所谓的宗教混乱无序的开始。人们不再那么温顺听话和服从教会的教规了，他们已经开始质疑，质疑对宗教而言是一种危险的事物。我们已经看到，腓特烈二世对待教皇的态度非常随意，即使被逐出教会也毫不在意。他甚至开始以书面的形式与教皇辩论，教皇在这场论战中显然没有占上风。在这个时期，像腓特烈二世这样抱有怀疑态度的人肯定不少。还有很多人虽然没有怀疑或反对教会或教皇的主张，但是他们厌恶教会大人物的腐败和享乐。

十字军东征正在以极其可耻的方式逐渐减少了。他们一开始抱有极大的希望和热情，但没能达到任何目的，这样的失败总是会带来一种反应。虽然不是对教会感到完全满意，但是人们开始茫然地、逐渐地在别的地方寻找光明。教会用暴力作为打击报复的手段，试图以恐怖的方式继续控制人们的思想。它忘记了，人的思想是非常棘手而且复杂的，野蛮残忍的暴力是最糟糕的武器。所以，它试图扼杀个人和群体中思想意识的觉醒，还试图用棍棒和火刑柱而不是用辩论和理性思考来解决质疑。

早在公元1155年，教会的盛怒就降临在了一位受人喜爱和认真虔诚的传教士身上，他就是意大利的布雷西亚的阿诺德（Arnold of Brescia）。阿诺德主张反对神职人员的腐败和奢侈。他遭到逮捕，并被处以了绞刑，然后他的尸体被焚烧，骨灰被抛进了台伯河，为的是不让人们保留他的遗骸！直到最后一刻，阿诺德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态度平静而沉着。教皇甚至宣布，凡是有一点不同于宗教信仰的或者大肆批评神职人员的团体和基督教宗派都会被逐出教会。教会利用常规的十字军东征来对付这些人，还使用了各种令人作呕的残暴方式和恐怖手段。法国南部图卢兹（Toulouse）的阿比尔教派（Albigenses）就遭到了这种迫害，还有基督教异端韦尔多教派（Waldenses）也是如此，这个教派追随的是一个名叫韦尔多（Waldo）的人。

大约在这个时期，或者更早一点，在意大利居住着一个人，他是基督教里最具有吸引力的人物之一。他就是阿西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他本是一个富人，舍弃了自己的财富，发誓要过贫穷的生活，投身于世界为病人和穷人服务。因为麻风病患者是最不幸且最不受重视的一群人，所以他格外地投入了精力去照顾他们。他建立了一个修会——被称为“圣方济各会”（Order of St. Francis）——有点像释迦牟尼的僧伽会。他四处传道和帮助他人，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他试图像基督那样过着苦修的生活。大批的人跟随着他，很多人成了他的信徒。当十字军东征还在进行的时候，他甚至前往了埃及和巴勒斯坦。然而，他虽然是一名基督徒，但穆斯林很尊敬这位温和可爱的人，没有用任何方式阻止他。他生于公元1181年，卒于公元1226年。在他死后，他创建的修会与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之间发生了冲突，也许教会不喜欢这种贫穷生活所带来的压力。他们已经发展成熟，不再需要最初的基督教教义了。公元1318年，在马赛，4名圣方济各会修士被当作异教徒而被活活烧死。

几年前，小城镇阿西西举行了纪念圣方济各的大型庆典。我忘记了当时举办的具体原因，可能是他逝世700年纪念日吧。

教会里还出现了一个修会，它像圣方济各会一样，但在精神上有很大的区别。这个修会由西班牙人圣多米尼克（St. Dominic）创立，被称为“多明我会”（Dominican Order）。这是一个激进的正统修会，他们主张一切都要服从于维护信仰这一伟大职责。如果不能通过劝服达到目的，那就要使用暴力手段。

公元1233年，教会正式而官方地启动了所谓的宗教法庭，以此开始了用暴力手段来统治宗教。宗教法庭是一种法庭形式，调查人们信仰的正统性，如果他们不符合标准，那么他们通常的处罚就是被处以火刑。针对“异端”的定期搜捕出现了，数百人被烧死在了火刑柱上。甚至比烧死更糟糕的是，这种火刑是强加给他们的酷刑，是为了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许多贫穷不幸的妇女被指控为巫女，也被烧死了。但是，这种酷刑常常由一伙暴徒来执行，而不是通过宗教法庭的命令来执行，这种情况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尤其普遍。

教皇颁布了“信仰令”（Edict of Faith），号召人人都要成为告密者！他谴责化学，称它为恶魔的艺术。所有的暴力和恐怖手段都是在毫无隐瞒的情况下实施的。他们认为，通过把人烧死在火刑柱上，他们就能拯救他的灵魂或其他人的灵魂。宗教人士经常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人，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还迫使他人相信他们正从事的是一项公共服务事业。他们以上帝的名义处死和谋杀了很多人；他们高谈着拯救“不朽的灵魂”，毫不犹豫地把肉身化为了灰烬。宗教的历史是非常可怕的。但是，我认为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得上宗教法庭的冷血和残酷。然而，令人惊叹的是，在对此该负责任的人们当中，有很多人这么做不是为了个人目的，而是为了坚定的信念，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

教皇在欧洲施以恐怖统治的同时，也在失去他们曾经拥有的如同帝王一样的统治地位。他们威胁要把皇帝逐出教会、恐吓他人屈服的时代已经消失了。

当神圣罗马帝国的境况很糟糕，没有人当皇帝或皇帝远离罗马的时候，法国国王便开始抵制教皇。公元1303年，这位法国国王对教皇的某些作为感到非常不满。他派了一个人到教皇那里，这个人设法进入了教皇宫殿的寝室里，当面辱骂了教皇。没有哪一个国家对教皇遭受的侮辱表示反对。把这件事和那位冰天雪地里赤脚站在卡诺萨城堡外的皇帝比较一下吧！

几年后的公元1309年，一位新教皇在法国的阿维尼翁（Avignon）定居下来，他是一名法国人。在公元1377年以前，教皇们一直居住在这里，法国国王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第二年，即公元1378年，枢机主教团出现了分裂，这起事件被称为“天主教会大分裂”（Great Schism）。于是，选出了两位教皇，两个红衣主教组织各选出了一位。一位教皇住在罗马，得到了北欧大部分国家和罗马皇帝的认可；另一位住在阿维尼翁，被称为“伪教皇”（anti-Pope），他得到了法国国王和一些同盟国的支持。这个局面一直持续了40年，两位教皇互相攻讦，相互开除对方的教籍。公元1417年出现了和解，双方共同推选出了一位居住在罗马的新教皇。但是，这场不体面的两位教皇之争给欧洲民众造成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如果这些自称为上帝在人世间的教皇代理和代表的人言行举止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人们就要开始怀疑他们的神圣和诚意了。所以，这场争斗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宗教权威的盲目服从。但是，他们还需要更多的震动。

其中有一个人开始非常直率地批评了教会，他就是英国人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他是一名牧师，也是牛津大学的教授。他是第一个把《圣经》翻译成英文的人，因而名气非常大。他在一生中一直在努力逃脱罗马教廷的愤怒，但是公元1415年，也就是在他死

后的31年，教会议会命令挖出他的骸骨并将其焚毁！这个命令还真被执行了。

虽然威克里夫的骸骨遭到了亵渎和焚毁，但是要埋没他的观点很难。这些观点得到了传播，甚至传到了遥远的波希米亚（Bohemia），也就是现在的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还影响了布拉格大学（Prague University）的校长约翰·胡斯（John Huss）。因为他的观点，他被教皇逐出了教会，但是因为他非常有名，所以在他的家乡，此事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他们对他施了一个诡计。罗马皇帝赐给他一个安全通行证，并邀请他前往瑞士的康斯坦茨（Constance）。他如约前往。然后，他被告知要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拒绝这么做，除非证明他是有罪的。于是，尽管他们许下了承诺并给了安全通行证，他们还是把他活活烧死了。这发生在公元1415年。胡斯是一个勇敢无畏的人，宁愿痛苦地死去，也不愿亲口说出他认为是错误的观点。他成了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殉道者。他是捷克（Czech）人民的众多英雄之一；直至今天，捷克斯洛伐克人依然很尊敬他的思想。

约翰·胡斯的殉道不是徒劳无效的。它是一颗火花，点燃了波希米亚的追随者们的起义之火。教皇宣布发动一次针对他们的十字军讨伐。十字军很低廉，几乎没有什么开销；利用十字军牟取私利的恶棍无赖和投机者不计其数。这些十字军对无辜的百姓“犯下了最可怕的暴行”（赫伯特·乔治·韦尔斯语）。但是，当胡斯党人（Hussites）的军队吟唱着他们的战歌而来时，十字军很快就消失不见了。他们沿着来时的路线迅速撤离了。只要是去杀害和抢劫无辜的百姓，这些十字军就充满了好斗的热情，但是一旦组织有序的军队向他们靠近，他们就会逃之夭夭。

所以，一系列反抗宗教专制独裁和教条专断的起义和暴动纷纷爆发了，它们将蔓延到整个欧洲，把欧洲分割成互相敌对的阵营，还把

基督教分成了天主教（Catholic）和新教（Protestant）。

71 ——反抗独裁主义

我担心，我对欧洲宗教冲突的叙述已经让你感到枯燥无趣了。但是，这段历史很重要，它们向我们展示了现代欧洲的发展情况，有助于我们对欧洲的了解。我们可以看见公元14世纪和此后在欧洲发生的为宗教自由而战的斗争，以及后来发生的为政治自由而战的斗争，实际上它们是同一场斗争的两个方面。这是反抗权威和独裁主义的斗争。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教廷代表了绝对的权威，他们试图粉碎人们的精神。罗马皇帝有“神授的权力”，教皇更是如此，没人有权质疑这一点，或不服从以上二者颁布的命令。服从是最好的美德。甚至个人的判断都被视为有罪。因此，在盲目服从和自由之间的争议是相当明显了。欧洲发起了一场长达数个世纪的伟大战斗——为自由思想而战和后来的为政治自由而战。在经过了无数次的跌宕起伏并承受了艰难困苦之后，这场战斗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但是，正当人们庆祝取得了自由的时候，他们却发现他们错了。只要贫穷仍然存在，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号召一个饥饿的人去争取自由就是对他的嘲笑。所以，下一步则是为经济自由而战，今天全世界都在为此而战斗。据说只有一个国家的人民普遍得到了经济自由，那就是俄国，或者应该称为苏联（Soviet Union）。

在印度没有出现过思想自由的斗争，因为从最早期开始，这样的权利似乎就从来没有被拒绝过。人们信任他们喜欢的几乎所有事物，而且都是自愿的。影响人们思想的是讨论和辩论，而不是棍棒和火刑柱。当然，也许偶尔也使用了强迫或暴力的手段，但是古老的雅利安理论承认了思想自由的权利。由此造成的结果却不完全都是好的，虽然这也许似乎很奇怪。人们确信了理论的自由，就不会足够警惕，逐

渐地，他们会越来越陷入退化堕落的宗教仪式、典礼和迷信中。他们发展了宗教思想，这个思想使他们后退了很远，也使他们成了宗教权威的奴隶。那个权威不是教皇或其他个人的权威，而是“圣书”、习俗和惯例的权威。所以，当我们谈到思想自由且自豪地拥有它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远离它，我们被烙印在脑海里的思想束缚了，而这些思想就是古老的典籍和我们的习俗。权威和独裁主义统治了我们，控制了我们的思想。这些有时候束缚了我们身体的枷锁太糟糕了，但是由思想和偏见构成的无形的枷锁束缚了我们的思想，这个更加糟糕。它们是由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虽然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但是它们可怕地抓住了我们。

穆斯林作为侵略者来到了印度，印度的宗教信仰也染上了强迫的特征。斗争实际上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政治斗争，但披上了宗教的外衣，有时候还出现了宗教迫害。但是，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伊斯兰教就代表了这样的迫害。有一个十分有趣的记录，记载的是一名西班牙穆斯林发表的讲话，那个时候是公元1610年，当时他和剩下的阿拉伯人被赶出了西班牙。他抗议宗教法庭，说道：

> 我们那些取得胜利的祖先在掌握权力之后，难道他们曾把在西班牙的基督教连根拔除了吗？难道他们不允许你们的父辈在戴上锁链的同时还享有宗教礼拜仪式的自由吗？……如果有强迫改变信仰的情况，那也是十分少见的，简直不值一提。有的人不畏惧上帝和先知，做出了强迫他人改变信仰的行为，这是直接地完全违背了伊斯兰教神圣的清规戒律。任何人只要成了值得尊敬的穆斯林，他都不会违背教规和亵渎神圣。就使用劝服手段改变他人的信仰这个方面而言，你们在我们中间绝对无法制造出任何嗜血残忍的正式法庭，也无法实施你们宗教法庭使用的恶劣手段。事实上，我们敞开怀抱，接纳所有愿意皈依我们宗教的任何人，但是我们神圣的《古兰经》不会允许我们去残酷统治他人的思想意识。

所以，宗教的宽容和思想的自由曾经是古老印度生活的鲜明特征，却在一定程度上悄然消失了，然而欧洲迎头赶上了我们，在经过了许多次的斗争后，他们先行一步建立起了这些非常重要的原则。现在印度还偶尔会发生教派冲突，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纷争不断，相互残杀。这种情况确实在一些地区偶有发生，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在和平友好地相处，因为这是我们真正的目标。对任何以宗教为借口对兄弟施以暴力的印度教教徒或穆斯林来说，这都是可耻的行为。我们必须制止这一点，当然，我们一定会这么做的。但是，重要的是要摆脱习俗、惯例和迷信带来的复杂意识形态，它们隐藏在宗教的外表下，束缚了我们的思想。

与宗教宽容一样，印度在政治自由方面一开始也做得非常不错。你应该记得我们的村落共和体制，国王的权力一开始就受到了限制，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君权神授”。因为我们整个政治形态是建立在村落自由的基础之上的，人们不太关心谁是国王。如果他们当地的自由能被保持下来，那么谁是统治者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这是一个危险而愚蠢的观点。逐渐地，顶层的统治者加大了手中的权力，蚕食了村落的自由。于是，这样的时期来临了：我们有了完全意义上的君主，没有了村落自治体系，从上到下都没有了自由的踪影。

72 ——中世纪的结束

让我们再看一看公元13世纪到15世纪的欧洲吧。它似乎到处充斥着无序、暴力和冲突。印度的情况也非常糟糕，但是相较于欧洲而言，人们几乎认为印度是很平静的。

蒙古人曾把火药传入了欧洲，火器在这个时期得到了使用。国王们利用火器来镇压封建贵族的叛乱。在镇压过程中，他们还得到了城市新兴商人阶级的帮助。贵族们之间常常爆发小型的私人武装冲突。这削弱了他们的实力，但也骚扰掠夺了农村地区。国王的权力日益增强，他镇压了这种私人武装冲突。在一些地方，为了争夺王位，两个敌对势力之间还会爆发内战。因此，在英格兰，两个家族——约克家族（House of York）和兰开斯特家族（House of Lancaster）之间发生了冲突。双方都以一朵玫瑰作为族徽，一个是白玫瑰，另一个是红玫瑰。因此，这场战争被称为“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大批封建贵族在内战中丧命。十字军东征也杀死了许多封建贵族。于是，封建领主们逐渐受到了控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权力从贵族手中转移到了人民手中，国王得到了更多权力。百姓们仍和以前一样，不过私人战争减少了，他们的境况稍微有了一些好转。然而，国王越来越强大，慢慢地成了手握全权的专制君主。国王和新的商人阶级之间的冲突即将出现。

甚至比战争和屠杀更可怕的，是发生在公元1348年的欧洲大瘟疫。瘟疫蔓延了整个欧洲，从俄国和小亚细亚到英格兰，还扩散到了埃及、北非、中亚，然后一直向西蔓延。在这场被称为“黑死病”（Black Death）的浩劫中，有数百万人丧生。英格兰有三分之一的人

口在这场瘟疫中丧生，在中国和其他地方，死亡人数也十分惊人。令人惊讶的是，这场瘟疫没有蔓延到印度。

这场可怕的灾难极大地减少了人口的数量，耕种土地的劳动力出现了短缺。由于缺乏人口，劳动者希望他们原先低得可怜的工资水平可以适当提高。但是，地主和财主控制了立法机构，他们通过法律强迫人们工作，只按照以前的工资水平支付薪酬，不允许他们有更多的要求。压迫和剥削已经超过了人们的忍耐极限，于是农民们和穷人们暴发了起义。在整个西欧，农民起义一场接一场地爆发。公元1358年，法国爆发了扎克雷（Jacquerie）起义[注]。英格兰爆发了瓦特·泰勒（Wat Tyler）起义，公元1381年，泰勒在英王的面前被处死。这些起义都被镇压了，采用的往往都是极为残酷的手段。但是，平等的新思想慢慢地传播开来。人们问自己，为什么他们应该挨饿受穷，而其他人却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和拥有一切呢？为什么有些人是领主，而有些人是农奴？为什么有些人可以穿华丽的衣裳，而其他人甚至衣衫褴褛、衣不蔽体？整个封建制度是建立在服从权威的旧思想之上的，而此时这个思想基础正在崩塌。所以，农民们一次又一次地起义，但是他们太弱小了，也没有被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他们的起义都遭到了镇压，只有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再次爆发。

英格兰和法国几乎是在不断地交战。从公元14世纪初期到15世纪中叶，英法两国之间的战争被称为“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在法国以东是勃艮第（Burgundy），这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也是法国国王名义上的属国。但是，勃艮第是一个不安分且麻烦不断的属国。英国人与它相互勾结，加上其他势力，一起对付法国。曾有一段时间，法国被各方面包围了。法国西部的很大一片地区长期以来被英国人占领，英格兰国王也开始称自己为法国国王。当法国处于国家命运最低谷的时候，当一切都似乎陷入了绝望的时候，希望和胜利却以一位年轻农家女的形式降临了。你知道一些有关圣女贞德的历史，她被称为“奥尔良少女”（Maid of Orleans）。她是你心

目中的女英雄。她给意志消沉的人们带来了信心，还尽最大努力去激励他们，在她的带领下，他们把英国人赶出了法国。但是，她得到的回报却是被审判，是宗教法庭的判决，最终被烧死在火刑柱上。英国人抓住了她，他们让教会给她定罪。然后在公元1430年，他们在鲁昂（Rouen）的广场上烧死了她。多年后，罗马教会推翻了对贞德的定罪，撤销了对她的判决；很久以后，他们才把贞德封为圣女！

贞德宣扬法国，宣扬要把她的家乡从外国人的手中解救出来。这是一种新的说法。在那个时期，人们的脑子里满是封建制度的观点，不会去想到国家主义。所以，贞德的这个说法让人觉得很吃惊，他们几乎无法理解她的想法。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圣女贞德那个时期开始，法国出现了模糊的国家主义思想的萌芽。

把英国人赶出了自己的国家后，法国国王把目光转向了勃艮第，这个惹是生非的地方。这个强大的属国最终被法国纳入了统治管辖中。公元1483年，勃艮第成了法国版图的一部分。现在的法国国王成了一位实力强大的君主，镇压或控制了所有的封建贵族。勃艮第被并入法国以后，法国和德国就面对面地相邻了，它们的边境接壤了。但是，当法国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时，德国还十分弱小，它被分裂成了很多个邦国。

此时，英格兰也在试图征服苏格兰（Scotland）。这也是一段持续了很长时间的斗争，苏格兰经常与法国联手对付英格兰。公元1314年，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领导下的苏格兰人民在班诺克本（Bannockburn）打败了英国人。

甚至在比这个时期更早的时候，即公元12世纪，英国人就开始试图征服爱尔兰（Ireland）。那是在700年前，从那时起，爱尔兰就出现了频繁的战争、暴乱、恐怖行动和恐怖政策。这个小国家拒绝屈服于一个外来民族的统治，一代又一代的爱尔兰人站起来反抗，宣称他们绝不会屈服。

公元13世纪，欧洲的另一个小国——瑞士——坚决维护获得自由的权利。它本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由奥地利（Austria）统治。你一定读过有关威廉·退尔（William Tell）和他儿子的故事，但这可能不是真实的。不过，更加惊奇的是，瑞士农民在反抗强大的帝国，他们拒绝臣服于帝国的统治。起初有三个州爆发了起义，并在公元1291年结成了同盟，被称为“永久同盟”（Everlasting League）。随后，其他州也纷纷加入。公元1499年，瑞士成了一个独立而自由的共和国。它是由不同州组成的一个联邦，称为“瑞士联邦”（Swiss Confederation）。你还记得吗？在8月1日那天，我们可以看见瑞士的很多山头上都燃起了篝火，那是瑞士的国庆日，是庆祝他们革命开始的纪念日，而篝火就是反抗奥地利统治者的标志。

在欧洲的东面，君士坦丁堡正在发生着什么呢？你应该还记得，公元1204年，拉丁人的十字军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这座城市。公元1261年，这些人又被希腊人赶出了这座城市，希腊人重建了东罗马帝国。但是，另一个更大的危机正在降临。

当蒙古人穿过亚洲，一路向前挺进的时候，5万名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他们面前四散逃跑了。这群人与塞尔柱突厥人有所不同。他们敬仰一位祖先，也是一个王朝的缔造者，这个人叫作奥斯曼（Osman）。因此，他们被称为奥斯曼人（Otoman）或奥斯曼土耳其人。这些奥斯曼人向西亚的塞尔柱人寻求庇护。当塞尔柱突厥人逐渐衰落的时候，奥斯曼人的实力似乎越来越强大了。他们一直在四处扩张。公元1353年，与其他人之前做过的一样，他们没有攻打君士坦丁堡，而是绕过它来到了欧洲。他们迅速扩张，占领了保加利亚（Bulgaria）和塞尔维亚，然后定都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因此，奥斯曼帝国（Otoman Empire）在君士坦丁堡的两边（亚洲和欧洲）开始扩张开来。它包围了君士坦丁堡，但这座城市仍在这个帝国的版图之外。然而，有着千年历史、骄傲的东罗马帝国的疆域已缩小到只剩这座城市了。虽然突厥人(注)正在吞并东罗马帝国的疆域，但是苏丹和罗马皇帝

之间似乎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们的家族也在通婚或联姻。最后，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了突厥人之手。我们现在只谈论奥斯曼土耳其人了，塞尔柱人已经退出了历史的画卷。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虽然早就在预料之中，但它仍是震动欧洲的一件大事。它意味着有着千年历史的希腊人统治的东罗马帝国结束了。它还意味着穆斯林对欧洲的又一次入侵。突厥人继续扩张，有时候它似乎好像要征服整个欧洲，但是被阻止在了维也纳的城门外。

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在公元6世纪兴建了圣索菲亚大教堂，此时这座教堂已经变成了一座清真寺——被称为“阿亚索菲亚”（Aya Sufya）——教堂里的有些财物也遭到了洗劫。欧洲对此大为吃惊，但无能为力。然而，事实上，土耳其苏丹对希腊正教教会是十分宽容的。在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以后，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ohammad II）居然宣称自己是希腊正教教会的保护者。后来，有一个被称为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cent）的苏丹，自认为代表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给自己冠上了“恺撒”的头衔。这就是古老传统的力量。

奥斯曼土耳其人似乎受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的欢迎，他们目睹了旧帝国的衰落崩溃。相较于教皇和西边的基督徒们，他们更喜欢突厥人。在拉丁人十字军的统治期间，他们的境况十分糟糕。据说，在君士坦丁堡最后被围困期间，即公元1453年，一位拜占庭贵族说：“先知的头巾远好过教皇的三重冕。”

突厥人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军团，被称为“耶尼切里”（Janissaries）注。他们吸收了年幼的基督徒儿童并给予他们特殊的训练，这些儿童完全是基督徒给他们的一种贡品。把小男孩们与他们的父母分开是非常残忍的，但是这些男孩子也得到了一些好处，因为他们受到了良好的训练，成了军事贵族。这支禁卫军成了奥斯曼苏

丹的支柱。“Janissary”一词来源于“Jan”（意指生命）和“nisar”（意指牺牲）——指牺牲自己生命的人。

同样，埃及也组建了一支马穆鲁克（Mamelukes）军团，与土耳其禁卫军一样。这支军团逐渐强大起来，且手握全权，甚至取代了埃及苏丹。

夺取了君士坦丁堡以后，奥斯曼苏丹似乎从前任拜占庭皇帝那里继承了奢侈和腐败的许多恶习。整个拜占庭帝国的堕落体制腐蚀了他们，逐渐地削弱了他们的实力。但是，曾有一段时间他们非常强大，信仰基督教的欧洲非常惧怕他们。他们征服了埃及，从软弱无能的阿拔斯家族的代表手中夺走了哈里发这个头衔。从那时起，奥斯曼苏丹就称自己为哈里发，直到几年前，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才废除了苏丹和哈里发。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之日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它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中世纪结束了。1000年的黑暗时代结束了。欧洲有了复苏的迹象，新的生命力和活力已清晰可见了。这被称为“文艺复兴运动”（Renaissance）的开端——知识和艺术的复兴。人们似乎从长长的沉睡中苏醒了，他们跨过了几个世纪，回顾了古希腊的荣耀时期，从中获取了灵感。这几乎是一场思想反抗，反抗教会提倡的阴郁、压抑的生活观念，反抗束缚人类精神的枷锁。出现了崇尚古希腊式的审美观，欧洲遍地出现了精美的绘画、雕刻和建筑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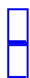
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是由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而突然引起的。这样的想法非常荒谬可笑。突厥人占领了这座城市仅仅是加快了这个变化的速度，因为大批有学之士和学者离开这座被占领的城市前往了西方。他们把希腊文学作品的瑰宝带到了意大利，此时正是西方世界欣赏、重视这些作品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起到了一点助推作用。

但是，对这个巨大的变化而言，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原因。古老的希腊文学和思想在中世纪的意大利或西方国家算不上什么新事物。在大学里，人们要学习它，饱学之士要了解它。但是，它被局限在了小部分群体中，因为它与当时普遍盛行的生活观念不太一致，所以传播并不广泛。逐渐地，人们开始质疑，接受新生活观念的土壤已经具备了。人们对本来已有的事物感到不满，要去寻找另外一些也许能让他们更满意的东西。当他们处于怀疑和期待的状态时，他们发现了古老的非基督教的希腊哲学，并从希腊文学中吸收了大量养分。这似乎就是他们要追寻的东西，这个发现使他们充满了热情。

文艺复兴运动始于意大利。然后，它又出现在了法国、英格兰和其他地方。它不仅仅是希腊思想和希腊文学的再现，也是一场更加伟大、更加宏伟的运动。它是长期以来掩盖在欧洲表象下的进步发展的外在表现形式。这种进步以多种形式爆发了。文艺复兴运动只是其中之一。

---

1. 扎克（Jacques）是法国封建主对农民的蔑称，意为“乡巴佬”。——译者注
2. 这里指奥斯曼土耳其人。——译者注
3. 耶尼切里，即土耳其禁卫军。——译者注



第三卷
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

73 ——海路大发现

我们现在来到欧洲的一个新阶段，这时候，中世纪的世界分崩离析，并开始让位于一种新的秩序。人们对现状有诸多不满，而这种不满情绪正是变革和进步的根源。被封建制度和宗教制度剥削的各个阶层都心怀不满。我们看到了农民起义的暴发，法国人称它们为“扎克雷起义”。可农民仍然是落后和软弱的。尽管他们发动了起义，但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因为属于农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真正的冲突发生在老的封建阶级和新兴的完全觉醒的中产阶级之间，因为中产阶级的力量正在逐渐壮大起来。封建制度意味着，财富是以土地为基础的——事实上，财富就是土地。可是现在，一种新的财富正在积累，而它并不来自土地。这种新的财富来自制造业和贸易。新兴的中产阶级或者叫作资产阶级，从制造业和贸易中获得了利益，逐步变得强大起来。其实，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两个阶级之间的相对地位发生了变化。尽管封建制度依然存在，但是它已经处于守势。而资产阶级则对自己的新力量充满了信心，开始向封建制度发起进攻。双方之间的斗争持续了几百年之久，而且越来越向着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方向发展。然而，在欧洲的不同国家，情况各有不同。在东欧，这样的斗争发生得并不多。而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地位却开始突显出来。

打破旧的壁垒之后，各个领域——科学、艺术、文学、建筑、新发现——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当人文精神冲破枷锁的时候，情况总是这样的，它会向各个领域扩展和传播。正因如此，当自由来到我们国家的时候，我们的人民也将在各个领域展示他们的才华和创造力。

教会放松了控制，它的权力也遭到了削弱，人们在大教堂和教会上的花费也减少了。很多地方建起了优美的楼宇，但它们都是市政厅一类的建筑。哥特式风格退隐了，一种新兴的风格却在逐步形成。

此时，西欧世界充满了新的能量，同时，又从东方袭来了黄金的诱惑。有关去过中国及印度的马可·波罗和其他旅行者的故事，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而东方的巨额财富，则把他们诱惑到了海上。就在此时，君士坦丁堡沦陷了。

土耳其人控制着去东方的陆路和海路，不过他们却不太鼓励人们进行贸易。大商人们对此很恼火，新生的冒险家们因为想得到东方的黄金，所以也对此愤愤不平。于是，他们试图寻找通往黄金东方的新路线。

现在所有的女学生都知道，我们的地球是圆的，它围绕着太阳转动。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可是在过去情况并非如此。那些胆敢这样想并且胆敢这样说出来的人，教会会找他们麻烦的。可是尽管人们害怕教会，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地球是圆的了。因而有些人认为，如果地球是圆的，那么向西走就有可能到达中国和印度。还有些人认为，绕过非洲就能够到达印度。

你得记住，当时是没有苏伊士运河的，船只无法从地中海到达红海。物资和商品以前都是在陆地上运输的，可能是放在骆驼背上，穿过地中海和红海之间的陆地，然后在陆地的另一边装进另外的船上。这样做，在任何时候都是很不方便的。而且在土耳其的南部还有埃及和叙利亚，这段旅程因而变得更为艰难了。

但是印度巨额的财富继续诱惑、激励、吸引着人们。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踏上了探险的旅程。那时的西班牙正在格拉纳达驱逐最后的摩尔人或萨拉森人（Saracens）。阿拉贡王国的费迪南德和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伊莎贝拉的联姻，统一了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1492年，也

就是土耳其人占领欧洲另一边的君士坦丁堡近50年之后，阿拉伯人的格拉纳达沦陷了。这样，西班牙就立刻成了欧洲一个庞大的基督教国家。

葡萄牙人尝试往东航行，而西班牙人则往西航行。1445年，葡萄牙人发现了佛得角（Cape Verde），这是航海史上第一个重大进展。佛得角位于非洲的最西端。看看非洲地图你就会发现，如果从欧洲去佛得角，船就得向西南方向航行。到了佛得角，绕过海角之后就开始向东南方向航行。发现佛得角是个鼓舞人心的信号，因为它使人们相信，他们可以绕过非洲，向印度航行。

然而，又过了40年，才有人成功绕过了非洲。1486年，葡萄牙人巴托罗缪·迪亚士（Bartholomew Diaz）航行绕过了非洲的最南端——也就是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几年之后，又一个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e Gama），利用这个发现，经好望角来到了印度。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抵达马拉巴尔海岸上的卡利卡特 (Calicut)。

因此，在谁先到达印度的竞赛中，葡萄牙人胜出了。然而，在世界的另一端，此时却发生了不少重大事件，西班牙人从这些事件中获得了很大益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于1492年抵达美洲大陆。哥伦布是个贫穷的热那亚人，他相信地球是圆的，所以他想向西航行去日本和印度。可他没有想到这次旅程最终远比他预想的要长得多。他往来于宫廷之间，到处游说，想劝诱某个王子来资助他的航海探险。终于，西班牙的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同意资助他。于是，哥伦布带领3艘小船和88名船员出发了。这是一次勇敢的、充满未知的冒险航行，因为没有人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但是哥伦布满怀着信念，而且最终事实证明了他的信念是正确的。经过69天的航行，他们来到了一片陆地。哥伦布认为这块陆地就是印度。而事实上，它只是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的一部分。那就是说，哥伦

布就连美洲大陆都未曾到达过，可是他至死都以为他到过亚洲。而且他这个奇怪错误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甚至到现在，这些岛屿仍然被称为西印度群岛，而美洲的原住民仍然被叫作印第安人（Indians）或红印第安人（Red Indians）。

哥伦布返回欧洲，又在第二年率领了比上一次多得多的船，再次出发了。欧洲人以为发现了去印度的新航线，为此激动不已。此后不久，瓦斯科·达·伽马仓促地开始了向东航行的旅程，并抵达了卡利卡特。随着东方和西方新发现的消息频频传来，欧洲人的激动情绪更加高涨了。而争夺这些新版图的两个竞争对手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这时候教皇出场了。为了避免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之间发生冲突，他决定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慷慨大方了一把。1493年，他颁布了一个教皇诏书——出于某种原因，教皇的公告或法令被称为“公牛”（Bull）——即“分界法令”（Bull of Demarcation）。他在亚速尔(Azores)以西100里格的地方，由北向南画了一条假想的线，宣布葡萄牙拥有这条线以东的所有非基督教的土地，而西班牙则拥有这条线以西的土地。这简直就是除了欧洲之外的整个一个世界的大礼，而教皇不花分文就把这份大礼分送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亚速尔是位于大西洋的群岛，在距亚速尔群岛以西100里格——大约相当于300英里处画线，就是把北美洲的全部和南美洲的大部分划到了西边。因此，实际上教皇就是把美洲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而把印度、中国、日本和其他东方国家以及整个非洲，作为礼物送给了葡萄牙！

于是葡萄牙人便开始行动了，他们要去占领这片广阔的领土。虽然这并非易事，但是他们取得了进展，并继续向东进发。他们在1510年到达了果阿（Goa）；1511年到达了马来半岛的马六甲(Malacca）；很快又到达了爪哇岛；1576年到达了中国。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占领了这些地方，他们只是在一些地方站稳了脚跟。至于他们将来在东方的经历，我们将在以后的信中讨论。

在去东方的葡萄牙人中，有一个名叫费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的人。他因为与他的葡萄牙主子们闹翻了，就返回了欧洲，并成了西班牙的臣民。他已经从东方航线经好望角去过印度和东部群岛，现在他想走西方航线，绕过美洲去那里。也许他知道，哥伦布发现的陆地根本就不是亚洲。的确，1513年，一个名叫巴尔博亚(Balboa)的西班牙人曾穿越中美洲的巴拿马的群山，到达了太平洋。可不知什么原因，他把这一海域称为“南海”（South Sea），他站在海岸边，声称这片新发现的海洋以及它所冲刷的土地归属于他的主子西班牙国王。

1519年，麦哲伦开始了他向西的航行，这将是航海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航行。他带领5艘船和270名船员，穿越大西洋到达南美洲，然后继续向南航行，直到抵达了大陆的南端。他的一艘船失事沉没了，还有一艘船开小差跑了；这样就剩下三艘船了。他带领这些船穿过南美大陆与一个岛屿之间的狭窄海峡，进入另一边的广阔海域。这就是太平洋，它是由麦哲伦命名的，因为和大西洋相比，它非常平静。

麦哲伦只用了14个月就到达了太平洋。他穿越的海峡至今仍以他的名字命名——麦哲伦海峡 (Strait of Magellan)。

接着，麦哲伦继续勇敢地向北航行，然后再向西北航行，穿越了这片未知的海洋。

这是此次航行中最糟糕的一段旅程。没有人想到它会如此漫长。大概有4个月，确切地说，是108天，他们都是在大洋中漂泊，食物和水极为匮乏。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菲律宾群岛(Philippine Islands)。那里的人们很友善，给他们食物，还和他们交换礼物。但是西班牙人十分傲慢无礼。麦哲伦参与了两位酋长之间的小规模冲突，在冲突中被当地人杀死了。还有许多西班牙人被当地岛民所杀，因为他们对岛民的态度极为傲慢无礼。

西班牙人要寻找香料岛，因为那里盛产珍贵的香料。他们在四处找寻的时候，不得不又抛弃并焚毁了一艘船，这样就只剩下两艘船了。于是，他们决定一艘船经太平洋返回西班牙，而另一艘则经好望角返回西班牙。经太平洋返回的那艘船没走多远就被葡萄牙人捕获了，而另外那艘名叫“维托里亚号”(Vitoria)的船则缓慢地绕过非洲，于1522年抵达了西班牙的塞维利亚（Seville），船上只剩下18名船员了。这距他们起航的日子仅仅过去了3年。这艘船环游了世界，而且它是第一艘环游世界的船。

我花了很多的笔墨来描述维托里亚号的航行，因为这是一次令人惊叹的航行。我们现在可以乘坐大轮船长途航行，舒服自在地穿越海洋，但是，想想那些早期的航海家，他们面临各种艰难险阻，投身到未知的世界，为后来的人们发现了海上航线。那时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虽然傲慢无礼又残忍，可是他们富有惊人的勇气和冒险精神。

当麦哲伦环绕地球航行的时候，科尔蒂斯进入墨西哥，为西班牙国王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关于这些，还有关于美洲的玛雅文明，我已经给你讲过一些。科尔蒂斯于1519年到达了墨西哥；皮萨罗于1530年到达了南美洲的印加帝国（Inca Empire，即现在的秘鲁）。凭借勇气、胆量，还有背信弃义和残忍，再加上当地人内部的不和，科尔蒂斯和皮萨罗成功终结了两个古老的帝国。不过，这两个帝国本来就已经是明日黄花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十分原始的。所以它们就像纸牌屋一样，一推就坍塌了。

探险家和探索者们所到之处都有成群的冒险家蜂拥而至，迫不及待地进行洗劫和掠夺。西班牙的属地美洲尤其深受其苦，甚至连哥伦布也遭到了他们的虐待。

同时，黄金和白银从秘鲁和墨西哥源源不断地流向西班牙。大量贵金属制品的涌入，令欧洲人眼花缭乱，并且使西班牙成了主宰欧洲

的强国。这些黄金和白银也流入欧洲的其他国家，于是那里的人们就有了充足的钱去购买东方制品。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成功自然激发起其他国家人们的想象力，尤其是法国人、英国人、荷兰人和德国北部城镇的人们。起初，他们拼命想找一条通向亚洲和美洲的北方航线，从挪威（Norway）的北部向东，经格陵兰岛（Greenland）再向西航行。但是他们没有成功，于是，也走上了那些众所周知的航线。

那一定是一个无比辉煌的时代，世界似乎敞开了大门，向人们展示她的宝藏和奇迹！新的发现接踵而来，海洋、新大陆，还有无以计数的财富，都在等待着那一声充满魔力的呼叫——“芝麻开门！”就连空气中都一定有这些冒险的魔语在低吟。

世界变小了，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发现的了。这似乎就是事实，但其实不然，因为科学打开了广阔的前景之门，等待着人们去探索，等待着人们去冒险。在今天的印度，更是如此！

74 ——蒙古帝国的瓦解

我已经给你写了欧洲中世纪的终结和新精神的觉醒，新的能量在许多地方找到了喷发的出口。欧洲似乎充满了活力和创造力。欧洲人被禁锢在自己的小国家里，几个世纪之后，冲出国门，穿越大洋，走向了世界远方的各个角落。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走出去，对自己的力量信心满满；正是这种自信给了他们勇气，让他们创造了奇迹。

可你一定想知道，这样突然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13世纪中叶，蒙古王国控制着亚洲和欧洲。东欧被它占领，而西欧则在这些英勇的、似乎战无不胜的斗士面前瑟瑟发抖。即使和大汗的一位将军相比，那些欧洲的国王和皇帝们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200年之后，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占据了帝都君士坦丁堡以及欧洲东南部的大部分领土。在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之间经历了800年的战争之后，这块吸引阿拉伯人和塞尔柱人的珍宝之地，落入了奥斯曼帝国之手。可是奥斯曼的苏丹并不满足，他们贪婪的眼睛又转向了西方，甚至落到了罗马身上。他们对德意志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和意大利构成了巨大威胁。他们还征服了匈牙利，并且兵临维也纳和意大利边境的城下。在东方，他们将巴格达纳入了他们的版图；而在南部，又占领了埃及。16世纪中叶，被称为苏莱曼大帝的苏丹苏莱曼统治着这个伟大的土耳其帝国。甚至在海上，他的舰队也是所向披靡的。

那么，情况是如何发生了变化的呢？欧洲是怎样摆脱掉蒙古帝国的威胁的呢？它又是如何在土耳其人的威胁之下生存下来的呢？它不

仅生存了下来，还变得极富进攻性，反而成了对别人的威胁，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蒙古帝国对欧洲的威胁并没有持续很久。为了回去推选一位新可汗，他们主动撤离了欧洲，之后就再没有回来。西欧距离他们在蒙古的故乡太遥远了。或许还因为他们习惯于开阔的大平原和大草原，而西欧是个多森林的国家，所以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力。不管怎样，西欧从蒙古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勇气，而是因为蒙古帝国对西欧不太感兴趣，而专注于其他的事情了。在东欧，蒙古帝国统治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到蒙古帝国逐渐瓦解时才结束。

我已经对你说过，人们认为土耳其人在1452年占领君士坦丁堡是欧洲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为了方便起见，人们以此作为中世纪的结束和新精神到来的标志。这种新精神就是文艺复兴，它在各个领域开花，并结出了累累硕果。于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就发生了。当欧洲受到土耳其人的威胁，而且土耳其人胜算的机会很大的时候，欧洲站立了起来，力量逐步壮大。当土耳其人继续向西欧推进的时候，欧洲的探险家们正在发现新的国家和海域，正在环绕地球航行。自1520年至1566年，在苏莱曼大帝的统治之下，土耳其帝国的疆土从维也纳一直扩展到了巴格达和开罗。但是，从那以后就再没有进展。古希腊人的君士坦丁堡素有软弱和腐败的传统，而土耳其人正是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之下，逐步走向衰落的。当欧洲羽翼丰满的时候，土耳其的力量却在慢慢削弱。

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次亚洲对欧洲的入侵。也有一些欧洲入侵亚洲的情况，但是时间都很短暂。亚历山大穿越亚洲到了印度，但是没有获得多少战果。罗马人最远也就到达了美索不达米亚。反之，欧洲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反反复复遭到亚洲部落的入侵。奥斯曼对欧洲的入侵，是这些来自亚洲入侵中的最后一次。渐渐地，我们发现亚欧之间发生了角色转换。欧洲变成了进攻的一方。这个变化

据说是发生在16世纪中叶。新发现的美洲很快就被欧洲征服。但是亚洲是个更棘手的问题。200年来，欧洲人一直设法在亚细亚大陆的许多地区找到立足之处。直到18世纪中叶，他们才开始控制亚洲的部分地区。大家应该记住这些，因为有些对历史知之甚少的人，以为欧洲一直都是高高在上，控制着亚洲呢。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欧洲只是到了近代才转变成了这种角色。可是现在，世界这个大舞台已经发生了变化，欧洲的角色似乎又过时了，因为在所有的东方国家，新的思想在涌动，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挑战和动摇着欧洲的统治。然而，比民族主义思想更加深刻、影响更加广泛的，是追求平等的新的社会思潮，这种平等的思潮就是要消灭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将来绝不能再有欧洲统治亚洲，或者亚洲统治欧洲，或者一个国家剥削另一个国家的情况存在了。

这个序言太长了点。我们还是回到蒙古帝国吧。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蒙古帝国的命运，看看蒙古帝国都经历了哪些事情。你应该记得，忽必烈可汗是蒙古帝国的末代可汗，他所统治的辽阔疆域横跨了从亚洲的朝鲜到欧洲的波兰和匈牙利的广阔版图。在他1292年去世之后，蒙古帝国分裂成五个帝国，而实际上这五个帝国都十分庞大。在前面一封信中（第68封）我已经告诉过你这五个帝国的名字。

这五个帝国中最大的就是中国，它的疆域包括东北地区、蒙古、西藏、朝鲜、安南、东京以及缅甸的一部分。忽必烈建立了元朝，之后他的后代继承了这片疆域。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中国在南方就丧失了大片土地。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在忽必烈去世仅66年之后，他的王朝就覆灭了，蒙古人被逐出了这片土地。

另外一个帝国，在遥远的西部，名叫金帐汗国——多么迷人的名字啊！在忽必烈死后近200年间，俄国贵族一直向它进贡。可到了后来（1840年），金帐汗国渐渐衰弱了。坐上了俄国贵族头把交椅的莫斯科大公（Prince of Moscow）便拒绝向金帐汗国进贡了。这位莫斯科

大公名叫伟大的伊凡（Ivan the Great）。在俄国的北部，有一个古老的共和国，诺夫哥罗德共和国，这是一个由商人控制的国家。伊凡打败了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使之成为俄罗斯的公国。同时，君士坦丁堡落入了土耳其人的手中，过去的皇族成员被赶了出来。伊凡娶了一个出生于过去的皇族家庭的女孩为妻，便声称自己是皇族成员，是古老的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沙皇俄国最初就是这样，在伟大的伊凡统治下建立起来，它最终于1917年被俄国革命所推翻。伟大的伊凡的孙子是个十分残忍的人，所以人们叫他“伊凡雷帝”(恐怖的伊凡）。他给了自己“沙皇”的头衔，就是“恺撒”或“皇帝”的同义词。

于是，蒙古帝国终于从欧洲退出了。那么至于金帐汗国或者中亚的其他蒙古帝国之后的境遇，我们就不必劳神探究了。而且我对它们的情况也知之甚少。但是，有一个人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此人就是帖木儿。他想成为第二个成吉思汗，声称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可是，他实际上是土耳其人。因为他是个跛子，所以人们叫他“帖木儿一兰”（Timur-i-lang），或“跛子帖木儿”（Timur Chengiz），或“泰摩兰”（Tamurlane）。他于1369年继承了父亲的王位，成为萨马尔罕城的统治者。此后不久，他便开始了残酷的扩张和征服。他是位了不起的将军，又是个极为残暴的人。那时中亚的蒙古帝国已皈依了伊斯兰教，帖木儿本人也是穆斯林。但是，信奉伊斯兰教一点儿也没有使他变得温和，所到之处带给人们的是荒芜、瘟疫和无尽的苦难。他最大的快乐就是用人的头颅堆起巨大的金字塔。从东边的德里到西边的小亚细亚，他带领军队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人，并用他们的头颅堆成了一座又一座金字塔！

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帝国，正如那个时代的其他帝国一样，都是残忍的破坏者。但是与那些帝王相比，帖木儿的残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因挥霍无度和凶恶残忍而闻名于世。据说，有一次，他用2000个活人搭起一个高塔，然后用砖块和砂浆糊在人肉塔上！

印度的财富吸引着这个残暴的人。但是，为了说服他的将军和贵族们同意他入侵印度的提议，他还是颇费了些周折。他们在撒马尔罕有一个议会，因为印度气候炎热，所以贵族们反对去印度。最终帖木儿承诺，不留在印度，只是掠夺、破坏，然后就返回。他最后也信守了诺言。

你要记住，当时印度的北部是在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在德里有一位苏丹。但是，这个伊斯兰教国家很软弱，加上在边境与蒙古帝国连续不断地发生战争，它已元气大伤。所以，当帖木儿率领一支蒙古帝国军队兵临城下之时，没有遇到多大的抵抗。接着帖木儿便兴致盎然地开始屠城，并堆起了头颅金字塔。不管是印度教教徒还是穆斯林，同样都惨遭杀戮。战俘成了负担，于是他下令把10万名战俘全部杀死。据说，在某个地方，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联合起来，为了荣誉，按照拉杰普特人传统的角哈祭仪式，冲向敌人，战死沙场。可是我为什么还要重复这个恐怖的故事呢？帖木儿和他的军队所到之处，留下的都是饥荒和瘟疫。他在德里待了15天，将这座伟大的城市变为了废墟。在返回萨马尔罕的途中，他又洗劫了克什米尔。

尽管帖木儿极其凶残，但他想在萨马尔罕和中亚的其他地方修建精美的建筑。于是，像很久以前的苏丹马哈茂德那样，他把印度的工匠、技师和建筑师集中起来，带回了他的帝国；他把最好的建筑师和工匠留下来为皇家服务，其他的则遣散到西亚的重要城市里。于是一种新的建筑风格渐渐形成了。

帖木儿撤离后，德里成了一座鬼城，饥荒和瘟疫肆虐。在两个月里，这里没有统治者，没有组织，没有秩序，只有很少的居民。甚至连帖木儿任命的德里总督也撤到了木尔坦（Multān）。

接着，帖木儿向西进攻，践踏和蹂躏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1402年，在安哥拉，他遇到一支奥斯曼土耳其的强悍军队。在他

的英明指挥下，他们打败了土耳其人。可是，海洋对他来说是不可逾越的，他无法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因此，欧洲便逃过了一劫。

三年之后，也就是1405年，帖木儿在远征中国的途中暴毙。这个占领了几乎整个西亚的伟大帝国，也随着他的离世而土崩瓦解了。奥斯曼土耳其以及埃及、金帐汗国曾经都向帖木儿朝贡。但是，他的才能仅限于军事领域，他的确有非凡的指挥才能。他指挥的西伯利亚雪原战役令人惊叹。可他骨子里就是个野蛮的游牧民。他没有像成吉思汗那样建立任何组织机构并培养得力的接班人，来继续执掌他的帝国，所以，他的帝国也就随他一起消亡了，只把屠杀和荒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在中亚的众多冒险家和征服者中，能让人们记住的只有四个人——伊斯坎达尔（即亚历山大大帝）、苏丹马哈茂德、成吉思汗、帖木儿。

帖木儿打败了奥斯曼土耳其，这使土耳其人大为恐慌。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他们很快就从失败中站了起来。50年后，他们占领了君士坦丁堡。

我们现在得离开中亚了。它的文明水准在倒退，渐被湮没了，没有再发生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昔日的文明被人类亲手毁灭，只有记忆留存下来，自然也对文明造成了严重破坏，使气候慢慢变得更加干燥，更不适于居住了。

我们也得对蒙古帝国说再见了。蒙古帝国中只有一个分支后来到了印度，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著名的伟大帝国。但是，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人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分崩离析了，又回到了小酋长、小部落的部族社会。

75 ——印度着手解决难题

我们已经跟你讲过帖木儿，以及他残忍的大屠杀，还有他用人的头颅堆起的金字塔。这一切似乎恐怖至极，野蛮无比！这样的暴行在我们的文明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还是不要这么笃定吧。只是到了近期，我们才看到和听到，甚至在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可能或者确实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可怕事件。无论成吉思汗还是帖木儿多么凶残地杀戮和无情地破坏，与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毁灭性的破坏相比，几乎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当代战争的惨绝人寰已经超越了蒙古帝国一次次的暴行总和。

然而，毫无疑问，从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年代到如今，人类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生活不仅变得无比复杂，也变得更加丰富了；人类探索自然，了解自然，并利用自然来服务于人类。当然，人类现在已变得更文明、更有教养了。那么，为什么到了战争时期，我们又会重新陷入野蛮残酷的状态呢？因为战争本身就是对文明和文化的否定和摒弃，但是它又利用了文明人的聪明才智，去发明并使用更具杀伤力、更可怕的武器。当战争来临的时候，大部分投身其中的人会陷入一种兴奋若狂、热血沸腾的状态，把文明、真理和生命的仁慈都抛在脑后，变成了和他们几千年前的祖先一样野蛮的人。那么，无论何时，战争一旦发生，它就会变成恐怖的恶魔，这一点还让人感到惊奇吗？

如果一个天外来客在战争期间访问我们这个世界，他会怎么评价我们呢？假设他只是在战争时期而不是在和平时期见到我们，他只能通过战争来评价我们，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是残酷无情的野蛮人，偶尔也会表现出勇敢无畏和牺牲精神，但是，总体来看，没有什

么可取之处，只是酷爱相互残杀和毁灭罢了。他会对我们做出错误的评价，并对我们的世界形成歪曲的看法，因为他只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对我们不太有利的时间，看到了我们的一个方面而已。

同样，如果我们只从战争和屠杀这方面来思考过去，那么我们也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不幸的是，战争和屠杀却总是能够吸引人们的目光。任何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都是比较单调的。历史学家对此有什么可说的呢？于是，他就抓住一场战争或者一场战斗，对其大肆渲染。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和忽视这些战争，但也不应该对其重要性言过其实。让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思考过去，从自身出发来审视过去的人们，这样，我们就会用更人性化的观点来看待他们，就会认识到，真正重要的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而非偶然的战争。你要记住这些，因为你会发现，你的历史书里过度渲染了这些战争，甚至连我给你写的这些信往往也会出现这种倾向。究其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很难描述过去年代里的日常生活，我对这些也不甚了解。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帖木儿曾给印度带来了最为深重的灾难。一想到他所到之处留下的恐怖踪迹就令人毛骨悚然。然而，印度南部完全没有受到他的侵害，东部、西部和中部也都幸免于难。甚至现在的联合省，除了在北部的德里和密拉特（Meerut）附近的一小片区域之外，实际上也逃过了帖木儿的洗劫。除了德里城之外，旁遮普邦是遭受帖木儿蹂躏最为惨重的邦。即使在旁遮普邦，虽然被帖木儿洗劫过的地方都尸横遍野，但是旁遮普邦的绝大多数人还在继续他们的日常工作，没有中断。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对这些战争和侵略的严重性言过其实。

让我们再来看看14世纪和15世纪的印度吧。德里苏丹所统治的领土不断缩小，到帖木儿入侵的时候，已经全部丧失了。在印度，有好几个独立的大国，它们大多是伊斯兰教国家；但是，在南方，有一个强大的印度教国家——维贾亚纳加尔。印度人对伊斯兰教已经不再感

到陌生和新奇，它已经在这里立足了。早期阿富汗的入侵者和奴隶主们已不再像从前那么凶猛和残暴了。伊斯兰教国家的国王和印度教国家的国王一样，大多为印度人，但国家之间没有什么联系，虽会有战争发生，但往往是因为政治，而非宗教引起的。有时候，伊斯兰教国家会雇用信仰印度教的军队，同样，印度教国家也会雇用信仰伊斯兰教的军队。伊斯兰教国家的国王经常娶信仰印度教的女人为妻，也聘用印度教教徒担任大臣和高级官员。在人们的心中，对于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并无高低贵贱之分。的确，大多数穆斯林，其中也包括一些统治者，都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印度人，他们许多人是为了博得宫廷的宠信，或者为了在经济上得到好处。尽管他们改变了宗教信仰，但仍然固守着他们过去的许多风俗习惯。有些伊斯兰教国家的统治者，采取强制措施让人们皈依伊斯兰教，但即使这样做，也主要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他们认为，皈依伊斯兰教的人会成为更忠诚的臣民。但是，强制措施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而更有效的却是经济措施。非穆斯林必须缴纳名为“吉兹亚”（jizya）的人头税，因此，许多人为了避税而成了穆斯林。

但是，这一切都发生在城市里，农村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几百万的村民继续着他们古老的生活方式。的确，国王的军官们会更多地干涉农村生活。村务委员会的权力已经不如过去那么大了，但是，它们仍然存在，而且是农村生活的中心和基础。在社会生活方面，农村的宗教和习俗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正如你知道的那样，印度仍然是由成千上万个乡村组成的国家。表面上我们似乎看到的都是城市和都会，但是真正的印度一直都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以乡村为主的。而印度的乡村并没有被伊斯兰教改变多少。

印度教在两个方面受到了伊斯兰教的冲击，但是，奇怪的是，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对立的。一方面，印度教变得保守了，坚固了，它把自己封闭起来，以保护自己不受伊斯兰教的冲击。种姓地位更加职业化，并且更加排外了；女人的深闺制度和隐居习俗变得更加普遍。而

另一方面，印度教内部出现了对种姓制度以及繁缛的礼拜和让人反感的仪式。因此，人们努力地对印度教进行了改良。

当然，从很早的时候起，贯穿历史的各个阶段，不断地涌现出了印度教的改革者，他们都试图去除印度教的弊病和陋习，佛陀就是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一位。我还跟你说过生活于8世纪的商羯罗。300年之后，也就是11世纪，又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改革者，罗摩奴阇（Ramanuja），他生活在南部的朱罗帝国，是一个与商羯罗学派对立的学派的掌门人。商羯罗属希瓦教派（Shaivite，即湿婆派），是个有智慧的人。罗摩奴阇属毗湿奴教派（Vaishnavite），是个有信仰的人。罗摩奴阇的影响遍及整个印度。我已经告诉过你，贯穿整个历史阶段，印度是如何在文化上始终保持统一的，尽管它在政治上也许分裂过，成为许多互相交战的国家。但无论何时，只要出现了伟人，或者发生了重要的运动，那么，不论国家之间有没有政治上的界限，伟人的思想，或者运动的影响，都会遍及整个印度。

伊斯兰教植根于印度之后，一位新型的改革者出现在了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他试图通过强调两种宗教的共同特点，同时抨击它们陈腐的仪式和礼仪，来拉近两种宗教彼此间的距离。他努力想创造一个两种宗教的结合体——也就是说，把两种宗教融合起来，这是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因为两者之间互相存有很多的反感和偏见。但是，我们将看到，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人在为宗教的融合而努力着，其中甚至有一些伊斯兰教的统治者，最著名的就是伟大的阿克巴。

拉玛南德（Ramanand）生活在14世纪的南方，他是第一位竭力鼓吹宗教融合的著名教师。他宣扬要反对和忽视种姓制度。他的信徒中有一位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织布工，名叫卡比尔（Kabir），后来，他广受人们的欢迎，声望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也许你知道，他用印地语写的歌，即使在现在的北部偏远乡村，也是家喻户晓的。他既不是印度教教徒，也非穆斯林，而是两者的结合体，或者处于两者之间。他

的追随者则来自两种宗教的教徒和各种种姓阶层。在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他死的时候，尸体是用床单覆盖着的；他的印度教信徒想将他火化，而他的穆斯林信徒则想将他土葬。他们为此争吵不休。但是，当他们揭开尸布时发现，让他们争吵不休的尸体已经不见了，尸布下只剩下一束鲜花。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很唯美。

卡比尔死后不久，在北方又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改革者和宗教领袖，他就是那纳克古鲁（Guru Nanak），锡克教（Sikhism）的创始人。在他之后，相继有10位锡克族的领袖，他们当中的最后一位是戈文德·辛格古鲁（Guru Govind Singh）。

在印度的宗教史和文化史中，还有一位著名的人物，我应该在这里提一下，他就是柴坦尼亚（Chaitanya），他是生活在16世纪早期的孟加拉地区的著名学者，但是，他突然意识到他的学者身份毫无价值，于是便放弃了学者身份，走上了信仰之路。他成了一位伟大的印度教的虔诚信徒。他带着信徒们在孟加拉地区四处游走，一边还吟唱着印度教的祈祷歌。他还创立了毗湿奴准则。至今他在孟加拉地区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

有关宗教改革和融合的事情就讲到这里。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也有这样的融合在发生，有些是有意识的，但更多的是无意识的。一种新的文化、新的建筑、新的语言正在形成。但是要记住，这一切大多发生在城市里而不是农村，尤其是发生在帝国的首都德里，以及其他王国和省邦的都会。高高在上的国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专制了。过去印度的统治者们有许多习俗和准则限制着他们的专制。新的伊斯兰教统治者们甚至连这些习俗和准则都剔除掉了。尽管，从理论上说，伊斯兰教更强调平等，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即使奴隶也可以成为苏丹。但是，国王的专制和无限制的权力还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疯狂的图格鲁克苏丹把首都从德里迁到了道拉塔巴德，还有什么例子能比这个更让人吃惊的吗？

苏丹豢养奴隶之风更加盛行。在战争中，他们费尽周折捕获奴隶，其中他们最看重的是工匠，其他的人则被召入帐下当警卫。

那么那烂陀大学、塔克西拉大学，这些名牌大学的情况又怎样呢？它们早已不复存在了，但是有很多新型的大学中心出现了，它们被称为“托尔”（Tol）。人们在那里学习古老的梵文知识。它们不是现代化的学校，而是沉迷于过去，保持着一种保守的精神。贝拿勒斯一直是这些中心里最大的中心之一。

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了卡比尔用印地语写的歌。因此，印地语在15世纪不仅已经广为流传，而且还演变成了一种文学语言。梵语早就不再是活语言了。甚至在迦梨陀娑和笈多帝国时期，梵语也仅限于在学术领域使用。普通百姓日常使用的是普拉克利特语，它是从梵语变化而成的语言。慢慢地，从梵语变化而成的其他语言——印地语、孟加拉语、马拉地语和古吉拉特语也逐渐形成了。许多穆斯林作家和诗人都用印度语写作。15世纪，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江布尔（Jaunpur）国王曾让人把《摩诃婆罗多》和《薄伽梵歌》从梵语翻译成了孟加拉语。而在南部比贾布尔（Bijapur）的穆斯林统治者们则是用马拉地文来记账。所以，我们看到，在15世纪，这些由梵语变化而来的语言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当然，在南部，德拉威语（Dravidian）——包括泰米尔语、泰卢固语、马拉雅拉姆语和卡纳拉语——要古老得多。

穆斯林法庭使用的语言是波斯语。受过教育的人，如果他们做与法庭和政府部门相关的工作，大多都学习波斯语。因此，有很多的印度教教徒学习波斯语。另外，在军营和市场里，一种新语言渐渐形成了，它叫“乌尔都语”，“乌尔都”一词是“军营”的意思。事实上，它不是新语言，只是印地语穿了件稍有不同的外衣而已；里面加入了更多的波斯语词汇，其他与印地语并无二致。这种印地-乌尔都语，或有时被称为印度斯坦语，广泛流传于印度的北部和中部。现在有1.5亿人说印度斯坦语，而且它在不同地区，语言差异很小。能听懂

印度斯坦语的人数则更多。所以，从人数来看，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语言之一。

在建筑方面，一些新的风格形成了，许多宏伟壮丽的建筑诞生了——在南方的比贾布尔和维贾亚纳加尔；在戈尔康达（Golkonda）；在当时雄伟而美丽的城市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在离阿拉哈巴德不远的江布尔，都出现了宏伟壮丽的建筑。你还记得我们曾去游览海得拉巴附近的戈尔康达古遗迹的情形吗？我们走上大要塞，看见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老城，雄伟的宫殿和宽阔的市场——现在都成了废墟。

所以，当帝王们相互争斗、相互摧毁的时候，在印度有一股无声的力量，为了使印度人民能够在一起和谐地生活，共同为社会的进步和繁荣贡献力量，正在不断努力，寻求一种融合。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的努力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在目标尚未完成之前，又出现了分歧和争吵，我们又走了一段回头路。今天，为了使所有美好的事物都能够走向融合，我们再次踏上了同一条前行的道路。但是，这一次，我们要让融合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它一定要建立在自由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而且必须适合更好的世界秩序。只有这样，它才能经久不衰。

几百年来，宗教和文化的融合问题吸引了印度人太多的注意力，他们把心思都放在这个问题上了，政治和社会的自由都被抛在了脑后。正当欧洲在各个领域大踏步前进的时候，印度却止步不前、不思进取、迟缓呆滞。

正如我跟你说过的，印度曾一度控制着海外市场，因为印度在化学领域——染料制造——还有炼钢领域，以及许多其他领域都很先进。印度船只载着自己的商品，运到遥远的地方。可是到我们刚才谈论的那个时代，印度早已失去了这种控制力。但到16世纪，河流又重

新流向了东方。最初，它只是涓涓细流，但是，很快就会成为滚滚洪流。

76 ——南印度的王国

让我们再看看印度，看看那些由许许多多的王国和帝国汇合而成、不断变幻的全景图吧。它简直就像是一部巨幅而又无休止的电影，展示着一个个无声的画面。

也许你还记得那个疯狂的苏丹，穆罕默德·图格鲁克，以及他如何成功地分裂了德里帝国。南部的大省纷纷脱离帝国，在那里出现了新的国家，其中主要的就是印度教国家维贾亚纳加尔和伊斯兰教国家古尔伯加（Gulbarga）。东部的加尔（Gaur）省，包括孟加拉地区和比哈尔邦，则成了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教王国。

穆罕默德的继任者，是他的侄子菲罗兹沙阿（Firoz Shah）。菲罗兹沙阿比他的叔叔更明智，也更仁慈，但并不十分宽容。他是个很有能力的统治者，把很多改革措施引入了他的政府。他无法收回那些南部和东部已经分裂出去的省份。但是，他设法阻止了帝国的进一步分裂。他特别喜欢修建新的城市、宫殿、清真寺，还喜欢设计庭园。德里附近的菲罗扎巴德（Firozābād），还有离阿拉哈巴德不远的江布尔，都是他的杰作。另外，他在亚穆纳河上挖了一条大运河，还修缮了许多即将坍塌的旧建筑。他对自己的杰作都颇为得意，并将他修建的新建筑和修缮的旧建筑列出了一个长长的清单。

菲罗兹沙阿的母亲是拉杰普特人，名叫碧碧·奈拉（Bibi Naila），是一位大酋长的女儿。传说她的族人最初拒绝让她嫁给菲罗兹的父亲，于是战争爆发了，碧碧·奈拉的国家就遭到了攻击和蹂躏。当碧碧·奈拉得知她的臣民因为她而遭受苦难的时候，她非常难过，于是决定结束战争，把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于是，她主动嫁

给了菲罗兹沙阿的父亲。就这样，菲罗兹就有了拉杰普特人的血统。你会发现，这种伊斯兰教统治者和拉杰普特女人之间的异族通婚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了，这对于一个共同民族性的情感形成，应该起了一定的作用。

菲罗兹沙阿于1388年去世，在位长达37年。他统治的德里帝国在他死后立刻就土崩瓦解了，中央政府不复存在，各地小领主开始为所欲为。就是在这样一个混乱而脆弱的时期，帖木儿从北方举兵来犯，而这是在菲罗兹沙阿去世仅仅10年之后。帖木儿在德里几乎将所有居民都斩尽杀绝了。后来德里渐渐恢复了元气。50年后，它又成了苏丹统治下的中央政府所在地。但是，德里只是个小王国，无法和南部、西部和东部的大帝国相提并论。德里的苏丹都是阿富汗人，他们都是些无能的家伙，最后，就连他们自己的阿富汗贵族也忍无可忍，厌恶至极，便请来了一个外族人来统治他们。这个人名叫巴布尔，是蒙古人，或者叫莫卧儿人，这是蒙古人来到印度定居后的名字。他是帖木儿的嫡系后代，其母亲则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当时，他正统治着喀布尔。他欣然接受了邀请，来到了印度；实际上，即使没有邀请，他可能自己也会来的。1526年，在德里附近的帕尼帕特（Panipat）大草原上，巴布尔战胜了印度斯坦帝国，又一个伟大的帝国就此诞生了，这就是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而德里则重新获得了它的显赫地位，成了帝国首都。但是，在我们讨论这些之前，我们必须先看看印度的其他地方，看看在德里衰退的这150年中，那些地方都发生了什么。

在这一时期，印度境内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王国。在新建的江布尔城，有一个小的伊斯兰教国家，被沙契（Sharqi）国王统治着。它面积不大，国力不强，政治上也并没什么影响力。但是，在15世纪的近百年中，它文化繁荣兴盛，宗教和悦、宽容。江布尔的穆斯林学院负责传播这些宽容的思想，还有一位统治者甚至试图使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融合在一起，关于这个人，我在上一封信里已经写过了。国家鼓励艺术和精美的建筑，同样也鼓励印地语和孟加拉语等正在该国形成的

语言。在这种宽容的气氛里，这个短命的江布尔小国脱颖而出，成了学术、文化和宽容的避风港。

在东部，几乎与阿拉哈巴德接壤的，是伟大的加尔王国，比哈尔邦和孟加拉地区都包括在内。加尔城是一个港口城市，有海路与印度的海岸城市相通。在印度中部的阿拉哈巴德以西，接近古吉拉特邦，是马尔瓦邦（Malwa），它的省会是曼杜（Mandu）。曼杜既是城市，也是要塞。在这里修建了许多美丽壮观的建筑，直到现在，它们的遗迹还吸引着无数的观光客。

马尔瓦王国的西北部是拉杰普塔纳，那里有许多拉杰普特人的王国，最著名的要数奇图尔王国。奇图尔王国、马尔瓦王国和古吉拉特王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与另外两个强大的王国相比，奇图尔王国显得非常弱小，但是拉杰普特人骁勇善战，尽管他们人数少，但有时候也能取胜。奇图尔的拉纳（Rana）王为了庆祝对马尔瓦王国之战的胜利，在奇图尔修建了一座精美的高塔——胜利之塔。曼杜的苏丹不愿意输给拉纳王，便在曼杜也建了一座高塔。奇图尔的塔至今还在，而曼杜的塔却早已没了踪迹。

马尔瓦的西边是古吉拉特王国。这是一个强大的王国，它的都城是由苏丹艾哈迈德国王建立的艾哈迈达巴德，这是一个居民近百万的大都市。都市里建起了许多雄伟的建筑，据说，从15世纪到18世纪的300年间，艾哈迈达巴德是全世界最繁华的都市之一。人们奇怪地发现，这个都市里气势宏伟的贾米清真寺（Jami Masjid），和奇图尔的拉纳王在兰布尔（Rānpur）所建的耆那教寺院非常相似，而它们基本是同时修建的。由此可以看出，古印度的建筑师们是如何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才建起了新风格的建筑。这里，你又一次看到了艺术领域的融合，正如我前面已经提及的那样。即使到现在，在艾哈迈达巴德还有许多这种精美的古老建筑，石头上都有美丽的雕刻。而在这些建筑周围建起的新的工业化城市却毫无美感可言。

正是在这个时候，葡萄牙人抵达了印度。你应该记得，瓦斯科·达·伽马是第一个绕过好望角的人。他于1498年抵达了卡利卡特。当然，很多欧洲人之前曾经来过印度，但他们是作为商人，或只是作为访客而来的。但是现在，葡萄牙人却带着不一样的想法来到了这里。他们傲慢而自信，因为教皇已经把东方世界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们。他们是为了征服这片土地而来的。一开始他们来的人为数不多，可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船只的到来，他们占领了一些海岸城市，果阿便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但是，葡萄牙人在印度没有太多建树，他们一直没有进入内地。不过，他们却是最早从海路入侵印度的欧洲人。很久之后，法国人和英国人也来了。海路敞开之后，印度沿海地区变得不堪一击。南印度的古老帝国已经衰落了，所以他们的注意力便转向了来自内地的威胁。

古吉拉特的苏丹甚至从海上抵抗过葡萄牙人的进攻。他们联合奥斯曼土耳其人打败了一支葡萄牙人的舰队。但后来葡萄牙人还是得胜了，取得了制海权。此时古吉拉特的苏丹因为害怕德里的莫卧儿人，便寻求与葡萄牙人讲和，最后却被葡萄牙人耍了。

早在14世纪，印度南部就出现了两个强大的国家：古尔伯加，也叫巴赫曼尼（Bahmani）王国，以及它南边的维贾亚纳加尔。巴赫曼尼王国的疆域覆盖了整个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卡纳塔克邦的部分地区。它的政权维持了150多年，但是它的统治却是一段可耻的历史，充斥着褊狭、暴力和谋杀；苏丹和贵族们穷奢极侈，而老百姓们却贫穷悲惨。由于统治者的无能，早在16世纪，巴赫曼尼王国就覆灭了，分裂成了五个苏丹国——比贾布尔、艾哈迈德讷格尔（Ahmednagar）、戈尔康达、比德尔（Bidar）和贝拉尔（Berar）。与此同时，维贾亚纳加尔已经存在了近200年，而且依然很繁盛。在这6个国家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各自都想得到南部的控制权。它们之间有各种形式的联合，而且不断发生着变化。有时候，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和一个印度教国家开战；有时候，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和一个印度教国家联合起来，与另一

个伊斯兰教国家开战。这些战争都纯粹是出于政治目的。一旦某一个国家过于强大，那么其他几个国家就会联合起来对付它。由于维贾亚纳加尔太强大，太富有，终于在1565年，伊斯兰教国家结成同盟，向它开战，并在达利戈达（Tālikota）战役中将它彻底击败。维贾亚纳加尔帝国在繁盛了两个半世纪之后覆灭了，这座宏伟壮丽的城市也随即遭到了彻底的毁灭。

胜利的同盟国家之间很快开始出现了内讧，并相互开战。可是没过多久，德里的莫卧儿帝国的威胁开始向它们逼近。它们的另一个麻烦是葡萄牙人，他们于1510年占领了属于比贾布尔王国的果阿。尽管印度人想尽办法要把他们赶走，可他们硬是留了下来。他们的指挥官阿尔布克尔克（Albuquerque），虽然有东方总督的绚丽头衔，可他是个血腥残暴的恶棍。葡萄牙人大肆屠杀，连女人和孩子都不放过。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葡萄牙人一直留在了果阿。

在南方的王国曾经建起了宏伟的建筑，尤其是在维贾亚纳加尔、戈尔康达和比贾布尔。戈尔康达现在已是一片废墟；比贾布尔仍然保留了很多美丽的建筑；维贾亚纳加尔当时就被夷为了平地，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戈尔康达附近建起了一座城市——海得拉巴。南方的这些建筑师和工匠据说后来去了北方，在阿格拉参与修建了泰姬陵（Taj Mahal）。

尽管两种宗教之间总体上说是相互宽容的，但是偏见和狭隘也时有发生。两种宗教之间的战争常常伴随着恐怖的杀戮和破坏。但有意思的是，伊斯兰教王国比贾布尔有印度教的骑兵，而印度教国家维贾亚纳加尔也有一些伊斯兰教的军队。当时，文明似乎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文明只是富人的秀场，战场上的士兵与此无缘。士兵都很贫穷，却要为富人的穷奢极侈去卖命；自古以来，这种情况都没有发生过变化。

77 ——维贾亚纳加尔

在我们上封信里讨论的南部所有王国里，维贾亚纳加尔的历史是最长的。恰好有很多的外国访客来过这里，并留下了对这个王国和城市的描述：有1420年来这里的意大利人尼克罗·孔蒂（Nicolo Conti）；1443年来这里的赫拉特人阿卜杜-拉扎克（Abdur-Razzaq），他来自中亚的大可汗国的宫廷；还有1522年来访的葡萄牙人佩斯（Paes）；还有很多其他人。印度的一部历史书也记载了南印度各国的情况，尤其是比贾布尔的情况，这是在阿克巴时代，也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时期之后不久，由福瑞施塔（Ferishta）用波斯文写成的。现代人写的历史往往带有偏见，而且很夸张，但是对我们还是很有帮助的。除了关于克什米尔历史的《罗阇塔兰吉尼》之外，对于伊斯兰教进入印度之前的历史记载少之又少，因此，福瑞施塔所写的历史是伟大的创新，接着便有其他人紧随其后效仿他。

国外来访者对维贾亚纳加尔的描述为我们呈现了这座城市生动而客观的画面。他们为我们描述的不仅仅是时常发生的可恶的战争。现在我来给你讲讲这些人都谈了些什么吧。

维贾亚纳加尔大约建立于1336年。它位于现在南印度的卡纳塔克地区。由于它是印度教国家，自然就吸引了许多来自南方伊斯兰教国家的难民，因而它迅速壮大，几年之内维贾亚纳加尔帝国就控制了整个印度南部地区，而它的都城因其财富和美丽十分引人注目。这样维贾亚纳加尔就成了德干高原居统治地位的强国。

福瑞施塔告诉我们，维贾亚纳加尔拥有巨额的财富，可谓富甲天下。他还描述了一位古尔伯加的伊斯兰教国家巴赫曼尼的国王，于

1406年前来帝都迎娶一位维贾亚纳加尔公主的情景。他说，6英里长的路上，铺满了金缕布、天鹅绒和诸如此类的豪华的东西。真是骄奢淫逸，暴殄天物！

1420年到来的意大利人尼克罗·孔蒂告诉我们，帝都方圆60英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有数不清的庭院。孔蒂认为，维贾亚纳加尔的统治者，人们叫他“拉亚”（Raya），是当时印度最强大的统治者。

接着就是来自中亚的阿卜杜-拉扎克。在他去维贾亚纳加尔的途中，在门格洛尔（Mangalore）附近，他看见了一座用纯黄铜建起的一座绝美的寺庙，15英尺高，底基长宽各30英尺。再往前走，在贝鲁尔（Belur）又有一座令他更为惊叹的寺庙。的确，他并没有试图去描述它，因为他担心，如果他这么做了，人们会说他“夸大其词”！之后，当他抵达维贾亚纳加尔城时，他陷入了狂喜之中。他说：“我在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从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像这样的城市。”他描述了市里的许多市场：“在每个市场的最前面，都有一个高耸的拱廊和华丽的走廊，但是，国王的宫殿比所有这些都更加巍峨。”“市场很长，也很宽阔……在城里总能买到鲜花，它们甚至像食物一样成了这里的必需品，因为离开了鲜花，人们就无法生存。每一行业或手工业的商人都把商店紧挨在一起。珠宝商在市场里公开兜售他们的红宝石、珍珠、钻石和祖母绿宝石。”阿卜杜-拉扎克继续描写道：“在这个神奇的地方，有国王的宫殿，还有许多小河和溪流，流经用琢石砌的水渠，琢石既光滑，又平整……整个城市星罗棋布，缤纷多彩，很难用有限的文字来描述它。”这位于15世纪中叶从中亚来的访客继续娓娓而谈，赞不绝口，对维贾亚纳加尔充满溢美之词。

也许人们会认为，阿卜杜-拉扎克没有去过多少大城市，所以一看见维贾亚纳加尔就会如此大惊小怪。然而，我们的下一位访客可是一位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人哦。他是葡萄牙人佩斯，他于1522年来到

这里，这正是文艺复兴影响意大利、许多精美宏伟的建筑在意大利城市里纷纷矗立起来的时候。佩斯显然很了解这些意大利的城市，所以他的记述是很有价值的。他说："维贾亚纳加尔之大，完全可与罗马相比肩，而且十分美丽，令人赏心悦目。"他大篇幅描述了城市的奇观，以及它不可胜数、令人陶醉的湖泊、水渠和果园。他说，这是"世界上供应最为丰富的城市……其他的城市不时会出现物资匮乏的情况，而在这里，各种物资都极为丰富"。他还参观了宫殿里的一个房间："房间，还有卧室从上到下所有墙壁上都是象牙，立柱和顶上的横梁上都是象牙雕刻的玫瑰花和莲花，工艺精湛之至，令人叹为观止——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如此丰富而美丽的画面。"

佩斯还描述了他来访期间的维贾亚纳加尔的统治者。他是南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他是位伟大的斗士，对敌人也尽显骑士风度。他大力赞助文化事业，是位广受欢迎、慷慨大方的国王。他的美好声誉至今还留在南印度人的心中。他的名字就是克利须那·德瓦·拉亚（Krishna Deva Raya）。从1509年至1529年，他统治了维贾亚纳加尔帝国20年。佩斯提到了他的身高和体态，甚至还说到了他白皙的皮肤。"他是最受人敬畏、完美得无以复加的国王，性情乐观而快乐。他对外国人总是以礼相待，热情周到，无论他们的身份地位如何，都对他们关心备至。"鉴于国王有这么多的优秀品质，佩斯说："与像他这样的人应该拥有的东西相比，似乎他实际上一无所有，但是他华贵完美，拥有一切。"这的确是高度的赞誉。

这时的维贾亚纳加尔帝国，疆域遍布整个南海岸和东海岸，包括迈索尔、特拉凡戈尔，以及现在的整个马德拉斯的辖区。

还有一件事我要说一下。大约在公元1400年就建起了伟大的水利工程，把干净的水引入了城市。整个一条河的周边都筑起了大坝，建起了一个大水库；从这里，水顺着引水渠流入城市；水渠长15英里，通常是用坚硬的岩石切割后砌成的。这就是维贾亚纳加尔。它对自己

的财富和美丽无比自豪，对自己的实力自信满满，但是没有人想到，这座城市和帝国的末日很快就要来临了。就在佩斯来访仅43年之后，危险突然降临到了帝国身上。德干高原的其他帝国，出于对维贾亚纳加尔的嫉妒，组成了一个联盟来对付它，要将它摧毁。即使到那时，维贾亚纳加尔仍然盲目自信。末日很快就到来了，结局惨不忍睹。

我已经告诉过你，维贾亚纳加尔在1565年被其他王国组成的联盟击败，先是残忍的大屠杀，之后不久就开始了对这座伟大城市的大洗劫。所有宏伟壮丽的建筑，如寺庙、宫殿，都毁于一旦。精美的石刻和雕像都被砸碎了，只要能烧的所有东西都付之一炬。一切都被毁了，只剩下一片废墟。一位英国史学家说：“在世界历史上，也许从未有过如此突如其来的浩劫降临到一个如此壮美的城市之上，这里的人们富裕而勤劳，他们原本生活在富足繁荣之中，然而，无以名状的野蛮而又恐怖的屠城开始了。顷刻之间，整座城市便遭到了占领和洗劫，变成了一片废墟。”

78 ——马来西亚帝国之满者伯夷和马六甲

我们有点儿忽略了马来西亚和东部群岛，因为已经好久没有提到它们了。我回头看了看，发现我最后一次讲到它们的情况是在第46封信里，之后我们又写了31封信，现在已经写到第78封了。可是要协调有序地讲述所有国家的历史是很不容易的。

你还记得正好两个月前的今天我给你写的信吗？关于柬埔寨、吴哥、苏门答腊和三佛齐的？在印度支那（Indo-China），老的印度殖民地是如何在几百年间发展成一个大国——柬埔寨帝国的？然而，大自然突如其来，残酷无情地终结了这个城市和帝国。这大约发生在公元1300年。

几乎在同一时期——也就是与柬埔寨同时期存在的，还有另一个国家，它就在与柬埔寨隔海相望的苏门答腊岛上：三佛齐帝国生涯开始得要晚一些，却比柬埔寨存在的时间更长。它的终结也十分突然，但终结它的是人，而不是大自然。300年来，三佛齐这个佛教帝国兴旺繁盛，控制了东部的几乎所有岛屿，甚至一度在印度、锡兰和中国都占有一席之地。它是一个商人的帝国，其主要支柱就是贸易。但是，在不远处，爪哇岛的东部，另一个商人的帝国出现了，这是一个印度教帝国，它始终不向三佛齐帝国屈服。从9世纪初开始的400年间，这个东部的爪哇国一直受到不断壮大的三佛齐帝国的威胁，但是它成功地保全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同时还修建了许许多多精美的石头寺庙，其中最为壮观的是婆罗浮屠塔，这些塔群留存至今，仍吸引着无数的观光客。东爪哇国不仅没有被三佛齐帝国统治，它自己还变得寻衅好

斗，反而对其老对手三佛齐帝国构成了威胁。两个帝国都是商人的帝国，做跨海贸易，所以它们之间经常发生冲突。

我对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竞争以及当代强国之间的竞争，比如德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很感兴趣，于是将它们做了个对比。爪哇国觉得，抑制三佛齐帝国并扩大自己贸易的唯一方法就是大力加强自身的海军力量和发展海上实力。于是他们派出了大规模的海军远征队，但是很多年来，远征队并不常和敌人发生冲突。这样，爪哇国继续发展壮大，变得越来越好斗。至13世纪末，他们建立了一座城市，名叫满者伯夷，它就成了不断发展壮大的爪哇国的首都。

爪哇国变得非常专横跋扈，傲慢自大，竟然侮辱了大可汗忽必烈派来收贡品的使节。他们不仅没有向大可汗进贡，还在一位使节的前额上刺上了侮辱性的文字！这是在和蒙古可汗玩一个非常愚蠢而危险的游戏。成吉思汗灭了中亚，后来旭烈兀灭了巴格达，原因都是因为类似的侮辱。然而，小岛上的爪哇国竟敢如此胆大妄为。但是，幸运的是，蒙古人已经温和了许多，已经无意去征服别人了。况且海战也不是他们的强项，他们只有在坚实的土地上才能感到自己的强大。但是忽必烈还是派了远征队去爪哇，惩罚那个罪不可恕的统治者。中国人打败了爪哇人，杀死了国王。然而，他们似乎并没有进行什么破坏活动。蒙古人在中国人的影响下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

的确，中国的远征队似乎最终使爪哇，或者我们现在称它为满者伯夷帝国，变得更加强大了。这是因为中国人把火器带到了爪哇，可能就是因为使用了这些火器，才使得满者伯夷在后来的战争中赢得了胜利。

满者伯夷继续扩张。它的扩张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随意的。这是由帝国组织的，由高效能的陆军和海军执行的帝国主义扩张。在帝国扩张期间，有一个阶段帝国的统治者是一个女人，她就是苏希达（Suhita）女王。当时的政府似乎权力高度集中，效率极高。西方的

史学家们说，满者伯夷有极好的税收、关税、通行费以及内部税入制度。政府的各部门包括殖民部、商务部、公共福利和公共健康部、内务部和作战部。它的最高法庭里有两名主管官员和七名法官。婆罗门牧师似乎有很大的权力，但是他们都在国王的控制之下。

这些部门，甚至这些部门的一些名称，多多少少会使我们想起《政事论》。但是殖民部是个新部门。内务部的负责人被称为部长，他负责处理国家内部事务。这表明，在来自南印度的帕拉瓦殖民者最早在此定居之后，印度的传统和文化在这些岛屿延续了1200年之久。而只有保持和印度的联系，才有可能延续它的传统和文化。毫无疑问，和印度的联系是通过贸易来维持的。

由于满者伯夷是一个贸易帝国，所以它自然会很周密仔细地安排出口和进口贸易，即输出的商品贸易和从其他国家输入的商品贸易。它主要是和印度、中国以及它自己的殖民地进行贸易。只要它和三佛齐处于战争状态，就不可能与三佛齐及其殖民地进行和平的贸易活动。

爪哇国维持了好几百年，但是满者伯夷帝国的全盛时期只有45年，从1335年至1380年。正是在此期间，三佛齐终于在1377年被占领并遭到了摧毁。满者伯夷帝国与安南、暹罗和柬埔寨结成了联盟。

满者伯夷的首都是个美丽繁荣的城市，在城市的中心有一个巨大的湿婆神庙。它还有许多壮观的建筑。的确，在马来西亚的所有印度殖民地都热衷于修建精美的建筑。另外，在爪哇岛上，还有其他几个大城市和许多港口。

这个大帝国在灭掉它的老对手三佛齐之后，自己也行将就木。帝国发生了内乱，又和中国惹上了麻烦，致使中国出动了一支强大的舰队来到爪哇。帝国的殖民地也在逐渐减少。1426年，帝国发生了大饥

荒，两年之后，满者伯夷帝国已不复存在。然而，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又继续存在了50年，直到被伊斯兰教王国马六甲占领。

马来西亚的早期印度殖民地区产生了许多帝国，而满者伯夷是这其中第三个覆灭的帝国。我们的信虽然短，但是涉及的历史时期非常漫长。第一批印度殖民者几乎在公元之初就从印度来到这里，而现在我们已经讲到了15世纪。所以，我们已经概括论述了1400年的印度殖民历史。我们特别讨论的这三个帝国——柬埔寨、三佛齐和满者伯夷——都存在了几百年。你要记住，在这些漫长的岁月里，人们看到了稳定和高效的帝国。它们尤其爱好精美的建筑，而它们的主业则是贸易。它们继承了印度的文化，并将其与中国文化中的许多元素和谐地结合在了一起。

你应该记得，除了我特别提及的这三个帝国之外，还有许多印度的殖民地。但是我们无法分别一一讲述。我也不能对这两个邻国——缅甸和暹罗——说得太多。在这两个国家都出现了一些强大的帝国，它们都从事了大量的艺术活动。佛教在这两个国家都传播广泛。缅甸曾经受到蒙古人的入侵，但是暹罗从未遭到中国的干涉。然而，缅甸和暹罗都经常向中国进贡。而这种进贡是小弟弟向大哥哥表示的敬意，而它们得到的回报是中国大哥哥给小弟弟的丰厚礼品。

在蒙古入侵之前，缅甸的首都在缅甸的北部城市帕甘（Pagan）。200年来，这个城市一直都是首都，据说这是座十分美丽的城市，它唯一的竞争对手是吴哥。它最精致的建筑是阿南达寺（Anand Temple），是全世界最美的佛教建筑之典范。还有其他许多宏伟建筑。的确，甚至现在的帕甘城遗迹也很美。帕甘的兴盛时期是从11世纪到13世纪。在此之后，缅甸经历了一段动乱和恐慌时期，缅甸的南方与北方分裂了。16世纪，在南方出现了一位伟大的统治者，他再次统一了缅甸。他的首都在南方的勃固（Pegu）。

我这么突然地用很短的篇幅谈及缅甸和暹罗，希望不会把你弄糊涂。我们有关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Indonesia）历史的章节已经接近尾声，所以我想给我们的概述画上句号。迄今为止，这些地区所受到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影响主要来自印度和中国。正如我已经告诉过你的，在东南亚的大陆国家，诸如缅甸、暹罗、印度支那，受到中国的影响更多一些，而那些岛屿以及马来半岛则受到印度的影响更多一些。

接着又一种新的影响力出现了，它来自阿拉伯人。缅甸和暹罗并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而马来半岛和那些岛屿则顺从了阿拉伯人，因此，很快那里就建立了一个伊斯兰教帝国。

阿拉伯的商人们来到了这些岛屿，在此已经定居1000多年了。但是他们只专心做生意，在其他方面从不干涉政府事务。14世纪，阿拉伯的传教士从阿拉伯半岛来到这里。他们可谓旗开得胜，尤其是成功地使一些当地的统治者皈依了伊斯兰教。

同时，政治上的变化也在发生。满者伯夷不断扩张，征服了三佛齐。三佛齐沦陷之后，大批难民流入马来半岛的南部，在那里建立了马六甲城。这座城市，还有那些帝国，迅速发展，到公元1400年，马六甲已经是一个大城市了。然而，满者伯夷的爪哇人并不受那些被他们征服的子民的爱戴。因为，正像所有的帝国主义者一样，他们也十分暴虐，所以很多人宁愿去新的马六甲王国，而不愿意留在满者伯夷。暹罗在当时也是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以马六甲成了许多人的避难之地。那里既有佛教教徒，也有穆斯林。那里的统治者最初是佛教教徒，但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

年轻的马六甲王国一边受到爪哇国的威胁，另一边受到暹罗的威胁，因此它试图在诸多岛屿上的小伊斯兰教王国中找到朋友和同盟。它甚至请求中国予以保护。那时，明朝已经取代蒙古人，统治了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所有小伊斯兰教王国是如何同时向中国寻求保护

的，这实在令人惊叹不已。这表明，它们一定都受到了强大敌人的直接威胁。

而对待马来西亚的这些国家，中国向来奉行的是友好而又高高在上的孤立政策。它并不热衷于征服，因为它觉得从中得不到多少好处。但是它很乐意向这些国家传授它的文明。而明朝皇帝朱棣显然决心要改变这个古老的政策，并对这些国家给予更多的重视。他似乎不能接受爪哇和暹罗的侵略行径。因此，为了抑制这些侵略行为，并让其他国家感受到中国的强大，他派出了由海军上将郑和率领的一支伟大的舰队，舰队中有些船只长达400英尺。

郑和去东南亚航行了很多次，拜访了几乎那里所有的岛屿——菲律宾、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半岛等。他甚至来到锡兰，并征服了它，还把国王掠去了中国。他的最后一次探险航行最远到达了波斯湾。郑和在15世纪初期的航行对他所访问过的所有国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抑制印度教国家满者伯夷和佛教国家暹罗的发展，他蓄意鼓励伊斯兰教。在他的庞大舰队的保护之下，马六甲王国的地位稳固地确立了。郑和的所作所为当然都是为了政治目的，跟宗教毫无关系。而他本人是位佛教教徒。

于是马六甲帝国成了满者伯夷的敌对国中的领头羊，它的力量不断壮大，渐渐地，它夺取了爪哇的殖民地。1478年，满者伯夷城本身也被占领了。然后伊斯兰教成了宫廷和各个城市的宗教。但是，在农村，就像在印度一样，古老的信仰、神话和习俗仍然在延续。

马六甲帝国本来是有可能成为像三佛齐和满者伯夷那样的伟大而长久的帝国的，可是它没有机会了。葡萄牙人来了，几年之后，也就是在1511年，马六甲帝国沦陷，落入了葡萄牙人的手中。这样，第四个帝国让位于第五个，而第五个帝国本身又是个短命的帝国。那么，有史以来，欧洲第一次在东方的土地上占据了进攻和支配的地位。

79 ——欧洲开始入侵东亚

在我们上封信结尾的时候说，葡萄牙人已经来到了马来西亚。你应该记得，我曾在不久之前给你讲过关于海路大发现，以及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之间如何相互竞争，看谁能先到达东方。葡萄牙人向东航行，西班牙人向西航行。葡萄牙人设法绕过非洲，抵达了印度。而西班牙人误打误撞到了美洲。后来他们绕过南美洲，抵达了马来西亚。那么现在让我们顺着这些线索，继续来讲马来西亚的故事吧。

你也许知道，香料（胡椒等）产自赤道附近气候炎热的国家，欧洲根本不出产这些香料。虽然南印度和锡兰出产一些香料，但是香料大部分产自马来西亚一个名叫摩鹿加群岛（Moluccas）的地方。这些岛屿实际上就叫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欧洲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对香料有着大量的需求，所以香料经常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香料一旦运到欧洲便身价倍增。在罗马时代，胡椒的价格相当于同等重量的黄金。尽管香料这么值钱，而且在西方需求量如此之大，但是欧洲并没有自己前去购买香料。很长一段时间，香料贸易都是控制在印度人的手中，后来阿拉伯人又控制了它。然而，正是因为香料的诱惑，才把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不断地吸引过来，相会在马来西亚。在这次远征中，葡萄牙人占了先机，因为西班牙人正在前往东方途中的美洲忙碌着，他们在忙着挣大钱。

在瓦斯科·达·伽马经好望角抵达印度之后不久，许多葡萄牙船只也沿着同一线路而来，并继续向东航行。那时新建立的马六甲帝国控制着香料和其他贸易，所以葡萄牙人很快就与马六甲帝国以及所有的阿拉伯商人发生了冲突。他们的总督阿尔布克尔克于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终结了穆斯林商人的贸易活动。那么，现在葡萄牙人控制了

对欧洲的贸易，他们在欧洲的首都里斯本（Lisbon），成了在欧洲分销香料以及许多其他东方产品的大商贸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阿尔布克尔克对阿拉伯人而言，是个严厉而残忍的敌人，但是他极力与东方的其他生意人友好相处。他对遇到的所有中国人尤其彬彬有礼，结果就有很多对葡萄牙人赞许有加的报告传到了中国。而阿尔布克尔克对阿拉伯人充满敌意，也许是阿拉伯人在东方贸易中占支配地位的缘故。

同时，葡萄牙人还在继续寻找香料岛。那个后来穿越太平洋完成了环游世界航行的麦哲伦，就是发现摩鹿加群岛的那支探险队的一员。60多年来，葡萄牙人在对欧洲的香料贸易中从没有遇到过竞争对手。

然后，在1565年，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群岛，这样第二个欧洲国家就走进了东方。但是，西班牙人并未对葡萄牙人的贸易产生多少影响，因为葡萄牙人的主业并非商业。他们派出了士兵和传教士到东方去。同时葡萄牙人已经垄断了香料贸易，连波斯和埃及都只能通过葡萄牙人购买香料。他们甚至不允许其他人直接和香料岛做贸易。所以葡萄牙人发了大财，但是他们无意开拓殖民地。正像你知道的，葡萄牙是个小国家，没有足够的人可以派去国外。这么一个小国家，在整个16世纪的100年间，在东方所做的一切，足以让人们惊叹不已了。

同时，西班牙人留在了菲律宾群岛，并在那里大肆勒索钱财。而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什么建树。他们和葡萄牙人达成了协议，以避免在东方与之发生冲突。西班牙政府不允许菲律宾群岛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进行贸易，因为他们担心墨西哥和秘鲁的黄金和白银会流到东方去。每年只有一艘船往返于菲律宾群岛和美洲之间，它叫“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你可以想象，在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一定会多么期盼这一年一度的来访。240年来，这艘马尼拉大帆船就这样穿越太平洋，往返航行在菲律宾群岛和美洲之间。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成功，令欧洲其他国家十分眼红。正像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那样，西班牙当时在欧洲处于很重要的地位。而英国几乎不在一流强国之列。在尼德兰——也就是荷兰以及比利时的部分地区——曾发生过一次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英国人同情荷兰人，嫉妒西班牙人，所以暗中帮助荷兰人。一些英国水兵在公海上四处游荡，干着海盗的勾当，抢劫来自美洲的满载着财宝的西班牙船只。领头玩这种有利可图的危险游戏的人是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爵士，他把这称作“烧焦西班牙国王的胡须”。

1577年，德雷克率领五艘船出征，去劫掠西班牙的殖民地。他的袭击很成功，但是，他自己也损失了四艘船。只有一艘船——金鹿号（Golden Hind）——抵达了太平洋，德雷克就是乘着这艘船经好望角回到了英国。这样他完成了环游世界的航行，而金鹿号则是第二艘环游世界的船只；第一艘是麦哲伦的维托里亚号，它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环游地球的航行。

而“烧焦西班牙国王胡须”的行动没过多久就惹来了麻烦。不久英国和西班牙之间便爆发了战争。当时荷兰正在和西班牙作战，葡萄牙也参与其中，因为前些年统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是同一位国王。凭借着坚强的决心和许多好运气，英国在这场战争中大获全胜，这让整个欧洲惊愕不已。你应该记得，西班牙派去镇压英国的“无敌舰队”被击败了。可是，我们目前要关注的还是发生在东方的事情。

英国人和荷兰人都入侵了远东，对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发起了进攻。西班牙人都集中在菲律宾群岛，所以对他们而言，抵御外敌的进犯并不难。可是葡萄牙人却遭到了重创。他们的东方帝国从红海到香料岛摩鹿加群岛，延绵达6000英里。他们分布在亚丁附近、波斯湾、锡兰以及许多印度沿海地区，当然，还有整个东部岛屿以及马来群岛。渐渐地，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东方帝国；一个接一个的城镇，一片接一片的殖民地，落入了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手中。就连马六甲也于

1641年陷落了。剩下的就只有在印度和其他地方的几个小的前哨基地。西印度的果阿便是其中最主要的基地，葡萄牙人留在了那里，它成为几年前建立的葡萄牙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伟大的阿克巴曾试图从葡萄牙人的手中夺取果阿，但没有成功。

就这样，葡萄牙人退出了东方的历史舞台。这个小国曾分得一大杯羹，但它又无法将它吞进，反而使自己精疲力尽。西班牙还是牢牢控制着菲律宾，但是在东方事务中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珍贵的东方贸易的控制权现在已经归属荷兰和英国了。这两个国家都为此做好了充分准备，成立了贸易公司。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1600年为东印度公司发放了特许执照。两年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成立了。这两家公司都只是为做生意而成立的。它们都是私有公司，但经常得到国家的帮助。它们主要是对马来西亚的香料贸易感兴趣。而印度当时是在莫卧儿皇帝统治之下的一个强大国家，可不是好惹的。

荷兰人和英国人之间也常常失和，英国人最终从东部群岛撤出，更多地去关注印度了。那时强大的莫卧儿帝国已经衰弱，这就给了外来的冒险家们可乘之机。我们以后将看到，这些冒险家是如何从英国和法国来到这里，通过阴谋和武力设法在这个正在分崩离析的帝国抢占一席之地的。

80 ——中国的和平繁荣时代

亲爱的，我知道你生病了，可能还在卧床休息吧。消息传到监狱里是需要时间的。我帮不了你什么，你得照顾好自己。但是，我会非常牵挂你的。真是不可思议，我们一家人被分散到各个不同的地方——你，远在浦那；你的妈妈，在阿拉哈巴德，她正在生病；家里的其他人都在各地的监狱中！

有些日子里，我发现给你写这些信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得假装在和你交谈，但是我很难做到这一点。我想到你在浦那，卧病在床，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到你；还要再过多少月，多少年，我们才能相见啊；而在此期间，你将长成什么样子呢？

可是，想得太多也于事无补，尤其是身陷狱中的时候。我必须克制自己，暂时忘掉现在，还是回到过去吧。

我们在讨论马来西亚，对吗？我们看见了一个奇怪的开始，欧洲人在亚洲变成了进攻者；葡萄牙人来了，然后是西班牙人，接着是英国人和荷兰人。但是，很长一段时间，这些欧洲人的活动都局限在马来西亚及附近岛屿。在西边，是莫卧儿帝国统治下的强大印度；在北边，是中国，它也完全有能力保卫自己。因此，印度和中国都没怎么受到欧洲人的干扰。

从马来西亚到中国只有一步之遥。现在我们去中国吧。由蒙古人忽必烈可汗建立的元朝已经覆灭了。1368年，农民起义把最后的蒙古军队赶到了长城之外。这次起义的领袖是朱元璋，他是贫苦农民家的儿子，没有受过什么学校教育。但是，他在生活的大学校里却是个好

学生，并成了一位杰出的领袖，后来还成了睿智的统治者。他没有因为当了皇帝就居功自傲，自我膨胀。他一辈子都记得自己是人民的儿子。他统治中国30年，至今他的统治仍为人们称道，因为他为了让人民大众生活得更好而不懈努力，而他自己就是来自人民大众的。直到最后，他还保持着早期的朴素。

朱元璋是新建立的明朝的第一位皇帝。他的儿子永乐大帝，于1402年至1424年在位，也是位伟大的统治者。但我不必让你记住这些中国人的名字。明朝虽然有几个圣明的统治者，但也有腐败和堕落，事情往往都是如此。还是让我们忘记这些皇帝，去看看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吧。这是个光明的时代，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明”这个字本身就是“光明”的意思。明朝统治中国276年——从1368年至1644年。它是所有朝代中最具中国特色的一个朝代。在明朝的统治下，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发挥。这一时期，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和平安宁。没有对外的侵略政策；没有帝国主义的冒险活动，它与邻国友好相处。只是在北方，有来自游牧民族鞑靼部落的威胁。而对于东方世界的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就是个大哥哥，它聪明睿智，彬彬有礼，深受爱戴，虽然自知自己的优越地位，但仍然善待小弟弟们，愿意给他们传授并与他们分享自己的文化和文明。而小弟弟们则对中国大哥哥尊敬有加。有一段时间，日本甚至承认中国为其宗主国，它的统治者，也就是将军，称自己为明朝皇帝的臣属。朝鲜、印度尼西亚群岛——爪哇岛、苏门答腊岛等——以及印度支那，都向明朝进贡。

正是在永乐年间，郑和将军率领伟大的海军远征队，前往了马来西亚。在近30年的时间里，郑和在整个东方海域直到波斯湾一带航行、漫游。这看似是一种对群岛上各个国家的帝国主义恐吓行为。然而，很显然，他并没有征服或者有其他掠夺的意图。也许是因为暹罗和满者伯夷的成长壮大诱使永乐皇帝派出了郑和的远征队。但是，不论是什么原因，郑和远征队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它遏制了满者伯

夷和暹罗，鼓励了新兴的伊斯兰教国家马六甲，并把中国文化传播到整个印度尼西亚和东方。

中国与邻国和平友好地相处，因而就有更多的精力把国内治理好了。有一个好的政府对农民实行减税政策，减轻农民的负担。政府还修整了道路、水路、运河和水库。公共粮仓也建了起来，这样在收成不好和遇到灾荒时，公共粮仓就可以为百姓提供粮食了。政府发行了纸币，这样就增强了政府的信誉，也便利了贸易和商品交换。这种纸币被广泛应用，70%的税费都可以用它来支付。

这一时期的文化史更加值得注意。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就是一个有文化教养、有艺术才能的民族。明朝政府治国有方，同时还鼓励艺术创作，这使人民的天赋得到了充分发挥。宏伟的建筑纷纷矗立起来，还有许多伟大的画作问世。另外，明代的瓷器因其优雅的形态和精美的工艺而闻名于世。当时意大利在文艺复兴的激励下，出现了很多伟大的绘画巨作，而明朝的画作完全可以与之相媲美。

15世纪末期，中国无论在财富、工业上，还是在文化上，都远远走在欧洲的前面。在整个明代，无论欧洲还是其他地方，在人民的福祉和文化活动方面，都无法和中国相比。要记住，这也包括欧洲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

明朝的艺术之所以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原因之一是，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传世之作，其中有宏伟的纪念碑、精美的木雕、象牙雕和玉雕，还有青铜花瓶以及瓷器。可是到了明朝末期，艺术设计开始变得过于繁复，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雕刻和绘画的风格。

就是在这个阶段，葡萄牙的舰船第一次来到了中国。他们于1516年抵达了广州，阿尔布克尔克十分小心地善待他遇到的所有中国人，于是，对他赞赏的报告便传到了中国，因此，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可是，不久之后，葡萄牙人在很多方面开始胡作非为了。他们还

在一些地方建起了要塞。中国政府对这种野蛮行径十分震惊，但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可是最终中国政府还是把他们都赶了出去。于是，葡萄牙人意识到，他们通常的做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所以他们变得平和、谦卑了一些。1557年，他们获准在广州附近定居，并在那里建立了澳门。

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基督教传教士也来了，其中最为有名的一位是圣弗朗西斯·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他在印度待了很久，你会看到，有许多教会学校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也去过日本。他在一个中国口岸等待登陆许可的时候去世了。中国人并不鼓励基督教传教士。然而，有两位耶稣会的牧师装扮成佛教弟子，在中国学习了好几年中文。他们成了伟大的儒家学者，还是知名的科学家。其中的一位名叫利玛窦（Mateo Ricci），是位精明能干、才华横溢的学者，而且他足智多谋，能够说服皇帝。后来他撕下了伪装，并且在他的影响下，基督教在中国赢得了更高的地位。

荷兰人在17世纪初来到了澳门，并要求获准进行贸易。但是，他们和葡萄牙人之间水火不容。葡萄牙人极力挑唆中国人反对荷兰人。他们对中国人说，荷兰人都是些凶残的海盗，于是中国人拒绝给他们贸易权。几年之后，荷兰人从他们在爪哇岛的巴达维亚（Batavia）城派出了一支舰队前往澳门。他们很愚蠢，试图用武力夺取澳门，而中国人和葡萄牙人对他们来说，简直太强大了。

英国人也紧随荷兰人来了，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直到明朝灭亡之后，他们才在中国贸易中分得了一杯羹。

明朝也像所有的事物一样，经历了由盛及衰的自然过程。到17世纪中叶，明朝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鞑靼部落最初只是北方上空一片小小的乌云，但它不断长大，最终发展成了投向整个中国的阴影。你应该记得过去的金人，也叫金鞑靼人，他们把宋朝赶到了中国的南方，而自己又被蒙古人赶走了。此时，一个新的部落，金人的远亲，在中

国的北部，也就是现在的满洲，异军突起。他们自称为满族。而正是满族最终灭掉了明朝。

但是，如果中国不是因为内部派系斗争而四分五裂的话，满族人是很难征服中国的。外国对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成功入侵——包括中国和印度等——都是由于国家自身的衰弱及其民族内部的矛盾冲突，给了外国势力可乘之机。在中国，各地都发生了骚乱。也许是因为后来的明朝皇帝腐败无能，或经济状况太糟糕，才引起了一场社会革命。与满族的战争使中国政府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政府资源也因此变得极度紧张。土匪强盗在各地兴起，而其中最大一股土匪的头目实际上还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皇帝。率领明朝军队抗击满族入侵的将军名叫吴三桂。他在土匪皇帝和满族人之间进退维谷，难以选择。可是最终他还是做出了愚蠢的背叛性选择，他请求满族帮助他对付土匪皇帝。满族人很乐意这么做，并且理所当然地留在了北京。那么，吴三桂深信明朝大势已去，便背弃了明朝，投靠了外来的入侵者——满族人。

吴三桂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叛臣之一，一直到今天，中国人都还在憎恨吴三桂，这就不足为奇了。他被委以重任，保卫国家，却卖身投靠敌人，实际上还帮助敌人，让南方几省都归顺了满族人。满族人为了奖赏他为满族赢得的这几个省份，便任命他为这几个省的总督。

1650年，广州被满族人占领，至此，满族人征服了整个中国。他们的胜利或许是因为他们比中国人更加勇猛善战，或许是因为中国人经历了太久的和平繁荣时期，战斗力被削弱了。但是满族人如此神速地征服了中国，还另有原因，那就是他们竭尽所能地赢得了中国人的支持。在以往的时代，鞑靼人的入侵常常伴随着暴行和屠杀。可是，在这次入侵中，满族人不遗余力地把中国的官员争取了过来，并再次

委以官职。于是中国的官员占据了最高层的职位。明朝政府的工作方法也没有改变，制度似乎也相同，只是改换了顶层的指挥者而已。

但是，有两个重要的事实表明中国人已被外族统治了。满族的军队驻扎在重要的中心地带；满族人有梳马尾辫的习俗，他们把这个习俗强加给中国人，作为归顺的象征。我们很多人总是把中国人和马尾辫联系在一起，可它根本不是中国人的习俗。它是被奴役的象征，就像今天有些印度人采用的很多标记一样，而他们却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和丢人。现在中国人已经剪掉了马尾辫。

这样，中国的光明时代明朝就终结了。人们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一个清明的政府，治理国家近300年之后，竟然如此突然地覆灭了？如果明朝政府真的这么清正廉洁，为什么会有反叛和内乱发生呢？为什么没能阻止来自满族的外来入侵呢？也许明朝政府后期变得暴虐，也许政府过度的家长式管理使人民变软弱了。过度宠爱对孩子和对国家都没有好处。

人们也许还会感到奇怪，那个时候，中国在文化方面高度发展，为什么在其他方面却没有什么进步呢？如科学、发现等。欧洲人远远落后于中国，然而，你看到，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充满了力量，富有冒险精神和探索精神。对于中国和欧洲，你可以做这样的比喻：中国是一个有教养的中年人，喜欢平静的生活，不热衷于新的冒险，不喜欢打乱规律的生活，忙于研究古典文化和艺术；而欧洲则是个毛头小伙儿，桀骜不驯，富有激情和探求精神，渴望到各处去冒险。中国不乏美妙动人之处，然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81 ——日本闭关自守

我们不妨从中国转去日本，途中在朝鲜做短暂的停留。当然，蒙古人已经统治了朝鲜。他们也试图入侵日本，但没有成功。忽必烈可汗派出了几支远征队前往日本，可是都被日本击退了。蒙古人似乎从来就没有适应大海，因为他们本质上还是陆地上的人。而日本是个岛国，因此逃过了蒙古人的洗劫。

蒙古人被赶出中国后不久，在朝鲜发生了一场革命，归顺蒙古人的那些统治者被赶了出去。这次起义的领袖是一位爱国的朝鲜人，名叫李成桂（Yi Taijo），他成了朝鲜的新的统治者，也是新王朝的开创者。这个王朝延续了500年——从1392年，一直到近代，最终日本吞并了朝鲜。汉城（Seoul）是当时的首都，并一直延续至今。我们不可能细说朝鲜这500年的历史。高丽现在又重新被称为朝鲜，以一个独立国家的姿态继续存在着，不过它一直生活在中国的阴影之下，常常要向中国进贡。它还与日本发生过几次战争，其中有几次还取得了胜利。可是，现在这两个国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日本是一个伟大而强盛的帝国，充斥着帝国主义强国的各种恶习；可怜的朝鲜只是这个帝国的一小部分，遭到日本人的统治和剥削。朝鲜人民无助但勇敢地为自由而斗争着。但这已是近代历史了，而我们正在讨论的还是遥远的过去。

你应该还记得，在日本，到12世纪末，幕府将军已经成为真正的统治者，而天皇几乎就是个傀儡。第一个幕府叫作镰仓幕府，持续了近150年，它有高效的政府，给国家带来了和平。但是，接踵而来的，也是通常会发生的，就是统治王朝的衰落，政府的无能、腐败以及内战。想维护自己权力的天皇与幕府将军之间发生了冲突，天皇失败

了，老的幕府也失败了，一批新的幕府将军于1338年掌管了政权，这就是室町幕府（Ashikaga Shogunate），它持续了235年。可是，这个时期也充斥着冲突和战争。室町幕府和中国的明朝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有一位幕府将军，因为急于赢得明朝的青睐，甚至甘于向明朝皇帝俯首称臣。日本的史学家们对这种轻贱日本的行为怒不可遏，都严厉谴责这位将军。

这个时期与中国的关系自然十分友好，日本对明朝时期盛行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日本人研究和欣赏中国所有的东西——绘画、诗歌、建筑、哲学，甚至兵法。有两个著名的建筑金阁寺（Kinkakuji）和银阁寺（Ginkakuji）就是在这个时期修建起来的。

而就在艺术的发展和奢华的另一面，农民的生活却苦不堪言。农民承担的赋税极为沉重，内战的负担大多落到了他们的身上。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甚至到了最后，中央政府在首都之外都已经无法行使职权了。

正是在这些战争期间，葡萄牙人于1542年来到了日本。有意思的是，火器是由葡萄牙人带到日本的。这真是很奇怪，因为中国人早就有了火器。事实上，欧洲人一定是通过蒙古人从中国人那里知道火器的。

有三个人终于把日本从几百年的内战中成功地解救了出来，他们是织田信长（Norbunaga），一位大名，或贵族；丰臣秀吉（Hideyoshi），一位农民；还有德川家康（Tokugawa Iyeyasu），最大的贵族之一。到16世纪末，整个日本再次统一了。农民出身的丰臣秀吉是日本最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可是据说，他长相极其丑陋——又矮又胖，还长着一张猿人似的脸。

统一日本之后，面对庞大的军队，这些人都不知所措。因为军队无事可做，他们便开始入侵朝鲜。可是，他们很快就对此懊悔不已，

朝鲜人击败了日本的海军，控制了两国之间的日本海。朝鲜人取胜主要得益于一种新型舰船的帮助，这种船有铁板制成的像龟背一样的顶棚，所以被称为“龟船”，它们可以随意前进和后退，日本的战舰就是被它们击毁的。

德川家康，就是我上面提到的第三个人，设法通过内战发了大财。他腰缠万贯，并拥有近七分之一的日本国土。就是他，在自己领地的中央建立了江户（Yedo），也就是后来的东京。德川家康于1603年成为幕府将军，于是便开始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幕府时期——德川幕府时期，持续了250多年。

同时，葡萄牙人在日本开展一些小规模的贸易活动。50年来，他们没有遇到来自欧洲的竞争者；西班牙人1592年才来到日本，而荷兰人和英国人来得更晚。基督教似乎是在1549年由圣弗朗西斯·沙勿略引入日本的。日本允许甚至鼓励耶稣会会士布道，这是出于政治的原因，因为佛教寺院被认为是阴谋的温床。正因为如此，这些僧侣受到压制，而基督教的传教士则受到了青睐。但是，不久日本人觉得这些传教士是危险人物，便立刻改变了政策，又试图将他们赶走。早在1587年，日本就颁布了一个反基督教的法令，勒令所有传教士20天内离开日本，违者处死。此法令并不针对商人，法令指出，商人可以留下来进行贸易，但是，如果他们用商船把传教士带到日本，那么商船及船上的货物都将被没收。该法令的通过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丰臣秀吉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觉得，传教士和他们的皈依者可能会成为政治上的危险分子，而他的想法也并无大错。

此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情，使丰臣秀吉深信，他的忧虑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件事情也激怒了他。你可能还记得马尼拉大帆船，它曾经每年一次航行于菲律宾群岛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之间。一次，它被台风吹到了日本海岸上，西班牙的船长想吓唬当地的日本人，于是给他们看一幅世界地图，并特别指出西班牙国王的广阔领地。当他们问

船长，西班牙是怎样得到这么巨大的帝国的，他的回答是：再简单不过了，传教士先去那里，等皈依教会的人多了，再派士兵去，和皈依者联合起来，推翻政府。此事件的报告送达到了丰臣秀吉手里，他十分不悦，并因此对传教士更加憎恨。他放走了马尼拉大帆船，但下令处死了一些传教士和皈依者。

当德川家康成为幕府将军时，他对外国人更加友好了，并对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感兴趣，尤其是发展自己的港口江户的对外贸易。但是，德川家康死后，对基督徒的迫害又开始了。传教士被强行赶走，皈依基督教的日本人被迫放弃基督教，甚至商业政策也发生了改变。日本人对外国人的政治阴谋惊恐万分，所以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外国人赶出去。

人们可以理解日本人的这种反应。可让人吃惊的是，尽管他们和欧洲人并无太多交集，但是，他们竟然能够透过欧洲人披着的宗教羊皮，看穿其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在后来的岁月里，在其他的国家，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了欧洲列强如何利用宗教使自己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那么，接下来发生了历史上很奇特的事情，那就是日本开始了闭关自守。他们蓄意采取了孤立和排外的政策，而一旦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就把这种政策执行到了极致。英国人发现自己并不受欢迎，于是从1623年起便不再去日本了。次年，西班牙人遭到驱逐，因为日本人最害怕的就是西班牙人。日本规定，只有非基督徒才可以出国做贸易，即使他们也不能去菲律宾群岛。最终，十几年之后，在1636年，日本彻底把自己封闭了起来。葡萄牙人也被赶了出去；所有日本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不得以任何理由出国；居住在国外的日本人也不许回日本。违者格杀勿论！只有一些荷兰人留下了，但是他们被绝对禁止离开港口，不准进入内地。1641年，甚至这些荷兰人也被迁到长崎（Nagasaki）港的一个小岛上，像囚犯一样被圈在那里。

就这样，在第一批葡萄牙人来到日本的99年后，日本切断了与外国的一切交往，把自己封闭了起来。

1640年，一艘葡萄牙船只载着特使来到日本，请求恢复与日本的贸易，但是毫无结果。日本人杀了使节和大部分的船员，只留下几个活着的船员回去报信。

200多年来，日本几乎完全断绝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甚至与自己的邻居中国和朝鲜也不再往来。那个小岛上的几个荷兰人，还有偶尔过来的而且在严格监督之下的中国人，是日本与外界仅有的联系。这种与世隔绝真的是非同一般，没有任何一段有记载的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发生过这种情况。即使是中部非洲，也常常与他们的邻邦交往。把自己孤立起来是很危险的，无论是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个国家，都是如此。但是，日本生存下来了，而且国内很和平，并从长期的战乱中恢复了元气。等到日本终于在1853年重新打开门户的时候，它又做出了惊人之举，它飞速前进，找回了失去的时间，赶上了欧洲国家，并在欧洲人自己的游戏里击败了欧洲人。

干巴巴的历史梗概是多么枯燥无味，其中的数字是多么单薄而又没有生气啊！可是，有时当你读着古书的时候，生命似乎又注入了死寂的过去，舞台似乎来到我们的眼前，活生生的、爱恨交织的人们在舞台上移动着。我一直在阅读关于古代日本的一位迷人女士的故事，她是紫式部（Murasaki，973——1015）女士，生活在几百年前——比我这封信里写的日本战国时期（1467——1615）还要早很多。她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描述了她在日本皇家宫廷的生活。当我阅读这篇小说摘录的时候，那些宜人的抚摸、亲密的缠绵，以及宫廷生活的无聊，让我感到紫式部女士变得非常真切，一幅旧时日本宫廷有限但唯美的生动画面，开始在我的眼前徐徐展开。

82 ——动乱中的欧洲

我已经好几天没给你写信了，自从上次写信到现在应该快有两个星期了。人在狱中是会有情绪的——的确，就像在外面世界里的人一样——而最近，我一点都没有想写信的感觉，因为这些信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看得到。它们被钉在一起，放在一边，等待着那个时刻，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到那时，也许你能看到它们，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啊！当我们再次相见，相互凝视，我会惊奇地发现，你长大了，有了很多变化。那时我们将有很多要谈和要做的事情，你是不会太留意这些信的。到那时，这些信将堆成山，而我的狱中生活将有几百个小时被锁在这些信里啊！

可是，我还是要继续写下去，把这已经写好的一堆信再堆得更高一些。你或许会对它们感兴趣，而我对它们当然是感兴趣的。

我们已经在亚洲逗留了一阵子了，讲述了发生在印度、马来西亚、中国和日本的故事。正当欧洲慢慢醒来，开始变得有趣的时候，我们有些突然地离开了它。那里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这是一种再生，或许说是一种新生更为准确，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正在发展的16世纪的欧洲，并不是任何过去某一时期的复制，它是一个新的事物，或者至少也是罩上了一个全新壳子的旧东西。

欧洲到处都是骚乱和不安，人们在努力打破禁锢和藩篱。好几百年来，以封建思想为基础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覆盖着欧洲，将其牢牢地禁锢着。在一段时间里，这个壳阻碍了欧洲的成长。但是，现在这个壳在许多地方已经开裂了。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和早期的海路发现者们打破了这个壳，而西班牙和葡萄牙从美洲和东方掠夺了巨额

财富，一夜暴富，令欧洲目眩、惊奇，从而加速了这场变革。欧洲的目光开始投向狭窄海域之外的地方，并开始从整个世界范围来思考问题了。世界贸易和疆土在欧洲人面前展开了无限的可能性。资产阶级成长起来，力量更强大了。封建制度在西欧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它已经过时，这种制度的本质就是对农民进行无耻的剥削。农民被迫劳动，没有工钱，还要向领主缴纳各种苛捐杂税，而领主本人就是法官。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农民起义和战争时常爆发。农民战争的范围越来越广，并且越来越频繁。在欧洲的许多地方，经济变革也接踵而至，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取代了封建制度。经济变革的发生主要是由这些农民起义或扎克雷起义引起的。

可你不要以为这些变革发生得很迅速。这些变革的发生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几十年来，内战在欧洲蔓延。实际上，欧洲的大部分都被这些战争毁灭了。不仅发生了农民起义，还有我们将看到的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像荷兰独立战争那样为自由而战的民族战争，还有资产阶级反对绝对王权的起义等。这些听起来让人十分困惑，对吗？嗯，这确实让人很困惑，很复杂。但是，如果我们看看那些重大事件和运动，我们就能够悟出点儿什么东西来。

你要记住的第一件事就是，农民极度贫困，痛苦不堪，这就导致了农民战争。第二件要注意的事是，资产阶级的兴起和生产力的发展。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商品上，贸易活动也更多了。第三件要注意的事是，教会是最大的土地拥有者。这是巨大的既得利益，因此，教会当然非常希望封建制度继续下去，它不想要任何经济变革，因为变革可能会剥夺它的巨额财富和地产。所以，罗马发生的宗教暴乱刚好与经济变革遥相呼应。

与伟大的经济变革相伴随的，或者紧随其后的，是各个方面的变革——社会变革、宗教变革和政治变革。如果你以长远的视野看一看

16世纪和17世纪的欧洲，你便能够看清，所有这些活动、运动和变革是如何相互关联、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通常这一阶段的三次伟大的运动是最为人们重视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但是，请记住，在这一切的背后是经济的贫困和混乱所导致的经济变革，它比所有其他的变革都重要得多。

文艺复兴是知识的复兴——它是艺术、科学、文学以及欧洲各国语言发展的运动。宗教改革是对罗马教会的反抗，是广大群众对教会腐败的反抗，也是欧洲的贵族们对教皇的反抗，因为教皇宣称教徒必须听命于教会，而且它试图从内部改革教会。而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要控制国王并限制其权力的政治斗争。

这些运动发生的背后还有另一个因素——印刷术的普及。你应该记得，阿拉伯人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造纸术，欧洲人又从阿拉伯人那里学到了这个技术。但是，过了很长时间之后，纸张才变得既便宜又充足。到了15世纪末，书籍在欧洲各个地方被印刷出来——在荷兰、意大利、英国和匈牙利等国均是如此。试想一下，在造纸术和印刷术普及之前，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已经对书籍、纸张和印刷都习以为常了，所以很难想象没有它们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没有印刷的书籍要教很多人，甚至阅读和写作，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人们必须靠手工把书吃力地誊抄下来，只能教授少数人。讲课也主要是口授，学生得把所学的东西都背诵下来。即使现在你还能在一些古老的伊斯兰教初等学校和教授梵文的传统学校里看到这种情况。

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巨大的变化也随之发生了。印刷的书籍出现了——比如教科书和其他一些书籍，而且很快就有很多人会阅读和写作了。人们读书越多，思考就越多（但这只适用于那些有思想的书籍，而不适用于今天出现的很多垃圾书籍）。而一个人思考得越多，就开始越多地对现状加以审视和批评，而这常常导致对现存秩序的质疑。无知总是害怕变化的。它害怕未知的东西，只想因循守

旧，不论现状有多么糟糕。它在黑暗中磕磕绊绊，胡乱地蹒跚而行。但是，正确的阅读可以使人掌握一定的知识，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人的眼界。

正是因为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打开了人的眼界，很大程度上促使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伟大运动的发生。《圣经》就是最早印刷的书籍之一。许多人之前只是听人读过拉丁文的《圣经》，但是听不懂。现在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语言阅读《圣经》了，这样的阅读常使他们带着批评的眼光看待牧师，并且能够比较独立地思考。教科书也大量出现了。从那时候起，我们发现，欧洲的语言发展得很快，而在此之前，它们一直被蒙在拉丁语的阴影之下。

欧洲历史充满了这个时期的伟人的名字。我们以后会碰到一些。当一个国家或者大陆冲破了阻碍其发展的外壳的时候，它总是会在许多方面飞速发展。我们在欧洲就看到了这种情况。由于所发生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变革，所以这一时期的欧洲的故事非常有意思，也十分有教育意义。我们来将它与同一时期的印度历史甚至中国历史做个比较吧。我告诉过你，那时这两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比欧洲发达，但是，这一时期的欧洲历史充满了活力，而相比之下，印度和中国则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状态。在印度和中国，也有伟大的统治者和伟人，还有高度的文明，但是，尤其是在印度，广大民众似乎死气沉沉，消极被动，他们任由统治者摆布，从不反抗，似乎已经被驯服了，习惯于服从，因而从不挑战权威。所以，他们的历史偶尔也会有趣，但更多记载的是重大事件和统治者，而不是大众的运动。我不确定在中国这种情况有多严重，但是，在印度一定有好几百年，情况都是如此。这个阶段印度发生的所有不幸，都源于我们人民的悲惨状态。

在印度，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倾向，是人们喜欢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看我们曾经达到的高度，而不是我们希望达到的高度。所以，我们的人民为过去叹息，而不是继续前行。他们顺从任何对他们指手

画脚的人。最终帝国不再依赖自身的力量，而是依赖其统治的子民们对帝国的顺从。

83 ——文艺复兴

在波及整个欧洲的骚乱和阵痛之中，开出了一朵鲜艳的花，这就是文艺复兴。它最初是生长在意大利的土壤里，但是，它回望几个世纪之前的古希腊，从那里获得了灵感和养分。它从希腊汲取了对美的热爱，并在形体之美中加入了更加深刻的、来自内心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它是在城市中发展起来的，意大利北部的城市是它的栖息地，尤其是佛罗伦萨，它是早期文艺复兴的发祥地。

在13世纪和14世纪，佛罗伦萨就出现了两位伟大的意大利诗人，但丁和彼特拉克。在中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佛罗伦萨都是欧洲的金融中心，在那里聚集了很多的放债人。它是个小共和国，里面净是些有钱但并不高贵的人，他们常常虐待自己身边的伟人，所以，人们称它为“薄情的佛罗伦萨”。尽管这个城市里有这些放债人、专制者和暴君，但是，在15世纪的下半叶，出现了三位巨匠：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和拉斐尔（Raphael）。他们三人都是伟大的艺术家和画家，莱昂纳多和米开朗基罗在其他领域也有非凡的建树。米开朗基罗是一位令人惊叹的雕塑家，能把坚硬的大理石雕刻成巨大的人像；他还是伟大的建筑设计师，宏伟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主要是由他设计的。他活到了近90岁高龄，而他几乎在弥留之际，还在悉心研究和设计圣彼得大教堂。他又是个不幸的人，总是在探寻事物表面之下的东西，总是在思考，总是试图创作出惊人之作。他曾这样描述自己：“一个用头脑而不是用手作画的人。”

莱昂纳多是这三杰之中最为年长的，而且在许多方面也是最杰出的一个。的确，他是那个时代最非凡的人物，请记住，那是个伟人辈

出的时代。他不仅是伟大的画家和雕塑家，还是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他总是不断地实验，不断地探求，试图发现事物蕴含的道理。他是当代科学的伟大奠基人中的第一位。他说：“仁慈的大自然让你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可以学习的东西。”他是个自学成才的人，30岁的时候开始自学拉丁语和数学。他还成了一位伟大的工程师，并且是第一个发现血液在人体中循环流动的人。他对人体的构造十分着迷。他说：“满身恶习、见识浅薄的粗鄙的人，根本配不上如此美丽精致、结构复杂的人类的身体。他们只配有一个皮囊，装进食物，再把它们排泄出去，因为他们只是食物的通道而已，别的一无是处！”他本人是一个素食者，十分喜爱动物。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市场上买来关在笼子里的鸟，然后立刻将它们放生。

最令人惊叹的是莱昂纳多在航空学方面的尝试，就是尝试在空中飞行。他没有成功，但是向成功迈出了一大步。没有人再跟进他的理论和实验。也许，如果有几个莱昂纳多跟随着他，现代的飞机也许可以在两三百年前就发明出来了。这个奇怪又非凡的人生活在1462年至1519年间。据说，他的生活“是与大自然的对话”。他总是在提问，并通过实验找到答案；他似乎总是在向前赶，想要抓住未来。

我已经介绍了佛罗伦萨的三位巨匠，尤其是莱昂纳多，因为他是我最喜欢的人。然而，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历史并不令人愉快，也没有多少教育意义，因为它充斥着阴谋、暴君和狡诈的统治者。但是，有关佛罗伦萨的种种劣迹大多是可以原谅的——我们甚至可以原谅它的放债人！——因为伟人们曾在那里诞生。佛罗伦萨的这些伟人的光辉，仍然还照耀在它的身上，当你穿过这座美丽城市的街道，或者看到可爱的亚诺河（Arno）从中世纪的桥下徐徐流过的时候，你会感到痴迷陶醉，仿佛过去的一切又生动鲜活起来。但丁从身边走过，还有他爱慕的女士——比阿特丽斯（Beatrice），也款款走过，身后飘过淡淡的香水味道。莱昂纳多似乎也在窄窄的街道上一边大步向前，一边沉思，思索着生命和大自然的奥秘。

文艺复兴从15世纪开始就在意大利开花结果，并渐渐波及其他的西方国家。伟大的艺术家们努力在石头和画布上表现生活，欧洲的美术馆和博物馆里都展示着他们的绘画和雕塑作品。到16世纪末，意大利艺术界的文艺复兴开始衰落。而17世纪的荷兰却诞生了一些伟大的画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伦勃朗（Rembrandt）。委拉斯凯兹（Velasquez）则是同一时期西班牙的著名画家。我不打算提到更多的名字了，因为实在太多了。如果你对伟大的画家们感兴趣的话，就去美术馆欣赏他们的作品吧。他们的名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的艺术，以及他们创造的美带给我们的启示。

在这个阶段——15世纪到17世纪——科学也在逐渐地稳步向前发展，进入了繁盛时期。它与教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因为教会不希望人们进行思考和实验。教会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围绕着地球转动，星星是天上固定的点点。任何持不同看法的人都是异教徒，可能会被交给宗教法庭裁判。尽管如此，一个名叫哥白尼（Copernicus）的波兰人却挑战教会的说法，并证明了地球是绕着太阳转动的，这样，他就为现代宇宙观奠定了基础。他生活在1473年至1543年间。虽然他持有革命性的、异教徒的主张，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设法避开了愤怒的教会。而步他后尘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意大利人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于1600年在罗马被教会烧死，因为他坚称地球围绕太阳转动，而太阳本身也是一颗恒星。和他同时代的科学家、制造了望远镜的伽利略（Galileo），也受到了教会的威胁，可是他比布鲁诺软弱，他觉得，放弃主张对自己更有利，因此，他向教会承认自己犯了愚蠢的错误，地球当然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是绕着地球转动的。即使这样，教会还是判他入狱，让他在狱中悔罪。

在16世纪杰出的科学巨人中，有一位是哈维（Harvey），他终于证明了血液循环的原理。到17世纪，出现了一位名叫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的人，他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牛顿是一位数学

家，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物体是如何坠落的——于是揭开了大自然的又一个奥秘。

关于科学就写这么多吧，或者说就写这么少吧。在这一阶段文学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广为流行的新思想对年轻的欧洲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语言存在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我们看到，意大利已经产生了一些伟大的诗人。在英国，有伟大的诗人乔叟。但是，他们的光辉被拉丁语遮住了，因为拉丁语是学术界及演讲使用的语言，也是全欧洲的教会语言。而欧洲各国的语言则是粗俗的语言——被称为土话，就像还有很多人把印度的语言称为土话一样，真让人感到奇怪。用欧洲语言写作几乎是件有失尊严的事。但是，新精神、造纸术和印刷术推动了欧洲语言的发展。在这个领域，意大利语走在了最前面，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紧随其后，最后是德语。在16世纪的法国，一群年轻作家决意用自己的语言写作，而不是用拉丁语。他们改良了自己“粗俗的语言”，使它成了能够创作出最优秀文学作品的合格工具。

因此，欧洲的语言不断进步，越来越丰富，表达力也越来越强，最后发展成了今天这样优美的语言。我不会提到很多著名作家的名字，就说几个吧。在英国，有鼎鼎大名的莎士比亚，他生活于1564年至1616年间；在17世纪，紧随莎士比亚之后是米尔顿（Milton），就是写了《失乐园》（*Paradise Lost*）的那位盲人诗人。在法国，有哲学家笛卡儿（Descartes）和戏剧家莫里哀（Moliere），他们都生活在17世纪。莫里哀是巴黎的法兰西喜剧院（Comedie Francaise），也就是了不起的法国国家剧院的创始人。在西班牙，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作家塞万提斯（Cervantes）写了《堂·吉诃德》（*Don Quixote*）。

我还要提一个名字，不是因为他伟大，而是因为他太有名了，他就是马基雅维利，也是佛罗伦萨人。他是15、16世纪一位普通的政治

家，但是，他的著作《君主论》（*The Princ*）声名远扬。这本书让我们窥视到了那时的君主和政治家们的内心世界。马基雅维利告诉我们，宗教对一个政府来说是很有必要的——但请注意，宗教并不要让人民的品德高尚，而是帮助政府统治和压制他们。统治者要扶持一种宗教，这甚至是他的职责，即使他相信这种宗教是虚妄的！马基雅维利说：

> 一个君主必须知道如何同时扮演人和野兽，狮子和狐狸。他既不应该，也不能够信守诺言，如果这么做对他不利的话……我敢大胆断言，永远诚实对君主来说是十分不利的；而另一方面，表现得虔诚、忠实、仁慈和真诚，则很有益处。没有什么比做出高尚而正直的样子更有用的了。

很糟糕，对吗？越无耻的恶棍就越能成为好的统治者！如果这是当时欧洲普通君主的心态的话，那么，欧洲总是陷入动乱也就不足为奇了。可是为什么要说到那么遥远的过去呢？即使今天，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径与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君主也是如出一辙。在表面上的高尚正直之下，是贪婪、残忍和狂妄；在文明的羊皮手套里，是野兽血淋淋的利爪。

84 ——新教教徒的反抗和农民战争

关于欧洲15世纪到17世纪的历史，我已经给你写了好几封信了。我谈到了中世纪的终结、农民的悲惨生活、资产阶级的勃兴、发现美洲大陆和通往东方的海路，还有艺术、科学和欧洲语言的进步。但是，关于这个时期，我还要讲很多东西才能使你较为完整地了解那个时期的历史画卷。要记住我前两封信的内容，还有那封关于海路大发现的信，而我正在写的这封，或许还有接下来的一两封，讲述的还是同一时期的欧洲。我把不同的运动和活动分开叙述，但是，它们基本上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并且相互之间还有影响。

甚至在文艺复兴之前，人们对罗马教会怨声载道。欧洲的君主和民众开始对教会的高压不堪重负，并开始抱怨和质疑了。你应该记得国王腓特烈二世，他与教皇发生了激烈争吵，甚至被逐出教会也毫不在意。他对教会的质疑和违抗的行为激怒了罗马教会，因此罗马教会决定对这些新的异端邪说进行镇压。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宗教法庭建立了起来。在整个欧洲，那些不幸被称为异端的男人和被指责为巫婆的女人们一起，都被宗教法庭烧死了。布拉格（Prague）的约翰·胡斯受宗教法庭的诱骗，并被烧死；于是他在波希米亚的追随者——胡斯信徒们举起了反抗的大旗。宗教法庭的恐吓并没有扑灭反抗罗马教会的新精神。新精神不断蔓延，而且，毫无疑问，农民对教会这个大地主的反感情绪中也渗透了新精神。还有许多地方的君主们出于自私，也鼓励这种精神，因为他们贪婪的眼睛也让他们对教会广阔的地产产生了嫉妒。而书籍和《圣经》的印刷更是对新精神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6世纪初，德国出了一个叫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人，他后来成了反罗马教会运动的伟大领袖。他是一位基督教牧师，但是，在他去罗马参观之后，对教会的腐败和奢华深恶痛绝。他和教会的争论不断升级，最终导致罗马教会分裂成两个教派，把西欧从宗教和政治上分成了两个阵营。而俄罗斯和东欧古老的希腊正教教会没有参与这场争论，对希腊正教教会而言，罗马本身已经远离了真正的信仰。

就这样，新教教徒的反抗开始了。它之所以被称为新教教徒的反抗，是因为它抗议罗马教会的各种教义。从那时开始，基督教在西欧就有了两个主要分支——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但是新教又分为许多派别。

这次反对罗马教会的运动被称为“宗教改革”。广大民众反对教会的腐败和独裁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许多君主还想就此终结教皇试图控制他们的企图。他们对于教皇干涉他们的政治事务深恶痛绝。宗教改革的第三个阶段是忠诚的教徒们努力从内部革除教会的陋习和弊端。

也许你还记得，天主教会的两个修道会——圣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在16世纪，正当马丁·路德的力量不断壮大的时候，西班牙人罗耀拉的圣依纳爵（Ignatius of Loyola）又开创了一个新的修道会，他称它为“耶稣会”，其成员被称为耶稣会会士。我已经提到过有关耶稣会会士访问中国和东方的事。这个耶稣会是个十分了不起的修道会，它致力于培养高效、全职的神职人员，为罗马教会和教皇服务。耶稣会通过艰苦的培训，获得了极大成功，为教会培养了非常干练而又忠诚的神职人员。他们对教会极为忠诚，总是盲目顺从，毫不怀疑，全身心地为教会奉献。只要是对教会有利的事情，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人人都知道，他们毫无顾忌、全身心地为教会服

务。只要对教会有好处，那么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也是可以原谅的。

这样一群非凡的人对教会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他们不仅将教会的名字和神谕带到了遥远的地方，还提高了欧洲教会的准则。部分原因是教会内部的改革运动，但主要是因为新教教徒反抗的威胁，罗马教会的腐败现象减少了很多。就这样，宗教改革使教会分裂成了两派，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从内部改良了教会。

就在新教教徒的反抗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欧洲的国王和君主们也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一些站在了新教一派，另外一些则站到了罗马天主教一派。而站在哪一派与宗教动机没有多大关系，这主要是出于政治和利益的考量。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查理五世（Charles V），他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由于他父亲和祖父的姻亲关系，使他得以继承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包括奥地利、德国（只是名义上的）、西班牙、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尼德兰以及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在当时的欧洲，通过联姻来扩大自己的领地是皇室最喜爱的做法。于是，虽然查理五世自己并没有什么功绩，却统治着半个欧洲，而且有一段时间，他似乎还是个伟大的人物。他决定与教皇站在一边，反对新教教徒，因为宗教改革的理念与帝国的理念大相径庭。可是，有许多德国的小君主站在了新教教徒的一边，而且整个德国分成了两派——罗马天主教派和路德新教教派，结果德国自然就爆发了内战。

在英国，多次结婚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反对教皇，支持新教教徒，更确切地说，是支持他自己。他觊觎教会的财产，所以，他和罗马教会决裂之后，没收了大修道院、隐修院和教会富饶的土地。他与教皇决裂的个人原因，是他想与妻子离婚，娶另一个女人。

法国的情况十分特殊。国王的首相是著名的红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他实际上是王国的统治者。黎塞留带领法国站在罗马

教会和教皇的一边，镇压那里的新教，但是，这只是政治阴谋，因为他支持德国的新教，这样，那里就可能会发生内战，德国国力就会变弱，德国就可能会分裂！法国和德国相互之间的敌对状态，就如同一条线，贯穿了欧洲的历史。

路德是位伟大的新教教徒，反对罗马的权威。但是，不要误以为他在宗教上是宽容的。他和他反对的教皇一样，毫无宽容可言，所以，宗教改革并没有给欧洲带去宗教自由，只是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狂热分子——清教教徒（Puritan）和加尔文教徒（Calvinist）。加尔文（Calvin）是新教教徒运动后期的一位领袖。他是个很好的组织者，曾一度控制了日内瓦（Geneva）。你是否还记得，在日内瓦的公园里有一个巨大的宗教改革纪念碑，在宽阔的高墙上刻有加尔文和其他一些人的雕像？加尔文是个心胸十分褊狭的人，很多自由的思想家只是因为和他的观点不一样，就被他活活烧死了。

路德和新教教徒们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大力帮助，因为他们都坚决反对罗马教会。正如我说过的，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经常发生暴乱。在德国，这些暴乱经常发展成为农民战争。贫穷的农民起来反抗压迫他们的罪恶制度，要求得到最基本的、合理的权利——结束农奴制，让农民有打鱼和狩猎的权利。但即使是这些要求也遭到了拒绝。德国的君主们试图以各种残暴的手段镇压他们。那么，伟大的改革家路德，他又是什么态度呢？他是不是站在农民的一边，支持他们的合理要求呢？不是！对于农民的结束农奴制的要求，路德是这么说的："这个条款将会使所有的人都平等，那么就把耶稣的精神王国变成一个外在的、世俗的世界。不可能！如果人们之间没有了不平等，那么尘世间的王国也就不可能存在了。有些人必须是自由的，其他的人是农奴；有些人是统治者，其他的人是臣民。"他诅咒农民们，并要求消灭他们。"因此，让所有有力量的人们公开地或秘密地砍死他们，屠杀、刺死他们，要记住，没有什么比叛逆者更加恶毒、更加可憎的了，简直就如彻头彻尾的恶魔一般。你必须像杀死一条疯

狗一样杀死他；如果你不袭击他，他就会袭击你，侵占你的土地。”这是多么绝妙的语言，尤其是它出自一位宗教领袖和改革者的口中。

所以，一切关于自由和权利的高谈阔论，都只是针对上层社会，而不针对广大人民。几乎在所有的年代，广大人民的生活比动物强不了多少。根据路德所说的，他们必须继续这样生活下去，因为这是上帝的安排。新教教徒对罗马教会的反抗，主要是由人们在经济上的极度窘困引起的。新教教徒的反抗正符合农民的心愿，同时新教教徒还利用了农民。但是，当农奴有可能挣脱农奴制、获得自由的时候——这就有点儿出格了——新教教徒的领袖们便与君主们联合起来，镇压农民。属于广大民众的日子还远远没有到来。初露曙光的新时代是属于中产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的。透过16世纪和17世纪的所有冲突和战争，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几乎不可避免地一步步走向兴盛。

凡是资产阶级力量发展得很强大的地方，就会有新教的传播。新教教徒分成很多派别。在英国，国王把自己封为教会的最高领导人——信仰的捍卫者——而教会实际上不再是教会了，它已经成了政府的一个部门。英国国教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德国、瑞士和尼德兰，其他的派别不断发展壮大，声名也变得越来越显赫。加尔文主义传播甚广，因为它与资产阶级的发展一致。在宗教事务方面，加尔文是很不宽容的，他对异教徒施以酷刑和火刑，对忠实的教徒也制定了严苛的教规。但是，在商业事务方面，他的训诫更利于贸易和工业的发展，而罗马教会的训诫则不然。加尔文主义保护商业利润，鼓励信贷。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便采纳了古老宗教的这种新版本，可以完全心安理得地继续赚钱了。他们利用了民众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而在战胜了贵族之后，他们便开始无视或压制广大民众。

但是，资产阶级仍然要面对许多障碍。国王仍然是拦路虎。国王曾经加入了城市平民反抗贵族的斗争。由于贵族已经失去了手中的权

力，国王的权力更大了，他似乎掌管了一切。他和中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即将爆发。

85 ——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的独裁统治

我最近非常懒散，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没有人向我提出问题，也没有人给我提出什么要求，所以，有时候我会有所松懈，去忙别的事情了。如果我们在一起，那就不一样了，对吗？可是，如果我和你可以面对面地交谈，那我为什么要写信呢？

我的前几封信是关于欧洲的大动乱和大变革的。信中写了16世纪和17世纪发生的巨大变革，这些变革是和经济变革一起到来的，或是紧随着经济变革而来的，欧洲的经济变革使中世纪走到了尽头，大大提升了资产阶级的地位。在我的上一封信里，我们看到，西欧的基督教世界分裂成了两派——天主教和新教。在德国，由于这两派的力量比较均衡，所以德国成了这两派之间宗教斗争的特殊战场。而西欧的其他国家也或多或少地卷入了这场斗争。英国没有参与欧洲大陆的宗教斗争。它在国王亨利八世的统治之下，没有经过多少内部的骚乱，便与罗马分道扬镳了。它建立了介于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自己的教会。亨利八世并不太在意宗教，只是想要教会的土地罢了。他如愿以偿地占有了那些土地；他还想再次结婚，也如愿了。所以，宗教改革的主要成果就是使国王和君主们从教皇的严格管束之中解放了出来。

在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和经济变革正在改变欧洲面貌的时候，当时的政治背景如何呢？16世纪和17世纪的欧洲地图是什么样的呢？当然，这200年里，它是在不断变化的。那么，让我们看看16世纪初的欧洲地图吧。

在东南部，土耳其人控制着君士坦丁堡，他们的帝国已经推进到了匈牙利境内。在西南角，阿拉伯征服者的后代萨拉森人，已经从格

拉纳达被赶出去了。西班牙在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的联合统治之下，已经成为一个基督教强国。在西班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冲突，使得西班牙人狂热而偏执地牢牢坚守着他们的天主教。那个可怕的宗教法庭正是在西班牙建立的。在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得到巨额财富的光环之下，西班牙开始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了。

再看看这张地图。我们看到的英国和法国与现在的情况差不多。在地图的中央是一个大帝国，分裂成许多德意志小国，每一个小国基本上是独立的。这些小国很奇特地聚合在一起，它们是由君主、公爵、主教、选帝侯和诸如此类的人统治着。还有许多有特权的城镇，和北部的商业城市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邦联。还有瑞士共和国，事实上是自由的国家，只是还没有正式得到承认；威尼斯共和国，还有意大利北部的其他城市共和国；在罗马周围、属于教皇的领地，被称为“教皇国”；还有在它们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王国。在东部，德意志帝国和俄罗斯之间是波兰，还有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阴影之下的匈牙利王国。再向东是俄罗斯，它驱逐了金帐汗国的蒙古人之后，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强国。在它的北边和西边，还有一些其他国家。

16世纪初，欧洲的情况就是这样的。1520年，查理五世当上了国王。他来自哈布斯堡家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设法继承了西班牙王国、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王国以及尼德兰。在欧洲，因为某些皇家的联姻，就能让整个国家和成千上万的人民改换门庭，这真是咄咄怪事。成千上万的人民和强大的国家就这样被继承了。有时候，国家和人民还可以作为嫁妆被赠送出去。孟买岛就是作为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妻子的嫁妆被划入英国版图的。他的妻子是来自葡萄牙布拉干萨（Bragança）的凯瑟琳（Catharine）。于是，通过精心策划的联姻，哈布斯堡家族聚集起了一个帝国，查理五世成了帝国之王。他是一个

很平庸的人，他得以为世人所熟悉，是因为他的食量大得惊人。可是在当时，他广袤的领地使他似乎成了欧洲的巨人。

就在查理五世当上皇帝的同一年，苏莱曼也当上了奥斯曼帝国的皇帝。在他的统治之下，帝国向各个方向，尤其是东欧，大肆扩张。土耳其人一直打到了维也纳的大门前，但是没能占领这座美丽的古城。可是，这吓坏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他觉得权宜之计就是向苏莱曼进贡，以此来收买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竟然向土耳其的苏丹进贡，真是难以想象。苏莱曼一向以苏莱曼大帝闻名于世。他自称为皇帝，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东方拜占庭恺撒的代表。

苏莱曼大帝时代，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了很多的建筑，还建了很多美丽的清真寺。似乎在东方也有与意大利艺术界的文艺复兴相媲美的艺术活动发生。艺术活动不仅局限在君士坦丁堡，在中亚的波斯和呼罗珊（Khorasan），也有精美的画作问世。

在印度，我们看到，莫卧儿人巴布尔从西北方来到这里，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这是在1526年，正是查理五世在欧洲即位称帝、苏莱曼统治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关于巴布尔以及他那些有卓越才干的后代，我们还有很多要说的。然而，有趣的是，巴布尔本人就是一位具有文艺复兴风范的君主，但是，他比同时期的欧洲君主更优秀。他是位冒险家，又是位风度翩翩的骑士，酷爱文学和艺术。在同一时期的意大利，也有这样一些君主，他们既是冒险家，又热爱文学和艺术，而且，他们的小宫廷也不乏表面上的豪华和风光。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和波吉亚家族（Borgias）当时都名噪一时。但是，这些意大利的君主，还有当时欧洲大部分其他君主，都是马基雅维利的忠实追随者。他们肆无忌惮、不择手段、专横暴虐，用刺客的毒药和匕首来对付他们的敌人。把富有骑士精神的巴布尔与这帮人相比较几乎是有失公允的，正如把他们小气的宫廷与莫卧儿皇帝们——阿克巴、沙阿贾汗和其他一些皇帝——在德里或阿格拉的宫廷相比较一样，也是很不

合适的。据说，莫卧儿的宫廷非常宏伟壮丽，是迄今为止最为华贵、最为壮观的。

我们不知不觉地从欧洲又回到了印度。但是，我想让你知道，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在印度和其他地方都发生了些什么。那时的土耳其、波斯、中亚和印度，在艺术领域也发生了很多艺术活动。在中国，此时正是明朝的和平繁荣时期，涌现了大量高水平的艺术作品。但是，或许除了中国之外，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或多或少都是宫廷的艺术，而非人民大众的艺术。在意大利，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其中的一些名字我之前提到过的——过世之后，文艺复兴后期的艺术作品已经变得稀松平常，没有太大价值了。

16世纪的欧洲君主被分为了两派：天主教君主和新教君主。那时起决定作用的是君主，而不是人民。意大利、奥地利、法国和西班牙都是天主教国家；德国一半是天主教，一半是新教；英国是新教国家，只是因为它的国王选择了新教。而因为英国是新教国家，这一点就足以使爱尔兰继续信仰天主教了，因为英国总想征服和压迫爱尔兰。但人们信仰什么宗教无关紧要这个说法也不太正确，因为最终人民的信仰还是很重要的，许多战争和革命都是因此而发生的。我们很难把宗教与政治和经济截然分开。我想，我已经告诉过你，反对罗马教会的新教叛乱大多发生在新兴贸易阶层的力量发展壮大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宗教和贸易之间是存在联系的。许多君主又一次对宗教改革感到害怕，因为他们认为，在宗教改革的外衣下，可能隐含着平民革命，那么他们当权的地位就可能被推翻。如果一个人要向教皇的宗教权力挑战，那么他也可能挑战国王或君主的政治权力。这对于国王们来说是很危险的。他们仍然坚信他们有神圣的统治权。即使是新教君主，也不愿放弃他们的权力。

然而，在欧洲，尽管发生了宗教改革，国王们的权力还是至高无上的。他们之前从没有如此专制过。因为以前有封建贵族钳制他们，

常常挑战他们的权威。商人和资产阶级都不喜欢这些贵族，国王也不喜欢他们。所以，在商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帮助下，国王镇压了贵族，得到了至高权力。资产阶级尽管力量更强大了，地位也上升了，但他们还不足以遏制国王的权力。但是，不久中产阶级开始反对国王做的许多事情，尤其反对多重的、沉重的赋税，以及国王对宗教的干涉。那么国王对此当然心里不痛快。中产阶级放肆地反对他所做的一切，他也是怒不可遏。于是，他把他们投进监狱，或以其他方式惩罚他们。那时就有任意监禁，就像在今天的印度，如果我们拒绝向英国政府屈服，就会被任意监禁一样。国王也干涉贸易。所有这些都使情况变得更糟了，也使反对国王的情绪更加高涨。资产阶级反对国王独裁、争取自身权力的斗争持续了好几百年，直到近代，许多国王人头落地之后，国王的“君权神授”思想才最终被埋葬，国王才被放在了合适的位置。有些国家胜利来得比较早，有些则来得晚一些。在接下来的信中，我们将关注这些斗争的发展情况。

但是，在16世纪的欧洲，国王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是独断专行的——几乎，但不是全部。你该记得，在瑞士，贫困的山区农民敢于公然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帝王，并赢得了自由。所以，在欧洲绝对王权和专制独裁的大海里，在这个小小的农民共和国瑞士，根本没有国王的立足之地。它就如同一个岛屿，赫然出现在欧洲这个绝对王权和专制独裁的大海之中。

不久，在另一个地方——尼德兰——情况也发展到了极为严重的关头。那里发生了要求民众自由、宗教自由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它虽是一个小国，但在那里发生了反对当时欧洲最强大帝国西班牙的伟大斗争。这样，尼德兰便为欧洲树立了一个榜样。接着，在英国发生了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当时的国会取得了胜利，国王掉了脑袋。尼德兰和英国在资产阶级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中起了带头作用。而由于资产阶级在这两个国家都取得了胜利，它便利用新的形势，优先于

其他国家，迅速地成长起来。后来这两个国家都建立了强大的海军，都与遥远的国家发展了贸易，都为在亚洲建立帝国打下了基础。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些信里没有太多地说到英国，因为没有什么可说的，英国在欧洲不是很重要的国家。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英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曾提到过《大宪章》和议会早期的起源情况，以及不同王朝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发生的内战。在这些战争中，在国王指使下的谋杀和刺杀屡见不鲜。很多封建贵族在战争中被杀了，所以，贵族阶层的力量衰弱了。一个新的王朝——都铎王朝（Tudors）——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善于专权独裁，亨利八世就是一个都铎家族的人，还有他的女儿伊丽莎白。

皇帝查理五世之后，帝国就分崩离析了。西班牙和尼德兰落入了他的儿子菲利普二世（Philip II）之手。当时的西班牙在欧洲可谓傲视群雄，是最强大的君主国。你应该记得，它占领了秘鲁和墨西哥，因而黄金源源不断地从美洲流入。但是，尽管西班牙有哥伦布、科尔蒂斯和皮萨罗，但它没有利用大好的新形势。它对贸易不感兴趣。它只对那种最偏执而残忍的宗教感兴趣。宗教法庭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对所谓的异教徒施以最可怕的酷刑。他们不时地会组织一些盛大的公众庆祝活动，就在国王、皇室家族、各国使节以及成千上万的民众面前，把一群群男男女女的“异教徒”放在巨大的柴堆上，活活烧死。这些公开的火刑被称为“Au to s- da- fé”，即“忠诚的行为”。这一切看起来恐怖至极，骇人听闻。而整个这一时期的欧洲历史都充斥着暴力、恐怖、野蛮、残忍，以及宗教的偏执，几乎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西班牙王国没有持续很久。小国荷兰的英勇斗争彻底动摇了它的根基。没过多久，在1588年，西班牙试图征服英国的行动又惨痛地失败了。载着西班牙军队的无敌舰队甚至根本没有到达英国，在公海上

就被击溃了。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指挥这支无敌舰队的人对舰船和大海一无所知。事实上，他曾去拜见过国王菲利普二世。“他卑微地请求国王陛下撤掉他在无敌舰队的职务，他说他对海战战略一窍不通，而且，他还是个糟糕的水手。但是，国王回答他说，舰队将由上帝本人来指挥！”

所以，渐渐地，西班牙帝国衰退了。在查理五世执政期间，据说他的帝国成了“日不落帝国”，而如今，这个说法也常常被用来描述今天的另一个傲慢而专横的帝国。

86 ——尼德兰为自由而战

我在上封信里告诉过你，16世纪，在几乎整个欧洲，国王是如何变得至高无上的。在英国是都铎王朝，在西班牙和奥地利是哈布斯堡王朝。在俄国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也有独裁的君主。而法国也许是这种由国王统治的个人专制君主国的典型，整个王国几乎被视为国王的个人财产。一位很有才干的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在巩固法国及其君主政体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法国一向认为，它的强大和安全有赖于德国的衰弱。因此，黎塞留，这位曾经在法国无情地镇压新教教徒的伟大的天主教神父，实际上却鼓励德国的新教教徒，其目的是鼓动德国教派之间的相互冲突，使其陷入混乱，这样就可以削弱德国。这一政策大获成功。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德国发生了极为惨烈的内战，整个国家遭受了灭顶之灾。

17世纪中叶，法国也发生了内战——它被称为“投石党之乱”（Fronde）。国王镇压了贵族和商人。贵族的力量已经丧失殆尽了，但是，国王为了拉拢他们，让他们站在自己一边，便给了他们很多特权。他们几乎不用纳税，贵族和神职人员都被免除了赋税，所有税收的负担都落在了平民尤其是农民的身上。国王把从这些贫困可怜的人那里勒索的钱财用来建造宏伟壮丽的宫殿，还有国王豪华壮观的宫廷。你还记得参观巴黎附近的凡尔赛宫（Versailles）吗？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雄伟的宫殿，是在17世纪用法国农民的血汗建成的。凡尔赛宫是极权独裁、不负责任的君主专制的象征；那么，凡尔赛成为法国革命的先驱也就不足为奇了。法国革命终结了君主专制政体。但是那时法国革命还很遥远。那时的国王是路易十四（Louis XIV），被人们称为“大君主”，自诩为“太阳王”，因为他认为自己身边的太阳

是围绕着他宫廷的行星转动的。他在位时间长达72年（1643——1715）；执政期间，他任用了另一位红衣主教马萨林（Mazarin）做他的首相。法国的上层社会奢侈华贵，另外，皇家还对文学、科学和艺术给予了资助。但是，在这层薄薄的华丽外壳之下充满着悲惨和苦难。这个世界就像是用漂亮的假发、蕾丝衣袖和精美的衣服包裹着一个很少清洗、满是泥土和污秽的身体一样。

我们所有人都会深受浮华和盛况的感染，所以，在路易十四执政期间，他对欧洲的影响很大。他是位模范国王，其他的国王纷纷效仿他。但是，这位大君主是什么样的人呢？英国著名作家卡莱尔（Carlyle）说：“剥去路易十四国王的行头，剩下的只不过是个可怜的分叉的小萝卜，上面雕刻着一个怪异的脑袋而已。”这是个很苛刻的描述，也许适用于大多数人，无论是国王，还是平民。

路易十四把我们带到18世纪初的1715年。同时在欧洲的其他国家也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一些事件值得我们注意。

我已经给你讲过了关于尼德兰反对西班牙的叛乱。尼德兰人英勇斗争的故事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一个名叫J. L.莫特利（J. L. Motley）的美国人对这场为自由而战的斗争写下了一部著名的小说，他将其写成了一个引人入胜、动人心魄的故事。即便是小说，我也几乎没有看到过比它更加扣人心弦的了。它生动地讲述了350年前，在欧洲的这个小小的角落里发生的故事。这本书名叫《荷兰共和国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Dutch Republi*），我是在狱中读的这本书。

尼德兰包含了荷兰和比利时。名字的本身就告诉我们，它们是些低洼的地方。荷兰（Holland）的名字来自“洼地”（hollow-land）一词。尼德兰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都在海平面以下，所以建起了巨大的堤坝和围墙把它和北海隔开。在这样的国家里，人们不得不与大海做不懈的斗争，所以有很多强悍的人以航海为业。他们经常跨海航行，从事贸易。这样，尼德兰人就成了商人。他们生产羊毛和其他商

品，东方的香料也被带到尼德兰。富裕而忙碌的城市出现了——布鲁日、根特，尤其是安特卫普。随着与东方贸易的发展，这些城市聚集了巨额财富。到16世纪，安特卫普成了欧洲商业的中心都市。据说，在安特卫普的交易所，每天有5000人聚集在那里互相做生意；在港口，一次会有多达2500艘船停靠。每天有近500艘船到港和离港。市政府都是由这些商人控制的。

正是这些从事贸易的人受到了宗教改革后的新宗教思想的吸引。新教在那里传播广泛，尤其是在北方。因为继承权，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和后来他的儿子菲利普二世都幸运地成了尼德兰的统治者。他们父子二人坚决反对给人民一丝的自由——无论是政治自由，还是宗教自由。菲利普二世试图压制城市的特权阶级以及新的宗教，他派去了阿尔瓦公爵（Duke of Alva）做他的总督，此人因其残酷地压迫人民以及专制独裁而著称。宗教法庭建立起来了，“血腥公堂”把数千人送上了火刑柱或断头台。

这是个很长的故事，我不能在这里细说了。西班牙暴政愈演愈烈，人民反抗暴政的力量也日趋强大，在反抗者中出现了一位伟大而睿智的领袖，他就是奥兰治（Orange）的威廉王子（Prince William），人们称他为“沉默的威廉”，他远远强于阿尔瓦公爵。在1568年，宗教法庭实际上在一次判决中几乎将所有尼德兰居民判决为异教徒，并判以死刑，只有极个别人除外。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惊人判决——寥寥三四行的判决书就判决了300万人！

最初，这场斗争似乎是尼德兰贵族和西班牙国王之间的斗争，几乎和其他国家国王和贵族之间的斗争并无二致。阿尔瓦公爵试图镇压他们，许多大贵族被送上了布鲁塞尔（Brussels）的断头台。埃格蒙特伯爵（Count Egmont）就是被处决的受人拥戴的著名贵族中的一位。后来，由于银根紧张，阿尔瓦公爵施行了新的重税税制，这就触

及了商人阶级的钱袋子，于是，商人阶级开始反抗。除此之外，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斗争又让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

西班牙是个强大的帝国，高高在上，不可一世；而尼德兰只是几个省而已，里面都是些商人，以及衰弱没落又奢侈无度的贵族，二者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西班牙发现，要镇压它并非易事。西班牙人在那里进行了多次大屠杀，几乎杀掉了尼德兰的所有居民。阿尔瓦公爵和他的将军们灭绝人性的屠杀，与成吉思汗和帖木儿不相上下。他们往往比蒙古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阿尔瓦公爵围住一个个的城市，而城中都是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男人，常常还有女人，与阿尔瓦公爵的训练有素的士兵在陆地和海上战斗。城里的市民们英勇不屈，直到饿得无法继续战斗为止。他们宁愿毁掉自己珍爱的一切，也不愿在西班牙人的暴政下苟延残喘。荷兰人凿开堤坝，让北海的海水灌进来，淹灭西班牙的军队，将他们赶走。随着战事的发展，战斗变得越来越惨烈，双方也变得越来越残忍。美丽的城市哈勒姆（Haarlem）保卫战尤为突出。全体居民奋起抵抗，一直战斗到最后，最终遭到西班牙军队的屠城和洗劫；在阿尔克马尔（Alkmaar）之战中，市民们打穿了堤坝，水淹了西班牙军队，才使城市逃过一劫；莱顿（Leiden)被敌军围困，饥饿和疾病夺去了数千市民的生命。莱顿的树上连一片绿叶也没有剩下，因为树叶都被人吃光了。男人、女人、饥饿的野狗一起争抢垃圾里的食物残渣。但是，他们仍然坚持着。在防御土墙的后面，面容枯槁、饥肠辘辘的市民们以充满蔑视的神情告诉西班牙人，他们宁愿吃老鼠、狗或其他任何东西，也绝不投降。“等到除了我们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吃掉自己的左臂，留下右臂来保护我们的女人、自由和宗教，来反抗暴君。如果上帝在愤怒之下宣判我们灭亡，拒绝解除我们的苦难，即使到那时，我们也将顽强地战斗，把你们拒之门外。当最后时刻来临的时候，我们将亲手点燃我们的城市，在烈焰中把男人、女人和孩子一起烧死，绝不让我们的家园受到蹂躏、自由遭到践踏。”

这就是莱顿人民的精神。但是，日复一日，情况并没有好转，绝望笼罩着整座城市。于是他们给城外的荷兰庄园的朋友们带去了口信。庄园做出了重大决定，即淹没他们挚爱的土地，绝不让莱顿落入敌人之手。“被淹没的城也强过陷落的城。”对莱顿，这座遭受沉重打击的姊妹之城，他们给了这样的回答，“我们宁愿看到我们所有的土地和所有的财产付之东流，也绝不会抛弃你，莱顿！”

最后，一个个的堤坝被毁，再借助有利的风向，于是，涌入的海水载来了荷兰人的船只，带来了食物和救援。而西班牙的军队，因为害怕援军和大海，只好仓皇逃走。就这样，莱顿幸存了下来。为了纪念其居民的英勇行为，于1575年建立了莱顿大学；从那时起，莱顿大学就非常著名了。

像这样的英雄故事还有很多，也有很多可怕的杀戮。在美丽的安特卫普就发生过可怕的屠城和洗劫事件，8000人惨遭屠戮。这次大屠杀被称为“西班牙狂怒”。

但是，伟大的战斗大多是在荷兰进行的，而不是在尼德兰的南部地区。西班牙统治者通过贿赂和强制的手段，成功地争取了很多尼德兰贵族，让他们镇压自己的国民。他们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在南方天主教教徒远远多于新教教徒。他们努力争取到了天主教教徒的支持，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那些贵族们啊！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从西班牙国王那里得到好处和财富而屈尊自贬，不惜采取背叛和欺骗的手段，太可耻了！

奥兰治的威廉在尼德兰的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尼德兰只能被尼德兰所镇压。阿尔瓦公爵所自夸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不就是从你们自己那里——从尼德兰的城市来的吗？他的船只、供给、金钱、武器、士兵是从哪里来的？它们都来自尼德兰人民。”

最终，西班牙人夺取了尼德兰的一部分，大致就是今天的比利时。但他们无法使荷兰屈服，尽管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奇怪的是，贯穿整个荷兰与西班牙的斗争，几乎到最后，荷兰都没有放弃对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的效忠。如果国王给予荷兰自由，那么它就愿意继续奉他为国王。最后，荷兰被迫脱离了西班牙国王。荷兰把王位献给了伟大的领袖威廉，但他拒绝接受这份馈赠。于是，迫于环境压力，荷兰几乎是不情愿地成了一个共和国。在那个年代，国王政体的传统实在是太强大了。

荷兰的斗争持续了很多年，直到1609年荷兰才得以独立。但是，在尼德兰的真正斗争却发生在1567年至1584年期间。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无力打败奥兰治的威廉，就只好雇用杀手去消灭他。菲利普二世还为此次刺杀行动给出了公开奖赏，这就是当时欧洲的道德观。好几次试图刺杀威廉的行动都失败了。1584年，第六次行刺成功了，这位在荷兰全国被称为“国父威廉”的伟人，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但是，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经历了巨大的牺牲和无尽的苦难之后，荷兰共和国终于诞生了。反抗暴君和独裁者，对国家和人民都大有益处。它可以锻炼人民，使国家强大。变得独立而强大的荷兰，很快就成了一个伟大的海上强国，并开始向远东扩张。而比利时与荷兰分离之后，继续处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

让我们再来看看德国，来完成欧洲的整个画面吧。1618年至1648年期间，这里发生了一场可怕的内战，被称为“三十年战争”。这是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战争，德国的小郡主和选帝侯以及皇帝，彼此开战；而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国王却站到新教的一方，使得事态更加混乱；最终，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人们称之为“北方之狮”——来到德国，击败了皇帝，拯救了新教教徒。但是，德国被毁了。那些雇佣兵像土匪一样，四处抢劫、掠夺，甚至连军队的将军们，因为没有钱支付给士兵，或没有食物给他们吃，也开始抢劫了。试想一下！——这种状况持续了30年：屠杀、破

坏和抢劫，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贸易，也几乎没有什么耕作。因此食物越来越少，忍饥挨饿的人越来越多，而这当然就滋生出了更多的土匪和抢劫。德国几乎成了职业军人和雇佣兵的滋生地。

也许没有剩下什么可以抢劫的东西了，这场战争才终于结束了。但是，德国用了极为漫长的时间，才恢复并重新振作起来。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最终结束了德国内战。这个和约使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成了没有实权的影子和幽灵。法国分得了阿尔萨斯（Alsace）这一大块肥肉；200年之后，法国又被迫将阿尔萨斯归还给了新兴的德国；在1914年至1918年的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又重新夺回了阿尔萨斯。所以，这个和约让法国受益匪浅。但是，在德国境内出现的另一位王国，让法国如坐针毡。这就是由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家族统治的普鲁士（Prussia）。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reaty of Westphalia*）终于承认了瑞士和荷兰共和国。

我告诉你，这是个关于战争、屠杀、抢劫和偏执的故事！然而，这就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就是在艺术和文学活动大发展、能量充分爆发之后的欧洲。我曾把欧洲和亚洲国家做了个比较，并注意到新生命正在欧洲苏醒。人们可以看到这个新生命在殊死抗争。一个新生儿和一种新秩序的诞生，会伴随着许多痛苦。当经济基础不稳定的时候，在上层的社会和政治就会动摇。显而易见，欧洲的新生命正在出现，不过被周围的野蛮行为包围了。当时的行为准则是“治国之科学即谎言之科学”。整个气氛充满了谎言、阴谋、暴力和残忍。有人一定会觉得奇怪，人民是如何忍受这一切的呢？

87 ——英国砍掉了国王的脑袋

现在，我们要花点时间讲讲英国历史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基本上忽略了英国，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那里并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它落后于法国和意大利。然而，牛津大学很早就成了著名学府，不久之后，剑桥大学也声名鹊起。是牛津大学培养出了威克里夫；在之前的信中（第70封），我已经给你介绍过此人了。

对于早期的英国历史，人们的兴趣主要在英国议会的发展上。从很早的时候开始，贵族们就在不断地努力，要限制王权。1215年，英国订立了《大宪章》。不久之后，议会的萌芽阶段开始出现了。它们只是议会的初级阶段，由大贵族和主教逐渐组成了上议院。但是，更重要的是，最终选举出了一个委员会，包括骑士、小地主和一些城镇的代表。这个选举出来的委员会渐渐发展成了下议院。这两个委员会或议院，都包括地主和有钱人。即使是下议院的人，也仅仅代表一小部分富裕的地主和商人。

下议院起初没有什么权力。他们向国王请愿，指出人们的不满和委屈。渐渐地，他们开始干涉税制。没有他们的同意就很难征收新的税款。因此，国王在征收新税款之前，会征得他们的同意。财权总是很重要的权力；议会，尤其是下议院，因为获得了财权，所以力量和声誉都得到了很大提升。国王和下议院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但是，议会还是比较软弱。正如我告诉你的，都铎王朝的统治者们基本上还是拥有极端权力的君主，但这些统治者很聪明，他们都避免逼迫议会，免得与他们发生争斗。

英国逃脱了欧洲大陆激烈的宗教战争，但是，在英国也发生了很多宗教冲突、暴乱和偏执的事件，无以数计的女人被活活烧死，因为人们认为她们是女巫。然而，与欧洲大陆相比，英国还算是和平的。英国随着亨利八世也变成了信奉新教的国家。当然，这里有很多的天主教教徒，也有很多极端的新教教徒。然而，新的英国国教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虽然英国国教自称是新教，但它也许更像天主教。事实上，英国国教是国家的一个部门，国王就是这个部门的首脑。英国国教与罗马和教皇的分裂是很彻底的，曾经发生过很多“反对罗马天主教”的暴动。在伊丽莎白女王（亨利八世的女儿）时期，通往东方和美洲的新海路的发现，以及新的贸易机会，吸引了许多人。英国受到西班牙和葡萄牙海员们的蛊惑，加上对财富的贪婪，也开始向海洋进发。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和他的同类们，起初做了海盗，劫掠来自美洲的西班牙船只。后来，德雷克开始了环游世界的伟大航行。他横跨大西洋，并尝试在现在的美国东海岸建立殖民地，这就是弗吉尼亚（Virginia）。为了向伊丽莎白女王表示敬意，人们称它为“童真女王”（Virgin Queen）。第一个把吸烟的习惯从美洲带到欧洲的人是雷利（Raleigh）。之后，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来了。彻底击败了这支骄傲的舰队，这极大地鼓舞了英国。但是，这一切与国王和议会之间的斗争没有多大的关系，它只是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去关注国外的事务。可是，即使是在都铎王朝时代，表面的平静之下还是有动乱的暗流在涌动。

伊丽莎白时期是英国最光明的时期之一。伊丽莎白是位杰出的女王，在她执政期间，英国出现了许多了不起的实干家。但是，比女王和她的冒险家骑士们更伟大的，是那个时代的诗人和戏剧家，而在他们之上，鹤立鸡群的是流芳百世的威廉·莎士比亚。今天，他的戏剧当然是举世闻名的，尽管我们对他本人知之甚少。正是莎士比亚和其他一些才华横溢的作家，用无数让我们充满喜悦的奇文瑰句，极大地丰富了英国语言。即使是伊丽莎白时期的抒情短诗，也有其特有的韵味，其他语言是无法与之相媲美的。他们用最简单、最甜美的语言，

以他们特有的欢快自如的方式，为我们讲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英国批评家利顿·斯特雷奇（Lyton Strachey）对那个时期是这样描述的："伊丽莎白时期卓越的作家们，富有坚定的决心和蓬勃的精神。他们在一个非凡的时代，为英国留下了世界上最辉煌的戏剧文化遗产。"

伊丽莎白辞世于1603年，比印度的阿克巴大帝的逝世时间早了两年。当时的苏格兰国王继承了她的王位，因为他在继承顺序上排在第一位。他就是詹姆斯一世（James I）。于是，苏格兰和英国成了一个王国。英国通过暴力没有做到的，现在却和平地完成了。詹姆斯一世是"君权神授"的信徒，他不喜欢议会，也不如伊丽莎白明智。不久，他和议会之间就出了麻烦。正是在他执政期间，很多英国顽固的新教教徒，于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永远地离开了他们的祖国，到美洲去定居。他们反对詹姆斯一世的独裁统治，不喜欢新的英国国教，认为它不算是新教。所以，他们背井离乡，乘船横渡大西洋，走向荒芜的新土地。他们在美洲的北部海岸登陆了一个被他们称为新普利茅斯（New Plymouth）的地方。更多的殖民者紧随其后，也来到了这里。渐渐地，沿着东海岸，殖民地增加到了13个。这些殖民地最终发展成了美利坚合众国。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詹姆斯一世的儿子是查理一世，他在1625年当上国王后不久，情况就发展到了很严重的关头。于是，议会便于1628年向他呈上了《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这是英国历史上一个很著名的文件。在请愿书中，国王被告知，他不是极权的君主，无权做很多事情。他不能非法征税和非法监禁。他这位17世纪的英国国王，甚至不能颁布法令和监禁自己的下属——而20世纪在印度的英国总督，却可以这样做。

查理一世对此大为光火。他解散了议会，国家由自己来统治。然而，几年之后，由于银根紧张，他不得不再次召集议会。查理一世在

没有议会的情况下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强烈愤慨，所以新的议会正一心想与他开战呢。不到两年，也就是1642年，内战就爆发了。一方是由许多贵族和大部分军队支持的国王，另一方是由富裕的商人和伦敦城支持的议会。这场战争拖延了好几年，直到议会一方出现了一位伟大的领袖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他是一位伟大的组织者，执行纪律十分严明，对事业也充满了宗教热情。卡莱尔是这样描述克伦威尔的："在黑暗的战争危险之中，在战场的高处，希望之光像一支火柱，在他的身上闪耀，照耀着四面八方。"克伦威尔建立了一支新军，被称为"铁骑军"，他把自己严守纪律的精神教给了他们。议会军队的清教教徒与查理的保皇党展开了决战。最后，克伦威尔取得了胜利，国王查理沦为了议会的阶下囚。

议会的许多议员仍然想与国王妥协，但是，克伦威尔的新军对此不予理睬。军队中的军官普赖德上校（Colonel Pride）勇敢地冲进议会大厦，把那些想要妥协的议员都赶了出去，这就是史上的"普赖德的清洗"。这是个极端的办法，对议会而言，这并不值得赞扬。议会反对国王的独裁，但是另一种国家力量（他们自己的军队）对他们合法的反对意见毫不理会。这就是革命的手段。

下议院留下来的议员们，被称为"尾闾议会"(Rump Parliament)。他们决定审判查理一世，尽管上议院对此十分反对。他们以"暴君、叛徒、谋杀者及国家公敌的罪名"，判处了查理一世死刑。1649年，在伦敦的白厅，他们砍下了这个曾经做过他们的国王、曾经极力鼓吹"君权神授"的人的人头。

国王和其他人一样，总是要死的。的确，历史上有许多死于暴力的国王。独裁和王权滋生了刺杀和谋杀，过去发生的刺杀英国王族的事件也屡见不鲜。但是，一个选举出来的议会竟然擅自组建法庭，审判国王，判处国王死刑，然后将他斩首，这可就是离奇惊人的事情了。很奇怪，英国人一向十分保守，反对快速变化，可他们竟然在如

何处置暴戾背叛的国王上开了先河。但是，这次的行动与其说是由全体英国人民执行的，还不如说是由克伦威尔领导下的新“铁骑军”执行的。

欧洲所有的国王、恺撒、君主和小王族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如果平民们变得如此自行其是，以英国为榜样，那么，他们会发生什么事呢？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本想进攻和镇压英国，但那时掌握英国命运的人已不再是一个无能的国王了。英国第一次成了一个共和国，而且克伦威尔和他的军队有能力保卫它。克伦威尔实际上是个独裁者，被称为“护国公”。在他严格高效的统治之下，英国国力开始强大起来，英国的舰队赶走了荷兰、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英国第一次成了欧洲主要的海上强国。

但是，英国共和国好景不长——查理一世死后不到11年，克伦威尔就于1658年去世了；两年之后，共和国覆灭。在国外避难的查理一世之子回到英国，受到热烈的欢迎，并被立为君主，称查理二世。这第二任查理很低俗，名声也不好，他的为君之道就是享乐。但他很聪明，不与议会作对。但是他实际上已暗中被法国国王收买了。英国失去了克伦威尔时期在欧洲赢得的地位。实际上，荷兰舰队已经进入泰晤士河，歼灭了驻泊在泰晤士河的英国舰队。

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继承了王位。他立刻与议会发生了冲突。詹姆斯二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教徒，想在英国重新建立教皇的支配地位。无论英国人对宗教持有何种想法——他们的想法都颇为暧昧——但是大多数人都对教皇和罗马天主教心怀怨恨。詹姆斯二世对于这种普遍的怨恨情绪无能为力，又激怒了议会，不得不逃往法国避难。

议会再一次战胜了国王，而这一次是和平的胜利，没有发生内战。国家没有了国王，但是，英国没有再次成为共和国。据说，英国人热爱君王，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热爱皇家的浮华和盛大仪式。

所以，议会开始寻找一位新国王。他们在奥兰治家族找到了一位。100年之前，奥兰治家族的“沉默的威廉”，曾经领导了尼德兰反对西班牙的伟大斗争。现在，另一个威廉（奥兰治的王子）娶了英国王室家族的玛丽（Mary）为妻。于是，1688年，威廉和玛丽成了联合君主。现在，议会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英国革命给了人民权力，人民在议会中享有了代表性地位。这样，英国革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从那时起就没有英国国王或女王胆敢挑战议会的权威了。虽然没有明显的反对和挑战，但是国王当然有很多方法对国会耍手腕，施加影响。有好几位国王都曾采取过这些方法。

议会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议会又是什么呢？不要以为它代表了英国人民，它只代表了人民的一小部分。顾名思义，上议院代表的是君主或大地主和主教。即使是下议院，也是有钱人的议会，是拥有土地的人或是大商人的议会。有选举权的人很少。直到100年前，英国还有一些所谓的“口袋选区”——也就是实际上是在某些人控制之下的选区。整个选区可能就包含一两位选民，由他们选出一名议员！据说，1793年，下议院的306名议员是由总共160人选举出来的！有一个名叫旧塞勒姆（Old Sarum）的小村庄，选出了2名国会议员。由此可见，大部分的民众都没有投票权，在国会里也没有代表性。下议院根本不是平民百姓的议会，它甚至不代表正在城市中兴起的中产阶级，它只代表地主阶级和富裕的商人们。议会的席位可以买卖，还有很多行贿的行为。这种情况一直存在，直到1832年；那一年，在经过了剧烈的骚动之后，《改革法案》（*Reform Bill*）得以通过，更多的人得到了选举权。

所以，我们看到，议会战胜了国王，这意味着一小部分有钱人取得了胜利。实际上，统治英国的只是这一小部分地主和极少数商人。

所有其他阶级，实际上包括整个国家，都没有话语权。

同样，你应该记得荷兰共和国吧，它是在与西班牙进行了殊死战斗之后才建立的，但它也是一个富人的共和国。

在威廉和玛丽之后，玛丽的妹妹安妮（Anne）成了英国女王。在1714年她去世的时候，下一位国王的人选又遇到些麻烦。议会最终去德国挑选了王位继承者。他们选择的这个德国人，当时是汉诺威（Hanover）的选帝侯。他被加冕为英国的乔治一世（George I）。也许议会选择他是因为他迟钝，一点儿也不聪明。愚蠢的国王比聪明的国王要安全些，因为愚蠢的国王不会去干涉议会。乔治一世甚至不会说英语，他对英语一窍不通。甚至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乔治二世，也基本上不懂英语。就这样，汉诺威家族，也称汉诺威王朝，在英国扎下了根，而且至今非常强盛。不过，很难说是它在统治国家，因为国家是由议会管理和统治的。

在16和17世纪，爱尔兰和英国之间出现了很多矛盾和摩擦。在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的统治时期，英国一直试图征服爱尔兰，因此反抗和屠杀事件不断发生。詹姆斯一世没收了位于北爱尔兰（North Ireland）的阿尔斯特（Ulster）的大片土地，并从苏格兰带去了新教教徒，让他们在这些地区定居。从那时起，这些新教教徒殖民者就留在那里生活，爱尔兰便被分成了两个部分：本土的爱尔兰人和苏格兰殖民者；罗马天主教教徒和新教教徒。这两者之间积怨很深，当然，英国人可以从中受益。一直以来统治者都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即使到现在，爱尔兰最大的问题仍然是阿尔斯特问题。

英国内战期间，在爱尔兰发生了针对英国人的大屠杀。于是，克伦威尔残暴地为英国人报了仇，大肆屠杀了爱尔兰人。直至今日，爱尔兰人对此还耿耿于怀。还有更多的战争以及殖民地和条约，但是英国人违反了这些条约——这是一段漫长而痛苦的历史，是爱尔兰的苦难历史。

《格列弗游记》（*Gulliver’s Travels*）的作者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1667——1745）就生活在这一时期，你对此或许会感兴趣。这本书是著名的经典儿童小说，但实际上是针砭时弊的，它对当时的英国进行了辛辣的讽刺。《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的作者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和斯威夫特是同时代的作家。

88 ——巴布尔

让我们回到印度吧。我们在欧洲已经待了一阵子了，而且在许多封信里，我们努力通过混乱、挣扎和战争，理解了16世纪和17世纪在那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不知道你对欧洲那一时期有什么样的印象。不论你的印象如何，它一定是很复杂的，因为那时的欧洲就是个既复杂又奇怪的地方。连续不断的野蛮战争、史无前例的宗教偏执和残忍、国王的独裁和“君权神授”、堕落的贵族，还有对人民无耻的剥削。而中国似乎远远地走在了欧洲的前面——它是个有教养、富有艺术气质并且十分宽容的国度，而且基本上是和平的。那么印度呢？尽管经历了分裂和衰退，但在很多方面它也可以与中国相媲美。

但是，欧洲也有一副不一样的、令人更加赏心悦目的面孔。当代科学的萌芽已经出现，而且民众自由的思想开始逐渐深入人心，动摇了国王的宝座。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以及许多其他活动发生的原因，都是因为西欧和西北欧国家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大城市发展起来了，城市里的商人与遥远的国家做起了生意，工匠们也在从事产业活动，一片忙忙碌碌的景象。整个西欧，行业协会——也就是工匠或手艺人的联合会——也发展起来了。这些商人和产业阶层构成了资产阶级——也就是新兴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正在不断发展，但是它也遇到了很多政治、社会和宗教方面的障碍。在政治和社会组织中还有封建制度的残余。封建制度属于过去的年代，阻碍了贸易和工业的发展，已经不适合新的形势了。封建地主以前常常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商人阶层对此十分不满。因此，资产阶级试图剥夺封建阶级的权力。国王也不喜欢封建贵族，因为他们想蚕食他的权力。这样，国王和资

产阶级就结成了联盟，共同反对封建地主，并剥夺了他们的权力。结果，国王的权力更大了，也就变得更加独裁了。

当时的西欧人们感觉宗教组织也是处于同样的状况。那时流行的宗教思想和做生意的理念都阻碍了贸易和工业的发展。宗教本身在很多方面都与封建制度有联系。前面我已经给你讲过，教会是最大的封建地主。在之前的很多年里，都有个人和团体起来批评和挑战罗马教会，但是都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然而，现在，整个新兴的资产阶级都要求改变现状，于是改革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所有这些改变，还有许多其他我们已经谈到的改变，结成一种合力，构成了革命的不同方面和阶段，把资产阶级推到了风口浪尖。变革的过程在西欧国家似乎基本相同，但是，各个国家发生变革的时间各不相同。东欧在当时以及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工业都十分落后，所以，在那里并没有出现这些变革。

在中国和印度，也有手艺行会和大批的工匠与手艺人。工业也同样很发达，往往比欧洲更先进。但是，在这个阶段，我们在那里却看不到像欧洲一样科学上的发展，也没有那种对民众自由的强烈要求。在这两个国家都有宗教自由、城市及农村的地方性自由和行会自由的长期传统。人们不太在意国王的权力和独裁，只要他们各自的地方事务不受干涉就好。这两个国家都建立了持续很久的社会体制，比欧洲的任何一种体制都稳定得多。或许正是这种体制的稳定和僵化阻碍了发展。在印度，我们看到，分裂和衰退最终导致了印度北部被莫卧儿帝国的巴布尔征服。人们似乎完全忘记了他们古老的雅利安人的自由思想，变得奴颜婢膝，对任何统治者都顺从听命。甚至给这个国家带来新生命的穆斯林似乎也变得和其他人一样软弱而顺从了。

而欧洲富有饱满的精神和活力，这正是古老的东方文明所缺少的。慢慢地，欧洲悄悄地超越了东方。它的子孙走到了世界的天涯海角。贸易和财富的诱惑把它的水手们吸引到了美洲和亚洲。在东南

亚，我们看到，葡萄牙人终结了阿拉伯人的马六甲帝国。他们在印度的海岸线上和东海上建立了军事基地。但是，不久他们控制的香料贸易就受到了荷兰和英国这两个新兴的海上强国的挑战。葡萄牙人被赶出了东方，他的东方帝国和贸易也随之消亡了。荷兰人从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葡萄牙，许多东方的岛屿被他们占领了。1600年，伊丽莎白女王批准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这是一个伦敦商人的公司，在印度进行贸易活动。两年之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也成立了，从而开启了欧洲列强瓜分亚洲的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它只是局限在马来群岛和东部岛屿。中国对于欧洲来说太强大了，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明末清初，满族人是在17世纪中叶来到中国的。日本人做得很绝，他们在1641年把所有外国人都赶了出去，并把自己完全封闭了起来。那么，印度呢？我们在印度的故事已经滞后了，我们得把这些内容补上。后面我们会看到，印度在新的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下，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君主国家，所以没有被欧洲入侵的危险和可能。但是，欧洲已经掌握了制海权。

所以，我们再回到印度。在欧洲、中国、日本和马来西亚，我们已经讲到了17世纪的末期，并来到了18世纪的起始点上。但是，印度的历史我们才讲到16世纪初期。此时，巴布尔来到了印度。

德里的阿富汗苏丹既软弱又卑劣，巴布尔于1526年打败了他，在印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和新帝国——莫卧儿帝国。除了一次短暂的间隔之外，莫卧儿帝国从1526年至1707年，持续了181年的时间。这是帝国强盛和荣耀的时代，印度伟大的莫卧儿帝国在整个亚洲和欧洲都声名远扬。这个王朝一共产生了6位伟大的统治者，后来帝国就分崩离析了。马拉地人、锡克教教徒和其他人瓜分了帝国，并建立了自己的王国。

在他们之后，英国人来了，他们在帝国分裂和国家混乱的局势里浑水摸鱼，逐渐建立起了他们的领地。

我已经告诉过你一些关于巴布尔的情况。他是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后裔，他继承了他们的英勇品质和军事才能。但是，蒙古人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已经变得更文明了。巴布尔是一个最有教养和最令人愉悦的人，没有教派意识，没有宗教偏见，而且不像他的先辈那样残民害物。他对艺术和文学都是全情投入，他本人就是波斯语的诗人。鲜花和园林是他的最爱，在炎热的印度，他常常想念远在中亚的故园。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费尔干纳（Ferghana）的紫罗兰十分美艳，还有成片的郁金香和玫瑰。"

巴布尔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只有11岁，但他就成了萨马尔罕城的统治者。这可不是个轻松的工作。他的周围被敌人包围着，因此，在应该上学的年龄，他却不得不佩剑上战场。他曾失掉了王位，随后又夺了回来。他在暴风骤雨般的战斗生涯中历经了许多冒险。然而，他还努力学习文学、诗歌和艺术。他志存高远，野心勃勃。他征服了喀布尔之后，跨过印度河，来到了印度。他只有一支小规模的军队，但他拥有当时在欧洲和西亚被普遍使用的新型火炮。与他作战的阿富汗军队虽然人数众多，却被他这支训练有素、小而精的军队用火炮打得落花流水。巴布尔胜利了，但是，他的麻烦并没有结束。有很多次，他的命运都危在旦夕。有一次，在他面临巨大危险的时候，他的将军们建议他往北方撤退。但是，他意志坚定，性格也很顽强。他说他宁死也不撤退。他嗜酒如命，然而，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决定戒酒，并砸碎了他的所有酒杯。他又一次战胜了敌人，而且他信守了戒酒的誓言。

巴布尔在印度待了不足四年就去世了。在这四年里，他都在征战，很少休息。对于印度而言，他还是个陌生人，而他对印度也知之甚少。他筹划在阿格拉建一座豪华壮观的都城。他派人到君士坦丁堡，去请一位有名的建筑师。那时，正是苏莱曼大帝在君士坦丁堡大兴土木的时候，希南（Sinan）是奥斯曼帝国著名的建筑师，他派他的得意门生优素福（Yusuf）来到了印度。

巴布尔写了回忆录，这本书读起来令人愉悦，并让我们对这位伟人有了亲密而简略的了解。他为我们介绍了印度斯坦，那里的动物、鲜花、树木和水果——他还没有忘记那里的青蛙！他渴望故乡的甜瓜、葡萄和鲜花。他也表达了对当地人民的无比失望之情。在他看来，他们真是一无是处。也许，在这四年的战争中，他没有机会去了解他们，而更有教养的阶层对新的征服者避之唯恐不及。也可能是因为，一个新来的人想进入另一个民族的生活和文化并非易事。总之，无论是在统治了印度相当一段时间的阿富汗人身上，还是在大多数的当地人身上，他都没有发现什么值得赞美的东西。他很善于观察，虽然他是个新来的人，看法可能有失偏颇，但他的叙述还是揭示了当时印度糟糕的状况。可他根本没有去过印度的南部。

巴布尔告诉我们："印度斯坦帝国富饶广袤，人口众多。它在东部、南北部甚至西部，都以大洋为界。在北部，它有喀布尔、加兹尼，还有坎大哈。印度斯坦的首都是德里。"有趣的是，巴布尔把整个印度看成一个整体，尽管当他来这里的时候，它已分裂成了许多王国。这种印度整体性的想法贯穿了印度的整个历史。

巴布尔对印度做了进一步的描述：

> 这是个非常美好的国家。但是，与我们的国家相比，它是个不同的世界。它的小山和河流，树林和平原，动物和植物，居民和语言，清风和细雨，都和别处的不同。一过了信德省，一切都是完全的印度斯坦风格了：乡村、树木、石头、四处游荡的部落，还有人们的礼仪风度和风俗习惯。甚至连爬行动物都不一样……印度斯坦的青蛙值得我们关注，尽管它们和我们的青蛙都是同类，然而，它们能够在水面上跑六七米远呢。

他还编制了印度斯坦的动物、鲜花、树木和水果一览表。然后，就是对当地人的描述了：

印度斯坦这个国家在娱乐消遣方面乏善可陈。人长得不好看，而且他们根本不知道社会和谐、与人坦率相交以及家庭里情感交流的美妙感觉。他们没有天分，头脑缺乏理解力，不懂礼貌，同胞之间没有善意和友情；在设计制作工艺品的时候，既不别出心裁，也无机械上的创新；在设计和建筑方面，也无技能和知识；他们没有骏马，没有美味的禽肉，没有葡萄和甜瓜，没有好吃的水果，没有冰和冰水，没有美味的食物，在他们的市场上没有面包，他们也没有澡堂，没有大学，没有蜡烛和火把，也没有烛台。

那么，人们一定会问，他们都有什么呢？巴布尔在写这些的时候，一定是对那里的一切厌倦透顶了。

巴布尔说：

印度斯坦的主要优点是，它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出产大量的黄金和白银……印度斯坦的另一个便利之处就是，各种专业和行业的工匠多得不计其数；任何工作，如果需要聘用任何工匠，总有一群人整装待发，而这些人所从事的工作和行业，几百年来都是一样的，是祖祖辈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我已经从巴布尔的回忆录中引述了不少段落。这样的书往往比任何描述都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一个人。

巴布尔逝世于1530年，终年49岁。关于他的死有个很有名的故事。他的儿子胡马雍（Humayun）生病了，据说巴布尔爱子心切，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换取儿子的康复。胡马雍康复了，而巴布尔在儿子康复后的几天内就去世了。

他们把巴布尔的遗体运回了喀布尔，将他葬在一个他喜爱的花园里。他终于回到了他钟爱的鲜花丛中。

89 ——阿克巴

巴布尔凭借他的军事效率和指挥才能征服了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他打败了德里的阿富汗苏丹。后来他又打败了更强劲的对手，奇图尔勇猛的拉纳·桑伽（Rana Sanga）领导下的拉杰普特人部落。拉纳·桑伽是拉杰普特人历史上著名的英雄人物。但是，巴布尔把一个棘手的问题留给了他的儿子胡马雍。胡马雍是个很有教养、知识渊博的人，但和他的父亲不同的是，他没有指挥作战的才能。他的新帝国危机四伏，最后，在1540年，也就是巴布尔去世10年之后，比哈尔邦的一个名叫舍尔汗（Sher Khan）注的阿富汗首领打败了胡马雍，将他赶出了印度。伟大的莫卧儿帝国的第二个皇帝就这样成了一个东躲西藏、饥寒交迫的流浪者。当他在拉杰普塔纳邦的沙漠上流浪的时候，他的妻子于1542年11月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降生在沙漠上的儿子就是阿克巴。

胡马雍逃到了波斯，当地的统治者沙阿塔马斯普（Shah Tamasp）收留了他。与此同时，舍尔汗在印度的北部已经如日中天，他自立为王，称“舍尔沙阿”（Sher Shah），在那里统治了5年。尽管这是个短暂的时期，但他显露了非凡的才干。他是位卓越的组织者，他的政府运作也非常积极而高效。就在战争期间，他还忙里偷闲地实施了一套更新更好的土地税收制度，评估耕种者的税收。他是个严厉而苛刻的人，但是，在印度的所有阿富汗统治者，以及很多其他的统治者中，他无疑是最好的，也是最有才干的。就像其他能干的独裁统治者常常会做的那样，他统管着政府的一切；等他一死，整个政府机构就瓦解了。

胡马雍正是利用了他们的混乱形势，在1556年率领军队从波斯打回来了。他取得了胜利，在时隔16年后又登上了德里的王位。但是好景不长，仅6个月之后，他不慎从楼梯上摔下来，一命呜呼了。

把舍尔沙阿和胡马雍的坟墓或陵墓做个对比，真的很有意思。那位阿富汗人的陵墓坐落在比哈尔邦的沙阿须蓝（Sahasram），是一座傲然耸立、高大而坚固的建筑物，就像他本人一样。胡马雍的陵墓在德里，是一个优美而雅致的建筑。通过这两座石头建筑，人们就能对这两个人有一定的了解，他们在16世纪曾是争夺帝国的竞争对手。

那时，阿克巴才13岁。像他的父亲一样，他也是很早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有一位监护人兼保护者培拉姆汗（Bairana Khan）——他被称为“汗巴巴”（Khan Baba）。但是4年之后，阿克巴厌倦了被人监护、受人摆布的生活，便将政府的大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阿克巴统治印度近50年，从1556年初至1605年末。这正是欧洲的尼德兰革命和英国的莎士比亚时期。阿克巴的名字在印度历史上十分引人注目，有时候，在某些方面，他会令人想起阿育王。真是奇怪，一个是公元前3世纪印度佛教国家的皇帝，一个是公元后16世纪印度伊斯兰教国家的皇帝，他们俩竟然用同样的方式和几乎同样的声音说话。人们会感到奇怪，是否这也许是印度自己的声音，从它两个伟大的儿子口中说出来了？我们对阿育王了解得不够多，只知道他留下了亲自刻在石头上的一些诏令。对阿克巴我们知道就很多了。他的宫廷里有两位同时代的史学家留下的长篇记述，还有前来拜访他的外国人，尤其是那些拼命想让他皈依基督教的耶稣会会士，都留下了长篇大论的记述。

他是从巴布尔排下来的莫卧儿帝国的第三位皇帝。但是，莫卧儿帝国的人们对于这个国家而言，还是新来的人。他们被看作外国人，他们依靠军队控制着印度。正是在阿克巴执政时期，建立了莫卧儿王朝，使印度成了他的领土，但是在景致上却完全保留了印度的特色。

也是在他的执政时期，欧洲人开始使用伟大的莫卧儿这个头衔了。他十分独裁，他的权力没有受到任何限制。似乎在当时的印度从没有人提出要限制皇权。幸好阿克巴是一位明智的专制君主，他为印度人民的福祉而努力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可能被认为是印度民族主义之父。当这个国家还没有什么民族意识，而且国家是用宗教来划分的时候，阿克巴有意识地提倡这种共同印度的民族主义思想，压制了分裂主义的宗教主张。他虽然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但是，他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已经十分令人惊叹了。

然而，阿克巴所取得的这些成功也不全是靠他的一己之力。如果没有天时、地利、人和，谁都不可能做成大事。但是，伟人往往能够创造出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而伟人本身就是时势造就出来的英雄。所以，阿克巴也是印度时势造就的英雄。

在之前的一封信中（第75封）我曾告诉过你，在印度有一种无声的力量就是如何使这个国家两种文化和宗教融合在一起。我告诉过你关于新的建筑风格以及印度语言的发展，尤其是乌尔都语和印度斯坦语。我还给你讲过一些改革家和宗教领袖，如拉玛南德、卡比尔和那纳克古鲁，他们想通过强调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共同点抨击它们繁复的仪式和礼仪，来拉进这两个宗教的距离。这种宗教融合的精神广为流传。头脑敏锐、接受能力极强的阿克巴一定也理解了这种精神，并做出了积极反应。事实上，他成了宗教融合的主要倡导者。

他甚至作为一位政治家，也一定得出了结论：他的力量以及国家的力量，都有赖于这种融合。他是位勇敢的斗士、有才干的将军。他不像阿育王，他从不反对战争。但是，比起武力征服，他更希望赢得人民的爱戴，因为他知道，只有赢得人民的爱戴，政权才能长久。所以，他处心积虑、煞费苦心地去赢得印度贵族和人民大众的亲善。他取消了对非穆斯林所征收的人头税（吉兹亚）和对印度朝圣者的税收。他娶了一位拉杰普特家族的贵族小姐为妻；后来，他也为儿子娶

了拉杰普特家族的小姐；他鼓励这样的通婚。他还任命拉杰普特家族的贵族在他的帝国里担任高官。他的几位最勇敢的将军和最有才干的大臣及总督都是印度人。曼·辛格王公（Raja Man Singh）甚至被派往喀布尔做了一段时间的总督。事实上，他为了博得拉杰普特人及印度民众的好感，甚至偶尔会不公正地对待他的穆斯林臣民。然而，他赢得了印度人的亲善，拉杰普特人也成群结队地来为他服务，向他表示敬意——几乎所有人都这样做了，但还是有一个人绝不屈服，他就是梅卧儿（Mewar）王国的拉纳·普拉塔普·辛格（Rana Pratap Singh）。拉纳·普拉塔普拒绝承认阿克巴的君主地位，即使只是名义上的。在战斗中受到重挫之后，他宁愿到森林里过逃亡的生活，也不愿当阿克巴的臣属，过锦衣玉食的生活。这个骄傲的拉杰普特人一生都在与德里的大皇帝战斗，拒绝向他俯首称臣。到最后，他甚至取得了一些胜利。有关这位勇敢的拉杰普特人的记忆，都珍藏在拉杰普塔纳邦的人民心中，围绕他的名字有许多的传奇故事。

这样，阿克巴赢得了拉杰普特人的心，受到人民大众的拥戴。他对帕西人，甚至还有到他宫廷来的耶稣会会士，都很宽厚。但是，他的这种宽厚以及对穆斯林的宗教仪式某种程度上的轻视，让穆斯林贵族十分不满，还发生过几次反对他的暴乱。

我曾把他比作阿育王，但是，请不要被这种比喻误导了。他在很多方面和阿育王不一样。他雄心勃勃，而且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是一个征服者，一心想扩张他的帝国。耶稣会会士告诉我们，他“思维敏捷，富有洞察力；有明智的判断力，行事谨慎；最重要的是，他慈悲和善，平易近人，慷慨大方。他把这些品质和那些野心勃勃地去成就大事业的人的勇气结合了起来……他对许多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博闻强记，不但精通军事和政治事务，还了解许多机械方面的技巧……这位君主身上闪耀着仁慈和温厚的光芒，甚至照耀在那些冒犯了他本人的人身上。他很少发脾气。一旦发脾气，那就是大发雷霆，怒不可遏；但是他的怒火很快就会平息”。要记住，这样的描述

不是出自他的廷臣，而是来自另外一个国度的陌生人，因为他有很多的机会观察阿克巴。

阿克巴的身体异常强壮而敏捷，他的最爱就是猎杀狂野而危险的动物。作为一名战士，他勇猛到了近乎鲁莽的程度。我们从他一次著名的行军中就足以看出他身体里所蕴含的惊人能量。古吉拉特邦发生了暴乱，阿克巴带领一支小部队，在9天的时间里，就从阿格拉穿越拉杰普塔纳沙漠赶到了艾哈迈达巴德，这段路程长达450英里。这是卓越非凡的壮举，因为，我几乎无须提醒你，那时既没有铁路，也没有汽车。

但是，伟人们除了具备这些品质之外，据说他们还具备一种把人们聚拢到自己身边的吸引力。阿克巴就拥有强大的吸引力和个人魅力；在耶稣会会士的美妙描述中，他那富有强烈吸引力的双眼“就如同阳光下的大海一样，充满了生气”。他高贵而阳刚的风姿在一群普通的国王里高高在上，傲视群雄。这样一个人至今仍然让我们着迷，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作为征服者，阿克巴在整个印度北方，甚至南方，都所向披靡。他将古吉拉特邦、孟加拉地区、奥里萨邦、克什米尔和信德省都纳入了他的帝国版图。他在印度的中部和南部也大获全胜，受到广泛的称赞。但是，击败了中部的一个省邦的女王杜尔伽瓦蒂（Rani Durgavati），却没有给他带来多少荣誉。这位女王是位勇敢而优秀的统治者，而且她对阿克巴毫无损害。但是，他的野心和对帝国的渴望，使他对这些绊脚石毫不在乎。在印度的南部，他的军队与另一位女王发生了战斗，她就是著名的察昂德·碧碧（Chand Bibi），艾哈迈德讷格尔的摄政王。她既勇敢又能干。她与莫卧儿的军队顽强战斗，使莫卧儿的军队十分钦佩，他们便赐予了她和平。不幸的是，后来她手下的一些对她心怀不满的士兵将她杀害了。

阿克巴的军队也围困了奇图尔邦——这是发生在杜尔伽瓦蒂之前的事。贾马尔（Jaimal）英勇顽强地保卫着奇图尔邦，临死的时候，又举行了可怕的角哈祭仪式，接着，奇图尔邦就沦陷了。

阿克巴设法把许多很能干的助理官员聚集在他的身边，而且他们对他都忠心耿耿。他们当中有几位重要的官员，法伊兹（Faizi）兄弟和阿布勒·法兹勒（Abul Fazl），还有波巴勒（Birbal）；民间流传着许多与他们有关的故事，人们至今还津津乐道。托达尔·马尔王公（Raja Todar Mal）是他的财政大臣，负责修改了整个税收制度。你或许会感兴趣，在那个年代，没有土地持有及田赋征收制度，也没有地主和乡长。国家直接和农民及佃户算账。现在我们称它为佃户税制系统。而今天的地主则是英国人的创造。

斋浦尔（Jaipur）的曼·辛格王公是阿克巴最优秀的将军之一。阿克巴宫廷里的另一位名人是檀增（Tansen），他是位伟大的歌手，而且已经成了印度所有歌手的最高典范。

阿克巴最初把首都定在了阿格拉，并在那里建起了城堡。后来他又在法塔赫布尔-西格里（Fatehpur-Sikri）建了一座新城，距离阿格拉大约15英里。他之所以选择法塔赫布尔-西格里，是因为圣人谢赫·沙利姆·奇斯蒂（Shaikh Salim Chishti）在那里生活。阿克巴在那里建起了一座宏伟壮观的城市。当时的一位英国旅行者说："它比伦敦壮观得多。"在15年多的时间里，它一直是阿克巴帝国的首都。后来，他又迁都到了拉合尔。阿克巴的朋友兼大臣阿布勒·法兹勒说："陛下规划出了雄伟的大厦，而他倾情之作的外观是用石头和黏土装饰的。"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城和它美丽的清真寺、宏伟的布兰德·达瓦扎（Buland Darwaza）大门，还有许多其他精美的建筑，至今都还巍然屹立着。这是一座被遗弃的城市，已经没有人在那里生活了。但是，当你穿过街道，走过宽阔的宫殿时，你似乎会感到一个消亡帝国的幽灵还在那里游荡。

我们现在的城市阿拉哈巴德也是阿克巴建造的，不过这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自从史诗《罗摩衍那》流传的年代起，圣城祭祀之地就在此地繁盛起来了。阿拉哈巴德的城堡也是由阿克巴建造的。

要征服并巩固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阿克巴一定是戎马倥偬，日理万机。但是，在此期间，人们可以看到阿克巴另一个非凡的特性，那就是他无边的好奇心和探寻真理的热忱。无论是谁，只要他对某个学科有新的见解，阿克巴都会把他请来，当面向他请教。在“信仰之屋”（Ibadat Khana，礼拜堂）聚集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他们每个人都希望能让这位伟大的君主皈依自己的宗教。他们经常发生争论，而阿克巴就坐在一旁，聆听他们的争论，还向他们提出很多问题。他深信，真理并非是某个宗教或派别的专利品。他宣布，他公开承认的原则，就是“全世界宗教信仰自由”。

在他执政期间，有一位名叫拜达欧尼（Badauni）的史学家一定多次光临了这样的聚会。他对阿克巴有一段有趣的描述，我在下面将援引他的话。拜达欧尼自己是一位正统的穆斯林，完全不赞同阿克巴的这些活动。

> 陛下（他说）收集了每个人的意见，尤其是那些非穆斯林的意见。他会保留他所赞同的意见，而对于不符合他性情的、违背他意愿的意见则一律拒绝。从少年到成年，再从成年到老年，陛下经历了各个阶段，见识过各种宗教习俗，听闻过不同派别的信仰，并以他特有的选择才能和与所有（伊斯兰教的）原则相反的探求精神，收集到了人们能在书籍中找到的所有关于宗教的信息。于是，以一些基本原则为基础的信仰在他心中的镜子里勾画出了轮廓，而且由于各种宗教对陛下的影响，在他的心中渐渐产生了一种信念，就如同宝石的轮廓一样。他的信念就是，在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当中，在所有国家里，都有明智的人，也有节俭而节制的思想家，还有具备了非凡力量的人。如果到处都能发现真理和知识的话，那么为什么真理只能局限在一种宗教里呢？……

在这个时候，你应该想起，欧洲曾经在宗教信仰方面十分褊狭。宗教法庭在西班牙、尼德兰和其他地方非常兴盛，天主教教徒和加尔文教徒都认为，对另一种宗教的宽容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年复一年，阿克巴继续与各种宗教的信仰者进行对话和辩论，直到这些信仰者对此厌倦了，放弃了想使他皈依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的希望。既然每一种信仰都有其真理，那么他怎么能够固定去信仰一种宗教呢？据耶稣会会士的报告所称，阿克巴曾经说过："非穆斯林认为他们的法规是很好的；同样，萨拉森人和基督徒也认为各自的法规是很好的。那么，我们应该坚持哪一种宗教呢？"（耶稣会会士说的非穆斯林是指印度教教徒，而萨拉森人当然是指穆斯林。耶稣会的神父是葡萄牙人，所以他们知道西班牙的萨拉森人，并用同样的名字称呼印度的穆斯林。）阿克巴的问题十分中肯，但是激怒了耶稣会会士，他们在书中说："于是，我们在这位国王身上看到了无神论者常犯的错误，他拒绝让理性顺从信仰，对于他薄弱的心智无法理解的任何事物都不能接受，他甘愿听任自己残缺的判断力，去判断那些超越了人类理解力极限的事物。"如果这是对无神论者的定义的话，那么，这世界上的无神论者越多越好。

我们并不清楚阿克巴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不是把这个问题看成是个纯粹的政治问题？他为了在印度形成一个共同的国民性，是不是想把不同的宗教融为一体？或者，他的动机和探求都是宗教性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倾向于认为，他首先是一位政治家，其次才是宗教的改革者。无论其目的是什么，他实际上宣布了一种新宗教的诞生——神圣宗教（Din Ilahi）——他自己任最高长老。在宗教问题上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他的专制是不容挑战的。他的宗教还有许多令人恶心的伏拜、吻脚等诸如此类的繁文缛节。这种神圣宗教并没有得到发展和传播，它只是激怒了穆斯林。

阿克巴是独裁主义者。然而，让我们猜测一下他对政治上的自由思想会如何反应的。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如果内心是自由的，那么为什么不给人民更多政治上的自由呢？他对科学一定会非常感兴趣。不幸的是，这些科学思想在当时的印度并不流行，而在当时的欧洲已经开始让一些人感到烦恼了。而且在印度似乎也没有印刷术，受教育的人十分有限。事实上这会让你很惊讶，阿克巴竟然是个文盲——也就是说，他既不会阅读，也不会写字！然而，他却有很高的文化修养，非常喜爱让人读书给他听。在他的命令下，许多梵文书籍被翻译成了波斯文。

应该注意的是，他下令禁止萨提（sati，寡妇殉葬）制度，还禁止让战犯当奴隶的做法。

阿克巴在执政近50年后，于1605年10月去世，终年64岁。他被葬在阿格拉附近锡坎德拉（Sikandra）的一座美丽的陵墓里。

在阿克巴执政期间，在印度的北部——主要在贝拿勒斯——有一个在联合省大名鼎鼎的人物，每个村民都知道他的名字，在那里，他比阿克巴或者任何一位国王名声都大，我说的就是蚁垤（Tulsi Das），他基于“拉玛克里玛那斯”（Ramacharitmanas）[注]用印地语撰写了《罗摩衍那》。

---

1. Khan，有两种译名：（1）可汗，古代突厥、鞑靼、回纥、蒙古、土耳其等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2）汗，古代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对统治者和官吏的称号。——译者注

2. 拉玛克里玛那斯，一种印度北部流行的说唱形式。——译者注

90 ——印度莫卧儿帝国的衰落和灭亡

关于阿克巴，我很想给你再多讲一些，但是，我必须得控制自己。可我还是忍不住要引述一些葡萄牙传教士对他的介绍。他们的看法远比那些廷臣的看法要有价值得多。而且，要记住，他们对阿克巴非常失望，因为他没有皈依基督教。但是他们仍然说："他的确是位伟大的国王，因为他知道，一位好的统治者能够让他的臣民顺从他，同时还尊敬他，热爱他，畏惧他。他是位广受爱戴的君主，他对待大人物态度坚定，对下层的人民十分和善，对所有人都很公正，无论地位是高是低，是邻居还是陌生人，是基督徒、萨拉森人，还是非穆斯林；于是所有人都认为，国王是站在自己一边的。"耶稣会会士还告诉我们："他刚才还在认真思考国家事务，或者倾听臣民的讲述，而不一会儿，人们就看到他在剪骆驼毛，凿石头，砍木头，或是打铁。而且，他总是十分勤勉地做这些事情，仿佛他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他的本行一样。"尽管他是位强大而独裁的君主，但他并不认为体力劳动有损他的尊严，而今天有些人似乎抱有这样的想法。

耶稣会会士还告诉我们："他的饮食十分节俭，一年只有三四个月吃荤食……他每天晚上尽力腾出三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他的记忆力惊人，他记得他所有大象的名字，尽管他有几千头大象。他还记得他的马、鹿，甚至鸽子的名字！"这种惊人的记忆力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也许他们的描述有一些夸张，但是毫无疑问，他的确智力超群。"尽管他既不会阅读，也不会写字，但他对帝国里所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而且，"他对知识如饥似渴，所以，就像一个饥饿的人想一大口吞进所有的食物那样，他想一下子就学会所有的东西"。

这就是阿克巴。他是个十足的暴君。尽管他给予了人民很大限度的保护，减轻了农民的税收负担，但他的想法并不是要通过教育和培训来普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所处的时代是个到处都是独裁统治的时代，与其他独裁君主相比，他，无论作为一个国王还是作为一个人，都是出类拔萃、光芒四射的。

尽管从巴布尔开始算起，阿克巴是第三位皇帝，但他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真正缔造者。就像忽必烈可汗在中国建立了元朝一样，从阿克巴开始，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者们建立了一个印度王朝。因为阿克巴在巩固帝国上所做的卓越工作，他的王朝在他死后又持续了100多年。

在阿克巴之后，又出现了三位很有才干的君主，但是，他们并没有什么非凡惊人之处。每当有皇帝辞世的时候，王子们都会因为争夺皇位而发生不合礼仪的斗争。这里有宫廷阴谋和争夺继承权的战争、儿子反对父亲的叛乱、兄弟之间的手足相残，还有亲人之间自相残杀和相互蒙蔽——所有这些都是与独裁和极权统治相生相伴的。这里也有浮华和辉煌，任何地方都无法与之相比。你要记住，当时正是“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法国最繁盛的时期；路易十四建造了凡尔赛宫，还拥有一座宏伟壮丽的宫殿，但是，在强大的莫卧儿帝国的豪华壮观面前，法国的这些同时代建筑便黯然失色了。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也许是当时最富有的君主了。在帝王的宫廷穷奢极侈的同时，饥荒、瘟疫和疾病却时有爆发，很多人因此丧生。

阿克巴时代对宗教的宽容，在他的儿子贾汗季（Jahangir）执政时期仍然继续着，但是，它渐渐消失了，之后出现了一些对基督徒和印度教教徒的迫害行为。后来，在奥朗则布（Aurangzeb）执政时期，印度教教徒开始遭到严酷迫害，寺庙被毁坏了，可恨的人头税又重新开征了。阿克巴千辛万苦为帝国奠定的基础，就这样被一一地废除了；突然间，帝国摇摇欲坠，最后竟然彻底坍塌了。

阿克巴的儿子贾汗季继承了阿克巴的王位，他的妻子是拉杰普特人。他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父亲的传统，但是，比起管理朝政，他也许对艺术、绘画、园林和鲜花更有兴趣。他有一个精美的艺术博物馆。每年他都要去克什米尔，我想，就是他设计了斯利那加（Srinagar）附近的著名林园——沙拉穆尔花园（Shalamar Bagh）和尼沙特花园（Nishat Bagh）。贾汗季的妻子，或者说，众多妻子中的一位，是美丽的努尔·贾汗（Nur Jahan），她才是宝座背后真正的掌权者，正是在贾汗季执政时期，建造了包括伊特玛瓦德拉陵（Itmad-ud-Daula）在内的美丽建筑。我只要去阿格拉，总是要去参拜这个建筑艺术的瑰宝，一饱眼福。

贾汗季之后，他的儿子沙阿贾汗（Shah Jahan）统治了帝国30年（1628——1658年）。在他执政时期——他与法国的路易十四生活在同一个时期——莫卧儿帝国达到了辉煌的鼎盛时期。但是，也是在他执政期间，帝国出现了明显的衰败迹象。缀满了贵重宝石的皇帝宝座是专门为沙阿贾汗制作的，这就是著名的孔雀宝座（Peacock Trone）。还有建在阿格拉的亚穆纳河畔的美得像梦幻一样的泰姬陵，也是他建造的。也许你知道，这是沙阿贾汗深爱的妻子慕塔芝玛哈（Mumtaz Mahal）(注)的陵墓。沙阿贾汗做了许多不光彩的事情，他在宗教上一点不宽容。当德干和古吉拉特邦发生严重饥荒的时候，他却冷眼旁观，见死不救。他的富有和浮华与臣民的贫穷和苦难形成了强烈对照，实在让人看不下去了。然而，也许人们大多可以原谅沙阿贾汗，因为他留下了用石头和大理石建造的美丽奇迹。就是在他执政时期，莫卧儿帝国的建筑水平达到了顶峰。除了泰姬陵，他还建造了莫迪清真寺（Moti Masjid），也就是阿格拉的珍珠清真寺；还有，德里宏伟的贾米清真寺（Jami Masjid），以及德里宫殿里的公众大厅（Diwan-i-am）和私人大厅（Diwan-i-khas）。这些都是高贵而简洁的建筑，有些还十分宏大，但又不失精美雅致，简直美若仙境。

在这仙境一般的美景之后，是贫困窘迫的人民。他们为那些豪华宫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许多人却连可以居住的泥土棚子都没有。那是无限王权的独裁时代，如果有谁冒犯了皇帝及其尊贵的总督或长官，他将受到残酷的惩罚。马基雅维利的君主思想操纵着宫廷的阴谋。阿克巴的仁慈、宽容，还有高效的政府，都成了往事。帝国的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

接下来，奥朗则布来了，他是伟大的莫卧儿帝国最后一位皇帝。他监禁了自己的老父亲，登上了皇位。他执政48年（1659——1707年）。不像他的祖父，他对艺术和文学毫无兴趣；不像他的父亲，他对建筑也毫无热情。他是个苦行的清教教徒，一个偏执的人，除了自己的宗教之外，对其他所有宗教都不宽容。宫廷的浮华壮观依旧，但是在私人生活方面，他很简朴，几乎就是个苦行者。他蓄意制定了迫害印度教教徒的政策，彻底改变了阿克巴的安抚和融合的政策，从而拆除了帝国一直以来赖以生存的整个基础。他重新向印度教教徒征收人头税，并且尽可能地把印度教教徒从政府公职中排挤出去；他还冒犯了拉杰普特的贵族——他们从阿克巴时期开始，就一直支持莫卧儿王朝——挑起了与拉杰普特人的战争；他毁掉了成千上万的印度教寺庙，许多古老而美丽的建筑被夷为平地。帝国向南扩张的时候，征服了比贾布尔和戈尔康达。当他迫使这些国家从遥远的南方向他进贡的时候，帝国的基础已经开始断裂，变得越来越脆弱。敌人开始从四面八方围攻他。一封印度教教徒写给他的、反对人头税的请愿书说：这种勒索的钱财“与公正背道而驰，与良策南辕北辙，因为它使国家极度贫困；更有甚者，它是对印度斯坦法律的篡改和侵犯”。请愿书在谈及帝国的形势时说：“在陛下执政期间，许多国家都与我们的帝国疏远了。接下来，进一步丧失国土是必然要发生的事，因为肆意破坏和强取豪夺正在世界范围内大肆盛行着。你的臣民被践踏在脚下，你的每个省邦都一贫如洗。人口在不断减少，困难在不断积聚！”

正是这种普遍的悲惨境遇，成了接下来50多年里印度发生巨变的前奏。这些巨变之一就是在奥朗则布死后，莫卧儿帝国突然而彻底地崩溃了。伟大的变革和运动的发生几乎总是有其背后的经济原因。我们看到，欧洲和中国的伟大帝国的消亡，都是在经济崩溃和接下来的社会变革之后发生的。在印度情况也是如此。

莫卧儿帝国的消亡几乎和所有帝国的消亡一样，是由于自己内部的衰败导致的。帝国真的是分崩离析了。在印度教教徒中间产生的一种新的反叛意识，对于帝国走向消亡的进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奥朗则布的新政策则把帝国推向了危急关头。但是，这种名不副实、宗教上的印度民族主义，甚至在比奥朗则布执政时期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扎下了根，或许这是造成奥朗则布对印度教怨恨和不宽容的部分原因。马拉地人、锡克教教徒以及其他一些人，是印度复兴运动的先锋，莫卧儿帝国终于被他们推翻了，我们在下一封信里将看到这些。但是，他们并没有继承这笔丰厚的遗产。英国人悄然而巧妙地介入了，当其他人为这笔遗产争斗的时候，英国人渔翁得利，将此据为己有。

也许你想知道，当莫卧儿皇帝的皇家军营和军队一起出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真可谓是声势浩大，方圆30英里聚集着50万人！这些人包括皇帝的卫队，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以及这座行进中的巨大城市里的几百个市场。正是在这些移动的军营里，乌尔都语——“军营”语言——发展了起来。

留存至今的莫卧儿帝国时代的许多肖像画，都十分精美雅致，现在有皇帝肖像的定期画展。这些肖像十分生动地展现了从巴布尔到奥朗则布这些帝王的个性。

莫卧儿帝国的皇帝曾经每天至少两次在阳台上露面，接待他的子民，接收请愿书。当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于1911年来到印度，在加冕典礼上正式接见印度臣民的时候，他也以莫卧儿帝国皇帝的那种方式露

面。英国人认为他们自己是莫卧儿帝国的继承人，他们继承了对印度的统治权，所以他们极力效仿莫卧儿帝国那些浮华和低俗的炫耀。正如我告诉过你的，英国国王甚至被授予了莫卧儿帝国统治者的头衔——印度皇帝。即使是现在，也许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印度的英国总督周围那样，有如此浮华和炫耀的盛况。

我还没有告诉你后来的莫卧儿帝国的皇帝与外国人的关系。在阿克巴的宫廷里，葡萄牙传教士是最大的宠儿，阿克巴与欧洲世界的联系主要就是通过这些葡萄牙人。在阿克巴看来，葡萄牙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他们掌握着制海权。英国人还没有露面。阿克巴觊觎着果阿，甚至对它发起了攻击，但没有取胜。莫卧儿帝国并没有用心向海洋发展，因此它在一个海洋强国面前是软弱无力的。这很奇怪，因为当时在东部的孟加拉地区，造船业很发达。但是，这些船主要是用于装运商品的商船。据说，莫卧儿帝国覆灭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在海上的软弱无能。海洋强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当英国人试图进入莫卧儿帝国宫廷的时候，葡萄牙人十分嫉妒他们，便使出浑身解数，让贾汗季对他们产生反感。但是，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的一位使节托马斯·罗（Tomas Roe）爵士，设法于1615年进入了贾汗季的宫廷，并从皇帝那里获得了特许权，为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打下了基础。同时，英国的舰队在印度洋上打败了葡萄牙的舰队。英国之星渐渐地从地平线上升起，而葡萄牙则在西方衰退了。荷兰人和英国人逐渐把葡萄牙人从东方海域赶了出去。而且，你要记住，就连大港口马六甲也于1641年落到了荷兰人的手中。1629年，沙阿贾汗和葡萄牙人在胡格利（Hugli）发生了战争。葡萄牙人在进行经常性的奴隶贸易，并强迫人们皈依基督教。在经历了一场英勇的保卫战之后，胡格利被莫卧儿帝国攻占了。葡萄牙这个小国被反反复复的战争拖得精疲力尽，于是它退出了对帝国的争夺，但是，它牢牢地抓住果阿和其他几个地方，直到现在还留在那里。

同时，英国人在印度的马德拉斯和苏拉特（Surat）附近的港口城市建起了工厂。马德拉斯本身就是英国人在1639年建立起来的。1662年，英国的查理二世娶了葡萄牙布拉干萨的凯瑟琳为妻，他得到了作为嫁妆的孟买岛。不久之后，他以极低的价钱将它卖给了东印度公司。这是发生在奥朗则布执政期间的事情。东印度公司因为赶走了葡萄牙人而备感自豪，并且认为莫卧儿帝国正在走向衰亡，因此，在1685年，东印度公司试图以武力来增加他们在印度的财产，但是他们遭到了惨败。战舰从英国长途奔袭而来，从东方的孟加拉地区和西方的苏拉特两面同时进攻奥朗则布的领地。但是，莫卧儿帝国仍然强大，足以重创英国人。英国人由此得到了教训，以后就小心谨慎多了。即使当奥朗则布死后，莫卧儿帝国显然已经分崩离析之时，英国人还是犹豫再三，很多年之后才开始他们新的冒险活动。1690年，英国人乔布·查诺克（Job Charnock）建立了加尔各答城（Calcuta）。所以，马德拉斯、孟买和加尔各答都是由英国人建立起来的，它们最初大多是和英国雄心勃勃的事业一起发展起来的。

现在，法国也出现在了印度。法国成立了一个贸易公司，1668年，他们在苏拉特建起了一个工厂，在其他地方也建起了一些工厂。几年之后，他们买下了本地治里城（Pondicherry），它成了东海岸最重要的商业港口城市。

1707年，奥朗则布在近90岁高龄离世。争夺他留下的这块瑰宝——印度的战斗打响了。参战的有他自己的那些无能的子孙，以及他的一些伟大的总督，有马拉地人和锡克教教徒，有西北边界以外的那些垂涎欲滴的人，还有来自大洋彼岸的英国人和法国人。那么可怜的印度人民呢！

---

1. 慕塔芝玛哈，本名阿姬蔓·芭奴·比古姆（Arjumand Banu Begum）。——译者注

91 ——锡克教教徒和马拉地人

在奥朗则布死后的100年里，印度成了一个奇怪的大杂烩，它如同一个不断变化的万花筒，但是看上去并不太美。对于冒险家和那些胆大妄为、不择手段地抓住机会的人而言，这样一个时期是再理想不过的了。所以，在印度涌现出了很多冒险家，这些冒险家里有来自本土的，有跨过西北边界而来的，还有像英国人和法国人那样跨越海洋前来的。而每一个人，或是每一帮人，都是为了一己的利益，欲将所有其他人置于死地；有时候两方或者多方联合起来，镇压第三方；后来他们之间又陷入内讧。有人疯狂地想要瓜分这些国家，一夜暴富。他们常常是毫不掩饰、毫无羞耻地掠夺，有时候则是披着薄薄的贸易的外衣进行掠夺。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正在消亡的莫卧儿帝国，它就像咧嘴而笑的柴郡猫一样消失了，到最后连笑容也没了踪影。而所谓的皇帝则成了一个不幸的退位之人，或者成了别人的阶下囚。

但是，所有这些骚乱激变，百转千回，都预示着一场革命已经悄然发生了。旧的经济秩序正在瓦解，封建制度已过了全盛时期，正在崩溃。它已经不适应国家的新形势了。我们已经看到了欧洲的这一进程，我们看见了商人阶级的兴起，但受到了极权君主的钳制。君主的权力只有在英国受到了抑制，在荷兰君主的权力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抑制。当奥朗则布登上皇位的时候，英国正值处决了查理一世之后的短命的共和国时期。而在奥朗则布执政时期，正是1688年詹姆斯一世逃亡、议会告捷、英国革命完胜之时。英国有一个类似议院的半世俗的委员会，它在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应该建立起某个组织来反对封建贵族，并进而反对国王。

大部分欧洲其他国家，情况各不相同。在法国，仍然有大君主路易十四，他漫长的执政期正好和奥朗则布处在同一时期，而且他在奥朗则布离世后又活了8年。极权统治在法国几乎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那时爆发了举世闻名、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德国的17世纪是个可怕的时代。在这个世纪里，德国发生了“三十年战争”，它分裂和毁灭了德国。

而18世纪印度的情况，从某种程度上说，与“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德国有些相似之处。但是，也不必过于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似。这两个国家经济衰退，旧的封建制度已不合时宜。在印度，尽管封建制度业已崩溃，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并没有消失。而即使当它实际上已经消失的时候，其外部的形式依然还留存着。事实上，即使在今天，在印度和欧洲的一些地方，还有封建制度的许多残余。

由于这些经济上的变化，莫卧儿帝国瓦解了。但是，并没有中产阶级来利用帝国的分裂，夺取权力。也没有像英国那样，有任何组织或委员会来代表这些阶级。

人民受到了太多的暴虐统治，他们大多变得顺从了，那些古老的自由思想，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也几乎被遗忘了。然而，在这封信里我们将要看到，有一些人试图夺取权力，他们有些来自封建阶级，有些来自资产阶级，还有些来自农民阶级。他们的一些努力已经接近成功了。然而，主要的问题是，似乎在封建制度的消亡和中产阶级的兴起之间有一个缺口，而中产阶级已经做好了夺权的充分准备。然而，每当有这样的缺口出现，就会发生骚动和混乱，就像德国的情况一样。在印度，情况也是如此。小国的国王和君主们为了争夺国家的权力而斗争，但是，他们是一个正在衰亡的社会秩序的代表，并没有稳固的基础。他们起来反对的是一个新兴的阶级：他们代表的是英国的资产阶级，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刚取得了胜利。英国的中产阶级代表的是比封建制度更加先进的社会秩序；它适合世界发展的新形势；

它有更合理、更高效的社会组织结构；它有更高级的工具和武器，于是能更有力地发起战争；而且它已经掌握了制海权。印度的封建君主是不可能与这个新兴力量抗衡的，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在它的面前倒下了。

这封信的前奏已经足够长了，我们现在必须再往回走一点。我在上封信和这封信里都提到了在奥朗则布执政的后期出现的民众造反，以及宗教上的印度民族主义复兴。现在，我们必须对这些情况多说几句。我们发现，很多半宗教性的群众运动在莫卧儿帝国的不同地区正在不断发展。有一段时间它们只是和平的运动，与政治没有多大关系。人们用自己国家的语言——印地语、马拉地语和旁遮普语——写的歌曲和赞美诗都流行起来。这些歌曲和赞美诗提高了人们的群体意识。在广受欢迎的布道者周围，形成了各种宗教派别。经济形势的压力逐渐把这些宗教派别变成了政治问题；它们和统治政权莫卧儿帝国之间发生了抵触，于是帝国便对这些教派进行了镇压，而镇压就使和平的宗教教派转变成为军事性的兄弟会组织。锡克教和其他一些教派便是这样形成的。而马拉地人的历史则更为复杂，但是，从他们身上我们也看到，宗教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了一起，人们拿起武器反抗莫卧儿帝国。莫卧儿帝国不是被英国人推翻的，而是被宗教民族主义运动，尤其是马拉地人推翻的。由于奥朗则布褊狭的政策，这些运动自然就愈演愈烈。也很有可能是因为正在兴起的反对奥朗则布统治的宗教意识，使他变得更加怨恨和褊狭。

早在1669年，在马图拉的贾特人（Jat）就爆发了农民起义。30年来，他们不断地被镇压，又不断地起义，直到奥朗则布去世。请记住，马图拉距离阿格拉很近，所以，这些暴乱就发生在首都的附近。另一次暴乱是一个印度教教派赛那米斯人（Satnamis）发起的，他们大多是普通百姓，所以，这次暴乱也是一次穷苦大众的起义，与贵族、总督以及诸如此类的暴乱有很大的区别。当时的一位莫卧儿帝国的贵族厌恶地将他们描述为“一群该死的穷鬼暴徒、金匠、木匠、制

革匠、清洁工和其他卑微的人”。在他看来，像这样“卑微的人”起来反抗他们的主子，一定是十分令人愤慨的事情。

现在我们来说说锡克教教徒。我们得从更早的时候来追溯他们的历史。你应该记得，我给你讲过那纳克古鲁。他来到印度后不久就在巴布尔去世了。他试图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找到一个共同的平台。在他之后，还有三位古鲁，他们和他一样，完全是爱好和平的，只对宗教问题感兴趣。阿克巴把位于阿姆利则（Amritsar）的水池和金庙这片地皮都赐给了第四任古鲁。从那时起，阿姆利则就成了锡克教的大本营。

接着就是第五代古鲁，阿尔琼·辛格（Arjun Singh）。他编制了谚语和赞美诗集《本初经》（*Adi Granth*），是锡克教的圣书。由于阿尔琼·辛格在政治上冒犯了贾汗季，所以被他折磨致死。这成了锡克教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他们的古鲁竟然遭到如此不公正的残忍虐待，锡克教的信徒们怒不可遏，从此他们转向了使用武力。在第六任古鲁哈尔戈文德（Hargovind）的领导下，他们组建了一支武装的兄弟会。从那时起，他们就经常与统治集团发生摩擦。哈尔戈文德古鲁本人就被贾汗季监禁了10年。第九位古鲁是巴哈都尔(Bahadur)，生活在奥朗则布执政时期。奥朗则布命令他信奉伊斯兰教，在遭到拒绝后，奥朗则布直接将其处死了。第十任，也是最后一任古鲁是戈文德·辛格。他把锡克教变成了一个军事社团，其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德里的皇帝。他在奥朗则布去世一年之后也辞世了。从此就再没有古鲁了。据说现在古鲁的权力归属于整个锡克教社团哈尔萨（Khalsa），或被称为“上帝所选”。

在奥朗则布死后不久，发生了一次锡克教教徒的起义。虽然它遭到了镇压，但是，锡克教的力量不断壮大，并且在旁遮普联合成了一个整体。后来，在18世纪末，在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的领导下，一个锡克族的王国出现在了旁遮普。

尽管这些起义是十分麻烦的事，但是，对于莫卧儿帝国而言，真正的危险来自西南部正在兴起并日益强大的马拉地人。甚至在沙阿贾汗执政时期，一位马拉地人的酋长沙吉·蓬斯尔（Shahji Bhonsla）就给帝国带来了不少麻烦。他是艾哈迈德讷格尔王国的一名军官，后来又去了比贾布尔。但是，成为马拉地人的光荣、莫卧儿帝国的噩梦的人，则是他的儿子、生于1627年的西瓦吉（Shivaji）。当他还是个19岁孩子的时候，就开始了征战生涯。他在浦那附近夺取了他的第一个要塞。他是位勇敢的首领、完美的游击队长和冒险家。他建起了一支由勇敢而坚定的山地人组成的队伍，他们都对他忠心耿耿。在他们的帮助下，他夺取了许多要塞，让奥朗则布的指挥官们日子很不好过。1665年，他突然出现在苏拉特，并洗劫了这个城市。而英国人在那里建有工厂。经人引荐，他在阿格拉的宫廷觐见了奥朗则布，但是，他因为没有受到独立君主般的待遇而备感屈辱。他被监禁在那里，但他设法逃走了。甚至在那时，奥朗则布还试图通过授予他王公的头衔，把他争取过来。

但是，不久西瓦吉又开始了征战。南方的莫卧儿帝国军官十分惧怕他，所以，他们付钱给他，以换来他的保护。这就是著名的四分之一收益，或者说是第四项税收，这是马拉地人所到之处都要索取的一项收入。这样，马拉地人的力量继续壮大，而德里帝国却在不断衰弱。1674年，西瓦吉在赖格尔城（Raigarh）为自己举行了盛大的加冕仪式。他不断取得胜利，直到1680年去世为止。

浦那是马拉地王国的中心。你已经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了，那你一定知道，西瓦吉在那里是多么受人民的爱戴和崇敬。他代表了一种宗教的民族复兴，关于这种宗教的民族复兴，我前面已经给你讲过了。经济的衰退和人民生活的普遍贫困，为这种复兴准备好了土壤，而两位马拉地的诗人，拉姆达斯（Ramdas）和图克拉姆（Tukaram），用他们的诗歌和颂歌滋养了这片土壤。于是，马拉地的人民便有了民

族和统一的意识，而正在此时，又来了一位带领他们走向胜利的卓越领袖。

西瓦吉的儿子，萨姆哈吉（Sambhaji）被莫卧儿帝国残酷折磨后又遭到了杀害。但是，马拉地人经历了一些挫折之后，仍然继续在壮大力量。奥朗则布死后，他伟大的帝国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各路总督脱离了总部，各自为政。孟加拉地区以及奥德和罗希尔坎德（Rohilkhand）都背弃了帝国。在南方，阿萨夫·贾希（Asaf Jah）家族建立了一个王国，史称海得拉巴王国。现在的尼查姆（Nizam）就是阿萨夫·贾希的后代。在奥朗则布逝世17年后，帝国就几乎完全消失了。但是，虽然没有了帝国，在德里或阿格拉，还是有名义上的皇帝按排序在继承王位。

随着帝国的衰弱，马拉地人变得更加强大了。他们的首相叫统领者，他才是真正掌握权力的人，超越了首领。统领者的职位成了世袭制，就如同日本的幕府将军，而首领已经沦为傀儡。德里的皇帝因为软弱无能，只好同意马拉地人在整个德干地区收取他们的第四项税收。统领者并不满足于此，他又征服了古吉拉特邦和马尔瓦邦，以及印度中部地区。他的军队于1737年出现在了德里的大门口。马拉地人似乎注定要统治整个印度。他们控制了这片土地。但在1739年，突然从西北方冒出的一股外来入侵者，打破了力量的平衡，改变了印度北部的局势。

92 ——英国人在印度战胜了对手

我们已经看到，德里帝国的境况十分糟糕。确实，人们几乎可以说，作为一个帝国，它已经名存实亡了。然而，德里和印度的北方还会陷入更深的泥潭。我告诉过你，那时的印度是冒险家的黄金地带。一位君主率领他的冒险家们，从西北方突然袭来，在大肆屠杀和洗劫之后，带着大量财宝扬长而去。这就是自封为波斯帝王的纳迪尔沙阿（Nadir Shah）。他还带走了沙阿贾汗制成的著名的孔雀宝座。这次可怕的入侵发生在1739年，印度北部选择了俯首称臣。纳迪尔沙阿把他的领地扩张到了印度河流域。于是，阿富汗便从印度分割出去了。从摩诃婆罗多和犍陀罗的那个时代起，贯穿整个印度的历史，阿富汗都是与印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现在，它被分割出去了。

然而，德里在17年后又遭遇了另一个入侵者和掠夺者，他就是在阿富汗继承了纳迪尔沙阿王位的艾哈迈德·沙阿·杜兰尼（Ahmad Shah Durrani）。然而，尽管经历了这些入侵，马拉地人的力量还在继续增强；1758年，旁遮普邦已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但是他们并没有试图在他们控制的领土上建立政府，他们只是收取了他们著名的第四项税收，而把统治权交给了当地人。他们实际上继承了德里帝国。但是，一股强大力量的到来制约了他们。杜兰尼又从西北方来了，他们联合了其他的力量，于1761年在帕尼帕特这个古老的战场上彻底击败了马拉地人的一支大部队。杜兰尼便成了印度北方的主人，没有力量能够制约他了。可是，在他大获全胜的时候，他遭到了自己人民的反叛和暴乱，于是他又返回了自己的家园。

有一段时间，马拉地人似乎已经失去了他们的领地，变得无足轻重了。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战利品。但是，他们渐渐地恢复了活

力，再次成为印度境内最令人生畏的力量。然而，同时另外一些更强大的力量也参与了进来，我们在后面将看到这些力量。印度几代人的命运将由他们来决定。就在此时出现了几位马拉地人的长官，他们被认为是统领者的侍从。他们中间最杰出的是瓜廖尔的辛迪亚（Scindia），还有巴罗达（Baroda）的盖克沃尔（Gaekwar）和印多尔（Indore）的哈卡尔（Holkar）。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我以上提到过的其他事件。这一时期印度南部最为重要的事实，就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斗争。通常情况下，在18世纪，只要英国和法国在欧洲发生战争，他们在印度的代表就会相互开战。可有的时候，即使这两个国家处于正式的和平时期，双方的代表也会在印度打仗。双方都有大胆而肆无忌惮的冒险家，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得到财富和权力，那么他们之间自然会有激烈的竞争。在法国一方，那个时期最杰出的人是迪普莱（Dupleix），在英国一方则是克莱武（Clive）。迪普莱开始玩起了利润丰厚的游戏，他参与当地两个王国之间的争端，出雇自己训练有素的部队，之后再霸占领地。法国的影响不断扩大；英国人也效仿法国人的手段，而且很快就盖过了法国人的势头。英法两方都像饥饿的秃鹫一样，寻衅滋事，制造事端。只要在南方发生继承权的争斗，你可能就会发现，英国人支持争夺继承权的其中一方，而法国人则支持另一方。经历了长达15年（1746——1761年）的争斗之后，英国人最终战胜了法国人。在印度的英国冒险家们得到了他们国内的全力支持，而迪普莱和他的同僚们则没有从法国得到这样的支持。这也并不奇怪。在印度的英国人背后是拥有东印度公司股份的英国商人和其他人，他们能够影响议院和政府；而法国人的身后是国王路易十五（他是大君主路易十四的曾孙和继任者），他终日寻欢作乐，不知大难将至。英国控制了制海权，这也对在印度的英国人有很大的帮助。法国人和英国人都训练印度的军队——他们被称为“印度兵”，这个词来自“西帕希”（sipahi）注——他们比当地的军队装备更加精良，纪律更加严明，所以各方对他们的需求都非常大。

在印度，英国人打败了法国人，并彻底地摧毁了法属城市金德讷格尔（Chandarnagore）和本地治里城。据说这两个地方被摧毁得连瓦片都没有剩下。从此时之后，法国人便从印度这个舞台上淡出了，尽管后来他们又回到金德讷格尔和本地治里城；直到今天，法国人还一直控制着这两座城市，但是他们在印度已经不再是重要角色了。

这一阶段印度并非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唯一战场。除了欧洲之外，他们还在加拿大以及其他地方互相战斗着。英国人在加拿大也胜出了。然而，不久英国人失去了在美洲的殖民地，法国人为了向英国人复仇，便帮助了这些殖民地。不过，关于这些我们在以后的信里还有很多要说的。

赶走了法国人之后，英国人还有什么阻挡他们的障碍呢？当然，在印度的西部和中部，甚至在北部的一些地方，有马拉地人，还有在海得拉巴的尼查姆，但他已经不太重要了。在南方，还有一个新的强劲对手，海德尔·阿里（Haider Ali）。他在古老的维贾亚纳加尔帝国（现在的迈索尔王国）的废墟上自立为王。在北方，孟加拉地区处在无能的西拉杰·乌德·达乌拉（Siraj-ud-Daula）的统治之下。而德里帝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然而，奇怪的是，英国人继续谦卑地给德里帝国送礼作为归顺的象征，一直到1756年——也就是在纳迪尔沙阿洗劫了德里之后又过了很久，而这次洗劫甚至把中央政府的影子都一扫而光了。你要记住，在孟加拉地区的英国人，在奥朗则布执政时期曾经冒险向他的帝国发起过进攻，但是损失惨重，而那次惨败让他们清醒了，所以他们迟疑了很久才敢再次进攻，尽管就当时北方的情况来看，对任何有坚定决心的人来说，这块土地都唾手可得。

英国人克莱武作为一位伟大帝国的缔造者，受到他的同胞们的无限敬仰。他就是这样一位决心坚定的人。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帝国是如何缔造的。他勇敢，富于冒险精神，而且异常贪婪；他决心坚

定，为了达到目的，哪怕采取伪造和欺骗的手段也在所不惜。孟加拉地区的印度行政长官西拉杰·乌德·达乌拉，被英国人的许多所作所为激怒了，于是从他的首都穆希达巴德（Murshidabad）举兵前来，占领了加尔各答。据说，所谓的“黑洞”悲剧就发生在那个时候。事情是这样的：印度行政长官的军官们把很多英国人锁在一个又小又闷的房间里一整夜，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被窒息而死。毫无疑问，这样的行为十分野蛮而恐怖，但是，整个事件是以一个人的叙述为依据的，而人们普遍认为此人不太靠谱。所以，许多人认为，这个故事大部分都是虚构的，无论如何也是被过分夸大了。

对印度行政长官成功占领加尔各答的行为，克莱武采取了报复行动。但是，这位帝国的缔造者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实施报复的，他收买了这位长官的大臣米尔·贾法尔（Mir Jafar），使他成了叛徒，他还伪造了文件。这个故事太长了，在此就不细说了。通过伪造文件和利用叛徒，克莱武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1757年，克莱武在普拉西（Plassey）击败了印度行政长官。这是一次小规模的战斗，而实际上克莱武甚至在战斗开始之前，就凭借他的阴谋取得了胜利。但是普拉西之战产生了非常重大的结果，它决定了孟加拉地区的命运，人们常说，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是从普拉西开始的。英国在印度的帝国就是建立在这些令人厌恶的背叛和伪造的基础之上的。不过，所有的帝国和帝国的缔造者都大致如此。

命运转盘突然转向了孟加拉地区的、喜爱冒险又十分贪婪的英国人的头上。他们是孟加拉地区的主人，没有人能限制他们。所以，在克莱武的领导下，他们将这里的公共宝藏洗劫一空。克莱武为自己挣得了大约250万卢比的现金，而且他并不满足，还掠夺了一块价值连城的地产，每年给他带来几千万卢比的收益！所有其他的英国人也以同样的方式“酬报”自己。他们无耻地攫取财富，东印度公司官员们的贪婪和肆无忌惮已经超越了所有的界限。英国人变成了孟加拉地区印度长官的制造者，他们可以随意更换印度的行政长官。而每一次更换

印度长官，都伴随着贿赂和厚礼。英国人对当地的政府不负任何责任——改变行政长官的工作是穷人的事，而他们的工作就是要一夜暴富。

几年之后的1764年，英国人又在布克萨尔（Buxar）赢得了一场战斗，结果使得德里名义上的皇帝向他们投降了。德里的皇帝成了英国人的阶下囚。英国人在孟加拉地区和比哈尔邦的权力已不可撼动。他们不满足于只从印度大肆掠夺，他们还要找到赚钱的新办法。他们本来是不做国内贸易的，而现在他们却坚持在不付转口税的情况下做国内贸易，而所有其他做本国制造产品生意的商人都必须付转口税。这是英国人对印度制造商和贸易造成的最初的重创之一。

在印度北部，英国人的地位很特殊：拥有权力和财富，却不承担任何责任。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冒险家们从不费神去区分诚信贸易和不公平贸易，他们只管明目张胆地掠夺。那时，英国人携带着从印度赚来的巨额财富回到英国，他们被称为“在印度发财归国的大富豪”。如果你读过萨克雷（Tackeray）的《名利场》（*Vanity Fair*），你就会记得，在书中就有这样一位傲慢自大的家伙。

由于政治上的不安定和动乱，以及干旱、英国人的掠夺政策，孟加拉地区和比哈尔邦在1770年发生了极其严重的饥荒。据说，饥荒夺走了这些地区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想想这可怕的数字吧！好几百万人慢慢地饿死，整个地区人口锐减，森林大肆扩展，吞没了耕地和村庄。没有人帮助濒临饿死的人们。印度的地方行政长官没有力量，没有职权，也没有意愿去采取行动。东印度公司有力量，也有职权，但是他们觉得没有责任，也没有意愿去帮助那些人。他们的工作是聚集财富和收取税款，而且他们非常善于此道，心满意足地填满自己的钱袋子。说来也神奇，尽管三分之一的人口在大饥荒年代消失了，他们却从幸存者那里收到了全额的税款！事实上，他们甚至收到了更多税款，而且，如官方报道的那样，他们是用“暴力强征的手段”收到

的！这样强行地、暴力地从饥饿悲惨的大饥荒幸存者那里收税，如此丧失人性的行为，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尽管英国人在孟加拉地区取得了胜利，还战胜了法国人，但是，他们在南方遇到了很多困难。在他们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也经历了失败和羞辱。迈索尔的海德尔·阿里就是他们势不两立的对手。他是位干练而又凶猛的领袖，一次又一次打败了英国人的军队。1769年，他在马德拉斯城墙下公布了对他自己有利的和平条件。10年之后，他再次取得了重大胜利。而他死后，他的儿子提普苏丹（Tippu Sultan）就成了英国人的眼中钉。在迈索尔又发生了两次战争，而且又过了许多年，英国人才终于打败了提普。迈索尔现任王公的一位祖先，在当时英国人的保护之下，被正式任命为那里的统治者。

在南方，马拉地人于1782年也打败了英国人。在北方，瓜廖尔的辛迪亚支配和控制着可怜又不幸的德里的皇帝。

同时，英国将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派往印度担任第一任总督。英国议会现在对印度开始感兴趣了。黑斯廷斯被认为是在印度最伟大的英国统治者，但是，即使在他执政时期，政府也以其腐败和滥用职权而著称于世。黑斯廷斯勒索巨额钱财的一些事件也已臭名昭著。他回到英国后，因其在印度任职期间的恶劣行为而受到了议会的指控。但经历了漫长的庭审后，他被宣告无罪。在此之前，克莱武也受到了议会的公开谴责，而他竟然自杀了。所以，英国通过公开谴责或审判这些人，也就使自己良心上好过一些罢了。然而从它的内心来说，它是崇拜他们的，而且十分乐意凭借他们的政策来获得好处。克莱武和黑斯廷斯也许受到了公开谴责，但是，他们是典型的帝国缔造者，只要英国想要把帝国强加给它的臣民，并剥削这些臣民，那么，克莱武和黑斯廷斯之流必定冲锋在前，必定受到赞赏。剥削的手段也许各个时代有所不同，但是精神实质是相同的。克莱武也许受到了英国议会的公开谴责，但是，他们在伦敦白厅的印度办公室前为

他建起了一尊塑像；而在办公室里，他的精神还在，并在帮助英国制定在印度的政策。

黑斯廷斯开始实施了扶植在英国人控制之下的印度傀儡君主的政策。所以，我们要感谢黑斯廷斯，因为他，现在才会有一群群富有而又脑袋空空的王公和长官们，趾高气扬地走在印度的土地上，让人十分讨厌。

大英帝国在印度发展的过程中，英国人与马拉地人、阿富汗人、锡克教教徒和缅甸人等，都发生了很多的战争。但是关于这些战争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尽管这些战争都是为了让英国人受益，但是印度得为此买单。没有任何负担落在英国或者英国人的身上。他们得到的只有好处。

请记住，东印度公司这个贸易公司在统治着印度。英国议会对印度的控制不断加强，但是，基本上来说，印度的命运是掌握在一帮商人冒险家的手中的。政府职能主要就是贸易，而贸易主要就是掠夺。两者的界限十分细微。东印度公司每年向股东支付100%、150%甚至超过200%的巨额红利。除此之外，它的代理人也赚取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就像我们在克莱武的事件中所看到的那样。公司的官员们也可以取得贸易垄断权，这样他们就能够快速地积累巨额财富了。这就是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控制情况。

---

1. 西帕希，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事封建地主骑兵，也就是依赖地产维护而不支付薪酬的部队。——译者注

93 ——中国伟大的满族统治者

我简直要完全崩溃了，不知如何是好。可怕的消息传来，圣雄甘地已经决心要绝食至死了。在我小小的世界里，他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现在，我的世界被震得摇摇欲坠，似乎到处都是黑暗和空虚。他的形象一次次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一年多以前，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样子，他站在轮船的甲板上，轮船将带着他离开印度，前往西方。我还能再见到他吗？当我感到疑惑，希望有人给我明智的忠告的时候，或是我感到苦恼和忧伤，需要爱的抚慰的时候，我该去找谁呢？他是激励和领导我们的领袖，是我们挚爱的人，当他离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该怎么办呢？哦，印度是一个可怕的国家，竟然让它的伟人们就这样死去了；印度的人民是奴隶，他们有着奴隶的心态，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不休，而忘记了自由本身。

我一直没有情绪写作，我甚至考虑过不再写这些信了，但这样做是很愚蠢的。在我的这间小牢房里，除了阅读、写作和思考，我还能做什么呢？而当我意志消沉、心烦意乱的时候，有什么比思念你、给你写信更让我感到安慰的呢？伤心和眼泪是这个世界上不幸的伴侣。活佛说：“人们流的泪比海洋里的水还要多。”而在这个不幸的世界改邪归正之前，人们还要流很多的眼泪呢。我们的任务还摆在面前，这项伟大的工作在召唤着我们，对于我们还有那些追随我们的人，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前，是没有时间停歇的。因此，我决定继续我的日常工作，我还会像以往那样给你写信。

我最近的几封信都是关于印度的，而我讲的故事的后半部分是没有多少启迪作用的。印度一蹶不振地躺倒在地，成了每个强盗和冒险

家的猎物。但是，它东方的大姐姐——中国，可比它要强得多，现在，我们必须去中国看看了。

你应该记得，我告诉过你（在第80封信里）有关明朝的强盛时期，以及腐败和混乱是如何出现的，还有中国北方的邻居满族人，来到中国并征服了它。从1650年开始，满族人就在整个中国牢牢地立足了。在满族统治之下，中国变得强大起来，甚至很有侵略性。满族人为中国增添了新的活力。他们尽可能少地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而是把过剩的精力用于向北、向西和向南扩张他们的帝国了。

一个新的王朝一开始往往会产生一些精明强干的统治者，然后统治者会变得越来越无能。满族也出现了一些能力超群、十分能干的统治者和政治家。满族的第二位皇帝是康熙。他才8岁就登基做了皇帝。他作为大清帝国的君主，执政61年，使中国成了世界上版图最大、人口最多的帝国。但是，他所获得的历史地位并非是因为这些，也不是因为他杰出的军事才能。人们记住他，是因为他的政治家的才能和非凡的文学活动。他从1661年至1722年当皇帝——也就是说，有45年他是和法国的“大君主”路易十四同时执政的。他们两人在位的时间都特别长，而路易十四在这场竞赛中胜出，创下了执政72年的纪录。把他们二人做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比较的结果都对路易十四不利。他毁掉了他的国家，因为欠下巨额债务而耗尽了国家的资源，使法国不堪重负。他对宗教也不宽容。而康熙，他虽然是位严肃的儒学家，但是他对别的信仰十分宽容。在他执政期间，事实上在前四位满族皇帝执政期间，明朝的文化都没有受到干扰，明朝文化保持了它的高水准，而且在有些方面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工业、艺术、文学和教育与明朝时一样繁荣兴旺。精美的瓷器继续在生产，还发明了彩色印刷，并从耶稣会会士那里学会了铜版印刷技术。

满族统治者治国和成功的秘诀在于，他们完全认同中国文化，在吸收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同时，并没有丧失不太文明的满族人所具备的

力量和活力。所以，康熙是非同寻常的，他是奇怪的混合体——他勤奋学习哲学和文学，专注于他的文学活动；同时，他又是个能干的军事天才，热衷于征服世界。他在文学和艺术上，不只是半吊子或浅薄的爱好者。在他的文学活动中，以下三项工作是在他的提议下，而且往往是在他亲自监督之下进行的，它们将让你了解康熙在兴趣和学识方面的深度。

你得知道，中文采用的是汉字，而不是单词。康熙让人编纂了一部中文词典，或叫字典。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共收录汉字4000多个，还有很多的词组来解释这些汉字。据说，即使在今天，它也是无可比拟的。注

另一项工作，我们也得归功于康熙的热情，那就是一套有图例说明的百科全书巨著，这是一部非凡的作品，共计几百册之多，它本身就是一座完整的图书馆；它包罗万象，所有的学科都收录了。它原来是刻在可移动的铜板上的；康熙死后，这套百科全书才被刊印成册。注我在这里要提到的第三项工作，是一部整个中国文学的主要语词索引——也就是一种字典，里面收集了各种词语和段落，并对它们做了对比。这也是一部非凡的巨著，它包含了对文学的全面而细致的研究，里面引用了大量诗人、历史学家和散文作者的语录。注

康熙从事了很多文学活动，但是仅凭这三项，他就足以让后世永远铭记了。除了《牛津英语词典》之外，我想不出还有其他类似的当代作品可以与之相媲美了。而《牛津英语词典》是由大批学者，耗费50多年的心血，于几年前才刚刚完成的。

康熙对基督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都是比较赞许的。他还鼓励对外贸易，并为此开放了中国所有的港口。但是，不久他就发现欧洲人行为不端，所以必须对他们进行监管。他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传教士与其国内政府的帝国主义者一起搞阴谋诡计，帮助他们进行征服活动。康

熙因此放弃了对基督教的宽容政策。他的怀疑后来被一位在广州的军官发来的报告所证实。该报告指出，在菲律宾和日本，欧洲政府和他们的商人及传教士的关系极为密切。于是这位军官建议，为了保卫帝国不受侵略，免遭外国的阴谋破坏，应该限制对外贸易，并阻止基督教的传播。

这份报告是在1717年递交的，它充分阐明了外国人在东方国家的阴谋活动及其动机，所以才促使一些东方国家限制对外贸易和基督教的传播。你也许记得，在日本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迫使日本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经常有人说，中国人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人落后又愚昧，他们憎恨外国人，所以才会对贸易设置障碍。而事实上，我们通过回顾历史，已经清楚地看到，从很早的时候起，印度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之间就有很多的交往。不存在憎恨外国人和对外贸易的问题。事实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印度曾控制了许多外国市场。只是当人们意识到，对外贸易成了西欧强国帝国主义扩张手段的时候，外国人才在东方受到怀疑。

这位广州军官的报告受到中国军机处的重视和认可。于是康熙皇帝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颁布了政令，严格限制对外贸易和传教士的活动。

我现在要放下中国一会儿，给你讲一下亚洲的北方西伯利亚，给你讲讲那里发生的事情。西伯利亚广阔的疆域把远东的中国和西方的俄国连在了一起。我已经说过，中国的大清帝国是很有侵略性的。大清帝国当然包括了满洲，它还扩张到了蒙古和蒙古以外的地方。俄国在赶走了蒙古和金帐汗国之后，也成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并越过了西伯利亚平原向东方扩张。现在这两个帝国在西伯利亚相遇了。

亚洲的蒙古国迅速衰弱和败落是历史上很奇怪的事件之一。这些人曾雷霆万钧，横扫亚洲和欧洲，在成吉思汗和他后代的率领下，占

领了大片领土。但他们渐渐被人遗忘。在帖木儿统治时期，他们一度又一次崛起，但是帝国随着帖木儿的离世，又衰亡了。帖木儿之后，他的一些后代，被称为帖木儿汗国人，统治了中亚。我们知道，有一名著名的绘画学派在他们的宫廷十分繁盛。来到印度的巴布尔，也是帖木儿汗国人。然而，尽管有这些帖木儿汗国的统治者，但是，在整个亚洲，从俄罗斯到他们的家乡蒙古，蒙古民族都衰败了，失去了它的重要地位。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人知道。有人认为，气候的变化与此有些关系；其他人则不这么看。不管怎样，昔日的征服者和侵略者，现在却受到来自各方的入侵。

蒙古帝国分崩离析之后，穿越亚洲的陆路通道关闭了近200年。然而，到了16世纪下半叶，俄国人派了一个特使从陆路来到中国。他们想与明朝的皇帝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没有成功。不久之后，一个名叫叶玛克（Yermak）的俄罗斯强盗，带领一队哥萨克人（Cossacks），穿过乌拉尔山脉（Ural Mountains），征服了西伯利亚小国，西伯利亚就是由这个国家得名的。

这是发生在1581年的事，从那时起，俄国人不断地向东进发，直到大约50年后，他们抵达了太平洋。不久，他们就在阿穆尔河流域（Amur Valley）与中国人发生了冲突，双方爆发了战争，结果俄国人被打败了。1689年，两国签署了《尼布楚条约》（*Treaty of Nerchinsk*）。该条约划定了两国的边界，对两国的贸易也做了安排。这是中国与欧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条约。该条约抑制了俄罗斯进一步向东扩张，但是发展了大规模的篷车贸易。那时俄国的沙皇是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他急切地想和中国建立密切的关系，他派了两名特使去见康熙，并留下了一名特使，常驻在中国宫廷里。

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就有接受外国使节的习惯。我想我在一封信里提过，罗马皇帝马库斯・奥勒留・安东尼在公元2世纪也派过特使前往中国。有意思的是，1656年，荷兰和俄罗斯的特使到了中国宫

廷，在那里发现了来自伟大的莫卧儿帝国的使节，他们一定是受沙阿贾汗的派遣前往中国的。

---

1. 这里说的应该是《康熙字典》。——译者注
2. 这里说的应该是《古今图书集成》。——译者注
3. 这里说的应该是《佩文韵府》。——译者注

94 ——中国皇帝给英国国王的信

满族的皇帝们似乎都特别长寿。康熙的孙子乾隆是第四任皇帝，他执政长达60年，从1736年一直到1796年。他在其他方面也很像他的祖父，文学活动和扩张帝国疆域是他的两大爱好。他让人对所有值得保存的文学作品都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将调研的材料收集起来，编成了很细致的目录。“目录”这个词几乎不足以来描述它，因为关于每一部作品的所有已知的细节都被记录了下来，还加上了评论。这一规模浩大、对帝国图书馆的描述性的目录，分为四个部分：经典作品（也就是孔子学说）、历史、哲学和普通的文学作品。据说，在任何地方，还没有可以望其项背的文献。㊟

大约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小说、短篇故事和戏剧的发展，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有趣的是，在那时的英国，小说也正在发展。中国的瓷器和其他精美的艺术品在欧洲需求量很大，所以两国之间不断进行着瓷器和艺术品的贸易。茶叶贸易的开始则更加有趣。茶叶贸易是在第一位清朝皇帝执政期间开始的，茶叶到达英国的时候可能是在查理二世执政时期。1660年，一位著名的英语日记作者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有一篇关于第一次喝“茶”（一种中国饮料）的日记。茶叶贸易发展飞快，200年之后的1860年，中国福州这个港口一个季度出口的茶叶就达到100万磅。后来，茶树在其他地方也开始种植，而现在，你也知道，在印度和锡兰也大量种植茶树了。

乾隆皇帝征服了中亚的突厥斯坦，还占领了中国西藏，使他的帝国疆域更加辽阔了。几年之后的1790年，尼泊尔的廓尔喀人（Gurkhas）入侵西藏。于是，乾隆不仅把廓尔喀人从西藏赶了出去，还越过喜马拉雅山追击他们，进入尼泊尔，迫使尼泊尔成了大清帝国

的臣属国。征服尼泊尔是一个非凡的成就。一支中国军队穿越西藏，翻过喜马拉雅山，打败了廓尔喀人这样骁勇善战的民族，而且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真是令人惊叹。碰巧，仅20年后的1814年，在印度的英国人也和尼泊尔发生了冲突，他们便派出一支军队前往尼泊尔，但是，他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尽管他们还不需要翻越喜马拉雅山。

1796年，也就是在乾隆执政的末期，在他直接统治下的帝国包括满洲、蒙古、西藏和突厥斯坦。承认他的宗主权地位的臣属国有：朝鲜、安南、暹罗和缅甸。但是，征服和寻求军事上的荣耀是代价昂贵的游戏，结果导致了巨额军费开支，于是税收负担加重了。而这些负担总是大多落在最贫困的人身上。经济形势也在变化，从而加重了人民的不满情绪。中国各地形成了许多秘密社团。中国就像意大利一样，常常有秘密社团出现。有些秘密社团的名字很有意思："白莲教"、"天理教"、"白羽毛会"、"天地会"等。

同时，尽管有很多的限制，但是对外贸易还在发展。外国的商人们对这些限制十分不满。东印度公司已经发展到了广州，因为它所占的贸易份额最大，所以对于贸易限制也最为不满。那时正是所谓的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而英国是工业革命的领头羊，这些我将会在后面的信中谈到。蒸汽机已经制造出来了，新方法和机器的使用，使工作变得轻松起来，产量也提高了，尤其是棉织品的产量。这些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也必须卖出去，所以要寻找新的市场。英国很幸运地在这个时候控制了印度，这样它便可以采取步骤，在那里强行出售它的产品了，事实上它也做到了。但是，它还想在中国做贸易。

所以，在1792年，英国政府派了一个由马嘎尔尼（Macartney）公爵率领的使团到了北京。乔治三世是当时的英国国王。乾隆接见了他们，并且和他们互换了礼物。但是，乾隆皇帝拒绝在对外贸易的限制上做任何改变。乾隆给乔治三世的信十分有趣，我从信中摘录了很长一段让你看看。以下就是乾隆信的引文：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悉知，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义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并不需尔国制办物件。尔国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

悉朕眷怀，特此敕谕！

乔治三世和他的大臣们读这封回信的时候，一定会有些震惊！但是，回信显示出的对高等文明和强国权威的淡定和自信，实际上是缺乏持久基础的。清政府看似强大，而且在乾隆年间的确很强大。但是，它的基础由于经济秩序的改变已经断裂了。我所提到的那些秘密社团的出现，就是民众不满的表示。但真正的麻烦是，国家制度已经不适合新的经济形势了。同时，西方是这种新秩序的领头羊，它飞速地向前发展，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在乾隆皇帝带给英国的乔治三世这封十分傲慢的回信之后不到70年，中国就受到了英国和法国的羞辱，它的傲慢也就被抛入了尘土之中。

然而，我必须把这个故事留到下一封关于中国的信里再说。乾隆皇帝于1796年去世，我们实际上也就来到了18世纪末。但是，在这个世纪结束之前，在美洲和欧洲发生了许多不同凡响的事情。的确，由于在欧洲发生的战争和动乱，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西方对中国的压力有所减轻。所以，在我们的下封信里，我们要去欧洲，继续从18世纪初讲述那里的故事，让它赶上印度和中国的节奏。

但是，在结束这封信之前，我要给你讲讲俄罗斯在东方的发展情况。在1689年俄罗斯和中国签署了《尼布楚条约》之后，在一个半世纪里，俄罗斯在东方的影响日益增大。1728年，受雇于俄罗斯的丹麦船长维他斯·白令（Vitus Bering），在亚洲和美洲之间的海峡从事探险活动。这个海峡，也许你知道，至今仍叫作白令海峡，就是以他

的名字命名的。白令穿过海峡，到了阿拉斯加，并宣布它为俄罗斯的领土。阿拉斯加是出产毛皮的绝好地方，由于中国对毛皮有很大的需求，所以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发展起了特殊的毛皮贸易。事实上，到了18世纪末，由于中国对毛皮等的需求太大了，所以俄罗斯人经过英国，从加拿大的哈得孙湾（Hudson Bay）进口毛皮，然后再将它们送到西伯利亚贝加尔湖（Lake Baikal）附近的恰克图（Kiakhta），那里有个很大的毛皮市场。毛皮经历了一个多么漫长的旅途啊！

这封信有点儿不同，比这一系列写给你的大部分信都要短些。希望你喜欢这个变化。

---

1. 这里说的应该是《四库全书》。——译者注

95 ——欧洲18世纪的思想之战

我们现在将回到欧洲，追寻它不断变幻的命运。这是在巨大变革的前夕，这些巨大变革是欧洲在世界历史上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要理解这些变革，我们就要透过事物的外表，进行深入的探究，发现人们内心的所思所想。因为在我们看来，行动是思想和激情、偏见和迷信、希望和恐惧等各种情结综合产生的结果；行动本身是很难理解的，除非我们分析导致行动的原因。但这绝非易事，而且，即使我能够把形成历史上重要事件的原因和动机很贴切地写出来，我也不想把这些信写得无比乏味和沉重。有时候我担心，由于我对一个话题或者某个观点的热情，我会过深地谈及这些话题或观点，恐怕你就得忍受这些了。所以，我们不能深究这些原因。但是，如果忽略了这些原因又将是十分愚蠢的；事实上，如果我们忽略这些原因，那就会错过历史上最令人着迷、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已经仔细了解了16世纪和17世纪上半叶欧洲的骚动和混乱。在17世纪中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的签署，结束了可怕的“三十年战争”；一年之后，英国内战结束，查理一世被斩首。接下来是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欧洲大陆的财富已经被彻底耗尽了。与美洲和其他地方的贸易给欧洲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从而缓解了各个阶级之间的紧张状况。

英国爆发了光荣革命，赶走了詹姆斯二世，把胜利成果交给了议会（1688年）。而在英国内战中，议会在与查理一世真正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光荣革命只是进一步肯定了40年前武力所做的决定而已。

在英国，国王的地位降低了，但是，在欧洲大陆，除了瑞士和荷兰几个小地方之外，情况并没有好转。在欧洲大陆，不负责任却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仍然比比皆是。法国的“大君主”路易十四是别人争相效仿的完美典范。欧洲大陆的17世纪，实际上是路易十四的世纪。欧洲的国王们无视等待他们的厄运，甚至不从英国查理一世的命运中吸取教训，仍在继续他们的独裁统治，而且浮华炫耀，愚蠢至极。他们声称拥有领地上的一切权力和财富，国家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他们的私人财产。400多年前，著名的荷兰学者伊拉斯谟（Erasmus）曾写道：

> 在智者看来，所有的鸟类中，只有老鹰和王公贵族极其相似——长相难看，没有乐感，不能食用，却是贪婪的食肉动物，令所有人憎恨，是所有人的祸害，害人的本领很强，而害人的欲望更强。

今天，国王几乎都消失了，而剩下的国王只是过去年代的遗俗罢了，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了。我们现在可以忽略他们。但是，其他的更危险的人已经占据了他们的位置，而对于这些当今的帝国主义者，以及钢铁、石油、白银和黄金的大亨们来说，老鹰仍然是个很合适的比喻。

欧洲的君主国家发展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地主和奴隶，这种古老的封建思想已经消亡，或者正在消亡。以国家为单位和实体的新思想取代了旧思想。法国在两位十分精明强干的大臣黎塞留和马萨林的领导之下，已经成了新思想的先锋。所以，民族主义得到了发展，它也是衡量爱国主义的标准。而宗教原本一直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现在已经退居幕后，让位于新思想了，在这封信的后面，我会跟你谈到这些。

17世纪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当代科学已经打下了基础，国际市场已经创建起来了。这个巨大的新市场自然颠覆了欧洲的旧经济。你只有把这个新市场记在心里，才能够理解接下来在欧洲、亚洲和美洲所发生的许多事情。科学后来也发展起来了，因此就有了科学的方法来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

在18世纪，对殖民地和帝国的争夺开始了，尤其是在英国和法国之间；争夺引发了战争，战争不仅发生在欧洲，也发生在加拿大和印度。这些战争之后，到18世纪中叶，又有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欧洲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平静得几乎没有一丝涟漪。欧洲无数的宫廷里充斥着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淑女和绅士。但是，这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平静而已。在平静的外表之下，是涌动的暗流，人们的内心被新的想法或思想所困扰而焦虑不安；另外，除了令人陶醉的宫廷圈子和一些上层阶级的人之外，人们的身体也由于越来越严重的贫困，遭受到越来越多的痛苦。因此，18世纪下半叶，欧洲的平静是十分具有欺骗性的，它是暴风骤雨到来的前奏。1789年7月14日，在法国这个欧洲最大的君主国家的首都巴黎，暴风骤雨突然大作，横扫了君主制度和上百种陈规陋习以及各种特权。

暴风骤雨和接下来的巨变，是新思想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酝酿已久的结果。贯穿整个中世纪，宗教在欧洲占据着主导地位。即使到了后来的宗教改革时期，情况依然如此。所有的问题，不论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都是从宗教的角度来考虑的。宗教是有组织的，代表了教皇或者教会高级官员的观点。社会组织有些像印度的种姓制度。种姓的概念本来是根据职业和功能划分的。正是根据功能来划分社会阶层这种思想，奠定了中世纪的社会理念。在同一个阶层里，就如同在印度的同一种姓里，人们是平等的。然而，在两个或更多的阶层之间，人们又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来自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那些在这种制度下受苦的人们，会被告知“期待在天堂得到报偿”。宗教就是以这种方式试图来维护这种不公正的

社会秩序，并试图通过谈论来世来分散人们对现世的思考。宗教还竭力宣扬一种被称为“受托人制度”的信条——也就是说，富人是穷人的受托人；地主掌管着土地，是替他的佃户“照管”土地。这就是教会对一种很令人尴尬的情形的解释。这对富人无关紧要，也没有带给穷人多少安慰。但巧妙的解释替代不了果腹的食物。

天主教教徒和新教教徒之间的激烈战争，天主教教徒和加尔文教徒的不宽容，还有宗教法庭，这一切都是由于强烈的宗教观点和对立教派之间的偏见而造成的。想一想吧！据说在欧洲，成千上万的女人被当作女巫活活烧死，而且大多是被清教教徒烧死的。科学上的新思想遭到压制，因为它们被认为与教会的观点是相冲突的。这是一种停滞不动的生活观，是不可能进步的。

我们发现，这些思想从16世纪开始发生了变化，科学出现了，掌管一切的宗教地位降低了，政治和经济被看作独立于宗教之外了。据说，在17世纪和18世纪，民族主义思想也得到了发展——也就是说，用理性来对抗盲目的信仰。的确，人们认为，宗教宽容在18世纪取得了胜利。这样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胜利实际上意味着，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把宗教看得那么重要了。宽容和淡漠很相近。当人们特别热衷于某种事情的时候，他们很少能对它宽容；只有当他们不太在乎它的时候，才能和蔼地宣称他们很宽容。随着工业主义和大机器的出现，对宗教的淡漠变得更加严重了。科学逐渐侵蚀了欧洲的古老信仰，新的工业和经济带来的新问题占据了人们的头脑。所以，欧洲人放弃了（当然没有完全放弃）为某种宗教信仰或教义的问题而打碎对方脑袋的做法，然而，他们却会为了经济和社会问题互相残杀。

如果把欧洲宗教至上的时期和今天的印度做个比较，会十分有趣而且很有教育意义。印度经常被称为宗教和精神之国，这种称呼既有赞扬的成分，也有嘲弄的成分。它与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欧洲被认为是无宗教的，过度钟情于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事实上，就印度的

景致都带有宗教色彩这一点而言，这个“宗教的”印度与16世纪的欧洲极其相似。当然，我们也不能把两者的相似说得太过头。但很明显的是，我们在这里也存在着对宗教信仰和教义过度重视的现象，存在着把政治和经济问题与宗教集团的利益混为一谈的现象，存在着教派之间的争吵，以及和欧洲中世纪存在的一些相似的问题。问题不在于西方讲究实际、注重物质，而东方则注重精神和来世。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一边是工业化的、高度机械化的西方，尽管它也有其长处和短处，而另一方则主要是工业化之前的、以农业为主的东方。

在欧洲，信仰自由和理性主义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最初，书籍对此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因为人们不敢公开批评基督教。因为公开批评基督教会坐牢，或受到其他的惩罚。一位德国哲学家因为过高地评价孔子而被逐出了普鲁士，因为他的行为被理解为对基督教的冷落和冒犯。然而，在18世纪，新思想越来越明朗，越来越普遍，讨论这些问题的书籍也就应运而生了。当时，写作有关理性主义和其他问题的最有名的作家是法国人伏尔泰，他曾遭到监禁和流放；最终，他定居在日内瓦附近的费内（Ferney）。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得不到纸和墨水，于是，他便用铅块把诗句写在书的字行之间。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名了。事实上，他年仅10岁时就因其非凡的才能而受到人们的注意。伏尔泰憎恨偏见和不公正，并向它们开战。他最著名的口号是“踩死败类”。他很长寿（生于1694年，卒于1778年），也写了很多书。因为他批评基督教，所以遭到正统基督徒的强烈憎恨。他在一本书中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认真考察，就接受了他的宗教，就如同一头公牛自己甘愿被拴起来一般。”伏尔泰的著作对人们倾向理性主义和新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费内居住的老房子至今仍然是许多人的朝圣之地。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是另一位伟大的作家，他是与伏尔泰同时代的人，但比伏尔泰年轻。他生于日内瓦，是日内瓦的骄傲。你是否记得那里有他的塑像？卢梭关于宗教和政治的

著作曾引起了强烈的抗议。然而，他的小说以及他大胆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在许多人的心中燃起了新的思想和新的决心。他的政治理论现在已经过时了，但是，它们在当时的作用十分巨大，让法国人民为大革命做好了准备。可卢梭并没有宣扬革命，甚至没有期待革命的到来。但是，他的著作和思想无疑在人们的心中播下了种子，它们在大革命中开花结果了。

他最著名的著作是《社会契约论》（*Du Contrat Social*），这本书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句名言（我是凭记忆写的）："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还是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在教学方面提出的许多新方法，现在的学校都还在采用。

除了伏尔泰和卢梭，18世纪的法国还有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作家。我再提一个名字——孟德斯鸠（Montesquieu），《论法的精神》（*Esprit des Lois*）是他作品中的一部。大约在这一时期，法国还出版了一部百科全书，里面收入了狄德罗（Diderot）和其他一些很有才华的作家有关政治和社会题材的文章。的确，法国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著作被广泛传阅，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因此开始思考他们的思想，讨论他们的理论。于是，在法国，有一股强大的舆论主流发展起来了，反对宗教偏执以及政治和社会的特权。人们心中燃起了一种模糊的对自由的渴望。然而，奇怪的是，无论是哲学家，还是人民群众，都不想除掉国王。当时，共和的思想还不是很普遍，人们仍然希望他们会有一位理想的君主，就像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那样，他将解除他们的重负，赐给他们公正和一定程度的自由。无论如何，这是那些哲学家所写的。人们可能会怀疑，劳苦大众在多大程度上爱戴他们的国王。

英国没有出现像法国这样的政治思想方面的进步。据说，英国人不是政治动物，而法国人是。除此之外，1688年的英国革命也多多少少缓解了一些紧张局面。然而，某些阶层仍然享受着许多特权。新经

济的发展——我很快会在另一封信里谈及这个问题——以及贸易，加之纠缠于美洲和印度的事务，这些就足以占满英国人的头脑了。当社会的紧张状况很严重的时候，一个暂时的妥协方案转移了爆发革命的危险。而在法国却无处安放这样的妥协，于是就发生了倾覆性的革命。

然而，有趣的是，大约在18世纪中期，现代小说在英国发展起来了。我已经告所过你，《格列弗游记》和《鲁滨孙漂流记》都在18世纪初期出版了。在它们之后，又出版了现实小说。此时在英国，一批新的大众读者也随之出现了。

也是在18世纪，英国人吉本写了著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我之前那些讨论罗马帝国的信中，已经提到过吉本和他的著作了。

96 ——巨变前夕的欧洲

我们已经试着窥视了18世纪欧洲男男女女的内心世界，尤其法国的。就是这样的一瞥，让我们看到了新思想的成长，及其与旧思想的斗争。现在，让我们在幕后看看欧洲公众舞台上的演员吧。

1715年，法国的老路易十四终于离开了人世，他活过了几代人，最后由他的重孙子继承了他的王位，称为路易十五。路易十五执政长达59年。所以，法国连续两位国王，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执政时间加起来长达131年！当然，这一定是创了世界纪录的。中国的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他们各自执政的时间都超过了60年，但是，乾隆并没有直接继承康熙的皇位，他们之间还有一位皇帝。

除了执政时间特别长以外，路易十五执政时期还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令人厌恶的腐败和阴谋。国王寻欢作乐，肆意挥霍着法国的资源。而宫廷里的奢侈铺张，往往是建立在贪赃枉法的基础之上的。那些在宫廷里对国王阿谀奉承的男男女女既能够无偿得到土地这样的赠物，还能得到闲职；也就是说，他们无须工作就能得到收入。而这一切重负越来越多地落在了人民大众的身上。独裁、无能和腐败结伴而行，快乐向前走。但是，到18世纪结束前，它们便走到了路的尽头，坠入了深渊，这还让人感到惊奇吗？然而让我们惊奇的是，这条路是那么漫长，而坠落却来得如此之晚。路易十五逃脱了人民的复仇和审判，而1774年即位的路易十六（Louis XVI），却不得不面对这些了。

尽管路易十五既无能又堕落，但他从不怀疑自己在王国里的绝对权力。他就是一切，有权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没有人敢挑战他的权

力。听听他1766年在巴黎一次集会演讲时所说的话吧：

> 只有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立法权只属于我，公共秩序一律出自我，我的人民只能和我站在一起，国家的权力和利益必须由我来处置，必须和我的一切联系在一起，如同躯体不可分割一样。

在18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的统治者就是这样的。甚至有一段时间，他似乎还控制了欧洲；但是，他和其他的富有野心的国王，与民众发生了冲突，只得承认了失败。法国的一些老对手在欧洲的舞台上已经不是重要角色了，但是涌现出了新兴的国家，继续挑战法国的力量。傲慢的西班牙在享受了短暂的至高荣耀之后，在欧洲和其他一些地方都退却了。但是，它在美洲和菲律宾群岛仍然控制着大片殖民地。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长期以来一直垄断着帝国的皇位，进而控制着欧洲，但是他们也不再像从前那么声名显赫了。奥地利在帝国里已经不再处于首要的位置；另一个王国——普鲁士兴起了，可以和奥地利分庭抗礼。围绕奥地利王位的继承权发生过多次战争；长期以来，奥地利的王位一直由一位名叫玛丽亚·特雷莎（Maria Teresa）的女人占据着。

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普鲁士成了欧洲最重要的强国之一。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着普鲁士，并在不断挑战另一个德意志王朝——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的霸权地位。46年（1740——1786年）来，腓特烈二世一直统治着普鲁士；由于他在军事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人们称他为“腓特烈大帝”。他和欧洲的其他君主一样，也是一位专制独裁的君主，但他摆出一副哲学家的姿态，并试图和伏尔泰成为朋友。他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将军。他称自己为理性主义者；据说，他曾经说过：“人人都应该被允许以自己的方式到达天堂。”

从17世纪开始，法国文化就在欧洲占据了统治地位。18世纪中期，这个趋势更加明显了，伏尔泰在欧洲名声大振；事实上，有人把18世纪称为“伏尔泰的世纪”。欧洲所有宫廷里的人都在阅读法国文学作品，甚至在落后的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也不例外。有教养、有文化的人更喜欢用法语阅读和写作。于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几乎都是用法语写作和说话。他甚至尝试写过法语的诗作，并让伏尔泰帮他修改和润色。

普鲁士的东边是俄罗斯。俄罗斯在近几年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国。我们讨论中国历史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俄罗斯横跨西伯利亚，到达了太平洋，甚至渡过大洋到了阿拉斯加。到17世纪末，统治俄罗斯的是强大的彼得大帝。俄罗斯继承了许多与古老蒙古人的联系，同时也继承了他们的观点。彼得大帝想结束这些联系，改变这种观点。正如人们所说的，他想使俄罗斯西方化。所以，他离开了旧日的首都莫斯科，因为它充满了旧的传统。他为自己建起了新的城市、新的首都，这就是圣彼得堡，位于俄罗斯北方、芬兰湾的入海口、涅瓦河河岸。它与莫斯科有很大的差别。莫斯科到处是穹顶和圆顶建筑，而圣彼得堡更像西方欧洲的大城市。圣彼得堡成为“西方化”的象征，俄罗斯开始在欧洲政治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了。也许，你只知道圣彼得堡这个名字。但是，在过去的20年里，它已经两次改名字了，第一次改为彼得格勒（Petrograd），第二次改为列宁格勒（Leningrad），也就是现在的名字。

彼得大帝在俄罗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我要提一下其中可能让你感兴趣的一项。他废除了被称为“特勒姆”（terem）的妇女隐居制度，这个制度在当时的俄罗斯十分盛行。彼得大帝还把目光投向了印度，他知道印度在国际政治中的价值。他在遗嘱中写道：“要记住，印度的贸易就是世界的贸易；谁能独享它，谁就是欧洲的独裁者。”

他遗嘱中的话被证实是正确的，因为英国在取得了对印度的控制权后，便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了。对印度的剥削给英国带来了威望和财富，让它保持了好几代世界霸主的地位。

普鲁士和奥地利在一侧，俄罗斯在另一侧，波兰位于它们两者之间。波兰是个落后的农奴制国家，没有什么贸易活动，也没有工业和大城市。它的政体很奇怪，国王是选举出来的，但是权力掌握在封建贵族的手中。随着周边国家的日益强大，波兰变得更加衰弱了。普鲁士、俄罗斯和奥地利都对它虎视眈眈，垂涎欲滴。

但是，1683年，当土耳其最后一次进攻维也纳的时候，波兰的国王击退了来犯的土耳其人。奥斯曼土耳其人从此再也没有发动侵略和挑衅了，他们已经耗尽了自己的能量，而且整个趋势也渐渐地发生了改变。从那时起，他们就处于防御的态势，慢慢地，欧洲的土耳其帝国开始缩小了。但是，在我们现在讨论的18世纪的前半叶，土耳其仍然是东南部欧洲的强国，它的帝国一直延伸到了巴尔干半岛，跨过匈牙利，直到波兰。

南部的意大利已经分裂，被不同的统治者控制着，在欧洲政治上已经微不足道了。教皇也不再占据支配地位，国王、君主们尽管对他还很尊重，但在政治事务上已经忽视他的存在了。渐渐地，一种新的体制在欧洲形成，这是一种大国强权的体制。我给你讲过，强大的集权君主制国家有助于国家概念的形成。人民开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国家，这在今天十分普遍，但是，在这一阶段之前实属罕见。法国、英国或大英帝国、意大利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形象开始出现了。他们似乎成了国家的象征。后来，在19世纪，这些形象在男人和女人的头脑里形成了清晰的认识，并不可思议地激起了他们内心的情感。它们成了新的女神，在它们的圣坛前，所有的爱国者都应该顶礼膜拜，并以它们的名义，或者为了保卫它们，英勇斗争，相互残杀。你知道，印度之母——母亲印度——这一信念，是如何使我们所

有人激动不已的，而为了这个神话般的、想象中的形象，人们是如何心甘情愿地受苦和献出自己生命的。其他国家的人民对他们祖国的信仰也是这样的感觉。但这一切是后来发展出来的。现在我想告诉你的是，在18世纪，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扎下了根。法国哲学家们推动了这种思想的发展进程，伟大的法国大革命对这种思想给予了肯定。

这些民族就是“国家”。国王来了又去了，但是国家继续存在。在这些国家里，渐渐地，有一些国家越来越凸显出来，地位比其他国家更为重要了。于是，在18世纪初期，法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都明显成了“强大的国家”。像西班牙等其他一些国家，理论上说也是强大的，但是它们正在衰落。

英国的财富迅速增长，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伊丽莎白时代之前，英国在欧洲都算不上是个重要的国家，就整个世界来说，更不值得一提了。当时，它的人口也很少，可能还不到600万人，比现在伦敦的人口还少很多。但是，清教教徒革命，以及议会战胜国王的行动，让英国适应了新的形势，开始大步向前发展。挣脱了西班牙枷锁的荷兰，情况也和英国一样。

18世纪，在美洲和亚洲，世界列强开始了对殖民地的争夺。许多欧洲强国都参与了这场争夺战，但是主要的竞争最终落在两个国家之间——英国和法国。无论在美洲还是在印度，英国在竞争中都遥遥领先。而法国，除了国王路易十五昏庸无道外，还过于陷入欧洲的政治之中。从1756年至1763年，在欧洲、加拿大和印度，英国和法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其他列强也参与了进来，目的是为了争夺这些地区的霸权。这场战争被称为“七年战争”。法国失败的时候，我们在印度也能看出一点端倪。在加拿大，英国也得胜了。在欧洲，英国采用了雇用其他国家军队为它打仗的政策，为此英国出了名。腓特烈大帝是它的同盟。

“七年战争”的结果对英国非常有利。在印度和加拿大，它都没有欧洲的对手了。它在海上也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于是，英国即将建立和扩大它的帝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普鲁士的地位也变得日益重要起来。

欧洲再次被战争耗得精疲力尽，因而整个欧洲大陆再次出现了相对的平静。但是，平静没有阻止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侵吞波兰王国的步伐。波兰无力抵抗这些强国，于是，这三只饿狼在反复瓜分波兰之后，终结了这个独立的国家。它们对波兰一共进行了三次瓜分——分别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在第一次瓜分之后，波兰人努力进行了改革，加强国力。他们建立了议会，还出现了艺术和文学的复兴。但是，包围着波兰的这些独裁君主已经尝到了血腥味，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了；况且，他们根本不喜欢议会。因此，尽管波兰人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在他们伟大的英雄科希丘什科（Kosciusko）的带领下，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波兰还是在1795年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波兰虽然从地图上消失了，但是，波兰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没有消失，他们继续梦想着自由。123年后，他们的梦想实现了。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又出现了。

我已经说过，欧洲在18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平静。但是，这平静并没有持续多久，而且大多也只是表面上的平静。我也告诉过你在这个世纪里发生的其他事件。但18世纪最为著名的有三大事件，也就是发生了三次革命，而欧洲在这100年间发生的所有其他事情，当你把它们和这三大事件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三次革命都发生在这个世纪的后25年里。它们是三次不同类型的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发生在美洲，是英国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地发起的反抗。反抗的结果是，独立的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了，它将在我们这个时代变得异常强大。工业革命是在英国开始的，并传播到了其他西欧国家，后来又传播到了欧洲以外的地方。这虽是一次和平的革命，但是意义更为深远，比之前有记载

的历史上任何事件对全世界生活的影响都要大。它为人们带来了蒸汽机和大机器，以及最终我们所看到的、在我们周围数不清的工业化的产物。社会革命是伟大的法国大革命，它不仅结束了法国的君主制度，还结束了特权阶级，把新兴的阶级推到了风口浪尖。我们必须分别细致地研究这三次革命。

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三次伟大的革命前夕，君主政体在欧洲是至高无上的。英国和荷兰已经有了议会，但是它们是被贵族和有钱人控制的。法律是为有钱人制定的，用以保护他们的财产、权利和特权。教育也只是有钱人和特权阶层才可以享受的。事实上，政府本身就是为这些阶层服务的。那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穷人的问题。尽管在上层情况有所改进，但是穷人的苦难还在继续，实际上是变得更加显著了。

整个18世纪，欧洲国家都在进行残酷无情的奴隶贸易。“奴隶”，按照这个词的严格意义来说，在欧洲已经不复存在了，尽管被称为“农奴”或“隶农”的土地耕种者的境遇比奴隶也好不了多少。然而，随着美洲大陆的发现，古老的奴隶贸易以最残酷的形式又重新繁荣了起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开创了奴隶贸易的先河，他们在非洲海岸捕获黑人，把他们带到美洲的土地上干活。英国人在这令人憎恶的奴隶贸易里也占了很大的份额。非洲人像野兽一样被追猎、捕获，然后用铁链拴在一起，运到美洲，你或者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难以想象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他们之中有很多人甚至还没有到达旅途的终点就死了。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受苦的人里，黑人或许承受了最沉重的苦难。奴隶制是在19世纪正式废除的，带头的是英国。而在美国，为了决定奴隶制的存续问题，发生了内战。今天，美国的几百万黑人就是这些奴隶的后代。

我要用令人愉悦的音符来结束这封信，我要给你讲讲这个世纪德国和奥地利音乐的发展。你也知道，德国人是欧洲音乐的引领者。有

些伟大的名字甚至在17世纪就出现了。像其他地方一样，音乐在欧洲几乎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渐渐地，它从宗教中分离出来，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在18世纪，有两个伟大的名字最为显赫——莫扎特（Mozart）和贝多芬（Beethoven）。他们俩都是音乐神童，都是作曲天才。奇怪的是，贝多芬，这位也许是西方世界最伟大的作曲家，后来竟然成了聋子，所以，他为别人创作的美妙音乐，自己却听不见。但是，在他捕捉到这些旋律之前，他的心一定已经唱给自己听了。

97 ——大机器时代的到来

我们现在来看看工业革命。它是在英国开始的，所以，我们先简单地研究一下英国的工业革命。我无法告诉你英国工业革命的确切日期，因为变革不像魔法，不是在某一天发生的。然而，它的发生也足够快了，从18世纪中期开始，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就改变了人类生活的面貌。你和我一起跟随着历史进程的脚步，从早期人类历史开始，走过了几千年，其间我们注意到了很多的变革。这些变革有的也是十分伟大的，但它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如果苏格拉底、阿育王或恺撒大帝突然出现在印度阿克巴的宫廷里，或是出现在18世纪初的英国和法国，他们应该会注意到很多的变化。他们可能会赞许其中的一些变化，而对其他的变化则不以为然。但总体上说，至少从表面上还能够认出这个世界，因为人们的思想并没有发生大的变革。就外部面貌而言，他们身处其中时也不会感觉完全不合时宜、格格不入。如果他们想旅行，他们还是会骑马，或者乘坐马拉的马车，基本上与他们自己那个时代的做法差不多，旅途所需的时间也大致相同。

但是，如果他们三个人中间有哪一位来到我们今天的世界，他将大为惊讶，而且，他的惊讶往往是痛苦的。他将发现，人们现在以比最快的马还要快得多、比离弦之箭还要更迅速的速度在旅行。人们乘着火车、轮船、汽车和飞机，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各地奔走忙碌着。然后，他将对很多东西产生兴趣：电报、电话、无线电以及现代印刷机构出版的大量书籍，还有报纸和一大堆其他的东西——也就是18世纪以及之后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工业形式的一切产物。我无法知道，苏格拉底、阿育王或恺撒大帝是否会赞成这些新方法，但是毫

无疑问，他们会发现，这些新方法和他们那个时代流行的方法真是天壤之别。

工业革命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大机器。它迎来了机器时代，或者叫机械时代。当然，以前也有机器，可是从没有像新机器这样的大型机器。什么是机器呢？它是帮助人们做工的工具。人类一直被称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从人类初期开始，人类就开始制造工具，并在随后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着工具。人类优于其他动物，但是许多动物比人类更强壮，人类就是因为自己制造的工具才确立了优势地位。工具是手的延伸，或许你可以称工具为第三只手。而机器又是工具的延伸。工具和机器提升了人类，使他们高于低等的动物。它们使人类社会摆脱了自然的枷锁。在工具和机器的帮助下，人类发现制造东西变得简单了。于是他造出更多的东西，而且还有了更多的闲暇。这就带来了文明艺术的进步，以及思想和科学的进步。

但是，大机器及其所有的同盟者带来的绝非都是幸事。如果说它鼓励了文明的发展，但同时也鼓励了野蛮的发展，因为它制造了战争和毁灭的可怕武器。如果说它带来了财富，但是财富主要不是带给广大人民的，享受到财富的只是有限的一小撮人。它使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了。大机器不是人类的工具和奴仆，而成了人类的主人。一方面，它教会了人们一些美德，比如合作、组织、守时等；另一方面，它使几百万人的生活变成了枯燥乏味的例行公事，一种机械的负担，没有多少乐趣和自由。

可是，我们应该因为机器所带来的祸害而去责怪可怜的机器吗？错误还是在人的身上，因为人类错误地使用了机器。错误还在于社会，因为它没有充分从机器上获益。让全世界，或者任何国家，回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旧时代，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为了摆脱这些祸害，我们竟然要抛弃工业化带给我们的无数好东西，似乎也是很不可取、很不明智的。无论如何，机器已经来了，就不会走了。所以，我们的问

题在于，要保留工业化带给我们的好东西，去除与它连在一起的祸害。我们必须从机器生产出的财富中获利，但是要注意，财富应该平均分配给那些制造财富的人。

这封信本来是要告诉你一些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情况，但是，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思路突然一转，开始讨论起工业化的影响来了。我还向你提出了一个目前困扰着人们的问题。但是，在我们解决今天的问题之前，必须先搞清楚昨天的问题；我们在考虑工业化的结果之前，必须研究一下，工业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以及如何出现的。我把这个开场白写了这么长，就是为了让你对工业革命的重要性有深刻的印象。它不只是改换高层的国王和统治者的政治革命而已。事实上，它是一场影响到所有阶层、所有人的革命。机器和工业化的胜利，意味着控制机器的阶级的胜利。我很久之前告诉过你，控制生产方式的阶级就是统治阶级。在古老的过去，唯一重要的生产方式就是土地，所以，那些控制土地的人——也就是地主——就是主人。封建时代就是如此。后来，土地之外的财富出现了，于是拥有土地的阶级开始与新生产方式的拥有者们分享他们的权力。现在，大机器出现了，那么自然而然地，控制大机器的阶级便上升到了最重要的位置，成了主人。

在写这些信的时候，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告诉你，城镇的资产阶级已经兴起，地位越来越重要。他们与封建贵族斗争，在一些地方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我也跟你说过封建制度的崩溃。我也许让你以为，资产阶级——也就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取代了封建阶级的位置。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更正一下，因为中产阶级得到权力的过程要慢得多，在我们讨论的那个时期，它还没有取代封建阶级的位置。直到法国爆发了一场伟大的革命，英国也险些爆发一场类似的革命，资产阶级才得到了权力。1688年的英国革命，议会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你要记住，议会本身就是一个代表少数人的机构，它主要代表地主

阶级。一些城镇的大商人也许进入了议会，但是，总体上说，商人阶级——也就是中产阶级——并没有占据什么重要地位。

因此，政治权力还是掌握在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人手中。英国的情况如此，别的地方情况更是如此。土地所有权是儿子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那么，政治权力本身也成了世袭的特权。我已经告诉过你英国的“口袋选区”——也就是向议会推选议员的选区，选区里只有几个有选举权的人。这几个有选举权的人往往是在某人的控制之下，于是人们就说，选区就在他的口袋里。这样的选举当然是滑稽可笑的；严重的腐败、买卖议会选票和席位的现象时有发生，那么有些新兴中产阶级中有钱的议员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议会中买到一个席位。但是广大的人民无论以哪种途径都没有机会进入议会。他们没有世袭的特权和权力，显然，他们也买不到权力。那么，当他们受到有钱人和有特权的人的欺压和剥削的时候，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在议会里没有发言权，甚至在选举议会议员时也没有选举权。他们在外面举行示威游行也令那些当权者感到厌恶，并遭到武力镇压。他们没有组织，软弱而无助。但是，当痛苦和苦难让他们无法忍受的时候，他们就会忘记法律和秩序，就会揭竿而起，反抗权贵。因此，在18世纪的英国，出现了很多的违法活动。人民总体的经济状况很糟糕，而大地主却以榨取小农场主的利益为代价，想方设法扩大他们的私有土地，这使人民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属于村庄的公共土地也被掠夺走了。这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痛苦或苦难。而在政府中没有自己的声音，这也使广大人民十分愤慨，他们也含糊地提出了要得到更多自由的要求。

在法国，情况更加糟糕，结果导致了革命的爆发。在英国，国王已经不重要了，更多的人分享了权力。而且，和法国不一样，在英国没有那种政治思想的进步和发展，所以英国避开了革命的爆发，而变革是逐渐到来的，同时，工业化和新的经济结构带来的巨大变化，也加快了变革的步伐。

18世纪英国的政治背景就是这样的。英国国内工业迅速发展，主要是有赖于从外国移民来的工匠。欧洲大陆的宗教战争迫使许多新教教徒离开自己的祖国和家庭，逃难到英国。当时，西班牙人正试图镇压尼德兰的暴乱，大量工匠从尼德兰逃到了英国。据说，他们有3万人在英国的东部定居下来，伊丽莎白女王允许他们定居的条件是，每一家都必须雇用一名英国学徒。这就帮助英国加强了自己的织布业。而当英国自己的织布业发展起来以后，英国人便禁止尼德兰的纺织品进入英国。同时，尼德兰还在为自由进行着惨烈的战斗，他们的各个行业都受到了重创。因此，以下的情况出现了：以前有无数装满纺织品的尼德兰船只开往英国，而不久之后，这些船只就被禁止了；同时，越来越多的英国纺织品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荷兰。

于是，来自比利时的瓦龙人（Walloon）教会了英国人织布。后来，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s）——来自法国的新教教徒难民——也来了，他们教会了英国人纺织丝绸。17世纪下半叶，大量技术工人从欧洲大陆来到英国，英国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手艺，例如造纸、造玻璃、制造机械玩具和钟表等。

所以，当时在欧洲还很落后的英国，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积累起来的财富也越来越多。伦敦也发展起来了，成了十分重要的港口，城市里涌现了一大批富商巨贾。通过下面这个有意思的故事，我们可以粗略地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早在17世纪初期，伦敦就是个大港口和贸易中心。被送上断头台的查理一世的父亲，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是独裁和君权神授思想的坚定信仰者，他不喜欢议会和伦敦那些暴富的商人。他曾在盛怒之下威胁伦敦的市民，要把他的宫廷搬到牛津（Oxford）去。面对他的威胁，伦敦的市长大人不为所动，只是说，他希望“陛下会仁慈地把泰晤士河给他们留下来”！

正是伦敦这些有钱的商人，在议会与查理一世的斗争中支持了议会，并为议会提供了大量资金。

在英国发展起来的所有这些工业都被称为家庭小工业。也就是说，工匠或手艺人通常是在他们自己家里干活，或是一小帮、一小群人在一起干活。每一个行业都有手艺人的行会或协会，有点像印度许多的种姓，只是没有种姓中的宗教元素。

工匠大师会带徒弟，教他们手艺。织布工有自己的织机，纺纱工有自己的手纺车。纺纱十分流行，是女孩和妇女们业余时间的行当。有时候，人们会成立一些小工厂，工厂里收集几架织机，织布工就在一起干活。但是，每个织布工都是独立地在自己的织机上干活。无论他是在家里自己的织机上干活，还是在其他地方，和其他织布工一起在各自的织机上干活，两者之间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小工厂和有大机器的现代工厂是有天壤之别的。

家庭小工业那时不仅在英国十分盛行，而且在全世界，在每一个有工业的国家，都很盛行。当时，在印度，这些家庭小工业是很先进的。现在，英国的家庭小工业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印度还有很多家庭小工业。在印度，大机器和家庭小工业的织机并排存在，二者都很盛行，你可以把二者做个比较或对比。你也知道，我们穿的是印度土布。它是手工纺纱，手工织布而成，所以完全是在印度村舍和泥土棚子里制造的产品。

然而，新机器的发明对英国的家庭小工业产生了重大影响。机器越来越多地承担了人的工作，使人们可以花更少的力气生产出更多的东西。这些发明是从18世纪中期开始的，我们将在下一封信里讨论它们。

我已经简单地谈过我们的印度土布运动。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个运动和印度手纺车并不是要和大机器抗衡的。许多人陷入了这样的错误认识，认为手纺车就意味着倒退回了中世纪，意味着丢弃了机器，以及工业化带给我们的一切。这就全错了。我们的运动绝对不是反对工业化本身，或者机器和工厂，我

们只是想让印度拥有所有最好的东西，而且越快越好。但是，考虑到印度现在的情况，尤其是印度农民可怕的贫穷状况，所以我们鼓励他们在业余时间里进行纺织。这样，他们不仅能改善一点自己的境遇，还能帮助减少我们对外国织物的依赖，它们已经从我们国家夺走了太多的财富。

98 ——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了

现在，我必须跟你谈谈一些造成生产方式巨变的机器发明。现在当我们在一些作坊或者工厂里见到它们的时候，它们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去灵光一现地构想出它们，并且把它们发明出来，则是极其艰涩复杂的。这些发明中的第一项出现于1738年，一个叫约翰·凯伊（John Kay）的人发明出了用来织布的飞梭。在这项伟大发明问世之前，织工们不得不用手把穿着线的梭子慢慢地穿过被称为经纱的那些纵向排列的纱线。飞梭加快了这一过程，因此织工的产量成倍增加了。这也就意味着织工们将要消耗更多的纱线。当时的纺纱工很难再向织工们供给额外的大量纱线了，因此他们就尝试找到某种方法来提高产量。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在1764年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接着，涌现了由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等人所创造的一系列发明；水力得到了大量使用，之后，蒸汽动力又开始普及。所有这些发明创造在一开始都是用于棉纺织业的，于是大工厂和棉花作坊开始崛起。下一个寻求新方法来提高生产的行业是毛纺业。

与此同时，在1765年，詹姆斯·瓦特（James Wat）制造出了蒸汽机。这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式的事件，紧接着蒸汽动力开始在工厂制造业中大量使用。新的工厂开始大量需求煤炭，因此煤炭工业得到了发展。煤炭的使用带来了铁熔炼的新方法——也就是将铁矿熔化，分离出纯金属。钢铁产业由此开始飞速发展。新工厂都建在煤矿附近，因为那里的煤价低廉。

在此情况下，三大产业在英国崛起了：纺织业、钢铁业和煤炭业；煤炭产区或其他适合的地区开始涌现出了大量的工厂。英国的面

貌开始改变了。绿色而闲适的乡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四处建起的工厂，它们高高的烟囱喷吐着烟雾，让四周一片暗淡。这些工厂看上去并不美观，因为它们周围往往是煤山和堆积的废料。而那些围绕着工厂发展起来的新兴制造业城镇，也毫无美感可言。但是，不管怎样，它们还是建起来了，而工厂主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这些工厂丑陋、庞大、肮脏、污秽，然而那些饥寒交迫的工人却不得不忍受这些，以及工厂里有害身心健康的工作环境。

你也许记得，我向你介绍过的大地主对小农场主的压榨，以及逐渐上升的失业率，这些因素导致英国出现了暴动及违法犯罪现象。一开始，新兴的产业使得事态变得更加糟糕。农业遭到重创，失业率不断攀升。实际上每一项新发明的问世都会直接导致手工劳动被机械化装置所取代，这往往会造成大量工人被解雇，进而引起工人们的强烈不满。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开始憎恨新机器，甚至去破坏它们。这些人被称为“破坏机器者”。

破坏机器的行为在欧洲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它可以追溯到16世纪，当时在德国问世了一种简单的织布机。在一本由一位意大利神父1579年撰写的旧书里提到这种织布机时写道，但泽的市政会“担心发明这种织布机会导致大量工人流落街头，便让人毁掉了机器，并把发明家秘密绞死或淹死了”。尽管人们采取了这种即决的方式来对付这位发明家，但是这种机器还是于17世纪再度出现了，而且也因此欧洲各地发生了暴乱。许多地方都通过了法律，不许使用这种机器，甚至在集市上将它公开烧毁。如果这些机器在刚刚问世的时候就被投入使用，那么很有可能其他的发明就会接踵而来，大机器时代就会来得更早一些。但是，它没有在一开始就被投入使用，这也揭示了当时使用它的条件还不成熟。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尽管在英国发生了很多暴乱，大机器还是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工人们对于机器感到愤恨不满也是自然的。渐渐地，工人们意识到，错误并不出在机器身上，而是那

些依靠机器牟取暴利的一小撮人的身上。现在还是让我们的话题回到英国大机器和工厂的发展上来吧。

新兴的大工厂吞并了大量的家庭小工业和个体手工业者。家庭小工业的工人根本无法与机器抗争。因此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原先的手艺和贸易活动，转而去他们所憎恶的工厂求职，成为靠工资为生的人，或者成为失业大军的一员。家庭小工业的崩溃，虽然不是突然间发生的，但也是非常迅速的。到17世纪末，或者大约在18世纪初，大工厂就已经十分引人注目了。大约30年后，英国出现了蒸汽火车，装配着斯蒂芬森（Stephenson）发明的、名叫“火箭”的著名蒸汽机车。于是，大机器继续推向全国，扩展到几乎各行各业，也延伸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趣的是，所有的这些发明家，包括许多我还没有提及的，都出身于手工工人阶级。还有许多工业领导者也出自这个阶级。然而他们的发明以及接踵而至的工厂体系，使得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差距更大了。工厂里的工人只是机器上的一个轮齿，无助地被掌控在他甚至无法理解、更不可能控制的巨大的经济力量之中。手工业者和工匠们最初察觉到事态不对，是因为他们发现，新兴的工厂正在与他们竞争，而工厂生产和出售的产品，比他们在家里用简单而原始的工具做出来的产品便宜得多。他们只好关闭自己的小店铺，虽然他们自己并没有什么过错。如果他们无法继续从事自己的本行，那么，去干一个新的行当就更难成功了。于是，他们加入了失业大军，忍饥挨饿。有人说：“饥饿是工厂主的教练员。”饥饿最终迫使他们到新的工厂去找工作。雇主们对他们并无怜悯之心，虽然确实给了他们工作岗位，却只付给勉强可以糊口的微薄薪水，而可怜的工人们不得不为此在工厂里倾注一生的血汗。女人，甚至还有年幼的儿童，在令人窒息且危害身心健康的环境中长时间工作，直到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过度疲劳几乎晕厥倒下为止。男人们在地下的矿井里终日劳作，甚至一连数月都见不到阳光。

但不要误以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雇主的残酷无情。他们并非存心要如此残忍，错误应归咎于这个体制。他们一心想要扩大自己的生意，占领在遥远异国的国际市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愿意忍受一切。建造新的工厂和购买机器花费了大量金钱。而只有在工厂开始生产，并将产品在市场上出售之后，才能把钱挣回来。所以，为了建工厂，工厂主们必须紧缩开支，甚至当产品出售之后，赚到了钱，他们会继续建造更多的工厂。由于工业化较早，工厂主们比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处于领先地位，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地位获利——他们也确实做到了。因此，在扩大生意和赚大钱的疯狂野心驱使之下，他们极力压榨那些贫苦的工人，而工人们的劳动正是工厂主们财富的源泉。

因此，这种新的工业体系尤其适合强者对弱者的剥削。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强者总是在剥削弱者。而工厂体系使剥削变得更简单了。从法律上来说，奴隶制已经不存在了，可实际上，这些忍饥挨饿的工人，也就是工厂里靠薪水为生的奴隶，他们比以前的奴隶好不到哪儿去。法律完全偏袒雇主。甚至宗教也偏袒雇主，他们告诉穷人，要忍受在这个世界上的悲惨命运，寄希望于能够在来世的天堂中得到补偿。事实上，统治阶级捏造出了一个适合他们的哲学，那就是穷人的存在对于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付给穷人微薄的薪水是公正的。如果穷人得到了丰厚的报酬，他们就会去享乐而不再努力工作了。这是一种令人欣慰而又实用的想法，因为它正符合工厂主和其他有钱人的物质利益。

对这段时间的解读是非常有趣和有教育意义的，可以让我们明白许多道理。我们可以看到生产的机械化进程对经济和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整个社会结构被颠覆了，新兴阶级走到台前，掌握了权力；手艺人成了工厂中的工薪阶层。除此之外，新兴经济对人的思想同样产生了影响，甚至影响了人们对宗教和道德伦理的看法。一个群体的信仰与他们的利益或阶级情感是紧密相连的，他们会悉心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当他们一旦掌握了足够大的权力，便会制定法律来保护自己

的利益。当然，所有这些，从表面上看，都是符合高尚道德品质的，都是确保法律背后的唯一动机，就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我们印度已经领教够了在印度的英国总督和其他官员的虔诚和柔情。而同时他们用法令和刺刀统治着我们，压榨人民的血汗。我们印度的地主告诉我们，他们如何爱他们的佃户，但他们毫无顾忌地压榨佃户，勒索高额租金，直到佃户一无所有，饿死在荒野。我们的资本家和工厂主们也向我们保证，他们对我们是充满善意的，但是善意并没有转变成为工人们高一些的薪水和好一点的生活条件。所有的利润都用来兴建豪宅，而不是改善工人们住的泥土房。

令人惊叹的是，人们是如何为了自己的利益欺骗自己和其他人的呢？所以我们看到，在18世纪以及18世纪以后，英国的雇主们抵制所有试图改善工人命运的努力。他们反对工厂制定法律，反对住房改革，拒绝承认社会有义务消除贫困的根源。他们自我安慰般地认为，只有懒惰的人才会受苦。不管怎样，他们几乎不把工人当成像他们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他们还发展了一种称为“无干涉主义”的新哲学，也就是说，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可以为所欲为，不要政府的任何干涉。他们因为比别的国家更早一些开设工厂，所以占得了先机，他们所需的一切，就是可以自由自在地挣钱的领域。无干涉主义几乎成了一个令人敬畏的理论，对于任何想利用它的人，它都应该给予机会。每个男人和女人为了出人头地，都要与世界上的其他人斗争，如果很多人在斗争中倒下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在这些信里给你讲了，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上取得的进步，是文明发展的基础。但是，无干涉主义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带来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卡莱尔将其称为“猪的哲学”。是谁制定了生活和商业的新法律呢？不是工人们。可怜的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发言权，是上层那些成功的工厂主们，他们假借着荒谬感情的名义，不让人干涉他们的成功。因此，假借自由和财产权的名义，他们甚至反对私人住房的强制性卫生设备，并反对干涉产品掺假的行为。

我刚才使用了“资本主义”这个词。低水平的资本主义在所有国家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了——也就是说，工业是靠积累的资金来经营的。但是，随着大机器和工业化的到来，工厂的生产需要更大量的资金，这被称为“工业资本”。而“资本主义”这个词，现在被用来指工业革命之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制度。在这个制度下，资本家（也就是资本的拥有者）控制着工厂，赚取了利润。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资本主义遍布了全世界，除了现在的苏联，或许还有一两个其他的地方。从资本主义的最早期开始，它就强调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工业机械化带来了更大规模的生产，于是更多的财富被生产出来。但是，这些新的财富只属于极少数人——新兴工业的所有者。工人们依然贫穷。在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慢慢得到了一些提高，主要是因为英国对印度和其他地方的剥削。但是，工人分得的工业利润的份额是很少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解决了生产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如何分配创造出的新财富的问题。所以，有钱人和穷人之间自古以来就一直在斗争，而现在斗争变得更加尖锐了。

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的下半叶，这正是英国人在印度和加拿大打仗的时候，同时也是“七年战争”发生的时候。这些事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对彼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印度公司及其雇员（你应该记得克莱武），在普拉西之战以后，从印度勒索了巨额的钱财，这些钱财对于开创新兴工业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在前面告诉过你，工业化在起初阶段的花费是异常巨大的。有一段时间，它吞噬了很多钱，却没有任何回报。除非通过借贷或其他方式筹集到很多钱，否则的话，结果仍将是贫穷和苦难，直到企业开始运转，开始挣钱为止。英国特别幸运，正当最需要钱来发展工业和兴建工厂的时候，它得到了从印度勒索来的巨额金钱。

工厂建起来之后，新的需求出现了。工厂需要原材料来制造产品。所以，要生产布匹，就需要棉花。更加必不可少的是新的市场，这样一来，工厂制造的新产品可以在那里出售。英国是最早开始建工

厂的国家，在这一点上，它远远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头。尽管它领先了，但是对它而言，发现新市场原本也是很困难的事情，但又一次印度解救了它，尽管是很不情愿的。在印度的英国人使出了各种诡计和手段，破坏印度的工业，强行把英国的布匹卖到印度去。关于这个问题，我后面还会谈得更多一些。同时，重要的是，你要注意，英国人通过控制印度，并强迫它配合英国的计划，从而帮助了英国的工业革命。

到了19世纪，工业主义遍布了世界各地，资本主义工业在其他地方也按照英国制定的总方针发展起来了。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新的帝国主义，因为到处都有制造业对原材料的需求，以及对出售制成品的市场的需求。获得市场和原材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占领整个国家。所以，在更强大的国家之间，开始疯狂地争夺新的领土。英国因为占领了印度，并且拥有强大的制海权，又一次占尽了优势。关于帝国主义及其丰厚的收益，我在后面还会再谈的。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英国越来越多地被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布匹大制造商、钢铁大亨、煤矿主所控制。

99 ——美国挣脱了英国的统治

我们现在来看看18世纪的第二场伟大的革命——美洲殖民地反抗英国的起义。这只是一场政治革命，不像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工业革命，或是紧跟其后发生的、动摇了欧洲社会基础的法国大革命那么至关重要。然而，这次发生在美洲的政治剧变也很重要，而且注定要产生重大的结果。美洲殖民地赢得了自由，当年的美洲殖民地已经发展成为当今全世界最强大、最富裕、工业最先进的国家。

你还记得五月花号吗？就是那艘于1620年载着一批新教教徒从英国来到美洲的船。他们不喜欢詹姆斯一世的独裁统治，也不喜欢他的宗教，于是这些从那时起就被称为“清教教徒前辈移民”的人，抖掉脚上的英国灰尘，来到大西洋彼岸的陌生土地上，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在这里，他们将有更多的自由。他们在北美洲登陆，把登陆的地方称为“新普利茅斯”。在他们之前，已经有殖民者造访了北美洲沿岸的其他地方。然后又有许多人跟随他们而来，后来一个个小殖民地遍布了从北向南的整个东海岸。这里既有天主教的殖民地，也有英国保皇党（Cavalier）贵族建立的殖民地，还有贵格会（Quaker）教徒的殖民地——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就是以贵格会教徒潘恩（Penn）的名字命名的。这里还有荷兰人、德国人、丹麦人和博尔纳（罗马）的法国人。他们是个混杂的人群，但是，英国殖民者的人数占绝对优势。荷兰人建起了一座城市，称为“新阿姆斯特丹”。后来，英国人占领了新阿姆斯特丹，将其更名为“纽约”——现在可谓大名鼎鼎了。

英国殖民者还继续承认英国国王和议会。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背井离乡，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在那里的境遇不满，对国王和议会的所作所

为也不以为然。但是，他们并无意脱离英国。南方的殖民地包括国王的保皇党和支持者，所以他们和英国的关系更为密切。各个殖民地各自过着自己的日子，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到了18世纪，在东海岸的殖民地已经达到了13个，全部都在英国人的控制之下。在它们的北边是加拿大，南边是西班牙的领地。荷兰人、丹麦人和其他人建在13个殖民地中的居留地都被吞噬了，也处在英国的控制之下。但是要记住，这些殖民地只是沿着东海岸向内陆延伸的一片区域。在这片区域以外，向西一直延伸到太平洋的大片土地，比13个殖民地面积的总和还要广阔10多倍。这些地区没有被任何欧洲殖民者占领，红印第安人的各种部落或民族居住并控制着这些区域。他们中的主要民族是易洛魁人（Iroquois）。

在18世纪中期，你应该记得，英国和法国之间发生了全世界范围的战争，被称为“七年战争”（1756——1763年），它不仅发生在欧洲，也发生在印度和加拿大。英国得胜了，法国只好拱手把加拿大让给了英国。于是，法国便从美洲被驱逐出去了。就这样，英国就控制了北美的所有殖民地。只有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Quebec）还有一些法国人，除此之外，英国人在北美殖民地占绝对优势。奇怪的是，魁北克至今仍然是一个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包围着的法国语言和文化的小岛。我相信，在魁北克省的最大城市蒙特利尔[Montreal，名字来自皇家山（Mont Royal）]，说法语的人比除巴黎之外的任何其他城市都要多。

我在之前的一封信里曾跟你谈过欧洲国家进行的奴隶贸易，就是把黑人从非洲掠到美洲的贸易。这种恐怖的贸易主要控制在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英国人的手中。美洲需要劳动力，尤其是在南方各州，很大的烟草种植园发展起来了。当地的土著，所谓的红印第安人，是游牧民族，他们不愿意定居下来，而且，他们拒绝在奴隶制的束缚下干活。他们宁死也不愿意给英国人干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真的死在了英国人手里。大多数印第安人在新环境中死去，他们

的种族也几乎被灭绝了。这个曾经统治整个美洲大陆的人群，今天已经所剩无几了。

由于红印第安人不愿意在种植园里干活，所以劳动力便严重不足。那些不幸的非洲人在可怕的追猎中被捕获，然后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残忍方式被运到大洋彼岸的美洲。这些非洲黑人被带到南方的几个州——弗吉尼亚州、卡罗莱纳州（Carolina）和佐治亚州（Georgia）——他们被迫成群地在大种植园，主要是烟草种植园里劳作。

北方各州的情况不同于南方的情况。乘坐五月花号轮船前来美洲的清教教徒前辈移民带来的古老的清教教徒传统在这里还十分盛行。这里有密集的小农场，但没有像南方那样巨大的种植园。这些农场不需要奴隶，或者大量的工人。由于不缺乏新的土地，所以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农场，成为自己的主人。因此，在这些早期的开拓者中间滋生出了一种人人平等的情感。

我们看到，在这些殖民地有两种并存发展的经济体制：一种是北方的经济体制，以小农场和一些平等观念为基础；另一种是南方的经济体制，以大种植园和奴隶制为基础。红印第安人在这两种体制里都没有立足之地。所以，这些美洲大陆的原住民，慢慢地被驱赶到大陆的西边。红印第安人自己内部之间不断发生争端和分裂，使他们被驱赶的过程变得更加容易了。

英国国王和许多英国的大地主在这些殖民地都有很多利益，尤其在南方。他们拼命地剥削压榨这些殖民地。在“七年战争”之后，他们尤其要从美洲殖民地大量搜刮钱财。英国的议会是被大地主所控制的，所以十分乐意去剥削殖民地，也很支持国王。他们对美洲殖民地强征暴敛，对贸易却多加限制。你应该记得，在这个时期的印度，孟加拉地区的英国人也开始了对印度的残酷剥削，并给印度的贸易活动设置了各种障碍。

美洲的殖民地居民反对这些强加给贸易的限制和新税制，但是，英国政府在“七年战争”胜利之后，觉得自己已经十分强大，充满了自信，丝毫没有在意殖民地居民的反对之声。然而，“七年战争”也教会了殖民地居民很多事情。来自不同殖民地或不同州的人们相遇，并相互认识了。他们和英国的正规军一起与法国军队作战，所以他们对打仗和可怕的战争游戏都很熟悉。殖民地居民这一方是不愿意忍受冤屈和不公正待遇的。

1773年，英国政府试图强行把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卖到美洲殖民地去，于是美洲殖民地的情况发展到万分危急的时刻。英国许多有钱人都在东印度公司持有股份，所以他们很关注公司的命运。而政府会受他们的影响，有可能政府官员们自己就参与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所以政府非常支持鼓励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为公司将茶叶运往美洲出售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这样就对殖民地当地的茶叶贸易造成了冲击。1773年12月，当东印度公司试图在波士顿卸下茶叶时，遭到了抵制。一些殖民地居民化装成红印第安人，登上茶船，当着一大群同情和支持者的面，把茶叶倾倒进了大海。这是对英国的挑战，而挑战最终演变成了奋起反抗的殖民地和英国之间的战争。

历史从来不会精确地重复自己，但有时候它也惊人地相似。1773年发生在波士顿、把茶倾倒入海里的事件已经闻名于世了，它被称为“波士顿倾茶事件”。而两年半之前，圣雄甘地开始了他的食盐进军运动（Te Salt March）；前往丹迪（Dandi）的长征，以及盐突袭运动，都让许多美国人想起了他们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并将它和新的“食盐事件”相提并论。但是，当然，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

一年半之后的1775年，英国和它的美洲殖民地之间爆发了战争。这些殖民地是为什么而战的呢？不是为了独立，不是要从英国分离出去。即使当战争已经开始，双方都有伤亡的时候，殖民地居民的领袖

们还继续称英国的乔治三世为他们的“最仁慈的君主”，并把自己当成是他的忠实臣民。这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你会发现，同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在荷兰，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仍被称为君主，尽管他们正在与他的军队进行惨烈的战争。只是在经过了许多年的战争之后，荷兰才被迫宣布独立。印度在经历了多年的疑惑、踌躇、纠结于自治领（Dominion）或诸如此类的想法之后，国会于1930年1月1日宣布支持独立。即使现在还有一些人似乎很害怕独立的想法，还在谈论着在印度实行自治领统治的制度。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而且荷兰和美国的实例已经让我们知道，这种斗争的结果只能是独立。

1774年，美洲殖民地和英国的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华盛顿说，整个北美洲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希望独立。然而，华盛顿最后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任总统！1774年，在战争开始之后，大陆会议的46位主要代表作为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忠实臣民，给国王写信，请求和平，希望停止“流血”冲突。他们热情地渴望英国和它的美国孩子之间能恢复和谐友好的关系。他们所请求的一切不过是某种程度上的自治政府而已，而且他们用华盛顿所说的话宣布，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愿意独立。写给国王的这封请愿信，被称为“橄榄枝请愿书”。

但是，在不到两年之后，这封请愿书的签署人中，有25位又签署了另一个文件——美国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所以，殖民地在最初开始战争的时候，并不是为了独立。他们对税制以及对贸易的限制不满，提出英国议会无权不经殖民地人民的同意就向他们征税。他们喊出的著名口号是“无代表，不纳税”，而他们在英国议会里是没有代表的。

殖民地居民没有军队，但是在任何必要的时候，他们都有广袤的土地可以撤退，可以依赖。他们建立起了一支军队，华盛顿最终成了他们的总司令。他们赢得了一些胜利。法国或许认为，攻击它的老对

手英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加入了殖民地一方。西班牙也向英国宣战了。现在，情况对英国十分不利，但是战争拖延了很多年。1776年，殖民地签署了著名的《独立宣言》。1782年，战争结束，交战双方于1783年签订了《巴黎和约》（*Peace of Par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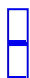
就这样，13个美洲的殖民地成了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各州之间相互猜忌，都认为自己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共同国家的情感是逐渐形成的。它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并且在继续向西扩张。它也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共和国，小国瑞士是唯一的另一个真正的共和国。荷兰尽管也是共和政体，但由贵族控制。英国不仅是一个君主制国家，而且它的议会还掌握在少数富裕的地主阶级手中。所以，美国这个共和国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它没有历史，而欧洲和亚洲的国家都是有历史的。除了南方的种植园制度和奴隶制之外，它也没有封建残余。它也没有世袭的贵族。所以，没有什么障碍能阻止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发展，于是资产阶级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美国在独立战争时的人口还不到400万人，而两年前的1930年，它的人口数已接近1.23亿了。

乔治·华盛顿成了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他本是弗吉尼亚州的大地主。被看作共和国缔造者的、这个时期的其他伟人还有托马斯·潘恩（Tomas Paine）、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托马斯·杰斐逊（Tomas Jefferson）、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本杰明·富兰克林不仅是一位特别杰出的伟人，还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在雷雨天里放风筝，以此证明了云里的闪电也是电。

1776年签署的《独立宣言》说："人人生而平等。"如果分析一下，这句话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因为有些人柔弱，有些人强壮，一些人比其他一些人更聪明、能干。但是这句话所蕴含的思想非常清楚明

了，值得赞扬。殖民地居民想废除欧洲不平等的封建制度，这就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进步。也许《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中，有许多人受到了从伏尔泰和卢梭开始、18世纪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影响。

“人人生而平等。”——但是，美国还有可怜的黑人，他们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奴隶！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怎样才能适合这种体制呢？他们不适合，而且至今仍不适合这种体制。许多年之后，南方和北方之间爆发了残酷的战争，废除了奴隶制。但是在美国，黑人问题依然存在。



第四卷
激荡的1 9世纪

100 ——巴士底监狱的陷落

我们已经简单地回顾了18世纪的两次大革命。在这封信里，我要给你讲讲第三次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在这三次大革命中，法国大革命是最惊心动魄的。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虽然具有广泛的重要意义，但它是逐渐地、在几乎不为大部分人所知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当时很少有人真正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则是如晴天霹雳一般突然爆发，震惊了整个欧洲。欧洲当时还处在一群君主和皇帝的统治之下。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早已经不再行使职权，但是它仍然在理论上存在着，而且它的幽灵仍然在欧洲上空投下长长的阴影。在这样一个充斥着国王、皇帝、宫廷和宫殿的地方，从广大人民中间冲出了这个奇怪的、令人生畏的怪物，它毫不理会那些老掉牙的习俗和特权，把国王从他的宝座上拉下来，其他人因为害怕相同的命运，也被吓破了胆。欧洲的国王和特权阶级长期忽视和压榨广大人民群众，那么，他们在奋起起义的人民面前瑟瑟发抖，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法国大革命如同火山一样爆发了。然而，无论是革命，还是火山，都不会毫无理由、不经过长期的演变就突然爆发的。我们看见了火山突然爆发，感到无比震惊。但是，在地球表面之下，很多力量长期地相互作用，火力聚集在一起，直到表面的地壳再也压制不了它们的时候，它们的巨大火焰便喷薄而出，冲向天空，熔化的岩浆顺着山边流淌下来。那么，最终在革命中爆发的力量，在社会表面之下，长期酝酿的情况更是如此。水被加热就会沸腾，但你知道，它是在变得越来越热之后，才达到沸点的。

思想和经济形势成就了革命。愚蠢的当权者对所有不符合他们想法的事物都视而不见，认为革命是由鼓动革命的人引起的。鼓动者是那些对现状不满的人，他们渴望变革，并为此不懈地努力着。每一个革命的时代都不乏这样的鼓动者，他们自己就是骚动和不满的产物。但是，成千上万的人民不会仅仅因为一个鼓动者的召唤就行动起来，大多数人还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他们是不会愿意冒着失去已经拥有东西的危险去做什么的。但是，当经济状况使他们的生活一天天变得更加痛苦，几乎成了无法忍受的负担时，那么，即使很软弱的人也愿意铤而走险。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他们才会去倾听鼓动者的声音，鼓动者似乎为他们指出了一条脱离苦难的路。

在我的许多封信中，我都提到了人民的痛苦以及农民起义。在亚洲和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出现了农民起义，结果是流血杀戮和残酷的镇压。农民的苦难生活迫使他们采取了革命的行动，但是，他们通常对自己所要达成的目标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因为他们思想模糊，缺乏一个思想体系，所以他们的努力经常是以失败告终的。在法国大革命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新事物，无论如何，它影响的范围很大——那就是革命行动的经济驱动力与思想信念的结合。只要有了这样的结合，就会发生真正的革命，而一场真正的革命会对生活和社会的整个结构——政治、社会、经济和宗教等方面——产生影响。我们看到，在18世纪最后的几年里，这一切在法国都发生了。

我已经告诉过你，法国国王穷奢极侈，昏庸无能，腐化堕落；而广大的人民大众却一贫如洗。我还告诉过你，在法国人民的心中，充满了不安和躁动；还有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和许多人点燃了新思想的火焰。因此，有两个过程——经济的贫困和新的思想体系的形成——它们同时发生并相互作用着。建立起一个民族的思想体系是需要漫长的时间的，因为新的思想必须逐渐渗透到他们的心中，而且很少有人愿意放弃他们固有的偏见或观念。通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建立起来，但是当人民最终接受了一系列新思想的时

候，这些思想本身又有点儿过时了。有意思的是，18世纪法国哲学家的思想是以欧洲工业化以前的时代为基础的；然而，几乎就在那个时候，工业革命在英国开始了，它正在大大地改变着工业和生活，事实上，它颠覆了很多法国新理论的基础。工业革命的确是后来才发生、发展的，法国的哲学家当然不可能猜想到将来要发生什么。然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们的思想为基础的，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到来，他们的思想有一部分已经过时了。

尽管如此，很显然，这些法国哲学家的思想和理论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以前也有过很多人民群众发动的起义和暴动；而现在这是一次非凡的、有意识的群众运动，或者说是在意识引导下的群众运动。所以，法国大革命是有很重大意义的。

我已经告诉过你，路易十五于1715年继承了他的曾祖父路易十四的王位，统治了法国59年。据说，他曾说过："我死之后，管它洪水滔天。"他也是依此想法行事的。他及时行乐，却把国家带入了深渊。他没有从英国革命及英王被斩首中汲取教训。1774年，他的孙子继承了他的王位，称路易十六，他是个极其愚蠢、脑残的家伙。他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e），是哈布斯堡的奥地利帝国皇帝的妹妹，她也十分愚蠢，而且顽固、执拗，路易十六完全是在她的掌控之下。她的"君权神授"思想甚至比路易十六还要根深蒂固，她憎恨广大的人民。他们夫妻二人的所作所为使人民对君主制度深恶痛绝。法国人民即使是在大革命开始之后，对于君主政体的问题，也没有清晰的看法。是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愚蠢行为使得共和国成了不可避免的结果。然而，即使更聪明的人对此也无能为力。即便如此，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前夕，俄罗斯的沙皇和皇后的愚蠢行为仍然让人感到惊诧。很奇怪，这些人在危机加深的时候，怎么会变得更加愚蠢，以致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呢？在拉丁语里有一句名言正合适他们——"神欲摧毁者，必先乱其心智。"在梵语里，也有几乎完全相同的名句。

君主制和独裁的后盾之一往往是军队。每当国内有了麻烦，国王或政府的小集团就会动心思，派军队去国外进行军事冒险，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但在法国，军事冒险的结果都不尽如人意。“七年战争”对法国来说意味着失败，因而对君主制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法国的专制制度越来越快地走向了崩溃。而法国参加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就意味着更多的花费，所有这些钱从哪里来呢？贵族和神父是特权阶层，可免征大部分的税收，他们也无意放弃他们的特权。然而，为了还债，还为了宫廷的挥霍无度，必须要筹集资金。那么广大的平民百姓呢？我从英国作家卡莱尔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中，引用一段对他们的描写。你会注意到，他的写作风格与众不同，但是，他笔下的画面往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 劳动人民的情况很糟。不幸的人啊！他们大概有2000万至2500万人。然而，我们却把他们归并在一起，成为一个黯淡、简单的整体，可怕却黯淡，在远处的一群乌合之众；或者更加人性地表达为“平民”。的确是平民；然而，奇怪的是，如果你努力地发挥一下想象力，跟随他们到辽阔法国的各个角落，进入他们的泥土茅舍，进入他们的阁楼和棚屋，平民包含了各种成员。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伤心事和悲哀；他们被自己的皮肤包裹着，站立在那里，但你只需轻轻一捏，他就鲜血淋淋。

这描述多么贴切，不仅适合1789年的法国，也适合1932年的印度！难道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不就是把印度的“平民”，几千万的农民和工人，归并在一起，把他们看成不幸的、粗劣的野兽吗？很久以来，他们就一直是驮兽，而且现在仍然还是。我们“同情”他们，屈尊俯就地谈论为他们做慈善。然而，我们几乎没有把他们看成个体和人类，和我们没什么差别。应该记住，在他们的茅草房里，他们有各自的生活，他们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会感觉到饥饿、寒冷和痛苦。我们的许多政客学习法律，思考和谈论着宪法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却忘

记了宪法和法律的制定是为了人民的。政治对于几千万住在茅草房和城市贫民窟的居民而言，就意味着饥饿者的食物、衣服和栖身之所。

法国，在路易十六的统治之下。在他的执政之初，就发生了饥民的暴动，持续了很多年，之后有一段间歇，接着又爆发了新的农民起义。在第戎（Dijon）的一次饥民暴动时，市长告诉饥饿的人们："青草已经长出来了，到草地上去吃草吧！"大批的饥民成了职业乞丐。1777年，官方正式宣布，法国的乞丐数量达110万。想到这样的贫穷和苦难，我们便不可避免地会想到印度！

农民们不仅迫切地想要食物，也迫切地想得到土地。在封建制度下，贵族是土地的主人，他们大部分的收入都来自土地。农民们没有清晰的思想和明确的目标，但是，他们想拥有自己的土地，痛恨压榨他们的封建制度，痛恨贵族和教士，还有（我又想到了印度！）盐务税或盐税，因为它给穷人带来的负担最为沉重。

这就是农民的境遇，然而国王和王后还在不断叫喊着要钱。政府已经没钱消费了，债务不断增长。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戏称为"赤字夫人"。

可是已经没有办法筹到更多的钱了。最后，路易十六黔驴技穷，于1789年5月召开法国议会会议。法国议会包括来自三个阶级的代表，或者称为王国的三个社会阶层：贵族、教士和平民。那么，就其组成来看，它与英国议会没什么差别，英国议会的上议院包括贵族和教士，还有下议院。但是，这两者之间有很多的不同。英国议会几百年来基本上定期召开会议，其传统、规则和工作方法已经完全被接受了。而法国议会很少召开会议，也没有传统。两个议会都代表上层阶级的利益，英国议会的下议院比法国议会的下议院更是如此。但是，两个议会都没有人代表农民的利益。

1789年5月4日，在国王的主持下，法国议会在凡尔赛宫召开了。但是很快，国王就后悔把这三个社会阶层的代表召集到一起了。第三阶层——也就是平民或中产阶级——开始不服管束，坚称不经他们同意不能征税。他们的前面有英国做榜样，在英国，下议院已经确立了这个权利。最近，美国也成了他们的榜样。他们极其错误地认为，英国是个自由的国家。事实上这是个错觉，因为英国是由贵族和地主阶级控制和统治着的。议会本身就被他们垄断了，因为选举权——也就是投票权是十分有限的。

然而，尽管第三阶层或平民阶层能做的并不多，但是对国王路易十六而言，已经太多了。他把他们赶出了会议厅。代表们并不想离开，便立刻聚集在附近的网球场上，并宣誓，不制定出一部宪法决不解散。这就是所谓的“网球场誓言”。接着，危急时刻到来了，国王试图使用武力，但是，他自己的士兵拒绝执行他的命令。在一场革命中情况总是如此，当作为政府主要后盾的军队拒绝向人群中他们的教友们开枪射击的时候，就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路易十六惊恐万分，做出了让步，但是后来，他又像以往那样愚蠢，搞阴谋诡计，暗中调集雇佣兵团来镇压自己的人民。法国人民终于忍无可忍了，在1789年7月14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他们在巴黎开始暴动，占领了古老的巴士底监狱，释放了关押在里面的犯人。

巴士底监狱的陷落是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法国大革命从此开始了；它成了全国革命的信号，各个城市的民众都起来暴动了；它意味着法国的旧秩序、封建制度和大君主制以及特权的结束；对于欧洲所有的国王和皇帝而言，它是可怕的不祥之兆。法国，这个曾经为大君主们树立了榜样的国度，现在又树立了新的榜样，让欧洲大为惊愕。有些人被吓得魂不附体，但是很多人从中看到了希望和更好的日子。7月14日，直到今天，仍然是法国的国庆日，每年全国各地都要纪念这个日子。

7月14日，巴士底监狱落入了巴黎民众的手中。然而，那些当权者对人民如此漠视，甚至7月13日还在凡尔赛宫举行盛宴。他们在国王和王后面前唱歌跳舞，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庆祝即将到来的、镇压巴黎暴民的胜利。奇怪的是，在欧洲，君主制的思想是多么根深蒂固啊。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共和制了，几乎不会把国王当回事儿。世界上仅剩下的几位国王也会十分谨小慎微地行事，唯恐厄运降临在他们身上。即使如此，大多数人还是反对君主政体的，因为它保留了阶级分裂、鼓励特权和势力的思想。但是，在18世纪的欧洲情况并非如此。对于那时的人们来说，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是有点儿难以想象的。因此，尽管路易十六如此愚蠢，并企图反抗，但是仍然没有人想要罢免他。人们又忍受了他和他的阴谋诡计近两年的时间。直到他企图逃跑，后来被抓了回来，法国才决定除掉国王。

但这些都是以后的事了。同时，法国议会变成了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国王应该成为君主立宪的君主，或者是君权受到限制的君主——也就是说，国王要听命于国民议会。但是，路易十六对此十分憎恨，玛丽·安托瓦内特更是无比震怒，而巴黎人民也憎恨他们，并怀疑他们在耍各种阴谋手段。凡尔赛宫那时是国王和王后的王宫，但它距离巴黎太远了，首都的人民无法监督他们。另外，关于凡尔赛宫盛宴和奢华故事的传闻也使饥饿的巴黎人民愤愤不平。所以，国王和王后在一个最为奇怪的队列里，被带到了巴黎的杜伊勒里宫（Tuileries）。在下一封信里，我将继续讲法国大革命的故事。

101 ——法国大革命

我发现，给你写法国大革命的事有点困难。这不是因为缺少材料，而是因为关于它的材料太多了。法国大革命是一出令人惊叹、情节不断变化的戏剧，充满了令人惊奇的事件，至今还让我们着迷，使人震惊，令人兴奋。国王和政治家们的政治活动是躲在壁橱和私密房间里进行的，充满了神秘感。面纱小心翼翼地遮住了许多的罪恶，而正派得体的语言则掩饰了对立双方的野心和贪婪。即使当冲突导致了战争，无数年轻人为了他们的贪婪和野心被派到战场上送死时，还是没有人会提到战争之平庸而低下的动机，因而人们也就不会为此愤怒了。而且他们会告诉我们，高尚的理想和伟大的事业值得我们做出一切牺牲。

但是，革命是完全不同的。它扎根于大地、街道和市场，它的方法也是简单粗暴的。而发起革命的人也没有君主和政治家们那样受教育的有利条件。他们的语言也非温文尔雅、正派得体，可以隐藏许多诡计和邪恶的图谋。他们没有什么神秘可言，没有面纱来遮挡他们的思想，他们甚至衣不遮体。大革命中的政治不再是国王或者职业政客的游戏。革命面对很现实的问题，政治的背后就是赤裸裸的人性，还有饥民们的空腹。

所以，在法国，这个命运攸关的五年，从1789年到1794年，我们看到饥饿的民众开始行动了。是他们迫使胆小的政客们采取行动，废黜了君主制度、封建制度以及教会的特权。是他们向可怕的断头台致敬，对那些过去镇压他们的人和那些疑似对他们新获得的自由进行阴谋破坏的人，实施了残酷的复仇。正是这些衣衫褴褛、赤着双脚的人，拿起简易的武器，冲向战场，捍卫他们的革命，赶走了欧洲联合

起来与他们作战的、训练有素的军队。法国人民创造了奇迹。但是，经历了几年可怕的过度紧张以及长期的战争之后，大革命耗尽了能量，并转向自己，开始吞噬自己的成果。接着反革命的力量反扑回来，吞噬革命成果，把那些公然反抗的、受苦受难的平民百姓又扔回到“上等”阶级的统治之下。但是，无论是反革命的力量，还是拿破仑，都无法让人民回到过去的位置了。没有人能够把大革命的重要成果一笔勾销，也没有人能够从法国人民，事实上，还有欧洲其他民族的人民心中抹去对那些激情岁月的记忆，在那些日子里，社会底层的人们挣脱了枷锁，即使只是在一段时间里。

在大革命的初期，有很多党派和组织在争夺领导权：有保皇党成员，他们一心希望路易十六继续做一个有绝对王权的国王，当然他们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有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想要制定一套宪法，并保留国王作为权力受限的君主；有温和的共和派——吉伦特派（Gironde）；还有更加极端的共和派——雅各宾派（Jacobins），因过去常常在雅各宾修道院集会而得名。这些是主要的党派和组织，在这些组织里，以及在这些组织之外，还有很多的冒险家。在这些组织和个人的后面，是法国的广大群众，尤其是巴黎的民众，他们在许多来自他们各自阶层的不知名领袖的领导之下。在国外，尤其在英国，有一些逃避大革命的法国流亡贵族，他们不断地密谋围剿大革命。欧洲各国都加入了围剿法国大革命的行列。由贵族统治的英国的议会，以及欧洲大陆的国王和皇帝们，对这个异国的平民暴动都同样害怕，都试图去镇压它。

保皇党和国王的阴谋，只是让自己毁灭得更快了。起初在国民议会里，最重要的党派是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想要的是基本上像英国和美国那样的宪法。他们的领袖是米拉波（Mirabeau）。近两年的时间，他们在国民议会里掌权，对于大革命初期取得的胜利兴奋不已。他们勇敢地发表了很多宣言，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在1789年8月4日，巴士底监狱陷落的20天后，在国民议会里发生了戏剧性的

一幕。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废除封建制度的权力和特权的问题。那时的法国有一种气息深入了人心，即使是封建地主，有一段时间，也似乎陶醉于自由这杯新的美酒里。大贵族和教会的领导人在会议大厅里纷纷起身，相互争论关于放弃他们的封建权力和特权的问题。这是一种诚实和慷慨的姿态，尽管有很多年它都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有时候，但很难得，这种慷慨的冲动会感动某个特权阶层；或许他们意识到，特权即将结束，高尚慷慨的行为才是最好的做法。就在几天前，我们看到了印度的印度教教徒做出这样一种非凡的姿态，这是因为甘地绝食，要求消除贱民阶层，这就如同魔术师挥动了魔棒，在整个土地上掀起浪潮。印度教束缚许多教友的枷锁，从某种程度上被打碎了，无数曾经在几百年里拒这些贱民于千里之外的大门，现在向他们敞开了。

所以，在革命激情的浪潮中，法国大革命的国民议会至少是以革命的方式，废除了农奴制、特权、封建法庭、对贵族和教士免除税收的税制甚至贵族的头衔。奇怪的是，尽管国王还保留着，但是贵族已经失去了头衔。

接下来，国民议会通过了《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这个著名宣言的理念可能取自美国的《独立宣言》。但是美国的《独立宣言》言简意赅，可法国的这个宣言很长，而且很复杂。人权是要保障人们享有平等、自由和幸福的权利。《人权宣言》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勇敢而大胆的，在后来的近100年间，它成了欧洲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共同纲领。然而，今天它已经过时了，并不能解决我们当今的任何问题。人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发现，只是法律面前的平等和选举权，并不能保障真正的平等、自由和幸福，那些当权者还有其他方法剥削人民。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政治思想进步了，发生了很大改变，也许甚至今天的大多数保守派人士也接受了《人权宣言》里高调动听的原则。但是，我们不用太费力气就能看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给予人民真正的平等和自由。《人

权宣言》确实保护了私有财产。由于与封建权力及特权相关的其他原因，大贵族和教会的财产被没收了。可是私人财产本身被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你也许知道，现在进步的政治思想认为，私人财产是邪恶的，应该尽可能地彻底废除。

《人权宣言》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似乎是个很平常的文件。昔日勇敢的想法，到了今天往往会变得稀松平常。但是，在当时，人们称颂它震撼了整个欧洲，它似乎给所有受苦受压迫的人们带去了充满希望的美好未来的许诺。但是国王并不喜欢它，他对这样亵渎的言辞感到震惊，拒绝批准它。那时他还在凡尔赛宫。就是在此时，巴黎的暴民在妇女的领导之下，来到凡尔赛宫。他们不仅迫使国王批准了《人权宣言》，还逼迫他去了巴黎。这就是我在上封信结尾的时候提到的“奇怪的队列”。

国民议会还带来了许多其他的改革。国家没收了教会的大片地产。法国的行政区被重新划分，分为80个行政区；没错的活，这种划分一直沿用至今。更好的法庭建立了起来，取代了老的封建法庭。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它没有走得更远。它没有给渴望土地的农民和城镇里渴望面包的平民带来很多的好处。革命似乎停滞不前了。我已经告诉过你，广大人民，农民和城镇的平民，在国民议会里根本没有代表他们的人。国民议会是由中产阶级控制、由米拉波领导的；一旦他们觉得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他们就竭尽全力阻止革命。他们甚至开始与国王路易十六结盟，在各省镇压农民。他们的领袖米拉波实际上成了国王的秘密顾问。而冲击并占领巴士底监狱的平民，原以为他们从此挣脱了锁链，现在却变得不知所以了。他们的自由似乎还是和过去一样遥不可及，新的国民议会几乎和过去的地主一样，继续压迫他们。

巴黎是法国大革命的心脏，但巴黎人民在国民议会里遭到了挫败。于是，他们为自己的革命干劲找到了另外一个出口，这就是巴黎

革命委员会，或巴黎市政局。不仅有巴黎革命委员会，而且城市的每个地区都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组织，直接和广大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而每个地区都选出几个巴黎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尤其是各个地区的委员会，成了大革命的旗手，也是温和的中产阶级国民议会的对手。

与此同时，攻克巴士底监狱的纪念日到了，巴黎人民在7月14日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它被称为“联邦纪念日”；平民们进行了义务劳动，来装点城市，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纪念日是属于他们的。

1790年和1791年，大革命处于了停滞状态。国民议会已经丧失了革命的热情，也厌倦了变革；但是，巴黎人民仍然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农民仍然渴望得到土地。这种情况不可能持续太久，革命要么继续向前，要么逐渐消亡。温和派的领袖米拉波于1791年初去世了。尽管他曾与国王一起密谋，但他仍然是深得民心、压得住阵脚的。1791年6月21日，发生了一件决定大革命命运的大事件，这就是国王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乔装出逃事件。他们几乎设法到达了法国边境。但是，在凡尔登（Verdun）附近的瓦雷讷（Varennes），一些农民认出了他们。于是，他们被截住并被带回了巴黎。

对于巴黎人民而言，国王和王后的行为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现在，共和的思想已经得到了很快的发展，然而，当时的国民议会和政府却过于温和，与公众的思想感情相去甚远，他们继续镇压要求废黜国王路易十六的人。马拉（Marat），法国大革命的一位重要人物，因为在国王试图潜逃之后，谴责国王为叛徒，而遭到当局的追捕。他不得不躲藏在巴黎的地下道里，身上还感染上了可怕的皮肤病。

可奇怪的是，路易十六又当了一年多名义上的国王。1791年9月，国民议会的政治生涯结束了，让位于立法议会。但是立法议会和国民议会一样，都是温和派，也只代表上层阶级，不代表法国上升的革命

热情。这种革命热情只在广大人民和极端的共和派雅各宾派之间蔓延。来自人民的雅各宾派，其力量不断地壮大起来。

与此同时，欧洲列强在惊恐地观望着法国发生的一切。有一阵子，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都忙于在别处大肆掠夺。他们终结了古老的波兰王国。但是，法国大革命发展得太过迅猛，引起了他们的注意。1792年，法国与奥地利和普鲁士开战了。我要告诉你，尼德兰的比利时此时归属奥地利，而比利时与法国交界。外国军队进入了法国领土，打败了法国军队。人们有理由相信，国王与他们结成了联盟，而且人们怀疑，所有的保皇党都背叛了国家。法国已经危机四伏，法国人民变得更加激动，也更惊恐了。他们看到四处都有间谍和叛徒。就在危急关头，巴黎革命委员会掌握了领导权，他们举起了红旗，表明人民已经宣布了军事管制，以应对宫廷的背叛。1792年8月10日，他们下令进攻国王的宫殿。国王命令他的瑞士卫兵向人民开枪。但是，人民战胜了国王，取得了胜利。巴黎革命委员会迫使立法议会废黜并监禁了国王。

大家都知道，现在在各地，红旗都是属于工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旗帜。以前，红旗是对人民实施军事管制的官方旗帜。我认为，但并不确定，巴黎革命委员会使用红旗，是第一次代表人民一方使用的，也就是从这一次开始，它渐渐变成了工人的旗帜。

废黜和监禁国王还不够。因为国王的瑞士卫兵向巴黎人民开枪，杀死了很多人，这使得巴黎人民群情激愤，而他们对叛徒和间谍既害怕又气愤，所以他们四处抓捕可疑的人，并把他们投入监狱。这些被捕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无疑是有罪的，但是，许多无辜的人也遭到了逮捕和监禁。几天之后，他们又掀起了一阵狂暴的巨浪，把囚犯从监狱中带出来，在经过一个虚假的审判后，杀掉了大部分囚犯。在这次被称为“九月大屠杀”的行动中，有1000多人被杀。这是巴黎暴民们第

一次大开杀戒。但对于暴民而言，这是不够的，还要流更多的血才行。

也是在9月，法国军队第一次战胜了入侵的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这是在瓦尔密（Valmy）的一场小规模的战斗。战斗本身虽小，但是意义很重大，因为它挽救了大革命。

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召开会议。这是个新的机构，取代了国民议会。它比之前的两个机构都更加进步，但是，它仍然落后于巴黎革命委员会。国民公会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不久，开始了对路易十六的审判；路易十六被判处了死刑；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用自己的脑袋偿还了君主制的罪孽。他被推上了断头台——也就是在断头台上被斩首。法国人民现在已经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他们迈出了最后的一步，开始公然反抗欧洲的国王和皇帝们。对他们而言，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在洒满国王鲜血的断头台石阶上，大革命的伟大领袖丹东（Danton），向聚集的人群发表了演说，并向其他的国王发起了强烈挑战。“欧洲的国王们会向我们挑战，”他大喊，“那么，我们就把国王的头颅投向他们！”

102 ——革命和反革命

国王路易十六死了。但是，甚至在他死之前，法国就已经经历了惊人的巨变。法国人民的鲜血和革命的热情一起燃烧着；他们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充满了火焰一般的激情。法兰西共和国已被团团围住，其他的欧洲国家，那些君主政体的欧洲国家，则对法国群起而攻之。法兰西共和国要让这些没落的国王和君主们看看，在自由的太阳温暖下的爱国者是如何奋起抵抗的。他们不仅为了刚刚赢得的自由而战，还要为所有被王公贵族欺压的人们的自由而战。对欧洲的其他国家，法国人民向它们发出了信息，号召那里的人民起来反对统治者，并宣布自己是各国人民的朋友，是所有君主专制政府的敌人。法兰西，祖国，成了自由的母亲，在它的圣坛下，人民甘愿牺牲一切。在这个充满狂野激情的时刻，有一首美妙的歌曲诞生了，它正好和人民高涨的情绪协调一致，他们高唱着这首歌曲，奋勇向前，不顾任何危险，越过一切障碍，冲到前线。这就是鲁热·德·利尔（Rouget de Lisle）为莱茵的军队写的进行曲，从那时起就被称为《马赛曲》（*Marseillaise*），即使现在，它仍然是法国国歌。

起来！祖国的儿女们，

光荣的一天已经到来，

看啊，暴君对我举起血染的旗。

听啊，在我们的国土上，

凶残的士兵们咆哮着，

冲到你的身边，

屠杀你的孩子，
屠杀你的妻子。
拿起武器，同胞！
排好队伍，
前进，前进！
用敌人肮脏的血，
做农田的肥料！

他们不再唱那些敬祝国王万寿无疆的毫无意义的歌曲。他们歌唱对祖国和自由的神圣的爱。

祖国神圣的爱，
指引我们坚定地去复仇，
自由啊，可贵的自由，
和你的保卫者一起战斗吧！

当时物资极度匮乏，没有足够的食物、衣服、靴子和鞋子，甚至也没有足够的武器。许多地方要求市民们把自己的靴子和鞋子交给军队；爱国者们把许多种稀缺的食物让给了急需食物的军队；有些人甚至经常禁食。皮革和厨房用具，油炸锅、水桶以及许多其他的家庭用具都被征用了。在巴黎街道上的很多铁匠铺在为平民们锻造武器，甚至所有的公民，无论男女，都在帮助制造武器。尽管物资匮乏，可是有什么关系呢？美丽的祖国法兰西，虽然衣衫褴褛，但是头上戴着自由的皇冠，它现在正处在危险的时刻，敌人已经兵临城下。所以，法国的青年们冲向前去解救它，他们不在乎饥渴，向着胜利冲锋。卡莱尔说：“我们很少看到，整个民族都拥有一个信仰，除了对可以吃喝

以及可以触摸的东西以外。一旦整个民族有了一个信仰，那么它的历史就变得振奋人心，值得注意了。”这种对一项伟大事业的信仰占据了大革命中男男女女的心，他们在那些值得记忆的日子里创造的历史和做出的牺牲，仍然令我们激动不已。

由新兵组成的革命军队，尽管只经过简单的训练，却把所有的外国军队都从法国领土上赶了出去，然后又把低地尼德兰（包括比利时等国）从奥地利人的手中解救了出来。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次离开了尼德兰，再也没有回来。欧洲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们无法面对革命的新兵。受过严格训练的士兵是为钱而战的，所以打仗时胆小谨慎；而革命的新兵是为一种理想而战的，为了胜利，不畏艰险。欧洲的军队有大量的辎重，行动缓慢，而革命的军队没有带什么东西，行动很迅速。革命的军队是战争中一种新型的军队，他们在战争中采用了一种新的战术。他们改变了老的作战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在欧洲接下来的100年里，他们成了军队的模范。但是，这些军队的真正力量在于他们充满了热情，勇敢而无所畏惧。我们可以把丹东的名句当作他们的格言，事实上也可以当作这一阶段大革命本身的格言：“为了打败祖国的敌人，我们必须勇敢，更勇敢，永远地勇敢下去。”

战争在蔓延。英国因为它强大的海军而成了法国的强大敌人。法兰西共和国建立了一支伟大的陆军，但是，它的海上力量还很薄弱。英国封锁了法国的所有港口。还有法国流亡贵族从英国向法国倾泻了几百万假的法兰西共和国指券(Assignat)[注]或流通纸币。他们企图用这种方式毁坏法国的货币流通和金融秩序。

与外敌的战争是重中之重，国家的所有力量都投入到战争之中了。这样的战争对革命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它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关注社会问题转向了与国外敌人的作战，于是，革命的真正目标没有实现。战争的狂热替代了革命的狂热。在法国，情况就是这样的，而

且，我们将会看到，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就是一个伟大的军事指挥官的独裁统治。

在国内也有麻烦。在法国西部的旺代省（Vendee），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部分原因是那里的农民被拒绝加入新的军队，还有部分原因是保皇党领袖和流亡贵族从中作祟。大革命实际上是由巴黎的城市人民控制和指挥的，农民无法理解和领会发生在首都的快速变革，他们落在了后面。旺代省的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了。在战争期间，尤其是内战期间，最可怕、最强烈的情感被激发起来了，而同情心却成了无处安放的情感。在里昂发生了反革命暴动，也遭到了镇压。有人提议，为了惩罚里昂，要毁灭这座伟大的城市。“里昂向自由发起战争——里昂不能存在下去！”幸运的是，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是，里昂还是遭受了很多的惩罚。

而与此同时，巴黎的情况如何呢？谁在那里掌控局面呢？一个新选出的巴黎革命委员会和它在各个地区的部门仍然控制着城市的生活。在国民公会里，不同派别之间发生了争夺权力的斗争，主要是吉伦特派或温和的共和派，与雅各宾派或极端共和派之间的斗争。雅各宾派最后取得了胜利。1793年6月初，大部分吉伦特派的代表都被开除出了国民公会。现在，国民公会采取了废黜封建权力的最后一步，曾经属于封建地主的土地，交还给了当地的村社或者市政当局——也就是说，这些土地成了公共财产。

现在由雅各宾派控制的国民公会，任命了两个委员会——公共福利委员会和公共安全委员会——并给予了它们很广泛的权力。这两个委员会，尤其是公共安全委员会，很快就变得十分强大而恐怖了。他们一步一步推动着国民公会，最终让革命坠入了恐怖的深渊。恐惧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所有人：人们害怕包围着他们的外国敌人，害怕身边许多的间谍和叛徒。恐惧会使人盲目，孤注一掷，国民公会在这种不断萦绕于心的恐惧驱策下，于1793年9月通过了一个可怕的法令——

《嫌疑犯法令》（*Law of Suspects*）。受到怀疑的人就不会安全了，而谁不会受到怀疑呢？一个月之后，国民公会里的22名吉伦特派的代表被军事法庭审判，并很快被判处了死刑。

于是恐怖统治开始了。每天，一批批死刑犯被送上断头台；每天，被人们称为死囚押送车的大车，载着这些牺牲者，在圆石铺成的巴黎的街道上，吱嘎吱嘎，隆隆作响地驶过，人们在一旁嘲弄着这些不幸的人。即使在国民公会上发表反对统治派的言论也是很危险的，因为那会引起怀疑，而怀疑会招致审判，然后被推上断头台。国民公会是由公共福利委员会和公共安全委员会控制的。这两个委员会手上掌握着生杀大权，不愿意与别人分享权力。他们反对巴黎革命委员会。事实上，他们反对任何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权力用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能使人腐化。这些委员会开始着手镇压巴黎革命委员会。巴黎革命委员会以及它的各个部门，一直是大革命的支柱。他们先镇压了它的各个部门。在铲除了巴黎革命委员会的支柱以后，他们又镇压了巴黎革命委员会。就这样，革命常常会发生内讧，消耗自己的力量。在巴黎各地的委员会的部门，是革命的上层领导与民众联系的纽带；它们是血管，大革命鲜红的血液就是通过它们流动的。是它们给了大革命力量和生命。革命委员会及其各个部门在1794年初被镇压了，这意味着大革命生命的血管被切断了。从此以后，国民公会及其委员会就是高高在上的政府机构了，他们用恐怖手段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人民。这是革命阶段真正结束的开始。这种恐怖统治还要再持续6个月，革命还在继续着，但是，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

在这些暴风骤雨、血雨腥风的日子里，谁才是法国和巴黎的领导者呢？很多的名字都非常引人注目。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是他带领人民在1789年攻克了巴士底监狱，并在许多其他活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因为在恐怖时期，请求实行仁慈宽厚的政策，使自己被推上了断头台，几天之后，他年轻的妻子露西尔（Lucille），也被推上了断头台。她从容赴死，不愿独自苟活于世。

还有诗人法布尔·德格朗丁（Fabre d’ Eglantine），以及令人畏惧的公诉人富基埃-坦维尔（FouquierTinville）。马拉，也许是法国大革命中最伟大、最有才干的人，被一个名叫夏洛特·科黛（Charlote Corday）的年轻女人刺死了。丹东，我已经两次引用过他的话了，他是个勇敢的人，蓄着如狮子般蓬松的须发。他是个伟大的、广受欢迎的演说家，然而，断头台却是他的归宿。还有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他的名声最大。他是雅各宾派的领袖。实际上，在“恐怖统治”时期，他是国民公会的独裁者，几乎成了“恐怖统治”的化身，许多人一想到他就会不寒而栗。但是，他的诚实以及对祖国的热爱是毋庸置疑的，他以“不受腐蚀的廉洁之人”著称。尽管他生活简朴，却过度地以自我为中心，他似乎认为，所有与他意见相左的人都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叛徒。

法国大革命的许多伟人，罗伯斯庇尔的战友们，都在他的建议下被送上了断头台；直到最后，一直温顺、追随于他的国民公会发动了政变。他们称他为独裁者和专制暴君，将他斩首，从而结束了他的独裁统治。

所有这些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都是年轻人，革命很少是由老年人发起的。尽管这些大革命领袖的作用十分重要，但是，他们中间无论哪一位，甚至是罗伯斯庇尔，在这场气势恢宏的戏剧中都没有处于支配地位。在大革命结束之前，他们似乎就萎谢了；因为大革命并不是他们发起的，甚至也不是由他们控制的。发起和控制大革命的是历史上时而发生的、人类社会原始的大动荡，而社会形势以及长期存在的苦难和独裁统治，为大动荡做好了准备，这个过程尽管缓慢，却是不可避免的。

不要以为国民公会除了争吵和杀头之外，毫无建树。一场革命所释放出的能量总是无比巨大的。这些能量大多被对外的战争所吸收，但是，仍然还剩下很多的能量，因此有很多建设性的工作得以完成。

尤其是国家的整个教育体系被彻底革新了。现在学校里所有孩子学习的计量公制，就是在那时确定下来的，它简化了所有的重量以及长度和体积的计量单位。这种计量制现在已经传播到大部分的文明世界里，但是，保守的英国仍然固守着一个古老过时的计量制，诸如码、弗隆、磅和英担等。我们在印度不得不忍受这些繁复的长度和重量单位，还有锡厄和莫恩德等等。

作为公制的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一个新的法兰西共和历出现了。它是从1792年9月22日宣布共和国成立的那天开始的。一周七天被改为了十天，第十天是个假期。一年还是十二个月，但是它们的名字改了，诗人法布尔·德格朗丁为这十二个月起了新的令人愉悦的名字，并与季节相一致。春季的三个月份分别是芽月、花月、牧月；夏季的月份是获月、热月、果月；秋季是葡月、雾月、霜月；冬季是雪月、雨月、风月。但这个历法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终结之后不久，也就不再使用了。

有一段时间出现了一种很强的反基督教趋势，并提倡人们崇尚理性。真理之庙建了起来。这种趋势迅速传播到了法国各省。1793年11月，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自由与理性的盛大集会，理性被拟人化为一位美丽的女性。但是，罗伯斯庇尔在这种事情上总是很保守。他不赞成这样的活动，丹东也一样。雅各宾派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也反对这个活动，因此这次活动的领导者们被推上了断头台。在权力和断头台之间，没有妥协的方案。罗伯斯庇尔组织了另一个庆祝活动，作为对自由和理性集会的反驳——至高无上力量的大集会。通过国民公会的投票，最终决定，法国信仰至高无上的力量！罗马天主教又一次成了宠儿。

在对巴黎革命委员会及其巴黎各个部门的镇压之后，情况很快就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雅各宾派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控制着政府，但是他们发生了内讧。领导自由与理性大集会的埃贝尔

（Hébert）及其支持者被处死，是雅各宾派的第一次重大分裂。接着，法布尔·德格朗丁也被处死了；1794年初，当丹东、卡米尔·德穆兰和其他一些人抗议罗伯斯庇尔滥杀无辜之后，他们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1794年4月，丹东被仓促斩首，因为害怕有人干预。丹东之死对于巴黎和各省的人民而言，意味着法国大革命的结束。大革命的一头雄狮倒下了，权力落到了一个狭隘的小派系的手中。这个派系被敌人包围着，脱离了人民，所以到处看到的都是背叛，他们除了加强恐怖统治之外，已经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自救了。

所以恐怖统治更加剧烈了，驶向断头台的死囚押送车里挤满了比以往更多的死囚。6月，通过了一个新的法案——《牧月二十二日法案》（*Law of the 22nd Prairial*），该法案将散布谣言分裂和煽动人民以及暗中破坏道德规范、腐蚀公众良心的行为定为犯罪行为，并被处以死刑。依据这个法案的大网，所有与罗伯斯庇尔及其亲信意见相左的人都将被绳之以法。大批的人一起受审判刑——每一批受审人数多达150人，既有即决犯，也有保皇党和其他人混杂在一起，进行集中审判。

这种新的恐怖统治持续了46天。最后，在热月的9号（1794年7月27日），反抗发生了。国民公会突然发动政变，他们高呼“打倒暴君”的口号，逮捕了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支持者，他们甚至不允许罗伯斯比尔说话。第二天，死囚押送车将他拉到了断头台前，他曾把许多人送到这里。法国大革命就这样结束了。

罗伯斯比尔死后，反革命卷土重来。温和派占据了重要位置，现在，这些人向雅各宾派发起进攻，并对他们实行了恐怖统治。在“红色恐怖”（Red Terrors）之后，所谓的“白色恐怖”（White Terrors）又袭来了。15个月之后的1795年10月，国民公会解散，成立了由五名成员组成的督政府。这肯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而且它极力镇压平民。在督政府统治法国四年多的时间里，法兰西共和国拥

有崇高的威望和强大的力量，虽然也经历了很多的内部矛盾。它在对外的战争中也取得了胜利。其间也发生过一些叛乱，但是都被镇压下去了。其中一次叛乱是被共和国军队的一位年轻将军镇压下去的，他叫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他竟然向民众开了枪——这就是著名的“一阵霰弹”事件——枪杀了很多的平民。过去的大革命军队，竟被用来杀戮法国平民，那么很显然，革命连影子也没有剩下了。

这样，法国大革命结束了，理想主义者许多光明的梦想和穷人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然而，它已经达到了很多当初想要达到的目的。任何反革命都无法让奴隶制复活，甚至连法国的波旁王朝（Bourbons）卷土重来的时候，他们的国王们也无法收回已经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农村和城市的平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裕了。实际上，即使是在恐怖统治时期，他们也比大革命前的经济情况要好一些。恐怖统治并不是针对他们的，而是针对上层阶级的；虽然到最后，一些更贫穷的人仍然还在受苦。

法国大革命结束了，但是，共和的思想传遍了整个欧洲，随之传播出去的，还有在《人权宣言》里所宣布的基本信念。

---

1. 指券，1789年到1796年期间，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行的可当作货币流通的有价证券。指券是资产阶级掠夺国有资产、进行商业投机和掠夺下层群众的工具。——译者注

103 ——政府的运作方式

我已经有两周没写作了。我担心我变得松懈了。一想到我正在走近故事的结尾，我就有点儿退缩了。我们已经讲到了18世纪的末期，19世纪的100年还在等待着我们去审视，之后，我们还有20世纪的32年才能把我们带到今天。但是，这剩下的132年是需要颇费口舌的。因为它们离我们很近，所以在我们的头脑中印象非常深刻。对我们而言，它们似乎比早期的事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我们今天周围的许多东西，都能在这些年里找到根源。事实上，我要带你走过19世纪和更多年代的浓密森林，讲述其间发生的事件，这绝非易事。也许正是因此，我才要逃避！但是，我也在想，当我最终把人类的故事讲到1932年的时候，当过去融入现在，并停留在未来的阴影之前的时候，我还能做什么？亲爱的，到那时我还给你写些什么呢？我还能有什么借口，拿着笔坐下来，想着你，或是想象着你坐在我的身边，努力地回答你提出的很多问题呢？

关于法国大革命我已经写了三封信了——三封长信，讲述的只是法国历史上短暂的五年。在我们回顾历史的过程中，我们曾一步跨越几个世纪，一瞥扫过几个大陆。可是，这里，在法国，在1789年至1794年间，我们却逗留良久；你也许会惊奇地发现，我已经尽量做到简洁了，因为我头脑里装满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话题，所以手中的笔就想不停地写下去。法国大革命是历史上很重要的事件，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而其中戏剧性的角色使它更加充满了强烈的吸引力。它给我们大家留下了许多教训。今天的世界再次陷入动乱之中，我们正处在巨大变革的前夕。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也生活在一个革命的阶段，无论它多么平静。我们可以从法国大革

命和另一场大革命中学习到很多东西。另一场革命就发生在俄国，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就在我们眼前。像这两次由人民发动的、真正的革命，向阴森的现实生活里投入了一道强光；它们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大地，尤其是那些阴暗的地方。至少有一段时间，革命的目标似乎清晰在望，触手可及。人们的心中充满了信念和力量。疑惑和怀疑已经了无踪影。人们绝对不会妥协，只能接受最好的结果。那些发动革命并带领它实现目标的人们，就像离弦之箭，勇往直前，绝不左顾右盼；而他们越是勇往直前，革命就越向前发展。但这只是发生在革命的高潮时期，革命的领袖们站在高山之巅，人民群众在奋力攀爬。可是，哎呀！低潮会到来，他们从山顶走到底下阴暗的山谷里，信仰变得暗淡了，干劲也不足了。

1778年，老伏尔泰，这位几乎一生都在流亡的人，回到了巴黎，不久就与世长辞了，终年84岁。在向巴黎的年轻人演讲时，他曾说："年轻人是幸运的，你们将看到伟大的事情发生。"的确，他们看到并参与了伟大的事情，因为11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这次革命已经酝酿了很久。"大君主"路易十四在17世纪时说，"朕即国家"；他的继任，路易十五在18世纪说，"我死之后，管它洪水滔天"；他的话真的招来了滔天的洪水，冲走了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国。头戴扑粉假发套、身穿丝绸马裤的贵族们下台了，而"无套裤汉"——不穿马裤的平民——走上了历史舞台；法国所有的人都是"公民"或"女公民"。新生的共和国向全世界喊出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恐怖统治阴云密布。从革命特别法庭的建立，到罗伯斯庇尔的倒台，不到16个月的时间里，近4000人被送上了断头台。这是个很大的数字，而且当人们想到一定会有很多无辜的人惨遭杀戮的时候，就会感到震惊和悲痛。但是，有些事实一定要记住，这样我们才能够从真实的角度看待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法兰西共和国被敌人、叛徒和间谍包围着，被押上断头台处死的人中，很

多都是公然反对共和国的敌人，他们极力想毁灭共和国。到恐怖统治的末期，无辜的人和罪人一起受苦。当恐惧袭来的时候，我们的目光被遮蔽，很难分辨罪人和无辜的人。在危急时刻，法兰西共和国不得不面对甚至来自它们自己一方的伟大将军的反对和背叛，比如拉法耶特（Lafayete）。难怪革命领袖们的神经会过度紧张，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逮捕和杀戮。

你还要记住，赫伯特·乔治·韦尔斯在他的《世界史纲》中所记述的那时在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刑法，尤其是保护财产的刑法，是十分残酷的，人们因为小过失而被绞死。在博尔纳（罗马）的很多地方，可以合法使用酷刑。韦尔斯说，在同一时期，在英国和美国被这样绞死的人，比法国的恐怖统治时期被送上断头台的人要多得多。

再想想那个时期的奴隶掠夺，可谓惨无人道，灭绝人性。再想想战争，尤其是现代战争，夺去了成千上万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生命。走近点儿，到我们自己的国家看看最近发生的事件。13年前，在阿姆利则的4月的一个晚上，这天正值春节，在札连瓦拉园（Jallianwala Bagh），成百上千的人被杀害，成千上万的人受重伤。而所有这些阴谋活动，特别是法庭和法令法规——它们除了试图恐吓和胁迫人民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压迫和恐怖的强度是衡量一个政府的恐惧程度的标准。每一个政府，无论它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是外国的，还是印度的，当它对于自己的存在感到恐惧的时候，就会沉溺于恐怖主义。反动政府这样做，是站在特权阶层的一边，对抗人民群众；革命政府这样做，则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边，对抗少数特权阶层。革命政府更加真诚，更加正直，它往往残忍而严厉，但是它从不欺骗，绝不耍花招。而反革命政府则是生活在欺骗的氛围之中，因为它知道，如果真相大白的话，它这个政府就不能持久。它大谈自由，而这自由只意味着它自己为所欲为的自由；它大谈正义，而这正义只意味着现存秩序的永恒，它在这样的秩序中繁荣发达，而其他的一切统统

灭亡。尤其是，它大谈法律和秩序，在这些词语的掩盖之下，它射击、杀戮、监禁、压制言论自由，做一切非法和目无法纪的事情。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我们成千上万的教友被特别法庭审判并处死刑。也是以这个名义，在两年半前，4月的一天，在白沙瓦，我们许多英勇的阿富汗同胞，遭到了机枪射杀，尽管他们手无寸铁。而为了这个“法律和秩序”，英国空军在我们的边境村庄和伊拉克投下炸弹，不分青红皂白地炸死和重伤了那里的男人、女人，还有儿童。唯恐人们在飞机飞过来的时候逃跑，一个恶魔般的精妙装置被发明了出来，叫作“延时炸弹”，它们落下时，显然对人毫无伤害，过一会儿之后才爆炸。乡村里的男男女女以为危险已经过去，便回到家里，但是，没过多久，炸弹爆炸了，炸死了村民，也毁灭了村庄。

再想想笼罩着几百万人的、日复一日的对饥饿的恐惧。我们对身边人的悲惨境遇已经习以为常。我们以为工人和农民是一帮比我们粗俗的人，对苦难并不敏感。这只不过是用来安抚我们刺痛的良心的、徒劳无益的争辩而已！我记得曾经访问过在比哈尔邦的加里亚（Jharia）的一个煤矿，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我看到男人女人们在地面之下的深处、漫长而黑暗的煤矿坑道里辛勤劳作的时候，无比震惊。人们谈论着煤矿工人的八小时工作制，有些人甚至对此还加以反对，认为应该进一步加大他们的工作量。当我听到或者读到这些争论时，我就会想起我访问过的那个在地下的黑暗地牢般的煤矿，在那里，甚至八分钟对我来说都是炼狱一般。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是十分可怕的。然而，与贫穷和失业的长期罪恶相比，它带给人们的痛苦不过相当于被跳蚤咬了一口而已。社会革命的代价尽管很大，但不如这种罪恶的代价大，也不如战争的代价大。在我们目前的政治和社会体系之下，战争时有发生。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许多有头衔的贵族阶层的人成了受害者。而我们已经习惯于尊重这些特权阶级，所以当他们遇到麻烦，我们就会深感同情。像同情别人那样去同情他们

也理所应当。但是，要记住，他们只是极少数人。我们可以祝福他们，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不能为了少数人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卢梭曾说过：“是人民群众构成了人类，而人民群众之外的人很少，不值得费心把他们考虑在内。”

我本打算在这封信里跟你谈拿破仑的。可我又走神了，手上的笔也就写出了其他的内容，而拿破仑还在等待着我们的审视呢。他必须等待，我们只能在下一封信里讲述他的故事了。

104 ——拿破仑

拿破仑在法国大革命中脱颖而出。法国，法兰西共和国，这个曾经挑战和公然反抗欧洲君王的国家，却在这个矮小的科西嘉（Corsica）人面前屈服了。法国那时是个奇特而狂野的美人。法国诗人巴比耶（Barbier）曾把它比作一头狂野的动物，一匹骄傲而自由的母马，头高高扬起，皮毛闪闪发光；浪荡而美丽，丝毫不能容忍马鞍、马具和缰绳，不停地踩踏着大地，发出阵阵嘶鸣，使世界惊恐不已。而这匹骄傲的母马却愿意被这个来自科西嘉的年轻人驾驭，而且他也为它做出了非凡的成就。但是，他也驯服了它，使这个狂野而自由的动物失去了所有的野性和自由。他还剥削它，使它枯竭；最后，它将他甩了下来，自己也倒下了。

科西嘉人留着平头，

在获月艳阳下的法国真美啊！

这是一匹难以驯服、性格顽劣的母马，

既没有铁衔，也没有金色缰绳。

野母马动作粗野，却有着国王般的坏脾气，

骄傲地用蹄子撞击着古老的土地。

从来没有一双手曾经驾驭过它，

使它俯首帖耳。

它宽阔的肋部从未载过陌生人的马鞍和马具。

它所有的毛色闪闪发光。

美丽的流浪者，抬起眼眉，摆动臀部，

竖起腿弯，发出嘶叫，恐吓着人们。

那么，拿破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世界上少有的伟人之一，人们所称道的“神选之人”，一个大英雄，一个帮助人类从许多重负中解脱出来的人吗？或者，他是如赫伯特·乔治·韦尔斯和其他人说的，只是位冒险家和破坏者，对欧洲和文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呢？也许这两种观点都夸大了事实，也许这两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的。我们大家都是善与恶、伟大与渺小的奇怪的混合体。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混合体，但是，和我们大部分人不同的是，这个混合体是由非凡的特质构成的。他具备勇气、自信、想象力、惊人的力量和勃勃雄心。他是位伟大的将军，十分精通战争艺术，可以和伟大的古代将领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媲美。但是，他又是个心胸狭窄、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支配他生活的动力不是追求理想，而是寻求个人的权力。他曾经说：“我的情人！权力就是我的情人！为了征服这位情人，我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所以我决不允许别人抢走她，或者与我分享她！”他虽然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但是，他梦想着广阔的帝国，他一心想着亚历山大式的征服，甚至欧洲似乎对他来说太小了。东方深深地吸引着他，尤其是埃及和印度。他早在27岁、军旅生涯早期的时候就说过：“只有东方才有伟大的帝国和伟大的变革，有6亿人生活在那里。而欧洲只是一个鼹鼠丘而已。”

拿破仑·波拿巴于1769年出生于法国统治下的科西嘉岛。他具有法属科西嘉血统和意大利血统。他在法国的一所军校里接受教育。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他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但是，也许他加入雅各宾派只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利益，不是因为他信仰他们的理想。1793年，他在土伦（Toulon）赢得了他的第一次胜利。那里的有钱人因为害怕在革命政权之下失去他们的财产，实际上招来了英国人，并把法国海军的残部拱手交给了他们。这个大灾难，加上同时发生的其他灾

难，给了年轻的共和国沉重的打击，于是，所有的可以征召的男人，甚至女人，都被征召入伍。拿破仑镇压了叛乱者，并巧妙地进攻土伦，打败了英国军队。他的幸运之星现在开始闪耀了，他24岁就当上了将军。然而，在几个月内，当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的时候，他却陷入了麻烦，因为人们怀疑他属于罗伯斯庇尔一派。可是，他只真正属于一个派别，而这个派别里只有一个成员——那就是拿破仑！接下来就是督政府时期，拿破仑证明了他绝不是雅各宾派的人，而是反革命的领袖，可以面不改色地射杀平民，这就是发生在1795年的著名的“一阵霰弹”事件，这些我在前一封信中已经告诉过你。那一天拿破仑伤害了共和国。而10年之后，他终结了法兰西共和国，成了法国的皇帝。

1796年，他成了法兰西共和国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他在意大利北部指挥的战役取得了非凡的胜利，震惊了整个欧洲。法国军队还怀有法国大革命的激情。但是，他们衣衫褴褛，既没有合适的衣服、鞋子，也没有食物和钱。他率领这支衣衫褴褛、腿脚酸痛的军队，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脉。他向士兵们许诺，到达富饶的意大利平原后，就会有食物和各种好东西。另一方面，他向意大利人民许诺，给他们自由；他将把他们从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这是把革命口号与对抢劫掠夺的展望奇特地混合在一起了！他很聪明地利用了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情感，而他自己就有一部分的意大利血统，所以对意大利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不断取得胜利，他的威望也随之不断上升，声名远扬。他在自己的军队里，与普通士兵同呼吸，共命运。当战斗打响的时候，当军队遇到危险的时候，总能看到他的身影。对于立下战功的士兵，他立刻给予奖赏，哪怕是在战场上。对他的士兵来说，他就像一位父亲——一位十分年轻的父亲！士兵们充满柔情地称他为“小伍长”，常常以“你”来称呼他。那么这位20多岁的年轻将军成为法国士兵最爱戴的人，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拿破仑在意大利北部大获全胜，而且在那里击败了奥地利，终结了古老的威尼斯共和国，赢得了令人厌恶的、帝国主义的和平。然后，他以一位征服者、大英雄的身份回到了巴黎。他已经开始控制法国了。但是，也许他觉得夺取权力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他又带领一支军队去埃及征战。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感觉到东方在召唤他，而现在他可以回应东方的召唤了，对广阔帝国的梦想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他设法避开了地中海的英国舰队，到达了亚历山大港。

埃及那时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但是，这个帝国已经衰败了，实际上，马穆鲁克以土耳其苏丹的名义在统治着它。革命和发明也许震撼了欧洲，但是马穆鲁克仍然是按照中世纪的方式生活着。据说，当拿破仑逼近埃及的时候，马穆鲁克的一名武士身着丝绸和波形花纹的铠甲，盛装骑行至法国军队的前面，向他们的领导者挑战，要与他单打独斗！这个可怜的人遭到了毫无骑士精神的法国士兵的子弹齐射。不久，拿破仑赢得了金字塔战役的胜利。他热衷于摆出戏剧性的姿态。他骑着马，向站在金字塔前的军队发表演讲：“士兵们，40个世纪正在俯视着你们！”

拿破仑是陆地上的战争之王，他继续不断地取得胜利。

但是，在海上他无能为力，他不懂海战，似乎也没有得力的海军将领。而英国，那时有一个天才人物，在地中海指挥着英国海军。他就是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一日纳尔逊十分大胆地进入了港口，在这场被称为“尼罗河之战”中摧毁了法国舰队。这样，拿破仑回法国的路就被阻断了，困在了埃及。他设法秘密逃回了法国，但是，他牺牲了他的东方军团。

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赢得了一些军事上的荣耀，但是伟大的东方远征失败了。然而，有趣的是，拿破仑去埃及时，带去了一大群带着书本和各种仪器的学者、专家和教授。每天这个“研究所”都进行讨论，拿破仑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讨论，这些学者做了大量有益的科学

研究和探索。他们解决了古老的象形文字之谜，因为他们发现了一块花岗岩石板，上面刻着三种文字——希腊文和两种埃及象形文字的变体。在希腊文的帮助下，另外两种文字也被破解了。另一个有趣的事，是拿破仑对他们提出的修筑苏伊士运河的建议十分感兴趣。

在埃及的时候，拿破仑曾经和波斯的沙阿和南印度的提普苏丹进行了谈判，但都没有什么结果，这是因为拿破仑在海上是无能的。正因为海上的无能，最终毁掉了拿破仑；也正是因为海上力量，使英国成了19世纪的强国。

拿破仑从埃及回来的时候，法国的情况非常糟糕。督政府已是声名狼藉，十分不得人心，所以人们便向拿破仑寻求帮助，他也十分乐意掌权执政。在他回来一个月之后，即1799年11月，在他的兄弟卢西恩（Lucien）的帮助下，他强行解散了议会，于是终结了当时督政府统治国家的宪法。像这样强行夺权的行动被称为“政变”，这次政变使拿破仑夺取了军政大权。他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他深受人民的爱戴，人民对他十分信赖。大革命已经遭到了清算；现在，甚至民主也在消失，一位备受爱戴的将军占领了阵地。法国起草了一部新宪法，宪法规定有三位执政官（这个名词取自古罗马），但是，拥有绝对权力的主执政官是拿破仑，他被称为第一执政官，任期为10年。在讨论宪法的时候，有人提议，国家应该有一个总统，没有实权，其主要职责是签署文件，并正式代表共和国，有点儿像立宪制的国王，或者像今天的法国总统。但是，拿破仑想要的是权力，不只是仆从般的忠诚。他决不要这种有威严却没有实权的总统。他叫喊着：“让这头肥猪滚开！”

这个任命拿破仑为为期10年的第一执政官的宪法，让人民进行了投票，300万人几乎一致通过。就这样，法国人民自己把所有的权力拱手交给了拿破仑，希望他能带给他们自由与幸福，但他们的希望最终成了泡影。

但是我们不能细说拿破仑的生平故事，它充斥着激烈的战斗和对更多权力的渴望。就在政变的当天晚上，在新宪法尚未拟定和通过之前，他就任命两个委员会起草了一部法典。这是他独裁统治的第一个法案。法典的起草经历了长时间的讨论，拿破仑亲自参与了讨论。这部被称为《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eon*）的法典，在1804年终于正式实施了。如果用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或用现代的标准来评判这部法典的话，它并不算先进。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却是一大进步。100年来，它在某些方面几乎是欧洲的典范。在许多其他方面，拿破仑引入了简单高效的行政管理方法。他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他记忆力超群，能够记住很多的细节。他精力过人，活力无限，但使他的同僚和秘书们精疲力竭。他的一名同僚是这样描述这一阶段的拿破仑的：“统治、管理、谈判——他聪慧而又有条理，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他在3年里所做的工作，比国王在100年里所做的还多。”毫无疑问，这有些夸张，但是很显然，拿破仑像阿克巴一样，有非凡的记忆力和完美清晰的头脑。他自己说：“当我不想再考虑某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把盛着这件事情的抽屉关上，然后打开另一个抽屉，那里面盛着另外一件事情。每个抽屉里的内容从来不会混淆，它们也不会令我烦恼或者让我疲倦。我想睡觉吗？我会关上所有的抽屉，然后我就睡着了。”的确，据说，他在战斗中，会在地上一躺，睡上半个小时左右，然后起来，开始另一段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

他被任命为第一执政官，任期为10年。权力之梯的下一步是在3年之后的1802年，他任命自己为终身执政官，他的权力进一步加强了。共和国已经名存实亡，他除了名字以外，就是一个君主。1804年，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在公民投票之后，拿破仑加冕称帝了。他在法国拥有一切权力，然而，他与过去的独裁专制的君主们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他不能把自己的政权建立在传统和君权神授的基础之上。他必须使之建立在他的高效执政和深得民心的基础之上，尤其要得到农民的拥戴，他们一直是他忠实的支持者，因为他们觉得，拿破仑为他们保全了土地。拿破仑曾经说过：“我才不在乎上流社交界人士和那些

饶舌者的意见！我只在乎一种意见，农民的意见。”但是，农民们也渐渐厌倦了把他们的儿子送上战场，因为战争几乎延绵不断。失去了农民的支持，拿破仑建立起来的这座巨大的大厦便开始摇摇欲坠了。

拿破仑称帝10年，在这10年中，他在欧洲大陆四处奔波，不断发起战争，并赢得了很多著名的战役。整个欧洲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瑟瑟发抖。他对欧洲的控制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马伦哥（Marengo）会战[1800年，他率领军队，在冬天穿越了大雪覆盖的瑞士大圣伯纳德山口（Great St. Bernard pass）]、乌尔姆（Ulm）战役、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战役、耶拿（Jena）战役、艾劳（Eylau）会战、弗里德兰（Friedland）战役、韦格勒姆（Wagram）战役，这些都是拿破仑在陆地上赢得的著名战役。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在他面前都土崩瓦解了。意大利、尼德兰、被称为莱茵联盟的德国的大部分地区、现在被称为华沙公国的波兰，都是拿破仑的臣属国。很久以来名存实亡的古老神圣罗马帝国终于被终结了。

在主要的欧洲强国中，只有英国逃过了这场灾难。大海，对于拿破仑来说，永远是个谜。大海拯救了英国。正是因为大海给英国带来了安全，英国才成了拿破仑最强大、最无情的敌人。我已经告诉过你，在拿破仑军事生涯的早期，纳尔逊是如何在尼罗河之战中摧毁拿破仑的舰队的。1805年10月21日，纳尔逊赢得了更大的胜利，他在西班牙南部海岸的特拉法尔加角（Cape Trafalgar）附近的海域，大败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在这场海战开始之前，纳尔逊向他的舰队发出了著名的旗语信号：“英国期待它的每一名士兵恪守职责。”纳尔逊在胜利的那一刻阵亡了，但是他所取得的胜利粉碎了拿破仑入侵英国的梦想。英国人民永远骄傲地铭记着纳尔逊的丰功伟绩。为了纪念他，伦敦修建了纳尔逊纪念柱和特拉法尔加广场。

拿破仑为了报复英国人，下令关闭欧洲大陆所有通往英国的港口，不允许与英国有任何联系，这样，“店主之国”英国就受到了抑

制。而英国方面则封锁了这些港口，阻止拿破仑帝国和美洲及其他大陆的贸易。为了打击拿破仑政权，英国还不断地在欧洲大陆搞阴谋诡计，并向他的敌对国和中立国分发大量的黄金。英国这样做，得到了一些欧洲伟大的金融家族的帮助，最著名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

英国为打击拿破仑所采取的另一个方法是宣传战。在那时这是一种很新颖的斗争方法，但是，从那时起，它已经变得很普遍了。英国发起了一场反对法国，尤其是反对拿破仑的新闻宣传运动。各种文章、小册子、报纸、嘲弄新皇帝的漫画、充满谎言的假回忆录，在英国出版后，被偷带进法国。如今虚假的新闻宣传已经成为现代战争中惯用的伎俩。在1914年至1918年的世界大战中，所有参战国家的政府都厚颜无耻地说着弥天大谎，而在制造和传播谎言的艺术上，英国政府似乎很轻松地夺得了冠军，因为自从拿破仑时代起，英国已经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训练了。在印度的我们十分了解，关于我们国家的真相是如何被隐瞒，而最惊人的谎言又是如何在这里和在英国传播的。

105 ——拿破仑续

我们必须接着上封信继续讲述拿破仑的故事。

拿破仑所到之处或多或少都传播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而且那些被他征服的国家的人民，并不完全反对他的到来。他们厌倦了沉重地压迫着自己的、衰弱的、半封建的统治者。这大大地帮助了拿破仑，他所到之处，封建制度便土崩瓦解。尤其在德国，封建制度被清除了。在西班牙，他终结了宗教法庭。但是，正是他在不知不觉中唤起的民族主义精神，向他发起了挑战，并最终打败了他。他能够打败老君主和国王，却制伏不了群起反抗他的整个一个民族。西班牙人民起来反抗他了，在几年的时间里，他们耗尽了他的精力和资源。德国人民在伟大的爱国者、拿破仑最无情的敌人冯·斯坦因男爵（Baron von Stein）的带领下，也组织起来了。德国暴发了解放战争。拿破仑自己唤起的民族主义思想，让几个国家组成了海上力量联盟，打败了拿破仑。但是无论如何，让整个欧洲容忍一位独裁者是很难的。或许拿破仑后来自己所说的是对的："我的失败，只能责怪我自己。我是我自己的最强大的敌人，也是我灾难性命运的原因。"

这个天才人物有很奇怪的弱点。他总是有一种新贵、暴发户的作风，他怀有一种奇怪的欲望，希望老的帝王君主们将他视为平等的人来对待。他用最荒唐的方式提拔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尽管他们都是些彻底的无能之辈。他唯一一个体面的兄弟卢西恩，曾在1799年的雾月政变的关键时刻帮助过他，但是后来也与他失和，隐退到了意大利。他其他的兄弟尽管都虚荣而愚蠢，却被拿破仑立为了国王和统治者。他有一种奇怪而庸俗的热情，要重用他的家人。可几乎他的每一位家人都在欺瞒他，在他遇到麻烦的时候抛弃他。拿破仑十分热衷于建立

一个王朝。在他军事生涯的早期，甚至在他去意大利作战并声名大振之前，他已经和约瑟芬·德博阿尔内（Josephine de Beauharnais）结婚了。约瑟芬是一位美丽但有些轻浮的女人。她不能为拿破仑生孩子，使拿破仑十分失望，因为他已经决心要建立一个王朝了。所以，尽管他喜欢约瑟芬，他还是决定和她离婚，娶了另一个女人。他想娶一位俄罗斯的女大公，但遭到了俄罗斯沙皇的拒绝。拿破仑可能几乎成了欧洲之王，但是沙皇认为，他想娶俄罗斯皇族女人的想法还是有些傲慢无礼！后来，拿破仑几乎是强迫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帝把女儿玛丽·路易斯（Marie Louise）嫁给了他。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她是个愚蠢乏味的女人，而且根本不喜欢拿破仑，还是位很糟糕的妻子。当拿破仑陷入麻烦的时候，她抛弃了他，还把他忘得一干二净。

奇怪的是，在某些方面远远胜过其他人的拿破仑，却成了古老君主体制思想的虚无魔力的受害者。然而，他常常使用革命的字眼说话，并嘲弄那些老君王。可他又蓄意背叛革命和新秩序，旧秩序不适合他，也不愿意接纳他。所以，他在新旧秩序之间倒下了。

渐渐地，他军事生涯的荣耀走向了必然的悲剧性结局。他自己的一些大臣背叛了他，并密谋要推翻他；塔列朗（Talleyrand）曾与俄国沙皇勾结，而富歇（Fouch）则与英国一起图谋。拿破仑发现了他们的背叛行为，然而，奇怪的是，他只是严厉训斥了他们，然后让他们继续做他的大臣。他的一位将军博纳多特（Bernadote）背叛他，成了他的死敌。拿破仑的家人，除了他的母亲和兄弟卢西恩以外，其他人仍然行为不端，还常常与他对着干。甚至在法国，对他的不满情绪也在不断加深，他的独裁统治变得严厉而无情，许多人未经审判就被投进了监狱。他的幸运之星显然开始坠落了。见他大势已去，许多小人便弃他而去。拿破仑的身体和精神都在衰退，尽管他那时还很年轻。他在战场上会突发急性腹痛。权力也使他堕落了。他还具备过去的技

能，只是行动迟缓了。他常常会犹豫不决，疑虑重重，他的军队也行动迟缓了。

1812年，他带领一支强大的军队——被称为拿破仑大军——向俄罗斯发起全面进攻。他打败了俄国人，所向披靡。俄罗斯军队一撤再撤，根本无心作战。而拿破仑大军一路追赶，最后到达了莫斯科。沙皇想投降，但是，有两个人劝说他不要投降，一个是法国人博纳多特，拿破仑的旧日同僚和将军，一个是被拿破仑宣布为逃犯的德国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冯·斯坦因男爵。俄国人放火烧掉了自己挚爱的莫斯科城，用浓烟熏跑了敌人。当火烧莫斯科城的消息传到圣彼得堡的时候，坐在桌边的斯坦因举起酒杯庆祝，并高喊："在此之前，我已经三四次丢掉了我的包袱。我们必须习惯于扔掉这些东西。既然我们都得死去，那就让我们勇敢些吧！"

当时是初冬。拿破仑决定离开大火熊熊的莫斯科，回法国去。所以拿破仑大军在雪地上疲惫地、步履艰难地往回撤退，俄罗斯的哥萨克轻骑兵在他们的两侧和后面不断地袭击和骚扰他们，砍杀掉队的士兵。严酷的寒冬和哥萨克轻骑兵给法国军队造成了成千上万的伤亡，拿破仑大军成了一支惨不忍睹的队伍——士兵们衣衫褴褛，举步维艰，疲惫不堪，腰酸腿疼，还冻得鼻青脸肿。拿破仑也和他精锐部队的士兵一起徒步行进。这是一次可怕的、令人心碎的长征，大军人数越来越少，几乎消失殆尽了。只有少数人回到了法国。

这次入侵俄罗斯的战役对法国是一次很沉重的打击。它耗尽了法国的人力。更严重的是，它使拿破仑衰老了，使他忧心忡忡，并开始厌恶战争了。但是他无法安静地休息，他的敌人包围着他，尽管他还是不断取得胜利的、卓越的指挥官，但包围他的罗网越收越紧。塔列朗变本加厉地搞阴谋破坏，甚至一些拿破仑最信任的元帅也起来反对他。拿破仑感到十分疲惫和厌倦，于是在1814年4月宣布退位。

现在拿破仑退位了，欧洲的强国们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重新瓜分欧洲版图。拿破仑则被流放到了地中海的一个小岛——厄尔巴岛（Elba）。另一个波旁家族的成员，另一个路易，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的兄弟，从隐居的某个地方回到法国，被立为法兰西王国的皇帝，称路易十八。波旁王朝复辟了，老的专制制度也随之回来了。这样，巴士底监狱陷落之后的25年间的所有英勇的革命行动也到此结束了！在维也纳，各国的国王和大臣们相互之间争吵不休，而会间休息，他们就尽情享乐。他们感觉十分放松，一场可怕的恐怖时期已经过去，他们又可以喘息了。塔列朗，这个背叛了拿破仑的叛徒，在这群国王和大臣中间很受欢迎，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代表大会上的另一位著名外交家是奥地利的外交大臣梅特涅（Meternich）。

不到一年的时间，拿破仑就厌倦了厄尔巴岛，而法国人也厌倦了波旁王朝。1815年2月26日，拿破仑几乎就一个人，设法乘着一条小船逃跑了，在里维埃拉（Riviera）的戛纳（Cannes）登陆。他受到了农民的热情欢迎。那些被派去堵截他的军队，一见到他们昔日的指挥官“小伍长”，就高喊“皇帝万岁”，马上成了他的军队。于是，他胜利抵达巴黎，波旁国王闻风而逃。惊愕和恐慌充满了欧洲其他的所有都城。在维也纳，代表大会还在拖延着，但是歌舞宴会戛然而止，恐惧使这些国王和大臣忘记了相互的争吵，开始集中精力去思考如何镇压重新崛起的拿破仑。拿破仑只是个46岁的疲倦老人了，甚至他的妻子玛丽·路易斯也抛弃了他。他还是赢得了一些战斗，可是最终，在他登陆100天之后，在布鲁塞尔市附近的滑铁卢（Waterloo），被威灵顿（Wellington）和布卢彻（Blucher）领导的英国和普鲁士军队打败了。于是，他返回的这个时期被称为“百日王朝”（Te Hundred Days）。这也许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但是，鹿死谁手最初还很难说。可是拿破仑运气很糟。他本来有可能取胜的，不过即便如此，他后来还是败在了反法国的欧洲联军的手下。现在他已经被打败了，他的许多支持者都对他反戈一击，以图自保。继续打下去已经没有希

望和前途了，于是他第二次退位，走向停在法国港口的英国船只，向船长投降，并告诉他，自己想在英国安静地生活。

如果他期望受到英国人或欧洲人的慷慨大方、谦恭有礼的待遇，那他就错了。他们太害怕他了，他从厄尔巴岛的出逃事件使他们相信，他必须被送到更远的地方，并且严加看守。所以，尽管他多次抗议，他还是被宣布为囚犯，被送到了遥远的南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St. Helena），只有几个同伴与他同往。他被认为是“欧洲的囚犯”，几个欧洲国家都派去了专员，在圣赫勒拿岛上看管他，但事实上，看守他完全是英国人的责任。即使在那么遥远的、与世隔绝的小岛上，他们还是派来了一支军队看守他。当时，俄罗斯专员巴尔曼伯爵（Count Balmain）把这个孤独的圣赫勒拿岛礁形容为：“这里是世界上最悲伤、最孤立、最难以接近、最易守难攻、最孤独的地方……”岛上的英国总督是一个特别粗俗野蛮的家伙，他很不公正地对待拿破仑。拿破仑被关在一个最不卫生、最肮脏的房子里，他还对拿破仑和他的同伴做了各种令人不快的限制规定。有时候，他甚至没有足够可以吃的健康食物。拿破仑也不能和欧洲的朋友联系，甚至不能和自己的小儿子联系。拿破仑掌权的时候，曾经封他儿子为罗马王。事实上，甚至连有关他儿子的消息也不让他知道。

拿破仑受到如此刻薄的对待，真是令人吃惊。但是，圣赫勒拿岛的总督只不过是政府的工具而已，虐待和羞辱他们的囚犯，似乎是英国政府蓄意制定的政策。而欧洲的其他强国对此都很赞同。拿破仑的母亲，尽管年事已高，但很想去圣赫勒拿岛陪伴他，可是被欧洲大国拒绝了！从对他的虐待可以看出欧洲人对他的恐惧程度，尽管他的翅膀已经被剪掉，无力地躺在遥远的孤岛上。

在五年半的时间里，他在圣赫勒拿岛上忍受着这种生不如死的生活。这样一个充满力量和野心的人被监禁在这样一个小岛上，每天忍受各种屈辱，不难想象他一定承受了很多的痛苦。他死于1821年5月，

甚至在他死后，那位总督的仇恨还在追随着他，给他建了一个很拙劣的坟墓。慢慢地，关于虐待和迫害拿破仑的消息传到了欧洲（那时，消息传播得很慢），许多国家对此都提出了强烈抗议，包括英国。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Castlereagh）对这种虐待行为负主要责任；由于这个缘故，加上他在国内实施的严苛政策，使他非常不得人心。他因此而自杀了。

评价非凡的伟人是不容易的事，拿破仑有其独特的伟大和毫无疑问的非凡。他几乎像一种自然力那样自然、质朴而又狂野。他有丰富的思想和想象力，但是对于理想的价值和无私的动机视而不见。他试图通过带给人民荣誉和财富来赢得他们的支持。所以，当他的荣耀和权力开始缩减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理想的动机使那些他曾提拔的人留在他的身边了，许多人卑鄙地抛弃了他。宗教对他而言，只是让贫穷可怜的人们满足于自己悲惨命运的手段。关于基督教，他曾说：“我怎么能接受一种咒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宗教呢？”在埃及的时候，他对伊斯兰教表现出了偏爱，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认为，这可能为他赢得那里的人民的爱戴。他是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然而他却鼓励宗教，因为他把宗教看成现存社会秩序的支柱。他说：“宗教把平等的思想与天堂联系在一起，这可以阻止穷人残杀富人。宗教和疫苗有同样的价值。它满足了我们对奇迹的热爱，也保护我们不上江湖骗子的当……社会如果没有财产的不平等就不可能存在，而财产的不平等如果没有宗教也不可能存在。一个人快要饿死了，而他身边的人正在吃着美味佳肴，大快朵颐，那么这个快要饿死的人只能凭借对一种更强大力量的信仰支撑，才能活下去，他得深信，在另一个世界财富的分配会有所不同。”据报道，在他权力的鼎盛时期，他曾经说过：“万一天空塌落，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将用长矛把它顶起。”

他具有伟人的魅力，赢得了许多人忠诚的友谊。他的目光就像阿克巴的目光一样，是有磁性的。他曾说过：“我很少拔剑，我用我的眼睛赢得战斗的胜利，而不是用武器。”对于一个使整个欧洲陷入战

争的人来说，说出这样的话真是很奇怪。在他后来的岁月里，在流放期间，他认为，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人的精神比利剑更伟大。他说：“你们知道吗？什么才是使我最吃惊的事情？武力是无力安排任何事情的。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精神和利剑。但是从长远来看，利剑总是要被精神所征服。”但是，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长远可言了。他总是行色匆匆。在他军事生涯的初期，他就选择了利剑之路；他因剑而胜，也因剑而败。他还说过：“战争是时代的错误，将来赢得胜利将不再需要大炮和刺刀。”

周遭的环境对于他已是不能承受之重——他野心勃勃，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而欧洲的统治者们对这个暴发户又恨又怕，使他不得安宁。他毫不在意战场上牺牲的生命，然而据说，他看到人民受到的苦难，会深深为之动容。

他的私人生活十分简单，除了过度工作之外，从不过度沉溺于任何事情。他说过：“不论一个人吃得多么少，都不嫌少。人会因为吃得太多而生病，从不因吃得少而得病。”正是这种简单生活使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他可以想睡就睡，而且他的睡眠很少。在一个上午或下午骑行100英里，对他而言只是等闲之事。

他的野心把他带到了整个欧洲大陆，他便把欧洲看成一个国家，一个单元，只有一种法律，一个政府。“我将把所有国家融为一体。”后来，他在圣赫勒拿岛上受惩戒的时候，又记起了这个想法，而且这个想法变得更加客观了。“终有一天，欧洲各国的联盟会因事态发展的影响而形成。第一次推动力已经出现，在我的政体崩溃之后，在我看来，在欧洲实现均势的唯一出路就是形成一个国家的联盟。”100多年之后，欧洲还在摸索和尝试，想组成一个国家的联盟！

圣赫勒拿岛的英国总督残忍地封锁了拿破仑小儿子的消息，不让他知道。他在最后的遗嘱中给这个曾被他立为罗马王的小儿子写了一封信。他希望他的儿子有一天会统治国家，他告诉儿子要和平地统

治，不要把资源用于暴力。“我被迫以武力恐吓欧洲，而如今的方式是用理性去说服。”可是他的儿子注定与君主无缘，在他父亲去世11年后，便英年早逝了。

但他所有这些想法都产生于流放期间，当时他正在受到惩戒，他这样写或许是为了博得子孙们对他的喜爱。在他如日中天的时期，他太热衷于行动，所以不可能成为哲学家。他只膜拜权力的圣坛，权力才是他真正的挚爱，但他并非粗陋地爱着它，而是像艺术家那样爱它。他说：“我爱权力，是的，我爱它，但我是用艺术家的方式在爱它：像一个小提琴家爱小提琴一样，是为了让它像施了魔法般地奏出音调、和弦和悦耳的曲调。”但是，寻求过度的权力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寻求它的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迟早都会失败，都会毁灭。所以拿破仑失败了，幸好他失败了。

同时，波旁王朝又开始统治法国了。据说波旁王朝从来没有学会任何东西，也从不忘记任何东西。拿破仑死后的第九年，法国厌倦了波旁王朝，又将他们推翻了。另一个君主即位了。为纪念拿破仑所建的拿破仑塑像，也就是那个曾经从旺多姆（Vendome）纪念铜柱上被挪走的拿破仑塑像，被新的君主重新放回了原位，这是新君主友善的姿态。年迈而失明的拿破仑可怜的母亲说：“皇帝又回到巴黎了。”

106 ——世界形势概述

拿破仑从他主宰了很久的世界舞台上消失了。在此之后，100多年过去了，很多老的争议已经尘埃落定。但是，我也告诉过你，人们对他的评价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如果拿破仑出生在其他时期，一个更加和平的时期，他或许就只是一位卓越的将军，仅此而已，也许会默默无闻地离去。但是革命和变革给了他加速前进的机会，他抓住了这个机会。而他的垮台和淡出欧洲政治，一定给欧洲人民带来了宽慰，因为他们厌倦了战争。整个一代人都没有见过真正的和平，他们渴望和平。没有人比欧洲的君主和国王更感到宽慰的了，因为很多年来，他们一听到他的名字就会瑟瑟发抖。

我们在法国和欧洲已经待了很久了。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19世纪。让我们环视一下世界，看看拿破仑垮台的时候，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你应该记得，在欧洲，老的国王和他们的大臣们聚集在维也纳的代表大会上。现在那个可怕的人不在了，他们可以玩他们过去的游戏，随心所欲地决定几百万人的命运了。人们想要什么无关紧要，一个国家自然和语言的边界是什么也无关紧要。沙皇俄国、英国（代表是卡斯尔雷）、奥地利（代表是梅特涅）以及普鲁士是主要的欧洲强国；当然，还有塔列朗，他聪明机智，广受欢迎，曾经是拿破仑的大臣，现在是法国波旁国王的大臣。这些人在休会期间吃喝玩乐，歌舞升平；在会议上，他们把被拿破仑大大改变了的欧洲版图进行了重新分割。

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被推回了法国。在西班牙，甚至宗教法庭又重新建立了起来。维也纳代表大会上的君主们不喜欢共和国，因此他们没有在荷兰重建老的荷兰共和国，而是把荷兰和比利时并为一个尼德兰王国。波兰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再次消失，被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所侵吞，其中俄罗斯吞并了大部分。威尼斯和北意大利划归了奥地利。在瑞士和里维埃拉之间的意大利的一小部分和法国的一小部分，成了撒丁（Sardinia）王国。在欧洲的中部，有一个奇怪而模糊的德国邦联，但是邦联里的两个主要国家仍然是普鲁士和奥地利。还有其他的一些改变。于是，维也纳代表大会上精明的人们发布了命令，强迫人们违反自己的意愿去这里、去那里，让他们说不是自己母语的语言，从总体上埋下了未来矛盾和战争的种子。

1814——1815年的维也纳代表大会特别关注的事情就是如何让国王们安全无忧。法国大革命曾吓得他们魂不附体，他们愚蠢地认为他们能够阻止新革命思想的传播。俄罗斯沙皇、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甚至形成了所谓的“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以保护他们自己和其他的君主。似乎我们几乎又回到了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时代。在整个欧洲，包括英国，到处都在对自由思想进行镇压。欧洲那些思想进步的人们一定感到绝望，因为大革命所经历的苦难已经变得徒劳无益了。

在欧洲东部，土耳其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了，它正在经历着缓慢衰落的过程。埃及应该属于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但已经半独立了。1821年，希腊奋起反抗土耳其的统治，在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的帮助下，经过为期8年的战争，终于赢得了自由。正是在这场战争中，英国诗人拜伦（Byron）作为为希腊作战的志愿者牺牲了。也许你知道，他写了一些关于希腊的非常优美的诗歌。

在这里，我不妨再提一下发生在1830年的欧洲的另外两个变化。法国已经受够了波旁王朝的压迫和独裁，又把他们赶走了。但是法国

并没有建立共和国，而是又选择了一位国王，这就是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路易·菲利普行事有所检点，或多或少有些像立宪制的国王。他设法统治法国到了1848年，那时又一次更猛烈的革命爆发了。在比利时，1830年也发生了起义，结果造成了比利时和荷兰的分离。当然，欧洲大国都强烈反对共和国体制，于是他们把一个德国的君主送到比利时，将他立为那里的国王。另一位德国君主被立为了希腊国王。德意志的众多小王国里有很多这样的君主，一旦有王位空缺，他们便可随时即位。你该记得，还在统治着英国的皇族就来自德意志的小王国汉诺威。

1830年也是欧洲许多其他地方爆发起义的一年——在德意志、意大利，尤其在波兰。但是起义都被国王镇压了。波兰的起义受到了俄国人残酷的镇压，俄国人甚至禁止波兰人使用波兰语。这一年——1830年——在某种程度上是1848年的序曲，我们将看到，1848年是欧洲的革命之年。

关于欧洲就先谈到这里。在大西洋的彼岸，美国在逐渐向西扩张。远离欧洲的对手，远离战争，还有可以任由自己支配的无尽的土地，所以美国在大踏步地前进，拼命追赶着欧洲。然而，在南美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间接地由拿破仑引起的。当拿破仑征服了西班牙，并将他的一个兄弟立为国王之时，在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爆发了起义。于是，离奇的事情发生了。导致这些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独立的原因，是它们对老的西班牙王朝的忠诚。但这只是它们的直接借口而已。它们的独立在晚些时候也会到来，因为独立的精神正在整个南美洲蔓延、发展。南美洲独立运动的伟大英雄是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他被称作“解放者”。南美洲的玻利维亚（Bolivia）共和国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于是，当拿破仑垮台之时，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也和西班牙切断了联系，并为独立而战斗了。拿破仑的退位并没有影响这场斗争，反对新的西班牙的斗争又持续了很多年。一些欧洲的国王想帮助他们的兄弟——西班牙国王镇压

美洲殖民地的革命者，但是，美国最终阻止了他们的干涉。那时的美国总统是门罗（Monroe），他告诉那些欧洲国家，如果他们对美洲的任何地方进行干涉，无论是南美洲还是北美洲，他们就得与美国开战。这个威胁吓住了欧洲国家，从那时起，他们基本上不再干涉南美洲的事务了。门罗总统对欧洲的这个威胁，被称为“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现在全世界都知道“门罗主义”了。在很长的时间里，它保护了新的南美洲共和国不受贪婪欧洲的侵犯，使新生的共和国得以成长。它们受到了保护，不受欧洲的侵犯，但是没有人保护它们不受它们的保护者——美国的侵犯。今天，美国控制着它们，许多更小的共和国也完全在美国的掌控之下。

巴西的广阔疆域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它大概在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独立的同时也获得了独立。因此，我们发现，到1830年，整个南美洲都脱离了欧洲的殖民统治。当然，在北美洲，还有英国的殖民地加拿大。

现在，我们来到亚洲。现在的英国毫无疑问在印度是主要的统治者。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欧洲，英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甚至还占领了爪哇。迈索尔的提普苏丹已经被征服了；1819年，马拉地王国终于被推翻了。然而，在旁遮普邦有一个在兰吉特·辛格领导下的锡克教国家。英国人在整个印度不断地蚕食和扩张。在东部，阿萨姆邦被吞并了，缅甸的若开邦（Arakan）是他们的下一个吞食对象。

英国在印度扩张的时候，另一个欧洲大国俄罗斯，也正在中亚进行扩张。它已经触到了东方的太平洋和中国。现在，它正穿过中亚的小国，直捣阿富汗的边境。在印度的英国人对这个巨人的逼近感到十分害怕，在惴惴不安中，毫无任何借口便向阿富汗挑起了战争，可结果让自己吃尽了苦头。

中国是在满族的统治之下，中国人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以贸易和宗教的名义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所以尽力把他们都赶出去。但是外国人

继续在中国的大门口大声叫嚣，行为不端，他们尤其鼓励在中国的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已经垄断了英国与中国的贸易。中国皇帝禁止鸦片进入中国，但是鸦片的走私仍然在继续，外国人在进行非法的鸦片贸易，这最终导致了中国与英国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确切称谓是“鸦片战争”，英国人强迫中国人接受了鸦片。

很久以前我就给你讲过，日本在1634年关闭了国门。到19世纪初，它仍然没有向任何外国人敞开大门。但是，在它关闭的国界之内，老的幕府在衰落，而新的形势在不断地发展，将会突然终结旧的制度。再向南，在亚洲的东南部，欧洲列强在忙着瓜分版图。西班牙仍然控制着菲律宾群岛。葡萄牙人已经被英国人和荷兰人赶走了。荷兰人在维也纳代表大会之后夺回了爪哇和其他岛屿。英国人正在向新加坡和马来半岛扩张。安南、暹罗和缅甸仍然是独立的，尽管它们时不时要向中国进贡。

这大致上就是从“滑铁卢之战”到1830年这15年间的世界政治形势。欧洲必定要成为世界的主人；在欧洲，反动势力胜利了。皇帝和国王们，甚至连英国的反动议会，也认为他们终于镇压了自由思想。他们试图将这些思想装进瓶子里封存起来。当然，他们失败了，因为接连发生了多次暴动。

政治变革似乎控制着政治舞台。但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所发生的生产、分配和旅行方式上的伟大革命，默默地却不可抗拒地在欧洲和北美洲扩展，改变了数百万人的观点和习惯，以及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新的思想从机器的轰鸣声中涌现出来，一个崭新的世界出现了。欧洲变得越来越高效而富有破坏性，越来越贪婪且帝国主义特性更强了，也愈发冷酷无情了。拿破仑的精神似乎渗透了整个欧洲。但是，在欧洲，注定要反抗和推翻帝国主义的思想也在发展。

这一阶段也产生了具有极大吸引力的文学、诗歌和音乐。可我必须停笔了，我已经完成了今天的任务。

107 ——世界大战前的一百年

拿破仑于1814年垮台了；他于第二年从厄尔巴岛返回，但再一次被打败了，可他的政体在1814年就已经崩溃了。整整100年之后的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了，波及了几乎整个世界，在它持续的4年里，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苦难。我们将比较仔细地审视一下这100年里发生的事情。我在上封信里已经给你讲述了在这个时期开始的时候，世界的大概形势。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把这个世纪全面地审视一下，再看看在各个不同国家的情况。这样，或许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在这100年的主要趋势，这样，我们才能既看见了树木，也看见了森林。

当然，你会注意到，从1814年至1914年这100年，主要是在19世纪。所以，我们不妨把它称为19世纪，尽管这样说不是很确切。

19世纪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年代，但是研究这个年代对于我们来说并非易事；这是个波澜壮阔的宏伟画面，而且由于我们离它很近，所以它对我们来说，就显得比以前的世纪更加宏大和丰满。正是因为它的宏大和复杂，所以当我们试图把汇集在一起的、成千上万的线索梳理清晰的时候，有时我们会感到不知所措。

19世纪在机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工业革命带来了机械革命，机器在人类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它们做了很多过去人类所做的工作，减轻了人类的劳苦，减少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并为人类创造了财富。科学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旅行和运输变得越来越快。铁路出现了，它取代了公共马车；汽船取代了帆船，然后又出现了功率大而又壮观的大型远洋客轮，它们定期、高速地往来于各个大陆之间。到了19世纪末，汽车出现了，而且遍及了全世界。最后，飞

机也出现了。同时，人类开始控制和使用一种新的奇迹——电。电报和电话也出现了。所有这一切让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通信方式发展进步了，人们的旅行也越来越快捷，世界似乎变小了。今天的我们已经对这一切习以为常，很少去多加考虑了。但是所有这些发展和改变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来说都是新鲜事物，它们都是在过去的100年间才出现的。

19世纪也是欧洲，或者说是西欧的世纪，尤其是英国的世纪。工业革命和机械革命就是在那里开始并发展的，并为西欧树立了榜样。英国在海上力量和工业方面都占据着优势，但是渐渐地，西欧的其他国家也赶了上来。随着新的机械文明，美国也飞速发展起来，铁路带着美国人向西扩张到了太平洋，并把广袤的土地变成了一个国家。他们一心忙于自己的问题，忙于向西扩张，无暇顾及欧洲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但是他们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对任何来自欧洲的干预表示愤怒，并予以阻止。在上一封信中我已经跟你讲过的“门罗主义”，保护了南美洲的共和国不受贪婪欧洲的侵犯。这些共和国被称为“拉丁共和国”，因为它们是由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人建立起来的。这两个国家，还有意大利和法国，被称为“拉丁国家”。而欧洲北部的国家是日耳曼国家，英国人是日耳曼人的分支盎格鲁-撒克逊人。美国人最初是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人种，但是从那以后，各个种族的移民相继来到了美国。

世界的其他地方在工业和机械方面还很落后，无法与西方新的机械文明抗衡。欧洲新的机器工业能够以比家庭小工业更快的速度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但是，生产这些产品需要原材料，很多的原材料在西欧是无法得到的；而产品生产出来之后，必须将它们出售，所以需要出售它们的市场。于是，西欧人开始寻找可以提供原材料，并能购买这些工业品的国家。亚洲和非洲软弱无力，所以欧洲就像捕食的野兽一般扑向它们。英国，由于它在工业和海上力量的领先地位，所以在争夺帝国疆土的竞争中毫不费力就独占鳌头了。

你应该记得，欧洲人最初来到印度和东方，是为了购买欧洲需要的香料和其他商品的。于是东方的商品来到欧洲，一种东方手工织机织出来的产品大量流向西方。可是现在，随着大机器的发展，这个程序被逆转了。西欧生产的便宜的产品流向东方，东印度公司为了促进销售英国的产品，蓄意扼杀了印度的家庭手工业。

欧洲坐拥亚洲这个巨人。在北方，俄罗斯帝国的势力已经蔓延至整个大陆。在南方，英国已经牢牢控制了最大的战利品——印度。在西部，土耳其帝国已经分崩离析，土耳其被称为“欧洲病夫”。波斯名义上还是独立的，但已经被英国和俄罗斯所控制。整个东南亚——缅甸、印度支那、马来半岛、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和菲律宾群岛等——除了暹罗的一小部分以外，都被欧洲所吞噬。在远东，中国正在被欧洲列强蚕食，中国被迫一步一步地退让。只有日本还傲然站立着，以平等的姿态面对欧洲。日本已经不再闭关自守，并努力调整自己，很快便适应了新的形势。

整个非洲，除了埃及以外，都十分落后。它无力对欧洲进行有效的抵抗，所有欧洲列强都扑向它，开始了争夺帝国疆域的疯狂竞争，瓜分了这片广阔的大陆。英国占领了埃及，因为它在通往印度的路上，而从此以后，英国的政策就被它想牢牢抓住印度的欲望所控制。1869年，苏伊士运河顺利通航，从而大大缩短了欧洲到印度的旅程；对英国而言，埃及变得更有价值了，因为埃及可以控制运河，所以也就可以控制通往印度的海路。

所以，作为机械革命的结果，资本主义文明遍布了整个世界，而欧洲在各处都处于支配地位。资本主义导致了帝国主义的产生。所以，这个世纪也可以称为帝国主义的世纪。可是，这个新的帝国主义时代与过去的罗马、中国、印度、阿拉伯和蒙古的帝国主义是极为不同的。一种新型的帝国出现了，它对原材料和市场充满了渴望。新帝国主义是新工业主义的产物。人们常说，“贸易跟随着旗帜”，而且

往往是旗帜跟随着《圣经》。宗教、科学、对自己国家的热爱，所有这些都只为了一个目标而被出卖了——对地球上的弱者和工业上更落后的民族进行剥削，好让大机器的主人和工业化的巨头们变得越来越富裕。披着真理和博爱外衣的基督教传教士往往是帝国的前哨。如果他们受到了伤害，那么他的国家就会以此为借口，夺取土地，并迫使当地人做出让步。

资本主义的产业和文明的体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帝国主义的产生。资本主义也导致了民族主义情感的加剧，所以你也可以把这个世纪称为民族主义的世纪。这种民族主义不仅是对自己国家的热爱，还是对所有其他国家的憎恨。这种对自己这片土地的赞美与对其他地方的轻蔑和贬低，必定会导致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欧洲不同国家之间工业的竞争和帝国的竞争，使事态变得更加糟糕。1814年至1815年的维也纳代表大会所确定的欧洲版图也十分令人气愤。根据这个版图，有些民族受到镇压，被迫处于其他民族的统治之下。波兰作为一个国家消失了。奥地利-匈牙利成了一个乌合之众的帝国，充斥着各色人等，彼此之间从心底里相互厌恶。在欧洲东南部的土耳其帝国包含了许多在巴尔干半岛的非土耳其的民族。意大利被分裂成了许多国家，有一部分是在奥地利的统治之下。人们不断试图通过战争和革命来改变这个欧洲版图。在上封信里，我提到过一些紧随在维也纳代表大会后所发生的一些战争和革命。在19世纪的下半叶，意大利设法摆脱了北部的奥地利人和中部教皇的控制，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不久之后，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德国也统一了。法国被德国打败了，而且受到了羞辱；德国还夺去了法国的两个边境省，阿尔萨斯和洛林（Lorraine）。从那一天起，法国就梦想着复仇。不到50年，一场血腥而可怕的复仇就发生了。

领头羊英国是欧洲国家里最幸运的国家了，它获得了所有最好的奖赏，对现状也十分满意。印度成了新型帝国的典范，对这片富饶土地的剥削形成了一条黄金的河流，源源不断地流向英国。所有想要建

立帝国的人，对于英国对印度的占有都十分嫉妒。他们想要按照印度的模式在其他地方建立帝国。法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德国人进入这个竞技场比较晚，给他们剩下的地方已经不多了。所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在这些“大国”之间，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紧张局势，因为这些国家都想吞噬更多的土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便会相互发生冲突。尤其在英国和俄罗斯之间，不断有摩擦发生，因为俄罗斯似乎从中亚威胁到了英国控制下的印度。所以英国总是在试图挫败俄罗斯。当俄罗斯在19世纪中叶打败了土耳其，并觊觎君士坦丁堡的时候，英国便前来解救土耳其了，他们把俄国人赶了回去。英国人这样做并非出于对土耳其的热爱，而是因为害怕俄罗斯，害怕失去印度。

德国、法国和美国迎头赶了上来，英国在工业上的优势越来越小了。到了19世纪末，情况到了危急时刻。对于这些欧洲国家的勃勃野心而言，世界太小了。它们之间相互惧怕、憎恨和嫉妒，这种害怕和憎恨迫使它们扩充军队和战舰数量，于是相互展开了疯狂的军备竞赛。不同国家之间也会结成联盟，与其他的国家抗衡。最终，在欧洲形成了两个对立的联盟体系——一个是以法国为首的联盟，英国私下是支持这个联盟的。另一个是以德国为首的联盟。欧洲成了一个武装的军营。工业、贸易和军备的竞赛愈演愈烈。在每一个西方国家，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被煽动起来，所以人民大众受到了误导，因而憎恨邻国的人们，并时刻准备着参加战争。

于是，一种盲目的民族主义开始控制欧洲。说来也奇怪，因为通信速度的提升，使各国人民的距离缩小了，而且旅行的人也更多了。人们可能会认为，人们对邻居的了解加深了，那么他们之间的偏见就应该缩小，他们的胸襟也会变得更加宽广。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发生了。但是在新的工业资本主义制度下，总体的社会结构偏偏会激发国与国、阶级与阶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摩擦。民族主义在东方也发展起来了，具体表现为对外国人的抵制，因为外国人正在控制和剥削着东方国家。起初，东方国家的封建残余在抵抗外来的

统治，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但是他们失败了，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后来兴起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并带着一种宗教色彩。渐渐地，这种宗教色彩退去了，一种西方式的民族主义出现了。在日本，他们躲过了外国的控制，但鼓励一种强烈的、半封建的民族主义。

亚洲从最早的时候就开始在抵抗欧洲的入侵，但是，当欧洲的军队所装备的新型武器变得越发高效强大的时候，这种抵抗也就变得不那么坚决了。欧洲科学的发展和机械的进步使得欧洲的军队比任何军队都要强大得多。因此，东方的军队在他们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只能绝望地卑躬屈膝。有些人说，东方是注重精神的，而西方是注重物质的。这样的说法很有欺骗性。当欧洲作为侵略者在18世纪和19世纪到来的时候，东方和西方的真正不同在于，东方还处于中世纪的状态，而西方已经在工业和机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印度和其他的东方国家一开始就被西方惊呆了，西方不仅有高效强大的军事，而且科学技术也十分先进。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使他们觉得在军事和技术上都有自卑感。然而，尽管如此，民族主义精神和抵御外国的入侵、赶走侵略者的欲望却在不断增强。20世纪初发生的一件大事，将对亚洲的思想倾向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就是日本打败了沙皇俄国。小小的日本却打败了俄罗斯，俄罗斯可是欧洲最伟大、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这使大部分人都极为震惊；在亚洲，这几乎是令人愉快的大惊喜。日本被看作亚洲抗击西方侵略的代表，所以一时间在整个东方很受推崇。当然，日本并非这样的亚洲代表，它只是为了一己利益而战，就像欧洲任何一个大国那样。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日本胜利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非常激动。我那时大概和你现在的年龄差不多。

所以，西方的帝国主义变得越来越具侵略性，东方的民族主义也在随之发展，也在与西方的帝国主义抗衡、战斗。整个亚洲，从西边的阿拉伯国家，到远东蒙古人的国家，民族运动已经形成；最初的发

展小心而稳健，后来，运动的要求也越来越极端。在印度，国大党成立了，并已经经历了最初的岁月。亚洲的反抗开始了。

我们对19世纪的概述还远没有结束，但是这封信已经很长了，必须得结束了。

108 ——19世纪续

我在上封信里给你讲了一些19世纪的突出特点，还有许多源自工业资本主义的事情。在大机器时代到来之后，西欧就处在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控制之下。西欧之所以在大机器的发展上走在了前面，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它占有煤矿和铁矿资源。对于大机器的制造和生产，煤和铁是必不可少的。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这种资本主义导致了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产生。其实民族主义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它以前就存在，只是变得更加强烈、更加狭隘了。同时，它使人团结，也造成了分裂；那些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的人们互相之间越来越亲密，但越来越疏远了生活在不同国家的其他人。爱国主义在每个国家都出现了并得到了发展，对外国人的讨厌和不信任也随之出现了。在欧洲，工业发达的国家像食肉猛兽那样虎视眈眈地相互怒目而视。英国得到的战利品最多，自然想保住这些战利品。但是，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特别是德国，这个世界上属于英国的领地太多了。所以，摩擦在加剧，最终导致了公开的战争。工业资本主义，以及衍生出的帝国主义，是这种摩擦和冲突的根源所在。似乎它们本身所固有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因为它们建立的基础就是冲突、竞争和剥削。所以，在东方，民族主义成了帝国主义最无情的敌人，而民族主义却是由帝国主义产生的。

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矛盾，但是资本主义的文明形式教会了人们许多有用的东西。它教会了人们什么叫组织性，因为大机器和大规模工业要想很好地运转，必须要有很好的组织性。它还教会了人们做大事时的合作精神。它教会了人们高效和守时。如果不具备这些品质，就不可能管理大工厂，或运营铁路系统。有时候人们说，这些品

质是典型的西方人的品质，东方人并不具备这些品质。在这一点上，如同在许多的其他问题上一样，不存在什么东方和西方的问题。这些品质是由工业主义培养起来的，西方因为已经工业化了，所以具备这些品质；而东方大部分还是农业国家，所以缺乏这些品质。

工业资本主义告诉人们财富是如何通过利用能源——也就是在大机器、煤和蒸汽的帮助下——创造出来的。这是它做出的另一项贡献。过去人们担心世界上没有足够的财富，所以必然会有很多的穷人，但是这个担心已经站不住脚了。在科学和机器的帮助下，人们可以为全世界的人口生产出足够的食物、衣服和所有其他的生活必需品。这样，生产的问题就解决了，至少是从理论上解决了。然而，问题的解决也就到此为止了。毫无疑问，财富被大量地生产出来，可是穷人依然贫穷，事实上，反而变得更加贫穷了。在欧洲的控制之下，当然会在东方和非洲国家上演赤裸裸的、无耻的剥削。没有人在意生活在那里的不幸的人们。但是，即使是在西欧，依然存在着贫穷，而且贫穷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有一段时间，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剥削为西欧带来了财富。这些财富的大部分是属于上层那一小撮富人的，但是有一些渗漏到了比较贫穷的阶级，他们的生活水平也稍微提高了一点儿，人口也大量增加了。

但是大部分的财富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以剥削亚洲、非洲和其他非工业化国家的人民为代价的。这种剥削和财富的产生在一段时间里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即使这样，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分歧也在加大，贫富差距在加深。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群，两个分离的民族。19世纪英国伟大的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这样描述他们：

> 两个族群，他们之间没有交集和同情，他们对彼此的爱好、思想和情感一无所知，仿佛他们是不同地区的居民，或是不同星球的栖息者；他们是用不同的方式养育出来的，吃的是不同的食

物，收到的是不同态度的指令，受到的是不同法律的统治……这就是富人和穷人。

工业的新形势把大量的工人带进了大工厂，因此一个新的阶级出现了——工厂的工人阶级。这些人与农民和田间工作者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农民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天气和降雨。这些都是他们无法控制的，所以他们开始认为他们的苦难和贫穷是因为超自然的原因造成的。于是他们就变得迷信了，忽视了经济的原因。他们过着乏味而无望的生活，听天由命，因为他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工厂的工人是用机器进行工作的，而机器是由人制造的；无论季节如何，下不下雨，他们都可以生产产品；他们创造了财富，却发现财富大多流入了别人的腰包，而他们自己仍然很贫穷；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以看见运转中的经济规律。所以，他们不会想到超自然的原因，也不像农民那么迷信。他们不把贫穷归罪于上帝，而是归罪于社会或者社会制度，尤其是那些把工人的劳动成果利润的大部分都据为己有的资本家。所以，他们具有阶级意识，看出有不同的阶级存在，上层阶级掠夺了他们这个阶级。这就导致了不满和造反。最初不满的轻声抱怨是含糊而单调的，最初的造反也是盲目、软弱、缺乏思考的，所以很容易就被政府镇压了。因为现在的政府完全代表新生的中产阶级的利益，而新生的中产阶级又控制着大工厂及其衍生物。但是，饥饿是不可能被长期压制的。不久，贫穷的工人和他们的同志们一起，在工会里找到了新的力量源泉。于是，工会形成了，它们保护工人，并为工人的权利而战。最初，它们只是些秘密的团体，因为政府甚至不允许工人组织起来。政府必定是一个阶级的政府，它竭尽全力、不择手段地保护它所代表的阶级，这已经越来越显而易见了。同样，法律也是阶级的法律。

渐渐地，工人的力量壮大了，他们的工会成了强大的组织。不同行业的工人发现，在对抗掌权的剥削阶级的问题上，他们的利益实际

上是一致的。因此，不同的工会在一起合作，一个国家的工厂工人成了一个有组织的群体。下一步是让不同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因为他们也感觉到，他们的利益是共同的，敌人也是共同的。于是他们喊出了口号：“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国际工人组织便应运而生了。同时，资本主义的工业也在发展，成了国际性的工业。所以，在任何工业资本主义发达的地方，就会有工会和资产阶级的对抗。

我已经往前讲得太快了，必须回过头来。但是，19世纪的世界是一个许多趋势混杂在一起的世界，而且它们之间往往相互抵触，所以很难把所有的趋势都审视一遍。我想知道，你是如何看待这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国际主义、财富和贫穷的奇特混合状态的？可是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奇怪的混合。我们不得不照单全收，并尽力去理解它，然后再去改善它。

这种不合时宜的混杂使欧洲和美国的许多人开始了思考。19世纪初，在拿破仑垮台之后，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没有什么自由。有些国家，是国王的专制统治，而有些国家，像英国，是一个小的贵族和富裕阶级在掌权。我说过的，到处都在压制自由的思想。可是尽管如此，美国和法国的革命还是让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了解并领会了民主和政治自由的思想。的确，民主开始被看成能够消除国家和人民所有不幸和麻烦的手段。民主的理想就是应该没有特权，国家应该从社会和政治价值上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当然，人与人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强壮，有些人更聪明，有些人更无私。但是信奉民主的人说，不论他们有什么不同，人都应该有同等的政治地位，而这就需要给每个人选举权。进步的思想家和自由主义者坚定地相信民主的好处，而且竭尽全力要实现民主。保守派和反动派反对他们，于是到处都是激烈的斗争。一些国家发生了革命。英国在扩大选举权之前——也就是更多的人有选举议员的投票权——几乎到了爆发内战的边缘。

然而，民主逐渐在很多地方取得了胜利，到19世纪末，在西欧和美国，至少大部分的男人有了选举权。民主是19世纪的伟大理想，所以19世纪也被称为民主的世纪。民主终于赢得了胜利，然而，当民主到来的时候，人们又开始对它失去信心了。他们发现，民主并没有结束贫穷和苦难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许多矛盾。选举权对于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而当他可能会为了一顿饭的代价而出卖他的投票权和服务时，那么自由有多大的价值呢？所以，民主已经丧失了名誉，或者，正确地说，政治民主已经不再受欢迎了。不过这是19世纪之后的事了。

民主应对的是政治方面的自由问题。它反对独裁和其他的专制体制。但是对于正在出现的工业问题或者贫穷问题或者阶级矛盾问题，它却没有提出特别的解决方案。它的重点放在每个个体的理论上的自由上，让每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工作，希望他能够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以各种方式提升自己，这样，社会才会进步。这就是自由放任主义的教义，关于这个教义，我在之前的信中已经提到过。但是，个人自由的理论是行不通的，因为为了薪水而被迫工作的人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由。

工业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主要困难是：那些辛苦工作、服务于社区的人们获得的薪水是很低的，而收益却让那些不工作的人拿走了。这样收益和服务就被剥离开来。这一方面导致了劳动者的贫困潦倒；另一方面，它创造了一个阶级，他们可以从工业中榨取利润，而自己无须工作或以任何方式创造财富。这就像农民在土地上劳作，而印度的地主自己无须在土地上劳作却从农民的劳作中获利一样。这种劳动成果的分配显然是不公平的；更重要的是，不像那些长期默默忍受的农民，工人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并为此愤愤不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了。在所有的西方工业化国家里，这些差异变得十分引人注目，所以有思想的、认真的人们于是开始努力想找到走出这种困境的出路。于是，一种叫作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出现了，它

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的敌人，并且也许注定要取代资本主义。在英国，社会主义是以比较温和的形式出现的，而在法国和德国，社会主义的革命性则更为强烈。在美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人口相对很少，所以人们有很多的发展机会，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带给西欧的不公正和苦难，在美国却不是很明显。

19世纪中叶，德国出现了一个人，他注定要成为社会主义的预言家和共产主义之父，他的名字就是卡尔·马克思。他不只是位模糊的哲学家，或是讨论学术理论的教授，他是位讲究实际的哲学家，他把科学方法运用到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研究中，试图找到革除世界弊端的方法。他说，迄今为止，哲学都只是试图解释世界的，共产主义必须努力改变世界。他和另一个叫作恩格斯（Engels）的人发表了《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这就是他的哲学大纲。后来，他用德文写的伟大巨著《资本论》（*Capital*）出版了；在书中，他从科学的角度回顾了世界历史，并指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以及如何才能够加快社会发展的进程。在这里，我不打算解释马克思的哲学。但我想让你记住，马克思的著作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天，它是共产主义俄国的《圣经》。

19世纪中叶，另一部轰动一时的著名著作在英国出版了，这就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达尔文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也就是说，他观察和研究自然，尤其是植物和动物。他用很多例子告诉人们，植物和动物是如何在自然界生长发育的，一个物种是如何通过自然选择的过程变成另一个物种的，简单的形式是如何逐渐变得更复杂的。这种科学的推理与一些关于创造世界、动物和人类的宗教教义是完全对立的。于是在科学家与这些宗教教义的信徒之间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真正的冲突与其说是关于事物的真实性，还不如说是关于对生活的总体态度。狭隘的宗教态度主要是一种恐惧、魔力和迷信的态度。社会不鼓励推理，人们只需相信他们听到的教义就行了，不要提出任何质疑。许多问题

都被裹上了虔诚和神圣的神秘外衣，不能揭开，不能触碰。而科学精神和方法却与此大相径庭，因为科学是带着好奇去发现一切。它不把任何事情看作理所当然的，那些被认为神圣的事物也不会把它吓跑。它探索一切事物，不鼓励迷信，只相信能被实验和推理所证实的事情。

科学精神在这场与陈旧的宗教观念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大多数思考这些问题的人，甚至早在18世纪就成了理性主义者。你应该记得我说过大革命前法国的哲学思潮。但是现在变革已经深入到了社会之中。受过教育的普通人已经开始受到科学进步思想的影响了。他们也许并没有十分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对科学也知之甚少。但是他们会情不自禁地对自己亲眼所见的发明和发现的盛典充满敬畏。铁路、电、电报、电话、留声机和许许多多的其他东西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它们都是科学方法的产物。人们欢呼科学的胜利。人们认为，科学不仅能够增长人们的知识，而且还能提高人类对大自然的控制力。所以科学赢得了胜利，人们在这个全能的新上帝面前顶礼膜拜，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19世纪的科学家们变得十分自满，对自己信心十足，对自己的想法也非常肯定。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可是今天科学家的态度与19世纪的自满和自信的态度已经大为不同了。今天，真正的科学家认为，知识的海洋是广阔无垠的，尽管他们试图在这个海洋里遨游，但是他们比前辈们更谦卑、更踌躇。

19世纪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西方在大众教育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这却遭到了许多统治阶级的强烈反对，他们说这会使平民有不满情绪，富有煽动性，傲慢无礼和不信基督教！根据这个论据，基督教存在于无知以及甘愿对有钱有势者的顺从之中。开始，尽管大众教育遭到了反对，但小学还是建立起来了，大众教育得到了推广。就像19世纪的其他特点那样，这个特点也是新工业主义的结果，因为大工厂和大机器需要工业的高效率，而高效率只能通过教育才能产生。这

一阶段的社会需要大量的、各行各业的技术工人，大众教育满足了这个需求。

基础教育的普及产生了一大批有读写能力的人，他们几乎不能称为受过教育的人，但是他们能读书写字，于是读报的习惯也普及了。便宜的报纸出版了，而且发行量很大，它们开始对人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事实上，它们经常误导人们，激发他们反对邻国的情绪，进而引发了战争。但是，无论如何，“报刊”成了一股需要重视的力量。

我在这封信里写的主要是欧洲的情况，尤其是西欧的情况。在北美，情况也大致相同。但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除了日本之外的亚洲和非洲，都只能被动地承受欧洲的政策带给它们的苦难。之前我也说过，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欧洲似乎填满了整个画面，欧洲占据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亚洲控制着欧洲。有一些阶段，文明和进步的中心在埃及或伊拉克或印度或中国或希腊或罗马或阿拉伯。但是古老的文明已经枯竭、僵化，丧失了活力。变革和进步的活力元素已经离开了它们，生命力传递到了其他地区。现在轮到欧洲了，欧洲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有力地控制着一切，因为通讯的巨大进步使得消息可以很轻松、快捷地传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19世纪是欧洲文明开花结果的世纪——它被称为资产阶级文明，因为工业资本主义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控制支配着这种文明。我已经讲过这种文明的许多矛盾和缺点。在印度和东方，这些缺点表现得更为明显，我们正深受其害。但是，无论是国家还是人民，如果不具备伟大的素质，就不可能达到伟大的境界，而西欧就具备这样伟大的素质。欧洲的显赫最终有赖于伟大的素质，而不是仰仗其军事力量。在欧洲，到处都充满了生命力、活力和创造力。欧洲产生了伟大的诗人、作家、哲学家、科学家、音乐家、工程师和实干家。毫无疑问，即使是西欧的普通人民大众也优于从前了。伟大的首都城市——伦

敦、巴黎、柏林、纽约——变得越来越大，它们的建筑变得越来越高，生活越来越奢侈，科学提供了成千上万种方法来减轻人类的辛苦劳作，增加生活的舒适和快乐。富有阶级的生活变得快乐而文雅，于是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自满、自足和虚情假意的情绪。这似乎已经到了一种文明得令人愉悦的中后期了。

于是，在19世纪下半叶，欧洲呈现出了一种愉快、繁荣的面貌。这种令人愉悦的文化和文明，至少在表面上看，似乎会永恒、进步，从胜利走向胜利。但是，如果你透过表面，向下窥视一眼，就会看到奇怪的骚动和许多令人不快的景象，因为这种繁荣的文化主要只是属于欧洲的上层阶级的，而且它是以对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剥削为基础的。你将看到我说过的一些矛盾、民族仇恨和帝国主义狰狞残酷的面目。那么，你就不会对19世纪文明的永恒和魅力如此确信了。身体的外表很美，但是在内心却有一个溃疡；虽然有人在大肆谈论健康和进步的问题，但是衰退正在吞噬着资产阶级文明的重要器官。

崩溃在1914年发生了。在经历了四年零三个月的战争之后，欧洲的确再度出现了，却带着还没有愈合的可怕伤痛。关于这些，我只好以后再告诉你了。

109 ——印度的战争和暴动

我们对19世纪已经做了很长的概述，现在让我们来仔细看看世界的某些地区，就从印度开始吧。

之前我告诉过你，英国是如何战胜在印度的对手的。很显然，法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被淘汰了。马拉地人、迈索尔的提普苏丹、旁遮普邦的锡克教教徒与英国人战斗了一阵子，但是他们没法进行长久抵抗。英国人显然是最强大的，装备也最精良。他们有更好的武器和更好的组织，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可以依赖的海上力量，即使在他们被打败的时候——这种情况也常常发生——他们也没有被淘汰，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其对海路的控制所获得的资源。然而对于当地的这些国家而言，失败往往意味着无法补救的灾难。英国人不仅装备更加精良，而且组织管理也更高效，他们比当地的对手要聪明得多，还善于利用对手之间的矛盾。所以，英国不可避免地在继续扩张，对手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倒，而且往往是在下一个将被打倒的对手的帮助之下。那时印度的封建族长们目光极为短浅，短浅得让人吃惊，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联合起来抵御外敌，他们都是孤军作战，然后失败了，这也是必然的结局。

英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它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越来越凶残。它找借口发起战争，或者没有任何借口就发起战争。这样的战争数不胜数，可我不打算对它们进行赘述，这会让你厌烦的。战争不是令人愉快的话题，而在历史上，人们给战争赋予了太多的重要意义。但是，如果我对战争避而不谈，那么画面就不完整了。

我已经给你讲过发生在迈索尔的海德尔·阿里和英国人之间的两场战争。在这两场战争中，海德尔·阿里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他的儿子提普苏丹是英国人的死敌。又经历了两场战争，一场发生在1790年至1792年，另一场发生在1799年，英国人才杀死了他。提普是在战斗中牺牲的。在迈索尔城的附近，你还能看到他的旧都城塞林伽巴丹（Seringapatam）的废墟，他就被安葬在那里。

挑战英国霸权地位的，还剩下马拉地人。他们在西边有佩什瓦（Peshwa），还有瓜廖尔的辛迪亚和印多尔的哈卡尔，还有其他一些首领。但是，马拉地人的两位伟大政治家，瓜廖尔的马哈达吉·辛迪亚（Mahadaji Scindia）死于1794年，佩什瓦的大臣纳纳·法那威（Nana Farnavis）死于1800年。这两位伟人死后，马拉地帝国便分崩离析了。但是马拉地人很难对付，在他们最终于1819年被推翻之前，英国人也经历过失败。马拉地人的首领是被分别打败的，因为在别的马拉地首领被打败的时候，其他首领都在袖手旁观。辛迪亚和哈卡尔成了附属于英国人的统治者，他们承认英国的宗主权地位。巴罗达的盖克沃尔甚至不战而降，直接向英国人妥协了。

在离开马拉地人之前，我想向你提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在印度的中部已经大名鼎鼎。她就是阿希丽雅·巴依（Ahalya Bai），是1765年至1795年这30年印多尔的统治者。她登上有垫宝座的时候，是一位30岁的年轻寡妇。她治理国家，成绩斐然。当然，她并不遵守深闺制度，马拉地人是从不遵守这个制度的。她对国家的事务总是亲力亲为，坐镇空旷的宫廷，把一个小村庄发展成了一座富足的都市。她避免了战争，维护了和平，使她的国家繁荣昌盛；而这个阶段，印度大部分国土正处于骚动混乱之中。在印度中部，她至今仍然被看作圣人，人们非常尊敬她。

在最后一次马拉地战争之前，英国人于1814年至1816年与尼泊尔发生了战争。虽然他们的山地作战十分困难，但最终还是取得了胜

利。这样，台拉登地区，也就是我被监禁的监狱所在地，还有古毛恩（Kumaun）地区和纳尼塔尔（Naini Tal）都被纳入了英国的统治。你可能记得，我曾在关于中国的信中告诉过你关于一支中国军队穿越西藏，徒步翻过喜马拉雅山，在廓尔喀人的家乡尼泊尔打败了他们的惊人战绩。这是在英国-尼泊尔战争的22年前发生的。从那时起，尼泊尔就正式承认了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但是我认为它现在已经不再承认了。它是个独特的国家，十分落后，与外界没有交往，然而，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它的地理位置绝佳，而且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它不像克什米尔和海得拉巴是英国的附属国。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英国人要确保它的独立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骁勇善战的尼泊尔人民——廓尔喀人——被征入了在印度的英国军队，用来镇压印度人。

在东部，缅甸已经扩张到了阿萨姆邦。那么他们注定要和不断向前推进的英国人发生冲突。英国和缅甸发生了三次战争，每一次战争的结果都是英国人吞并一些领土。第一次战争爆发于1824年至1826年，其结果是阿萨姆邦被置于了英国人的统治之下；在1852年的第二次战争中，缅甸南部被吞并了。缅甸的北部——首都阿瓦（Ava）在曼德勒（Mandalay）附近——现在完全和大海隔绝了，处于干燥的高地上，任凭英国人摆布。最后，在1885年，第三次缅甸战争到来了，整个缅甸都被英国人吞并了，缅甸变成了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但缅甸在理论上还是中国的臣属国；事实上，缅甸过去是要定期向中国进贡的。奇怪的是，英国人在吞并缅甸的时候，竟然同意它继续向中国进贡。这表明，甚至在1885年，他们对中国的力量都还是十分钦佩的，虽然中国当时自己也是麻烦缠身。当它的臣属国缅甸遭到入侵的时候，它已经无法提供帮助了。英国人在1885年之后向中国进贡了一次，以后就停止了。

缅甸战争把我们带回了1885年。我本想给你讲讲这几次战争，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回到19世纪更早期的印度北方。在旁遮普邦，一个伟大的锡克教国家在兰吉特·辛格的领导下建立了起来。19世纪初，兰

吉特·辛格成了阿姆利则的统治者。到1820年，他成了几乎整个旁遮普邦和克什米尔的统治者。兰吉特·辛格逝世于1839年，在他死后，这个锡克教国家很快就衰落、崩溃了。锡克教教徒诠释了古老的格言，即在逆境中崛起，在成功后衰落。当锡克教教徒还是一个被追捕的小部族时，即使是后来的莫卧儿人都镇压不了锡克教教徒。但是，随着政治上的成功，他们成功的基础被削弱了。在英国人和锡克教教徒之间爆发了两次战争，第一次是在1845年至1846年，第二次是在1848年至1849年。在第二次战争中，英国人在吉利扬瓦拉（Chiliānwāla）受到了重创。然而，到最后，英国人还是取得了完胜，占领了旁遮普邦。你可能会感兴趣——因为你是克什米尔人——英国人以大约750万卢比把克什米尔卖给了查谟（Jammu）地区的某个王公古拉·辛格（Gulab Singh）。当然，这次交易是没有克什米尔穷人的份儿的。现在，克什米尔是英国的附属国之一，现在那里的王公就是古拉·辛格的后代。

再向北，或者在旁遮普邦的西北部，是阿富汗人，而另一边，离阿富汗人不远处则是俄罗斯人。俄罗斯帝国在中亚的扩张令英国人心烦意乱。他们担心俄国会进攻印度。所以几乎在整个19世纪，他们都在谈论“俄罗斯威胁”。早在1839年，在印度的英国人就完全无故地对阿富汗人发起了进攻。那时，阿富汗的边界远离英国人的印度，旁遮普邦独立的锡克教王国出兵进行了干涉。然而，英国人还是进军至喀布尔，并使锡克教教徒成了他们的同盟。但是阿富汗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尽管他们或许在许多方面都很落后，但是他们热爱自由，为了自由他们会战斗到底。所以阿富汗对于任何入侵的外国军队而言，永远是一个“马蜂窝”。尽管英国人占领了喀布尔和阿富汗的许多其他地区，但是，突然间，到处都爆发了起义，英国人被赶了回去，整个英国军队受到了重创。后来，英国对阿富汗又进行了一次入侵，并对阿富汗人实施了报复。英国占领了喀布尔，炸毁了城市里的有篷大集市，英国士兵大肆掠夺，然后放火烧掉了城市的许多地方。但是很

显然，阿富汗是不会不战而降、轻易向英国人屈服的。所以，英国人撤退了。

在近40年之后的1878年，印度的英国人又一次因为阿富汗的统治者埃米尔向俄罗斯示好而心慌意乱。历史往往会重演。又一场战争爆发了，英国人入侵阿富汗，而且似乎已经胜利在握了，但此时英国人的使团被阿富汗人残杀了，还有一支英国军队也被打败了。英国人采取了一些报复措施，但最终还是从“马蜂窝”里撤了出来。在此之后的许多年里，阿富汗一直处于一个很奇特的位置。英国人不允许埃米尔与其他国家直接交往，同时，他们每年给他一大笔钱。13年前，也就是1919年，爆发了第三次阿富汗战争，结果阿富汗赢得了完全独立。但这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历史阶段之后的事情了。

还有一些小型的战争，其中一次特别厚颜无耻的战争是在1843年英国人强加给信德省的；那里的英国政府代表欺负信德人，刺激他们和自己开战，然后再镇压他们，并乘机吞并了信德省。为此，政府给有功的英国官员发放了奖金，这成了官员们的一项有利可图的副业；政府代表查尔斯·内皮尔爵士（Sir Charles Napier）分得了大约70万卢比！那个时期的印度吸引了一些肆无忌惮、喜欢冒险的英国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奥德在1856年也被占领了。当时的奥德，政府管理十分糟糕。很长一段时间，统治者都是地方行政大臣。本来，地方行政大臣是由在德里的莫卧儿皇帝任命的，作为他在奥德的总督。但是，随着莫卧儿帝国的衰退，奥德独立了，不过独立的时间并不长。后来的地方行政大臣完全是无能堕落之辈，而且即使他们想做点好事，也无力为之，因为东印度公司要横加干涉。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实权了，英国人对奥德的内政毫无兴趣。所以，奥德分崩离析，不可避免地成了英国的领地。

关于战争和兼并我已经说得够多了，也许已经说得太多了。但是，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正在发生的一个伟大进程的外部表现而已，而且这一进程一定要继续下去。在印度，旧的经济秩序已经日渐衰颓，这时，英国人来了。封建制度正在崩溃。即使那时没有外国人来这里，封建制度也不会存在很久了。就像在欧洲那样，它将会渐渐地让位于一种新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之下，新的生产阶级将拥有更大的权力。但是，在这个变化发生之前，当旧秩序断裂之时，英国人来了，他们毫不费力地走进了这个裂缝。与英国人作战并惨遭失败的印度统治者们已经属于过去的、正在消失的年代。他们的前面没有真正的未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英国人是注定要胜利的。他们加速了印度封建制度的灭亡，然而，奇怪的是，正像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那样，他们试图维持表面上的封建制度，于是在印度向新秩序发展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障碍。

于是，英国人成了印度历史变化过程的一个动因——这个变化过程就是封建的印度向现代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转变的过程。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然，与他们战斗的形形色色的印度统治者们对此也一无所知。一个注定要灭亡的制度很少能看到时代的征兆；很少意识到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和任务，应该在一些具有强大推动力的事件迫使它毫无尊严地退下去之前，就优雅地退出；很少能吸取历史的教训；很少能理解世界是在向前发展的；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把封建制度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即使这样，印度的封建秩序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所以还在徒劳地与英国人战斗。即使是这样，今天在印度和东方其他地方的英国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帝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世界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把大英帝国推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但是，当英国人在扩张之时，印度的封建秩序仍然在盛行。它希望夺回自己的权力，赶走外国人，于是孤注一掷，于1857年发动了大暴动。在整个印度，人们对英国人都非常不满。东印度公司的政策就

是挣钱，别的什么也不做；这个政策，再加上它的许多官员无知又贪婪，导致了人民普遍的贫困和悲惨的状况。甚至连英国人的印度军队也受到了影响，发生了许多小型的兵变。许多封建首领以及他们的子孙自然对他们的新主子怀有满腔仇恨，所以他们秘密组织了一场暴动。他们的组织活动主要遍及了联合省和印度的中部地区。然而，在印度的英国人对印度人的所做所想熟视无睹，所以政府对此毫无察觉。显然，印度人定下了暴动的日期，在很多地方同时行动。但是，一些在密拉特的印度军团行动过早地开始了，他们于1857年5月10日就发动了兵变。这个草率的行动打乱了暴动领袖制定的计划，因为它使政府提高了警惕。然而，这次暴动波及了整个联合省、德里、印度中部的部分地区和比哈尔邦。这不仅是一次军事政变，也是一场在这些地区发生的反对英国人的广大民众的起义。巴哈都尔沙阿（Bahadur Shah）是伟大的莫卧儿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他是位虚弱的老人，还是一位诗人。他被一些人推上了皇帝的宝座。暴动演变成了一场印度反对可恨的外国侵略者的印度独立战争。但这是旧的封建式的独立，上层依旧是独裁的皇帝，平民们仍然没有自由，但是他们很多人参加了战争，因为他们把自己贫苦窘困的悲惨境遇与英国人的入侵联系在了一起。在有些地方，他们认为是大地主的统治导致了他们的不幸。宗教仇恨也激励着他们，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全面参与了这场战争。

在好几个月里，英国在印度北部和中部的统治似乎已经岌岌可危了。但是，暴动的命运却由印度人自己决定了。锡克教教徒和廓尔喀人支持英国人，南方的尼查姆、北方的辛迪亚，还有许多印度其他王国也站到了英国人的一边。甚至除了这些背叛行为之外，这次暴动本身就已经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它是为了一个已经失败的秩序——封建秩序而战；它缺乏优秀的领导者，它没有良好的组织，内部始终都在不停地争吵。有些参与暴动的人残忍地屠杀英国人，玷污了自己的事业。这种野蛮的行为自然使在印度的英国人重整旗鼓，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给予了印度百倍、千倍的报复。英国人尤其被发生在坎普尔的大屠杀激怒了。据说，佩什瓦的后代纳纳·萨希卜（Nana

Sahab）先是许诺保证英国人的安全，之后又背叛了诺言，下令屠杀了英国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坎普尔修建了一口纪念井，以纪念这个可怕的悲剧。

在许多边远的驻地，英国人被暴动的人群包围了，有时候英国人会受到善待，但多数情况会遭到虐待。

尽管有很大的困难，他们还是在勇猛顽强地战斗。围困勒克瑙一战十分引人注目，与此相联系的有两个名字：乌特勒姆（Outram）和哈夫洛克（Havelock）。他们是英国人勇敢和坚韧的典范。1857年9月，德里的围困和陷落成了此次暴动的转折点。在此后接下来的好几个月里，英国人镇压了暴动。在镇压的过程中，他们到处制造着恐怖气氛。很多人遭到残忍射杀，大批人被炮弹打成了碎片，成千上万的人被吊死在路边的树上。据说，一位名叫尼尔（Neill）的英国将军从阿拉哈巴德进军至坎普尔的途中，沿途吊死了很多人，直到路边的几乎每一棵树都被用作了绞刑架为止。繁茂的村庄被彻底毁灭了。这是个可怕且惨痛的故事，我几乎不敢把所有残酷的事实都告诉你。如果说纳纳·萨希卜的行为背信弃义、野蛮残忍的话，那么许多英国军官则超越了他的野蛮百倍。如果说成群的、没有军官和首领领导的印度士兵犯下了残忍的、令人作呕的罪行，那么那些训练有素的、在军官带领下的英国士兵则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残忍和野蛮。我不想把这两者做比较。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可悲的，但是我们歪曲的历史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印度一边的背叛和残忍，而对另一边几乎只字不提。还要记住，当一个有组织的政府开始像暴民一样行事的时候，其残忍程度是暴民的残忍无法相比的。即便是今天，如果你去我们省里的许多村庄看看，你就会发现，那里的人们仍然对镇压暴动时降临在他们头上的恐怖情景记忆犹新。

在暴动和镇压的恐怖时期，有一个名字特别引人注目，就像是黑暗年代的亮光一般，这个名字就是拉克希米·巴依（Lakshmi Bai），

她是占西（Jhānsi）的拉尼（Rani，王妃），一个20岁的寡妇。她披上男人的战袍，走出去领导她的人民与英国人战斗。有很多讲述她那不屈的精神、战斗的才能和无畏的勇气的故事。甚至与她作战的英国将军都称她是暴乱的领袖中“最有才能和最勇敢的”。她在战斗中牺牲了。

1857年至1858年的暴动是印度封建制度的最后一次星火闪耀，它标志着很多事情的终结。它终结了伟大的莫卧儿帝国的皇族，因为巴哈都尔沙阿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都被英国军官霍德森（Hodson）在没有任何原因和未受到任何挑衅的情况下残忍射杀了。当时，霍德森正在将他们带往德里的路上。就这样，英国人卑鄙地终结了帖木儿、巴布尔和阿克巴的家族。

暴动还终结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现在由英国政府直接接管印度，英国的地方行政长官发展成了“总督”。19年之后，也就是1877年，英国女王被正式加冕为“印度女皇”（Empress of India），恺撒和拜占庭帝国的旧头衔被稍加改动后又在印度开始使用了。莫卧儿王朝不复存在了，但是，独裁的精神甚至独裁的象征还保留着，另一个伟大的莫卧儿帝国已经坐落在了英国。

110 ——印度工匠被淘汰

我们已经讲完了印度19世纪的战争。我很开心，我们现在可以继续考虑印度这一阶段发生的更重要的事情了。但你要记住，这些战争的受益者是英国，而为此买单的却是印度。英国人十分成功地实践了让印度人民为他们自己的征服行动买单的方法。印度人民也为英国人征服印度邻国的民族而付出了鲜血和财富的代价，而这些邻国——缅甸和阿富汗——与印度并没有什么矛盾。这些战争使得印度变得相当贫穷，因为所有的战争都意味着财富的毁灭。战争对于征服者而言也意味着奖金，这样的情形我们在信德省的战争中也看到过。尽管由于这些和其他的原因使得印度陷入了极端的贫穷，但为了能够付给股东丰厚的红利，黄金和白银仍然在源源不断地流入东印度公司。

我想我之前告诉过你，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早期是商人冒险家的天下，他们既做贸易，也肆意掠夺。东印度公司及其代理人用这种方式夺走了印度积累的大量财富。实际上这些财富都是有去无回的。但是在普通的贸易活动中，既有给予也有索取，可是在18世纪下半叶，在普拉西之战以后，所有的钱都在单向地流入英国。于是，印度过去的大量财富都被掠夺一空，这些财富帮助英国在重要的过渡时期发展了自己的工业。英国在印度的第一阶段是以贸易和赤裸裸的掠夺为基础的，这一阶段大致结束于18世纪末。

英国统治印度的第二阶段覆盖了整个19世纪，印度成了英国原材料的主要来源地，这些原材料被送到英国的工厂；同时，印度还是英国产品的市场。这一切都是以牺牲印度的进步和经济发展为代价的。在19世纪上半叶，东印度公司只是一家贸易公司，起初它只是挣钱和统治印度。然而，英国的议会对印度事务越来越关注了。然后，在

1857年至1858年的暴动之后，在上封信里我们已经知道，英国政府直接接管了印度。但是，这对于他们的基本政策并没有什么重大改变，因为政府所代表的阶级和控制东印度公司的阶级是同一个阶级。

在经济利益上，印度和英国有明显的冲突，而冲突的解决总是对英国有利，因为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甚至在英国工业化之前，一位著名的英国作家就指出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所造成的有害结果。他就是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

他的名著《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早在1776年就出版了，关于东印度公司的问题，他说：

> 一个代表唯一一家商人公司的政府，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也许都是最糟糕的政府。……被运往他们印度领地的欧洲商品，在那里应该被卖得越便宜越好；而印度当地生产的商品应该在那里卖得越贵越好，这才符合东印度公司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利益。而东印度公司作为商人，情况正好相反。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的利益与他们统治的国家是一致的。而作为商人，他们的利益则与国家的利益截然相反。

我告诉过你，当英国人来到印度的时候，旧的封建秩序正在崩溃。莫卧儿帝国的陷落在印度的许多地方造成了政治混乱和骚动。但即便如此，“18世纪的印度仍是一个伟大的制造业国家和伟大的农业国家，印度的手工织机供应了亚洲和欧洲的市场”，印度经济学家R. C.杜特（Romesh Chundra Dut）曾这样写道。在我的这些信里，我告诉过你，在古代的时候，印度控制着国外的市场。埃及4000年的木乃伊就是用精致的印度平纹细布包裹的。印度工匠的技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闻名遐迩。即使在印度政治上衰败的时候，工匠们也没有忘记灵巧的双手。为了做贸易而来到印度的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商人，不

是到这里来卖外国的产品，而是来购买印度生产的精美雅致的商品，然后在欧洲出售，从中赚取很高的利润。因此，欧洲商人首先不是被原材料吸引来的，吸引他们的是印度制造的产品。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获得统治权之前，做着利润很高的生意，即出售印度产的亚麻织品、毛料衣服、丝绸衣服和绣花织品。尤其是印度的纺织业——也就是在棉织品、丝绸织品和羊毛制品的生产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R. C.杜特说："织布是印度的民族工业，纺纱是几百万名妇女的职业。"印度的纺织品到了英国和欧洲的其他地方，到了中国、日本、缅甸、阿拉伯和波斯，以及非洲的一些地方。

克莱武曾在1757年将孟加拉地区的穆希达巴德描述为一个"像伦敦一样广阔、人口稠密而又富裕的城市，只有一个差异，那就是个体之间的贫富差距十分巨大"。这一年就是普拉西之战发生的那一年，就在这一年，英国人终于在孟加拉地区站住了脚。孟加拉地区虽然政治在衰退，但还是很富裕，拥有许多工业，并将它精致的织物源源不断地送到世界的各个地区。达卡（Dacca）尤其以它精美的平纹细布而出名，做了大量的平纹细布的出口贸易。

所以，这一阶段印度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粹的农业和乡村的阶段。当然，印度那时是，现在还是，而且一定还会长久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但是，随着乡村生活和农业的发展，城市生活也在发展。在这些城市里，工匠和手艺人聚集在一起，于是，集体生产就出现了——也就是说，出现了一些聘用了100多名工匠的小工厂。当然，这些工厂与后来出现的大机器时代的大工厂没法相比。在西欧，尤其是在尼德兰，在工业主义到来之前，有很多这样的工厂。

印度正处于一个过渡的阶段。它是个制造业国家，资产阶级正在这些城市里逐步形成。这些工厂的主人是资本家，他们把原材料提供给工匠。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阶级将成长得非常强大，

就像在欧洲一样，足以取代封建阶级。就在此时，英国人插了进来，给印度的工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起初，东印度公司鼓励印度的工业，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赚钱。在外国出售印度产品给国家带来了黄金和白银。但是英国的制造商不喜欢这样的竞争，所以在18世纪初，他们劝诱他们的政府对进口来英国的印度产品征税。有一些印度商品遭到全面禁止，不准进入英国，而且我相信，任何人在公共场合穿某种印度布料制成的衣服，已会被定为犯罪行为。他们可以在法律的帮助下强行抵制印度商品。目前，在印度，谁如果说起要对英国布匹进行联合抵制，谁就会招来牢狱之灾。英国对印度产品的联合抵制政策本身并不会产生多大的危害，因为还有许多其他的市场。但是英国当时恰好通过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因此英国蓄意开始实施了一项政策，即以牺牲印度的工业为代价，鼓励英国的工业。英国的产品可以不用支付任何关税就进入印度。在印度，工匠和手艺人不断受到骚扰，被迫在东印度公司的工厂里做工。由于英国人征收转口税——也就是产品从一处运往另一处时必须支付的税款——甚至连印度的国内贸易也遭到了重创。

印度的纺织业十分高效，甚至连新兴的英国大机器工业也无法与之竞争，所以得通过80%的征税加以保护。19世纪初，一些印度丝绸制品和棉织品可以在英国市场上出售，但是售价比英国生产的产品低很多。但是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持久的，因为印度的统治者英国一心想要压倒印度的工业。无论如何，随着英国对印度工业的不断压迫，印度家庭小工业不可能长期与大机器工业抗衡。因为大机器工业能更高效地生产出大量的产品，所以这些产品比家庭小作坊的产品要便宜得多。印度还没来得及逐步让自己适应已经变化的新形势，英国就强行地加速了这一进程。

所以几百年来作为“东方世界的兰开夏郡”、并在18世纪向欧洲供应了大量棉布产品的印度，已经丧失了制造业国家的地位，成了英

国产品的消费者。机器并没有像通常情况那样来到印度，但是机器制造的产品从国外进来了。从印度流出的潮水把印度产品带到外国，再把黄金和白银带回印度。可是现在这股潮水被逆转了。从此以后，外国的产品来到印度，黄金和白银则流出了印度。

印度的纺织业是在这场袭击中第一个崩溃的产业。随着机器工业在英国的发展，其他印度工业也重蹈了纺织业的覆辙。一般来说，保护和鼓励国家工业是国家政府的职责。可是东印度公司根本不保护和鼓励国家的工业，而是镇压与英国工业发生冲突的所有工业。印度的造船业也崩溃了，金属加工工人已经难以为继，玻璃制造业和造纸业也衰落了。

最初，外国的产品进入了港口城市和靠近它们的内陆地区。随着道路和铁路的建成，外国的产品越来越深入内地，甚至把村庄里的工匠也赶走了。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英国离印度更近了，将英国产品运到印度也变得更便宜了，所以越来越多的外国机器产品来到印度，甚至到了遥远的乡村。这一过程贯穿了整个19世纪，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在继续发生。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这种现象已受到了一些制约，我们以后再谈这个问题。

以布匹为主的英国产品的扩散和逐步发展，终结了印度的手工业。可是还有一个更加可怕的后果。几百万失业的工匠怎么办呢？大批失业的织布工和其他工人怎么办呢？在英国，当大工厂出现的时候，工匠们也失业了。他们吃了很多的苦，但是他们在新的工厂里又找到了工作，所以他们适应了新的环境。但是在印度没有这样的选择。他们没有工厂可去，英国人不想让印度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所以不鼓励发展工厂。因此，贫穷、无家可归、因失业而饥肠辘辘的工匠们又回到了土地上。但土地也并不欢迎他们，土地上的人已经太多了，再没有土地给他们了。一些失业的工匠设法变为了农民，但是大多数人成了没有土地、不停地找工作的工人。还有大批的人一定是

饿死了。据说，1834年，印度的英国总督曾报告说："在商业的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可以与之相比的悲惨状况。棉纺织工的白骨把印度的大片土地都变白了。"

大多数的织布工和工匠过去都居住在城镇和城市里，现在他们没有了工作，又漂泊回到了土地和村庄里。所以城镇人口下降了，农村人口增加了。换句话说，印度变得更加乡村化而不是都市化了。这种乡村化在整个19世纪不断加剧，即使到现在都还没有停止。印度在这一时期的情况是件很奇怪的现象。在全世界，机器工业和工业化的作用是把人们从乡村吸引到城镇里。而在印度，趋势正好相反。城市和城镇变小了，失去了活力。越来越多的人依附于农业，过着很艰辛的生活。

除了主要的工业以外，许多次要的、从属的工业也开始消失了。梳棉、印染、印花工艺等工业的规模也越来越小了；手工纺纱已经停止了，手纺车也从几百万个家庭里消失了。这意味着农民失去了一个额外收入的来源，因为农民家庭成员进行纺纱，可以帮助其增加收入。当然，当机器工业开始发展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曾在西欧发生过。但是，在那里发生的变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如果旧秩序消亡了，同时就会有新秩序诞生。而在印度，这种变化来得异常剧烈。家庭小工业的旧秩序是被杀死的，但是，并没有新秩序诞生；为了保护英国工业的利益，英国当局不允许新秩序诞生。

我们已经看到，当英国人在印度夺取了权力的时候，印度是一个繁荣的制造业国家。按照正常的步骤，下一步应该使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工业国家，并引进大机器。但是，由于英国人所采取的政策，印度不仅没有这样向前发展，反而向后倒退了。它甚至不再是一个制造业国家了，成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趋向于农业的国家。

可怜的农业不得不支持这些大批失业的工匠和其他的人员。这些对土地的压力是十分可怕的，但是压力还在不断加剧。这就是印度贫

困问题的基础。我们的不幸大多源自英国人的这项政策。除非这个基本问题解决了，否则印度农民和乡村居民的贫困和不幸就不会结束。

太多没有职业、只依赖农业、依赖土地的人，把他们的农场和财产分割成小块。但是没有足够的土地和财产分给每个人。每个农民家庭所拥有的一片土地太小了，不足以供养一个家庭过上体面的生活。即便是在最好的时节，贫穷和半饥饿状态也总是和他们如影随形。但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好时节。他们完全是受季节、自然环境和季风的支配。饥荒来临，可怕的疾病蔓延，夺去了几百万人的生命。他们去找商人——村庄里的放债人——从那里借钱，他们的债务越滚越重，到后来连还债的希望都没有了，生活成了不能承受的负担。这就是19世纪在英国的统治下，印度大多数人的生活境遇。

111 ——印度的农民、村庄和地主

我在上封信里告诉过你，英国在印度的政策导致了印度家庭小工业的消亡，并迫使工匠们回到了村庄，依赖农业生存。就像我说过的，没有其他的工作而完全依赖土地生存的人太多了，给土地带来了太大的压力和负担，这成了印度的大问题。印度的贫穷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如果能把这些人从土地上转移开，并给他们其他的能创造财富的职业，那么他们不仅能增加国家的财富，而且对土地的压力也能大大减轻，甚至农业也将兴旺起来。

经常有人说，土地压力过大的原因与其说是因为英国的政策，不如说是因为印度人口的增长。这种论点是错误的。印度人口在过去的100年中的确增长了很多，但是其他国家的人口也大都增长了。事实上，在欧洲，尤其在英国、比利时、荷兰和德国，人口相应的增长幅度要大得多。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问题，或整个世界的人口增长问题，以及如何为这么多的人提供生计，在必要的时候如何限制人口增长，这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此我不能深谈这个问题，因为它可能扰乱其他的问题。但我想说清楚的是，造成印度土地压力过大的真正原因是缺少除农业以外的其他职业，而不是人口的增长。如果其他的职业和行业随时都有的话，那么印度目前的人口可能就很容易被吸收，并在印度茁壮生长。也许我们以后得考虑一下人口增长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看看英国在印度政策的其他方面。我们先到村庄去。

我经常写到关于印度的村务委员会，以及它们是如何经历了外国的入侵以及变革而存留下来的。到1830年，印度的英国总督查尔斯·梅特卡夫爵士(Sir Charles Metcalfe)是如此描述村社的：

> 村社是小共和国，他们几乎能自给自足，几乎不依赖与外部的联系。它们似乎永远存在，哪怕别的东西都消亡了。这种村社的联盟，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它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并让他们享受相当多的自由和独立。

这段描述对古老的村社制度充满了溢美之词。我们看到了一幅几乎是田园诗般的画面。毫无疑问，村社享有一定的地方自由和独立是一件好事，村社还有一些其他的特点。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这种制度的缺点。过一种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与外面的世界隔绝，这无益于进步和发展。发展和进步在于强强之间的合作。一个人或团体越是自我封闭，就越可能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心胸狭窄。与城市人相比，农村人往往心胸狭窄又迷信。所以，尽管村社有很多的好处，但是不可能成为进步的中心。它们比较原始、落后。手工业和工业主要是在城镇兴盛起来的。当然，也有大量的织布工散布在各个村庄里。

各个村社过着各自独立的生活，互相之间没有什么交集，造成这个状况的真正原因是他们缺乏交通工具。没有什么好的道路连接这些村庄。事实上，正是因为缺乏好的道路才使得国家的中央政府很难过多地干涉乡村事务。在大河岸边或者靠近大河岸边的城镇和乡村可以用船来相互联系。但是可以如此被利用的河流并不多。缺乏方便的交通工具，也阻碍了国内贸易。

很多年来东印度公司只对赚钱和向他们的股东分发红利感兴趣，他们很少花钱修建公路，对教育、公共卫生、医院和诸如此类的事务，他们更是一毛不拔。但是后来，当英国人开始全力以赴去购买原材料和出售英国的机器生产的产品的时候，他们便对交通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为了满足不断发展的对外贸易的需要，在印度的海岸边，新的城市出现了。这些城市——如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还有后来的卡拉奇（Karachi）——收集原材料，如棉花等，然后发往国外，

并接受外国的机器生产的产品，尤其是来自英国的，然后在印度分送并出售。这些新兴的城市与正在西方兴起的大工业城市，如利物浦（Liverpool）、曼彻斯特（Manchester）、伯明翰（Birmingham）和舍菲尔德（Sheffield）等十分不同。欧洲的城市都是制造业的中心，里面有制造产品的大工厂，还有发送这些产品的港口。但是印度的城市并不生产产品。它们只是对外贸易的仓库，同时它们也是外国统治的象征。

由于英国的政策，印度变得越来越乡村化了，人们离开城市，来到了村庄和土地上。尽管如此，这些新的城市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但是并没有影响印度的乡村化进程。新城市的发展使得较小的城市和城镇受到了损害，但没有使村庄受到损害。总之，乡村化进程还在持续着。

这些在海滨地区的新城市必须与内地相联系，才能够在原材料的收集和外国产品的分送上起作用。一些其他的城市，作为各省的都城或者行政中心，也发展起来了。于是对良好交通的需求更加迫切了。公路修建起来了，后来又修建了铁路。第一条铁路是1863年在孟买建成的。

古老的村社无法适应由于印度工业的毁灭所造成的形势变化。但是，当更多的优质公路和铁路建成并遍及整个国家的时候，已经存留了很久的古老村社制度终于崩溃、终结了。当世界来敲门的时候，小小的村社共和国就无法再与世界隔绝了。一个村庄里的商品价格立刻会影响到另一个村庄里的商品价格，因为商品可以很方便地从一个村庄运到另一个村庄。事实上，随着世界上交通的发展，加拿大或者美国的小麦价格会影响到印度的小麦价格。于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印度的乡村体制被拖进了世界价格的圈子。村庄里的旧经济秩序分崩离析了，而且让农民惊愕的是，一个新秩序被强加在他们身上。他们不再为了他们农村的市场而种植作物和其他东西，而是为世界市场而耕

作。他们被卷入了全世界的生产和价格的旋涡，而且越陷越深。过去，当收成不好的年景，印度就会发生饥荒，人们没有什么可以依赖，也没有适当的办法从国家的其他地区获得食物，因此食物严重短缺。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食物充裕，或者可以得到食物的时候，也会有人饿死。即使当地没有食物，也可以用火车或者其他的快速交通工具从别处把食物运过来。食物就在那里，但是农民没有钱购买食物，所以，短缺的是钱，而不是食物。更奇怪的是，有时候庄稼丰收带给农民的依旧是苦难，正如我们在前三年的萧条中所看到的那样。

所以，古老的村庄体制终结了，村务委员会也不复存在了。对此我们不必表示遗憾，因为这个体制早已经过时了，不适应现代的形势了。但是，旧的体制崩溃了，也没有一个新的村庄体制再生，以适应新的形势。重建和再生的工作还有待我们去完成。

我们已经考虑了英国的政策对土地和农民所产生的间接后果。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下东印度公司实际的土地政策是什么——也就是直接影响农民和所有与土地有关的人们的政策。这是比较复杂的，而且恐怕还很乏味。但是，我们的国家有很多这样的耕种者，我们应该努力搞清楚是什么使他们痛苦，以及我们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并改善他们的命运。

我们都听说过印度地主、征税官和他们的佃户；佃户有很多种，还有二佃户——也就是佃户的佃户。我不想带你去探究这些错综复杂的事情。概括性地说，今天的地主就是中间人——也就是说，他们站在耕种者和国家之间。耕种者是他们的佃户，向他们付租金，或者叫缴税，因为他们使用了土地，而土地是属于地主的。地主把租金的一部分缴给国家作为土地税入，作为对土地的征税。于是土地产出的农产品被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归属地主，另一部分归属国家，第三部分留给耕种的佃户。不要以为这三部分的数量是等同的。耕种者在土

地上劳作，因为他们的辛苦劳作、耕地、播种和其他的劳动，土地才能够产出农产品。显然，他们有权享受自己辛苦劳动的成果。而国家，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要为人民的利益行使其重要的职能，它应该为所有的孩子提供教育，建设优质的公路及提供其他交通工具，提供医疗和卫生服务，建设公园和博物馆，还有很多的其他东西。这一切都需要钱，所以国家从农产品中收取一定的份额也是合情合理的。至于这个份额应该是多少，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耕种者交给国家的，实际上又返还给他们了，或者说，应该返还给他们，而且是以服务的形式——公路、教育、卫生等。而目前，印度是代表外国政府利益的，所以我们往往会讨厌这个国家。但在一个组织良好的、自由的国度里，国家就是人民。

我们已经处理了土地农产品的两部分了——一份归属了耕种者，另一份归属了国家。第三部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归属了地主或中间人。他们做了什么？应该得到这些呢？根本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他就是从农产品中拿走了一大份——他的地租——但是他没有付出任何劳动。这样，他们便成了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不仅毫无必要，实际上还是累赘，是对土地的负担。自然，这个毫无必要的负担的最大受害者就是农民，因为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一部分收入缴给地主。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地主或征税官是完全不需要的中间人，土地持有及田赋征收制度是不合理的，应该进行改革，让中间人消失。目前，印度只有三个省——孟加拉地区、比哈尔邦和联合省——还有土地持有及田赋征收制度。

在其他的省邦里，耕种土地的农民们通常将土地税收直接上缴国家，没有中间人。这些人有时候被称作农民业主；有时候，如在旁遮普邦，他们也被称为地主，但是他们不同于联合省、孟加拉地区和比哈尔邦的大地主。

做了这么长的解释之后，我想告诉你，这个在孟加拉地区、比哈尔邦以及联合省十分盛行的土地持有及田赋征收制度，在印度是个比较新的事物，尽管我们现在听说了很多关于它的事情。它是英国人的发明，在他们到来之前是不存在的。

在过去，根本就没有地主或土地持有人或中间人。耕种者把他们农产品的一部分直接缴给国家。有时候，村务委员会代表村里的所有村民行事。在阿克巴的年代，他的著名的财政大臣，托达尔·马尔王公曾命人对土地进行了仔细的勘察。政府或国家从耕种者那里征收三分之一的农产品，如果他们愿意，可以用现金来支付。这样的税收总体来说不算重，税收也很缓慢地增加。接着，莫卧儿帝国崩溃了。中央政府变得衰弱了，无法正常地收税。然后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收税方式。政府任命收税人，他们没有工资，而是作为代理人，可以自己保留十分之一的税款。他们被称为“收税者”，或者有时候也叫“地主”或者“征税官”，但是请记住，这些词当时的意思和今天的意思是不同的。

随着中央政府的衰弱，这种田赋征收制度每况愈下，甚至到了如此的境地：政府对某一地区的税收权进行拍卖，出价最高的人就成了这个地区的收税者。这就意味着得到这个工作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尽可能多地从不幸的耕种者那里勒索钱财，而他们把这个权力用到了极致。渐渐地，这些收税者成了世袭的，因为政府太软弱了，无法免除他们的职务。

事实上，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地区第一个所谓的合法头衔就是代表莫卧儿帝国的收税者，这是由地万（Diwan）注于1765年授予的。于是东印度公司成了德里的莫卧儿皇帝的地万。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只是虚幻。在1757年的普拉西之战后，英国人在孟加拉地区占据了支配地位，可怜的莫卧儿皇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什么权力了。

东印度公司及其官员们十分贪婪。我已经告诉过你，他们掏光了孟加拉地区的国库，哪里有钱，他们的手就疯狂地伸向哪里。他们拼命地压榨孟加拉地区和比哈尔邦，从土地税收里索取尽可能多的钱财。他们创设了较小税区的税收地主，并对他们提出了过高的税收要求。土地税收在短时间内翻了一番。他们无情地向税收地主们收取土地税，如果谁不能按时缴纳，就会被赶走。接着，税收地主对耕种者也进行残忍的掠夺，耕种者被勒索高额租金，并被剥夺了土地。在普拉西之战12年后，即地万授予东印度公司税收地主头衔4年后，东印度公司的政策，再加上天气干旱，导致了孟加拉地区和比哈尔邦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三分之一的人口在饥荒中死去。我在以前给你的信里曾经提到过1769年到1770年的饥荒，我还告诉你，尽管如此，东印度公司还是收取了足额的土地税收。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在此值得一提，因为他们的工作效率非常之高。几千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饿死了，可是这些官员甚至能够从尸体上勒索到钱财，这样才能把大笔的红利支付给英国的有钱人。

这样的状况又持续了20多年，尽管发生了饥荒，东印度公司还是继续勒索钱财，美丽的孟加拉地区也被毁掉了。即使是大收税者也沦为了乞丐，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可怜的耕种者的生活状态了。情况糟到了让东印度公司警醒的地步了，他们也试图挽回糟糕的现状。当时的总督康沃利斯勋爵（Lord Cornwallis）本人就是英国的大地主，他想让印度也产生像英国那样的地主。收税者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充当着地主的角色。康沃利斯与他们达成了协议。他把他们就当作地主对待。结果，印度第一次有了这种新型的中间人，而耕种者沦落到了佃户的地位。英国人直接与这些土地租赁者或地主打交道，而这些土地租赁者或地主则可以对他们的佃户为所欲为。没有人保护这些可怜的佃户不受地主的强取豪夺。

康沃利斯与孟加拉地区和比哈尔邦的地主们在1793年达成的协议被称为“永久协议”。“协议”这个词意味着定下了每位地主向政府

缴纳的土地税收数量。对于孟加拉地区和比哈尔邦而言，土地税收数量已经永久性地固定下来，不能更改了。后来，随着英国人在西北部的统治扩张到了奥德和阿格拉，英国的政策发生了改变。他们与地主们达成了暂时的协议，而不是像孟加拉地区那种永久性的协议。每一个暂时性的协议都会定期修改，通常是每30年修改一次，重新制定土地税收应付的数额。通常每次修改协议，数额都会增加。

在南方，在马德拉斯及其周边地区，土地持有及田赋征收制度并不盛行。在那里，农民是土地的所有人，因此东印度公司便直接与农民达成协议。但是在那里，就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永不满足的贪婪驱使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把土地税收的数额定得非常高，使农民受到残忍的掠夺与勒索。不缴纳税款的农民就立刻被驱逐，可是，可怜的农民能到哪里去呢？由于对土地的压力过大，所以土地总是十分缺乏；总是有饥肠辘辘的人为了得到土地，情愿接受任何条件。骚乱和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因为长期受苦的农民也有忍无可忍的时候。

大约在19世纪中叶，另一种专制在孟加拉地区出现了。某些英国人为了继续进行靛蓝贸易，便自立为地主。他们与佃户就种植槐蓝植物订立了十分苛刻的协议。佃户们被迫在他们的部分土地上种植槐蓝，然后以固定的价格卖给地主或称为种植园主。这种制度被称为种植园制度。对佃户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所以他们很难做到。于是，英国政府来帮助种植园主了，它通过了特别法律，强迫贫穷的佃户按照政府提出的条件种植槐蓝。按照这些法律，对他们的惩罚是，这些种植园的佃户在某些方面将沦落为种植园主的农奴和奴隶。他们受到靛蓝厂代理人的恐吓，而这些英国和印度的代理人在政府的保护下感到十分安全。通常当靛蓝的价格回落的时候，种植其他的作物对耕种者来说利润更高，比如稻子，可是他们不被允许这样做。耕种者经历了很多的痛苦和不幸，最后他们怒不可遏了。逼人太甚，必有反抗。农民们起来反抗种植园主，洗劫了工厂。结果他们遭到镇压，不得不屈服了。

在这封信里，恐怕我已经用了很长的篇幅给你描绘了一幅19世纪农民状况的画面。我已经给你解释了印度农民的命运是如何变得每况愈下的；他们是如何受到所有接触他们的人的剥削的，如收税人、地主、商人、种植园主和他的代理人，还有最大的商人英国政府，要么通过东印度公司，要么直接进行剥削。因为所有这些剥削的基础就是在印度的英国政府蓄意制定的政策：不费吹灰之力就毁掉了家庭小工业，并以其他的工业取而代之；迫使失业的工匠到农村去，结果给土地带去了太大的压力；地主制度；种植园制度；对土地的重税造成了过重的租金，并且残忍地收取租金；迫使农民去找商人放债人，从此就无法逃脱他们的魔掌；无数人因为无法及时缴纳租金或税款被逐出土地；最主要的是，对警察和收税人、地主的代理人和工厂的代理人的永远的恐惧，这几乎毁掉了佃户们的精神和灵魂。那么这一切的结果，除了不可避免的、可怕的天灾人祸之外，还会好到哪里呢？

可怕的饥荒发生了，消灭了几百万的人口。奇怪的是，甚至当食物短缺，人们因为没有食物而挨饿的时候，富裕的商人们为了赚取利润，还把小麦和其他谷物出口到国外。但是真正的悲剧不是缺乏食物，因为食物可以用火车从国家的其他地区运过来，问题是人们没有钱购买。1861年，在印度北部发生了严重饥荒，尤其在我们的省邦，据说受灾地区81%至82%的人都死亡了。15年之后，从1876年开始的两年里，又一场严重的饥荒在印度的北部和中部以及印度的南部爆发了。联合省又是最严重的受害者，其他饥荒严重的地方还有中部的省邦和旁遮普邦的部分地区。死亡人数达1000万！20年后，即在1896年，大致也在同样这些不幸的地区，又发生了饥荒，比印度历史上任何一次都更加严重。这次骇人听闻的灾难把印度北部和中部彻底击倒、压垮了。1900年，又发生了一次饥荒。

在简短的一个段落里，我给你讲了在40年间所发生的4次大饥荒。如果我不告诉你，你也就无法意识到在这个恐怖的故事里所包含的可怕的苦难和惨状。事实上，我不确定我该不该让你意识到这些，因为

一旦你意识到这些，你就会愤怒并陷入极度痛苦之中，而我不希望你这么小的年纪就感受痛苦。

你听说过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她是那个第一次对战争中的伤员组织了有效护理的勇敢的英国女人。早在1878年，她就写道："在东方——不，可能是在全世界——所能看到的最悲惨的情景，就是在我们东方帝国的农民中间。"她还提到了"我们的法则之后果"就是"在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里，把许多衣食无忧的地方也变成了难以忍受的、长期半饥饿的地区"。

是的，不可能有什么比带着无望、惊恐眼神的农民深陷的双眼更悲伤的情景了。我们的农民这么多年来背负着多么沉重的负担啊！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家境殷实的人也一直是造成那个负担的一部分。我们所有的人，不论是外国人还是印度人，一直试图剥削那些长期受苦受难的农民，已经骑在了他们的背上了。那么他们的背压断了，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但是，后来农民们终于有了一点隐约的希望，能有好一点的日子，轻一点的负担。一个小个子男人出现了，他凝视着他们的双眼，看到了他们干枯的心，对他们长期的痛苦感同身受。在他的眼中有一种魔力，他的触摸带着热情，他的声音里充满理解、同情、无限的爱和至死的忠诚。当农民、工人和所有受压迫的人们看到他和听说他的时候，他们已死的心又复活、兴奋起来了，并生出奇怪的希望，他们大声叫喊着："圣雄甘地胜利！"他们愿意冲出苦难的山谷。但是，长久以来压迫他们的旧机器不会轻易放走他们。它又开始转动，生产出新的武器、新的法律和法规来压迫他们，用新的锁链来束缚他们。然后呢？那不是我要讲的故事和历史的一部分了。那仍然是属于明天的部分，当明天变成了今天，我们就知道了。但是，谁会怀疑呢？

---

1. 地万，是指印度邦政府首席部长，或旧时印度邦政府的财政部长，或印度的高级官员。——译者注

112 ——英国是如何统治印度的

关于19世纪的印度，我已经给你写了三封长信。这是个很长的故事，也是很长的痛苦，如果我把它压缩得太短，我担心会使它更难理解。我也许对印度故事中的这个阶段，比对其他国家或者其他阶段更加关注。这没有什么不合情理的。作为一个印度人，我对它更感兴趣，也更加了解，可以更全面地记述它。除此之外，这一阶段对我们而言，不只是对历史的兴趣，它还蕴含了更多的东西。当代的印度，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印度，是在19世纪的阵痛中形成并最终定型下来的。如果我们要理解现在的印度，就必须了解造就它和损坏它的那些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智慧地服务于它，知道我们该做些什么，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关于印度这一时期的历史我还没有说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在这些信里，我会给你讲述一个或者多个方面的问题，我会分别讲述每个方面的问题，这样，理解起来就会容易一些。当然，你要知道，我给你说的所有活动和变革，还有我在这封信以及以后要谈到的，大致都是同时发生的，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就是在它们中间产生出了19世纪的印度。

当你阅读在印度的英国人这些行为和罪恶的时候，对于他们奉行的政策及其造成的广泛的苦难，你有时候会感到非常气愤。可是这一切的发生又是谁的错呢？难道不正是因为我们的软弱和无知吗？软弱和愚蠢总会招致专制和暴政。如果英国人能够从我们之间的不和中受益，那么我们自己人之间争吵的责任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如果他们能够让我们分裂，使我们软弱，利用我们各个团体之间的自私，那么我们允许他们这样做，这本身就表明了英国人的优势。因此，如果你要

气愤，就应该对自己的软弱、无知和相互争斗而气愤，因为正是这些导致了我们今天的不幸。

我们常说英国人的专制制度，可究竟是谁的专制制度呢？谁能从中受益呢？并不是整个英国人民，因为数百万的英国人民也是不幸的受压迫者。毫无疑问，印度人中的一些小团体和阶级也能从英国人对印度的剥削中得到一些好处。那么我们如何划清界限呢？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我们一直生活在剥削和压迫印度数百万人民的巨大机器之下，这个机器就是新兴的帝国主义的机器，它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这种剥削所得的利润大部分都流入了英国，而在英国，它们几乎全部流入了某些阶级的腰包。剥削所得的利润也有一部分留在了印度，某些阶级成了受益者。所以，我们对个人，甚至对全体的英国人民感到气愤是愚蠢的。如果这个制度是错误的，伤害了我们，那么它就应该改变。谁是这个制度的管理者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即便是好人，在一个坏的制度里也将无能为力。就算是怀有世界上最美好的意愿，你也无法把石头和泥土变成好吃的食物，无论你将它们烧煮多久。我想，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是这种状况，它们是无法改良的，唯一真正的改良就是彻底地废除它们。但这只是我自己的意见，有些人并不赞同。你不必想当然地认同任何一种意见。在一定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得出结论。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错误在于制度。对某些个人的愤怒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们想要改变，就让我们抨击和改变这个制度吧。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制度在印度所造成的罪恶后果。当我们环顾中国、埃及和其他国家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同样的制度，同样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机器，它正在运转着，还在剥削着别的民族。

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故事吧。我告诉过你，当英国人入侵的时候，印度的家庭小工业已经处于一个很先进的阶段了。随着生产方式的自然进步，在没有外力干涉的情况下，机器工业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来到印度。国家有钢铁和煤炭，正如我们在英国所见到的，钢铁和煤炭将

大大促进新工业主义的发展；事实上，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新工业主义的出现。最终，新工业主义也会出现在印度。由于混乱的政治形势，使它的发生被耽搁了一段时间。然而，英国人介入其中了。他们所代表的是一个已经转变到了新的大机器生产的国家和社会。于是，人们可能会认为，他们会鼓励这样的变化也在印度发生，并对印度最有可能促使其发生的那个阶级给予鼓励。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事实上，他们所做的正好相反。他们把印度当成了可能的对手，于是他们破坏了印度的工业，实际上阻止了机器工业的发展。

于是，我们在印度看到了一个有些异乎寻常的事态。我们发现，英国人，这个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民族，在印度与最落后、最保守的阶级结成了同盟。他们支撑着奄奄一息的封建阶级；他们创立了地主阶层；他们支持成百上千的、在半封建的王国里附属于他们的印度统治者。他们实际上加强了印度的封建制度。然而，这些英国人一直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在欧洲的先驱，是他们给了议会权力；他们也是工业革命的先驱，而工业革命则让世界了解了工业资本主义。正是因为他们在这些方面的领先地位，他们才走在了对手的前面，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要理解为什么英国人会在印度有如此的作为并不困难。资本主义的整个基础就是残酷无情的竞争和剥削，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拥有权力的英国人消灭了他们真正的竞争者，并蓄意阻止了其他对手的发展。他们不可能与人民群众交朋友，因为他们在印度存在的全部目的就是对人民群众进行剥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利益是永远不可能一致的。所以，英国人就依赖了印度仍然保留的封建残余。即使这些封建残余在英国人到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剩下什么力量了。但是，他们受到了支撑，并从对国家的剥削所得中分得了一杯羹。然而，这种支撑能够给予一个早已经失去了效用的阶级的，只是暂时的救济而已。当这些支撑被挪走了之后，他们必然要倒下，或者使自己适应新的形势。印度大大小小的王国有700多个，它们都有赖于

英国人的亲善而存在。你知道其中的一些大的王国：海得拉巴、克什米尔、迈索尔、巴罗达、瓜廖尔等。但奇怪的是，这些王国的大部分印度统治者并不是古老的封建贵族的后代，正如大多数的大地主也并没有很古老的传统一样。然而，有一个乌代布尔的玛哈拉那，日系拉杰普特人的首领，他的家族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或许唯一活着的、可以在这方面与他竞争的人就是日本天皇。

英国的统治也帮助了宗教的保守主义。这听起来很奇怪，因为英国人宣称信仰基督教，可是他们的到来使印度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更加严厉、更为僵化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反应也很自然，因为外来的入侵往往使被入侵国家的宗教和文化严格地自我保护起来。就是这样，印度教变得更严厉了，而且在伊斯兰教入侵后，种姓制度发展了起来。现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都以这种方式做出了反应。但是除此之外，印度的英国政府——蓄意地或无意识地——帮助了这两个宗教中的保守分子。英国人对宗教和改变信仰的问题都没有兴趣，他们只想挣钱。他们害怕以任何方式干涉宗教问题，以免引发人民的愤怒，起来反抗他们。所以，为了避免甚至有人怀疑他们干涉宗教，他们实际上不惜保护和帮助所在国家的宗教，或者说是保护和帮助宗教的外部形式。结果往往是，外部的形式被保留了下来，但没有多少实质的内容。

因为害怕激怒那些正统派教徒，所以政府在改革问题上总是和这些人站在一起，于是改革的事业受到了阻碍。一个外来的政府很少会推行社会改革，因为它试图推行的任何改革都会受到人民的怨恨。印度教和印度教法规在很多方面都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尽管在最近几个世纪里，它的发展异常缓慢。印度教法规本身大多是习俗，而习俗是会变化和发展的。然而，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印度教法规的灵活性消失了，让位于严厉的法定规范，而这些法定规范是在向大部分的正统派教徒征求意见之后制定的。印度教社团的发展原本就很缓慢，

此后便彻底地停歇了。穆斯林对这种状况更为愤恨，于是便缄口不语了。

英国人把废除了被（错误地）称为殉夫自焚习俗的功劳都归于自己，殉夫自焚就是印度教徒的寡妇在她丈夫的火葬柴堆上把自己烧死。英国人对于这一习俗的废除有一定的功劳，但是事实上，政府是在印度教领袖拉姆·莫汉·罗伊（Raja Ram Mohan Roy）领导下的改革者们鼓动了很多年之后才采取行动的。在英国人之前，其他的统治者，尤其是马拉地人，曾经禁止了这一习俗；葡萄牙人也在果阿禁止过它。由于印度人的鼓动和基督徒的努力，它最终被英国人取缔了。在我的记忆中，这是英国人带来的唯一一次具有宗教意义的改革。

因此，英国人与印度所有落后、保守的人结成了联盟。他们试图使印度成为一个纯粹的农业国，为他们的工业提供原材料。为了阻止工厂在印度发展，他们实际上对进入印度的机器征收了关税。其他的国家都鼓励自己的工业。我们将要看到，日本在工业化之后向前疾速飞奔。可是在印度，英国政府坚决压制印度的工业。由于政府对机器征收关税，而且直到1860年才取消，因此，在印度建造一个工厂的成本是在英国建厂成本的4倍，尽管印度的劳动力要便宜得多。可是阻碍工业发展的政策只能延缓事物的发展，但是，它无法阻止事物不可避免地向前发展。大约在19世纪中叶，机器工业开始在印度发展起来。黄麻工业是用英国人的资金在孟加拉地区开始的。铁路的出现促进了工业的发展。1880年后，棉纺厂在孟买和艾哈迈达巴德发展起来，这主要使用的是印度的资金。接着就是采矿业。除了棉纺厂之外，这个缓慢的工业化进程中使用的主要是英国人的资金。所有这些都不顾政府的阻碍发展起来了。政府谈到要实行不干涉主义的政策，允许事物按照自己的进程发展，不干涉个人的首创精神。当印度的贸易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成为英国的竞争对手的时候，英国政府却开始干涉印度在英国的贸易，并用关税和禁令将其压垮了。而当他们成功之后，便可以大谈不干涉主义了。然而，事实上他们不只是毫不在意，他们

实际上阻止了某些印度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在孟买和艾哈迈达巴德正在发展中的棉纺织业。他们对这些印度工厂的产品征收了被称为棉花税的税收，其目的就是帮助来自兰开夏郡的英国棉织品与印度纺织品竞争。几乎每一个国家都会对某些国外的商品征税，要么是为了保护它自己的工业，要么是为了募集资金。但是英国人在印度的所作所为极为不同寻常。他们自己对印度的商品征税！尽管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棉花税还是一直在征收，直到近几年才取消。

就这样，现代工业在印度缓慢地发展起来了，尽管受到政府的压制。印度的富裕阶级越来越强烈地呼吁发展工业。我记得，直到1905年，政府才创立了一个贸易和工业部，可即使是这样，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它也没有什么建树。工业形势的发展创造出了一个在城市的工厂里工作的产业工人阶级。我告诉过你的，土地的压力以及农村地区的半饥饿状况，把很多村民赶到了工厂里，有些人去了正在孟加拉地区和阿萨姆邦兴起的大种植园。这种压力还导致了许多人移民到其他国家，因为他们被告知将得到更高的薪水。移民的主要国家有南非、斐济（Fiji）、毛里求斯（Mauritius）和锡兰。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给工人们带来什么好处。在有些国家，移民受到的待遇和奴隶差不多。在阿萨姆邦的茶叶种植园里，他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感到沮丧和灰心，于是后来又试图从种植园回到他们的村庄去。可是他们在自己的村庄也不受欢迎，因为已经没有土地给他们了。

不久，工厂的工人们便发现，稍微高一点的薪水并没有给他们多少帮助，城市的物价也更高，总体的生活成本要高得多。他们居住的地方是破旧简陋的小屋，肮脏、潮湿、阴暗而又不卫生。他们的工作条件也很差。在农村，他们经常挨饿，但是他们有足够的阳光和新鲜空气。而工厂的工人却享受不到新鲜空气和阳光。甚至连女人和孩子也得长时间地做工。抱着婴儿的母亲只好给孩子吃安眠药，这样，他们就不会干扰自己的工作了。这就是这些在工厂里工作的产业工人的

悲惨境况。他们当然是不幸的，因而不满情绪就会滋长。有时候，在极度绝望中，他们会举行罢工——也就是停止工作。但是，他们又软弱无力，而他们的雇主有钱，往往又有政府的支持，毫不费力地就把这些工人镇压了。渐渐地，在经过了许多痛苦的经历后，他们知道了联合行动的力量，于是，他们组织了工会。

不要以为这里描述的是过去的状况。在印度，劳动条件有了一些改善，也通过了一些法律，给予贫穷的工人一点点保护。可即使是现在，你只需到坎普尔和孟买，或是有工厂的其他一些地方看看；看到工人的住房，你就会惊骇万分的。

我在这里和其他的信里都提到了印度的英国人和印度的英国政府。这是什么情况，又是如何运作的呢？先是有了东印度公司，在它的后面是英国议会。1858年，在大暴动之后，英国议会直接接管了印度，后来，英国国王，或者说女王——因为那时是女王——加冕为印度女皇。在印度，最高的英国地方行政长官也变成了总督，在他之下有成群的官员。印度被分成了大的省和邦，大致就是现在的样子。在印度统治者领导之下的邦应该是半独立的，但事实上，它们完全是附属于英国人的。一种被称为“特派代表”的英国官员住在每一个较大的邦里，行使总的行政管理。他对国内的改革没有兴趣，邦政府多么糟糕或多么落后，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他感兴趣的是加强英国在印度邦的权力。

大约印度的三分之一被分成了这些邦，剩下的三分之二是在英国政府的直接领导之下。所以这三分之二的地区被称为“英国的印度”。在英国的印度，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是英国人，只是到了19世纪末，有几个印度人也爬上了这些位置。即便如此，所有的权力和权威当然的归属仍然是英国人。除了军队以外，这些高官都是被称为印度行政部门（Indian Civil Service，简称ICS）的官员。整个印度政府是由这个部门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政府，其官员是相互任命的，而且

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必对人民负责，因此它被称为“官僚机构”（bureaucracy），这个词来自“办事处”（bureau），即办公室的意思。

我们听到过很多关于印度行政部门的事情，他们是一帮奇怪的人。他们在某些方面的效率的确很高。他们组织政府，加强英国的统治，偶尔他们自己能由此大大地获利。所有帮助巩固英国统治和收税的政府部门都是很高效地组织起来的。而其他部门则被忽视了。由于印度行政部门不是人民委派的，也不对人民负责，所以它对那些主要是关乎人民利益的部门并不在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自然地变得傲慢自大，对公众的意见十分鄙视。他们目光短浅，开始把自己看成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印度的优点对于他们而言，主要都是他们自己的功劳。他们形成了一种相互赞赏的阶层，不断地相互吹捧。不受约束的权力和权威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些情况的发生，印度行政部门实际上成了印度的主人。英国的议会鞭长莫及，而且也根本没有理由去干涉他们，因为他们是为英国议会的利益和英国工业的利益服务的。至于印度人民的利益，是不可能对他们有什么显著影响的。而对他们行为的哪怕是微弱的批评也会让他们很气愤，他们是很不宽容的。

然而，印度行政部门也不乏很多善良、诚实而又能干的人。可是，他们无法改变政策的倾向，或者让推动着印度前行的潮流转向。毕竟，印度行政部门是英国的工业和金融利益的代理人，他们主要的兴趣就是剥削印度。

印度的官僚机构在涉及自己的利益和英国工业的利益方面都极为高效。但是，教育、卫生、医疗和其他许多能够使整个民族健康和进步的活动都被忽视了。很多年来，他们根本不考虑这些。古老的乡村学校消失了。后来，缓慢而极不情愿地，学校又开始建起来了。开始建学校也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需要。英国人占据了所有高级职位，但是

他们显然不可能占据更低的职位和办事员职位。政府需要职员，正是为了培养所需的职员，英国人才开办了最早的学校和大学。从那时起，这就一直是印度教育的主要目的，所以教育产物中的大多数都只能当职员。但是，不久，职员的供应就大于了政府和其他办公室的需求。许多人找不到工作，这些人形成了一个新的有知识的失业人群。

孟加拉地区在这种新式的英国教育上走在了前头，所以早期职员的供应大多来自孟加拉地区。1857年，印度建立了三所大学，分布在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有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穆斯林对这种新式教育不以为然，所以他们在职员和政府部门的竞争中落在了后面。后来，这成了他们感到怨愤的事。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即使当政府在教育上起步了，但是女性还是完全被忽略了。这并不令人诧异。因为这种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职员，需要的是男性职员。由于落后的社会习俗，那时只有男性的职位。所以女性彻底地被忽视了，只是在很久之后，才开始有了少量女性的职位。

113 ——印度再次觉醒

我告诉过你关于英国强化在印度的统治，及其给我们的人民带来贫穷和苦难的政策。和平当然来临了，也有了秩序良好的政府。人们在经历了莫卧儿帝国分崩瓦解所带来的一段混乱无序之后，对和平和有秩序的政府都十分欢迎。有组织的盗贼和强盗团伙被镇压了。但是，和平和秩序对于那些在土地和工厂劳作的人们没有太大的价值，因为他们被新政权的统治带给他们的沉重负担压垮了。可是，我还要提醒你，对一个国家或人民，或者对英国或英国人感到愤怒是愚蠢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境遇的受害者。研究历史使我们知道了生活往往是十分残酷无情而又麻木不仁的。对这一切过于激愤或只是去责怪别人，都是很愚蠢的，也是于事无补的。更加明智的做法是，努力搞清楚造成贫穷、苦难和剥削的根源，再努力消除这些根源。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而自己落后于事态的发展了，那么我们注定要受苦。印度就是这样落后了，它成了一个化石；它的社会形成于古老的传统；它的社会体制已经失去了生命和活力，开始进入停滞状态。所以，印度受苦受难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英国人碰巧是使它受苦受难的动因。如果他们没有到来，或许其他人也可能会如此行事。

但是英国的确给印度带来了一大好处。他们全新的、充满活力的生命冲击震动了印度，带来了一种政治上的统一性和民族属性。或许这样一种震动，尽管很痛苦，却是我们古老的国家和人民恢复青春活力所需要的。英国的教育是为了培养出职员，但也使得印度人有机会接触了流行的西方思潮。一个新的阶级开始出现了，即受过英式教育的阶级，尽管这是脱离广大民众的少数人，但是，他们注定要成为新的民族运动的领头羊。起初，这个阶级充满了对英国和英国自由思想

的艳羡。在那时，英国人民正在热议着自由和民主，但这一切还是比较模糊的，因为在印度，英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印度实施的是专制统治。但是人们乐观地期盼着，英国在合适的时候会给印度带来自由。

西方思想对印度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印度教产生了影响。广大民众并未受到什么影响；我已经告诉过你，英国政府的政策实际上是扶持正统派教徒的。但是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包括政府的公务员和专业人士，已经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早在19世纪初，在孟加拉地区就有人试图按照西方的思路对印度教进行改革。当然，印度教在过去曾有过无数的改革者，而其中有一些，我在给你的这些信中也提到过。但是，这次新的改革一定是受到了基督教和西方思想的影响。这次的改革者是拉姆·莫汉·罗伊，他既是一位伟人，也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他的名字在我们谈论废除殉夫自焚习俗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他精通梵语、阿拉伯语和很多其他语言，还仔细研究了各种宗教。他反对宗教仪式、印度教的礼拜和诸如此类的事情，他还要求进行社会改革，提倡妇女教育。他成立了一个社团，叫作“梵社”（Brahmo Samaj）。这是个小组织，而且就其人数而言，仍然是个小组织，只局限于孟加拉地区懂英语的人士。但是，它对孟加拉地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泰戈尔（Tagore）家族对梵社很有好感，很长一段时间，诗人拉宾德拉纳特（Rabindranath）的父亲被称为马哈希·代温德拉·纳特·泰戈尔（Maharshi Devendranath Tagore），是梵社的栋梁。另一个梵社的领军人物是凯沙布·钱德拉·森（Keshab Chander Sen）。

在这个世纪的晚些时候发生了另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它发生在旁遮普邦，发起者是贤人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Swami Dayananda Saraswati），另一个社团也创建了起来，叫作“圣社”(Arya Samaj)。它也排斥印度教和种姓后来发展的许多教派。它的口号是“回到吠陀”。尽管这是一场改革运动，毫无疑问是受到了伊斯兰教

和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但在本质上，它是一场具有侵略性的军事活动。奇怪的是，在许多印度教教派中，圣社可能与伊斯兰教最接近，却成了伊斯兰教的对手和敌人。圣社试图把防御性的、静止的印度教变成一个侵略性的、传教的宗教。圣社旨在复兴印度教，而民族主义色彩则给这场运动带来了一些力量。事实上，这是印度教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抬头。而它是印度教的民族主义，所以很难成为印度的民族主义。

圣社比梵社发展得更为广泛，尤其是在旁遮普邦，但是它主要局限于中产阶级。圣社做了大量教育方面的工作，开设了很多中学和学院，既招收男孩，也招收女孩。

19世纪另一个非凡的宗教人物是瑞玛克里斯纳·帕拉宏撒（Ramakrishna Paramhansa），他不同于我这封信里提到的其他人，他没有创立任何具有侵略性质的改革社团。他的重点是放在服务上的。他在国家的许多地方灌输他的思想，继续发扬其为弱小贫穷者服务的传统。瑞玛克里斯纳最著名的信徒是斯瓦米·维威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他极有说服力地宣讲民族主义教义。这一点也不是反对伊斯兰教，或反对任何人的，也丝毫没有使圣社的民族主义变得狭隘，而它的根是扎在印度教的宗教和文化里的。

有意思的是，19世纪印度的民族主义早期浪潮是宗教性的，与印度教有关。伊斯兰教自然不会参与这场印度教的民族主义运动，他们与此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由于他们被排除在英国的教育之外，因此所有新思想对他们的影响都比较少，在他们中间，知识的躁动就更少了。几十年之后，他们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回望伊斯兰教的传统和文化，因为害怕在占多数的印度教教徒面前失去这些伊斯兰教的传统和文化。像印度教教徒一样，他们的民族主义是以穆斯林的民族主义形式出现的。但只是很久之后，到19世纪末，这场穆斯林运动才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效果。

另一个有趣且值得注意的事情是，这些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改革和进步的运动尽可能地让起源于西方的新科学和政治思想适应他们古老的宗教观念和习惯。他们并不愿意勇敢地挑战和审视这些古老的观念和习惯，他们也不愿忽视科学的新世界以及他们周围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因此他们想通过阐明所有现代思想和进步都能够追溯到他们的宗教圣书里，来让古老的观念和习惯与科学的新世界和现代思想与进步和谐一致。这样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它只会阻止人们进行正确的思考。人们不能够大胆地思考，努力去理解正在改变世界的新的力量和思想，而是在古老习惯和传统的重压之下抬不起头来。他们不能向前看，向前走，而是始终在悄悄地向后看。如果一个人的头总是转回去，向后看，那么要想前进就很不容易。

接受了英式教育的阶级在城市里慢慢发展起来，同时，一个包含了专业人士的新的中产阶级也发展起来了——也就是律师和医生以及诸如此类的人，还有商人和生意人。当然，在过去，中产阶级也一直存在，但他们大部分都被早期的英国政策压垮了。新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是英国统治的直接产物；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英国统治的追随者。他们也从对人民群众的剥削中分得了一小杯羹；他们从英国统治阶级的丰盛餐桌上拾得了一点碎屑。他们是服务于英国政府部门的小官员；许多人是协助法庭工作的律师，并通过诉讼发了财；还有商人，他们是英国贸易和工业之间的中间人，他们在出售英国商品的过程中获得了利润或佣金。

新兴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印度教教徒。因为与穆斯林相比，他们的经济状况稍微好一些，另外他们还接受了英式教育，这成了他们在政府部门就业的通行证。穆斯林总体来说是比较贫穷的。大部分纺织工人都是穆斯林，他们因为英国人毁掉了印度的工业而失去了工作。孟加拉地区是印度所有省邦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穆斯林们都是贫穷的佃户或小地主。而地主往往是印度教教徒。还有，村庄里的商人，往往也是印度教教徒，他们是村庄商店的放债人和店主。于

是地主和商人就可以压迫和剥削那些佃户了，那么他们也就把对佃户的压迫和剥削做到了极致。你要记住这些，因为这些压迫和剥削正是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紧张关系的根源。

同样，较高种姓的印度教教徒，尤其在南方，剥削那些被称为“低等的”阶级（贱民），他们大多是土地上的工人。最近，尤其是自从甘地绝食之后，贱民阶级的问题更加明显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贱民身份在政治阵线上受到强烈抨击，成百上千的寺庙和其他地方向这些人开放了。但是，从根本上说，问题存在于经济上的剥削，除非剥削被消灭了，否则贱民阶级还仍然是贱民。贱民是农奴，他们不允许拥有土地。他们还在其他方面受到限制。

尽管整个印度和广大民众都变得更加贫困了，但是组成新资产阶级的一小撮人在一定程度上发达起来，因为他们从对国家的剥削中获得了好处。律师和其他的专业人士，以及商人们都积累了一些钱。他们想做一些投资，以便从利润中获得一份收益。他们中有许多人从贫穷的地主那里购买了土地，于是他们变成了地主。其他人看见了英国工业的繁荣发达，便想把他们的钱投入到印度的工厂里。就这样，印度的资本进入了这些大机器的工厂，工业资产阶级也开始在印度兴起了。这大约是在50年前，也就是1880年之后的事了。

随着资产阶的发展，他们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了。他们想继续挣更多的钱，在政府部门担任更多的职务，想要更多的设备来开设工厂。他们发现英国人在他们的每一条路上都设置了障碍。所有的高职位都被英国人垄断了，而工业的运作都是为了给英国人赚取利润。所以他们便开始了鼓动，这就是新的民族运动的起源。在1857年发生了暴动并被残酷镇压之后，人民已经精疲力尽，再也承受不了什么鼓动或者进步的运动了。又过了很多年，他们才又慢慢恢复了一点生机。

民族主义思想很快地传播起来，孟加拉地区成了领头羊。很多新书在孟加拉地区出版，它们对孟加拉的语言和民族主义的发展都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正是这些书中的一本，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Bankim Chandra Chaterji）写的《阿难陀寺院》（*Ananda Matha*）里，出现了我们著名的歌曲《母亲，向您致敬》（*Vande Mairam*）。一首孟加拉的诗歌——《槐蓝之镜》（*Nil Darpan*）引起了轩然大波，它描述了在种植园体制下的孟加拉农民的悲惨生活，这些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同时，印度资本的力量也在壮大，它要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最终，在1885年，所有这些新兴资产阶级决定要建立一个组织来为自己辩护。于是，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简称印度国大党）于1885年成立了。这个组织是你和印度的所有男孩女孩都很了解的，它在近几年已经变得很强大、很有力量了。国大党承担起广大民众的事业，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的支持者。它挑战英国在印度统治的基础，领导反抗英国统治的人民运动。它高举独立的大旗，勇敢地为自由而战。今天，它还在继续战斗着。但这一切都是以后的历史了。印度国大党在最初建立的时候是一个十分温和谨慎的机构，它坚持声称忠实于英国人，并十分礼貌地要求进行一些小的改革。它代表的是比较富裕的资产阶级，甚至连比较贫穷的中产阶级也没有进入这个机构。至于广大的民众，农民和工人，他们与此更是毫无关系。这主要是受过英式教育的阶级的机构，它是用我们的继母的语言——英语来开展活动的。它的诉求是地主、印度资本家的诉求，也是那些受过教育的、正在找工作的失业者的诉求。没有人在意人民大众的极度贫困和他们的需求。它要求政府部门的“印度化”——也就是说，要求在政府部门有更多的印度人代替英国人任职。它并没有看到，剥削人民的机器才是印度问题的关键，而谁在控制机器，是印度人还是外国人，并没有什么关系。国大党还进而抱怨在军队和行政部门的英国官员的开支太大，还抱怨黄金和白银从印度“外流”到英国。

不要以为我说国大党是温和的政党，是在批评它，或是在贬低它。那不是我的目的，因为我相信，那时的国大党和它的领导人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印度政治的严酷现实使得它几乎是不情愿地、一步一步地被逼到了越来越极端的境地。但是在早期，它只可能是那样一个温和的政党。在那些日子里，国大党的缔造者们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使政党向前发展。如果大众站在我们的一边，并称颂我们的作为，那么我们勇敢地大谈自由是件很容易的事。但是，要做一个伟大事业的先行者很艰难。

国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85年在孟买举行。孟加拉的W. C.博纳吉（W. C. Bonnerji）是第一任主席。国大党早期的其他著名人物还有苏兰德拉·纳特·班纳吉(Surendra Nath Banerji)、巴德拉丁·塔比吉（Badruddin Tyabji）和弗罗兹-沙阿·迈塔（Pheroze-Shah Mehta）。但是，有一个名字的名声要胜过其他所有人，这就是达达拜·瑙罗吉（Dadabhai Naoroji），他成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元勋，他还率先使用“自治”作为印度的目标。我还要提一个名字，他是国大党的老一辈守卫者中今天唯一幸存者，你也很了解他。他就是潘迪特·玛丹·摩罕·马拉维亚（Pandit Madan Mohan Malaviya）。50多年来，他一直在为了印度的事业努力工作，经年的劳累和焦虑使他疲惫不堪，但是他仍为了实现他年轻时代的梦想而努力着。

国大党年复一年，力量不断壮大。它的诉求不像早期的印度教的民族主义那么狭隘。但它主要还是以印度教教徒为主。一些重要的穆斯林也加入了国大党，甚至还担任了领导职位。但是穆斯林总体来说对该政党还是敬而远之的。当时有一位穆斯林的伟大领袖叫赛义德·艾哈迈德汗爵士（Sir Syed Ahmad Khan）。他看到，缺乏教育，尤其是现代教育，对穆斯林的损害是十分巨大的，他们的落后和进步迟缓都与此有关。因此他觉得必须说服他们去接受教育，并专心于此，之后再涉足政治。所以，他建议穆斯林远离国大党。他与政府合作，在阿里格尔（Aligarh）建立了一所优秀的大学，至今它已经发展成了一

所综合性的大学。很多穆斯林都遵循赛义德爵士的建议，没有加入国大党。但还是有一小部分穆斯林加入了国大党。请你记住，当我说多数和少数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中上层阶级、接受英式教育的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中的多数和少数。而广大的民众，无论是印度教教徒还是穆斯林，都与国大党毫无关系，那时甚至没有多少人听说过国大党。那时即使是中产阶级的下层也没有受到国大党的影响。

国大党在发展，但是，比国大党发展更快的是民族思想和对自由的渴望。国大党的诉求必定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它只局限于懂英语的人群。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有助于使各省之间关系更加密切，并逐渐产生了一个共同的观点。可是因为它没有深入到人民之中，所以没有什么力量。在另一封信里，我提到过一件极大地震撼了亚洲的事件，这就是1904年至1905年，小小的日本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印度和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也就是说，受教育的中产阶级受到了极大震动，他们的自信心大大地提升了。如果日本能够成功地战胜欧洲最强大的一个国家，那么为什么印度不能战胜英国呢？很久以来，印度人民在英国人面前总有一种自卑感。因为长期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加上1857年的暴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使印度人受到了恐吓。而《武器条令》（*Arms Act*）不允许他们拥有武器。在印度发生的一切都在提醒着印度人，他们是臣服的民族、劣等的民族。甚至连给他们的教育也让他们的心中充满了自卑思想。歪曲和虚假的历史告诉他们，印度一向就是一片无政府的混乱之地，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互相残杀，直到英国人来了，把印度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给它带来了和平与繁荣。事实上，无论历史真相如何，欧洲人都相信并声称，整个亚洲是一个落后的大陆，必须由欧洲人来统治。

因此，日本的胜利使亚洲的精神为之一振。在印度，我们大多数人都受到了自卑的困扰，而日本的胜利减少了我们的自卑感。民族主义思想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尤其在孟加拉地区和马哈拉施特拉邦。正在那时，又发生了一件深深震撼了孟加拉地区也使整个印度激动起

来的事件。英国政府把孟加拉大省（当时它包含了比哈尔邦）分成了两个部分，其中一个是东孟加拉。孟加拉地区不断发展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对此十分愤怒，他们怀疑英国人想通过分裂来削弱他们的力量。东孟加拉大部分人都是穆斯林，因此这样的分裂又激起了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的问题。在孟加拉地区，一场伟大的反英运动爆发了。大部分地主加入其中，印度的资本家也参加了。在那时，第一次提出了国货运动的口号，随之开始了抵制英国货的运动，这当然有助于印度工业和资本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这场运动甚至蔓延到了人民大众中间，而这场运动的灵感部分来自印度教。与这场运动站在一边的，是在孟加拉兴起的革命暴力派，炸弹第一次在印度政治中出现了。这场孟加拉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是奥罗宾多·高斯（Aurobindo Ghose）。他依然健在，但是很多年来，他一直在法属的印度地区——本地治里城过着隐居的生活，在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在同一时期也发生了动乱，还有活跃的民族主义的复苏，也带着印度教的色彩。那里出现了一位伟大的领袖，巴尔·甘加达尔·蒂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他在整个印度都被称为“洛克马尼亚”（Lokamanya），即“受尊敬的人”。蒂拉克是位伟大的学者，既有古老东方智者的智慧，又有西方的新思想和新知识；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但是，最重要的，他是伟大的群众领袖。国大党的领袖们至今只是迎合受过英式教育的印度人，人民群众对他们知之甚少。而蒂拉克是新印度的第一位接近人民群众并从他们那里汲取力量的政治领袖。他坚强的性格带来了新的力量和不屈不挠的勇气，并加强了孟加拉民族主义和新的献身精神，改变了印度的政治面貌。

在1906年、1907年和1908年的动乱年代，国大党都做了些什么？国大党的领袖们根本没有在这个民族精神觉醒的时候领导国家前进，而是踌躇不前。他们习惯于一种没有群众参与的、平静的政治。他们不喜欢孟加拉运动的那种燃烧的热情，也不适应在蒂拉克身上所体现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那种新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赞扬国货运动，但是对于抵制英国货犹豫不决。在国大党中渐渐出现了两个派别——

蒂拉克和一些孟加拉地区领袖领导下的极端派与在老的国大党领袖领导下的温和派。然而，最著名的温和派领袖却是一个年轻人——戈帕尔·克里希那·戈凯尔（Gopal Krishna Gokhale）。他精明强干，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他的事业。戈凯尔也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蒂拉克和戈凯尔代表各自的派别，相互对立。1907年，他们不可避免地分裂了——国大党分裂了。温和派继续控制着国大党，极端派被逐出了国大党。温和派赢得了胜利，但是他们也付出了代价，在国内失去了民心，而蒂拉克的党派则深得民心。国大党变得更加软弱了，在几年里已经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了。

而在这些年里，政府的情况如何呢？它对印度的民族主义发展是如何反应的呢？政府对付他们不喜欢的争议和要求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无情地打击。因此英国政府肆意地镇压人民，把他们关入监狱，用《新闻法》来控制报纸，派出大批的秘密警察和间谍，跟踪所有他们不喜欢的人。从那时起，印度的刑事调查局（CID）就一直与著名印度政治家形影不离了。许多孟加拉地区的领袖被判刑入狱。最为著名的审判是对备受尊敬的蒂拉克的审判，他被判入狱6年，而在曼德勒的狱中，他写出了一部名著。拉奇普特·雷依先生（Lala Lajpat Rai）也被驱逐到了缅甸。

英国人并没能成功地镇压孟加拉的运动。最终，为了满足一些人的要求，英国人对行政管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那时的政策与后来和现在的政策一样，就是要分裂民族主义的队伍。温和派是要被“团结”的力量，而极端派则是要被镇压的力量。1908年，政府宣布了被称为“莫莱-明托改革”（Morley-Minto Reforms，得名于当时印度总督和印度事务大臣的名字）的新改革方案。它们成功地“团结了温和派”，因为温和派对方案十分满意。而极端派，由于领袖们都被关进了监狱，因而士气低落，民族主义运动也衰落了。然而，在孟加拉地区，反对分裂的鼓动还在继续，并获得了成功。1911年，英国政府撤销了对孟加拉地区的分裂。这一胜利给孟加拉人注入了新的热

情。但是，1907年的运动势头渐消，印度重新陷入了对政治的漠然态度之中。

也是在1911年，英国宣布德里将成为新的首都——它曾经是许多帝国的首都，也是许多帝国的坟墓。

1914年的印度就是这样的状况，就在这一年，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了，为这个100年画上了句号。这场战争对印度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关于这些问题，我以后再谈。

我终于讲完了19世纪的印度。我已经把你带到距今还有18年的时段了。现在，我们必须离开印度了，下一封信我们要去中国，去看看另一种类型的帝国主义剥削。

114 ——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

我已经用了很长的篇幅给你讲了工业革命和机械革命对印度造成的影响，以及新兴的帝国主义是如何在印度运作的。作为一个印度人，我又是个党派人士，恐怕我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偏见。但我也努力地，也希望你也能努力地像科学家仔细观察客观事实那样公正地思考这些问题，而不是作为一个试图去证明事物某一方面的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在其适当的位置是件好事，但它是不可靠的朋友，靠不住的历史学家。它使我们看不到很多发生的事件，有时候还会曲解真相，尤其当真相关乎到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国家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考虑印度近代史的时候就要十分小心，以免把我们所有的不幸都归罪于英国人。

我们已经看到了印度在19世纪是如何被英国的工厂主和资本家剥削的，现在让我们去看看亚洲的另一个伟大国家——中国，它是印度旧时的朋友，是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在这里，我们将要看到西方剥削的另一种类型。中国不像印度，它没有成为任何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或者附属国。它逃脱了这样的命运，因为它有足够强大的中央政府把国家团结在一起，直到大约19世纪中叶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印度早已在此之前的100多年，即莫卧儿帝国瓦解之时，就分崩离析了。中国虽然在19世纪的时候衰落了，但它直到最后都一直保持着国家的统一，而那些外国势力，由于相互之间的嫉妒，所以彼此都在设法阻止对方利用中国的软弱而获取更多的利益。

我在上一封(第94封）关于中国的信里告诉过你，英国人试图扩大与中国的贸易。我还引用了清朝乾隆皇帝回复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一封傲慢的、屈尊俯就的信。这是1792年的事了。这一事件应该会让你

想起欧洲那个暴风骤雨的年代——那正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接下来就是拿破仑和拿破仑战争。英国在整个这一时期已经是自顾不暇，正在与拿破仑拼死一战。所以那时它不可能和中国扩大贸易。直到拿破仑垮台，英国才得以轻松地喘了一口气。在不久之后的1816年，英国又派遣了另一位使节出访中国。但是在拜谒的礼节上出现了问题，因而中国皇帝拒绝接见英国使节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并将他驱逐出了中国。他拒绝向中国皇帝行的礼节叫作叩头，那是一种跪地磕头的仪式。或许你听说过“叩头”这个词。

因此，这一次英国使节的来访无果而终。同时，一种新的贸易迅速发展起来——鸦片贸易。也许称它为新的贸易并不恰当，因为早在15世纪，鸦片就第一次从印度进口了。在过去，印度曾给中国带去了很多好东西，而鸦片是印度带给它的极坏的东西之一。但是，鸦片贸易很有限。可是到19世纪，鸦片贸易因为欧洲人而发展起来了，尤其是因为垄断了英国贸易的东印度公司。据说，在东方的荷兰人过去常常把鸦片和烟草混合在一起吸食，以预防疟疾。通过他们，吸食鸦片的习惯传到了中国，但更糟的是，在中国，人们吸食纯鸦片。中国政府想阻止这种习惯，因为它对人们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同时也因为鸦片贸易赚走了中国很多的钱。

1800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或命令，禁止一切鸦片贸易，无论是出于任何目的。但是，鸦片贸易对外国人来说是利润极其丰厚的生意。他们继续走私鸦片进入中国，并贿赂中国官员，以疏通走私通道。于是，中国政府又制定了一项规定，不允许官员与外国商人见面，而对教授外国人汉语或满语也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鸦片生意还在继续，而且可能伴随着很多的贿赂和腐败现象。事实上，1834年之后，情况变得更糟了，因为英国政府终结了东印度公司在对中国贸易上的垄断地位，这样，对中国的贸易便对所有英国商人敞开了。

鸦片走私又突然剧增了，于是中国政府终于决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禁止鸦片走私。政府选定了执行这些措施的合适人选。林则徐被委任为钦差大臣，负责禁止鸦片走私，他采取了迅速而强有力的措施。他南下非法贸易的中心广州，命令那里所有的外国商人上交手上的全部鸦片。起初，外国商人都拒绝听从这项命令，于是林则徐强制他们执行命令。他把他们困在他们的工厂里，让他们的工人和用人都离开他们，不允许从外面给他们带食物。这些强有力而又周密的措施迫使外国商人妥协了，把2万箱的鸦片交给了中国人。林则徐全部销毁了大批的、显然是准备用于走私的鸦片。林则徐还告诉外国商人，除非船长保证不携带鸦片，否则船只不得进入广州。如果有人违背了诺言，那么中国政府将没收船只和全部的货物。钦差大臣林则徐是个细致周到的人，他非常圆满地完成了皇帝交托给他的工作，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将给中国带来严重的后果。

他所带来的后果是：与英国的战争，中国的失败，屈辱的条约；还有，中国政府想要禁止的鸦片，被强行推入了他们的喉咙。鸦片对于中国人是好是坏都无关紧要，中国政府想做什么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向中国走私鸦片对于英国商人来说是件有利可图的事，英国不愿意失去这笔收入。被钦差大臣林则徐销毁的鸦片大部分是属于英国商人的。因此，英国以国家荣誉为名，在1840年向中国开战。这场战争被很恰当地称作“鸦片战争”，因为它的起因和目的都是为了强行把鸦片卖给中国。

对于封锁了广州和其他一些地方的英国舰队，中国人无能为力。两年后，中国被迫屈服了。1842年，中英签署了《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对外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当时尤其意指对鸦片开放。这五个口岸是广州、上海、厦门、宁波和福州。它们被称为“五口通商”。英国还占领了靠近广州的香港，勒索了大笔钱财，作为对被销毁鸦片的赔偿，以及对他们强加给中国的战争的赔偿。

英国人取得了鸦片战争的胜利。中国皇帝曾亲自向当时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Queen Victoria）恳求，并非常谦恭地指出了被强加给中国的鸦片贸易带给中国的可怕影响。对于他的恳求，女王根本不予答复。而50年前，他的前任乾隆曾经以完全不同的态度，给英国国王写过信。

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它的闭关自守结束了，它不得不接受外国的贸易；除此之外，它还要接受基督教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作为帝国主义的前卫，在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接下来的很多麻烦都与传教士有关。他们的行为往往傲慢无礼、令人恼怒，但是他们不能被中国的法庭审判。按照新签订的条约，来自西方的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和中国司法的约束。他们只被自己国家的法庭审判。这叫作“治外法权”，尽管中国人非常憎恨“治外法权”，但它仍然存在。传教士的皈依者也声称拥有“治外法权”的特殊保护。当然他们根本没有这个权利，但是这没有关系，因为伟大的传教士，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支持着他们。于是，有时候他们使村庄和村庄之间相互敌对，而当村民或者其他人极度愤怒、忍无可忍的时候，便会奋起攻击传教士，有时甚至会杀死传教士，那么支持传教士的帝国主义国家就会猛扑过来，索取高额赔偿。对于欧洲列强来说，没有什么事件像在中国的传教士谋杀案那么有利可图了！因为他们利用每一次谋杀事件的机会，要求和勒索进一步的特权。

正是因为传教士要求人们皈依基督教，从而引起了一次在中国最为恐怖而残忍的起义，这就是“太平天国起义”，大约爆发于1850年(注)，由一个半疯狂的人洪秀全发起的。这个宗教狂人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他杀人如麻，所到之处高喊起义的口号，“杀死偶像崇拜者”。起义使得大半个中国遭到破坏，田地荒芜，十几年下来，据估算有至少2000万人因此而丧命。当然，不应该让基督教传教士或者外国列强对这次起义，以及随之发生的屠杀负责。起初，传教士似乎对这次起义赞赏有加，可后来他们又开始诋毁洪秀全。然而，中国政府继续相

信太平天国起义应该归咎于基督教传教士。由此可见，在当时和以后，中国人多么憎恨传教士的活动。对于他们而言，传教士并非是宗教和善意的先驱，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正如一位英国作家所言："先是传教士，接着是炮舰，然后就是霸占土地——这便是中国人心中的帝国主义进程。"你一定要把这些记在心里，因为在讨论中国所遭遇的麻烦的时候，常常会提及传教士。

一场由狂热的疯子领导的起义，竟然在取得了如此伟大的成功之后才最终被镇压，这真是令人惊奇。其中真正的原因是，中国的旧秩序正在崩溃。我想在我上一封关于中国的信中，已经说过了苛捐杂税、正在改变的经济形势和人民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到处都出现了反对清政府的秘密社团，起义暴动一触即发。外国贸易，鸦片和其他产品的贸易，使情况更为恶化。当然，在过去，中国也有对外贸易，可现在的形势不同了。西方的大机器工业正在快速地生产产品，这些产品不可能在国内全部卖出，因此他们必须在其他地方找到市场。所以他们迫切需要在印度和中国找到市场。这些产品，尤其是鸦片，打乱了旧的贸易秩序，使得混乱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就像在印度一样，中国市场的产品价格开始受到国际价格的影响。所有这些更加重了人们的不满和困难，这让太平天国起义变得更加激烈。

这就是当时西方列强日益傲慢自大、不断干涉中国时的中国背景情况。中国对于西方的要求已无力承受。我们将看到，这些欧洲列强以及很久之后的日本，利用中国的混乱和困难，从中国勒索了特权和土地。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西方列强和日本之间的相互敌对和嫉妒的话，中国早就已经重蹈印度的覆辙，成了某个列强的附属国或帝国的一部分了。

刚才讲述了关于19世纪中国的大背景、经济的衰落、太平天国起义、传教士和外国的入侵，我又跑题了。但是要想听明白所叙述的各种事件，就必须对以上情况有所了解。因为历史事件并不是像奇迹一

般发生的，而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但是这些原因往往并不明显，它们藏在表面的事件之下。直到不久前还很伟大而强盛的中国清政府的统治者们，对于命运转盘的突然逆转一定感到惊诧不已吧。也许他们没有看到，他们崩溃的根源埋在他们的过去；他们没有意识到西方工业的进步及其对中国经济制度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他们对于“野蛮的”外国人的入侵感到无比愤慨。当时的皇帝在提及这些入侵时，使用了一句令人愉悦的中国老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但是尽管这句老话中充满了睿智和幽默，教会了人们在不幸的时候要淡定、自信和坚韧，但不足以击退外国人。

开放口岸的条约把中国的大门向英国敞开了。但英国不能独占这么多好东西。法国和美国也来了，也和中国签署了商业条约。中国十分无助，在胁迫之下，它不可能喜欢和尊重外国人，它憎恨这些“野蛮人”的出现。而外国人一方也远远没有满足，他们剥削中国的胃口越来越大。英国人又一次成了领头羊。

这个阶段是对外国人十分有利的时候，因为中国忙于对付太平天国起义，无力抵抗外国的入侵。因此英国人开始寻找借口，发起战争。1856年，广州的中国总督下令以海盗罪逮捕了一条船上的中国船员。这条船是属于中国人的，没有外国人牵涉其中。但是它悬挂的是英国国旗，因为它得到了香港政府的许可。甚至连这个许可也过期了。但是英国政府仍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开战了，这就像河边的狼和羊的寓言故事一样。

英国人派出了军队到中国。就在此时，印度1857年发生了暴动，所有的军队又被调往印度。中国的战争只好等到镇压完印度暴动之后了。1858年，第二次对中国的战争开始了。同时，法国也找到了一个参战的借口，因为一位法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某个地方被杀死了。就这样，英国人和法国人扑向了中国人，而中国人此时正在忙于对付太平天国起义。英国人和法国人还试图引诱俄国和美国也加入战争，但是

他们没有同意。然而，他们却很乐意瓜分战利品。实际上没有经过任何战斗，这四个大国就与中国签署了新的条约，强行获取了更多的特权。中国向外国开放了更多的口岸。

但是，第二次对中国的战争故事还没有结束，又有一场戏剧要上演，还有随之而来的更加悲剧性的后果。条约签署后，按照惯例，有关政府要对条约正式批准和确认。按照安排，新条约的正式批准需要一年内在北京进行。到了预定的时间，俄国特使经陆路从俄罗斯直接来到北京。而另外三方是从海上来的，他们想带舰队从白河（即海河）去北京。那时，大沽因为受到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威胁，已经设防了。于是中国政府要求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特使不要经水路前往，而是经陆路向北。这并不是无理的要求。美国人同意了，但是英国和法国的特使不同意。他们企图强行带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尽管大沽口已经设防。于是中国军队向他们开炮，英法联军受到重创，被迫撤退。

傲慢而自负的政府，甚至连中国政府要他们改变行程的请求都不听，根本就不可能接受如此的惨败。他们派来了更多的军队进行复仇。1860年，他们冲进了古老的北京城。他们的复仇就是破坏、洗劫，还焚毁了京城一座非常美丽的建筑，这就是皇家的夏宫圆明园。它是在乾隆年间建成的。圆明园里有很多艺术和文学的稀世珍宝，是中国制造出的最完美的宝物。有古老的美丽青铜制品、令人惊叹的精美瓷器、珍稀的手稿、书画，以及使中国1000年来闻名于世的其他各种艺术珍品。英法联军的士兵们，一帮无知的破坏者，先抢劫了这些珍宝，然后一把火烧了圆明园，大火连续烧了很多天，圆明园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有着几千年文化底蕴的中国人，心中充满愤怒地看着这种故意破坏文物的行为，把这些破坏者看成是只知道杀戮和破坏的、无知的野蛮人，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他们一定会想起匈人、蒙古人和许多其他旧时的野蛮破坏者。

但是，外国的“野蛮人”一点也不在乎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他们在自己的炮舰里，手持现代武器，感到十分安全。几百年来收集的稀世珍宝被付之一炬，可这对他们又有什么要紧的呢？他们对中国的艺术和文化又有什么可在意的呢？

“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反正有马克沁（Maxim）重机枪，而他们没有。”

---

1. 实际是1851年。——译者注

115 ——困境中的中国

在上一封信里，我讲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了美丽的圆明园。据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惩罚中国人违背休战的规则。一些中国军队的确违背了休战的规则，这也许是事实，可是英法联军蓄意破坏文物的行为几乎超越了补偿的范围。这不是一部分无知士兵的行为，而是当权者的行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是文明的、有文化的人，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是现代文明的引领者。然而这些在私人生活上很体面、很体贴的人们，在公众行为方面却忘记了所有的文明和体面，而去与人争战。相互之间的个人行为和国家行为之间似乎有一种奇怪的对照。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无论男孩和女孩，都是教育他们不要太自私，要为别人考虑，要行为端正。我们所有的教育都是为了教会我们这些，但我们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学会了这些。战争一来，我们就忘记学到的东西，我们身上的兽性就暴露出来了。于是，体面的人就像野兽一样行事了。

像法国和德国这样两个同宗的国家相互作战，尚且兽性毕现。当不同种族之间发生冲突，情况就糟得多了；当欧洲面对亚洲和非洲的种族和人民时，不同的种族相互了解很少，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而言，就像一本合着的书，在充斥着无知的地方是没有同情的。种族仇恨和苦难在加剧，当两个种族之间发生冲突，就不只是政治战争了，而是更糟的种族战争。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1857年的印度暴动为什么会如此恐怖，以及主要欧洲列强在亚洲和非洲为什么会如此残忍、为什么要蓄意破坏文物。

这看起来非常悲惨又非常愚蠢。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可以控制另一国家，一个民族控制另一个民族，一个阶级控制另一个阶级，那么注

定会产生不满、摩擦和暴动，就会有被剥削的国家或人民或阶级试图摆脱剥削者。一方对另一方的剥削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的基础，它被称为资本主义，而帝国主义就是由此产生的。

在19世纪，大机器和工业的发展使西欧国家和美国成了富裕而强大的国家。他们开始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主宰，其他种族是劣等民族，必须要为他们让路。当他们获得了对自然界的一些控制之后，就变得高傲、盛气凌人了。他们忘记了文明人不仅要控制自然，还必须控制自己。因此我们看到了19世纪先进的种族，虽然在很多方面领先于其他人，但是其行为往往会使落后的野蛮人都感到羞耻。这也许会帮助你理解欧洲人在亚洲和非洲的行为，这些行为不仅发生在19世纪，甚至也发生在今天。

不要以为我把欧洲民族和我们自己或其他民族做比较是对我们有利的。远不是如此。我们有自己的缺点，而且有些缺点还很糟糕；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跌落得如此之深了。

我们现在要回到中国了。英法联军焚毁了圆明园，展示了他们的威力。他们又进而强迫中国更换条约，并从中国勒索到了新的特权。在上海，中国政府按照新条约的规定，让外国官员组织管理中国的海关部门，被称为“帝国海关”。

同时，太平天国起义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国力，这给了外国列强可乘之机。太平天国起义还在延续着。最后，在1864年，它终于被中国的一位官员李鸿章镇压了，他也因此成了中国重要的政治家。

当英国和法国通过恐怖手段从中国勒索到了特权和租界的时候，俄国通过外交手段在北方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仅仅几年之前，渴望得到君士坦丁堡的俄罗斯还对土耳其发起了进攻。英国和法国害怕俄罗斯力量不断壮大，所以他们加入了土耳其一方，在1854年至1856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中打败了俄罗斯。在西方失败之

后，俄罗斯开始把目光投向东方，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收获。俄罗斯通过外交手段迫使中国把东北部的一个省割让给了它，该省与大海毗邻，且包含了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俄罗斯的这一胜利归功于它的一位卓越的年轻军官穆拉维约夫（Muravieff）。就这样，俄罗斯通过特殊的手段获得了比英国和法国多得多的好处，而英国和法国却经历了三年的战争，并实施了丧失理性的破坏。

这就是1860年的情况。伟大的中国大清帝国在18世纪末曾经占据和控制了近半个亚洲，可现在却受到如此羞辱。来自遥远欧洲的西方列强打败并羞辱了它，一次国内的起义几乎颠覆了它。所有这些都彻底震动了中国。很显然，情况有些不妙。中国也做了一些努力，对国家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和对付外来的威胁。所以，1860年也许几乎可以被看作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中国开始准备抗击外来入侵了。中国的邻国日本，在那时也同样被占领，而它也是个很好的例子。日本要比中国成功得多，但是，有一段时间，中国的确成功阻挡了外国列强的入侵。

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是中国人的热心朋友。一个在他率领之下的中国使团被派往与中国签署条约的几个国家，他成功地从这些国家争取到了对中国更有利一些的条款。1868年，一个新的中美条约签署了，有趣的是，在这个条约里，中国政府作为对美国的优惠和特许，同意中国劳工移民去美国。美国那时正忙于开发他们西部的太平洋海岸各州，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而那里的劳动力极为短缺。因此他们便从中国进口劳动力。但是，这又成了新麻烦的根源。美国人开始反对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了，而且两国政府之间也产生了摩擦。美国政府后来停止了中国的移民，这种侮辱性的待遇让中国人民十分气愤，他们便开始抵制美国货。但这又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将一直把我们带进20世纪。我们现在不必讲述它。

太平天国起义还没有被镇压下去，另一个反对清政府的起义又爆发了。它发生在中国遥远的西部，亚洲的中心，新疆。这里的居民大多是穆斯林；在一个名叫阿古柏（Yakub Beg）的领袖领导下的穆斯林部落在1863年起义，赶走了当权者。这个地区性的暴动之所以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主要有两个原因。俄罗斯设法利用这个机会抢占了中国的领土。当然，每当中国遇到麻烦的时候，这种做法已经成了欧洲人惯用的伎俩。但是，让所有人吃惊的是，中国拒绝让步，最终它使俄罗斯吐出了抢占的土地。这要归功于中国将军左宗棠在中亚与阿古柏进行的一场非凡的战役。这位将军的作战方式可谓胜似闲庭信步。部队缓慢地前进，年复一年，他终于到达了暴乱之地。事实上，他让部队在途中停了两次，休整了很久，并播种和收割了庄稼以供部队之用！为部队提供给养总是个难题，而当部队要穿越戈壁沙漠的时候，这一定更是个难以应付的问题。所以左将军用一种新奇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他打败了阿古柏，终结了这次暴动。据说，从军事的角度来说，他在喀什噶尔、吐鲁番和莎车的战役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中亚，与俄罗斯的冲突已经令人满意地解决了，但是在中国政府广阔且正在瓦解的辖区里，又有一个地方出了麻烦。这是在安南，它是中国的臣属国，而法国对它也有所图谋，因此中国和法国之间便爆发了战争。又一次让所有人吃惊的是，中国打得不错，没有被法国人吓倒。1885年，两国之间签署了令人满意的条约。

这些中国力量的新信号足以使帝国主义列强刮目相看了。似乎它正在从1860年以及之前的衰弱中恢复过来。有人在谈论改革，许多人认为它已经渡过了难关。正因为如此，当英国在1886年兼并缅甸的时候，它承诺按照惯例，每十年向中国进贡一次。

但是，中国还远远没有渡过难关。还有很多的羞辱、苦难和分裂在等着它。它的问题不只是军队或海军的软弱，而是更加深层的问

题。它的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即将瓦解。我已经告诉过你，在19世纪，形成了许多反对清政府的秘密社团，这使形势变得更糟了。而对外贸易和与工业化国家的交往更是雪上加霜。1860年中国表现出的力量的背后，没有多少实力。有些积极的官员，尤其是李鸿章，进行了一些地方性的改革。但这些改革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或者治好使中国衰弱的顽疾。

在那些年里，中国能表现出外在力量，主要是因为出现了一个主管国家事务的强有力的统治者。这是一位非凡的女人，她就是慈禧太后。她掌权的时候才26岁，她年幼的儿子成了名义上的皇帝。47年来，她对中国进行了高压统治。她选择能干的官员，并以自己的高压手段影响着他们。主要是因为她和她的执政方式，才使中国比以前很多年都表现得更加勇敢。

但同时，在狭窄的大海对面，日本正在创造着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去日本了。

116 ——日本飞速发展

已经很久没有谈论日本了。5个月前，我在第81封信里说过，日本在17世纪采取的是一种奇怪的闭关自守政策。从1641年开始的200年间，日本人独守一隅，将自己与世界的其他地方隔绝开来。在这200年里，欧洲、亚洲、美洲，甚至非洲，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时期所发生的激动人心的事件，我已经给你讲过一些。但是，关于它们的消息传不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外面的微风一丝都吹不进日本这个古老的封建世界。似乎时间停滞了，变化也迟缓了，17世纪中叶就像被囚禁了一样。尽管时间在流逝，但是局面似乎没有改变。这就是封建的日本，拥有土地的阶级掌握着权力。而天皇没有什么权力，真正的统治者是幕府将军，他是宗族集团的首脑。就像印度的刹帝利，在日本有一个斗士阶级，叫作“武士阶层”。封建地主和武士阶层是统治阶级。不同的地主和宗族之间常常相互争斗。但是，他们会联合起来，欺压和剥削农民及所有其他人。

但是，日本是和平的。长期内战耗尽了国家的资源，所以战后的和平是很受欢迎的。一些交战的大封建主——大名——受到了压制。日本开始渐渐地从内战的蹂躏中恢复了元气。人们的心思更多地转向了工业、艺术、文学和宗教。基督教已经遭到禁止，佛教复兴了，后来还有神道教，这是典型的日本人敬拜祖先的活动。在社会行为和道德问题上，中国的圣人孔子成了他们仰视的楷模。艺术在宫廷和贵族的圈子里繁盛起来。在某些方面，日本那时的情况与欧洲的中世纪有些相似。

但是要阻挡变革并非易事，尽管与外界的联系被阻断了，在日本内部，变革却仍在发生，虽然比较慢一些。就像在其他国家一样，日

本的封建秩序正在走向崩溃。不满情绪在滋生，而幕府将军则是人们不满的对象，因为他是执掌国事的人。神道教崇拜的发展，使人们更加依赖天皇，因为他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于是，从普遍的不满情绪中产生了一种民族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基础就是经济的衰退，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变革和日本对世界的开放。

外国列强曾经多次努力，想打开日本的国门，但是都无果而终。大约到19世纪中叶，美国便对打开日本的国门特别感兴趣。他们刚刚扩张到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新开通的与中国的贸易虽然很诱人，但是穿越太平洋的旅途极为漫长，因此，他们希望途中能在日本的港口停留一下，以补充给养。这就是美国不断努力打开日本国门的原因。

1853年，一支美国海军舰队来到日本，并带去了美国总统的信。这是日本人所看见的第一批轮船。一年之后，幕府将军同意开放两个港口。听到这个消息，英国人、俄国人和荷兰人很快就来了，也和幕府将军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于是，在213年之后，日本再次向世界敞开了大门。

但是很快麻烦就来了。幕府将军在外国人面前总是摆出天皇的姿态。他已经不得人心了，人们激愤地起来反对他，以及他与外国签署的条约。有一些外国人遭到了杀害，结果导致了外国列强的海军前来攻击。情况越来越糟，经过劝说，幕府将军终于在1867年宣布退位，从而结束了德川幕府的统治。不知你是否还记得，德川幕府是在1603年由德川家康建立的。不仅如此，持续了近700年的整个幕府制度也走到了尽头。

新的天皇现在合理地取得了属于自己的东西。他是个14岁的男孩，刚刚继承了王位，成为睦仁（Mutsihito）天皇。他统治日本45年，从1867年至1912年。这一阶段被称为“明治时代”（或“开明统治”）。在他统治期间，日本飞速发展。它学习西方国家，并且在很

多方面可以与西方匹敌。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这是十分惊人的，而且在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日本成了一个伟大的工业国，并仿照西方列强的模式，成为一个帝国主义的、掠夺成性的国家。它具备所有进步的外在标志。它在工业上的发展甚至超越了它的老师们，它的人口也迅速增长，它的轮船环游了世界。它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上，它的声音也受到了重视。然而，这个巨大的变革并没有深入到这个国家的心脏。如果把这些变革说成是肤浅的，这是违背事实的，因为它们远远不止表面上的变革。可是统治者的观念仍然是封建主义的，他们试图把彻底的改革与封建的外壳结合起来。他们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在日本发生的这些伟大的变革得归功于一帮有远见的贵族——他们被称为“元老”。当在日本发生的反对外国的暴动导致了外国军舰的炮击时，日本人看到了自己的无助，感到了深深的耻辱。但是，他们没有诅咒命运，也没有怒不可遏，而是从这次失败和羞辱中汲取了教训。元老们设计了一个改革方案，他们便坚定地执行了。

老的封建大名被废除了。天皇的首都从京都迁到了江户，现在改名为东京。日本颁布了宪法，根据宪法设置了两个议院，众议院的议员是选举产生的，而上议院的议员是任命的。日本在教育、法律、工业和几乎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改革。工厂建了起来，现代的陆军和海军也建立起来了。日本从国外请来了专家，并把日本学生派往欧洲和美国，但不是像印度人过去所做的那样，让他们成为律师之类的人，而是让他们成为科学家和技术专家。

这一切都是元老以天皇的名义安排的。尽管建立了新的国会，但是在法律上，天皇仍然是日本帝国的绝对统治者。他们在推进改革的同时，还散布对天皇的盲目崇拜。这是一种奇怪的结合：一边是工厂、现代工业和议会制政府的外表，而另一边是对神圣天皇的中世纪一般的崇拜。很难理解这两者是怎样结合到一起的，哪怕只是很短的

一段时间。然而，它们的确在并肩向前，而且甚至今天也没有分开。元老从两个方面利用了人们崇敬天皇的情感：他们强行对保守和封建阶级推行改革，这些阶级若不是因为受到天皇声望的威慑，是会反对改革的；他们还阻止了更加进步的人士，就是那些想发展得更快并废除封建制度的人们。

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和日本之间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日本快速地西化了；而中国，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还有很久之后我们将要看到的，陷入了非常巨大的困难之中。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因此变革十分困难。印度遭受的苦难，也是因为这种表面上的力量之源——辽阔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中国政府的集权并不够强大——也就是说，国家的各个地区都有很大的自治权。所以，中央政府就很难像日本那样，介入各个地区并带来巨大变革。而且，中国几千年发展起来的伟大文明与它的生活已经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很难轻易地丢弃。这一点，印度和中国又很相似。而另一方面，日本借鉴了中国的文明，也可以更轻易地取代它。中国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来自欧洲列强的不断骚扰。中国是一个广袤的大陆国家，它无法像岛国日本那样，将自己封闭起来。俄罗斯在北方和西北方与它的领土相接，大英帝国在西南与它相邻，而法国也在南方悄然行进。这些欧洲列强已经设法从中国勒索到重要的特权，并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这些利益又给了它们很多干涉中国的借口。

就这样，日本在飞速向前发展，而中国还在盲目地挣扎，却没能使自己适应新的形势。但是，还有一个奇怪的事实值得注意。日本虽然学习并采用了西方的机器和工业生产，建立了现代的陆军和海军，俨然是一副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样子，但它不愿意接受欧洲的新思想和新观念、个人和社会自由的观念、对生活和社会的科学观点。在内心它还是个封建独裁的国家，并与一种奇怪的天皇崇拜结合在一起，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早已经摆脱了这种对皇帝的崇拜。日本人这种强烈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和对天皇的忠诚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民族主义和对神圣天皇的狂热崇拜并行不悖。而另一方面，中国不愿意接受大机器和工业；但是中国人，至少是现代的中国人，欢迎西方的思想观念和科学观点，因为它们与自己的思想很相近。因此我们看到，尽管现代中国进入了西方文明的思想里，但日本超越了它，因为日本穿上了西方文明的盔甲，却忽视了思想。而整个欧洲对日本都赞赏有加，因为它穿着盔甲，变得很强壮，所以欧洲使它成了自己的伙伴。但是中国很软弱，也没有马克沁重机枪及诸如此类的武器。所以欧洲列强可以羞辱它，劝诫它，剥削它，毫不在意它的思想和观念。

日本不仅在工业方法上学习欧洲，还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上也效仿欧洲。它远不止是欧洲列强的忠实学生，它还经常将老师的侵略手段发扬光大。它真正的问题在于新的工业主义和旧的封建制度之间的冲突。它试图将两者都继续下去，但又无法建立经济上的平衡。税收沉重，人民怨声载道。为了避免国内发生骚乱，它便求助于一个古老的方法——通过到国外发起战争和进行帝国主义冒险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新兴的工业也迫使它去国外寻求原材料和市场，就像工业革命曾经迫使英国以及后来其他的欧洲国家去国外进行征服一样。生产增长了，人口也迅速增加，所以就需要更多的食物和原材料。那么它去哪里得到这些呢？它的近邻是中国和朝鲜。中国给予了日本贸易机会。中国是个人口密集的国家，然而，在构成中国帝国东北部省份的满洲，却有足够的发展和殖民的空间。于是，日本对朝鲜和满洲贪婪觊觎，垂涎欲滴。

日本关切地看着西方列强从中国得到了各种特权，甚至还试图得到领土。日本对此当然不以为然。如果这些列强在它对面的大陆站稳脚跟的话，那么它的安全就可能受到威胁，至少，它在这片大陆的发展将受到制约。

日本在对外部世界开放之后不到20年，就开始图谋入侵中国了。一艘日本渔船在中国台湾附近失事，渔民被杀害，引起了与中国的小型争端，日本就利用这个机会要求中国赔偿。中国开始拒绝了。但是后来因为受到战争的威胁，而当时又忙于应付安南的法国人，于是中国向日本屈服了。这是1874年的事儿。日本对此次胜利颇为得意，立刻开始寻找下一个猎物。朝鲜似乎很诱人，于是日本寻衅滋事，以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入侵朝鲜，强迫其支付了一大笔钱，并开放了一些港口，与日本进行贸易。

朝鲜长久以来都是中国的臣属国。它向中国寻求支持，但是中国无能为力。中国政府害怕日本取得太多的势力，于是建议朝鲜暂时屈服，并且也与西方列强签署条约，借以牵制日本。于是，到1882年，朝鲜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了。但是日本并没有就此满足。它利用中国的困难，又提出了朝鲜问题，迫使中国同意与其联合对朝鲜行使保护国的权力——也就是说，可怜的朝鲜成了两个国家的臣属国。显然，这对相关的几方都不是令人满意的事态，一定会有麻烦产生。事实上，日本希望有麻烦，1894年，它向中国发起了战争。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而言是一边倒的战争。它的陆军和海军是现代化的军队，而中国人还是老式的、效率很差的军队。日本所向披靡，取得了胜利，并强迫中国与其签署了《马关条约》，这便使其得到了与西方条约国家同样的地位。朝鲜被宣布独立了，但这只是日本对它的控制的一层面纱而已。中国也被迫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包括旅顺，还有台湾和其他一些岛屿。

小日本对中国的毁灭性打击震惊了世界。西方列强对于一个东方强大国家的兴起一点都不高兴。即使在中日战争期间，当日本就要取胜的时候，这些西方列强就警告日本，他们不会同意日本兼并中国大陆的任何地区。尽管如此，它还是夺取到了辽东半岛，还包含一个重要港口——旅顺。但是西方列强不许它保留辽东半岛。三个大国——

俄罗斯、德国和法国——坚持要它放弃辽东半岛。尽管它很气愤，但又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它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对抗这三个强国的地步。

但是，日本记住了对它的冒犯。这激起了它的愤恨，并使它为一场更大的战争做好了准备。9年之后，这场与俄罗斯的战争爆发了。

同时，日本由于对中国的战争取得了胜利，因此一跃成了远东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暴露了它所有的弱点，西方列强对它的惧怕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扑向中国，就像兀鹫扑向已死或者将死的尸体那样，尽可能地从它们身上获取更多的东西。法国、俄罗斯、英国和德国——都来争夺中国的海港，并索取更多的特权。他们为了争夺租界而进行了可怕的、最无耻的战斗。任何一点小事都被作为借口，索取更多的特权或租界。因为两个传教士被杀，德国强行夺取了东部胶东半岛的青岛。因为德国占领了青岛，其他列强也坚持要分得一份战利品。于是，俄罗斯占领了旅顺，三年前，它曾阻止日本占领该港口。英国占领了威海卫，以抵消俄罗斯对旅顺的占领。法国占领了安南的一个港口和属地。俄罗斯还得到许可，修建了一条贯穿北满的铁路，这是横穿西伯利亚铁路的延伸段。

这场无耻的瓜分真是非同寻常。当然，中国不愿国土被瓜分，或者给予西方列强特权。每一次它都是在列强的海军力量的威胁或轰炸的威胁之下才被迫同意的。这种令人愤恨的行为应该叫作什么呢？公路上的拦路抢劫？土匪抢劫？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方式。有时候，它是暗地里进行的；有时候，它会披着真诚情感的外衣，带着与人为善的虚情假意，来掩盖其邪恶的行为。但是在1898年的中国，连这些外衣和虚情假意都没有了，引人注目的只是赤裸裸的恶行。

117 ——日本打败俄罗斯

我的信一直在给你讲述远东的事情，今天我还要继续讲那里的故事。你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我要用过去的战争和争斗来烦扰你。我并不想强调这些事件。可是今天在远东所发生的事情，有许多都是源自这些战争和争斗的，因此对它们有所了解，对于你理解现在的问题是必需的。中国的问题和印度一样，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甚至在我写信的时候，对于日本人侵占满洲的问题正在发生着激烈的争论。

在上一封信里我告诉过你1898年西方列强以战舰威慑、瓜分中国的情况。他们强占了所有好的港口，而在这些港口所在的省份里，他们又勒索了各种特权，包括采矿和建设铁路等特权。但是他们还在继续索要更多的特权。外国政府开始谈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这是帝国主义政府瓜分一个国家的温柔的方式。占有和控制的程度各种各样。当然，兼并是完全的占有，而对受保护国的控制要少一些，对“势力范围”的控制则更少。但是，它们都是一步接着一步，殊途同归。我们或许在以后会讨论这些，事实上，兼并是一种古老的、几乎被丢弃的方法，因为它会随之带来民族主义的问题。更方便的方法是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不管其他的问题。

对中国的瓜分即将开始，日本感到十分惊恐。它对中国作战的胜利成果似乎落入了西方列强的腰包，它无助而愤怒地看着中国被瓜分。最主要的是，它对俄罗斯是极其愤怒的，因为它先阻止了日本占领旅顺，之后又将其据为己有。

然而，有一个大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参与对中国的分割和即将瓜分的计划，它就是美国。他们没有参与其中，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加道德高尚，而是因为他们正忙于开发他们广阔的疆域。当他们向西部的太平洋扩张的时候，他们得开发新的地区，所有的精力和财富都会投入其中。事实上，大量的欧洲资本也为此目的投入到了美国。但是，到了19世纪末，美国人开始向国外寻找投资目标了。他们看到中国，看到了欧洲列强正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并最终想兼并中国，美国人对此十分不以为然，因为自己被落下了。因此美国要求中国实施所谓的“开放”政策，这就意味中国要给予所有国家同等的贸易和商业的便利。其他的国家对此也表示了赞同。

外国的不断入侵使中国政府十分害怕，也让他们相信他们必须改革和整顿。他们努力想这样做，可是没有成功的机会，因为列强在不断地提出新特权的要求。老太后慈禧几年来一直过着退隐的生活。中国人民开始把她看成了可能拯救他们的救星。当时的皇帝怀疑她在搞阴谋，想将她投入监狱。但是这个老太婆进行了反击，将皇帝罢免，自己独揽了大权。她没有像日本那样进行彻底的改革，但是她集中精力建立了一支现代的军队。她鼓励建立用于防御的地方民兵组织。这些当地的民兵组织自称为“义和团”——正义和谐的团队。有时候他们也被称为“正义和谐的拳头”——义和拳。后者传到了海港城市的欧洲人耳朵里，他们将其翻译成了“拳师”，这的确是对一个优雅词组的粗俗翻译。

这些“拳师”从事的是爱国行动，反对外国的侵略以及外国人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无数次的羞辱。他们不喜欢外国人也并不奇怪，因为外国人把他们看成邪恶的象征。他们尤其不喜欢传教士，因为传教士行为不端。至于那些中国的基督徒，他们则认为那些人是国家的叛徒。他们代表了旧中国，为保护它不受新秩序的侵袭而做着最后的努力。这样的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些爱国的、反对外国人的、反对传教士的、保守的人们与西方人之间必定会产生摩擦。冲突真的发生了，一位英国传教士被杀害了，许多欧洲人和大批的中国基督徒也被杀害了。于是，外国政府要求镇压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中国政府惩罚了杀人者，但是，它怎么能这样来镇压自己的孩子呢？同时，义和团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外国的使节们极为震惊，于是把他们战舰上的军队集结起来，让中国人认为外国要开始入侵了。不久之后，冲突发生了。德国公使被杀，在北京的外国公使馆遭到了包围。

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同情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并起来进行了武装斗争。但是有一些省的总督仍然保持中立，并以此来帮助外国列强。老太后毫无疑问是同情义和团的，但是，她与他们并没有公开的联系。外国人试图证明义和团只是土匪而已。但是，事实上，这场发生在1900年的起义是一场爱国运动，要把中国从外国列强的入侵中解救出来。一位驻中国的英国高官罗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当时在中国任海关总税务司，亲历了公使馆被围的事件。他告诉我们，外国人，尤其是传教士应该对中国人民爆发出的义愤负责，他还告诉我们，义和团的“起因是出于爱国，也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义和团运动的目标是确定无疑的，而且再坚持也不为过”。

这样突然遭到威逼使得西方列强十分气愤。他们立即召集军队来解救和保护他们被包围在北京的国民，他们完全有理由这么做。在德国指挥官的带领下，一支国际武装力量的联军出发前去解救公使馆。德国皇帝命令自己在中国的军队像匈人一样战斗，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命令，英国人在世界大战时把所有德国人称为匈人。

不仅德国军队执行了德国皇帝的这个命令，而且所有的外国军队都执行了这个命令。这支联军在向北京进发的路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很多人宁死都不愿意落入他们之手。那时，中国妇女都裹着小脚，跑不动。所以，很多妇女都选择了自杀。就这样，外国联军一路

向前冲杀，身后留下一片死尸和烧毁的村庄。一位跟随联军的英国记者这样写道：

> 有些事情我不能写下来，可能在英国也不会被印刷出来，因为它们会让人们看到，我们的西方文明只不过是掩盖野蛮的面具而已。关于任何战争的真实情况从来就没有被书写出来，这一次也不例外。

这支联军到达了北京，解救了公使馆。然后就开始了对北京的洗劫——“自从皮萨罗时期以来最大规模的洗劫”。北京的艺术瑰宝落入了粗野的、没有教养的人手中，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可悲的是，传教士在这场洗劫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成群结队的联军从一座房子窜到另一座房子，在贵重物品上贴上告示，说这些东西是属于他们的。房子里的贵重物品被售出后，他们又窜到另一座房子。

由于各个列强之间的竞争，也有一部分是因为美国政府的态度，才让中国避免了被瓜分的命运。但是它被迫饮下了最惨痛的羞辱。各种侮辱伤害堆积在它身上：一支外国军队将永久驻扎在北京，保卫铁路；许多要塞必须毁掉；加入反对外国人社团者将被处死；外国人获得了更多的商业特权，并勒索了大笔钱财作为赔偿；最可怕的打击是，中国政府被迫将义和团运动的爱国领袖作为“反叛分子”处死。这就是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的内容。

当这一切在中国本土，尤其在北京附近发生的时候，俄国政府利用这一片混乱的局面，派大批军队穿过西伯利亚，到了满洲。中国已经无力抵抗，它能做的一切就只是抗议了。但是，碰巧其他列强对于俄国政府这样去抢占大片土地都很不以为然。而对此事态的发展更加不安和震惊的是日本政府。所以列强强迫俄国撤出，而俄国政府则作出极为痛苦而吃惊的样子，因为它真诚的意图竟然受到了怀疑。它向列强保证，它绝对无意干涉中国主权，一旦俄罗斯在满洲的铁路秩序

得以恢复，它就撤出它的军队。这样，人人都满意了，毫无疑问，列强之间一定为了它们非凡无私的高尚之举而相互赞美过。然而，俄罗斯军队却留在了满洲，并不断向朝鲜扩张。

俄罗斯在满洲的进展以及向朝鲜的扩张大大地激怒了日本人。日本正在悄无声息但紧锣密鼓地为战争做着准备。他们牢记着1895年三国列强联合起来，逼迫他们在中国战争之后放弃旅顺的事，所以他们努力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他们发现，英国害怕俄罗斯的发展，希望抑制其发展。所以，1902年，英国和日本结成了联盟，目的是为了防止任何列强联合起来，在远东胁迫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现在，日本感到安全了，便对俄罗斯采取了更具侵略性的态度。它要求俄罗斯的军队从满洲撤出。但是，当时愚蠢的沙皇政府对日本十分不屑，根本不相信它会与自己开战。

1904年初，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爆发了。日本早已为此做好了准备，日本人民在他们政府的宣传和他们对天皇的疯狂崇拜的鼓动之下，心中燃烧着爱国的热情。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完全是毫无准备，而它的独裁政府只是通过镇压人民来统治国家。激烈的战争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整个亚洲、欧洲和美洲都目睹了日本在海上和陆地上大获全胜。在经历了令人惊叹的牺牲和穷凶极恶的杀戮之后，旅顺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

俄罗斯从欧洲调派了一支庞大的舰队，远涉重洋，奔赴远东。这支大型舰队穿越了半个世界，航行了几千英里，风尘仆仆地到达了日本海。在日本和朝鲜之间的狭窄海峡里，这支舰队连同它的海军上将一起被击沉了。整个舰队几乎是全军覆没。

俄罗斯，沙皇的俄罗斯，因一次接一次的失败而受到重创。俄罗斯有着强大的力量储备。在100年前让拿破仑蒙羞的不正是俄罗斯吗？但那时，是真正的俄罗斯，是俄罗斯的平民百姓在说话。

在这些信里，我不断地提到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日本等国家，仿佛每个国家都是一个有生命的实体。这是我的一个坏习惯，是我从书本和报纸里学到的。当然，我的意思是指当今的俄罗斯政府、英国政府等。这些政府可能只代表一小撮人，或许它们只代表一个阶级，所以认为或者说它们代表所有人民是不正确的。在19世纪，英国政府可以说只代表一小撮有钱人、土地拥有者和上层的中产阶级，这些人控制着议会。大部分人民是没有话语权的。在今天的印度，人们有时候会听说，印度派代表参加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或一个圆桌会议（Round Table Conference）或一些其他会议。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所谓的代表不可能是印度的代表，除非是印度人民选择了他们。他们是由印度政府任命的，虽然名为印度政府，实际上只是英国政府的一个部门而已。在日俄战争时期，俄罗斯是一个独裁国家。沙皇是“全俄罗斯的独裁者”，而且他是个很愚蠢的独裁者。工人和农民受到军队的压制，甚至连中产阶级在政府中也没有任何话语权。许多勇敢的俄罗斯青年抬起头，举起手，起来反对独裁，并在为自由而战的战斗中牺牲了生命。许多女孩也和他们一样战斗。所以，当我谈到“俄罗斯”做这些、做那些，以及与日本作战，我指的是沙皇政府，仅此而已。

日本的战争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更多的苦难是带给平民百姓的。工人们经常在工厂里进行罢工，给政府施加压力。1905年1月22日，成千上万的和平的工人和农民，在一位神父的带领下，列队行进到沙皇的冬宫，乞求减轻他们的苦难。沙皇非但不听他们的诉求，还命令军队射杀他们。可怕的屠杀发生了，200人被杀害，彼得堡冬天的雪被鲜血染红了。这是一个星期天，从那时起，那一天就被称为“流血星期日”（Red Sunday）。整个俄罗斯都受到深深的震动。工人们举行了罢工，进而又导致了一场革命。但是1905年的这场革命被沙皇政府残酷地镇压了。有几个原因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它是12年后即1917年的伟大革命的某种准备，而1917年的伟大革命改变了俄罗斯的面貌。正是在1905年这场不成功的革命期间，革命的工人们创建了一个新的组织，也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苏维埃（Soviet）。

我从给你讲关于中国、日本和俄日战争的情况，又转而去讲1905年的俄国革命，这就是我的方式。但是我必须给你讲讲这场革命，以解释这场满洲之战时期的俄罗斯的背景情况。主要是由于这场没有成功的革命，以及人民的愤怒，才使沙皇向日本妥协了。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俄两国于1905年9月签署了《朴茨茅斯和约》（*Treaty of Portsmouth*）。朴茨茅斯位于美国。美国总统邀请了交战双方，在那里签署了和平和约。通过这个和约，日本终于夺回了旅顺和辽东半岛，你应该记得，它曾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被迫放弃了它们。日本还得到了俄国人在满洲修建的大部分铁路，还有位于日本北方的库页岛（Sakhalien）的一半。另外，俄罗斯帝国还放弃了在朝鲜的权利。

日本胜利了，它进入了世界列强的小集团。日本是一个亚洲国家，它的胜利，对亚洲所有国家都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我告诉过你，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孩，为此激动不已。亚洲的许多男孩、女孩和成年人都为此激动不已。一个强大的欧洲国家被打败了；就像过去常常发生的那样，亚洲仍然能够打败欧洲。民族主义思想更加快速地在东方国家传播开来，人们喊出了“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但是，这种民族主义思想并不只是回归过去，抱着旧的习俗和信念不放。人们认为，日本的胜利是由于它采用了西方新的工业方法，而这些思想和方法在整个东方已经更加普遍了。

118 ——中国成了共和国

我们看到，日本对俄国的胜利如何使亚洲国家感到既高兴又荣幸的。然而，其直接的结果是，在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小集团里又加入了一个新成员，而第一个受害者是朝鲜。日本的崛起就是朝鲜的坠落。自从日本对外部世界开放之后，就把朝鲜和一部分的满洲划归了自己。当然，它反复宣称它将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朝鲜的独立。甚至在抢劫别国的时候还做出虚伪的善意许诺，甚至在杀人的时候还宣称生命的神圣性，帝国主义在这些事上一向是有一手的。于是，日本郑重宣布它不会干涉朝鲜，同时继续实施它的占领朝鲜的老政策。它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争都是围绕着朝鲜和满洲而展开的。它步步为营，而现在又打败了中国和俄罗斯，其野心更是昭然若揭了。

日本在实施其帝国主义政策上一向是无所顾忌的。它公开地掠夺，甚至不想费心给它的阴谋罩上面纱。早在1894年，正是中日战争开始的前夕，日本人强行进入了朝鲜位于首都汉城的王宫，罢免并监禁了王后，因为她不听命于日本人。日俄战争之后，在1905年，日本政府强迫朝鲜国王签字放弃国家的独立，并接受日本的宗主国地位。但是这还不够。不到5年之后，这个不幸的国王就被彻底地从国王宝座上罢黜了，朝鲜被日本帝国吞并了。这发生在1910年。在经历了3000年的漫长历史之后，朝鲜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消失了。被罢黜的国王属于曾经赶走了蒙古人的那个王朝。但是朝鲜和它的老大姐中国一样，已经变得陈腐而僵化，所以它们为此受到了惩罚。

朝鲜又重新被称为朝鲜王国，清晨宁静之地。日本人虽然带来了一些现代的改革，但是他们在无情地压迫着朝鲜人民的精神。很多年来，人民一直在为独立而斗者，发生了很多次暴乱，最重要的一次发

生在1919年。朝鲜人民，尤其是年轻的男男女女，尽管异常困难，他们还是英勇地斗争着。有一次，一个为自由而战的朝鲜组织刚刚正式宣布独立，公然反抗日本人，而接下来他们就立刻打电话告诉警察自己的所作所为，于是他们从容地为他们的理想牺牲了。日本人对朝鲜人的镇压是历史上十分悲惨和黑暗的一页。你应该知道，年轻的朝鲜女孩们，许多才刚刚大学毕业，在斗争中起了非常突出的作用。

让我们现在回到中国。在镇压义和团运动和1901年签署《辛丑条约》之后，我们就突然离开了它。中国彻底地受到了屈辱，它又一次试图改革。甚至老太后也似乎觉得应该做点儿什么了。在日俄战争期间，中国仍然是一个被动的看客，尽管战斗是在中国的领土——满洲发生的。日本的胜利更加坚定了中国的改革派的决心。他们使教育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还派出了很多学生去欧洲、美国和日本，学习现代科学。过去任命官员的旧式科举制度也被废除了。

这是一种令人惊叹的、典型的中国考试制度，它已经持续了2000年——从汉朝就开始了。它早就已经过时了，严重妨碍了中国的发展；废除这个考试制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从某个合适的立场来看，它长久以来都是个很奇妙的制度。它代表了中国人对生活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不像是在大多数亚洲和欧洲国家，他们的观念要么是封建的，要么是敬神的。中国人一直都是最不信宗教的人，然而，他们比任何宗教人士都更加严格地遵循自己合乎道德又节制的生活制度。他们试图发展一个理性的社会，但是把这样一个社会限制在古老的经典之内，因而阻止了进步和必要的改革，招致的结果就是僵化和停滞。在印度的我们要向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学习很多东西，因为我们仍然是在种姓制度、教条的宗教以及敬神和封建思想的控制之下。中国的伟大圣人孔子曾经警告他的人民，孔子的话值得我们牢记，其大意是，永远不要和那些假装与超自然物有联系的人来往。如果你允许这种超自然力在你的国家立足的话，结果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不幸的是，在我们的国家，很多人头上有一束头发或缠

结在一起的头发，或长长的辫子，或前额上刻着错综复杂的标识，或披着金黄色的斗篷，这些人冒充是超自然力的代表，来剥削广大的平民百姓。

中国守着它所有旧的理性主义和文化，已经与现在脱节了，但是在它陷入困境的时候，它的旧制度却无法解救它。事件的进展激励了它的许多孩子，使他们孜孜不倦地在别处寻找阳光。他们甚至震惊了老太后，她也谈论允许制定宪法以及成立自治政府，并派出一个委员会去国外学习他们的体制。

在老太后统治下的中国政府终于向前发展了，但是，人民的发展更快。早在1894年，孙逸仙博士（孙中山）就建立了兴中会，很多人加入了兴中会，抗议外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公平的、偏袒的条约——中国人称为“不平等条约”。兴中会不断发展壮大，吸引了许多年轻人。1911年，兴中会改名为国民党——中国国民党——它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孙中山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他把美国作为榜样，想建立一个共和国，而不是像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当然更不是像日本那样崇拜天皇的国家。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对他们的皇帝盲目崇拜过，而且，当时统治中国的王朝不是汉族人，而是满族人，因而在中国有很多反对清廷的情绪。正是人民中间的这种激动情绪触动了老太后。但是，她在宣布即将制定宪法后不久就离世了。奇怪的是，老太后和被她罢黜的皇帝侄子在1908年11月同时离开了人世，而且两人离世的时间相差不到24个小时。现在，一个幼儿成了中国名义上的皇帝。

要求设立议会的呼声更大了，反对清廷和反对君主政体的情绪也越发高涨了。革命者的力量在不断聚集。唯一可以对付他们的强悍人物是某个省的总督袁世凯。此人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但他碰巧控制着中国唯一一支现代的、高效的军队，称为“新军”。清廷统治者愚蠢地激怒了袁世凯，并解除了他的官职，于是，他们就失去了唯一一

位可能暂时解救他们的人。1911年10月，长江流域爆发了革命，不久，中国的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也相继起义。1912年元旦，这些起义的省宣布成立共和国，首都设在南京，孙中山被选为总统。

与此同时，袁世凯正在静观事态的发展，并准备在对自己有利的时机介入其中。关于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其子为幼儿皇帝）解除职务，以及之后又被召回的故事十分有趣。一切都是按照旧中国的礼仪和礼貌行事的。当必须解除袁世凯的职务时，清廷宣布他有腿疾。当然，人人都知道他的腿一点问题也没有，这只是要赶他走的惯常的做法。但是袁世凯报仇了。两年之后的1911年，当反对清廷的兵变和起义爆发的时候，摄政王又在惊恐之中想把袁世凯召唤回去。然而，除非袁世凯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否则他是不会回去的。于是他答复摄政王说，他的腿疾还没有完全好，不能旅行！而一个月之后，他的条件都得到了满足，他的腿便以惊人的速度康复了。

但是想制止革命已经太晚了，袁世凯很聪明，他没有卷入任何一方来危及自己。最终，他劝说清廷退位。清廷统治者面对着一个新成立的共和国，又被自己的将军所抛弃，已经别无选择。1912年2月12日，清朝政府发布了《逊位诏书》，于是，统治了中国两个半世纪还多的清政府从中国的舞台上消失了。正如中国的老话所言，“虎头蛇尾”。

就在同一天，也是2月12日，在共和国的首都南京举行了一个奇怪的仪式，这里也是明朝第一任皇帝的陵墓所在地——这个仪式使得旧的君主和新的总统形成了鲜明生动的对比。共和国的总统孙中山和他的内阁一起来到了这座陵墓，并以古老的方式献上了供物。在孙中山的就职演说中，他告诉人民，他们正在为东亚树立一个共和国形式的政府的榜样；对于起来斗争的人们来说，成功的到来或早或晚，但是正直的人们最终一定会得到报偿。那么为什么今天要因为胜利迟迟未来而苦恼呢？

很多年来，孙中山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流亡期间，都在努力为中国的自由而奋斗，而成功终于到来了。但是自由是个靠不住的朋友，成功在到来之前需要全部的付出，而且它还会嘲笑我们的妄想，用许多艰难困苦考验我们，最后才能得到自由。中国的道路和孙中山的道路远远没有走完。很多年，年轻的共和国为了生存而奋斗着，即使到了21年之后的今天，它本应该已经到了成熟壮大的阶段，但是中国的前途还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清廷已经退位，但是袁世凯仍然阻碍着共和国的发展，似乎没有人知道他将会做什么。他控制着北方和南方的共和国。为了和平，避免战争，孙中山自己从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让袁世凯当上了总统。但是袁世凯绝不是共和主义者，他是为了争得权力，提升自己。他向外国列强借钱去镇压那个曾经敬重他、将他选为总统的共和国。他还解散了议会和国民党，从而导致了分裂。一个以孙中山为首的对立政府在南方建立了。就在分裂发生、中国出现了两个政府的时候，世界大战爆发了。袁世凯想当皇帝，但是没有成功，并在不久后就一命呜呼了。

119 ——印度支那和东印度群岛

对远东的叙述我们就暂告一段落了。我们也了解了一些19世纪的印度，是时候向西走，去看看欧洲、美洲和非洲了。但在我们进行这次长途旅行之前，我想带你去看看亚洲的东南角，了解一下那里的最新情况。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讲述这些国家了，我在以前的信中也曾含糊地、分别地但或许是不太正确地提到过它们，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东印度群岛和印度支那。可我觉得这些名字任何一个都不能涵盖整个地区，可是，只要我们能够相互理解，名字又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你手头有地图的话，你就看看吧。在亚洲的东南部，你能看到一个包括缅甸和暹罗的半岛，现在被称为“法属印度支那”。而从缅甸和暹罗中间伸出了一条细细的舌状陆地——马来半岛——半岛的顶端较为宽大，新加坡城就在尖端的位置。从马来半岛到澳大利亚之间的海上散布着很多岛屿，大大小小，形状怪异，感觉像是连接亚洲和澳洲的巨大桥梁的遗迹。这些岛屿就是东印度群岛，群岛的北方是菲律宾群岛。现代的地图会告诉你，缅甸和马来半岛正处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印度支那是在法国统治之下，这两者之间的暹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东印度群岛——苏门答腊和爪哇，还有婆罗洲、苏拉威西岛和摩鹿加群岛的大部分。这些就是著名的香料岛，它们曾吸引欧洲的航海者们穿越几千英里的危险海域来到这里——现在它们属于荷兰。菲律宾群岛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

这就是东部海域这些国家目前的情况。你应该记得我告诉过你，印度的孩子们近2000年前曾到这些国家并在那里开拓殖民地；很长一段时间里，那里的伟大帝国都十分繁荣；那里的美丽城市建起了奇妙的建筑；还有贸易和商业，以及印度和中国文化、文明的结合。

在我的上一封讲述这些国家的信中（第79封），我告诉过你葡萄牙东方帝国的瓦解，以及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的兴起。在菲律宾，西班牙人仍然是统治者。

英国人和荷兰人联合起来打败并赶走了葡萄牙人。他们成功了，但是，在胜利者之间也是相互厌恶的，英国人和荷兰人之间纷争不断。有一次，在1623年，摩鹿加群岛的安汶岛（Amboina）的荷兰总督把东印度公司的全体英国职员都逮捕并处死了，罪名是阴谋颠覆荷兰政府。这次大批处死英国职员的行动被称为“安汶岛大屠杀”。

有一个事实你要记住，在之前的信中我已经告诉过你，在这一阶段——也就是在17世纪和之后的时间里——欧洲还不是工业国家，它还没有大量生产出产品用于出口。大机器和工业革命还是很久以后的事。相比之下，亚洲更是生产国和出口国。亚洲的商品出口到欧洲，其中一部分是用欧洲的产品来交换的，还有一部分是用来自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财富来支付的。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利润极其丰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受葡萄牙人控制的，葡萄牙人因此而发了财；英国和荷兰成立东印度公司，目的都是为了能分享亚欧贸易的利润。但是葡萄牙把亚欧贸易看成了他们独占的贸易，不允许任何人来分享。他们在菲律宾与西班牙人并没有发生什么摩擦，因为西班牙人对宗教比对贸易更感兴趣。但是，英国和荷兰的冒险家们对宗教毫无兴趣，他们是代表着两个新的贸易公司而来的。很快冲突就爆发了。

葡萄牙人在东方统治了125年多。他们并不受那些被他们统治的人民的欢迎，到处都是不满的情绪。英国和荷兰的这两个贸易公司利用当地人的不满情绪，帮助他们摆脱了葡萄牙人，但是，葡萄牙人刚走，他们就进入了这个地区。他们作为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的统治者，以苛捐杂税和其他形式向那里的人民勒索钱财，这帮助了他们进行对外贸易活动，而又不必给欧洲增加很多负担。于是，欧洲之前所承担的、支付来自东方产品的巨大负担减轻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即便

是这样，英国还是以禁止和重税的方式来阻止印度的产品流入英国。在工业革命到来之前，情况就是这样的。

在东印度群岛的荷兰人与英国人之间的冲突没有持续很久，因为英国人从那里撤出了，他们在印度开始忙碌起来，无暇顾及东印度群岛了。这样，东印度群岛就完全留给了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了，只有菲律宾群岛仍然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由于西班牙人对贸易没有什么兴趣，并不想征服更多的领土，那么荷兰人在这个地区现在就没有竞争对手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在印度的、与其同名的英国公司一样，安下心来，尽可能多地挣钱了。150年来，这个贸易公司一直统治着这些岛屿。他们对人民的福祉一点也不在意，只是压迫那里的人民，并勒索尽可能多的钱财。当他们可以通过勒索就能轻易地挣到钱的时候，贸易就成了次要的事情了，也就渐渐衰退了。这个公司是很没有效率的，而到那里去工作的荷兰人和在印度的英国公司的代理人和代理商一样，都是同一类型、肆无忌惮的冒险家。无论用公正的还是邪恶的手段，赚钱都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在印度国家资源要雄厚得多，甚至存在严重的管理不善也可以被掩盖起来；而且在印度的上层，还有一些精明能干的英国总督使管理层能够高效地工作，尽管在底层它仍然在压榨人民。但是你应该记得，1857年的大暴动还是终结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每况愈下，终于在1798年，荷兰政府直接接管了东方岛屿。不久由于欧洲的拿破仑战争，荷兰成了拿破仑帝国的一部分，英国政府便乘机占领了这些岛屿。五年里，它们成了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在这一阶段，英国在这里大力进行了改革。随着拿破仑的垮台，东印度群岛又回到了荷兰人的手中。在爪哇与英属的印度政府联系在一起的五年里，一个很有才干的英国人托马斯·斯坦福德·莱佛士（Tomas Stamford Raffles），担任爪哇的副总督。莱佛士描述

说，荷兰殖民统治的历史“就是最为惊人的背叛、贿赂、屠杀和卑劣等行为的结合”。在各种卑劣行径之中，还有荷兰官员的一种常规制度，即在苏拉威西岛进行绑架，以保证爪哇有可供使用的奴隶。伴随这种绑架行为的是破坏和杀戮。

而尼德兰政府的直接统治也不比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统治强多少。在某些方面，它对人民的压迫更为残酷。你也许记得，我跟你说过孟加拉地区的槐蓝种植园体制，它使耕种者受尽了苦难。而在爪哇和其他地方也引入了一种类似的制度，情况比槐蓝种植园制度更加糟糕。在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人们被迫提供商品。现在，在所谓的“种植园制度”之下，人们每年被迫工作一段时间，大概是耕种者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时间。而实际上，通常几乎所有耕种者的时间都被占用了。荷兰政府是通过承包商来进行作的，政府提供给承包商无息的预付款。然后，这些承包商再剥削土地上的被迫劳动的人们。而土地的农产品应该以一定的比例在政府、承包商和耕种者之间分配。大概贫穷的耕种者的份额是最小的，但我不知道确切的份额是多少。政府还规定，有些土地上必须种植一些欧洲需要的产品，包括茶叶、咖啡、糖、槐蓝等。正如孟加拉地区的槐蓝种植园一样，这些植物都是必须种植的，尽管利润没有种植其他作物那么大。

荷兰政府获得了巨额利润，承包商也发了财，种植者却忍饥挨饿，生活悲苦。在19世纪中叶，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很多人被饿死。只是到了那时，才有人想到应该为不幸的耕种者做点事情了。慢慢地，他们的条件得以改善，但是甚至到了1916年，还有强迫劳动的现象存在。

在19世纪下半叶，荷兰人进行了一些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改革。一个新的中产阶级成长起来了，一场民族主义运动要求得到自由。就像在印度一样，民族主义运动取得了缓慢的进步，没有什么权力的、软弱的议会也建立起来了。大约在五年之前，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发生了

一场革命，但是革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然而任何残酷的镇压都扼杀不了自由的精神，它已经在爪哇和其他岛屿上蔓延开了。

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在被称为尼德兰的印度。每两周会有一趟航班从荷兰飞越欧洲和亚洲，到达爪哇的巴达维亚市。

我已经完成了对东印度群岛的概述，现在，我要回到亚洲的本土。关于缅甸，没有什么更多可说的了。这个国家通常被分为北方和南方，南北方相互争斗。有时候，一个强有力的国王统一了南北方，甚至还冒险去征服邻国暹罗。然后，到了19世纪，他们与英国人发生了冲突。缅甸国王对自己的力量过于自信，入侵并兼并了阿萨姆邦。接下来，缅甸在1824年与印度的英国人发生了第一次缅甸战争，阿萨姆邦回到了英国人的手中。现在英国人发现，缅甸政府和军队都很软弱，所以英国人心中燃起了兼并整个缅甸的欲望之火。于是，他们找到了愚蠢的借口，挑起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战争。到1885年，整个缅甸王国被兼并，成了英国的印度王国的一部分。从那时起，缅甸的命运就与印度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缅甸以南，英国人还扩张到了马来半岛。他们早在19世纪就占领了新加坡岛，由于它的位置优越，很快成了一个新兴的商业城市和所有去往远东船只的停靠港。在半岛更靠北方的老的马六甲港衰落了。从新加坡，英国人开始向北扩张。在马来半岛有很多小王国，它们大都是暹罗的臣属国。到19世纪末，这些王国都成了英国人的受保护国，它们以联邦的形式联合在一起，称为“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暹罗不得不把它在这些王国拥有的所有权利拱手交给了英国。

这样，暹罗就被欧洲列强包围了。在它的西边和南边是缅甸和马来，在那里，英国是最高统治者；在东边，法国正在侵略和吞并安南。安南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但是，当中国已经自身难保的时候，这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你应该记得，我在最近的一封信里告诉

过你，因为法国入侵安南，法国和中国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法国受到了一些抑制，但只是暂时的。在19世纪下半叶，法国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地，叫作法属印度支那，包括安南和柬埔寨。柬埔寨，伟大的吴哥帝国过去曾在这里兴旺繁盛，而当时是暹罗的臣属国。法国以战争威胁暹罗的方式，建立了自己在柬埔寨的统治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在这些国家的所有早期的阴谋行为，都是通过法国传教士实施的。其中有一名传教士因为某种原因被处死了，正是为了确保得到赔偿，1857年，法国派出了第一支远征军。这支远征军攻占了南方的西贡市（Saigon），从那里，法国继续向北扩张。

恐怕讲述帝国主义入侵这些亚洲国家的卑劣故事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重复。因为他们在各处使用的方法多多少少都是相同的，在各处也几乎都取得了成功。我给你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国家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是以这个国家沦为某个欧洲列强的殖民地而结束，至少是暂时的结束。在东南亚，只有一个国家逃脱了这样的命运，这个国家就是暹罗。

暹罗很幸运地逃脱了，因为它被挤在缅甸的英国人和印度支那的法国人中间。或许正是因为在它的左右两侧出现了这两个欧洲的竞争对手，才使它得以逃脱。它的好运气还因为有一段时间，它拥有一个良好的政府，不像其他许多国家那样，它的国内没有发生内乱。当然，好的政府并不能保证国家不受外敌侵略。碰巧，此时英国忙于在印度和缅甸的事务，而法国则忙于印度支那的事务。当这两国于19世纪末都到达暹罗边境的时候，兼并的时代业已过去。在东方，反抗的精神正在兴起，民族主义运动也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展开了。在柬埔寨的问题上，暹罗和法国之间已经到了战争的边缘，但是暹罗屈服了，避免了与法国的战争。在西边，有一座大山作为屏障，保护了暹罗免受在缅甸的英国人的入侵。

过去我至少两次提到过，缅甸的国王曾入侵暹罗，甚至兼并了它。最后一次入侵是在1767年，暹罗人的首都阿育他耶府（Ayudhia，你看，印度的名字出现了）遭到了毁灭。然而，不久之后，缅甸人就被一次民众的起义赶了出去；1782年，拉玛一世（Rama I）在此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甚至到了150年后的今天，这个王朝仍然统治着暹罗，所有的国王似乎都被称为“拉玛”。在这个新王朝的统治之下，暹罗有一个很公正但却是家长式的政府，它很明智地努力与外国列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它开放了港口，与外国做贸易，还和一些外国列强签署了商业条约，并对政府部门进行了一些改革。新的首都设在曼谷（Bangkok）。但这一切并不足以把帝国主义恶狼挡在国门之外。英国在马来半岛进行扩张，并占领了暹罗在那里的领土；法国占领了柬埔寨和在东边的暹罗领土。1896年，法国和英国几乎在暹罗打了起来。但是后来，双方以帝国主义认可的方式，都同意要保证暹罗剩下的国土部分的完整，同时，又将其划分为三个“势力范围”。东边的部分是法国的势力范围，西边的部分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在两者之间有一个中立区，双方都可以随意取得不义之财。尽管他们庄严地保证暹罗领土的完整，但是，几年之后，法国又占领了东部的一些领土，当然，英国也必须在南方得到一些补偿。

尽管如此，但是暹罗的一部分还是逃脱了欧洲人的控制，它是在亚洲的这个地区唯一一个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国家。现在，欧洲的入侵浪潮已经受到了抑制，欧洲人已经没有什么机会在亚洲得到更多的领地了。在亚洲的欧洲列强不得不收拾行囊回家的日子也很快就要到来了。

直到最近，暹罗还是个独裁的君主国家，尽管它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还存在着大量的封建残余。几个月前，那里发生了一场和平的革命，似乎上层的中产阶级来到了最重要的位置。暹罗建立了议会。拉玛一世王朝的国王很明智地同意了改革的建议；就这样，拉玛王朝被保留了下来。于是，暹罗现在还有一位立宪制的君主。

还有一个东南亚国家等着我们去了解，那就是菲律宾群岛。我本想也在这封信里写的，但是现在已经晚了，我也累了，而且这封信已经够长了。

这是我在1932年里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了——这一年自然而然地走到了最后时刻。再过三个小时，今年就要结束了，它将成为过去的记忆。

120 ——又一个元旦

今天是元旦。地球已经完成了又一个围绕太阳旋转的周期。地球并不能识别特殊的日子和节假日，只是永不停歇地穿越太空，根本不在乎生活其上的芸芸众生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拥挤在地球上，相互争吵，并且出于愚蠢的自大，把自己——男人和女人们——想象成为社会的中坚，宇宙的中心。地球忽视了它的孩子们，但是我们无法忽视我们自己，在元旦这一天，我们许多人往往要在生命的旅程中休息一会儿，回首过去，缅怀一下往事，然后再向前看，努力振作起来。所以，今天我就在怀旧了。这是我在监狱里连续度过的第三个元旦了，尽管其间我曾到外面的大世界里待几个月。再往后看看，我记得在过去的11年里，我在狱中度过了5个元旦。我在想，我还要在狱中度过多少个这样的日子和其他的日子呢？！

用监狱里面的话来说，我现在是个“惯犯”了，而且是很多次的惯犯。我已经习惯了监狱里的生活，它与我在外面的生活形成了很奇怪的对照。在外面，我总是忙于工作、各种活动、大型的聚会和公开的演说，还总是不停地东奔西走。而在这里，一切都不一样了；一切都是那么安静，也没有什么活动，我长时间地坐着，一言不发。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过去了，它们相互融合在一起，已无法进行区分了。过去宛如一幅模糊的画面，已经没有特别突出的印迹了。昨天把我带回了被捕的那一天，而从那时到现在，其间发生的一切都没有在我的头脑里留下什么印象，几乎成了一片空白。这就像扎根于一处的植物的生活，它就在那里生长，没有意见，也没有争论，安安静静，一动不动。有时候，外面世界的活动对于一个在狱中的人来说，似乎有点奇怪，令人困惑；它们似乎遥远而又不真实——就像

是一种幻象的表演。所以，我们形成了两种性格——主动和被动的性格，两种生活方式和两种个性，如同“化身博士”一般。你有没有读过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这个故事？一个人经过一段时间，都会对某种东西习以为常的，甚至是对监狱生活的千篇一律和一成不变。休息对身体有益，安静对头脑有益，它使人思考。“休息是件好事，但无聊是它的兄弟。”现在，你也许明白了给你写这些信，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在你看来，它们也许乏味、冗长又啰嗦，但是它们充实了我的狱中生活，给了我一个能够带给我快乐的工作。只是在两年前的今天，在元旦这天，我才开始在奈尼监狱写这些信，而当我再一次回到监狱后，又继续写。有时候，我连续几周都不动笔，有时候又每天都写。每当我有了写作的状态时，便拿起纸笔坐下来，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你就成了我可爱的伙伴，我便把监狱的一切抛在脑后。所以，这些信就是我逃避监狱生活的消遣方式。

我正在写的这封信是第120封，这个编号是9个月前在巴雷利监狱开始的。我惊奇的是已经写了这么多，而且我还担心，当这堆积如山的信一股脑儿地交给你的时候，你会说什么，会有什么感觉。可是你不会吝惜我逃避监狱生活的一点消遣和旅行吧。亲爱的，我已经7个月没有看到你了。多么漫长的岁月啊！

我信里所讲述的故事不是令人愉快的故事。历史并不令人愉快。人类尽管自诩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是讨厌而自私的动物。人类漫长而沉闷的历史，充斥着自私、好斗和残忍，但是透过这一切，还是可以看到一线进步的希望。我算是个乐观主义者，往往会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是不能让我们的乐观蒙住我们的双眼，看不到周围的黑暗之处，看不到不合时宜的、轻率的乐观主义的危险性。因为世界的过去和现在都没有给乐观主义太多的发展空间。对于那些理想主义者和那些不愿轻信的人，这个世界是个很艰难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提了出来，却没有直接的答案；各种各样的疑问出现了，也不会轻易

消失。这世界上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愚蠢和苦难？这是个古老的问题，它困扰着2500年前我们国家的悉达多王子。根据传说，他问了自己这个问题很多次，然后受到了启迪，成了佛。据说，他自问：

> 梵天（Brahm）怎么能够创造一个世界，却又让它如此悲惨呢？既然他是万能的，他却让世界成为这个样子，那么他就不仁慈，如果他不是万能的，那他就不是造物主了吗？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为自由而战的斗争还在继续，然而，我们的许多同胞对此并不在意，而是在相互之间争论、争吵，并且以一个宗派或者宗教集团或者狭隘的阶级的立场来思考问题，忘记了广大民众的利益。还有一些人对自由毫无想象力：

> ……与独裁者休战，变得温顺驯服，他们拾起被扔掉的王冠和信条，给破布和碎片重新镀金。

以法律和秩序之名，独裁兴旺起来，并试图镇压那些不向它屈服的人们。奇怪的是，应该成为弱者和受压迫者的避难之所的东西，在压迫者的手中却成了武器。这封信已经引用了好几段语录了，但我必须再引用一段，因为这一段对我很有感染力，而其似乎很适合我们目前的状态。它选自孟德斯鸠的一本书。孟德斯鸠是一位法国18世纪的哲学家，我在前面的信中也提到过他。

> 没有哪一种暴政会比在法律庇护下，披着正义色彩的专制更为残酷，它用同一艘船溺死了我们本希望搭救的不幸者。

作为一封元旦的信，这封信已经变得太忧郁了，这是很不合时宜的。事实上，我并不感到忧郁，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忧郁呢？我们正在

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而快乐地工作和斗争着；我们有一位伟大的领袖、一位挚爱的朋友和值得信赖的导师，他的目光给了我们力量，他的抚摸给了我们激励；我们坚信成功在等待着我们，总有一天我们会成功的。如果没有我们需要克服的障碍和我们必须赢得的斗争，那么生活将会沉闷而平淡无奇。

而你，我亲爱的人，生活才刚刚开始，绝不要和忧郁、沉闷有任何交集。你应该以一张快乐宁静的面容，直面生活和它所带给你的一切，迎接前进路上的困难，并欢悦地战胜它们。

再见，亲爱的，希望再见的日子不会太遥远！

121 ——菲律宾和美国

元旦那天，我们说了点题外话，现在我们要继续讲我们的故事了。我们不妨说说菲律宾群岛，这样我们东亚部分的画面也许就描绘完成了。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些群岛呢？在亚洲和世界的其他地方，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岛屿，可我在信中甚至没有提及它们。我们正在尝试着探索新兴的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发展及其对传统文明所造成的冲击。印度就是一个适于这种研究的典型帝国；而中国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工业帝国主义扩张的另一面，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面。东印度群岛、印度支那半岛等等，都对我们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同样，我们对菲律宾也很感兴趣。而由于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积极活动的新力量——美利坚合众国，使得我们对它的兴趣更浓厚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美国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具有侵略性；有时候，美国甚至会通过限制其他帝国主义政府在中国的活动来帮助中国。这并不是出于美国对帝国主义的厌恶或者对中国的喜爱，而是由于一些内部因素使其有别于欧洲列强。这些欧洲国家紧紧地挤在了一块小小的大陆上，人口十分密集，没有置肘之地，所以相互之间总有摩擦和矛盾。随着工业主义的到来，这些国家的人口急剧膨胀，并且他们开始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而这么多的产品无法在国内全部卖掉。增长的人口需要食物，工厂需要原材料，制造出来的产品需要市场。满足这些需求的急迫的经济必要性驱使他们冲向遥远的国度，加入到相互之间争夺帝国的战争中。

然而这些动机并不适用于美国。美国有着和整个欧洲差不多辽阔的疆土和为数不多的人口。在那里，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空间。同时，他们也有很多的机会，让他们可以把精力倾注到自己广阔的、未开发

的领土上。随着铁路的建成，他们不断向西扩张，最终到达了太平洋。这些在自己国家的工作已经让美国人非常忙碌，所以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去进行殖民冒险。前面我已经告诉过你，实际上，由于加利福尼亚州沿岸劳动力的短缺，美国一度不得不请求中国政府派出中国劳工。中国政府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可是日后引发了两国之间的不愉快。正是因为美国人忙于他们自己国内的事务，才使他们远离了欧洲各国政府肆意从事的帝国竞争。美国只在他们认为有必要或担心其他列强之间将要瓜分中国的时候，才开始干涉中国事务。

无论如何，菲律宾已经处在美国的直接统治之下。菲律宾为我们讲述了美帝国主义的统治，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不要以为美国的帝国仅限于菲律宾群岛。表面上看，这是他们唯一的一个帝国，但是，他们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验和麻烦中受益良多，改进了老的殖民方法。他们并不费力去吞并一个国家，像英国吞并印度那样；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利润，因此他们采取行动，去控制一个国家的财富。通过控制这个国家的财富，就很容易控制这个国家的人民乃至整个国土。所以，无须太多的麻烦，或者无须与具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发生什么摩擦，他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并且分享了它的财富。这个巧妙的手段被称为“经济帝国主义”。地图上并没有将其显示出来。如果你查阅地理书籍或地图册，你会发现这个国家似乎是自由且独立的。但如果你透过这层面纱探究其本质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已经处于另一个国家的控制之下了，更确切地说，是处于另一个国家的银行家和大商人的控制之下。这就是美国所拥有的无形的帝国。而英国正试图在印度和其他地方为自己保全的，正是这种无形但很有效的帝国，虽然表面上它把对政治机器的控制权交给了那些国家的人民。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们必须对此多加提防。

眼下我们暂时还不需要去深入了解这种无形的经济帝国，因为菲律宾是有形帝国的一部分。我们对菲律宾之所以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还有另一个微不足道但是有些伤感的原因。虽然今天的菲律宾有着西

班牙-美国混杂的面貌，但实际上他们古老文化的整个背景都起源于印度。印度文化通过苏门答腊和爪哇传到了菲律宾，并且几乎触及了其生活的每个方面——社会、宗教和政治。古老的印度神话和故事以及一部分我们的文学作品传播到了菲律宾。他们的语言包含了很多梵文词语。他们的艺术也受到了印度的影响，还有法律和手工业。甚至衣着和装饰品也有印度的印记。西班牙人在他们统治菲律宾的300多年中，竭力毁掉了所有古印度文化的痕迹，如今它们已经所剩无几了。

西班牙人对这些岛屿的占领要追溯到1565年，因此这些岛屿是欧洲在亚洲最早的立脚点之一。西班牙人对这些岛屿的统治与葡萄牙、英国或荷兰的殖民地都大不相同。贸易并没受到鼓励。宗教是政府的背景，政府官员大都是传教士和牧师。因此，它被称为“传教士帝国”。他们从没有试图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们不善于治理国家，还残酷压迫人民并征收重税，且试图强迫人民皈依基督教。这种状况自然引发了许多起义。许多中国人前来菲律宾群岛进行贸易活动。由于他们拒绝皈依基督教，因此遭到了西班牙人的屠杀。英国和荷兰的商人不被允许到此经商，部分原因是英国和荷兰经常与西班牙为敌，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是新教教徒，在信奉罗马天主教的西班牙人眼中，他们就是异教徒。

形势在不断恶化，但是接下来又出现了转机。这些群岛的不同部分和族群联合起来了，一种民族意识在19世纪开始形成。在19世纪中期，这些群岛对外国商人开放了，这导致了教育和其他部门的改革，并且贸易和商业也得到了发展。菲律宾中产阶级崛起了。西班牙人和菲律宾人之间开始出现了异族通婚，许多菲律宾人都有西班牙血统。西班牙几乎被看作菲律宾人的祖国，西班牙人的思想也得到了普及。但是，民族主义精神仍然在继续成长，由于它受到了压制，于是它便更具革命性了。一开始，菲律宾人并没有想要脱离西班牙，他们只是要求自治，还有在被称为“Cortes”的衰弱而无能的西班牙国会里享有代表权。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民族运动温和但不可避免地兴起了，

但它是如何变得激进并最终朝着脱离西班牙而独立的方向发展的呢？被压制的民主要求必定在日后得到加倍偿还。在菲律宾，民主的呼声不断高涨，人们形成了一些民族组织，以力促民主要求的实现。秘密社团遍地开花。一个以何塞·黎刹博士（Dr. Jose Rizal）为领袖的“年轻菲律宾党”异军突起，在这场民族运动中起了很突出的作用。西班牙当局想通过恐怖方式——这似乎是所有政府所熟知的唯一方式——来镇压这场运动。黎刹和许多其他领导者被判处了死刑，并于1896年被处决。

这犹如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公开反抗西班牙政府的起义爆发了，菲律宾人发布了他们的“独立宣言”。这场斗争持续了整整一年，西班牙人根本无法镇压这场起义。接着，西班牙政府承诺进行实质性改革，才使起义暂时中止了。然而，西班牙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举措，因此在1898年，起义重新爆发了。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与西班牙之间由于一些其他事由发生了冲突，并最终升级成了战争。在1898年4月，一支美国舰队进攻了菲律宾。菲律宾的起义领导者满怀期待地认为，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会拥护菲律宾的自由，因而在这场战争中帮助了美国人。他们再次宣布独立，并且组建了一个共和政府。在1898年9月，菲律宾国会召开了会议。11月底，正式通过了一部宪法。但是，当国会正在讨论这部宪法的时候，西班牙正被美国打得节节败退，已经不堪一击了。于是，西班牙在年底之前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战争到此结束。作为和平的条件，西班牙将菲律宾拱手交给了美国。西班牙不费分毫就送出了这个慷慨的礼物，因为菲律宾的起义者已经终结了西班牙的统治。

现在，美国开始采取步骤去占领这个群岛了。菲律宾人提出了抗议，并且指出西班牙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移交这个群岛，因为这个群岛当时根本就不再属于西班牙了。他们的抗议是徒劳的，而且正当他们为了刚刚赢得的自由而欢庆的时候，却不得不重新开始与一个比西

班牙强大得多的政府斗争了。在三年半的时间里，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有几个月是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府进行的斗争，而之后使用的则是游击战法。

这场起义最终被镇压了，美国确立了它在菲律宾的统治。美国推行了大量的改革，尤其是在教育方面。但是要求独立的呼声仍然在持续。191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人称《琼斯法案》（*Jones Bill*），该法案把一些权力移交给了一个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然而，美国总督有权干涉，并且他也常常进行干涉。

岛上再没有发生过反对美国当局的叛乱了，但是菲律宾人拒绝满足于现状，一直在鼓动和要求独立。美国政府总是以帝国主义的一贯方式向他们担保，美国在这里只是为了造福于菲律宾人，一旦菲律宾人有能力自己管理好国家，美国就会离开。即便是在1916年的《琼斯法案》里也声明："一旦菲律宾在那里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府，美国就放弃对菲律宾群岛的主权，并承认菲律宾的独立。这就是而且始终是美国人民的意图。"尽管如此，在美国还是有很多人公然反对菲律宾独立。

甚至就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报纸上刊登的消息还在声称，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或是某种公告，声明菲律宾将在10年内被准予独立。

美国急切地保护他们在菲律宾的一些经济利益。他们对那里的橡胶园尤为感兴趣，因为橡胶是他们所缺乏的必要物资之一。不过我相信，他们对于占领那块岛屿的主要兴趣，是源于对日本的忌惮。日本离菲律宾群岛的距离很近，并且日本人口不断增长，已经人满为患。日本政府很有可能正在对这些岛屿虎视眈眈。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交恶已久，因此，菲律宾未来的问题就成了太平洋大国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一更大问题的一部分。

122 ——三个大陆的交融之处

我的一个新年愿望成真了，而且比我两星期以前写信的时候所预期的时间还要早得多。经过漫长的等待，我们最终等来了一次会面的机会，我再一次见到了你们。在之后的好几天里，我的心中都充满了见到你和其他人的快乐和兴奋，打乱了我的日程安排，并且使我忽略了我的日常工作。我的心情就像过节一样快乐。我们的会面是在四天前，可我已经觉得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已经开始期待未来，不知道我们何时何地能够再相见。同时，没有任何监狱的规章条例可以阻止我的虚幻游戏，我将继续给你写这些信。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写一些关于19世纪的事。我首先把这个世纪，也就是大致从拿破仑垮台之后的100年间的历史，进行了概括性的叙述。然后我们继续对一些国家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我们仔细研究了印度，然后是中国和日本，最后是印度支那和东印度群岛。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个更详细的研究中，只考察了亚洲的一部分，而对于这个世界的其他部分还没有进行研究。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而且很难让它井井有条、清晰明了。我不得不把这些国家和大陆一个接一个地分别讲述。为了讲述不同地区的事件，我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同一个时期。这就必然有些让人容易混淆。但是你必须得记住，所有这些19世纪的不同国家的事件都发生于同一时期，大致在同一时间，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单独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是非常靠不住的，只有一部世界历史才能让我们对那些塑造过去并决定现在的事件和力量的重要性有正确的认识。我不敢妄称这些信能给你这样的一部世界历史，这个任务已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而且你会发现有关这个主题的书已经很多了。我在这些信中所做的，只

是唤起你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向你展示世界历史的一些方面，并让你追踪从古至今一些人类活动的线索。我不知道能写成什么样，我担心我努力的结果也许就是放在你面前的一个大杂烩，非但没有帮助你形成一个正确的判断，反而让你更加糊涂了。

欧洲是19世纪发展的驱动力。这时的欧洲民族主义盛行，工业主义开始普及，散射到世界上各个遥远的角落，并且以帝国主义的形象出现。我们在第一部分关于这个世纪的概述中已经看到了这些，并且相当详尽地追踪了帝国主义在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的影响。在我们走近欧洲去详细解读之前，我希望你能够去西亚做一个短暂的访问。我已经在很长的时间里忽略了这个地方，主要是因为我对它后来的历史知之甚少。

西亚与东亚和印度都十分不同。当然，在遥远的过去，许多民族和部落从中亚和东方而来，并占据了它。土耳其人也来了。在基督纪元之前，佛教也同样普及到了小亚细亚半岛，但似乎并没有在那里扎根。在那个时代，西亚更多的是面向欧洲而不是亚洲或东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亚是亚洲面向欧洲的窗口。伊斯兰教甚至在传入亚洲的许多地区之后，仍然没有对西亚的观念产生多大的影响。

印度、中国和一些邻国从来没有这样去审视过欧洲。他们在亚洲偏安一隅。印度和中国也在种族、观念和文化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从来没有当过宗教的奴隶，也从没有过任何神职人员的等级制度。而印度总是以它的宗教为荣，它的社会充斥着神职人员，尽管佛陀努力地使它解脱这个沉重的负担。印度和中国还有许多其他的差异，但是印度和东亚、东南亚之间有一种奇特的共性。

这种共性是由佛教传说的主线贯穿起来的，它把这些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编织出一个艺术、文学、音乐和歌曲的共同主题。

伊斯兰教将一些西亚的东西带进了印度。那是一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观念。但是西亚的观念并非直接进入印度，也不是以其自然的外表进入印度的，不过要是阿拉伯征服了印度的话，倒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它是在很久之后，通过中亚民族传入的，而这些中亚民族绝非他们最合适的代表。尽管如此，伊斯兰教仍然连接了印度和西亚，印度也因此成了这两大文明的交融碰撞之地。伊斯兰教也传播到了中国，并且收获了很多信徒，但是它从没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过挑战。而在印度，伊斯兰教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很大的挑战，因为伊斯兰教长期以来都是统治阶级的宗教信仰。印度也因此成了两种文化相互对峙的国家；我也向你介绍过，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很多人努力想找到一个宗教的融合体。这些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就在此时，一种新的危险和新的障碍出现了，这就是英国对印度的征服。如今，这两种文化都失去了它们过去的意义。民族主义和工业化已经改变了世界，古老文化能否生存下去，完全取决于它们能否适应新的经济环境。这两种文化变得徒有其表，真正的内涵已经消失了。在西亚，在伊斯兰教真正的发源地，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和远东正处于连年的战乱中。而在印度，我们可以目睹正在发生的一切。

我已经太久没有讲过西亚的情况了，所以我发现很难再继续讲下去。你应该记得我告诉你的，关于伟大的阿拉伯帝国巴格达，以及它是如何在土耳其人面前陷落的——这里说的土耳其人，是指塞尔柱突厥人，而不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以及它是如何最终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摧毁的。这些蒙古人同样终结了当时已经扩张到包括波斯在内的中亚的花剌子模帝国。跛子帖木儿随后到来，在短短一天的军事胜利以及大屠杀之后，一切都结束了。然而，在西方，一个新兴的帝国，尽管曾被帖木儿击败，但仍然在继续扩张。这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它占领了西亚的波斯以及埃及和一大片欧洲东南部的疆土。世世代代他们都威胁着欧洲，对于刚刚从中世纪走出来的欧洲宗教人士和迷信者来说，他们就像是被派来惩罚罪人的“上帝之鞭”。

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西亚几乎从历史上消失了，它变成了一潭从世界生活的主流中被分隔开的死水。很多个世纪以来，实际上是几千年来，它都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通道，不计其数的满载着货物的商队穿越了它的城市和沙漠，从一个大陆去往另一个大陆。但是土耳其人并不鼓励贸易。即使他们鼓励贸易，他们在一种新的因素面前仍然是软弱无力的，那就是亚洲和欧洲之间海上航线的发展。大海成了新的运输通道，船舶取代了沙漠中的骆驼。这样的变化使西亚失去了它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过起了独守一隅的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使得海路更加重要了。这条运河成了东西方之间最伟大的通道，将两个世界拉得更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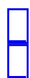
而现在，在20世纪，另一个变化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了；在陆地与海洋这对老对手的竞争中，陆地占了上风并且取代了海洋，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通道。汽车的问世使得局面发生了改变，而飞机则带来了更大的变化。荒废已久的古代贸易通道再次变得车水马龙，但是，悠闲缓慢的骆驼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飞驰穿越沙漠的汽车和在天空中飞行的飞机。

奥斯曼帝国将亚洲、非洲和欧洲这三个大陆连接在了一起。在19世纪之前很久，它就已经衰弱了，而在19世纪，这个帝国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它从“上帝之鞭”，变成了“欧洲病夫”。1914年到1918年的世界大战宣告了它的终结，然后在其灰烬中一个新的土耳其崛起了，它独立自主，强大进取，与它一同出现的还有另外几个新兴的国家。

我在前面说了，西亚是亚洲面向欧洲的窗口。它以地中海为界。地中海是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分界线，也把这三大洲连接在一起。这种连接在过去非常强大，地中海周边的国家都有很多的共同之处。欧洲文明始于地中海地区。古希腊的殖民地遍布了三个大陆的地中海沿岸地区；罗马帝国也围绕着地中海进行扩张；基督教在地中海周围找

到了它的发源地；阿拉伯人把他们的文化从东海岸带到了西西里岛，然后穿过在其南方的非洲海岸，传到了西边的西班牙，并在那里逗留，至今已有700多年。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亚洲地中海国家和南欧与北非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因此，西亚在过去成了亚洲和另外两个大陆之间明确的纽带。我们只要去寻找，就很容易在全世界各地找到这样的纽带。国家主义的狭隘视野，使得我们更多地去考虑各个单独的国家，而不是世界的统一性和不同国家的共同利益。



第五卷
民主主义的前进

123 ——一次回顾

最近，我读了两本让我深感愉悦的书，我想把它们分享给你。这两本书都是由一位名叫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的法国人写的，他是巴黎集美博物馆（Musee Guimet）的管理委员。你有没有去过这座展示东方艺术特别是佛教艺术美妙的博物馆呢？我不记得你陪我去过。格鲁塞先生撰写了一套概述东方文明，也就是亚洲文明的书，共分为四卷，分别介绍了印度、中东（也就是西亚和波斯）、中国以及日本。作为一位对艺术深感兴趣的人，他从各种艺术门类发展的角度出发，进行撰写和阐述，还提供了大量精美的图片。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历史，比了解战争、战役和国王们的政治阴谋好得多，也有趣得多。

到现在为止，格鲁塞先生的著作我只阅读了两卷，这两卷书分别介绍印度和中东，让我欣喜不已。书中展示的瑰丽建筑、宏伟雕塑、精美壁画和绘画，让我感觉自己仿佛离开了台拉登监狱，到达了遥远的国度，回到了久远的过去。

在很久以前写给你的信中，我提到过印度西北部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它们都是5000年前繁荣兴旺的古代文明遗址。在那遥远的时代，人们在摩亨佐达罗生活、劳作和玩耍的时候，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文明中心。我们的信息非常有限，只局限于在亚洲各地和埃及发现和发掘的某些遗址。如果我们挖掘足够努力，挖掘范围足够大，我们会发现更多这样的遗址。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那个时期高度发达的文明，在埃及的尼罗河流域（Nile Valley）、埃兰国（Elam）都城苏萨城所在地迦勒底（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东部

（Eastern Persia）的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中亚地区的突厥斯坦，以及中国的黄河流域，都发现了高度发达的文明。

在这个时期，新石器时代已经远去，铜器开始大量使用。从埃及到中国的广阔地域之内，文明几乎都处在相同的发展阶段。的确，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些证据，证明当时存在一种横跨亚洲的共同文明，这说明各个文明中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之间保持着沟通与联系。农业繁荣发达，家禽家畜被广泛饲养，人们也有一些贸易往来。文字也出现了，只是人们还没有破译出这些古老的图画文字。在相距很远的各个地域，发现了相似的工具，而且各地的艺术作品也十分相似。彩陶，充满各种设计和装饰的美丽花瓶，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关注，人们甚至将这个时期称为“彩陶文明”（Painted Potery Civilization）。这个时期出现了金银珠宝，也出现了雪花石膏和大理石器皿，甚至还出现了棉织品。从埃及到印度河流域再到中国，每个早期文明的中心都有它的独特之处，这些独特之处各自发展着，然而各个文明之间似乎还是有一种共同的、相互联系的文明存在。

这大约是5000年前的事情。但是很显然，这样的文明是比较先进的，它必定经过了大约几千年的发展。在尼罗河流域以及迦勒底，文明还能再向前追溯至少2000年，其他的文明中心也可能同样这么古老。

四大东方文明均源自早期铜器时代广泛传播的共同文明，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的摩亨佐达罗时期，四大东方文明开始分化，差异开始出现。这四大文明分别是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文明以及中国文明。正是在后来的这个时期，埃及建造了大金字塔，吉萨（Gizeh）建造了狮身人面像狮身人面像。之后，大约公元前2000年，埃及进入了底比斯时期。当时的底比斯王国繁荣昌盛，创造出了大量美妙的雕塑和壁画。这是一个艺术复兴的伟大时期。卢克索（Luxor）的巨大神庙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期建造的。图坦卡蒙（Tutankhamen）

是底比斯法老（Theban Pharaohs）之一，似乎人人都知道他的大名，却对有关他的其他事情知之甚少。

在迦勒底，苏美尔（Sumer）和阿卡德（Akkad）这两个地区出现了强大的国家。位于迦勒底的著名城市乌尔（Ur），在摩亨佐达罗时期就已经有艺术杰作产生了。在经过大约700年的统治之后，乌尔被推翻了。巴比伦人成了新的统治者，他们是来自叙利亚的闪米特人（Semitic，就像犹太人或阿拉伯人）。这时的巴比伦城成了一个新的帝国中心，《圣经》中经常提到巴比伦城。在这个时期，文学得到了复兴，史诗被谱写出来并被广泛吟诵。人们认为这些描写世界起源和洪水泛滥的史诗是《圣经》最初几章内容的故事原型。

之后，巴比伦沦陷了；许多个世纪之后（大约公元前1000年及以后），亚述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建立了以尼尼微为都城的帝国。他们所有的执政体制都建立在恐怖主义的基础之上；通过屠杀和摧毁其他国家，他们在整个中东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帝国。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帝国主义者。然而，这些人在某些方面却有着高度的文化教养。在尼尼微有一座庞大的图书馆，当时各种门类的知识都汇聚在了一起。不用说，这座图书馆里面没有一张纸，更没有像现代图书一样的东西。那时候的书都是刻在石碑上的。尼尼微古老图书馆中那些数以千计的石碑，如今就陈列在伦敦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里。其中有一些画面是相当恐怖的，暴君生动地描述了他对敌人的残暴以及他对残暴行为的喜爱。

在印度，摩亨佐达罗时期之后，出现了雅利安人。人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他们早期的遗址和雕塑，但他们最伟大的遗迹是他们古老的书籍《吠陀经》和其他书籍，这些书让我们了解了这些来到印度平原的快乐勇士的思想。这些书里全都是赞颂大自然的诗歌，神明就是大自然的神。当艺术得到发展的时候，这种对大自然的热爱也理所当然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坐落在博帕尔（Bhopal）附近的桑奇塔门（Sanchi

gates），是被发现的最早的艺术遗迹之一。它们源于早期的佛教时期，这些塔门上雕刻的美丽花朵、树叶和动物形象，都在向我们诉说着雕刻艺术家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和理解。

后来，希腊文化的影响从西北方向传来。你应该记得，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希腊帝国接近了印度边境；之后，出现了边境帝国贵霜帝国，它同样受到了希腊的影响。佛陀释迦牟尼反对偶像崇拜。他不把自己称作神，也不让别人崇拜他。他希望社会能摆脱神职人员的谋略所带来的邪恶，他是一位努力扶持沉沦者和失意者的改革家。“我来到这里，”他在贝拿勒斯附近的鹿野苑第一次宣讲佛法的时候说道，“我来到这里用智慧让无知的人获得满足……一个人只有将毕生投入到对生灵有益的事情中，只有慰藉那些被遗弃的人的时候才算完美……我的信条是一种慈悲的信条，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快乐的人们觉得这种信条很难。救赎的道路对所有人开放。婆罗门对旃陀罗关闭了救赎的道路，可婆罗门其实和旃陀罗一样，来自女人的子宫。湮灭你的激情吧，就像大象推倒芦苇小屋一样……对抗邪恶的唯一方法就是清醒的现实。”佛陀释迦牟尼以此告诉人们做善事的方法和生活的方式。但是，就像那些无法理解大师内涵的愚蠢信徒一样，许多追随者只看到他制定的外在行为规则，却没有领会其内在的意义。他们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依然崇拜他。这个时期，佛陀释迦牟尼的雕塑并没有出现，还没有人去创造他的形象。

之后，希腊以及其他希腊化国家的思想开始出现；在这些国家，美丽的神像雕塑被创造出来，并供人膜拜。在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这种影响最为深刻，雕塑中出现了婴儿时期的佛陀释迦牟尼形象。就像幼小而迷人的爱神丘比特（Cupid），或者婴儿时期的耶稣基督一样，意大利人把它们叫作“神圣的婴孩”。从此以后，佛教中开始出现偶像崇拜，并不断地发展，到最后每一座佛教寺庙里都出现了佛陀释迦牟尼的塑像。

伊朗和波斯也对印度艺术产生了影响。佛陀释迦牟尼的传奇故事和丰富的印度教神话故事，为印度艺术家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在安得拉邦的阿马拉瓦蒂（Amaravati）、孟买附近的象岛（Elephanta Caves）、阿旃陀石窟、埃罗拉（Ellore）石窟以及其他很多地方，你都能在石雕或者绘画中找到这些古老传说和神话的踪迹。这些地方非常值得参观，我希望每位在校学生至少去参观其中几个地方。

印度传说漂洋过海，传到了更远的地方。在爪哇岛的婆罗浮屠，一系列壮观的石雕壁画展现了佛陀释迦牟尼的所有故事。在吴哥窟的遗址中，许多美丽的雕像让我们想起了800年前的时代，那时候这座城市在东亚被视为“雄伟吴哥”。这些雕像的面容温和而充满了生命力，流露出一种神秘而难以捉摸的微笑，这种微笑被称为“吴哥的微笑”（Smile of Angkor）。尽管雕刻出来的人物种族不同，这种微笑依然出现在每座雕像上，而且永远不会显得单调乏味。

艺术是一个时代生活与文明最真实的写照。当印度文明充满生机的时候，它能创造出美丽的事物，艺术变得繁荣，艺术影响力也辐射到其他遥远的国度。但是，如你所知，当国家停滞不前、腐朽衰落甚至瓦解之后，艺术也随之跌落谷底。艺术失去了活力和生命力，细节过于累赘，有些细节甚至是奇形怪状的。穆斯林的到来，给印度带来了冲击和新的影响力，使退化的印度艺术形式摆脱了繁复的装饰。古老的印度式理想典型依旧存在，但是它们已经穿上了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新外衣，这使它们显得简单而优雅。在过去，成千上万的印度建筑大师从印度到了中亚。现在建筑师们和画师们从西亚来到印度。在波斯和中亚，一次艺术复兴已经开始；在君士坦丁堡，优秀的建筑师们正建造起雄伟宏大的建筑。这个时期也是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时期，众多大师在这个时期创作了精美绝伦的绘画作品和雕塑作品。

希南是当时著名的土耳其建筑师，巴布尔派人找来了希南最喜欢的学生优素福。在伊朗，毕扎德（Bihzad）是伟大的画家，阿克巴派人找来了毕扎德的几个学生，并让他们成了他的宫廷画家。波斯的文化影响在建筑和绘画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以前给你写的一封信里，我提到过一些这样的伟大建筑，它们展现了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印度-穆斯林艺术，你已经见过其中的几座建筑了。这种印度-波斯艺术最成功的典范就是泰姬陵。许多优秀的艺术家在其建造过程中都提供了帮助。据说最主要的一位建筑师名叫乌斯塔德·伊萨（Ustad Isa），他可能是土耳其人，也可能是波斯人，印度的建筑师协助他工作。一些欧洲艺术家，特别是一位意大利人，也参与了内部的装饰工作。虽然有很多不同地域的大师一起参与了建造，这座建筑并没有任何不和谐或者互相矛盾的元素。所有的文化影响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和谐。许多人参与了泰姬陵的建造，但是最主要的两种文化影响则来自波斯和印度，因此，格鲁塞先生将它称为“在印度的身躯中显现了伊朗的灵魂”。

124 ——伊朗悠久的传统得以传承

现在让我们看看波斯，人们说这个国家的灵魂来到了印度，并在泰姬陵找到了合适的身躯。波斯艺术有着非凡的传统，这个传统已经传承了2000年以上——从亚述人时期就开始了。无论政府、王朝和宗教如何更迭，无论国家被外来者还是自己的国王统治，就算伊斯兰教传到这里并且发生了不小的变革，这个传统仍然传承了下来。当然，它在时代的进程中也经过了变化和发展。据说，这种传统之所以能传承下来，是因为波斯艺术与整个波斯大地和波斯风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前一封信里，我提到过尼尼微的亚述帝国。这个帝国就包括波斯。大约公元前500年或前600年，伊朗人，也就是原来的雅利安人，占领了尼尼微，并且结束了亚述帝国时代。然后从印度河岸边开始直到埃及的地域范围里，波斯-雅利安人（Persian-Aryans）建造起了自己的帝国。他们主导了古代世界，他们的统治者在希腊人的描述中常常被称为“王中之王”。居鲁士、大流士、薛西斯就是几个“王中之王”的名字。你也许记得，大流士和薛西斯试图征服希腊，但是没有成功。这个王朝被称为“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王朝。这个王朝统治这个巨大的帝国长达220年，直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终结了这个王朝。

在亚述人和巴比伦人（Babylonians）之后，波斯人的到来可以算是一种安慰。作为文明开化的、更加包容的主宰者，他们使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得到繁荣发展。他们将这个庞大的帝国管理得井井有条，并且还建立了一套良好的道路网络，保障各方的信息都能相互交流。这些波斯人和来到印度的印度雅利安人之间关系紧密。他们的宗教——

琐罗亚斯德创立的琐罗亚斯德教——与早期的吠陀教有着密切联系。无论这两种宗教的具体起源在什么地方，它们共同的起源地似乎就在早期雅利安人的家乡。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们都是伟大的建造者。在都城波斯波利斯，他们建造了庞大的宫殿——他们不建造寺庙——巨大的宫殿大厅由无数的石柱支撑起来。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在一些遗址中看到这些庞大的建筑结构。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艺术似乎与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等）的印度艺术保持着联系，并且对后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亚历山大大帝击败了“王中之王”大流士，结束了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是短暂的希腊统治时期，君王是塞琉古（亚历山大大帝的军官）和他的继承者，再后来是一段时间比较长、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统治者中有一半是外来者。贵霜人也生活在这个时期，他们的王国位于印度边境，向南延伸到贝拿勒斯，向北延伸到中亚，他们也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如此一来，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到公元3世纪的500多年间，位于亚洲西部的整个印度地区，都受到了希腊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艺术方面。但是波斯的宗教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依然是琐罗亚斯德教。

公元3世纪，波斯出现了一次民族复兴，一个新的王朝开始执政。这就是萨珊王朝，它拥有很强的民族优越感，并且宣称自己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继承者。这种想法和其他激进民族主义一样狭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边的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帝国以及东边不断推进的突厥部落将它挤在中间。尽管如此，它还是存在了400年以上，直到伊斯兰教国家出现。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在萨珊王朝时代叱咤风云，他们的教派控制着整个国家，而且不能容忍任何反对者的存在。据说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们的经典《阿维斯陀经》（*Avestha*）被整理了出来。

这个时期，印度的笈多王朝繁荣兴旺，它也是贵霜王朝和佛教时期之后民族复兴的产物。艺术和文学在这时得到了复兴，一些最伟大的梵文作家，比如迦梨陀娑，就生活在这个时候。有许多迹象表明，波斯的萨珊王朝和印度的笈多王朝在艺术上是互相联系和交流的。萨珊王朝时期的绘画作品和雕塑作品只有很少一部分保留到了今天；所有这些作品都充满了生命力和动感，其中的动物形象与阿旃陀石窟里雕刻的动物非常相似。萨珊王朝时期的艺术影响力，似乎一直延伸到了中国的戈壁沙漠。

萨珊王朝统治了很长时间，到末期时变得十分脆弱，波斯的处境变得非常糟糕。与拜占庭帝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之后，双方都消耗殆尽。对新的信仰充满热情的阿拉伯军队，轻而易举地征服了波斯。到了7世纪中期，先知穆罕默德死后不到十年，阿拉伯哈里发就统治了波斯。阿拉伯军队征战到中亚和北非，并带去了新的宗教，也带去了一个年轻而不断壮大的文明。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埃及，都对阿拉伯文化非常着迷。阿拉伯语成了他们的语言，甚至在种族上，他们都被阿拉伯同化了。巴格达、大马士革以及开罗成为阿拉伯文化的重要中心，在新的文明推动下，许多宏伟的建筑拔地而起。甚至在今天，所有这些国家都是阿拉伯国家，尽管相互分隔，它们仍然梦想着要统一起来。

虽然波斯同样被阿拉伯人征服了，但是波斯与叙利亚或埃及不同，他们没有被阿拉伯人吸引和同化。伊朗人种，以前雅利安人的后裔，逐渐从阿拉伯闪米特人中分离出来，他们的语言也是一种雅利安人的语言。因此他们这个种族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们的语言也得以继续发展。

伊斯兰教迅速蔓延并且取代了琐罗亚斯德教，后者不得不在印度寻求庇护。但是即使在伊斯兰教里，波斯人依然延续着自己的路线。教派分裂成两个派别，也就是伊斯兰教的两个分支——什叶派和逊尼

派。波斯成了并且依然是一个什叶派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而伊斯兰教世界的其他国家大多数都是逊尼派。

尽管波斯没有被同化，阿拉伯文明仍然对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像在印度一样，伊斯兰教给艺术创作增添了新的生命力。阿拉伯艺术和文化同样受到波斯艺术风格的影响。波斯的奢华风格进入到沙漠里普通孩子们的家中，阿拉伯哈里发的宫殿也像其他皇家宫殿一样辉煌宏伟。帝国都市巴格达成为当时最壮观的城市。在它的北边，底格里斯河畔的萨迈拉（Samarra）城，哈里发们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宏伟的清真寺和宫殿，它们的遗址现在依然挺立。这座清真寺拥有巨大的礼拜堂以及带有喷泉的庭院，宫殿的外观是方形的，其中一边的长度超过了一公里。

9世纪，巴格达帝国开始衰落，帝国分裂成了许多国家。波斯取得了独立，从东边来的突厥部落建立了许多国家，他们最终攻占了波斯并且控制了有名无实的巴格达哈里发。加兹尼的马哈茂德在11世纪初期崛起，他袭击印度并威胁哈里发，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短暂的帝国，这个帝国后来被另一个突厥部落塞尔柱人终结。塞尔柱人与基督教的十字军交火多年，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他们的帝国持续了150年。然而，在临近12世纪末期的时候，另一个突厥部落将塞尔柱人赶出了波斯，并建立了花剌子模国或称希瓦国。但是这个国家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因为花剌子模国国王侮辱了成吉思汗的特使，愤怒的成吉思汗带领蒙古人灭掉了这个国家和人民。

在一个简短的段落里，我讲到了很多变化，提到了许多帝国，你一定感到很混乱吧。我提到这些王朝和种族的起起落落，并不是想给你的头脑增添负担，而是想要强调，尽管兴衰起落反复无常，波斯的艺术传统和生活仍然得以传承下来。突厥部落一个接一个地从东边过来，他们都被这种混合的、盛行在布哈拉到伊拉克之间的波斯-阿拉伯文明同化了。一些突厥人成功到达了远离波斯的小亚细亚地区，他们

保持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拒绝向阿拉伯文化屈服。他们几乎将小亚细亚变成了他们的原有领地突厥斯坦。但是在波斯和相邻的国家，悠久的伊朗文化力量非常强大，使得当地的人们接受并且适应了伊朗文化。在不同的突厥王朝统治时期，波斯艺术和文学都很盛行。我想我给你讲过波斯的诗人菲尔多西吧，他生活在加兹尼的马哈茂德苏丹统治时期。在马哈茂德的要求下，他写下了著名的波斯国史诗《列王纪》，书中描写的情景都发生在伊斯兰教入侵之前，其中描写了伟大的英雄鲁斯塔姆（Rustam）。这本书告诉我们，波斯艺术和文学与悠久的民族和传统之间有着紧密联系。波斯绘画和细密画的大多数主题都来自《列王纪》里描写的故事。

菲尔多西生于公元932年，逝世于公元1021年，这个时期正是世纪之交和千禧年之交。在他之后不久，出现了一个在英语和波斯语中都闻名遐迩的名字——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波斯尼沙布尔（Nishapur）的诗人和天文学家。在莪默之后是出生于设拉子（Shiraz）的谢赫·萨迪（Sheikh Sadi），他是波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写的《真境花园》（*Ghilistdn*）和《果园》（*Bustan*）是一代又一代印度在校男生必须熟记于心的作品。

我提到的仅仅是许多伟大名字中的几个，我把一长串名字都告诉你是没什么意义的。但是我希望你知道，许多世纪以来，波斯艺术和文化的明灯一直在中亚的波斯到河中地区（Transoxiana）闪耀。作为艺术和文学活动的中心，布哈拉以及河中地区的巴尔赫（Balkh）这样的大城市能与波斯的城市媲美。在10世纪末期，最著名的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西拿或者叫阿维森纳，就出生在布哈拉。200年之后，在巴尔赫诞生了另一位伟大的波斯诗人，他就是贾拉鲁丁·鲁米（Jalaluddin Rumi）。他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并且创立了跳旋转舞的苦行僧教派——苏菲派。

因此，即使有战争、冲突以及政治变革，波斯-阿拉伯艺术和文化传统一直充满着生命力，在文学、绘画以及建筑领域创造出许多杰出的作品。之后，灾难降临。13世纪（大约公元1220年），成吉思汗大举进攻并击败了花剌子模国和伊朗，几年之后，旭烈兀毁灭了巴格达，积累了数个世纪的、高度发展的文化毁于一旦。我在以前的几封信中告诉过你，蒙古人几乎把中亚变成了一个蛮荒之地，中亚的重要城市遭到遗弃，几乎变成了无人之境。

中亚始终没有从这场灾难中完全恢复过来，它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经足够让人惊奇了。你也许记得，在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巨大帝国四分五裂了。其中，在波斯的一部分以及附近的地域被旭烈兀统治，他在毁灭了其他国家之后安顿了下来，成为一个和平而包容的统治者，并且建立了伊儿汗王朝。在一段时间之内，伊儿汗王朝的人们继续信奉蒙古人崇拜长生天的古老宗教；后来他们改变信仰，皈依了伊斯兰教。无论在这个改变之前还是之后，他们对于其他的宗教都是完全包容的。他们在中国的兄弟，大汗和他的家族都是佛教教徒，双方之间的关系最为亲密。他们甚至派人去中国迎娶新娘回来。

波斯和中国的两个蒙古人分支之间的联系，对艺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中国文化的影响慢慢渗入波斯，一种阿拉伯、波斯和中国文化的奇妙混合产物出现在了绘画作品中。尽管经历了很多灾难，但是，波斯文化再一次取得了胜利。在14世纪中期，波斯出现了另一位伟大的诗人，哈菲兹（Ha z），他的作品很流行，甚至在印度也很受欢迎。

蒙古伊儿汗国持续的时间不长，最后的残存势力被另一位著名的勇士、来自河中地区撒马尔罕的帖木儿消灭了。我曾经在信中讲过这个令人恐惧、十分残酷的暴君，他是一个支持艺术的人，也被认为是一个博学的人。他对艺术的爱似乎主要表现在掠夺德里、设拉子、巴格达以及大马士革这样的大型城市，然后把掠夺来的物品带回他的都

城撒马尔罕作为装饰品。但是撒马尔罕最精美、最宏伟的建筑物是帖木儿的陵墓——古尔·阿米尔（Gur Amir）陵墓。这座陵墓对他来说十分合适，因为它庄严的外观能够体现出他威严的风采与力量，以及强烈的意志。

帖木儿征服的广阔领土在他死后逐渐缩小，但他的继承者们还是留住了一个相对较小的领土范围，这个范围包括河中地区和波斯。这些被称为“帖木儿人”的人们，在15世纪整整100年的时间里，统治着伊朗、布哈拉以及赫拉特，奇怪的是，残酷暴君的这些后人却以他们的慷慨、博爱以及对艺术的促进而闻名于世。帖木儿的儿子，沙阿鲁克（Shah Rukh）就是这些后人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在都城赫拉特建立了一座壮观的图书馆，吸引了众多爱好文学的人。

延续了100年的帖木儿人时期，在艺术和文学运动上的成就十分引人注目，这个时期也因此被称作“帖木儿人文艺复兴”（Timurid Renaissance）。波斯文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许多精美的绘画作品被创作出来。伟大的画家毕扎德成了一个绘画流派的创始人。很有意思的是，和波斯文学比肩的突厥文学也在帖木儿文艺繁盛时期得到了发展。再提醒你一次，意大利文艺复兴也是在这个时期。

帖木儿人是突厥人，但他们在文化上主要受波斯文化的影响。伊朗受到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控制，但他们将自己的文化强加在了征服者的身上。同时，波斯试图在政治上获得自由，渐渐地，帖木儿人被驱逐到东边的地域，他们在河中地区附近的领土范围越来越小。16世纪初，伊朗民族主义取得胜利，帖木儿人最终被驱逐出了波斯。一个民族主义王朝萨法维（Safavi或Safavids）王朝，开始掌管波斯的王权。正是这个王朝的第二代国王塔赫玛斯普一世（Tahmasp I），庇护了被舍尔汗赶出印度的胡马雍。

从1502年到1722年，萨法维王朝持续了220年，这个时期被称为波斯艺术的“黄金时代”。帝国的都城伊斯法罕（Isfahan）雄伟的建筑

林立，成了一个著名的艺术中心，尤其以绘画闻名。从1587年到1629年统治帝国的阿巴斯大帝（Shah Abbas），是这个王朝杰出的君主，他被认为是波斯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他被外部的乌兹别克人（Uzbegs）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左右夹击。击退了这两方敌人之后，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与西方和其他地区的遥远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并致力于美化他的都城。阿巴斯大帝为伊斯法罕所做的城市规划被称为“一个体现纯粹与品位的经典杰作”。建造出来的建筑物不仅外观瑰丽、装饰精美，而且周边迷人的环境更增强了美观的效果。当时游览波斯的欧洲旅行者们，无不对它充满了赞美之词。

建筑、文学、绘画、壁画、细密画、美丽的地毯、精美的彩釉陶器以及马赛克，在这个波斯艺术的“黄金时代”都十分兴盛。有一些壁画作品和微型画像的精美程度，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艺术不分国界，也不应该有国界之分，许多不同的文化影响力都让16世纪和17世纪的波斯艺术变得更加丰富。据说意大利的文化影响也非常显著。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依然是传承了2000年之久的伊朗艺术传统，而且伊朗文化的影响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波斯。它在一个广阔的地域范围里传播，从西边的土耳其一直到东边的印度。波斯语是印度莫卧儿帝国王宫的文化语言，也是西亚广泛使用的文化语言，就像法语以前在欧洲的地位一样。古老的波斯艺术精髓给阿格拉城的泰姬陵留下了永恒的印迹。波斯艺术也以相同的方式，影响了奥斯曼帝国的建筑；在西边的君士坦丁堡，许多有名的建筑物拔地而起，它们都带有波斯文化影响的印记。

波斯的萨法维帝国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差不多出现在同一个时期。印度莫卧儿帝国的第一位君主巴布尔，是撒马尔罕的帖木儿后裔中的一位王子。当波斯人的力量强大之后，他们将帖木儿人赶了出去，只有河中地区和阿富汗的部分领土仍然在几位帖木儿王子的统治之下。作为仅有的几位王子之一，巴布尔不得不从12岁时就开始参战。他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成为喀布尔的统治者，之后他来到了印

度。我们可以从巴布尔以及他的传记中判断出当时帖木儿人文化的发展程度，我在以前的一封信中曾经引用过他的传记内容。萨法维帝国最伟大的统治者阿巴斯大帝，与阿克巴、贾汗季生活在同一时期。两国之间的联系极为密切。长久以来，阿富汗一直是印度莫卧儿帝国的一部分，因此这两个国家共有一条边界线。

125 ——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在波斯

你完全有理由对我发牢骚。我带着你在历史长河中不停地前后穿梭，一定让你牢骚满腹了。我从不同的方面给你讲述历史，讲到19世纪的时候，又突然把你带回到几千年前，讲了一些关于埃及、印度、中国和波斯的内容。这种跳跃式的讲述方式的确让人纳闷和混乱，要是你对我提出抗议，我也无可奈何。勒内·格鲁塞先生的书突然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我急于把这些事情与你分享。我也感觉，在写给你的这些信中，我忽视了波斯的内容，所以想要做一些弥补。既然我们已经谈到了波斯，那就让我们继续讲讲现代波斯的故事吧。

我给你讲过，波斯文化有着悠久的传统和伟大的成就，波斯艺术进入了黄金时代，等等。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措辞的时候，会发现它们很花哨，甚至有些歧义。这些措辞会让人以为，波斯人真的迎来了黄金时代，他们所有的悲惨遭遇都不存在了，就像在童话故事里一样幸福地生活着。当然，这都不是真的。那时候，波斯的文化和艺术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即使现在也依然如此；文化和艺术与平民大众没有一点关系。其实从一开始，这些平民就是为了获得食物和生活必需品而活着的，这种生活和动物没什么太大区别。他们无暇顾及其他事情，他们面临的灾祸已经很多了，怎么还有时间欣赏艺术和文化呢？作为王室与富人阶级的一种消遣，艺术在波斯、印度、中国、意大利以及欧洲其他国家都欣欣向荣。而对于平民大众来说，他们只能接触到一些宗教艺术。

虽然王室热爱艺术，但这并不代表他们能很好地管理国家；那些以支持艺术和文学为傲的统治者，通常都是既无能又残忍。和当时很多国家一样，整个波斯社会几乎是封建社会。有一些强势的国王受人

爱戴，是因为他们不允许封建领主剥削和压榨平民。有些时期，国家治理得相对较好，而其他时期，国家治理得十分糟糕。

正当印度莫卧儿帝国进入统治末期的时候，萨法维王朝在1725年左右退出了历史舞台。和其他王朝一样，萨法维王朝自我毁灭了，封建制度逐渐瓦解，经济发展不断变化，打破了旧的秩序。繁重的税收让国家形势更加糟糕，普通大众苦不堪言。萨法维王朝统治下的阿富汗人起义反抗，他们不仅取得了胜利，而且还占领了伊斯法罕，废黜了国王。不久之后，一位波斯首领纳迪尔沙阿，驱逐了阿富汗人，自己登上了王位。衰落的莫卧儿帝国进入末期的时候，纳迪尔沙阿攻入印度，残杀了德里的百姓，掠夺了大量财宝，其中包括沙阿贾汗的孔雀宝座。18世纪的波斯历史，就是一部反映内战、统治和暴政的悲惨记录。

到了19世纪，新的烦恼随之而来。欧洲帝国主义不断扩张，极具侵略性，与波斯产生了冲突。俄国在北边步步紧逼，英国则从波斯湾慢慢推进。波斯离印度不远，他们的边界线在逐渐靠近，如今，它们之间的确共享的是一条边界线。波斯是通往印度的必经之路，在波斯，可以远眺印度的海上航线。英国国家策略的基本目的就是保护英属印度帝国（British Indian Empire），以及通往印度帝国的航线。他们不希望看到他们最大的对手俄国跨越这条线，然后对印度虎视眈眈。因此，英国和俄国都对波斯饶有兴趣，经常侵扰这个弱国。波斯的国王们既无能又愚蠢，常常被英俄两国玩弄于股掌之中，不是在错误的时间发动攻击，就是将矛头指向自己的国民。如果不是因为英俄两国之间严重对立，波斯很有可能被其中一方完全占领和吞并，或者和埃及一样，成为受保护国。

在20世纪初期，波斯又因为别的原因沦为了其他国家贪婪的目标。波斯地区发现了价值不菲的石油。1901年，英国人达西（D’Arcy）说服波斯国王，得到了一项十分有利的特许权，可以在之

后60年里开发波斯地区的油田。几年之后，一家英国公司——英国波斯石油公司（Anglo-Persian Oil Company），开始了波斯油田的开采工作。从那时候起，这家公司一直在波斯开采石油，并且从石油买卖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些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归波斯政府所有，大部分利润都被公司的股东收入囊中，其中，最大的股东就是英国政府。如今波斯政府的民族主义意识强烈，极其反对外国势力的剥削和利用。他们取消了1901年与达西签订的那份合同，不再允许英国石油公司继续开采波斯地区的石油。英国政府对此恼羞成怒，试图威胁和欺负波斯政府，但是他们忘了，时代已经不同了，现在要欺负亚洲人民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注

但是，我更希望看到后来的历史走向。由于帝国主义的威胁，波斯国王逐渐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傀儡，这自然导致了波斯民族主义的发展。波斯建立了一个民族主义政党。这个政党厌恶外国干涉，同样也强烈反对波斯独裁政府。他们要求制定民主宪法，进行现代化改革。波斯自身管理不当，税负过重，英国和俄国又不断干涉波斯内政。保守的波斯国王宁愿和外国政府打交道，也不愿意面对渴望自由的本国人民。最支持立宪的是新的中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1904年，日本战胜沙俄的消息，极大地影响和鼓舞了波斯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亚洲力量战胜了欧洲力量，也因为沙俄同样经常侵犯邻国波斯。1905年的俄国革命，尽管遭到无情地镇压而最终失败了，还是给波斯民族主义者的行动增添了激情和动力。波斯国王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尽管不太情愿，但他还是在1906年同意实行民主宪法。波斯成立了国会，取名为“波斯议会”（Mejlis），波斯革命似乎取得了成功。

然而，麻烦还没有结束。波斯国王并不准备放弃王权，俄国和英国也不希望看到一个民主的波斯强大起来，继而摆脱它们的控制。波斯国王与波斯议会之间发生了冲突，国王于是亲自解散了议会。但是人民和军队是站在波斯议会以及民族主义者一边的，波斯国王只能依靠俄国的军队。俄国和英国总是以各种借口派遣军队驻扎在波斯，他

们的借口通常是保护本国国民在波斯的利益。俄国派驻在波斯的军队是令人胆怯的哥萨克军队，英国则利用印度军队侵扰波斯，尽管印度与波斯之间没有任何过节。

波斯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之中。国家财政亏空，人民的生活境况极为糟糕。波斯议会试图改善这一状况，但是俄国和英国对波斯的打击，总是让波斯议会的努力化为泡影。最后，波斯议会向美国寻求帮助，他们邀请到一位美国财政顾问来帮助他们重振经济。这位美国人摩根·舒斯特（Morgan Shuster），虽然付出了许多努力，但总是在俄国和英国的打击下处处碰壁。他变得灰心沮丧，最后离开波斯回到了美国。后来舒斯特写了一本书，书中描写了帝国主义国家俄国和英国是如何将人们赶出波斯的。这本书的名字很有象征意义，书如其名——《波斯的挣扎》（*The Struggling of Persi*）。

波斯似乎命中注定不会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当俄国和英国把波斯划分成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时，波斯独立的失败就已经注定。俄英两国的军队占领了波斯的要害所在，一家英国公司在开采波斯的石油资源。波斯的处境非常悲惨。如果波斯被某个外国强权完全吞并，也许更好，因为吞并波斯的国家会担负起一定的责任。之后在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了。

在世界大战中，波斯宣布采取中立态度，但是强国并不把弱国的立场放在眼里。所有的相关势力都忽视了波斯的中立态度，外国军队纷纷在波斯交战，丝毫不顾及波斯政府的想法。波斯周边的国家都卷入了战争。英俄两国是同盟国，当时领土涵盖了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的土耳其，与德国是同盟关系。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英国、法国以及他们的同盟国取得了胜利，于是，波斯被英国完全占领。英国准备宣布将波斯作为其保护国，这实质上是一种温和的吞并；他们还梦想建立一个巨大的英国中东帝国（British Middle Eastern Empire），将地中海至俾路支和印度的广大区域都纳入其中。但是他

们的梦想没有实现。对英国来说，很不幸的是沙俄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苏维埃俄国（Soviet Russia）。同样不幸的是，英国的计划在土耳其也化为了泡影，凯末尔帕夏从协约国（Allies）手中拯救了土耳其。

所发生的这一切帮助了波斯的民族主义者，波斯在名义上得以保持自由之身。1921年，一位波斯军人礼萨汗（Riza Khan）通过一场武装政变夺取了政权。他掌握了军权，后来成了内阁总理。1925年，原来的国王被罢免，制宪议会（Constituent Assembly）选举礼萨汗为新国王。礼萨汗的正式头衔加名字是礼萨·沙阿·巴列维（Riza Shah Pahlavi）。

礼萨沙阿通过和平的、表面上民主的方式取得了王权。波斯议会依然在发挥作用，新的国王不会成为独裁君主。然而很明显的是，礼萨沙阿是掌管波斯政府实权的强势人物。在过去的几年里，波斯变化巨大，礼萨沙阿决心对国家进行改革，使国家向着现代化发展。波斯经历了一次强烈的国家复兴运动，给国家带来了新的活力，波斯也初步形成了反抗外国干涉势力的民族主义力量。

我们可以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波斯的这次国家复兴恰好反映了具有2000年历史的伊朗传统。在伊斯兰征服波斯之前，伊朗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如今他们仍希望恢复当年的风采。礼萨沙阿将他的王朝命名为“巴列维”，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波斯以前的岁月。当然，波斯人是什叶派穆斯林，但是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时候，波斯的民族主义就会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整个亚洲此时都兴起了民族主义，而欧洲的民族主义热潮则发生在100年之前的19世纪；但是现在，欧洲的人们认为，民族主义已经过时了，他们要寻找的是更适合现在情况的新信仰和新信念。

现在，波斯的官方名称是“伊朗”。礼萨沙阿下令，不再使用“波斯”这个名字。

1. 最终，英国政府和英国石油公司不得不同意签署一份对伊朗政府有利的新合同。

126 ——1848年欧洲革命

现在，我们必须回到欧洲，再看看19世纪欧洲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形势。在两个月前写给你的几封信中，我讲过有关这个世纪的情况，还指出了这个世纪最主要的特点。我并不强求你记住我提到的所有“主义”，就说其中几个吧：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国际主义。我还给你讲过，民主和科学、交通运输方式的巨大革命、大众教育和教育产品以及现代报纸。所有这些事物以及众多其他的事物，组成了当时的欧洲文明——资产阶级文明，它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由新的中产阶级控制工业机器的一种文明。欧洲资产阶级文明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它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又一个高度；到了19世纪末，在一场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之前，资产阶级文明的威力已经令自己和全世界都刮目相看了。

在亚洲，我们也能从一些细节中看出这种文明在起作用。在日益发展的工业主义推动下，欧洲将触角伸向了遥远的国度，试图霸占和控制它们，通过干预这些国家的事务而从中获益。这里提到的欧洲主要指的是在工业主义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的西欧；而在西欧国家中，英国是当之无愧的领袖，它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并且从工业主义发展中获得了巨大利润。

19世纪初，所有这些发生在英国和西方的巨大变化，并没有引起国王和君主们的注意。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不断发展的新势力有多重要。在拿破仑被驱逐之后，这些欧洲统治者唯一的想法就是永远保住自己的皇位，继续他们的独裁政体。他们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还心有余悸，不希望重蹈覆辙。我在以前写给你的信里说过，为了维护“君权神授”，这些国王结成了“神圣同盟”以及其他类似的同

盟，这样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继续镇压百姓。为了这个目的，独裁统治和宗教像以前一样再次联合起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是这些同盟的发起者。俄国没有出现工业主义，也没有产生新的风潮，国家依然落后，就像处在中世纪一样。俄国的大城市屈指可数，商业发展也很迟缓，就连手工艺品都很低级、粗糙。俄国的独裁政体不受任何约束。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与俄国不同。越往西中产阶级就越多。我告诉过你，英国是没有独裁政体的。英国国王受到英国议会的控制，但是英国议会本身又受富人阶级的控制。俄国的独裁者，和由富人控制的英国寡头政治集团是大不相同的。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害怕平民百姓，担心革命。

因此，在整个欧洲，保守势力取得了胜利，他们无情地压制了所有追求自由的行动。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所做的决定，许多民族，例如意大利和东欧的一些民族，处于异国的统治之下，这些民族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武力镇压。但是这种做法不可能永远成功，一定会产生动乱。这就像是想要压住一个已经烧开了水的水壶盖子。欧洲已经充满了蒸汽，这些蒸汽不停地想要冲开盖子。我在以前的信里讲过1830年发生的起义，那时候欧洲发生了不少变化，特别是在法国，波旁王朝最终覆灭了。这些起义使国王、君主和大臣们惊恐无比，他们花了很大的精力去镇压这些起义者。

在我写给你的这些信中，我们经常看到战争和革命给国家带来的变化。以前的战争有些是宗教战争，有些是王朝战争；它们常常是一个民族入侵另一个民族的政治战争。这些战争的背后常常也有一些经济上的原因。中亚部落入侵欧洲和亚洲，主要是因为饥饿迫使这些部落向西寻求生路。经济上的进步会让一个民族或国家变强，使他们比其他人拥有更强大的优势。我说过，即使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发生的所谓宗教战争中，经济因素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现代，我们发现宗教战争和王朝战争停止了。当然，战争并未终止。不幸的是，战争反而变得更加残酷了。现代战争的主要原因显然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

因。政治原因主要和民族主义有关：一个民族镇压了另一个民族，或者是两个好斗的民族之间产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主要也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比如现代工业国家对原材料和市场有所需求。所以我们发现，经济原因在战争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而在今天的战争中，经济原因也比其他因素更为突出。

革命也经历了同样的改变。早期的革命通常是宫廷革命：要么是王室成员夺权篡位，互相残杀；要么是暴民骚乱，推翻暴君；要么是武装叛乱中一位野心勃勃的军人夺取了王权。这种宫廷革命虽然时有发生，但平民百姓并未受到什么影响，他们也不关心这些革命。统治者换了，但是国家体制依然不变，人们的生活丝毫没有变化。当然，糟糕的统治者暴戾乖张，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好一点的统治者可能不那么令人厌恶。但是无论统治者是好是坏，人们的社会处境和经济状况不会仅仅因为政治上的改变而有所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革命是不会出现的。

比起宫廷革命，民族革命会带来更大的变化。当一个国家受另一个国家统治的时候，另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就取得了主导地位。这种统治带来的伤害是多方面的，因为另一个国家或它的统治阶级的目的，是通过统治这个国家为自己带来利益。这对于被统治国的人们来说，是极其伤害民族自尊心的。除此之外，另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剥夺了被统治国的上层阶级原本应该掌握的权力。一次成功的民族革命至少可以让被统治国摆脱异国统治的影响，这个国家自身的主导阶级会很快地取而代之。摆脱了异国的统治阶级之后，本国的主导阶级就会获得极大的利益；当这个国家不再受到异国统治之后，整个国家就会受益。底层的人们可能无法获得很多利益，除非在民族革命之后，再发生社会革命。

社会革命和其他革命截然不同，其他革命改变的仅仅是表面上的事情。社会革命也包含了政治革命，但是比政治革命的意义更为深

远，因为它改变了社会结构。英国革命的发生使议会取得了最高地位，它不仅仅是一次政治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一次社会革命，因为它意味着，拥有大量财富的资产阶级和权力阶级联合起来了。于是，这个处于上层地位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地位都得到了提升，地位较低的资产阶级和普通大众并没有受到影响。法国大革命具有更浓的社会革命性质。像我们看到的一样，法国大革命彻底颠覆了当时的社会制度，甚至普通大众也在革命中发挥了一段时间的作用。最终，法国的资产阶级也如愿以偿地取得了胜利，而在革命中发挥过作用的普通大众，则无奈地又回到了之前的位置；至少，拥有特权的贵族已不复存在了。

显然，这种社会革命远比单纯的政治变化影响更为深远，而且社会革命与社会状况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或一群野心勃勃的人，只有在平民大众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才能发动社会革命。我所说的充分准备，并不是说他们受到鼓动后自觉地做好了准备。我的意思是，社会情况和经济状况如此恶劣，生活成了他们的沉重负担，除非社会发生变化，否则他们的困境将无法减轻或者改变。事实上，长久以来对于众多百姓来说，生活就是沉重的负担，他们能够承受住这样的负担已经是奇迹了。有时候他们会发动起义，主要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暴动，在狂怒之下，他们盲目地毁坏了一切能毁坏的东西。但是这些人对彻底改变社会制度没有清晰的意识。然而，尽管他们有些无知，但是他们在古罗马、欧洲中世纪、印度以及中国发动的起义，颠覆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许多帝国都在这些起义之后覆灭了。

过去，社会和经济变化缓慢，生产、分配和交通运输能够长时间地保持不变。因此，人们无法感觉到社会变化的过程，他们认为旧的社会制度是永恒不变的。宗教也给社会制度以及随之而来的风俗和信仰，赋予了神圣的光环。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尽管社会状况已经无法适应人们的生活，他们也从没想过要改变社会制度。随着工业革命的

到来，交通运输方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社会也随之加快了变化速度。新兴阶级冲锋在前，变得富有起来。一个与工匠或农民截然不同的新兴工人阶级崛起了。这些变化产生后，社会需要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进行调整和适应，而西欧则处于一种社会制度与政治经济状况不相适应的状态。如果社会足够聪明，就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必要的改变，并因此受益。但是社会却不够聪明，各个阶级的想法分散，全社会没有一个整体的观念。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趣味相投的各个阶级也都为自身利益着想。如果某一个阶级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这个阶级就希望继续保持它的地位，并通过剥削其他地位低的阶级来获得利益。如果有足够的智慧和远见，从长远考虑，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就是使整个社会都获利，这样作为社会中的一部分，自身也必然会受益。但是有权的人和阶级都不想放弃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要保持原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其他阶级和其他人相信，现有的社会制度是最合适的。权力阶级通过宗教和教育强化了人们的这种认识；令人惊奇的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想强化，几乎每一个人都对此深信不疑，不再寻求改变。甚至那些因为社会制度不公而遭受痛苦的人也相信，这种制度必须保持下去，他们应该继续受压迫、被桎梏，当别人生活富裕的时候，他们应该继续挨饿。

所以，人们误以为的确存在一种无法改变的社会制度，如果社会中大多数人因这种社会制度身处困境，那就不是任何人的错，而是他们自己的错，是上天的安排，是无法逃避的宿命，这是对过往罪孽的惩罚。社会总是保守的，它不喜欢变化。社会喜欢墨守成规，并且坚定地相信它必须墨守成规。因此社会总是惩罚那些想要改善社会、让社会做出改变的人。

但是社会中安于现状、不思改变的情况，并不会阻止社会状况和经济状况的变化。尽管人们的想法不变，社会和经济依然会向前发展。传统守旧的思想观念和不断发展的现实之间产生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不采取办法缩小差距，将两者统一起来，社会制度就面临崩

溃的危险，灾难就会降临。这样一来，就引发了真正的社会革命。如果存在这样的社会情况，革命必然会发生，但也许会因为传统观念的拖累而发生得比较晚。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情况，那么无论怎么努力，革命都不可能发生。当革命发生的时候，掩盖社会真实情况的面纱被掀开，人们很快就了解到了真相。一旦他们摆脱了旧思想的桎梏，他们就会不断地向前冲。因此在革命时期，人们拥有勇往直前的巨大力量。所以说，革命是保守主义和因循守旧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社会能够摒弃社会制度不变的错误认识，能够随变化的社会情况而变，那么社会革命就不会发生。相应地，社会就会不断地进步。

以前，我没有想过要谈这么多有关革命的事情，这次我写了很多。这个话题吸引我的原因在于，如今世界上很多地方似乎都存在社会制度与社会状况不相适应的现象，很多地方的社会制度都走向了衰落。这种现象的存在，一般都预示着社会革命即将发生，人们自然会相信，他们已经处于世界变革的前夜。印度和其他受异族统治的国家一样，民族主义以及摆脱异国统治的愿望十分强烈。但是很大程度上，这种民族主义主张只局限于条件较好的阶级。对于生活缺乏保障的农民、工人以及其他人来说，比起模糊不清的民族主义理想，他们对填饱肚子的现实需求，自然更感兴趣。对他们来说，民族主义或者印度独立没有任何意义，除非它能带来更多的食物和更好的生活条件。因此，如今印度的问题不仅仅是政治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19世纪，欧洲发生了很多起义和骚乱，这使我偏离了主题，长篇大论地谈起了革命。这些起义，特别是19世纪上半叶的起义，许多都是反对异族统治的民族主义起义。和它相似的是，在工业化国家，社会革命的想法使得新工人阶级与它的资本家主人之间开始产生冲突。人们开始考虑并且有意识地为社会革命而战。

1848年被称为“欧洲的革命之年”。许多国家爆发了起义，有些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但是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发生在波兰、意大

利、波希米亚以及匈牙利的起义，都是由受到压抑的民族主义发起的。波兰起义反抗普鲁士，波希米亚和意大利北部反抗奥地利。这些起义都遭到了镇压。其中最大的起义是匈牙利反抗奥地利的起义。这场起义的领袖是匈牙利历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争取自由的战士拉约什·科苏特（Lojos Kossuth）。这场起义坚持了两年，最终还是失败了。几年之后，另一位领袖戴阿克（Deak）带领匈牙利以一种不同的战斗方式取得了胜利。值得注意的是，戴阿克的方式是被动抵抗。1867年，匈牙利和奥地利在一个比较平等的基础上结合，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二元君主国”，受哈布斯堡家族的弗朗茨·约瑟夫国王统治。半个世纪之后，爱尔兰在反抗英国的时候，借鉴了这种被动的抵抗方式。1920年，印度发生“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时候，有些人想起了戴阿克的做法。但是印度的运动和戴阿克的抵抗方式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

1848年，德国也发生了起义，但是这些起义规模都不大；国家镇压了这些起义，并承诺进行改革。法国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从1830年波旁王朝覆灭后，半立宪君主路易·菲利普当上了国王。到了1848年，人们对这位国王感到不满，于是他被迫退位。法国再一次成立了共和国。这就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第一共和国成立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这个时候，拿破仑的一个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来到巴黎，摆出一副热爱自由的姿态，通过选举成了共和国总统。但这只是他为了得到权力的一种伪装。在完全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后，他控制了军队，并在1851年发起了一次武装政变。他的军队使整个巴黎都陷入了恐怖之中，军队射杀了很多人，并且以恐怖手段威胁议会。一年后，他自封为国王，自称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因为他认为拿破仑的亲儿子尽管没有当过国王，但他应该是拿破仑二世（Napoleon II）。就这样，毫无作为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只存在了短短的四年就被终结了。

1848年，英国没有发生起义，但发生了许多骚乱。在面对骚乱威胁的时候，英国采取了一种灵活的化解方式。英国的宪法非常灵活，因此可以化解威胁，而且经过长期实践的英国人，能够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接受折中解决的方式。和那些宪法比较死板、人民不愿意妥协的国家不同，通过这种方式，英国成功地避免了巨大而突然的变革。1832年，英国发生了一次针对一项《改革法案》的大型骚乱，这项法案使更多人具有选举议会成员的投票权。以现代的标准来看，这项法案是十分温和而无害的。依照这项法案，除了中产阶级之外，只有少数其他阶级的人拥有选举权；工人和大多数其他人仍然没有投票权。那时候的议会掌握在一小群富人手中，他们害怕失去特权以及他们的“腐败选区”，一旦失去，他们只能进入下议院。所以，这些人极力反对《改革法案》，他们宣称，该法案一旦通过，英国就会走向灭亡，世界将会终结。就在一场内战一触即发之时，反对这项法案的议员们出于对骚乱的恐惧，最终同意了这项法案。无须赘述，英国再一次渡过了难关，议会和以前一样继续受富人操纵。条件优越的中产阶级获得了更大的权力。

1848年，另一场运动震动了英国。这场运动叫作“宪章运动”（Chartist Agitation），工人阶级通过发表《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向议会请愿，要求进行改革。尽管这场运动最终被镇压下去了，它还是令统治阶级惊恐不已。痛苦和不满情绪弥漫在工人阶级中间。这时候一些劳动法律开始颁布，这些法律稍稍改善了工人的状况。英国通过快速增长的贸易迅速累积财富，变成了“世界工厂”。工厂的老板获得了大部分的利益，不过工人们还是陆续获得了一小部分利益。因此在1848年，并没有发生起义。不过在当时，起义几乎一触即发。

关于1848年的事情我还没有讲完，我还要告诉你1848年发生在罗马的故事。我只能在下一封信中讲给你听了。

127 ——意大利成了一个统一而自由的国家

讲到1848年的革命故事时，我把意大利的故事留到最后来讲。1848年发生的所有令人血脉贲张的事件中，发生在罗马的英勇抗争是最激动人心的。在拿破仑控制意大利之前，意大利是分裂的，由一些小城邦拼凑而成，这些城邦都有自己的君主。拿破仑将意大利统一了一段时间。拿破仑退位之后，意大利又回到了之前的分裂状态，而且比以前的状况更糟糕了。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胜利的同盟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对意大利进行了重新划分。奥地利得到了威尼斯以及威尼斯周边的许多领土；一些奥地利的王公可以挑选他们想要的领土范围；教皇回到了罗马以及毗邻罗马的教皇国（Papal States）；那不勒斯以及南部地区成了由一位波旁国王统治的两西西里王国（Kingdom of the Two Sicilies）；在西北地区，靠近法国边境的地方是皮埃蒙特-萨丁尼亚国王（King of Piedmont and Sardinia）的领地。除了皮埃蒙特之外，所有这些小城邦的君主都实行独裁统治，他们对国民的压迫甚至比拿破仑到来之前还要严重。但是拿破仑的到来使意大利产生了震动，意大利实现自由统一的梦想深深鼓舞了意大利的年轻人。尽管统治者极力压迫国民，但在压迫下人们发起了不少小规模的起义，成立了一些秘密社团组织。

很快出现了一位被称为自由运动领袖的、充满激情的年轻人，他就是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意大利民族主义的先驱。1831年，他发起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青年意大利”（Young Italy），目的是建立意大利共和国。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他奋斗了多年，曾经流亡到国外，多次险些丧命。他所写的许多作品都成

了民族主义文学作品中的经典之作。1848年，意大利北部地区爆发了许多起义，马志尼认准这个机会，来到了罗马。人们赶走了教皇，宣布成立了一个由三人执政的共和国，人们称之为“三头政治”（Triumvirs），这个词来源于古罗马历史。马志尼是三位执政官之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受到三股势力的围攻：奥地利人、那不勒斯人，甚至还有想要恢复教皇地位的法国人。为罗马共和国而战的军人领袖是加里波第（Garibaldi），他抵挡住了奥地利人的攻击，击败了那不勒斯军队，甚至阻止了法国人的进攻。这些战绩有赖于志愿兵的英勇战斗，罗马最勇敢、最优秀的年轻人，为了保卫罗马共和国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经过了一场英勇的抗争，罗马共和国最终还是落入了法国人手中，法国人重新恢复了教皇的地位。

抗争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马志尼和加里波第以不同的方式继续着他们的事业，马志尼向广大民众宣传民族主义思想，加里波第则为下一次的战斗做准备。他们两人差别很大，一位是思想家和理想主义者，另一位是善于打游击战的军人。两人都全身心投入到意大利的自由和统一事业中。加富尔（Cavour）是这场抗争中涌现出的第三位著名人物，他是皮埃蒙特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的首相。加富尔最大的兴趣是让维克托·伊曼纽尔成为意大利的国王。这就需要压制甚至消灭一些城邦的君主，而马志尼和加里波第的行动正好可以助他一臂之力。他与当时拿破仑三世统治之下的法国密谋，让法国参与了他与敌国奥地利的战斗。这件事发生在1859年。法国击败了奥地利，让加里波第有机会带领部队远征到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对抗当地的国王。这就是加里波第以及他的“千人红衫军”（1000 red-shirts）著名的“千人远征”，这批红衫军未经训练，也没有好的武装配备，但是面对训练有素的军队，他们没有退缩，而是奋起反击。敌军的人数远远超过他们，但是他们的战斗热情以及民众的热切愿望，引领他们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加里波第声名远播，他的名字也具有了不可思议的魔力，只要听说加里波第靠近，敌军就会闻风丧胆，主动撤退。加里波第的任务依然艰巨，好几次他和

他的志愿军都差点战败。幸运之神总是眷顾那些孤注一掷的冒险事业，在最危急的时刻，加里波第也幸运地扭转了战局。

加里波第和他的“千人红衫军”在西西里岛登陆。他们从西西里岛缓慢地向意大利内陆推进。经过意大利南部的村庄时，加里波第在村庄里招募志愿兵，他承诺，志愿兵们会获得与众不同的回报。“来吧！”他对大家说，“来吧！躲在家里的人是懦夫。加入我的队伍你必定会遭遇困顿、艰难和战斗。我们要么征服敌人，要么战死沙场。”成功便是最好的回报。加里波第早期在战斗中取得的成功，激发了意大利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志愿兵争先恐后地加入他的队伍，他们一边高唱加里波第的赞歌，一边向北方进发：

> 坟墓盖子已掀开，逝者已从远方来，烈士的英魂也参战，手持宝剑，头戴桂冠，逝者的心依然随意大利而跳动。快来加入他们！快来，伙伴们，我们国家的年轻人啊！来举起我们的旗帜，来集结我们的队伍！带上冰冷的武器，带上火热的激情，带上为意大利而战的热情！
>
> 滚出意大利，滚出我们的家，滚出意大利，侵略者啊，滚出去！

全世界歌唱民族主义的歌曲竟是如此相似！

加富尔充分利用了加里波第的胜利，在1861年，皮埃蒙特的维克托·伊曼纽尔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意大利的国王。法国军队依然控制着罗马，奥地利人依然控制着威尼斯。但在10年之内，威尼斯和罗马都并入了意大利，罗马成了意大利的首都。意大利终于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马志尼并不高兴，他的毕生都为了共和国理想而努力，而如今意大利只不过是皮埃蒙特的维克托·伊曼纽尔统治的王国。新的王国实行了君主立宪制，维克托·伊曼纽尔当上国王后不久，意大利议会就在都灵（Turin）召开了会议。

意大利再一次完成了国家统一，摆脱了异国统治。马志尼、加里波第以及加富尔这三个人完成了这个伟大的事业；如果缺了其中任何一个人，意大利的自由都不会那么早实现。多年之后，英国诗人、小说家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这样写道：

> 我们目睹了意大利的挣扎，成功了一半之后，又被无情地打压下去。如今，意大利就像经过辛勤耕耘的一片丰收的麦田，当我们看到它的美好和富足时，我们想起了给意大利带来无限生机的人：加富尔、马志尼和加里波第。这三个人，他们是意大利的头脑、灵魂和宝剑；怀着同一个远大的志向，他们使意大利不再受到破坏，成了一个和谐统一的国家。

我简要而粗略地给你讲了意大利争取自由的故事。这个简短的内容在你看来也许和其他历史事件一样，毫无生命力。但是我要告诉你，怎样才能让这个故事生动起来，怎样才能感受到这场斗争中的苦与乐。很久以前，当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特里维廉写的三本书给了我这种真实的感受，这三本书是——《加里波第保卫罗马共和国》（*Garibaldi and the Fight for the Roman Republic*）、《加里波第与千人红衫军》（*Garibaldi and the Thousan*）以及《加里波第与意大利的形成》（*Garibaldi and the Making of Italy*）。

当意大利的斗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时，英国人给予了加里波第和他的红衫军很大的支持，许多英国诗人都写下了与这场斗争有关、激动人心的诗篇。很奇怪的是，英国人总是支持那些与他们利益无关的民族为自由而战。英国人派出了诗人拜伦和其他诗人，支持为自由而战的希腊，对于意大利，英国人送上了美好的祝福和极大的鼓励。但是对于近邻爱尔兰，以及遥远的埃及、印度和其他地方，英国人则带去了马克沁重机枪和毁灭性的破坏。斯温伯恩（Swinburne）、梅瑞狄斯、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 Browning）写了

许多首有关当时意大利的优美诗作。梅瑞狄斯还写了几部有关这个主题的小说。在这里我要引用一段斯温伯恩的诗《止步于罗马前》（*The Halt before Rom*）——写这首诗的时候，意大利的斗争正在进行，而且遇到了许多艰难险阻，许多卖国贼正在为异国主人卖命。

你的主人们能够给你礼物，

自由无法给你礼物；她没有栖身之处，

她不受限制，以不知倦怠的速度催促军队为她挨饿，流血，

以生命的代价换来自由的种子，他们的灰烬能为她重建一个国家，

他们的灵魂将为她重新点亮星辰。

128 ——德国的崛起

在上一封信中，我们看到了我们熟悉的一个欧洲大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现在，我们来看看另一个现代化大国——德国的建立过程吧。德国民族尽管有着相同的语言和许多相似的特点，却一直保持着分裂状态，形成了众多大大小小的城邦。许多世纪以来，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一直是德国的领导力量。之后普鲁士也发展成了一支重要的力量，这两大势力为了争夺德国民族的领导地位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后，拿破仑打败了这两方势力。这场战争的结果，使德国的民族主义获得了力量，并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拿破仑虽然没有刻意这样去做，但他还是促进了意大利和德国的民族主义精神以及争取自由的观念的发展。拿破仑时期，哲学家费希特（Fichte）是德国民族主义领袖之一，他也是一位极力促使同胞觉醒的爱国者。

在拿破仑失败后的半个世纪里，德国的各个城邦依然保持着原样。他们曾经尝试着组成联邦，但是由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统治者和政府都想成为联邦的领导者，因此联邦并没有实现。同时，自由主义思想和行动受到了压制，1830年和1848年发生的起义均遭到了无情的镇压。为了平复人们的情绪，政府进行了小规模的改革。

和英国一样，德国的一些地方煤矿和铁矿资源丰富，也有利于工业的发展。德国的哲学家、科学家和军人也都天下闻名。人们盖起了很多工厂，产业工人阶级正在不断发展壮大。

在这个阶段，也就是19世纪中期，普鲁士出现了一位将要主导德国以及欧洲政坛多年的人物，他就是奥托·冯·俾斯麦（Oto von Bismarck），一位容克（junker）——也就是普鲁士的地主。他出生

于滑铁卢战役发生的那一年，有过多年的外交官生涯。1862年，在出任普鲁士首相后不久，他的影响力便开始突显出来。在成为首相后的一周之内，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当代的重大问题，并不是通过演讲和多数派决议就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

铁和血！这段著名的讲话，真实地反映了他在深谋远虑之下义无反顾地追求的政策。他厌恶民主，也看不起议会和大众集会。他就像一个来自古代的人，但是他的能力和决心很强，能使现代的人向他的意愿屈服。在19世纪下半叶，他塑造了现代德国，从而决定了欧洲历史的走向。以哲学家和科学家为傲的德国退居二线，新的铁血军事大国德国开始主导欧洲大陆。和他同时期的一位著名的德国人曾说过："俾斯麦让德国变得伟大，而让德国人变得渺小。"俾斯麦所制定的、让德国成为欧洲以及世界霸主的政策，令德国民众十分满意，不断增加的国家威望令他们着迷，因此对于俾斯麦的各种压迫，他们也就默默忍受了。

掌权之后的俾斯麦想法很明确，他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并为此精心制定了一项计划。他坚决地执行了这个计划，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功。他想让德国称霸于欧洲，从而使普鲁士成为欧洲的主导者。那时候，拿破仑三世统治的法国，被认为是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奥地利则是另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作为国际政治和外交的经典一课，让我们看看俾斯麦是如何同其他强国周旋，然后一个个地处理掉它们的。他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由谁领导德国"这个问题。以前发生在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对抗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最终的决定是普鲁士取得领导权，而奥地利必须认识到，它只能居于第二。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就该解决与法国之间的问题了。（你要记得，我所说的普鲁士、奥地利和法国，是指这些国家的政府。这些政府或多或少都受到独裁统治，而它们的议会没有什么权力。）

为此，俾斯麦默默地扩充着自己的军事实力。在此期间，拿破仑三世攻打并击败了奥地利。法国挫败了奥地利，使加里波第有机会在意大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最终使意大利获得了自由。法国的行动正合俾斯麦之意，因为它大大削弱了奥地利的实力。受俄国控制的波兰发生了一次起义，俾斯麦向俄国沙皇提供了帮助，在必要的时候开枪射杀起义的波兰人。这种帮助虽不光彩，但是能够达到目的，未来在欧洲发生纠纷的时候，他就可以得到俄国沙皇的支持。之后，俾斯麦又与奥地利联手，击败了丹麦；很快，俾斯麦又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下将矛头转回，对准了奥地利。1866年，普鲁士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压制住了奥地利。在解决了由谁领导德国、确定了普鲁士的领导地位之后，为了不给失败者留下痛苦的回忆，俾斯麦明智地对奥地利展现了宽容大度的一面。这样一来万事俱备，一个由普鲁士领导的北德意志联邦（North German Federation）便成立了（其中并不包括奥地利）。俾斯麦出任联邦首相。如今我们一些博学的政治家和法学家，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来讨论建立联邦和宪法的问题，而有趣的是，俾斯麦在五个小时之内就口述了北德意志联邦的新宪法。这部宪法经过一些改动后，成了之后50年的德国宪法，一直沿用到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共和国成立的时候。

俾斯麦成功地实现了他的第一个伟大目标。下一步是要通过削弱法国，使德国成为欧洲的霸主。他不露声色地筹备着这一切，试图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并打消其他欧洲大国的疑虑。他甚至用极其温和的方式对待战败的奥地利，这样就不会再有其他国家对他产生敌意了。英国在历史上是法国的竞争对手，密切提防着拿破仑三世的野心图谋。因此，在对付法国的时候，俾斯麦很轻易地取得了英国的支持。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之后，在他的巧妙策划之下，拿破仑三世于1870年主动向普鲁士宣战。在欧洲其他国家看来，普鲁士政府成了法国霸权的无辜受害者。人们在巴黎高喊：“柏林！柏林！”拿破仑三世自信满满地认为，自己很快就会带领胜利的部队攻占柏林。但是事与愿违。俾斯麦训练有素的军事力量，在法国东北部前线表现神勇，

法国部队在他们面前溃不成军。几周之内，德国人就在法国城市色当（Sedan）擒获了拿破仑三世和他的部队。

法国拿破仑家族的第二个帝国就此终结。不久，巴黎建立了一个共和政府。拿破仑三世的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因为他所实行的压迫政策不得人心。他试图通过发动外部战争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这是国王和政府在遇到危急时的惯用伎俩。然而，拿破仑三世失败了，他发动的战争终结了他自己的野心。

巴黎成立了一个国防政府（National Defence）。他们向普鲁士抛出了橄榄枝，但是俾斯麦制定的条约具有羞辱性，因此即使部队已经所剩无几，巴黎还是决定继续战斗。在巴黎的凡尔赛和城市各处，守军受到德军长时间的围困。最终，巴黎选择了投降，新的共和政体只得接受失败，也接受了俾斯麦苛刻的条约。他们同意支付一大笔战争赔款，但对法国人伤害最深的是，法国统治了200多年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被迫割让给了德国。

但是在巴黎的围困结束之前，一个新帝国就已经在凡尔赛诞生了。1870年9月，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帝国覆灭了；1871年1月，一个统一的、由普鲁士国王担任皇帝的德意志帝国，在路易十四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内宣告成立。德意志帝国的所有王侯和代表齐聚凡尔赛宫，承诺效忠于他们的新皇帝。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室成了帝国的王室，统一的德国一举成了世界强国。

凡尔赛沉浸在喜悦和欢庆的气氛中，但是附近的巴黎其他地方则充满了悲伤、痛苦和耻辱。因为灾祸，人们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他们也没有一个稳定而善治的政府。国民议会中有许多支持君主制的人，他们在密谋复辟君主政体。为了扫清复辟路上的障碍，他们就得解除属于共和政体的国民自卫军（National Guard）的武装。巴黎的民主主义者和革命派都认为，保守势力想要通过武力镇压卷土重来。于是一场起义随之爆发；1871年3月，“巴黎公社”（Commune of Paris）

宣告成立。巴黎公社是一种自治政府，它的灵感来自法国大革命时期。但是它所包含的意义更大，尽管不是十分清晰，但毕竟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念出现了。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俄国苏维埃的雏形。

但是1871年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很短。君主制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害怕平民起义，他们包围了由巴黎公社控制的地区。在附近的凡尔赛和其他地区，德国军队则在静观其变。德国人释放了法国战俘；战俘回到巴黎，与原来的军官们一起攻打巴黎公社。他们大举围攻巴黎公社社员，并在1871年5月底的一天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在巴黎街头被他们杀死的人多达3万人。众多被俘的巴黎公社社员后来也遭到了无情的处决。巴黎公社就此结束，这一事件给当时的欧洲大陆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不仅是因为它遭到了血腥镇压，也因为它是反抗现有社会制度的第一场社会主义起义。穷人过去也经常起义反抗富人，但他们从未想过要颠覆使他们变穷的社会制度。巴黎公社既是一次民主主义起义，又是一次经济上的反抗，因此它成了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法国，巴黎公社遭受的暴力镇压，使社会主义观念开始隐蔽起来，经过很长时间之后，才慢慢重见天日。

尽管巴黎公社遭到了镇压，但法国依然没有复辟君主政体。不久之后，法国最终确定实行共和主义；1875年1月，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宣告成立，并实行新宪法。自那时起，这个共和国一直持续到现在。即使在今天，法国依然有人提议恢复国王的地位，但这不过是少数人的意见罢了，法国似乎坚定了实行共和主义的决心。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受条件优越的中产阶级控制。

法国从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恢复了过来，他们交给德国一大笔赔款，但是在法国人民的心中，对于所遭受的耻辱一直怀恨在心。法兰西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充满自豪的民族，复仇的想法一直萦绕在他们心中。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让他们感到特别伤心。俾斯麦对战败的奥地利明智地展现出了宽容的一面，但是对法国他毫

不宽容地采取了强硬态度，这种做法并不明智。羞辱了一个充满自豪感的敌对民族，换来的必定是这个民族对其刻骨铭心的仇恨。在“普法战争”尚未结束、“色当战役”刚刚结束的时候，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卡尔·马克思就发表了一份宣言，他预言道，吞并阿尔萨斯将会导致“两国之间不共戴天的仇恨，两国只会休战而不会和平相处”。在这一点和其他许多事情上，卡尔·马克思就是一位真正的预言家。

俾斯麦现在已经是德意志帝国无所不能的宰相了。取得阶段性成功的“铁血政策”获得了德国的认可，自由开明的观念则不那么受重视了。俾斯麦不相信民主，他希望国王能够一直掌权。德国工业给工人阶级的发展带来了新问题，因为这个阶级获得了力量，提出了激进的要求。俾斯麦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二是压制社会主义的发展。他通过社会立法拉拢工人，这至少防止了他们做出极端行为。德国首创了劳工立法，颁布了与工人相关的养老金、社会保险、医疗救助以及其他改善工人条件的法律，同样在工业和工人运动方面发展迅速的英国，尽管已经在劳工立法方面做了很多准备，还是落后于德国。这个政策取得了一部分成功，但是工人组织依然在壮大。他们的领袖都很有才能：才华横溢的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被称为19世纪最伟大的演说家。他死于一场决斗，死的时候还很年轻。勇敢的斗争者、反叛者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从枪口下死里逃生，还活了很长时间；他的儿子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继承了他的斗争事业，并于1918年德意志共和国建立时被人杀害。还有卡尔·马克思，我会在以后的信中给你介绍他。但是马克思大半生都被德国驱逐在外，过着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

不断壮大的工人组织在1875年联合起来，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ocialist Democratic Party）。俾斯麦根本不能容忍社会主义的发展。一次，有人想要刺杀国王，俾斯麦以此为借口，对社会主义者展开了猛烈的进攻。1878年，俾斯麦颁布了反社会主义者的法律，开

始镇压各种社会主义活动。此外，对于社会主义者还有一项戒严令，成千上万的人被德国驱逐出境或被判入狱。许多流亡者去了美国，成了美国社会主义的先驱。社会民主党受到了重创，但它还是坚持了下来，并再一次积聚了力量。俾斯麦的恐怖手段无法消灭它，它的成功会招致更大的伤害。力量壮大之后，它成了一个拥有大量财富的巨大组织，成千上万有工资收入的工人加入了这个组织。当一个人或组织变得富有之后，就不再革命了。这种命运也降临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身上。

俾斯麦娴熟的外交手段并没有结束，他在当时的国际政坛上还耍了很多手段。无论是当时的还是现在的政坛，都布满了错综复杂的阴谋、反阴谋、欺骗和虚张声势，所有政治手段都在暗地里进行，都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这些手段一旦暴露就无法实施了。由于害怕法国人复仇，俾斯麦与奥匈帝国以及意大利结成同盟，号称“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敌对双方都在继续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一边策划着阴谋诡计，一边紧盯着对方。

1888年，年轻气盛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继位。他自诩为强大之人，并很快与俾斯麦产生了分歧。令这位铁血宰相愤怒的是，在年老之时，他被迫辞职。虽然获封了王室爵位以示安慰，但是在告老还乡的时候，他还是对君主们充满了厌恶和失望。他曾对一位朋友说：“走马上任的时候，我对国王投入了保皇党人的情感和崇敬之情；让我伤心的是，我投入的感情被慢慢耗尽了！……我见到过三位国王裸体的样子，那景象可不怎么令人愉快！”

这位性情乖戾的老头儿又活了几年，于1898年离开了人世，享年83岁。在德国皇帝将他免职之后，甚至在他死后，他的影响力依然遍布于整个德国境内，他的精神感染了他的继任者们。但是继任者们表现平平，根本无法超越他。

129 ——几位著名作家

昨天给你写信写到有关德国崛起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还没给你讲过19世纪初期德国最伟大的一个人。他就是著名作家歌德（Goethe），几个月之前，他逝世100周年的时候，全德国都在纪念他。接着我想到，我应该给你讲讲，这个时期欧洲著名的几位作家的故事。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主题，因为它必然会暴露出我的无知。仅仅列出一串众所周知的名字会显得很幼稚，而引申开来又很难。关于英国文学我知之甚少，对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我的认识也只局限于一些翻译过来的作品。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说说有关这个主题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我觉得，即使不能陪你在这个令人着迷的领域走得很远，至少我也应该给你指出一个前行的方向。比起表面化的大众活动，艺术与文学总能让人更深入地了解一个国家的灵魂。艺术与文学能使人冷静思考，不会受到一时的热情与偏见的影响。但是如今，人们认为诗人和艺术家们不能预知未来，因此并不尊重他们。即使他们能够得到尊重，也往往是在他们死后。

我会告诉你几个名字，其中有一些对你来说一定很熟悉了，另外我只会提到19世纪初期的几个人。他们可以满足你的求知欲。要知道，在19世纪，欧洲很多国家都涌现了大量优秀的著作。歌德其实是18世纪的人，因为他出生于1749年，但他活到了83岁高龄，因此19世纪最初的30年也成为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他经历了欧洲历史上变化激烈的一段时间，也目睹了自己的国家惨遭拿破仑军队的蹂躏。他的一生中有过不少悲痛的经历，但是渐渐地，他不再受这些悲痛的影响，内心变得非常宁静，足以让他克服人生中的困难。歌德60多岁

的时候，拿破仑第一次见到他。他站在门口，面容和身形与众不同，流露出无忧无虑、充满自豪的神态，拿破仑一见到他就大喊："瞧，就是他！"他涉足了多个领域，无论做什么都有杰出的表现。他是哲学家、诗人、剧作家以及对许多学科都感兴趣的科学家；除此之外，他的实际工作竟是德国一个邦国君主的大臣！他的作家身份最为我们熟知，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浮士德》（*Faust*）。一生中他的声名远播，在文学方面，他被同胞视作"半神"。

另一位伟大的诗人席勒（Schiller）是歌德的同代人，比歌德年轻一些。还有一位更年轻的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同样是一位伟大而受人喜欢的诗人，他写过许多优美的抒情诗。歌德、席勒和海涅三人都深深地受到了古希腊经典文化的浸染。

长久以来，德国一直以拥有众多哲学家而闻名，我可以告诉你一两个名字，但你也许对他们不会感兴趣。只有那些对哲学有热情的人，才想读他们的书，因为这些书的内容太晦涩难懂了。但是他们以及其他哲学家依然是有趣的、对他人有益的人，因为他们让思想的火炬长明，人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作品紧跟思想观念的发展。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是18世纪德国伟大的哲学家，80岁时辞世，那时19世纪才刚刚开始不久。黑格尔（Hegel）是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紧随在康德之后，黑格尔对"共产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哲学家就讲到这里为止。

19世纪初期，涌现了许多杰出的诗人，特别是在英国。俄国最著名的民族诗人普希金（Pushkin）就生活在那个时期，他死于年轻时的一次决斗。法国也有一些诗人，但是我只说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生于1802年，像歌德一样活到了83岁高龄，也像歌德一样，被本国人民视作文学上的"半神"。雨果的作家和政治家生涯经历了许多变化。一开始，他是一位强势的保皇党人，坚定地相信独裁政体。慢慢地，经过一步步的改变，他在1848年成了

一位共和主义者。雨果因为自己的共和主义思想，被法兰西短命的第二共和国的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驱逐出了法国。1871年，雨果支持了巴黎公社的起义。他从极右派保守主义者慢慢地转变成了极左派的社会主义者。大多数人在他们年老之后就趋于保守。而雨果正好与他们相反。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作为一位作家的雨果。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小说家以及剧作家。

我要讲的第二个法国人是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他与雨果身处同一时期，但与雨果截然不同。他是一位能量充沛的小说家，在并不算长的一生中，他创作了数量巨大的小说。他写的故事都是互相关联的，不同的故事中常常会出现同一个角色。他的目标是写一本反映当时法国社会生活全貌的小说集，取名为《人间喜剧》（*La Comedie Humaine*）。这是个雄心勃勃的想法，尽管努力了很久，他还是没能完成他布置给自己的庞大任务。

19世纪初期，英国出现了三位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他们生活在同一时期，在三年内相继去世，去世的时候都很年轻。这三位诗人就是济慈（Keats）、雪莱（Shelley）和拜伦。济慈生前一直贫困潦倒，1821年在罗马去世的时候只有26岁，当时很少有人认识他。然而，他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篇。济慈属于中产阶级，所以很有意思的是，如果说缺钱成为他的一大障碍，那么对于真正的穷人来说，要成为诗人和作家实在是难上加难了。一位现任剑桥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对此做出了中肯的评价：

> 在我们英联邦国家，由于一些错误，贫穷的诗人在现代以及过去的200年中，一直没有得到什么机会。相信我，我用了10年的时间观察了大约320所小学，我们总是唠叨着要民主，但实际上，英国的穷孩子和雅典奴隶的孩子差不多，都没有机会得到智力上的解放和自由，而这种解放和自由正是诞生伟大著作的摇篮。

我引述这段话是因为，我们往往会忘记，诗歌、写作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只属于条件优越的阶级。诗歌和文化不会出现在穷人的陋室中，它们不属于饿肚子的人。所以说，现如今我们的文化反映的是优越资产阶级的意志。如果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工人可以有机会和空闲时间让自己沉浸在文化之中，那么文化会大为不同。如今的苏维埃俄国正经历着这样的变化，人们也饶有兴致地关注着这个变化。

这也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们印度，过去几代人在文化上的贫瘠，主要是因为我们民族实在太穷困了。对那些连饭都吃不上的人谈文化是很无礼的。贫穷带来的弊端甚至影响到了少数条件稍微好一些的人，不幸的是，如今这些在印度条件稍好的阶级，也得不到文化教育的滋养。这都要归咎于罪恶的外国统治以及社会的落后。但即使在这样贫穷与乏味的环境里，印度依然培养了杰出的人，以及像甘地和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这样伟大的文化典范。

我又偏离主题了。

雪莱非常受人喜爱，他从年轻时起就热情洋溢，勇敢捍卫自由。因为写了一篇《论无神论的必然性》（*The Necessity of Atheis*），他被牛津大学开除。济慈也一样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以及大自然中，丝毫不受世俗困难影响地走完了诗人的短暂一生。在济慈去世一年后，雪莱在意大利海岸附近溺水身亡。我不需要告诉你他写过哪些著名的诗篇，因为你自己就能找到。但是我要告诉你一首他的短诗。这无疑是他最优秀的诗作之一，但它写出了我们目前的文明中可怜的工人遭遇到的悲惨命运。工人所处的糟糕环境与以前的奴隶差不多。这首诗写于100多年前，但是依然符合现在的社会环境。诗歌的题目是“暴政的假面游行”（The Mask of Anarch）。

自由是什么？但是，你们

善于回答的，却只是奴役。
因为，奴役这一名称本身
已经成为你们姓名的回声。
那就是辛勤劳动，而报酬
只够，维持体力勉强糊口，
只能为了应承暴君的差役
居住在阴暗的地窖和牢狱。
那就是使你们的自身成为
他们的犁铲、刀剑和织机，
为他们的饱暖而殚精竭虑，
由不得你们愿意或不愿意。
那就是，眼看着自己家的
妻子和儿女们瘦损、憔悴，
当冬季那刻骨的寒风刮起，
就在我说话时，奄奄死去。
那就是，对于那么一口口
财主们在饮闹时随意抛投
去喂他们脚下肥狗的狗食，
也只能够是可望而不可即。
那就是心甘情愿成为奴隶，
在灵魂深处放弃自由权利，
听任奴隶主的摆布和驱使。
而当你们终于发出了抱怨，

尽管是微弱而徒劳的低语，

可是看吧，暴君们的鹰犬

就凌虐你们和你们的妻子——

热血将像雨露把萎草染遍。注

拜伦也写过赞美自由的好诗，但是与雪莱有关经济自由的主题不同，他写的是民族自由。我给你讲过，在雪莱去世两年后，拜伦在抵抗土耳其的希腊民族解放战争中死去。虽然我对拜伦有些偏见，但是我对他有着同伴一般的感觉，因为他不是和我一样，也毕业于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以及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吗？他与济慈和雪莱不同，很年轻的时候就出名了，伦敦社会曾经极为推崇他，后来就不再理他了。

这个时期还有另外两位家喻户晓的诗人，比起前面三位英年早逝的诗人，他们活的时间要长得多。华兹华斯（Wordsworth）是公认的英国伟大诗人之一，他生于1770年，死于1850年，享年80岁。他热爱大自然，诗作大部分是自然诗歌。另一位是柯勒律治（Coleridge），他的一些诗歌作品是上乘佳作。

19世纪初期还出现了三位著名的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是三位中最年长的，他写的《威弗利》（*Waverley*）小说集十分受欢迎。我想你肯定读过其中几篇。我记得，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这些小说，但是品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改变，我相信如果现在读这些小说，我一定会觉得很无聊。另外两位小说家是萨克雷和狄更斯（Dickens）。我认为这两位的作品都远胜过司各特的作品。我希望你能与他们的作品为伴。1811年，萨克雷出生在加尔各答，并在加尔各答生活了五六年。他在他的一些书中对那些在印度发财的英国富豪有很多现实的描写——一些英国人在印度赚了一大笔钱，变得肥胖而暴躁，之后他们回到英国享受生活。

关于19世纪初期的作家，我想我就讲这么多了。对于这么大的一个主题来说，我所讲的实在少得可怜。熟知这个主题的人也许能写得更加吸引人。毫无疑问，他也会告诉你很多那个时期的音乐和艺术。这需要生动的描述和渊博的知识，因为我都不具备，所以我还是明智一点，适可而止吧。

我将以歌德的《浮士德》中的一首诗作为这封信的结尾。当然它是由德语翻译过来的：

可怜！可怜！

这美好的人间，

被你沉重的拳头

打得稀烂！

它被半神捣毁，

它倾覆，倒坍！

一位把它摧毁！

我们把砖头杂物

搬进虚无，

为丧失的美

我们哀哭。

世人中的

男子汉

更辉煌地

把它重建，

重建在你的心间！

要心情开朗，

把新的生活道路

拓展，

新的歌声

震响其间！注

1. 译文引自《雪莱抒情诗全编·玫瑰集》，江枫译，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48——150页。——译者注
2. 译文引自《浮士德》，[德]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著，樊修章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68——69页。——译者注

130 ——达尔文以及科学的胜利

说完诗人让我们来说说科学家。恐怕人们依然认为，诗人是毫无用处的。但科学家是现代奇迹的制造者，他们影响力巨大，受人尊敬。19世纪之前，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在之前几个世纪，欧洲科学家的人生充满了风险，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代价。我告诉过你，罗马教会是怎么烧死乔达诺·布鲁诺的。几年之后，在17世纪，伽利略由于公开支持日心说而差点丧命。后来他为此道歉，并收回了之前的言论，才得以逃脱惩罚异端邪说的死刑。可以看出，欧洲教会总是试图禁止新观点的出现，也总是与科学发生冲突。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宗教组织严密，有着与之相应的各种教条，宗教的信徒们必须深信不疑地接受这些教条。而科学看待事物的方式与宗教迥然不同。科学认为，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科学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教条。科学鼓励人们开放思想，并通过不断地实验得到真理。显然，科学和宗教的见解不同，因此两者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也并不奇怪。

我认为，每个时期不同地方的人们都做过各种各样的实验。据说在古印度，化学和医学是相当先进的，那种先进程度只有通过大量的实验才能达到。古希腊人也做了很多实验。至于中国人，最近我找到了一个惊人的记录，其中摘录了1500年前中国作家的作品，这些内容表明，他们当时就知道进化理论，知道血液在身体里循环，中国的外科医生还会给病人做麻醉。但是关于这个时期我们了解得太少，所以不能对这些内容下任何结论。如果古代文明发现了这些医疗方法，后来人们为什么忘记了呢？为什么他们没有取得更大的进步？难道是因为他们没有重视吗？我们会发现很多有趣的问题，但是我们找不到任何资料回答这些问题。

阿拉伯人非常喜欢做实验，中世纪的欧洲紧随其后。但事实上，他们所做的实验并不科学。他们一直在寻找能够将普通金属变成金子的所谓“点金石”。人们将毕生心血投入复杂的化学实验中，试图找到金属转化的秘密；这种方法被称作“炼金术”。他们也孜孜不倦地寻找一种能让人永生的“长生不老药”。除了童话故事，没有任何记载显示，有人曾找到过这种“长生不老药”或者“点金石”。这仅仅是为了获得财富、权力和长生不老而尝试的某种魔法。它与科学精神毫无关联。科学与魔法、巫术之类的东西无关。

然而，真正的科学方法在欧洲慢慢地发展起来，在科学的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字之一，就是英国人艾萨克·牛顿，他生于1642年，死于1727年。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也就是，物体是怎样坠落的；在这个定律以及其他定律的帮助下，他解释了太阳和行星的运动规律。一个物体不论大小，似乎都适用于他的理论，他也因此获得了世人的尊敬。

科学精神渐渐地赶超了教会的教条风气。科学不会再受到镇压，科学的追随者们也不再受到死亡的威胁了。许多科学家，特别是英国、法国以及后来德国、美国的科学家们，耐心地埋头于工作与实验当中，累积了大量事实与知识。科学知识因此得以不断发展。你应该记得，18世纪的欧洲，理性主义开始在受过良好教育的阶级中传播开来。这个世纪属于伏尔泰、卢梭以及其他有才华的法国人，他们创作了主题丰富的著作，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启蒙。这个世纪也是孵化法国大革命的摇篮。理性的观念与科学的观念是一致的，但这两种观念与教会的教条观念则是完全背离的。

我告诉过你，19世纪是科学的世纪。工业革命、机械革命以及交通运输方式的惊人变化，都要归功于科学。众多工厂改变了生产方式；突然间，铁路和轮船缩短了世界的距离；电报机的发明更加神奇。大英帝国控制的广大领土范围内产生了大量财富，这些财富源源

不断地涌入英国本土。传统观念受到动摇，宗教的控制力也变小了。与农业生活相比，工业生活让人们意识到，经济关系比宗教教条更重要。

19世纪中期，也就是在1859年的时候，英国出版了一本书，引起了教条思想和科学思想的激烈冲突。这就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达尔文并非科学超人，他的理论没有什么新颖之处。在他之前，其他的地质学家和博物学家就已经做了很多研究，收集了很多资料。尽管如此，达尔文的书依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力巨大，比其他的科学作品更有力地改变了社会观念。这本书引发了人们思想上的震动，达尔文也因此一举成名。

作为一位博物学家，达尔文曾经在南美洲和太平洋地区游历过，并且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和数据。他用这些资料和数据告诉人们，物种是通过自然选择进行变化和发展的。在此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每一个物种，都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物种之间保持着分离状态，并且保持不变——也就是说，一个物种不会变成另一个物种。达尔文通过大量现实的例子告诉人们，一个物种可以变成另一个物种，这是物种进化的正常途径。这种进化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一个物种发生的微小变异，如果恰好能让这个物种更好地生存，它就会渐渐地变成一个永久性的变化，因为这个变化，物种的更多个体就会生存下来。很快，这个变化的物种就会以其巨大的数量淹没其他物种。这样一来，变化和变异一次次出现，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有新的物种产生。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自然选择，许多新物种就在这个“适者生存”的过程中产生了。这个法则适用于植物和动物，甚至人类。依照这个理论，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所有动植物可能都拥有同一个祖先。

几年之后，达尔文出版了另一本书——《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书中他将自己的理论运用到了人类身上。如今尽管

人们的理解与达尔文及他的追随者提出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个进化和自然选择的观点。的确，人们普遍将这个自然选择的法则引申为人造选择，用于饲养动物以及培育植物、水果和鲜花。如今许多珍稀的动植物都是人工培育出来的新品种。如果人类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创造出如此多的变化和新物种，经历千百万年的大自然又怎么会做不到呢？我们参观任何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比如伦敦的南肯辛顿博物馆（South Kensington Museum），就能看到动植物是如何慢慢地改变自己去适应自然的。

这些事实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70年前的人们可不这么想。那时欧洲大多数人依然相信《圣经》记载的内容，他们相信，世界是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的，上帝还创造了动物、植物和人类。他们相信，洪水灭世之时，诺亚方舟带走成双成对的动物，物种因此没有灭绝。这些都不符合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达尔文和地质学家们探讨的是地球千百万年来的变化，而非短暂的6000年时间。因此，人们在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许多人不知道该相信谁。他们的传统信仰让他们相信一件事，而他们的理性则让他们相信另一件事。如果人们一直盲目相信的一种教条受到了冲击，他们就会感到无助、痛苦、无所依靠。但是，能够唤醒人们、让他们接受现实的这种冲击是有好处的。

因此，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科学和宗教之间产生了很多争论和冲突。结果当然就不言而喻了。依赖科学的力量，新的世界发展了工业、机械和交通运输，因此人们不能舍弃科学。科学获得了全面胜利，“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成了人们的日常用语，尽管他们并不了解这两句话的真正含义。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暗示，人类也许与某种猿猴拥有同一个祖先。他列举的例子来自进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这些例子并不能证明他的观点。为此人们开了不少关于“缺少一环”的玩笑。奇怪的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歪曲了达尔文的理论，他们坚定地认为，这个理论足以证明他们的优越性。

他们是生存战役中最适合生存的人，因此，通过“自然选择”，他们处于优势地位，成了统治阶级。这个理论成了一个阶级控制另一个阶级或者一个种族统治另一个种族的一种辩解。它成为帝国主义和白种人优势说的最后论据。西方很多人认为，他们越专横跋扈、残酷无情，就拥有越高级的人类价值。这个想法并不令人愉快，但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西方帝国主义霸权在亚洲和非洲的所作所为。

达尔文的理论后来受到过其他科学家的批评，但是人们依然赞同他的总体观点。大众接受他的理论，主要表现在人们相信进化的理论，也就是人类、社会以及整个世界正在不断地越变越好，趋向完美。这种进化的观点并非只来自达尔文的理论。工业革命以及之后一段时间的发展，使科学发现与变化成为趋势，这使人们有了接受进化观点的准备。达尔文的理论证实了人们的想法，人们开始想象，他们正自信地向完美人类的目标迈进，尽管他们并不清楚完美人类是什么样的。有意思的是，这种进化的观点是全新的。过去在欧洲、亚洲或者其他古老的文明中，似乎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观点。在欧洲，工业革命产生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古代才是完美的时期。人们认为，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时期，比后来的时期更美好、更先进，也更重视文化教育。人们认为，人种一直在不断地堕落、退化，至少没有发生过显著的变化。

在印度，人们也有相似的退化观点，认为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印度神话中，以众多的时代划分时间，就像地质学划分时代一样，但印度神话总是以伟大的黄金时代（Krita Yuga）为开始，最后沦落到目前邪恶的黑暗时代（Kali Yuga）。

因此我们看到，人类进化的观点是相当现代的。我们所掌握的历史知识，让我们对这个观点深信不疑。但是，我们掌握的知识非常有限，如果掌握更多知识，我们的观念也许还会改变。如今我们对“进化”的热情，远不及19世纪下半叶人们的热情。如果进化导致了人们

大规模地伤害彼此，就像世界大战中发生的那样，那么这种进化就是错误的。另外值得记住的一点就是，达尔文所说的“适者生存”，指的并不是最强者生存。这些都是博学者的推断。我们要注意的是，过去人们普遍持有的静止不变甚至慢慢退化的社会观念，已经被19世纪的现代科学所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活力充沛、不断变化的社会观念。进化的观念也由此产生。在这一时期，社会的确产生了令人讶异的巨大改变。

讲过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理论，我想你可能有兴趣听听2500年前的一位名叫老子(注)的中国哲人有关这个话题的表述。在公元前6世纪，大约是在佛陀释迦牟尼时期，他这样写道：

> 万物源自单一物种。此物种经不断演化，形成各种形态。此变化非一日而成，而是经日积月累而成。

这与达尔文的理论十分相近，神奇的是，这位中国古代的生物学家得出的结论，直到2500年后才被世人再次发现。

进入19世纪以后，进行的速度越来越快。科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不断涌现的科学发现和发明，让人们眼花缭乱。众多的科学发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比如电报、电话、汽车以及后来的飞机等。科学敢于探索最遥远的太空，也敢于研究肉眼看不见的原子，甚至比原子更小的结构。科学使人类的工作不再那么辛苦，人们的生活轻松多了。由于科学的发展，世界人口，特别是工业国家的人口，数量大幅增加。同时，随着科学的发展，毁灭性的手段也得到了进化。但这并不是科学的错。科学使人类增强了控制大自然的能力，但是拥有了这种能力的人类，却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因此，他们浪费了科学给予人类的馈赠，经常做出恶劣的行为来。不过，科学继续

昂扬前行，在150年内，科学对世界的改变远远超过之前几千年的变化。从生活的每个角度、每个方面来说，科学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

如今科学依然在前进，它的发展速度比以往更快了。科学的发展从未停歇过。一条铁路建好之后，还没投入使用就已经过时了。一台机器买回家后，不消一两年，更好更高效的同类型机器就制造出来了。如此激烈的竞争一直持续到今天，如今电力已经取代了蒸汽，电力带来的革命与一个半世纪之前的工业革命是同等的重要。

众多科学家和专家们持续地致力于各种科学研究。当今最伟大的科学家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他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牛顿的著名理论。

科学发展的进度如此之快，科学理论的新发现和新变化如此多样，连科学家们自己都吃惊不已。如今他们不再像过去一样自鸣得意、自信满满了。在下结论和预言未来的时候，他们都慎之又慎。

但这是我们今天20世纪社会发展的情况。在19世纪，人们对科学充满了信心，科学骄傲地取得了不计其数的成功，它时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也像信奉神明一样崇拜着科学。

---

1. 原文为“Tson Tse”，根据上下文，这里应该是指老子。其核心思想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译者注

131 ——民主的进步

在上一封信中我带你领略了19世纪的科学发展。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世纪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民主思想的发展。

你应该记得，我曾经给你讲过18世纪法国发生的思想革命，讲过伟大的思想家与作家伏尔泰，讲过欧洲其他一些挑战旧的宗教与社会观念、勇于发展新理论的人。当时这种政治思想主要出现在法国。在德国，哲学家们更有兴趣研究深奥的哲学问题。在英国，随着商业和贸易的蓬勃发展，大多数人并不喜欢思考，除非环境迫使他们去思考。不过，18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版了一本著名的书，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本书的主题不是政治，而是政治经济学。当时，所有书的主题都会混入一些宗教和伦理道德的内容，因此人们读书的时候会感觉很困惑。亚当·斯密则抛开了所有的伦理纠纷，以一种科学的方式阐述了这个主题，试图掌握经济学的自然规律。你可能知道，经济学研究的是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收支管理、人们的生产和消费、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亚当·斯密相信，这些较为复杂的问题遵循了一定的自然规律，他在书中总结了这些规律。他还相信，为了让这些自然规律不受影响，工业必须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发展。这是我和你提到过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发端。亚当·斯密的书与当时在法国萌芽的新民主思想没有任何关系。然而，他在研究一个与国家和人们息息相关的问题时，运用了科学的方法，这一点表明，人们逐渐脱离了神学的方式，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看待问题。亚当·斯密被人尊称为“经济学之父”，他激励了许多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

只有教授们和一些博学之士掌握了这些新的经济学知识。不过，与此同时，新的民主思想正在传播，经过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宣扬，这些新思想普遍受到了人们的欢迎。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充满了振奋人心的话语。它们为成千上万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人带来了解脱的希望。这两份宣言都提到了自由、平等以及人人享有幸福的权利。人们并没有通过这些宣言获得这些珍贵的权利。即使在这些宣言发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也只有极少数的人享受到了这些权利。不过，这些宣言的发表仍是意义非凡、鼓舞人心的。

不管在欧洲还是其他地方，不管是基督教还是其他宗教，人们的传统观念都认为，罪孽与不幸是人类难以避免的宿命。宗教视人世间的贫困与悲惨为永恒，甚至荣耀。宗教给人们的允诺和奖赏都是针对另一个世界的，人们只能顺从这种宿命，不能追求任何改变。宗教鼓励人们施舍穷人，但是并没有鼓励人们摆脱贫穷，或者摆脱导致贫穷的制度。自由与平等的思想正好与教会和社会的权力主义观点相对立。

当然，民主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达到平等。民主不能下这样的断言，因为不同的人之间显然存在不平等的情况：体质上的不同导致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强壮，智力上的不同使一些人比其他人更聪明、更有才华，道德上的不同使一些人慷慨无私，而另一些人自私自利。这些不平等的情况，可能是因为人们的家庭成长环境不同，接受的教育也不同。两个能力相似的孩子，如果其中一个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另一个没有接受教育，那么几年之后，这两个孩子之间就会有很大的差异。或者其中一个吃了健康的食物，另一个则吃得很差或者吃不饱，那么前者就会健康成长，而后者就会体弱多病、发育不良。因此，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和接受的教育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如果我们可以给予每个人同样的教育和机会，那么很有可能目前的不平等情况会减少。这种情况确实很有可能发生。但是，就民主而言，它承认了人与人之间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尽管如此，民主还是宣称，每个人都应

该享有平等的政治和社会价值。如果我们接受了整个民主主义理论，我们就会得出各种革命性的结论。眼下我们不必深入了解这些理论，但是这些理论得出了一个明显的结论，即每个人都应享有选举执政议会代表的选举权。选举权是政治权力的象征，人们认为，如果每个人都有选举权，那么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力。因此，整个19世纪，民主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扩大选举权——也就是使更多人享有投票的权利。成人普选意味着每个成年人都应该参与选举投票。很久以来，女性是没有选举权的，不久以前，女性，特别是英国女性，发动了大型的女权运动。如今在先进的国家中，男性和女性都可以参加成人普选。

但奇怪的是，人们获得了选举权后，他们发现这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尽管拥有选举权，他们在国家中还是只有很少的权力，甚至没有权力。一张选票对于一个饥饿的人来说毫无用处。掌握实权的人们会利用饥饿的人，让他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工作或者做任何事情。因此，本该代表政治权力的选举权，在没有经济力量的情况下，只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幻影，而早期民主人士提出的选举权能带来平等的大胆设想，最终也化成了泡影。

不过这是后来的事情了。在早期，也就是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期，民主人士普遍热情高涨。有了民主，每个人都将成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政府也将为每个人的幸福而努力。人们强烈地反对18世纪君主与政府的专制统治，以及他们滥用权力的行为。因此人们在宣言中明确了个人应享有的权利。不过，美国和法国的宣言中所声明的个人权利也许是不对的。在复杂的社会里，将人们分隔开来并给予他们完全的自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必然会产生冲突。但不管怎样，民主很大程度上是主张实现个人自由的。

18世纪政治观念落后的英国，深受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英国的第一反应就是，害怕本土会产生新的民主思想，也害怕会

发生社会革命。统治阶级变得更为保守和守旧。但是新思想还是在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托马斯·潘恩（Tomas Paine）是这个时期一位有趣的英国人。美国独立战争（War of Independence）时期，他在美国向美国人伸出了援手。几乎可以说，是他让美国人产生了想要完全独立的想法。回到英国后，他写了一本小册子《人权》（*The Rights of Ma*），歌颂了刚刚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书中他抨击了君主专制，呼吁民主。英国政府查禁了这本书，并追捕他，他被迫旅居法国。在巴黎，他很快成为法国国民议会的一员，但在1793年，由于反对处决路易十六，他被雅各宾派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写了另一本书《理性的时代》（*The Age of Reaso*），书中他批判了宗教。英国的法院无法制裁潘恩（在罗伯斯庇尔死后他就在巴黎监狱获释了），但是他的英国出版商由于发行了这本书而受到了监禁。这样一本反宗教的书，在社会看来是一大威胁，因为宗教能使穷人安于现状。潘恩这本书的几位出版商，包括女性出版商，都进了监狱。值得一提的是，诗人雪莱曾经给审判法官写过一封抗议信。

在欧洲，起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思想，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传播。事实上，尽管环境在快速变化，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依然留存下来了。知识分子依靠这些民主思想来反对君主和独裁统治。这些思想是在工业化之前产生的。但是新的工业——蒸汽和大机器的运用——完全颠覆了旧的秩序。然而，奇怪的是，19世纪早期的激进分子和民主人士均无视这些变化，继续宣扬大革命以及《人权宣言》中的优美词句。也许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变化仅仅是物质上的，并不能影响民主高贵的精神、道德和政治需求。但是物质的东西无法被忽略。我们发现，人们要摒弃旧思想、接受新思想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人们会紧闭双眼甚至紧闭心胸，拒绝了解新思想；即使旧思想伤害了他们，他们还是会努力维护这些旧思想。除了接受新思想、适应新形势，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保守主义的力量大得惊人。即使自认为开明的激进分子们，也常常是因循守旧的，他们对变化的情况都避而不见。难怪

新思想的发展如此缓慢，人们的思想总是大大地滞后于实际情况——这就导致了革命局面的出现。

因此在几十年中，民主一直是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和思想的延续。民主未能适应新的形势，这导致了19世纪末期民主的力量不断削弱，到了20世纪，许多人开始批判民主。在今天的印度，我们的不少资深政客依然根据法国大革命和《人权宣言》的内容谈论问题，丝毫没有意识到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

早期民主人士偏爱理性主义。他们渴望得到思想和言论自由的要求，与教条式的宗教和神学是对立的。因此，为了削弱神学教条的控制，民主与科学联合到了一起。人们开始敢于把《圣经》视为一本普通的书籍进行研究，而不是盲目地、无条件地接受它的内容。这种对《圣经》的考证称为“高等考证”。评论家们得出结论，《圣经》是一本合集，内容是由不同时代的不同人写的。他们还认为，耶稣并未打算建立一个宗教。对《圣经》的考证撼动了许多古老的信仰。

当传统的宗教基础受到科学与民主思想削弱之时，人们试图建构一个哲学体系来替代传统的宗教。生于1798年、死于1857年的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k）就做了这样的尝试。孔德感觉到，传统的神学和教条的宗教已经过时，但他相信，社会依然需要某种宗教。因此，他提出建立“人道教”，并称之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这个宗教主张：爱是原则，秩序是基础，进步是目的。它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与超自然的力量无关。人类发展的观念在背后支持着它，也支持着19世纪几乎所有的现代思想。孔德的宗教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信仰，但是他对欧洲思想产生的普遍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说，他开创了研究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学科——社会学。

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与孔德生活在同一时期，但比孔德寿命更长一些。密尔受到了孔德的学说以及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英国政治

经济学派是在亚当·斯密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密尔试图将这一学派引入一个新的方向，并将一些社会主义原理应用到经济领域中。但他更有名的身份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功利主义”是早前在英国开创的一个全新哲学理论，密尔将它发扬光大。从它的名称可以看出，这个理论的主旨是效益或效用。功利主义者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追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它成为判断一件事对与错的标准。如果一些行为能增进幸福，那它们就是正确的，如果导致产生与幸福相反的东西，那它们就是错误的。社会和政府都要根据“追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目标行事。这个观点与之前宣扬人人平等的民主信条有所不同。要达到“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必然会导致小部分人牺牲自己的幸福。我只是给你指出这个不同之处，但是我们并不需要就此展开。民主因此意味着大多数人拥有权利。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极力拥护民主思想，他认为任何个人都有自由的权利。他写了一本著名的书《论自由》（*On Liberty*）。我摘录了书中一段支持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的内容：

> 但是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于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对现存的一代都是一样，对不同意那个意见的人比对抱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我们永远不能确定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假如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也仍然是一个罪恶。注

这样一种态度，在教条的宗教或专制的统治中绝对不会出现。它是一位哲学家、一位真理寻求者的态度。

我给你讲了几个19世纪西欧重要思想家的名字，目的是想告诉你思想是如何发展的，并且给你介绍思想世界中这些里程碑式的人物。但是这些人以及早期民主人士的影响只局限于知识分子阶级。通过知识分子，这些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其他人。尽管对普通大众的直接影响并不大，但这种民主思想的间接影响是巨大的。这种思想对于某些问题的直接影响也很大，比如要求获得投票权。

随着19世纪的发展，其他的运动和思想也得到发展——这就是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它们对民主观念产生了影响，而它们本身又受到民主观念的影响。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是民主的替代品；另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是民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看到，民主人士的观念中充满了自由、平等和人人享有幸福的权利。但他们很快意识到，仅仅把幸福变为一种基本权利，并不意味着人们就能获得幸福。撇开其他不说，获得幸福首先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一个饿肚子的人不可能幸福。由此，民主人士意识到，更合理的财富分配才是幸福的基础。这就引出了社会主义，这个话题留待下一封信中我再给你讲。

19世纪上半叶，无论哪个民族或种族，只要是为了自由而战，他们就会把民主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意大利的马志尼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民主爱国者。之后，民族主义的民主化特点逐渐淡化，进取心和权力意识变得更强。国家成为每个人都必须崇拜的神。

英国商人是新工业的领导者，他们对民主原则以及人们的自由权利并不感兴趣。但是他们发现，人们获得的自由越多，越有利于商业发展。因为工人的水平能够提升，他们还会有一种获得了自由的错觉，这样他们的工作效率就会提高。工业效率的提高也有赖于国民教育。商人和实业家们意识到这一点对他们有利，所以他们十分愿意惠及大众。19世纪下半叶，英国和西欧的人们普遍地接受了文化教育。

1. 译文引自《论自由》，[英]约翰·密尔著，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9——20页。——译者注

132 ——社会主义的到来

我已经给你讲了民主的进步，但是要记住，民主的进步是很艰难的。从现有制度中获益的人们，并不希望看到改变，他们会用尽一切力量去抵制改变的发生。但是，想要发展或者改良，必然会引起变革；政府的管理制度或方式，必须让位于更好的管理制度或方式。渴望这种发展的人们，必然会攻击旧的制度或惯例，从而导致他们不断地反抗现有制度，并与那些从现有制度中获益的人们发生冲突。西欧国家的统治阶级抵制一切进步。英国的统治阶级也只有在发生暴力革命的时候才会稍做让步。另一个进步的原因，我以前提到过，就是现代商人们认为，一定的民主不失为一个有助于生意发展的权宜之计。

但我要再次提醒你，19世纪上半叶的这些民主思想，大多仅局限于知识分子之中。普通大众受到了工业主义发展的巨大影响，纷纷离开田地，进入工厂。这个产业工人阶级蜷缩在煤矿附近、工厂聚集的肮脏城镇，他们的队伍在不断地壮大。这些工人发生着快速的变化，他们有了新的思想。他们与那些由于饥饿而涌入工厂的农民、工匠完全不同。英国是最早建立这些工厂的国家，因此英国也成为第一个发展出这个产业工人阶级的国家。工厂里的状况十分恶劣，工人们的住宿条件更差。他们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幼童和妇女们的工作时间很长。然而，工厂主们对改善工厂和住房条件的立法，是持坚决反对态度的。在他们看来，这不是对财产权的一种可耻的干涉吗？按照这种说法，连私有住房必要的卫生设备都不允许安装了。

可怜的英国工人由于饥饿和超负荷工作，正慢慢地走向死亡。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耗尽了精力，导致了国家经济衰退，而受害最深的则是工人。工人自然渴望建立起保护他们的协会，并以此争取更好

的条件。之前，曾经有过工匠和手艺人的行业协会，不过这些行业协会和工人渴望建立的协会完全不同。不过，这些行业协会，对产业工人建立自己的协会还是带来了启发。但是他们的想法遭到了禁止。英国统治阶级由于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惊吓，于是制定了法律——《结社法》（*Combination Acts*）——禁止贫穷的工人聚集在一起发牢骚。“法律与制度”不论在那时的英国还是如今的印度，都有效地发挥了作用，为少数拥有权力的人服务，让他们的腰包都变得鼓鼓的。

但是，禁止工人集会的法律并不会改善他们的状况，这些法律只会引起他们的愤怒，迫使他们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他们成立了秘密组织，立下约束彼此的誓约，并且在深夜时分，在偏僻的地方进行集会。如果有人出卖或揭发他们，他们就会严惩那些叛徒和告密者。有时候他们会愤怒地毁掉机器，放火烧掉工厂，甚至杀死自己的工厂老板。最终在1825年，针对工人组织的一部分限制取消了，工会开始出现。这些工会是由薪酬更高的技术工人建立的。大量的非技术工人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依然没有组织。由此，工人运动以工会的形式展开，他们集体与雇主讨价还价，以达到改善工人状况的目的。工人唯一有效的武器就是罢工，他们停止工作，使工厂陷入停滞状态。这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武器，不过他们的雇主采用的武器更有力，那就是让工人挨饿使其妥协。因此，工人阶级的斗争继续进行着，但是工人为此牺牲了很多，而获得的利益却很少。由于没有选举权，他们对议会也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遭到强烈反对的1832年《改革法案》，仅仅使优越的中产阶级得到了选举权。工人和下层的中产阶级仍然没有选举权。

与此同时，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中出现了一位慈善家，工人的悲惨状况让他感到痛苦。这个人就是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他在自己的工厂中推行了许多改革，改善了工人的状况。他试图说服和改变雇主阶级，不断鼓动他们给劳工更好的待遇。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因为欧文，英国议会才通过了第一部保护工人不受贪婪自私的雇主

侵害的法律。这就是1819年的《工厂法》（*Factory Act*）。这部法案明确规定，9岁大的孩子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12小时。这个条款本身可以让你了解到，工人们的状况是多么糟糕。

据说，在1830年左右，罗伯特·欧文率先使用了“社会主义”这个词。当然，缩小贫富差距、达到相对平等的财富分配，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想法了，过去有很多人都拥护这个观点。早期的人类社会中产生过一种共产主义，土地和其他财产为整个村社共同拥有。这种原始共产主义在很多国家，包括印度都出现过。但是，新的社会主义不只是一个想要达到人人平等的模糊想法，它的意义更加明确，首先它适用于新的工厂生产体系，因此它是工业体系的一个产物。欧文的想法是，成立工人合作社，并且让工人享有工厂的所有权。他在英国和美国成功地建立了示范性工厂和工人定居点。但是，他没能转变其他雇主以及政府的态度。不过，当时他的影响非常巨大，而且他让“社会主义”这个词流传开来，自此以后，千百万人为了社会主义而魂牵梦萦。

资本主义工业一直在发展，并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随之而来的，则是工人阶级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越来越多的产品被生产出来，由于人们获得了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食物，人口数量大幅增加。人们建立了大型企业，企业内部的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协作，同时，小企业在竞争中遭到了排挤。大量的财富涌入了英国，但人们用大部分的财富开办新工厂，修建新铁路，或建设其他的企业。工人们试图通过罢工来获得更好的条件，但总是遭到惨痛的失败，之后他们加入了19世纪40年代的宪章运动。这场宪章运动在革命之年——1848年——衰落了。

资本主义的成功使人们惊异不已，但仍有一些激进分子、一些抱有先进观念的人以及慈善家，他们不愿意看到资本主义残酷无情的竞争，他们也不愿意看到，尽管资本主义使国家变得富有，却使工人们

遭受了痛苦。在英国、德国和法国，这些人考虑用别的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提出了各种建议，“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社会民主”，这些词大致上都是一个意思。这些改革家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问题出在工业的私有化以及控制权上。如果没有这种私有化，国家就可以拥有或控制工厂，或者一定程度上控制主要的生产方式，比如土地和主要产业，那么，工人们就不会有受剥削的危险了。因此，人们茫然地寻找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品。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退出的打算，它正变得越来越强大。

提出这些社会主义思想的都是知识分子，不过工厂主罗伯特·欧文则是一个例外。一段时间内，工人的工会运动在各处开展着，目的仅仅是争取较高的工资收入和较好的工作环境。工会运动自然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反过来，它也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主义在欧洲三大工业化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发展，随着每个国家工人阶级力量的大小和特点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总的来说，英国的社会主义比较保守，它相信可以通过渐进的方式取得缓慢的发展；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更加激进、更具革命性。在美国情况却完全不同，因为美国地域辽阔，对劳工的需求很大，因此很长时期之内，工人阶级运动并没有蓬勃地发展。

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二三十年时间里，英国工业主导了世界，英国从工业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并通过剥削印度和其他附属国获得了巨额财富。工人最终得到了这笔财富中的一部分，他们的生活水准达到了他们未曾想过的高度。繁荣与革命不会共存，英国工人以往的革命精神消失了。英国式的社会主义演变成了最温和的一种社会主义。它叫作“费边主义”（Fabianism），这个名称来自古罗马一位将军的名字，他主张避免与敌人正面决战，而是采用拖延战术，逐渐消灭敌人。1867年，英国的选举权范围进一步扩大，一些城市工人获得了选举权。由于工会蓬勃发展，表现优异，英国自由党（British Liberal Party）获得了劳工选票。

当英国为自己的繁荣沾沾自喜的时候，在欧洲大陆，一个新的信条得到了人们热情洋溢的支持。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这个词对不了解它的人来说，听上去似乎很可怕。无政府主义提倡，一个社会没有中央政府的统治，个人拥有极大的自由。无政府主义者有着异常远大的理想：“坚信无私、团结、为他人利益着想的社会理想必将实现。”国家不应对人民进行强迫和干涉。美国人梭罗（Toreau）说过：“无政而治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当人们准备好接受这样的政府时，这种政府就会存在。”注

这似乎是一个理想状态——每个人都是完全自由的，人们相互尊重，无私奉献，乐于合作——但是如今的世界充满了自私和暴力，已经远远达不到这种理想状态了。无政府主义者如此渴望政府不管事或少管事，是他们长期遭到独裁与专制统治迫害后的一种反抗。政府对人民实行压迫和暴政，因此人们不希望有政府存在。无政府主义者也认为，在社会主义的某些形式下，掌握所有生产方式的国家本身，也可能会实行专制暴政。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是社会主义者的一种，他们强调的是当地的、个人的自由。另一方面，许多社会主义者愿意把无政府主义者的信条当作一个遥远的理想，但他们认为，一段时间之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强大的国家集权政府依然有必要存在。尽管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但共性也不少，而且两者之间的共性正变得越来越多。

现代工业造就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无政府主义运动，从其本质来说，无法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运动。因此，工会等类似的组织在工业化国家中发展良好，但无政府主义观念在这些国家中则没有什么传播的机会。英国和德国都没有出现数量可观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在工业主义较为落后的南欧和东欧，这些思想就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当现代工业传播到南欧和东欧之后，无政府主义渐渐弱化。如今这种信条实际上已经没有生命力了，不过在非工业化国家，例如西班牙，仍能看到一定程度的无政府主义。

作为一种理想，无政府主义本该是高尚的，不过，它不仅为容易激动、对社会不满的人们提供了庇护，还为那些自私的、披着这个理想的外衣为自己牟利的人提供了庇护。而且，它还带来了暴力行为，如今在人们的脑海里，这种暴力行为已经与无政府主义联系在一起了，严重破坏了无政府主义的名声。无政府主义者无法像他们设想的那样，大规模地改变社会，于是一些人决定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宣传。这就是“行为宣传”，通过勇敢的抵抗暴政和自我牺牲的示范行为去影响其他人。在这种行为的鼓舞下，许多地方发生了叛乱。当时，参加这些叛乱的人们并不指望成功。出于自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采取了这种不同寻常的宣传方式。当然，这些叛乱都遭到了镇压，之后个别无政府主义者开始采取恐怖主义的手段，他们投掷炸弹，并且暗杀国家元首和高官。显然，这种愚蠢的暴力行为显示出无政府主义正在不断衰弱，正在走向绝望。到了19世纪末期，无政府主义运动便逐渐消失了。许多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赞成进行炸弹攻击和“行为宣传”，他们与这些行为划清了界限。

我要告诉你几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很有趣的是，大多数无政府主义领袖，在生活中都是极其温和、理想化、讨人喜爱的。最早的无政府主义领袖是法国人皮埃尔·蒲鲁东（Pierre Proudhon），生于1809年，死于1865年。有一位比他年纪略轻的是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的米哈伊尔·巴枯宁（Michel Bakunin），他是欧洲特别是南欧十分活跃的劳工领袖。他与马克思产生了分歧，马克思便将他和他的党羽开除出了国际工人组织。第三个人差不多与我们生活在同一时期，他就是俄国王子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atkin）。他著有一些无政府主义以及其他主题的书，都比较有意思。我要讲的第四个人，也是最后一个人，就是80岁的意大利人恩里科·马拉泰斯塔（Enrico Malatesta），他是19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

关于马拉泰斯塔有一个精彩的故事我必须讲给你听。他曾受到意大利一家法庭的指控。政府起诉人说，马拉泰斯塔对当地工人的影响

太大，完全改变了这些工人的性格。结果是，人们不再犯罪，当地的犯罪率大幅降低。如果没有任何犯罪行为发生，法庭该怎么办？因此必须把马拉泰斯塔送进监狱！他被判了6个月监禁。

不幸的是，人们几乎把无政府主义与暴力行为等同起来，忘记了它是一种哲学思想，忘记了它的理想目标曾吸引过很多优秀人物。我们目前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依然离这个理想目标很远，我们的现代文明对于无政府主义简单的解决方式来说，过于复杂了。

---

1. 译文引自《梭罗散文》，[美]梭罗著，苏福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57页。——译者注

133 ——卡尔·马克思以及工人组织的发展

大约在19世纪中期，欧洲的劳工与社会主义世界出现了一位引人注目的全新人物。在我以前给你写的信中提到过他，他就是卡尔·马克思。他生于1818年，是德国裔犹太人，学习过法律、历史和哲学。因为一份由他主编的报纸（《莱茵报》），他与德国当权者发生了冲突。他来到巴黎，接触了新的人群，阅读了有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新书后，他开始热衷于社会主义思想。在巴黎，他遇到了另一个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当时他定居在英国，是一位富有的工厂主，从事着不断发展的棉纺织业。恩格斯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感到不安和不满，他想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改进他所见到的贫困和剥削问题。罗伯特·欧文有关改革的思想和尝试吸引了他，他成了欧文的拥护者——欧文主义者（Owenite）。第一次与卡尔·马克思会面的巴黎之行，也让他发生了改变。自此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成了亲密的朋友和同事；他们年龄相仿，观点一致，都全身心地为了同一个事业而奋斗，合作也非常亲密，他们出版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两人合著的。

当时，由路易·菲利普执政的法国政府将马克思驱逐出了巴黎。他来到伦敦，并在伦敦生活了很多年。在伦敦期间，他就在大英博物馆里埋头苦读里面的藏书。他勤奋努力，不断完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将其写成了书。但他绝不是一位与世隔绝、只会杜撰理论的教授或哲学家。他一边为社会主义运动比较模糊的思想体系做阐释和说明，赋予它明确清晰的思想和任务，一边积极地领导、组织工人开展运动。欧洲的革命之年——1848年发生的事件给了他很大的触动。就

在这一年，他和恩格斯合作发表了一份非常著名的宣言——《共产党宣言》。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论述了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1830年、1848年起义背后的思想，并指出，这些革命和起义都准备不足，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他们批评了之后盛行的民主主义对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呼吁，指出这些对人们来说毫无意义可言，仅仅给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伪善的遮掩。然后他们简要地阐述了自己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宣言的结尾处，他们呼吁所有工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这是一次行动的召唤。马克思继续利用报纸和手册进行宣传，努力将工人组织联合起来。他似乎感觉到，欧洲将要面临一次巨大的危机，他希望工人们能为此做好准备，以便利用这次危机带来的机会。根据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会发生危机。1854年，在一份纽约的报纸中，马克思写道：

>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欧洲存在着第六个强权力量，在一定的时刻它将统治其他五个所谓的"强权"国家，使它们颤抖。这个强权力量就是革命。在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现在革命再一次受到危难和饥饿的召唤，冲向了战场……只需一个信号，欧洲第六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强权力量，将身披铠甲，手持利剑，勇往直前，就像奥林匹亚山上的女神密涅瓦（Minerva）一样。迫在眉睫的欧洲战争将会发出这个信号。

马克思有关欧洲很快将发生革命的预言没有成真。在他的文章发表60多年之后，一场世界大战让欧洲的一个地区发生了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一次革命的尝试，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它遭到了无情的镇压。

1864年，马克思在伦敦成功地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其中许多群体含糊地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有一些民主人士和爱国者，

他们来自受异国统治的欧洲国家，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比较淡薄，对国家独立更感兴趣；另一方面，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希望尽快开始作战。除了马克思，无政府主义领袖巴枯宁也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在遭受了多年牢狱之灾后，于三年前逃离了西伯利亚。巴枯宁的拥护者主要来自南欧的拉丁语系国家，比如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些国家在工业上都非常落后。他的拥护者都是失业的知识分子，以及与社会秩序格格不入的革命分子。马克思的拥护者则来自工业化国家，主要是德国，这些国家工人的状况要好一些。因此，马克思代表了不断壮大、组织严密、条件相对好的工人阶级，巴枯宁则代表了更贫穷和无组织的工人、知识分子和对社会不满的人。马克思倾向于耐心地用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对工人进行组织和教育，等待他认为即将到来的行动时刻。巴枯宁和他的拥护者则倾向于立即采取行动。在两者的冲突中，马克思赢得了胜利，建立了“国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人们将它简称为“第一国际”（the First International）。

三年后的1867年，马克思用德文写成的伟大的著作《资本论》问世了，这是他在伦敦长期埋头努力的结果。书中他分析了现有的经济理论，用大量篇幅阐述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一部纯粹的科学作品。他冷静而科学地论述了历史与经济的发展过程，避免了模糊的、理想主义的表述。他还特别论述了大机器时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在人类社会的进化、历史和阶级冲突等方面，得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结论。因此马克思这种全新的、阐述清晰又中肯的社会主义，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与长期盛行的“空想社会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马克思的《资本论》读起来并不轻松，事实上，这本书的阅读难度超出了想象。不管怎样，它是一本难得一见的好书，它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进而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1871年，巴黎公社的悲剧发生了，巴黎公社也许是第一个有意识的社会主义起义。它吓坏了欧洲国家的政府，使他们更加严酷地镇压工人运动。第二年，马克思建立的第一国际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大会上，马克思成功地将第一国际的总部转移到了纽约。他这么做显然是为了摆脱巴枯宁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追随者，也可能是因为，他认为巴黎公社引起了欧洲国家的愤怒，因此纽约比欧洲国家政府控制的地区更加安全。但是，远离了中心地带的第一国际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它的力量全部都在欧洲，即使在欧洲，工人运动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第一国际日渐衰落，最终只能解散了。

马克思主义或者叫马克思社会主义，主要在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之间传播，特别是在拥有社会民主的德国和奥地利。不过英国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当时的英国繁荣兴旺，不愿接受任何激进的社会信条。英国式社会主义的代表是费边社，它有一套进行点滴改革的温和计划。费边社成员不是工人，而是先进而自由的知识分子。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就是一位早期的费边社成员。费边社的策略可能来自另一位著名的费边社成员悉尼·韦伯（Sidney Webb）的名言：“不可避免的循序渐进。”

在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社会主义经过了12年才慢慢恢复了元气，重新活跃起来。不过它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的，一种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混合的产物——“工团主义”（syndicalism），这个名称来自法语的“工会”（syndicat）一词。社会主义理论认为，代表整个社会的国家应该掌握和控制生产方式——也就是土地和工厂等。至于社会化能达到何种程度，人们的意见不一。显然，像工具、家用机器这样的私人物品是很难进行社会化的。不过社会主义者的一个观点得到了认可，那就是，任何可以被使用并通过他人的劳动为个人创造利润的东西都应该归公，也就是所有权归国家。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不喜欢国家，都试图限制国家的权力。他们希望每个产业都由产业内的工人以及工会来控制。他们的想法是，各种产业工会

选举出代表，组成一个总会，这个总会负责监管全国事务，发挥类似议会的作用，处理综合事务，但无权干涉产业内部的安排。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工团主义者支持大罢工，使全国陷入了停顿状态。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赞同工团主义，但奇怪的是，在马克思死后，工团主义者竟然把马克思视作了他们的一员。

就在50年前的1883年，卡尔·马克思去世了。到那时为止，强大的工会组织已经在英国、德国以及其他工业化国家发展起来了。英国工业最辉煌的时期已经过去，在与不断强大的德国和美国的竞争中，英国走了下坡路。当然，美国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因此它的工业发展迅速。在德国，政治独裁（而它的议会是软弱无力的）和工业增长奇特地混合在了一起。俾斯麦执政期间以及之后的德国政府，从多个方面促进工业的发展，希望通过社会改革和改善工人的状况来拉拢工人阶级。英国自由党（English Liberals）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他们批准通过了一些社会改革措施，减少了工人的工作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境况。在国家繁荣的前提下，这个方法非常奏效，英国工人继续保持着温和、顺从的态度，忠实地为自由党投票。不过在19世纪80年代，由于其他国家的竞争力提高了，英国长期的繁荣兴旺走到了尽头，英国贸易出现了萧条，工人的工资也降低了。因此，工人阶级再一次觉醒，革命潮流再次风生水起。许多英国人开始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

1889年，人们尝试成立了一个新的国际工人联合会。这时候，许多工会组织和劳工政党都很强大了，而且非常富有，内部还出现了大量领取薪酬的官员。这个成立于1889年的国际工人联合会[我想它的名称应该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Labour and Socialist International）]，被称为“第二国际”（the Second International）。它持续了25年，直到世界大战爆发，才面临了真正的考验，不足之处才显现出来。第二国际中许多级别较高的人日后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都成了高级官员。有一些人把工人运动当作提高自己

地位的垫脚石，达到目的之后就抛弃了工人运动。他们成了首相、主席之类的高官，他们的人生是成功的；但是他们抛弃了曾经帮助他们成为高官、对他们深信不疑的劳苦大众，这些大众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即使是那些以马克思之名宣誓过的领袖或是热情的工团主义者，也都进入了议会，或者成了收入很高的工会领导人，他们越来越不愿意放弃自己舒服的地位而投身到鲁莽的革命事业当中。因此，他们变得悄无声息，而当工人出于绝望，准备采取大规模行动的时候，他们则出面压制。德国的社会民主人士（在战后）成了共和国的主席和总理；在法国，原本热衷于工团主义、支持大罢工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担任过11次法国总理，镇压过一次由他以前的同志发起的罢工。在英国，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成为首相后，就与他原先所在的工党（Labour Party）决裂了；这样的情形同样发生在瑞典、丹麦、比利时和奥地利。如今的西欧到处都是独裁者，而当权的人早期都曾是社会主义者，但随着年纪的增长，他们变得飘飘然了，忘记了原本对所追求事业的热情，有时甚至与原来的同志为敌。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Mussolini），原本是社会主义者，波兰独裁者毕苏斯基（Pilsudski）也是如此。

工人运动以及几乎所有的民族独立运动都因领袖和杰出人物的背叛而元气大伤。一段时间之后，长期的失败让工人们精疲力竭，殉道者获得的空洞荣誉也不再具有吸引力。他们沉寂下来，变得毫无生气。那些更加有野心和手段的人，则走向了对立的一方，与他们曾经反对和打击过的人达成了个人之间的休战。一个人可以很轻易地为了他想做的任何事，让自己的良心做出妥协。工人运动在这样的背叛下遭遇了一些阻碍，而且由于那些压制劳工和民众的人掌握了这种心理，他们尝试用各种优厚条件和花言巧语将工人一个个争取过来。但是针对个人的优厚条件或者花言巧语，并不能给工人大众或一个受尽压迫、争取自由的民族带来宽慰。因此，尽管遭遇了背弃和阻碍，这场斗争依然在朝着既定目标前进。

1889年成立的第二国际，在人数和声望上都在不断增长。几年之后，马拉泰斯塔带领下的无政府主义者，被第二国际拒之门外，因为他们拒绝投票给议会。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宁愿与议会修好，也不愿与原来的同志共同奋斗。关于欧洲战争中社会主义者应承担的责任，他们做出了勇敢的宣言。在为事业奋斗的过程中，社会主义者是不分国籍的，他们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曾对战争表示过反对。但是当1914年战争爆发的时候，第二国际瓦解了，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劳工政党，甚至连克鲁泡特金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和其他人一样，成了怨恨其他国家的狂热民族主义者。只有少数人在坚持抵制战争，因此这些人遭受了各种苦难，包括长期监禁。

战争结束后，1919年，列宁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新的国际工人联合会。它是一个纯粹的共产主义组织，只有宣过誓的共产主义者才能加入。如今它依然存在着，被称为“第三国际”（Tird International）。第二国际残留的一些人在战后慢慢地又聚到了一起。一部分人联合起来，加入了莫斯科的第三国际，但大部分人强烈厌恶莫斯科以及第三国际的纲领，拒绝靠近莫斯科。他们重新恢复了第二国际，这个组织如今也依然存在着。因此目前有两个国际工人组织，即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奇怪的是，尽管两者都奉行马克思主义，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他们有着各自的解读，而且他们相互之间的怨恨甚至比对共同敌人——资本主义的怨恨还要大。

这两个国际工人联合会并没有将世界上所有的工会和工人组织都包括进来。许多工会和工人组织并没有参与其中任何一个联合会。美国工会中的大部分人都非常保守，因此他们与两个联合会保持着距离。印度工会也没有参与其中任何一个联合会。你也许知道《国际歌》（*Internationale*），它是全世界公认的工人与社会主义者之歌。

134 ——马克思主义

在上一封信中我给你讲了一些马克思的思想，他的思想在欧洲社会主义世界里引起了骚动。但那封信已经够长了，我只能在这封信中接着讲这个内容。对我来说，写这个话题并不轻松，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并且专家和博学者又恰恰是不同的。我只能避开比较难懂的部分，告诉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特点。这会让你读起来很别扭，不过我给你写这些信的目的，并不是要详细完整地给你描述任何事情。

我告诉过你，社会主义有许多种类。不过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由国家控制生产方式，即土地、煤矿、工厂等；控制分配方式，如铁路等；以及控制银行及类似的机构。它的思想是，个人不应该利用这些方式或机构来剥削他人的劳动，获取个人利益。如今这些方式或机构大部分归个人所有，归个人使用，致使一部分人生活富裕起来，而整个社会则困苦不堪，大众百姓依旧贫穷，而且大部分拥有和控制这些生产方式的人，如今都把精力投入到了相互之间的激烈竞争之中。如果没有这样的私人战争，取而代之的是合理安排的生产和考虑周全的分配，那就会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和竞争，存在于各种阶级和种族之间的巨大财富差距也会消失。因此，生产、分配以及其他重要的经济活动，都应该大规模地社会化，由国家——也就是由全体人民控制。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或政府形式应该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尽管也非常重要，但目前我们还不需要深入探究。

社会主义的目标原则得到认同之后，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人们怎么实现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者之间意见不一致，不同的群体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他们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主张缓慢改变的改良派。他们相信，可以一步一步地通过议会，比如通过英国工党和费边社成员，达到目的。第二类是革命派。他们不相信能够通过议会取得成效。后一类群体中，大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

前一种改良派的规模现在已经很小了，即使是英国的改良派，其力量也在削弱，他们与自由党以及其他非社会主义群体之间的差别正在逐渐变小。所以，马克思主义如今可以说是社会主义者的总纲领。不过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存在两个主要的分支——其中一方是俄国共产主义者，另一方是德国、奥地利以及其他地区原本的社会民主人士——这两方之间依然相互爱戴。这些社会民主人士，由于未能在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践行自己的信念，因此失去了以前的威望。他们把热情转移到了共产主义者身上，但是依然控制着西欧大型的工会组织。共产主义由于在俄国取得了成功，而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信条。如今在欧洲和全世界，共产主义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

那么，马克思主义又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理解历史、政治、经济、人类生活和人类需求的方式。它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行动号召。它是对人类生活中的大部分活动发表看法的一种哲学思想。它试图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类发展收纳在一个严格的逻辑系统中，使其发展命运遵循一定的必然性。人类生活是否很有逻辑性，是否遵循严格的规则和体系，答案似乎并不明显，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但是马克思从科学的角度研究了过去的历史，并从中得出了一定的结论。他发现，在人类早期，人们为了生存，与大自然和自己的同胞进行斗争。人们为了获得食物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而劳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生产方式渐渐发生了改变，变得更加复杂和先进。马克思认为，这些创造谋生手段的生产方式，是每个时期的人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它们主导了每一个历史阶段，影响了当时所有

的人类活动和社会关系，并且随着它们的改变，巨大的历史和社会变革也随之产生。在我给你写的这些信中，我们追溯过一部分由这些变化带来的重大影响。例如，当农业最初形成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游牧民族定居下来，村庄和城市发展起来，随着农业产量的提高，农产品有所剩余，人口得以增加，人们获得了财富，也有了闲暇时间创造艺术和工艺品。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工业革命，大机器的出现带来了另一个巨大的改变。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生产方式符合人类发展的特定阶段。在生产过程中以及作为生产活动的一个结果，人们相互之间产生了特定的联系（比如实物交换、采购、销售、商品交易等），这些联系与人们的生产方式是相适应、相契合的。这些联系集合起来就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了法律、政治、社会惯例、思想以及其他所有的事物。因此，依照马克思的这个观点，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经济结构也会发生变化，人们的思想、法律、政治等都会随之发生变化。

马克思也认为，历史记录了各种阶级之间的斗争。“从古至今，一切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控制生产方式的阶级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个阶级通过剥削其他阶级的劳动为自己牟利。那些付出劳动的人并没有获得劳动的所有价值。他们只得到了满足最低需求的一部分价值，而剩余的价值则被剥削阶级占为己有。所以，剥削阶级由于获得了剩余价值而变得富有。国家政府受控于这个掌握生产的阶级，国家的首要目的就变成了保护这个统治的阶级。马克思说：“国家就是管理整个统治阶级事务的执行机构。”法律是为此目的而制定的，教育、宗教以及其他方式也引导人们相信，这个阶级的统治是合理而自然的。这些做法都是为了掩盖政府和法律的阶级特征，让其他受剥削的阶级难以发现事情的本质，以免他们产生不满。如果有任何人产生了不满，想要挑战这个制度，他就成了社会和道德伦理的敌人，成了悠久传统的破坏者，将会受到国家的镇压。

但是，无论怎么努力，一个阶级不会永远保持统治地位。使它占据统治地位的因素如今开始对它起反作用了。由于控制了当时的生产方式，它成了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如今随着新的生产方式的涌现，控制这些生产方式的新阶级开始占据突出地位，他们拒绝受到剥削。新的思想打动了人们，这场意识形态革命打破了旧思想和教条的镣铐。于是这个崛起的阶级与原来的、不愿放弃权力的阶级之间产生了冲突。新阶级夺得了必然的胜利，因为现在它控制了经济权力，而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作用的旧阶级，则渐渐衰落了。

新阶级取得的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成功，这象征了新的生产方式的胜利。在此之后，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新的思想、新的政治结构、法律、惯例等所有的事物都受到了影响。这个新阶级此刻开始剥削其他低于它的阶级，直到它被这些受剥削阶级中的一个取代。因此，这场斗争持续进行着，直到阶级之间不再有剥削。只有当阶级差别消失了，只剩下一个阶级的时候，这场斗争才会结束，因为那样就不存在剥削的机会了。唯一的阶级不会自我剥削。只有那样社会才能平衡，才会有充分的合作，而不会像现在这样充满了永无休止的斗争和竞争。国家的一个主要任务——高压政治，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需要压制的阶级不存在了，因此国家也会逐渐“衰亡”。这样一来，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就会实现。

马克思认为，历史宏大的演变过程是由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带来的。他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和细节，向我们描述了这一切是如何产生的；在过去，封建时期如何演变为有大机器出现的资本主义时期，以及封建阶级如何让位于资产阶级。他认为，最后一场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进行着。资本主义本身使工人阶级得以产生，使这个阶级的数量和力量不断增加，最后它将会颠覆资本主义，创造无阶级的社会，实现社会主义。

马克思阐释的这种看待历史的观点，被称为“唯物史观”。它是“唯物论”，而非“唯心论”，这是马克思时期的哲学家经常用来表达特殊意义的一个词。在那个时期，十分流行进化的观念。我曾经告诉过你，达尔文使人们普遍接受了有关物种起源和发展的进化论。但是，它并没有解释人类的社会关系。一些哲学家尝试通过含糊的、有关精神发展的唯心主义观念，来解释人类的进步。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模糊的凭空推测以及唯心主义在他看来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样会使人们幻想出各种没有现实基础的事物。因此，他用科学方法继续剖析现实。由此产生了这个词，“唯物主义者”。

马克思不断提到剥削和阶级斗争。我们中的许多人对身边发生的不公平感到气愤不已。但是，马克思认为，对于这种事，愤怒或谏言都没用。剥削并不是剥削者的错。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是历史发展的正常结果，在恰当的时候，这种统治会发生调整。如果一个人属于统治阶级，并依此剥削别人，这对他来说并不是可怕的罪过。他是制度的一部分，让他背负冷酷无情的名声是荒唐的。我们太容易忘记个人与制度之间的区别了。印度处于英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我们用尽全力与英帝国主义做斗争。但是我们不应该责备那些身处印度的、支持这个制度的英国人。他们只是一台大型机器中一个个不起眼的齿轮，他们无力改变整个机器的运转。同样，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印度地主拥有的土地管辖制已经过时了，佃户在这种制度下遭到了严重剥削，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同样，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地主应该受到责备，那些经常被指责为剥削者的资本家也不应该受到责备。错误永远归咎于制度，而非个人。

马克思并没有宣扬阶级矛盾，他只是告诉人们，阶级矛盾是实际存在的，并且以各种形式存在着。他写《资本论》的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揭示出这些规律，也就揭示出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激烈矛盾。这些阶级矛盾并不总像阶级斗争那样突出，因为统治阶级总是竭力隐藏自己的阶级特征。不过，当现有制度受到威

胁时，统治阶级会卸下所有的伪装，露出真实的一面，阶级之间就会公开交战。这个时候各种形式的民主、法律规范和议事程序都消失不见了。有些人说，这些阶级斗争不是由意见分歧或政治煽动者的恶行引起的，它们是社会的固有特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暴露出来以后，阶级斗争也随之加剧。

让我们将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和印度目前的状况做一下比较。长久以来英国政府反复强调，英国统治印度是出于正义，目的是使印度人民获益；毫无疑问，过去我们的同胞都相信，英国的这种说法多多少少是有些真实性的。但是现在，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极大地挑战了这种统治，使它的真实本性暴露无遗，人们现在看清了它的真面目，那就是帝国主义以武力为后盾，对人们进行剥削。一切漂亮形式和动听语言的伪装都被揭开了。国家将一些特别法令写入惯用的法律法规和诉讼程序，并且禁止正常的话语权、集会权和新闻出版权。对现有权威的挑战越大，这样的情况就发生得越多。当一个阶级严重威胁到另一个阶级的时候，情况往往也是如此。如今我们的国家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农民、工人以及为他们卖力的其他人，受到了残暴的判决。

马克思的历史观认为，社会是不断变化、不断前进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情况。历史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无论发生什么，它都不可避免地会向前发展；同时，一种社会制度会被另一种代替。不过，只有当一种社会制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发展之后，它才会消失。当社会的发展超出了这个范围的时候，社会就穿不下旧制度这件束缚它的外衣了，于是它自然会撕去旧制度的外衣，换上全新的、更大一些的衣服。

马克思认为，人类注定要在这巨大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之前的时期都已经过去了。最后一次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在进行。（当然，这发生在资本主义

发达的先进工业化国家。其他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发展滞后，因此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斗争有着不同的、混杂的特质。不过从根本上说，由于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即使是在这些国家，阶级斗争也正以某种形式进行着。）马克思说，由于资本主义内部缺乏平衡，因此资本主义会面临重重困难和危机，直到垮台。在马克思写下这些内容后，至今已过去了60多年，这期间，资本主义经历了许多危机。但是，它没有在危机中消亡，反而生存了下来，并且变得更加强大了，但是俄国除外。资本主义在俄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目前，正如我写的一样，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似乎都已病入膏肓，已无药可救了。

据说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延续到今天，有一个因素或许连马克思都没有充分考虑到。这就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对帝国殖民领土的剥削。这给了资本主义新的生命，使之繁荣，当然，代价是贫穷的国家受到了沉重的剥削。

我们经常谴责当今资本主义制度下富人对穷人的剥削以及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这无疑是事实，并不因为这是资本家的错，而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就以剥削为基础。同时，我们不要误以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新鲜产物。在过去各个年代，在所有的制度下，剥削都是工人和穷人所承受的、沉重而不变的际遇。的确可以这么说，尽管资本主义的剥削依然存在，人们现在的境况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好了。但这种说法还不够全面。

列宁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倡导者。他不仅详细讲解和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还亲身践行了马克思主义。不过，他也提醒我们，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个僵死的教条。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深信不疑，他并没有不假思索地接受它的每个细节，或者将它的细节应用到所有地方。他告诉我们：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来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注

在这封信中我试着给你讲了一些有关马克思理论的内容，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所讲的这些零星拼凑起来的内容，也不知道这些内容能不能给你传递一些清晰的观点。掌握这些理论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们正改变着如今众多的人，并且也许对我们自己的国家会有所帮助。俄罗斯这个了不起的国家，以及苏联的其他地方，都把马克思当作他们的先知，如今世界上遭受了不幸，正在寻求解脱的人们，也希望从马克思身上找到启发。

我要引用英国诗人丁尼生（Tennyson）的诗句结束这封信：

旧秩序让位于新秩序，

上帝以各种方式实现自己，

以免一个好的习惯将世界腐化。

1. 译文引自《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译者注

135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

在我给你写的有关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信中我指出过，英国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最温和的社会主义类型。在当时欧洲盛行的意识形态中，它是革命程度最低的一种，它期盼渐进地、一步步地改善现状。有时社会发生贸易不景气、贸易萧条、失业率上升以及工资下降等情况，人们会因此受到打击；当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英国也会出现革命浪潮。但是，如果现状变好了，这种革命浪潮就会消退。英国19世纪的兴旺繁盛与英国的这种克制思想有密切的联系，因为繁荣与革命并不共存。革命意味着巨大的变化，而那些对现状相当满意的人并不愿意轻率地冒险，参与一个不太可能帮助他们改善现状的冒险事业。

19世纪的确是英国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世纪。18世纪，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取得了领先地位，建造的新工厂超过了其他国家，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都保持着这样的领先地位。像我说过的那样，英国成了世界工厂，从遥远国家获得的财富涌入了英国。对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剥削使它能够不间断地获得丰富的贡品，并使它的威望大幅提高。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在变化的时候，英国似乎没有发生任何革命，它像石头一样坚硬和牢固。在英国，危机时不时也会发生，不过，只要给更多人提供选举权，就能化解这些危机。同时，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在法国，共和国和帝国这两种制度快速地更替着；在意大利，经过长期的分裂之后，一个将整个半岛联合起来的新国家崛起了；在德国，一个新的帝国产生了。小一些的国家，比如比利时、丹麦和希腊，也在各个方面发生着变化。在奥地利，欧洲最古老的王室家族哈布斯堡王朝，不断地遭到法国、意大利和普鲁士的攻打。只有东边的俄国似乎没有什么改变，依然由沙皇进行独裁统治，就像莫卧

儿帝国一样。但是俄国在工业上十分落后，是一个农业国家；它还没有呼吸到新思想和新工业的气息。

英国的财富、帝国以及海上霸权使它在欧洲和全世界占据了主导地位。英国是世界领先的国家，它的触角遍及世界各地。美国自身的麻烦依然存在，因此比起国际事务，它更加关注国家内部的发展。交通运输方式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世界因此显得更小、国家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了。这些变化也帮助英国加强了对遥远领土的控制。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英国的政体依然保持不变，仍是君主立宪制——即君主的权力较小，议会的地位最高。最初，议会是由少数地主以及有钱的商人选举出来的，但是，在19世纪的进程中，每当危机出现的时候，英国为了避免麻烦，就赋予越来越多的人选举权。

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英国都是由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她是德国汉诺威（Hanover）王室成员，18世纪，这个王室诞生了几位名为“乔治”的英国国王。1837年，18岁的维多利亚继位，她在位长达63年，直到世纪交替的1900年为止。英国的这段时间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Age）。维多利亚女王目睹了欧洲及其他地方许多重大的变化，看到了众多新旧事物的交替。她见证了欧洲的革命、法国的变化、意大利王国以及德意志帝国的崛起。当她去世的时候，她几乎成了欧洲以及欧洲君主们的祖母。不过，和维多利亚同一时期的，欧洲还有一位与她经历十分相似的统治者，他就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弗朗茨·约瑟夫国王。他在革命之年——1848年继位的时候，同样也是18岁，那时的奥地利帝国已经摇摇欲坠。他在位68年，成功地将奥地利、匈牙利以及其他地区联合起来，并纳入了自己的统治。但是，世界大战终结了他的帝国以及他的统治。

维多利亚更加幸运，在执政期间，她目睹了英国实力的提高，也见证了大英帝国的扩张。当她继位的时候，加拿大发生了动乱。在殖民地的公开叛乱中，许多殖民者想要脱离英国，加入比邻的美国。但

是英国从美国战争中吸取了教训，连忙安抚加拿大人，给他们极大程度的自治权。不久之后，这种自治权发展成了完全的自治权。这是帝国的一种新型尝试，因为自由和君权是无法共存的；不过，英国迫于形势也只能这么做，否则它就会失去加拿大这片领土。由于大部分加拿大人是英国后裔，因此加拿大与它的宗主国之间的感情纽带很坚固。这个新国家有着大片未开发的土地以及稀疏的人口，因此它不得不依赖英国制造业以及英国投资帮助其发展。因此，两国之间在利益上并无冲突，两国之间奇特而新颖的关系也没有受到过任何压力。

19世纪后期，这种给予英国海外殖民地自治权的方式，延伸到了澳大利亚，一直到19世纪中期，澳大利亚都是英国犯人的海外流放地。到了19世纪末，澳大利亚已经成为大英帝国中一个拥有自治权的自由领土。

另一方面，英国加强了对印度的控制，英国通过一次次的军事征服，扩张了英属印度帝国。印度是英国的附属国，它完全没有自治权。1857年的起义遭到镇压后，印度被迫完全接受了大英帝国的统治。我在以前的信中告诉过你，英国是怎样通过各种方式剥削印度的。当然，印度是大英帝国的领土，为了向世界宣告这一事实，维多利亚女王获得了“印度女皇”的头衔。不过，除了印度，英国在世界上各个地方还有其他许多较小的附属国。

于是，大英帝国成了由两种国家类型组成的奇特混合物：其一是日后成为自由领地的自治国，其二是附属国和受保护国。前者是宗主国的家族成员，某种程度上他们认同宗主国的领导地位；后者则完全是当权者的仆人和奴隶，他们受到鄙视、虐待和剥削。自治领地的人口是由英国人、其他欧洲人以及他们的后裔组成的，而附属国中则没有英国人或欧洲人。大英帝国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之间一直到现在还存在着这种区别。

英国拥有如此多的财富以及如此庞大的帝国，它几乎是一个称心如意的强国了。但也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帝国主义的本能就是永远不满足于现有的领域，永远想要对外扩张。然而，英国最大的担忧不是继续获取其他领土，而是保护现有领土。尤其是印度，英国将其视为珍贵的领土，想要一直控制下去。英国所有的外交政策都是围绕它的领地印度以及通往东方的航线安全而制定的。英国干涉了埃及的事务，并最终控制了这个国家；同样，它也干涉了波斯和阿富汗的事务。英国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它买下了苏伊士运河公司（Suez Canal Company）的股份，由此获得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

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大国并没有给英国带来任何烦恼，因为这些国家自身麻烦重重，而且经常相互开战。英国继续玩着它的传统把戏，通过挑起其他国家之间的争斗，利用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对抗，保持着欧洲的平衡。法国的拿破仑三世是个危险人物，不过他最终还是溃败了，法国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了实力。德国的资历较浅，还不是一个危险的对手。不过，有一个国家似乎对大英帝国构成了威胁，那就是沙皇俄国，虽然它发展滞后，但它依然是地理意义上的一个大国。当英国在印度和南亚扩张的时候，俄国也在北亚和中亚进行扩张，俄国的边境离印度并不远。对英国来说，俄国近在咫尺，成了它无法摆脱的噩梦。讲到印度的时候，我曾经告诉过你，英国入侵阿富汗以及阿富汗战争，这些几乎都是因为英国惧怕沙皇俄国才发生的。

英国和俄国也在欧洲大打出手。俄国渴望拥有一个全年开放的优良不冻港。尽管俄国的领土幅员辽阔，但它所有的港口都在北极圈附近，一年中的一部分时间里，这些港口是冰冻起来的。在印度以及阿富汗，俄国受到英国的阻挠，无法接近海洋，在波斯也是如此。由于土耳其拥有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达达尼尔海峡，因此黑海也无法通行。以前俄国曾经想要夺取君士坦丁堡，但是土耳其人太强大了，俄国根本打不过他们。现在，土耳其人实力变弱了，俄国觊觎许久的战

利品几乎唾手可得。它想夺取这个战利品，但是英国出于自私的理由，声援了土耳其人，阻碍了俄国的行动。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以及之后另一场战争的威胁，使俄国节节败退，无法再靠近。

正是在1854至1856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率领一批勇敢的女性志愿者来到前线护理伤员。这在当时真是难得一见，因为在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女性都是不喜欢出门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给这些女性树立了主动参与服务工作的新榜样，使她们从自己的绘画室中走了出来。因此，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女性运动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英国的政体是所谓的君主立宪制或者叫作“虚君共和”。这意味着君主没有实际权力，他们只是受议会信任的政府部长们的传声筒。政治上，他（或她）应该是部长们手中的傀儡；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高于政治”的。事实上，任何有才智、有志向的人，都不会甘愿仅仅当一个傀儡，英国国王或女王有很多机会干预公共事务。通常这样的干预是在幕后进行的，公众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很久以后他们才知道。公开的干预行为会受到人们的厌恶，也会危及君主立宪制政体。立宪君主必须具备的一个特质就是处事圆滑；如果他有这种特质，他就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并在许多方面体现自己的存在感。

从宪法和法律上说，共和政体的总统（比如美国总统）比议会国家的君主拥有更大的权力。但是，前者的变动很频繁，而后者则长时间保持不变，并且可以在暗中不断对各类事务施加影响。国王也有很多机会施诡计或者施加社会压力，因为他是社会中地位最高的人。事实上王室的整个氛围反映出的是独裁主义、地位、头衔和阶级，这给整个国家设定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不符合社会平等和废除阶级的要求。毫无疑问，英国王室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英国人的思想，让他们接受了社会的阶级划分。或许更确切地说，由于人们接受了阶级之间地位的高低差别，王室制度才得以在英国存在，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

大国中，这种制度都消失了。有句俗语“每个英国人都爱贵族”，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在欧洲、美洲以及亚洲，除了日本和印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阶级差别像英国那样大。奇怪的是，过去英国在政治民主和工业化中处于领先地位，而现在英国的社会却如此滞后、如此保守。

英国议会被称为“议会之母”（Mother of Parliaments）。英国议会有着悠久和光荣的历史，在很多事情上它都成了与国王独裁统治做斗争的先锋。独裁统治被议会的寡头政治所替代——也就是由一个小规模的地主和执政阶级统治。之后民主政治声势浩大地出现了，经过多次争夺，大多数百姓获得了投票选举下议院成员的权利。事实上这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民主控制权，带来的只是富有的工业家对议会的控制权。这是财团统治，而非民主政治。

英国议会发展出了一套奇怪的执政和立法体制。这就是“两党制”。两个政党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坚持的原则并不相互对立。两者都是富人的政党，他们都接受现有的社会制度。其中一个政党中有许多传统的地主阶级成员，另一个政党中有更多富有的工厂主。以前它们分别叫作“辉格党”（Tories）和“托利党”（Whigs）；后来，19世纪的时候，它们分别被称为“保守党”（Conservatives）和“自由党”（Liberals）。

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则大为不同，拥有不同思想和政见的党派之间，在议会内外常常产生激烈的对抗和斗争。但在英国，这些斗争都像是家庭事务，对立本身变成了一种合作，每个政党轮流担任执政党和在野党。由于两大政党都是富人政党，所以富人和穷人之间真正的阶级冲突和不合，都没有在议会中表现出来。没有出现引起人们热情的重大宗教问题，也没有出现任何种族或民族问题（像欧洲大陆上发生的那样）。19世纪后期，爱尔兰民族主义分子带来了唯一真正刺激的因素，因为爱尔兰的自由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民族问题。

这两大政党都参选议会成员，因此独立的个人和小团体很难当选。尽管有民主和选举权，但贫穷的选举人在选举中几乎没有发言权。他们要么投票给其中一个政党的候选人，要么待在家里不投票。议会中这两个政党的成员也几乎没有自主权，他们必须执行党派首领的命令，进行投票表决，除此之外什么也做不了。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维持党内团结，发展党派实力，击败对手，从而获得执政权。这种团结一致对政党自身发展来说无疑是好事，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民主。

我们看到，甚至在英国——这个被视为民主进步榜样的国家，民主也没有取得耀眼的成功。政府的一大问题，即人们应该怎样选举出最好的人进行执政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在行动上，民主的表现就是呼喊和公开演讲，或者是贫穷的选举人受人诱导，选择一个他们并不了解的人。大选成了一场兜售各种承诺的公开拍卖。然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这种虚伪的民主仍然得以继续存在，因为英国的发展欣欣向荣，英国的繁荣给这种制度带来了生机，也给人们带来了一定的满足感。

19世纪下半叶，英国政党的两位重要领袖是迪斯雷利和格莱斯顿（Gladstone）。迪斯雷利是保守党领袖，他多次出任英国首相，后来成为比肯斯菲尔德伯爵（Earl of Beaconsfeld）。这对他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他是一个没有人脉关系的犹太人，而英国人不喜欢犹太人。他完全凭自身的能力和毅力克服了别人对他的偏见，努力冲到了前面。他是一位十足的保皇派，正是他使维多利亚当上了印度女皇。格莱斯顿出身于一个英国富商家庭。他是自由党领袖，也多次出任英国首相。在帝国主义以及外交政策方面，迪斯雷利和格莱斯顿之间没有任何民族分歧。不过，迪斯雷利坦率地表明自己拥护帝国主义的立场；而格莱斯顿作为一个典型的英国人，用漂亮的言辞和虔诚的演说，掩盖了自己拥护帝国主义的立场，他似乎想要证明，自己做所有事情都以上帝的意见为准。他领导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运动，带领

民众反对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的恶行，当然，迪斯雷利站在完全对立的一面，支持土耳其人。实际上土耳其人以及巴尔干半岛上臣服于他们的其他国家都应受到谴责，他们双方轮流进行了可怕的肆意屠杀。

格莱斯顿也支持爱尔兰自治（Home Rule for Ireland），但他没有成功，他的做法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连自由党自身都分裂了，其中一部分加入了保守党，现在叫作“统一党”，因为他们想继续完成与爱尔兰的统一。我还要在下一封信里告诉你更多有关这个话题的内容，再告诉你一些维多利亚时代发生的事情。

136 ——英国成为世界的债权国

英国19世纪的繁荣昌盛主要源自它的工业，以及它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剥削。英国的财富不断增长，主要得益于四大产业，或者称为“基础产业”，即纺织业、煤炭业、钢铁业以及造船业。许多其他产业，无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都是围绕这几个产业发展起来的。人们盖起了众多大型商务楼和银行大厦。几乎在世界上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英国商船的身影，这些商船不仅装载了英国的商品，也装载了其他工业化国家生产的商品。它们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商品运输工具。伦敦劳埃德海上保险协会的办公地成了世界级的航运中心。这些产业和行业的代表在英国议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大量财富涌入了英国，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变得越来越富有；工人阶级也获得了其中一部分财富，他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富人们如何处理他们获得的财富呢？他们不会愚蠢地把财富放着不用，相反，他们每个人都在积极助推工业的发展，这样就会生产出更多的商品，他们也会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些财富中的一大部分被投入到了英国和苏格兰的新工厂、铁路以及类似的工程上面。不久之后，工厂的数量趋于饱和，整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也达到了巅峰；随着竞争的不断加剧，利润率自然下降了。于是有钱的资本家放眼海外，希望找到利润更大的投资领域和更多的机遇。整个世界人们都在建设铁路、电缆、电报线路以及工厂。英国将剩余的财富投入到欧洲、美洲、非洲以及英国附属国的类似工程之中。拥有丰富资源的美国正在快速发展，美国人将大量的英国投资用于建设铁路等工程。在南美，特别是在阿根廷（Argentine），英国拥有大量的种植园。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是利用英国的资本建设起来的。我也给你讲过一些发生在中国的租

借地之战的内容。在印度，英国无疑占据着统治地位，它贷款给印度，用于建设铁路以及其他工程，并要求印度接受它所提出的苛刻条件。

因此英国成了世界的债权国，伦敦则成了世界的资金市场。不过，别以为放债就是把装满黄金、白银或者现金的巨型钱袋子从英国运到其他国家。现代商业的经营方式并不是这样的，而且用于流通的黄金和白银也没有那么多。只有愚蠢的人才把黄金和白银看得很重，其实它们只不过是一种交易工具和商品流转工具而已。黄金和白银不能吃，不能戴，也不能用，当然，它们可以用来做装饰品，不过这对人们来说没什么用。真正的财富在于拥有实用的商品。所以，当英国，或者更确切地说，英国资本家贷款给别人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对外国工业或铁路进行了投资，这种投资输出的并不是现金，而是英国商品。因此，英国将自己生产的机器或修建铁路的原材料源源不断地运到了外国。这不仅对英国工业有帮助，同时给英国投资者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将他们手中的盈余进行投资，并获取可观的收益。

放债是一桩很合算的买卖；英国放债越多，它就越有钱。一个完全依靠放债获得利润或红利的有闲阶级，因此发展了起来。他们不需要工作，也不必生产任何东西。他们拥有某个铁路公司或茶叶种植园等企业的股份，可以得到固定的分红。英国有闲阶级人士侨居在许多受人欢迎的地方，例如法国的里维埃拉、意大利和瑞士；不过大部分依然待在英国。

所有从英国借钱的国家是怎样支付贷款利息或红利的呢？同样，它们也不能用黄金或白银支付。它们没有足够的黄金或白银用于年复一年地支付利息。因此，它们用商品进行支付，由于英国本身就是领先的制造业大国，因此它们支付的不是工业制品，而是食品和原材料。大量的货物，如小麦、茶叶、咖啡、肉、水果、葡萄酒、棉花、羊毛等，源源不断地流进了英国。

两国之间的商业往来是由相互间的物品交换组成的。一个国家总是买入商品、另一个国家总是卖出商品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买入的一方必须用黄金或白银支付货款，很快黄金或白银就会所剩无几，即使是单向贸易本身，也总有一天会停止。在双向贸易中，交易也会进行自我调整，这种交易有时对一个国家有利，有时对另一个国家有利。如果细细考察19世纪英国的贸易，我们会发现，总的来说，英国获得的商品比输出的要多。也就是说，尽管英国出口了大量商品，实际上它进口的商品价值更大，它进出口的商品种类也不同，出口的是工业制品，进口的主要是食品和原材料。因此，表面上看，英国买入的商品比卖出的多，这似乎不是一个好的商业经营方式。但是，过量的进口商品其实是英国获得的贷款利息，也是债务国以及印度这样的附属国向英国表示敬意的方式。

英国并没有拿回所有的投资收益。一部分收益留在了债务国，由英国资本家进行再次投资。这样可以保证英国在不追加新资金或商品的情况下，海外投资总量能持续不断地增长。在印度，铁路、运河以及其他大量的工程常常提醒着我们，它们是英国投资的产物，因此，印度欠英国巨额的债务。印度人对此提出了许多异议，不过我们目前不必对此展开深入的探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额巨大的投资中没有多少是英国投入的新资本。英国利用其在印度获得的利润进行了再次投资。我告诉过你，在普拉西和克莱武时期，印度大量的金银财宝流失到了英国。从那之后，英国对印度的剥削产生了形式上的变化，剥削方式不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英国利用剥削而来的一部分利润在印度进行投资。

英国发现，想要在全世界范围内继续放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接受他国以商品的形式支付利息。像我之前和你说的那样，英国不可能只接受黄金。这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结果是，英国把国外的食品提供给本国人食用，让本国的农业遭到了重创。英国专注于生产工业制品，并销售到国外，却忽视了本国农民所处的困境。如果可

以从外国获得廉价的食物，为什么还要费心地自己生产食品呢？如果可以从工业中获得更多利润，为什么还要担心农业的发展呢？因此，英国成了一个纯粹的工业化国家，食品则完全依靠进口。

第二个结果是，英国采取了自由贸易政策，即它对进口的外国商品不征税，或者只征少量的税。由于英国是领先的工业化国家，很久以来，在工业制品方面，它从不担心遇到竞争对手。对外国商品征税，意味着对进口的外国食品以及原材料征税。这样会提高人们购买食品的价格，以及本国工业制品的价格。此外，如果英国以高额的税收禁止了外国食品的进口，那些债务国又该怎样继续向英国表示敬意呢？它们只能用商品作为支付手段。这就是英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而其他所有工业化国家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原因。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即通过对进口的外国商品征税，保护本国持续增长的工业。美国、法国以及德国都是贸易保护主义国家。

19世纪，英国采取的忽视农业、专注工业、从国外进口食品以及舒适地依靠海外贡品生存的策略，似乎非常有利可图，人们也很乐于接受。不过它也有风险，如今这种风险已经很明显了。这种策略的基础是，英国在工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它的对外贸易量极大。但是，如果失去了这种优势地位，同时对外贸易量也减少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它该拿什么购买食品呢？即使它可以购买食品，如果一个强大的敌人妨碍了它，它又该怎样从外国获得食品呢？在世界大战中，由于食品供应的中断，英国国民几乎遭遇了饥荒。更大的一个风险是，由于外国竞争的出现，导致了英国对外贸易量不断减少。19世纪80年代，美国和德国开始寻求开拓海外市场，这时竞争变得就很明显了。渐渐地，其他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也开始追求海外市场，如今几乎整个世界都或多或少地实现了工业化。每个国家都设法尽己所能，制造本国所需的商品，同时将外国商品拒之门外。印度就不希望进口外国布料。这样一来，英国兰开夏郡该怎么办？其他依赖对外贸易的英国产业又该怎么办？

对英国来说，这些问题很难回答，似乎还有很多其他的困难等待着它。它甚至不能躲藏起来，过自给自足的生活，生产自己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对这样的生活来说，现代世界过于复杂了。即使能自我隔绝，恐怕它也很难生产出足够的食品，供过多的本国人食用。不过，这些问题都是现在才出现的问题；在19世纪的时候，这些问题还不怎么迫切。因此，英国赌上了自己的未来，寄希望于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这是一场巨大的赌博，赌注非常高——要么成为世界领先的国家，要么垮台。对英国来说，没有中间地带可选。不过，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并不缺乏自信与自负。他们长期的繁盛和成功，加上他们在工业和商业上的领导地位，使他们确信，自己比世界上其他人种更优越。他们看不起任何外国人。亚洲人和非洲人，当然是落后而野蛮的，他们的存在似乎就是给英国提供了一个机会，发挥它天生的统治才能以及改善落后人种的才能。甚至连欧洲大陆上的人都是无知而迷信的外国人。英国人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人种，他们的文明程度高度发达，他们是欧洲领先的先锋力量；而欧洲本身就是世界领先的地区。大英帝国是一个认定了自己的人种优越性的半神化国家。30年前担任印度总督的寇松勋爵（Lord Curzon），是他那个时期最有才干的人之一，他在自己的一本书中写道，要将此书献给“那些相信大英帝国是上天安排的、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人”。

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我写的内容听起来似乎有些不着边际和超乎寻常，也许你会认为，我只是想拿英国人开玩笑。任何有理智的人做出这些行为，采取这种奇特、自负甚至自以为是的态度，都是很奇怪的。不过，一个民族对任何能满足它的虚荣心并且对它有利的事，几乎都会深信不疑。任何个人永远不会想到用这样粗鲁和低俗的方式对付他的邻居，但是一个民族则没有这样的顾虑。遗憾的是，我们天生都是如此，都会趾高气扬地炫耀自己民族的优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成了一种类型的人，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都能看到这种类型的人，只是有稍许不同罢了。所有欧洲国家都有这种类型的人，美洲和亚洲也是如此。

英国和西欧的繁荣要归功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资本主义一边向前发展，一边不停地寻找利润。由于资本主义与宗教和道德无关，因此成功与利润成为人们唯一崇拜的神。它成为个人之间和国家之间激烈竞争的信条，谁落后谁倒霉！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以自己对宗教的宽容为傲，他们相信进步和科学，他们在商业和帝国统治权上的成功恰恰帮助他们证明了，自己是竞争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佼佼者。达尔文不是也说过这样的话吗？他们对宗教事务的宽容，实际上是漠不关心。英国作家R. H.托尼（R. H. Tawney）对此做过恰当的描述。他说，上帝被置于高高在上的地方，远离了世俗问题。“天堂里的君主统治，和地球上的一样有限！”这是优越的资产阶级的想法，但国家还是提倡人们去教堂做礼拜，并参与其他宗教活动，希望这些活动能让他们远离革命思想。对宗教宽容不代表对其他事也宽容，只要事情关系到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他们就不会宽容；在压力之下，所有的宽容都会消失。英国在印度设立的政府对宗教极为宽容，并以此为荣。事实上，它一点也不关心宗教事务。不过，一旦有人稍微批评了它的政治或者所作所为，它就会竖起耳朵，于是就没人再说它会宽容了。压力越大，落差越大。如果压力大到一定的程度，政府就会放下一切宽容的伪装，毫不遮掩地肆意实施恐怖行为。如今在印度，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情况。不久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十几岁的男孩被判处了长达8年的监禁，仅仅因为他给某位英国官员写了封恐吓信！

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变化。资本主义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大型企业的利润和效益远远大于小型企业。因此，大型的联合集团和信托机构发展起来，控制了全部产业，吞并了小型的独立制造商和工厂。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个人发挥主动权的机会越来越少，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思想也衰落了。强大的联合集团和公司控制了政府。

资本主义也将帝国主义推进到了另一个更激烈的阶段。19世纪下半叶，随着工业大国之间的竞争加剧，他们开始放眼世界，寻找更远

的市场以及更多的原材料。全世界范围内争夺帝国统治权的竞争异常激烈。我曾经详细地告诉过你发生在印度、中国、更远的印度地区以及波斯等亚洲地区的事情。如今欧洲大国在非洲趁火打劫，瓜分了这片大陆。在非洲，英国也获得了最大利益——它控制了北边的埃及，以及东边、西边和南边的大片领土。法国获得的也不少。意大利也想分得一杯羹，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它却败给了阿比西尼亚。德国获得了一部分利益，不过它并不满意。帝国主义的喊叫、威胁和贪婪到处蔓延。大英帝国大受欢迎的一位诗人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曾经讴歌过“白人的重担”。法国人声称，教化人类是法国的使命。德国当然也要传播它的文化。因此，这些教化者、改良者和他人重担的承担者，以彻底的牺牲和贡献为名，将棕色人种、黄色人种和黑色人种踩在了脚下。然而并没有人关心过黑人肩负的重担。

对于这些贪婪的帝国主义竞争者来说，世界还不够大。资本主义对市场的热切需求，催促着每个国家采取行动，因此它们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英国与法国之间发生的多次战争，似乎依然悬而未决。不过，真正的利益冲突发生在英国工业和德国工业之间。德国在工业和海运领域赶超了英国，并对英国的各个市场提出了挑战。但是，德国发现，世界上最佳的地理位置都被英国占领了。拥有强烈自尊心和斗志的德国，对于其他国家的牵制感到很恼火，于是积极准备与那些国家展开一场大战。整个欧洲都在准备开战，各国的陆军和海军都在不断壮大。各国之间互相结盟，最终欧洲出现了两大对峙的军事势力——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以及法国和俄国的“两国同盟”，英国在私下里加入了法俄同盟。

同时，即19世纪末，在南非，英国与当地人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战争。导致1899年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人们在布尔人（Boer）的德兰士瓦共和国（Transvaal Republic）发现了金矿。有着惊人勇气和毅力的布尔人与英国这个欧洲领先的大国对抗了三年。布尔人最终被击溃，只好认输。不过，不久之后，英国（当时执政的是自由党）做

出了一个明智而慷慨的决定，它给予了刚刚被它击败的敌人完全的自治权。又过了一段时间后，整个南非成了大英帝国的自由领地。

137 ——美国内战

冲突与密谋、君主与革命、怨恨与民族主义交织的旧大陆，占据了我们太多时间。现在让我们跨越大西洋，探访美洲这片新大陆，看看它在摆脱了欧洲的控制之后，发展情况如何。我们尤其要关注美国。美国从零开始，不断地发展壮大，到现在为止，他们似乎主导了世界局势。如今英国不再拥有引以为傲的地位，它不再是世界的债权国，而只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债务国，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它请求美国对待它要仁慈、慷慨。世界债权国的光荣称号如今落在了美国头上；财富不断涌来，导致美国出现了数量惊人的百万富翁。然而，就像古代迈达斯（Midas）国王的遭遇一样，点石成金的美国并没有感到快乐，尽管拥有众多富豪，美国大众的生活依然贫困。

1775年脱离英国而独立的美国沿海13个州，当时的人口远不到400万，现在仅纽约一个城市的人口数量就是这个数字的2倍，而整个美国则拥有1.25亿人口。如今联邦各州的数量比以往更多，这些州跨越了美洲大陆，延伸到了太平洋沿岸。美国在19世纪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它的发展不仅是地域和人口上的发展，也是现代工商业、财富和影响力上的发展。美国与欧洲之间有着许多争议和麻烦，也发生了一些冲突和战争，但是对于美国来说，最大的烦恼来自北方各州与南方各州之间激烈而惨痛的内战。

美国取得独立的几年之后爆发了法国大革命，之后又发生了拿破仑战争。拿破仑和英国都想要摧毁对方的商业贸易，这样一来，它们就与美国发生了冲突。美国的海外商业贸易陷入瘫痪，这导致了1812年美国与英国发生的另一场战争。这场持续了两年的战争结束后，格局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在这场战争进行的过程中，拿破仑被流放

到厄尔巴岛上，英国获得了施展拳脚的机会，英国人一度占领了首都华盛顿（Washington），他们烧毁、破坏了所有重要的公共建筑，包括召开国会会议的国会大厦，以及总统的住所白宫（White House）。最终，美国人还是战胜了英国人。

在这场战争之前，美国就在南方扩充了一大片领土。这片领土就是法国旧殖民地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由于拿破仑已无法守护这片领土免受英国海军的攻击，因此他将这片领土卖给了美国。几年之后，也就是在1822年，美国又从西班牙手中购买了佛罗里达州（Florida）；1848年，与墨西哥的一场战争胜利之后，美国在西南部地区又扩充了几个州，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美国西南部地区，许多城市的名称依然是西班牙语的名称，它们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是西班牙人或者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统治过的地方。这些城市包括众所周知的电影之都洛杉矶（Los Angeles），以及旧金山（San Francisco）。

当欧洲在反复上演革命与镇压之时，美国仍在继续向西扩张。欧洲发生的镇压促进了移民浪潮的出现，美国这片广阔土地上的精彩故事以及高额薪酬，吸引来了众多欧洲人。随着人口不断向西扩散，他们又成立了一些新的州，这些州都加入了联邦。

一开始，北方各州和南方各州之间的差异就很大。北方各州受工业化的影响，新的大机械化工业迅速发展；在南方，则有许多由奴隶进行劳作的大型种植园。奴隶制在南方是合法的，但在北方奴隶制并不多见，也并不重要。南方各州则完全依靠奴隶提供劳动力。当然，奴隶都是来自非洲的黑人，白人不会成为奴隶。《独立宣言》中有句话：“人人生而平等。”不过这句话只针对白人，而非黑人。

说起这些黑人是如何被人从非洲带过来的，这又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奴隶贸易最早开始于17世纪，定期的奴隶供应一直持续到1863年。最初，每当货船驶过西非海岸——西非海岸的一部分依然被称为

“奴隶海岸”（Slave Coast）——它们就能轻而易举地载上非洲人，并把他们带往美国。非洲人之间几乎没有奴隶买卖，只有战俘或欠债人才会变成奴隶。人们发现，将非洲人带到美国，并把他们卖给别人当奴隶，是一桩赚钱的买卖。奴隶贸易迅速发展，成为以英国、西班牙、葡萄牙为主的一些国家赚取利润的好生意。为此他们建造了特殊的船只——甲板之间搭了几层舱板的贩奴船。痛苦的黑人被迫蜷缩在这些舱板中，脚上拴着锁链，每两个人锁在一起。横渡大西洋需要花费好几周的时间，有时甚至要几个月。在这数周甚至数月时间里，这些黑人被锁链拴在一起，蜷缩在狭窄的舱板中，每个黑人能够占据的空间，竟然只有5.5英尺长，16英寸宽！

在奴隶贸易的基础上，利物浦发展成了一座大型城市。早在1713年签订《乌得勒支条约》（*Peace of Utrecht*）时，英国就从西班牙手里强行取得了在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贩卖非洲奴隶的特权。在这之前英国就已经为美洲的英殖民地供应了大量奴隶，因此在18世纪，英国试图垄断非洲和美洲之间的奴隶贸易。1730年的时候，利物浦有15艘船只参与这项贸易。船只的数量持续增长，到了1792年，利物浦雇用的、从事奴隶贸易的船只已达到132艘。早期的工业革命使英国兰开夏郡的棉纺织业取得了显著发展，这也导致美国对奴隶的需求大增。因为兰开夏郡的纺织厂使用的棉花原料，都来自美国南方各州的大型棉花种植园。这些棉花种植园的规模快速扩大，越来越多的非洲奴隶被带到这里，养育黑人成了一个重要任务！1790年，美国共有69.7万名奴隶；186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400万。

19世纪早期，英国议会通过了反对奴隶制的严厉法律。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洲也紧随其后。不过，即使奴隶贸易失去了法律保护，但依然有很多非洲黑人来到美洲，只不过他们在路途中的情况比以前更糟糕了。由于不能公开运送黑人，他们被迫藏匿在别人看不到的松散架子上，一个人叠在另一个人身上。一位美国作家告诉我们，有时候“一个人挤在另一个人的膝盖上，他们的腿也叠在一起，就像拥挤地

骑在一根雪橇上似的”。很难想象这幅令人惊恐的画面。贩奴船的状况实在令人作呕，航行了四到五次之后就不能再使用了。但是由此获得的利润却十分丰厚，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奴隶贸易达到高峰的时候，每年从非洲奴隶海岸运送出来的奴隶多达10万人。要知道，要成功运送这么多的奴隶，也就意味着在搜捕中死亡的黑人会更多。

所有大国都在19世纪早期左右，从法律上废止了奴隶贸易。美国也是如此。然而，尽管奴隶贸易是非法的，奴隶制在美洲依然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原来的奴隶现在依然是奴隶。而且由于奴隶制是合法的，因此奴隶贸易在被禁止的情况下依然继续存在。当英国也废除了奴隶制以后，纽约就此成为奴隶贸易最主要的港口。

尽管纽约的港口从事奴隶贸易多年——一直到19世纪中期——北方各州依然反对奴隶制。相反，南方各州则需要这些奴隶从事种植园的工作。有一些州废除了奴隶制，其他各州却依然保留着奴隶制。黑人们常常从某个奴隶制州逃往非奴隶制州，因此引发了不少争端。

由于北方与南方的经济利害关系不同，早在1830年就发生了由关税引起的摩擦。有些州威胁要退出联邦。这些州守护着自己的权利，不喜欢受到联邦政府的过多干涉。国家出现了两大派别，一派人支持各州自治，另一派人则希望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这些分歧使北方与南方渐行渐远，只要有新的州加入联邦，他们就要选择支持哪一派。那么大多数人支持哪一派呢？由于欧洲移民增多，北方的人口迅速增长，这使得南方人担心，北方人口很快就会超过南方，对各种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时，他们的票数就会不及北方。因此，南北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同时，北方全面废除奴隶制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支持废奴的人叫作“废奴主义者”（Abolitionists），他们的主要领袖是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1831年，加里森创办了一份报纸——《解放者报》（*Liberator*），来支持自己的反奴隶制行动。在发刊词中他旗帜鲜明地表示，对于废奴运动，他不会妥

协，也不会采取中庸的立场。在他的这份发刊词中，有许多著名的语句，在这里我要讲给你听：

> 我要像真理一样严厉，像正义一样坚决。在这个问题（废奴问题）上，我在思想上、言论上或写作上将没有中庸可讲！没有！绝没有！你可以让一个家中失火的人温柔地呼救吗？让丈夫温文尔雅地从强奸者手中抢回他的妻子吗？让母亲不慌不忙地救出落入火海的孩子吗？但是，在当前的事业中，请不要劝我采取中庸的态度。现在我态度坚决，我不会含糊其辞，不会找借口，不会退让半步，我将让世人听到我的声音。

不过，只有少数人拥有这样的勇敢态度，大多数反对奴隶制的人都不愿意干涉现存的奴隶制。北方与南方之间的矛盾依然在扩大，这主要是由于两者之间有着不同的经济利害关系，特别是在关税问题上有矛盾。

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当选为美国总统，他的当选预示着南方将与联邦决裂。他反对奴隶制，不过即使如此，他还是明确表示，现存的奴隶制不会受到干预。对于新的州是否可以采取奴隶制，或者给予奴隶制合法的地位等问题，他都没有做好回答的准备。南方各州对于这样的保证并不满意，它们一个接一个地退出了联邦。美国变得四分五裂。这就是新总统所面临的糟糕情况。为了避免分裂，他再次努力争取拉拢南方。他对南方做出了各种承诺，允许奴隶制可以继续存在；他甚至说过，他准备将奴隶制（在奴隶制已经存在的地方）写入宪法，让奴隶制永久存在。事实上，为了和平，他准备做出一切让步，但是他唯一不能答应的，就是分裂联邦。他拒绝任何一个州退出联邦。

林肯试图避免出现内战，但是他失败了。南方决定退出联邦，有11个州相继退出，另外有一些边境州对它们的退出也表示支持。退出

的各州自称为“美国南部邦联”（Confederate States），并选出了自己的总统——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1861年4月，美国内战（Civil War）爆发，这场令人疲惫的战争持续了4年，许多兄弟之间、朋友之间都大打出手。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大规模的军队也在不断发展。北方拥有更多优势，它拥有更多的人口和财富。作为制造业和工业地区，北方的资源更丰富，铁路也更多。但是南方的士兵和将军则更骁勇善战，尤其是罗伯特·李将军（General Lee），南方因此取得了最初几场战斗的胜利。不过，南方最终还是精疲力竭了。北方海军完全切断了南方通往欧洲市场的航路，棉花和烟草因此无法出口。这不仅使南方陷入瘫痪，也给英国兰开夏郡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由于没有棉花，许多纺织工厂只能停产。兰开夏郡的失业工人陷入了痛苦之中。

关于美国内战，英国人的意见普遍支持南方，至少富人阶级的意见是支持南方的。激进分子则支持北方。

奴隶制并不是美国内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我曾经告诉过你，直到最后林肯都不断承诺，他会尊重现存的奴隶制。真正的麻烦来自南北之间不同的甚至有些冲突的经济利害关系；最终，林肯为了维护联邦的统一，选择了战争。甚至在战争开始之后，林肯也没有做过任何有关奴隶制的明确声明，因为他害怕刺激到支持废除奴隶制的北方人民。随着战争的深入，他才明确了想法。一开始他提议，国会先赔偿奴隶主，然后解放奴隶。后来他放弃了赔偿的想法，最终在1862年，他发表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Proclamation of Emancipation*），这份宣言宣布，从1863年1月1日起，反抗联邦政府的各州之内的奴隶都应该获得自由。发表这个宣言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想要在战争中削弱南方的力量。结果，400万名奴隶获得了自由，支持废奴的人们希望这些奴隶会给美国南部邦联带来麻烦。

在南方力量消耗殆尽之后，美国内战于1865年宣告结束。任何时期的战争都是可怕的，不过内战通常更加可怕。4年的惨烈斗争所造成的负担大部分落在了林肯总统的身上，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由于林肯不管遇到多大的失望和灾难，都会毅然决然地坚持到底。他不仅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而努力，也在获得胜利时尽量避免表现出恶意；这样一来，他所为之战斗的联邦才能成为人们心中真正的联邦，而不是强制形成的联邦。因此，战争胜利后，他准备对战败的南方各州表现出自己的慷慨。不过，仅仅几天之后，他就遇刺身亡了。

亚伯拉罕·林肯是美国最伟大的英雄之一，他也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之一。他出身卑微，没怎么上过学，所受的教育大部分来自自己的劳作，可是，长大之后，他成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演说家，并带领他的国家渡过了一场巨大的危机。

林肯死后，美国国会对待南方白人并没有林肯原计划的那么慷慨。这些南方白人遭到了各种惩罚，有许多人被剥夺了公民权，也就是失去了选举权。另一方面，黑人则成为正式公民，获得了所有的公民权利，这项内容被写入了美国宪法。宪法也规定，任何州都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种族、肤色或者之前的奴隶身份而剥夺这个人的公民权。

黑人在法律上成了自由的人，也获得了选举权。但这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好处，因为他们的经济状况依然没有变化。所有获得自由的黑人都没有任何财产，人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他们。一些黑人移居到北方城镇，不过大部分黑人依然留在当地，像以前一样，受原来的南方白人奴隶主控制。他们在以前的种植园里成为领取工资的劳工，白人雇主按照自己的意愿支付他们工资。南方白人也组织起来，以各种恐怖主义手段压制黑人。一个名叫“三K党”（Ku Klux Klan）的半秘密组织成立了，它的成员头戴面具，到处恐吓黑人，甚至阻止黑人在选举中投票。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黑人取得了一些进步。许多黑人拥有了财产，他们还拥有了一些很好的教育机构。不过，他们依然还是受人支配的人种。美国的黑人数量大约是1200万，仅占美国总人口的10%。在黑人数量比较少的地方，比如北方的某些地方，人们对待黑人比较宽容，但是黑人的数量一旦增多，他们就会遭到严重的歧视，受到的待遇与以前的奴隶没什么差别。在任何地方，比如宾馆、饭店、教堂、学校、公园、海滩、电车甚至是商店里，他们都遭到隔离，必须远离白人。在火车上，他们只能搭乘特殊的车厢“吉姆·克劳车厢”（Jim-Crow Cars）。法律禁止白人和黑人结婚。除此之外，还有各种针对黑人的奇怪法律。就在不久之前的1926年，弗吉尼亚州还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白人和有色人种坐在同一间屋里！

有时白人和黑人之间会爆发严重的种族冲突。在南方，经常会发生滥用私刑的可怕情况，即一群暴徒抓住一个他们怀疑有罪的人，然后杀死他。近些年发生了多起白人暴徒将黑人绑在火刑柱上烧死的案例。

在整个美国，特别是南方各州，黑人的命运依然艰难。通常当劳工缺乏的时候，在南方一些州里，无辜的黑人就会因为某种捏造的指控而被判入狱，而这些犯人劳工则会被出租给个体承包商。这种情况非常恶劣，随之而来的状况更是令人震惊。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律上规定的自由终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你读过或听说过哈里耶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写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吗？这本书讲述了南方各州的黑奴以及有关他们的悲惨故事。这本书在美国内战爆发10年之前出版的，它对美国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激发了美国人反对奴隶制的情绪。

138 ——美国的无形帝国

美国内战中，年轻人的死亡人数非常高，内战给美国留下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不过，美国是一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国家，它的发展并未停止。它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矿产尤其丰富。形成现代工业和文明的三种基础物质——煤、铁和石油，在美国处处皆是。那里还有大量可供发电的水力资源，尼亚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就是你能想到的一个水力发电的例子。美国的面积很大，人口相对较少，每个人都有很多自由活动的场所。作为一个制造业和工业大国，美国的发展条件十分有利，它开始快速地发展起来。到了19世纪80年代，美国工业开始在海外市场中与英国工业展开竞争。美国和德国终结了英国在对外贸易中持续了100多年的安逸的领先地位。

外来的移民蜂拥而至，各种各样的欧洲人来到美国，包括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Scandinavians）、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波兰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本国遭到了政治迫害，很多人都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条件而来到这里。过于拥挤的欧洲将自己的过剩人口输送到了美国。这是一个充满了各种种族、民族、语言和宗教的大熔炉。在欧洲的时候，他们散居各地，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中，相互之间充满了仇恨与敌意；而在这里，他们都聚集在一个新的环境中，过去的仇恨似乎没那么重要了。统一的义务教育系统很快就磨平了各个民族的棱角，这个种族大熔炉开始发展出了美国式的特色。盎格鲁-撒克逊人仍然自诩为贵族，他们是社会中的领导者。仅次于他们的是来自北欧的种族。从南欧来的人，特别是意大利人，受到这些北欧人的蔑视，被他们蔑称为“南欧佬”（Dagos）。当然黑人是远离他们的。黑人处于底层，他们和白种人没有任何交集。在西海岸，生活

着一些中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他们在劳工需求旺盛的时候来到这里。这些亚洲种族也和其他种族相隔甚远。

遍布各地的铁路网和电报网将这个巨大的国家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实现的，那时候东西海岸之间的旅程需要花费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过去我们看到，亚洲和欧洲通常会出现大型帝国。但是这些帝国由于通讯和交通不便，无法紧密联系起来。帝国的各个部分实际上是各自独立的，它们过着自己的日子，只不过它们都承认帝国君主的最高地位，并向君主朝贡。它们只是由一位统治者领导、由不同国家组成的松散联合体。它们没有共同的愿景。然而，由于铁路和其他通讯方式以及统一教育系统的出现，美国的各个种族之间形成了共同的愿景。各个种族渐渐同化，成了同一个种族。这个同化的过程并没有完成，它仍在继续。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种族同化现象。

美国设法远离了欧洲的纠葛和欧洲强国的阴谋，他们也希望欧洲远离美国的北方与南方。我给你讲过“门罗主义”，指的是一些欧洲强国，即“神圣同盟”，为了保住西班牙的帝国领地而插手南美洲事务的时候，美国的门罗总统（President Monroe）做出的决定。门罗宣布，美国绝不容忍任何欧洲国家武力干预美洲事务。这个宣言将年轻的南美各国从欧洲手中解救了出来。这个宣言曾差一点导致美英两国开战，不过美国至今已经成功地坚持了这个政策长达100多年。

南美洲与北美洲完全不同，100年过去了，这种差别依然没有减少。北美的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接近美国，但是南美各国并不是这样的。我曾经告诉过你，这些南美国家，包括北美的墨西哥，都是拉丁美洲的共和国。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划分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民与文化。在边境南边，整个狭窄的中美洲地带以及整个南美洲广阔的大地上，人们的语言都是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是最主要的语言，我觉得，只有巴西人讲葡萄牙语。由于南美洲的存在，西班牙语

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语言之一。西班牙依然是拉丁美洲的文化来源。南美的种族差异不像在美国和加拿大那么重要。西班牙人和红印第安人通婚，有时甚至和黑人通婚，于是产生了混血人种。

尽管已经独立了100年，这些拉丁美洲共和国仍然不愿意安定下来。这些国家时不时地发生革命和军事独裁，它们的政治和政府更替很快，人们很难跟上它们的变化速度。南美洲最主要的三个国家是阿根廷（Argentine）、巴西（Brazil）和智利（Chile），人们根据这三个国家名称的首字母把它们称作“ABC三国”。北美的墨西哥是拉丁美洲的一个重要国家。

美国通过门罗主义阻止了欧洲干涉拉丁美洲事务。但是随着他们的财富增多，他们开始向外探寻可以扩张的新土地。他们自然将眼光落在了拉丁美洲。他们并不打算利用传统的建立帝国的方式，通过武力占领这些国家的领土。他们把商品送到那里，占领了那里的市场。他们还对铁路、矿产以及南美其他工程进行了投资，他们借钱给政府，发生革命的时候他们还借钱给敌对双方。我说的“他们”指的是美国资本家和银行家，但是在他们身后支持他们的则是美国政府。通过这些银行家的放债和投资，他们渐渐地控制了许多小型的中南美洲国家政府。银行家甚至可以通过只给一方提供金钱和武器，挑起双方之间的武装革命。银行家和资本家身后是强大的美国政府，因此，弱小的南美各国又能怎么办呢？有时美国还会借口维持秩序，出兵帮助一个国家中的某方势力。

这样一来，美国资本家就有效地控制了这些南美小国，控制了这些国家的银行、铁路和矿产，通过剥削这些国家而牟取利益。他们甚至对拉丁美洲一些较大的国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他们对这些国家进行了投资，并控制了这些国家的财政。也就是说，美国吞并了这些国家大部分的财富。如今这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因为这是一种新型的帝国——现代类型的帝国。这是一种无形的、经济上的帝国统治，

它对其他国家的剥削和控制，从表面上看一点都不明显，从政治上和国际上来看，南美洲各国是自由而独立的。这些国家的面积很大，没有任何现象表明它们不是独立的国家。然而，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完全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

从我们对世界历史的了解中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时期，帝国主义的类型也不一样。最初，一个民族在战争中战胜了另一个民族后，胜利者就可以任意处置他们所征服的领土和人民。他们吞并这些土地以及当地居民，也就是说，战败的人民成了奴隶。这是一般的情况。在《圣经》里，我们读到过犹太人在战争中被巴比伦人击败因而遭到流放的故事，此外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慢慢地，另一种类型的帝国主义取代了原有的类型，新型的帝国主义国家只吞并别国土地，并没有强迫当地人民成为奴隶。当然，我们发现，帝国主义国家很容易通过税收以及其他的剥削形式，榨取别国人民的钱财。我们大多数人仍然会想到这种类型的帝国，比如英属印度，我们还想象着，如果英国没有从政治上实际控制印度的话，印度也许就自由了。不过，这种类型的帝国也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先进和完善的帝国类型。最新型的帝国甚至不需要吞并土地，只吞并这个国家的财富或者创造财富的基本要素就可以了。如此一来，它可以充分剥削这个国家并从中获利，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这个国家，同时不必为了管理和约束这个国家而承担任何责任。实际上，这个国家的领土以及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都受到了控制，而这种控制下产生的麻烦是最少的。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主义不断完善自我，现代类型的帝国就是无形的经济帝国。奴隶制的废除以及后来封建农奴制的消亡，让人们以为人类将会获得自由。但是人们很快发现，那些控制了财力的人依旧可以剥削和控制别人。人们只是从奴隶和农奴变成了工资的奴隶，对他们来说，自由依然遥不可及。国家也是一样。人们误以为，一个国家的政治遭到另一个国家的控制就是唯一的麻烦，只要这个麻烦解决了，这个国家自然会获得自由。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尽

然，我们能看到许多政治上独立的国家，在经济上却完全被其他国家掌控。英属印度帝国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英国从政治上控制了印度。作为这种有形帝国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英国也从经济上控制了印度。英国对印度的有形控制也许不久就会结束，然而经济上的控制则很有可能以一种无形的帝国形式持续下去。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就意味着英国会继续剥削印度。

对统治力量来说，经济上的帝国主义是麻烦最小的一种统治形式。经济控制不像政治控制那样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因为许多人意识不到经济控制的存在。不过，一旦人们手头拮据，他们就会察觉到这种经济控制，并对此感到愤怒。如今，拉丁美洲的人们并不喜欢美国，拉丁美洲国家尝试了各种方法阻碍和反对北美洲对拉丁美洲的控制。不过，只有当这些国家不再频繁地发生宫廷革命和相互争吵之后，它们才有可能成功。

美国的有形帝国延伸到了菲律宾群岛。在以前的信中我告诉过你，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占领了菲律宾。这场战争发生在1898年，目的是争夺大西洋地区的古巴（Cuba）。古巴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但是古巴和海地（Haiti）都受到了美国的控制。

大约12年前，巴拿马运河（Panama Canal）通航了。它位于狭长的中美洲地带，是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纽带。50多年前，斐迪南·德·雷赛布（Ferdinand de Lesseps）设计了这条运河，他曾创造了苏伊士运河。不过由于他陷入了麻烦，这条运河最后是由美国人开凿完成的。巴拿马的疟疾和黄热病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他们着手消灭这些疾病并取得了成功。他们除掉了一切可以繁殖携带病毒的蚊子和其他昆虫的水源，使运河一带成了健康的区域。这条运河位于小国巴拿马，但是美国控制了这条运河以及这个小国。对美国来说，这条运河带来了便利，否则所有船只必须绕行南美洲。不过，巴拿马运河的重要性不及苏伊士运河。

因此，美国持续着它的发展脚步，变得更加强大和富有，产生了包括百万富翁和摩天大楼在内的许多事物。在很多方面它都超过了欧洲。工业上它成为世界领先的国家，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比其他任何地方都高。就像19世纪的英国一样，由于美国社会的繁荣，社会主义和其他激进的理论在这里都鲜有支持者。美国劳工几乎都非常温和与保守，只有个别例外。美国劳工获得的工资相对较高，他们何必冒着失去现有舒适生活的风险，争取不太可能实现的生活改善呢？美国劳工主要由意大利人以及其他被轻蔑地称为“南欧佬”的人组成。他们力量薄弱，缺乏组织，受人歧视。甚至那些工资较高的技术工人，都自认为他们的阶级与这些“南欧佬”不同。

美国政坛发展出两大党派——共和党以及民主党。与英国类似，甚至比英国还要明显，这两个党派都代表了富人阶级的利益，两个党派之间没有原则上的差别。

美国一直维持着这样的状况，直到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才最终被卷入了斗争的旋涡。

139 ——爱尔兰与英国之间持续700年的冲突

让我们再次穿越大西洋回到旧大陆。无论坐船还是坐飞机，一位旅行者穿越大西洋后，最先看到的陆地就是爱尔兰，因此让我们把爱尔兰作为我们的第一站吧。这座美丽的绿色岛屿位于欧洲最西边的大西洋之中。这个小岛远离了世界历史的主要思潮；它尽管很小，却充满了传奇色彩，数个世纪以来，它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展现出了不可战胜的勇气和牺牲精神。爱尔兰在与它的强大邻邦对抗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它们之间的争斗早在750年前就开始了，而至今仍未解决！我们看到，英国在印度、中国以及其他地方实施了帝国主义政策。从最初开始，爱尔兰就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是，爱尔兰从未心甘情愿地顺从于英国，几乎每一代爱尔兰人都起义反抗英国。爱尔兰最勇敢的人们有的为了争取独立而战死，有的遭到了英国当权者的处决。众多爱尔兰人只得离开他们热爱的故土，移居到国外。许多人加入了反抗英国的外国军队，为的是有机会出一份力，与这个占领和欺负他们祖国的国家做斗争。背井离乡的爱尔兰人散布于世界各地，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心中永远都忘不了故乡爱尔兰。

无论是不幸的人还是受到压迫而努力抗争的国家，所有对现实不满、郁郁寡欢的人都愿意回顾往事，并从中寻求慰藉。他们赞美往事，回忆过去的辉煌，并从中找到安慰。每当现实变得很灰暗的时候，过去就成了能提供安慰和鼓励的港湾。以前所受的委屈也同样令人痛苦，让人无法释怀。不断地回首往事，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个积极的现象。积极向上的人和国家应活在当下，并且放眼未来。

但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或国家不可能变得积极向上，所以，这样的人或国家自然会回顾过去，一定程度上还会生活在过去。

因此，爱尔兰依然生活在过去，爱尔兰人珍视过去那些自由的时光，也清楚地记得他们为了追求自由所做的抗争以及过去所受的委屈。他们常常回顾1400年前的公元6世纪，那时爱尔兰是西欧的学习中心，吸引了远道而来的学生。罗马帝国没落之后，汪达尔人和匈人破坏了罗马文明。据说在那时，爱尔兰是文化明灯依旧燃烧的地区之一，直到欧洲文化再次复兴。基督教很早就传到了爱尔兰。爱尔兰的守护圣人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将基督教带到了爱尔兰。基督教正是从爱尔兰传到英国北方的。爱尔兰建造了很多修道院，它们和印度传统的静修院以及佛教寺院一样，成了学习中心，在这些学习中心里，布道者在户外进行公开讲学。许多传教士从这些修道院出发，前往北欧和西欧，向异教徒和无宗教信仰者宣讲新的基督教教义。爱尔兰修道院的一些修道士书写并绘制了漂亮的手抄本。大约在1200年前手写而成的一本叫作《凯尔经》（*Book of Kells*）的精美手抄本，如今就保存在都柏林（Dublin）。

从公元6世纪开始的200年到300年间，在爱尔兰人看来算得上是爱尔兰的一个“黄金时代”，当时盖尔文化（Gaelic Culture）正处于巅峰时期。或许是因为时间久远，这些古老的时期显得很有魅力，比实际显得更辉煌。那时爱尔兰的许多部族不停地相互斗争，最终让爱尔兰走向了分裂。爱尔兰的弱点和印度一样，都是内部争斗。后来，丹麦人和挪威人来到这里，他们像对待英国和法国一样，一再蹂躏爱尔兰人，并占领了大范围的爱尔兰领土。11世纪初，一位名叫布里安·博卢（Brian Boruma）的著名爱尔兰国王，曾经击败过丹麦人，并将爱尔兰统一了一段时间。不过，爱尔兰在他死后又再一次分裂了。

你应该记得，征服者威廉统治的诺曼人在11世纪征服了英国。100年后，这些盎格鲁-诺曼人（Anglo-Normans）侵入爱尔兰，把他们征

服的地区叫作“佩尔”（Pale）；英语中有个说法叫作“超出范围”，这个说法也许就是从这里来的，它的意思是指在一个特权圈子或者社会团体的范围之外。公元1169年发生的这次盎格鲁-诺曼人的入侵，严重打击了古老的盖尔文明（Gaelic Civilization），并开始了他们与爱尔兰部族之间连续不断的战争。这些持续了几百年的战争极其野蛮和残酷。英国人（盎格鲁-诺曼人现在的称呼）总是看不起爱尔兰人，认为他们是半野蛮的种族。他们两个种族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英国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爱尔兰人是凯尔特人（Celts）；他们在宗教上也有差别，英国人和苏格兰人（Scotch）是新教教徒，爱尔兰人则依然忠于罗马天主教。因此，这些英爱战争（Anglo-Irish Wars）都是惨烈的种族和宗教战争。英国人刻意阻止了两个种族之间的融合。英国甚至通过了一项法令[《基尔肯尼法令》（*Statute of Kilkenny*）]，禁止英国人和爱尔兰人通婚。

爱尔兰爆发了一次又一次起义，但是每次起义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爱尔兰人自然会怨恨他们的异国统治者和暴君，无论时机是否成熟，他们都会发动起义。有这样一句谚语：“英格兰的危机是爱尔兰的良机。”出于政治以及宗教原因，爱尔兰经常与英国的敌人为伍，比如法国和西班牙。这使英国人非常愤怒，让他们感觉背上挨了一刀，于是他们以各种凶残的方式进行报复。

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16世纪），为了削弱爱尔兰人的造反气焰和反抗力量，英国决定在爱尔兰安插英国地主，以此压制住爱尔兰人。爱尔兰人的土地被英国没收，爱尔兰的地主阶级不得不被外国人取代。因此，实际上爱尔兰成了受外国地主控制的佃户国家。几百年过去了，这些地主对于爱尔兰人来说，依然是外来者。

伊丽莎白女王的继任者，英王詹姆士一世（James I），进一步挫败了爱尔兰人的锐气。他决定在爱尔兰建立常规的外国殖民种植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国国王没收了爱尔兰北方阿尔斯特六个郡的几

乎全部的土地。这些免费的土地吸引了许多英国和苏格兰投机者来到这里。这些英国人和苏格兰人得到了土地，并作为农场主定居下来。伦敦市也按照要求参与了这个殖民地的开拓过程，为了新的“阿尔斯特种植园”（Plantation of Ulster），伦敦形成了特殊的群体。正因如此，爱尔兰北部的德里市（Derry）成了众所周知的伦敦德里市（Londonderry）。

因此，爱尔兰阿尔斯特的一部分地区成了英国的领土——北爱尔兰，爱尔兰人对此感到愤怒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从新的北爱尔兰人（Ulsterites）的角度来看，他们则厌恶爱尔兰人，并且看不起他们。英国将爱尔兰分割成两个敌对阵营，这一帝国主义行动多么狡猾啊！300多年过去了，阿尔斯特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在阿尔斯特种植园问题发生后不久，英王查尔斯一世（Charles I）和议会之间就发生了内战。清教教徒和新教教徒站在议会一边，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自然站在了国王一边，而阿尔斯特则支持议会。爱尔兰害怕清教教徒会击垮天主教，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因此1641年的时候，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起义。这次起义比以往更加暴力和残忍。爱尔兰天主教教徒残暴地屠杀了新教教徒。克伦威尔展开的报复行动也极为可怕。爱尔兰人，特别是天主教神父，遭到多次屠杀，如今在爱尔兰，克伦威尔依然是他们的痛苦记忆。

尽管发生了这些恐怖和残忍的行为，之后的一代人又再次爆发了起义和内战，其中，围攻伦敦德里市和利默里克市（Limerick）这两次行动尤其引人注目。1688年，位于阿尔斯特的新教教徒据点伦敦德里市遭到爱尔兰天主教教徒的围攻，尽管新教教徒缺少食物、忍饥挨饿，他们还是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经过四个月的围困和物资短缺之后，英国船只最终带来了食物和救援物资。1690年对利默里克市的围攻则是另一种情形，爱尔兰天主教教徒遭到英国人的围困。这次围攻事件中出现了一位英雄人物——帕特里克·萨斯菲尔德（Patrick

Sarsfeld），他在重重逆境中出色地保卫了利默里克市。就连爱尔兰妇女也参与了这次保卫行动，如今在爱尔兰乡村，人们依然传唱着有关萨斯菲尔德和他的勇敢战士们的盖尔语歌曲。萨斯菲尔德最终放弃了利默里克市，但在此之前他与英国人签订了体面的条约。《利默里克条约》（*Treaty of Limerick*）中有一项条款规定，爱尔兰天主教教徒将拥有完全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

英国人，或者说生活在爱尔兰的英国地主家族，违反了《利默里克条约》。这些新教教徒家族控制了顺从他们的都柏林议会，尽管之前在利默里克庄严地许下过承诺，他们还是拒绝赋予天主教教徒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相反，他们通过了特殊的法律，制裁天主教教徒，并故意破坏爱尔兰的羊毛贸易。他们无情地镇压了佃户，还将他们赶出了自己的土地。要记得，这是少数外来的信奉新教的地主对大多数信奉天主教的佃户的所作所为。但是，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这些英国地主手中，这些地主并不住在乡村的房子里，因而佃户又遭到了地主的代理人和收租人的贪婪压榨。

利默里克的故事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对庄严承诺的背叛所引发的痛苦和愤怒依然没有减弱，甚至在今天，一提到英国的背信弃义，爱尔兰民族主义人士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词就是“利默里克”。那时，这种违背承诺的行为、宗教上的侵害和镇压以及地主的残酷行为，驱使众多爱尔兰人去往其他国家。爱尔兰年轻人中的佼佼者来到海外，主动为那些与英国开战的国家服务。在任何与英国交战的地方，都能看到爱尔兰人的身影。

《格列弗游记》的作者乔纳森·斯威夫特就生活在这一时期（他出生于1667年，死于1745年），从他给爱尔兰同胞们的建议中，能看出他对英国人的愤怒：“烧掉所有英国的东西，就是别烧他们的煤！”他葬于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St. Patrick’s

Cathedral）内，墓碑上的墓志铭言辞则更加激烈。这篇墓志铭很有可能是他本人写的：

乔纳森·斯威夫特

葬于此处，

他担任本教堂枢机主教长三十年，

这座教堂使他的内心

不再经受激烈愤怒的折磨。

去吧，旅行者，

如果可以，去效仿

那些为保卫自由

做出贡献的人。

1774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英国军队必须横渡大西洋开赴美洲战场。这样一来，改变发生了，爱尔兰实际上不再受英国军队的控制；有消息说，法国开始入侵，因为法国也向英国宣战了。因此，爱尔兰天主教教徒和新教教徒都主动请缨，进行防御。一段时间内，他们忘记了以往的仇恨，相互合作，发挥了双方的力量。英国不得不面对另一次起义的威胁；他们担心爱尔兰也会像美国一样突然脱离英国统治，因此他们准许爱尔兰成立独立议会。因此，从理论上讲，爱尔兰脱离英国，赢得了独立，然而它继续承认英国国王的统治地位。但是，爱尔兰议会（Irish Parliament）依然是由地主组成的狭隘的议会，议员全部是新教教徒，过去他们一直压制着天主教教徒。天主教教徒在许多方面依然处于不利地位。唯一的区别就是，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之间的感觉变好了。这个议会的领袖是一位新教教徒亨利·格拉顿（Henry Gratan），他希望为天主教教徒扫清障碍，但是成效不明显。

与此同时，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它给爱尔兰带来了巨大希望。说来也怪，这场革命受到了关系逐渐拉近的天主教教徒和新教教徒的共同欢迎。一个叫作“爱尔兰人联合会”（United Irishmen）的组织成立了，它的目的就是将天主教教徒和新教教徒联合起来，并致力于解放天主教教徒。爱尔兰人联合会的成立并未获得政府的批准，很快便遭到了取缔。因此，1798年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周期性的起义。这场战斗和以前的不一样，它并不是阿尔斯特与爱尔兰其他地区之间的宗教战斗，而某种程度上是双方力量都参与的一场民族起义。这场起义同样遭到了英国的镇压，起义中的爱尔兰英雄沃尔夫·托恩（Wolfe Tone）被判犯有叛国罪而遭到了处决。

因此，很显然，爱尔兰成立的独立议会并没有给爱尔兰人带来什么变化。那时的英国议会是由受人操纵的选区选举出来的，它受到小部分地主阶级和少数富有商人的控制，本身就是狭隘、腐败的。爱尔兰议会同样受到这些势力的侵害，此外，虽然爱尔兰是天主教国家，爱尔兰议会却受到这个国家中少数新教教徒的控制。尽管如此，英国政府决定革除爱尔兰议会，让爱尔兰加入英国。这一决定遭到爱尔兰的强烈反对，但是都柏林议会（Dublin Parliament）议员被大量的贿赂所诱惑，投票同意解散他们的议会。1800年，英国通过了《联合法案》（*Act of Union*），存在时间很短的格拉顿议会就此终结，一些爱尔兰议员被派往伦敦的英国议会。

解散腐败的爱尔兰议会或许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唯一的遗憾就是，如果它继续存在的话，也许今后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这部《联合法案》带来了真正的伤害，这种伤害可能正是英国的本意。这部法案终结了爱尔兰的南北统一运动，也阻止了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之间的团结统一。信奉新教的阿尔斯特不再理睬爱尔兰其他地区，双方的关系开始疏远。双方之间还出现了另一个差异：阿尔斯特和英国一样，开始发展现代工业，爱尔兰其他地区则依然保留农业传统，而由于土地制度的限制以及越来越多的人移居国外，就连农业发展都

举步维艰。因此，当爱尔兰北部成了工业化地区时，爱尔兰其他地区，特别是西部，在工业上依然处于落后的原始状态。

《联合法案》也曾引发过一场起义。一位有才华的年轻人罗伯特·埃米特（Robert Emmet）领导了这场起义，但最终失败了，他和以前的许多同胞一样，最终死在了绞刑架上。

爱尔兰议员进入了英国下议院，但是天主教教徒无法进入议会。无论在英国还是爱尔兰，天主教教徒都没有资格进入议会。1829年，这些障碍被排除了，天主教教徒可以出席英国议会。爱尔兰领袖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成功地排除了这些障碍，因此他被称为“解放者”。渐渐地，另一个变化也发生了，选民范围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选举权。如今爱尔兰与英国联合之后，它们拥有了相同的法律。因此，著名的《1832年改革法案》对爱尔兰和英国都适用。后来的《选举改革法》（*Franchise Bill*）也同样适用于二者，这样一来，英国下议院中的爱尔兰议员也发生了转型，他们由地主的代表变成了信奉天主教的农民阶级以及爱尔兰民族主义的代言人。

受地主压榨、被强索地租的爱尔兰佃户们十分贫穷，土豆是他们的主要食品。实际上，他们只能以土豆为食，像如今的印度农民一样，他们没有粮食储备，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他们处在生存的边缘，不再有任何抵抗的力量。1846年，土豆歉收，爱尔兰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尽管出现了饥荒，地主们还是以佃户欠租为由，将他们从土地上赶了出去。众多爱尔兰人背井离乡，去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爱尔兰几乎成了一片了无人烟的土地。许多田地无人耕种，成了草原牧场。

农业土地转变为牧场的过程，在爱尔兰持续了100多年，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转变的主要原因是英国生产羊毛纺织品的工厂在不断地发展。运转的机器越多，生产的产品就越多，需要的羊毛也越多。对

于爱尔兰地主来说，比起需要人耕种的田地来说，养羊的牧场给他们带来的利润要丰厚得多。牧场并不需要很多工人，只需要几个人照看绵羊就可以了。农业劳动者成了多余的人，因此他们被地主赶走了。于是，人口本来就稀少的爱尔兰，经常会有“多余的”劳工，因此这个国家的人口越来越少。爱尔兰仅仅成了一个为“工业化”的英国提供原材料的地区。如今，之前发生的耕地变牧场的过程已经颠倒了过来，田地耕作恢复了。奇怪的是，导致这个情况出现的原因，是一场1932年开始的、发生在爱尔兰和英国之间的贸易战争。

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爱尔兰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也就是在外居住的地主实行的地主所有制给悲惨的佃户带来的麻烦。最终，英国政府决定让地主彻底离开，政府强制购买了地主的土地，并将土地分给了佃户。当然地主们没有一点损失，政府以足价买下了他们的土地。佃户得到了土地，但是他们也承担了支付土地费用的重担。他们不需要一次性付清，只需每年支付一部分费用。

在1798年民族起义之后的100多年里，爱尔兰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起义。与之前的几个世纪不同，19世纪爱尔兰并没有时常发生此类事件，但这并不表示爱尔兰有了安于现状的感觉。这只是因为最近一次起义令人精疲力竭，而后爱尔兰又遭遇了严重饥荒，并且人口数量也在减少。某种程度上，在19世纪后半叶，人们也开始关注英国议会，他们希望爱尔兰议员在英国议会中可以为爱尔兰做出一些贡献。不过，还是有一些爱尔兰人想要继续他们的起义传统。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起义，爱尔兰的精神和灵魂才能保持活力和纯正。移居美国的爱尔兰移民成立了一个争取爱尔兰独立的团体。这些被称为“芬尼亚社社员”（Fenians）的人在爱尔兰组织了一些小规模的起义。但是他们脱离了爱尔兰大众，芬尼亚社没过多久就被铲除了。

这封信写得太长了，我只能就此停笔。不过爱尔兰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140 ——爱尔兰自治与爱尔兰新芬党

经过这么多次的武装叛乱，再加上饥荒和其他灾难，爱尔兰对于这种争取自由的方式感到疲惫了。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议会扩大了选民范围，不少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成为了议员，进入了英国下议院。人们希望这些议员可以为爱尔兰独立做出一些努力，他们开始寄希望于议会的行动，而不再是原先的武装起义。

北部的阿尔斯特和爱尔兰其他地区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两者之间依旧存在种族和宗教分歧，除此之外，经济上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阿尔斯特像英国和苏格兰一样，也实现了工业化，出现了大型的工厂生产活动。而阿尔斯特以外的爱尔兰其他地区则依然以农业为主，处于原始生产状态，人口稀少，贫困不堪。英国以前所采取的将爱尔兰分割成两个部分的策略，实在是成功过头了，多年以后连英国自己都无法克服这个难题。阿尔斯特成为爱尔兰独立的最大障碍。富有的信奉新教的阿尔斯特担心，在爱尔兰独立之后，他们会被迫与贫穷的信奉天主教的其他爱尔兰地区结合在一起。

英国议会和爱尔兰开始使用一个新词“自治”（Home Rule）。爱尔兰如今的需求就是自治。这与700年之前争取独立的要求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要求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它意味着，附属于英国的爱尔兰议会有权处理地方事务，而英国议会继续拥有重大问题的控制权。许多爱尔兰人不同意降低他们争取独立的要求。但是，整个国家已经厌倦了起义和争斗，不想再参与无法成功的叛乱行动了。

英国下议院中有一位叫作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的爱尔兰议员，他意识到英国两大政党——保守党

和自由党，都对爱尔兰漠不关心，于是他决定为难这两个党派，让他们难以继续他们客套的议会把戏。他和其他几位爱尔兰议员一起，通过发表冗长的演讲和其他拖延时间的手段，妨碍议会正常开展工作。英国人对此深感厌恶，指责这些手段并不符合议会制度，也缺乏绅士风度。但是，帕内尔不为这些批评所动。他进入议会的目的并非按照英国人制定的规则要弄英国人客套的议会把戏。他的目的是为爱尔兰服务，如果用正常的方式无法达到目的，他认为自己完全可以采取其他非正常的方式。不管怎样，他成功地吸引了人们对爱尔兰的关注。

帕内尔成了英国下议院中爱尔兰自治党（Irish Home Rule Party）的领袖，这个党派成了英国两大传统政党的眼中钉。两大政党几乎是势均力敌的，因此爱尔兰自治党人可以对其中任何一方产生较大的影响。这样一来，爱尔兰问题总是成为焦点。最终，格莱斯顿同意爱尔兰自治。1886年，他在英国下议院提出了一个《自治法案》（*Home Rule Bill*）。虽然该法案提出的自治办法是十分有限的，但它还是引发了一场风暴。保守党人当然是完全反对这项法案的，甚至是格莱斯顿所代表的自由党也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自由党因此分裂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加入了保守党，这部分人被称为“统一党”，因为他们支持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这部《自治法案》就这么夭折了，格莱斯顿也因此下了台。

七年之后的1893年，那时已经84岁高龄的格莱斯顿再次成为首相。他第二次提出了《自治法案》，这部法案在下议院勉强获得了通过。但是任何法案都必须经过上议院的通过才能正式颁布，而上议院中全是保守党人和保守分子。上议院并非通过选举产生，它是由地主和一些主教组成的世袭议会。这部在下议院通过的《自治法案》遭到了上议院的否决。

因此，议会的努力也没能为爱尔兰带来它所期待的结果。爱尔兰民族独立党[Irish Nationalist Party，或称自治党（Home Rule

Party）]依然在英国议会中进行着努力，希望取得成功；总的来说，他们受到了爱尔兰人民的信任。但是仍然有许多人对这些行动方式和英国议会失去了信心。许多爱尔兰人对狭义上的政治变得有些厌恶，他们于是投入到了文化和经济活动之中。在20世纪初的许多年里，爱尔兰出现了文化上的复兴，特别是恢复了依然在爱尔兰西部地区使用的爱尔兰传统语言盖尔语（Gaelic）。这种凯尔特人的语言文学曾经丰富多彩，但是英国几个世纪以来的统治使它淡出了人们的生活，正在慢慢地消失。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感到，爱尔兰只有通过使用爱尔兰人自己的语言，才能保留这个国家的精髓和传统文化，因此他们努力将这种语言从西部的村落里发掘出来，使它成为活的语言。为此他们成立了一个盖尔语联合会（Gaelic League）。任何地方，尤其是受他国统治的国家里，民族主义运动总是以本国语言为基础的。使用异国语言的运动无法联系大众并扎根于大众。在爱尔兰，英语不算是异国语言。几乎人人都熟悉英语，使用英语。比起盖尔语，人们显然对英语更熟悉。不过，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认为，恢复使用盖尔语很有必要，这样他们就不会脱离自己的传统文化了。

那时，爱尔兰人有一种感觉，他们觉得力量来自国家内部而非外界。仅仅依靠议会中的政治活动根本无法实现他们的理想，因此他们就尝试将国家建设得更加扎实和稳固。20世纪初的爱尔兰与以往截然不同，在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复兴，比如我之前提到过的文学和文化上的复兴，以及由于爱尔兰农民相互合作而产生的经济上的复兴。

但是，这些现象的背后依然是人们对独立的渴求，尽管英国议会中的爱尔兰民族独立党似乎留住了爱尔兰人的信心，但是人们对他们的信任已经动摇。他们仅仅被人看作喜欢发表演说、没有能力做事的政客。以前的芬尼亚社社员以及其他对独立有信仰的人，从不相信这些议会雄辩家以及他们提出的自治理念。现在新一代年轻的爱尔兰人也开始远离议会。既然他们已经有了自立自主的想法，何不把这种想法运用到政治中去呢？人们的脑海中再一次出现了武装起义的念头。

但是这种采取行动的渴望产生了新的转变，一位年轻的爱尔兰人亚瑟·格里菲思（Arthur Griffith）开始宣扬一种新的策略，也就是后来为人所知的新芬党（Sinn Fein），意思是“我们自己”。

这个词让我们了解了新芬党策略背后的思想。新芬党人希望爱尔兰完全依靠自己，而不寻求英国的帮助和救济。他们希望依靠国内力量，逐步增强整个国家的实力。他们支持恢复盖尔语的运动以及文化复兴。政治上，他们反对毫无用处的议会行动，对此也不抱任何希望。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武装起义并不可行。他们宣扬“直接行动”，这与议会行动恰恰相反，是对英国议会采取不合作的一种方式。二三十年前，匈牙利曾经采取过消极抵抗的策略并取得了成功，因此亚瑟·格里菲思以匈牙利为例，希望采取同样的策略，迫使英国做出公开回应。

在过去的13年里，在印度，我们采取过各种形式的不合作行动，我很有兴趣将之前发生在爱尔兰的类似行动拿来做个比较。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不合作运动的基础是非暴力政策。在爱尔兰，并没有这样的基础或背景，不过他们的不合作运动也同样从和平的消极抵抗中获得了力量。这场斗争就应该是非暴力的斗争。

新芬党的思想慢慢地在爱尔兰青年中传播。爱尔兰并没有因为这种思想而突然激动起来。仍然有一些人寄希望于议会，特别是1906年，自由党以多数席位恢复了议会中的地位。尽管在下议院占有多数优势，自由党人还是要面对以保守党人和统一党人为主的上议院，上下两院很快就产生了冲突。这场冲突的最终结果是限制了上议院的权力。下议院三度通过了上议院反对的财政预算案，使得下议院克服了上议院对财政事务的干预。这样一来，1911年颁布的《议会法案》（*Parliament Act*）使自由党人摆脱了上议院的束缚。但是，上议院仍然拥有很大的控制和干预权。

自由党人提出了第三个《自治法案》，并于1913年在下议院获得通过，他们预料到上议院一定会进行阻挠。果不其然，上议院否决了这个法案，于是，经过了一个费时费力的过程，下议院三度通过了这项法案。1914年它正式成为法律，适用于包括阿尔斯特在内的整个爱尔兰。

爱尔兰表面上似乎取得了自治，但是——“但是”实在太多了！当1912年和1913年议会围绕自治展开辩论的时候，爱尔兰北部地区发生了一件怪事。阿尔斯特的领袖宣称，他们不会接受这项法案，即使它成为法律他们也会进行抵制。他们扬言要发动叛乱，并为此进行着准备。他们甚至宣布，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寻求外国，也就是德国的帮助，共同与自治作斗争！这简直是公开而狂妄的通敌叛国。更为奇怪的是，英国保守党的领袖支持这次叛乱，许多人为此提供了帮助。富有的保守党阶级给阿尔斯特提供了巨额资助。很显然，这些所谓的“上层阶级”或者说统治阶级普遍支持阿尔斯特，许多出身于这些阶级的军官也站在阿尔斯特一边。他们暗中运送武器，公开训练志愿兵。阿尔斯特甚至成立了临时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准备在必要时刻掌权。有意思的是，阿尔斯特“叛乱”领袖中有一位著名的议会保守党成员，他就是后来成为伯肯黑德勋爵（Lord Birkenhead）的F. E.史密斯（F. E. Smith），他担任过印度事务大臣以及其他的高级职位。

叛乱是历史上再普通不过的事了，爱尔兰更是对此习以为常。不过，阿尔斯特叛乱的这些准备措施还是令我们特别感兴趣，因为在背后支持叛乱的政党，正是以其法制和保守的特点为荣的政党。这个政党总是提到“法律与制度”，喜欢对违背法律与制度的人施以重罚。然而，这个政党中的著名人物却公开发表叛国言论，并准备发起武装叛乱，而政党中的其他普通人竟出钱资助这场叛乱！还有一点也很值得注意，这场精心策划的叛乱完全不顾议会的权威，当时议会正在考

虑并且后来通过了《自治法案》。民主的基础因此受到重创，英国人以前吹嘘的他们对法制以及宪法的信赖都成了空谈。

1912年至1914年的阿尔斯特“叛乱”撕破了这些伪装以及高调的措辞，揭露了政府和现代民主的真实本质。只要“法律与制度”保护统治阶级的特权和利益，它们就会受到欢迎；只要民主没有侵犯到这些特权和利益，民主便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如果这些特权遭到了攻击，那么这个阶级就会奋起抗争。因此，“法律与制度”这个说法只代表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个事实表明，英国政府实际上还是一个阶级政府，甚至不用议会中的多数人同意，就能轻而易举地摆脱它。

如果议会中的多数人想要通过一项削弱统治阶级特权的社会法案，这个阶级就会不顾任何民主原则奋起反抗。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适用于所有的国家，而且我们很容易受到伪善的措辞和夸张话语的迷惑而忘记这个事实。在这方面，经常发生革命的南美国家以及拥有稳定政府的英国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英国的稳定在于其统治阶级已经根深蒂固，其他阶级的力量都不足以撼动他们。1911年，他们的保护伞之一上议院的实力被削弱了，因此他们产生了恐惧，而阿尔斯特成了叛乱的借口。

当然在印度，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很多次这组迷人的词语——“法律与制度”。因此，我们最好记住它的确切含义。我们也应该记住，我们的领导人之一，印度事务大臣，曾经是阿尔斯特叛乱的领袖。

因此，阿尔斯特为叛乱准备好了武器和志愿军，而政府则静观其变。政府没有颁布任何法规去阻止这些准备工作！不久之后，爱尔兰其他地区开始效仿阿尔斯特，组织成立了“国民志愿军”（National Volunteers），不过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争取自治而战，必要时他们会与阿尔斯特开战。因此，爱尔兰各处相互敌对的军队势力不断壮大。我们奇怪地发现，对阿尔斯特叛乱的志愿军武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英国当权者，在镇压国民志愿军的时候却十分清醒，尽管他们并未反对《自治法案》。

爱尔兰这两支志愿军之间的冲突似乎在所难免，一场内战一触即发。就在此时，一场更大的战争——世界大战于1914年8月爆发了，在这场战争面前，其他所有的事情都变得不值一提。《自治法案》（*Home Rule Act*）虽然成了法律，但是同时，英国政府规定，这部法案必须等到战争结束后才能实施！因此，自治依然无法实现，而且在世界大战结束前爱尔兰还会发生很多变化。

我介绍的这些不同国家的情况，都是截止到世界大战爆发时所发生的。我对爱尔兰的介绍也到了这个时间段，因此我们要暂时停止对爱尔兰的了解了。但是在结束这封信之前，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阿尔斯特叛乱的领袖并未因为他们的行动受到惩罚，反而受到了褒奖，被英国政府委任为内阁大臣以及其他高级职位。

141 ——英国占领埃及并保持对埃及的控制

越过大西洋，我们从美国跳跃到了爱尔兰。现在让我们再次跳跃到第三个大陆——非洲，看看另一个英国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埃及。我以前给你写过的几封信中提到过埃及早期的历史。由于我的疏忽，当时介绍得简短而混乱。即使我知道更多有关这个话题的内容，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也不能再回过头去介绍发生在早期的事情了。我们几乎已经介绍完了19世纪的相关情况，接着应该介绍20世纪的情况了。我们可不能总是前后跳跃啊！此外，如果每个国家过去发生的事情我都要讲述，这些信可怎么写得完呢？

然而，我也不会让你以为，埃及的故事是乏善可陈的。埃及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它的历史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长，这段历史可不是区区几百年，而是数千年。精妙和令人惊叹的遗址仍然能让我们想起这段遥远的往事。埃及是最早和最重要的考古研究地，人们从沙土中挖掘出了石碑以及其他遗迹，我们从中看到了远古时代令人陶醉的故事，这些遗迹在当时都是新建的。遗迹的挖掘和发现过程仍在继续，它为埃及的悠久历史增添了新的篇章。我们至今无法说出这段历史是何时产生、如何产生的。大约7000年前，居住在尼罗河流域的文明开化的人们就已经经过了长期的文化发展过程。他们有自己的图形文字——象形文字，他们制作了精美的陶器和花瓶，以及用黄金、铜、象牙和雪花石雕刻而成的各种容器。

据说，早在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之前，在埃及这片土地上就已经出现过31个埃及王朝。4000年至5000年的时

间里，埃及涌现出了一些伟大的人物，他们的影响力至今犹存。他们是充满行动力的人，其中有伟大的建筑师、梦想家和思想家、勇士、专制者和暴君、傲慢而自负的统治者，以及美丽的女性。我们看到，几千年间继任的埃及法老一位接着一位。女性拥有完全的自由，有些还成了统治者。埃及是一个受神职人员支配的国家，埃及人沉浸在对未来以及来世的憧憬之中。由受到强迫、遭到虐待的劳工建造起来的大金字塔，就是为法老的来世预先做好的一种准备。木乃伊同样是一种为了来生而保存尸体的方式。这些听起来似乎有些阴暗、严肃和无趣。然后，我们发现埃及人使用假发，因为那时候他们是剃光头发的，我们还能发现孩子们的玩具！有球、玩偶以及四肢可以活动的玩具小动物，这些玩具突然间让我们记住了古埃及人人性化的一面，他们似乎穿越了时光，和我们靠得更近了。

公元前6世纪，大约在佛陀释迦牟尼时期，波斯人征服了埃及，并将它划为从尼罗河到印度河之间广阔的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这些波斯人就是建都于波斯波利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君主们，他们未能征服希腊，并最终被亚历山大大帝击败。亚历山大大帝在埃及很受欢迎，埃及人认为他将埃及从波斯人的残暴统治中解救出来了。他将自己的丰碑留在了著名的学术和希腊文化的中心——亚历山大港。

你应该记得，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被他的将军们瓜分，于是埃及成了托勒密王朝的领土。托勒密王朝的人们与波斯人不一样，他们很快适应了环境，并接受了埃及的习俗。他们的行为举止和埃及人无异，几乎是公认的继承了法老传统的人。克利奥帕特拉是最后一位托勒密王朝的君主，在她死后，埃及于基督纪元开始前几年，沦为了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

远在古罗马接受基督教之前，埃及就已经信奉基督教了，埃及的基督徒受到了古罗马人的迫害，只好藏身于沙漠之中。沙漠中隐秘的修道院越来越多，那时候的基督教世界里，有关这些隐修者创造奇迹

的美妙而神秘的传说故事有很多。后来君斯坦丁大帝接纳了基督教，使之成为罗马帝国的合法宗教之后，这些埃及的基督徒试图进行报复，他们迫害非基督徒。非基督徒也被称为异教徒，指的就是那些忠于埃及古老教派的人。亚历山大港此时成了著名的基督教中心，但是由于基督教是埃及的国教，这个宗教内部的不同宗派之间开始相互争吵，争夺控制权。这些血腥的积怨令人厌恶，大部分人也因此彻底厌倦了一切基督教宗派。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带着新的宗教来到埃及，并且受到热烈欢迎。这就是阿拉伯人能够轻松征服埃及和北非的原因之一。基督徒再次受到迫害，遭到了极其残酷的镇压。

因此，埃及成为哈里发帝国的一个行省。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快速传播，古老的埃及语也被逐渐取代了。200年后的公元9世纪时，随着巴格达哈里发帝国实力的削弱，埃及成为土耳其统治下的半独立国家。又过了300年，抗击十字军的穆斯林英雄萨拉丁成为埃及苏丹。其后不久，萨拉丁的一位继任者从高加索（Caucasus）地区带来大量土耳其奴隶，并让他们成为他的士兵。这些白人奴隶被称为“马穆鲁克”，意思就是“奴隶”。他们是经过了精挑细选才加入军队的，每个人都身强力壮。几年之后，这些马穆鲁克发动了起义，其中一人成了埃及苏丹。从此开始了马穆鲁克统治埃及的时期，这个时期持续了两个半世纪，之后又以半独立的方式持续了近300年。因此，这些外国奴隶统治埃及的时间长达500多年——这是历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独特事例。

马穆鲁克并未在埃及形成一种世袭的等级制度或阶级。埃及军队不断地挑选高加索白种人中最优秀的自由奴隶加入他们的队伍。这些高加索人种是雅利安人，因此马穆鲁克也是雅利安人。这些外来人种在埃及土地上难以茁壮成长，他们的家族经过几代人之后就全部死亡了。但是，不断有新的马穆鲁克加入，因此这个阶级的数量，特别是力量和活力，都保存了下来。所以说，这些人虽然没有形成世袭的阶级，但他们还是形成了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贵族阶级和统治阶级。

16世纪初，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征服了埃及，并将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送上了绞刑架。埃及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但是马穆鲁克依然是掌握统治权的贵族阶级。后来，当土耳其人在欧洲的实力减弱后，马穆鲁克便开始在埃及随心所欲地行事，尽管从理论上说，埃及依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18世纪末，拿破仑来到埃及的时候，也遭遇了并击败了这些马穆鲁克。你或许还记得我曾经给你讲过马穆鲁克与法国军队之间的故事吧。马穆鲁克骑士骑马来到法国军队面前，以中世纪骑士的方式对法国将领提出，他们要一对一决斗。

现在，我们来到了19世纪。19世纪上半叶，统治埃及的是一位阿尔巴尼亚裔的土耳其人，名叫穆罕默德·阿里（Mehemet Ali）。他是埃及的统治者，或者和其他土耳其统治者的称呼一样，叫作“埃及总督”（Khedive）。穆罕默德·阿里被视为现代埃及的奠基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屠杀马穆鲁克，消灭他们的势力。他还击败过入侵埃及的一支英国军队，并成了埃及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只承认土耳其苏丹形式上的宗主权。他从农民阶级（而非马穆鲁克）中选拔建立起一支新的埃及军队，修建了新的运河，还鼓励种植棉花，后来棉花成了埃及的主要产业。他甚至威胁要占领君士坦丁堡并赶走他名义上的主人，但还是忍住没有这么做，只是将叙利亚纳入了埃及的版图。

1849年，80岁高龄的穆罕默德·阿里去世。他的继任者都是些软弱、奢侈浪费、毫无能力的人。不过，即使他们能力很强，也很难抵抗外国资本家的劫掠和欧洲帝国主义的贪婪。外国人，特别是英国和法国资本家，他们以很高的利率借钱给埃及总督，主要是供他们私人使用，而当他们没有及时付清利息的时候，外国军舰便会开过来收取利息！这是一场特殊的国际密谋，各国资本家和政府相互勾结，目的是掠夺和控制另一个国家。尽管几位埃及总督很无能，埃及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1876年1月，英国的主流报纸《泰晤士报》（*The Time*）报道说：“埃及的发展令人惊叹。它在70年中的进步，相当于

其他国家500年的进步。”尽管如此，外国资本家仍然坚持他们合法而不合理的要求，想让外界以为埃及这个国家正濒临破产，急需外国干预。外国政府，尤其是英国和法国政府，都急于干预埃及事务。对他们来说，埃及这份盘中餐实在太有诱惑力了，而且埃及是通往印度的必经之路，因此他们想找个理由干预埃及事务。

1869年，由受到强迫和虐待的劳工修建的苏伊士运河通航了。（你也许想知道，在大约公元前1400年的古埃及王朝时期，红海和地中海之间似乎就有过一条这样的运河！）这条运河的通航，打通了欧洲、亚洲和非洲之间的交通，使它们交汇在苏伊士港，埃及的重要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对英国来说，由于印度和整个东方关系着它的切身利益，因此控制这条运河和埃及是它的头等大事。1875年，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完成了一个精明之举。他以超低的价格，买下了无力偿还债务的埃及总督手中所有的苏伊士运河的股份。这不仅是一次良好的投资，同时也为英国政府带来了大量的运河控制权。埃及剩下的运河股份被卖给了法国资本家，因此实际上，埃及丧失了对这条运河所有的经济控制权。英法两国从这些股份中获取了巨额红利，同时又控制了运河，并牢牢控制了埃及。1932年，仅英国政府就从原本400万英镑的投资中获得了350万英镑的红利。

英国政府必然会尽力争取进一步控制埃及，因此在1879年，他们开始不断地插手埃及内部事务，并让英国资本家在埃及拥有了控制权。这自然引起埃及人的愤怒，一个决心让埃及摆脱外国干预的祖国党发展了起来。这个祖国党的领袖阿拉比帕夏（Arabi Pasha）是一位年轻的军人，他出身于贫穷的工人阶级家庭，之后加入埃及军队，成了一名士兵。他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当上了陆军指挥官，此后他便拒绝执行英法两国统治者的命令。英国以战争的形式回应了这种拒绝顺从他们命令的行为。1882年，英国舰队炮轰并烧毁了亚历山大港。在炫耀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击败了埃及武装之后，如今英国完全控制了埃及。

英国由此开始占领埃及，这在国际法中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埃及是土耳其领土的一个行省或一个部分。英国与土耳其关系融洽，但是英国依旧从容地占据着一部分土耳其领土。它在埃及安插了一个全权代理人，这位全权代理人是当地的领袖，他就像是一位莫卧儿大帝（Great Moghal），类似于印度总督，在这位英国全权代理人面前，甚至连埃及总督以及大臣都没有任何权力。第一位英国全权代理人是一位巴林家族的军官（Major Baring）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他统治了埃及25年。克罗默统治埃及的时候就像一位专制君主。他关心的头等大事就是给外国资本家和债券持有者支付红利。这种支付很有规律，因此埃及良好的经济形势得到了广泛赞誉。和印度一样，埃及也实行了提高管理效率的措施。但是，在他这25年统治期间，埃及原先的债务依然没有减少。事实上，在这25年中，克罗默不仅没有为教育做任何事，甚至还关停了一所即将开办的国家级大学。我们可以从他1892年给当时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写的一封信中了解他的观点：“埃及总督快要变成十足的埃及人了！”因为在克罗默勋爵眼里，如果一个埃及人表现得像个埃及人的话，是一种冒犯，就像一个印度人如果表现得像个印度人的话，英国人就会对他产生不满，并且惩罚他。

法国人不喜欢英国对埃及的这种控制，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战利品。其他欧洲大国也不喜欢这种控制；不用说，埃及人对此更是深恶痛绝。英国政府告诉大家不要担心，因为他们只会在埃及做短暂停留，很快会离开埃及。英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发表官方正式声明，表示会撤离埃及。这种严肃的声明至少发表了50多次，次数多到数也数不清了。然而，英国人仍未离开，依然赖在埃及！

1904年，英国与法国之间就许多争议问题达成了协议。他们约定，法国对摩洛哥享有特权；作为交换条件，法国承认英国对埃及的占领。这是一场公平的交易，只是他们没有询问过埃及的宗主国土耳其的意见，当然更不会问埃及人民的意见了！

埃及这个时期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埃及法庭对外国人没有司法权和管辖权。这些埃及法庭被认为不够完善，因此外国人有权受到本国法庭的审讯。于是被称为“治外法权”的特别法庭成立起来了，这些法庭由外国法官组成，他们的内心当然是为了外国利益考虑的。特别法庭中的一位外国法官曾经这样描写道：他们的司法部门，给剥削这一国家的外国同盟提供了极好的服务。我相信，居住在埃及的外国居民一定也逃避了大部分税收。这简直是一种幸福的状态——无须缴税，不受居住国法律或法庭的约束，同时还能轻易剥削那个国家！

就这样，英国统治并剥削着埃及，英国的代理人或代表们带着独裁君主一般的显赫气派居住在埃及的住所里。自然而然地，埃及的民族主义发展起来了，改革运动也初具规模。19世纪埃及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就是宗教领袖哲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uddin Afghani），他试图对伊斯兰教进行创新，努力使伊斯兰教适应现代社会情况。他主张，所有的社会进步都可以与伊斯兰教相适应。他对伊斯兰教的创新实际上与印度尝试创新印度教的努力是相似的。这些创新的尝试是建立在回溯宗教原来的基本教义、为传统的习俗和信条发现新的意义的基础之上的。由此现代知识成为对原本宗教知识的一种补充，或者是一种注解。当然，这种创新宗教的方法与科学方法截然不同，科学方法可以不受任何原有信仰的束缚，可以大胆地向前发展。不管怎样，哲马鲁丁不仅仅在埃及形成了极大的影响力，同时还影响了其他阿拉伯国家。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埃及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成了新的民族主义的支柱力量。从这个阶级中走出了一位最伟大的现代埃及领袖——萨德·柴鲁尔帕夏（Saad Zaghlul Pasha）。埃及主要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但是埃及仍有相当多信奉基督教的科普特人（Copts）。这些科普特人是最纯正的古埃及人的后裔。新的中产阶级中既有穆斯林，也有科普特人，幸运的是，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敌意。英国人试图在两者之间挑起冲突，但是没有成功。英国人还想分

裂祖国党。像在印度一样，他们偶尔会成功地拉入一些中立派人士与他们合作。关于这件事，我会在以后的信里告诉你。

这就是1914年8月世界大战开始时埃及的情况。三个月以后，土耳其与德国联手对抗英国、法国以及他们的盟友。英国随即决定将埃及作为它的附属国，但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于是英国转而宣布埃及成为它的受保护国。

埃及的情况就介绍到这儿。19世纪下半叶，非洲其他国家也沦为了欧洲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欧洲大国争先恐后地瓜分了这片广袤的大陆。它们就像秃鹫一样扑向非洲，有时候相互之间还会发生争吵。它们的行动几乎没有受到阻碍，不过，1896年，意大利被阿比西尼亚击败了。非洲主要受英国和法国的控制，有些地区受到比利时、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控制。德国直到在世界大战中战败之前，也一直在非洲占据着一席之地。非洲只剩下两个独立的国家，一个是东边的阿比西尼亚，一个是西海岸的小国利比里亚（Liberia）。摩洛哥受到法国和西班牙的双重控制。

这些广阔的领土被他国占领的故事既漫长又可怕，这些故事还远未结束。这片大陆遭到的剥削，特别是这片大陆上的橡胶遭到榨取的方式更加可怕。许多年前，发生在比利时属刚果（Belgian Congo）的暴行震惊了所谓的文明世界。黑人所肩负的重担一直都无比沉重。

19世纪下半叶以前，有“黑暗大陆”（Dark Continent）之称的非洲，就其内部情况而言，几乎是一块无人了解的土地。人们在这片大陆上进行冒险而刺激的旅程的时候，这片神秘的土地还没有在地图上标注出来。最伟大的非洲探险家是一位苏格兰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这片大陆吞噬了他，外部世界许多年都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与他的名字密切联系的是记者、探险家亨利·史丹利（Henry Stanley），他去非洲寻找大卫·利文斯通，最终在非洲内陆地区找到了他。

142 ——土耳其成为“欧洲病夫”

跨越地中海从埃及到土耳其仅有一步之遥。19世纪，欧洲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逐渐衰落。这种逐渐发生的衰落从18世纪就开始了。也许你还记得，我给你讲过，土耳其人曾经围攻过维也纳，一段时间之内，欧洲面对土耳其人的武力感到惶恐不安。西方虔诚的基督徒认为，土耳其人是“上帝之鞭”，是上帝派来惩罚基督教世界的罪恶的。但是土耳其人最终在维也纳的城门前被击退，之后局势发生了彻底的扭转；从那以后，他们在欧洲就处于了防御态势。对他们来说，他们在欧洲东南部征服的许多民族就像许多的尖刺。他们并不准备同化这些民族，即使他们想这么做或许也不会成功，民族主义的精神与土耳其人的高压统治发生了很大冲突。在东北部，沙皇俄国的势力越来越大，并不断对土耳其领土施加压力。沙俄成了土耳其的宿敌，在近200年的时间里，沙俄时不时对土耳其发动战争，直到最后，俄国沙皇和土耳其苏丹几乎同时衰败了，他们的帝国也随之没落。

奥斯曼帝国存在的时间很长。在小亚细亚地区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它开始于1361年在欧洲立足。尽管君士坦丁堡是1453年才落入土耳其人手中的，但是它周围的领土早在1453之前就被土耳其人占领了。由于西亚的帖木儿人发起了暴动，并于1402年在安哥拉压倒性地击败了土耳其苏丹，因此君士坦丁堡曾经得到过一段时间的拯救。但是，土耳其人很快从这场失败中恢复了过来。从1361年开始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终结，奥斯曼帝国存在的时间长达5个半世纪之久。

不过，在中世纪结束之后，土耳其人并未适应欧洲发展的新情况。贸易和商业不断增长，欧洲从事制造业的城市以更大的规模在生产各类产品。土耳其人对此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们是优秀的士兵，是

勇猛而训练有素的战士，在闲暇时间里他们是逍遥自在的人，一旦受到战争的鼓舞，他们就会变成凶猛无情的人。尽管他们定居在城市里，建造了华丽的建筑来点缀他们的城市，但是他们骨子里依然保留着游牧的本性，因此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有着游牧的特点。这种生活方式在土耳其人的故乡也许是最适合的，但是它并不适合欧洲和小亚细亚地区的新环境。土耳其人拒绝适应新环境，因此，他们和外界环境这两种不同的体系之间不断地发生冲突。

奥斯曼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覆盖了东西方之间所有的古代贸易通道。假如土耳其人愿意并且具备了必要的能力，完全有机会利用这个地理位置的优势，让自己成为一个商业大国。但是，他们没有这种意愿，也没有这种能力，或许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其他人利用这种贸易获利，他们甚至出面阻碍贸易活动的进行。这种对传统贸易通道的阻碍，一定程度上迫使欧洲的航海者和商业者寻找其他通往东方的通道，这也导致后来哥伦布在西线发现了新航道，迪亚士和瓦斯科·达·伽马在东线发现了新航道。但是，土耳其人对此依然漠不关心，仍旧依靠严格纪律和军事实力控制着他们的帝国。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商业和创造财富的活动在奥斯曼帝国占领下的部分欧洲领土上渐渐地消失了。其中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种族和宗教冲突造成的。从十字军东征甚至之前开始，土耳其人和巴尔干半岛上信奉基督教的种族之间就一直存在宗教不和。新兴的民族主义更是火上浇油，不断给土耳其人制造麻烦。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看看奥斯曼帝国占领的欧洲领土的情况是多么恶劣：1829年希腊独立的时候，著名古城雅典只是一个仅有2000名居民的小村庄。（如今100年过去了，雅典的人口已经超过50万人。）商业和其他创造财富的活动锐减，土耳其统治者最终也尝到了这一变化带来的恶果。帝国的主体部分变得越发衰弱和贫困，帝国的核心也随之陷入了虚弱和痛苦。令人惊奇的是，即使出现了这么多冲突和困难，奥斯曼帝国依然持续存在了很长时间。

几百年间，土耳其苏丹的力量都掌握在耶尼切里（禁卫军）手中，他们是由从小经过严格训练、信奉基督教的奴隶组成的土耳其军队。耶尼切里会让人想起埃及的马穆鲁克，不过他们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尽管耶尼切里是土耳其军人中的精英，但是他们没有像埃及的马穆鲁克那样成为土耳其的统治力量。不过，与马穆鲁克相似的是，他们也没有形成世袭的阶级。作为奴隶，他们享有特权，可以担任高官，不过，他们的孩子是拥有自由的穆斯林，不能长期留在这支只招收奴隶的特权军队里。这支军队只招收新的信奉基督教的白人奴隶。这听上去很奇怪，不是吗？但是要记住，那时候伊斯兰教国家里的“奴隶”这个词的含义与现在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从严格意义上和法律意义上说，他们是奴隶，但他们可以担任高级官职。你应该记得德里的奴隶王和埃及的萨拉丁吧？他们原本也是奴隶。土耳其人似乎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统治阶级需要经过全面的训练，尽可能地提高他们的能力。和老师一样，他们知道，训练一个人的最佳时期是从年幼时期开始。他们也许很难把穆斯林的孩子带走，让这些孩子与他们的父母完全断绝联系，并让他们成为奴隶。因此，他们抓住年幼的基督徒，让他们进入苏丹的奴隶家庭，并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训练。当然，这些小男孩长大之后会成为穆斯林。

这种体系也延伸到了苏丹自己身上。苏丹的婚姻和一般人不同。精挑细选出来的奴隶女孩们会被送到苏丹家中，之后她们就会成为苏丹孩子的母亲。因此，直到18世纪早期，所有的土耳其苏丹都是奴隶母亲所生的，他们和其他奴隶家庭出身的人一样，必须经历同样严格的训练。

这种对奴隶的精心挑选以及上至苏丹、下至平民所接受的专门训练是有一定道理的。这种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了一些功效，新的奴隶不断带来新鲜血液，也就无法形成世袭的统治阶级。也许帝国在早期就是依靠这种体系获得力量的。但是，这种体系显然与欧洲和亚洲的情况完全不同。它与封建制度大不相同，与替代欧洲封建主义的制

度更是相去甚远。在这种制度下，由于缺乏贸易和商业活动，因此无法形成真正的中产阶级。16世纪下半叶以后，这种制度不像原先那么纯正了，奴隶家庭里开始出现世袭的情况，家庭成员的儿子们可以留在家中并继承父亲的工作。这种制度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渐渐开始松动。不过，它的影响依然存在，土耳其于是显得与欧洲格格不入，尽管几个世纪以来土耳其与欧洲联系密切，但是对欧洲而言，土耳其依然非常陌生。在土耳其内部，外国人的聚居区也完全与外界隔绝，拥有自己的法律和小圈子。

我给你讲了很多有关这种特殊的土耳其传统体系的内容，因为这种体系很独特，它对奥斯曼帝国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当然，现在这种体系已经不复存在，已经成了历史。

土耳其过去20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的历史，他们与持续压境的俄国人之间发生了战争，与受他们统治、爆发起义的民族之间也燃起了战火。希腊、罗马尼亚（Rumania）、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黑山（Montenegro）和波斯尼亚都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也都是奥斯曼帝国的组成部分。如我们所见，希腊在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帮助下，于1829年脱离了奥斯曼帝国。俄国是一个斯拉夫人的国家，巴尔干半岛上的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也是斯拉夫人的国家。沙俄想要显示出自己是这些巴尔干斯拉夫人（Balkan Slavs）的保护者和捍卫者。对于俄国来说，真正的诱惑是君士坦丁堡，俄国所有策略的目的，就是要占有这座古老的帝国中心，因为沙皇自认为是拜占庭君主的继承人。1730年，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开始了一系列的战争，这些战争时断时续，爆发的时间分别是1768年、1792年、1807年、1828年、1853年、1877年，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14年。1774年，俄国从土耳其手中夺取了克里米亚半岛，因此他们的势力范围到达了黑海。但这并没有带来多大优势，因为君士坦丁堡的地理位置封锁了黑海的出海口。1792年和1807年，俄国边境不断靠近君士坦丁堡，土耳其边境则不断向后退。在希腊独立战争期间，沙皇试图利用这场战争，趁着土耳其无暇

顾及之时对其发动进攻。要不是英国和奥地利插手，他也许就成功占领君士坦丁堡了。

英国和奥地利为什么要从俄国手中解救土耳其呢？并非因为它们热爱土耳其，而是因为它们要对抗俄国，它们担心俄国会强大起来。以前我告诉过你，英国和俄国在亚洲和其他地区一直有对立的传统。特别是对印度的占领使英国直接到达了俄国边境，英国总是担心沙俄会对印度下手。因此，他们的策略是阻挠俄国，使它无法增添力量。一旦占领君士坦丁堡，俄国就会获得地中海的优良港口，也就能够在靠近印度的航道上驻泊一支舰队。这个风险实在太大了，因此英国屡次阻挠俄国对土耳其的攻击。奥地利也希望赶走俄国。虽然奥地利现在是一个小国，多年前它却是一个毗邻巴尔干半岛的大型帝国，它想等到土耳其瓦解之后，瓜分到部分巴尔干半岛国家的领土。所以它必须赶走俄国。

可怜的土耳其面临的情况似乎很糟糕，这些强大的邻国虎视眈眈地等待着，一旦有机会它们就会扑向它，将它撕碎。1853年，俄国沙皇在谈及土耳其时对英国大使说："我们控制着一个病夫——他已经病入膏肓了……他也许会突然死在我们手上……"这个说法很有名，土耳其因此得名"欧洲病夫"。但是，这个病夫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真正死去。就在1853年，沙皇又做了一次尝试，想击垮土耳其。这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英国和法国在这场战争中成功地击退了俄国的进攻。战争结束21年之后的1877年，沙皇再一次攻打土耳其并将其击败，不过其他国家也再次进行了干预，在一定程度上解救了土耳其，至少确保了君士坦丁堡没有落入俄国手中。1878年，在柏林召开了一次著名的国际会议，会上讨论了土耳其的命运，俾斯麦、迪斯雷利和其他许多欧洲政要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之间互相威胁、密谋获取自己的利益。英国与俄国的战争一触即发之时，俄国做出了让步。《柏林条约》（*Treaty of Berlin*）的内容包括：巴尔干半岛国家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黑山获得了独立；奥匈帝国占领

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Herzegovina，理论上，土耳其依然统治着这个地区）；由于英国在一定程度上站在了土耳其一边，因此土耳其将塞浦路斯岛（Island of Cyprus）让给了英国。

后来的一次俄土战争（Russo-Turkish War）发生在36年之后的1914年，这场战争也是世界大战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土耳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土耳其在1774年的战争中惨败于俄国，第一次震惊了土耳其人，这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在欧洲已经处于落后地位了。作为一个军事国家，土耳其首先意识到，他们必须更新自己的军队。军队完成了一定程度的更新，通过新的军官阶级，西方思想开始渗入土耳其。我告诉过你，土耳其几乎没有中产阶级，也没有其他成体系的阶级。在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土耳其才真正开始尝试进行西化。一场争取建立立宪政府的运动（也就是建立民主议会，取代苏丹独裁统治）开始发展起来。米德哈特帕夏（Midhat Pasha）是这场运动的领袖。1876年，君士坦丁堡发生了支持立宪的暴乱，苏丹默许了这些行动，但由于保加利亚的暴动以及俄国发起的战争，很快苏丹就不再理会这些行动了。在基础经济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这场战争的高额花费以及改革的巨大成本，最终导致了土耳其政府破产，土耳其只能从西方资本家手里借钱，于是这些资本家控制了土耳其的部分财政收入。因此，土耳其尝试进行的西化和改革并未获得成功。这些变化很难适应土耳其帝国的古老体系。

在20世纪早期，立宪的需求进一步增强。和以前一样，军官是这个国家唯一形成系统的人群，一个叫作“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 Party）的新兴团体在这群人中快速地发展起来。秘密成立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Commitees of Union and Progress）获得了大部分军人的支持，并于1908年迫使苏丹恢复了1876年的宪法。为此，土耳其迎来了一个人人平等、拥有完全主权的新纪元；人们欢呼

雀跃，之前一直相互残杀的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们相互拥抱，喜极而泣。

英俊而自负、大胆而无畏的恩维尔·贝伊（Enver Bey）是这场无伤亡革命的主要领导者。日后成为土耳其救世主的穆斯塔法·凯末尔也是一位重要的青年土耳其党领袖，但是和恩维尔相比，他处于幕后，这两人的关系并不好。

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日子并不轻松。苏丹给他们带来了麻烦，还发生过流血事件，于是他们废黜了这位苏丹，另立了新苏丹。其他大国给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困难和麻烦。奥匈帝国趁乱宣布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奥匈帝国在1878年《柏林条约》签署后占领了这一地区）。意大利在北非强占了的黎波里（Tripoli），并向土耳其宣战。土耳其人对此无能为力，由于没有像样的海军，他们只能顺从意大利人的要求。刚刚处理完这件事，他们就面临了一个更新、更近的威胁。急于将土耳其赶出欧洲并分享战利品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黑山，认为这个时刻对它们十分有利，于是联合起来形成了“巴尔干同盟”（Balkan League），并于1912年攻打土耳其。土耳其精疲力尽、混乱不堪，立宪主义者和保守派开始争夺权力。在巴尔干同盟面前，土耳其完全崩溃了，损失极其惨重。几个月后，第一次巴尔干战争（Balkan War）结束，土耳其几乎完全失去了它在欧洲占领的地区，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它甚至极不情愿地被迫割让了它所占领的欧洲古城阿德里安堡。

但是很快，取得了胜利的巴尔干各国围绕战利品发生了争吵，保加利亚突然背叛同盟，开始攻击其他同盟国家。双方互相残杀，为了趁乱得利，同盟之外的罗马尼亚也加入了同盟，对抗保加利亚。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保加利亚大败，失去了原先得到的所有领土，罗马尼亚、希腊和塞尔维亚则获得了很多领土。土耳其也拿回了阿德里安

堡。巴尔干各民族之间的仇恨真是令人惊异。巴尔干各国都是小国，但在很多事情上它们都是欧洲的风暴中心。

1909年被青年土耳其党人废黜的苏丹值得我们关注。这位苏丹就是在1876年即位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他不喜欢改革，也不喜欢现代创新，但是他有自己的一套，他因挑起西方大国之间的竞争而闻名于世。你应该记得，所有土耳其苏丹以前也都是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哈里发。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充分利用他的这一地位，试图发起一场“泛伊斯兰教运动”（Pan-Islamic Movement）——也就是一场其他国家的穆斯林都可以参加的运动，他想通过这场运动得到其他国家的穆斯林的支持。有关泛伊斯兰教主义（Pan-Islamism）的话题在欧洲和亚洲持续了几年，但是泛伊斯兰教主义并没有坚实的基础，世界大战彻底终结了它。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反对泛伊斯兰教主义，前者的力量比后者更胜一筹。

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欧洲不得人心，因为人们认为，发生在保加利亚、亚美尼亚和其他地方的残酷镇压和大屠杀都是他主使的。格莱斯顿称他为“杀人狂”，并在英国领导了一场反对这些暴行的大型运动。土耳其人自己也认为，他的统治是土耳其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在巴尔干半岛和亚美尼亚，屠杀和暴行经常发生，巴尔干各国、亚美尼亚以及土耳其把这当成了家常便饭。和土耳其人屠杀巴尔干各民族以及亚美尼亚人一样，巴尔干各民族以及亚美尼亚人也屠杀了土耳其人。几个世纪以来的种族和宗教仇恨已经深深植入这些民族的血液之中，他们以十分可怕的形式表达了这种仇恨。亚美尼亚是最大的受害者，现在它是靠近高加索地区的一个苏维埃国家。

因此，巴尔干战争之后，土耳其感到精疲力尽，它在欧洲仅剩下了一个立足之处。土耳其帝国的其他部分也开始分崩离析。当然，埃及仅仅在名义上属于土耳其，实际上是被英国占领和剥削的。不过，就连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出现了民族主义运动的迹象。土耳其感到心灰

意冷和大失所望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土耳其人在1908年时的大胆憧憬都灰飞烟灭了。就在这时，德国似乎对土耳其产生了同情。德国将眼光投向东方，期望将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到整个中东。土耳其也有求于德国，于是它们之间的联系渐渐加强了。这就是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仅一年之后、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的情况。土耳其依然不得安宁。

143 ——沙皇统治的俄国

现在的俄国是一个苏维埃国家，工人代表和农民代表管理着这个国家的政府。在某些方面，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无论现实情况如何，这个国家的政府结构和社会结构是建立在社会平等原则上的。这是目前的情况。然而，许多年前，整个19世纪以及之前，俄国还是欧洲最落后、最保守的国家。那时的俄国实行的是最纯正的独裁统治和独裁主义；尽管西欧发生了革命和变化，俄国沙皇依然坚持“君权神授”的理论。俄国的教派是古老的东正教，而非天主教或新教。就连俄国的东正教或许也比其他地方的教派更加专制，它也是沙皇政府的后盾和工具。这个国家被称为“神圣俄罗斯”（Holy Russia），沙皇则是人们的“白人小父亲”（Litle White Father），教会和当权者利用这些传奇故事迷惑人心，让他们的注意力无法集中在政治和经济状况上。这种神圣氛围总是奇怪地出现在历史进程之中！

神圣俄罗斯的典型象征是“笞刑”，经常发生“集体迫害”——这是沙俄呈现给世界的两个词。笞刑就是用一种皮鞭惩罚农奴和其他人的体罚。集体迫害指的是严重的、有组织的迫害，实际上就是指大屠杀，特别是对犹太人的屠杀。沙俄的后方是广阔无边的荒凉之地西伯利亚，一提到这个名字人们就会联想到流放、监禁和绝望。众多政治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流放者营地和聚居地逐渐扩大，在这些聚居地周围则是自杀身亡者的坟墓。漫长而孤寂的流放期和监禁期令人难以忍受，许多勇士的心理和身体在巨大压力下彻底垮掉。一个人必须拥有坚强的意志、平静而沉着的内心以及持久的勇气，才能与世隔绝地生活，远离朋友和伙伴，远离能够分享他的希望和减轻他负担的人们。因此，沙俄摧垮了每个想要造反的人，镇压了一切想要获得自由

的人。俄国甚至阻止人们的旅行，因为这样一来，外国的自由思想就不会传进俄罗斯。但是，被压抑的自由会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当它不断向前发展的时候，很有可能呈现出跳跃式的增长方式，这势必会让旧的体制感到不自在。

在以前的信中，我们谈到过沙俄在亚洲和欧洲各处的一些活动和策略，这些地区包括远东、中亚、波斯和土耳其。现在，让我们添加一些内容，把这些独立的事件与我们的主题结合起来。俄国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了两面性，其中一面朝向西方，另一面朝向东方。俄国凭借自己所处的位置，发展成了一个欧亚大国，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它时而对东方产生兴趣，时而对西方产生兴趣。在西方遭到厌恶，它就会转向东方；在东方遇到阻碍，它又会转向西方。

我告诉过你，由成吉思汗打下江山的蒙古帝国是如何终结的，也告诉过你，在莫斯科大公的带领下，俄罗斯王公们最终是如何把金帐汗国的蒙古人赶出俄罗斯的。这是发生在14世纪末的事情。莫斯科大公渐渐地成了整个国家的独裁统治者，并自称沙皇（或恺撒）。他们的观念和习惯大部分保留了蒙古人的传统，他们与西欧的差异很大，西欧把俄罗斯视为野蛮的国家。1689年，沙皇彼得即位，人称“彼得大帝”。他决定让俄国赶上西方国家，在欧洲做了一次长途旅行，调查了欧洲国家的情况。他引进了许多自己亲眼所见的技术，并用自己的西方化思想去影响那些顽固而无知的贵族阶级。当然，民众是非常落后和压抑的，至于民众如何看待自己的改革，彼得并不是很关心。彼得看到，当时所有的大国都有强大的海上力量，意识到了成为海上强国的重要性。但是，尽管俄国幅员辽阔，但是当时除了通往北冰洋的入海口以外，俄国没有其他的入海口，这一点对俄国非常不利。因此，他向西北的波罗的海（Baltic Sea），以及南边的克里米亚半岛推进。他并没有到达克里米亚半岛（他的继任者们做到了），但是他在击败瑞典（Sweden）后到达了波罗的海。他建立了一座新的西方化城市——圣彼得堡，位于涅瓦河（Neva）畔，紧邻通往波罗的海的芬

兰湾（Gulf of Finland）。为了彻底破除依附于莫斯科的旧传统，他将都城迁到了这里。1725年，彼得大帝去世。

半个多世纪之后的1782年，另一位俄国统治者再次试图“西化”这个国家。她就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也被称为“大帝”。她是一位非同寻常的女人，强大、残酷、能干，私生活方面的口碑一团糟。通过谋杀，她推翻了沙皇，也就是她的丈夫，成了俄罗斯帝国的独裁统治者，统治了俄罗斯帝国14年。她摆出一副大力支持文化的姿态，试图与一直保持书信往来的伏尔泰成为朋友。她的宫殿仿照了一些法国凡尔赛宫的样子，她还引进了一些教育改革。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只是为了炫耀而已。文化不是模仿一下就可以的，它需要扎实的根基。一个只是模仿先进国家的落后国家，只能把真正的文化精髓变为华而不实的装饰品。西欧的文化是以特定的社会环境为基础的。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还没尝试创造这样的环境就想模仿它的样子，结果，这些改变的重担就压在了民众身上，实际上巩固了农奴制和沙皇的独裁统治。

因此在沙俄，一丁点儿的进步总会引发保守势力的强烈抵制。俄国的农民几乎都是农奴。他们受到束缚，没有得到特别准许是无法离开自己所在的土地的。只有拥有大量土地的上层阶级中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才能获得教育。中产阶级几乎不存在，平民大众全部是无知而落后的。过去，农民受到极大的压迫，盲目地发动起义，这些血腥的农民起义经常发生，但都遭到了镇压。这时由于上层获得了一些教育，西欧盛行的一些思想也慢慢渗入俄国。这个时期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和之后的拿破仑时期。你应该记得，拿破仑的失败导致了整个欧洲的保守势力当道，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以及他的“神圣同盟”的君主们是这些保守势力的捍卫者。他的继任者更为保守。一群年轻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感到异常恼怒，并于1825年采取行动，发动了起义。他们都来自拥有土地的阶级，没有得到平民大众和军队的支持，起义很快就遭到了镇压。由于起义发生在1825年12月，因此他们被称为“十二月党

人”（Decembrists）。这次起义是俄国第一次公开的政治觉醒的表现。由于沙皇政府禁止一切公开的政治活动，所以在这场起义之前，人们组织了一些秘密政治团体。这些秘密团体的存在使得革命思想开始传播，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传播。

克里米亚战争失利之后，俄国引进了一些改革措施。1861年，俄国废除了农奴制。对农民阶级来说，这是一件大事，但是它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宽慰，因为获得了自由的农奴并没有得到足够维持他们生活的土地。同时，知识分子中革命思想的传播以及沙皇政府对这些思想的镇压并存着。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农民阶级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共同点。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倾向于社会主义（都是模糊和空想的社会主义）的学生们决定向农民阶级进行宣传，成千上万的学生开始走进村庄。农民们不认识这些学生，所以也不信任学生，怀疑这些学生可能是密谋恢复农奴制的人。因此，这些农民抓住了很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潜在危险的学生，并把他们移交给了沙皇警方！这就是在不联系大众的情况下企图凭空开展工作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些学生在争取农民阶级的过程中，遭遇到了彻底失败，受到了深深的打击；他们出于厌恶和绝望，采取了所谓的“恐怖主义”方式，开始尝试通过炸弹袭击和其他方式去暗杀当权者。俄国开始出现恐怖主义和炸弹袭击，革命活动就此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些炸弹袭击者自称是“携带炸弹的自由党人”，他们的恐怖主义组织名为“人民意志”。这个名称有点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因为与这个组织有关的人员其实并不多。

于是，这些由坚定的年轻人组成的团体和沙皇政府之间展开了新的对抗。许多受沙皇统治的种族和俄国少数民族的人加入进来，充实了革命力量，他们都遭到过政府的虐待和欺辱。政府不允许他们公开使用自己的语言，在其他很多方面他们也受到了侵扰，蒙受了屈辱。

工业上比俄国先进的波兰仅仅被划为俄国的一个行省，“波兰”这个名称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波兰语也遭到了禁止。这就是波兰的境遇，其他少数民族和种族的境遇更糟糕。在19世纪60年代，波兰发生过一次起义，这场起义遭到了残酷镇压，5万波兰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犹太人不断遭到集体迫害，也就是大屠杀，许多犹太人只好移居他国。

受沙皇迫害而满腔怒火的犹太人以及其他种族，很自然地加入了俄国恐怖分子的队伍。这种被称为“虚无主义”的恐怖主义运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血腥的镇压，载满政治犯的列车经过长途跋涉开进了西伯利亚草原，许多政治犯被处死。为了达到威吓的效果，沙皇政府不遗余力地采用了一种方法。就是，他们派特工奸细潜入恐怖分子和革命分子的队伍，事实上这些人煽动了炸弹袭击，有时候还亲自为之，这样一来，他们才能牵连别人。这些著名的特工奸细中有一位名叫阿泽夫（Azeff）的人，他是炸弹袭击革命者的领袖之一，同时他也是俄国秘密警察中的一名高官！作为警察特工，秘密警察部门中的沙皇军官实施炸弹袭击以使其他人陷入麻烦，这样的真实案例还有很多！

与此同时，俄国不断向东扩张版图，我告诉过你，俄国人最终到达了太平洋。在中亚，俄国人到达了阿富汗边境，在南边，他们推进到了土耳其边境。19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工业的崛起成了俄国境内的另一个重要的新生事物。这些工业发展只局限于几个地区，比如彼得堡地区和莫斯科，而整体上俄国仍然是个纯粹的农业国家。不过，建立起来的工厂却非常现代，这些工厂通常由英国人管理。这导致了两个结果：俄国资本主义在这些仅有的工业区迅速发展起来，工人阶级也同样快速地发展起来。和英国工厂体系建立的初期一样，俄国工人也遭到了严重的剥削，几乎被迫昼夜不停地工作。但是，两者也存在着区别。随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思想的出现，俄国工人有了新

的意识，他们乐于接受这些思想。而英国工人由于长期的传统思想束缚，已经变得十分保守，无法摆脱旧思想了。

这些新思想慢慢形成，社会民主工党（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成立了。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宣布，他们反对恐怖主义行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工人阶级必须受到鼓舞，行动起来，只有通过这样的大规模行动，他们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通过恐怖主义杀害个人并不能促使工人阶级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推翻沙皇制度，而不是暗杀沙皇或他的大臣。

世界闻名的列宁，早在19世纪80年代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活动，虽然当时他只是一名学生。1887年，列宁17岁的时候遭遇了一次巨大的打击。与他关系非常亲密的哥哥亚历山大（Alexander），由于参加了一次刺杀沙皇的暴力行动而被送上了断头台。尽管受到了极大的震惊，列宁却说，即使这样，依然不能通过恐怖主义的方式争取自由，唯一的方式只能通过大规模的行动。凭借坚定不移的决心，列宁继续完成了他的学业，参加了毕业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这就是30年后那场革命的领导者和创始人的成长经历！

马克思认为，他预测的工人阶级革命会首先从一个高度工业化、拥有大规模和组织严密的工人阶级的国家开始，例如德国。他认为，俄国是最不可能发生工人阶级革命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非常落后，具有中世纪的特质。但是，在俄国，马克思有着忠实的年轻追随者，他们热情地学习他的思想，试图找到方法结束令他们难以忍受的境遇。在沙俄，他们无法公开举行活动或者开展立宪运动，因而只能投身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习和讨论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被关进监狱，流放到西伯利亚或驱逐到国外。无论他们到什么地方，都会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了行动的那一天做好准备。

144 ——失败的俄国1905年革命

来自社会民主工党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1903年遇到一次危机，他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并做出回答，这个问题是每个基于特定原理和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迟早都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事实上，所有拥有这样的原则和信念的人，一生中都要多次面对这样的危机。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到底应该完全坚持自己的原则、准备发起一场工人阶级革命，还是应该向现实情况妥协、为最终的革命奠定基础？所有西欧国家都遇到过这个问题，各地的社会民主党派或类似的党派几乎都出现了力量削弱和内部冲突的情况。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勇敢而充分地表明了自己的革命观点，但实际上他们表现低调，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态度。在法国，许多主要的社会主义者背弃了他们的政党，当上了内阁大臣。意大利、比利时和其他地方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较小，因此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但即使在英国也有一位工党成员成了内阁大臣。

俄国的情况与这些国家不同，俄国没有议会，因此无法发挥议会的功能。即便如此，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可能放弃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所谓“非法”斗争，只进行克制的、理论上的宣传活动。但是列宁对这个问题有着清晰而确定的答案。他不赞同任何的力量削弱或妥协行为，因为他担心，那会使他的党派中充满机会主义者。他曾经见过西方社会主义党派采用的方式，但这些方式并未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在谈到其他问题时，他曾经这样说道：“西方社会主义者采取的议会政治策略，相当令人士气低落，这些策略以及党派中的野心家和求职者，渐渐地使各个社会主义党派带有了一些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的影子。”（坦慕尼协会位于纽约，已经成了政治

腐败的一个象征。）列宁不在乎有多少人支持他，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威胁说要孤军奋斗，但是他依然坚持只接受那些即使没有群众的欢呼喝彩也准备为事业做出一切牺牲的“全力支持者”。他想要组建一支由革命能手组成的队伍，这样可以有效地开展运动。他不接受任何的同情者以及不能共患难的朋友。

这是一条强硬路线，很多人认为这并不是明智之举。然而，总的来说，列宁获得了胜利，社会民主工党分裂成两个部分，它们的名称后来变得很有名——布尔什维克（Bolsheviki）和孟什维克（Mensheviki）。“布尔什维克”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个可怕的词，但它的意思其实是多数派。孟什维克的意思是少数派。1903年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列宁带领的团体由于占多数，因此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也就是多数派政党。有趣的是，当时一个24岁的年轻人，后来在1917年革命中成为列宁亲密战友的托洛茨基（Trotsky），那时是站在孟什维克一边的。

所有这些讨论和争论都是在远离俄国的伦敦进行的。一个俄国政党的会议只能在伦敦进行的原因是，在沙皇俄国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而且这个政党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是流亡者，或是从西伯利亚逃出来的流放犯。同时，俄国内部的麻烦也在不断发酵。政治罢工就是这种麻烦的表现之一。工人政治罢工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比如获得更高的工资，而是为了反对政府的某些政治行动。这意味着工人已经有了一些政治意识。因此，如果印度工人由于甘地被捕，或者由于受到一些压迫而进行罢工的话，这就是一种政治罢工。奇怪的是，尽管西欧的工会和工人组织很强大，但是政治罢工在西欧很少发生。也许这是因为工人领袖获得了既得利益，因此他们的态度变温和了。在俄国，沙皇制度的持续暴行使政治方面的活动始终处在风口浪尖上。早在1903年，俄国南部就发生过很多次自发的政治罢工。这场运动的规模很大，但是由于缺少领导者，它也就渐渐地消退了。

远东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遇到了麻烦。在以前的一封信中，我给你讲过横跨亚洲北部草原直达太平洋的漫长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过程，讲过俄国从1894年开始与日本产生的冲突，也讲过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我也给你讲过被称为“流血星期日”的1905年1月22日，这一天，沙皇的军队朝一支平静的示威队伍开枪，这支示威队伍是由一位神父领导的，他曾经向“小父亲”（沙皇）乞求要改善生活。恐怖遍布了整个国家，各地发生了很多政治罢工。最终整个俄国爆发了一次大罢工。一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开始了。

参加罢工的工人，特别是彼得堡和莫斯科这些中心城市的工人，在每个中心城市都成立了新组织——苏维埃。最初，这只是一个组织罢工的委员会。托洛茨基成了彼得堡苏维埃的领袖。沙皇政府震惊不已，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允诺成立立宪议会并进行民主选举。独裁统治的堡垒似乎要坍塌了。过去农民起义没有做到的、采取炸弹袭击的恐怖分子没有成功的、温和的自由立宪主义者通过谨慎的呼吁没有达到的目标，工人经过大罢工都成功实现了。沙皇独裁政府历史上第一次向普通民众低下了头。后来，这场胜利还是落空了。但是，它留给人们的记忆成了指引工人前进的灯塔。

沙皇曾经承诺成立一个立宪议会，这个议会被称为“杜马”（Duma），意思是思考的场所，而非谈话的场所[英语中的“议会”（parliament）来源于法语“谈话”（parler）一词]。这个承诺让温和的自由党人很满意，他们的情绪也平息了。这些人总是很容易满足。地主们受到革命的惊吓，同意采取一些对较为富有的农民有利的改革。当时，与真正的革命者面对面的沙皇政府掌握了革命者的弱点，于是投其所好。一方面，比起政治宪法，饥饿的工人对填饱肚子和提高薪水更有兴趣，贫穷一些的农民阶级提出了危险的口号：“给我们土地。”另一方面，革命者最关心的是政治形势，他们希望以西欧为榜样成立议会，而不太考虑群众的真正需求和感受。工会组织中许多来自较优越阶级的技术工人加入了革命队伍，因为他们关心政治

形势。但是来自城市和农村的群众普遍对此则漠不关心。于是，沙皇政府和警方采取了专制统治的传统手段：他们挑起了人们之间的对立情绪，煽动这些饥饿的群众反对一些革命团体。俄国人屠杀了悲惨的犹太人，鞑靼人屠杀了亚美尼亚人，甚至革命学生和较贫穷的工人之间也发生了冲突。通过这种方式在全国各地扰乱了革命之后，政府又攻击了两大风暴中心——彼得堡和莫斯科。彼得堡苏维埃很轻易地就被击败了。在莫斯科，军方援助了革命者，在苏维埃被击败之前，他们进行了5天的抵抗。报复行动随之展开。据说在莫斯科，政府未经审判就处死了1000人，关押了7万人。全国因各种起义而死亡的人数达到1.4万人。

俄国1905年革命就这样以惨败而告终了。它被称为1917年的成功革命的序曲。“群众需要从重大事件中获得经验”，才能唤起他们的意识，才能大规模地开展行动。付出惨痛代价的1905年革命就让群众获得了这样的经验。

1906年5月，杜马进行了选举，召开了会议。杜马并不是一个革命机构，但是它对于沙皇来说太自由开明了，因此两个半月之后，沙皇解散了杜马。在镇压了革命之后，沙皇对杜马的愤怒置之不理。被解散的、由中产阶级自由立宪主义者组成的杜马代表们来到芬兰（Finland，离彼得堡很近，那时候是一个半独立国家，沙皇拥有它的宗主权），他们号召俄国人拒绝纳税，拒绝应征入伍，以此表示对解散杜马的抗议。杜马代表与群众缺少联系，因此没有人响应他们的号召。

第二年，也就是1907年，选举产生了第二届杜马。警方试图阻止激进的候选者参加竞选，他们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阻挠，情急之下有时干脆逮捕这些人。这一届杜马依然不合沙皇心意，三个月后沙皇又解散了这一届杜马。这时，沙皇政府开始采取措施，通过修改选举法

来阻止那些不合他们心意的人当选。这个举措非常成功，第三届杜马就是一个相当令政府满意的保守团体，它存在的时间很长。

你也许会问，在镇压了1905年革命后，沙皇的实力已经强大到足以随心所欲，他为什么还不厌其烦地成立这些软弱的杜马呢？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俄国的一些小团体的需求，主要是富有的地主和商人。这个国家的状况很糟糕。无疑，人民受到了压制，但他们充满了怨气和怒火。因此，沙皇认为至少应该与富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想给欧洲国家留下自己是一位开明君主的印象。沙皇专制的暴政和专横在西欧成了口头禅。第一届杜马解散的时候，英国自由党的一位领袖在下议院大喊道："杜马已死！杜马万岁！"这显示出人们是多么同情杜马啊。当时沙皇需要钱，需要很多钱，精打细算的法国人一直借钱给他，事实上，正是有了法国的借款，沙皇才得以镇压1905年革命。这形成了一个怪异的反差——拥护共和政体的法国帮助独裁专制的俄国镇压其激进分子和革命者。但是拥护共和政体的法国的代表人物，其实就是法国银行家。不管怎样，沙皇还是想要保持形象，而杜马帮他做到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欧洲和世界局势正在快速变化。日本打败俄国之后，英国不再像以前那样惧怕俄国了。英国有了新的惧怕对象，那就是德国。德国的工业和海上霸权这两个英国曾长期占有优势的领域都令英国感到畏惧。对德国的畏惧也使法国慷慨地借款给俄国。这种所谓的德国威胁促使两个传统劲敌携起手来。1907年签署的《英俄条约》（*Anglo-Russian Treaty*）解决了双方在阿富汗、波斯以及其他地区的主要争端。之后，英、法、俄三国又形成了"三国协约"。在巴尔干半岛，奥匈帝国是俄国的对手，是德国的同盟国，意大利理论上也是德国的同盟国。因此，英、法、俄的"三国协约"面对的是德、奥、意的"三国同盟"。在各国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平静的人们却还在沉睡，不知道恐怖正在向他们袭来。

1905年之后的这些年，一直是保守势力在当道。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其他的革命力量已经被完全压制了。一些流亡国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比如列宁，耐心地继续进行写作，他们写书或者宣传册，设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孟什维克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中较为温和的少数派）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孟什维克主义在保守势力当道的这几年里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了。实际上，尽管它的名称的意思是少数派，但是当时拥护它的人更多。从1912年起，俄罗斯世界再次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革命活动明显增加，布尔什维克主义随之壮大。到了1914年中期，彼得格勒到处都在谈论有关革命的话题，也像1905年一样发生了多次政治罢工。然而，由七人组成的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中，人们后来发现竟然能有三个人来自沙皇的特务机关！革命中竟然出现了这种情况！杜马中有一小部分人是布尔什维克党人，这个小群体的领袖是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y）。人们发现他也是一名警察！而列宁还十分信任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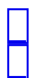
1914年8月爆发的世界大战一下子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战斗前线，大部分工人应征入伍，使得革命运动逐渐平息。高声反对战争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只是少数，他们很不受欢迎。

我们谈论的内容已经到达了既定位置——世界大战，因此这封信要到此结束了。但是在结束这封信之前，我还想提醒你关注俄国的艺术和文学。大多数人都知道，尽管有着种种缺陷，沙俄还是保留了美妙的舞蹈艺术。19世纪俄国也出现了一系列伟大的作家，这些作家创造了杰出的文学传统。俄国作家所著的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都显示出令人惊异的高水准。被称为俄国最伟大的诗人的普希金生活在19世纪早期，是拜伦、雪莱和济慈的同辈人。果戈理（Gogol）、屠格涅夫（Turgeniev）、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ievsky）以及契诃夫（Tchekhov）是19世纪著名的小说作家。最伟大的作家也许是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他不仅是位天才小说家，也是一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宗教和精神领袖。事实上，当时身处南非的甘地也受到了

他的影响，他们二位互相欣赏，保持着通信联系。两人对非抵抗或非暴力的坚定信念不谋而合。托尔斯泰认为，这是基督的基本教义，而甘地也从古老的印度教经典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当托尔斯泰坚持着他的信念，依然是一位较为与世隔绝的预言家时，甘地则积极地将这种表面上很消极的理论运用到南非和印度的社会问题中去了。有一位19世纪的俄国伟大作家依然在世，他就是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i）。[注]

---

1. 高尔基逝世于1936年。



第六卷
世界大战及战后

145 ——一个时代的结束

19世纪！我们花了这么长一段时间来谈论这100年！我花了断断续续4个月的时间，在信中告诉你有关这个时期的内容，我都有点疲倦了，也许你看到这么多信也会感到厌烦吧。一开始讲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告诉过你，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时期，但是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之后，再大的魅力也会变得枯燥乏味的。我们讲的内容已经超出了19世纪的范围，进入20世纪了。1914年是这些内容的截止时间。正是在那一年，在欧洲和整个世界，就像谚语说的那样，战争的猛犬四处蹂躏。那一年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预示了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1914年！那一年你还没有出生，而那一年距离现在还不到19年，19年在人的一生中也不算很长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更是极为短暂。但是，在这十几年中，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目前仍在继续。从那一年起到现在，仿佛经过了一个时代，1914年以及之前的年份属于一段久远的历史，成了我们在书本中读到的遥远往事，这段往事与我们现在的时代是极为不同的。我会在以后告诉你有关这些巨大变化的内容。现在，有件事我要告诫你。你正在学校里学习地理，你所学的地理知识和1914年以前我在学校里学习到的很不一样。像我当初一样，你可能很快就要抛弃你现在所学的地理知识。传统的地标和古老的国家已经消失在战争的硝烟中了，取而代之的是名字很难记住的新地标和新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几百座城市改变了名称，圣彼得堡变成了彼得格勒，后来又变成了列宁格勒，君士坦丁堡现在叫作伊斯坦布尔，北京现在的名称是北平，波希米亚的布拉格（Prague）变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Praha）。

在我写给你的有关19世纪的信中，我将各个大陆和国家的情况分开叙述，对于不同的形势和运动我们也是分开讨论的。但是，当然你要记住，这些情况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历史的千万个脚步在全世界是同时前进的。科学与工业、政治与经济、富足与贫穷、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达尔文与马克思、自由与奴役、饥荒与瘟疫、战争与和平、文明与野蛮——所有这些因素在这个奇怪的结构中都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它们各自发挥着作用又相互影响。因此，如果我们要在脑海中构造一幅有关这个时期或其他时期的画面，这必定是像万花筒一般复杂、不断运动和变化的画面，尽管这幅画面中有些部分并不令人感到愉快。

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个时期主要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这种发展依靠的是大规模的动力生产，也就是借助于某些机械动力，例如水、蒸汽或电力（我们把生产电力的工厂称为“发电厂”）而进行的生产。这在世界各地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些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因此，兰开夏郡由动力织布机进行的纺织生产使得偏远的印度乡村非常苦恼，很多人失业了。资本主义工业充满了活力，它的本质就是要不断地扩大，它的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贪得无厌成为它与众不同的标志，它总是要反复地获取和控制。个人和国家都在不断地获取和控制。因此，在这种制度下发展起来的社会被称为贪婪的社会。它的目标就是要不断生产出更多产品，然后将生产所剩余的财富用于建设更多的工厂、铁路以及类似的工程，当然，也能使其所有者变得富裕。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他们可以牺牲任何其他东西。创造工业财富的工人获得的利益最少，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这些工人要经历一段可怕的日子才能稍稍改善自己的命运。为了这种资本主义工业以及拥有这种工业的国家的利益，殖民地和附属国也成了牺牲品，遭到了剥削。

资本主义就这样一味地、无情地向前迈进，一路上留下了许多受害者。尽管如此，它的发展过程是成功的。在科学的辅助下，资本主

义取得了很大成功，这种成功令世界惊异不已，几乎抵消了它所造成的很多苦难。不经意之间，在未经过精心安排的情况下，它还创造出了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事物。不过，在光鲜和美好的外表下隐藏着很多害处。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它所产生的反差，它的发展越大，反差也越明显，这些反差包括：极度的贫穷与极度的富有、贫民窟与摩天大楼、帝国与受剥削的附属国殖民地。欧洲是处于优势地位的大陆，而亚洲和非洲则是受剥削的大陆。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洲是远离世界主要潮流的，但是它正以很快的速度前进并积累了许多财富。在欧洲，英国是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的佼佼者，它富有、傲慢、扬扬自得。

资本主义工业的步伐以及它贪婪的特性令事态变得尖锐化，引发了敌对和不安情绪，保护工人的措施最终也出台了。早期的工厂生产制度其实是对工人特别是对妇女和儿童的恶劣剥削。妇女和儿童比男人更受雇用者欢迎，因为他们更廉价，他们被迫在对健康极为有害的恶劣环境中工作，有时被迫每天工作18个小时。最后，国家出面干预并通过了被称为工厂法的法律，规定了每天的工作时间，也督促工厂改善了工作环境。这些法律尤其是要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益，但是面对工厂主的强烈反对，这些法律经过了漫长而艰难的努力才最终得以通过。

资本主义工业进一步导致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生，这些接受了新工业的思想，对资本主义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工人的组织、工会以及国际联合会也都发展了起来。资本主义还导致了帝国主义的产生，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对东方国家建立已久的经济环境的影响，在东方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渐渐地，资本主义工业甚至在这些东方国家也扎下根来，并开始发展。那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势力也开始壮大，对西方帝国主义提出了挑战。

资本主义就这样撼动了全世界，尽管它为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但总的来说，至少它在西方算是一次有益的运动。它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幸福生活的标准。和过去相比，普通人变得更重要了。实际上，除了虚幻的选举权，人们对任何事都没什么发言权，但是理论上他们在国家中的地位提高了，他们的自尊心也相应地得到了增强。当然，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的情况。大量的知识得到了积累，科学创造了奇迹，科学在生活中的各种应用使每个人的生活都轻松了很多。药物，特别是预防疾病的药物，以及卫生设备开始抑制并根除了许多对人类造成过祸害的疾病。举一个例子：人们发现了疟疾的病因和预防方法，如今只要采取必要的步骤，一个地区就可以彻底根除疟疾，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印度以及其他地方依然有疟疾，而且很多人患上了疟疾，这并不是科学的错，而是由政府的漠不关心以及民众的无知造成的。

这个世纪最显著的特征，或许就是交通运输方式和通讯方式的发展。铁路、轮船、电报以及汽车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实际上让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地方。世界变小了，人们彼此靠近了，也更能相互理解了；由于彼此的认识加深了，许多因为无知而产生的隔阂也随之消失了。共同的思想开始传播，使得全世界达成了一定程度的一致意见。就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世纪的末期，出现了无线电报和飞机。现在，它们都是很普通的事物了，你也曾经坐过几次飞机出游，但没有怎么在意这种出行方式。无线电报和飞机属于20世纪以及我们这个时代。以前人们经常乘坐热气球，但是还没有人乘坐比空气重的东西飞上天空，除了古代神话和故事，比如《一千零一夜》里的飞毯以及我们印度传说中的飞行器之外。美国人莱特兄弟——威尔伯·莱特和奥维尔·莱特（Wilbur and Orville Wright）是最早乘坐比空气重的飞行器成功飞上天的人，是现代飞机之父。1903年12月，他们飞行了不超过300码的距离，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完成了之前从未有人完成的奇迹。从此之后，飞机不断地发展，我还记得，1909年法国人布莱里奥（Blériot）驾驶飞行器飞越了英吉利海峡

（English Channel），从法国飞到了英国，激起了人们的兴奋情绪。之后不久，我在巴黎目睹了第一架飞越埃菲尔铁塔（Eiffel Tower）上空的飞机。许多年后的1927年5月，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驾驶飞机，像一支闪耀的银色箭头，飞越了大西洋，并成功在巴黎勒布尔热（Le Bourget）飞机场降落。当时你和我都在巴黎。

这些都是属于资本主义工业盛行这个时期值得称颂的一面。在这个世纪，人类无疑做了很多精彩的事。还有更值得肯定的一面。由于贪婪的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出现了抑制其发展的合作社运动，也就是人们联合起来共同购买和销售物品，并共同分配收益。正常的资本主义方式充满了激烈的竞争，每个人都设法超越其他人。合作的方式是建立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之上的。你一定看到过很多合作社商店。合作社运动在19世纪的欧洲发展很快。也许它在丹麦这个小国家是最成功的。

在政治方面，民主思想有所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选举议会和国会成员的权利。但是这种选举权，也就是投票权，只有男人才有，无论女人将来的才干如何，男人们都不认为赋予女人选举权是一个明智之举。许多女人对此感到愤怒，在20世纪前几年里，英国妇女们组织了一场大型的抗议活动。这场运动被称为“妇女选举权运动”，由于男人没有认真对待这场运动，对它漠不关心，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妇女们采取了强行的甚至暴力的方式来引起他们的注意。她们通过制造混乱场面扰乱了议会的正常举行，她们还袭击英国内阁大臣，这些大臣只能不断寻求警方的保护。大规模有组织的暴力行动也在进行，许多妇女被逮捕并被关进了监狱，在狱中她们经常通过绝食来继续反抗，她们因此被释放了。一旦她们身体变好，又会被送进监狱。议会为准许这种做法专门通过了一项法案，人们普遍称这项法案为“猫捉老鼠法案”（Cat and Mouse Act）。然而，争取妇女选举权

的妇女们采取的这些方法无疑成功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几年以后，即在世界大战开始之后，妇女就被赋予了选举权。

妇女运动，或者俗称为“女权主义运动”，要争取的并不仅仅是选举权，她们要求在所有事情中都拥有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在近代以前，西方女性的地位一直很低，几乎没有什么权利。英国法律甚至规定，妇女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所有的财产份额都归丈夫所有，甚至包括她们的收入。因此，从法律上说，她们的状况甚至比如今受印度法律制约的印度妇女状况还要糟糕，这实在是太恶劣了。西方妇女实际上是一个受制约的人种，很多方面就和现在的印度妇女一样。在这场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开始之前，妇女们早就要求在其他方面获得与男人平等的待遇了。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妇女终于获得了一些拥有财产的权利。妇女在这方面的成功，部分原因是有工厂主的支持，他们认为，如果妇女可以保管自己的收入，就可以吸引更多妇女到工厂上班。

我们注意到了各个方面的巨大变化，但是在政府执政方式上没看到什么变化。大国继续采用阴谋和欺骗的手段，这是很久以前佛罗伦萨的马基亚维利倡导的方式，也是早于马基亚维利1800年的印度大臣考底利耶倡导的方式。大国之间有着永无休止的竞争以及秘密的协约与同盟，每个大国都想要超越其他国家。我们已经看到，欧洲扮演着主动而具有侵略性的角色，亚洲则是被动的。美洲由于自顾不暇，因此在世界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

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无论对错，祖国就是祖国”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发展起来了；就个人而言属于恶劣与邪恶的行为，各个国家却引以为荣。由此，个人与国家的道德准则之间出现了奇怪的反差。这两者之间差异很大，个人的不道德行为恰恰成了国家的美德。就个人而言，自私、贪婪、傲慢和粗俗都是极其恶劣不堪的。但是就一大群人而言，就国家而言，它们则披上了爱国主义和爱国心的高尚外衣，

受到了称颂和鼓励。甚至连杀人都成了值得赞扬的事情，只要它是国家之间相互对抗时发生的杀人行为。最近一位作家的说法很有道理：“文明成了一种手段，授权越来越多的群体实施个人的不道德行为。”

146 ——世界大战开始

在上一封信的结尾，我告诉过你，各国在对待其他国家时采取的行为是多么恶毒和不道德。它们认为，用一种无礼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态度对待其他国家能显示出它们的独立自主，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会这么做，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策略。其他人无权让它们举止端正，难道它们不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吗？任何干涉不是都会招致厌恶吗？只有担心造成严重后果的时候，这些国家的行为才会有所收敛。因此，可以说强国是受人尊敬的，而弱国是受人欺负的。

事实上，这种国与国之间的敌对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我们已经看到，不断增加的对市场和原材料的需求迫使资本主义大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帝国竞赛。它们在亚洲和非洲横冲直撞，倾尽全力去占领更多的领土，以便剥削这些地方。走遍全世界之后，已经没有可以扩张的地方了，于是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开始觊觎彼此，想要得到彼此所拥有的领地。这些大国在亚洲、非洲和欧洲频繁爆发冲突，愤怒的情绪不断升级，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一些大国的情况比其他国家好一些，有着工业领先地位和巨大帝国版图的英国似乎是其中最幸运的国家。然而，即便是英国也并不满足，因为拥有的越多，想要的就越多。英国的“帝国蒂造者”脑海里萦绕着扩张帝国的巨大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在非洲建立从北到南、从开罗到好望角的非洲帝国。英国也十分担心德国和美国在工业上对它造成的竞争压力。这两个国家生产的产品比英国的便宜，因此窃取了英国的市场。

如果连幸运的英国都不满足，其他国家就更不满足了。特别是德国，德国加入大国的行列比较晚，它发现成熟的果实都被抢光了。德国在科学、教育以及工业方面的进步很大，同时还建立了一支了不起

的军队。甚至在维护工人权利的社会改革立法方面，德国也领先于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尽管德国登场的时候，整个世界已经被其他帝国主义大国占领，剥削的途径已经很有限了，但是通过努力和自律，德国还是成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最强大、最高效的大国。世界上每个港口都能看到德国的商船，德国自己的港口汉堡和不来梅都是世界上的大型港口。德国的商船不仅将德国商品运到遥远的国家，也吸引了其他国家的转口贸易。

取得了这些成就、也完全清楚自己实力的新帝国主义国家德国，对于它的进一步发展所受到的限制自然会勃然大怒。普鲁士在德意志帝国中占有领导地位，普鲁士当权的地主阶级和军人阶级从未以谦逊著称过。他们具有攻击性，并以冷酷无情的侵略性为傲。他们认为，霍亨索伦王室出身、拥有独断和傲慢精神的德皇威廉二世正是这样一位理想的领袖。德皇宣称德国将成为世界领袖，宣称德国需要一片阳光普照的大地，宣称德国的未来在海上，宣称德国的任务是将德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其他民族和国家都说过这样的话。英国的“白人的重担”（White Man’s Burden）以及法国的“开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与德国文化如出一辙。英国声称，实际上也的确拥有最强的海上力量。德皇对德国较为粗俗和自负的断言与英国人对英国的断言相同，区别在于，英国确实拥有这个地位而德国没有。但是，德皇的自负言论大大激怒了英国人，其他国家就连拥有成为世界领先国家的想法都会让英国人感到极其厌恶。这对自认为是领先国家的英国来说，无异于是异端邪说，也是一种公然的攻击。至于海上实力，自从100年前拿破仑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战败之后，英国就一直独占着海上霸权；对英国人来说，德国或其他国家想要挑战它的地位是很不合适的。如果英国失去了海上霸权，它分布各处的帝国会落得什么结果呢？

德皇的挑战和威胁已经很恶劣了，而更糟糕的是，他继而贯彻了这一路线，增强了海军实力。这完全惹怒了英国人，他们也开始增强自己的海军实力。因此，两国之间开始了海军竞赛，两国的报纸也不断地叫嚣，要求建造更多的战舰，唤起人们更大的民族仇恨。

这是欧洲的一个危险地带。还有许多其他的危险地带。当然法国和德国是传统的劲敌，1870年战败的痛苦回忆依然令法国人愤怒不已，他们梦想着进行报复。巴尔干半岛一直是各方利益产生冲突的火药桶。德国也开始与土耳其建立伙伴关系，从而扩大自己在西亚的影响力。有人建议修建一条通往巴格达的铁路，连通巴格达与君士坦丁堡以及欧洲。这项提议是很受欢迎的，但是由于德国想要控制这条巴格达铁路，因此引发了其他国家的嫉妒。

渐渐地，战争的恐惧传遍了整个欧洲；为了自卫，大国开始寻求结盟。大国之间形成了两大阵营：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以及英国、法国和俄国的“三国协约”。意大利在三国同盟中属于温和派，而事实上，在战争过程中意大利背弃誓言加入了另一个阵营。奥匈帝国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帝国，虽然地域面积非常广阔，但内部充满了不和谐因素，它的首都是重要的科学、音乐和艺术中心——美丽的维也纳。因此，实际上三国同盟的主体就是德国。但是，未经过考验没人知道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会变成什么样子。

因此，恐惧情绪占据了欧洲，恐惧情绪是很可怕的。各国都在为战争做着准备，都在最大限度地武装自己。各国开始了军备竞赛，这种竞赛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如果一个国家增加了武器装备，其他国家也会被迫做同样的事情。制造武器装备，也就是制造枪支、战舰、弹药以及其他军需物资的大型私有企业，自然获得了丰厚的收入，富得流油。为了获得更多利润，它们还制造了战争恐慌，引诱各国向它们购买更多的武器。这些军备企业富有而强大，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许多高官大臣在这些企业里拥有股份，因此他们很关心这

些企业的发展。军备企业的成功是伴随着战争恐慌和战争而来的。因此，这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局面，许多国家政府中的高官大臣都对战争中的财政问题很感兴趣。这些企业也尝试了其他办法促进各国提高战争经费开支。它们买通报社进而影响公众舆论，经常贿赂政府官员，还传播虚假消息刺激人们。这种依靠他人的死亡而生存、为了获得利润而不惜支持和引发战争恐慌的军备工业是多么可怕啊！这种工业一定程度上加速了1914年战争的爆发。即使在今天，军备工业也在继续做着同样的事情。

在讨论这场战争的过程中，我要告诉你一件怪异的事情，是有关呼吁和平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建议，为了世界和平，各个大国应该聚在一起开会。在自己的帝国里镇压自由运动、将犯人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沙皇竟然会这么做！听他谈论和平简直就是一个笑话。不过，也许他是真心的，因为对他来说，和平就意味着他可以保持目前的状况不变，也可以保住他的独裁统治地位。为了响应他的提议，1899年和1907年，各国在荷兰的海牙（Hague）召开了两次和平会议。这两次会议都没有任何结果。和平不会突然从天而降，只有根除了纷争的根源，和平才会降临。

我已经给你讲了很多有关大国的对抗和恐惧的事情。贫穷的小国被忽视了，当然那些行为不端的小国除外。在欧洲北部，有一些小国值得人们关注，因为它们与贪婪的大国完全不同。这些国家就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Scandinavia）的挪威和瑞典，以及紧邻它们南部的丹麦。这些国家靠近北极圈地区，非常寒冷，生活在这些国家是很艰难的。只有很少的人能在那里生活。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处于充满仇恨、戒备与竞争的大国圈子之外，所以它们的生活很祥和，大部分精力都用于文明开化上。那里科学繁荣，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1905年之前，挪威和瑞典曾经统一成了一个国家。1905年的时候，挪威决定脱离这个统一的国家，以独立的形式存在。因此，这两个国家决定

和平地分割边境，自那以后，它们就成了独立的两个国家。这个过程中没有发生战争，也没有出现强迫行为，两国依然是友好邻邦。

小国丹麦裁掉了陆军和海军，为各个国家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丹麦是一个农业国家，人口基本都是农民，因此贫富差距不大。这种平等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那里的合作社运动。

但是，并非所有的欧洲小国都像丹麦一样是道德典范。荷兰尽管本身是一个小国，却依然控制着东印度群岛的巨大帝国领土（包括爪哇岛、苏门答腊岛等）。然后是比利时，它剥削着非洲的刚果。然而，比利时在欧洲政治中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它几乎位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公用通道上，因此这两国之间发生任何战争都必定会波及它。你应该记得，滑铁卢就是比利时境内的一个靠近布鲁塞尔的城镇。因此，比利时一直被称为“欧洲的斗鸡场”。主要的几个大国在未开战时达成协定，要尊重比利时的中立立场，但是我们也看到，当战争爆发的时候，这种协定和许诺都成了空谈。

然而，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所有小国中，最令人头疼的就是巴尔干半岛国家了。由于世代积累的仇恨和对立情绪，这个种族和人种大杂烩的地区一直充满了敌意和冲突。1912年和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血腥无比，一个小范围地区在短时间内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据说保加利亚人对难民以及撤退的土耳其人实施了可怕的暴行。之前，土耳其人自己也是劣迹斑斑。塞尔维亚（现在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因暗杀行动而恶名昭著。由所谓的爱国者组成、成员包括国家的许多高官在内的秘密刺杀团体“黑手党”（Black Hand）实施了一系列的恐怖刺杀行动。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King Alexander）和王后德拉加（Queen Draga）、王后的兄弟、首相和其他大臣都被残忍地刺杀了。这仅仅是一场宫廷革命，另一个人被拥立成了国王。

因此，20世纪伊始，欧洲的天空雷电交加，随着时间的推移，暴风雨愈加猛烈。形势愈发错综复杂，欧洲各国之间纠葛不断，只有战

争才能最终斩断这些纠葛。所有大国都预测，战争即将爆发，并为此做着积极的准备，但是它们也许并不热衷于战争。一定程度上它们害怕战争，因为没有人能确切地预言战争的结果。然而，恐惧本身又驱使它们加入战争。我告诉过你，欧洲的两大阵营是相互对立的。这种对立被称为“力量平衡”，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任何一点外力都可以将它打破。日本尽管离欧洲很远，对欧洲的事务也不太感兴趣，但是日本也参与了欧洲的联盟以及这种力量平衡，因为日本是英国的同盟。这种同盟就是为了保护英国在东方的利益，特别是在印度的利益。这种联盟是在英俄对抗时期结成的，尽管现在英国和俄国已经属于同一阵营了，这种联盟关系依然存在。美国是唯一一个未参与这种欧洲联盟以及平衡体系的大国。

1914年的局势就是这样。你应该记得，当时在有关《自治法案》的问题上，爱尔兰给英国带来了很多麻烦。阿尔斯特爆发了叛乱，北方和南方的志愿军都在进行军事训练，有传言说爱尔兰要爆发内战。德国政府很可能认为，爱尔兰的麻烦会牵制英国，如果欧洲爆发了战争，英国也不会插手。实际上，英国政府私底下承诺法国，如果战争爆发，它会站在法国一边，不过这个承诺是没有公开的。

1914年6月28日——这一天，一个火花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前往巴尔干半岛的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进行访问。我告诉过你，几年之前，也就是青年土耳其党人试图废黜土耳其苏丹的那个时候，奥匈帝国吞并了波斯尼亚。当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坐在一部敞篷车里，沿着萨拉热窝的街道行进的时候，有人朝他开枪，他和妻子都中弹身亡。这激怒了奥匈帝国的政府和人民，他们指责塞尔维亚政府（塞尔维亚紧邻波斯尼亚）合谋参与了这场刺杀。塞尔维亚政府断然否认了这种指责。很久以后的调查显示，尽管塞尔维亚政府对此事不负有直接责任，但也并非对这件事的准备工作完全不知情。要为这场刺杀负责的主要是塞尔维亚黑手党组织。

出于愤怒和战略考虑，奥匈帝国政府对塞尔维亚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度。显然，它决定彻底击败塞尔维亚，并依赖德国的强而有力的支持，以备在发生更大的战争时可以获得帮助。因此，奥匈帝国不接受塞尔维亚的道歉，在1914年7月23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5天之后的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

奥匈帝国的策略主要是由一群肤浅而愚蠢、决意要发动战争的大臣制定的。年事已高的弗朗茨·约瑟夫国王（1848年开始登上王位）被说服同意了这些策略，德国所做的有关提供帮助的部分承诺被他们解读为完全的承诺。实际上，除了奥匈帝国以外，其他大国也许当时并不渴望战争。尽管德国已经做好万全准备，而且十分好战，但是德国当时对战争也不感兴趣，德皇威廉二世甚至有些半推半就地想要阻止战争的爆发。英国和法国也不喜欢战争。代表俄国政府的是软弱而愚钝的沙皇，身边是一群他自己挑选的恶棍和白痴，处处受他们影响。然而，这个男人手中掌握着数百万人的命运。他自己基本上是反对参战的，但是他的顾问们拿推迟参战的后果吓唬他，让他答应动员军队参战。这种“动员”就是征召现役部队，在俄国这么大面积的国家里，这个过程要花费很长时间。也许是由于害怕德国发起攻击，俄国加速了动员工作。俄国从7月30日开始的动员令德国非常恐惧，它要求俄国停止动员工作。但是，此时巨大的战争机器已经无法停止了。两天之后的8月1日，德国动员起来对俄国和法国宣战，很快德国开始大举侵袭比利时，以便从比利时侵入法国。可怜的比利时从未伤害过德国，但是当国家之间展开生死决战的时候，它们顾不得那么多，也不在乎以前做过的承诺了。德国政府曾经请求比利时允许德国军队穿越比利时境内，这种请求自然遭到了比利时的愤怒拒绝。

这种侵犯比利时中立立场的行为引起了英国和其他地区的强烈抗议，英国以此为理由对德国宣战。事实上，英国很久以前就做了这个决定，比利时问题恰好成为它的借口。现在人们发现，连法国军队也在战前做了准备和计划，必要时也会让军队穿过比利时攻击德国。不

管怎样，英国试图以权力和真理的捍卫者以及小国的支持者自居，并与人们口中所说的、把庄严承诺和协约视作“废纸”的德国形成了鲜明对比。8月4日午夜，英国对德国宣战，但是英国已经做好了预防措施，提前几天派遣军队，也就是英国远征军（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秘密渡过了英吉利海峡以防不测。因此，当全世界还认为英国是否参战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的时候，英国军队早已经到达欧洲大陆了。

奥匈帝国、俄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现在都陷入了战争，当然，某种程度上造成战争爆发的小国塞尔维亚也参与其中了。德国与奥匈帝国的同盟意大利呢？意大利隔岸观火，观察着哪一方比较占优势。意大利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在6个月之后，明确表示加入法、英、俄一方，与原先的盟友成了敌人。

就这样，1914年8月初的几天里，欧洲的军队四处集结、行进。这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军队呢？过去，军队里都是专业的士兵。军队也是常备军队。不过，法国大革命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当大革命处于外国攻击的威胁中时，大批普通民众被征召入伍，并进行训练。从那时候开始，欧洲出现了一种趋势，以征兵制的军队取代人数有限的职业志愿军。征兵制也就是国家中所有强壮的男子都被强制服兵役，因此，这种普遍征召强壮男子服兵役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个产物。它遍及了欧洲大陆，每个年轻男子都要在军营中接受两年或两年以上的军事训练，之后只要被征召就必须服役。因此，现役军队里的士兵其实就是一个国家所有的年轻男子。法国、德国、奥匈帝国以及俄国都是这样，这些国家的军事动员就意味着从遥远的城镇和村庄里征召这些年轻男子。战争开始的时候，英国并没有这种普遍服役的情况。依靠强大的海军，英国拥有一支人数相对较少的常备志愿军。然而，在战争的过程中，英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开始了征兵，也就是强制服兵役。

这种普遍征兵制意味着整个国家都武装起来了。军事动员的命令影响到了每个城镇、每座村庄以及每个家庭。在欧洲大部分地方，8月最初的几天里，人们的生活突然陷入停滞，几百万年轻男子离开家庭，再也没有回来。到处是行进的军队、沉重的脚步声、鼓励军队的欢呼声、巨大爱国热情的展现以及紧绷的心弦，同时也杂有一种轻松的心态，因为人们当时还未意识到未来几年会变得多么恐怖。

激昂的爱国主义情绪横扫了每一个人。曾经极力鼓吹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曾经号召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对抗资本主义这一共同敌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激动不已，作为热诚的爱国者加入了这场资本主义战争。一部分人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但是这些人遭到了鄙视、咒骂和反复的惩罚。大部分人对敌人都恨之入骨。当英国和德国工人互相残杀的时候，这两个国家以及其他参战国的学者、科学家和教授也开始相互咒骂，诅咒最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在对方身上。

因此，随着战争的到来，19世纪结束了。庄严而宁静流淌着的西方文明的大河突然被战争的旋涡吞没。旧的世界已不复存在。四年多以后，新的事物从那个旋涡里诞生了。

147 ——战争前夕的印度

我已经很久没给你讲印度的事情了，我很想重新回到这个话题上来，告诉你印度在战争前夕的悲惨遭遇。我还是决定服从自己的意愿。

在前面几封很长的信中，我们已经详细研究了印度人的生活以及19世纪英国统治印度的一些情况。这个时期最主要的特点似乎是英国巩固了对印度的控制以及伴随而来的对印度的剥削。印度受到了三种侵占力量的控制——军事、行政和贸易。英国军队以及英国军官领导下的印度雇佣军，显然是外来的侵占力量。不过，更有力的一种力量是对行政事务的控制，形成了无须向任何人负责的、高度集权的官僚制度。第三种侵占力量受到前两种的支持，是贸易上的侵占，这是三者中最危险的一种，因为大部分剥削来自或是代表了贸易侵占，而且这种剥削国家的方式不像另外两种那么明显。的确，很长时间以来，甚至目前也多少是如此，一些知名的印度人士更反感前两种情况，似乎认为第三种并不重要。

英国对印度采取的政策，其一贯的目的之一就是建立特权阶级，这些由英国指定的特权阶级会依赖他们，并成为他们在印度的支持者。这样一来，封建王公们的权力就得到了增强，形成了印度大地主阶级和印度贵族阶级，甚至在不干涉宗教的名义下，社会保守主义也得到了促进。所有这些特权阶级自身对剥削国家就很感兴趣，实际上他们也只能依靠这种剥削存在下去。印度形成的最大既定利益就是英国资本的利益。

英国政治家、曾担任过印度事务大臣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在1875年说的话很能说明问题，因而常常被人引用。他这样说道：

> 我们必须从印度身上抽血，抽血的时候，应该把刀子对准充血的部位，至少是血液充足的部位，而不是已经被抽过血的虚弱部位。

英国对印度的侵占以及他们的一贯策略导致了许多后果，其中一些后果令英国人很不愉快。不过，就算是个人也无法控制自己行为带来的一切后果，更不用说国家了。某些行动往往导致了新势力的出现，这些新势力会反对这些行动，与之作斗争并最终战胜它们。帝国主义引发了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导致工厂中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人团体，这些工人联合起来共同与资本家工厂主做斗争。为遏制一场运动而镇压一个种族所进行的政府压制，往往增强了他们的信念和决心，也让他们为取得最终胜利做好了准备。

我们看到，英国对印度的工业策略导致农村化越来越严重，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找不到其他工作，只能从城镇回到乡村。土地的负担变大了，农民的佃租土地，也就是他们租种的农田或田地变得更小了。这些佃租土地大部分都变得“不经济”了，也就是说这些田地太小，不够为耕种者带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最低收入。但是耕种者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继续这样生活，他们往往会背负越来越多的债务。英国政府的土地政策使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特别是在贵族和大地主控制的地区。但是在这些区域以及农民小土地所有制盛行的区域，由于没有向政府缴税或给地主缴租，农民被驱逐出了他们佃租的土地。结果，不断有新来的人亟须得到土地，导致农村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无土地劳工阶级，我告诉过你，那里也发生了可怕的饥荒。

这个规模庞大、无依无靠的阶级渴望得到用于耕种的土地，但是土地不够大家分。在地主拥有土地管辖制的地区，地主们利用这种需

求提高了土地租金。一些保护佃户的租赁法禁止突然提高租金的行为，并且规定提高租金的范围不得超出一定比例。但是，地主还是以各种方式突破了这些法律限制，征收了各种非法的费用。有人告诉我，在北方邦奥德的一个贵族庄园里曾经有多达50多种不同的非法征收费用！这些费用中最主要的一种叫作“礼金”，这是佃户一开始就要支付的一种附加费。贫穷的佃户怎样才能支付这些名目繁多的费用呢？他们只能从乡村银行家——商人手里借钱。在没有希望和能力还钱的情况下向别人借钱是很愚蠢的。但是，这些可怜的农民又该怎么办呢？到处都看不到希望，他们无论如何都需要土地，希望情况出现一线转机。结果常常是他们即使借了钱也满足不了地主的要求，于是被驱逐出佃租的土地，再次沦为无土地劳工阶级。

自耕农、佃户以及许多无土地劳工都成了商人的受害者。他们根本无法摆脱债务，只要赚了一点钱他们就要缴出去，但这只够缴利息，本金依然没有减少。几乎没有人阻止商人对他们的榨取。实际上，他们就像农奴一样受困于商人的束缚。某种程度上而言，可怜的佃户是双重农奴身份——既是地主的农奴，又是商人的农奴。

显然，这种事情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的，总有一天所有农民都将无法满足任何人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商人会拒绝再次借款给他们，而地主也很难应付。这个体系表面上就存在着衰落和不稳定因素。近期我们遇到的全国土地问题似乎表明，现在这种体系正在崩溃，已经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了。

恐怕我在这封信中讲的内容与以前一封信中所讲的有重复的地方，只是稍有不同罢了。但是，我希望你知道，代表印度的其实是这几百万不幸的农业劳动者，而不是一直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少数中产阶级人士。

大规模无依无靠的无土地劳工阶级使开设工厂变得很容易了。这些工厂得以运营的前提就是有足够多的（甚至更多的）、愿意为了赚

取工资而工作的人。拥有一点土地的人都不想舍弃他的土地。众多无土地、无工作的人因此成了工厂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样的人越多，工厂所有者就越容易压低工资并控制他们。

我想我已经告诉过你，大约就在这时，印度渐渐出现了一个积累了一定投资资本的新兴中产阶级。因此，只要有资金和劳工，就会有工厂。不过，投资在印度的资本大都是外国（英国）资本。英国政府并不鼓励建造这些工厂。英国的策略是让印度保持纯粹的农业大国状态，为英国提供原材料，并消费英国的制造品，而工厂的出现与这一策略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在刚才我所说的那种情况下，印度必然会开始大机器生产，而英国政府将无法轻易地阻止这一进程。因此，尽管有政府的反对，还是有工厂不断涌现了出来。政府的一种反对手段就是对进入印度的机器征税，另一种方式就是征收棉花消费税，实际上就是对印度棉纺厂生产的产品征税。

加姆塞提·纳萨尔万吉·塔塔（Jamshedji Nasarwanji Tata）是最伟大的早期印度工业家，他开创了许多产业，最大的产业就是位于比哈尔邦萨克奇村（Sakchi）的塔塔钢铁公司（Tata Iron and Steel Co.）。塔塔钢铁公司创办于1907年，投产于1912年。钢铁工业是人们所说的“基础”工业之一。当今世界对钢铁的依赖很大，如果一个国家没有钢铁工业，它就会极其依赖其他国家。塔塔公司的钢铁厂规模巨大，萨克奇村现在变成了詹谢普尔市（Jamshedpur），不远处的火车站被称作“塔塔纳加尔站”（Tatanagar）。钢铁厂在战争时期尤为宝贵，因为这些工厂可以生产军需品。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印度塔塔工厂的存在对英国政府来说就是件很幸运的事情。

印度工厂的劳动条件很糟糕，与19世纪初英国工厂的状况相似。由于雇用的是大量失业的没有土地耕种的人，因此他们的工资很低，工作时间很长。1911年，第一部普遍适用的《印度工厂法案》

（*Indian Factory Act*）获得通过。即使是这部法案也规定成人每天工作12小时，儿童每天工作6小时。

这些工厂并未吸纳所有的无地可种的人。大批人来到阿萨姆邦以及印度其他地方的茶叶种植园和其他种植园，他们的工作环境让他们成了雇主的农奴。

超过200万生活窘迫的印度工人迁居到了国外。其中大多数人去了锡兰和马来的种植园。还有许多人去了毛里求斯群岛[位于印度洋上，马达加斯加岛（Madagascar）附近]、特立尼达岛（Trinidad，紧邻南美洲北部）、斐济（靠近澳大利亚），以及南非、东非和英属圭亚那（British Guiana，位于南美洲）。他们是作为契约工人来到这些地方的，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他们是农奴。契约是雇主和这些工人签订的包括合同在内的文件；依照契约，这些工人成了雇主的奴隶。许多有关这种契约制度的可怕说法，特别是来自斐济的情况传回了印度，于是印度发生了骚乱，这种制度也就被废止了。

有关农民、劳工和侨工的情况就讲到这里。这些人是印度贫穷、沉默、长期受苦受难的民众。真正发出声音的是新兴中产阶级，他们的出现与英国有很大关系，但是他们也开始指责英国。随着这个阶级的发展，民族解放运动也发展起来了。你应该记得，民族解放运动在1907年至1908年达到高潮，群众运动震动了孟加拉，印度国大党分裂为两派——极端派和温和派。英国人继续采取一贯策略，压制先进的群体并试图用微不足道的改良争取到温和派的支持。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穆斯林要求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单独存在并获得特殊待遇的政治主张。现在人们都知道，当时政府支持了这些要求，从而在印度人民中间制造分裂局面，以此阻止民族主义的发展。

英国政府的策略暂时取得了成功。罗卡曼尼亚·蒂拉克（Lokamanya Tilak）被捕入狱，他的党派受到镇压。温和派热情地接受了政府的行政改革（莫莱-明托改革），这些政府行政改革没有赋予

印度人任何权利。不久之后，废除了孟加拉分裂方案，从而缓和了孟加拉人的情绪。1907年以及之后的政治运动再次成为纸上谈兵者的业余消遣活动。1914年战争来临的时候，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并不活跃。只代表温和派利益的国大党一年召开一次会议，通过了一些不实用的决议，别的事一概不做。民族主义陷入了低潮。

除了政治领域，与西方的联系还产生了其他反响。新兴中产阶级的（而非大众的）宗教思想受到了影响，出现了新的宗教改革运动，例如梵社和圣社，严格的种姓系统逐渐衰落。文化上也出现了觉醒，尤其在孟加拉。孟加拉作家使孟加拉语成了最丰富的一种印度现代语言；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同胞之一、依然与我们同在的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就来自孟加拉。从孟加拉还走出了著名的科学家贾加迪什·钱德拉·玻色爵士（Sir Jagadish Chandra Bose）以及普拉富拉·钱德拉·雷爵士（Sir Prafulla Chandra Ray）。我要提到的另外两位印度科学家是拉马努金（Ramanijam）以及拉曼爵士（Sir Chandrashekhara Venkata Raman）。因此印度在科学界表现突出，而科学一直是欧洲巨大成就的基础。

我还要提到另一个人，他就是用乌尔都语和波斯语创作的天才诗人穆罕默德·伊克巴尔爵士（Sir Muhammad Iqbal）。他写下了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优美诗篇。可惜的是，他在晚年放弃了诗歌创作，投身到其他工作之中去了。

当印度政治在战前处于静止状态的时候，在远离印度的一个国家里，却为了印度的名誉发生了一场英勇而特别的战斗。这个国家就是大量印度劳工和一些印度商人侨居的南非。由于南非的种族歧视根深蒂固，侨居南非的印度人在许多方面受尽屈辱，惨遭虐待。恰巧一位年轻的印度律师被带到南非参与处理一个案子。他目睹了自己同胞们的状况，感到非常屈辱和痛苦。他下定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他默默地努力了很多年，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和财产，全身心地投

入到他所选择的事业中去。这个人就是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如今，每一个印度孩子都知道他，爱戴他，但是当时他在南非以外的地方并不出名。突然之间，他的名字传回了印度，人们惊讶而自豪地谈论他，谈论他的英勇斗争，对他充满了钦佩之情。南非政府还想继续羞辱印度侨民，而在甘地的领导下，这些侨居者拒绝屈服于政府。这样一个远离故乡、贫穷、受压制而又无知的工人群体以及一小群商人能拥有这么勇敢的态度，这是很令人意外的。更令人意外的是他们采取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从那以后，我们就经常能听到这种方式了。这就是甘地主张的“非暴力不合作原则”，它原意是坚持真理。有时它也被称作“消极抵抗”，但这种翻译并不合适，因为它其实是很积极的。尽管非暴力主义是它的基本组成部分，但它的意思并不只是不抵抗。甘地以这种非暴力战争的方式，震惊了印度和南非，印度人民获悉我们在南非的数以千计的同胞心甘情愿走进监狱时，都感到非常激动、自豪和欣喜。在我们的内心里，我们对自己在本国的顺从和无能感到羞愧难当，代表我们民族的这种勇敢挑战行为增强了我们的自尊心。忽然之间，印度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政治觉醒，钱款开始涌入南非。甘地和南非政府达成协议之后，这场斗争才停止下来。尽管在当时，这无疑是印度取得的一个胜利，但是印度人遇到的障碍依然存在，据说南非政府也没有遵守原先的协议。海外印度人的问题依然存在，只有等到印度独立，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印度人在自己的国家都没有得到尊重，怎么能在其他地方得到尊重呢？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都没有成功地解放自己，又怎么能帮助海外的同胞呢？

战前的几年里，印度的情况就是这样的。1911年土耳其遭到意大利攻击时，印度十分同情土耳其，因为土耳其被视为亚洲和东方大国，受到了所有印度人的支持。印度穆斯林受到的影响更深，因为他

们将土耳其苏丹视作伊斯兰教领袖哈里发。那时，也有一些人谈论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提出的“泛伊斯兰教主义”。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更加激怒了印度穆斯林。为了展现友谊和好意，一个叫作“红新月代表团”（Red Crescent Mission）的医疗团队从印度启程，去帮助土耳其伤员。

不久之后就爆发了世界大战，土耳其作为英国的敌人被卷入了战争。不过，这就要谈到战争时期的事了，所以我必须就此搁笔。

148 ——1914年至1918年世界大战

这场被称为世界大战的战争，这场在四年时间里摧毁了欧洲以及亚洲、非洲部分地区并夺走了几百万年轻人生命的战争，我该给你讲些什么呢？战争是一个让人想起来就不愉快的主题。它很丑陋，但也经常受到赞美，披上浓墨重彩的外衣；人们也常说，如同火焰能够精炼珍贵的金属一样，由于生活太过安逸、美好而变得脆弱、堕落和懒散的国家也能通过战争获得锤炼，变得强大。许多充满高尚的勇气和感人的牺牲精神的例子展现在我们眼前，仿佛战争就是这些品质的创造者一样。

我已经试着给你梳理了这场战争的一些原因：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贪婪以及帝国主义大国的竞争是如何产生冲突、如何不可避免地发生争斗的。这些国家的工业领袖非常希望得到越来越多的机会和区域进行剥削，金融家也渴望赚取更多的钱，军火制造商也渴望获得更大的利润。因此，这些人参与到战争中来，按照他们的要求，年长的政客们代表了他们以及他们阶级的利益，而国家中的年轻人则互相攻击。大多数这样的年轻人以及相关国家的普通民众对战争爆发的原因毫不知情。实际上，这与他们无关，无论战争成功还是失败，他们都注定要失败。这是以人们的生命，大多数是年轻人生命为代价的富人的竞赛。然而，只有当普通大众都准备好战斗，战争才会打响。我曾经告诉过你，欧洲大陆所有国家都有征兵制或强制兵役制度，英国是在战争后期才出现这种制度的。但是，假如人们没有真正的意愿，强制征兵也不可能迫使所有人都参与这场战争。

因此，所有参战的国家都费尽心思激发人们对国家的热情和热爱。每一方都称其他人为“侵略者”，装出一副只是为了自卫而战斗

的样子。德国说自己被各方敌人包围起来，这些敌人企图困住它。德国指责俄国和法国的主动入侵。英国认为自己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小国比利时，因为德国严重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立场。所有相关国家都以正义自居，将责任归咎到敌人身上。很多信息使得每个民族相信，他们的自由受到了威胁，他们应该为了保卫自由而战斗。尤其是各地的报纸都在制造战争氛围，也就是在引起人们对敌对国家的痛恨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种情绪失控的态势十分猛烈，几乎横扫了面前的一切。激发大众的集体热情是很容易的，但是，就连理智的知识分子和本该具有镇定及温和性格的人，例如思想家、作家、教授、科学家——所有相关国家中的所有这些人都产生了心理失衡，他们心中充满了对敌国的愤恨和杀戮欲望。本该代表安定和睦、从事宗教活动的牧师也变得非常残忍，甚至比其他人更加凶残了。就连反战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失去了理智，忘记了原则。所有人——但也并非所有人都是这样。每个国家都有一小部分人不愿变得歇斯底里，不愿让自己痴迷于这股战争狂热之中。人们嘲笑他们，称他们为胆小鬼，许多拒绝服兵役的人甚至被投进了监狱，其中一些是社会主义者，还有一些是宗教人士，比如本着良心反对战争的贵格会教徒。有一种说法很确切，如今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与之相关的人们都发疯了。

战争一开始，各国政府就把战争当作压制真理、散播各种谣言的借口。人们的个人自由也受到了压制。当然，事情的另外一面被完全遮盖了。因此，人们只能了解到事情的一面，而他们了解到的都是经过扭曲、往往是完全虚假的内容。用这种方式愚弄人们并不困难。

甚至在和平时期，狭隘的民族主义宣传和歪曲事实的报道就已经在愚弄人们了，早就为战争打好了基础。战争本身得到了美化。在德国，或者说在普鲁士，这种对战争的美化成了统治者的明确思想，从德皇到地位在他之下的其他统治者都具有这种思想。学术性的著作也

在摇旗呐喊，证明战争是一种“生物需要”，也就是说战争是人类生活及进步的必需品。德皇总是在聚光灯下装腔作势地表演，因此赢得了很多关注。不过，类似的思想在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军队以及其他上层阶级圈子里也极为盛行。罗斯金（Ruskin）是19世纪英国的一位大作家，深受甘地的喜爱。也许你读过他的一些作品。这位具有真正高尚思想的人在一本书中写道：

> 简而言之，我发现，战争使所有大国掌握了话语的真理以及思想的力量，和平则使这些真理和力量荒废了；战争教之，和平误之；战争训之，和平背之。总之，这些真理和力量生于战争，死于和平。

为了说明罗斯金是一位多么直率的帝国主义者，我要再引用一段他的文字：

> 它（英国）必须这么做，否则就要毁灭：它必须建立殖民地……夺取它能涉足的每一块肥沃的废弃之地，在那里教导它的殖民者，他们的首要目的就是通过陆地或海洋发展英国的力量。

我还要引用一段话，这段话摘自一位英国少将写的书。他指出：“除非通过蓄意欺骗、虚情假意或者闪烁其词的方式”，否则几乎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他认为，任何“拒绝采取这些方式”的人“就是故意背叛战友和下属的叛徒”，“只能被称为最卑鄙的懦夫”。“道德与不道德——这些东西对处于成败关头的大国来说算得了什么呢？”一个国家“必须不断地发动攻击，直到它的对手受到致命的打击为止”。我很想知道，罗斯金听到这些话会说什么呢？当然，不要误以为这是英国人思想的典型，也不要误以为德皇夸夸其谈的发言就代表了普通的德国民众。然而不幸的是，当权者总是有很多想法，在战争时期，他们几乎总是冲在最前面。

这种直率的说法并不总是公开宣布的，战争往往被人披上假装圣洁的外衣。因此，当欧洲和其他地区绵延几百英里的战争前线上发生了可怕残杀的时候，留在国内的人们则制造了华丽而高调的措辞，以便为杀戮开脱，进而欺骗人们。这场战争变成了争取自由和自尊的战争，变成了终结战争的战争，变成了保护民主的战争，变成了争取国家自主权和小国解放的战争，等等。同时，许多留在国内的金融家、工业家和军需品制造商使用这些充满爱国之情的华丽措辞，劝说年轻人跳进战争的熔炉，这些人因此获得了巨额的利润，成了百万富翁。

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战争还在持续，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其中。两大阵营都试图通过私下贿赂赢得中立国的支持，这种行为一旦公开，必将使那些崇高的理想以及被人四处张扬的华丽措辞化为乌有。英国和法国的行贿实力比德国要大，因此大多数参战的中立国都站到了英、法、俄“三国协约”一边。原先是德国盟友的意大利，也被这些协约国（以下我把英法协约一方简称为“协约国”，德奥同盟一方简称为“同盟国”）争取过去了，原因是英、法、俄三国和意大利签订了一项秘密协议，许诺意大利可以得到小亚细亚半岛地区和其他地区的部分领土。另外一项秘密协议许诺，俄国可以获得君士坦丁堡。对它们来说，瓜分世界是一个愉快的任务。这些秘密协议的内容与协约国政治家们的公开声明是完全背离的。如果不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夺权后将这些协议刊印出来，也许就没人会知道它们的存在。

最终，有十余个或更多个国家站在了协约国一边。这些国家包括英国及其附属帝国、法国、俄国、意大利、美国、比利时、塞尔维亚、日本、中国、罗马尼亚、希腊以及葡萄牙。站在德国一边的有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美国在战争开始后第三年也参战了。即使不考虑美国的加入，协约国的资源显然也远远多于德国一方。协约国在人口、财力、制造武器和弹药的工厂方面，都要优于德国。最重要的是，它们控制了海洋，于是就能轻易利用中立国的资源。因此，由于拥有海上霸权，协约国可以获得原材料、食物以及美

国借给它们的钱款。德国和它的同盟国陷入了敌人的围困圈，而德国的盟友都是些实力很弱的国家，一点也帮不上忙。它们还常常耗费德国的实力，依赖德国的资助。因此，实际上是德国自己在与世界上大部分武装起来的国家进行对抗。从任何角度来说，这似乎都是一场很不平等的战争。然而，德国在四年中抵御住了世界的侵袭，还屡次走到了战争胜利的边缘。年复一年，胜利的归属似乎一直悬而未决。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德国之所以能获得这种成就，是由于德国建立起了强大的军事机器。直到最后，当德国和它的盟友最终被击败的时候，德国军队依然毫发无损，其中大部分部队都在外国领土上。

在协约国这边，法国军队在战斗中受到的攻击最多，法国以众多法国年轻人的生命为代价，最终经受住了德国军事机器的打击。英国的贡献主要是他们的海军和海上实力，以及外交和政治宣传。以军队实力为傲的德国在与中立国的外交策略上和政治宣传方式上表现得非常粗鲁。在所有参战国中，英国无疑是最有效率的，它充分宣传了虚假和扭曲的事实。俄国和意大利以及其他协约国在战斗中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表现并不突出。所有国家中损失最惨重的恐怕要算俄国。在战争后期才加入的美国，在击败德国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战争最初的几个月里，英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听说两国之间甚至发生了战争。两国的冲突原因在于，英国干涉了美国的海上货运，英国怀疑这些货物是运往德国的。但是，当时英国的政治宣传机构非常繁忙，并努力争取到了美国的支持。他们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传德国暴行，散布德国军队在比利时的可怕行径。这种暴行被称为德国兵的“恐怖政策”。这些内容里有些是有事实依据的，比如毁坏鲁汶大学（University of Louvain）校园以及图书馆，但是大多数内容则纯粹是虚构的。还有一件令人惊异的事：据说德国人竟然经营着一家尸体工厂！无论怎么说，敌对民族之间的怨恨实在太强烈了，无论什么事情他们都会相信。

当我告诉你，前往美国的英国军事代表团由500名官员以及1万名助理组成的时候，你应该对英国政治宣传的巨大规模有些概念了吧。这是官方的工作，除此之外，他们还做了很多非官方的宣传工作。为了政治宣传，他们用尽了一切方法，无论这些方法正规与否。为了赢得瑞典人的支持，英国人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Stockholm）正式成立了英式的音乐厅，演出了许多丰富多彩的节目。

经过长期的努力，这种政治宣传以及我以后要给你讲的德国潜艇活动，才将美国拉入了协约国一方。不过，最终的决定性因素还是金钱。

战争是极其昂贵的，它吞噬了大量贵重的物资，这些物资最终都遭到毁坏。它使得大多数生产财富的活动陷入了停滞，人们的精力也集中在了破坏行为之上。这些钱从哪儿来呢？首先，在协约国一方，只有英国和法国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它们不仅要支付自身的战争开销，还要借钱借物给它们的盟友用以战争开销。一段时间之后，巴黎支撑不住了，它的经济资源被耗尽了。于是伦敦独自为协约国一方提供资金支持。在战争第二年年末，伦敦也支撑不住了。因此，1916年年末，法国和英国几乎耗尽了全部存款。于是，一支由著名政治家组成的英国代表团前往美国寻求经济援助。美国同意借款给他们，此后，美国出钱支持协约国一方继续参战。协约国欠美国的债务增长迅猛，达到了惊人的数字，随着债务的增长，贷款给协约国的美国大银行家和金融家对协约国的胜利越来越感兴趣了。如果德国击败了协约国，美国借给协约国的大量钱财怎么办？美国银行家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于是他们也做出了相应的反应。支持美国参战并加入协约国一边的意见越来越多，最终美国真的这么做了。

现在，我们听到很多有关美国债务问题的消息，报纸上到处都在谈论这个话题。这些债务在战争时期不断累积起来，就像挂在英国和

法国脖子上沉重的石磨，让它们难以偿还。如果这笔钱没有及时到位，它们的信誉将会完全崩溃，也许美国也不会加入它们一边了。

149 ——世界大战的进程

1914年8月初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比利时以及法国的北部边境地区。大批德国军队持续推进，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他们对小国比利时的短暂阻击感到十分愤怒，于是试图通过恐怖手段去威吓比利时人，这就是协约国宣传德国暴行的根据。德军继续朝着巴黎进发，前进途中他们遭遇了法国军队，而少量的英国军队则被他们击退了。大战爆发后不到一个月，巴黎似乎已经注定在劫难逃，法国政府因此准备将巴黎政府部门和贵重物品转移到南边的波尔多。一些德国人认为，他们实际上已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8月底的时候，西线战场（也就是法国前线）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同时，俄国军队正在侵袭东普鲁士（East Prussia），试图将德国的注意力从西线战场转移过来。被称为“蒸汽轧路机”的俄国正在逼近柏林，法国和英国对此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但是，俄国士兵的武器装备很差，俄军军官极其无能，身后又是沙皇的腐败政府。突然间德军向俄军发动了攻击，将大量俄国军队围困在东普鲁士的湖泊沼泽中，并彻底消灭了他们。德军获胜的这场战役被称为“坦嫩贝格战役”（Batle of Tannenburg），冯·兴登堡（von Hindenberg）是这场战役的主要统帅之一，后来他成了德意志共和国总统。

这是一场巨大的胜利，然而它间接地损耗了大量德国兵力。为了取得胜利，也出于对俄国人在东线推进的一丝担忧，德国将一些对法作战的兵力转移过来对付俄国。这种做法稍微缓解了西部前线的压力，法国军队拼尽全力，总算打退了入侵的德军。在1914年9月初的马恩河战役（Batle of the Marne）中，法军成功地迫使德军后撤了约50英里。巴黎获救了，法军和英军也得到了一些喘息的机会。

德军再次发动了进攻，就在他们几乎就要成功的时候，还是遭到了阻击。于是双方军队都开始挖掘战壕，一种新型的战斗形式堑壕战开始了。这是一种对峙的战争形式，西线战场上的这种堑壕战持续了三年多时间，几乎一直持续到了大战末期；大量军人就像鼹鼠一样挖掘战壕，企图耗尽对方的力量。西线战场上的德军和法军人数最初就达数百万人之多。战场上规模不大的英国军队人数在快速上升，后来也达到了几百万人在东线战场，也就是在俄国前线，军事行动更为频繁。俄国军队不断击败奥地利人，自身却又总是败给德军。这条战线上的损失和伤亡人数非常巨大。别以为在西线打的是堑壕战，伤亡就会很少。士兵的生命遭到了漠视，几十万人被迫在战壕里进行反复的、毫无结果的攻击，结果必然只有死亡。

当时还有许多其他战场。土耳其人企图攻占苏伊士运河，但被击退了。我以前告诉过你，1914年12月埃及沦为了英国的受保护国，随即英国暂停了新立法议会的工作，将他们认为可疑的人关进了监狱。英国禁止发行民族主义报纸，不准五个以上的人集会。伦敦《泰晤士报》称英国对埃及的管制是“野蛮而无情的”。事实上，整个战争期间埃及都处在军事管制之下。

英国攻打了摇摇欲坠的土耳其帝国领土上许多薄弱的地方，比如伊拉克，以及后来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在阿拉伯半岛，英国人利用阿拉伯人的民族情绪，为支持阿拉伯反抗土耳其的起义慷慨提供了金钱和给养。英国驻阿拉伯半岛的特派员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上校（Colonel T. E. Lawrence）是这场起义的主要参与者，后来他成了亚洲地区许多运动的幕后神秘人物。

但是，攻打土耳其要害的直接行动开始于1915年2月，英国舰队试图夺取达达尼尔海峡，并一举占领君士坦丁堡。如果他们取得成功，他们不仅会把土耳其逐出战争，也会消除德国在西亚地区的一切影响。然而，英国并没有成功。土耳其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值得

注意的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英军一直想要攻占加里波利（Gallipoli），但在蒙受了极大损失之后，最终还是撤退了。

协约国也攻击了西非和东非的德国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与德国之间的联系被切断，无法获得德国的援助。慢慢地，它们屈服了。在中国，日本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德国的租借地胶州湾。日本的日子真是无忧无虑，因为远东地区的麻烦事并不多。于是日本利用这个机会欺凌中国、威胁中国，在中国强占了各种租借地，获取了特许权。

意大利花了几个月时间来观战，它想要辨别出哪一方会取得胜利。最终它认为协约国获胜的机会更大，于是接受了协约国的收买，并与协约国签署了秘密协议。1915年5月，意大利正式以协约国的身份参战。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互相对峙了两年但没有分出胜负。直到德国出面相助，奥匈帝国才战胜了意大利。奥德大军几乎一直攻打到了威尼斯。

保加利亚于1915年10月成了德国的盟友。不久之后，与保加利亚共同合作的奥德大军彻底击败了塞尔维亚。塞尔维亚统治者和残余部队只得离开自己的国家，登上协约国的船只寻求庇护，塞尔维亚的统治权落入了德国人手中。

在巴尔干战争中，罗马尼亚因为投机取巧而闻名于世。观察了两年战争进程之后，罗马尼亚最终于1916年8月决定加入协约国阵营。它很快受到了惩罚，德军横扫了罗马尼亚，消灭了所有的抵抗势力。罗马尼亚也被奥德大军占领了。

因此，同盟国，也就是德国和奥匈帝国，占领了比利时、法国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波兰、塞尔维亚以及罗马尼亚。它们在许多次要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但是西线战场以及海上才是战斗中心，它们在那些地方并没有取得进展。在西线战场对抗的双方军队陷入了死亡的包围

圈。在海上，协约国占据了优势。在战争初期，德国巡洋舰四处阻挠协约国的海运。埃姆登号（Emden）巡洋舰特别著名，它甚至轰炸过马德拉斯市。不过，这种阻挠起到的作用很有限，并没有改变协约国对海上航道的控制。凭借海上的控制权，协约国阻断了同盟国从外界获取食物和其他给养的通道。由于食物短缺，同盟国内出现了饥荒；对德国和奥匈帝国而言，这种封锁真是痛苦的煎熬。

另一方面，德国开始利用潜艇去攻击协约国的船只。这场潜艇大战打得十分成功，英国的粮食供给被迫减少，英国人也面临着饥饿的威胁。1915年5月，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著名的大西洋航线邮轮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很多人随船沉入了大海。船上的许多美国乘客也未能幸免于难，因此美国对此事件非常愤怒。

德国还对英国发动了空中打击。大型的齐柏林硬式飞艇（Zeppelin Airships）在夜色之中轰炸了伦敦以及军火工业基地。之后飞机开始执行轰炸任务，于是人们经常能听到飞机的轰鸣声以及防空炮开火的声响，人们冲进地下室或者地道避难成了家常便饭。英国人对轰炸平民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怒。他们的愤怒是有道理的，毕竟轰炸平民的行为太过恐怖了。不过，当英国飞机投下炸弹，尤其是那些恶毒的“定时炸弹”，轰炸印度西北边境以及伊拉克的时候，英国人却没有一丝愤慨。这种所谓的治安行动，甚至发生在所谓的和平时期。

月复一月，战争继续吞噬着人们的生命，就像森林大火吞噬成群的蝗虫一样；随着战争的持续，战争的破坏力和残暴程度也越来越大。德国人率先使用了毒气，很快敌对双方都开始使用毒气。飞机投弹更加频繁，后来英国一方还首次使用了“坦克”，这是一种庞大的机械怪物，就像碾轧毛毛虫一样碾轧一切。数十万人在前线阵亡，而在他们的故乡，女人和孩子却在忍受着饥饿和贫困。特别是在德国和奥匈帝国，由于受到封锁，饥荒更为严重。这成了一场忍耐力的考验

之战。哪一方能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胜出呢？一方军队会拖垮另一方军队吗？协约国对德国的物资封锁会使德国大伤元气吗？或者是德国潜艇能切断英国的给养，使英国元气大伤，丧失斗志吗？每个国家都留下了巨大牺牲和苦难的记录。人们想知道，这些牺牲和苦难是徒劳的吗？我们要忘记死去的人向敌人投降吗？战前的岁月似乎已经久远了，战争的过程甚至也被人遗忘了，只有一件事一直萦绕在人们脑海中，那就是复仇和获胜的欲望。

那些为了他们珍惜的事业而献出生命的人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这是任何有勇气的人都无法抗拒的。在战争最后的几年中，到处都笼罩着黑暗，参战国的每个家庭都很悲痛，人们也非常疲倦，也极度失望；然而，除了高举火把，人们还能做什么呢？读一读这首英国军官麦克雷少校（Major McCrae）所写的感人诗篇吧，想象一下这首诗在那些黑暗而阴沉的战争岁月里是如何感动那些读过它的英国人的。要记住，许多国家的人都使用不同的语言写出过类似的诗篇：

我们已经战死。几天之前，

我们还有生命，还在感受黎明晨曦，仰望落日余晖。

我们曾经爱过，也曾经被爱过，而如今我们却长眠在

佛兰德斯战场。

请将我们与敌人的战斗继续下去；

从我们低垂的手中接过火炬，将它高高举起。

假如你背弃了我们的遗志，

我们将永不瞑目，即使罂粟花开遍

佛兰德斯战场。

临近1916年末的时候，情况似乎变得对协约国有利了。他们的新型坦克使他们在西线战场占据了主动；袭击英国的齐柏林硬式飞艇遭遇了彻底的失败；尽管有德国潜艇的阻挠，英国还是通过中立国船只获得了足够的食物补给。1916年5月，大西洋东北部的北海（North Sea）海域发生了一场海战[日德兰海战（Batle of Jutland）]，总的来说，获胜的一方是英国。同时，德国受到的封锁使奥匈帝国、德国的饥荒更加严重了。时间越长对同盟国越不利，速战速决对它们来说很有必要。德国甚至做出过和谈的试探性行动，但是协约国并不想这么做；协约国政府必须遵守承诺，因为它们秘密签订的分割各国的协约只有在取得完全的胜利后才能让各方满足。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也曾为了实现和谈做出过不算成功的努力。

于是德国领导人决定强化潜艇战，打算用饥饿迫使英国投降。1917年1月，德国宣称，在特定海域里他们连中立国的船只都会击沉。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要阻止中立国船只向英国运送食物。这次宣告让美国极为恼怒，它不能容忍自己的船只以这种方式沉没。美国于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场战争，德国政府在决定实施无限制潜艇攻击战的时候，一定也知道美国会有这样的反应。他们或许认为，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必须冒这个风险。他们或许还认为，美国金融家给协约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总之，美国在1917年宣布参战，此时其他所有国家都已精疲力竭，而只有美国资源丰富、状况良好；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参战，就注定了德国及其同盟必定要失败。

然而，在美国宣战之前，还发生了另外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1917年3月15日，第一次俄国革命已经成功迫使沙皇退位。我会单独写一封信给你讲讲这次革命的内容。我现在想提醒你注意，这次革命对世界大战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这时的俄国显然无法与德国及其同盟国抗衡，这就意味着在东线战场上，德国的麻烦得到了缓解。德国可以将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的东线部队转移到西线战场，与法国和英国对阵。情况一下子变得对德国极为有利了。如果德国能在俄国革命发

生前六七周就知道俄国要发生革命的话，情况就会有很大的改变了。也许潜艇战就不会发生变化，也许美国就会依旧保持中立。在俄国退出和美国中立的情况下，德国很有可能击败英国和法国军队。即使这种情况出现了，德国还是会增强西线战场的兵力，德国潜艇还是会严重破坏协约国和中立国的海运。

俄国革命似乎帮了德国一个忙，而它也成为俄国内部实力衰弱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一次革命后，仅仅时隔八个月就发生了第二次革命，这次革命让倡导和平的苏维埃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人掌握了权力。他们对参战国的工人和士兵发出了和平的呼吁；他们指出，这是一场资本主义战争，工人们不能容忍自己被人利用，去充当帝国主义进步的炮灰。这样的声音和呼吁传到了前线战场上其他国家的士兵耳中，对他们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军队中出现了许多次兵变，当局费了很大力气才稳住了局面。德国士兵受到的影响更大，许多军团在俄国革命之后开始与俄国军队密切往来。这些军团转移到西线战场的时候，他们带去了这一新信息，并在其他军团中传播。德国已经厌倦了战争，开始打退堂鼓，从俄国带来的种子落到了准备接收它们的土壤中。俄国革命以这种方式从内部分化了德国。

但是德国军方对这些征兆视而不见，1918年3月，他们强迫苏维埃俄国接受了压倒性和羞辱性的和约。苏维埃接受了和约条款，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愿意以任何代价换取和平。1918年3月，德国军队还在西线战场发起了最后一次强势进攻。德军冲破了英法防线，一路上消灭了很多部队，再一次推进到马恩河；三年半之前，德军被迫撤离了马恩河。

这次攻势很强烈，但这也是最后一次了，德国已经精疲力竭。同时，美国的军队横跨大西洋来到欧洲战场；在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之后，西线战场上所有的协约国军队——英国、美国和法国军队——将指挥权交给了一位最高统帅，以便充分合作，形成合力。法国元帅福

煦（Marshal Foch）成了西线战场所有协约国军队的总司令。到1918年年中，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占据了主动地位和攻势地位的协约国军队不断向前推进，迫使德军节节败退。1918年10月，战争临近结束了，各方开始考虑签署停战协定。

1918年11月4日，德国海军在基尔港（Kiel）发生了水兵哗变，五天之后，德意志共和国在柏林宣布成立。11月9日，德皇威廉二世灰溜溜地从德国逃亡到荷兰，霍亨索伦王室也在同一天随之覆灭了。就像中国清朝的满族人一样，“他们出现时如猛虎般咆哮，消失时如游蛇般无声”。

1918年11月11日，交战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战争宣告结束。这个停战协定以美国总统威尔逊制定的《十四点原则》（*Fourteen Points*）为基础，主要包括恢复相关小国家的自主权、裁减军备、杜绝秘密外交、俄国接受其他大国帮助以及成立国际联盟等条款。我们以后会看到，《十四点原则》中的有些原则被胜利者们随意遗弃了。

战争结束了，但是英国舰艇继续封锁德国，忍饥挨饿的德国妇女和儿童无法获得食物。这种惩罚别人甚至是弱小孩子的敌意和欲望令人吃惊，但得到了有名望的英国政治家、公众人物、大型报社甚至所谓的自由主义期刊的支持。实际上，当时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是一个自由党人。四年零三个月的战争充斥着疯狂的残暴行为。然而，停战之后还继续封锁德国，这种行为无疑是最冷血、最残暴的。战争结束了，整个国家依然饥荒不断，小孩子们在可怕的饥荒中受尽了苦难；英国也故意强行禁止食物进入德国。战争多么扭曲我们的心灵啊，让我们的心灵充满了疯狂的仇恨！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 Hollweg）曾说：“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孩子的孩子，都会铭记英国强加于我们的封锁，这是一种如魔鬼般的极端残忍行为。”

当著名的政治家和其他身居高位的人士在极力称赞这种封锁的时候，那些参加战斗的英国兵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情形了。在停战之后，一支驻扎在莱茵兰（Rhineland）地区科隆市的英国军队，要求他们的英国上将给劳合·乔治首相发电报，指出“德国妇女和儿童遭受苦难的景象对英国军队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停战之后，英国对德国的封锁又持续了7个多月。

长时间的战争使参战国家都变得非常残忍和无情。战争破坏了很多人的道德意识，很多正常人都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罪犯。人们习惯了暴力，习惯了蓄意扭曲事实，内心都充满了仇恨以及复仇的意志。

战争的资产负债情况是怎样的？具体情况还不清楚，各国还在统计之中！我要告诉你一些数字，让你记住现代战争的真正意义。

战争伤亡总人数统计如下：

确认士兵死亡人数1000万人

推定士兵死亡人数300万人

平民死亡人数1300万人

受伤人数2000万人

俘虏300万人

战争孤儿900万人

战争寡妇500万人

难民1000万人

看看这些惊人的数字，想象一下它们所代表的人类苦难。把这些数字加起来：仅仅伤亡总数就达到4600万人。

现金花费如何呢？各国还在统计之中！据美国估算，协约国一方总支出为409.996亿英镑，接近410亿英镑；德国一方总支出为151.22亿英镑，超过150亿英镑。总计超过560亿英镑！我们不能完全理解这些数字的意义，因为它们彻底超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数字范围。这些数字几乎让我们想起了天文学上的数字，比如地球到太阳或者其他星球的距离。毫不意外，之前的参战国，无论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绝望地陷入了战争财政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之中。

“终结战争”、“为保卫世界民主而战”、“确保小国解放”、“争取自主权”以及广泛争取独立和崇高理想的战争结束了；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以及它们的卫星国（当然俄国排除在外）获得了胜利。我们会在以后看到这些高尚而高贵的理想是怎样转化为现实的。同时，我们应该引述一下英国诗人骚塞（Southey）描写的有关以前取得的另一场胜利的诗句：

“每个人都赞美公爵

他赢得了大战的胜利。”

“但是最后有何益处？”

小皮特金打断了老人的话题。

“哎呀，我也说不清，”老人喃喃自语，

“不过那确是极好的胜利。”

150 ——俄国沙皇独裁政府的灭亡

在有关世界大战进程的介绍中，我提到了俄国革命以及它对战争的影响。除了对战争的影响之外，俄国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大事件，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它是第一次出现的一种革命类型，但它绝不会是唯一的一次，因为它已经对其他国家形成了挑战，并且成为全世界革命者的榜样。因此，它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它无疑是世界大战最大的成果，然而，它也是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不受参战国政府和政治家欢迎的。或许更确切地说，它是俄国的历史和经济状况的产物，因为世界大战所导致的巨大损失和苦难很快就将俄国推到了危急关头，而列宁这位领袖人物和天才革命家则利用了这一危急状况。

1917年，俄国发生了两次革命，一次发生在3月，另一次发生在11月。这整个时期也可以被看作具有两次高潮标志的一个连续的革命过程。

在上一封有关俄国内容的信中，我给你讲过1905年革命，这场革命发生的时候，俄国也处于一个战争时期和战败时期。这场革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沙皇政府依旧继续着横行霸道的独裁统治和秘密监视，并压制一切自由主张。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党人遭到了武力镇压，其主要成员不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个囚犯聚居地，就是被驱逐到了国外。然而，就是这一小批被驱逐到国外的人，在列宁的领导下，继续着他们的政治宣传和学习。他们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马克思的信条更适用于英国或德国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俄国仍是一个具有中世纪特质的农业国，只有大城镇才有一点工业的影子。列宁着手改编马克思主义原理，使其适应俄国情况。他就

这个主题写出了很多内容，在俄国流放者中传播，他们就这样做着革命理论的准备。列宁相信，任何一件工作都应交由熟练的、经过训练的人完成，而不仅仅由热心者来完成。如果要发起一次革命，他认为参与者也应该接受彻底的训练，这样一来，当行动时机到来之时，他们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该如何行动。因此，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利用了1905年之后昏暗、压抑的那几年时间，为未来的行动做着准备。

1914年的时候，俄国城市里的工人阶级早已觉醒，再一次成了革命者。俄国那时发生了很多次政治罢工。然后，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最先进的工人们被派往前线成了士兵。列宁和他的队伍（大多数领导者都被驱逐到国外了）从一开始就反对战争，他们不像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那样情绪激动。他们称这场战争为资本主义战争，工人阶级对此毫不关心，除非这场战争能使他们获益，让他们获得自由。

战场上的俄国军队损失惨重，他们的损失也许是所有参战军队中最惨重的。俄国将领们极其无能，他们甚至都不具备一般军人的必要才智。俄国士兵在武器装备破旧、缺乏弹药和补给的状况下抗击敌人，几乎是在白白送死，战死的人数多达几十万人。同时，在以圣彼得堡这个名字而闻名的彼得格勒，以及其他大城市，出现了大量投机倒把行为，投机商人赚取了大笔财富。这些“爱国的”投机者和奸商当然要大声疾呼，要求将战争进行到底。永无休止的战争无疑符合了他们的愿望。然而，士兵、工人和农民（给士兵提供补给的人）则精疲力竭，忍饥挨饿，不满情绪非常严重。

沙皇尼古拉二世昏庸无能，受他妻子沙皇皇后的影响很深；而沙皇皇后也很愚蠢，但是她比沙皇强势。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是各种无赖和傻瓜，没人敢批评他们。后来，一个令人厌恶的恶棍格里高利·拉斯普廷（Gregory Rasputin）受到了沙皇皇后的宠爱，并由此赢得了

沙皇的宠爱。拉斯普廷（“拉斯普廷”这个词的意思是“龌龊的人”）以前是一个贫穷的农民，曾经当过盗马贼。他决定以宗教为名，从事赚钱的苦行僧职业。如同在印度一样，这种行当在俄国也是一种轻松赚钱的方法。他蓄起了长发；他的头发越来越长，他的名气也越变越大，最后他的名声传到了皇宫里。沙皇和沙皇皇后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沙皇的长子，当时患了一种疾病，于是拉斯普廷设法使沙皇皇后相信他能治好她儿子的病。他的运气真的很好，很快他就控制了沙皇和沙皇皇后，许多高层官员的任命都要听他的意见。他的生活腐化堕落，收受了大额贿赂，他在很多年里一直担任着这种控制一切的角色。

每个人都对此深感厌恶，就连温和派和贵族都开始发牢骚了，还有人策划了一场宫廷革命——也就是用武力强迫更换沙皇。同时，沙皇尼古拉二世担任了俄国军队的总司令，把什么都搞得一团糟。就在1916年快要结束的前几天，一位沙皇王室成员杀死了拉斯普廷。这位王室成员邀请了拉斯普廷参加宴会，并要求拉斯普廷开枪自杀，遭到拒绝后他开枪打死了拉斯普廷。人们欣然接受了拉斯普廷的死讯，他们终于摆脱了他，但是沙皇政府秘密警察部门也因此对人们施加了更大的压迫。彼得格勒发生了食物短缺和争抢食物的骚乱。1916年3月初，由于工人长期积聚的痛苦，革命出乎意料地突然爆发了。从3月8日到12日的5天时间里，这场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不是宫廷事件，甚至不是由上层领袖精心组织和策划的革命行动。这次行动几乎是由底层的、最受压迫的工人发起的，整个过程中他们摸索着前行，也没有清晰的计划或领导。各种革命团体，包括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都措手不及，不知道该怎样指挥这次行动。民众自己发挥了主动性，他们在争取到了彼得格勒驻军的支持后，成功就开始向他们招手了。不过，我们不能误认为这些革命群众是存心搞破坏的、无组织的聚众闹事者，就像以前的农民暴力活动一样。这次“三月革命”（March revolution）的重要事实在于，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工人阶级，也被称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尽管当时杰出的领导者没有与他们在

一起（列宁和其他人都在狱中或流亡国外），但是这些工人中有许多人都接受过列宁团体的训练。这些来自几十家工厂的无名工人，成了整个运动的支柱，将运动引入了正轨。

工人大众在行动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过的。当然，俄国大体上还是一个农业化国家，即使是这种农业，也还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在整个国家，现代工业都很少见，即使有也只集中在部分城镇。彼得格勒就有其中的几家工厂，因此有许多从事工业劳动的工人。“三月革命”就是由这些彼得格勒的工人以及当地军队共同完成的。

3月8日，革命发出了第一声轰鸣，妇女们冲在了最前面。纺织厂的女工涌到街头展开游行示威。第二天，罢工浪潮传播开来，男性工人也加入了游行队伍，人们要求获得面包，高喊“独裁政府下台”。当权者派出了哥萨克军队去镇压示威工人，这些哥萨克军队以往一直都很拥护沙皇独裁政府。哥萨克军队推散了人群，但没有开枪，于是工人们欣喜地注意到，哥萨克军队只是在表面上遵照政府的意愿，而内心对他们却是友好的。很快，人们又开始热情高涨，想要与哥萨克军队化敌为友。不过，人们依然痛恨警察，不断向他们扔石头。第三天，也就是3月10号，与哥萨克军队合流的意愿更加强烈了。甚至有传言说哥萨克军队开枪射击了那些射杀群众的警察。警察们从大街上撤退了。妇女们走到士兵面前，真诚地恳求他们，士兵们终于放下了武器。

之后的一天，即3月11日，是一个星期天。工人们聚集在城市中心，警察则从隐蔽处朝他们开枪。一些士兵也在朝人们开枪，人们于是来到军队的兵营前，进行痛苦的抗议。军队动摇了，在军士们的推动下，军队最终决定保护群众，开始向警察开火。这支军队虽然遭到了逮捕，但是为时已晚。3月12日，另一个军队也开始起义，他们拿出了步枪和机关枪。大街上的射击声此起彼伏，但很难说谁打中了谁。

士兵和工人抓捕了几个官员（其他官员已经逃走了）、警察和秘密特工。他们还从监狱中救出了早先被关押的政治犯。

彼得格勒的革命取得了胜利，莫斯科紧随其后。乡村则在密切注视着事态的进展。农民慢慢接受了新制度，但是热情并不高。对他们来说，只有两个问题最重要：土地与和平。

沙皇怎么样了呢？在这些充满变故的日子里，他又遇到些什么事呢？他不在彼得格勒，而是在一个遥远的小镇里；在那里，他作为总司令还必须指挥他的军队。不过，他的好日子到头了，就像一个熟透了的果子，他的坠落几乎没人在意。趾高气扬的沙皇、能让几百万人瑟瑟发抖的俄罗斯帝国大独裁者、“神圣俄罗斯”的“小父亲”，最终消失在了“历史的垃圾箱”中。我们都很好奇，那些巨大的体系在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以后，是如何坍塌的呢？沙皇听说了彼得格勒的工人罢工以及骚乱以后，立即宣布了戒严令。司令员正式下达了这个戒严令，但是戒严令并没有在城市里传播或者张贴，因为没有人能做这件事！政府机关已经支离破碎了。对此一无所知的沙皇还妄想着能回到彼得格勒。铁路工人拦住他乘坐的火车。当时身在彼得格勒郊区的沙皇皇后给沙皇发了一封电报。不过这封电报被电报局退了回来，并附上了一张铅笔写的字条：“查无此地址！”

前线的将领和彼得格勒的自由党领袖完全被事态的发展吓住了，同时他们也希望能挽回一些东西，于是乞求沙皇退位。沙皇退位了，他任命了一位亲属来继位。但是沙皇制度就此结束了，罗曼诺夫王朝（House of Romanoff）在经过了300年独裁统治之后，永远退出了俄国历史舞台。

贵族阶级、地主阶级、上流中产阶级甚至自由党人和改革家们，都对工人阶级的暴动感到无比的惊恐和焦虑。当他们看到自己所依赖的军队也站到了工人一边时，他们感到非常无助。他们还不确定哪一方会取得胜利，因为沙皇可能会带着军队从前线赶回来，并在这批军

队的帮助下镇压这场暴动。因此，他们一方面害怕工人，另一方面又害怕沙皇，再加上自我保命的过度焦虑，让他们苦不堪言。俄罗斯杜马代表的是地主阶级和上流中产阶级。工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尊敬杜马的，但是杜马没有在危急关头起到带头作用或采取任何行动；杜马主席和成员全都陷入了惊恐和焦虑之中，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同时，苏维埃政府慢慢形成了。除了工人代表，还有军人代表；新苏维埃占据了庞大的塔夫利达宫（Tauride Palace）的一侧，杜马也占据了宫殿的一部分。工人和士兵对他们的胜利感到欣喜不已。但是问题也跟着来了：胜利之后，他们该怎么办？夺取了权力之后，他们又该如何使用权力呢？他们以前没想到苏维埃会夺取权力，他们一直想当然地认为中产阶级会掌权。因此，一个苏维埃代表团来到杜马面前，要求他们执政。杜马主席和成员还以为这个代表团是来逮捕他们的！他们并不想背负权力的重担，他们担心其中肯定有风险。但是他们能怎么办呢？苏维埃代表团坚持这么做，他们也不敢拒绝。于是，在极不情愿、担心后果的情况下，杜马委员会接过了政权，在外界看来，似乎是杜马领导了这场革命。这是多么混乱的情况啊，如果我们在故事书中读到这些内容，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过，事实通常比虚构的故事还要离奇。

杜马委员会任命的临时政府是一个极为保守的群体，首相是一位大公。苏维埃位于同一座建筑的另一侧，他们不断干涉临时政府的工作。但是，苏维埃一开始也是温和的，其中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只占了少数。因此，出现了两个政府并存的状态——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政府——两个政府背后是将革命坚持到底的革命群众，他们对这次革命抱有很大的期望。新政府给这些饥饿又厌战的群众下达的唯一指令，就是要继续进行战斗，直到击败德国为止。他们不禁要问，难道这就是他们将革命进行到底并推翻沙皇的目的所在？

4月17日，列宁露面了。整个世界大战期间，他一直在瑞士；一听说俄国发生了革命，他就急切地想要回到俄国。他该怎么回到俄国呢？英国人和法国人是不会让他通过他们的领土的，德国人和奥匈帝国人也不会这么做。最后，德国政府出于自己的考虑，同意让他搭乘一列封闭的火车从瑞士经过德国前往俄国前线。当然，德国政府希望，也有理由相信，列宁回到俄国后将会削弱临时政府和主战派的力量，因为列宁是反对战争的，他们希望能从中受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有些默默无闻的革命者最终震动了欧洲和整个世界。

列宁的思想中没有任何迟疑或含糊的成分。他洞察力敏锐，能够洞察群众的情绪；他头脑清晰，能够调整精心策划的原则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他意志坚定，能够坚持他所制定的行动方针，不会因为一时的结果而动摇。在他到达俄国的第一天，他就猛烈抨击了布尔什维克党，批评了他们的无动于衷，并言辞激烈地指出了他们所肩负的责任。他的演讲就像电流一般刺痛了听众，同时又给了他们以无穷的力量。“我们不是骗子，”他说，“我们必须把唤起群众的意识作为我们的基本任务。即使我们需要继续做少数派——我们也应该这么做。暂时放弃领导地位是一件好事，我们不应该担心继续做少数派。”因此，他坚持自己的原则，拒绝妥协。这场长时间没有领导和指挥的革命最终迎来了它的领袖。时间造就了列宁。

在这个阶段，区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及其他革命团体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在列宁到来之前，是什么致使当地布尔什维克党人无法采取行动的呢？还有，苏维埃掌握权力之后为什么会转交给传统而保守的杜马呢？我无法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了，但是如果我们要搞懂1917年发生在彼得格勒和俄国的一系列戏剧性变化的话，我们必须思考这些问题。

卡尔·马克思有关人类变化和发展的理论——“唯物史观”理论的基础就是新的社会形式取代旧的社会形式，因为后者已经过时了。

随着技术型生产方式的改进，社会上的经济和政治组织也渐渐追赶上来了。它们的改进是通过统治阶级和受剥削阶级之间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实现的。西欧中产阶级取代了传统的封建阶级，中产阶级现在控制着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系，而中产阶级也将会被工人阶级取代。在俄国，封建阶级依然处于统治地位，西欧国家发生的、使中产阶级掌握权力的变革在俄国还没有发生。因此，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俄国也必然会经历这个中产阶级和议会掌权的阶段，然后才能进一步进入以工人为主导的共和国这一最终阶段。他们认为，中间阶段是无法逾越的。列宁本人也在1917年3月发生革命之前，为了发起一场中产阶级革命而制定过一个与农民联合对抗沙皇和地主的中间政策（并不反对中产阶级）。

因此，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及所有信仰马克思理论的人都认为，他们要遵循英国和法国模式建立一个中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工人领袖的代表也必然会有这种想法，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苏维埃夺取政权之后没有自己执政，而是将政权交给了杜马。这些人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成了自己信条的奴隶，对于需要采取全新的策略或者至少需要修正旧策略的新情况视而不见。群众的革命创新性远比领导者要大得多。控制苏维埃的孟什维克甚至表示，工人阶级在当时不能引发任何社会问题，他们当下的任务是要实现政治上的解放。布尔什维克党人顺应了这个观点。尽管领导者犹豫不决、战战兢兢，“三月革命”还是取得了胜利。

列宁的到来使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他很快摸清了当时的形势，对马克思原理做出了相应的修改，体现出了他真正的领导才能。现在，要进行的是一场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并与农民阶级合作对抗资本主义的战斗。布尔什维克党人当前的三个口号是：（1）民主共和；（2）没收地产；（3）八小时工作制。很快，这些口号成了农民和工人在斗争中争取实现的目标。它们不再是虚无而空洞的理想，它们预示的是生机和希望。

列宁的策略是希望布尔什维克党人能赢得大多数工人的支持，由此在苏维埃中占据优势；进而通过苏维埃，从临时政府手中夺取政权。他并不准备立即发起新的革命。他坚持要在推翻临时政府之前赢得大多数工人以及苏维埃的支持。他严厉地批判那些想要与临时政府合作的人，因为那是对革命的背叛。同样，他也严厉地批判那些想要在时机到来之前急于推翻临时政府的人。“行动的时刻，”他说，“有一点点偏差都不行。我们认为破坏组织就是最严重的罪过。”

因此，覆盖在炽热火焰之外的这块冰层，就像承载了注定的命运一般，沉着而不可阻挡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向前进发。

151 ——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

在革命时期里，历史前进的步伐极快。除了外部的快速变化之外，民众意识上的变化也更加显著。由于他们没什么机会接受书本教育，所以他们几乎没有从书本上学到过什么，而书本所隐藏的内容远远多于它所揭示的内容。他们接受的教育来自亲身经历，接受这种教育更加艰难，但也更加真实。革命时期，在争夺权力的生死斗争中，掩盖人们真实动机的面具被揭开，在这些面具背后，我们能看到社会的现实。因此，在决定性的1917年，俄国民众，尤其是城镇里处于革命风暴中心、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们，从各种事件中吸取了教训，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稳定和平衡已经不复存在。生活充满了动荡与变化，民众和上层阶级在各个方面展开了拉锯战。仍有一些人想要恢复沙皇的独裁统治，但是他们代表的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阶级，我们可以忽略他们。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之间发生了很大的矛盾，苏维埃中的多数派是愿意与临时政府合作并做出妥协的。那些急于妥协的人担心，他们会被迫接管政府以及国家政权。“谁将会取代现有政府？我们？可是我们的双手还颤抖得很厉害呀……”苏维埃的一位发言人这么说道。我们在印度也听到很多双手颤抖、内心惊恐的人发出过类似的哀号。不过，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民众中并不缺乏拥有强劲双手和坚强内心的人。

无论双方的妥协分子多么想避免冲突，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之间的冲突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临时政府为了取悦于协约国而继续参战，为了取悦于俄国的富有阶级而尽力保护他们的财产。与群众联系更为密切的苏维埃意识到了群众对和平的要求、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以及工人的许多要求，比如八小时工作制等。因此，苏维埃使临时政府陷入了

瘫痪，而群众又使苏维埃陷入了瘫痪，因为群众的革命热情比任何党派以及党派领袖的热情都要高得多。

为了使临时政府和苏维埃的步调更加一致，人们做了一次尝试，一位激进的律师兼雄辩的演说家克伦斯基（Kerensky）成了临时政府的领导人。他成功地组建了一个联合政府，苏维埃中的孟什维克也派了几位代表进入这个政府。他也通过对德国发动进攻的方式，竭力取悦于英国和法国。这场进攻最后还是失败了，因为军队和人民都没心思继续参战了。

同时，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All-Russian Soviet Congresses），会议一次比一次激进。越来越多的布尔什维克成员当选为代表，两大主要党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一个农民党派）的席位减少了。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彼得格勒的工人中间的影响力，不断增加。苏维埃的势力在整个国家中迅速发展壮大，他们拒绝听从临时政府的命令，除非这些命令是经过苏维埃联合签署的。临时政府实力薄弱的一个原因在于，俄国缺少强大的中产阶级。

首都在上演激烈的政权争夺战的时候，农民则开始自己解决问题了。我告诉过你，这些农民对“三月革命”并不热情，也不反对。他们一直在等待，在观望。但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们担心自己的土地会被充公，于是将土地分成小块，分给挂名的主人，这些人就代表地主拥有了这些土地。他们还将许多土地转移给了外国人。他们想通过这种做法保留他们的土地。农民们对此很不满意，要求政府颁布法令，禁止一切土地销售。临时政府犹豫了，它能怎么办呢？它不想惹怒任何一方。于是，农民就自己开始采取行动。早在1917年4月份，一些农民就抓住了他们的地主，抢夺并分割了地主的土地。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当然都是农民）在这场行动中起了主要作用。这场运动不断

发展，一大批人都得到了土地。到了6月，连西伯利亚草原都受到了波及。西伯利亚没有大地主，因此农民占据了教堂以及修道院的土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没收大量土地的行动完全是农民的自发行为，这场行动的发生比布尔什维克革命要早好几个月。列宁很支持这种以有组织的形式快速将土地转移给农民的做法。他完全不赞同无计划、无组织的没收行动。因此，当布尔什维克党人后来当权的时候，他们发现，俄国的农民已经占有了土地。

在列宁到达彼得格勒整整一个月后，另一位引人注目的流亡者也回到了彼得格勒，他就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中途被英国人扣押了一段时间之后，从纽约回到了俄国。托洛茨基原先并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人，此时也并不是一个孟什维克党人。不过很快他就与列宁站在了同一战线，成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袖人物。他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优秀的作家，也像是一个充满能量的电池，他对列宁一派的帮助最大。我要从他的自传中摘录一个比较长的段落给你，他的自传叫作《我的生平》（*My Life*），书中他描写了他在一个名为“摩登马戏场”（Modern Circus）的大楼里参加并发表讲话的会议。这不仅仅是一段优秀的文章，它也向我们生动而真实地展现了1917年那些特别的革命日子里彼得格勒的景象。

> 拥挤的马戏场中爆发出热烈的呼喊声和尖叫声，充满了摩登马戏场独有的味道。我的周围，肩肘、胸膛、脑袋都挤成了一团，我就像是在人体构成的温暖的洞穴中演讲。每次我伸出手来都会碰到别人，而对方友好的动作告诉我：没关系，请继续你的演讲。在这样激动的群众的强力电流之下，任何疲劳感都会跑得无影无踪。这些人们渴望知道、明了并找到自己的道路。有时好像你的嘴唇都能感受到这些已经融为一体的人群对工作的急切渴望。于是，预先准备好的演讲词都在同情心的压力下退缩了，而群众期盼的话语和论据则在无意识中脱口而出。这时，我觉得自

己的精神仿佛脱离了躯壳，在听别人演讲，在努力跟上他的思想，而又唯恐他听见了我清醒的逻辑推理的声音而像梦游者一样失足跌入深渊。

这就是摩登马戏场，热烈、温柔而又疯狂。婴儿平静地靠在发出欢呼或愤懑声的胸膛上，吮吸着乳汁。民众也如婴儿般把干渴的嘴唇紧贴在革命的乳房上，于是这个婴儿迅速成熟起来。注

不断变化的戏剧化革命就这样在彼得格勒以及俄国其他城市和乡村继续上演着。婴儿逐渐长大成熟了。战争的巨大压力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各地出现了明显的经济衰退。然而，投机商人仍旧继续发着他们的战争财！

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力量和影响在工厂中和苏维埃中不断增强。惊恐无比的克伦斯基决定镇压他们。首先，诽谤列宁的言论不绝于耳，有人说他是德国为了给俄国制造麻烦而派来的特工，如果没有德国的默许，他怎么可能从瑞士穿过德国回到俄国呢？列宁在中产阶级中很不受欢迎，他们把列宁当成了卖国贼。克伦斯基签发了对列宁的逮捕令，并不是把他当作革命者逮捕，而是当作一个亲德的卖国贼。列宁自己也愿意面对审讯，反驳这一指控；他的同志们并不同意他的想法，强迫他隐藏了起来。托洛茨基也被捕了，但是后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坚持努力下得以释放。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党人也遭到逮捕；他们的报纸被迫停办，支持他们的工人也被迫放下了武器。这些工人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具有进攻性和威胁性，他们不断发起反对临时政府的大规模游行示威。

这段时间里还有一次反革命运动插曲。一位名叫科尔尼洛夫（Kornilov）的将军带领一支军队浩浩荡荡向首都挺进，企图打倒一切革命力量，包括临时政府。而在接近彼得格勒的时候，他的部下都纷纷离开了。这些人站到了革命者一边。

情况瞬息万变。苏维埃与临时政府公然对立，经常对临时政府的命令充耳不闻，或者发出相反的指令。斯莫尔尼宫（Smolny Institute）成了苏维埃的驻地以及彼得格勒革命的总指挥部。这座建筑曾经是一家私立的贵族女子学院。

列宁来到了彼得格勒郊外，布尔什维克党人认为，是从临时政府手中夺取政权的时候了。人们推举托洛茨基负责制定行动计划，于是托洛茨基制定出了详细周密的计划，包括夺取政权的重点和时间。起义时间定在11月7日。那一天，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将要召开一次会议。这个日期是由列宁定下的，他的理由很有意思。“6日太早，”听说他曾这样说道，“我们必须动员全俄罗斯的苏维埃代表参与起义，6日参会的代表还没有全部到场。另一方面，8日又太晚。那时，代表大会已经结束，要让一大群人采取迅速而坚决的行动就会很困难。我们必须在7日代表们共同参会的这一天采取行动，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向大会宣布：‘政权就在眼前！你们要怎么对待它？’”这位头脑清晰的革命专家完全清楚，革命的成功往往靠的是表面上不太重要的细节。[注]

11月7日这一天到来了，苏维埃士兵占领了政府大楼，尤其是一些至关重要的战略部门，比如电报局、电话局和国家银行等。他们没有遇到反抗。“临时政府直接解散了。”一位英国特派员在交给英国的正式报告中这样写道。

列宁成了新政府的领袖——主席，而托洛茨基成了外交部长。第二天，11月8日，列宁来到斯莫尔尼宫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现场。那是一个夜晚，苏维埃代表大会热烈欢迎领袖的到来。现场的一位美国新闻记者里德（Reed）描述了这位“伟大的列宁”走上演讲台时的样子：

> 他身材不高，但很茁壮，头大，前额凸出，已经秃顶了。他的眼睛细眯眯的，鼻梁端正，口形宽厚有力，下颌厚重。这时他

已剃掉了胡须，然而他那过去和未来都很有名的胡子又已经开始毛茸茸地露了出来。他穿着一套旧衣服，那条裤子对他说来嫌太长了。作为一个人民群众的偶像，一个在历史上罕见的受人爱戴和尊敬的领袖，他给人的印象却是平淡的。他是一位异乎寻常的领袖，一位纯粹以自己的智慧见长的领袖。他不矫饰，不幽默，不妥协，而又公正无私。他没有引人注目的癖性，却具有一种以简单的语句来阐明极其深刻的思想的能力，有对具体情况加以精辟分析的能力。这些品质之外再加上他的精明干练，就形成了最有智慧的胆略。注

同一年中的第二次革命取得了成功，它是一场到目前为止都极其平静的革命。在政权更替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三月革命”的时候发生的战斗和死伤更多。“三月革命”是一场自发的、无组织的行动，“十一月革命”则是经过周密计划的。最贫穷的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代表，成了国家中地位最高的人，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不过，他们的成功不会来得这么容易。暴风雨正积聚在他们周围，随时会失去控制，朝他们袭来。

列宁和他的新布尔什维克政府面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德国的战争仍在继续，尽管俄国军队已经支离破碎，无法再继续参战了；整个国家都混乱不堪，不安分的士兵和强盗在肆意妄为；经济体系已经瓦解；食物短缺引发了饥荒；周围到处都是准备摧毁革命的旧制度。国家的组织机构采取的是资本主义形式，大部分原政府人员拒绝与新政府合作；银行家不愿提供资金，就连电报局都不再发送电报。甚至是最勇敢的人，面对这种困难无比的情况，也会感到恐慌的。

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想尽了各种办法。他们的当务之急是与德国达成和解，他们很快安排了与德国签署停战协议。两国代表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会面。德国人很清楚，布尔什维克党人不愿再战，于是他们骄傲而愚蠢地提出了大量侮辱性的要求。虽然布

尔什维克党人渴望停战，但他们还是大吃一惊，许多人不同意接受这些条款。列宁不惜一切代价，坚持要达成和解。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德国人曾邀请参加和谈的俄国代表托洛茨基穿一件晚礼服去参加宴会，他感到很不安，一个工人代表穿着这种资产阶级服装合适吗？于是他给列宁发电报寻求建议，列宁马上回复他说："如果能够促成和平，穿衬裙去都可以！"

苏维埃在围绕和约条款进行争论的时候，德国人开始向彼得格勒进发，他们还提出了比之前更加苛刻的和谈条件。苏维埃最终接受了列宁的建议，尽管很不情愿，还是于1918年3月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Peace of Brest-Litovsk*）上签了字。按照这个和约，俄国西部的一大片领土被割让给德国，不过，人们必须接受不惜代价换来的和平，因为列宁认为："军队是反对和平的。"

苏维埃最初想要与世界大战中所有参战大国达成普遍的和解。就在夺取政权的第二天，他们发表声明，向全世界抛出了和平的橄榄枝，并明确表示他们不承认沙皇政府签署的秘密条约中的任何主张。他们说，君士坦丁堡应该继续归土耳其人所有，其他割让领土的情况也不应该再发生。苏维埃的建议无人回应，因为参战的两大阵营依然期待着成功之后能瓜分战利品。无疑，苏维埃提出这个想法，部分是为了政治宣传。他们想要影响各个国家的民众以及厌战的军人，想要煽动其他国家发动社会革命。因为他们希望全世界都发起革命，他们认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卫自己的革命。我告诉过你，苏维埃的政治宣传对英国和德国军队产生了很大影响。

列宁认为，与德国签订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只是一个不会持续太久的权宜之计。正如他想的那样，过了9个月，德国在西线战场被协约国击败之后，苏维埃于是宣告此和约无效。列宁的目的就是为军队中疲惫的工人和农民争取到暂时休息和喘息的时间，好让他们回到家乡亲眼看看革命的成果。他想让农民意识到，地主已经离

开，土地现在属于他们了，他想让工人看到，剥削他们的人也离开了。这将会让他们珍惜并且渴望守卫革命的果实，他们会发现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知道内战即将到来的列宁就是这么想的。他的策略后来经过证实是很成功的。这些农民和工人从前线回到自己的土地和工厂；他们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也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们成了革命的忠实支持者，因为他们不想放弃革命带给他们的一切。

在努力与德国签署协议的时候，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也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内部情况上。大批拥有机关枪和军需品的旧军官与投机商人变成了土匪和强盗，他们在大城市的中心地带杀人越货。还有一些原先的无政府主义党派人士，他们反对苏维埃，并制造了很多麻烦。苏维埃当局严厉地对待和镇压了这些匪徒以及制造麻烦的人。

苏维埃政权更大的危险来自公务员，他们中很多人拒绝在布尔什维克党人领导下工作，或拒绝与他们进行任何合作。列宁制定了一个“不愿意工作的人没有饭吃”的原则。不工作就饿肚子。这些不愿意合作的公务员很快就被免职了。银行家拒绝打开保险箱，这些保险箱后来都被炸药炸开了。不过，列宁蔑视拒绝合作的旧制度公务员，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军队总司令拒绝服从命令的时候。这位总司令遭免职后不到五分钟，一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中尉克雷连柯（Krylenko）就被任命为总司令！

虽然发生了这些变化，俄国的许多传统体系还是保持着原样，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要让一个巨大的国家短时间内实现社会主义是很难的，要不是采取了一些强制行动，俄国的改变过程也许要花上好几年。就像农民赶走了地主一样，许多对原来的工厂主感到愤怒的工人赶走了他们，占有了工厂。苏维埃不可能将工厂还给原来的资本家工厂主，因此占有了工厂。在后来的内战中，有些工厂主企图毁坏工厂设备，于是苏维埃政府再次进行干预，他们占有了这些工厂，保护它们免遭毁坏。这样一来，生产方式社会化——也就是一种国家社会主

义，或者说工厂的国家所有制，等等——发展速度远比正常情况下的发展速度快得多。

在苏维埃统治的最初9个月里，俄国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布尔什维克党人忍受了指责甚至侮辱，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报纸不断出现。大众普遍挨饿，但是富人依然有很多钱去摆阔和享受。夜总会人潮如织，赛马和其他运动娱乐也在继续进行着。富有的中产阶级在大城镇里引人注目，公开而喜悦地期待苏维埃政府垮台。这些原本具有爱国心、希望继续与德国对战的人们此时却在欢庆德国对彼得格勒的进攻。他们对德国军队可能占领他们的首都感到很愉快。他们对社会革命的厌恶远远超越了对异国统治的恐惧。这几乎是一种普遍情况，尤其是在关系到阶级利益的时候。

因此，生活大体是正常的，这个阶段当然没有出现布尔什维克的恐怖活动。著名的莫斯科芭蕾舞团继续每天为大批观众演出。由于彼得格勒受到德国的威胁，苏维埃政府搬到了莫斯科，自此以后莫斯科成了他们的首都。协约国的大使们还在俄国。当彼得格勒面临落入德国人手中的威胁时，他们逃了出来，并在沃洛格达（Vologda）这座远离各种纷扰的小城找到了安身之处。在那里，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时而对听到的传闻表示愤怒，时而又很激动。他们频繁而焦虑地向托洛茨基求证这些传闻的真实性。托洛茨基厌倦了这些外交官的神经质和焦躁不安，于是主动开出“一个镇静剂处方，用来安抚沃洛格达各位阁下的情绪！”医生们会给那些歇斯底里、容易激动的人用镇静剂，以缓和他们的紧张情绪。

表面上看，生活似乎一切正常，不过，在表面的平静之下却有许多暗潮和逆流。没有人认为布尔什维克会长久存在，甚至连布尔什维克党人自己都不这么想。各方都在耍心机。德国人在俄国南部的乌克兰（Ukraine）成立了一个傀儡国家，尽管一切平静，但它似乎总是威胁着苏维埃。协约国当然痛恨德国，但是它们更恨布尔什维克。美国

总统威尔逊在1918年年初给苏维埃代表大会发来了诚挚的问候，但是后来他好像又后悔了，改变了主意。协约国在私下资助反革命活动，甚至还在秘密地参与这些活动。莫斯科到处是外国间谍。英国特务机关的特工主管，也就是英国的主要间谍，被派往莫斯科给苏维埃政府制造麻烦。在协约国的金钱资助下，失去产业的贵族和中产阶级不断地煽动反革命活动。

1918年年中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苏维埃的生命似乎危在旦夕。

---

1. 译文引自《托洛茨基自传》，[苏]托洛茨基著，胡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37页，略有改动。——译者注
2. 列宁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日期定在11月7日，这个说法来自当时身在彼得格勒的美国新闻记者里德。但是其他在场的人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列宁并未露面，他很担心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会拖延时间，错过最佳时机。因此，他一直在敦促他们采取行动。7日这天，事态发展到了紧要关头，于是行动就在那时发生了。
3. 译文引自《震撼世界的十天》，[美]约翰·里德著，郭圣铭译，卞集校，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9——140页。——译者注

152 ——苏维埃最终赢得了胜利

1918年7月，俄国的形势发展很令人吃惊。围绕在布尔什维克党人周围的大网正在慢慢地收紧。在南边，德国从乌克兰发出威胁，众多身在俄国的原捷克斯洛伐克战俘受到协约国鼓动，走上莫斯科街头示威。法国西线战场上，战争仍在继续，但是在苏维埃俄国出现了奇怪的景象，协约国和德国政权各自从事着相同的任务——打倒布尔什维克。我们再一次看到，民族仇恨的恶意及激烈程度已经很深了，而阶级仇恨的力量比民族仇恨的力量大得多。这些大国并没有正式向俄国宣战，他们找到了其他方式骚扰苏维埃，特别是鼓励反革命领袖，并为他们提供武器和金钱。一些原先的沙皇将领如今与苏维埃开战。

沙皇和他的家族成员作为囚犯被关押在俄国东部乌拉尔山脉附近，并由当地的苏维埃看守。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向这个地区不断推进，这让当地苏维埃感到害怕，他们担心，前沙皇会被人解救并成为反革命的中心力量。于是他们自己采取了行动，处决了沙皇一家。苏维埃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ee of the Soviet）似乎不该为此事负责，列宁依据国际政策反对处决前沙皇，依据人道主义精神反对处决前沙皇的家人。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中央政府确认了这次行动的正确性。也许这件事令协约国政府更加气愤，使他们的攻势更加猛烈了。

8月的时候，局势恶化，先后有两件事让人们感到愤怒、失望和恐惧。其中一件事就是有人企图谋杀列宁，另一件就是一支协约国军队在俄国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Archangelsk）登陆。莫斯科发生了巨大骚乱，苏维埃的末日似乎临近了。实际上莫斯科被敌人包围了，这些敌人包括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反革命武装。只有莫斯科周边一

些很少的地区还在苏维埃统治之下，一支协约国军队的登陆似乎更加确定了苏维埃的灭亡。布尔什维克几乎没有军队；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之后刚刚过了5个月，原来的军队大都解散回到他们的土地上了。莫斯科充满了阴谋，中产阶级对苏维埃即将到来的灭亡公然表现出喜悦之情。

存在了9个月的苏维埃共和国遇到了如此糟糕的境况，布尔什维克党人充满了失望与恐惧。由于他们认为自己迟早一死，于是他们决定在斗争中死去。与125年前年轻的法国共和国的做法一样，他们如同一头困兽扑向了敌人。他们不再忍耐，不再宽容。整个国家陷入武装斗争之中。9月初，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宣布实行红色恐怖。“打死卖国贼，打倒外国入侵者。”他们要与内部和外部的敌人战斗到底。这是苏维埃与世界的对抗，也是与国内反动派的对抗。一个被称为“军事共产主义”的时期开始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被围困的阵地。苏维埃全力组建红军（Red Army），托洛茨基负责此项工作。

大约在1918年9月和10月的时候，德国战争机器在西线溃败，停战的消息不胫而走。威尔逊总统制定了他的《十四点原则》，其中包含了协约国的所有意图。其中有一点很有意思，那就是外国军队撤出俄国领土，俄国将在大国的帮助下获得自我发展的机会。对于这一点，只需看看协约国对俄国的干预，以及它们的武装部队在俄国的登陆，就无须再做其他评论了。布尔什维克政府传话给威尔逊总统，尖锐地批评他的《十四点原则》。他们说：“你要求波兰、塞尔维亚、比利时获得独立，奥匈帝国人民获得自治权……但是，很奇怪，我们在你的要求里没有看到你提及爱尔兰、埃及、印度甚至菲律宾的自治权。”

1918年11月11日，协约国和德国达成了和解，签署了停战协定。但是在俄国，内战贯穿了整个1919年和1920年。苏维埃单枪匹马地与一大群敌人战斗。红军曾一度在17条战线上遭遇攻击。英国、美国、

法国、日本、意大利、塞尔维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罗的海各国、波兰以及众多反革命俄军将领都反对苏维埃，战线从西伯利亚东部延伸到波罗的海以及克里米亚半岛。苏维埃屡次面临灭亡，莫斯科反复受到威胁，彼得格勒也总是面临落入敌人手中的威胁，但是苏维埃渡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每一次成功都增加了它的自信心和力量。

反革命头领中有一位海军上将高尔察克（Admiral Kolchak），他自称是俄国的统治者，协约国认同他的说法，并给他提供了很大帮助。他的一位盟友，指挥美国军队支持高尔察克的格雷夫斯将军（General Graves）描述了他在西伯利亚的所作所为。这位美军将领说：

> 那里发生了可怕的杀戮，但是杀人者并不是人们以为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我可以保证，在东西伯利亚，布尔什维克党每杀死一个人，布尔什维克党的反对者就会杀死100个人。

你肯定有兴趣知道，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在处理大国事务以及战争与和平的时候，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是什么样的。当时的英国首相——或许是欧洲最强大的人——劳合·乔治在英国下议院谈论有关俄国问题时，提到了高尔察克以及其他俄军将领，同时他还提到了“哈尔科夫（Kharkov）将军”。哈尔科夫不是一位将军，而是一个重要城市，乌克兰的首都！然而，这种对基本地理常识的无知并不妨碍这些政治家分割欧洲版图，绘制新的欧洲地图。

协约国也封锁了俄国，这种封锁效果明显，整个1919年俄国都无法和外国进行任何商品买卖。

尽管遇到了这些巨大的困难和数不清的强大敌人，苏维埃俄国还是挺了过来，取得了成功。这是历史上最惊人的成就之一。他们是怎

么做到的？毫无疑问，如果协约国各国联合起来下决心消灭布尔什维克，它们早就能成功了。解决了德国之后，它们还拥有大量军队。但是派遣这些军队并不容易，尤其是与苏维埃作战。这些军队已经厌战，再次要求他们参加国外的战争必定会遭到拒绝。各国工人也十分同情新俄国，协约国各国政府担心，一旦向苏维埃公开宣战，它们在本国会遇到麻烦。事实上，欧洲似乎即将爆发起义。协约国各国之间也存在纷争。和谈之后，它们互相争吵和反目。所有这些都使它们无法下决心消灭布尔什维克。它们尝试间接地、尽可能地消灭布尔什维克党人，它们让其他人替它们战斗，并给这些人提供钱、武器以及专家意见。它们确信，苏维埃不会坚持很久。

这些情况无疑帮助了苏维埃，让他们有时间增强自己的实力。但是，如果认为他们的胜利来自外部环境的话，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他们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自信、信仰、自我牺牲以及俄罗斯人民坚定决心的胜利。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俄罗斯人一直被认为是懒惰、无知、意志消沉、不可能有所成就的人。自由是一种习惯，如果我们的自由被剥夺了很久的话，我们往往会忘记自由。这些无知愚昧的俄国农民和工人几乎没有机会实践这种习惯。然而，那时的俄国领导者能力极强，把一个基础很差的国家变成了强大而有组织的国家，这个国家忠于自己的使命，对自己充满信心。高尔察克之类的人之所以失败，不仅因为布尔什维克领袖的能力和决心，也因为俄国农民拒绝忍受这些人的行为。对俄国农民来说，这些人代表了旧制度，是来夺走他们刚刚得到的土地和其他权益的，他们决定誓死保卫这些土地和权益。

在这一切之上，拥有无与伦比的最高权力的人就是列宁。对于俄国人来说，他成了一个半神人物，他象征着希望与信仰，他有着过人的智慧，知道克服一切困难的方法，他从不为任何事感到沮丧和不安。那时候仅次于列宁的是作家和演说家托洛茨基（因为现在他在俄国名声扫地了），之前没有过任何战争经验的他，此时在内战和封锁

的双重夹击下着手建立一支伟大的军队。托洛茨基勇敢无畏，经常冒险战斗。他绝不怜悯那些缺乏勇气、缺乏自律的人。在内战中的一个危急时刻，他发布了这样的命令：

> 我警告，如果任何一个分队没有接到命令就撤退，那么第一个被处决的将是这个分队的代表，第二个将是指挥官。英勇无畏的士兵将接替他们的位置。胆小鬼、懦夫和叛徒也要吃枪子儿。我当着所有红军的面郑重许下这个承诺。

他遵守了自己的诺言。

托洛茨基在1919年10月发布的另一个军令很有意思，它显示出布尔什维克总想将民众与资本主义政府区分开来，从来都不把国家当作整体来看。

这个命令是这样的：

> 然而，即使今天，当我们与英国的雇佣兵尤登尼奇（Yudenich）激烈交战的时候，我命令你们不要忘记，有两个英国。除了一个有着利益、暴力、贿赂和凶残的英国，还有一个有着劳工、精神力量和崇高国际主义理想的英国。与我们交战的是那个有着证券市场操纵者的卑鄙、阴险的英国。那个有着劳工的英国以及它的人民是与我们同在的。

红军战斗时坚持不懈的精神，从他们面临被尤登尼奇消灭的危急时刻还誓死保卫彼得格勒的决心中可见一斑。国防委员会的命令是：“保卫彼得格勒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决不妥协一步，在每一条大街小巷进行战斗。”

伟大的俄国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告诉我们，列宁曾经这样形容托洛茨基：

> 如果还有谁能在一年时间内组织起一支近乎完美的军队，而且能赢得军事专家尊重的话，请告诉我。我们就有这么一个人。我们拥有了一切。还会有其他奇迹发生。

红军的发展突飞猛进。1917年12月，布尔什维克党人夺取政权后不久，这支军队的人数是43.5万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签署后，这支军队的大部分人已经离开了，必须重新组织起来。到了1919年年中，军队人数已达150万人。一年以后，整个军队的人数已经上升到了惊人的530万人。

到了1919年年底，苏维埃在内战中占了上风。然而，又过了一年，战争仍在持续，还出现了很多令人焦虑的时刻。1920年，重新建国不久的波兰（在德国战败后刚刚建国）与俄国发生了争端，两国开战。所有这些战争几乎到了1920年年底才结束，俄国最终获得了一些安宁。

与此同时，国内的麻烦加剧了。战争、封锁、疾病和饥荒使国家陷入了悲惨境地。农作物和商品产量急剧下降，因为敌军不断地推进，使农民无法耕作，工人无法经营工厂。战时共产主义设法让国家渡过难关，但是每个人都必须继续束紧腰带过日子，直到这种日子也令人难以忍受。农民对种庄稼不怎么感兴趣，因为他们说，在当时军事共产主义盛行的情况下，他们额外产出的农作物都会被国家收去，所以他们为什么还要费力去种植呢？一种十分艰难而危险的情况正在出现。离彼得格勒不远的喀琅施塔得（Kronstadt）甚至发生了水手的叛乱，彼得格勒（或者称为列宁格勒）也发生了罢工。

列宁是一位具有调整基本原理使其适应现实情况天赋的人，他立即采取了行动。他废止了战时共产主义，实行了一种新政策，名为“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缩写为NEP）。这项政策使农民更加自由地产出和销售农产品，同时它也允许一定程度的私人贸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政策是完全脱离严格的共产主义原则的，不过列宁解释说它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它的确极大地缓解了人们的艰难生活。但是很快俄国又面临了另一个可怕的灾难。俄国东南部由于严重干旱，粮食大面积绝收，导致了饥荒。这场可怕的饥荒是人们已知最严重的饥荒之一，它夺走了几百万人的生命。这场饥荒发生在连续多年的世界大战、内战、外国封锁以及经济崩溃之后，在苏维埃政府还没来得及平静下来进行和平活动之前，因此它很可能就这样摧毁整个政府体系。然而，就像以前面对灾难时一样，苏维埃挺了过来。欧洲各国政府代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他们如何帮助俄国缓解饥荒。他们宣布，苏维埃政府只有承诺偿还原沙皇的债务他们才会提供帮助，苏维埃政府曾经拒绝过他们。他们的债权人身份比人道主义者身份更强烈，就连俄罗斯母亲们为了她们奄奄一息的孩子所发出的令人揪心的祈求也无人理睬。但是，美国无条件地提供了很多帮助。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拒绝为俄国饥荒提供帮助，不过它们也没有联合抵制苏维埃。1921年初，英俄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许多别的国家纷纷效仿，也与苏维埃签订了贸易协定。

对于中国、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这样的东方国家，苏维埃采用了慷慨大方的政策。他们放弃原沙皇占领的土地(注)，意图表现得十分友善。这符合他们的原则，即所有受统治和剥削的人们都要获得自由，不过，更加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想要巩固自身的地位。英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大国与苏维埃俄国的慷慨相比自然处于尴尬的境地，对于东方国家来说，这种对比对于英国和其他大国来说很不利。

我必须要告诉你发生在1919年的另一个重要事件，那就是共产党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三国际。我曾经在以前的信中给你讲过卡尔·马克

思创立的第一国际，以及曾经豪言壮志、却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投入战争的第二国际。布尔什维克党人认为，工人阶级遭到了创立第二国际的那些原来的工人和社会主义党派的背叛。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人创立了第三国际，它的革命意图相当明确，旨在发起对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同时也打击那些遵循“中间道路”策略的投机取巧的社会主义者。第三国际常常被称为“共产国际”[Comintern，是“共产主义”（Communist）和“国际”（International）这两个词结合产生的]，它在许多国家中发挥了政治宣传的重要作用。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它是一个由各国共产主义党派选举出来的国际组织，不过，由于俄国是唯一一个取得共产主义胜利的国家，它自然成了共产国际的主导者。共产国际当然与苏维埃政府不同，尽管有许多人同时在两个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由于共产国际是一个公开传播革命共产主义的组织，因此遭到帝国主义大国的厌恶，这些国家总是尽力压制共产国际在他们领土上的活动。

第二国际[“劳工与社会主义国际”（Labour and Socialist International）]于世界大战后在西欧得到重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很大程度上有着相同的目标，至少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它们的思想意识和行动方式大为不同，两者之间的关系很不好。它们之间的争吵、争斗和攻击比对付资本主义这个共同的敌人还要激烈。第二国际如今是一个体面的组织，经常为欧洲各国政府输送内阁大臣。第三国际则一直保留革命的特点，因此并不那么体面。

整个俄国内战时期，红色恐怖和白色恐怖激烈而残酷地彼此对抗，后者也许胜过了前者。我们可以从美国将军关于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的暴行的描述（之前我引述过）以及其他描述中得出这个结论。不过，红色恐怖无疑也是非常残酷的，肯定有许多无辜的人受到了伤害。由于四处受到攻击，还被阴谋和间谍包围，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神经坚持不住了，稍有怀疑他们就严厉地惩罚怀疑对象。特别是他们的

政治安保机构，被称为“契卡”（Cheka）的组织，因红色恐怖而臭名昭著。契卡相当于印度的刑事调查局，但权力更大。

这封信已经很长了。不过在结束这封信之前，我必须告诉你一些有关列宁的事。尽管在1918年8月的一次阴谋刺杀中他受了伤，但是他没有休息多久，继续在重压下工作。1922年5月，他的身体还是垮了。短暂休息后，他又继续工作，但没有坚持多久。1923年，他的身体状况更加糟糕，从此再未恢复。1924年1月21日，他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地方去世了。

他的遗体在莫斯科停放了数日——当时是冬天，遗体至今也经过了化学防腐处理——全俄国以及遥远的西伯利亚草原的普通民众代表，农民和工人，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来向这位将他们从深渊里拉出来并给他们指明更美好生活方向的、他们最敬爱的同志致以最后的敬意。他们在美丽的莫斯科红场（Red Square of Moscow）为他建造了一座简单而朴实的陵墓，他的遗体至今依然保存在一座水晶棺内，每晚人们排着长队默默地瞻仰他的遗体。从他去世到现在并未过去多少年，而列宁已经成了俄国本土以及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伟大的形象。他的伟大与日俱增，他已经成为世界上永垂不朽的人物之一。彼得格勒改称“列宁格勒”，几乎每个俄国家庭中都有一个列宁角或是一幅列宁的画像。不过，他并不活在纪念碑或者画像中，他活在他的伟大事业之中，活在如今几亿工人的心中，他们从他身上获得了启发，看到了美好未来的希望。

别以为列宁像一台不近人情的机器，只会全身心投入工作而不考虑别的一切。当然，他的确全身心致力于自己的工作使命和生活目标，同时完全不为自己考虑，几乎就是一种思想的化身。然而，他也很有人情味，具有普通人的一切特点，也会尽情地欢笑。在苏维埃最初的危险时期，英国派驻莫斯科的代表洛克哈特（Lockhart）曾经说过，无论发生什么事，列宁的情绪总是很好。“在我见过的所有公众

人物中，他的脾气最好。”这位英国外交官如是说。他的谈吐和做事风格朴实而直接，他痛恨豪言壮语和装腔作势。他热爱音乐，对音乐的强烈热爱甚至令他担心这会影响到他，让他在工作中变得过于柔和。

列宁的一位同事，任布尔什维克教育部长多年的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曾经对列宁做过一次有趣的评价。他将列宁对资本主义者的打击与耶稣基督驱逐寺院里的债权人做比较，并补充道：“如果耶稣基督依然在世，他一定是一位布尔什维克党人。”这对无宗教信仰的人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关于妇女，列宁曾经这样说道：“如果一个国家一半的人口被束缚在厨房里，这个国家是不会解放的。”有一次，他在看望一些儿童的时候说了一些话，这些话流露出了他的感情。他的老朋友马克西姆·高尔基告诉我们，列宁说：“这些孩子将比我们生活得更幸福。他们将不会经历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他们未来的生活中不会有这么多残酷的经历。”我们都希望如此。

在这封信最后，我要摘录一首俄罗斯交响乐团及合唱团最新创作的歌曲的歌词。据听过这首歌的人们说，这首曲子充满了激情与力量，这首歌似乎代表了起义民众的精神。我在此摘录的这首歌的歌词的翻译内容也展现了这种精神。这首歌叫作《十月》（*October*），这个名称代表了1917年11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那时俄国使用的日历是所谓的旧历，日期比一般西方日历晚13天。按照俄国旧历，1917年3月的革命发生在2月，因此被称为“二月革命”，与之相似，1917年11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被称为“十月革命”。现在俄国已经放弃了旧历，采用了新历，不过这些旧的名称依然沿用。

我们行动起来，争取工作与面包，我们的内心痛苦压抑，工厂的烟囱直指天空，就像疲倦的手臂无力握拳。

我们悲伤与痛苦的呼喊打破了寂静，响亮的声音盖过了枪炮声。

哦，列宁！手掌起茧的人内心的渴望。我们明白，列宁，我们明白，自己的命运就是一场斗争！

斗争！斗争！你引领我们战斗到最后一刻。斗争！你给我们带来了胜利。

没人能将我们战胜愚昧和压迫而取得的胜利夺走。

没有人！没有人！绝不会！绝不会！让每个人都在斗争中展现出朝气和勇敢，因为我们的胜利叫作十月！十月！十月！十月是太阳的信使。十月是起义时代的意志。十月！它是劳动成果，是喜悦之情，是一首赞歌。十月！它给田野和机器带来好运。这就是年轻一代与列宁肩扛的大旗。

1. 苏联归还中国被占领土的承诺最后并未兑现。——译者注

153 ——日本欺凌中国

世界大战在持续进行的时候，远东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值得我们关注。现在我就要带你去看看中国的情况。在上一封有关中国的信中，我给你讲了中国建立了一个共和政体以及之后出现的问题。有人试图恢复帝制。虽然这些行动失败了，但是这个共和政体并未在整个中国成功地树立威信，更确切地说，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成功过。自那以后，所有当局政府的统治都受到过来自国家内部的挑战。有几年，这个国家出现了两个主要的政府，北方政府和南方政府。在南方，孙中山和他组建的国民党的地位最高。在北方，袁世凯统领一切，一大群军官和军人跟在他身后。这些军事冒险家被称为督军，最近几年，他们一直是中国的祸害。

就这样，由于持续的混乱状况，中国处于恶劣的环境之中，南北之间的内战以及督军之间的对抗经常发生。对于帝国主义大国来说，这给它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通过支持某个党派或督军再转而支持别的党派或督军实施阴谋诡计，企图从中国内部纷争中获益。你应该记得，这就是英国在印度站稳脚跟所使用的方式。欧洲大国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搞阴谋，挑起督军之间的争斗。但是，很快他们自己也遇到了麻烦，世界大战使他们停止了在远东地区的行动。

日本并没有碰到这些问题。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十分遥远，日本觉得它在中国实施阴谋诡计是很安全的。的确，当时日本有条件这么做，因为其他大国正在别处忙碌着，不可能对日本进行干预。日本对德国宣战，纯粹是为了夺走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胶州湾，以便进一步挺进中国内地地区。

在过去的40年中，日本人对中国的策略一直未变。实现了军队的现代化并继续推进国家的工业化之后，他们决定要成为统治中国的力量。他们需要足够的空间发展和扩张工业，邻国朝鲜和中国的实力薄弱，吸引着他们去进行统治和剥削。1894年至1895年对中国发动的战争是他们的第一次尝试。他们成功了，但是由于遭到某些欧洲大国的反对，他们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之后在1904年，他们与俄国展开了更为艰难的争斗。这次他们也获胜了，并在朝鲜和满洲站稳了脚跟。不久之后，朝鲜被日本强占，成了日本帝国的一部分。

然而，满洲仍是中国的一部分。满洲指的是中国的东三省。日本人直接接管了俄国在东三省的租借地，包括俄国人建造的铁路，当时被称为中国东方铁路。后来这条铁路改称南满铁路。此时日本开始牢牢控制了满洲。同时，这条铁路吸引了来自中国其他人口密集地区的移民，中国农民蜂拥而来。满洲盛产一种豆子，叫作大豆，由于大豆价值很高，世界对大豆的需求越来越大。这种豆子可以被用来制作一种油，以及其他很多产品。大豆的种植也吸引了很多移民。所以，日本人从一开始就想完全控制满洲的经济机制，而中国南方人蜂拥而至，并定居在这片土地上。原居于此的满族人被中国农民以及其他的人潮淹没，完全融入了汉族的文化和观念之中。日本并不愿意看到中国成立共和政体。它不赞同任何能够增强中国实力的做法，它的外交策略就是要阻止中国成为一个团结而强大的国家。因此，它积极地帮助一个督军对付另一个督军，这样一来国家内部的混乱状态就会持续下去。

年轻的中华民国遇到了极为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从灭亡的帝国政府那里夺取政权。没有什么可以夺取的政权，因为这种中央集权几乎不存在。政权有待建立。旧中国名义上是一个帝国，实际上是由很多自治地区组成的，这些自治地区之间关系并不紧密。每个省份都有一定的自治权，就连城镇和村庄都是这样。人们承认皇帝的中央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并不干涉地区事务。并不存在所谓的“中

央集权”国家，政权和实际管辖权并未集中到中央，政府各部门也并不统一。由于西方工业的影响和帝国主义的贪婪，这个（政治意义上）联系松散的国家变得支离破碎。如果中国要继续生存下去，它必须成为一个强大的、拥有统一政府的中央集权国家。新成立的共和政体意在建立这样一个国家。这是全新的任务，因此也成为中华民国面临的困难之一。缺少适当的交流以及道路和铁路已经成为阻碍中华民国政治统一的一大障碍。

中国人以前并不像现在这样看重政治权力。他们的伟大文明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文化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方式教会了他们生存之道。他们的生活中满是这些传统文化，就连政治经济体系崩溃的时候，他们也依然坚持传统的文化习俗。日本审慎地吸收了西方工业和西方生活方式，而本质上依然是封建国家。中国并不封建，它充满了理性与科学精神，热切地注视着西方科学和工业的发展。不过，它并不像日本那样急于行动。毫无疑问，它遇到了很多日本没有遇到的困难。但是，它也很犹豫，犹豫是否要做一件完全改变传统文化的事。中国有着哲学家的气质，哲学家是不会草率行事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的心中都动荡不定；因为它所面临的不只是政治上的问题，还有经济、社会、思想和教育等问题。

而且，巨大的国土面积也给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造成了麻烦。它们是大陆国家，它们的领土给自己带来了沉重负担。如果一头大象倒下了，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站起来，它不会像猫或狗那样轻松地跳起来。

世界大战刚一开始，日本就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国宣战。它占领了胶州湾，并开始向胶州湾所在地山东省的内陆地区推进。这意味着，日本人正式入侵中国。他们不需要与德国对抗，因为德国已经与这个地区无关了。中国政府委婉地要求日本人撤军。日本人说中国人太自大了，他们立刻炮制出了包含21条要求的官方文件。

这就是著名的《二十一条》。这里我就不介绍它的内容了。这些条款意在使日本获得各种权利和权益，尤其是在满洲、蒙古和山东省的权益。同意这些要求就意味着中国实际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虚弱的中国北方政府虽然反对这些要求，但是他们怎么能抵抗得了强大的日本军队呢？而且，北方政府本身也不受北方人民欢迎。不过，它还是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公布了日本的《二十一条》。中国人立即进行了强烈抗议，就连忙于战争的其他大国也都愤愤不平。美国的反对之声最为强烈。结果日本收回了一些要求，又修改了一些条款。1915年5月，日本逼迫中国政府接受了其他侮辱性的要求。这引发了中国强烈的反日情绪。

1917年8月，世界大战开始三年后，中国加入了协约国一方，对德国宣战。这很荒唐，因为中国无法对德国做任何事情。中国的目的是使自己委身于协约国一方，以此保护自己不受日本进一步的侵略。

此后不久，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十一月革命”爆发了，随即在整个亚洲北部引发了混乱。西伯利亚是苏维埃和反苏维埃军队交战的一处战场。俄国军官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与苏维埃对阵。日本担心苏维埃获胜，于是派军队前往西伯利亚。英国和美国也派了军队过去。俄国在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暂时消除了。英国政府尽全力彻底结束了俄国在这些地区的威望。在位于中亚地区中心的喀什葛尔，英国人专门设置了一个无线电台，用以进行反布尔什维克宣传。

苏维埃和反苏维埃军队也在蒙古进行了激烈交战。早在1915年世界大战还在进行的时候，蒙古在沙皇俄国的帮助下，成功地从中国政府手中获得了很大的自治权。不过，中国依然是蒙古的宗主国，而俄国在与蒙古的外交关系方面也有了立足点。这是一个奇怪的局面。苏维埃革命之后，蒙古发生了内战，当地的苏维埃在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斗争之后取得了胜利。

我还没有给你介绍过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和平会议。我会在以后的信里给你介绍。

不过，这里我要提一提，参加和平会议的大国，尤其是英国、法国和美国，决定将中国的山东省赠予日本。因此，它们的盟友中国在战后被强迫割让了自己的领土。原因是英国、法国和日本在世界大战过程中签订了某个秘密协议。无论什么原因，中国人对这种卑鄙行为深恶痛绝，他们威胁北京政府，如果政府在这件事上妥协了，他们就会起义。他们还宣布坚决抵制日货，并开展了反日暴动。中国政府（我指的是北方的、位于北京的政府，是中国主要的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两年以后，山东问题出现在美国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所有对远东地区问题感兴趣的大国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聚在一起讨论各自的海军力量问题。1922年的这次华盛顿会议（Washington Conference）在有关中国和日本的问题上做出了一些重要决议。日本同意归还山东，曾经激怒中国人的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大国之间还签署了两个重要条约。

其中一个就是美国、英国、日本和法国共同签署的《四国条约》（*Four-Power Pact*）。这四国承诺，相互尊重各自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土权利，也就是说它们各自承诺不侵犯另外三个国家的领土权利。另一个条约是参会的九个国家美国、比利时、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葡萄牙和中国签署的《九国公约》（*NinePower Treaty*）。这个公约的第一条内容是这样的：

“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这些条约显然意在保护中国不受进一步攻击，意在让大国停止在中国划分租借地和吞并领土的行为。西方大国当时面临着很多战后问题，暂时无暇顾及中国。因此出现了这种它们许诺遵守的克己条约。

日本也承诺遵守这些条约，尽管这些条约与日本一直坚持的策略相悖。不出几年，我们就看到，尽管日本签署了条约，也做出了承诺，它还是坚持实行原先的对华政策，并开始侵略中国。这是一种极其露骨的国际欺骗和虚伪行为。为了让你理解后来所发生的事情的背景，我必须先让你了解一下华盛顿会议。

华盛顿会议召开的时候，也正是外国军队从西伯利亚最后撤军的时候。最后撤军的是日本人。很快，当地苏维埃重振旗鼓并加入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

俄国苏维埃之前就对中国政府提出过，愿意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的一切权益，就像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一样。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本身的道路就不一样，除此之外，苏维埃也有意识地对长期遭到西方大国剥削和威胁的东方国家采取慷慨的策略。这不仅体现出苏维埃俄国的善良品质，同时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这样一来苏维埃俄国可以在东方交到朋友。苏维埃对特殊权益的放弃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不要求任何回报。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并不敢与苏维埃打交道，唯恐惹恼了西欧大国。不过，俄国和中国代表最终还是会面了，1924年，他们就一些条款达成了协议。获知此协议的法国、美国和日本政府对北京政府提出了抗议，北京政府很害怕，甚至不承认派出代表在协议上签了字。苦闷的北京政府竟沦落到这个地步！于是，俄国代表将协议的内容全文公开，引起了轰动。中国在与大国的接触中第一次受到了尊重和体面的待遇，它的权利第一次得到了认可。这是中国与一个大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国人欣喜不已，政府只好在协议上签字。帝国主义大国自然对此很不满意，因为这使它们陷入了不利地位。苏维埃俄国如此慷慨大方，而它们却牢牢抓住自己的特殊权益。

苏维埃政府也和孙中山领导的位于广州的南方国民政府取得了联系，双方达成了互信。在这段时间里，南北政府之间一直在持续打内战，北方各军阀之间也是兵火不断。这些北方督军，也被称为军阀，

他们不为任何原理或计划而战，只为个人权力而战。他们相互结盟，然后改变立场，又形成新的联盟。这些不断改变的联盟让局外人摸不着头脑。这些督军，这些军事冒险家，建立了私人的军队，强征私人的税收，展开私人的战争，而所有这些负担都落在了长期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身上。据说，一些大国，尤其是日本，在背后支持着某一些军阀。位于上海的外国大公司也出钱帮助他们。

孙中山政府执政的南方地区是唯一光明的地方，这里有理想信念和方针政策，而不像一些北方督军政府那样做一些鸡鸣狗盗之事。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孙中山向大会发表宣言。在这份宣言中，他制定了指导整个国家的原则。这份宣言和这些原则成了国民党的基本原则，现在也应该是指导所谓的国民政府的一般原则。

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他为中国耗尽了毕生精力，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爱戴。

154 ——世界大战期间的印度

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印度理所当然地被直接卷入了世界大战。但是在印度及印度附近并没有发生战斗。虽然如此，战争还是从各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印度的发展，给印度带来了相当大的改变。为了给协约国提供帮助，印度的资源完全被耗尽。

这场战争并不是印度的战争。印度对德国并无不满，而印度对土耳其则深表同情。但是印度在这件事情上别无选择。它只是英国的附属国，被迫听从它的帝国主义统治者的命令。因此，尽管很不情愿，印度士兵还是与土耳其、埃及以及其他国家的军队对阵，使得西亚各国对印度都深恶痛绝。

我在以前的一封信中讲过，在战争前夕，印度的政治活动处于停滞状态。战争的到来进一步转移了印度的注意力，而且，英国政府采取的多种战时措施也使真正的政治活动很难开展。政府总是拿战争当作借口，为他们压制民众、为所欲为的行为开脱。他们限制其他人的行动，唯独放任自己。他们还建立了一个审查机构，禁止发布一切真相，常常散布谎言，还阻止人们批判现实。政府通过了特殊的法案和法规，控制了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活动。每一个参战国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印度自然也不例外，印度通过了一部《印度防卫法案》（*Defence of India Act*）。该法案有效地阻止了人们对战争的公开评论以及相关的活动。不过，在背地里，人们普遍同情土耳其，还希望德国狠狠地打击英国。这种不现实的希望自然来自那些曾经被狠狠打击过的人。但是没有人敢公开这些想法。

在公开场合，到处都能听到人们对英国表示忠诚的呼喊。发出这些呼喊的主要是统治阶层的王公贵族，还有一些是与政府联系紧密的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受到协约国有关民主、自由和国家解放的豪言壮语的影响，多多少少也参与到了呼喊的队伍中。也许，人们认为这也适用于印度，而且人们也希望，他们在英国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了帮助，日后可能会获得适当的回报。无论如何，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别无选择，也没有其他更安全的做法；因此，他们只能在困境中尽力而为。

印度公开表现的这种忠诚在当时受到了英国的赞赏，英国也表示了感谢。那些有权的人说，自打这件事以后，英国对印度会“另眼相看”。

但是有一些印度人并没有这种“忠诚的”态度，印度国内和国外都有这样的人。他们甚至不像大多数人那样保持平静或冷漠。他们相信，就像爱尔兰的传统谚语说的那样，英格兰的危机是他们国家的良机。尤其是一些身处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印度人，他们聚集在柏林，出谋划策帮助英国的敌人，并为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德国政府当然愿意接受各种形式的帮助，这些印度革命者自然很受他们的欢迎。德国政府和印度人的委员会双方达成并签订了一份书面协议，在这份协议中，印度人许诺在战争期间帮助德国政府，条件是德国胜利后要支持印度独立。于是，这个印度委员会在整个战争期间所做的工作都代表了德国的利益。他们在派驻国外的印度军队中进行政治宣传，他们的活动范围还扩展到阿富汗以及印度的西北边境。不过，除了让英国人感到焦虑之外，他们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英国人挫败了一次通过海路向印度运输武器的企图。德国人的战败自动终止了这个委员会及其全部的希望。

印度也出现了一些针对革命活动的诉讼，政府指派特别法庭审理叛乱案件，很多人被判死刑，还有很多人被判长期监禁。18年过去

了，当时被判决的一些人现在仍在监狱里！

在战争过程中，和别的地方一样，印度有一部分人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但是大多数人都感到负担越来越重，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前线战场需要更多的人，军队征兵的需要变得更加强烈。任何能够为军队招到新兵的人都能得到各种物质奖励和回报，印度地主还必须从自己的佃户中为军队招募并提供固定配额的新兵。尤其在旁遮普，军队和劳工队常常用这种“拉壮丁”的方式，也就是强征入伍的方式招人。前往各条战线的印度士兵和劳工队队员总数超过了100万人。受到牵连的人们十分厌恶这些强征方式，而这些强征方式也应该是战后旁遮普发生动乱的原因之一。

旁遮普在其他方面也受到了影响。许多旁遮普人，尤其是锡克教教徒，迁居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以及加拿大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移居者不断涌入，美国和加拿大当局后来开始出面阻止。为了给这样的移民设置难题，加拿大政府制定了一个规则，只接受直接从某港口出发到另一港口上岸、中途不换船的移民。这个规则意在阻止印度移民，因为他们往往需要在中国或日本换乘船只。于是，一位名叫辛格（Baba Gurdit Singh）的锡克教教徒雇了一艘名为“驹形丸”（Komagata Maru）的客轮，这艘船带着一大批印度人从加尔各答出发直接到达加拿大温哥华。这样一来他巧妙地避开了加拿大法规，但是加拿大无论如何也不允许他和其他印度人上岸。他们被迫返航，到达印度时他们既贫乏又愤怒。在加尔各答巴奇巴奇（Budge Budge）码头，他们与警方交战，导致很多人死亡，其中主要是锡克教教徒。而后这些锡克教教徒中有许多人在整个旁遮普遭到盯梢和追捕。这些人的愤怒和不满在旁遮普传播开来，整个印度对“驹形丸事件”都感到极其愤恨。

我们很难得知那些战争岁月里发生的所有事情，因为审查制度禁止了许多消息的发表，因此流言蜚语满天飞。不过，我们都知道，一

支印度军队在新加坡发动过一场兵变，在其他许多地方也发生了小规模的动乱。

除了为战争提供人力和其他方式的帮助，印度还被迫贡献出现金。这被称为印度的“赠品”。印度曾经以这种方式一次性支付了1亿英镑，后来还支付过一大笔钱。将一个贫穷国家被强迫拿出的资金称为“赠品”，这实在要归功于英国政府的幽默感。

到目前为止，我给你讲的这些战争结果对印度而言都是不太重要的。但是战时的状况给印度带来了更大的变化。在战争期间，印度的对外贸易和其他国家一样一蹶不振。过去从英国运到印度的大量商品如今大部分无法运达印度。德国潜艇在地中海以及大西洋击沉各种船只，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活动是无法开展的。因此印度只能自给自足。它还要满足政府的各种战争需求。于是印度工业快速发展起来，传统工业，例如纺织业和黄麻纤维业以及新的战时工业都迅速地发展起来了。一直被政府漠视的塔塔钢铁公司如今变得十分重要，因为它们能够生产军需物资。它们的经营或多或少受到了政府的控制。

因此，在战争的几年时间里，身处印度的资本家，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拥有很多的赚钱机会以及很少的海外竞争。他们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以贫穷的印度民众为代价赚取利润。他们抬高了商品价格，赚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利润。但是，付出劳动、创造了红利和利润的工人们则没有改变他们的悲惨境遇。他们的工资提高了一点，但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提高得更多，所以说，他们的状况实际上变得更糟了。

但是资本家生意兴旺，积累了大量利润，他们想把这些钱再投资到工业中去。印度资本家第一次强大到能够对政府施压了。除了这种压力，时局的影响也迫使英国政府在战争时期帮助印度工业发展。为了进一步发展工业，印度需要从国外进口更多的机械，因为印度当时

还无法制造这些机械。因此，我们发现，此时印度进口更多的是机械，而不是英国的商品。

这些情况的出现意味着英国对印度的政策需要进行大幅的调整；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旧政策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政策。英帝国主义适应了变化的形势，彻底改变了面貌。你应该记得，我给你讲过英国统治印度的早期阶段的情况。第一阶段，英国在18世纪掠夺了印度的金钱。第二阶段，英国巩固了其在印度的统治地位，这个阶段持续了100多年，直到世界大战爆发。在这一阶段中，英国把印度当作为英国制造品提供原材料和市场的地方。大型工业在印度受到了种种阻碍，印度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限制。现在的战争时期是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英国政府鼓励印度发展大型工业，尽管这多多少少会与英国的制造业产生冲突。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印度的纺织业得到支持，兰开夏郡就会受到冲击，因为印度以前一直是兰开夏郡的头号客户。那么英国政府为什么会改变政策，从而导致兰开夏郡以及其他英国工业受到损害呢？我已经告诉过你，他们是受战争形势所迫才这么做的。让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吧。

1. 战时的需求自然而然地造成了这个结果，推动了印度的工业化。

2. 工业化使印度资产阶级增加了人数，增强了实力，为了工业发展，他们需要具备更强的能力，使他们有机会将自己的剩余资金进行投资。英国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再忽视他们，因为这样会疏远了他们，让他们支持国家中逐渐强大起来的更极端的革命分子。因此，如果有可能，英国最好是通过给他们提供发展机会把他们留在自己一边。

3. 英国资产阶级也在寻求机会把自己的剩余资本投资到利润回报更大的落后国家。英国自身已经达到了高度工业化的程度，英国本土已经没有很好的投资机会了。在英国本土投资获得的利润并不高，而且，由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实力在壮大，工人骚乱时有发生。而落后

地区劳工力量薄弱，因此工资很低，利润很高。英国资本家自然愿意在印度这样的受英国控制的落后地区进行投资。因此，英国资本注入印度，这进一步促进了印度工业的发展。

4.战争经验表明，只有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才能在战争中占据先机。沙皇俄国在战争中最终溃败，因为它的工业化程度不高，必须依赖其他国家。英国担心自己将与苏维埃俄国在印度边境发生一场战争。如果印度没有大型工业，英国政府就无法在印度边境占据先机。这个风险实在太大了，因此，印度还是应该进行工业化发展。

出于这些原因，英国必然要改变策略，于是决定在印度进行工业化。英国宏观的帝国主义政策决定了这一点，甚至不惜牺牲兰开夏郡以及其他英国工业的利益。当然，英国谎称自己这么做是出于英国政府对印度的热爱以及印度人民的福祉。决定实施这个策略之后，英国采取了措施，确保印度新工业的实际控制权依然掌握在英国资本家手中。英国资本家把印度资本家亲切地当成这个领域中的初级合伙人。

战争期间的1916年，政府成立了印度工业委员会（Indian Industrial Commission），两年后，这个委员会在报告中建议政府促进工业，并将新工业方式引入农业。它还建议要实行全民普及的基础教育。因为在英国工业发展的早期，为了培养技术工人，大众基础教育被认为是很有必要的。

战后，一系列其他的委员会和促进会纷纷效仿工业委员会。甚至有委员会建议，印度工业应该受到关税保护。人们把这种情况看作印度工业的一个伟大胜利。它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一种胜利。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特点。这些建议鼓励外国资本注入印度，外国资本实际上指的就是英国资本；英国资本蜂拥而至。这些资本不仅占据了主导地位，还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大部分大型企业的资金来源都是英国资本。因此，印度的关税保护其实就是保护英国在印度投资的资本！归根结底，英国对印度政策的巨大改变对英国资

本家来说并不是坏事。他们得到了一个理想的免税市场供他们施展拳脚，并通过付给工人低额工资来赚取自己的高额利润。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对他们也十分有利。将资本投资于印度、中国、埃及等工资很低的国家之后，英国资本家就开始威胁降低英国本土工人的工资。英国资本家告诉这些工人，如果不这样做，他就竞争不过印度、中国等低工资国家的产品。如果英国工人反对降低工资，资本家告诉他们，他将被迫遗憾地关闭他在英国的工厂，把资本投资到其他国家去。

管辖印度的英国政府也采取了其他措施控制印度的工业。这个话题很复杂，我不想在这里进行深入讨论。但是有一件事我要提一提。银行在现代工业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大企业总是需要信用贷款。如果得不到信用贷款，再好的企业也会突然破产。由于银行能提供信用贷款，可想而知它们拥有多么大的权力。企业的成败都是由他们一手掌握的。战争结束后不久，英国政府就控制了整个印度的银行体系。这样一来，通过控制货币的流通，政府就能对印度工业和企业行使巨大的权力。而且，为了支持英国对印度的贸易，他们还提出了“帝国优先权”。这意味着，如果要对外国商品征收关税的话，对英国商品要降低税率或者完全不征税，这样英国商品就会比其他国家的商品更有优势。

在战争期间，印度资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的实力不断增强，这个现象也开始在政治运动中显现出来。政治逐渐从战前以及战争早期的平静中苏醒过来，人们开始提出自治以及其他类似的要求。罗卡曼尼亚·蒂拉克度过了漫长的刑期后出狱了。我跟你说过，当时温和派控制了印度国大党，因此这个党派变成了一个脱离民众、没有影响力的小团体。由于思想更加先进的政治家没有进入国大党，于是他们组建了印度自治同盟（Home Rule Leagues）。罗卡曼尼亚·蒂拉克和安妮·贝赞特夫人（Mrs. Annie Besant）分别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同盟。贝赞特夫人在印度政治界发挥了多年的重要作用，她用雄辩的口才和

强有力的主张唤起人们对政治的关注。政府认为她的政治宣传很危险，甚至关押了她和她的两个同僚好几个月。她曾担任国大党加尔各答大会主席，是其首任女主席。几年以后，沙拉金尼·奈都夫人（Mrs. Sarojini Naidu）成为国大党的第二位女主席。

1916年，印度国大党的两派——温和派和极端派相互妥协，双方联合起来参加了1916年12月的勒克瑙大会。双方的联合持续时间不长，不到两年又出现了分裂，如今自称自由派的温和派脱离了国大党，从此一直保持着独立。

1916年的勒克瑙大会标志着印度国大党的复兴。从那时开始，它的力量和重要性不断增强，自成立以来它第一次开始真正成了中产阶级的国家组织。这个党派与民众关系不大，民众也对它不感兴趣；直到甘地出现，情况才发生了改变。因此，所谓的温和派和极端派几乎代表着同一个阶级——中产阶级。温和派代表了或者本身就是少数生活富裕的、与政府公务工作搭边的人；极端派代表了中产阶级中绝大部分的人，队伍中还有不少失业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我指的是多少接受过一些教育的人）使他们的队伍变得更加强硬，也为革命者的队伍输送了新成员。温和派和极端派的目标和理想区别并不大。他们都提出要在大英帝国内取得自治权，双方都能接受暂时先取得一部分自治权，只是极端派的意愿比温和派更强一些，语气更重一些。少数革命者当然希望取得完全的独立，但是他们影响不了国大党的领袖。温和派和极端派实质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属于富人和攀附富人的政党，而极端派里则有一群穷人；作为一个更加极端的政党，它自然吸引了印度的年轻人，他们大多认为，强硬的呼吁是行动的必要替代品。当然，这些概括性的说法并不完全适用于两个党派中的每个成员。例如，温和派中有一位十分能干、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领袖戈帕尔·克里希那·戈凯尔，他并不是富人。他创办了印度公仆协会（Servants of India Society）。但是温和派和极端派中都没有真正的穷人、工人或农民。不过，蒂拉克本人却深受民众的好评。

1916年的勒克瑙大会还因另一种联合而出了名，那就是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的联合。国大党一直坚持全国性的基础，但实际上它主要是一个印度教的组织，因为党派中印度教教徒的数量占了压倒性的多数。在战争开始之前的几年里，受到政府煽动的穆斯林知识分子组建了属于自己的独立团体——全印穆斯林联盟（AllIndia Muslim League）。该联盟的宗旨是为了让穆斯林远离国大党，但是很快它就开始接近国大党，双方还在勒克瑙签订了有关印度未来宪法的公约——《国大党-全印穆斯林联盟计划》（*Congress-League Scheme*），其中一项条款规定了穆斯林少数民族所占席位的比例。当时，这份《国大党-全印穆斯林联盟计划》成了一份国家需要的联合计划。它代表了当时唯一有政治意识的中产阶级人们的观点。以这份计划为基础，民众发起了激烈的运动。

穆斯林的政治意识不断提高，并与国大党携手合作的原因，主要是英国人攻击土耳其这一事件激怒了他们。由于同情土耳其并强烈地表现出了他们的同情，两位穆斯林领袖——毛拉纳·穆罕默德·阿里（Maulanas Mohamad Ali）以及肖卡特·阿里（Shaukat Ali）在战争初期就被关押了起来。毛拉纳·阿布·卡拉姆·阿扎德（Maulana Abul Kalam Azad）由于与阿拉伯国家联系紧密也遭到了关押，他的著作使他在阿拉伯国家很受欢迎。这些事件都激怒并惹恼了穆斯林，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

印度争取自治的要求与日俱增，英国政府也做出了各种承诺，并在印度展开了引人注目的调查。1918年夏天，当时的印度事务大臣和印度总督发表了一份联合报告——该报告的名称来自这两个人的名字，叫作《孟塔古-切姆斯福德报告》（*Montagu-Chelmsford Report*）——这份报告提出了在印度实行政治改革的建议。很快，全国对这些探索性的建议开始了激烈的讨论。国大党强烈反对，认为这些建议并不充分。自由派则乐于接受这些建议，因此他们与印度国大党产生了分歧。

这就是印度在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局面。各地的人们都强烈期望变革。政治晴雨表正在凸显，温和派轻柔而舒缓的甚至有些愧疚和无力的低语正在被极端派更加自信、积极、直接而尖刻的呐喊所代替。不过，温和派和极端派都是从政治以及政府外部结构的角度思考和讨论问题的；在他们身后，英帝国主义仍在默默地加强其对印度经济生活的控制力度。

155 ——新的欧洲地图

我们简短地回顾了世界大战的进程，继而是俄国革命，然后是印度在世界大战时期的状态。现在，让我们回到终结战争的停战协议上来看看胜利者的表现。德国一蹶不振，德皇逃亡，德国宣布成立共和国。然而，为了确保德国军队不再发挥威力，停战协定中制定了很多针对德国的苛刻条款。德国军队不仅要从他们所侵略的所有领土上撤军，还要从阿尔萨斯-洛林以及莱茵河地区的部分德国领土上撤军。协约国准备占领莱茵兰地区，也就是科隆周围的领土。德国还必须交出它所拥有的许多战舰、所有潜艇——亚瑟潜艇、数以千计的重型火炮、飞机、火车机车、卡车以及其他物资。

在签署停战协议的地方，法国北部贡比涅（Compiegne）的森林里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这样的法语铭文：

> 是日，1918年11月11日，德意志帝国于此处终结其罪恶之行径，自由之民族战胜德意志帝国，挫败其奴役其他民族之野心。

德意志帝国已经灭亡——至少表面上如此——普鲁士的军事野心也遭到了挫败。在此之前，俄罗斯帝国已经覆灭，罗曼诺夫王朝已经被迫下了台，结束了其长期的恶劣行径。这场战争还导致第三个帝国也是一个古老王朝的灭亡，那就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不过，其他帝国依然存在，这些帝国属于战胜国，胜利没有让它们减少骄傲自满的情绪，也没有让它们更加关心受它们奴役的其他民族的权利。

获胜的协约国在1919年召开了巴黎和会（Peace Conference in Paris）。他们将在巴黎决定世界的未来格局，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这座著名的城市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各种各样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中有自认为地位显要的政治家和政客、外交官、专家、军人、金融家以及投机商，这些人都带来了随行助手、打字员和办事员。当然还有一大群记者。其中有争取独立的国家的代表，比如来自爱尔兰、埃及、阿拉伯以及其他闻所未闻的国家的代表；还有从东欧来的人，他们想在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的废墟上成立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当然其中也有大量的冒险家。整个世界将要被重新划分，而贪婪的人们绝不会错失良机。

人们对这次和会寄予了极大期待。人们希望，可怕的战争之后将会出现公正与持久的和平。人们身上的巨大压力依然存在，工人阶级中间也有很大的不满情绪。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大幅上升使人们的生活雪上加霜。1919年欧洲有许多迹象表明，社会革命迫在眉睫。俄国的榜样似乎很有感染力。

这就是此次和会的背景，这次和会召开的地点凡尔赛宫大厅，正是48年前德意志帝国宣布成立的地点。每天召开如此庞大的会议是很困难的，因此大会被分成多个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私下会面，在外表谨慎的掩饰下他们钩心斗角、争辩激烈。整个会议由协约国的“十人委员会”（Council of Ten）操纵。之后缩减为五个国家，被称为“五巨头”（Big Five），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日本退出后，变为“四人委员会”（Council of Four）；最后意大利离会后，剩下“三巨头”（Big Tree）——美国、英国和法国。代表这三个国家的分别是威尔逊总统、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Clemenceau），他们三人肩负着重塑世界以及治愈世界伤痛的重大任务。这个任务需要有非凡才能的人或是受人崇拜的人来完成，这三个人都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国王、政治家和将军等当权者经过新闻报道等方式的宣扬和吹嘘，超越凡人，成了思想和行动的巨人。他们身

边似乎环绕着光环，不明所以的我们误以为，他们身上拥有很多品质，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具备那些品质。不过，一旦与他们密切接触，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非常普通的人。一位著名的奥地利政治家曾经说过，如果全世界都知道处于统治地位的人有多么无知，这个世界会感到震惊的。因此这三个人、“三巨头”、表面上的大人物并没有多少远见，对国际事务一窍不通，甚至连地理常识都没有！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拥有极高的声誉和名望，他在演讲和文章中运用了许多优美而且理想化的语句，使得人们几乎把他当作一个预言自由将会到来的先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是一个善于运用华丽辞藻的人，但是他也被认为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人称“老虎”的克列孟梭用的却不是理想的原则和伪善的措辞，他直接摧毁法国的宿敌德国，以各种方式消灭它、羞辱它，使它无法再抬起头。

就这样，这三人互相争夺，每个人都想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而每个人又受到来自和会内部和外部的很多其他人的影响。他们背后一直笼罩着苏维埃俄国的阴影。俄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德国也没有，但是对聚集在巴黎的所有资本主义大国来说，苏维埃俄国的存在是一个持续存在的挑战。

在劳合·乔治的帮助下，克列孟梭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威尔逊也遂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建立一个国际联盟——为了让其他国家同意成立这个组织，他对其他大部分问题做出了让步。在争吵和辩论了数月之后，参加巴黎和会的协约国最终起草出一个和约草案，协约国代表对此草案达成了一致意见之后，他们要求德国代表听命于他们。他们把包含440条条款的厚重和约草案扔到德国代表面前，要求他们签字。他们没有和德国代表争吵，也没有给德国代表提意见或者做出修改的机会。这将是一个强制执行的和约；德国代表要么签字，要么承担不签字的后果。新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国代表提出抗议，不过，在限

期的最后一天，他们还是在这份《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上签了字。

协约国还与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共同起草、签署了单独的和约。尽管土耳其苏丹接受了和会制定的有关土耳其的和约，但是这份和约遭到了凯末尔帕夏以及他的英勇同伴们的强烈抵制。有关这个故事我会单独讲给你听。

这些和约带来了哪些改变呢？东欧、西亚和非洲的领土变化最大。在非洲，协约国夺走了德国殖民地作为战利品，英国得到了其中最好的部分。取得了东非的坦噶尼喀（Tanganyika）和其他一些领土后，英国人成功地实现了他们长久以来的梦想，拥有了一个纵贯非洲大陆的狭长帝国领土，从北边的埃及开始一直到南边的好望角。

欧洲的变化相当大，出现了很多新的国家。拿一份旧地图与一份新地图做个比较，这些变化就一目了然了。

有些变化是俄国革命造成的结果，很多生活在俄国边境的非俄罗斯民族脱离了苏维埃，宣布独立。苏维埃政府承认他们的自主权，对此未加干涉。看一看新的欧洲地图吧。一个大国——奥匈帝国已经完全消失，分裂成了许多小国，这些小国常常被称为“奥地利继承国”（Austrian Succession States），它们包括：原有领土面积只剩下一小部分、以著名城市维也纳为首都的奥地利，领土面积同样大幅减少的匈牙利，将原波希米亚纳入领土范围的捷克斯洛伐克，令我们不愉快的旧相识南斯拉夫的一部分、扩张后面目全非的塞尔维亚，还有一些部分成了罗马尼亚、波兰和意大利的领土。这是一次彻底的领土切分。

再往北出现了另一个新兴国家，或者说一个旧国家重生了，它就是波兰。这个国家由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的部分领土构成。为了让波兰拥有入海口，人们完成了一个非凡的壮举。德国，准确地说是普

鲁士，被分割成两个部分，当中的一条延伸到海边的陆地走廊被划分给了波兰。因此，如果要从西普鲁士到东普鲁士，必须穿过这条波兰走廊（Polish Corridor）。这条走廊附近有一座著名的城市但泽，它变成了一个自由市——也就是说它既不属于德国，也不属于波兰，它是独立的，直接接受国际联盟管辖。

波兰以北是波罗的海各国——立陶宛（Lithuania）、拉脱维亚（Latvia）、爱沙尼亚（Estonia）和芬兰，它们都是原沙俄帝国分裂出来的国家。这些国家都很小，但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和独特的文化实体。你应该有兴趣知道，立陶宛人是雅利安人后裔（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他们的语言与古印度梵语有相似之处。这个不同寻常的事实也许很多印度人都不了解，它让我们与遥远国度的人们产生了联系。

欧洲另一个主要的领土变化就是，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回归了法国。其他的变化还有不少，我就不在此赘述了。现在你已经清楚了，这些变化导致了许多新国家的出现，这些国家大部分都是小国。如今东欧与巴尔干半岛有了相似之处，因此人们常说，和约导致欧洲“巴尔干化”了。如今国家边境更多了，这些小国之间经常发生矛盾。这些国家对彼此的仇恨，特别是在多瑙河流域的仇恨很深，深得令人惊讶。其主要的责任在于协约国错误地分割了欧洲，导致了很多新问题出现。许多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受到压迫他们的外国政府统治。波兰有一大片领土实际上是乌克兰的一部分，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可怜的乌克兰人遭受到各种残酷的暴行，遭受了强制性的“波兰化”。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意大利都有类似的外国少数民族，这些国家也都欺负这些少数民族。另一方面，奥地利和匈牙利被肢解得只剩骨头了，它们两国的大部分人民都被分割给了其他国家。所有这些受外国控制的地区必然会出现民族主义运动和持续的冲突。

再看看这幅地图。你会看到，有排成一竖排的几个国家将俄国与西欧完全分隔开来，这些国家是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以及罗马尼亚。我告诉过你，这些国家大部分并不是根据凡尔赛的一系列和约成立的，而是苏维埃革命的结果。不管怎样，这些国家受到了协约国的欢迎，因为它们形成了一条间隔地带，将俄国与非布尔什维克的欧洲分隔开来。它们是一条防疫封锁线（可以隔离传染疾病的封锁线），有助于阻挡布尔什维克传染病！所有这些波罗的海国家都是非布尔什维克国家，否则它们早就加入苏维埃联邦了。

在西亚，原土耳其帝国的部分领土吸引了西方大国的注意力。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曾支持阿拉伯人发动一场反抗土耳其的起义，承诺让他们建立一个覆盖阿拉伯半岛、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阿拉伯联合王国。英国人一边对阿拉伯人做出承诺，一边又和法国签订了分割这些领土的秘密协约。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把它称为“粗鲁的口是心非”。不过他说这话的时候是10年之前，那时他还不是一位高官，因此有时可以讲些真话。

更离奇的还在后面，英国政府不仅想背弃对阿拉伯人的承诺，还要取消和法国签订的协约。他们想象着拥有一个从印度一直延伸到埃及的庞大的中东帝国，这将是一个把他们的印度帝国与他们所占有的大片非洲领土连接起来的广阔区域。这是一个诱人而又惊人的梦想。然而，这个梦想在当时似乎不难实现。1919年的时候，英国军队占领了这片广阔的地区，包括波斯、伊拉克、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的一部分以及埃及。他们试图阻止法国人进入叙利亚。君士坦丁堡本身也被英国人占据着。等待着他们的命运在1920年、1921年和1922年这几年中逐渐清晰起来，他们的这个梦想也随之化为乌有。幕后的苏维埃和台前的凯末尔帕夏摧毁了英国大臣们野心勃勃的阴谋诡计。

不过，英国对西亚的控制力量依然很大，它控制了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并试图通过贿赂以及其他方式影响事态的发展。叙利亚的命运

落入了法国手中。有关阿拉伯国家出现的新民族主义以及它们争取独立的斗争，我会找其他机会告诉你。

现在我们要再回顾一下《凡尔赛和约》。这份和约规定，德国是引发战争的有罪一方，因此德国人被迫在和约上签字，承认他们的战争罪恶。这种强迫的认罪没有什么价值，在这件事情上强制只能给人带来痛苦。

德国还被要求裁军，只能保留一部分军队用于维护治安，它还必须向协约国交出舰队。由于德国舰队即将被没收，舰队的船长和船员们自行决定，宁愿让舰队沉没也不交给英国人。因此，1919年6月在斯卡帕湾（Scapa Plow），当着准备接收舰队的英国人的面，整个德国舰队集体自沉了。

此外，德国还要支付战争赔款，补偿战争对协约国造成的损失和破坏。“赔款”这个词在许多年里就像笼罩在欧洲上空的阴影。和约并未规定确切的数额，不过补充条款规定了偿还的具体数额。补偿协约国的战争损失是一个相当大的任务。当时德国是一个战败的、残破的国家，维持国民生计都很困难。除此之外还要承担协约国的重担，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协约国充满了仇恨和复仇的情绪，它们不仅想满足自己“合法的无理要求”，也想从德国衰弱的身上榨取最后一滴血。在英国，呼喊着“绞死德皇”的劳合·乔治赢得了一次选举胜利。在法国，这种情绪更加激烈。

所有这些和约条款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束缚德国，让它动弹不得，让它无法再次强大起来。它将在以后几十年里一直做协约国的经济奴隶，每年要支付它们一大笔钱。这种方式根本无法长久地束缚一个国家，这是历史的一个明摆着的教训。然而，为这份凡尔赛复仇和约奠定基础的、有智慧的超级政治家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现在，他们后悔了。

最后，我要给你讲讲威尔逊总统的产物、由《凡尔赛和约》呈现给世界的“国际联盟”。这是一个由独立自治的国家组成的联盟，它的目标是：“在公正与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关系，促进世界各国物质和精神上的合作，避免未来发生战争。”这是一个多么值得称赞的目标啊！联盟的每一个成员国承诺，永远不再和其他成员国开战，直到所有和平和解的可能性都用尽，还要间隔9个月时间。如果任何一个成员国背弃承诺，其他成员国保证与那个国家中断金融和经济关系。在书面上这些听上去都很不错，但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理论上，国际联盟也没有尽全力去结束战争，它只是试着给战争设置一些难题，以便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努力地调解去缓和战争情绪。它并没有想办法去消除战争的根源。

国际联盟的组成包括一个全体成员国都派出代表参加的全体大会以及一个理事会，几个大国拥有其中的常任代表席位，再由全体大会选举出一些额外的代表席位。它位于日内瓦的总部还设有一个秘书处。它还设有其他的活动部门：处理劳工问题的国际劳工局（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位于海牙的国际常设法庭（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知识合作委员会（Commitee for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国际联盟并不是一开始就设有这些部门的，其中有一些是后来附设上去的。

《凡尔赛和约》写明了国际联盟最初的结构。这个部分被称为《国际联盟盟约》（*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这个盟约还规定，各国必须削减军备，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保留最少的军备。首先要实现的是德国裁军（当然是强制性的），其他国家则紧随其后。它进一步规定，万一有国家发起侵略行为，必须对其采取措施。但是它并没有明确侵略行为的定义。当两个民族或国家交战的时候，每一方都会责怪另一方，称对方为侵略者。

国际联盟在决定重大问题的时候，必须经过各成员国全体同意。因此如果任何一个成员国对一项提议投了反对票，这项提议就不能通过。这意味着，将不会存在多数票赞同即强行通过的现象。这也进一步说明，国家主权依然和以前一样是独立的，是无须对其他人负责的；国际联盟并没有成为凌驾于各国之上的超级国家。这个条款极大地弱化了国际联盟的力量，使它实际上成了一个顾问机构。

任何独立的国家都可以加入国际联盟，但有四个国家被明确地排除在外，它们就是战败的德国、奥地利、土耳其，以及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不过，按照规定，它们今后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加入进来。有意思的是，印度成了国际联盟的一个初始成员国，这与只有自治的国家才能加入联盟的规定是自相矛盾的。当然，他们所说的“印度”指的是管辖印度的英国政府，而通过这一个小伎俩，英国政府成功地获得了一个额外的代表席位。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是国际联盟创造者的美国则拒绝加入国际联盟。美国人不赞同威尔逊总统的做法以及欧洲人的阴谋诡计和复杂形势，决定要与他们保持距离。

许多人对国际联盟寄予了厚望，希望它能结束或者至少是大幅减少当今世界的不和谐因素，给我们带来和平与富足的时代。许多国家建立了国际联盟协会，以推广国际联盟和一种所谓的以国际眼光看待问题的习惯。另一方面，还有很多人认为国际联盟是一个虚伪的骗子，意在推进大国的计划。现在我们对此有了实际的体验，也许评判它的作用更容易一些。1920年新年到来的那一天，国际联盟正式开始运行。到现在为止，它存在的时间还不长，但是它的声誉早就完全丧失了。无疑，它在现代生活的各种次要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而且，它让各个国家或者说各国政府聚集起来讨论国际问题的这个形式，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但是，它完全没有实现自己真正的使命，那就是维护和平或者仅仅是降低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无论威尔逊总统提议建立国际联盟的最初意图是什么，国际联盟无疑已经成了大国，特别是成了英法两国手中的一个工具。它最基本的功能就是维持现状，也就是现有的秩序。它呼吁国家之间的公正和尊重，但未深究现有的各国关系是否是建立在公正与尊重之上的。它宣称不干涉国家的“内部事务”。对帝国主义大国来说，它的附属国就是内部事务。因此，就国际联盟而言，它希望这些大国能永久支配自己的帝国。除此之外，国际联盟还把从德国和土耳其夺来的新领土，以“委任统治地”的名义，奖励给了协约国中的大国。“委任统治地”是一个具有国际联盟特色的词，这意味着，原先的帝国主义剥削行为将以一个悦耳的名称延续下去。国际联盟认为，将“委任统治地”划归其他国家也应该是委任统治地人民的意愿。这些不幸的人们对此发起过反抗，进行过长期的流血斗争，但最后在炮火的袭击之下都屈服了。这竟然就是探询相关人民意愿的方式！

国际联盟使用的措辞华而不实。帝国主义大国变成了委任统治地人民的“受任统治者”，国际联盟要确保受任统治者执行所有的委任统治条款。事实上，这样一来问题就更严重了。大国为所欲为，但它们表面上假装圣洁，蒙蔽那些没有戒备心的人。当某个小国家以任何形式违反规定的时候，国际联盟就会对它表现得十分严厉，以自己的不满去威胁它。当一个大国违反规定的时候，国际联盟则会转移视线或者试着将违规的影响降到最低。

因此，大国支配了国际联盟，只要能帮助它们达到目的，它们就会加以利用；如果嫌麻烦，它们就会弃之不顾。也许错不在国际联盟，而在国际联盟注定要接受的这个制度本身。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大国之间的激烈对抗和竞争，每个大国都在尽全力剥削世界上的各处领土。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成员不断地偷窃别人的东西，并且为了相互残杀而磨刀霍霍，那么他们之间就不可能进行合作，这个社会也不会取得很大的进步。因此，不出所料，尽管背后有一大批强大的后援者和支持者，国际联盟还是没落了。

在讨论制定《凡尔赛和约》的过程中，有人代表日本政府提出在和约中加入一条承认种族平等的条款。但是这项提议未被采纳。不过，日本霸占了中国的胶州湾，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安慰。“三巨头”在牺牲中国这样实力虚弱的盟友时显得非常慷慨。因此，中国并未在和约上签字。

这就是为“终结战争的战争”画上句号的《凡尔赛和约》。后来成为斯诺登子爵（Viscount Snowden）以及英国内阁大臣的菲利浦·斯诺登（Philip Snowden）对该和约做了以下评价：

> 此和约必将满足强盗、帝国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要求。对于那些期盼战争结束后会产生和平的人则是致命一击。它不是一个和平条约，而是另一场战争的宣言。它背叛了民主以及战争中的阵亡者。此和约暴露了协约国的真实目的。

的确，协约国的仇恨、自满和贪婪让它们心比天高、不自量力。在之后的几年中，它们开始懊悔，因为它们的愚蠢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可能会把自己压垮。但是此时，一切都太晚了。

156 ——世界大战后的世界

我们漫长的游历终于到了最后阶段，就快接近当今的内容了。我们还要看看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我们已经迎来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也正是你的时代！这是最后的阶段，一个相对来说很短但依然艰难的时期。世界大战结束后到现在才过去了14年半，这一小段时间对于我们谈论过的历史上的漫长时期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不过，我们正处于这个时期之中，要如此近距离地对事件做出正确的评价是很难的。我们既无法得出合适的观点，也无法具备历史所需的冷静客观。我们对很多事件过于激动了，很小的事情对我们来说似乎都被放大了，而一些真正的大事则可能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我们也许会因为一棵树而放弃了整片森林。

而且，我们也很难掌握一点，那就是如何衡量事件的重要性。我们应该使用怎样的标准？很显然，这取决于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从一个角度来看，一件事对我们来说似乎是重要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也许就完全不重要，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恐怕我在以前给你写的信中对这个问题有所回避，我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的看法还是影响了我所写的内容。如果有另一个人描述同样的时期和事件的话，他也许会写出完全不同的内容来。

在此，我不打算讨论我们对历史应该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一问题。我自己对此话题的看法在最近几年中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像我对这件事或其他事改变了看法一样，其他很多人也都改变了看法。因为战争极大地震惊了每件事和每个人。它完全颠覆了旧的世界；自那以后，我们可怜的旧世界煞费苦心地设法再次站起来，却总是失败。它震动了我们从小到大的思想体系，让我们开始怀疑现代社会和文明的

基础。我们看到了大量年轻生命的逝去、谎言、暴力、残忍、毁灭，想知道这是否就是文明的终结。苏维埃在俄国崛起了，这是一个新兴事物，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是对旧事物的一种挑战。其他思想也在传播。这是一个蜕变的时期，是旧信条和旧传统瓦解的时期，一个在过渡和急剧变化的时期中经常出现的、充满不确定和疑问的时代。

这些都让我们觉得，把战后的时期视作一段历史是很困难的。不过，虽然我们会讨论和质疑各种信条和思想，不因为它们是传统的就接受它们，但我们也不能把这当作我们不认真对待各种思想观念、不肯花心思去努力思辨的借口，否则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世界历史中这样的过渡时期尤其需要人们的头脑与身体都活跃起来。在这样的时期里，单调乏味的生活变得有生气了，冒险与刺激召唤着人们，我们都可以参与建立新秩序。而且，在这样的时期里，青年们往往起着主导作用，因为他们比那些传统守旧、观念一成不变的年长者更容易适应不断变化的思想和环境。

也许我们也应该看看这个战后时期的一些细节。不过在这封信里，我想给你概述一下这个时期。你应该还记得我们对拿破仑失败之后的19世纪的概述吧。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起1815年维也纳会议签订的条约及其后果，并将它与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及其后果做比较。维也纳会议签订的条约并非一个令人愉快的条约，它给欧洲未来发生的战争埋下了伏笔。我们的政治家们没有吸取经验教训，让《凡尔赛和约》变成了一份更加糟糕的和约，在上一封信中我们都已经看到了。这一份所谓的和约给战后时期蒙上了沉重的阴影。

过去的14年中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呢？我认为，最重要的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就是苏联的崛起与合并，成立了苏联，或者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nion of Socialist and Soviet Republics，简称USSR）。我告诉过你苏维埃俄国为了生存而面对的巨大困难。在这样的困境中最终取得胜利是这个世纪中的一大奇迹。苏

维埃体系覆盖的范围包括了亚洲地区的前沙俄帝国领土，从西伯利亚直到太平洋以及中亚的印度边境附近。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不过它们以联邦制结成了联盟，也就是现在的苏联。这个联盟涵盖了欧洲和亚洲的大片领土面积，几乎是全世界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这个面积非常大，但是面积大并不能代表什么，俄国以及西伯利亚和中亚都十分落后。苏维埃创造的第二个奇迹就是制定了庞大的计划，让这个大面积地区完全改变了模样。一个国家发生如此快速的进步在历史记载中还没有出现过。就连中亚最落后的地区都一下子冲到了前面，令身处印度的我们羡慕不已。最显著的进步是教育和工业方面的进步。通过大规模地实施“五年计划”（Five Years’Plans），俄国以疯狂的速度推进了工业化，建立了数量众多的工厂。这些对于苏联人来说是很大的压力，他们无法安逸地生活，连生活必需品都没有，这样一来，他们大部分的工作收入就可以投入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之中。农民的负担尤其沉重。

不断进步的、有进取心的苏维埃国家和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西欧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尽管遇到很多困难，西欧仍然比俄国富有得多。在西欧长期繁荣兴旺的岁月里，它积累了大量财富，够它用一阵子了。不过，每个国家都承担债务责任、《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必须支付的战争赔款以及各国之间持续的对抗与冲突，使可怜的欧洲陷入了困境。人们召开无休止的会议，试图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但是他们没找到，而局势却逐日恶化了。苏维埃俄国就好像是一个身负重担却生机勃勃、精力充沛的青年，相较之下，西欧就像是一个没有希望、失去活力的老人，尽管依然傲慢地在前进，但它目前的状况必然会有到头的一天。

美国在战后几乎没有遇到欧洲那样的困境。在10年时间里，美国极为繁荣。在战争期间，他们把英国从债权国老大的位置上挤了下去。现在，美国成了世界的债权国，全世界都是它的债务国。在经济方面，美国主导了整个世界，它原本可以像英国以前的做法一样，靠

着整个世界付给它的钱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但是它遇到了两个难题。债务国深陷困境，无法以现金偿还债务；实际上，即使它们比现在富裕，它们也付不出这么大额的现金。为了偿还债务，它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生产商品并把商品送到美国。但是美国人并不愿意接受外国商品，他们设置了巨大的关税壁垒，阻止了大部分外国商品进入美国。那么，可怜的债务国该怎么还债呢？它们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它们可以再向美国借款，用于偿还到期利息！这是一个特别的还债方式，因为它意味着债权国要拿出更多的钱，债务额会越来越高。很显然，大部分债务国永远都不可能摆脱债务，然后突然间美国停止出借，脆弱的纸上协定就会轰然倒塌。美国还发生了另一件奇怪的事情。繁荣富足、遍地黄金的美国，突然之间到处是失业工人，工业的车轮停止了转动，贫困开始四处蔓延。

如果富足的美国都濒临破产，欧洲的状态就可想而知了。每个国家都通过提高关税和其他策略来阻止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并且鼓励人们购买国货。每个国家都想销售自己的产品，不想购买或者尽可能少买外国的产品。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必然会削弱国际贸易，因为贸易和商业活动依赖的是商品交换。这种政策被称为经济民族主义。这种政策和其他积极的民族主义形式蔓延至所有的国家。随着贸易和工业的衰落，各国的困难与日俱增，帝国主义大国为了达到本国的收支平衡，加重了对海外领土的剥削，也削减了本国工人的工资。在剥削世界的欲望和行动中，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当国际联盟伪善地呼吁裁军，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的时候，战争的阴霾似乎越来越近了。大国再次开始集结各自的力量，为几乎不可避免的冲突做好准备。

资本主义文明控制西欧、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重要时期似乎进入了尾声。战后第一个十年里，资本主义似乎有希望恢复实力，进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稳固自己的地位。但是，接下去的三年左右的时间给这种可能性打上了问号。不仅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达到了白热

化程度，同时也因为国家内部各阶级之间的冲突，也就是工人阶级与控制政府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也变得十分尖锐。情况在不断恶化，统治阶级在压制崛起的工人阶级方面做了最后一搏，采取了法西斯主义的方式。阶级冲突尖锐、统治阶级面临了失去特权地位的威胁时，法西斯主义出现了。

战后不久，意大利开始实行法西斯主义。为了镇压意大利工人，墨索里尼领导下的法西斯党人取得了控制权，自那以后一直掌握着政权。法西斯主义意味着赤裸裸的独裁专政，它公开蔑视民主政体。许多欧洲国家或多或少都采用了法西斯主义的方式，独裁专制在这些国家是很普遍的现象。1933年初，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取得胜利，终结了1918年刚刚宣布成立的共和国，德国法西斯主义采用极为残暴的方式扼杀了工人运动。

因此在欧洲，法西斯主义面对着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同时资本主义大国彼此怒目而视，随时准备开战。而且，资本主义还扩大了贫富差距，一边是食物腐烂，甚至被丢弃和销毁，另一边则是饿着肚子的人们。

欧洲的一个古老国家西班牙在过去几年中转变成为一个共和国，赶走了原先的哈布斯堡-波旁皇族（Hapsburg-Bourbon）的统治者。这样一来，欧洲和世界又少了一位国王。

我已经给你讲了战后14年中发生的三件大事：苏联的崛起；美国经济在世界上所拥有的统治地位以及它目前所面临的危机；欧洲的纷争。这个时期的第四个重大事件是：东方国家彻底觉醒了，它们为了争取独立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东方国家毋庸置疑地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这些东方国家可以被划分为两个等级：一些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一些是受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殖民地国家。在亚洲和北非各国，民族主义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对独立的渴望也从未间断、从未懈怠。这些国家都发生了大型运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针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叛

乱。其中许多国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都得到了苏联的直接帮助，以及更重要的道义上的支持。落魄的国家得以复兴，而最令人瞩目的例子就是土耳其；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他是一位勇敢的领袖，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都不曾屈服。他不仅为他的国家赢得了独立解放，还对国家进行了现代化改革，使这个国家改变了旧模样。他废除了苏丹制度和哈里发制度，解除了对妇女的禁锢以及其他许多旧传统。苏维埃从道义上的支持以及实际提供的援助对他来说帮助很大。苏维埃也为努力摆脱英国影响的波斯提供了帮助。波斯也出现了一位强者——礼萨汗，如今他已成了波斯的统治者。阿富汗也在这个时期成功地确立了其完全独立的地位。

阿拉伯半岛之外的阿拉伯国家仍然在受外国控制。阿拉伯人统一的要求并未得到满足。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在苏丹伊本·沙特（Sultan Ibn Saud）的领导下获得了独立。伊拉克理论上获得了独立，但实际上依然处于英国影响和控制的范围之内。巴勒斯坦和外约旦（Trans-Jordan）这两块不大的区域是英国的委任统治地，叙利亚是法国的委任统治地。叙利亚发生过一次反对法国人的极为英勇的起义，并取得了部分成功。埃及也发动过反对英国人的叛乱，与英国人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这场斗争依然还在持续着，尽管埃及被称为独立国家，并由一位英国人扶持的国王统治。

在北非最西边，摩洛哥也在阿卜杜勒·克里姆（Abdel Krim）的领导下开展了争取独立的英勇斗争。他成功地赶走了西班牙人，但是后来法国人以强大的武力攻势击败了他。

亚洲和非洲发生的这些争取独立的斗争，显示出新思想如何在海外同步影响着遥远东方国度的人们。有两个国家特别突出，因为它们有着举世瞩目的重要性，这就是中国和印度。无论这两个国家中哪一个发生了根本改变，都会影响世界上的整个强国体系；必定会对世界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中国和印度的斗争不仅仅是这两个国家

内部的斗争。中国的成功意味着一个强大国家的出现，这会改变所谓的当今力量平衡，也会使帝国主义大国自动终止对中国的剥削。印度的成功也意味着一个强大国家，至少是潜在的强大国家的出现，也自然而然地意味着英帝国主义统治的结束。

中国在过去的10年里经历了许多次起起落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盟破裂了，自那以后中国受尽了督军以及类似的土匪军官的折磨，这些军官都接受了希望中国持续混乱的外国利益集团的资助。在过去两年里，日本人侵略了中国，占领了中国的几个省。这种非法侵占仍在继续。同时，中国内地的广阔地区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者，那里还成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

印度的过去14年是经历丰富的14年，印度出现了积极而又平和的民族主义。战后不久，当人们对重大改革抱有很高预期的时候，旁遮普实行了戒严，而札连瓦拉园发生了可怕的屠杀。人们对此的愤怒以及穆斯林对土耳其和哈里发制度所处境遇的不满，导致1920年至1922年间发生了由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实际上，从1920年起，甘地一直是毋庸置疑的印度民族主义领袖。这是印度的甘地时代，他倡导的和平起义方式新颖而有效，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和准备，1930年时，争取独立的斗争卷土重来，这是印度国大党为了国家独立的目标而采取的措施。自那以后，断断续续地出现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监狱人满为患以及其他很多你已经知道的事情。同时，英国在其策略中做出了些许改革以争取一些印度人的支持，也采取了行动镇压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

1931年，缅甸穷苦的农民阶级爆发了一次大规模起义，但是起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在爪哇岛以及荷属印度群岛（Dutch Indies）也发生了起义。暹罗爆发的动乱导致国家发生了变化，国王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在法属印度支那，民族主义也在行动着。

因此，在整个东方，民族主义努力地自我表现着，在有些地方，民族主义还掺杂着一些共产主义成分。这两者之间除了同样仇恨帝国主义之外并没有相似之处。苏维埃俄国对联盟内外的所有东方国家所采取的明智而慷慨的策略，为其带来了很多伙伴，甚至包括一些非共产主义国家。

近几年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妇女从许多束缚中解放出来了，这些束缚包括法律上的、社会上的以及风俗上的束缚。在西方，世界大战大力推动了妇女解放。甚至在东方，从土耳其到印度和中国，妇女也站了起来、行动起来，并且勇敢地参与了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活动。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每天都有新的变化和重要的事件发生，比如国家之间的摩擦，比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比如日益加重的贫困，而不断延长的战争阴影则一直笼罩在这一切之上。

这是历史上一个激荡的时期，能活在这个时期并参与其中是一件好事，即使这种参与是在台拉登监狱中度过孤寂的时光！

157 ——爱尔兰为成立共和国而斗争

现在，我们要详细地看一下近几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我首先要讲的是爱尔兰。从世界历史和世界力量的角度来看，这个位于欧洲最西部的小国家目前的重要性并不大。但是，它是一个勇敢而难以征服的国家，大英帝国的巨大威力都没能碾碎它的意志，也没能胁迫它屈服。

在上一封有关爱尔兰的信中我给你讲过，英国议会在世界大战开始前不久通过了《自治法案》。阿尔斯特的新教领袖和英国的保守党对此感到非常愤怒，并照例组织了一次反对该法案的起义。为此南部的爱尔兰人也组织起自己的国民志愿军队伍，在必要的时候与阿尔斯特战斗。爱尔兰内战似乎一触即发。就在此时，世界大战爆发了，所有的注意力都被转移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战场上了。议会中的爱尔兰领袖在战争中伸出了援手，但英国对此无动于衷、毫无兴趣。同时，阿尔斯特的“反叛者”还得到了英国政府提供的高级公职，这让爱尔兰人民更加不满了。

爱尔兰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爱尔兰人感觉到他们不能为了英国的战争而牺牲自己。当有人提议爱尔兰应和英国一样开展征兵，强迫所有年轻力壮的男人参军的时候，整个国家都充满了抗议的怒火。爱尔兰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动用武力进行抵制。

1916年复活节那一周里，都柏林发生了起义，爱尔兰共和国（Irish Republic）宣布成立。经过几天的战斗之后，英国人镇压了这场起义，后来爱尔兰最为勇敢和优秀的几位年轻人由于参与了这场短暂的起义而遭到处决。这场“复活节起义”（Easter Rising）不算

是一次对英国人的严重挑战，它更像是一种姿态，它向世界表明，爱尔兰依旧渴望建立共和国，依旧拒绝屈服于英国人的统治。发起起义的勇敢的年轻人为了让世界看到这种姿态，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完全清楚，在当前的情况下他们必定会失败，但仍然希望他们的牺牲将会在未来结出硕果，加速实现国家独立。

这场起义发生的时候，英国人还逮捕了一个爱尔兰人，因为他企图从德国运送武器到爱尔兰。他就是长期从事英国领事工作的罗杰·凯斯门特爵士（Sir Roger Casement）。凯斯门特在伦敦受到审判，被判死刑；在法庭被告席上，他做了一番极为感人和动人的陈述，流露出爱尔兰人心中激昂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场起义失败了，但它的失败又带来了胜利。英国政府随后的镇压行为，尤其是处决一群年轻领导者的行为，给爱尔兰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爱尔兰表面上似乎平静了，但是内心的怒火在熊熊燃烧，很快人们在新芬党中找到了发泄这股怒火的机会。新芬党的思想迅速传播开来。在上一封有关爱尔兰的信中我给你介绍过新芬党。一开始新芬党并不成功，如今它已经呈现出了星火燎原一般的态势。

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列颠诸岛开始进行英国议会选举。在爱尔兰，新芬党人夺得了大多数议席，取代了原先的赞同与英国人开展一些合作的民族主义者。不过，新芬党人参与选举并不是为了进入英国议会。他们的策略完全不同，他们认为应该开展不合作运动以及抵制行动。因此，1919年，这些当选的新芬党人拒绝进入伦敦的国会，在都柏林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共和议会。他们宣布成立爱尔兰共和国，将他们的议会称为“爱尔兰众议院”（Dail Eireann）。这个议会本应是属于包括阿尔斯特在内的整个爱尔兰的，但阿尔斯特人当然是拒绝加入的。他们对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地区十分厌恶。爱尔兰众议院选举德·瓦勒拉（De Valera）出任主席，格里菲思出任副主席。这两位新共和国首领当时恰巧都被关押在英国监狱里。

一场最特别的斗争由此开始，这场斗争很独特，与之前爱尔兰和英国数不清的斗争都不同。一小群年轻人在祖国人民的支持下，尽管困难重重，还是在坚持战斗；与他们对阵的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帝国。新芬党斗争是一种带有一些暴力行为的不合作运动。他们呼吁抵制英国机构，尽量建立属于自己的机构，例如替代传统法院的仲裁法庭。在乡村，人们为了对抗警察部队开展了游击战。新芬党囚犯在狱中进行绝食抗议，给英国政府带来了很多麻烦。最著名的一次绝食抗议是震动了整个爱尔兰的科克市市长（Lord Mayor of Cork）特伦斯·麦克斯威尼（Terence MacSwiney）的绝食抗议。刚入狱时他就宣布，无论出狱时是死是活，他在狱中绝不会进食。节食75天之后，他的遗体被运出了监狱。

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是新芬党起义中最杰出的组织者之一。新芬党的战术使英国在爱尔兰的政府陷入了瘫痪，而在郊区，英国政府几乎失去了权力。渐渐地，敌对双方的暴力行动越来越多，暴力的报复行为十分频繁。英国征召了一支特别部队在爱尔兰服役。这支部队的成员获得了可观的报酬，他们都是参加过世界大战的英国老兵，其中不乏走投无路、十分暴力的人。这支部队因其制服颜色而得名“黑棕部队”（Black and Tans）。这支黑棕部队开始了冷血的杀戮，常常趁人们熟睡时枪杀他们，企图以此胁迫新芬党人屈服。但是，新芬党人拒绝投降，仍在继续着他们的游击战。于是，黑棕部队开始了疯狂的烧杀抢掠，他们烧毁了全境所有的村庄和大部分城镇。爱尔兰成了矛盾冲突的巨大战场，在这里，交战双方进行着暴力和毁灭性的斗争；其中一方背后是一个帝国系统的力量，另一方背后则是一小群人坚忍不拔的决心。这场英爱战争从1919年开始到1921年10月结束，一共持续了两年。

同时，在1920年，英国议会仓促地通过了一份新的《自治法案》。世界大战开始前不久才通过的、险些引发阿尔斯特起义的前一份《自治法案》被悄悄地终止了。这份新法案将爱尔兰分裂成了两个

部分：阿尔斯特或者北爱尔兰，以及爱尔兰剩余的地区，而且还将有两个独立的议会。爱尔兰是一个小国家，被分裂之后形成的两个部分变成了这座小岛上两个更小的地区。阿尔斯特成立了北爱尔兰新议会，但是在南部，也就是爱尔兰的其余地区，没有人关注《自治法案》，他们都全神贯注于新芬党起义。

1921年10月，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向新芬党领袖提出休战的请求，希望双方协商解决问题，这一请求得到了同意。英国大可利用自己丰富的资源或者通过将整个爱尔兰变成蛮荒之地的方法击败爱尔兰新芬党，但是它对爱尔兰的策略使它在美国和其他地方都非常不得人心。身在美国的爱尔兰人甚至英国自治领都为爱尔兰提供了金钱，支持他们继续斗争。同时，新芬党人也疲倦不堪，都顶着巨大的压力。

英国代表和爱尔兰代表在伦敦会面，经过两个月的讨论和争辩之后，他们于1921年12月签订了一份临时条约。这份条约并未承认爱尔兰共和国，但是它使爱尔兰在绝大多数问题上享有了比其他自治领更大的自治权，只有一两件事除外。即便如此，爱尔兰代表还是不愿意接受这份条约，当英国威胁向他们立即发动战争的时候，他们才接受了。

在爱尔兰，这份条约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一些人支持它，其他人则强烈反对它。在这个问题上，新芬党分裂成了两派。爱尔兰众议院最终接受了这份条约，爱尔兰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成立了，爱尔兰语官方名称为“Saorstat Eireann”（爱尔兰自由邦）。但是它引发了内战，敌对的双方原先在新芬党内都是同僚。爱尔兰众议院主席德·瓦勒拉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反对这份与英国签订的条约；格里菲思、迈克尔·柯林斯以及另一些人则支持这份条约。这场内战在全国持续了数月，在英国军队的帮助下，支持这份条约以及爱尔兰自由邦的人击败了另一方。迈克尔·柯林斯遭到共和主义者刺杀，同样，许多共和主义领袖也遭到了自由邦支持者的杀害。监狱里满是共和主

义者。这场内战以及敌对双方的仇恨都是爱尔兰在勇敢地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形成的极为可悲的情况。英国虽然在武力上受阻，但策略上取得了成功，爱尔兰人开始互相攻击，英国在一定程度上默默支持着一方，同时在一旁观望，并对爱尔兰出现的新情况感到满意。

内战渐渐平息，但是共和主义者依然不接受自由邦。就连那些被选为爱尔兰议会（自由邦议会）议员的共和主义者都拒绝参加议会，因为他们拒绝宣誓效忠英国国王。所以德·瓦勒拉带领的一派拒绝参加爱尔兰议会，自由邦总统科斯格雷夫（Cosgrave）带领的自由邦一派则想尽办法消灭共和主义者。

爱尔兰自由邦的成立对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产生了一些深远的影响。这份爱尔兰条约使爱尔兰在法律上比当时其他英国自治领拥有更大的自治权。爱尔兰获得了这种自治权后，其他自治领也自动地得到了类似的自治权，自治领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英国和自治领之间举行的一些帝国会议也为自治领带来了更大的自治权。爱尔兰在其激烈的共和主义运动的推动下，不断争取获得完全自治权。以布尔人为多数的南非也是如此。就这样，自治领的地位不断发生着变化，情况也得到了改善，直到它们都成了英国的姐妹国家——英联邦国家。这是一个好消息，它无疑代表了一种进步，各国朝着政治地位平等的目标又进了一步。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平等而非事实上的平等。英联邦自治领在经济上还是受到英国以及英国资本的束缚，很容易被迫承受经济压力。同时，随着英联邦自治领的发展，它们的经济利益往往会与英国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因此，整个英帝国的力量在逐渐变弱。由于帝国瓦解的威胁迫在眉睫，英国同意放松对自治领的限制，承认了自治领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因为及时而明智的决定，英国避免了不少损失。但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将自治领与英国割裂开来的力量仍在发挥作用，这些力量主要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力量不断削弱着帝国的实力。这种情况以及英国毫无疑问的衰落，就是我给你讲过的大英帝国消失的原因。如果与英国拥有共同的传统、文化和种族的自治领都

很难再与英国产生联系的话，那么印度就更难了。因为印度的经济利益与英国的利益是直接冲突的，其中一方必须向另一方妥协。因此独立的印度无法接受它与英国之间的这种关系，因为这必然会导致印度的经济政策受英国经济政策的摆布。

英联邦国家，也就是独立的自治领成了政治上独立的地区，贫穷的附属国印度则还不是。爱尔兰条约意味着英国资本可以继续剥削爱尔兰，这是一个共和国发生骚乱背后的真正问题所在。德·瓦勒拉以及共和主义者代表了贫穷的农民、地位较低的中产阶级以及贫穷的知识分子；科斯格雷夫以及自由邦人民代表的是较富有的中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阶级都对英国贸易很感兴趣，英国资本对他们也很感兴趣。

过了一段时间，德·瓦勒拉决定改变策略。他和他的党派进入了爱尔兰众议院，进行了宣誓效忠仪式，同时声称，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形式上的需要，当他们取得多数席位后将会废除这份誓言。在1932年初的又一次选举中，德·瓦勒拉在自由邦议会真的赢得了多数席位，于是立即着手执行自己的计划。争取成立共和国的战斗依然在继续，但是斗争方式发生了变化。德·瓦勒拉提议废除宣誓效忠的誓言，还告诉英国政府他不会再向他们支付土地年金。我想我告诉过你，这些年金是什么。当英国从大地主手中收回了爱尔兰土地的时候，这些大地主得到了巨额的补偿，而这些补偿转嫁给了取得土地的农民，他们必须每年支付这些补偿金。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一代人以上的时间，但是这种情况依然还在持续。德·瓦勒拉表示他拒绝再支付这笔钱。

这很快演变成了一场与英国政府的冲突，英国进行了公开抗议。英国人首先抗议说，德·瓦勒拉废除宣誓效忠的做法违反了1921年签订的爱尔兰条约。德·瓦勒拉则说，如果爱尔兰像其他自治领一样和英国成了姐妹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权改变宪法，那么显然爱尔兰也可

以改变或者去除宪法中的誓言。这与1921年的条约并不冲突。如果爱尔兰没有这个权利，那么它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英国的附属国。

其次，英国政府对拒缴土地年金提出了更强烈的抗议，认为这是严重违反约定和责任的行为。德·瓦勒拉对此同样予以了否认，法律界也进行了有关的辩论，在这里就不必展开了。缴土地年金的时限到来的时候，英国并未收到钱款，于是再次与爱尔兰开战。这是一场经济战。英国对爱尔兰出口到英国的商品征收高额的进口关税，希望以此打击生产产品出口英国的爱尔兰农民，并以此逼迫爱尔兰政府做出妥协。像往常一样，英国开始使用它的大棒政策去胁迫对手，但是这种方式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奏效了。爱尔兰政府进行了还击，对英国出口到爱尔兰的商品也征收了关税。这场经济战导致双方的农业和工业都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是受伤害的民族主义和各自的威望感使任何一方都不愿让步。

1933年初，爱尔兰又进行了一次选举，令英国政府愤怒的是，德·瓦勒拉这次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占有的席位比以前更多了。很显然，英国的经济高压政策并未成功。荒唐的是，英国政府在指责可恶的爱尔兰人不偿还债务的同时，自己又不愿意偿还他们拖欠美国的债务。

德·瓦勒拉如今成了爱尔兰政府首脑，他正带领他的国家一步步朝着成立共和国的目标迈进。宣誓效忠的誓言已经不复存在，土地年金也最终取消了，英国派驻爱尔兰的总督也离开了，德·瓦勒拉任命一位他的党派成员担任了这个不再重要的职位。争取成立共和国的斗争仍在继续，但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持续了几个世纪的英爱斗争虽然仍在继续，但是这种斗争的形式如今已经变成经济战了。

爱尔兰也许很快就会发展为一个共和国，但是这条路上还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德·瓦勒拉和他的党派希望实现整个爱尔兰的统一，建立一个共和国，一个属于全爱尔兰、包括阿尔斯特在内的中央政府。

爱尔兰本身就很小，不能再分割成两个更小的部分了。德·瓦勒拉面前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让阿尔斯特与爱尔兰其他地区合并。这不能通过武力解决。1914年英国政府的武力尝试差点儿导致了一场起义，自由邦当然无法强迫阿尔斯特，他们也没想过要这么做。德·瓦勒拉希望，他能够赢得阿尔斯特的好感，以此实现统一。这种想法过于乐观了，因为信奉新教的阿尔斯特依然不信任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

说明（1938年）：两国之间的经济战持续了几年之后，两国政府签订了一份协约，从而终止了这场经济战。这份解决了土地年金和其他经济契约问题的协约对自由邦非常有利。德·瓦勒拉先生进一步朝着成立共和国的目标迈进，与英国政府和王室断绝了很多联系。爱尔兰如今叫作爱尔兰共和国。爱尔兰共和国面临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统一问题，统一的范围包括阿尔斯特。然而，阿尔斯特依然不愿意与爱尔兰统一。

158 ——新土耳其从废墟中诞生

上一封信中我给你讲了爱尔兰为争取成立共和国而进行的勇敢斗争。爱尔兰和土耳其之间没有特殊的关系，但是今天我想到了新土耳其，所以我要给你讲讲有关它的事情。和爱尔兰一样，土耳其也在逆境中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抵抗。我们已经看到世界大战造成了三个帝国的灭亡，它们是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以及德意志帝国。而在土耳其，我们看到了第四个帝国的灭亡，那就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以及他的继任者们在600年前创建了这个帝国，因此他们的王朝比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或普鲁士和德国的霍亨索伦王朝都古老得多。他们与13世纪哈布斯堡王朝出现在同一时期，这两个古老的皇族都逐渐没落了。

世界大战中，土耳其战败的时间比德国早几天，并与协约国签订了单独的停战协议。整个国家实际上已经瓦解，帝国已不复存在，政府机器已经停止了运转。伊拉克和阿拉伯国家被分割出去，大部分在协约国的统治之下。君士坦丁堡也在协约国控制之下，英国舰队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抛锚停泊，骄傲地显示出英国的胜利之姿。到处都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军队，各个地方都潜伏着英国的秘密特工。土耳其要塞被拆除，其剩余的军队也被迫交出了武器。青年土耳其党领袖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塔拉特·贝格（Talaat Beg）以及其他几个人流亡到其他国家。业已沦为傀儡的苏丹哈里发瓦希德丁（Caliph Wahid-ud-din）决定，不管自己的国家发生什么，首先要自保性命。

另一位讨好英国政府的傀儡人物被任命为总理大臣。土耳其议会被迫解散了。

这就是土耳其在1918年末、1919年初的形势。土耳其人已经精疲力竭、精神崩溃。要记得他们曾经忍受了多么可怕的遭遇。在持续四年的世界大战之前，发生过巴尔干战争，而在那之前又是与意大利之间的战争，所有这些战争都紧随在青年土耳其党革命（Young Turk Revolution）之后，这场革命废黜了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建立了议会。土耳其人表现出了惊人的忍耐力，但是，近8年不间断的战争让他们无法承受，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无法承受的。所以，他们放弃所有的希望，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任由协约国宰割。

差不多两年之前，在世界大战时期，协约国曾与意大利达成秘密协议，承诺将士麦那（Smyrna）以及小亚细亚半岛西部划分给意大利。在这之前，君士坦丁堡在书面协议上就被赠送给了俄国，协约国瓜分了阿拉伯国家。有关小亚细亚半岛划分给意大利的这最后一份秘密协议必须得到俄国同意。让意大利遗憾的是，布尔什维克在此之前就夺取了政权，因此这份协议从未获得批准，这让意大利对它的同盟国感到非常厌恶和愤怒。

情况就是这样的。土耳其人似乎穷困潦倒，落魄不堪，从懦弱的苏丹到在他之下的人们，似乎都是如此。这个“欧洲病夫”气数已尽，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但是有一些土耳其人拒绝向命运和困境低头，无论他们的抵抗希望多么渺茫。他们默默地努力了一段时间，秘密地从协约国控制的仓库中收集到了武器和军需物资，并将它们经黑海运到了安纳托利亚（Anatolia，小亚细亚半岛）。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位，我的前几封信中提到过他的名字。

英国人一点也不喜欢穆斯塔法·凯末尔。他们怀疑他，企图抓捕他。受英国人控制的苏丹也不喜欢他。但苏丹认为，把他遣送到遥远的内陆地区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因此凯末尔帕夏被任命为东安纳托利亚（Eastern Anatolia）陆军总检察长。这只是个虚职，他的实际工作是帮助协约国获得土耳其士兵的武器。这对凯末尔来说是一个理想

的机会；他迫不及待，立即就走马上任了。还好他这么做了，因为就在他出发几小时之后，苏丹就改变了主意。他对凯末尔的畏惧突然令他局促不安；午夜时分，他捎信给英国人，让他们阻止凯末尔上任。但是凯末尔早已离开了。

凯末尔帕夏以及一小群土耳其人开始在安纳托利亚组织国民抵抗运动。一开始，他们的行动低调而谨慎，想要赢得驻扎在那里的军官的支持。表面上他们以苏丹特派员的身份行事，但是他们并不理睬从君士坦丁堡传来的命令。事态的发展对他们很有利。在高加索地区，英国人建立了一个亚美尼亚共和国（Armenian Republic），并承诺将土耳其东部各省并入其中（亚美尼亚共和国现在是苏维埃联盟之一）。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仇恨很深，相互屠杀的事情过去常常发生。土耳其人占据上风的时候，他们对亚美尼亚人的血腥屠杀更加残忍，特别是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如果现在土耳其人要接受亚美尼亚人统治，那就意味着他们将要遭受灭顶之灾。与其如此，还不如奋起战斗。因此安纳托利亚东部各省的土耳其人都愿意听从凯末尔帕夏的呼吁和规劝。

同时，另一件事，也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刺激了土耳其人。1919年初，意大利人想要让自己的军队在小亚细亚半岛登陆，以实现他们与法国和英国签订但未实现的秘密协约。英法两国并不情愿，当时他们不想支持意大利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们同意希腊军队占领士麦那，以便抢在意大利人之前先发制人。

为什么选择希腊军队？英法两国的军队都已厌战甚至有了反叛的倾向。他们想退伍并立刻返乡。希腊军队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希腊政府一直梦想着要霸占小亚细亚半岛和君士坦丁堡，复兴拜占庭帝国。有两位能力出众的希腊人恰好是劳合·乔治的朋友；劳合·乔治是当时的英国首相，在协约国委员会中权力很大。其中一人是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Venizelos），另一人是一位神秘人物，巴西尔·扎哈洛夫

爵士（Sir Basil Zaharoff），本名是巴西里奥斯·扎哈利亚斯（Basileios Zacharias）。1877年初，当他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他就成了英国一家军火公司在巴尔干半岛的代理人。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他是欧洲或许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各大政治家和各国政府都以他为荣。他被英国和法国授予了很高的头衔和称号。他拥有许多报社，似乎从幕后对各国政府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他远离公众的视野，因而公众对他知之甚少。他确实是一位典型的现代国际金融家，在很多国家和权势人物之间都游刃有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各个民主国家的政府。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想要自我管理，但他们身后存在着无形的、真正的控制力量——国际金融。

扎哈洛夫是如何变得这么富有和重要的呢？他的生意就是销售各类军火，这是一个暴利的行业，尤其是在巴尔干半岛。但很多人认为，他一开始就是英国秘密特工组织的一员。这对他的生意和政治活动都很有帮助，频繁的战争给他带来了数百万元的利润，所以他变成了当今世界一位神秘的大人物。

这位极其富有的神秘人以及韦尼泽洛斯设法说服劳合·乔治同意让希腊军队占领小亚细亚半岛。扎哈洛夫主动提出为这项工作提供资金。这是他所做的一项没有回报的投资，因为据说他浪费了1亿美元支持希腊人发动他们与土耳其的战争。

1919年5月，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战舰的掩护下，希腊军队随英国船只来到小亚细亚半岛并在士麦那登陆。很快这些军队——协约国给土耳其的一份大礼——开始了大规模的烧杀抢掠。这是一个恐怖统治时期，在这个良知被战争消磨殆尽的厌战世界，希腊的暴行还是引起了巨大震动。它给土耳其造成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因为土耳其人似乎看到了协约国为他们安排的宿命。屠杀他们和如此对待他们的竟然是他们的宿敌和曾经受他们统治的希腊人！土耳其人心中燃起了熊熊怒火，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兴起。实际上，据说尽管这场运动的领袖是凯

末尔帕夏，但希腊军队占领士麦那才是引发这场运动的真正原因。许多原本犹豫不定的土耳其军官此时也加入了这场运动，尽管这违反了苏丹的命令。因为苏丹当时已经下令逮捕穆斯塔法·凯末尔。

1919年9月，安纳托利亚的锡瓦斯（Sivas）举行了一次由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新抵抗运动变成了板上钉钉的事情，并成立了由凯末尔为主席的执行委员会。大会还通过了不向协约国妥协、以获得完整主权为目标的《国民公约》（*National Pact*）。这件事给身在君士坦丁堡的苏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丹同时也感到一丝恐惧。他答应召开一次议会会议并进行选举。锡瓦斯大会的与会代表在选举中取得了议会多数席位。凯末尔帕夏不信任君士坦丁堡的人，他建议新当选的代表不要前往。但是他们没有同意，在劳夫·贝格（Rauf Beg）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伊斯坦布尔（今后我将称君士坦丁堡为伊斯坦布尔）。他们这么做的一个原因是，协约国宣称，只要新议会在承认苏丹为议长的前提下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协约国就会承认这个新议会。尽管凯末尔本人也是代表之一，但是他并没有前往。

1920年1月，新议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很快他们提出了在锡瓦斯大会之上制定的《国民公约》。伊斯坦布尔的协约国代表对此非常不满，对新议会的其他很多做法也都很有意见。所以，六周之后，他们决定采用他们在埃及和其他国家常用的老一套、同时也是非常野蛮的手段。英军占领了伊斯坦布尔，宣布实行戒严，逮捕了包括劳夫·贝格在内的40位民族主义代表，并将他们驱逐到了马耳他（Malta）！英国人的这种温和做法只是要表明协约国不赞同这份《国民公约》。

土耳其再一次沸腾了。现在一切再清楚不过了，苏丹就是受英国人操纵的一个傀儡。许多土耳其代表逃往安哥拉，并在那里召开了名为“土耳其大国民议会”（Grand National Assembly of Turkey）的

会议。议会宣布成立土耳其国民政府，并宣称自英国人占领伊斯坦布尔的那一天开始，苏丹和他的伊斯坦布尔政府就失去了权力。

苏丹进行了还击，宣布凯末尔帕夏以及他的追随者为不法分子，驱逐他们并判他们死罪。此外，他还宣布，任何杀死凯末尔以及其追随者的人都是在完成神圣的职责，在现世和来世都会获得回报。要记住，苏丹也是宗教领袖哈里发，他竟然公开支持谋杀，这种行为是很可怕的事情。凯末尔帕夏不但是一个遭到追杀的反叛者，也是一个信仰的倒退者，任何一个盲目信仰者或宗教狂热分子都想要行刺他。苏丹利用自己的权力，想尽办法要消灭民族主义者。他宣布对他们展开圣战，并组织了一支非正规军“哈里发军队”与他们作战。信仰宗教的人受命组织了各种起义活动。各地起义不断，在一段时间内，全土耳其范围内爆发了内战。这是一场城镇之间、兄弟之间的激烈战争，敌对双方都表现出了残酷无情的一面。

同时，攻占了士麦那的希腊人表现得好像自己就是这个国家永远的主人似的，而且是很残暴的主人。他们把肥沃的山谷地带变成了荒芜之地，还赶走了几千名无家可归的土耳其人。他们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并没有遭遇到土耳其人的有效抵抗。

民族主义者面对的情况很不利——在国家内战中他们受到了宗教制裁，外国侵略者正在不断推进，在背后支持苏丹和希腊人的是协约国；协约国在击败德国之后，已经控制了整个世界。但是凯末尔帕夏对人们呼喊的口号是“要么赢，要么死”。一个美国人问他，如果民族主义者失败了，他会怎么办的时候，他回答说：“一个为了生存和独立而牺牲一切的国家永远不会失败。死气沉沉的国家才是失败的。”

1920年8月，协约国发表了他们为不幸的土耳其起草的条约——《色佛尔条约》（*Treaty of Sevres*）。这份条约旨在剥夺土耳其人独立的权利，就像给土耳其成为独立国家的理想判了死刑。不仅整个

国家被分割为几个部分，而且还要在伊斯坦布尔建立协约国委员会以便进行控制。整个国家陷入了悲痛之中，全国哀悼了一天，人们诵经祷告，还进行了联合休业罢工——也就是他们停止了一切工作。报纸全部加上了黑色边框。可是，苏丹的代表还是在这份条约上签了字。民族主义者当然不屑地拒绝承认该条约，条约的发表反而使他们的实力有所增强；为了挽救国家，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然而，谁会强迫反叛的土耳其执行这份条约呢？

协约国并不准备亲自上阵。他们已经遣散了军队，他们要面对他们各自国内的退伍士兵和工人的敌意和怒气。西欧国家中依然弥漫着一种革命的气息。此外，协约国相互之间争吵不断，围绕战利品的分配也是争执不休。在东边，英国必须面对危险的情况，法国多少也是如此。法国的委任统治国叙利亚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情绪，随时都有爆发动乱的可能。埃及已经爆发过一场血腥的动乱，并遭到了英国的镇压。在印度，1857年起义以来的第一次大型反抗运动已经成形，尽管这是一场和平的反抗运动。它就是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纲领之一就是哈里发制度或称基拉法特（Khilafat）的问题以及强加于土耳其的条约。

因此，我们看到，协约国无法将自己炮制的条约强加于土耳其，他们也不想容忍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对该条约的公开蔑视。他们寻求老朋友韦尼泽洛斯和扎哈洛夫的帮助，这两位绝对愿意代表希腊完成这项工作。没人能想到士气低沉的土耳其人会爆发多大的动乱，而且小亚细亚半岛这个战利品绝对值得拥有。希腊派出了更多军队，希土战争（Graeco-Turkish War）的规模也随之扩大了。1920年的夏秋两季，希腊人占了上风，给土耳其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凯末尔帕夏和他的伙伴尽全力在残缺的队伍中建立起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在最困难

的时候，他们得到了最及时的帮助。苏维埃俄国向他们提供了武器和资金，因为英国是他们两国的共同敌人。

凯末尔的力量不断增强，协约国开始对这场斗争的未来感到难以预测了，于是它们向对方开出了更好的条件。但是凯末尔的追随者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他们觉得这些条件还不够好。于是，协约国宣布中立，不再插手希土战争。将希腊人卷入这场战争后，协约国弃希腊于不顾了。实际上，法国，甚至是意大利，私下里都想要与土耳其人修好。英国人基本上还是站在希腊人一边，尽管英国提供的支持是非正式的。

1921年夏天，希腊人竭尽全力占领了土耳其首都安哥拉。在占领了一座又一座城镇之后，他们接近了目标，却最终在萨卡里亚河（Saqariah River）遭到了阻击。两军在这条河附近持续激战了三个星期；他们带着几个世纪以来的种族矛盾，毫不留情地互相攻击。这场战役极其考验双方的忍耐力；希腊人最终放弃并撤退的时候，土耳其人才勉强坚持了下来。希腊军队故技重施，转而烧毁并毁灭了一切，将200英里内的肥沃土地变为了荒漠。

土耳其军队只是险胜了萨卡里亚河之役。这绝不是最终的胜利，但它仍是近代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之一。它扭转了战局，它也是东西方之间的巨大冲突之一。过去2000多年里，东西方之间的冲突令小亚细亚半岛的每一寸土地都洒满了人类的鲜血。

两国军队都精疲力竭了，他们停下来休养生息、重新整顿。但是毫无疑问，凯末尔帕夏的幸运之星正在冉冉升起。法国政府与安哥拉签订了条约。安哥拉与苏维埃也签订了条约。得到法国的承认对穆斯塔法·凯末尔来说是精神和现实的双重胜利。叙利亚边境上的土耳其军队由此得以解放出来抗击希腊。英国政府仍在支持傀儡苏丹以及虚弱无力的伊斯坦布尔政府，因此法国的这份条约对它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1922年8月，经过缜密的部署，土耳其军队突然间向希腊军队发起攻击，并直接把希腊人赶到了海边。8天时间里，希腊人撤退了160英里；尽管如此，在撤退过程中他们展开了报复，杀害了他们遇到的所有土耳其男女老少。土耳其人也同样没有怜悯之情，但是他们俘获的战俘很少。不过，这些战俘中包括了希腊军队的总司令和他的手下。剩下的大部分希腊军队渡海逃离了士麦那，然而士麦那城大部分已被烧毁。

凯末尔帕夏乘胜追击，带领他的军队逼近伊斯坦布尔。在距离伊斯坦布尔不远的查纳卡（Chanak），英国军队将他拦了下来。在1922年9月的几天时间里，有消息说土耳其和英国之间会开战。但是英国人同意了土耳其人的几乎所有要求，双方于是签订了停战协议；协约国在协议中承诺，让留在色雷斯的所有希腊军队撤出土耳其。新土耳其背后一直有苏维埃俄国的身影，协约国并不想与土耳其交战，因为土耳其有俄国相助。

穆斯塔法·凯末尔胜利了，参加过1919年抵抗运动的几位反叛者如今可以与大国派出的代表们平等对话了。许多情况都对这群勇敢者有所帮助——战后人们的抵触情绪、协约国之间的纠纷、英国人全神贯注于印度和埃及的动乱、苏维埃俄国的协助、英国人对土耳其的侮辱——不过他们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他们争取独立的钢铁般意志和决心，以及土耳其农民与士兵令人惊叹的战斗能力。

双方代表在洛桑（Lausanne）召开了一次持续了数月的和平会议。代表英国的寇松勋爵专横跋扈、盛气凌人，而伊斯麦特帕夏（Ismet Pasha）则不为所动，态度坚定，只是默默地微笑，对他不愿意听到的内容充耳不闻，这使寇松勋爵十分恼火，两人之间的争斗尤其引人入胜。习惯于印度总督的行事方式并且十分高傲的寇松采用了各种强硬粗暴的方式，而这对于充耳不闻、保持微笑的伊斯麦特来说一点效果也没有。怒气冲冲的寇松退出了和会，和会因此破裂。后

来，和会再次召开，另一位英国代表代替寇松参加了第二次和会。土耳其人在《国民公约》提出的所有要求，除了一条之外，都得到了满足；1923年7月，双方签订了《洛桑条约》。苏维埃俄国的支持以及协约国之间的相互猜忌再一次帮了土耳其的忙。

获胜的勇士凯末尔帕夏几乎实现了他当初所有的目标。不过，他从一开始就很明智地确定了自己的最低要求，即使在取得成功的时候，他依然坚持着这些要求。他放弃了土耳其占领的非土耳其人领土，比如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他希望一个纯粹的土耳其——也就是土耳其人民居住的土地获得独立。他不希望土耳其人干涉其他国家事务，也不能容忍任何外国势力干涉土耳其事务。由此，土耳其成了一个紧凑、单一种族的国家。几年之后，在希腊人的建议下，发生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人口交换。留在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被送回了希腊；作为交换，生活在希腊的土耳其人也回到了土耳其。交换的希腊人大约有150万人，其中有许多家族世世代代分别在安纳托利亚和希腊生活了几个世纪。这是一次惊人的种族迁移，这次迁移严重地打击了土耳其的经济生活，因为希腊人对商业的贡献非常大。不过，从此以后，土耳其的种族更加单一、纯正了，它或许是目前亚洲或欧洲种族最单一的国家之一。

前面我说过，在《洛桑条约》中，土耳其人的要求全都实现了，只有一条除外。这一条就是得到伊拉克边境附近的摩苏尔省。由于双方就此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因此这个问题交由国际联盟讨论。摩苏尔极为重要，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区有石油，但是更大的原因还在于它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控制了摩苏尔的山脉就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土耳其、伊拉克和波斯，甚至是俄国的高加索地区。这对土耳其来说显然是很重要的。对于英国来说，它也同样重要，因为它可以成为一条攻击或抵抗苏维埃俄国的路线，以此保护英国通往印度的陆上及空中通道。看一看地图你就会发现摩苏尔的重要性有多大。国际联盟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偏向英国。土耳其人不同意，战争的传闻再次出

现。就在此时，1925年12月，俄国和土耳其签订了一份新条约。不过，安哥拉政府最终做了让步，摩苏尔成了新国家伊拉克的一座城市。伊拉克应该是一个独立国家，不过目前它仍是英国的受保护国，国内满是英国官员和顾问。

我还清楚地记得，差不多11年前，当听到穆斯塔法·凯末尔战胜希腊人的时候，我们是多么欢欣鼓舞啊。这就是1922年8月的阿菲永卡拉希萨尔（Afum Qarahisar）战役，他在这场战役中攻破了希腊人的防线，将希腊军队赶到了士麦那和海边。当时我们许多人都被关押在勒克瑙区监狱里，我们用能够收集到的零零碎碎的东西装饰我们的牢房，以此庆祝土耳其人的胜利，我们甚至还尝试在夜晚亮灯，但是没有成功。

159 ——穆斯塔法·凯末尔破除旧俗

我们关注了土耳其人的兴衰命运，从他们失败的黑暗时期一直到胜利的光明时期，我们发现，很奇怪的是，协约国特别是英国为了镇压和削弱土耳其人实力所采取的措施适得其反，实际上激励了民族主义者，让他们为日后的抵抗做好了准备。协约国努力分裂土耳其、将希腊军队送到士麦那、1920年3月英国军队武装夺权并逮捕和驱逐了民族主义领袖以及英国支持他们的傀儡苏丹对付民族主义者——所有这些情况都激起了土耳其人内心的怒火和狂热。企图侮辱和打击一个勇敢的民族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和他的同伴们在胜利之后都做了些什么呢？凯末尔帕夏并不相信老一套，他想要彻底改变土耳其。不过，尽管他胜利后受人爱戴，他仍需谨慎行事，因为要彻底改变一个民族建立在悠久传统和宗教信仰之上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想要废除苏丹制度以及哈里发制度，但是他的许多同僚不同意他这么做，而且土耳其人的普遍意见也很可能是反对这一变革的。没人希望傀儡苏丹瓦希德丁继续执政。人们憎恨他，认为他是企图将国家卖给外国人的卖国贼。但是许多人想要的是一种宪法框架之下的苏丹制度和哈里发制度，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大国民议会手上。凯末尔帕夏不愿妥协，他在等待自己的机会。

和以前一样，英国人给他提供了这个机会。筹备洛桑和会的时候，英国政府给伊斯坦布尔苏丹发了一份参会邀请，请他派代表参与讨论和平条款，还要求他将此邀请转达给安哥拉政府。英国这样随意地对待刚刚赢得战争胜利的安哥拉国民政府以及蓄意再次操控傀儡苏丹的行为，在土耳其引起了轰动，激怒了土耳其人。他们怀疑，英国

人和奸诈的苏丹还在搞阴谋。穆斯塔法·凯末尔马上利用国民的这种情绪，在1922年11月通过大国民议会废除了苏丹制度。但是哈里发制度依然存在，奥斯曼皇族宣布继续保留这一制度。此后不久，前苏丹瓦希德丁被指控犯有严重的叛国罪。他选择了逃避而非公开审判，悄悄地乘坐一辆英国救护车逃跑了，这辆车将他带到了一艘英国战舰上。大国民议会选举了他的堂兄弟阿卜杜勒·马吉德阁下（Abdul Majid Effendi）担任新哈里发，他成了一位没有政治权力的形式上的宗教领袖。

第二年，也就是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布成立，首都设在安哥拉。穆斯塔法·凯末尔被选为总统，他将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成了一位独裁领袖。大国民议会得执行他的命令。现在，他开始着手破除其他的旧传统，他对待宗教问题也并不客气。不少人对他的做法以及他的独裁专制感到不满，尤其是那些宗教信仰者，这些人聚集在安静而随和的新哈里发周围。凯末尔帕夏对此感到不快。他以略显粗暴的方式对待这位哈里发，并等待合适的时机采取进一步的重要举措。

很快，他又一次得到了机会，这个机会的到来方式很有意思。他收到了一封从伦敦寄来的信，这封信是阿迦汗（Aga Khan）和一位印度前法官埃米尔·阿里（Ameer Ali）共同书写的。他们声称他们所说的话代表了几百万印度穆斯林，他们对哈里发所受到的待遇表示抗议，要求哈里发受到尊重，得到更好的待遇。他们将这封信的复印件发给了伊斯坦布尔的几家报社，在原稿送达安哥拉之前，报纸上就刊印了这封信的内容。这封信里并没有任何攻击性的内容，但是凯末尔帕夏则利用这个机会，发起了一场巨大的抗议活动。他的机会终于来了，而他也想好好地利用这次机会。因此，这件事被认定为英国人分裂土耳其人的又一次阴谋。阿迦汗据称是英国人的特务，他居住在英国，对英国赛马特别感兴趣，并总是亲近英国的政治家们。他甚至不是一位正统的穆斯林，因为他是一个特殊教派的领袖。还有人进一步

指出，在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曾利用过他，让他与东方的苏丹-哈里发（Sultan-Caliph）形成一种平衡，并通过政治宣传等方式提升他的威望，还想让他成为印度穆斯林的领袖，以便掌控印度穆斯林。如果阿迦汗这么关心哈里发，那么战争期间向英国人发起圣战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支持哈里发呢？他当时站在了英国人一边反对哈里发。

通过这种手段，凯末尔帕夏引发了人们对这封来自伦敦的联名信的激烈情绪，这封信的作者们从未预料到这封信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并且凯末尔帕夏的做法让阿迦汗给人们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刊登了这封信的几位可怜的伊斯坦布尔报社编辑也被称为叛徒以及英国特工，并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引发了人们的强烈情绪之后，大国民议会在1924年3月的一天收到了废除哈里发的提案，同一天这项提案获得通过。自此，一个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古老制度从现代舞台上消失了。如今，不再会有“信徒的指挥官”了，至少土耳其不会再有了，因为土耳其现在是一个世俗国家。

不久之前，当英国人在战后威胁到哈里发制度的时候，印度曾为此出现过骚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基拉法特委员会（Khilafat Commitees），在这场骚动中，大量印度教教徒加入了穆斯林的行列，因为他们感到英国政府正在伤害伊斯兰教。如今，土耳其人自己却有意识地废除了哈里发制度；从此，伊斯兰教世界少了一位哈里发。凯末尔帕夏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土耳其必须与阿拉伯国家或印度断绝宗教上的牵连。他不希望伊斯兰教领导他的国家或者领导他。当印度和埃及的一些人建议他自己成为哈里发的时候，他也拒绝了。他的眼光紧盯着西方的欧洲，希望土耳其能尽快实现西化。他完全反对泛伊斯兰教主义思想。土耳其人的种族是图兰族（Turanian），因此泛图兰族主义（Pan-Turanianism）成了新的理想。也就是说，他摒弃了更为宽泛、更为松散的国际伊斯兰教理想，选择了更为严格、更为集中的纯民族主义束缚。

我告诉过你，土耳其如今已经是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异族人很少。不过，在土耳其东部，靠近伊拉克和波斯边境的地方仍有一个非土耳其种族，他们是库尔德人（Kurds），这是一个说伊朗语的古老种族。这些人所生活的地方库尔德斯坦（Kurdistan）被分割成了土耳其、波斯、伊拉克和摩苏尔地区的土地。总共300万库尔德人中，近半数仍生活在土耳其。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后不久，那里就发生了一次现代的民族主义运动。甚至在凡尔赛和会上，库尔德代表还提出过国家独立的要求。

1925年，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地区爆发了一次大型的起义。这时正是英国和土耳其就摩苏尔争端发生摩擦的时候，而摩苏尔本身也是一个库尔德人地区，毗邻土耳其发生起义的地区。土耳其人自然认为英国是这次起义的幕后支持者，认为英国特工煽动了宗教信仰更强的库尔德人来反对凯末尔帕夏的改革。很难说英国特工是否与这次起义有关，尽管当时土耳其发生的库尔德人动乱显然受到了英国政府的欢迎。然而，有一点很清楚，宗教传统与这次起义有很大的关系，同样，库尔德民族主义也与此有关。民族主义动机或许是最强的。

凯末尔帕夏立即大声疾呼，声称土耳其民族正处于危险之中，因为英国在背后支持库尔德人。他授意大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法规，规定无论是口头上还是书面上，凡是利用宗教引发大众情绪的人都被视为犯有严重的叛国罪，并要被处以极刑。清真寺内的宗教教义传授也遭到禁止，因为这有可能会破坏人们对共和国的忠诚之心。他毫不留情地镇压了库尔德人，成立了特别独立法庭，审判了成千上万的库尔德人。库尔德领袖谢赫·赛义德（Sheikh Said）、福阿德博士（Doctor Fuad）以及其他许多人都遭到了处决。他们临死的时候还在呼吁库尔德斯坦独立。

因此，不久之前还为争取自由而战的土耳其人压制了寻求自己自由的库尔德人。很奇怪，一种自卫的民族主义竟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攻

击性的民族主义，一场争取自由的战斗竟演变成了一场统治别人的战斗。1929年，库尔德人又发动了一次起义，而起义再次遭到了镇压，至少目前是这样的。不过，一个人又怎么能永远压制一个坚持独立并准备为之付出一切的民族呢？

于是，凯末尔帕夏斥责那些大国民议会内部或外部反对他政策的人。对独裁权力的渴望总是在不断增长，永远得不到满足，也容不下任何反对意见。因此，穆斯塔法·凯末尔对一切反对意见都感到愤怒；一些狂热分子企图刺杀他，这使事态的发展达到了高潮。特别独立法庭在全土耳其审判并严厉惩罚所有反对帕夏勇士的人。即使是大国民议会中的大人物——凯末尔原先的民族主义同伴们——如果反对他，也不能幸免。被英国人流放到马耳他、之后当过土耳其首相的劳夫·贝格在不在场的情况下被宣告有罪。许多在争取独立的战争中英勇奋战的其他重要领袖和将军都蒙受了屈辱，受到了惩罚，有些人甚至被处决了。指控他们的理由就是他们与库尔德人甚至可能和宿敌英国合谋破坏国家安全。

扫清了一切反对力量之后，穆斯塔法·凯末尔如今已是一位毫无争议的独裁者，伊斯麦特帕夏成了他的得力助手。现在他开始将各种想法一一付诸实施。他从一件小事开始做起，但这也是一件极具代表性的事。他抨击了土耳其毡帽，这种头饰是土耳其人的象征，某种程度上也是穆斯林的象征。他小心翼翼地开始从军队入手。然后，他自己戴着礼帽出现在公众面前，这引起了人群的一阵惊讶；最后他把戴土耳其毡帽的行为规定为一种犯罪行为！听上去如此重视头饰是一件很愚蠢的事。人们头脑中的想法才更为重要，而非人们头上戴的饰物。不过，有时候小事会成为大事的象征，凯末尔帕夏通过抨击一个对人无害的毡帽，意在攻击旧习俗和旧传统。这个问题引发了一些骚乱，不过这些骚乱都被平息了，参加骚乱的人们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取得了第一个胜利之后，穆斯塔法·凯末尔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他关闭并遣散了所有的寺院和宗教团体，将他们所有的财产充公。这些寺庙里的僧人不得不以工作谋生。就连他们与众不同的服饰也遭到了禁止。

在这之前，穆斯林宗教学校已经被废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创办的世俗学校。土耳其还出现了许多外国学校和学院。这些学校也不得进行宗教教育，如有违反，它们也必须被关闭。

土耳其法律的改变非常大。迄今为止，法律在许多问题上都是以伊斯兰教教法《古兰经》的教义为基础的。如今土耳其法律完全采用了《瑞士民法典》（*Swiss Civil Code*）、《意大利刑法》（*Italian Penal Code*）以及《德国商业法典》（*German Commercial Code*）。这意味着，管理婚姻、遗产继承等方面的属人法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有关这些问题的传统伊斯兰法律都被改变了。一夫多妻制也被废止了。

与宗教习俗相悖的另一个变化就是鼓励人像的绘画和雕刻。在伊斯兰教中，这些都是被禁止的。穆斯塔法·凯末尔为此开办了艺术学校，招收男女学生。

自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之后，土耳其妇女在争取自由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凯末尔帕夏非常支持解除妇女各方面的束缚。土耳其成立了一个妇女权利保护协会（Society for the Defence of the Rights of Women），妇女们得到了很多工作机会。妇女们的面纱是第一个受攻击的对象，很快面纱就不再出现了。妇女们必须得有一个扯下面纱的机会。凯末尔帕夏给了她们这个机会，于是面纱就被扯下来了。他也非常推崇欧洲舞蹈。不仅是因为他自己很喜欢，他认为这也能代表妇女的解放和西方的文明。礼帽和舞蹈成了进步与文明的口号！它们并不能很好地代表西方，不过至少表面上它们起到了作用，土耳其人改变了头饰、服饰以及生活方式。在与世隔绝的状况下成长

起来的一代妇女，在短短几年内突然转变成了律师、教师、医生和法官。伊斯坦布尔街头还出现了女警！一件事给另一件事带来的影响是非常神奇的。土耳其采用了拉丁字母表，这使打字机的利用率越来越高，也意味着需要更多速记打字员，因此更多的妇女得到了工作机会。

儿童们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在宗教学校里接受那种死记硬背式的教育，而是得到了各种形式的鼓励，努力成为自立和能干的公民。土耳其现在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制度，叫作“儿童周”（Children’s Week）。据说，每年有一周时间，每一位政府官员都要在名义上由一个孩子代替他的职位，整个国家都由孩子们管理。我不知道这怎么行得通，不过它是一个很棒的主意，我相信，尽管有一些孩子很淘气也缺乏经验，但是很多成年人以及很多古板而严肃的统治者和官员的行为方式要比这些孩子愚蠢得多。

另一个代表了土耳其管理者们新观念的、虽然细微却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取消了“额手礼”。他们明确表示，握手是一种更文明的问候方式，未来应该广泛使用。

然后，凯末尔帕夏开始猛烈抨击土耳其的语言，更确切地说是其中他认为的外国语言元素。土耳其语是用阿拉伯文字书写的，凯末尔帕夏认为，这既不容易书写又不是土耳其本土的东西。在中亚，苏维埃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因为许多鞑靼人的文字来自阿拉伯语或波斯语。1924年，苏维埃在巴库（Baku）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会议决定，中亚的鞑靼语必须采用拉丁语的书写方式。也就是说，原本的语言保持不变，但是要用拉丁字母或者罗马字母进行书写。人们还设计出一种特别的标注系统，用以表现这些语言的特殊发音。穆斯塔法·凯末尔被这种系统所吸引，并学会了它。他把这种系统应用于土耳其语，并亲自发起了一场使用新语言的运动。经过几年时间的宣传和教学，法律规定了一个最后期限，在这之后一律禁止使

用阿拉伯字母，强制使用拉丁字母。报纸、书籍和一切书面文字都要用拉丁字母书写。16岁至40岁的人都要到学校里学习拉丁字母表。不会新文字的政府官员就会被解雇。如果囚犯不会用新文字阅读或书写的话，即使刑期满了也不能出狱！一位独裁者可以将专横的政策实施得很彻底，如果他碰巧又是一个受人欢迎的独裁者，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很少有其他政府敢这么干涉人民的生活。

从此，土耳其文字开始使用拉丁字母，不过很快又发生了另一个变化。人们发现，使用这种新字母很难书写阿拉伯词汇和波斯词汇；新字母无法体现这两种语言的特殊发音和精妙之处。纯正的土耳其词汇并没有这么精妙，它们比较粗糙、直接、有力，很容易用新字母书写出来。因此，土耳其决定放弃使用阿拉伯词汇和波斯词汇，用纯正的土耳其词汇代替它们。当然，这一决定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原因。我告诉过你，凯末尔帕夏想要切断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联系。充满阿拉伯词汇和波斯词汇的旧土耳其语很适合奥斯曼帝国宫廷内浮华而讲究的生活，但并不适合崭新而有力的土耳其共和国。因此，精妙的词汇遭到了舍弃，博学的教授等学者来到乡村，学习农民的语言，寻找土耳其语系的词汇。这种改变至今仍在进行。如果在我们印度的北部发生这种改变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要舍弃我们在勒克瑙和德里所使用的华而不实的印度斯坦语——过去宫廷生活遗留下来的语言——并用许多乡土味儿很浓的语言去代替它。

语言的这些改变也意味着城镇名称和人名的变化。如你所知，君士坦丁堡现在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安哥拉改名为安卡拉，士麦那改名为伊兹密尔（Ismir）。土耳其人的名字通常都源于阿拉伯语——“穆斯塔法·凯末尔”这个名字本身就是阿拉伯名字。新的趋势就是给土耳其人取纯正的土耳其名字。

有一个变化带来了麻烦，那就是伊斯兰教祈祷文以及宣礼也必须使用土耳其语。以前穆斯林一直使用最初的阿拉伯语背诵这些祈祷

文，甚至在如今的印度也是如此。因此，很多大毛拉（moulvis）以及清真寺负责人都认为这种创新很不合适，他们继续使用阿拉伯语做祷告。这个问题引发过骚乱，现在还时有发生。但是，凯末尔帕夏领导的土耳其政府就像对付其他反对意见一样，无情地镇压了这些骚乱。

过去十年中发生的所有这些社会乱象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旧传统和宗教社团完全无关的新一代人正在成长起来。然而，尽管这些变化很显著，但它们并没有给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带来太大的影响。除了一些表面上的细微变化，经济基础依然没有发生改变。凯末尔帕夏并不是经济学家，对苏维埃俄国发生的那种激进的变化也没什么兴趣。因此，尽管他在政治上与苏维埃结成了联盟关系，经济上他却与共产主义保持着距离。他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似乎都来源于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

而且，除了专业人士阶级之外，土耳其也没有实力雄厚的中产阶级。将希腊人和其他外国人送走之后，商业和贸易也出现了滑坡。不过，比起牺牲自己的经济独立权，土耳其政府更愿意接受本国的贫困和缓慢的工业发展。而且土耳其政府担心，如果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入土耳其，就意味着他们要牺牲经济独立权，并且会遭到外国人的剥削，因此他们不让外国企业进入土耳其。他们还对外国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许多产业都实现了国有化，即政府代表人民拥有并控制这些产业。铁路建设的速度还比较合理。

凯末尔帕夏对农业更感兴趣，因为土耳其农民一直是土耳其国民以及军队的支柱。土耳其建造了示范性农场，开始使用拖拉机，还成立了农民合作社。

土耳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也遭受了贸易萧条，难以保持收支平衡。不过，在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和独裁者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带领下，它正在不慌不忙、步伐稳健地向前发展。凯末尔被赐予了

“阿塔土克”这一封号，意思是土耳其之父，如今他已经以这个封号闻名于世了。

160 ——全印度追随着甘地

现在，我要给你讲讲印度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比起国外所发生的事，我们自然对印度的事情更感兴趣，我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讲太多的细节问题。然而，除了我们的个人兴趣，就像我说过的那样，如今的印度是世界上麻烦最大的国家之一。它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的受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英帝国主义的整个体系都压在它身上，英国这个成功的例子吸引了很多别的国家也走上了帝国主义冒险的道路。

在上一封介绍印度的信里，我给你讲过印度在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变化，讲过印度工业和印度资产阶级的发展，以及英国对印度工业政策的改变。印度给英国带来的工业和商业压力不断增加，政治压力也是如此。所有东方国家都产生了政治觉醒，整个世界在战后都出现了动荡不安的情况。在印度，偶尔会发生暴力革命活动。人们抱有很高的期望。英国政府本身也意识到必须要采取一些行动，于是他们开展了政治领域的调查，然后在《孟塔古-切姆斯福德报告》中提出了一些改变的建议，在经济领域他们对崛起的中产阶级施以小恩小惠，同时小心翼翼地将权力和剥削手段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战后的一段短时期内，贸易得到了发展，出现了一段繁荣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赚取了高额利润，特别是孟加拉的黄麻买卖。利润率通常是百分之百。价格上涨也使工资有所提高，只是提高的额度微乎其微。随着价格的上涨，佃户要支付给地主的租金也水涨船高。之后，价格下跌，贸易开始下滑。产业工人和农民的状况变得更糟，人们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由于工厂的状况越来越艰难，出现了很多工人罢工的现象。在奥德，印度贵族制度控制下的佃户状况尤其糟糕，

那里发生了一场几乎是自发的大型农民运动。在受过教育的下层中产阶级中失业现象不断加剧，使他们遭受了很深的苦难。

这就是战后初期的经济背景，如果你记住了这一点，它会帮助你理解政治形势的发展。国家中出现了好战精神，这种精神以各种方式显示出来。产业劳工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之后还成立了全印度工会代表大会（All-India Trade Union Congress）；小地主和自耕农对政府很不满，他们十分期待政治上的行动；就连佃户这样众所周知的可怜虫都想要改变；中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失业者，明确地要寻求政治解决方式，小部分人参加了革命活动。印度教教徒、穆斯林、锡克教教徒以及其他很多人也同样受了这些情况的影响，因为尽管宗教各有不同，但是经济状况都差不多。除此之外，对抗土耳其的战争使穆斯林受到严重的惊吓，他们也担心英国政府会占领阿拉伯半岛以及圣城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犹太人、基督徒以及穆斯林的圣地）。

因此，印度在战后耐心地等待着；它心怀怨恨，略带攻击性，并不抱有太大的希望但依然有所期待。焦急地等待了几个月后，英国新政策的最初成果以一份提案的形式体现了出来，这份提案建议政府批准几部控制革命运动的特别法案。人们得到的不是更多的自由，而是更大的约束。这些法案由一个委员会起草，被称为《罗拉特法案》（*Rowlat Bills*）。不过，很快全国各地都把这些法案称为“黑色法案”（Black Bills），每一处的每一个印度人甚至包括温和派都公开谴责这些法案。它们使政府和警察部门有权逮捕任何他们怀疑的人，不经审讯或经过秘密审讯即可关押这些人。当时有一句著名的话形容这些法案：“无律师，无审理，无判决。”在不断壮大的反对法案的声势中，一位新领袖登场了，他就像政治界的一小片云彩，不断扩展，迅速延伸，最后覆盖了印度的整片天空。

这位新领袖就是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他在世界大战期间从南非回到了印度，和他的侨民同伴居住在萨巴尔马提（Sabarmati）的一处静修院内。他远离了政治。他甚至帮助过政府为战争征召军人。当然，他在南非组织的非暴力抵抗斗争使他在印度很有名气。1917年，在比哈尔邦查姆普兰地区（Champaran District），他成功地声援了悲惨的、受尽欧洲种植园主蹂躏的佃户。后来，他还维护了古吉拉特邦凯尔拉（Kaira）地区的农民。1919年初他患了重病。他的身体刚刚有所恢复的时候，全国各地展开了反《罗拉特法案》的运动。他也加入了公开反对的行列，发出了自己的呼声。

但是他的呼声与其他人有所不同。这个声音平缓而低沉，却能穿透人群的呐喊回响在人们耳畔；这个声音柔弱而温和，却似乎蕴含着钢铁般的坚毅力量；这个声音谦恭而恳切，却能体现出冷酷而令人生畏的一面；他所用的每个词都意义重大，仿佛体现出他的极度真诚。在平和而友好的语言背后，是力量，是跃跃欲试的行动以及不向错误屈服的决心。如今，我们对这个声音已经很熟悉了；在过去14年中，我们经常能听到这个声音。但是，在1919年2月和3月的时候，这个声音对我们来说还是新鲜的，我们并不清楚该怎么理解它，但是我们为之感到激动。它与我们的策略不一样，我们的策略只是发出吵闹的谴责之声，发表冗长的演讲，结尾处往往是一些毫无效果、毫无作用、没人会认真对待的抗议决心。而这个声音是行动的策略，而非空谈的策略。

圣雄甘地组织了一个非暴力不合作团队（Satyagraha Sabha），参与者都是准备违反特定的法律并准备为此入狱的人。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想法，很多人感到兴奋，但很多人退缩了。如今，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这甚至成了我们生活中一个固定而有规律的部分！

甘地用他惯常的方式给印度总督发去了谦恭的恳求及警告。当他发现英国政府决意要在全印度人的反对声中通过法案的时候，他呼吁，在法案通过之后的第一个周日举行全印度哀悼日活动，那一天全印度都要休业罢工，无论是商业还是集会都要停止。这就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开端，因此1919年4月6日这个周日被视作整个国家所有城镇和乡村的“非暴力抵抗日”（Satyagraha Day）。这是第一场全印度参与的此类型的示威运动，形形色色的个人与团体参与了这场令人赞叹且印象深刻的运动。我们这些为了这场联合休业罢工运动而努力的人都对这场运动所取得的成功感到吃惊。我们在城市中接触到的人很有限，但是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风气，而这种风气成功地传播到了我们这个庞大国家的每一个遥远的村庄。乡村居民第一次和城镇工人一起参加了大规模的政治示威活动。

由于人们搞错了日期，4月6日之前的一个礼拜，也就是前一个周日3月31日，德里的联合休业罢工就提前开始了。德里的印度教教徒以及穆斯林在这段时间展现出了非凡的友谊和善意，人们目睹了圣社的伟大领袖斯瓦米· 施尔塔南德（Swami Shraddhanand）在著名的德里贾玛清真寺（Jame Masjid）向众多印度人发表演讲的壮观景象。3月31日这一天，警方以及军方试图驱散大街上的人群，他们向人群开枪，一些人倒在了枪口之下。身材伟岸、一身印度教遁世者装扮的斯瓦米· 施尔塔南德以自己的胸膛和无所畏惧的眼神面对月光集市（Chandni Chowk）里廓尔喀族士兵的刺刀。他幸免于难，他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让整个印度都感到无比激动和兴奋；然而，不幸的是，不到8年，他在自己的病床上被一个穆斯林狂热分子刺死了。

4月6日的非暴力抵抗日之后，事态发展得很快。4月10日阿姆利则发生了骚乱，一群手无寸铁、光着头的人在为他们被逮捕的领袖基奇鲁博士（Dr. Kitchlew）以及萨特亚帕尔博士（Dr. Satyapal）表达哀伤的时候，遭到军方射击，很多人遇害；于是这群人开始疯狂地报复，他们杀害了五六个无辜的、坐在办公室里的英国人，并烧毁了他

们的银行大楼。此后旁遮普似乎陷入了与世隔绝的境地。严格的审查将这里与印度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外界的信息无法传进来，人们也很难进入或者离开旁遮普。旁遮普还实行了戒严，给人们带来了持续几个月的痛苦。慢慢地，经过数周甚至数月折磨人的悬念，幕布最终拉开，可怕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在此，我就不给你讲旁遮普戒严期间发生的可怕事件了。全世界都得知了4月13日发生在阿姆利则的札连瓦拉园大屠杀。在这次大屠杀中，死伤人数多达数千人，札连瓦拉园成了死亡陷阱，没人得以幸免。“阿姆利则”这个词已经成了大屠杀的代名词。这次事件十分恶劣，然而，在旁遮普还发生过其他更为可耻的行动。

即使在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还是很难忘却这场残暴与恐怖的野蛮行为，不过它发生的原因并不难理解。身处印度的英国人总感觉他们生活在一座火山的边缘，这种感觉来自他们的统治天性。他们从不理解，也从未试着理解印度人的思想和内心。他们远离印度人，过着自己的生活，依靠着他们庞大而复杂的组织以及背后的势力。然而，在他们的自信心背后，总是有着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而印度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片未知的土地，尽管他们已经统治了这片土地一个半世纪之久。他们还清楚地记得1857年起义，他们感到自己仿佛生活在一个陌生而怀有敌意的国家，这个国家随时都有可能攻击他们，撕碎他们。他们的情况大体就是这样的。当他们看到这个国家发生了一场大型的、反对他们的起义行动时，他们的恐惧情绪变得越发强烈了。身在拉合尔的旁遮普的高级官员听闻了4月10日发生在阿姆利则的流血事件之后，他们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他们认为，这就像1857年起义一样，是另一场大规模的血腥起义，他们觉得所有英国人的生命都危在旦夕。他们勃然大怒，于是决定实施恐怖行动。札连瓦拉园大屠杀、戒严以及之后发生的所有一切都是这种思想态度的结果。

尽管我们不能原谅，但可以理解一个受到惊吓的人做出的不端行为，即使这种惊吓是没有实际理由的。但更令印度震惊与愤怒的是，几个月之后，下令在阿姆利则开枪射击的戴尔将军（General Dyer）为自己的行为轻蔑地做出了辩解，并且残忍地忽视了几千名受伤的印度民众。“那与我无关。”他这样说道。身在英国的一些人和政府委婉地批评了戴尔，但英国上议院的一次会议讨论则表露了英国统治阶级的普遍态度。在这场讨论中，戴尔受到了褒奖。所有这些情况都点燃了印度的怒火，整个国家都对旁遮普发生的惨案感到痛心疾首。政府和国大党都指派了调查委员会对旁遮普发生的真实情况进行调查。全国都在等待他们的调查报告。

从那一年开始，4月13日便成了印度的“国民日”（National Day），从4月6日至4月13日的8天时间为印度的“国民周”（National Week）。现在，札连瓦拉园已经是一个政治圣地了。如今它已成为一座富有魅力的花园，曾经发生的恐怖事件已经过去了，但是悲惨的记忆依然存在。

就在那一年，1919年12月，因为机缘巧合，国大党选择在阿姆利则召开年会。这次年会并未达成任何重大决议，因为人们还在等待调查结果，但是很显然，国大党已经发生了变化。如今它具有了一种群众性的特征以及一种全新的活力，这令原有的一些国大党成员感到不安。与以往一样坚定不屈的罗卡曼尼亚·蒂拉克参加了他的最后一次大会，因为在下一次会议召开之前他就去世了。在民众中声望很高的甘地开始了他在国大党以及印度政治界中的长期领导时期。在戒严时期被卷入巨大阴谋案并被判处了长期监禁的许多领导者获得了赦免，著名的阿里兄弟（Ali Brothers）在遭遇多年拘留之后也刚刚被释放出来，这些领导者走出监狱后也直接参加了年会。

第二年，国大党果断行动，采纳了甘地的不合作主义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在加尔各答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被采纳，后又在那格

浦尔（Nagpur）年会上正式得到确认。这种斗争方式是完全和平的，正如它的全称——“非暴力不合作”，它的基本原则是拒绝配合政府对印度的管理和剥削。一开始他们开展了一些联合抵制行动——抵制外国政府赋予的封号，抵制官方的行政职务及类似的职责，律师与诉讼当事人联合抵制法院、抵制官方创办的学校和学院以及抵制在孟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中新成立的政务机构。后来，联合抵制行动又扩展到国民、军事以及税务领域。他们积极地将重点放在手工纺纱和手织棉布方面，并以仲裁法庭代替法院。其他两个重点则是印度教教徒-穆斯林的团结一致以及废除印度教教徒的贱民制度。

国大党还修改了宪法，成了一个具有行动力的实体，同时为自己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这个指导思想与国大党一直以来的行动是完全不同的；的确，它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思想，因为发生在南非的非暴力抵抗的影响范围是很有限的。它对于一些人来说是直接而沉重的牺牲，例如受到号召而放弃事业的律师，以及受到号召而抵制政府开办的学院的学生。人们很难评判这一指导思想，因为没有任何比较标准。国大党中的元老以及富有经验的领导者们会产生犹豫、充满怀疑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中最伟大的罗卡曼尼亚·蒂拉克在此之前已经去世了。在其他主要的国大党领袖中，只有一位莫迪拉尔·尼赫鲁（Motilal Nehru）在最初阶段支持甘地。不过，普通的国大党成员、街头的人们以及广大群众的热情是毫无疑问的。甘地激发了他们的热情，几乎使他们进入了痴迷状态，他们高喊“圣雄甘地必胜”，表现出对非暴力不合作这一新福音的支持。穆斯林和其他人一样对它也展现出了热情。实际上，阿里兄弟领导下的基拉法特委员会甚至在国大党之前就已经采纳了这个指导思想。很快，大众的热情以及早期行动取得的成功使大多数国大党元老级的领导者加入了进来。

在这几封信中，我无法详述这种全新行动或其思想基础的优缺点，要说明这个问题实在太复杂了，也许没人能够完美地做到这一点，除了这场行动的创始人——甘地。不过，我们还是要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去审视它，试着理解它如此迅速而成功地传播的真正原因。

我已经给你讲过民众在外国剥削之下所承担的经济压力、他们不断恶化的生活状况以及中产阶级不断增长的失业率。有什么补救方法呢？民族主义的发展使人们在思想上认为政治自由是十分必要的。自由十分必要，因为依赖他人及受人奴役是很丢脸的，也因为像蒂拉克所说的，自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们必须拥有自由，同时自由也是为了减轻我们的同胞所承受的贫困负担。我们怎样获得自由呢？显然，我们不能奢望保持沉默、静静等待就能获得自由。同样，国大党一直以来热情采用的仅仅通过抗议和祈求的方式不仅有损人们的尊严，也无法奏效。历史上这些方式从未成功地使一个统治阶级或特权阶级失去过权力。事实上，历史告诉我们，受奴役的民族和阶级都是通过暴力起义和反抗获得自由的。

武装起义对印度人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武器装备，我们中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如何使用武器。此外，在暴力的斗争中，英国政府或其他任何国家有组织的势力都要比起义反抗它们的力量强大得多。军队可能会发生兵变，但是手无寸铁的人们则不会造反或与武装力量对抗。另一方面，使用炸弹或手枪杀死个别官员的个人恐怖主义是令人名誉扫地的行为。这种做法会让人士气低落，无论它给个人带来的恐惧有多大，也绝对无法撼动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府。我告诉过你，就连俄国革命者都放弃了这种个人暴力行为。

那么，还剩下什么呢？俄国的革命取得了成功，建立了属于工人的共和国，俄国运用的方式是在军队支持下的大规模群众行动。不过，即使在俄国，苏维埃取得成功的时期正是整个国家和旧政府因为战争而崩溃的时候，苏维埃没有遇到什么反对的力量。此外，在当时

的印度，没什么人知道俄国或者马克思主义，更别提从工人或农民的角度思考问题了。

因此，这些方式都行不通，印度似乎没有办法摆脱令人难以忍受的、有辱尊严的奴役状况了。敏感的人们感到无比沮丧和无助。就在此时，甘地提出了他的不合作运动的指导思想。像爱尔兰的新芬党一样，他的思想教导我们要依靠自己来增进自己的力量，显然这是一个给政府施加压力的非常有效的方式。政府的管理很大程度上依赖印度人的合作，无论这种合作是自愿的还是不情愿的，如果印度人不再合作而进行联合抵制的话，这在理论上很有可能会导致整个政府结构垮台。即使不合作运动无法做到这一点，它无疑也能够对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同时增强人们的力量。这种方式完全是和平的，然而它并非只是不抵抗主义。非暴力抵抗尽管是非暴力的，但它是一种明确的、对被认为错误的事情进行抵抗的形式。实际上，它是一种和平的反抗，是一种十分文明的斗争方式，然而它对国家的稳定来说是很危险的。它是一种发挥群众作用的有效方式，它似乎能展现印度人的特别才能。它让我们表现十分出色，而让对手理亏。它让我们摆脱了自己的恐惧，过去我们从不敢正视别人，现在我们开始正视别人了，也开始坦率而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了。我们似乎卸下了思想上的重担，这种语言上与行动上的新自由使我们充满了自信与力量。最后一点是，以往，尖锐的种族仇恨与民族仇恨常常会伴随着斗争而产生，和平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些仇恨的扩大，并因此使问题的最终解决变得更加容易。

因此，这种不合作运动的指导思想加上甘地的卓越人格引发了全国的想象，使国家充满了希望。它传播开来，随着它的到来，人们原先低落的情绪消失了。新国大党吸引了国家中充满活力的一群人，它的力量和威望都得到了增强。

同时，在孟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计划下成立了新的政务机构和议会。现在被称为自由党的温和派分子十分欢迎这些机构的出现，并成了其中的部长和其他官员。他们实际上并入了政府，民众都不支持他们。国大党一直以来都是抵制这些机构的，整个国家并不在意这些机构的存在。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外部的城镇和乡村所发生的真正斗争之上。国大党的众多工人成员第一次来到乡村，并在那里建立了国大党委员会，帮助唤醒村民们的政治觉悟。

事情发展到了关键时刻，1921年12月，冲突难以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发生在威尔士亲王访问印度的时候，国大党对这次访问进行了抵制。全印度许多人遭到逮捕，监狱中挤满了数千名“政治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那时第一次经历了牢狱之灾。就连国大党的民选主席戴希班度·吉德伦金·达斯（Deshbandhu Chitaranjan Das）也被逮捕了，哈基姆·阿吉马尔汗（Hakim Ajmal Khan）在艾哈迈达巴德年会期间接替了他的会议主席职务。不过，那时甘地没有被捕，这次行动开展得如火如荼，那些随时准备被捕的人的数量总是超过实际被捕的人数。随着为人熟知的领袖和工人被捕入狱，新的、毫无经验的甚至令人厌恶的人（有时甚至是秘密警察特工！）取代了他们的位置，造成了组织的混乱，还导致了暴力行为的出现。1922年初，联合省戈勒克布尔（Gorakhpur）附近的曹里曹拉（Chauri Chaura）村发生了一起农民与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最终农民们烧毁了警察局，一些警察死于其中。甘地对此事件以及其他一些事件深感震惊，这些事件表明，不合作运动出现了组织混乱和暴力的倾向，在甘地的建议下，国大党执行委员会暂停了触犯法律的不合作运动。此后不久，甘地自己也遭到逮捕和审判，被判处了6年监禁。这件事发生在1922年3月，不合作运动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

161 —— 20世纪20年代的印度

1922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被迫暂停，不合作运动的第一阶段就结束了，不过这次运动的暂停令很多国大党成员不满。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意识觉醒，约有3万名公民抵抗者被捕入狱。难道就因为一些行为过激的可怜农民做出了错误的举动，所有这些付出就都是毫无价值的吗？这场进行到一半还未达到目标的运动就要突然暂停吗？自由依然遥不可及，英国政府还像以往一样运转着。德里和各省都有立法委员会，但是没有实权，国大党对这些机构进行了抵制。甘地还在狱中。

国大党内部关于下一步采取怎样的行动产生了很多争论，成立了一个提倡改变国大党策略的党派——印度自治党。他们建议，在坚持不合作纲领的同时，也应该在某一方面进行调整。应该停止对立法委员会的抵制。这导致国大党内部出现分裂，但是最终印度自治党获得了成功。

国大党成员进入这些立法委员会，发表了大胆的演说，拒绝了各种供给。不过，政府漠视了他们的决心和决议，印度总督提供了被议会放弃的预算拨款。国大党成员在立法机构中的行动达到了短暂的宣传效果，但是他们的行动也意味着他们降低了这场运动的基调。他们脱离了民众，向保守派做出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妥协。

让我们试着了解一下20世纪20年代引起印度轰动的一些不同的力量和运动吧。

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印度教教徒-穆斯林问题。两者间摩擦冲突不断，在印度北方的许多地区发生了暴动，仅仅是因为一些小问题，比

如在清真寺前演奏音乐的权利等。在不合作运动时期曾经十分团结一致的双方突然之间发生了如此奇怪的变化。这是怎么回事？而他们当时团结一致的基础又是什么呢？

民族运动主要以经济困难与失业状况为基础。这使各方团体普遍产生了反英国政府的情绪以及实现印度自治或印度独立的模糊愿望。这种愤怒反抗的情绪形成了人们的共同纽带，因此才有了行动上的一致，但是不同的团体有着不同的动机。印度自治对于每个团体来说都有着不同的意义——失业的中产阶级渴望得到工作，农民想要减轻地主强加于他们的重担，等等。从宗教团体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看到，穆斯林全体加入这场运动的主要原因是基拉法特。这是一个仅仅影响到穆斯林的宗教问题，非穆斯林与此无关。然而甘地却采纳了这个宗教问题，并鼓励其他人也为此努力，因为他认为，帮助不幸的同胞是他的责任。他也希望以这种方式拉近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距离。穆斯林的普遍观点是实现穆斯林的民族主义或者穆斯林的国际主义，而非真正的民族主义。双方之间的矛盾暂时还不明显。

另一方面，印度教教徒的民族主义思想当然是印度教的民族主义。在这个方面（这与穆斯林的情况不同）很难在印度教的民族主义和真正的民族主义之间给出区别。两者是重叠的，因为印度是印度教教徒唯一的家园，他们在印度占有多数地位。因此，尽管每一方都代表着各自的民族主义，印度教教徒还是比穆斯林更容易成为热情的民族主义者。

第三，除了这两种宗教的、群体的民族主义种类之外，还存在着能够被称为真正的或印度的民族主义，严格地说，这才是唯一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形式。当然，参与这第三类民族主义的既有印度教教徒，又有穆斯林，还有其他人。这三种民族主义恰巧同时发生在

1920年至1922年之间，这段时间正是不合作运动进行的时候。这三条道路是相互分离的，但是在不合作运动中它们三者可以齐头并进。

英国政府对1921年发生的群众运动感到非常吃惊。尽管他们很早以前就对此有所察觉，但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通常使用的直接逮捕和惩罚的方式并不奏效，因为这正是国大党所希望的结果。因此他们的特务机关设计了一个从国大党内部削弱力量的计谋。警察特工和特务机关的人员潜入国大党委员会，通过煽动暴力行动制造麻烦。他们采用的另一个方法是派特工假扮苦行僧和托钵僧制造群体混乱。

当然，违背人们的意愿进行统治的政府往往会采用类似的方法。它们是帝国主义大国的惯用手段。这些方法获得了成功，这足以显示人们的软弱和落后，而不是因为相关政府罪孽深重。有能力分裂其他人，让他们相互冲突，进而削弱他们的力量并剥削他们，这本身就表示，这是一个优越的组织机构。只有当另一方出现不和与裂痕的时候，这种策略才能成功。尽管英国政府并未在印度制造印度教教徒-穆斯林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基本事实：他们让这个问题持续存在，并且阻挠双方为了团结而进行的不懈努力。

1922年，不合作运动暂停之后，情况对这种阴谋很有利。一场激烈的运动在未取得明显结果的情况下突然停止，从而导致了不良反应的出现。曾经齐头并进的三条道路开始出现分歧，彼此分离。基拉法特问题被搁置一边。在不合作运动期间被民众热情所压制的印度教和穆斯林的群体领袖们，再次走进公众视野，开始参与公共生活。失业的中产阶级穆斯林们觉得，印度教教徒垄断了所有的工作岗位，阻碍了他们的发展。因此，他们要求在各个方面得到区别对待以及独有的利益。从政治上说，印度教教徒-穆斯林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中产阶级问题以及一个争夺工作的问题。然而，它的影响却延伸到了群众之中。

印度教教徒基本上是境况较好的群体。由于在早前接受过英式教育，他们因而得到了大多数的政府工作。他们也更为富有。乡村资本

家或银行家是剥削小地主以及佃户的商人，他们慢慢地让这些剥削对象一无所有，自己占有了土地。无论是印度教教徒还是穆斯林的佃户与小地主，这些商人都同样进行剥削，不过他们对穆斯林的剥削更为普遍，特别是在一些以穆斯林农民为主的省份。机器制造的商品的传播对穆斯林群体的冲击可能比对印度教教徒的冲击更大，因为穆斯林拥有较多的工匠。所有这些因素都增加了印度这两个主要群体之间的矛盾，也增强了穆斯林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寄望于穆斯林群体而非国家。

穆斯林群体领袖提出的要求打破了印度实现真正民族统一的希望。为了在群体战线上与穆斯林斗争，印度教的群体组织也开始壮大。他们装作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其实他们与其他人一样，也是狭隘的宗派主义者。

国大党作为一个团体远离了群体组织，但是不少个体成员受到了影响。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试图停止这种群体的狂乱状况，但收效甚微；大规模的暴动时有发生。

给这种混乱局面火上浇油的是，出现了第三种类型的群体民族主义——锡克教民族主义。过去，锡克教教徒与印度教教徒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民族主义的觉醒也震撼了强壮的锡克教教徒，他们开始为自身更为清晰而独立的身份认同而努力。他们中有许多退伍士兵，这些人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大但组织性很强的群体，他们与印度大多数团体不同，比起空谈他们更愿意采取实际行动。他们中大部分是旁遮普的自耕农，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城镇银行家与其他城市利益者的威胁。这是他们想要获得独立的团体身份认同的真正动机。首先发生了阿卡利（Akali）运动，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阿卡利党人是锡克教教徒中积极而主动的一群人，他们关心宗教问题，或者说他们关心圣祠财产的归属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政府发生了冲突，在阿姆利则附近的古鲁嘉园（Guru-ka-bagh），他们展现出惊人的勇气与耐

力。阿卡利党武装分子遭到警察暴打，但他们丝毫不退让，也不向警察投降。阿卡利党人最终取得了胜利，获得了圣祠的所有权。之后他们转向政治界，和其他群体一样，为自己的利益提出了激进的要求。

各种群体的这些狭隘的群体情绪，或者如我所称的“群体民族主义”，是非常不恰当的。但是，它们又是极其自然的。不合作运动已经彻底震动了全印度，这种震动所产生的首要结果就是这些团体的觉醒以及印度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的民族主义的出现。还有其他一些小规模的群体也产生了自我意识，特别是所谓的“愁苦阶级”。这些人主要是乡村中无土地的劳工，他们长期受到印度教上层阶级的压制。当他们获得了自我意识之后，他们自然就会渴望摆脱自己的困境，也自然会怨恨几个世纪以来压迫他们的印度教教徒。

每个觉醒的群体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来看待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一个群体或团体往往是自私的，正如一个国家也是自私的一样，尽管团体或国家中的个人会有无私的观念。因此每个群体都想要得到更多的利益，这必然会导致冲突。随着群体之间的矛盾增加，各个群体中较为极端的群体领袖都站到了最前方，因为在盛怒之下，每个群体都会选择在提群体要求时声音最高的以及咒骂他人最厉害的人作为代表。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加剧冲突，特别是通过鼓动极端的群体领袖这一方式。因此，敌意不断扩散，我们似乎落入了一个没有出路的恶性循环。

当这些势力与破坏性的趋势在印度形成之时，甘地在耶拉伏达监狱（Yervade Prison）身患重病，必须接受手术。1924年初，他出狱了。对于群体矛盾他感到无比痛苦，几个月后，一场大型的暴动使他非常震惊，为此他绝食了21天。人们为了和谈举行了许多次“统一”大会，但都毫无结果。

这些群体争执和群体民族主义削弱了国大党以及委员会中的印度自治党。印度自治的理想退居幕后，因为大多数人都以自己团体的角

度来看待和讨论问题。尽量避免与任何一个团体站在一边的国大党，却遭到了民族主义者各方面的攻击。这个时期国大党的主要工作是一个平静的组织所从事的工作，例如乡村产业（手织棉布业），这种工作帮助国大党与农民大众保持着联系。

有关我们国家发生的群体矛盾我已经介绍了很多，因为它们是20世纪20年代印度政治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它们。

现在有一种趋势，就是太过于看重这些矛盾，一个印度教男孩和一个穆斯林男孩之间的任何一次争吵都会被看作一次群体争吵，任何一次小型的冲突都被公之于众。我们要记住，印度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在数以万计的城镇和乡村里，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和平相处，他们之间没有群体矛盾。这种矛盾通常仅限于几座城市，尽管有时也会波及乡村。我们还要记住，印度的群体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中产阶级问题，因为我们的政治由中产阶级主导——无论是在国大党中、在行政机构中，还是在报纸上以及在任何其他形式的活动中——中产阶级的地位都过分突出了。农民阶级还无法表达自己，最近几年他们才开始在乡村的国大党委员会、一些农民联合会及类似的地方发挥政治上的作用。城镇工人，特别是大型工厂中的工人，政治觉悟更高一些，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组织。不过，就连这些工人都要从中产阶级中挑选领导人，农民更是如此。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时期包括农民和工人在内的民众的状况吧。

战争使印度工业得以快速发展，这种发展在战争结束后持续了几年时间。英国资本大量涌入印度，注册成立了众多新公司，新工厂和新产业开始运营。大型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工厂，都是由外国资本投资运营的，因此，大规模工业实际上是由英国资本家控制的。几年前据估计，在印度运营的公司中，87%的资本是英国资本，可能实际的比例还更高。因此，英国加强了对印度经济的实际控制。大型城镇以牺

牲小型城镇而非乡村为代价发展了起来。纺织工业的发展尤为突出，采矿业也是如此。

政府为了关注工业化增长带来的新问题，任命了很多委员会和调查团。这些委员会和调查团建议政府鼓励外国资本投资，并且普遍支持英国在印度获得工业利益。政府任命了一个关税理事会以保护印度工业。但是就像我说过的那样，这种保护的实质就是在很多问题上保护英国在印度的资本。这些受保护的商品在市场上自然提高了价格，生活成本也相应增加了。因此，这种保护所带来的重担落在了民众以及商品购买者的身上，而工厂主们则拥有了一个受到庇护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竞争被削弱甚至不存在了。

随着工厂的发展，从事工业的工薪阶级人数自然也增加了。据政府估计，在1922年，印度工薪阶级的人数高达2000万。农村地区无土地的失业者流动到工业城镇中，加入了这个阶级，他们照例要忍受耻辱的剥削环境。100年前工业体系刚刚开始的时候英国出现过的状况，现在也在印度出现了——超长的工作时间、少得可怜的工资以及恶劣、不卫生的工作环境。工厂主们只有一个目的：尽可能利用这个景气的时期赚取利润；他们的做法连续多年取得成功，获得了巨大效益，而工人们的状况依然非常恶劣。创造了这些高额利润的工人得不到一点分红，但是后来，景气时期之后经济衰落、贸易萧条的时候，这些工人却要被迫分担灾难，接受更低的工资。

随着工人组织——工会的发展，工人们的要求不断提高，他们渴望得到更好的劳动环境、更短的工作时间以及更高的工资。受此影响，再加上受到全世界普遍要求劳工得到更好待遇的影响，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旨在改善工人命运的法律。在以前的信中我讲过《工厂法》得以通过的有关内容。这部法案规定，12岁至15岁的孩子每天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妇女和儿童不得做夜间工作，成年人每天最多工

作11小时，每周最多60小时（一周包括6个工作日）。这部有关工厂的法律之后又经过几次修改，一直沿用至今。

1923年通过了一部《印度采矿法案》（*Indian Mines Act*），该法案为那些必须在地下采矿（主要是煤矿）的可怜工人提供了一些保障。13岁以下的孩子禁止在地下工作，但妇女仍然在地下工作，她们的数量接近矿工总数的一半。按规定，成年人每周6个工作日的最高工作时间为：地上工作60小时或地下工作54小时。每天的最高工作时间为12小时。我告诉你这些工作时间的数字也是为了让你了解劳工的一些状况。即使了解了这些，对你来说仅仅也只是一小部分，因为你还要了解很多别的内容，比如工资数额和生活状况等，那样你才能真正全面地了解他们的状况。在此我们无法再深入介绍这些内容了。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些男女老少在工厂中每天要工作11个小时，却只能获得维持生计的微薄工资。他们在工厂里所做的单调工作令人十分压抑，他们的工作丝毫没有乐趣；而当他们精疲力尽地回到家中时，一家人往往只能蜷缩在一个泥巴堆砌的、没有卫生设施的小屋里。

政府还通过了一些别的有利于工人的法律。1923年，通过了一部《工人抚恤金法案》（*Workmen’s Compensation Act*）。该法案规定，如果遭遇事故，受伤工人必须获得一定的抚恤金。1926年，通过了一部《工会法》（*Trade Union Act*），规定了工会的形成和确认方式。在此期间，工会运动在印度，特别是在孟买，迅速发展了起来，成立了一个全印度工会代表大会，但是成立几年后这个组织就分裂成了两个团体。自从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之后，全世界劳工被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所吸引：一种是原先正统的、温和的工会，它们依附于第二国际（我以前给你讲过一些有关第二国际的情况）；另一种是全新而有力的俄国模式以及第三国际。因此，无论在哪里，温和的、通常也是境况更好的工人倾向于安全的环境以及第二国际，而更为革命的工人则倾向于第三国际。印度也出现了这两种不同的吸引力量，1929

年年底，劳工的发展方向正式分裂。自那以后，印度的劳工运动一直都很微弱乏力。

有关农民的内容我在以前的信里已经提到过，在此就不做补充了。他们的状况正在恶化，对于所欠的债务他们也越来越绝望。小地主、自耕农和佃户全都受到了债主也就是商人、放债人的控制。渐渐地，由于债务无法还清，债主得到了土地，而佃户则变成了双重农奴，既是地主的农奴，又是放债人的农奴。这些商人地主通常住在城市里，他们和佃户之间没有密切联系。他们不断地想要从忍饥挨饿的农民手中尽量多地获得金钱。以前的印度地主住在佃户中间，他们也许会偶尔流露出同情；住在城市里的银行家地主们派代理人收租，他们几乎不会表现出这种弱点。

政府机构对从事农业的阶级所承担的债务做了各种各样的官方评估。1930年，据估计，全印度（除缅甸外）这些阶级的负债总额达到了惊人的80.3亿卢比。这包括了地主和耕种者的负债情况。在经济下滑及之后的时期，这个数字又大幅上升了。

因此，从事农业的阶级，比如小地主、佃户等等，深深地陷入了困境，除非出现一个彻底铲除目前土地制度的方法，否则他们就没有出路。税收制度如此不合理，使得最重的负担落到了最贫困、最无法承担的阶级身上。经费大部分花在了军队、政府机构以及其他的英国人的收费名目之上，民众则无法从中获益。教育经费大约是人均9便士，而英国是人均2.15英镑；因此，英国的人均教育经费是印度的73.3倍。

过去，人们多次尝试估算印度的人均国民收入。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估算出的数字各不相同。达达拜·瑙罗吉在1870年的估算值为人均20卢比。近期的一项评估结果上升到了67卢比，就连英国人最乐观的估计也没有超过116卢比。把这个数字与外国的数字做个比较就

很有意思了。在美国，对应的数字为人均1925卢比，这个数字后来又有大幅的上升；在英国，这个数字为人均1000卢比。[注]

---

1. 按照目前的汇率，1印度卢比相当于1先令6便士。

162 ——印度的和平反抗

在给你写的很多信中，我对印度以及印度过往的介绍比其他国家都要多。不过，印度的过往目前正在与现状相融合，我希望我要写的这封信能够连接起印度的过去和现在。我会提到一些近期发生的、令我们记忆犹新的事件。虽然现在还不是评述这些事的时候，因为故事仍未结束。不过，历史总是在突然之间结束于当前的，而整个故事的剩余篇章则隐藏于未来之中。事实上，故事不会结束，它一直会继续下去。

临近1927年底的时候，英国政府宣布，他们将派一个调查团到印度，进行有关政府结构未来改革和变化的调查。这项宣布引发了印度政界的气愤和谴责。国大党对此提出反对，因为他们无法接受别人定期检查他们自我管理的能力。这是英国人为了掩盖他们长期控制印度的欲望而使用的措辞。国大党一直以来宣称印度拥有自决的权利，这也是协约国在世界大战中一直宣扬的，国大党拒绝承认英国议会拥有命令印度或成为印度未来命运最终主宰的权力。根据这些理由，国大党坚决反对新议会调查团的到来。印度的温和团体则以其他理由反对这个调查团，主要的理由是其中没有印度成员。这个调查团里全部是英国人。尽管理由不同，但事实是，包括最温和的团体在内的几乎每个印度团体都联合起来，声讨这个调查团，并倡议抵制它。

1927年12月左右，国大党在马德拉斯召开年会，会议决定以争取印度的国家独立为国大党的目标。这是国大党第一次宣布争取独立。两年后，在拉合尔，国大党的纲领确定为争取印度独立。马德拉斯年会还创立了一个短暂的但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全党派会议。

第二年，即1928年，英国调查团出现在印度。正像我说过的那样，这支队伍遭到了人们的联合抵制，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反对他们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这个调查团以其主席的名字命名为“西蒙调查团”（Te Simon Commission），“西蒙滚回去”成了全印度的普遍呼声。在多次示威活动中，警察对示威者使用了警棍；在拉合尔，警察甚至殴打了拉奇普特·雷依先生。几个月后，他便去世了，医生认为警察的殴打加速了他的死亡。所有这些事件都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愤怒。

同时，全党派会议试图起草一部宪法，为群体纷争找到解决方法。会议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了有关宪法和群体问题的建议。这份报告名为《尼赫鲁报告》（*Nehru Report*），因为博学家摩迪拉·尼赫鲁是这份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主席。

这一年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发生在古吉拉特邦巴多利县（Bardoli）的一次大型农民运动，这些农民反对政府提高税收估价。古吉拉特邦没有联合省所拥有的大地主的土地管辖制，那里有自耕农。在领袖瓦拉巴伊·帕特尔（Sardar Vallabhbhai Patel）的领导下，这些农民英勇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1928年，国大党加尔各答年会（Calcuta Congress）正式采纳了《尼赫鲁报告》，这份报告建议制定一部与英国自治领宪法内容相似的宪法。不过国大党只是暂时性地采纳这个建议，并设定了一年的期限。如果在一年中不能与英国政府就这个原则达成一致，那么国大党将会重新争取独立。因此，国大党和整个国家不可避免地朝着决定性的时刻迈进。

劳工也十分不满，在一些大型的工业中心，由于工资降低，劳工们变得咄咄逼人。在孟买，这些劳工很好地组织在一起，进行了有10万或更多工人参与的大罢工。社会主义思想及一些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在工人中间传播，政府对革命的进展和日益壮大的劳工力量感到非常

害怕，在1929年初突然逮捕了32位劳工领袖，并制造了针对他们的阴谋案。这个案件世界闻名，叫作“密拉特阴谋案”。在历时近四年的审判后，几乎所有被告都被判处了长期监禁。最奇怪的是，他们都没有受到实际参与叛乱或妨碍治安的指控。他们的罪名似乎是持有并企图传播某种观点罪。在人们的呼吁下，政府大幅度减轻了这些判决。

另一种活动形式就是一些赞同暴力方式的人所采取的发动革命的形式，这种形式不断发酵，有时也会表现出来。这主要出现在孟加拉，有时也出现在旁遮普，在联合省也会出现一些。英国政府以各种方式试图压制这种活动，他们制造了许多起阴谋案。政府颁布了一个被称为《孟加拉条例》（*Bengal Ordinance*）的特别法令，使他们可以逮捕他们怀疑的任何人，不经审判就可以关进监狱。在这项法令之下，几百名孟加拉青年遭到逮捕和关押，他们被称为“被拘留者”，而且他们的关押时间是没有期限的。值得注意的是，当这项不同寻常的法令颁布之时，英国当政的是工党政府，因此是他们颁布了这项法令。

这些革命者实施了很多恐怖主义行动，它们大多数发生在孟加拉。不过，有三件事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其中一件事发生在拉合尔，一位英国警官遭到枪杀，他被认为在反对西蒙调查团的示威活动中打伤了拉奇普特·雷依先生。第二件事发生在德里，巴哈特·辛格（Bhagat Singh）和巴图克什瓦拉·达特（Batukeshwara Dut）向议会大楼投掷了一颗炸弹。不过，这颗炸弹并没有造成什么破坏，仅仅是为了引起轰动，吸引全国的注意。第三件事发生在吉大港（Chitagong），时间正好是1930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开始的时候。这是一次对兵工厂的英勇而大规模的袭击行动，它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政府采取一切能够想到的手段镇压了这次运动。出现了很多间谍和告密者、大量的拘捕行动和阴谋案以及被拘留者（有时，在法庭上被宣判无罪的人，根据法令直接又被重新拘捕，成为被拘留者），东孟加拉的一些区域遭到军事占领，人们未经允许不得擅自活动，他们也不

能骑自行车，甚至不能穿着他们自己选择的衣服。如果没有向警方提供信息，所有城镇和村庄都要受到重罚。

1929年发生在拉合尔的一件阴谋案中，有一位名叫贾廷德拉纳斯·达斯（Jatindranath Das）的犯人为抗议狱中遭受的待遇进行了持续的绝食抗议。这个男孩坚持到了最后，在绝食的第61天死亡了。贾廷德拉纳斯·达斯的自我牺牲深深地感动了印度。令印度震惊和悲痛的另一件事就是1931年初巴哈特·辛格遭到了处决。

现在，我要回到国大党的政治活动这个话题上来。加尔各答年会规定的一年宽限期即将结束。临近1929年年底的时候，英国政府竭尽全力阻止更加严重的事态发生。它就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了一份内容含糊的宣言。那时，国大党依然愿意配合，只要他们提出的一些条件得到满足。由于这些条件没有得到满足，1929年12月的拉合尔年会自然而然地决定以争取独立为目标，开展争取独立的斗争。

因此，1930年初，即将发生的事件带来了灰暗的气氛。当时人们正在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做着准备。议会和政府机构再次受到抵制，国大党成员退出了这些机构。1月26日，人们在全国各地的城镇和乡村聚集起来，发誓要争取独立，那一天成了人们每年纪念的独立日。3月，甘地为了反抗当局的《食盐法》，开始了向海岸边的丹迪村进发的著名的食盐行军之旅。他选择食盐税作为发起运动的原因，是因为这项税收给穷人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因此是一项极为不合理的税收。

到了1930年4月中旬，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全国各地不仅反抗《食盐法》，也反抗其他的法律。整个国家都在开展和平反抗，为了压制这些反抗，当局紧接着又颁布了新的法律和法令。然而这些法令恰恰成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反对的对象。逮捕群众、野蛮的警棍攻击、向平静的人群开枪、剥夺国大党委员会权力、剥夺报社的言论自由、审查制度、殴打以及监狱中的粗暴待遇都成了家常便饭。一方面是当局制定了法令法规，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坚定而一贯地

破坏这些法规，以及抵制外国纺织品和英国产品。近10万人被捕入狱，印度发生的这场和平但坚定的斗争一时间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我要提醒你注意三件事：第一件是西北边境省（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产生了了不起的政治觉醒。1930年4月，斗争一开始，白沙瓦就有很多参加和平反抗的人被枪杀，在这一年中，我们的身处边境的同胞们以英勇而刚毅的精神承受了许多野蛮的对待。这件事之所以了不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身处边境的人们性格其实并不平和，他们受到一点刺激就会发怒，然而，他们还是保持了平静。像帕坦人（Pathana）这样的政治领域的新手，能够直接处于风口浪尖并且表现得如此勇敢是很令人意外的，也很值得称赞。

第二件值得注意的、也是这伟大的一年中最为杰出的事件，就是印度妇女引人注目的觉醒。若不是亲眼所见，人们很难相信成千上万的印度妇女抛开面纱，离开庇护她们的家，走上街头和集市，在这场斗争中与她们的兄弟并肩战斗，她们的表现常常令男人们汗颜。

值得注意的第三件事就是，随着这场运动的发展，经济因素对农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0年是世界贸易萧条的第一年，农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农民因此遭受了极大的打击，因为他们的收入完全依靠农产品的销售收入。因此，取消纳税符合他们的危难处境，而印度独立对他们来说也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政治目标，更是一个眼下的经济目标。因此，这场运动对他们来说有了全新的、更直接的意义，而地主和佃户之间的一些阶级冲突也产生了。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联合省和印度西部。

当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印度蓬勃发展的时候，在大洋彼岸，英国政府在伦敦召开了一次场面盛大的圆桌会议。国大党没有参与。参加会议的印度人全部是由政府指定的。这些人就像提线木偶或影子一样的人物，他们虽然知道真正的斗争发生在印度，但在伦敦的舞台上活跃地表现自己。政府始终把群体问题作为话题的焦点以此放大印度人

的弱点；他们刻意挑选了最为极端的地方自治主义者和保守派参加会议，使得会议无法得出任何解决办法。

1931年3月，国大党与政府当局暂停了争执或者说达成了临时的协议，以便开展进一步对话。这份协议被称为《甘地-欧文协定》（*Gandhi-Irwin Pact*）注。协议规定，终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释放数以千计因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入狱的犯人，废除戒严法令。

1931年，甘地代表国大党参加了第二轮伦敦圆桌会议。印度出现了三个重要问题，吸引了国大党和政府的注意：第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当局以镇压恐怖主义为借口在孟加拉对参与政治运动的人员进行了镇压。政府颁布了一项新的、更为严厉的法令，尽管有《德里协定》，孟加拉的事态依然无法平静。

第二个问题发生在边境省。在那里，政治觉醒正促使人们行动起来。在汗阿卜杜勒·伽法尔汗（Khan Abdul Ghaffar Khan）的领导下，一个庞大、训练有素而又平和的组织发展了起来。这个组织的成员被称为“神之仆人”（Khudai Khidmatgar），有时也被称为“红衫军”，因为他们穿着一种红色的制服（并不是因为他们与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有任何联系）。政府很厌恶这场运动，也很害怕，因为他们知道帕坦人都是些优秀的战士。

第三个问题出现在联合省。可怜的佃户受到世界贸易萧条以及产品价格下跌的极大打击，他们付不起租金。尽管租金得到了一些减免，但还是太高。国大党尝试着为了他们的利益进行斡旋，但是效果不明显。1931年11月，收租的期限已到，事态发展到了关键时刻。从阿拉哈巴德地区开始，国大党建议佃户和地主在租金减免问题解决之前停止缴租和收租。政府立即进行还击，专门颁布了一项针对联合省的法令。这项法令十分严厉和全面，它使地区内的官员有权压制一切活动，甚至可以阻止个人的行动。

此法令颁布之后，政府又紧随其后颁布了两项针对边境省的令人惊异的法令，无论在边境省还是联合省，国大党领袖都遭到了拘捕。

在伦敦未获得成功的甘地在1931年的最后一周回国时，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情况。三个省份受到特别法令的管制，他的一些同僚已经被投进了监狱。一周之内，国大党再次宣布开始采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而政府一方则宣布剥夺几千个国大党委员会以及众多联合组织的权力。

这场斗争比1930年的那场斗争更为激烈。得益于之前的经验，政府早已为此做好了精心的准备。法制与法律法规的遮蔽物被抛到了一边，在包罗万象的特别法令之下，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由公务人员控制的戒严状态。当局真正的强制力量已经十分明显了。这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因为民族主义运动发展得越好，它对外国政府统治基础的威胁就越大，后者的抗击也就越猛烈。这些异国统治者抛开了受任统治和亲善这样虚情假意的措辞，转而用大棒和刺刀作为统治的真正道具。法律不仅变成了上层印度总督的意志，也成了每一位小官员的意志，他们知道自己是受到上级支持的，因此可以为所欲为。像沙皇时期的俄国一样，印度到处都散布着权力日渐增强的特务机关和刑事调查局的人员。他们不受审查监督，而且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让他们欲罢不能。一个主要通过特务机关进行治理的政府以及一个不得不忍受这种情况的国家，很快就会陷入混乱。因为任何特务机关都沉溺于一个充满阴谋、间谍、谎言、恐怖主义、挑衅、陷害、敲诈等的环境之中。过去三年中，印度的小官员、警察、刑事调查局所拥有的过度权力以及他们对权力的运用，导致这些机构变得越来越残暴和堕落。他们的目标就是暴力压制。

这里我就不再细说了。政府这一次的政策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就是大范围没收各类组织和个人的房屋、汽车和银行存款等财产。这种做法意在打击支持国大党的中产阶级人士。有一项法令中有

一条虽不重要但异乎寻常的规定：如果家长或监护人冒犯了他们的孩子或被监护人，他们就要为此受到惩罚！

与此同时，英国的宣传机器正忙于描绘一幅印度的美好画面。印度本土的报社都因为担心后果而不敢刊发事实——就连刊出被捕人员的名字都是违法的。

不过，英国对印度政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企图与印度最为保守的团体联手。大英帝国如今依靠着封建力量以及其他极端的保守力量对抗进步力量。他们试图恢复支持者的“既得利益”，并威胁这些支持者如果英国当局离开，印度就会发生社会革命。土邦王公们是第一道防线，然后是印度大地主阶级。通过巧妙的操纵手段以及将极端的地方自治主义者推到最前方的做法，少数群体的问题变成了印度独立的一个阻碍。最近，我们目睹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在寺庙入口问题上，英国政府对印度教教徒中的极端宗教保守分子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心和热诚。英国人四处寻找保守派、狭隘的偏执狂以及被误导的利己主义者作为他们的支持者。

群众斗争有一个明显的优势。这是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最佳以及最迅速的方式，尽管也许是一个痛苦的方式。因为群众需要“重大事件的历练”。和平时期普通的政治活动，例如民主国家中的选举，经常会使普通人感到困惑。演讲铺天盖地，每个候选者都做出了各种承诺，可怜的投票者，或者说田地里、工厂里或商店里的人就会感到困惑。对于投票者来说，团体与团体之间没有非常清楚的区分。但是当群众斗争发生的时候，或者说在革命时期，真正的立场就会变得清晰起来，好像被闪电照亮了一般。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各种团体、阶级或个人都无法隐藏他们的真实感情或品质。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革命时期不仅可以检验品质、勇气、耐力和无私精神，还能让不同的阶级和团体之间被华丽而模糊的措辞掩盖着的真正冲突显现出来。

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一场全国性斗争，这当然不是一场阶级斗争，它是一场得到了农民支持的中产阶级运动。因此它不像阶级斗争那样能够区分阶级。不过，即使在这样一场全国性运动中，某种程度上也出现了阶级站队的情况。有些人，比如土邦王公、贵族和大地主，完全站到了政府一边；比起国家独立，他们更愿意保住自己的阶级利益。

在国大党领导下，随着全国运动的不断发展，农民群众也加入了国大党，希望国大党能够帮助他们摆脱重负。这极大地增强了国大党的力量，同时也使国大党具有了群众观念。虽然中产阶级仍是国大党的领导者，但他们的群众观念缓和了自下而上的压力，农村问题和社会问题越来越成为国大党的关注重心。国大党也渐渐产生了社会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体现在1931年卡拉奇年会通过的一项有关基本权利和经济计划的重要决议中。这项决议规定，宪法应该保障公认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以及少数群体的权利。它进一步规定，关键而基本的产业和服务机构应该由国家控制。争取独立的斗争不再仅仅意味着政治自由，也被赋予了社会内容。终结群众所遭受的贫困与剥削成了真正的问题，而独立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

当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仍在持续、大量政治参与者仍在狱中的时候，英国政府提议印度进行宪政改革。他们建议实行权力有限的省自治以及一个土邦王公具有决定权的联邦制度。政府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并增强对印度军事、公民和商业的三重占领，想出了一切可以想到的措施。所有的既得利益都得到了充分的保护，最重要的是，英国的既得利益受到了最为有效的保护，似乎只有印度的3.5亿人民的利益遭到了忽视。这些提议遭到了印度的强烈反对。

我把缅甸给忽略掉了，我要给你讲讲缅甸的事情。缅甸人没有参与1930年或1932年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过在1930年和1931年，由于巨大的经济困难，缅甸北部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英国政

府残暴地镇压了这次起义。政府企图在政治上将缅甸与印度分隔开来，这样一来，即使印度获得了独立，缅甸仍继续受到英帝国主义的剥削。缅甸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因为它有石油、木材和矿产资源。

说明（1938年10月）：由于这封信是5年半以前在狱中书写的，自那以后印度又发生了很多变化。那时，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仍在持续，尽管规模变小了，国大党的很多成员还在狱中。国大党自身，以及它的几千个委员会和联合组织被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1934年，国大党停止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政府也撤销了对国大党的禁令。国大党调整了原先对立法机构的抵制策略，并且成功地在选举中赢得了中央议会的席位。

1935年，经过了漫长的辩论，英国议会通过了《印度政府法案》（*Government of India Act*），该法案为印度制定了新宪法。根据该法案，印度要实行带有大量保护措施的省自治以及各省与印度土邦之间的联邦制度。这部法案在印度掀起了反对的声浪，国大党也明确反对该法案。人们尤其反对省督和印度总督手中掌握的保护措施和“特权”，因为这使省自治失去了实际意义；人们更强烈地反对联邦制度，因为这延续了国家中的专制政权，并导致封建和专制土邦与半民主的省份之间形成了一种怪异的、不切实际的联合。该法案被视作英国政府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土邦王公蓄意抑制印度的政治和社会进步，加强英帝国主义对印度的控制。群体分类也成了新宪法的一部分，并形成了许多单独的选区。这一内容多多少少受到了因此而获益的一些少数群体的欢迎，但是人们也以反民主和阻碍进步的理由谴责了这一内容。

《印度政府法案》中有关省自治的部分于1937年初实施，按照这一内容，全印度举行了普选。尽管拒绝接受这部法案，国大党依然决定参加这些选举，整个国家开始了积极而广泛的选举活动。国大党在绝大多数省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国大党成员在大多数新成立的省立

法议会中占有了多数席位。他们围绕是否应该接受省政府官职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国大党决定接受官职，但是国大党也清楚地表示会继续坚持原先争取独立的目标和政策，而接受这些官职是为了进一步实施这些政策以及增强国家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的力量。此外，国大党还规定，省督不得使用保护措施。

做此决定之后，国大党在七个省份成立了政府部门：孟买、马德拉斯、联合省、比哈尔、中央省、奥里萨和西北边境省。之后，国大党又在阿萨姆成立了联合政府。孟加拉和旁遮普是国大党没有成立自治政府的两大省份。

国大党政府的成立使得政治犯得以释放，也使那些地区的公民自由权利不再受到限制。群众很欢迎这种变化，十分期待他们的状况能够迅速得到改善。人们的政治意识迅速增强，农民和工人运动的势头越来越猛。人们进行了很多次罢工运动。省政府立即制定了农民法规和债务法规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并设法改善产业工人的状况。尽管做了一些事，但是形势如此，变革受到了法案的限制，重大的社会变革还是难以实现。

国大党政府和省督之间的冲突很频繁，有两次政府官员递交了辞呈。这些辞呈一旦被接受将会引发国大党和英国政府间的很大冲突。

英国政府并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省政府官员的观点占了上风。然而，形势动荡，冲突难以避免。对于国大党来说，这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它的目标依然是争取独立。

英国政府企图强行实行联邦制度也许会招致大规模冲突。之所以一直没能实施，是因为联邦制度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如今的国大党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它的力量是无法被忽视的。国大党下定决心不接受英国提出的联邦制度。国大党要求成立一个由成年选举人

选举产生的立宪议会，这个立宪议会将会为自由的印度制定一部宪法。

群体问题再一次成为印度的重要问题，并引发了摩擦。然而，有一种趋势，那就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正在成为重点，它们会分散人们对群体和宗教分歧的注意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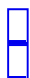
印度的民众觉醒蔓延至印度土邦，在许多印度土邦要求政府尽责的运动在不断发展。在主要的土邦中，迈索尔、克什米尔和特拉凡戈尔进行的运动尤为显著。土邦当局对民众的这些要求进行了野蛮的暴力镇压，近期在特拉凡戈尔就是这样的。在许多这样的半封建土邦中（比如克什米尔），政府机构是由英国官员控制的。

在过去的几年中，印度对国际事务的兴趣越来越大，它试图结合国际问题来看待自己的问题。发生在阿比西尼亚、西班牙、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巴勒斯坦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印度人的神经，国大党于是开始制定外交政策。这份外交政策是和平的、支持民主的外交政策。这份外交政策同样也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缅甸于1937年脱离了印度。它拥有了一个类似于印度省议会的立法议会。

---

1. 即《德里协定》（Delhi Settlement）。——译者注



第七卷
亚洲的觉醒

163 ——埃及，为自由而战

现在让我们来到埃及。在这里，民族主义浪潮日益高涨，与帝国主义势力又展开了一场斗争。与印度的情况一样，埃及正经受着大英帝国的压迫。从很多方面来说，埃及与印度情况差异很大，它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时间相对较短，但是这两个国家之间也有许多类似之处。印度和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它们的目标一致，都渴望获得民族自由。在镇压两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行动中，大英帝国几乎采取了完全相同的方式。因此我们都可以从彼此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对于印度人来说，这个教训尤为特别，这是因为我们能从埃及的经历中清楚地看到：英国施舍给我们的“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又能把我们引向何方？

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中（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埃及最为发达。它是连接东西方的快速通道，这是自苏伊士运河通航以来轮船必经的伟大贸易航线。比起西亚各国，它与19世纪的新欧洲之间的接触更为频繁。这个国家独具一格，似乎与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国家毫无关联，但是事实上它们之间有着割不断的文化关系，这是因为它们的语言、传统以及宗教是完全一样的。开罗的日报在阿拉伯国家中随处可见，给它们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在这些国家中，埃及是最早开始出现民族主义运动的，因此埃及民族主义自然而然地成了其他阿拉伯国家争相效仿的典范。

在上一封关于埃及的信中，我已经提到过阿拉比帕夏在1881——1882年之间发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以及这个运动是如何遭到英国镇压的。我也向你提到过那些早期的改革者，如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以及来自西方的新思想对正统伊斯兰教所造成的影响。

这些改革者重新拾起古老的法则，摒弃这个宗教在漫长岁月中日积月累的沉淀，试图以这种方式让伊斯兰教与时俱进。这些进步人士的下一步措施是把宗教与社会机构分离开来。古老的宗教通过其特有的方式，渗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规范着我们的日常行为。因此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除了宣扬宗教教义之外，还制定了关于婚姻、遗产继承、民事以及刑事法案、政府机构，还有几乎其他各个方面的社会准则和规定。换言之，它们形成了完整的社会结构，并赋予它宗教制裁的权力以及权威性。在这个方面，印度教因其严格的等级制度而显得最为突出。宗教渗入到社会结构之中，这对改革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因此，与其他国家一样，埃及的进步人士也努力尝试着把宗教与社会结构或制度剥离开来。他们的理由是，那些在过去由宗教或者习俗所强加在人们身上的制度，无疑是符合了《圣经》（*Scriptures*）时期的普遍情况的。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大为不同了，因此这些古旧制度已经不再符合时代的要求。牛车行驶的规则一定不会符合汽车或者火车的行驶要求，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基本常识。

这是那些进步人士和改革者常用的论点。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是，这个国家以及诸多制度日益世俗化，也就是说，它们与宗教脱离了关系。我们看到土耳其的去宗教化行动尤为彻底。土耳其共和国的总统甚至不再以上帝的名义而是以个人的名义宣誓就职。

当然埃及还未发展到这个地步，但是在这里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国家里也产生了相同的趋势。土耳其人、埃及人、叙利亚人、波斯人等逐渐放弃使用古旧的宗教语言，而更多转为使用民族主义的新语言。也许印度的穆斯林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穆斯林团队更加抗拒民族主义进程，因而与伊斯兰教国家的其他宗教人士相比，他们更加保守，宗教观念更为根深蒂固。

这个事实引人注目，令人感到惊讶。新民族主义进程通常伴随着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下的一个中间阶层）的发展。印度的

穆斯林在中产阶级的发展中早已滞后了，这一失败或许已经阻碍了他们的民族主义进程。可能由于他们在印度是少数群体，因此他们内心充满恐惧，这就让他们变得更加保守，紧紧抓住古老传统，并怀疑一切新兴观念和思想。大约1000年之前，在伊斯兰教侵入印度的早期阶段，印度教教徒龟缩起来不敢反抗，并在组织内部形成了极其森严的等级制度，这必定与这种心态不无关联。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在19世纪最后25年内，新兴中产阶级在埃及迅速发展起来，并在随后的岁月中，这个群体得以继续壮大。其中有一位杰出人物萨德·柴鲁尔，出身于埃及的贫农家庭。1881——1882年间，阿拉比帕夏领导反英起义，年轻的萨德·柴鲁尔加入了这个队伍。从那以后直到他于1927年过世的整整45年间，他一直为埃及的民族自由而奋斗，成了埃及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这个贫农出身的中产阶级人物在埃及的领袖地位毫无争议，广受农民阶级的爱戴，并成了中产阶级的偶像。但是那些所谓的上层社会，即旧式封建制度下的地主阶级，十分憎恶他。他们讨厌这个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因为这会逐渐威胁到他们在这个国家的主导地位。在他们的眼中，柴鲁尔就是个出头鸟，他代表着中产阶级，并领导这个群体与他们不断地斗争。跟在印度的情形完全一样，英国人同样试图获得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支持。实际上这个阶级大多是土耳其人而非埃及人，他们代表着在过去占据着统治地位的贵族阶层。

因此，在埃及的英国人继续利用那套屡试不爽的帝国主义手段，试图与该国的某些社会团队或者政治力量结成同盟，挑拨离间，引起内斗，以此来阻止它的民族独立进程。跟在印度的情况一样，他们想要利用信奉基督教的埃及科普特人来挑起少数派问题，但是他们最终失败了。他们总是嘴上说着伪善的言辞，急于表明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对方的利益，这也是他们常常使用的花招；他们自称是“几百万沉默的民众”的“保护者”，如果那些“煽动者”以及那些“在这个国家并无利益关系”的人不再制造麻烦，那么一切都将会十分美

好。顺便说一句，这个赋予利益的过程通常会演变成对获益者的大肆屠杀。也许这种方式会让他们远离这个苦难的世界，能够更快地开启天堂之行。

从战争时期开始直到很久之后，埃及都处于严密的军事管制之下。在战争期间还通过了一个裁军法案和征兵法案。英国军队占领了这个国家，并在战争初期宣告埃及成为英国的“受保护国”。

1918年战争结束，和平到来，埃及的民族主义人士又重新活跃了起来。他们向英国政府以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埃及独立的要求。那时埃及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有一个名为“爱国者”（Watanists）的全国性政党，它的成员人数却很少。当时有人提议让萨德·柴鲁尔帕夏带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前往伦敦和巴黎，提出埃及独立的诉求。为了让这个代表团获得强大的支持，能够代表国家的利益，一个组织便应运而生，它的规模迅速扩大起来。这就是伟大的埃及华夫脱党（Wafd Party）的前身，“华夫脱”一词正是代表团的意思。英国政府拒绝允许该代表团前往伦敦，并在1919年3月逮捕了柴鲁尔和其他几名领袖。这随即引发了一场血腥的革命。一些英国人死于这场暴动，而开罗以及其他一些中心城市被革命委员会控制起来。许多地区纷纷成立公共安全民族委员会（Nationalist Commi ees of Public Safety）。大学生积极地参与了这场反抗运动。但是在最初的胜利之后，这次反抗运动基本被镇压了下来，尽管偶尔仍会有英国官员遭到暗杀。虽然从表面而言，这次暴动已经遭到了镇压，但是这次运动还远未结束，只不过它改变了行动策略，转入了第二个阶段，即消极反抗阶段。这种方法十分奏效，因为英国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满足了埃及人的要求。米尔纳勋爵（Lord Milner）的委员会从伦敦抵达埃及，而埃及的民族主义人士决定要抵制这个委员会，并最终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学生们再次在这场抵制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面对埃及全国上下的一致抵抗，委员会受到很大的触动，并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些意义重大的建议。但是英国政府对此置之不理，因此从

1919年初到1922年初，埃及的抵抗运动又持续了三年之久。除了完全独立，埃及人其他条件都不接受。

柴鲁尔帕夏在1919年入狱不久就被释放出来，但是在1921年11月时再次遭到拘捕，并被驱逐出境。但是英国人认为埃及的形势并未好转，因而他们只好采取措施安抚埃及人的不满情绪。尽管柴鲁尔远非那种绝不妥协的极端分子，但是那些所有做出让步的尝试均告失败。的确，有一次一些人采取行动，企图暗杀柴鲁尔。这些人指责柴鲁尔是一个可耻的叛国者，认为他软弱无能，向英国人做出了不应该的让步。但是，英国政府和埃及民族主义分子之间未能达成协议的真正原因一直都是根本性的，这与印度的情况极为相似。埃及民族主义分子并非是想要忽略英国在埃及的利益。实际上他们早已完全准备好去讨论这个问题，并愿意体谅英国在帝国贸易、战略路线以及其他方面的特殊利益。但是他们要求在民族独立得到认可并不会受到损害的前提下，才能和英国讨论这些问题。另一方面，英国却认为只有它才有资格决定到底给予埃及多大的自由，并且这个自由不能触犯它的利益，它的利益必须得到优先保护。因此双方完全无法达成共识。但是英国政府认为他们必须马上做出行动，因而即便没有达成协议，他们仍在1922年2月28日发出一则宣言。他们声明将来会把埃及认定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这是个语气十分强烈的但是），还有四个重大问题悬而未决，有待进一步考量。这四个问题是：

1.大英帝国在埃及的通信安全问题。

2.直接或间接保护埃及，抗击任何外来侵略或干涉。

3.保护在埃及的外国利益以及少数派利益。

4.苏丹未来何去何从的问题。

这些遗留问题与印度的情况简直如出一辙，我们将他们称之为“护卫者”，在这里他们的残余势力更甚。这些遗留问题是不能接受的，这是因为，就算它们看上去是那么简单无害，但是它们意味着，无论是在内政上还是在外交上，这个国家都不会享有真正的独立。因此1922年2月28日的独立宣言只是英国政府单方面的行为，是不会得到埃及的承认的。在随后的数年里，在埃及，这些遗留问题或是英国的“护卫者”影响下的独立，充分展现了其本来的面目。

尽管埃及已经获得了这种“独立”，但是英国官员下达的戒严令依然持续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直到埃及政府通过了一项免罪法案，这个戒严状态才得以终结。这项免罪法案规定，在戒严期间，所有官员都无须对他们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在这个刚“独立”的埃及，宪法极为保守，形同虚设，它完全处于国王福阿德一世（King Fuad I）的控制之下，这个国王对贫苦的埃及人民实施了极为残酷的暴政。福阿德一世和英国官员一拍即合，他们都非常憎恶民族主义者，也反对人民的自由思想，甚至还反对建立真正的议会制政府。福阿德一世认为他就是政府，他可以随心所欲，恣意妄为，解散议会，并凭借英国的武力对埃及进行专制统治。当然英国从未让他失望过。

在英国政府宣布埃及独立之后，它首次提出了普惠举措，提出要划拨巨额资金，以补偿那些在新政权下退休的官员。福阿德一世代表埃及政府，爽快地表示了同意，从而政府为此支付了高达650万英镑的巨额费用。有一名高级官员得到了8500英镑的补偿，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额了。但有趣的现象是，有一些获得高额补偿的退休官员很快签订了特殊协议，又重新获得了雇用。要知道埃及不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总数还不及印度联合省的三分之一。

埃及制宪人大胆地在宪法中规定“所有的权力源自国家”。事实上，自从新宪法生效以来，埃及的议会一直在困境中苦苦挣扎。就我

所知，没有任何一个议会能够存续到正常的任期结束。福阿德一世一再突然宣布解散议会，他下令暂停宪制，在埃及施行起君主专制统治来。

新议会的第一次选举在1923年举行，柴鲁尔帕夏领导的华夫脱党在这次选举中大获全胜，赢得了90%的选票，在214个席位中夺得了177个席位。他们努力尝试着与英国达成协议，而柴鲁尔为此专门前往伦敦。但是双方的观点立场完全不可调和，在几个问题上的分歧使得谈判完全崩溃。其中一个问题是关于苏丹的。苏丹北邻埃及，但是它与埃及完全不同：首先，两国人种不同；其次，语言不同。尼罗河的上游流经苏丹境内。从有史记载以来，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7000到8000年，尼罗河一直都是埃及的生命线。尼罗河每年会定期泛滥，来自阿比西尼亚高原的肥沃土壤被洪水带到埃及，将原本荒芜的沙漠变成了富饶肥沃的土地，因此埃及的农业和人民的生活都有赖于此。米尔纳勋爵（遭到埃及人抵制的委员会成员）对尼罗河是这样描写的：

> 这条伟大的河流为埃及人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水源。它对埃及来说，可不仅仅是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和繁荣，它更是一条生命之源。只要它的上游不在埃及的控制范围内，埃及就不得不时而面临着威胁。这件事光是想想都让他们觉得无比难受。

尼罗河的上游正是在苏丹境内，因此苏丹对于埃及来说意义极其重要。在过去，苏丹是英国和埃及的“共管国”，因此它曾被称为“英埃苏丹”（Anglo-Egyptian Sudan）。由于当时英国是埃及的实际统治者，因此英埃两国并无利益冲突，而且埃及还给予了苏丹大笔资金援助。的确如此，1924年之时，寇松勋爵曾在英国议会发表声明，指出如果埃及没有向苏丹提供财政援助，那么苏丹早已破产了。当英国最终面临离开埃及这个问题时，他们就像要抓紧苏丹，绝不放

手。而埃及人却认为，是否能够掌控住在苏丹境内的尼罗河上游，这就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因此英埃两国的利益冲突就此产生。

1924年，萨德·柴鲁尔与英国政府就苏丹问题展开讨论，这时苏丹人民通过多种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埃及的深深依恋。为此他们遭到了英国人的严厉惩罚。尽管苏丹是英埃两国的共管国，但是埃及政府事先完全不知道英国人会随心所欲地胡作非为。对此埃及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这个所谓的埃及独立宣言中，英国还提出了另一个遗留问题，即外国利益的保护问题。这些外国利益是指什么呢？在前一封信中我已经略微提起过了。当土耳其帝国（奥斯曼帝国）日渐衰落之时，列强曾强加各种条约，规定它们的公民在土耳其能够享受到特别的待遇。这些欧洲外来者不论所犯何罪，均不受土耳其法律或者法庭的管辖，只有他们本国的领事或者外交代表，又或是那些由外来者组成的特殊法庭，才能对他们进行审判。他们还享有其他的特权，比如几乎不用缴纳税费。外来者的这些极其宝贵的特权被认为是“屈服”。这可以说是屈从，又可以说成是投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当事国丧权辱国的表现。由于土耳其不得不忍气吞声，因此在它统治之下的各个地区也不得不屈从于他们。虽然埃及当时完全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它也完全不属于土耳其的统治范围，但是在这个方面被当成土耳其的属地一样对待，同样被强迫做出了丧权辱国的让步。外来者享受着这些无比幸运的条件，因此外国商人和资本家蜂拥而至，在各个城市中大量聚集起来。他们自然会反对废除这个体系，毕竟这是一个能对他们进行全方位保护的体系，他们甚至不用缴纳任何税费，从而能够快速地发家致富。这就是英国政府势必要保护的外国既得利益。埃及不可能承认这个体系的继续存在，因为它不光是与国家独立完全冲突，而且还会造成国家财政的严重损失。如果最有钱的一群人可以逃避缴税的话，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行动就势必难以进行。在英国直接控

制的漫长时期内，他们在基础教育、卫生以及改善农村状况等各方面几乎一事无成。

在凯末尔帕夏取得胜利之后，曾经是最早做出丧权辱国让步的土耳其，完全摆脱了他们的控制。在这里我还要提到中国，它也正在为摆脱这些不平等的特权而努力奋斗。日本在19世纪的一段时间内也遭受了这样的对待，但是在它强大起来之后，就完全摆脱了这种命运。

因此在英埃两国达成协议的道路上，外国既得利益的问题是另一个阻碍。自由常常受到既得利益的阻碍。英国政府常常装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态度，因而它又决定要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这也是1922年2月独立宣言的一个遗留问题。科普特人是最主要的少数民族，这些人可能是古埃及人的直系后裔，因此他们是埃及最古老的种族。他们信奉基督教，自基督教诞生以来，在欧洲信仰基督教之前，他们就一直持有这样的信仰。然而，科普特人并没有感激英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心，却“忘恩负义”地告知它：不要来制造麻烦。英国在1922年2月发表宣言后，科普特人随即举行了大型集会，决定“为了国家统一以及达到国家目标，特此放弃一切少数民族代表资格以及对他们的保护”。他们的决定遭到了英国人的谴责，被认为是一种极其愚蠢的行为。但是，不管这种做法是聪明还是愚蠢，它都让英国人不能继续宣称要保护他们，从而少数派的问题不再成为讨论的话题。事实上科普特人在民族自由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华夫脱党中，深受柴鲁尔帕夏信任的一些成员正是来自这个少数民族。

由于英埃两国相互矛盾的立场看法，以及它们之间实际存在的利益冲突，萨德·柴鲁尔和他的同僚所代表的埃及与英国政府之间的协议于1924年完全被撕毁。英国政府对此十分震怒。他们早已习惯在埃及横行无忌，因而当他们发现以华夫脱党领袖为代表的开罗新议会顽固不化的时候，他们简直感到不可忍受。他们决定用帝国主义的方式，给华夫脱党以及埃及议会一点教训。很快他们的机会来了，他们

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并从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利益。我将在下一封信中进行详细的叙述。这次著名的事件被看作展示现代帝国主义活动的一面镜子，因此值得我用一封信的内容来阐述它。

164 ——英国控制之下的独立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上一封信中，我提到，以民族主义者为代表的埃及政府与英国政府之间的和谈于1924年宣告破裂，为此英国政府十分震怒。我先不继续讲述随后发生的重大事件，因为我必须首先让你明白，在这所谓的独立背后，埃及实际上仍然处于英国的军事管制之下。英国军队仍然驻扎在这里，而且埃及的军队也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英国人担任着埃及军队的首脑，被称为“军队总司令”。埃及的警察总长们也是由英国人来出任。不仅如此，英国政府借口要保护在埃及的外国人，仍然控制着埃及的财政、司法以及内务部。也就是说，他们控制着埃及政府的每一个要害部门。埃及人自然坚持要求英国放弃这些控制权。

1924年11月19日，英国驻苏丹总督兼埃及军队总司令李·斯塔克爵士（Sir Lee Stack）遭到埃及人的暗杀。在埃及以及本土英国人自然对此无比震惊；也许埃及民族主义政党华夫脱党更是备受惊吓，因为他们知道英国人的报复会冲着他们而来。英国的报复来得如此之快，事件发生的第三天，也就是11月22日，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艾伦比勋爵（Lord Allenby）对埃及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埃及政府必须立即做出以下补救措施：

1.正式致歉。

2.惩罚暴徒。

3.禁止一切政治示威游行。

4.支付50万英镑的赔偿金。

5. 24小时内将全部埃及军队从苏丹境内撤出。

6.撤销基于埃及利益而制定的限制令，解除苏丹用水灌溉的限制。

7.停止一切反对英国政府保护在埃及外国人权利的行为。这条特别针对继续在埃及财政、司法和内务部任职的英国官员。

这七条要求相当耐人寻味。某些埃及人谋杀了李·斯塔特爵士，因此英国政府马上借机大做文章，甚至根本对此不加询问，就把这项罪名归结到埃及政府头上。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埃及人民都是谋杀犯。除此之外，他们从这个事件中获得了大笔赔偿，获益颇丰。最重要的是，他们利用这次事件霸道地解决了他们和埃及政府之间的所有争端，而这些争端正是造成几个月之前两方和谈破裂的主要因素。即使这样他们还是觉得意犹未尽，还要求必须禁止所有的政治游行示威活动，从而造成埃及日常社会生活都陷入停顿状态。

这次谋杀事件的后续发展真是令人大跌眼镜。一件不大的谋杀事件却给英国带来了莫大的利益，这种处理手段真是超乎所有人的想象。更有意思的是，本应对此次事件负责的两位主要官员（名义上是隶属于埃及政府的），即负责打击犯罪和镇压暴乱的开罗市警察总长以及欧洲公共安全部署长，却都是英国人。没有人认为他们应为此次谋杀负责。但是可怜的埃及政府，虽然它在事后立即对此表示沉痛的哀悼和遗憾，却不得不承受着英国政府的暴怒，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冷酷的英国政府是如此精于算计，利用了此次事件大赚了一笔。

埃及政府的态度简直卑微到了尘埃里。柴鲁尔几乎接受了最后通牒里列出的所有条件，甚至在24小时内支付50万英镑的赔偿金。但是

埃及政府表示，唯有苏丹问题，他们不可能放弃权利。对艾伦比勋爵来说，即使埃及政府做出这种谦让的态度并诚恳致歉，都不能令他感到满意，这是因为他们不肯对苏丹问题做出让步。因此，艾伦比勋爵代表英国政府使用强制性措施占领了位于亚历山大港的海关大楼，从而控制了所有的海关税收。除此之外，他对埃及人的抗议置之不理，在苏丹强制执行最后通牒中的条件，使苏丹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驻扎在苏丹的埃及军队不断爆发反抗行动，但是都遭到了英国的血腥镇压。

柴鲁尔和他所代表的政府迅速对英国的行径表示了严正抗议，并立即宣布辞职。就在1924年11月这段时间内，福阿德一世解散了议会。因此英国成功地将柴鲁尔和他的华夫脱党赶下了台，暂时终结了埃及议会的存在。他们也吞并了苏丹，控制了苏丹境内的尼罗河上游流域，从而轻而易举地掐住了埃及的咽喉。

悲愤的埃及议会向国际联盟申诉，反对英国“利用一次悲惨的事件来达到其帝国主义意图”。但是国际联盟对此装聋作哑，不理会这种针对列强的抗议。

从那以后，埃及国内的抗争就没有消停过。这场斗争涉及两方，其一是代表埃及人民的华夫脱党，其二是福阿德一世与英国高级专员的联合势力，他们受到其他外国利益以及法庭中的英国奉迎者的支持。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埃及完全处于暴政之下，这完全违背了宪法的精神。福阿德一世就是那个专制独裁的暴君。

每当议会获准聚集开会时，一切行为都表明了埃及全国人民都支持华夫脱党，因此议会遭到了解散。如果福阿德一世身后没有英国以及它所控制下的军队和警察的支持，他是绝不可能做出这种行为的。所谓的“独立”埃及几乎被当成了印度，完全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利。而在埃及的英国人把埃及变成了牵线木偶，在幕后操纵着一切，成了这个国家的实际控制者。

1924年11月埃及议会遭到解散，1925年3月组建了新议会，并召开了大会。在这次议会中，华夫脱党成员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席位，并立即选举柴鲁尔成为下议院议长。英国政府和福阿德一世均不承认这次选举的结果，因此就在同一天，这个全新的议会又遭到解散，存在时间仅仅只有一天之久！在此之后的整整一年时间内，埃及没有了议会，这明显不符合宪法的要求。而福阿德一世开始对埃及进行独裁统治，但是实际上幕后真正的统治者是英国专员。埃及全国上下对此深恶痛绝，从而萨德·柴鲁尔就成功地联合起社会各阶层人士，共同反对福阿德一世以及英国政府的联合统治。1925年11月议会的成员甚至再次集会，共同抗议政府的禁令。议会大楼已经被军队占领了，因此议会成员在另一个地点进行集会。

福阿德一世企图颁布一条法令，彻底修改宪法。他的目的是将宪法变得更为保守，如此一来，他以后就能更加轻松地控制住议会，可能还能将大多数柴鲁尔的追随者排挤在外。但是他的行径引起了埃及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极为强烈的抗议。显而易见的是，人们会彻底抵制新体系下的选举结果。因此，福阿德一世不得不做出让步，而选举得以在旧体制下进行。结果是：柴鲁尔的政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200:14。没有什么比这个结果更能证明柴鲁尔在埃及深厚的群众基础以及埃及的真正需要了。尽管如此，当时的英国专员（前印度总督劳埃德勋爵）表示，他反对柴鲁尔成为埃及首相，并随即指定了另一个人来取代他。英国的强加干涉让人有点不得其解，到底这件事情与它何干呢？但是，新政府几乎完全在柴鲁尔为首的华夫脱党的控制之下。尽管他们努力保持克制，但还是常常与劳埃德发生各种冲突，而劳埃德专横跋扈，盛气凌人，时常威胁要派遣军舰对他们进行打击。

1927年埃及政府再次尝试与英国达成协议，但即使是福阿德一世那位最温和的首相，也对英国的条件感到瞠目结舌。埃及的独立完全

成为一纸空文，事实上英国提出的要求是让埃及成为它的保护国。因此和谈再次宣告失败。

在各种和谈的进行过程中，埃及伟大的领袖萨德·柴鲁尔于1927年8月23日逝世，享年70岁。虽然他已不在人世，但是他给埃及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埃及人都会永远把他铭记在心里，他们在今后的岁月中也会深受鼓舞，勇往直前。他的妻子萨菲亚·柴鲁尔（Safa Zaghlul）仍然健在，她被称为“埃及国母”，深受埃及人民的爱戴。他在开罗的寓所被称为“国民大楼”，一直以来都是埃及民族主义者的总部所在。

柴鲁尔过世后，穆斯塔法·纳哈斯帕夏（Mustafa Nahas Pasha）成了他的继任者。随后，他于1928年3月出任了埃及首相。他试图在埃及国内开展一些简单的改革，以促进公民自由，并允许民众拥有武器。英国在军事管制时期对这些权利进行了削减。因此，当埃及政府刚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时，英国政府马上发出威胁，禁止埃及政府采取举措。英国政府对埃及内务如此横加干涉，这似乎非比寻常，但是劳埃德勋爵故技重施，再次发出了一份最后通牒，与此同时，英国的战舰从马耳他开进了亚历山大港，对埃及进行武力威慑。为此，纳哈斯帕夏做出了某些让步，并同意在几个月之后的会议上再行商定具体举措。

但是下一次会议化为了泡影。代表埃及国内反动势力的福阿德一世与代表帝国主义势力的英国专员都坚决认为，不能再给议会“胡作非为”的机会了。很快，他们利用一封信件（随后被证实为伪造品），对纳哈斯帕夏与另外一名科普特人的华夫脱党领袖提出了贪污指控。但是，事实上纳哈斯帕夏正是因其高尚人格与清正廉洁而声名远播的。埃及贵族阶层以及英国人对这次事件大加宣传。对此英国的通讯社以及各大报纸在全球范围内大肆报道，将这些错误的指控传扬开来。福阿德一世以此为借口，要求纳哈斯帕夏引咎辞职。纳哈斯帕

夏断然拒绝这一无理要求，但随即就遭到了福阿德一世的罢免。劳埃德与福阿德一世继续实施他们密谋的下一步计划。他们发动了军事政变，福阿德一世下令中止议会活动并修改了宪法。宪法中关于新闻自由以及其他自由的条款遭到废除，独裁统治又扬扬得意地回到了历史舞台之上。英国新闻媒体以及在埃及的欧洲人闻之举手称快，一片欢腾。

议员们顶住了独裁统治的高压，再次聚集在一起。在会上，他们宣布新政府是非法的，但是劳埃德和福阿德一世均对此浑不在意。“法律和秩序”的作用是为反对势力与帝国主义势力提供支持的，而不是用来对抗它们的武器。虽然新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但是它对纳哈斯帕夏的指控仍然破灭了，因为这些指控被认为是不实的。新政府（它真是太公正有礼了）发布命令，禁止新闻媒体刊登判决结果。尽管如此，这个消息仍旧快速传播开来，埃及各处顿觉欢欣鼓舞。

劳埃德与英国军队所支持下的独裁政权用尽一切手段，企图彻底打击并瓦解代表着埃及民族主义的华夫脱党。在那时，埃及国内弥漫着一片恐怖的气氛，新闻审查极为严酷。尽管如此，大规模的全国性示威活动仍旧时有发生，其中有了埃及女性活跃的身影。罢工整整持续了一周之久，律师以及其他行业人员也参与了此次运动。由于新闻审查极为严厉，报纸上并未刊登相关报道。

在风雨飘摇的高压统治之下，1928年过去了。在年末之时，英国国内政局骤变，这立即对埃及造成了影响。在工党成为执政党之后，英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其中一项就是召回劳埃德。由此可见，就连英国政府也难以容忍他了。劳埃德卸任回国，福阿德一世与英国的联盟关系暂时中断了。

失去英国政府这一强大后盾之后，福阿德一世的独裁统治难以为继，因此他在1928年12月允许议会进行重新选举。华夫脱党再次夺得了几乎全部席位。

英国工党政府重新启动英埃和谈，为此纳哈斯帕夏在1929年奔赴伦敦参与和谈。比起前几届政府，工党政府又做出了些许让步，它接受了纳哈斯帕夏关于三大遗留问题的意见。但是双方在苏丹问题上仍旧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因此这次和谈再次破裂。尽管如此，这次和谈也取得了更大的进展；双方态度友好，均表示将再次就相关问题举行协商。从总体上看，这次和谈对纳哈斯帕夏和华夫脱党来说是一次胜利，但对在埃及的英国人与其他外国商人和资本家而言，这可不是一件让他们高兴的事情。几个月之后，也就是1930年6月的某天，国王和议会之间的矛盾再次爆发，纳哈斯帕夏宣布辞去首相职务。

福阿德一世再次违背宪法，又开始施行独裁统治，这已是他在位期间的第三次独裁统治了。上议院和下议院议员均坚决对抗国王一手把持的政府，奋不顾身地突破重围，回到议会大楼举行了会议。1930年6月23日，他们庄严地宣誓，承诺忠于宪法，并将竭尽所能捍卫宪法的尊严。全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军队对此进行残酷镇压，到处血流成河，伤亡惨重。纳哈斯帕夏自己也在这场运动中负伤了。在英国官员控制下的军队和警察通过暴力手段控制住了局势，并强制推行独裁统治，这引起了埃及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而效忠国王的一小撮贵族和富人却感到兴奋不已。华夫脱党人公开表示他们坚决反对一切镇压手段，除此之外，就连温和派和自由派人士都站出来代表人民表明了同样的立场，这与印度的情况何其相似啊。埃及几乎所有阶层都对独裁统治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在同年晚些时候，福阿德一世出台了一条法令，宣布实施新宪法。在这个新宪法中，他削减了议会的权力，增加了君主的权力！做这件事情对他而言真是轻而易举啊。他只需发布公告就行了，因为在他的身后，帝国主义势力的恐怖阴影正笼罩着埃及全境。

我絮絮叨叨地讲述了1922——1930年间埃及这9年的历史，这是因为我觉得这段历史非比寻常。这是埃及“独立”的9年，根据英国政府

的埃及“独立”宣言，埃及是在1922年2月获得“独立”的。埃及人民内心的渴望是不言而喻的。一有机会，不管是穆斯林还是科普特人，大多都会选择拥护华夫脱党人。但是正是因为他们希望减少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剥削埃及的权力，因此这些外国既得利益者才会用尽一切手段对付他们。这些手段不胜枚举，包括暴力镇压、阴谋欺骗，甚至还会扶植傀儡国王，让他唯命是从。

华夫脱党领导的运动一直都是纯粹的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他们奋力争取民族独立，与此同时，他们也从未忽视过社会问题：每当议会正常工作时，它都给教育部门以及其他部门带去了积极的改变。的确如此，尽管当时议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民族独立而斗争，但是它在短短的时间内对民生的改善，是英国政府在过去40年中都未做到的。在每次大选以及大游行中，农民阶级对华夫脱党的拥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这从本质上说是一次中产阶级运动，因此它还不能充分发动起群众的力量，难以实现社会变革的目标。

在这封信的末尾，我必须提到妇女运动。在阿拉伯世界中（或许不包括沙特阿拉伯），妇女们的意识逐渐觉醒。在这个方面埃及一如既往地走在了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国前面。但是在所有的国家里都出现了有组织的妇女运动。1930年7月第一届阿拉伯妇女代表大会在大马士革召开。比起政治问题，她们更为关注文化和社会进步。但是埃及妇女更具有政治倾向性。她们参与政治示威，并组建了一个强大的妇女选举联盟（Women Suffrage Union）。她们要求改革婚姻法，保护妇女的权益，还呼吁给予女性平等的就业机会，等等。蒙面外出的习俗对妇女的禁锢正在减弱，在埃及尤为如此。跟土耳其的情况一样，面纱从未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但是它正变得支离破碎。

说明（1938年10月）：1930年以来，埃及一直处于君主所操纵的独裁政府的统治之下。从理论上说，它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实际上它近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这是因为外国的军队仍旧驻扎

在开罗和亚历山大港，而且英国还牢牢地控制住了苏伊士运河和苏丹。在那个时期，全球经济陷入大萧条，棉花价格大跌，埃及为此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1935年意大利法西斯入侵阿比西尼亚，这不仅对埃及形成了新的威胁，而且也严重影响到英国在尼罗河上游的既得利益。埃及和英国的关系由此得以改变。如果埃及反抗不断，继续保持敌对态度，那么英国会腹背受敌，这是它难以承受的局面。而埃及的领袖们也开始把英国当作可能的伙伴。在埃及议会大选中，华夫脱党大获全胜，纳哈斯帕夏当选首相。由于意大利的侵略行为，国际局势发生了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埃及与英国达成了协议，并于1936年8月签订了条约。出于和平的目的，埃及同意放弃之前坚持要求的许多权利，接受了苏丹的现状以及英国对苏伊士运河的保护权。除此之外，埃及与英国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而英国撤出了驻扎在开罗和亚历山大港的英军部队，承诺会帮助埃及废除混合法庭（Mixed Court）以及治外法权，并支持埃及加入国际联盟。

大家都为协议的达成感到欢欣鼓舞，但是他们高兴得早了点。尽管福阿德一世退位，新的埃及国王继承了王位，但是王权势力仍旧憎恨华夫脱党，并继续图谋打击它。英国帝国主义势力仍然继续在幕后施加影响。大片的埃及土地仍然归少数人所有，尤其是王室成员。这些大地主强烈反对立法制度的改革以及人民权力的增加。因此在埃及国内，各种大小摩擦不断发生，国王最终罢免了纳哈斯首相，并解散了议会。

在王权控制下的政府统治埃及一段时间之后，议会又重新举行了大选。但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华夫脱党在选举中惨败。随后，有迹象表明这次选举结果几乎全是捏造的，有人暗中精心安排了这次造假行为。纳哈斯帕夏领导下的华夫脱党仍然深受民众爱戴，但是当前政府落入了英国帝国主义扶植的王权集团之手。

165 ——西亚重新回到世界政治舞台

从地图上看，位于非洲的埃及与西亚之间仅仅隔着一片极为狭窄的蓝色海域。让我们一起穿越苏伊士运河，漫游在沙特阿拉伯、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疆域上，我们也可以走得更远一些，也就可以在波斯四处逛逛了。大家都知道，西亚曾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过去，它常常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曾几何时，它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随后的数百年光阴中变得默默无闻起来。它变得暮气沉沉，即使生命之急流呼啸而过，也未能在这一潭死水之上激起一丝涟漪。现在，我们却目睹了一场变革的到来，它将把中东各国重新引入世界政治舞台；东西方交通要道再次横贯西亚大陆。这个事实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

每当我想起西亚，我往往会迷失在过去的光阴里；无数旧时的光影涌入我的脑海中，让我久久沉浸于它们的瑰丽之中而无法自拔。我应该努力摆脱对它们的痴迷，但是我必须再次提醒你（害怕你忘记了），你要牢记，地球上这一片土地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从来都是至关重要的。古老的迦勒底大约出现在7000年前（它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在此之后，巴比伦出现了，紧随巴比伦人之后出现的是残酷的亚述人，这些亚述人把他们的伟大首都设在了尼尼微。随后亚述也成了过眼云烟，来自波斯的民族建立起崭新的朝代，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了这片西起印度边界、北至埃及的广袤中东大地之上。这是来自波斯的阿契美尼德人，他们的都城位于波斯波利斯。波斯帝国中诞生了三位“王中之王”：居鲁士大帝、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一世。薛西斯一世曾率兵攻打过弱小的希腊，但失败而归。最后这个帝国的命运落入了“希腊之子”或者“马其顿之子”亚历山大大帝之手。在亚

历山大大帝的一次征战途中，曾发生过这样一件古怪的事情：在亚洲和欧洲的交界处，他计划让这两个大陆“联姻”。

尽管他早已娶过好几位妻子，但他又迎娶了波斯公主为妻。他治下的众多官员和士兵争相效仿，也都争相和波斯女性结婚。

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后的许多个世纪，希腊文化在这片西起印度边境、北至埃及的中东大地上都极为盛行。在这段时间内，古罗马的国力开始增强，朝着亚洲席卷而来。但是一个新兴的波斯帝国——萨珊王朝，终结了它的强劲势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分裂成了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成了东罗马帝国的都城所在地。东西方之间的纷争从未间断，战火继续在西亚广袤的平原上蔓延。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的拜占庭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之间的争斗尤为激烈。在这段时间里，队伍庞大的骆驼商队运送着货品，在这条自西向东的漫漫长路上来来往往。在那时，中东是世界上一条极其重要的商贸要道。

在西亚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三大宗教诞生了，它们分别是犹太教（犹太人的信仰）、琐罗亚斯德教，亦称拜火教（现代帕西人的信仰）以及基督教。现在，在沙特阿拉伯的沙漠地带还出现了第四大宗教，它的影响快速席卷了这片土地，很快就凌驾于其他三大宗教之上。不久之后，定都巴格达的阿拉伯帝国在这片大陆上崛起。阿拉伯人与拜占庭人开始争斗不休，东西纷争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阿拉伯文明走过了漫长而恢宏的岁月，但是塞尔柱土耳其人来到这里之后，阿拉伯文明开始日渐衰落了。最终来自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征服了这片疆域。

但是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一场激烈的斗争早已在亚洲的西海岸揭开了序幕。来自西方的基督徒和东方的穆斯林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十字军东征的硝烟时起时休，断断续续绵延了250年之久，几乎到13世纪中叶才宣告完全结束。十字军东征被看作宗教战争，当然这些的确是宗教战争。但是宗教应该不是这些战争的起因，只是借口而已。当

时，与东方相比，西方人仍旧野蛮落后。对欧洲来说，那是黑暗世纪。但是欧洲正在觉醒，因此经济发达、文明进步的东方牢牢吸引住了欧洲的目光。他们采用多种方法表达着自己对东方的渴望和向往，而十字军东征则是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欧洲向西亚各国学习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它了解了精美的艺术，同时还掌握了精湛的工艺。欧洲贵族也学会了享受，养成了奢侈的习惯。尤为重要的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给欧洲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十字军东征还没有完全结束，蒙古人就已挟雷霆之势，进入了西亚，蒙古铁骑四处奔袭，所到之处无不哀鸿遍野。但是我们不能只把蒙古人看作毁灭者。他们从中国一路奔袭到俄国，征途之远、涉及国家之众是前所未有的。在蒙古大帝国的统治和鼓励之下，相隔遥远的人们拉近了距离，各国人民开始通商通婚。在这个庞大帝国的护佑之下，古老的商队路线又开始变得安全起来，商人、外事人员、传教士等纷纷踏上了遥远的旅程。中东正处于这些古老交通要道的中心：它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纽带。

也许你还记得，正是在蒙古人统治的时间内，马可·波罗不远万里从他的家乡威尼斯出发，横跨亚洲来到了中国。我们恰巧有了一本他所撰写的，或者说是经由他口述而成的游记，其中记录了他的旅途见闻，这也是他名垂千古的原因。但是应该还有很多其他人也曾踏过千山万水，但未曾留下只言片语。即使他们写下了游记，他们的手稿也许早已化作灰烬，吹散在历史的长空里了。商队不辞辛劳，日夜行走在商道之上，走过了一国又一国。虽然他们是为了经商和贸易，但是跟着他们一路前行的许多人却是为了体验冒险，寻找好运气。马可·波罗是当时最为著名的旅行家。除了他之外，还有伊本·白图泰，这是一位生于14世纪早期的阿拉伯人，出生地位于摩洛哥的丹吉尔（Tanger）。他的出现比马可·波罗晚了30年。21岁时，他踌躇满志地踏上了漫长的旅程，开始探索这个巨大的世界。他身无长物，在漫

长的探索途中，与他为伴的只有他的智慧和来自穆斯林卡齐（Muslim Qazi）或宗教法官的教导。他从摩洛哥启程，穿过北非，来到了埃及，之后又前往了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波斯；在此之后，他陆续来到了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俄国南部[在蒙古可汗和钦察汗国（Golden Horde）统治之下]、君士坦丁堡（当时还是拜占庭帝国的都城）、中亚以及印度。他从印度北部一路走到南部，穿越了印度来到了马拉巴尔海岸和锡兰，并最后抵达了中国。在回程途中，他漫游了非洲大陆，甚至还穿越了撒哈拉沙漠。在今天看来，虽然旅途变得更加容易了，但是像他这样的环球旅游也是极为罕见的。在14世纪的前半段，这可是件让人眼界大开的事情啊。它让我们意识到，在那个时代，长途旅行是多么普及。无论如何，不论在哪个时代，伊本·白图泰都算得上数一数二的伟大旅行家。

伊本·白图泰的游记生动活泼，记录了他对所访之国及其人民的见闻。那时的埃及十分富有，这是因为印度和西方的所有贸易活动都必须经由这个国家，这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由于这些巨大的利润，开罗成了一个伟大的城市，城中到处都是壮丽的纪念碑。伊本·白图泰在书中向我们描述了印度的种姓制度、妇女的殉葬仪式以及其他生活习俗。从他的书中，我们了解到当时印度在海外港口的贸易活动十分兴盛，印度的商船在海上商道上频繁地往返。他特别关注美女众多的国度，并做了记录，在书中详细描述了她们的漂亮衣着、美妙香味以及精巧的配饰。他把印度德里描述为“印度的大都市，一望无际，宏伟壮丽，是力与美的完美结合”。当时，图格鲁克王朝正统治着这片广袤的土地，疯狂的穆罕默德·图格鲁克苏丹在气头上下令，将都城从德里迁至南部的道拉塔巴德。他的这个决定把这个原本“广阔而壮美的城市”变成了一个“鲜有居民、空空荡荡”的荒漠，甚至那些仅有的少量居民也是在很久之后才悄无声息地定居在此的。

我被伊本·白图泰的书深深地迷住了，他笔下的旅行故事让我欣喜不已。

因此我们发现，直到14世纪，中东，亦称西亚，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还是连接东西方的纽带。接下来的100年里，情况却发生了改变。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并横扫了中东的所有国家，甚至还包括埃及。他们打击跨国贸易，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地中海地区的对手，即维也纳人和热那亚人，控制着这些贸易活动。贸易活动本身也发生了改变，因为海上贸易路线被开辟出来，从而取代了古老的陆上商道。因此，那些曾在千百年历史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陆地商道，就此荒芜了下来，而沿路的西亚各国也不复以往的辉煌了。

从16世纪早期到19世纪末将近400年的时间里，海上贸易航线意义非凡，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陆上商道，尤其是当时铁路已出现在西亚大陆上。世界大战前夕，有人提出应当修建连接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两座城市的铁路。在德意志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这一提案得以通过。其余欧洲列强对德国的做法十分眼红，因为这条铁路的修建即意味着德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会大幅度增强。而就在这时，世界大战爆发了。

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英帝国确定了其在西亚的霸主地位。我曾告诉过你，在短暂的时间之内，从印度到土耳其，一个庞大中东帝国的美妙景象浮现在英国政客的眼前，让其浮想联翩、目眩神迷。这是很难实现的梦想。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罗斯、凯末尔帕夏等一切因素的存在，让这个设想的实现变得困难重重，但是英国仍旧坚持不肯放手。伊拉克和巴勒斯坦仍旧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因此，即使英国不能实现它的宏伟设想，英国人还是成功地控制住了通过印度的要道，这是它惯常采用的手段。正是出于这个目的，英国军队才会参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的战争，鼓励并帮助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的统治。正因为如此，世界大战后英国和土耳其在摩苏尔问题上

再次发生了冲突，摩擦不断升级。这也是造成英国和苏联之间相互仇恨的一个主要原因。强大的苏联坐在花园的墙头上，对通过印度的要道虎视眈眈，英国一想到这点就不由得心生怨恨，不寒而栗。

在世界大战之前，关于巴格达铁路和汉志铁路（Hejaz Railway）的修建，列强们争论不休，而现在它也已经完工了。巴格达铁路将巴格达、地中海以及欧洲连接在了一起。汉志铁路起自沙特阿拉伯的麦地那，在阿勒颇与巴格达铁路连成一线。（汉志地区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个重要区域，伊斯兰教圣城麦加和麦地那都位于这个地区。）从此之后，铁路系统把西亚的众多重要城市与欧洲和埃及连接了起来，便利的交通让这些城市不再遥不可及。三个大陆的铁路系统交会在阿勒颇市，因此这座城市成了重要的铁路枢纽。这三大交会的铁路线分别是起自欧洲的铁路、起自亚洲途经巴格达的铁路以及起自非洲途经开罗的铁路。英国的政策目标由来已久，那就是控制亚洲和非洲的所有路线。从巴格达延伸出来的亚洲铁路可能会直通印度。非洲铁路将会横跨非洲大陆，从开罗一直延伸到最南面的开普敦（Cape Town）。长期以来，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一直梦想着把这条开普敦至开罗的铁路在地图上画成大红色，现在这个梦想正在逐步实现。“大红色”意味着这条铁路途经之地必须是大英帝国的版图，因为“红色”正是地图上标记出大英帝国所占土地的颜色。

但是将来也许不会出现这些发展，因为现在铁路也面临着汽车和飞机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同时我们必须记住，巴格达铁路和汉志铁路几乎完全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英国利用这两条西亚的新铁路线来完成其政策的既定目标，即在它的控制之下开辟前往印度的短途新铁路线。巴格达铁路的一段要经过法国控制下的叙利亚。对于这条铁路受制于法国的事实，英国深表不满，因此它计划修建一条途经巴勒斯坦的新铁路，以取代巴格达铁路。于是，在沙特阿拉伯，一条规模不大的铁路得以修建，把红海海岸港口城市吉达（Jeddah）和麦加连接了

起来。这条铁路为数以万计的朝拜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让他们每年的麦加朝圣之旅不再那么坎坷。

关于这个让西亚诸国不再闭塞的铁路系统，我的叙述到此为止。但是，在这个铁路系统充分发挥作用之前，它就已经开始慢慢失去了重要地位了。汽车和飞机的出现，让铁路不再那么不可取代了。人们可以非常轻松地开车进入沙漠，在那古老的商队贸易旧道上驰骋，而那些勤劳的骆驼曾在这些道路上艰苦跋涉，走过了数千年的时光。铁路耗费巨大，修建时间也特别长。汽车造价便宜，需要使用它时就可以立刻启动。但是汽车和货车并不能经常长途运行，它们至多能在100英里区域内往返，那么这个行驶范围就远不及火车了。

就长途行驶而言，飞机自然比铁路的造价便宜，而且飞行速度远非火车可比。毫无疑问，在运输方面，飞机的使用将会日益增多。现在翻天覆地的进步早已实现了，各大洲之间的大型客机能够定时运送乘客和物资。西亚再次成了了不起的空中航线的交会地，而巴格达又成了中心之中心了。英国帝国航空公司（British Imperial Airways）的航线是从伦敦经由巴格达到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荷兰国家航空公司（K.L.M.Dutch）的航线是从阿姆斯特丹（Amsterdam）至巴达维亚的，而法国航空的航线是从巴黎到印度支那半岛的。莫斯科和伊朗之间的航线也必须经由巴格达。搭机前往中国和远东地区的乘客都必须经过巴格达。人们可以乘坐经由巴格达的飞机前往开罗，然后乘坐非洲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开普敦。

大多数航空公司都不需要自负盈亏，各国政府都会对本国的航空公司下拨巨额补助，这是因为空中力量对今天的帝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空中力量的发展，海上力量的重要性日渐消退。虽然英国海军实力雄厚，英国自以为十分安全，但是它已经不能再偏安一隅，退守孤岛了。其实，来自法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空袭都会让它受到极大的打击。因此，所有的大国都热衷于发展空中力量，各国海上竞

争已经转为空中竞争了。在和平时期，各国都鼓励乘客坐飞机出行，并对这类乘客给予补贴。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让飞行员能积累更多的飞行经验，从而在战时能够参与战斗。民用航空的发展促进了军用航空的进步。因此民用航空蓬勃发展起来，欧洲和美洲涌现了大批航空班机。美利坚合众国的航空发展尤为瞩目；苏联的民用航空也是进步显著，大量的民航班机飞行在其广袤的领土上空。

在空中力量蓬勃发展的时代，西亚又重新奠定了其重要地位，这是因为许多长途班机都会途经这片区域。它又重新回到了世界政治的舞台上，并成了洲际事务的焦点。这也意味着，当列强们的利益发生冲突，或试图挫败对手时，他们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很好地理解这个对英国产生重要影响并指引着它在中东和其他地区开展行动的政策。

摩苏尔不仅位于这条通往印度的要道之上，而且还盛产石油。要知道，在发展空中力量的时代里，石油的作用尤为重要。伊拉克拥有众多产量巨大的油田，它因此成了洲际航空系统的要害地区。因此，控制伊拉克对英国来说意义十分重大。波斯也拥有占地面积极广的油田，英波石油公司（Anglo-Persian Oil Company）在很长时间内对此进行了大肆开采（英国对这家石油公司拥有部分所有权）。石油和汽油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并极大地影响着帝国主义政策。的确，现代帝国主义有时也被称作“石油帝国主义”。

在这封信中我们一起思考了几个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给中东地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使它重新被重视，并再次回到了世界政治的旋涡之中。但是在这一切的背后，整个亚洲东部的觉醒才是最为重要的。

166 ——阿拉伯国家——叙利亚

我们已经看到民族主义的威力，它能把居住在语言相通、习俗相近的国度中的人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迸发出更加强大的力量。当民族主义把一个群体紧紧团结起来时，它会让这个群体变得独一无二，有别于其他任何群体。因此民族主义使法国成了一个强大而坚定的国家，法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把法兰西民族看作独具一格的群体。同样，它也把德国各民族团结在一起，一个强大的德国便应运而生。但是法国和德国的民族团结倾向让它们越离越远。

如果在一个国家之中各民族之间界限分明，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民族主义就不能够团结人民、增强国力了，它会成为一种破坏力量，使国力衰弱，甚至还会让国家分崩离析。在世界大战之前，奥匈帝国就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德裔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是占据支配地位的两大民族，而其他民族则处于从属地位。然而，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奥匈帝国国力日渐衰弱，这是因为民族主义把这些民族带入了新的生命，让它们更加渴望获得自由。战争爆发后，形势更为恶化。奥匈帝国在世界大战中战败，这个国家迅速分崩离析，每个民族区域都宣布独立，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这个分裂的过程是十分痛苦和混乱的，但是在这里我们没必要做详细说明。）德国则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它也遭到了惨败，但是它维持住了国家的统一。在民族主义的重重压力之下，它经受住了这次灾难性打击的考验。

跟奥匈帝国一样，战前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是由多民族构成的。在这个帝国中，不仅有巴尔干人，还有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等诸多民族。民族主义在这个国家同样也展现出了它的破坏力。巴尔干

人最先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因此在整个19世纪，土耳其都在与巴尔干半岛的各个民族进行激烈的斗争。这场纷争首先开始于希腊，一波接着一波，从未休止。欧洲列强，尤其是沙皇俄国，都利用民族主义来玩弄阴谋，企图从这场民族觉醒的运动中分得一杯羹。它们还利用亚美尼亚人作为打击和削弱奥斯曼帝国的工具，因此土耳其政府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冲突升级，最后演变为一场血腥的屠杀。这些列强无耻地利用了亚美利亚人，以达到宣扬民族主义的目的。但是，在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亚美利亚人遭到了无情抛弃，不得不独立面对自己的命运。此后不久，位于土耳其东面黑海之滨的亚美利亚（Armenia）成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并加入了苏联。

在土耳其帝国的辽阔疆域中，阿拉伯各国的觉醒来得最晚，尽管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之间早已势不两立。在阿拉伯世界中首先出现了文化意识的觉醒以及阿拉伯语言文学的复兴。这股浪潮始于19世纪60年代，首先在叙利亚兴起，随之蔓延到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1908年，土耳其国内爆发了青年土耳其党革命，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遭到废黜，从此以后，各种政治运动日益高涨。民族主义思想在阿拉伯人中传播开来，不论他们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开始渴望把阿拉伯国家从土耳其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并实现阿拉伯世界的团结统一。尽管埃及也是讲阿拉伯语的国家，但是从政治上说，它基本上与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联系不深，因此这个设想中的阿拉伯国并未包括它，这个国家只把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囊括在内。阿拉伯人还希望土耳其苏丹能把伊斯兰教宗教领袖哈里发的职权归还给阿拉伯王朝，从而实现伊斯兰教宗教领袖对这片土地的领导。虽然这只是一个宗教诉求，但是人们还是趋向于认为这是一次民族主义运动，而且这个运动将对阿拉伯人的重要地位和昔日荣光的恢复大有助益，因此就连信奉基督教的叙利亚阿拉伯人都对此表示了支持。

甚至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国就开始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大做文章，密谋从中获得好处。在世界大战中，英国对阿拉伯国家做

出许多承诺，答应要帮助他们建立一个伟大的阿拉伯王国，而麦加的侯赛因王子（Sherif Hussein）沉迷于英国人的花言巧语，梦想成为阿拉伯王国伟大的统治者和哈里发，因此他就与英国人结为同盟，开始带领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的统治。叙利亚的阿拉伯人，不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踊跃地加入了侯赛因王子的反抗队伍中。很多叙利亚的革命领袖被土耳其当权者送上了绞刑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年5月6日是这些被擒者受刑的日子，绞刑分别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Beirut）举行，因此直至今日，这一天都是叙利亚全国追悼民族英雄的纪念日。

英国出资扶持了这场阿拉伯起义，而英国的神秘人物、天才特工劳伦斯上校也为此出谋划策，最终这次起义取得了胜利。但是，大战结束之后，原来隶属于土耳其的阿拉伯领土却几乎都落入了英国人之手，土耳其帝国则分崩离析了。我曾向你提起过穆斯塔法·凯末尔在争取土耳其独立的斗争中，他从未打算去征服非土耳其本土的地域（库尔德斯坦的一部分疆域除外）。他的做法可谓十分明智。

战争结束之后，是该要决定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命运了。获得这场战争胜利的协约国，或者说就是英法两国政府，装模作样地宣称这些阿拉伯国家的目标就是“完全彻底地解放长期受土耳其政府压迫的人民，并建立起国家政府和机构，人民可以自由选择政府，并赋予其权力”。英法两国政府共同占有了更多的阿拉伯土地，继续实现着这个冠冕堂皇的高尚目标。在国际联盟的批准下，英国和法国获得了托管权，这是帝国主义势力夺取他国领土的新办法。法国托管了叙利亚，而英国则接管了巴勒斯坦和伊拉克。而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汉志王国（Hejaz）则由麦加的侯赛因王子接管，但是他是英国保护扶植的对象。尽管当初英国承诺会帮助阿拉伯人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但是它和法国以这种方式将这片广袤的疆域分割成不同的板块，使其分别处于不同势力的托管之下。而看似独立的汉志王国实际上仍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阿拉伯人对这种分裂大失所望，坚决拒绝接受这种

安排。但是更多的意外和失望还在等着他们，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还会依照分裂政策，甚至在每一个托管地区内继续分而治之，以达到轻松控制的目的。现在我们就可以分别来一一认识这些国家了。让我首先介绍法属叙利亚托管地吧。

1920年初，在英国的支持下，埃米尔费萨尔（Emir Feisal，汉志王国侯赛因国王的儿子）领导下的阿拉伯政府成立了。叙利亚国家议会召集开会，决定在统一的叙利亚国内采用民主立宪制。但是这仅仅持续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随后在1920年夏天，法国介入其中，由于它拥有国际联盟批准的叙利亚托管权，因而轻而易举地就把费萨尔赶下了台，并强制占领了这个国家。叙利亚是一个小国，全部人口不到300万。但是，法国这次可真是捅到马蜂窝了，因为叙利亚阿拉伯人，不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现在都坚定了获取民族独立的决心，他们断然拒绝屈从于另一个强国的统治。在这个国家中纷争从未停歇，地方起义此起彼伏，因此法国不得不派驻大批军队镇压叙利亚境内的动乱，以维持它的统治。随后法国政府又玩弄起帝国主义的惯常手段，将叙利亚分割成更小的城邦，激起宗教和民族纠纷，以此削弱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这是蓄意为之的政策，就差没有冠冕堂皇地宣布要“分而治之”了。

叙利亚这样一个小国竟然被划分为了5个独立的国家。黎巴嫩（Lebanon）在西海岸和黎巴嫩山脉附近建立起来了。在这个国家里，绝大多数人都信奉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这些人被称为“马龙派教徒”（Maronite）。法国人给予了他们特殊的地位，因此成功地把他们争取了过来，一起对付叙利亚阿拉伯人。

黎巴嫩北部沿岸还建立起了另一个小国，这个小国地处群山之中，居民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维斯人（Alawis）。第三个小国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a）则建立在更远的北部，它与土耳其接壤，国中居民大多讲土耳其语。

而保留下来的叙利亚本土就失去了一些最富饶的地区。更糟糕的是，它远离海岸，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叙利亚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地中海国家，而现在这一传统关系被无情地斩断了，它不得不望着眼前这片寸草不生的沙漠而黯然神伤。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的分裂还没有停止。又一个山区小国切断了和它的联系，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德鲁兹人（Druz）是这个被称为德鲁兹山（Jebeled Druz）地区的原住民。

叙利亚人自始至终都极度反感法国的托管。在这里，各种冲突此起彼伏，大型示威活动时有发生，阿拉伯女性也积极地投身到了这些政治示威游行之中。法国政府采用高压手段，对这一系列的反抗行为进行了严厉的镇压。法国分裂叙利亚的行径，以及它蓄意挑起宗教和民族纠纷的做法，使得事态变得更为严峻，而叙利亚国内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为了稳定局面，法国采用了英国在印度的做法，大肆压制个人和政治自由，并派出大量的间谍和特工严密地监视着这个国家的一举一动。法国人任命“忠诚的”叙利亚人为官员，这些人则被叙利亚人民看作国家的叛徒，在人民当中没有丝毫影响力。当然法国人指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最为真诚的动机，法国人还宣称他们认为“他们有责任教化叙利亚人，帮助他们建立起成熟的政治体制并获得独立”。这句话听上去多像英国在印度的说辞啊！

叙利亚的局势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尤其是斗争以及较为落后的德鲁兹人（他们可不像我们西北边境的部落）问题激化了矛盾，使得冲突一触即发。法国总督对德鲁兹人头领玩起了阴谋诡计，他邀请他们前来做客，却翻脸扣下他们作为人质。这个恶劣的事件发生在1925年夏季，德鲁兹人由此愤然揭竿起义。这个小范围的反抗行动迅速蔓延到叙利亚全境，叙利亚各地纷纷加入战争，为民族独立和团结而战。

叙利亚独立战争是一次值得铭记的事件。这个国家相当于印度两到三个地区的面积，但是它能勇敢地反抗法国这个当时世界最强大的

军事大国。当然，叙利亚人根本无法与人数众多、装备优良的法国军队展开真刀真枪的大规模战斗，但是他们能让法国无法在农村地区站稳脚跟。法国只能占领那些大城镇；即便如此，这些法国占领区还会时常遭到叙利亚人的突袭。为此，法国人枪杀了大量的反抗者，烧毁了无数的村庄，竭尽全力对叙利亚实施恐怖统治。历史名城大马士革也在1925年10月遭到炮轰，城中建筑大多损毁严重，到处一片狼藉。整个叙利亚沦为了一座军营。尽管法国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这场起义仍然坚持了两年之久。最后强大的法国战争机器还是碾轧了这次反抗运动，不过叙利亚人做出的伟大牺牲并非是徒劳无功的。通过这次战争，他们已经坚定地表明自己拥有追求自由的权利，也让世界看到他们是多么英勇不屈。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企图让外界认为这场起义是由宗教纷争引起的，并想要利用基督徒来对付德鲁兹人，但是叙利亚人明确地提出，这场起义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并非是出于宗教目的。在反抗行动开始之初，在德鲁兹境内就成立了一个地方政府，这个政府发布宣言，呼吁国民参与这场独立战争，以赢得“一个完整叙利亚的完全独立……”让这个国家“能够自由选举国民代表大会起草宪法，赶走外国占领军，建立起国家军队，保卫国家安全，并依照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和人权来安邦兴国”。因此，法国政府及其军队企图镇压的是一群坚持法国大革命原则和权利的人，而这些原则和权利却是法国人自己一直所拥护的。

1928年初，对叙利亚的戒严令解除了，新闻审查制度同样也取消了。许多政治犯获得了释放。根据民族主义者的诉求，国民代表大会得以召开，宪法的制定也提上了日程。但是，法国根据宗教信仰的不同，把叙利亚划分为不同的选区（这与印度现在的情况一致），从而播下了矛盾的种子。穆斯林、希腊天主教教徒、希腊东正教徒以及犹太人被安排到不同的隔间里面投票，每个投票者都被迫投票给自己的宗教教派。因此，大马士革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场面，法国人的居心昭

然若揭。叙利亚民主主义者的领袖是新教教徒，他不属于任何一个选区，即使他是大马士革城内最受欢迎的人，也最终没被选出来。穆斯林获得了10个席位，他们提出要放弃一个，把它让给新教教徒，但是遭到了法国政府的断然拒绝。

尽管法国人万般阻挠，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仍旧控制了国民代表大会，并起草了宪法，以争取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叙利亚将成为一个共和国，国家权力必须来自人民。在这份宪法草案中并未提及法国以及它对叙利亚的托管权。法国人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但是国民代表大会决不妥协，因此双方互不相让，斗争旷日持久。最后，法国高级专员建议在这份宪法草案中加入一条过渡条款，这条过渡条款的大意是，在法国托管权存续期间，宪法草案中任何一条违背法国托管义务的条款均不能应用生效。这个说法十分含糊，但是这的确是法国所做出的巨大让步了。但是，国民代表大会还是寸步不让。于是法国政府就在1930年5月解散了国民代表大会，在同一时间公布了它所制定的宪法草案，并附加了那条过渡条款。

因此叙利亚本土成功地达到了它几乎全部的要求，而且还未做出妥协或是放弃任何一条要求。还有两个遗留问题：一是托管权的终结，这个问题不解决，过渡条款也没法终结；二是叙利亚的统一问题，这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除此之外，宪法本身是与时俱进的，而且它是专为完全独立的国家所制定的。叙利亚人在伟大的反抗运动期间展示了他们英勇不屈的精神，之后在和谈期间，他们再次显示出这种不屈不挠和坚忍不拔的勇气。对于完全自由的要求，他们绝不接受一丝一毫的更改和解释。

1933年11月，法国向叙利亚下议院递交了一份条约。尽管下议院议员绝大多数都是亲法的温和派，但是这份条约也遭到了他们的断然拒绝。这是因为法国坚持要求继续保持叙利亚的分裂现状，还要求保留法国在叙利亚的军营、营房、专用机场以及驻军。

说明（1938年10月）：纳粹德国战胜捷克斯洛伐克后，欧洲大片土地逐渐落入德国之手，它对领土的要求日益扩大，若不满足则以战争作为威胁，由此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局面。法国式微，沦落成二流强国，因此再也无法维持一个幅员辽阔的海外帝国。巴勒斯坦的困局让巴勒斯坦、叙利亚以及外约旦都意识到这个可能：它们也许应该联合起来，建立起阿拉伯联盟，相互帮助，共同进退。

167 ——巴勒斯坦和外约旦

巴勒斯坦是叙利亚的邻国，在此英国得到国际联盟的批准，对巴勒斯坦行使托管权。巴勒斯坦的国土面积甚至比叙利亚还小，总人口数不到100万。但是，它的历史悠久，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因此它就像一块磁石，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要知道，它不仅是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圣地，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与穆斯林也关系密切。巴勒斯坦的主要居民为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他们强烈要求独立自由，渴望团结起叙利亚的阿拉伯人。但是英国人玩弄手段，利用了巴以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在这里蓄意挑起了这个少数民族问题。因此，犹太人与英国政府结为同盟，一致反对巴勒斯坦的民族自由。究其原因，应该是犹太人害怕阿拉伯人统治巴勒斯坦吧。双方立场不同，因而冲突必然时有发生。阿拉伯人人数占优，但是犹太人财力雄厚，并且拥有一个国际性的犹太人组织。因此，英国才挑中了犹太人，让犹太宗教民族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相互争斗。这两个民族之间斗争日益激烈，英国就常常从中调停，以维护和平局面。如此一来，在这里英国的存在似乎就变得不可或缺了。这是帝国主义对其控制的国家常常玩弄的阴谋诡计；奇怪的是，这个伎俩却屡试不爽。

犹太民族是一个杰出的民族。最早他们只是居住在巴勒斯坦的一个小部落，或者是几个小部落，《旧约圣经》中记载了他们的早期历史。犹太人十分自负，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但是这也是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抱有的幻想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他们不断地遭到征服、压迫以及奴役，有不少优美感人的英语诗篇正是引用了《圣经》官方译本对犹太人的吟唱和哀歌的译文。我想希伯来语文本也是

十分优美的，甚至应该更加优美。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诗篇》（*Psalms*）中一些经典的句子：

>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
>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
>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
>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
>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
>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
> 我若不记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注)

最后这些犹太人散落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他们没有家园，也没有母国。无论到哪里，他们都被当作异族人，不受欢迎，也不受待见。他们被迫聚居在城市的特定区域里，当地人都远离这些被称为“犹太贫民窟”的角落，把他们看作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有时他们还会被迫穿上特别的服装，来给自己打上标记。他们饱受欺辱和虐待，甚至遭遇过大屠杀；“犹太人”这个词成为咒骂用语，意思和守财奴以及贪婪的放债者不相上下。面对诸多的苦难，犹太民族不仅幸存了下来，还尽力保留了自己的种族文化特征；这个民族不断发展壮大，并且涌现了一大批伟大的人物。时至今日，许多出类拔萃的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金融家、商人都出身于犹太民族，甚至就连最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是犹太人。当然，大多数犹太人仍然处境凄凉；大批犹太人散布在东欧的各个城市，不时遭受着“集体迫害”或者大屠杀。这些没有家国的犹太人，尤其是他们当中最贫苦的群体，从未忘却对古老耶路撒冷的梦想。对他们而言，耶路撒冷

是那么宏伟壮丽，超凡入圣，但这也只是存在于他们的梦中而已。他们把耶路撒冷称作“锡安”（Zion），意为“乐土福地”，而正是因为他们对过去的向往，犹太复国主义，亦称锡安主义（Zionism），就此兴起，他们热切渴望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

临近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已然渐具雏形，它成了殖民化运动，许多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定居下来。与此同时，希伯来语也渐渐复兴起来。在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队入侵了巴勒斯坦。1917年11月，英军进入耶路撒冷，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发表了《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宣称他们的目的是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这个宣言的意图是要赢得全世界犹太人的好感和支持，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这个宣言赢得了犹太人的一致欢迎。但是这个计划有一个小缺陷，就是人们似乎完全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要知道，巴勒斯坦可不是荒郊野地，更不是无人居住的空城，它早已成了其他民族的家园。因此英国政府这一慷慨的举动却是以牺牲巴勒斯坦现有居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这些民族，不论他们是阿拉伯人还是非阿拉伯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只要不是犹太人，都一致激烈地抗议这个宣言。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这些抗议的民族认为，犹太人会全面加入竞争行列，而他们背后雄厚的资本将会让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说一不二；他们害怕犹太人会来夺走他们的口粮，抢占农民的土地。

从此以后，巴勒斯坦的历史就充斥着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的各种矛盾冲突，而英国政府则根据情势需要，选择支持其中一方，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它都偏向了犹太民族。这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政府，完全沦落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在基督徒和其他非犹太民族的大力支持下，阿拉伯民族一直在争取民族自决和完全自由。他们一直强烈抗议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并且坚决反对新移民的到来，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这里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了。随着犹太移民蜂拥而至，他们的恐惧和愤怒与日俱增。他们（阿拉伯人）宣称：“锡安主义从来都是英国帝

国主义的帮凶；活跃的锡安主义领袖们四处活动，竭力主张一个强大的犹太人民族之家才能有助于英国霸占通往印度的道路，因为它才是那个能够扼杀阿拉伯民族理想的力量。”你看，印度怎么出现在这些不合时宜的地方啊！

阿拉伯国会决定对英国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并拒绝参与英国人组建的立法委员会选举。这次抵制活动十分奏效，最终英国人的委员会流产了。这类不合作政策持续了几年时间；之后它的执行不再那么坚决，一些组织又恢复了与英国人的一些合作。即便如此，英国人最终也未能建立起选举委员会，而英国高级专员在这里相当于是权力无边的苏丹王，对这个国家进行着绝对的统治。

1928年，在阿拉伯国会中，其他阿拉伯组织再次团结起来，强烈要求“基于正当权利”实施议会民主政体。他们进而更为大胆地声明，“巴勒斯坦人们不能也不会容忍目前的绝对殖民主义政体”。此次阿拉伯民族主义新浪潮展现出了一个有趣的特点，即这些民族主义者开始重视经济问题了，这常常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状况的理解正在不断地加深。

1929年8月，大规模的阿以暴乱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是因为犹太人人口急剧增加，资本愈加雄厚，这让阿拉伯人愤愤不平，恐惧难安。不仅如此，犹太人反对阿拉伯人的自由诉求也加深了两个民族的矛盾。但是，这场暴乱的导火索是关于“哭墙”（Wailing Wall）的纷争。这是耶路撒冷老城古代以色列第二圣殿护墙的一段。犹太人认为，这段遗址是对他们过去辉煌的纪念，因此这对他们来说是第一圣地。不久之后，这里修建了一座清真寺，而“哭墙”则被归入这座建筑物之中。犹太人常常在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大声哭诉流亡之苦，这也是“哭墙”名字的由来。但是穆斯林强烈反对犹太人在他们最著名的清真寺前做出这种哀哭的行为。

骚乱很快平息下来，但是阿以双方通过其他各种方式继续进行斗争。最奇怪的是，巴勒斯坦的所有基督教派都全力支持阿拉伯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团结一致，积极地参与了各种大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在这些运动中甚至还出现了女性活跃的身影。这充分表明，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并非是宗教矛盾，而是新来者与原住民之间的经济冲突。国际联盟对英国政府提出了强烈谴责，认为它未能很好地履行托管义务，并指出它在1929年大骚乱问题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巴勒斯坦实际上仍然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从某些方面来说，甚至还不如完全殖民化的国家。英国仍然玩弄各种伎俩，挑起阿以矛盾，让它们相互争斗，在巴勒斯坦保持这种事态。英国官员遍布该国各个机关，占据了所有的高级职位。跟其他半殖民化国家一样，英国完全忽视了阿拉伯人对教育发展的强烈需求，在教育领域毫无任何建树。而犹太人财力雄厚，因此他们能够建起条件优越的各种学校。犹太人人口大增，相当于穆斯林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而他们的财力则更为惊人。他们似乎正在期盼着他们的未来；他们相信，终有一天他们必能成为巴勒斯坦最为举足轻重的民族。阿拉伯人试图赢得他们的支持，劝说他们加入追求民族自由和民主政府的斗争中来，但是他们将阿拉伯人的好意拒之门外。他们更乐意与外国统治势力沆瀣一气，助纣为虐，竭力阻止巴勒斯坦大众对自由的追求。因此，难怪巴勒斯坦大众（主要包括阿拉伯人，还有基督徒）会如此憎恶犹太民族了。

外约旦

战后，英国以约旦河为界，在约旦河的东岸建立起了一个小国，这个小国与巴勒斯坦隔河相望。这就是外约旦的由来。它的国土面积极小，位于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并且还临近沙漠。这个国家的总人口数为30万左右，几乎还未能达到一个中等规模城市的人口数量

标准！英国政府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并入巴勒斯坦，但是帝国主义从来都是喜分厌合，以此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这个国家是通往印度的陆上交通线和空中航线的重要枢纽。它也是连接沙漠和通向西海岸的富饶国家的纽带，其战略地位十分突出。

虽然这是一个弹丸小国，但相继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其完整性和复杂性绝不亚于周边大国的情况。在这里，民众纷纷要求实行议会民主制度，但是英国政府从未表示过赞同，不仅如此，它还镇压示威游行，设立审查制度，驱逐民族领袖，并拒绝批准政府的措施，帝国主义的各种手段简直是层出不穷。英国人精心谋划，扶植埃米尔阿卜杜拉（Emir Abdullah，汉志国侯赛因国王次子，埃米尔费萨尔的弟弟）上台，成了外约旦的统治者，但是他只是英国一手操纵的傀儡。他成了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替罪羊，在外约旦民心尽失。实际上，阿卜杜拉治下的外约旦与某些印度小邦较为相似。

从理论上说，外约旦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在1928年时，阿卜杜拉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一个条约，同意英国拥有各种形式的军事及其他特权。事实上，外约旦已经沦为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了。

在1929年巴勒斯坦骚乱事件期间，外约旦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民众对英国以及《贝尔福宣言》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我不厌其烦地详细阐述了各个国家的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简直如出一辙，就像历史在不断地重演一般。我是想让你知道，虽然我们常常认为自己的祖国是与众不同的，但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在这些国家里，外国势力野蛮入侵，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席卷整个东方，帝国主义随即采用同样的手法对其进行了无情的压制，这个历史的进程是何其相似。民族主义不断发展壮大，帝国主义的统治策略也随之进行了细微的调整；帝国主义已经不再拘泥于形式上的控制，开始做出努力平息事态，并做出让步。同时，在这些国家中，不仅是民族独立斗争愈演愈烈，各种社会冲突以及阶级矛盾也日益凸

显。在这个过程中，封建统治阶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有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势力越走越近，狼狈为奸，沆瀣一气。

说明（1938年10月）：阿拉伯民族主义、犹太锡安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共存于巴勒斯坦，这三方势力之间冲突不断，矛盾趋于白热化。纳粹德国在欧洲大获全胜，驱使大批犹太人逃离中欧，纷纷涌入巴勒斯坦，使得该国的压力陡增。阿拉伯人对此更加忧惧，害怕他们会被淹没在犹太移民的浪潮里，更担心从此以后巴勒斯坦会落入犹太人之手。因此阿拉伯人开始奋起反抗，但是有一些人开始采取恐怖主义手段。锡安主义极端分子随即采取了同样的恐怖手段，对其施以血腥的报复。

1936年4月，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宣布开始大罢工。尽管英国当局派遣军队进行了镇压，也进行了报复性的打击，但是这场罢工还是持续了将近半年之久。各种仿照纳粹模式的大型集中营比比皆是。在这场斗争中，英国一败涂地，因而英国政府指派了皇家委员会前来调查巴勒斯坦的局势。此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并不成功，英国应该放弃这一托管权。它进而建议把这个国家分割为三大块，即其中较大的一个区域由阿拉伯人控制，另一个较小的近海区域由犹太人控制，而耶路撒冷地区则完全由英国直接控制。不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几乎都反对这个分裂计划，但是许多犹太人已经做好实施这个计划的准备了。

不幸的是，阿拉伯人大肆采用了恐怖主义手段，而犹太人有时也会采用同样的手段予以报复。英国政府在过去以及现在都施行残暴政策，热衷杀戮和毁灭，试图彻底扑灭阿拉伯人的民族独立斗争。它在巴勒斯坦倒行逆施，所用的手段甚至比爱尔兰王室警吏团（Black and Tan）更为恶劣。巴勒斯坦遭受了严酷的新闻封锁，与世界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了。但可怕的事情还远不止这些。我近来才知道，英国军队把阿拉伯“可疑分子”们集中关押，圈禁在多个用带刺钢丝围成的大

片区域内，这些被称为“铁笼子”的区域每个能容纳50至400名囚徒，他们的饮食问题由自己的亲人来解决，简直就像是笼中困兽一般。

与此同时，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怒火正在熊熊燃烧。帝国主义势力对民族独立自由运动的血腥镇压手段，对整个东部地区，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均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的确，这些民族曾经多次采取恐怖主义行动，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英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残酷压迫之下，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为本族独立自由而战。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是遭受压迫的民族，但是他们之间也势不两立，非要争个你死我活，这真是莫大的不幸。犹太人的确值得同情，他们在欧洲的经历极为惨痛，大批犹太人失去家园，颠沛流离，连一处容身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完全明白他们对巴勒斯坦的向往。事实上，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的确改变了那里的状况，引入了先进的工业，也提高了生活水平。但是我们必须谨记，事实上巴勒斯坦现在是，而且将来也必会是一个阿拉伯国家，因此阿拉伯人绝不应该在自己的国土上遭到打击和镇压。两族人民不应该侵犯对方合法的权益，而应该在一个自由的巴勒斯坦国内相互合作，互帮互助，共同建设一个先进的国家。

巴勒斯坦正好位于通往印度和东方的海上航线以及陆上通道之上，因此，它不幸地成了英国帝国主义图谋的一个核心要素。为了继续实施这个图谋，英国无耻地利用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未来的一切都是那么扑朔迷离。既定的分割计划可能会宣告破产，而另一个方案却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即把巴勒斯坦划分为一大一小两部分，前者为阿拉伯联邦（Arab Federation），而后者为犹太人自治区。但是，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绝不会屈服，只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消灭帝国主义，才能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

1. 《诗篇》第137篇，出自《圣经和合本》。——译者注

168 ——沙特阿拉伯——告别中世纪，跃入现代社会

在前几封信中我对你讲述了其他几个阿拉伯国家的故事，但是我至今仍未提及阿拉伯语言与文化的源头以及伊斯兰教的诞生地——沙特阿拉伯。尽管它是阿拉伯文明的发源地，但是它十分落后，仍停留在中世纪的时光里难以自拔。现代文明的浪潮席卷了全球，其他几个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都在昂首阔步向前进，而它却被历史的车轮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沙特阿拉伯幅员辽阔，它的国土面积相当于印度的三分之二左右，但总人口只有四五百万，也就是说，只相当于印度人口的十七分之一或十八分之一。显而易见，这个国家地广人稀，它的国土大多为沙漠地带，正因如此，它在过去才幸运地避开了冒险家们贪婪的目光。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是在这里，中世纪的阴影挥之不去，一切新兴事物如铁路、电报或电话均不见踪迹。这里的主要居民是游牧民族贝都因人，他们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东游西荡，骑着行动敏捷的“沙漠之舟”骆驼或骑着闻名于世的阿拉伯骏马穿越沙漠，到处迁徙。这个民族实行的族长制已经维持了1000年之久，但是世界大战的影响何其深远，为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伟大的阿拉伯半岛正处于红海和波斯湾之间。它南临阿拉伯海，北靠巴勒斯坦、外约旦和叙利亚沙漠地带，东北面紧邻伊拉克绿意盎然、土地肥沃的山谷地区。它的西面是红海沿岸，正是伊斯兰教的摇篮汉志王国的疆域。这里有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以及吉达港，每年成千上万的朝圣者乘船来到吉达港，前往麦加朝圣。在沙特阿拉伯的中部地区，从半岛的东部直到波斯湾的区域

是内志王国（Nejd）。汉志和内志是沙特阿拉伯的两大主要地区。阿拉伯半岛的西南端是也门（Yemen），古代罗马人曾称它为“阿拉伯福地”、“幸运阿拉伯”或“快乐阿拉伯”，这是因为也门一带沃野千里，物产丰富，而阿拉伯半岛的其他区域大多是贫瘠的不毛之地。可想而知，这个国家的人口极为稠密。亚丁湾几乎正位于阿拉伯半岛的西南角，它是英属港口，是船只在地中海和印度洋（东西方）快捷往来的必经港口。

世界大战前，沙特阿拉伯几乎完全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或是说它承认土耳其人的皇权地位。但是在内志王国，穆罕默德的后裔埃米尔伊本·沙特（Emir Ibn Saud）逐渐崛起，确立了其在内志王国的统治地位。他一路征战，把王国疆域一直延伸到了波斯湾沿岸。这段历史发生在世界大战之前。伊本·沙特是瓦哈比派（Wahabis，伊斯兰教的一个特别派别，隶属于逊尼派）的领袖，这个派别是阿卜杜勒·瓦哈卜（Abdul Wahab）于18世纪创立的。瓦哈比派掀起了一股伊斯兰教复兴运动，这与基督教的清教运动较为相似。瓦哈比派反对穆斯林推崇的多种宗教仪式和圣徒崇拜，严禁人们瞻仰圣墓或圣徒的遗迹以达到祈福的目的。瓦哈比派将这些行为称为盲目崇拜，正如欧洲的清教教徒将罗马天主教崇拜圣像和遗迹的行为称之为盲目崇拜一样。因此，瓦哈比派与沙特阿拉伯的其他伊斯兰教派别不仅在政权上势不两立，在宗教上也素有宿怨。

在世界大战期间，沙特阿拉伯成了英国玩弄阴谋诡计的温床，英国和印度慷慨大方地向阿拉伯各酋长提供大笔资金，重金收买他们，以达到它的特殊目的。英国人对他们满口承诺，鼓励他们反抗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有时英国人还会同时援助两位相互争斗的酋长！英国人成功获得了麦加的侯赛因王子的支持，从此阿拉伯反抗运动便上了一个新台阶。侯赛因王子是穆罕默德先知的后裔，因此他的地位超然，深受人民敬仰。英国人对他许下承诺，保证帮助他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王国。

伊本·沙特头脑更清楚。他不仅让英国承认了他对内志王国的独立统治，而且还得到每月6000英镑（相当于7万左右印度卢比）的小笔资金援助，以换取他在争斗中保持中立。因此，当其他酋长都在忙于争斗之时，他却巩固了地位，并加强了统治，当然从某方面来说，这也得归功于英国人的金钱支持。由于侯赛因王子参与了反对土耳其苏丹的叛乱，他因此逐渐在伊斯兰教国家（包括印度）中失去了民心，这是因为在那时苏丹王也是伊斯兰教的哈里发。伊本·沙特却在这场动乱中默默地保持着中立态度，充分地利用了瞬息万变的局势，渐渐赢得了名声，成了伊斯兰教世界的重要人物。

在战争期间，南部也门的统治者，亦称伊玛目（Imam），仍然效忠于土耳其帝国。但是他远离战场，有心相救，却无能为力。土耳其战败后，他不再受制于人，而也门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战争结束后，英国把沙特阿拉伯牢牢地攥在手里，并试图把侯赛因和伊本·沙特变成它的统治工具。精明的伊本·沙特是决不允许自己受人利用的。但是，侯赛因的家族接受了英军的保护，从此荣光绽放，无比显赫。侯赛因本人成了汉志王国的国王，他的一个儿子费萨尔成了叙利亚的统治者，而英国扶持他的另一个儿子阿卜杜拉当上了新建小国外约旦的统治者。但是，这份荣耀昙花一现，费萨尔被法国人驱逐出了叙利亚，而侯赛因的王权在伊本·沙特领导下的瓦哈比派的步步紧逼之下也摇摇欲坠。在费萨尔再次失去统治地位之后，英国人把他扶上伊拉克统治者的宝座。在那里，他完全依赖着英国的势力，维持着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侯赛因统治汉志王国的短暂时期内，位于安哥拉的土耳其议会在1924年宣布废除哈里发制度，从此哈里发不复存在。然而胆大妄为的侯赛因急不可耐地抢过这个空荡荡的宝座，宣称自己为伊斯兰教的哈里发。伊本·沙特认识到他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于是迅速向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及伊斯兰教国际主义发起呼吁，号召共同反对侯赛因的行

径。他振臂一呼，挺身而出，摆出一副对抗野心勃勃的篡位者、捍卫伊斯兰教的姿态。他的宣传攻势小心而谨慎，他因而获得了其他国家穆斯林的好感。印度的基拉法特委员会也对他送上了美好的祝福。英国人敏锐地发现，整个大风向已经发生了改变，也意识到他们押宝的那匹马绝不可能获胜，因此他们悄悄地撤回了对侯赛因的支持。英国中断了对侯赛因的资助，拒不兑现对他许下的诸多承诺，而这个可怜的侯赛因几乎沦为了孤家寡人，面对着步步紧逼的强大对手，他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瓦哈比派只花了短短数月的时间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并于1924年10月进入了圣城麦加。在教派信仰的驱使下，他们摧毁了几座圣墓。伊斯兰教国家对他们的行为感到相当震惊，甚至印度也对此深感不安。次年，麦地那和吉达也落入了伊本·沙特之手，而侯赛因和他的家族遭到驱逐，狼狈逃离了汉志王国。1926年初，伊本·沙特宣布成为汉志国王。为了巩固王权并赢得国外穆斯林的善意，他于1926年6月在麦加举行了伊斯兰教世界大会（Islamic World Congress）。显而易见，他并不想成为哈里发，而他的瓦哈比派背景也让他不可能获得穆斯林大众的支持。之前我们谈到过埃及的福阿德国王，你应该还对他的反民族主义行径和独裁统治记忆犹新吧。他热衷于成为哈里发，但是没人支持他，甚至埃及本国人民也唾弃他。侯赛因在战败后逊位，退下了哈里发的宝座。

在麦加举行的伊斯兰教世界大会并未达成任何重大的决策，也许它的初衷也不在于此。它是伊本·沙特采取的手段，旨在巩固其地位，尤其是要以此来威慑外国列强。印度基拉法特委员会的与会代表[我认为穆罕默德·阿里毛拉（Maulana Mohammad Ali）是其中一员]失望而归，对伊本·沙特感到十分愤怒。但是这对伊本·沙特毫无影响。当他需要印度基拉法特委员会的帮助时，他毫不犹豫地利用了它，而现在他羽翼已丰，不再需要它的善意了。

伊本·沙特很快控制了几乎整个沙特阿拉伯，但是也门仍然偏安一隅，尊伊玛目为其领袖。但是除了这个西南端的小国外，伊本·沙特成了沙特阿拉伯的主宰，他得到了内志王国国王的封号，从此身兼汉志王国国王和内志王国国王的双重身份。外国列强承认了他的独立地位，外国人在这个国家里也并未享受到特权，就跟他们目前在埃及的状况一样。的确如此，他们甚至不能饮用任何酒精类饮品。

伊本·沙特既是一名出色的军人，也是一名优秀的斗士。现在他开始进行更为艰难的工作，要让他的国家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他的国家将从族长制阶段一举迈入现代世界。伊本·沙特似乎在这个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向世界展现出了他的远见卓识和政治眼光。

首先，他成功地平定了内乱。在极短的时间内，伟大的商队和朝圣路线都变得非常安全。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人数众多的朝圣者一直以来在他们的行程中都不时会遭遇抢劫的威胁，他们自然对这种改变十分欢迎。

他还取得了更加瞩目的成就，那就是让游牧民族贝都因人定居下来，不再迁徙。甚至在他征服汉志王国之前，他就开始了这项安居计划。通过这种方式，他为现代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贝都因人热爱自由，他们不愿意总待在一个地方，热衷于四处漫游。要让他们安定下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伊本·沙特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国家管理在许多方面得以改善，飞机、汽车、电话以及许多其他现代文明的标志性产物，也在这个国家出现了。汉志王国的确正在缓慢地实现现代化。但是要把一个停留在中世纪的国家马上变成现代国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大的困难在于改变人们的看法。许多阿拉伯人并不待见这个新的进步和变化；西方那些复杂的机器、各种发动机、汽车以及飞机让他们大惊失色，他们认为这些都是邪恶的发明。他们抗议革新，甚至在1929年群起反抗伊本·沙特。伊本·沙特运用老练的手腕与他们周旋，并试图通过辩论获取他们的支持，最后他成

功地拉拢了许多抗议者。那些继续反抗的人最终都被伊本·沙特打败了。

在此之后，伊本·沙特又面临另一重大难题，但这是世界各国都不得不面对的苦难。1930年以来，全球贸易陷入低谷。西方各大工业强国的感受尤为强烈，但是它们仍在咬紧牙关奋力挣扎着。沙特阿拉伯与世界贸易并无关系，但是这场萧条给它带来了另一种影响。伊本·沙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每年大量涌入麦加的朝圣者。过去每年大约有10万名外国朝圣者前来圣地麦加朝拜。1930年，这个数字忽然跌至4万人，而且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仍旧保持着下跌趋势。这种情况让沙特阿拉伯国内经济结构陷入了混乱，而沙特阿拉伯大部分地区都穷困潦倒。紧张的财政让伊本·沙特在诸多方面寸步难行，他的许多改革计划不得不暂时停顿。他绝不向外国势力让步，这是因为他害怕一旦放任外国势力剥削本国资源，那么外国影响力必将增强。这将意味着外国势力可以干涉内政，而本国的独立地位会遭到削弱。他的恐惧不无道理，这是因为那些殖民国家所遭受的伤害大多源自外国势力的剥削。比起以失去自由为代价而获得的一定进步和财富，伊本·沙特宁愿他的国家贫穷也要自由。

但是，贸易衰退给沙特阿拉伯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迫使伊本·沙特不得不稍微调整相关政策，允许外国人享有一定的特权。即便如此，他还是十分谨慎，坚决地捍卫着独立主权，并专门为此设置了限定条件。当时他只授予外国穆斯林团队一定的特权，因此首先获得特权的有一个穆斯林资本家群体，伊本·沙特授权他们修建连接港口城市吉达和麦加之间的铁路。这条铁路在沙特阿拉伯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这是因为它为每年一度的朝圣之旅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它不仅方便了万千朝圣者，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沙特阿拉伯的现代化进程。

在前一封信中，我向你提起过现在的一条重要铁路，这条名为“汉志铁路”的线路，把麦地那和位于叙利亚的巴格达铁路阿勒颇段连接了起来。

在这封信的前面部分，我曾提到西南端的也门被称为“阿拉伯福地”。事实上这个名称也适用于沙特阿拉伯南面的大部分地区，这个范围还一直延伸到波斯湾周边地区。但是这个名称完全不适合用来描述这个地带，因为这里是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沙漠。也许过去人们对它的认识不够充分，才会有此误解吧。迄今为止，这里仍是一片未知的领域，是地球上少有的、在地图上未有标记的地带。

169 ——伊拉克与空中轰炸的优势

还有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阿拉伯国家，它就是伊拉克，史称“美索不达米亚”。这是一片位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富饶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流传着许多古老的故事，巴格达的悠久历史辉煌灿烂，而阿巴斯王朝哈里发哈伦-拉希德与《一千零一夜》也是千古流传。伊拉克位于波斯与阿拉伯沙漠地带之间；南面是它的最大海港巴士拉，离波斯湾仅有极短的水程；它北接土耳其，与土耳其的交界处位于库尔德斯坦，这个地区的主要居民为库尔德人。现在大多数库尔德人都在土耳其境内，我曾向你讲述过他们反抗土耳其人、追求自由的斗争。但是也有不少库尔德人居住在伊拉克，他们成了这个国家中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摩苏尔曾是土耳其和英国之间争斗的焦点，而现在属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这就意味着它完全落入英国人的控制之中。在摩苏尔附近还有亚述人的古都尼尼微的废墟。

伊拉克是英国诸多“托管地”之中的一个，英国获得的“托管权”来自国际联盟，这个联盟伪善地将这种权力称为“代表国际联盟履行的、文明的‘神圣托管’”。它认为这些托管地的居民文明程度不高，或者他们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就必须让大国介入给予帮助。这就好比是派来一只老虎来保护一群牛或鹿的利益。托管权本应是按照所涉人民的需要来授予。但是，那些从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却沦为了英国和法国的“托管地”，命运则任由这两个大国拿捏。我曾经对你说过，这两个大国的政府公开表示，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完全彻底地解放各国人民……建立起国家政府和政权，其权力必须由本国人民主动自愿赋予”。那么在过去的12年中，它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实现这个崇高目标的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

经对叙利亚、巴勒斯坦、外约旦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这些国家动乱不断，不合作以及抵制运动时有发生。那时，“主动与自由选择”只是空谈而已，英法两国实施暴力统治，射杀反抗的人民，将他们的领袖驱逐出境，让其流亡在外，封锁他们的报纸，毁灭他们的城市及乡村，还常常宣布进行军事管制，以此来镇压人民的“主动与自由选择”。这些事件屡有发生，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在历史记录中可以看到，自其形成之初起，帝国主义势力就一直热衷于暴力、毁灭和恐怖统治。现代帝国主义的新特点是它使用“信任关系”、“大众之利益”、“落后民族实现自治的训练”以及类似的伪善措辞，试图以此掩饰其恐怖统治及残酷剥削的本质。他们大开杀戒，蓄意毁灭，只为彻底损害人民的利益。也许它的惺惺作态是进步的标志，因为虚伪是对美德表示的崇敬，这说明真相不受人喜欢，因此才需要用这些宽心的言辞来蒙蔽人心，从而掩藏本质。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道貌岸然的虚伪行径似乎远比残酷的真相更为可怕。

现在让我们看看伊拉克人民的愿望是如何得以实现，以及这个国家是如何在英国的托管之下走向自由的。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把伊拉克用作对抗土耳其军事行动的基地，因此大批英国和印度的军队涌入这个国家。1916年4月，汤森德将军（General Townshend）麾下的英军被迫在库塔-阿尔-阿马拉（Kut-al-Amara）向土耳其人投降，这是英国人在开战后遭遇的第一次重大失败。在美索不达米亚行动中，各种浪费十分惊人，整体管理极为混乱，印度政府应该对这种糟糕的局面付起主要的责任，而它也因为效率低下以及愚蠢无能而备受各方的强烈谴责。但是，从长期来看，英国充足的资源让它具备了绝对优势，它把土耳其人赶到北面，夺取了巴格达，最终几乎占领了摩苏尔。战争结束时，英军已经占领了伊拉克全境。

1920年初，伊拉克出现了反对授权英国托管伊拉克的第一波浪潮。伊拉克人强烈抗议这项决定，随即骚乱四起，最后升级成了一场叛乱，战火蔓延到伊拉克全境。在1920年的前半年，土耳其、埃及、

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和波斯几乎同时爆发了各种骚乱，这种“巧合”真是令人惊讶。那个时期，甚至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也在印度流行开来。最后，在印度军队的大力协助下，伊拉克的叛乱遭到了血腥镇压。一直以来印度军队的任务就是帮英国帝国主义干这种卑鄙的勾当。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祖国才会遭到中东以及其他地区的唾弃。

英国之所以能够平息伊拉克叛乱，一部分原因在于军队镇压，而另一部分原因是它承诺将来给予伊拉克独立地位。他们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其中各位部长都是阿拉伯人，但是每位部长都受到一位英国顾问的监管，因此英国才是实际的统治力量。这些部长是由英国指定的，温顺而听话，但是英国就连他们都不满意，认为他们总是咄咄逼人。根据英国的计划，伊拉克必须完全服从它的统治，成为它的附庸，对此不少部长绝不敢苟同，他们拒绝与英国为伍。因此，在1921年4月，英国逮捕并流放了为首的赛义德·塔里布沙阿（Sayyid Talib Shah），他也是这些部长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人物。英国接下来采取了另一种行动，准备让伊拉克实现独立。1921年夏天，英国把汉志王国侯赛因国王的儿子费萨尔带到了伊拉克，并向伊拉克人表示他将成为他们的国王。你一定还记得费萨尔这个人，那时他刚刚失去统治地位，其叙利亚政权在法国的攻势下已经分崩离析了。他是英国人忠诚的伙伴，曾在世界大战期间领导过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的统治。因此，他肯定比伊拉克当地的部长们更有可能顺从于英国的计划。伊拉克的显要阶层，包括富裕的中产阶级以及其他上层人士，都同意接受费萨尔成为伊拉克的国王，但是他们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立宪并且成立民主议会。在这个方面他们几乎毫无选择。他们想要的就是真正的议会，而费萨尔始终都会坐上国王的宝座，那么他们就把成立议会作为谈判的条件。没有人想到该去听听普通大众的意见。因此，费萨尔在1921年8月成了伊拉克的国王。

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伊拉克人坚决反对英国的托管，并要求完全独立，随后他们与其他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了。人民激动的情绪不断高涨，各种示威游行此起彼伏，终于在一年后，也就是1922年8月，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但是英国当局的处置方法又给了渴求独立的伊拉克更为沉痛的教训。英国高级专员帕西·考克斯爵士（Sir Percy Cox）终止了国王的权力（当时国王的健康状况不佳），与此同时，还剥夺了伊拉克现有的政府部门和委员会的权力，完全操控了政府。事实上，他成了彻底的独裁者，凭借英国军队的力量（尤其是英国空军）推行着他的意志，并镇压了各种骚乱。历史再一次重演。在每个国家，如印度、埃及、叙利亚等，我们都发现，虽然具体的事件略有不同，但是历史惊人地相似。民族主义报纸遭到查禁，政党遭到解散，领袖们流亡国外，而耀武扬威的英国轰炸机奠定了大英帝国的绝对权威。

这一回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几个月后，帕西·考克斯爵士允许国王和政府部门对外行使职能，但是要他们同意与英国签署一个条约。英国再次保证将会帮助伊拉克实现民族独立，甚至还会帮助它成为国际联盟的一员。但是，在这些美妙舒心的承诺背后隐藏着铁一般的事实，那就是伊拉克政府被迫在英国官员或者英国认可之人的监管下来管理国家。1922年10月的条约，在人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生效了，伊拉克人都一致谴责这份条约。有人指出，阿拉伯政府就是个假象，真正的权力仍然掌握在英国当局的手中。因此，伊拉克领袖们决定要联合抵制国民制宪议会选举，而这个议会的召集目的，就是草拟未来的宪法。这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十分奏效，而国民制宪会议也未能召开。在征税的过程中也是困难重重，骚乱不断。

整整一年时间，一直到1923年底，这些麻烦仍然绵绵不绝。最终，条约进行了一些有利于伊拉克的修改，而一些主要的煽动者遭到了流放。愤怒的情绪缓和下来，国民制宪议会的选举终于在1924年初得以举行。国民制宪议会也反对这一英国条约，但是英国人对其施加

了沉重的压力，因此最后它批准了这个稍加修改的条约，只有三分之一的与会人员投了赞成票，而许多代表甚至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国民制宪会议为伊拉克草拟了一份新宪法，这份新宪法表面上看来十分公正，它规定伊拉克是一个主权独立的自由国家，实行世袭君主立宪制，建立议会制政府。但是议会两院中的参议院由国王指定，如此一来国王就拥有了极大的权力，而国王背后的英国官员们就能占据这些关键位置。该宪法于1925年3月正式生效，在随后的数年里，这个新议会虽然运转正常，但是伊拉克人反抗托管权的行动仍在继续。当时，伊拉克十分关注英国与土耳其之间有关摩苏尔的争夺，因为它也宣称摩苏尔是自己的领土。这场纷争最终在1926年6月得以解决，英国、伊拉克和土耳其为此签署了一份三方条约。摩苏尔归伊拉克所有，但是由于伊拉克自己仍处于英国帝国主义的阴影之下，因此英国人保全了自己的利益。

1930年6月，英国和伊拉克签订了一个全新的联盟条约。在这份条约中，英国再次承认了伊拉克在内外事务中的完全独立地位。但是英国仍对伊拉克进行保护，并且在该国享受特权，因此伊拉克实际上还是英国的保护国，而“独立”只是一块遮羞布而已。为了保护通往印度的路线，即条约中所述的英国“必要的交通”，英国要求伊拉克为英国空军提供基地。同时英国保留其在摩苏尔和其他城市的驻军。伊拉克必须接受英国军事教官，英国官员将会在伊拉克军队中行使顾问职能。英国将会向伊拉克提供武器、炸弹、飞机等一切物资。一旦战争爆发，英国将会使用伊拉克的所有设施，以对敌人发动军事行动。因此，英国军队就可以从摩苏尔周围的战略地区出发，轻易就能对土耳其、波斯或者阿塞拜疆（Azerbaijan）实施军事打击。

在这份条约之后，英国和伊拉克在1931年又签订了一份司法协议。该协议规定，伊拉克同意雇用一名英国司法顾问，让英国人在上

诉法庭担任主席一职，并让英国人在巴格达、巴士拉、摩苏尔以及其他地区担任主席。

除了这些条款之外，英国官员们似乎还占据了很多政府高级职位。因此，这个“独立”国家实际上就是英国的保护国，而1930年的联盟条约还确保这种关系会持续25年之久。

尽管在1925年新宪法生效后，新议会得以正常运行，但是人们对目前的状况仍然十分不满，在边远地区各种骚乱时有发生。这正是库尔德地区的真实写照。在这个地区，骚乱不断爆发，英国空军总是采用“高尚的”做法，实施空中轰炸，毁灭整个村庄，以此来平息事态。1930年英伊两国签订条约之后，关于英国支持伊拉克加入国际联盟的问题摆上了桌面。但是这个国家并不太平，各种骚乱从未停歇。不管是对拥有托管权的英国而言，还是对以费萨尔国王为首的现任政府来说，这都不是什么值得引以为荣的事情，因为这些叛乱已经足以证明伊拉克人民十分厌恶英国强加给他们的这个政府。当权派认为，把这些事情闹到国际联盟面前会带来极为不良的影响，因此他们竭尽全力诉诸武力或者进行恐怖统治，以此终结伊拉克各地的骚乱。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英国派遣其空军开展行动，努力维持和平与恢复秩序。从一名出色的英国军官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英国空军的努力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32年6月8日，英军中校阿诺德·威尔逊爵士（Lt.-Col. Sir Arnold Wilson）曾在伦敦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n Society）做过一次周年讲座，在讲座过程中他提到了下面这段话：

> （尽管《日内瓦公约》对战争行为设置了严格的规范）英国皇家空军在过去的10年内（尤其是在刚刚过去的6个月内），不间断地对库尔德人实施了轰炸。库尔德村庄沦为废墟，牛羊尸横遍野，妇女儿童伤痕累累。用《时代周刊》一名特约记者的话来

说，这一切都证明，推行文明社会的统一模式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英国人发现他们的轰炸机即将飞抵轰炸目标的上空时，当地村落的居民往往会四处逃散并且躲藏起来，而且他们也从来不会让自己成为显眼的靶子，傻傻地等着炸弹来终结他们的生命。为此英国空军专门使用了一种新型炸弹，即延时炸弹。这些炸弹落地时并不会爆炸，它们装有延迟爆炸的特殊装置。这个邪恶计策的目的是要误导当地村民，让他们在飞机离去之后返回自己的小屋，然后成为延时炸弹的牺牲品。死于爆炸的人还是相对幸运的，而那些致残的人，比如四肢被炸断的或者遭受了其他重伤的村民则更为不幸，因为这些村落十分偏远，村民们根本得不到医疗救助。

由此伊拉克国内秩序得以恢复，和平重新降临。在英国的全力支持下，伊拉克政府向国际联盟提起了申请，并获得批准成了国际联盟的成员国。有人说过，伊拉克被炮弹“轰进了”国际联盟，这的确就是事实。

伊拉克加入国际联盟之后，英国的托管权就失效了。但是，1930年英伊条约取代了托管权，从而确保了英国仍能有效地控制伊拉克。伊拉克国内对这种局面的不满情绪继续发酵，这是因为伊拉克人民要求完全独立自主，并渴望阿拉伯各国实现统一。他们对国际联盟的成员国地位并不感冒，他们与大多数受压迫的东方民族一样，都认为国际联盟不过是欧洲列强掌控的工具而已，其用途是为了加强它们的殖民统治和实现其他目的。注

现在关于阿拉伯国家的概况就到此为止了。你应该会注意到，它们与印度和其他东方国家一样，在世界大战后都受到了民族主义浪潮的巨大影响。民族主义浪潮就像一股电流，在同一时间击穿了它们。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反抗行动的相似性。这些国家大多都出现了暴

动和叛乱，但是它们逐渐改变了做法，越来越依赖非暴力不合作以及抵制政策来进行抗争。毫无疑问，这种新式反抗方法是印度在1920年发起的，当时的印度国会奉圣雄甘地为首。非暴力不合作理念以及抵制议会的做法在整个东方大地上流行开来，成为人民最熟悉的一种抗争方式，并在争取民族自由的运动中被经常采用。

我想提醒你注意一个有趣的差异，那就是英法两国采用了截然不同的帝国主义控制手段。英国在它所有的殖民地中，都尝试着与当地封建地主以及最保守落后的阶层建立同盟关系。比如在印度、埃及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如此。它在这些殖民国家中设置了君主地位，并把反动的统治者推上了宝座，这个王位摇摇欲坠，因此它清楚地知道这些统治者必将全力支持它的统治。因此它让福阿德当上了埃及国王，让费萨尔当上了伊拉克国王，让阿卜杜拉当上了外约旦国王，并努力把侯赛因推上了汉志国王的宝座。然而，法国这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试图在它的殖民地中寻求部分新兴中产阶级的支持。比如，在叙利亚，它寻求到了中产阶级基督徒的支持。在殖民地中，英国和法国都主要依靠削弱民族主义来加强统治，它们会分化民族主义力量，制造少数民族、种族以及宗教矛盾，以此来对抗民族主义运动。但是，民族主义逐渐超越了东方大地上的各种分歧，没有任何地方能像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各国那样，宗教团体淡化了彼此之间的分歧，携手为民族统一大业而共同奋斗。

在前文中我已经向你讲述过英国皇家空军在伊拉克的行动了。在过去的十数年内，英国政府始终贯彻着一项明确的政策，即派遣空军在半殖民国家中执行所谓的“警务工作”。这项政策尤其适用于那些获得了自治权并且其政府机关职位大多由本国人担任的国家。目前在这些国家中，占领军已经完全撤出，或者驻军人数大大降低了。

这样的做法好处颇多。首先，节省了大量开支，而且军事占领某国的行为不再是普遍的现象了。同时，飞机和炸弹的使用让它们能够

完全控制住局面。这样帝国主义势力在独立地区使用空中轰炸的方式的频率大大增加，其中，英国远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更青睐这种做法。伊拉克的情况我已经给你讲过了。而在印度的西南边境，正在上演同样的故事。在这里，英国空军的轰炸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这种方式也许比派地面部队攻打的传统方式更能节省开支，并且更为快速有效。但是这是一种极为残酷和恐怖的做法。的确如此，把炸弹，尤其是延时炸弹，投掷到各个村落中，无差别地毁灭一切（不管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这让我们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事情比这种做法更为野蛮残暴、令人生厌的了。这个方式也让入侵他国变成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这种做法遭到了强烈的抗议。在日内瓦国际联盟的会议上，与会代表发表了许多极具说服力的讲话，坚决抗议空袭平民的野蛮行径。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赞成完全禁止空中轰炸。但是英国仍然坚持保留其使用空军在它的殖民地执行“警务任务”的权利，这就导致国际联盟以及1933年裁军会议（Disarmament Conference）未能达成最终的协议。

---

1. 1933年9月，费萨尔国王过世，他的儿子卡齐一世（Qazi I）继位。1939年，新任国王卡齐一世在车祸中丧生，随后他年幼的儿子继承了王位。

170 ——阿富汗与其他亚洲国家

伊拉克的东面是史称波斯的伊朗，而波斯的东面则是阿富汗。波斯和阿富汗都是印度的邻邦，因为波斯与印度的俾路支斯坦地区接壤，共用边界线长达数百英里，而阿富汗则与印度比邻而居，两国之间的边界线长达1000英里左右，一直从俾路支斯坦最西端绵延至兴都库什（Hindu Kush）北部山脉地区。在中亚的腹地，兴都库什山脉印度段的高山白雪皑皑，巍然耸立，俯瞰着苏联广袤的土地。这三个国家不仅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而他们在人种上也极其相似，因为它们都曾经处于古代雅利安人的统治之下。就我们所知，它们过去在文化方面有着许多共同之处。直至最近，波斯语仍是印度北部地区博识之士使用的语言，而且目前它依然十分盛行，尤其是穆斯林很喜欢使用它。在阿富汗，波斯语为宫廷用语，并在该国的普什图人（Pashtu）中十分流行。

关于波斯，我在前面的信中已有描述，我也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了。但是我觉得有必要简要地讲述一下最近发生在阿富汗的事件。阿富汗的历史几乎就是印度历史的一部分；的确如此，阿富汗在漫长的时期一直都是印度的领地。自从它脱离印度以来，尤其是在最近的100多年里，它一直都是沙俄帝国和大英帝国之间的缓冲地带。沙俄帝国覆灭后，苏联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阿富汗的角色仍旧保持不变，在这里，英国人和俄国人钩心斗角，争夺着对它的控制权。19世纪时，这场钩心斗角演变为英国和阿富汗之间的战争，英国在这场战争中碰得头破血流，但是奠定了它的霸权地位。许多阿富汗王族成员流落到印度北部各地，这让我们想起了英国对阿富汗的军事干预。亲英的埃米尔们开始统治阿富汗，阿富汗的对外政策完全受到英国的控制。但

是，就算这些埃米尔对英国十分亲善，他们也不是绝对可靠的，因此英国每年还会给予他们大笔的资金补贴。阿卜杜勒·拉赫曼(Abdur Rahman)就是其中的一位埃米尔，他在位时间很长，于1901年才退下阿富汗王位。他的继任者为埃米尔哈比布拉（Amir Habibullah），他也是一个亲英派。

阿富汗越来越依赖在印度的英国帝国主义，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它的地理位置。从地图上可以发现，阿富汗是个内陆国家，最近的出海口是在印度的俾路支斯坦。它就好比是一间远离公路的孤独小屋，只有经由他人的土地才能与外界接触，这可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情。阿富汗通过印度与外部世界联系即为最简单的办法了。那时，在阿富汗北部的俄国领土上还没有恰当的联络方式。我相信，苏联政府近来应该已经采取了各种方式以增进联系，比如兴建铁路，或者鼓励公路和航空运输服务等。因此，印度成为阿富汗走向外部世界的窗口，而英国政府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对阿富汗施加各种压力。阿富汗没有直接入海口，难以与外界接触，这仍旧是这个国家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1919年初，阿富汗宫廷中的各种钩心斗角以及权力角逐浮上了水面，两场宫廷政变接连发生。我并不清楚幕后发生了什么事件或谁应该为这些政变负责。哈比布拉埃米尔遭到暗杀，他的兄弟纳斯鲁拉（Nasrullah）随即成为新的埃米尔。但是很快纳斯鲁拉遭到废黜，而哈比布拉的小儿子阿曼诺拉（Amanullah）成了新的埃米尔。1919年5月，他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对印度发起了一场小规模的入侵战争。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是什么呢？谁主动挑起了战争？对此我并不知情。也许阿曼诺拉对阿富汗沦为英国附庸的事实深表厌恶，他想给自己的国家赢得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也许他也认为当时的情况十分有利。你要知道，在这段时间内，旁遮普邦正处于军事戒严的恐怖气氛中，印度国内对现状普遍感到不满，而在基拉法特问题上，穆斯林的激动情绪不断高涨。不管到底是出于何种原因或动机，英国和阿富汗开战

了。但是这场战争持续时间极短，双方几乎未曾交火战争就结束了。从军事角度来说，在印度的英国帝国主义的实力当然要远远强于阿曼诺拉领导下的阿富汗，但是当时英国人无心恋战，所以几场小规模的摩擦就足以让他们向阿富汗人妥协。最终英国承认阿富汗为一个独立国家，能够全权决定它与他国的外交关系。因此阿曼诺拉成功地实现了他的目标，从此他在欧亚大陆上声名鹊起。当然，在英国人的笔下，他自然是一个反面人物。

阿曼诺拉在阿富汗国内推行新的政策，由此引来了更多的关注。这是一种基于西方路线的快速改革，被称之为阿富汗“西化”改革。在这场改革中，他的妻子索拉娅（Souriyah）王后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她曾在欧洲求学，也十分厌恶阿拉伯妇女必须戴面纱的习俗，认为这是隔离封闭女性的做法。自此阿富汗进入了一个奇特的发展阶段，改革者要求在极短的时间内改变这个国家落后的面貌，并迫使阿富汗人摒弃传统方式，并快速适应新的生活。很明显，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正是阿曼诺拉的偶像，他在许多方面都效仿了凯末尔的做法，甚至包括要求阿富汗人穿上西装，戴上礼帽，并且强迫他们刮去胡须。但是阿曼诺拉并没有具备凯末尔那样刚毅的个性与杰出的能力。在凯末尔启动全面彻底的改革之前，他已经巩固了他在国际和国内的地位。在他的身后，有一支效率极高、坚韧果敢的军队，而且他在国内的声望如日中天，不可撼动。阿曼诺拉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开始实施改革，因此他的行动更加困难重重，何况阿富汗人远比土耳其人落后。

但是事后聪明多容易啊！在阿曼诺拉统治早期，似乎气势如虹，坚不可摧。他选派了许多阿富汗少年前往欧洲学习，并在政府机关中开始实行各种改革。他与各邻国以及土耳其签订条约，以巩固他的国际地位。当时苏联政府施行慷慨友善的外交政策，有意与中国、土耳其等东方国家搞好关系。在土耳其与波斯摆脱外国势力控制的过程中，苏联的友好态度与大力帮助可谓意义重大。同样，阿曼诺拉在

1919年与英国的短暂战争中，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他的目的，这也与苏联的慷慨相助有很大的关系。在接下来的数年内，亚洲四大强国，即苏联、土耳其、波斯与阿富汗，互相签订了许多条约，建立起各种同盟关系。但是，他们并未签订任何四国条约或是三国条约。每一个国家都与其他三个国家分别签订了独立条约，但是这些条约或多或少都具有相似之处。由此在中东地区，一系列条约得以签订，加强了这些国家的实力。我将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把这些条约列举出来：

《土阿条约》 1921年2月19日

《苏土条约》 1925年12月17日

《土波条约》 1926年4月22日

《苏阿条约》 1926年8月31日

《苏波条约》 1927年10月1日

《波阿条约》 1927年11月28日

对苏联外交而言，这些条约的签订是极大的胜利，它们沉重地打击了中东的英帝国主义的势力，极大地削弱了它的影响力。不用说，英国政府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它尤其不满阿曼诺拉与苏联的友好关系以及他的亲苏倾向。

1928年初，阿曼诺拉与索拉娅王后离开阿富汗，前往欧洲进行盛大的国事访问。他们参观了许多欧洲国家的首都——罗马、巴黎、伦敦、莫斯科，所到之处都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这些国家都热切地盼望着赢得索拉娅王后的好感，以促进贸易的发展，并实现其政治目的。阿曼诺拉还收到了许多昂贵的礼物，但是他的态度不偏不倚，并未做出任何承诺。在返程途中，他访问了土耳其和波斯。

他的这次出访行程漫长，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这次访问提高了阿曼诺拉的名望，也极大地提升了阿富汗的国际地位。但是阿富汗国内局势并不乐观。阿富汗改革所带来的剧变震动了守旧者们固有的生活方式，让他们深感不满。在这种严峻的局势下，阿曼诺拉的出访可谓风险巨大。穆斯塔法·凯末尔从未冒险做过这样危险的事情。在阿曼诺拉出访在外这段漫长的时间内，那些反对他的人和势力逐渐走到了台前。他们用尽一切阴谋手段，制造了无数的谣言，以此诋毁阿曼诺拉的名声。大量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阿富汗国内，支持这股反阿曼诺拉的宣传运动。没有人知道资金的来源。许多称为“毛拉”的僧侣被重金收买，他们四处奔走，大肆宣传阿曼诺拉为“异教徒”，谴责他是与信仰为敌的。索拉娅王后身着欧洲晚礼服或便装的滑稽图片在许多村庄到处散播，这是用来揭示她以往的穿着打扮是多么不合时宜。究竟谁应该为这场影响颇广、耗费巨大的宣传运动负责呢？阿富汗人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接受相关的训练，他们只不过正好是这场宣传运动的恰当人选而已。中东和欧洲都普遍认为英国秘密情报局（British Secret Service）是这场运动的幕后推手。这一点很难得到证实，在此之后也没有确切的证据显示英国与此事有关，尽管阿富汗叛乱分子据传正是使用了英国造的步枪。但是，毋庸置疑，英国是最想要削弱阿曼诺拉对阿富汗统治的国家。

尽管在那个时候，阿曼诺拉在阿富汗国内的统治基础正在遭到削弱，但是他在欧洲各国则受到了隆重的款待。返回国内之后，他热情高涨地投入到改革工作中，新的想法层出不穷。他曾在安哥拉与凯末尔帕夏会面，凯末尔帕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更感钦佩。他立即开始工作，努力推动改革的进程。他废除了贵族阶层的封号，并试图削减宗教领袖的权力。甚至他还试图建立一个直接对政府负责的内阁委员会，以此减少他自己的专制权。同时，他也在缓慢地推进妇女的解放。

人们心中郁积的怒火突然爆发出来了，1928年末一场叛乱应时而生。在一名普通的挑水夫巴恰·依·沙科(Bacha-i-Saqao)的领导下，这场叛乱迅速蔓延开来，并于1929年取得了胜利。阿曼诺拉带着他的王后逃走了，而这位挑水夫则登上了埃米尔的宝座。纳第尔汗（Nadir Khan）领兵攻占喀布尔，推翻了巴恰·依·沙科的统治，这位挑水夫的在位时间仅仅持续了5个月。纳第尔汗曾是阿曼诺拉国王的军队指挥官以及大臣。他的心里也有自己的利益打算，在获胜之后他自己登上了王位，成了纳第尔沙阿（Nadir Shah）。尽管阿富汗国内各种纷争和动乱不断发生，纳第尔沙阿却能稳坐王位，这是因为他投靠了英国并得到了它的大力帮助。英国政府给予他大笔无息借款，并向他提供了大量的步枪和火药。阿富汗国内局势之所以会动荡不安，其主要原因不外乎是因为它是两个列强国家争权夺势的缓冲地带。(注)关于阿富汗、西亚以及南亚地区的部分就到此为止了。接下来我将简要叙述一下最近发生在亚洲东南边境的一些事件，然后这封信就写完了。

暹罗位于缅甸东面，它是这片土地上唯一艰难地保持着主权独立的国家。它被英属缅甸以及法属印度支那夹在中间。这个国家到处都是古印度的遗迹，它的传统和文化仍旧深深地镌刻着古印度的印记。直至近来，这个国家仍然实行着君主专制统治，其基本社会状态还是封建制，只有少量新兴的中产阶级。我认为，该国国王常以“拉玛”作为封号，这个词让我们不由得联想到了印度。因此暹罗的国王有拉玛一世、拉玛二世、拉玛三世，以此类推。在世界大战期间，当协约国已经胜利在望时，暹罗加入了协约国阵营，并随后加入了国际联盟。

1932年6月，暹罗首都曼谷爆发了一场政变，君主专制统治被推翻，从此暹罗在暹罗人民党的控制下，开始迈入了民主共和时期。一群年轻的暹罗军官，在一位名为銮巴立（Luang Pradit）的律师领导下，逮捕了王室成员和主要大臣们，迫使帕恰迪波国王（King Prajadhipok，即拉玛七世）接受立宪政体。国王的权力受到了限制，

而人民议会也宣告成立。这个变化能赢得广泛的支持，其原因并非因为它是民众起义。它与土耳其的一场军事政变十分相似，在这场军事政变中，年轻的土耳其人推翻了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的专制统治。帕恰迪波国王很快表示屈服，危急得以解除，但是他并非真心愿意顺从于变革，因此他在1933年4月突然宣布解散人民议会，并将銮巴立驱逐出境。两个月之后，又一场政变爆发，人民议会得以重新召集。暹罗新政府并未与英国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却更多地表现出它的亲日倾向。注

从法属印度支那到暹罗的东部大片地区，民族主义也扩散开来，并不断地发展壮大。法国政府试图镇压这场民族主义运动，因此它曾多次玩弄阴谋诡计，并长期囚禁当地许多人士。1933年3月，法国代表在日内瓦裁军会议的一次集会上曾吐露了真实的情况。这位法国代表名为M.萨罗（M. Sarraut），曾是法属印度支那总督。他提到“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日益发展壮大，使得宗主国的管理愈加困难”。他以法属印度支那的情况为佐证，指出在他出任总督之时，只需要1500名军人来维持当地秩序稳定，而现在这个人数激增到了1万人。

最后，我想说说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爪哇。这个国家因盛产甘蔗和香蕉而闻名于世，但是它也因过去发生在种植园中的残酷剥削而臭名昭著。跟印度一样，民族主义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也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镇压。爪哇国民中绝大多数都是穆斯林，世界大战以来发生在西亚的各种事件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发生在中国广东的辛亥革命规模不断扩大，这让他们感触很深，他们也对发生在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很感兴趣。1916年，荷兰政府承诺在爪哇进行立宪制改革，并在巴达维亚建立了人民委员会。但是委员会成员大多是指定的，而且并没有什么权力，因此爪哇人对它十分不满，激动的情绪不断高涨。1925年，新宪法得到批准，但是它未能带来任何变化，因此人民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岛上，罢工和暴乱时有发生。1927年爆发了一场针对荷兰政府的起义，但是它遭到

了极为残酷的镇压。然而，民族主义运动并未停止。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在这场运动中，许多国内学校得以修建，家庭手工业和手艺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跟印度一样）。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仍在继续。由于当时全球经济陷于低潮，而且国外市场以征收巨额保护性关税的方式来限制进口，爪哇的制糖工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1933年初，在爪哇以东海域发生了一场有趣的事件。一艘荷兰战舰的船员们不满于他们的工资遭到削减，于是夺取了这艘战舰的控制权，并开船驶离了这片海域。他们没有做出任何破坏性的举动，声称他们只是为了拿回自己应得的工资。但是这对荷兰政府来说是一次挑衅式的罢工行为。荷兰政府随即派出飞机对这艘战舰实施轰炸，许多船员当场毙命，而这艘船又重新回到了荷兰政府的手中。

在亚洲大陆上，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时有发生，从未停止。但是现在我们的目光必须离开亚洲，转向欧洲，因为这片土地同样需要我们的关注。但是我们还没有思考过战后欧洲的问题，你必须记住欧洲局势也是世界局势的关键。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封信中，我会说到欧洲。

在亚洲，还有两大板块还没有探讨，它们分别是中国和北面的苏联。稍后我们还会回到这两大问题上来。

---

1. 1933年11月，纳第尔沙阿遭到暗杀，他年幼的儿子继任王位，成了查希尔沙阿。
2. 1933年10月爆发了一场右翼叛乱，但叛乱很快遭到镇压，銮巴立得以继续领导政府。

171 ——一场并未发生的革命

英国著名作家G. 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曾说过，英国在19世纪最重大的事件，就是那场并未发生的革命。你应该记得，在19世纪这100年间，英国有好几次都濒临革命的边缘，这场革命是由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掀起的社会革命。但是，统治阶级常常在最后关头会做出些许让步，给予革命阶级投票权，让他们在议会中能够获得一些次要的席位，并且让他们能够分享到英帝国主义势力殖民剥削所带来的少量利益，从而阻止了一场迫在眉睫的革命。他们之所以可以这么做，是因为大英帝国还在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地，并且从中获得了巨额的利益。因此革命并未发生在英国本土，但是革命的阴影常常笼罩在这个国家头顶，英国的很多事件都因为对革命的恐惧而受到了影响。因此，一件并未实际发生的事情却被认为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事件。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世界大战后的西欧，最伟大的事件就是那场并未发生的革命。引发了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条件，中欧和西欧各国同样具备了，只不过程度较轻而已。俄国与英、德、法等西方工业强国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俄国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人阶级革命应该首先在这些发达的工业国家爆发，绝非是在落后的俄国发生。世界大战粉碎了陈旧腐朽的沙皇专制统治，但是俄国没有出现一支强大的中产阶级队伍来利用西方的议会制度以控制政府，因此工人苏维埃政权夺得了权力。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俄国的落后与积弱却成了它实现飞跃的原因，比起那些更加发达的国家，它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迈出了这一步，但是他们对现实有着异常清晰的认识。他们十分清

楚俄国的落后现状，并知道需要时间来发展自身，才能追上那些更加发达的国家。他们希望，苏维埃工人阶级共和国的建成能够激励其他欧洲国家的工人阶级，促使他们站起来反抗现有政权的统治。他们认为，要让工人苏维埃政权能够延续下去，唯一的希望就是让社会革命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否则这个年轻的苏维埃政府将会遭到资本主义世界的镇压。

正因为他们抱有这样的期望和信仰，他们才会在革命的早期阶段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传播他们的思想，呼吁他们加入到革命的浪潮中来。他们公开谴责帝国主义势力吞并他国领土的企图；他们宣传自己不会按照沙皇俄国与英法签署的秘密条约对他国领土提出所有权要求；他们明确表示，君士坦丁堡必须归土耳其人所有。他们向东方各国以及许多受到沙俄帝国长期压迫的民族提供了最为慷慨的帮助。最重要的是，他们以国际工人阶级战士的姿态站了出来，号召世界各国的工人跟随他们的步伐，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他们来说，民族主义以及俄罗斯民族一文不名，只有一件事情意义重大，那就是，有史以来，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府第一次在这片国土上建立起来了。

虽然布尔什维克的号召遭到了德国和协约国政府的压制，但是它们一点一滴地渗透到了战斗前线以及工厂区域之中。它们给世界各地带来了相当巨大的影响。法国军队明显正在分崩离析，德国军队和工人甚至受到了更大的影响。在德国、奥地利以及匈牙利这些战败国中，甚至还会常常爆发起义和叛乱，有些会持续好几个月时间，甚至还有持续一到两年的。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似乎就要降临在欧洲大陆之上。获胜的协约国比战败国情况稍好，因为战争的胜利让他们声势大振并满怀希望（之后证明都是空洞的希望），以为可以通过掠夺战败国的资源来弥补自己的战争损失。但是甚至在协约国内部也形成了革命的气候。的确如此，欧洲和亚洲各处气氛都十分沉重，人民普遍对现状感到不满，看似平静的表面之下，却是已经点燃的革命的星星之火，随时可能变成燎原之火而熊熊燃烧。但是，亚洲和欧洲的不满

情绪在内容上并不相同，而威胁发起革命的阶级也不一样。在亚洲，中产阶级是领导全国人民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中坚力量；而在欧洲，工人阶级扬言要推翻现有的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并从中产阶级手中夺取权力。

尽管革命的雷声隆隆作响，暴风雨似乎即将来临，但是最终在中欧和西欧并未发生俄国那样的革命。欧洲的旧格局十分强大，抵制住了一波接一波的攻势。但是这些攻势削弱并威慑了这个格局，保护了苏联的安全。本来苏联最有可能在1919年或1920年遭到帝国主义势力的毁灭，但是它幸免于难，这主要应该归功于工人阶级在敌人后方的努力。

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时光的流逝，事态逐渐有所平息。反动保守分子、保皇派以及封建地主与温和的社会党人或者社会民主党人结成了奇特的联盟，共同镇压了革命势力。这的确是一个奇特的联盟，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宣称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以建立工人阶级政府为目标。因此，他们的理想表面上似乎与苏联共产主义完全一致。但事实上，共产主义者远比资本主义者更让这些社会民主党人感到恐惧，因此他们与资本家联合起来，企图消灭共产主义者。或者也许他们太害怕资本家了，因此他们不敢公然反抗；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和平的议会民主途径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从而让社会主义不知不觉地传播开来。不管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确帮助了反革命势力去镇压革命精神，因此，他们实际上在欧洲许多国家中发起了反革命运动。反过来，这场反革命运动也推翻了这些社会民主党，一个激烈反对社会主义的新势力开始上台执政。大体上讲，在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这段时间内，发生在欧洲的各个重大事件都呈现出了这样的特征。

但是冲突并未结束，两大对立势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尽管这两大对立势力曾经或者将来也许能够签订临时协议或者条约，但是它们不可能达成永久的妥协。世界力量的两极

分化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和以西欧与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强国。在两极之间，各国的自由主义者、温和派以及中间党派都正在消失。全球经济陷入困境，人民生活日渐困苦潦倒，这才是造成冲突和不满的真正原因。在世界格局再次形成某种平衡状态之前，这个纷争绝不会休止。

自世界大战开始以来，欧洲曾发生了许多次失败的革命，其中发生在德国的一次革命是最为有趣、最发人深省的。因此我将要向你说说这次革命的一些情况。我已经告诉过你，在战争来临的时候，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并未实现他们的理想，也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在欧洲各国，民族主义的浪潮来势汹汹，席卷全国，并掀起了战争的血雨腥风，这些社会主义者完全迷失在战争的疯狂之中，完全忘却了社会主义国际化的理想。1914年6月30日，在世界大战濒临爆发的边缘，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发表声明，反对牺牲“德国士兵宝贵的生命”来实现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主义企图。[当时，奥利地与塞尔维亚正为奥地利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Ferdinand）遇刺事件而争吵不休。]五天后，这个政党却表示支持开战，其他国家的同类型政党也做了类似的表态。的确如此，奥地利的社会主义领袖确实说过要让波兰和塞尔维亚加入奥地利帝国，但不承认这是一种吞并行为！

1918年初，布尔什维克对欧洲工人阶级的宣传攻势，终于对德国工人产生了显著的成效，德国兵工厂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行动。德国帝国主义政府顿时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而这场罢工甚至可能会在惨痛中收场。社会主义领袖随即加入罢工委员会，从内部瓦解了这次行动，从而扭转了局面。

1918年11月4日，德国北部基尔港海军水兵哗变。德国海军的远洋战舰接到命令要出海作战，但是水手和司炉工拒绝执行命令。德国政府派出军队前去镇压这次兵变，但是军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掉转枪口对准了政府。德国政府官员要么遭到罢免，要么遭到逮捕，而工兵

代表苏维埃却得以建立了起来。这场革命与俄国早期的苏维埃革命简直如出一辙，这场革命之火似乎就要燃遍德国全境了。社会民主党领袖来到基尔港，成功地把水手和工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的问题上。虽然水手带着武器离开了基尔港，却把反抗的种子撒遍了德国大地。

革命运动迅速扩散开来。巴伐利亚（Bavaria，德国南部）宣布成立共和国。德国皇帝仍然负隅顽抗，决不投降。11月9日，一场总罢工在柏林爆发，城市的一切工作都陷入停顿。柏林卫戍部队全部加入了革命的阵营，因此并未出现暴力对抗。显而易见，旧秩序已经彻底瓦解了，但问题是新秩序到底是什么。本来一些共产主义领袖就要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了，但是一位社会民主党领袖先发制人，宣布建立议会制共和国。

德国共和国（German Republic）就这样诞生了。不过，它只是一个虚假的共和国，因为它没有带来丝毫的改变。那些控制了局势的社会民主党人几乎保留了原有的一切，他们只获得了少量的高官职位和部长身份等，而军队、文职部门、司法机构以及政府行政机关仍旧保留着德皇统治时期的原貌。因此，正如最近一本书的书名所说："德皇退位：将军们原封不动。"革命的成果不应该是这样的。真正的革命必须改变政治、社会以及经济格局。如果权力还留在敌人的手中，如何还能期望革命继续下去呢？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抱有这种荒唐可笑的想法，给了革命的敌人充分的机会，让他们可以轻松自在地筹备并规划自己的没落之路。老牌的军国主义者仍旧掌握着德国的政权。

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并不希望看到基尔港的水手在全国各地游荡，并传播他们的革命思想。他们试图镇压这些在柏林的水手，因此在1919年1月，暴力冲突时有发生。德国共产主义者随即尝试要建立苏维埃政府，并号召柏林市的人民大众加入他们。他们从人民那里得

到了一些帮助，占领了政府大楼，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内（被称为柏林的“红色星期”），他们似乎完全控制了柏林。但是人民大众并不热衷于此，因为大多数人完全搞不清楚状况，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柏林正规军也很茫然失措，因此他们选择了中立。由于这些士兵完全不可依靠，所以社会民主党人招募了一些特殊的志愿军来镇压共产主义起义。战斗十分惨烈，政府甚至下达了“格杀勿论”的命令。战斗结束后数天内，两位共产主义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以及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遭到追捕，他俩在躲藏地点被捕，并遭到反革命军队的冷酷杀害。这场谋杀事件之后，相关责任人却又被无罪释放，这就激起了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深刻仇怨。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老李卜克内西是19世纪著名的社会主义斗士，我在之前的一封信中提起过他的名字。罗莎·卢森堡也是长期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革命家，她与列宁交情很深。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两人恰巧都反对这场造成他们遇害的共产主义起义。

社会民主共和国镇压了共产主义者，不久之后，共和国宪法在魏玛（Weimar）得以通过，因此这个宪法又被称为《魏玛宪法》（*Weimar Constitution*）。不到三个月，年轻的共和国就受到一场由反革命势力发动的新变化的威胁。这些反革命分子发起了一场对抗共和国的反革命行动，以前在德皇麾下的指挥官们成了其中的领军人物。这次叛乱被称为“卡普政变”（Kapp Putsch）——“卡普”是这场政变的领导人，德语中的“putsch”表示的是“政变”。社会民主政府逃离了柏林，但是柏林的工人突然发起了一场总罢工，从而结束了这场“政变”。柏林的工人总罢工让整座城市的一切活动都陷入了停滞，柏林这座伟大的城市因而陷入了瘫痪状态。面对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卡普和他的伙伴不得不逃离柏林，而社会民主党领袖则再次回到柏林掌管政府。政府对参与“卡普政变”的叛乱分子态度温和，这与它镇压共产主义者的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多叛乱分子都是领

取政府津贴的官员，在他们叛乱之后，政府甚至还在继续向他们发放津贴。

在巴伐利亚，反革命势力又组织起一场类似的反革命“政变”。虽然这场“政变”最终失败了，但是最有意思的是，组织这场政变的奥地利下等军官希特勒（Hitler），后来却成了德国的独裁者。

这些事件之后，德国魏玛共和国已经是名存实亡了。社会主义者分裂为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主义者两大派系，这实际上削弱了他们的实力，而那些公开反对共和国的反动势力却变得更有组织性，也更加咄咄逼人。大地主（德国人称他们为“容克”）和大工业家们逐渐把政府中极少数的社会主义分子排挤出去了。《凡尔赛和约》的签订，沉重打击了德国人民，而反动势力则借此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这个和约之下，德国不得不开始裁军计划，放弃了庞大的军队。按照和约规定，它只能保留10万人的军队。实际情况是，从表面上看，德国实施了裁军计划，但是大量的装备隐藏了起来。大批“私募军队”涌现出来，他们是分属于不同政党的志愿军。保守民族主义志愿军的别称为“钢盔”，共产主义工人志愿军的别称为“红色前线”；在此之后，希特勒的追随者组建了“纳粹”军队。

我对你讲述了许多关于德国战后早期的事件，我还要举更多的实例来证明革命并未消失，与反革命的斗争仍在持续。在德国各地，如巴伐利亚和萨克森（Saxony），各种起义也在不断发生。奥地利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按照和约规定，这个国家的领土大为缩水，仅剩下原来面积的极少部分。奥地利国家虽小，却拥有一个规模宏大的首都维也纳，在语言文化方面它与德国并无二致。1918年11月12日，在签订停战协议之后，奥地利成了共和国。它想要加入德国，但是协约国断然拒绝了它的要求，虽然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anschluss”这个德语词被用来表达奥地利和德国之间的联盟方案。[注]

奥地利的情况与德国一样，首先是社会民主党人掌握了权力，但是他们内心充满了恐惧，对自己缺乏自信，因而选择了向中产阶级政党妥协的政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力量遭到极大削弱，而政府也落入了他人之手。跟德国一样，私募军队异军突起，最后反动独裁统治大行其道。很长时间以来，社会主义势力控制下的维也纳与保守地主阶级控制下的乡村之间，一直在发生冲突。社会主义力量控制下的维也纳自治市，为工人阶级提供了舒适的住房，并实施了其他的发展计划，这座城市也因此而闻名遐迩。

离世界大战结束还有5个星期的时候，也就是1918年10月3日，匈牙利爆发了一场革命。11月，匈牙利共和国宣布成立。4个月后，也就是1919年3月，第二次革命爆发。这是一场由共产主义者贝拉·孔（Bela Kun）领导的苏维埃革命，这位革命者早前与列宁联系密切。他们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又掌握了权力。然而，匈牙利保守反动分子随即引罗马尼亚军队进入匈牙利，帮助他们反扑。罗马尼亚人十分乐意，兴高采烈地来到匈牙利，帮助镇压了贝拉·孔政府，但是在此之后他们赖着不走，在匈牙利国内大肆抢掠。直到协约国威胁要对他们采取行动，他们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去了。罗马尼亚军队撤退之后，匈牙利的保守势力组织了私募军队或者志愿军对国内的自由或进步势力进行恐怖统治，以便扼杀所有革命的苗头。从1919年开始，匈牙利进入了所谓的“白色恐怖”时期，在战后历史这部鸿篇巨制中留下了“最为血腥的一页”。匈牙利仍保留了一部分封建残余，这些封建地主与大发战争横财的大工业家沆瀣一气，联手杀害共产主义者、工人大众、社会民主党人、开明人士、反战主义者，甚至犹太人，并对他们实行恐怖统治。从那以后，匈牙利就一直处在反动独裁统治之下。该国的议会成了摆设，但选举是公开的，也就是说，民众要选举议会成员，而警察和军队会密切监视整个选举过程，确保只有支持独裁统治的人才能当选。这个国家不允许关于政治诉求的公共集会。

在这封信中，我思考了发生在中欧的一些战后事件，反思了世界大战和战败以及俄国革命对同盟国所施加的影响。稍后，我们将分门别类地分析战争带来的巨大经济影响以及它们是如何把资本主义引入目前的困境的。我在这封信中写到的事件所造成的最终后果是，战后欧洲的社会革命似乎已经迫在眉睫。这个事实极大地帮助了苏联，因为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强国都不敢全心全意地攻击它，因为它们害怕激起本国工人阶级的反抗。但是，除了一些零星爆发而又旋即被扑灭的小规模革命之外，大革命并没有爆发。尽管社会民主党是建立在社会革命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在镇压和阻止这场社会革命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似乎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希望或者相信资本主义会自己消亡。因此，他们并未猛烈地攻击它，相反，他们还暂时帮助它存续了下来。或者也有可能是他们庞大而富有的政党机器满足于现状，早已深深地陷入现有的秩序中而不能自拔，再也不愿意承受社会剧变带来的风险。他们试图选择一条中间路线，但他们完全搞砸了，甚至还失去了现有的一切。近来发生在德国的事件更加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战后这段时间的另一个主导因素是暴力精神的扩散。当印度正在宣扬非暴力的福音之时，世界上几乎每个角落都在上演暴力行为，这些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完全不加掩饰，甚至还受到吹捧和美化，这真是一种特别奇怪的现象。战争应对此负主要责任，而在战争结束后，不同阶级利益的冲突又加剧了这种暴力行为。冲突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激烈，暴力行为也越演越烈。自由主义几乎彻底消失了，19世纪盛行的民主制不再受到欢迎。独裁者们开始粉墨登场。

在这封信中，我谈到了战败国里发生的事情。其实战胜国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尽管英国和法国并未经历中欧地区发生的起义或者剧变。意大利也发生了剧变，这场剧变导致了奇特的后果。后面我会专门来讲述这次事件。

1. “anschluss”，指发生在1938年3月的纳粹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

172 ——偿还旧债的新办法

从此我们发现，在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洲，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整个世界，就像是一口沸腾的大锅。《凡尔赛和约》和其他条约并未给它带来实质性的改善。在欧洲新版图之下，波兰人民、捷克人民和波罗的海各国人民得到解放，从而解决了一些旧的民族问题。但与此同时，奥地利蒂罗尔州（Tyrol）的一部分地区被划入了意大利，乌克兰的一部分地区被划入了波兰，而东欧地区的其他领土划分也引起了各种冲突，又造成了新的民族问题。最奇特的安排是波兰走廊和但泽的归属问题，这引起了极大的愤怒。许多新建的小国出现在中欧和东欧的土地上，国界划分更为复杂，海关屏障大大增加，民族之间的刻骨仇恨愈加深刻，使这片区域日趋“巴尔干化”，成为局势紧张的“火药桶”。

除开这些1919年签署的条约之外，罗马尼亚设法占领了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它以前属于俄罗斯西南部地区。自此之后，比萨拉比亚就成了苏联和罗马尼亚之间一个具有争议性的地区。长期以来，它一直被称作“第聂伯河畔的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 on the Dnieper）。

战后，战败的德国被迫向战胜国赔款，以偿还它们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和破坏，这个战争赔偿问题远比领土重新划分更为严重。《凡尔赛和约》中并未规定具体的赔偿数额，但是在后续的几次和谈中，数额最终得以确定，德国从此开始以每年分期偿还的方式，要支付一笔总计66亿英镑的巨额赔款。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承受这么大一笔赔款，更别说这个一败涂地、精疲力尽的德国了。德国提出强烈抗议，但是一无所获；它别无选择，只能向美国借款，筹措资金支付了2到3

次分期赔款，以争取一定的时间，希望整个赔款问题能够得到重新考虑。对德国以及其他国家来说，让德国旷日持久地偿还这笔巨额赔款明显会让它难以为继。

德国的财政体系很快就彻底崩溃了，德国政府既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偿付战争赔款等外部债务，甚至也没钱来履行国内责任。德国必须用黄金支付赔款给战胜国。如果德国不能在规定的还款日支付赔款，就会出现拖欠问题。但是，在德国国内，政府可以用现金纸币来支付，因此就开始大量印制钞票。印发纸币并不能产生更多的钱，只能产生债务。因为人们知道钞票可以等价交换黄金或者白银，所以他们才愿意接受纸币。实际上，政府通常都会在银行中储备定量的黄金，以此来保持货币的价值。因此，纸币用处很大，它省去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大量黄金和白银进行交易的麻烦，同时也增加了信用债务。但是，如果某个政府无限制地印制和发行钞票，完全不考虑银行中是否有等量的黄金储备作为支持，那么货币必然会贬值。钞票印制得越多，货币的价值就越低，它就更难履行其信用债务职能。这个过程被称为“通货膨胀”，它真实地发生在1922年和1923年的德国。德国政府希望有更多的钱来支付开支，因此它印制了更多的钞票。这种做法的结果是物价飞涨，但是德国马克与英镑、美元以及法郎的比值在缩小。德国政府简直是在疯狂地印钞，到了最后1美元或1英镑的价值就等同于10亿马克纸币。事实上，马克纸币几乎毫无价值了，竟然买一张邮票都要花100万马克纸币！其他价格也上扬得离谱，而且还变化无常。

德国的通货膨胀以及德国马克的急速贬值并非是自然发生的，它们是德国政府刻意为之的产物。德国政府希望实现自救，摆脱财务困境。它的确在很多方面都做到了，因为政府、市政以及其他的债务方使用了毫无价值的马克纸币偿付了它们所有的国内债务。当然它们不能以这种办法来对付战胜国的债务，因为这些国家绝不会接受德国纸币。在德国国内，它们可以立法，强制人民接受纸币，这样政府和每

个债务方都摆脱了麻烦的债务负担。但是它们的这种做法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德国人民在通货膨胀时期生活极为痛苦，但是中产阶级尤其艰难，因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领固定工资或者其他的固定收入。当然，马克贬值以后，工资随之增加了，但是工资的涨幅从未跑过马克贬值的速度。小资产阶级几乎在这次通货膨胀中全军覆没，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一点，因为它与德国在随后几年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密切相关。现在，这些落魄失意的下层中产阶级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内心愤愤不平，渴望通过革命来改变一切。他们纷纷加入了主要党派组建的私募军队中，其中绝大多数都加入了以希特勒为首的新兴党派，即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ational Sozialist）或称纳粹党。

随后，一文不值的旧马克遭到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称为“地租马克”（rentenmark）的新货币。这种新纸币并未因通货膨胀而贬值，它的价值直接与黄金挂钩。因此，德国重新拥有了稳定的货币，而在这之前，其国内的小资产阶级则在通货膨胀中完全消失了。

德国的财政问题引起了严重的国际影响。德国拖欠了偿付给协约国的战争赔款。而协约国瓜分了这些战争赔款，其中法国获得了最大的份额。俄国并未从中分得一杯羹，实际上它放弃了它也许应得的赔偿。当德国无法支付赔款时，法国和比利时出兵占领了德国的鲁尔（Ruhr）地区。

根据《凡尔赛和约》，协约国已经占领了莱茵兰地区。1923年1月，法国和比利时又占领了另一个地区（英国拒绝参与这项行动）。鲁尔地区紧挨着莱茵兰地区，煤炭资源丰富，工业发达。法国人想要占有该地区的煤炭和其他生产物资来抵销德国拖欠的赔款。但是这次法国遇到了麻烦。德国政府决定要消极抵抗法国的占领行为，它们呼吁当地的煤矿主以及鲁尔区的工人们停止工作，绝不给予法国任何形式的帮助。它们甚至还支付给当地煤矿主和工业家大笔资金，以弥补

他们遭受的损失。9到10个月之后，德国和法国都发现再也无法承受这个高昂的代价了，因此德国放弃了消极抵抗，开始与法国合作，重新启动当地煤矿和工厂的运作。1925年，法国和比利时军队撤离鲁尔地区。

德国在鲁尔地区的消极抵抗宣告破产，但是这让协约国清楚地认识到，各国必须重新考虑战争赔款问题，并要确定一个更为合理的赔款数额。自此之后，各种会议和委员会走马灯似的召开，而全新的计划则接连提出，层出不穷。1924年提出了“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五年后，即1929年，又提出“扬格计划”（Young Plan），三年后的1932年，相关各方实际上达成了共识，同意德国无须再支付战争赔款，德国的赔款问题宣告结束。

从1924年以来的数年内，德国定期支付了战争赔款。但是，在德国完全没有钱、失去了偿还能力的情况下，它是如何完成赔款任务的呢？原来它向美国借了大量的债务。协约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在战争时期欠了美国很多钱，而德国欠了协约国大笔赔款。因此美国就借钱给德国，这样协约国可能就会把德国的赔款用于支付美国的欠款。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安排，似乎大家都感到十分满意！的确如此，当时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收回欠款了。当然这种借来还去的循环必须有赖于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美国要不断地借钱给德国。如果美国停止借钱，那么这个安排也就完全破灭了。

这些国家之间发生的借款和还款交易并非通过现金支付的，这些交易都是通过一纸协定来达成的。美国给予德国一定数额的信用贷款，德国将之转交给协约国，而协约国又转而交还给美国。这笔钱实际上并未动用，只不过多出了几笔账面记录而已。为什么美国会锲而不舍地借款给那些穷困潦倒的国家呢？这些国家甚至都还不起之前欠款的利息了。美国这么做的目的是帮助它们尽可能维系稳定的局面，不至于沦落到国家破产的地步，因为美国害怕欧洲彻底崩溃。且不论

欧洲崩溃可能带来的其他恶果，这首先就意味着美国绝无可能收回欧洲的美元债务了。因此，美国就像一个小心谨慎的债主，坚持要让它的债务者们保持活力并履行职能。但是，不久之后，美国就厌倦了这种没完没了的借款政策，于是停止了这种行为。战争赔款和债务格局轰然倒塌，拖欠情况时有发生，而欧洲诸国和美国都深深地陷入了债务泥潭之中。

在战争结束之后的12年间，战争赔款问题的阴影一直笼罩在欧洲的上空。与此同时还有战争债务问题，即德国以外国家的债务。我在一封关于世界大战的信中提到过，英国和法国在早期给那些容易操控的国家提供资金，借款给那些与他们结为同盟的小国。不久之后，法国的资源消耗殆尽，它再也不能提供借款了。然而英国却还在继续提供借款。随后英国经济崩溃，也不能继续借款了。美国就成了唯一能够借款的国家，它十分慷慨地提供大笔资金，从而为自己、英国、法国和其他协约国成员赢得了利益。因此，战争结束后，一些国家成了法国的债务国，许多国家则是英国的债务国，而所有的协约国成员都欠了大笔美元外债。而美国则成了唯一一个没有外债的国家，从而成了最大的债权国，取代了英国的地位，一举成了世界的债权国。也许一些数据可能会更清楚地说明这个情况。在战争开始之前，美国是一个债务国，欠下了300亿美元的外债。但是，战争结束之时，美国的外债已经一笔勾销，一跃成了最大的债权国。1926年，其他国家欠美国的债务已然高达2500亿美元之巨。

这些战争债务对那些身负巨债的国家而言，例如英国、法国、意大利等，都是十分沉重的负担，因为这些债务都是由政府负责偿还的官方债务。它们试图让美国给予特别优惠条件，而美国也做出了一些让步，然而债务负担仍旧沉重。只要德国继续偿还战争赔款，那么这些赔款（实际上是美国提供的信贷）就会从债务国手中回流到美国。但是一旦德国不能按时还款，或者停止还款，那么债务国就很难支付欠款了。欧洲的债务国想要把赔款和战争债务联系到一起。它们说必

须把两者放到一起来考虑，也就是说，如果一方停止还款，那么另一方也自动停止还款。但是美国反对这种相互关联的办法。它说它必须收回借出的款项，认为德国战争赔款问题是另一回事，不能与之混为一谈。欧洲对美国也非常怨恨，并对它提出诸多苛刻的指责。据说，美国被比作《威尼斯商人》中的高利贷者夏洛克（Shylock），妄图要让欧洲割肉还款。欧洲各国，尤其是法国，提出美国的借款已经全部消耗到战争这个共同的活动中去了，因此这些借款不能被认作普通债务。另一方面，美国极其反感战后欧洲各国进行军备竞赛以及玩弄阴谋诡计的行为。它发现法国、英国以及意大利的军费支出仍然十分庞大，它们甚至还借款给其他小国，帮助其发展军事力量。既然这些欧洲国家有钱展开军备竞赛，为什么还要让美国免除它们的债务呢？如果美国真把这些债务一笔勾销，它们可能还会把这些钱投入到军备计划中去。美国正式地提出了这个理由，并坚持要求欧洲偿还欠美国的债务。

总而言之，偿还战争债务的难度不亚于支付战争赔偿。国际债务可以用黄金、货品或者公共服务（如交通、航运以及其他服务）来偿还。单用黄金来支付这些极为庞大的费用是绝无可能的，因为黄金的数量远远不足。而使用货品和公共服务来偿还战争赔款或者债务也几乎不可能完成，这是因为美国和欧洲各国设置了极高的关税壁垒来阻止外国商品进口。这就造成了十分棘手的局面，也是真正困境所在。可是没有任何国家打算要降低关税壁垒或者愿意接受货品来抵销欠款，因为这种做法意味着本国工业会遭受打击。由此，一个奇特的恶性循环油然而生。

美国的债务国不仅仅限于欧洲大陆。美国的银行家和商人们在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即南美、中美洲以及墨西哥）进行了大笔投资。这些拉美国家在世界大战期间感受到了现代工业和机械的强大力量，受到了强烈的触动，从此一心想要发展本国工业，因此大量的资金从财政充裕的美国源源不断地流入了这些国家。它们负债累累，甚至都无

法支付利息了。拉丁美洲各国纷纷出现了独裁者，只要美国像借款给德国那样，继续借款给它们，那么它们就能够继续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一旦美国停止提供资金，拉丁美洲就会像欧洲那样全盘崩溃。

让我来列举两个数据，让你略微了解一下美国在拉丁美洲投资的迅猛发展情况。1926年，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总额为425亿美元。3年后，也就是1929年，这个数值增长到550亿美元以上。

毋庸置疑，战后的美国成了世界的银行家，财大气粗、繁荣兴旺、富得流油。美国成了世界的主宰，美国国内对欧洲不屑一顾，认为它已经日薄西山，陈腐不堪，却还吵闹不休，而他们对亚洲的鄙夷更甚。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美国在其最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所拥有的财富吧。从1912年到1927年的15年间，美国的国民财富总额从1872.39亿美元增长到了4000亿美元，而1927年美国总人口数大约是1.17亿，因此人均国民财富为3428美元。美国一直保持着迅猛的发展势头，因此这些数据每年都在发生改变。在之前的一封信中，在比对印度的国民收入和其他国家收入时，我给出的美国收入数据要比这里的低得多。但是那个数据是指的年收入，而非国民财富，而且这很可能是很早以前的数据了。这里给出的1927年的数据来源于美国的柯立芝（Coolidge）总统在1926年11月所做的一份声明。

也许你会对其他数据感兴趣。以下都是1927年的数据。美国的家庭总数为2700万户，其中使用电灯照明的家庭达到了1592.3万户，使用电话的家庭有1778万户。美国人总共拥有19237171辆小汽车，占到全世界汽车总量的81%。美国生产了占全世界汽车生产总量的87%，出产了占全世界总出产量71%的汽油以及43%的煤炭。但是，美国的人口总数仅占全世界总人口的6%。因此，人均标准非常高，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财富集中在少数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手中。这些“大财团”控制了整个国家，他们选出总统，制定法律，还常常胡作非

为。他们极为腐败，但是只要美国继续国富民安，那么美国人也就对此浑不在意了。

我再列举一堆数据，我们来看看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呈现出的繁荣景象吧。我这么做，一方面是要向你展示现代工业文明究竟可以把一个国家推到何种高度，让那些诸如中国和印度这样落后的非工业国家望尘莫及。另一方面则是要让你体会到不久之后美国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崩盘与这段时间内的繁荣之间的鲜明反差，稍后我会讲到美国的这场危机。

这场危机很快就会到来。1929年，美国似乎已经摆脱了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欧洲和亚洲所带来的问题。战败国几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之前我曾向你讲述过德国的悲惨境遇。中欧的大多数小国，尤其是奥地利，面临着更加糟糕的局面。奥地利国内也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波兰也是这样。这两个国家最终都不得不重新发行新的货币。

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只限于战败国。甚至连那些战胜国也慢慢地遭遇了同样的问题。众所周知，债务国的日子可不好过。现在人们奇怪地发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债务国的日子也不好过！对战胜国而言，虽然德国要向他们偿还战争赔款，但是这些战争赔款给它们带来了极大的麻烦，而接收赔款更是让它们麻烦不断。关于这个问题，我必须在下一封信中详细地告诉你。

173 ——货币的奇怪行为

货币混乱是战后的一大显著特征。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各国的货币价值比较固定，波动较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比如印度的卢比、英国的英镑、美国的美元、法国的法郎、德国的马克、俄国的卢布以及意大利的里拉等等。根据国际金本位它们具有了一定的比价，也就是说，每种货币都有一定的含金量。在各国国内，本国货币是最好的，但在境外并非如此。两种不同货币都与黄金挂钩，因此国际支付或者赔偿金都是使用黄金来结算的。只要各国货币都有固定的含金量，那么它们的价值就不会产生太大的波动，因为黄金是一种价值相当稳定的贵金属。

但是，参战各国的政府面对战争时期的困境，认为极有必要脱离金本位制度，从而促使本国货币贬值。这是一种通货膨胀的措施。这种方法有助于维护本国的经济，但是扰乱了国际货币关系。在战争期间，整个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即协约国阵营和德国阵营，每个阵营内各方力量都在相互协调、通力合作，战争的需要高于一切。战后，各种困境浮出水面，经济状况不断发生改变，各国之间相互不信任，这就造成各国货币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化。当今的货币体系很大程度上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纸币和支票都是支付的保证，因此人们愿意使用它们。信用的基础是信心，如果人们失去了信心，那么信用也就随之消失了。因此，当欧洲的混乱局势动摇了所有信心时，战后的货币体系也就出现了纷乱。现代世界相互依存，世界各国联系紧密，国际活动也是前所未有地频繁。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问题就会立刻引起他国的反应。如果德国马克贬值或者一家德国银行破产，那么伦敦、巴黎或者纽约的人也许会在许多方面受到影响。

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几乎每个国家都出现了货币或者金钱危机。工业越发达的国家所面临的困境越严重，这是因为工业发展意味着极为复杂和微妙的国际格局。显而易见的是，像中国西藏这样极为偏远和落后的地区就不会受到马克或者英镑变化的影响。但是美元贬值的影响可能就会马上波及日本。

同样，在任何一个工业国家中，各个群体的利益是不同的。因此，有一些群体就希望发生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当然，并非是曾发生在德国的那种无限制的通货膨胀），而另一些群体却希望出现通货膨胀的反面，即通货紧缩，让货币拥有极高的含金量。比如说，债权人、银行家等均赞成货币升值，因为别人欠下了他们的债务，然而债务人自然希望货币贬值，这有利于他们返还债务。工业家和制造商们支持货币贬值，因为他们欠下银行的大笔债务，更重要的是，这能够增加他们的商品在海外的销售量。英镑贬值意味着英国商品在海外市场的价格低于德国、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同类商品的价格，这就让英国工业家们具有了优势，促进了当时英国商品的销售。你会注意到不同的群体都在各谋各的利益，其中最主要的是工业家和银行家展开了拔河拉锯战。我试着尽可能简单地解释这个问题。事实上，有许多复杂的因素牵涉其中。

法国和意大利都发生了通货膨胀，法郎和里拉相继贬值。过去法郎对英镑的比价是25:1，但是现在跌落至275:1。最终法郎对英镑的比价确定为大约120:1。

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不再援助英国，英镑的价值出现了小幅下跌。那时，英国面临着一个困难的局面：它是否应该遵循英镑贬值这个自然规律并重新确定英镑的新价值呢？英镑贬值，本土商品的成本就会降低，这对英国工业很有好处，但是会让银行家和债权人蒙受损失。更重要的是，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就会荡然无存，纽约可能会接替这个位子，而借贷人就会转而投奔这个新的世界金融中

心，不会再来伦敦了。英国还可以选择使用强制手段来维持英镑的原有价值。这种做法将会提高英镑的声望，而伦敦也能够保持其世界金融之都的地位。但是英国工业将会受到打击，事实证明，这会引发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

1925年，英国政府选择了后一条路，强行提升英镑价值，使它保持原来的含金量。因此，它们为了银行家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本国的工业。摆在它们面前的真正问题更为紧要，因为这严重危及了大英帝国的存在与延续。如果伦敦失去了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大英帝国的从属国们就不再唯英国马首是瞻，也不会再向它寻求帮助了，这样它就会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了。因此这个问题就成了一个帝国主义政策，而英国工业以及国内短期利益的损失，在帝国主义更大的利益面前也就无足轻重了。你也许还记得，出于对帝国主义整体利益的考虑，英国在战后开始推进印度的工业化进程，甚至让兰开夏郡和英国工业都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跟这次的英镑事件其实是同一个道理。

于是，英国为了保持其领袖地位，延续大英帝国的荣光，做出了勇敢的尝试，但是这次尝试让它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注定终将以失败告终。任何政府，包括英国政府都不可能违背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英镑暂时恢复了过去的声望，但是英国工业逐渐陷入停滞，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失业率高居不下，煤炭工业尤其受到重创。这主要得归罪于英镑含金量的提高。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英国允许德国使用煤炭来支付战争赔偿，这就意味着英国国内对本国煤炭的需求量减少了，这就造成更为严重的英国煤矿工人失业问题。这让债权人和战胜国逐渐意识到，接受战败国“上供”的物品可并非是纯粹的好处了。英国煤矿工业组织涣散，数百家小型公司各行其是，很难与来自欧洲大陆以及美国的组织严密、规模更大的公司集团展开竞争。

英国煤炭工业每况愈下，因此煤矿主们决定削减工人的工资。这个决定引起矿工们极大的愤慨，他们得到了其他产业工人的支持。英国劳工运动已经准备好为了矿工而展开斗争，并组建了行动委员会。在此之前，英国三大工会，即矿工工会、铁路工人工会以及运输行业工人工会实现联合，并组建了“三方同盟”。这三大工会的成员是无数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工人。工人阶级的强势态度让英国政府相当害怕，因此它们向煤矿主们提供补助，要求他们在接下来的一年内保持原有的工资水平，以此来延缓危机到来的时间。与此同时，政府还指派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但是这一切都落空了，1926年煤矿主们又想要削减工资，危机又再一次出现了。这一次政府已经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做好了一切准备，决心与工人们抗衡到底。

因为矿工们不同意削减工资，煤炭主们就决定禁止他们进入作业场所。这种做法激化了矛盾，工会代表大会号召工人罢工，因此这场总罢工提前到来了。英国劳工十分积极地响应号召，几乎所有加入组织的工人都参与了这场罢工。英国的社会生活几乎完全停滞，铁路上没有火车奔驰的身影，报摊上没有任何新发行的报纸，而且其他大多数活动也都完全停止了。英国政府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勉力维持着一些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这场总罢工的正式爆发时间是在1926年5月3日至4日的午夜。10天之后，工会代表大会的温和派领袖们以英国政府含糊其辞的承诺为借口，突然叫停了这次罢工，而实际原因是他们对这种革命性的罢工行动毫无好感。矿工们突然遭到抛弃，但是他们又努力坚持了很长时间，弄得自己疲惫不堪。他们饥饿难忍，人数锐减，最后遭到彻底的失败。这不仅是矿工们的失败，对所有英国工人来说，也是一场标志性的失利。工人工资普遍减少了，一些行业的劳动时间增加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下降了。政府利用这次胜利，通过了新的法律来削弱劳工力量，尤其是要预防将来再次发生总罢工。由于工会领袖们优柔寡断，表现软弱，一心想要做好罢工的充分准备，1926年英国工人总罢工才因此遭到了失败。实际上，这些领袖的目标是要避免出现罢工的，当他们避无可避之时，他们必会一有机会就结

束罢工行动。另一方面，政府为罢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且它还得到了中产阶级的大力支持。

英国总罢工以及英国煤矿长期停工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苏联工会为这场罢工提供了大笔资金支持，尤其是苏联工人们积极捐款，帮助英国的矿工渡过难关。

那个时期，英国的劳工力量遭到了彻底摧毁。但是英国政府并未找到办法来解决工业日益衰弱以及失业率不断增高的问题。失业意味着工人们普遍生活困顿，这也意味着国家要承受极大的负担，因为失业保险体系已经在许多国家发展起来了。人们普遍认为，对于并非因为个人过错而失去工作的工人，国家有责任和义务提供救助。因此，英国政府向那些登记在案的失业工人提供了一些失业救济，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机构的开支极大地增加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为什么不仅仅是在英国，几乎在每个国家，工业都在严重衰退，贸易愈发萧条，失业率大增，社会状况日益恶化？各种会议接连举行，政治家和统治者们显然热切地希望能够改善社会状况，但是他们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这个问题的出现并不像发生地震、洪水或者干旱这类自然灾害那样突如其来，造成饥荒和苦难。世界的发展与过去没有什么两样。实际上，现在食物更为充足，工厂数量更多，人们所需要的一切都更加丰富了，但是人类遭遇的苦难更胜从前。一定是有什么极端错误的原因才会导致这种自相矛盾的结果。在某些国家里，管理不善是显而易见的问题。社会党人和共产主义者认为，这都是苟延残喘的资本主义犯下的错误。他们指出，虽然俄国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但至少没有出现失业问题。

这些问题相当复杂，而医生和巫师对人类疾病的处理方法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关注它们，并找出它们的一些突出特点。

当今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实际上它已经基本成为一个整体了。也就是说，各国人民的生活以及产品生产、分配以及消费等，都变得国际化和全球化了，而且这个趋势还呈现出上升的态势。贸易、工业以及货币系统也大多具有了国际化的特征。各国之间相互依存，联系也是前所未有地紧密，一个国家发生任何事件都会引发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尽管国际化趋势已经如此明显，各国政府却仍在采取极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政策。的确如此，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战后时期愈演愈烈，表现得更为咄咄逼人，时至今日它仍是世界上主流的思想观点。因此，国际事件全球化趋势与政府的民族主义政策之间相互抵触，矛盾不断。也许你可以把这个世界的国际化活动比作一条流入大海的河流，而国家民族主义政策则是企图截断这条河流，迫使其改道，甚至让它回流。显而易见的是，河流是不会回流的，它也不可能停止不前。但是它也许会改变前进的方向，强行截流可能会导致洪水的爆发。因此，当今民族主义正在干预河流永恒的流动，最终导致河水泛滥成灾，或者变成一潭死水，但是河流最终仍然会向前奔流，这个趋势是绝不可能终结的。

贸易和经济领域中也出现了所谓的“经济民族主义”。它指的是一个国家出口量超过进口量，生产量超过消费量。每个国家都想卖出自己的产品，但是谁来购买呢？在任何买卖行为中，必须同时存在买方和卖方。如果这个世界只有卖方，无疑是一种十分荒谬的情况。可是这就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基础。每个国家都建立起关税壁垒，通过经济手段抵制外国商品的进入，同时它又想发展自己的对外贸易。这些关税壁垒干涉了国际贸易，并将其推向了死亡，而国际贸易却是现代世界的存在基础。随着贸易的日益萧条，工业发展受到打击，而失业问题也更加严重了。这种情况再次促使各国政府提高关税壁垒，抵制外国商品，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舶来品会对本国工业造成伤害。因此，国际贸易受到了更大的打击，而这个恶性循环周而复始，永不停息。

现在工业世界已经完全超越了民族主义阶段。商品生产和分配机制完全不能适应政府和国家的民族主义格局。这个外壳太小了，而内部发展又太快，最终它承受不住了，只能完全破裂。

贸易发展道路上的关税障碍实际上只让国内某些阶级从中受益，但是由于这些阶级在自己国内都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它们能够制定国家的政策。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最终他们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仇恨也日益加深。各种会议接连召开，各国不断努力，想要解决相互之间的分歧，各国的政治家们纷纷表达了良好的意愿，但是他们最终一事无成。这是否让你回想起印度不断努力解决印度社会的普遍问题，即印度教教徒、穆斯林以及锡克教教徒之间的矛盾？也许在这两个事件中，失败都是由错误的设想、错误的前提乃至错误的目标造成的。

在每个国家中，总有一些阶级通过关税以及鼓励经济民族主义的其他手段（包括政府补贴、补助以及货物专运等）获得巨额利益。这些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生产者阶层在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中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在保护政策和关税壁垒之下出现了既得利益群体，它们与其他既得利益群体并无二致，都极其强烈地反对任何可能给它们带来伤害的改变。这既是为什么关税手段一经使用就历久不衰的一大原因，也是为什么在人们对经济民族主义的普遍危害性有了广泛认知之后，经济民族主义仍能大行其道的一大原因。一旦形成了既得利益群体，那么要想终结它就不再是件容易的事情了，而且任何国家要想在这个方面特立独行就更是难上加难。如果世界各国能够达成一致，共同行动，去结束或者极大地降低关税壁垒的话，也许这个问题就能得以解决。即使是那样，事情也不会一帆风顺，因为工业落后的国家会遭受重创，它们是没有能力与发达国家平等地进行竞争的。新产业通常是在保护性关税的庇护之下建立起来的。

经济民族主义阻碍了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因此国际市场势必会受到影响。每个国家都对本国市场进行保护，从而将自己变成了垄断区域，自由市场也就不复存在了。在每个国家，只要垄断行为愈演愈烈，自由开放的市场就会渐渐消失。大型机构、工厂以及商店吞并了小作坊和杂货铺，从而扼杀了一切竞争。不论是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还是在其他工业国家，这些国内垄断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从此权力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汽油、肥皂、化工产品、军需用品、钢铁、银行业以及无数的其他领域都遭到了垄断。这种行为带来了奇特的后果。科学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带来这个结果，可是这个结果又会将资本主义连根斩断。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是自由的世界市场，而竞争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要素。如果世界市场消失了，那么各国国内的自由市场与竞争行为也会随之消失，那么资本主义社会旧格局的根基就会完全遭到动摇。谁会取代它的位置是另一个问题了，但是只要这些相互矛盾的倾向继续发展下去，这个旧秩序似乎就将难以维持下去了。

科学和工业进步远远走在了现有社会体系的前面。它们改进了生产，为人类带来了大量的食物，也为人类生活带来了许多美好的改变，但是资本主义不知道该如何与它们共处。的确如此，它常常会煞费苦心地破坏它们，或者限制生产。因此我们才会看到物资丰富和人民生活贫困并存的怪现象。如果资本主义不能随着现代科技与时俱进的话，就一定会发展出某种其他体系来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否则唯一的其他选择就是扼杀科学的进步，阻碍它的发展。但是这种做法是相当愚蠢的，无论如何都让人无法想象。

随着资本主义日益衰落，经济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大肆蔓延，垄断行为和国家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加之一些其他的负面影响，全球范围内必定会出现各种问题，这个结果完全不足为奇。现代帝国主义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因为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想要

通过剥削他国人民来解决本国的问题。这再次引起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任何事情似乎都会引起当今乱世的矛盾。

在这封信的开头，我提到货币在战后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当其他一切都表现得极为奇怪的时候，我们还能把责任归咎到货币身上吗？

174 ——合作与对抗

在前两封信中，我主要探讨了经济和货币问题。人们常常认为这类主题非常神秘，难以理解。的确，它们不是什么容易的话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思索，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们也并非有那么可怕。这些主题之所以会弥散着一股神秘的感觉，这跟那些经济学家和专家脱不了干系。从前，神父是唯一拥有所谓神秘力量的人物。他们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无知的贫民身上。在仪式上，他们常常使用晦涩难懂的古语，几乎没有人能够听得明白，还会假装与看不见的神秘力量进行交流。时至今日，神父们的把戏已经不再那么唬人了，而在工业国家中，它几乎已经完全销声匿迹了。然而，在神父们退场之后，经济学专家、银行家等取而代之，开始玩起了唬人的把戏。他们满口行话，晦涩神秘，让外行人一听就晕头转向，不知所云。因此我们这些普通人就只好让专家们来解决这些神秘的问题。但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专家常常依附于统治阶级，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而且专家之间也有差异。

因此，我们也应该对经济问题有一定的了解，毕竟这些问题似乎支配着政治，也深刻地影响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有许多种把人类划分为不同群体和阶级的方法，其中一种可能的方式是将人分为两类：第一类被称作漂流者，他们没有个人意志，只愿意像浮在水面上的稻草那样随波逐流；另一类人想要掌控生活，影响世界。对后者而言，知识和领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才是有效行为的基础。仅有美好的愿望或者虔诚的希望是远远不够的。每当干旱等自然灾害发生，流行病肆虐，或者其他厄运降临的时候，人们都会虔诚地祈祷，希望得到安慰，这一幕我们不仅在印度可以常常看到，在欧洲也是一

样。如果祈祷能够减轻他们的苦痛，给予他们信心和勇气，那么这就是一件好事，我们不需要反对这种行为。但是祈祷能够驱逐流行病的想法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科学观念，科学认为只有通过公共卫生和其他方式才能够根除疾病。当工厂中的机器出现故障，或者汽车轮胎被扎破时，有谁听说过人们傻坐在那里，希望或者虔诚地期望，甚至去祈祷故障能够自行恢复或者刺孔能够自行修补呢？人们会着手工作，修补机器或轮胎，很快机器就能重新运转，汽车又能平稳地在道路上奔驰了。

同样的道理，对于人类和社会机器，我们不仅要有良好的愿望，对它们的运作以及各种可能的情况也得有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很少能够做到准确无误，因为它关乎的都是飘忽不定的事物，比如人类的愿望、欲望、偏见或者渴求，尤其是当我们要了解人类大众、整个社会或者不同阶级的人时，它们会变得更加模糊，更难界定。但是，通过学习研究、经验总结和仔细观察，甚至连这个相当模糊的部分都开始有了秩序，人们加深了认识，而我们适应环境的能力也随之得到了提高。

现在我想说说战后欧洲的政治形势。第一个突出情况是欧洲大陆被划分为三大阵营：战胜国、战败国和苏联。还有一些小国，如挪威、瑞典、荷兰以及瑞士，并不属于任何阵营，但是从政治全局出发，它们的确无足轻重。当然，苏联自成一派，政府由工人阶级控制，是战胜国的眼中钉、肉中刺。它的政府体制还不是引发仇视的唯一原因，尽管这种体制也吸引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人发动革命，另一个原因是它常常阻碍战胜国在东方实施各种图谋。我早就向你提起过1919年到1920年之间发生的外国干涉战争的事情，战胜国们企图通过战争来摧毁苏联。但是，苏联并没有倒下，欧洲的帝国主义势力不得不忍受它的存在，但是它们也从来没有对苏联表示出善意或者欣然的态度。尤其是英俄之间，始自沙俄时代的争斗又继续上演，偶尔还会升级为战争警报或者摩擦，或者濒临战争的边缘。苏联坚信，英国总

是不停地玩弄各种阴谋诡计，想要在欧洲建立起反苏阵营，并激起了数次战争恐慌。

在西欧和中欧，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尤其是法国，它把胜利者的做派表现得淋漓尽致。战败国自然对和约的诸多条款表示不满，尽管它们对此无能为力，但是仍然梦想着未来能够有所变化。奥地利和匈牙利本来就是积弱之国，现在它们的局势似乎还在恶化。另一方面，南斯拉夫的前身是塞尔维亚，它曾经大肆扩张，吞并了众多的群体和民族，而这些群体和民族之间又矛盾重重，整个国家成了一盘散沙。很快，国内各民族的矛盾终究难以调和，它们都想要脱离南斯拉夫，取得独立地位。克罗地亚（Croatia，现在是南斯拉夫联邦的一个省份）发起了轰轰烈烈的独立运动，但遭到了塞尔维亚政府的大力镇压。现在波兰的版图已经相当辽阔了，但是其国内的帝国主义分子仍然怀抱着梦想，妄图将其疆域延伸到南部的黑海边上，从而恢复古波兰在1772年之时的边界。与此同时，波兰还占领了俄属乌克兰的一部分。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波兰政府都在这里实施着恐怖统治，严刑拷打和残酷杀戮是它的惯用手段，其他野蛮的惩处措施也并不少见，从而“平息”了反抗，完成了“波兰化”进程。在东欧，冲突的星星之火正在酝酿着，虽然微不足道，但是一旦它们掀起了燎原之势，就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战后，法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均赢得了欧洲的霸主地位。无论是版图还是战争赔款等承诺，法国基本上达成了自己的愿望，但是它仍然不高兴。它内心充满了巨大的恐惧，担心有一天德国会重新崛起，再次向它发起攻击，甚至可能完全击垮它。造成这种恐惧的主要原因是德国人口总数远超法国。实际上，法国领土面积比德国更大，也许甚至连土地都比德国更为丰饶。但是法国人口总数不到4100万，而且这个数字还相当稳定。而德国人口总数超过6200万，还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德国素来是一个十分强势而且好战的民族，在我们的记忆中它曾经两度入侵法国。

因此，害怕德国报复的心理深深困扰着法国，因而法国总体政策的基础和指导方针都是“安全”，保障法国能够控制和保留现在拥有的一切。正是法国的军事霸权威慑了那些对《凡尔赛和约》深感失望的国家，因为它认为维持这种和平局面对法国的安全是十分必要的。为了进一步加强它的霸主地位，法国建立了一个国家联盟，联合了所有有意于维护《凡尔赛和约》的国家。这些国家有比利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以及南斯拉夫。

法国就这样确立了它在欧洲的霸权或领袖地位，这让英国大为恼火，因为英国不喜欢看到任何国家，除了它自己，成为欧洲的霸权国家。英国和法国在世界大战期间因结盟而形成的好感以及友谊迅速降温；而英国报纸大肆抨击法国，尖锐地指出法国自私自利，心肠冷硬，然而对过去的敌人德国，却友善地提及了多次。英国人民说道：“我们必须遗忘和宽恕，在和平年代里不能让战争岁月的记忆束缚我们的心灵。”这些都是多么可贵的情操。英国认为这是尤为可贵的，是因为这恰巧符合了英国政策的需要。意大利政治家斯福尔扎伯爵（Count Sforza）曾经指出，这是“上天恩赐英国人民的珍贵礼物”，因为英国各阶层都会用最崇高的道德理由来为英国获得的任何政治优势或者英国政府采取的任何外交行动进行辩护。

从1922年初开始，英法不和就成了欧洲政治中一个难以消散的特征。两国表面上笑语殷殷，言辞客气，它们的政治家和总理们也常常会晤，热情合影，但是两国政府总是各行其是，互不买账。1922年，德国拖欠了战争赔款，协约国军队占领德国鲁尔工业区，当时英国是持反对态度的，而法国却不顾英国的反对独行其是。然而，英国并没有参与这次军事行动。

另一个世界大战时的协约国成员意大利也与法国关系不和，法意两国之间也不断发生摩擦。这是因为墨索里尼于1922年上台执政，而

法国却总是阻碍他实现自己的帝国主义野心。关于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我将在下一封信中做详细阐述。

战后数年，大英帝国频频显现出颓废的趋势。我曾在其他信件中提到过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在这里我只提一个方面。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正在逐渐加入美国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范围，而这三个国家都非常讨厌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移民。澳大利亚尤其容易“深受其害”，因为它的大片土地无人居住，而日本相隔不远，急需安置过剩的人口。这两个国家和美国都不满英国与日本结盟。英国想要讨好美国，因为美国在经济等方面都成了世界的主导，但是它也希望能够让大英帝国长盛不衰。因此它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牺牲了英日同盟关系。在上一封关于中国的信中，我向你讲述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在这次会议上签订了《四国条约》和《九国公约》。这些条约关系到中国和太平洋海域问题，但是这次会议不顾苏联的强烈抗议，并未对它提出参会邀请，尽管苏联对这次的议题非常感兴趣。

华盛顿会议标志着英国的东方政策发生了变化。过去，英国一直依赖日本来帮助它在远东的行动，甚至一旦有需要，还会让日本帮助解决印度问题。而现在，远东地区正在成为世界事务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各个帝国主义强国在这里有尖锐的利益冲突。中国正在崛起，或者说看似崛起，而日本和美国越来越相互敌视。许多人认为太平洋地区将会成为下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区。夹在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英国选择投向后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不再与日本结盟。英国的政策的确是与强大而富有的美国保持友好关系，而又不做任何承诺。在结束了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之后，英国开始筹备一场可能发生的远东战争。它耗费巨资，在新加坡修建了多座规模庞大的港口，并将之用作大型海军基地。这个地理位置能够让它掌控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航运交通。一方面它可以控制印度和缅甸，另一方面它可以监控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地。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在太平洋地区的任何冲突中占据主动，不论这场冲突是针对日本还是其他帝国主义国家。

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英日同盟关系崩溃了，这让日本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日本被迫向俄国示好，从此开始逐步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三年后，也就是1925年1月，日本和苏联签订了一份条约。

战后初期，德国被战胜国视为了异类，受到了无情的唾弃。当它发现这些国家对它的遭遇无动于衷之后，同时也是想要稍微恐吓一下它们，它转而与苏联搞好关系，并与苏联在1922年4月签订了《拉帕洛条约》（*Treaty of Rapallo*）。关于这份条约，苏德两国的磋商都是秘密进行的，因此这个条约一经公布，协约国政府均大受震动。英国政府尤其感到不安，因为英国统治阶级极度厌恶苏联政府。英国意识到，如果德国受到不公对待或者它的情绪得不到安抚的话，那么德国很可能会转而投向苏联的怀抱，正是这种认识引起了英国对德政策的变化。英国人开始对德国的困境表示理解，并通过许多方式推进与它的非正式友好交往。他们坚决不参与协约国军队对鲁尔工业区的行动。这并非是因为英国人突然对德国产生了好感，而是因为它想让德国远离苏联，将它拉拢到反苏国家阵营里来。这成为那个时期内英国政策的基本原则。1925年，英国终于在瑞士洛迦诺（Locarno）尝到了胜利的果实。欧洲数国代表齐聚洛迦诺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战胜国与德国在战后首次就几个问题达成了真正的协议，最后都表现在《洛迦诺公约》之中。这份协议并不彻底，战争赔款这个大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但是它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各国相互做出了许多保证和承诺。德国认可了《凡尔赛和约》划定的德法西部边界，但拒绝接受东部边界的界定，要求对从波兰走廊到波罗的海一带的归属问题进行重新讨论。但是它承诺德方将会尽力采取和平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任何一方撕毁协议，那么其他缔约国必然会联合起来对付它。

洛迦诺会议是英国政策的一次胜利。它让英国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法德争端的仲裁者，也让德国远离了苏联。的确，洛迦诺会议最重要的意义是让西欧各国团结起来一致对苏。苏联对此感到十分紧张，在

短短的数月中，它就与土耳其建立了同盟关系，作为对此事的回应。1925年12月，在国际联盟做出了不利于摩苏尔的决定仅仅两天之后，俄国和土耳其就签订了《苏土条约》。你也许还记得，这个决定是不利于土耳其的。1926年9月，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受到了其他成员国的热烈欢迎，国际联盟中呈现出一片和睦友好的气氛。

因此，由于常常受到国内政策的影响，欧洲各国之间时而合作，时而对抗。1923年12月，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失利，而工党取得了胜利，并首次组建了政府，尽管它并没有在议会中赢得绝对多数票。拉姆齐·麦克唐纳当上了英国首相。这个政府存续时间极短，仅仅9个半月后就宣告垮台。但是在这段时间内，它与苏联签订了一项协议，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

保守党人坚决否认苏联，而在下一届英国大选中（距上一次大选不到一年），苏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保守党在大选中把称作“季诺维也夫之信”（Zinoviev Leter）的信件作为了手中的王牌。这封信鼓动英国的共产主义者开展秘密活动，筹划一场革命。季诺维也夫是苏联政府中一名布尔什维克领袖，他坚决否认这封信是出自他之手，指出它绝对是伪造的。但是保守党人仍然充分利用了这封信件，它也成了保守党在这次大选中获胜的部分原因。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成了英国首相，上台组阁。英国各界不断要求重新调查“季诺维也夫之信”的真伪，但是保守党政府拒绝了这个要求。随后，这个秘闻在柏林被揭露了出来，这封信的确是伪造的，出自一位苏联“白军”，即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政治流亡者的手笔。但是，这封伪造的信件已经在英国发挥了作用，终结了一任政府，将另一任政府推上了历史舞台。这些事件看似琐碎，却对国际事务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之后不久，一场发生在远东地区的变化让英国政府极为恼怒。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民政府在中国大地上异军突起，它似乎与苏联建立

起了亲密的关系。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英国政府在中国举步维艰，他们不得不收敛锋芒，忍气吞声，做了许多违背自己心意的事情。然而，中国的革命运动就如昙花一现，很快就四分五裂、分崩离析了。中国的军阀们大肆屠杀驱逐革命激进分子，他们更愿意依赖上海的外国银行家们的支持来维系统治。俄国在这次国际竞争中遭到了惨败，不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地区，苏联的威信都一落千丈。对英国来说，这是一次胜利，它想要彻底击垮俄国，以因势利导。因此它再次尝试组织反苏国家集团，将苏联团团包围起来。

大约在1927年年中，世界各地都掀起了一股反苏行动。1927年4月，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和驻上海领事馆在同一天遭到了突袭。尽管控制着这两个地区的是两个不同的中国政府，但是它们在这个事件上保持了一致行动。大使馆遭到袭击，大使遭到侮辱，这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这次事件几乎必然会引发一场战争。苏联政府认为这两大中国政府都是受到了英国和其他反苏列强的唆使，才做出了如此野蛮的举动，以此迫使苏联发动战争。但是苏联并未让它们如愿。一个月之后，也即1927年5月，又发生了一场非比寻常的突袭行动，这一次是针对苏联驻伦敦的贸易机构。因为涉事的苏联驻英国官办贸易公司名为“阿科斯”（Arcos），于是这次事件被称为“阿科斯突袭行动”。这次事件完全是对一个大国极其无端的侮辱。很快，英苏两国宣布，双方外交关系破裂、贸易关系终止。6月，苏联公使在波兰首都华沙遭到暗杀。（四年前，博尔纳的苏联公使在洛桑曾遭到暗杀。）这些事件接踵而来，让苏联人民深感不安，完全相信帝国主义势力将会向苏联发起联合攻击。巨大的战争恐惧笼罩在苏联人民心头。在许多西欧国家中，工人们走上街头，公开支持苏联，提出了反战的要求。战争的阴云很快就消散了。

就在1927年，苏联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当时，英国和法国十分敌视苏联，但是在这次庆典上，苏联与东方国家的友好关系是有目共睹的。来自波

斯、土耳其、阿富汗以及蒙古的官方代表团出席了苏方的各种庆祝活动。

虽然欧洲等地都在积极备战，战争警报不绝于耳，但是世界各国也在积极讨论裁军问题。《国际联盟盟约》规定："联盟成员承认为维持和平起见，必须缩减本国军备，达到保卫国家安全及共同履行国际义务的最少限度。"除了制定了上述原则之外，当时国际联盟并未采取其他任何行动，但是它呼吁联盟理事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必要的措施。当然，德国以及其他战败国根据各种和平协议的要求进行了裁军。战胜国也曾许诺要缩减军备；它们就此问题不断召开会议，但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这样的结果也很好理解，因为每个国家都希望不论怎么裁军，都始终要让本国的军事力量强于其他国家，这是它们共同的目标。这些国家自然就很难达成一致意见。法国人始终坚持要把保证本国安全的要求放在首位，而裁军次之。

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的确，苏联把国际联盟看作一场充满敌意的竞争表演，其中，一群资本主义列强将枪口直指苏联。苏联本身就常被看作（就像有时大英帝国那样）一个国家联盟，因为苏联实际上是由许多共和国组成的联盟。东方国家同样也对国际联盟充满了怀疑，将之看作帝国主义列强掌握的工具。尽管如此，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和苏联都参加了国际联盟的会议，共同商议裁军问题。1925年，国际联盟专门委派了一个筹备委员会，为一场规模空前的国际裁军会议做好准备工作。这个委员会花费了7年时间，没完没了地审查了无数的裁军计划，最后却无果而终。1932年，世界裁军会议得以召开，与会各国代表提出了各种意见，却没有带来任何有用的结果，而这场旷日持久的裁军会议最后也就不欢而散了。

美国不仅参与了这些裁军谈判，而且它对欧洲和欧洲事务的兴趣也与日俱增，这是因为它已经占据了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已经是整

个欧洲的债权国了。它积极地制止欧洲各国再次发生相互残杀的行为。且不论它有什么更为崇高的想法，它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它考虑到，如果欧洲再次爆发战争，它的借款还能收回来吗？贸易还能继续进行吗？一系列裁军会谈并未立即取得显著的成效，因此在1928年，经过法国和美国政府数次会谈之后，一份新的提案正式提出，对维护和平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份提案做出了勇敢的尝试，想要“废弃”战争。最初这只是美国和法国所签订的公约中的观点，但是这个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最终将几乎世界各国都包括进来了。1928年8月，法国和美国在巴黎签订了这个公约，因此这个公约被称作《1928年巴黎公约》（*The Paris Pact of 1928*），又称《凯洛格-白里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简称《凯洛格公约》（*Kellogg Pact*）。凯洛格时任美国国务卿，是这次非战问题讨论的领导人，而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是当时的法国外长。这份公约篇幅不长，它谴责采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的行为，也规定公约缔约国必须放弃战争作为相互关系中国家政策的手段。这份公约的用词十分优美，如果它能够表里如一，必将能够废弃战争。但是，各国列强的虚伪嘴脸很快就显露无遗了。法国和英国，尤其是英国，在签订非战公约之前，声明了许多保留条件，实际上对它们而言这份公约沦为了一纸空文。英国政府将它可能发起的任何关乎大英帝国利益的战争行为，都从这份公约中剔除出去了，这就意味着它随时可以发动战争。这就宣告了英国对其统治区域和势力范围实施的是“门罗主义”。

尽管从此战争公开遭到了“废弃”，但是英法两国在1928年又签署了一项秘密的海军妥协性协议（Naval Compromise）。但是关于这份协议的内幕消息被泄露出去，欧洲他国和美国闻之大为震惊，这已经足以说明幕后的真实情况。

苏联同意《凯洛格公约》的内容并签署了它。它愿意缔结这份公约的真正原因是，它想要通过这种方式，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

他国组建反苏国家集团，或以公约为借口，对苏联发动攻击。英国对这份公约提出的保留条件尤其是针对苏联的。在公约签订的过程中，苏联对英国和法国提出的保留条件表示了强烈反对。

苏联热切地希望能够避免战争，因此它采取了其他措施，为其国内安全上了双保险。它与众多邻国，如波兰、罗马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土耳其以及波斯，签订了特别和约，史称《李维诺夫公约》（*Litvinov Pact*）。这份公约于1929年2月正式签署，比《凯洛格公约》成为国际法要早6个月。

因此，国际社会继续努力达成了各种公约、同盟协议以及条约，竭尽全力要使这个争吵不休、岌岌可危的世界稳定下来，仿佛这些协定或者流于表面的修修补补就能够治愈这个根深蒂固的疾病。1920年至1929年期间，欧洲各国的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时不时就能上台执政。他们对权力和地位体验越多，就会更深地融入资本主义体系而不能自拔。的确如此，他们成了资本主义最好的保卫者，常常成了与过去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那样坚定的帝国主义者。从某种程度上说，欧洲国家经历了战后初期革命情绪发酵的阶段之后，已经渐渐地沉寂下来了。资本主义似乎已经做好了调整，完全适应了新时期的新局势，所以欧洲各地似乎不会马上出现革命性变化的可能。

这就是1929年欧洲的状况。

175 ——墨索里尼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

在我们的欧洲历史故事概要中，我已经写到了1929年。但是，到现在为止，我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章节，而现在我必须回过头去完成它。这个章节主要讲述战后意大利发生的各种事件。这些事件之所以意义重大，并非是因为我们能了解到意大利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而是因为这些事件不同于往昔，它们发出了警告，预示着整个世界将会进入一个活动频繁、冲突不断的新时期。它们所带来的重要影响并不限于意大利国内，因此我专门留出一个独立的章节来讲述这些问题。在这封信中，我会讲到墨索里尼，这是当今一位不同凡响的重要人物，还会详细地叙述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崛起的历程。

甚至早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意大利就已经完全受困于本国严重的经济问题了。1911年至1912年，它与土耳其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它还侵吞了位于北非的的黎波里，国内的帝国主义势力对此感到十分满意。但是这场小型战争并未给国内局势带来积极的影响，也未能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意大利的局势每况愈下。1914年，就在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它似乎已经到了濒临革命的边缘。各地工厂多次发生大罢工，只有那些温和的社会党劳工领袖还能控制住工人的行为，他们最终成功地镇压了工人的罢工行动。随后战争来临了。意大利拒绝加入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阵营，想要利用其中立的立场从交战双方那里榨取好处。这种待价而沽的姿态是可鄙的，然而这些国家冷酷无情，它们的行事规则甚至会让人类感到羞愧不已。在协约国阵营中，英国和法国能够给予意大利更多的好处，它们提供的资金不仅能够迅速到位，还对战后领土的划分做出了承诺。因

此，1915年5月，意大利投入了协约国阵营，对同盟国宣战。我想我已经向你提起过它们随后签订的秘密协议，它们在协议中约定将士麦那和小亚细亚的一部分划分给意大利。在这份协议获得批准之前，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了，从而打乱了它们的秘密计划。这是让意大利深感憋屈的一大原因，而且它对巴黎和平协定也不甚满意，因为它觉得自己的“权益”完全遭到了忽视。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势力和中产阶级早就期盼着能够侵吞和盘剥新的殖民地，从而减轻本国经济的压力。

战后，意大利的状况十分糟糕，它元气大伤，比其他几个协约国成员的情况更为严重。它的经济体系似乎就要完全崩溃了，其国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当然，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给它带了不小的影响。一方面，目前经济状况不佳，这让工人们深受其害；另一方面，大量士兵退伍，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无事可做。社会秩序越来越混乱，而中产阶级领袖们则试图把这些士兵组织起来，以对抗日益强大的工人阶级。1920年夏天，一场危机逐渐显现出来。伟大的钢铁工人工会带领50万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待遇。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于是工人们决定要开展一种全新的罢工形式，即所谓的“在工作场所中罢工”。它的意思是工人们进入工厂，但是并不开工，相反还会去阻挠工作。这其实是很多年前法国劳工倡导的一种工团主义行动。工厂主们纷纷停工，以对抗这次采取阻碍策略的罢工行动，也就是说他们关闭工厂，停止运转。于是，工人们干脆占领工厂，试图按照社会主义路线对这些工厂进行管理。

工人们的确展开了革命行动，如果能够坚持下去，最后的结果要么是带来一场社会变革，要么就是彻底失败，没有中间路线可走。当时，意大利社会党十分强大，它不仅控制了所有的工会，还控制了3000个自治市，在议会中拥有150个席位，几乎占据了总席位的三分之一。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如果它力量强大，基础牢固，拥有雄厚的资产，掌握了国内许多重要职位，那么它根本就不可能具有革命精神。

即便如此，这个政党完全支持工人占领工厂的举动，甚至包括其党内的温和派都双手赞成。除了这些，它就再也没有做过其他事情了。它不想倒退到过去，也不敢奋勇前进，所以它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尽可能不采取任何激烈对抗的手段。就像那些总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的怀疑者那样，它们失去了实现跨越的时机，在发展的进程中遭到彻底的失败。由于工会领袖和激进政党迟疑不决，工人占领工厂的行动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了。

这次失败助长了统治阶级的气焰。它们认真衡量了工人和工会领袖的力量，发现这个力量并没有他们猜测的那么强大，因此它们现在谋划要发动一场报复行动，以彻底打压工人运动及其背后的社会党。它们开始从一些志愿者组织那里寻求支持，这些志愿者组织成立于1919年，由贝尼托·墨索里尼创立，其成员大多为退伍的士兵。这些组织被称为“战斗法西斯”，即“战斗组织”。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会对社会党人、激进分子和它们的组织发动进攻，这也是它们的主要作用。从此，它们大肆破坏社会党报社，或者攻击社会党或激进组织控制下的自治市或者合作组织。大工业家和中产阶级上层人士都开始向这些“战斗组织”提供各种帮助，支持它们对抗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甚至就连政府都对它们十分纵容，毕竟它想要摧毁社会党的力量。

这些战斗组织或者“战斗法西斯”（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简称为“法西斯”）的组织者贝尼托·墨索里尼究竟是什么人物？当时，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出生于1883年，现在也才50岁），但是已经换过很多份工作，经历丰富，生活十分精彩。他的父亲是一名铁匠，也是社会主义活跃分子，因此贝尼托从小就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熏陶。进入青年期后，他成了一名十分激进的煽动者，四处宣扬他的革命言论，因而被瑞士的几个行政区驱逐出境。他言辞激烈地攻击那些温和的社会党领袖，坚决反对他们的中庸态度。他公开支持使用炸弹和其他恐怖主义手段来对抗国家政权。在意大利和土耳其交战期间，大多

数社会党领袖都支持这场战争，但是墨索里尼坚决反战，甚至他还因为自己的暴力行为锒铛入狱，几个月后才得以出狱。由于社会党温和派领袖们支持这场战争，墨索里尼非常激烈地抨击了他们。他的行为让他们忍无可忍，最终他被逐出了社会党。接下来他又成为社会党的日报《米兰前进！》（*Avanti of Milan*）的编辑，他每天都向工人宣传着“以暴制暴”的观点。然而，温和的马克思主义领袖们坚决反对这种煽动暴力的行为。

随后世界大战暴发了。一开始，墨索里尼坚决反对战争，到处鼓吹意大利要保持中立。然后，他非常突兀地改变了看法，或者是改变了他对自己观点的叙述方法，宣布他积极赞成意大利加入协约国阵营。他离开了社会党报纸，并且自己编写了一份新的报纸，用以宣传这项新政策。他被社会党开除了党籍。不久之后，他自愿入伍，成了一名普通士兵，在意大利的前线服役，并在一次战役中负了伤。

战后，墨索里尼不再以社会主义者自居。他无所事事，既不为社会党所喜，也在工人阶级中失去了影响力。他开始公开指责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还大肆抨击资产阶级国家。他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组织，他把自己称为“个人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大加赞扬。他多次撰文表达了这些观点。他在1919年3月发起了一场“法西斯主义运动”，招募了大批没活可干的退伍士兵加入了他的战斗小组。暴力是这些战斗组织的信条，由于政府很少干预他们的行为，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发展壮大起来。在城市中，工人阶级时常与他们发生冲突，并把他们赶了出去。但是，社会党领袖们反对工人们的斗争精神，劝告他们应该耐心地顺从，要以和平的态度对待法西斯主义恐怖行为。这些领袖希望法西斯主义就此自行消亡。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方向进行。法西斯组织日益壮大起来，财团们纷纷给予他们大量的资金支持，政府也拒绝干预他们的行为，而民众也失去了以往的反抗精神，这也就助长了他们的发展势头。甚至都从未有人尝试过利用罢工这一劳工武器来对付法西斯的暴力。

墨索里尼领导下的法西斯分子设法同时取得了两个相互对立阶层的支持。首先，他们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敌人，因此他们赢得了有产阶级的支持。但是在过去，墨索里尼是一个社会主义煽动家和革命者，所以对于深受最贫苦阶层喜欢的反资本主义流行口号，他可是了如指掌，信手拈来。而且，他早已从最善于煽动革命情绪的共产主义者那里学到了一身鼓吹的本事。于是，法西斯主义结合多种不同的理论、主义和哲学，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社会组织，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对它的本质进行解释。它实质上就是一种资产阶级运动，但是它喊出了许多危及资本主义的口号，因此它逐渐聚拢了一批三教九流的人。中产阶级是它的基础，尤其是那些失去工作的下层中产阶级。随着法西斯主义的不断壮大，许多没有加入工会的无技术失业工人开始加入这个组织。这真是一事成功百事顺啊！法西斯分子胁迫商铺店主控制商品价格，从而赢得了贫苦百姓的好感。许多投机取巧的人自然就会涌入法西斯组织，按照法西斯主义的原则和标准行事。尽管法西斯主义蓬勃发展起来了，但是它仍然是一种小众运动。

因此，法西斯势力日益发展壮大起来，而与此同时，社会党的领袖们则疑虑重重，迟疑不决，相互争吵，而社会党党内也意见不合，派系林立。意大利正规军对法西斯组织十分友好，墨索里尼也得到了几位将领的支持。墨索里尼将这些形形色色、相互对立的人群吸引到他的旗帜之下，把他们团结起来，并让组织中的每个群体都认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它们的救星，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有钱的法西斯分子把他看作财产的护卫者，认为他的反资本主义演讲和口号都是空话套话，是为了哄骗那些劳苦大众。而穷苦的法西斯分子却相信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是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摒弃，它目前的一些行为只是为了拉拢那些有产阶级。因此，墨索里尼就在他们之间挑拨离间，从中得利。今天，他会发表一通支持有产阶级的言论，而明天则话锋一转，改为对劳苦大众表示支持和鼓励。但是，从本质上说，他是有产阶级的捍卫者，因为这些阶级供给他活动经费，而这些阶级发誓要摧毁劳工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甩脱这个压在他们心头的巨大威胁。

最后，在1922年10月，法西斯冲锋队在一些正规军将领的带领下向罗马进军。意大利总理一改之前对法西斯活动的容忍态度，宣布全国进入军事戒严状态。但是一切都太迟了，意大利国王已经站到了墨索里尼这边，国王否决了军事戒严令，接受了总理的辞呈，召墨索里尼执政，任命他为下一任总理，组建内阁。法西斯军队于1922年10月30日抵达博尔纳，而墨索里尼则在同一天乘坐火车抵达米兰，正式上台执政。

法西斯主义取得了胜利，墨索里尼控制了整个局面。但是他到底代表了哪个阶层的利益呢？他的计划和政策是什么？伟大运动几乎无一例外都必须基于清晰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则必须以确定的原则为基础，具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法西斯主义独具一格，没有确定的原则，也没有意识形态，更没有政治哲学，也许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可以勉强称得上是它的政治哲学吧。1920年，即法西斯组织成立一年后，墨索里尼向所有的法西斯分子宣称：

> 他们不会受到任何固定原则的束缚，只会不断地向同一个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意大利人民未来的福祉。

当然，这绝对不是什么与众不同的政策，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说他打算代表人民的利益。1922年，就在法西斯军队抵达博尔纳的一个月前，墨索里尼说道：“我们的计划很简单，我们想要统治意大利。”

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百科全书》（*Enciclopedia Italiana*）中写到了法西斯主义的起源，在这篇文章中他更为清楚地做出了解释。他说，当他向博尔纳进发之时，他的脑海里并没有清晰地勾画出未来的计划。当政局动荡混乱时，人们就会强烈要求稳定秩序，这就促使他开启了自己的政治冒险历程，这也是他在过去社会主义斗争的历练中所形成的政治敏锐感。

尽管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极端对立的，但它们也有一些共同之处。然而，从原则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它们之间的强烈反差是无可比拟的。我们早就知道，法西斯没有基本原则，最初简直是一片空白。而马克思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却是错综复杂的经济理论和历史演绎，需要极强的精神自律性。

尽管法西斯主义没有原则或目标，但是它以暴力和恐怖作为其明确的行事方式，而且它过去的一些表现让我们能够稍微更多地了解它。它沿用了古罗马帝国的权力标志，这个标志通常是放置在古罗马执政官和皇帝面前的。这个权力标志是捆在一起的一束棍棒（他们将之称为“束棒”，这也是“法西斯主义”一词的由来），中间插一柄斧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组织也仿照了古罗马的组织形式，甚至连名字都原封不动地照搬了。法西斯党徒的敬礼方式被称为“fascista”，它源于古罗马的举手礼，敬礼人都是将右臂平举上抬。法西斯分子都是从古罗马时期寻找灵感，所以它们又有帝国主义的表现。他们的格言是：“没有商量，唯有服从。”这个格言也许只适用于军队，但是绝不可能符合民主制度的需要。法西斯的领袖墨索里尼成了一个独裁者。而法西斯党徒们都身着黑衫，因此他们常被世人称作“黑衫军”。

法西斯分子唯一明确的计划就是要夺取权力，因此在墨索里尼成为意大利总理后，他们实现了这个目标。随后，墨索里尼大肆镇压反对者，以此巩固他的统治地位。法西斯党徒肆无忌惮地到处实施暴力行为，进行恐怖主义活动。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暴力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虽然它也有必要性，但是会给人类带来痛苦，因此暴力实施者都需要解释自己的行为，努力获得谅解。但是，法西斯主义从不认为需要对自己的暴力行为道歉。它的党徒们完全接受暴力的思想，并对此公开大加赞扬。在实施暴力行为时，即使没有遇到丝毫反抗，他们也绝不会停手。在法西斯党徒的暴力手段之下，议会中的反对党

领袖们都噤若寒蝉，于是一部选举新法得以强行通过了，而这部新法律也违背了宪法。通过这种方式，墨索里尼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在法西斯分子完全控制了警察力量和国家机器之后，他们仍然继续保持这种非法的暴力行为，这实在是一种奇特的现象。但是，他们就这样做了，当然他们完全不受约束，因为警察是不会干涉他们的行动的。在意大利各处，人们遭到屠杀，被施以酷刑，随意打骂已成家常便饭，破坏财物早已司空见惯。但是，这还不算完。法西斯党徒们纷纷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暴力手段，那就是向法西斯的反对者身上泼洒大量的蓖麻油。

1924年，意大利议会议员、社会党领军人物吉亚科莫·马泰奥蒂（Giacomo Mateoti）遭到暗杀，这个事件让整个欧洲大感震惊。在刚刚举行的选举期间，他在意大利议会发表演说，激烈批评法西斯的独裁行为。几天后，他就遭到暗杀。谋杀者受到审判，但是这个审判只是走了个形式而已，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遭到处罚。自由党温和派领袖阿曼多拉（Amendola）也遭到了殴打，不幸身亡。意大利前总理、开明人士尼蒂（Niti）刚刚成功地逃离了意大利，但是他的寓所遭到了破坏。以上事件都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但是类似的事件在意大利简直是数不胜数，因为暴力事件仍然四处蔓延，从未停息。除了合法的镇压手段之外，暴力行为大行其道，而且暴徒们并非只是通过实施暴力来宣泄情绪。法西斯的暴力行为是训练有素而且组织严密的，其目的是专门打击反对者，其中不仅包括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还包括爱好和平、十分温和的开明人士。墨索里尼命令法西斯党徒继续展开行动，要让法西斯反对者们寸步难行，甚至“痛不欲生”。他的指示得到了坚决贯彻。除法西斯党之外，意大利的其他政党、组织或者机构都不复存在了。法西斯主义控制了意大利的一切，而且只有法西斯分子才能得到工作机会。

墨索里尼成了独揽意大利大权的独裁者。他不仅是意大利总理，还身兼意大利外长、内务部长、殖民部长、战争部长、海军部长、空军部长和劳动部长等各种重要职位！事实上，他完全集整个内阁于一身。可怜的国王只能退居幕后，几乎完全销声匿迹了。议会逐渐被边缘化，对意大利的政局更加无能为力。法西斯党大议会（Fascist Grand Council）控制了政局，而墨索里尼则控制了法西斯党大议会。

墨索里尼关于外交事务的早期演说让欧洲其他国家大为震惊而又惊慌失措。这些演说简直不同寻常，墨索里尼大肆吹嘘，满口威胁，完全不像是政治家们惯用的外交口吻。他似乎一门心思就想要斗争。他讲到了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命运，梦想意大利的战机能够遮天蔽日，他还在多个场合公开威胁意大利的邻国法国。当然，法国远比意大利强大，但是由于没有人希望开战，所以墨索里尼的言论没有激起法国强烈的反应。尽管意大利也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他尤其喜欢针对国际联盟，对它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甚至还采用过最蛮横的方式公开反抗它。但是，国际联盟和其他成员国也极力忍耐下来了。

意大利发生了许多外部变化。表面上意大利各处都变得井然有序，人民严守时间，肯定会给游客们留下良好的印象。皇城博尔纳经过重新修缮，变得更加美丽，而意大利政府还实施了许多野心勃勃的改善计划。墨索里尼的眼前浮现出一幅崭新的罗马帝国的景象。

1929年，墨索里尼与教皇的代表签订了一份协议，从而结束了教皇和意大利政府之间由来已久的纷争。自从1871年意大利王国把首都设为博尔纳以来，教皇一直拒绝接受，也从未放弃过索取博尔纳主权。因此，每一任教皇一旦就任，就立马住进博尔纳境内梵蒂冈的巨大宫殿中（圣彼得大教堂正位于其中），再也不肯踏入意大利领土一步。他们自愿将自己囚禁起来。在1929年双方签订了协议之后，博尔纳中心的这一小片梵蒂冈区域获得认可，成了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教皇就是这个小国的绝对君主，这个国家的总人口只有500人！这

个小国也开设了法庭，发行自己的货币和邮票，也有公共服务事业，甚至还有世界上造价最为昂贵的小铁路。教皇不再将自己关在宫殿里面了，他偶尔也会离开梵蒂冈。墨索里尼与教皇签订了这份协议之后，立刻得到了天主教教徒们的拥护。非法的法西斯暴力行为持续了一年左右，其间暴力行为十分密集，随后其程度逐渐减轻，直到1926年彻底结束。1926年，意大利通过了《例外法律》（*Exceptional Law*），从此国家才有权力来处理政敌问题，那么非法行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个法律类似于一些基于某些法令的法令和法律条文，印度也有许多这类的法令。这部《例外法律》实施以后，人民仍然受到惩罚，锒铛入狱，还有许多人遭到流放。根据官方统计数字，在1926年11月到1932年10月，多达10044名人士被送到特殊法庭接受审判。政府专门把三个小岛设为流放地点，它们分别是蓬扎（Ponza）、文托勒尼（Ventolene）和特雷米蒂（Tremiti），岛上的条件尤为恶劣。

大规模的镇压和逮捕行动一直在进行。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法西斯政府竭尽全力进行镇压，但是意大利国内仍然存在着一支秘密的革命力量在反抗它的独裁统治。经济压力加大，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仍在继续恶化。

176 ——民主与独裁

贝尼托·墨索里尼成了意大利的独裁者，这一榜样效应似乎引来各国争相效仿，独裁统治在欧洲大陆蔓延开来。他曾说过：“欧洲各国王位空缺，正等着有能耐的人。”独裁统治在许多国家兴起，而议会要么遭到解散，要么被迫顺从独裁者的意志。西班牙显然正是如此。

西班牙并未加入世界大战。它向参战国家售卖商品，发了一笔战争财。虽然它没有外患，但是也有内忧。现在它的工业发展非常落后。很久以前，它从美洲和东方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将之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国内各大港口，但是它在欧洲的辉煌岁月早就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它已经不能算作欧洲强国了。西班牙议会相当懦弱，而罗马教廷在这里势力很强，影响深远。正如其他工业落后的欧洲国家一样，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西班牙大行其道，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与在德国和英国盛行的温和式社会主义在此却无法生存。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正在奋力抗争，争取权利，而西班牙的工人阶级和激进分子则发动了一场全面罢工，试图建立民主共和国。国王的政府和军队镇压了这次罢工和整个运动，从此军队在这个国家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依赖军队的国王也开始变得有点独立和霸道了。

法国和西班牙在摩洛哥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1921年，阿卜杜勒·克里姆在摩洛哥里夫地区（Riffs）崭露头角，率领民众反抗西班牙的统治。他能力出众，表现英勇，屡次挫败西班牙军队的行动。这导致西班牙国内出现了严重危机。西班牙国王和军队高层都想要结束宪政，解散议会，开始实施独裁统治。关于独裁统治他们达成了共识，但是关于谁来掌控独裁权力，他们的意见就产生了分歧。国王自

己想要成为独裁者或者专制君主，但是军队高层希望实施军事独裁统治。1923年9月，西班牙发生了军事政变，从而军队占得了优势，普利莫·德·里维拉（Primo de Rivera）将军开始实施独裁统治。他暂停了议会活动，毫不掩饰地依靠武力（也就是军队）实施独裁统治。但是，镇压里夫人的摩洛哥行动并未发展起来，而阿卜杜勒·克里姆还在继续激烈反抗西班牙的统治。西班牙政府甚至向他提供了十分诱人的条件，但是他断然拒绝，仍然坚持斗争，以争取完全独立。也许西班牙政府单靠自己本就不能制伏他。1925年，在摩洛哥享有很多利益的法国决定要插手干预了。法国人调用他们庞大的资源来打压阿卜杜勒·克里姆。1926年年中，阿卜杜勒·克里姆战败，向法国投降，从此结束了他长期英勇的斗争。

在这段时间内，普利莫·德·里维拉继续在西班牙实行独裁统治，军队威慑、强制审查、武力镇压司空见惯，而军事管制也时有发生。我们必须牢记，西班牙的独裁统治不同于墨索里尼的独裁，因为前者完全依赖于军队，而后者拥有不同阶级的支持者。一旦军队厌倦了普利莫·德·里维拉，他就立即孤立无援了。1930年年初，西班牙国王罢免了普利莫。同年，西班牙发生革命，虽然这场革命很快遭到镇压，但是要求共和的革命情绪已经深入人心，很难将其抑制下去。1931年，共和派在市镇选举中取得胜利，展示了其巨大的实力。阿方索国王（King Alfonso）认为小心即大勇，因此很快宣布逊位并逃离了西班牙。西班牙建立起了一个临时政府，从此这个代表君主专制以及教会统治的欧洲古国成了欧洲最年轻的共和国，它驱逐了前国王阿方索，并与教会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但是我想说的是独裁者问题。除了意大利和西班牙，还有其他一些国家放弃了民主政权，确立了独裁统治。这些国家包括波兰、南斯拉夫、希腊、保加利亚、葡萄牙、匈牙利以及奥地利。在波兰，毕苏斯基曾是沙俄统治时期的社会党人，他一手把持了军队，成了波兰的独裁者。他常常言语无礼至极，恣意攻击波兰的议员们，有时这些议

员还会被匆匆带走，遭到逮捕。在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就是独裁者。据说，在这个国家的一些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了，独裁政权的镇压是前所未有地残酷，甚至比土耳其统治时期更甚。

上述几个国家都并非一直处于公然的独裁统治之下。有时，这些国家的议会暂时活跃一阵儿，可以行使职责；有时，正如保加利亚近来发生的事件一样，拥有权力的政府逮捕一切让其不开心的议员，比如共产主义者，并强行把他们赶出议会，让剩下的议员们尽其所能地继续行使职责。这些国家常常处于独裁统治之下，或者濒临独裁统治的边缘。这些个人专制或者少数群体政府依赖武力，不断采取镇压手段，杀害并囚禁反对者，实施严厉的审查制度，并派出大量的间谍监视全国，以此来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

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也出现了独裁统治。我曾经对你说过土耳其和凯末尔帕夏的故事。南美洲多见独裁者，但是那里的人们早就习以为常了，南美洲的各个共和国从未接受过民主进程。

在上面列举的独裁政权中，我并未把苏联算在内，这是因为苏联的独裁统治与众不同。在苏联，实施统治的并非是某个人或者少数人群体，而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组织严密的政党。他们将之称为“无产阶级专政”。军事独裁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它早就存在了。但是共产主义专政和法西斯独裁都是新生事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产物。

你应该记得我曾告诉过你，19世纪是民主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法国大革命宣扬的人权主义成了最进步的思想，而个人自由成了奋斗的目标。由此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中，议会政体应运而生，发展程度各有不同。在经济领域，自由主义理论就此盛行起来。进入20世纪，更准确地说，是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9世纪的伟大传统成了过去，仍然对形式民主怀有敬畏之情的人越来越少了。随着民主政治的

陨落，那些所谓的自由民主团体无一例外地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他们也不再算作有效力量了。

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反对并谴责民主主义，尽管它们给出的理由互不相同。甚至在那些既非共产主义也非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中，民主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广泛的支持。议会不复当初的盛况，人们已经不再对它肃然起敬了。政府首脑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他们可以绕过议会直接进行一切他们认为必要的事情。他们之所以可以这样做，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必须对任何变化做出快速反应，而议会的行动有时会比较迟缓。德国最近完全抛弃了议会，现在开始在实施最为严酷的法西斯统治。美国向来赋予美国总统极大的权力，最近总统权力再次得到增强。英国和法国是硕果仅存的两个国家，议会一如往昔，仍旧对外行使着职能。它们在附属国和殖民地中进行着法西斯活动，英国的军事独裁在印度展露无遗，而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施行军事独裁，“平定”了当地的局势。但是，即便是在伦敦和巴黎，议会也渐渐被架空，成为没有权力的空壳子。就在上个月，一位有名的英国自由民主人士说道：

> 我们的议会正在迅速沦为登记机器，为统治者集团实施专制独裁服务，而这个集团则是由一个并不完美且运转不灵的选举机器选举出来的。

不论在何处，风靡19世纪的民主和议会自此节节败退。在某些国家里，它们遭到野蛮粗暴的公然抛弃。虽然在另一些国家里，它们仍然存在，但是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意义，逐渐沦为一种“神圣而空洞的虚饰”。一位历史学家曾把议会的衰退与19世纪王权的衰亡进行了比较。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国王失去了实权，成了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他们的存在多多少少都难逃“作秀”的痕迹。这位历史学家认为，议

会的情况与之类似，很可能会成为，其实正在变成没有权力的神圣象征，形象看似高大，地位无比显赫，然而却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民主曾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人心向往之的理想和信念，成千上万的殉道者曾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现在它为什么受到人们的唾弃了呢？这些变化的发生当然是有充分的缘由的。这并非是因为人民大众变化无常，随心所欲，不切实际，这必然是因为19世纪的形式民主不能适应现代的社会状况。这个话题很有意思，但是十分错综复杂。我现在不会对此展开深入探讨，但是我会提出一两个问题供你思考。

在之前的某段中，我把民主称作是“形式上的”。共产主义者说这不是真正的民主，这不过是披着民主外衣的专制，实际上仍是一个阶级在统治其他阶级。他们认为，民主掩盖了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事实。这就是富豪统治，政府受到财团的控制。民主赋予人民大众选举权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让他们能每隔4至5年有一次表达个人意愿的机会，决定是让甲还是乙来统治和剥削他们。不论哪种情况，人民大众最终都会受到统治阶级的盘剥。只有当统治阶级成为唯一存在的阶级，社会中就不再有剥削和压迫，那么真正的民主才能到来。但是，为了建立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必然要经历一段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以控制人群中所有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分子，不让他们有机会玩弄阴谋诡计来危害工人阶级专政国家。在俄国，代表着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积极”分子的苏维埃政权实行了专政统治。因此，这就变成了90%，甚至是95%的人对剩余10%到5%的人的专政。这就是他们的理论。实际上是共产党控制了苏维埃，而共产主义统治集团控制了共产党。由于这种专政有赖于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持，因此它必须考虑到工人的利益。最后，在这种专政之下，并不会为了某个阶级的利益对工人或者其他阶级进行剥削。剥削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果说还有剥削的话，那就是国家为了所有人的利益所采取的行为。值得铭记的是，俄

国从未有过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政府，它在1917年时实现飞跃，直接从沙皇独裁统治进入了共产主义。

法西斯的看法却完全不同。在上一封信中，我已经告诉过你，要找出法西斯主义原则是很难的，因为它们似乎并没有什么固定原则。但是关于它们是民主的对立面这点还是毋庸置疑的。它们反对民主的理由不同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认为民主不是货真价实的，只是一种假象，而它们却反对民主主义思想的所有原则基础，并极尽诅咒之能事，竭尽全力批判民主。墨索里尼就曾把民主称为“正在腐烂的尸体”！法西斯主义者憎恶个人自由思想，他们认为国家就是一切，个人无关紧要。要是那位倡导19世纪民主自由主义的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能了解这一切，他又会对他的同胞墨索里尼说什么呢？

不仅是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就连那些曾经深深思考过当今社会问题的其他人士，都对选举权就意味着民主的旧观念越发不满。民主的真正意义是平等，民主只能在平等社会里才能够繁荣昌盛起来。显而易见的是，每个人都能投票选举但并不能创造出一个平等社会。尽管成年人拥有了投票权或者相似的权利，但是今天社会不平等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因此，为了让民主有起死回生的机会，就必须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这个论断让人们纷纷倒向其他的目标和方法。但是人们都认为今日之议会令人非常不满意。

让我们稍微深入地了解一下法西斯主义，去探究它的本质。它以暴力为荣，以和平为耻。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百科全书》中写道：

> 法西斯主义不相信永久和平是必要或有用的。因此它完全否定和平主义，因为和平主义掩饰了其逃避斗争和懦弱的本质——尤其是在面对牺牲时。战争，也唯有战争，才能把人类的力量激发出来，实现其最大张力，并让那些有勇气迎接它的人深刻认识

到它的伟大和高尚。其他所有考验都不能替代它，它们都不能让人直面生死的抉择。

法西斯主义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而共产主义却具有国际主义精神。法西斯主义实际上是反对国际主义的。它把国家推上了神坛，而个人自由和权利则成了“神”的祭品。它把其他国家都看作异族，几乎与它们完全敌对起来。犹太人就被当作异类，受到了残酷的虐待。尽管法西斯主义高喊着反资本主义的口号，打着革命的旗号，但是它与反动的垄断资产阶级联合了起来。

这些都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些奇怪的方面。我们很难了解它的思想基础（如果它有的话）。就我们所知，它最初是出于人类对权力的纯粹欲望。当它成功地获得了权力，它就会试图建立起支撑它的思想基础。为了让你了解一下这有多复杂难懂，我将引用意大利一位著名法西斯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中的一段话，他的名字叫作乔瓦尼·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他也是政府中的一名法西斯部长。秦梯利认为，人们不应该按照民主主义所倡导的那样，通过自己的个性或个人意志去追求自我实现，而是应该按照法西斯主义的主张，通过作为世界自我意识的先验自我的行为来实现自我。（不论它可能意味着什么，但是我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因此，按照这种观点，个人自由和个性没有存在的必要；个人只有投身于国家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存在和自由。

我的个性并未遭到抑制，而是与其他个性相互交融，在群体、国家和精神中得以重生，从而得到了提升、巩固和扩展。

秦梯利再次写道：

> 在口头劝诫或者棍棒暴力中，每种力量都是道德的力量，只要它能够影响意志，不论它引起了多少争议。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每当英国政府大肆采用包铁警棍等武器对付印度人民时，他们也耗尽了大量的道德力量。

这些理论都试图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对其理由与合理性加以解释。据说法西斯主义倡导建立一个“社团国”（Corporative State），我猜测在这样的国家里，人们为了共同的福祉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但是迄今为止，意大利或者其他国家并未出现这样的国家形式。资本主义在意大利的运行模式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大同小异，尽管意大利施行了一些限制条件。

随着法西斯主义在其他国家的不断扩散，我们逐渐清楚地认识到，它并非是意大利特有的现象，而是当某个国家出现了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时，它才会显现出来。每当工人阶级强大起来，真正危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时，资产阶级自然会展开行动，自我拯救。通常只有在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时，工人阶级才会威胁到资本主义。如果有产统治阶级不能利用警察和军队，按照通常的民主方式来扑灭工人阶级运动的话，它就会采用法西斯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发动一场民众运动，提出一些口号，鼓动大众参与运动，实际目的却是为了保护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这场运动的群众基础是小资产阶级，他们中绝大多数都受到失业问题的困扰，而许多政治上落后、缺乏组织的工人和农民也受到了运动口号的蛊惑，希望能够通过参与这场运动来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大资产阶级为这场运动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他们希望能够从中牟利。尽管这场运动的信条是暴力，而且它使用暴力也已成为司空见惯的行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也极大地容忍了它，因为它们都在共同对抗同一个敌人——社会主义劳动者。作为一个政党，它摧毁了各种工人组织，并对所有的敌对势力施以恐怖统治。如果它上台执政的话，它的行为会变本加厉。

当不断进步的社会主义与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和危险时，法西斯主义就应运而生了。这个社会战争并非是因为误解产生的，而是因为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我们现在社会所固有的矛盾和利益的多样性。如果忽略这些矛盾，那么这些矛盾将不会得到解决。那些在现有体系下苦苦挣扎的人们对利益的多样性了解越多，那么他们就会对自己的利益遭到剥夺而越发地怨恨。有产阶级无意放弃它所拥有的一切，因此矛盾就会日趋激烈。只要资本主义能够利用民主制度机器来掌握权力并镇压工人的反抗，那么民主就能得以蓬勃发展。一旦不能采用这种方式，资本主义就会立刻抛弃民主，公然采用赤裸裸的法西斯方法，使用暴力并进行恐怖统治。

我认为，欧洲的所有国家，除俄国之外，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法西斯主义。法西斯最近在德国大获全胜。甚至在英国，法西斯思想在统治阶级中也在广为流传，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常常在印度大张旗鼓地实施法西斯统治。今天，在世界舞台上，作为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招——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狭路相逢了。

但是，撇开法西斯主义的其他方面不谈，它并未能够解决困扰世界的经济问题。由于法西斯主义极端而强硬的民族主义倾向，它与相互依存的国际趋势背道而驰，从而使资本主义衰落所带来的问题更加严重，并且加剧了国与国之间的摩擦与不和，使得战争的可能大大增加。

177 ——中国革命与反革命运动

现在我们将离开欧洲前往世界的另一个角落——远东地区。欧洲的局势动荡不安，人民怨声载道，而远东地区的中国和日本则面临着更大的问题。在上一封关于中国的信中，我向你讲述了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它嫁接在世界上最为古老却生气勃勃的中华文化之上，正面对着许多艰难险阻。这个国家似乎正在四分五裂，肆无忌惮的军阀、督军以及大督军大行其道，权势滔天，帝国主义势力一心想要保持中国积弱分裂的局面，因此常常鼓励帮助这些反动势力割据一方。这些督军没有道德原则，做事不择手段，他们的目标就是扩张自己的势力。军阀混战总是不断发生，而这些督军也在频繁地更换阵营。同时，这些军阀依靠他们的武装部队对农民施以苛捐杂税，农民的生活困苦潦倒。我也向你提到过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南部省份广东建立的国民政府。终其一生，孙中山先生都在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而奋斗。

整个中国都处于外国列强的控制之下，它们在华展开了经济利益的争斗，占领了多个重要的港口城市，如上海和香港，还把持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孙中山先生早前曾说过，中国在经济上就是这些列强的殖民地，这句话真是一语中的。有一个控制者都已经是很糟糕的事情了，何况是有多个相互争斗的控制者，这样一来情况有时会更糟。孙中山先生试图想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帮助中国发展工业，并恢复国内秩序。他尤其指望美国和英国能够伸出援手，但是这两个国家以及其他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不愿意给予帮助。它们只热衷于剥削中国，对它是否能够健康发展、增强国力完全不屑一顾。随后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转而向苏联求助。

共产主义思想一直在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内部秘密而快速地传播着。1920年(注)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但是它是一个秘密组织，因为任何政权都不允许它公开活动。孙中山先生不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他仅仅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就像他提倡的著名的“三民主义”所表现的那样。但是，苏联对中国以及其他东方国家十分热情坦诚，这让他大受触动，因此他与苏联建立起了友好关系。他聘请了不少苏联顾问，在他们当中鲍罗廷（Borodin）最为著名，他是一位能力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鲍罗廷成为广东国民党的主心骨，他致力于建立一个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强大的全国政党组织。国民党中有许多颇有资产的保守派成员（尤其是地主），他们并不喜欢与共产主义者扯上任何关系。另一方面，许多共产主义者也不情不愿，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淡化自己的主张，不能进行那些他们本来可以独立开展的行动。这不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联盟关系，我们将会看到，它会在一个关键时刻完全崩溃，并给中国带来极大的灾难。要把利益完全冲突的两个或多个阶层合并起来，这通常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在这个联盟关系存续期间，它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而国民党和广州革命政府也日益发展壮大起来。革命政府鼓励佃户发展自己的组织，因此这些组织遍地开花，工会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使广州国民党真正地强大起来，但是这让地主阶级的领袖们心生恐惧，促使他们之后与这个政党分道扬镳。

中国的状况与印度有许多相似之处，尽管同样也有许多巨大的差异。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人数众多。资本主义工业主要局限于6座城市里，而且还受到外国列强的控制。无数农民与佃户身负巨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跟印度一样，土地的租金是十分高昂的。当土地里没活可做的时候，这些农业劳作者在很长时间内就不得不闲散下来，因此他们需要做些家庭手工业来消磨这段空闲时间，并增加自己的收入。的确，现在这样的家庭手工业比比皆是。一个人拥有大片土地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即使有，也会很快被土地的继承人们分割成小块。大约有一半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而另一半则成了地

主的佃户。因此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无数的小农场。几百年以来，中国的农民早就练就了一身好本领，能在狭小的土地上刨出尽可能多的粮食。因为他们拥有的土地实在是太有限了，他们才不得不发挥惊人的创造力，并进行极为辛勤的劳作。他们并没有使用现代农机设备，因此他们只得更加努力地劳作，以保证收成。

即使他们在生产劳动中创造力惊人，也十分辛勤地劳作，但是几乎半数的人都没有办法维持基本的生活。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都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印度的农民也是如此。他们穷困潦倒，在灾难面前不堪一击。饥荒和洪水常常夺走无数人的生命。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政府根据鲍罗廷的建议，通过了一项法令，对这些贫农和工人提供救助。法令规定土地租金减少25%，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以及设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并允许建立农民协会。这些改革自然会受到大众的欢迎，让人民心中充满了热情。他们纷纷加入新的联盟，并支持广州革命政府。

因此广州革命政府稳固了政权，开始准备北伐战争。它开办了一所军事院校，建立了一支革命军。不仅是在广东，整个中国范围内都发生了一次有趣的变革，那就是世俗权威完全取代了宗教权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场变革也蔓延到了整个东方地区。当然，从狭义上来说，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宗教国家，现在它变得更加世俗化了。过去的宗教教育变为了世俗教育。这场变革最有力的佐证就是许多古老的寺庙被改作了他用。在广东，一座名寺摇身一变就成了警察训练机构！在其他一些地方，许多寺庙则变成了菜市场。

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逝世，但是广州革命政府仍在不断发展壮大，鲍罗廷继续担任顾问一职。不久之后，发生了一些事情，这激起了中国人民对外国帝国主义由来已久的愤怒情绪，他们的不满主要是针对英国的。上海棉纱厂爆发罢工运动，一位工人在1925年5月的游行示威中遭到杀害。人们为他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最后扩大成为

学生和工人参与的反帝国主义游行。一名英国警官下达了“射杀”命令，指挥手下的印度锡克教警察对游行人群开枪射击，一些学生丧生。民众对英国的怒火迅速燃遍整个中国，随后发生的事件使得事态进一步恶化。这个事件于1925年6月[注]发生在广州外国租界（即沙面地区）。一群中国民众，其中大部分是学生，遭到了机关枪的射击。52人遇害，还有许多人负伤。人们认为英国人是这场被称为“沙面大屠杀”事件的罪魁祸首。广州革命政府宣布对英国货物进行抵制，并长期中断与香港的贸易，这让英国公司以及英国政府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你也许知道香港，它是英国在中国南部地区的殖民地。它与广州相隔不远，因此它成了与内地进行贸易往来的口岸。

孙中山先生过世之后，广州革命政府内部右翼保守势力与左翼进步势力之间的斗争仍未停息。在各种纷争中，它们之间互有输赢。在1926年年中，右翼人士蒋介石出任总司令，开始了把共产主义者驱逐出去的行动。但是这两个党派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合作关系，尽管它们相互并不信任对方。在此之后，北伐战争打响，革命军队挥师北上，发誓要赶走所有的军阀，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民政府。北伐运动非同凡响，很快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北伐之路上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战斗，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快速向北挺进。北方地区四分五裂，而南方的真正力量来自农民和工人的拥戴。北伐先遣部队是一支宣传小分队，它在行进的过程中组织起农民协会和工人工会，向他们描述了广州革命政府治理下的光明前景。因此，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国民革命军都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各地人民都竭尽所能地提供一切帮助。军阀们派来阻击广东国民革命军的部队拒绝开战，往往还会完全投入革命军的阵营，倒戈相向。在1926年年末，民族主义者们已经跨过半个中国，控制了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汉口。他们把国民政府所在地从广州迁到了汉口，并把汉口改名为武汉。革命军打败了北洋军阀，把他们赶出了盘踞地，而列强们突然懊恼地意识到，这个新生的中华民国雄心勃勃，堂堂正正地向它们提出平等要求，并拒绝再受欺辱。

1927年初，民族主义者们试图夺回汉口英租界的控制权，这就引起了国民政府与英国的冲突。通常，如果中国方面采取如此挑衅的态度，都会导致战争的爆发，而英国政府也会进行血腥镇压，加以胁迫，以获得中方更多的割地赔款。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延续近百年的惯常做法。但是，时代变了，它们现在面对的中国已经不同往日，因此英国政府第一次在中国迅速改变了对华政策，向中国新政府做出了让步。汉口租界事件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因此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解决。但是，在离汉口不远的地方是重要的港口城市上海，它正处于国民革命军的行进路线上。这座城市是外国势力在中国面积最大、最为富裕的租界。庞大的外国既得利益群体对上海的命运万分关切。上海或者说是上海的租界是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中的，实际上并不是中国政府的管辖范围。国民革命军步步逼近上海，在上海的外国人以及外国政府都焦虑万分，大批军舰和军队快速向这个港口城市集结。尤其是英国政府在1927年1月初派出了一支规模巨大的远征军，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印度的军队。

定都武汉的国民政府面临着一个难题：是继续前行还是停下脚步？是攻占上海还是放弃这一意图？到目前为止，北伐战争一路高歌猛进，并未遭遇挫折，这让国民革命军士气高涨，无所畏惧，而上海就像一块诱人的蛋糕，让他们不忍释手。另一方面，他们只是马不停蹄地行军，走过了500多英里的中国土地，但是并未建立起根据地，巩固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进攻上海可能会让他们陷入困境，遭到帝国主义者的打击，而这也许会危及他们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鲍罗廷建议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并巩固政权。他认为国民政府应该避开上海，加强在它已经控制下的中国南部的统治地位，并利用宣传手段在北方打好革命的基础。他希望，最多一年左右时间，整个中国就能做好迎接民族革命到来的准备。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夺取上海，进而挺进北京，直面外国列强的帝国主义势力。革命家鲍罗廷给出了谨慎的建议，这是因为他经验丰富，善于判断权衡当前局势中的不同因素。但是，国民党中的右翼分子，尤其是蒋介石总司令坚持要继续向上海

进发。后来，在国民党分裂之后，他们想要夺取上海的真正原因才显露出来。这些右翼领袖并不乐意看到农民协会和工人工会发展壮大。北伐战争中的许多将军本来就是地主阶级出身，因此他们决意要摧毁这些组织，不惜以分裂国民党与削弱民族革命事业为代价。上海是中国大资产阶级的重要中心，所以右翼将领们指望能从上海获得资金以及其他方面的支持，让他们能够与党内进步力量，尤其是共产主义者进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们知道还能依靠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家和工业家的支持。

因此他们继续向上海行军，并于1927年3月22日攻占了这座城市，但是并未进攻上海租界，保持了它的原状。他们依旧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这座城市。军阀的抵抗部队向他们投诚，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声援他们，上海现有政府轰然倒塌。两天之后，南京也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囊中之物。在此之后，国民党内部左翼和右翼势力彻底决裂，由此国民革命的胜利戛然而止，灾难随之而来。革命终结了，反革命运动揭开了序幕。

蒋介石不顾武汉国民政府众多成员的反对，执意挥师上海。国民党内部两大势力钩心斗角，相互倾轧。武汉国民政府意图削弱蒋介石在军中的影响，从而能够把他赶出国民党，但是蒋介石另立南京国民政府来与之抗衡。这一切都发生在占领上海后短短几天内。在背叛了武汉国民政府之后，蒋介石开始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左翼进步人士和工会成员。那些曾为蒋介石占领上海扫除障碍的工人，那些曾经兴高采烈地欢迎他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的工人，现在却成了他追捕和镇压的对象。许多人遭到射杀或处决，还有无数人遭到逮捕和囚禁。国民革命者本应给上海带来自由，这座城市却经受了一场血雨腥风和黑暗恐怖。

同年4月，北京的苏联大使馆与上海的苏联领事馆几乎同时遭到突袭。在这次突袭行动上，蒋介石与东北军阀张作霖出奇地一致，这再

明显不过了。本来在那个时候这两个人应该在战场上相见的。不论是在北京还是上海，一场针对共产党和进步工人“大清洗运动”正式铺开。帝国主义势力当然对事态的发展表示支持，因为这会分化削弱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力量。蒋介石力求与在上海的外国列强代表进行合作。你要记住，正是在1927年5月，英国政府出动警察突袭搜查苏联驻伦敦贸易机构阿科斯公司，随即宣布与苏联断交。

仅仅一两个月，中国的面貌就彻底改变了。在此之前，国民党是代表中华民族的统一政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对抗着外国在华势力，正是志得意满、踌躇满志之时，但是现在它已经分崩离析，党内势力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派。而曾经给它带来勃勃生机和强大力量的工人和农民现在却面临着迫害和追捕的命运。上海的外国利益群体额手称庆，殷勤地帮助中国国内的内斗，它们尤其热衷于收买和骚扰工人，以作消遣，并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上海（应是全中国）各大工厂的工人们遭受到工厂主的非人剥削，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都极其恶劣。在过去，工会能给予他们力量，帮助他们从工厂主那里争取到更高的工资。因此欧洲各国、日本、中国的工厂主们都不愿意看到工会的存在。

看到中国的形势急转直下，莫斯科方面对鲍罗廷提出了严厉的谴责，并在1927年7月将他召回苏联。在他离去之后，武汉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左翼势力变得支离破碎。现在南京国民政府完全控制了国民党，并继续清洗共产主义者、左翼进步分子和工人领袖，进行大肆屠杀。在这个时期，许多人士被逼出走，而孙中山夫人就是其中的一位。孙夫人是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在人民心中威望极高。她沉痛地宣布，这些军国主义分子以及其他反动势力已经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但是这些军国主义分子仍然推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以及民生主义。

中国再一次陷入了军阀将领们的混战中，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广州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在南方建立了一个独立政府。1928年，北京落入南京国民政府之手。随后，北京改名为北平，寓意“北方安宁平定”。“北京”一词在过去是“北方京城”之义，但是它不再是首都了。

尽管北平（现在我们必须这么称呼它了）陷落了，内战仍未停息，中国烽烟四起。广州成立了一个独立政府，但是在北方，各个军阀恣意妄为，争吵不断，有时能够暂时相互妥协。从理论上说，这个所谓的南京“国民”政府从形式上统一了除广州以外的中国。但是，有许多地区都不受它的控制，尤其是在共产党政权控制下的中国内地的大片土地。南京国民政府主要依赖上海的银行家们提供资金支持。各大将领手下的庞大军队开支巨大，让农民阶级不堪重负，苦不堪言。大量退伍军人游荡在乡村里，贫困潦倒，苦苦谋生。那些没有找到出路的常常落草为寇，四处抢劫。

1927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正式断交。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南京政府采用了强硬的反苏政策。这种挑衅的态度本来必定会引发一场中苏战争，但是苏联坚定了自己的立场，绝不轻易卷入战争。1929年，中国政府再次变得十分强硬，这次事件发生在满洲。在那里，苏联领事馆遭到突袭搜查，东清铁路的苏方官员被就地免职。这条铁路主要是苏联的产业，因此苏联政府立即对中方采取了反击行动。小规模战争持续了数月时间，最后中国政府接受了苏联政府的要求，重新恢复了以前的安排。

在前文中我提到过中国某些地区已经建立了共产党政权。似乎第一个共产党政权是在1927年11月建立的，位于南方广东省的海丰县。这个政权被称为“海丰县苏维埃共和国”，是在数个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直到1932年中期，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内地发展壮大起来，占据了中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说，它的占地面积为25万

平方公里，人口总数高达5000万。这个政权组建了一支40万人的红军，而且这支军队还有儿童团。南京国民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都竭尽所能，镇压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而且蒋介石不断组织大规模的反共讨伐战争，但是收效甚微。有时候苏维埃政权会战略性撤退，在中国内地找到另一个地区，继续巩固自己的地位。[注]

---

1. 正式成立是1921年。——译者注
2. 实际是5月30日，被称为“五卅惨案”，随后的社会运动被称为“五卅运动”。——译者注
3. 在本书结尾后记中，我将会谈及蒋介石和中国苏维埃政权之间的斗争、国共两党合作对抗击日本侵略，以及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等。

178 ——日本公然挑战世界

我们已经追溯了中国那段阴暗的历史往事，四分五裂的中国看似就要取得革命的胜利，但是这场革命戛然而止，一败涂地，遭到疯狂的反革命运动的反扑和吞噬。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各种事件层出不穷。有意识的阶级利益矛盾远远胜过了民族主义力量的团结，是这场革命失败的原因。富裕的地主阶级和其他利益集团更愿意破坏民族主义运动，绝不愿意让农民和工人大众占据统治地位，从而避免让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

中国不光受困于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它现在还不得不面对敌国在所难免的侵略。这个敌对的国家正是日本，它一心想要趁中国国力衰弱之时从中渔利，也想从其他早已进入中国的列强手中分得一杯羹。

日本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在日本，现代工业文明与中世纪封建制度神奇地结合在了一起，而议会制度与军国主义也和谐地共存了下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以及军事贵族们有意地建立起了氏族式的国家，他们尊天皇为最高领袖，而又各自独霸一方。他们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涉及宗教和教育等方面，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宗教是完全受官方控制的，寺庙和神社都是由政府直接控制，而且神职人员都是由政府任命的。因此，一个庞大的宣传机器利用寺庙和学校，有效地运转起来，不眠不休地教导普通大众，让他们不仅要具有爱国意识，而且必须服从于被称为“半神”的天皇的意志。“武士道”（Bushido）是一个古老的日本词，它的意思大概是旧式的骑士精神，即对氏族的忠诚。武士道精神深刻影响了日本全国上下，武士都对天皇宣誓效忠。事实上天皇只是一种标志，占统治地位的大地主和军事

贵族们正是以天皇的名义来行使权力的。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资产阶级在日本发展起来了，但是大工业巨头们恰巧全部出自旧式地主家族，因此在那个时候，权力并没有转交到资产阶级手中。实际上，垄断现象在日本屡见不鲜，极少数权势家族控制了日本的产业经济以及国家政权。

一直以来，佛教在日本拥有众多的信徒，但是神道教才是日本所有国民必须信仰的宗教，它的教义则是对祖先的崇拜。神道教崇拜的范畴包括历任天皇以及国家英雄，尤其是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人。神道教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变成了当权者手中强大而有效的工具，在国民中宣扬爱国主义并传播服从现任天皇意志的思想。日本国民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能为它做出一切牺牲，在这方面可谓是全球闻名。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这么激进，一心想要建立一个世界帝国。1915年前后，一个被称为“大本教”（Omoto-Kyo Sect）的新教派在日本兴起，并在全国范围迅猛地发展开来。这个教派的教义主张日本应当成为世界的统治者，而天皇则为最高领袖。该教派宣称：

> 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让日本天皇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和管理者，因为他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仍然坚持神圣世界的远祖所传承下来的精神使命的统治者。

我们看到，在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丧权辱国的21条不平等要求。由于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强烈抗议，它的全部要求并未得到满足，但是它的确获利良多。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认为沙皇俄国的倾覆正好是它在亚洲扩张势力的大好机会。自此，日本军队进入西伯利亚，而日本特工潜入了中亚地区的撒马尔罕以及布哈拉。由于俄国很快恢复了元气，而美国也极力反对，且对日本充满了怀疑，因此这次探路行动以失败告终。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日本和美国之间是水

火不相容的。它们相互憎恶，远隔着太平洋彼此怒目而视。1922年华盛顿会议打击了日本的扩张野心，但对美国的外交而言是一场胜利。在这次会议上，包括日本在内的9个帝国主义列强承诺将会尊重中国的主权完整，这就意味着日本必须放弃它在中国大肆扩张势力的行动，它的所有希望化为泡影。在这次会议上，英日同盟关系走到了终点，日本在远东地区变得孤立无援了。英国政府开始在新加坡建立一个规模巨大的海军基地，这无疑对日本形成了不小的威胁。1924年，美国通过了一项反日本移民法案，因为美国人打算把日本工人赶出美国。日本国内对美国种族歧视的做法非常愤怒，甚至整个东方世界都对此非常反感，但是日本对美国一点办法也没有。日本发现自己完全处于敌对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孤立无援、举步维艰，因此它转而拉拢俄国，并于1925年1月与俄国签订了条约。

我必须告诉你，在这段时间内，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了日本，极大地削弱了日本的国力。这场灾难是发生在1925年9月1日的大地震，地震引发了海啸，火灾在日本首都东京肆虐。这座大型城市一片残垣断壁，横滨港（Yokohama）也沦为了废墟。10万多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给日本酿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日本人民勇敢而坚决地承受住了灾难的打击，在地震火灾的废墟之上又重新建起了一座全新的东京城。

那时日本处境艰难，因此它与俄国达成了协议，但是这并不代表它赞同共产主义了。共产主义意味着天皇崇拜的终结，而封建主义、统治阶级对劳苦大众的剥削，现有秩序下的几乎所有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强大的工业资本利益集团对日本国民的剥削日益严苛，人民的生活也愈发困苦，因此日本国内的共产主义发展起来了。日本国内人口激增，而他们无法移民到美国或者加拿大，甚至也无法前往澳大利亚的贫瘠之地；所有的门都关闭了，希望变得渺茫。虽然中国离得很近，但是中国已经人满为患了。也有一些日本人移居到朝鲜和满洲里。除了自身的特殊问题之外，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不得不面

对工业化进程以及贸易萧条所带来的普遍困境。由于日本国内局势更加严峻，日本政府开始对共产主义者以及所有的激进思想进行严酷地镇压。1925年，日本通过了《治安维持法》（*Peace Preservation Law*）。《治安维持法》的措辞相当有趣，我给你展示一下这份法案的第一条吧。它的内容如下：

> 以改变国体或者否认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而组织结社或者在知道这一情况下而企图加入者，处以不同程度的惩罚，从5年以上监禁到死刑不等。

这条法律极其严酷，不仅限制了共产主义的发展，也打击了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激进主义甚至国体改革，这显示了日本政府在面对共产主义发展时那种极度恐惧的心理状态。

但是，日本国内的社会状况让日本国民大多生活困窘、处境悲惨，因而共产主义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了。除非社会状况得到改善，否则仅仅依靠镇压手段并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目前日本人民生活十分痛苦，日本的农民与中国和印度的农民一样，都不堪巨额债务的重负，生活已经难以为继。他们承受着沉重的苛捐杂税，而日本政府大量的军备开支以及战争储备又进一步加重了税收负担。有报道指出，不少日本农民饥不择食，只能靠吃草根维持生命，甚至被迫忍痛卖儿卖女。中产阶级因为失业问题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自杀事件大大增加。

1928年初，日本政府发起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镇压运动。一夜之间，1000多人遭到逮捕，而各大报纸在一个月期间不得刊登相关报道。年复一年，日本国内不断发生警察突袭围捕以及大规模逮捕事件。最大的一次突袭围捕行动发生在1932年10月，在此期间有2250人遭到逮捕。在遭到逮捕的人中，大多数都是学生和教师，而非工人。而且，这些人当中还有数百名大学毕业生和妇女。由此可见，在日本

有不少富裕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也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吸引，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有趣现象。日本和印度以及其他国家一样，进步的思想者被认为比犯罪分子还要危险。与印度的密拉特审判一样，一些日本共产主义者的审判也历时数年，迟迟没有最终判决。

我已经向你讲述了日本的全部情况，你可能对日本侵略满洲里的背景有了基本的了解。现在我要讲一下这个事件的一些情况了。

日本一直锲而不舍地努力，试图在亚洲大陆上找到立足点；它首先侵入朝鲜，之后又来到了满洲里，关于这个方面你已经在前几封信中有所了解了。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日本发动了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10年后的日俄战争。胜利女神总是眷顾日本，它的行动越来越激进。日本吞并了朝鲜，让朝鲜沦为了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在泛指中国东北三省的满洲里，俄国将旅顺港的租借权和特权都转让给了日本。沙俄帝国修筑的中东铁路满洲里段也落入日军之手，并更名为“南满铁路”。尽管发生了诸多变故，不过满洲里全境名义上仍旧归中国政府管辖，因此中国国内移民不断沿着这条铁路涌入满洲里。史称“闯关东”的移民潮的确算是世界历史上最为伟大的人口迁徙运动之一。从1923年到1929年的7年时间里，250多万中国人来到了满洲里，这里的人口总数一跃攀升到3000万左右，其中大约95%都是中国人。因而这三大省份几乎完全被中国人占据了，剩下5%则由俄国人、蒙古游牧民族、朝鲜人和日本人组成。满族人已经完全被汉人同化，他们甚至已经完全忘记了满族语。

你应该记得我之前提到的在华盛顿签署的《九国公约》。这份公约是依照西方列强的建议，专为遏制日本在中国的图谋而制定的。九个帝国主义列强（包括日本在内）清楚明确地约定要“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在接下来的数年里，日本的行为有所收敛。但是，它利用金钱和其他方式，在背地里扶持了一些中国军阀或者督军，让中国不断爆发

内战，从而削弱中国的国力。它大力扶持张作霖，在来自南方的民族主义力量到来之前，这位中国军阀一直统治着满洲里以及北京地区。1931年，日本政府在满洲里的行动表现出了极其明显的侵略性态度。这或许是因为日本国内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迫使日本政府在海外采取行动，以此来转移国内注意力，缓解国内的紧张局势；也或许是因为军国主义势力在政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又或者是他们认为其他列强都忙于应对自身的问题和贸易萧条，分身乏术，因此不可能干涉日本的行动。可能是以上所有的原因，诱使日本政府走出了这关键的一步。因为这一举动公然违背了1922年签署的《九国公约》。它也违反了《国际联盟盟约》，因为中国和日本都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因此它们都不能在不知会国际联盟的情况下相互攻击。最后，它还明显违背了《1928年巴黎公约》（又称《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因为这场战争完全是非法的。日本政府对中国采取了军事行动，蓄意破坏了上述条约和承诺，公然对全世界提出挑战。

当然日本并不会公开叫嚣侵略中国，他们借口满洲里出现匪祸，迫使他们派遣部队前去剿匪，以维持当地秩序，保证自己的利益。很明显，这是个拙劣的借口，一听就知道是假的。虽然日本并未公开对中国宣战，但事实上它的确对满洲里实施了侵略行为。中国人民对此十分愤怒。中国政府严正抗议，并上诉国际联盟，求助其他列强，但是中国的局势并未引起外界的关注。每个国家都面对重重困难，分身乏术，因此不想与日本对立，平添更多的烦恼。也有可能是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与日本有秘密约定。中国的非正规军在满洲里给日军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但是外界认为这两个国家之间并没有发生战事！对日本来说，更大的麻烦在于中国掀起了一场抵制日货的全民运动。

1932年1月，一支日本军队突袭上海近郊，犯下了现代最为恐怖的屠杀罪行。他们不愿意激怒西方列强，于是绕过外国租界，直接进攻人口稠密的中国人聚居区。上海近郊的大片区域（我认为是闸北）遭

到轰炸和炮击，最后完全沦为废墟，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死于炮火之中，还有更多的人无家可归。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两军交战，而是对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进行的残酷轰炸。指挥这次大规模侵略行动的日本海军上将在面对外界质疑时，声称日本已经仁至义尽了，决定“对平民的无差别轰炸再持续仅仅两天时间”！就连驻上海的《伦敦时报》（*London Times*）亲日派记者都惊骇不已，他将此称为日军对中国人的“彻底的杀戮”行动。我们完全很容易想象中国人的感受。恐惧和愤怒席卷了整个中国，各个军阀和政府面对这次野蛮的外来侵略，忘却了（或者看似忘却了）彼此之间的权力之争。各方表示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在中国内地的共产党政府也表示要协助南京国民政府。但奇怪的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面对进犯的日本军队完全放弃了保卫上海。南京国民政府唯一的举动就是向国际联盟提出抗议。它甚至都没有尝试过组织一场遏制日本进攻的抵抗行动。这几乎看起来就像是南京国民政府完全不想抵抗，尽管中国人民心中已经燃起了熊熊的反日怒火，而南京国民政府总是大话连篇。

那时，上海出现了一支来自南方的另类军队——第十九路军。这支部队多为广东士兵，但是它并不受命于南京国民政府或者广州国民政府。这支军队可谓一穷二白，装备不足，没有大炮，军服寒碜，甚至没有足够的衣物来抵御严冬。许多服役的士兵是14到16岁的孩子，甚至有些只有12岁。这支衣衫褴褛的部队不顾蒋介石的转移命令，决定要奋起迎战抵抗。1932年1月末到2月初整整两周时间，第十九路军在毫无来自南京国民政府后援的情况下，顽强抗敌，他们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拖住了日军的侵略步伐，这让装备精良、实力强大的日军大为震惊。不仅是日军感到震惊，所有人也都惊讶不已，包括外国列强和中国人自己。在两周孤立无援的战斗之后，这支军队饱受赞誉，声名大噪，而蒋介石也派出一些嫡系部队前往上海增援。

第十九路军创造了历史，从此举世闻名。他们的顽强抵抗挫败了日军的计划，再加上西方列强十分看重它们在上海的利益，日军只得

慢慢地撤离上海地区，滚回了日本。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列强更关心他们的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利益，尽管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死于这次屠杀，但是它们对日军在闸北的屠杀行径漠不关心，也对日本公然违背神圣条约以及国际公约的做法毫不在意。尽管国际联盟的会议多次提起有关日本侵略行径的动议，但是国际联盟总能找出借口推迟制裁行动。对国际联盟来说，实际战争爆发以及无数人丧生或正在遭遇屠杀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据说，国际联盟指出真正的战争并没有爆发，因为日本并没有正式宣战！由于国际联盟在此事上表现软弱，而且几乎算是刻意纵容了日军的恶行，因此它的威望和声誉一落千丈。最终，国际联盟指派利顿勋爵（Lord Lyton）带领一个国际委员会，前往满洲里进行调查。帝国主义列强们很快就此达成了共识，因为一旦进入调查程序，国际联盟的决议就将长期地推迟下去。满洲里十分遥远，因此委员会必须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到达那里，又要花很多时间进行调查并提交报告，也许这件事情到时候就会烟消云散了。

日本虽然从上海撤军了，但是他们现在更加重视满洲里。他们在满洲里设置了一个傀儡政府，声称满洲里已经开始行使自决权了。这个新兴的傀儡国家被称为“满洲国”，一个性格软弱的年轻人（清朝统治者的后裔）在日本人的扶植下，当上了“满洲国”的君王。当然这一切都是欲盖弥彰的做法，实际上日本才是“满洲国”真正的主宰。大家心里都清楚，只要日军从“满洲国”撤离，这个政权在一天之内就会被彻底推翻。

日军在满洲里麻烦不断，因为中国人自愿组织起军队，一直在抵抗日军的侵略。日本把这些军队称为“匪徒”。“满洲国”的军队是由当地人组成，接受的是日军的训练和装备。当他们受命“剿匪”之时，他们往往会带着新式武器加入这些“匪徒”的队伍！在无尽无休的炮火中，满洲里满目疮痍，大豆贸易也逐渐停止了。

这次调查历时很长，最终利顿委员会向国际联盟呈交了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十分谨慎，语言温和，措辞公正，但是它直接针对着日本，这让英国政府十分恼火，因为他们是站在日本一边的。国际联盟再次推迟讨论，但是最终它还是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美国的态度与英国截然不同，它与日本是完全对立的。美国已经表态，宣称它不会承认日本在满洲里或其他地区通过强制手段所带来的任何改变。尽管美国持有如此强硬的态度，英国却完全站在日本一方，而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多少也对日本表示了支持。

尽管国际联盟在尽量避免做出决议，而日本却有了新的动作。1933年新年之夜，一支日军部队突然出现在中国境内，对中国的长城关隘山海关发动了进攻。日军大炮和驱逐舰对山海关进行了狂轰滥炸，日本飞机也扔下了许多炸弹。这是一次完全现代化战争风格的进攻，山海关被炸为废墟，硝烟弥漫，一片狼藉，许多当地居民在战火中丧生，或者奄奄一息地躺在血泊中。随后日军长驱直入，进入中国热和省，并逐渐向北平逼近。日本为这次行动又找了个借口，声称“匪徒”常以热河为据点进攻“满洲国”，而实际上热河本来就是“满洲国”的一部分！

日本这次全新的侵略行为以及新年大屠杀让国际联盟警醒过来。尤其是实力稍弱的列强们，它们坚持要制裁日本，国际联盟才最终通过了决议，采信了利顿的报告，并对日本进行了强烈谴责。日本政府对此毫不在意（或许是因为它知道包括英国在内的几个大国都在背地里支持它？），并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在此之后，日本继续默默地向北平进发。一路上，日军几乎没有遇到来自中国军队的抵抗，几乎兵临北平城下了。1933年5月，中国和日本签署停战协议，日本取得了胜利，不再向北平进发。面对日本的侵略，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软弱无能，难怪它们在中国会失去民心。

我在信中长篇大论地叙述了满洲里事变。这次事件意义重大，因为它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未来。更为重要的是，这次事件充分显示：国际联盟在面对明显的国际恶行时，毫无效率，完全起不了作用。它也显示了欧洲列强两面三刀、耍尽手段的特性。在此次事件中，美国（不是国际联盟的成员）试图对日本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几乎擦枪走火，引爆了两国战争。但是随后英国和其他列强暗地里支持日本，这就让美国的强硬姿态完全失效，而美国也害怕因为对抗日本而遭到孤立，从而变得更为谨慎小心。国际联盟装模作样地谴责了日本，但是并未有任何后续的惩罚措施。国际联盟成员国表示不承认“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但是这无异于一场闹剧罢了。

尽管国际联盟对日本提出了强烈谴责，英国的大臣们和大使们却纷纷各显神通，为日本的行为寻找合理的借口。这完全不同于它对待俄国的行为，让人感到十分奇怪。1933年4月，一些英国工程师在俄国受审，他们的罪名是在俄从事间谍活动。他们大多被无罪开释，仅有两人被判了有期徒刑，但是监禁时间并不长。英国虽然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但英国政府立即禁止俄国商品进入英国。俄国也禁止进口英国商品，以此报复英国的行为。注

在中国新疆地区，商队常常经由拉达克的列城（Leh），从新疆的莎车县和喀什葛尔前往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新疆人大多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中国少数民族。他们长得跟中国人一样，沿袭中华文化，甚至也用汉名，但是他们远离中原地区，戈壁滩切断了新疆与中国腹地的联系。通讯方式也十分原始。因此，他们与中国内地之间的纽带并非那么牢不可破，而土耳其民族主义时不时地在新疆挑起分裂运动。自世界大战以来，这片辽阔的土地就成了各种国际阴谋的交锋场所。英国、俄国、日本都在密切监视彼此和中国政府的行动，并支持当地的敌对首领们。

1933年初，新疆发生了一次东突叛乱，叛军攻陷了莎车县和喀什葛尔，并宣布成立“共和国”。英国指责是俄国促成了这次叛乱，但是俄国又反过来指控英国，认为是英国为了在中国和俄国之间建立一个类似于“满洲国”的缓冲地带，才暗地里煽动了这次叛乱，甚至连参与组织新疆叛乱的英国军官的名字都提到了。

注意——这次新疆叛乱遭到了中国政府支持者的镇压，显然苏联当局给予了一些非官方的帮助。结果苏联在中亚地区的声望不断上升，而英国的声望开始下降。

---

1. 后来，英国和俄国签署了协议，结束了两国之间的贸易战。

179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现在让我们回到苏联时代的俄国，重新将中断的故事串接起来。我们已经来到了1924年1月，这个时候俄国革命的领袖和精神导师列宁已经过世了。在我写给你的关于他国历史的信件中，你应该常常看到俄国的身影。不论我们是思考欧洲问题、印度边境问题、中东地区土耳其和波斯的问题，还是远东地区的中日问题，俄国总是无所不在，反复出现。你肯定已经注意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是很难，或者说不可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分割开来。近年来，国家之间的内在联系更加紧密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也愈加显著，而世界在许多方面正在变成一个整体。历史已经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人类历史已经变成一部世界历史了，如果我们一直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那么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哪怕只是一个国家的历史。

苏联疆域辽阔，横跨欧亚大陆，远离资本主义世界，但是它和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在不断地接触，也常常发生矛盾冲突。在之前的信件中，我曾经向你提到过苏联慷慨的东方政策，讲述了它向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提供过的帮助，也回顾了它与中国建立却在不久之后又突然破裂的亲密关系。我也讲到了发生在英国的“阿科斯突袭行动”以及“季诺维也夫之信事件”。虽然季诺维也夫之信最后被证实是伪造的，但依然影响到了英国的大选。现在我想带你到苏联的心脏地区看看；在这片土地上，一场奇特而有趣的社会试验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进展吧。

革命结束后的头四年，即1917年到1921年这四年间，苏维埃政权一直在与各种敌人做斗争，以保全革命的成果。在这段时间里，苏联国内硝烟四起，叛乱从未间断过，内战频频爆发，人民食不果腹，饿

殍遍地，局势动荡不安，让人惊恐不安。但是人民大众对变革充满了热情，他们英勇无畏地捍卫着理想，给这个黑暗时期带来了无限光明。虽然苏联人民没能够马上获得胜利的果实，但是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希望，信心十足地承受了极为可怕的苦难，甚至暂时忘却了饥饿。这就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

1921年，列宁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从此苏联国内尖锐的矛盾略微缓和了下来。这是共产主义的倒退，是与国内资产阶级妥协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改变了他们的目标，这只是意味着他们退后了一步，让国家能够得以休养生息，然后才能向前迈出几大步。因此，苏联安定下来了，开始面对这个巨大的问题，认真思考如何才能重建这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为了重建这个国家，他们需要机器和材料，比如火车机车、车厢、机动货车、拖拉机和工厂设备等。他们必须从国外购买这些机器和材料，但问题是他们缺乏资金。因此他们想要获得国外贷款，这样他们可能就会很方便地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来购买所需货品。只有两国建立起友好关系，才可能得到贷款，但是如果它们互不认可，贷款绝不可能。所以俄国非常想得到西方大国的认可，并与它们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但是这些帝国主义强国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切都十分厌恶。对它们来说，共产主义是必须割除的毒瘤。它们的确曾经发起战争，企图干预俄国革命，竭尽全力镇压共产主义，但是它们最终彻底失败了。它们原本根本不愿意与苏联进行任何交易，但是它们又很难忽略这个控制了地球总面积六分之一的政府。要让它们不理会这个准备购买大量昂贵机器的好主顾，这就更难了。苏联这类农业国家与德国、英国、美国这些工业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往来，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十分有利的，因为俄国需要机器，却能够提供便宜的食物以及原材料。

金钱的诱惑最终战胜了对共产主义的憎恨。几乎所有国家都承认了苏联，许多国家还与之签订了协议。美国是唯一一个不断拒绝承认苏联的国家。但是，美国和俄国之间仍然有贸易往来。㊟

苏联通过这种方式与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从这些国家之间的竞争中受益匪浅，比如1922年，战败国德国投向苏联，并与它签订了《拉帕洛条约》。但是，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妥协关系并不稳定，因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阵营在根本上就是水火不相容的。布尔什维克总是鼓励那些受压迫、受剥削的人，包括殖民国家的属民以及工厂里的工人，起来反抗他们的剥削者。苏联政府并未公开鼓励，但是共产国际大量开展了这些革命活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尤其是英国，总是不断地耍着各种阴谋手段，妄图推翻苏联的统治。因此，矛盾势必不断发生，冲突也从未停止，常常导致外交关系破裂，带来战争的恐怖阴云。你也许还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1927年的“阿科斯突袭行动”之后，英苏两国关系开始恶化。这个摩擦其实很好理解，因为英国是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苏联则代表了一种能够打击帝国主义根源的思想。但是，这些敌对国家之间还远不止这些问题，自沙俄时代起，俄国与英国之间就一直存在着历史遗留的种种仇恨和冲突。

现今，让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心生恐惧的并非苏联的军队，更多的是一种无形的但更加强大和危险的事物，比如苏维埃思想和共产主义宣传。为了展开对抗，帝国主义国家开始持续不断地进行反苏宣传，其内容大多都是虚假的，甚至还编造了匪夷所思的故事，大肆渲染和传播所谓的苏联恶行。英国政治家们常常使用他们在战时抨击对手的语言来侮辱苏联的领袖们。伯肯黑德勋爵常说苏联的政治家是“一群暗杀者”或是“一群肿胀的青蛙”。要知道，当时英苏两国应该不仅是处于发展和平关系的时期，还彼此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这种状况下，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明显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友好关系。它们之间的分歧是根本性的。战胜国与战败国还有可能会冰释前嫌，但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和平只是暂时的，双方只是暂时休战而已。

俄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经常为前者拒绝承认外国债务问题发生纠纷。现在这不是什么重大问题了，因为几乎所有的国家在这段艰难的时期内都在拖欠应该偿还的债务。但是，这个话题还是会时不时地被提起。布尔什维克党人夺取政权之后，他们立即宣布否认沙俄的外国债务。早在1905年那场不成功的革命发生之时，就已经宣布过这项政策了。苏联始终贯彻着这个政策，他们也放弃索取东方国家、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欠债。而且他们也并未提出参与战争赔款的瓜分。1922年，协约国政府就沙俄债务问题向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苏联政府在回复中提醒这些政府，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过去也拒绝承认债务和承担义务，并且还没收了外国人的财产。“新生的革命政府和体系不必遵守被推翻政府的义务。”苏联政府尤其提到了法国，提醒协约国集团回想这个协约国成员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做法。

> 法国国民公会宣布自己为合法的继任者。它在1792年12月12日宣布：“人民的主权不受暴政者所签订的条约的束缚。”根据这份宣言，法国革命政府不仅撕毁了前政权与外国签订的政治条约，也拒绝承认国家债务。

尽管苏联政府有正当的理由拒绝承认债务，但是它十分渴望与其他国家达成协议，因此它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打算与它们讨论债务问题。但是，它表明了立场，提出除非这些外国政府无条件承认苏联，它才会与它们进行磋商。实际上，苏联屡次向英、法、美三国做出还款保证，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急于和苏联达成协议。

为了应对英国提出的索赔要求，苏联也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反索赔要求。英国要求俄国偿还政府债务、战争债务、铁路债券以及商业投资，索赔金额总计大约为8.4亿英镑。而布尔什维克党人向英国提出了反索赔，要求英国对它在俄国内战时期所造成的破坏做出赔偿，这是因为英国和英国军队在那个时期给苏联的敌人提供了帮助。据估

算，全部战争损失总计为4 067 226 040英镑，而英国据说必须承担其中大约20亿英镑的损失赔偿，所以反索赔的金额几乎是索赔金额的2.5倍。

布尔什维克党人理直气壮地提出了反索赔要求。他们以著名的亚拉巴马号巡洋舰事件为例表明了立场。这艘巡洋舰是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时英国为美国南方各州建造的。内战爆发后，它驶离利物浦，在战争期间给美国北方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英美两国为此几乎走到了濒临战争的边缘。美利坚合众国宣称英国在美国内战期间无权把巡洋舰移交给南方邦联，因此他们向英国提出索赔，要求它赔偿这艘巡洋舰所造成的一切损失。这个事件经过仲裁之后，最终英国为此向美利坚合众国支付了3 229 166英镑的赔偿款。

英国更是积极地参与了俄国内战，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其提供一艘巡洋舰对美国北方所造成的破坏，而它却为后者付出了大笔赔偿。在外国势力干涉俄国事务的战争期间，根据苏联公布的官方数据，135万人在战争中丧生。

目前苏联旧债问题仅仅只是达成了部分决议，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没有实际意义了。我们发现，那些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一方面对俄国的做法大感震惊，而另一方面它们的所作所为几乎也没什么两样。的确，它们并没有否认它们的债务，或者去挑战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它们的做法就是拖欠债务，不予偿还。

苏联的对外政策就是几乎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和平，因为他们需要休养生息的时间，而且那时他们一心想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其他国家似乎不可能在近期内发生社会变革，所以“世界革命”的想法暂时消退了。俄国与东方国家积极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尽管这些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之前我曾告诉过你，苏联、土耳其、波斯和

阿富汗四国之间分别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它们都对帝国主义强国充满了恐惧和厌恶，这也就成了它们紧密团结的纽带。

1921年，列宁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目的是赢得中农对公有化进程的支持。但是，富农阶级（俄文中称为“kulak”，意为殷实农夫。俄文中“kviak”一词的意思是“拳头”）并未对新政表示出兴趣，因为他们算得上是小资产阶级了，仍然很排斥公有化进程。与此同时，列宁启动了一项宏大的计划，要让农村地区也实现电气化，因此许多大型电厂建立起来了。这个计划的目的是给农民的生活带来便利，为国家工业化进程做好准备。首先，它是为了让农民产生工业化的意识，从而拉近他们与城市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之间的距离。一盏盏电灯照亮了乡村的夜空，而且许多农场都开始使用电力来完成农活，这一切都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他们渐渐抛弃迷信思想，不再因循守旧，开始认真思考新的思想路线。城市和乡村之间，城镇居民和农民之间，常常有着尖锐的矛盾冲突。城市中的工人希望农村能够提供便宜的食物和原材料，却又希望工厂的产品能卖高价。另一方面，农民希望能够从城市买到便宜的工具和工厂产品，而自己生产的食物和原材料能卖个好价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四年之后，这个矛盾在俄国国内变得越发尖锐了。正是为了缓解这个矛盾，苏联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并允许农民在合理范围内进行私下交易。

列宁十分热衷于这项电气化计划，为此实施了一套著名的方案。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论断。甚至在列宁过世之后，电气化进程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批拖拉机出现在农场上，用以耕作或其他目的，这也深深地影响了农民的思想，并改造了传统的农作方式。这些拖拉机是美国福特公司（Ford Company of America）提供的。苏联政府还与福特公司签订了一个非常大的合同，允许福特公司在俄国境内修建一个年产量达10万辆的大型汽车制造厂，其中主要是拖拉机。

苏联政府鼓励生产并向海外销售原油和汽油，这就引发了它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冲突。在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以及格鲁吉亚（Georgia），有一片区域原油产量十分丰富。也许这是延伸到波斯、摩苏尔以及伊拉克的大片产油区的一部分。位于里海之滨的巴库是俄国南部的一座伟大的石油之城。苏联开始以低于那些大型石油公司定价的价格，向国外销售原油和汽油。美国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英波石油公司（Anglo-Persian）、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 Shell Co.）等大型石油公司实力雄厚，几乎控制着全球的汽油供应。苏联的低价销售行为给它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让它们极为恼火。它们开始与苏联展开石油竞争，说苏联的石油是“偷来的”，因为高加索地区的油井是苏维埃政权从资本主义旧主那里没收来的。但是，不久之后，它们与这“偷石油”的苏联达成了协议。

在这封信和其他很多信中，我总是不断地用到“苏维埃”（Soviet）或者“苏联”（Soviets）两个词。有时我还会说“俄国”（Russia）又做了什么事情。我并没有严格区别这些词的意思，在信中它们指的是同一个对象，我必须告诉你这个对象是什么。你当然知道，在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之后，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于1917年11月在彼得格勒宣告诞生了。沙俄帝国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国家。整个俄国横跨欧亚大陆，许多不同的民族归属它的统治。俄国总共有接近200个民族，而且民族之间差异很大。在沙皇统治时期，他们被当作属民，而他们的语言文化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压制。沙俄帝国几乎就没有改善过中亚落后民族的生活。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这个少数民族常常遭到最恶劣的对待，对它们的大屠杀行为也是臭名昭著。因此，在这些受压迫的民族中，有许多人加入了俄国的革命行动，尽管他们想要发动民族革命，而非社会革命。在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临时政府向这些民族做出了许多承诺，但是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兑现。然而，在大革命发生很久之前，从布尔什维克党建党初期开始，列宁就一直坚持要给予每个民族充分的自决权，甚至同意他们脱离俄国，实现民族独立。这是过去布尔什维克党行动纲领的一个方面。大革命发

生后，布尔什维克党，现在是这个国家的执政党，随即重申他们完全遵循这个自决权原则。

内战期间，沙俄帝国分崩离析，而苏维埃共和国在一段时间内仅仅只控制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周围的一小片区域。在西方势力的鼓动之下，波罗的海附近的几个民族，如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成了独立的国家。当然波兰也独立了。俄国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外国军队逐渐撤离，许多独立的苏维埃政权在西伯利亚和中亚建立了起来。这些政权都有共同的目标，从而自然而然地紧密团结起来了。1923年，他们联合起来，组建了苏联，其正式全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nion of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s），外界常常用“USSR”这个首字母缩略词来称呼它。

1923年以来，联盟共和国的数量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有个别共和国分裂成了两个国家。

现在苏联总共有7个联盟共和国成员：

（1）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ussian Socialist Federative Soviet Republic），简称RSFSR

（2）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White Russia SSR）

（3）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Ukrainian SSR）

（4）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2K（Trans-Caucasian Socialist Federative SR 2K）

（5）土库曼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Turkmenistan SSR）

（6）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Uzbek SSR）

（7）塔吉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Tadjikistan SSR）

蒙古也与苏联建立了一定的同盟关系。

由此看来，苏联是由几个共和国组成的联邦。一些加入苏联的共和国其本身也是一个联邦。因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是由12个自治共和国组成的联邦，而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则是由3个共和国组成的联邦，这三个共和国分别是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Azerbaijan SSR）、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Georgia SSR）以及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Armenia SSR）。这些共和国数量众多，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依存，而在它们境内还有许多“民族自治”区域。在苏联境内，自治现象十分普遍，其目的是为了让每个民族都能保持自己特有的文化和语言，并享有充分的自由。苏联政府竭尽所能去避免让一个民族或者种族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苏联对少数民族问题的解决方式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因为我们自己的国家也因为少数民族问题而面临诸多困难。苏联比我们国家更为困难，因为他们需要处理182个不同民族的问题。他们的解决方法非常奏效。他们完全彻底地认可每个民族的自由和权利，鼓励他们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来处理工作、发展教育。这并不只是为了去迎合少数民族的分离倾向，而是因为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只有使用本族语言，才能够让大众接受真正的教育，并促进文化的进步。到目前为止，这种解决措施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

尽管苏联表面上十分松散，并未实现一体化，但是，这些不同民族之间的联系远比沙俄帝国中央集权统治之时更为紧密。这是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理想，为了共同的事业在一起努力奋斗。从理论上说，每一个联盟共和国都有权随时脱离苏联，但是实际上它们不可能这么做，因为只有它们结成联盟，才能处于有利的地位，具备抵抗资本主义世界敌对势力的力量。

苏联最主要的共和国当然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它的疆域从列宁格勒一直向外延伸，跨越了整个西伯利亚。白俄罗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毗邻波兰。乌克兰南接黑海之滨，是俄国的粮仓。外高加索，顾名思义，就是横跨高加索山脉的地区，它位于里海和黑海之间。亚美尼亚是外高加索三大共和国中的一个，在这里，奥斯曼土耳其人曾经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了恐怖的种族大屠杀。而今它成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似乎已经摆脱了动荡不安的局面，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在里海的另一边，还有三个中亚共和国，它们分别是土库曼斯坦（Turkmenistan）、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以及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两大著名城市正是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塔吉克斯坦位于阿富汗的北面，是距离印度最近的苏维埃共和国。

我们对中亚的苏维埃共和国特别感兴趣，因为从古到今印度和中亚之间的联系都十分紧密。现在它们对我们更有吸引力了，因为它们在过去的几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沙皇统治时期，中亚贫困落后，迷信思想盛行，它们的人民几乎没有接受任何教育，而妇女们大多戴着厚厚的面纱，不以真面目示人。现在，中亚却在许多方面走到了印度的前面。

---

1. 美国在1933年承认了苏联，随即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180 ——苏联的五年计划

列宁在世期间一直是俄国无可争议的领袖，每个人都由衷地敬佩他所做出的所有决策。当纷争出现之时，他的话就是最终法则，能让共产党内不同派系握手言和。在他过世之后，党内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外界而言，托洛茨基是继列宁之后最有才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苏联国内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这么认为。正是托洛茨基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也是他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和困境，创建了苏联红军，取得了苏联内战的胜利，并粉碎了外国势力的武力干预。但是，托洛茨基最初并非布尔什维克党人，那些布尔什维克元老（列宁除外）既不喜欢他也不太信任他。其中一位元老级人物斯大林（Stalin）成了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因此他控制了这个在苏联居于主导地位的最强大的组织。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几乎水火不容，他们相互厌恶，他们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托洛茨基精于写作，善于演说，组织管理能力出色，行动力极强。他智力超群，才思敏捷，推动了革命理论的发展。托洛茨基善于使用尖刻的语言进行猛烈抨击，让他的对手无不感到如鞭抽蝎蜇般疼痛。然而，斯大林就要平常得多，他沉默寡言，在人群中并不起眼，远没有托洛茨基那么光彩夺目。但是，他同样组织能力突出，敢于斗争，意志力惊人。的确，斯大林逐渐成为人们口中的“铁人”。尽管人们钦佩托洛茨基的能力，但是斯大林能够激起人们的自信。他原是格鲁吉亚人，出身于平凡的农民家庭。一山不容二虎，在苏共党内，这两个鹤立鸡群的杰出人物是不可能和平共处的。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因为私人矛盾而相互争斗，但是其影响更为深远。这是因为，他们分别代表的是不同的政策方向，以及推动革命前

进的不同方法。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很多年以前，托洛茨基就已经提出了“不断革命”理论。按照他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它的地理位置有多么优越，都不可能独自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唯有发生一次世界革命，才能够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够有效地让农民阶级社会化。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下一个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正如我们在今天世界很多地区所看到的情况那样，资本主义在其国际化发展过程中衰落了下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彻底解决世界格局所面对的问题，发挥其最大的优势，因此社会主义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但是，如果某个国家试图要在本国境内（在国家范围内而非世界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那么这就意味着倒退回了更低一级的经济发展阶段。国际主义是推进一切进步，包括社会主义进步的必要基础，背离这个基础的倒退行为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因此，托洛茨基认为，任何一个孤立的国家都不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即使是苏联这样的大国也不可能。苏联在很多方面都不得不依赖于西欧的工业国家。这就好比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合作发展，西方的工业国家就是城市，而苏联主要还是以农业地区为多。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托洛茨基仍然认为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大环境下存续下来。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根本不可调和的。要么是资本主义国家彻底打垮社会主义国家，要么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社会革命，而社会主义随即就会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当然，它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还是会共同存在，尽管它们之间的平衡关系摇摇欲坠，随时都有崩塌的危险。

从很大程度上说，在“十月革命”前后，布尔什维克党内部所有的领袖似乎都持有这种观点。他们焦躁不安地等待着世界革命的发生，或者至少是某些欧洲国家发生革命。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欧洲的上空总是电闪雷鸣，但是革命的风暴化为了泡影。苏联从此就沉寂了下来，专心发展新经济政策，社会生活或多或少逐渐单调平凡起来。托洛茨基随即大声呐喊，提出了警告，指出社会主义革命

已经岌岌可危，除非苏联立刻采取更积极的政策来推动世界革命的发生。这是对苏联现行政策的严重挑战，从而引发了他与斯大林之间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苏共内部动荡不已。最终斯大林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主要还是因为他控制了苏共这架政党机器。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们被认定为革命的敌人，被驱逐出党，并遭到了残酷打压。而托洛茨基本人先是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随后又被迫流亡国外。

斯大林主张实施一项积极的农业政策，以争取农民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支持。这个提议立即引爆了他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斯大林完全不顾外部环境，要尝试在苏联一国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而托洛茨基拒绝了斯大林的提议，继续坚持“不断革命”理论。他指出，如果革命不能持续不断地进行，农民阶级是绝不可能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实际上，斯大林采用了托洛茨基提出的许多建议，但是他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而非托洛茨基的方式来进行具体操作的。就此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 但是，能够决定政治的要素不仅仅是事件本身，还包括决定的方式以及拥有决策权的人。

从此这两位巨人掀起的狂风暴雨停歇了下来，托洛茨基被赶下了这个曾经让他大放异彩的政治舞台。他只好离开苏联，尽管他曾经是这个伟大国度的主要建设者之一。几乎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对这位精力充沛的人物心怀恐惧，因此它们都拒绝让他入境。英国不允许他进入，而绝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最后，他来到土耳其，住在一个距离伊斯坦布尔不远的小岛上，这个名为普林基波岛（Prinkipo）的小岛就成了他的临时避难所。从此他笔耕不辍，完成了一部恢宏的俄国革命史书。他对斯大林的憎恨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他，从此他继续在书中用尖刻辛辣的语言批评和攻击着这位老对手。

一个正式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在世界的一些地区成立了，这个政党将矛头直接对准了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宣扬的共产主义。

在清除了托洛茨基之后，斯大林以非凡的勇气全身心地投入到农业新政的推行中去了。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异常困难的局面：知识分子们找不到工作，终日忧心忡忡，就连工人阶级也已经发动了数次罢工。他对富农阶级课以重税，并将这笔税收全部用于在农村地区兴建集体农庄，在这些农庄中，大批农民在一起进行劳作，并共享劳动成果。富农们非常厌恶这项政策，心中充满了对苏联政府的愤懑。他们害怕自己将不得不与贫苦的邻居们共用自家的牲口和农场生产资料。出于恐惧，他们竟然宰杀了自己的牲畜。这种牲畜屠杀行动规模极大，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苏联国内突然严重缺乏粮食、肉类和奶制品。

斯大林遭到了突如其来的打击，但是他仍然冷酷地坚持着自己的既定计划。的确，这项计划是斯大林提出的，它覆盖了苏联农业和工业的方方面面，规模空前浩大。斯大林大力建设巨型国有农场样本以及集体农庄，以此让农民向工业靠拢。不仅如此，他还大力兴建大型工厂、水力发电厂、煤矿等，加快实现苏联全国的工业化。与此同时，他还推行了一系列其他活动，关系到教育、科技、合作买卖、修建工人住房以及提高生活标准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五年计划”，苏联人将之称为“Piatiletka”。这个计划规模空前，就算是让一个国力强盛的发达国家来具体实施它，也很难取得成功，更何况当时苏联发展落后，国库空虚，它的尝试似乎是极其愚蠢的行为了。

这个五年计划是经过非常谨慎的思考和调查之后才得以制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调研了整个国家的情况，无数的专家参与了讨论，就如何协调整个计划的问题提出了建议。真正的困难就是这个协调问题。如果原材料缺乏，那么大型工厂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就算原材料

充足，它们还得被运送到工厂中去，那么运输问题就必须得到解决。为了解决运输问题，就必须修建铁路，这就需要大量的煤炭，因此煤矿就必须运营起来。工厂本身也需要能源来维持运转，因此就必须在大江大河上修建水坝，从中获得水力能源用以发电，而这些电力随后必须通过电缆输送到工厂和农场，并为城市和农村提供照明。可是，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工程师、机械师和技术工人来实现，而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大量训练有素的工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无数动力拖拉机可以源源不断地被运送到农场中，但是又有多少人会操作呢？

以上是我列举的少许例子，目的是让你了解这个五年计划究竟给苏联带来了多么复杂的问题。一个错误也许就会造成影响极为深远的后果。在行动链条上，只要出现一个疲软或者落后的环节，那么这一系列的行动就会延迟或者停顿。但是，比起资本主义国家来，苏联有一大优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所有的行动都取决于个人的主动性以及机遇，而且竞争还造成精力的浪费。不同生产商或者不同行业的工人们并没有相互配合，除非买卖双方进入同一个市场，恰巧促成了他们之间的协作。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缺乏宏观的计划。私有企业也许会依照自己所关心的方面来规划将来的行动，但是大多数企业都在计划如何才能超过或者击败其他竞争对手。从国家层面上来看，这就走向了计划的相对面。它意味着物资过剩和物资匮乏的情况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存。苏联政府的优势在于它控制住了苏联境内所有不同的行业和活动，因此它才能够制定并实施一套统一计划，协调每个行动，让它们各司其职。这就不会产生任何浪费，除非在计划中出现了计算错误或者运行错误。就算出现了错误，在政府的统一调控下，这些错误也能以最快的速度得以修正。

这项计划的目标是为苏联的工业化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个想法并不只是建起一些能够生产出人民大众需要之产品（如布匹等）的工厂而已。如果只是这样，那可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苏联只需要像印度那样从国外买进机器，然后整修使用就可以了。这种生产消费品的产业

被称为“轻工业”。但是，这些轻工业产业必须依赖于“重工业”，如钢铁以及机械制造产业，这些重工业产业才能为轻工业产业提供必需的机械设备以及发动机等等。苏联政府高瞻远瞩，决定在这个五年计划中集中力量发展这些基础重工业。这样苏联的工业化才能具有坚实的基础，那么在此之后轻工业的发展就不再困难了。这些重工业的发展还能减少苏联对国外进口机器或者战争物资的依赖。

在当时的情况下，优先发展重工业似乎是最为明显不过的选择了，但是这也意味着苏联人民将会付出更大的努力，也将会付出巨大的牺牲。比起发展轻工业来说，重工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再者，两种工业之间最为核心的差别在于，重工业的发展在短期内看不到任何成效。一家纺织工厂开始生产布匹，而这些布料在出厂之后就能马上卖给人民使用，而生产消费品的其他轻工业产业也是这么快速地显现成效的。然而，就算一家钢铁厂可能生产出了大量铁轨和机头，但是这些产品不能马上派上用场，除非政府正在修建一条铁路。重工业的发展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它凸显成效之前，政府投入的资金就像是石沉大海，而整个国家也会为此陷入更加贫苦的境地。

因此，对苏联而言，快速建设重工业意味着它将做出伟大的牺牲。它必须为这些建设工程以及进口的机械买单，而且还必须用黄金和现金支付。那么它是如何做到的呢？苏联人民为此节衣缩食，甚至放弃了生活所必需的物品，好让政府筹措资金支付海外的账务。苏联政府大量出口粮食，以粮食换取机器。只要海外市场有需要，他们就会全部出售，包括小麦、黑麦、大麦、玉米、蔬菜、水果、鸡蛋、黄油、肉类、禽类、蜂蜜、鱼类、鱼子酱、砂糖、油类以及甜食等等。这些食品全部出售后苏联人民就一无所有了。他们没有黄油可吃，就是因为黄油拿去换成了机器，还有许多其他物品都是这样用于了交换。

这个倾全国之力的五年计划在1929年正式开始。革命精神再一次震惊了海外，崇高理想的召唤激励了大众，让他们倾尽所有，献身于这场新的斗争中。这场斗争并非是为了打败某个外来敌人或者内部敌人，而是为了彻底改变苏联落后的现状，扫除资本主义残余，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们几乎完全是靠着这满腔的热忱，才能义无反顾地做出更大的牺牲，过起了十分清苦的生活。美好的未来似乎正在向他们招手，为此他们牺牲了现在的安逸生活，骄傲而荣耀地建设着苏联灿烂的明天。

过去，每个国家都会集中力量完成一项重大任务，但是这仅仅是战时的做法。在世界大战期间，德国、英国和法国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赢得战争的胜利，其他任何事情都必须服从于这个最高目标。苏联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倾全国之力以和平方式搞建设而非去毁灭的国家，它将竭尽全力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走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使自己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但是苏联物资匮乏，尤其是富农和中农阶层生活贫困，因此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常常到了看似濒临崩溃的边缘，甚至也许还会导致苏联政府的垮台。苏联政府需要极大的勇气才能坚定不移地实施这项计划。许多地位显赫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认为，这项农业计划给苏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给苏联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困境，因此有必要放松一下。但是斯大林可不这样认为。他一声不吭，十分严厉地继续实施着这项计划。他从不空谈，从不进行公共演讲。他似乎成了钢铁意志的化身，命中注定就必须要带领苏联人民达成目标。他的勇气和决心感染了苏联共产党内的每一个成员以及整个苏联工人阶级。

苏联政府持续不断地积极宣传五年计划，让人民保持建设的热情，激励他们焕发新的活力。苏联人民对大型水电工程、水坝、桥梁、工厂以及集体农庄的建设都极感兴趣。工程成了最流行的职业，各种报纸通篇报道各种伟大工程的技术细节。沙漠和草原渐渐人满为患，每一个大型工厂周围都会兴建新的大城镇。苏联各处都修建起了

新的公路、运河、铁路（绝大多数都是电气化铁路），航空运输业也得到了发展。苏联还建起了化工产业、军工产业和工具产业，开始生产拖拉机、汽车、大功率机车、汽车发动机、涡轮机以及飞机等。苏联大部分地区实现了通电，普通人家也用上了收音机。失业问题完全消失，因为苏联各处大搞建设，彻底消化了所有的人力资源。的确，还有许多有能力的工程师来到苏联并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值得铭记的是，在苏联如火如荼发展之际，西欧和美国都笼罩在经济危机的萧条氛围之中，失业人数激增，数据大得惊人。

五年计划的实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整个过程中，各种麻烦不断，各方缺乏协调，计划也常常被搅乱，浪费现象时有发生。但是，尽管如此，五年计划发展的速度在不断提高，苏联国内总是要求更多工作。不久之后，一则“四年完成五年计划”的口号在苏联国内流传开来，就好像完成这个非凡的计划五年绰绰有余了似的！这项计划在1932年12月31日正式结束，正好是第四年年末。随即，在1933年1月1日又启动了新的五年计划。

关于五年计划的争议颇多。一些人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而其他人又说这是一场失败。我们很容易指出它的失败之处，因为它在许多方面都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时至今日，苏联在诸多方面都发展失衡，它最缺的是训练有素的专业工人。苏联境内工厂林立，但是工程师的数量屈指可数，餐馆数量众多，但是合格的厨师少之又少！这种失衡现象无疑在短时间内是不会消失的，也不会缓解。有一件事是再清楚不过的，那就是这个五年计划改变了苏联的面貌。它从一个封建国家一跃成了发达的工业强国。文化进步也十分显著。社会服务、医疗体系和意外保险体系都是世界上包容性最强、最为发达的。尽管物资匮乏，人民生活水平不高，但是那些笼罩在其他国家工人头顶的失业和饥饿带来的恐惧已经荡然无存。苏联人民对于经济保障有了新的认识。

关于五年计划成败问题的争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能从苏联的现状上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这项计划如此匪夷所思，超出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想象，这也是它的成功之处。现在“计划”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理念，而五年、十年或者三年计划也让世人不再陌生。苏联给词汇带来了多么神奇的魔力啊。

181 ——苏联的困境、失败与成功

苏联的五年计划是一项十分庞大的任务。实际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同时发生了许多大变革，其中农业和工业的变革尤其引人注目。在农业变革中，旧式的小农经济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机械化的集体农业生产。而工业变革帮助苏联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但是这个计划最有趣的一个特征还在于其蕴含的精神，这是一种政治生活和工业生产方面的新精神。这是一种科学精神，是一种采用臆想出来的科学方法建设社会的尝试。在此之前，任何国家都没有做出过这样的尝试，包括那些最为发达的国家。正是他们将科学方法应用到了人类和社会事务中，这才使苏联的计划如此与众不同，令人瞩目。从此以后，世界各国都开始大谈计划，但是其他国家都很难有效地实施计划，因为它们的社会体制，如资本主义制度，都是基于竞争以及对既得权利的保护基础之上的。

但是，我曾经告诉过你，这个五年计划带来了巨大的苦难，苏联经济面临着各种困境，社会陷入混乱之中，人民生活颠沛流离。苏联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绝大多数苏联人是甘愿付出这个代价的，他们梦想着美好的未来，在几年的光阴里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苦难，乐于做出任何牺牲。但是，也有一些人并不情愿，他们被迫屈从于苏联政府的强制性措施。在此期间，富农的损失最为惨重。这些占有更多的财富、具有特殊影响力的富农阶级并不适应新的方案。他们是资本主义分子，想方设法阻止社会主义集体农庄的发展。他们常常反对集体化进程，有时他们也加入集体农户，但目的是为了从内部削弱它，或者为了从中牟取私利。苏联政府对他们实施了严厉的镇压。苏联政府也十分苛刻地对待许多中产阶级人士，它怀疑这类人群在帮

助苏联的敌人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正因如此，许多工程师受到惩罚，锒铛入狱。然而，建设中的许多大型项目严重缺乏工程师，因此政府的行为损害了五年计划的实施。

苏联各处几乎都出现了发展失衡的情况。

由于交通体系发展滞后，因此工厂生产的工业品以及土地上出产的农产品只得排队等着交通工具前来运输，这就打乱了其他工作的节奏。苏联严重缺乏有能力的专家和工程师，这才是困扰苏联的最大障碍。

在五年计划实施的这段时间内，世界，或者说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贸易萧条。贸易额减少，工厂倒闭，失业率上升。食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大幅下跌，全球的农业遭受了极其沉重的打击。但是，苏联人民不愁就业，积极参与建设，国内到处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而在世界其他国家中，人民失去工作，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到处死气沉沉，从而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反差。似乎苏联因为其经济基础不同于其他国家，而未受到全球大萧条的影响。但是实际上，苏联难以独善其身。在不知不觉中，大萧条的影响也间接地蔓延到了苏联，苏联的困境也相应加剧了。我曾经告诉过你，苏联一直都在向国外购买机器，它用于支付费用的钱来自出口农产品所获得的资金。由于全球市场食品等产品价格下跌，苏联的出口收入也随之减少。但是它必须要筹集足够的黄金，用以支付买进机器的费用，因此它就必须出口更多的食品。就是这样，全球贸易萧条以及价格下跌让苏联损失惨重，严重干扰了苏联众多计划的实施。而且这也造成苏联国内许多生活必需品的进一步短缺，苏联人民的生活变得越发艰难了。

尽管食物越来越紧缺，但是苏联人口总数出现了大幅增长。人口增长的速度完全与农业生产的进度不成比例，这也成了苏联面临的一大难题。在俄国革命之前，在苏联现有土地上，人口总数为1.3亿。让

我们看看，在随后十几年时间里，尽管内战消耗了大量人力，但是人口增长情况仍然十分惊人。

1917年人口总数为1.3亿

1926年1.49亿

1929年1.54亿

1930年1.58亿

1933年（春季人口统计数据）1.65亿

从此可以看出，在15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苏联人口增加了3500万，增长率为26%，这可是十分惊人的增长速度了。

苏联各地人口都增加了，尤其是城市，人口增长更为显著。老牌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而新兴工业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甚至连沙漠和草原上都兴建起了聚居区。按照五年计划，许多大型企业需要建设，因此急需大量劳动力，于是大批农民深受吸引，纷纷离开乡村，涌入城市。1917年，苏联境内总共有24座城市，每座城市平均人口总数略超过10万。1926年，城市总数增加到31个，而到了1931年，城市总数增加到50多个。15年间，苏联建成了100多个工业城镇。从1913年到1932年间，莫斯科的人口总量翻番，从160万猛增到了320万。列宁格勒的人口总量增加了100万，几乎逼近了300万大关。在外高加索的巴库，当地人口总数同样翻了一番，从33.4万激增到66万。1913年，苏联的城镇总人口为2000万，到了1932年，这个数值飙升到了3500万。

一个农民来到城市之后，成了一名工人，他不再像以前在农村时那样生产粮食了。成为工人后，他也许生产了许多工业品或工具，但是就食物而言，他现在只是一名消费者而已。农民大量逃离田园，这

就意味着原是粮食生产者的人纷纷转变为了食物的消耗者，这就加剧了苏联的食品供给问题。

还有一个原因。苏联工业发展迅速，工厂对原材料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织布厂需要大量的棉花。因此，农民开始大量种植棉花和其他原材料，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幅缩减。这就造成食品供应的进一步短缺。

苏联人口大幅增加，就其本身而言，这可谓是繁荣的明显标志。苏联并不像美国那样，是依靠外来移民来增加人口总量的。这表明，尽管当时苏联人民物资匮乏，生活困苦，但是总的说来苏联并没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在那个时期，苏联政府严格执行配给制，尽可能向每一个人发放绝对必需的食用品。目光敏锐的观察者告诉我们，苏联人口之所以会如此快速地增长，其主要原因应该归结为苏联人民普遍具有经济安全感。儿童对家庭不再是负担，因为国家做好了一切准备，能为孩子们提供食物和教育。另一个原因是卫生状况得到了改善，医疗设施日臻完善，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从27%降到了12%。以莫斯科为例，1913年，当地每千名婴儿中就会有23名以上的婴儿夭折；到了1931年，每千名婴儿中夭折的婴儿不到13名。

1931年，苏联部分地区出现了干旱，苏联食品短缺所造成的困难局势进一步恶化。1931年至1932年，远东地区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中，苏联害怕日本会联手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其发动攻击，因此开始大量囤积粮食和其他食品，以备必要时军队所需。正如俄罗斯古谚语所说的那样：“恐惧有双大眼睛。”这句话千真万确，小到幼儿，大到社区甚至国家，在面对危险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放大危险，并为此深感不安！因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永远不可能真正地和平共处，帝国主义国家一心只想要镇压共产主义，为此它们使尽了各种阴谋手段，玩遍了各种伎俩，所以布尔什维克党人从未放松过他们紧绷的神经，一旦敌人做出丝毫的挑衅举动，他们就会立刻睁大双眼，紧张万分。通常

他们都有充分的理由感到焦虑不安，甚至在苏联境内，他们都不得不去应对各种层出不穷的针对苏联工厂或其他大型项目的破坏和毁灭行动。

对苏联来说，1932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苏联政府采取了最为激烈的措施来应对破坏和偷窃公共财产行为，许多集体农庄都曾经发生过此类事件。苏联通常没有死刑，但是死刑被引入到了反革命案件的判决中。苏联政府颁布法令，认定偷窃公共财产就是反革命行为，因此符合死刑使用的标准。斯大林曾说过：

> 如果资本主义者宣称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从而才在他们的时代中加强了资本主义秩序的话，那么我们共产主义者更要昭告天下，宣称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此加强这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

苏联政府也采取了措施，通过其他方式来舒解压力。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政府允许集体农庄和私人农庄在城镇市场里直接售卖剩余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人联想到1921年战时共产主义结束之后的新经济政策，但是现在的苏联和那个时候完全不同了。它找到了一条正确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它实现了工业化，而它的农业生产基本实现了集体化。

在1929年到1933年之间，苏联一共组建了20万家集体农场，除此之外还有大约5000家国有农场。这些国有农场应该是其他农场的模板，有一些国有农场规模极为巨大。在这段时间内，农场引进了12万多辆拖拉机辅助农业生产，将近三分之二的农民加入了集体户。

除此之外，合作社组织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起来。1928年，有2650万人加入了消费者合作社。1932年，这个数值增长到7500万

人。消费者合作社控制了许多连锁零售店和批发商店，这些商店遍布苏联全境，甚至在苏联最边远的角落也出现了这些店铺的身影。

1933年1月1日，苏联正式开始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它的指导方针是大力发展轻工业，快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苏联政府希望能够通过实施这个计划，让人民享受到发展的益处，让他们在经历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带来的压力和物资匮乏之后，能够获得更加舒适和良好的生活条件。对于苏联来说，海外不再是购买大多数机器的必要途径了，因为苏联的重工业已经能够供应这些设备了。苏联不再需要向海外出口大量的食品来支付所购商品的费用了，这就让它卸下了沉重的负担。

1933年，斯大林在集体农庄农民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 对我们来说，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要让所有参与集体户的农民过上较为富足的生活。对的，同志们，过上好日子……有时，有人会说：都社会主义了，为什么我们还得工作呢？以前我们也劳作，现在仍然如此。现在是否可以放弃工作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是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要求人人都能真诚地工作，不是为别人，不是为有钱人，不是为剥削者，而是为自己和社会认真工作。

劳动会继续存在，它必须存在；和计划经济实验的初期试验相比，也许将来的工作会变得更加令人感到轻松和愉悦。的确，在苏联有这么一条格言：“不劳动者不得食。”但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为劳动增加了一条新的动机：“为改善社会而劳动。”在过去，理想主义者和独行者常常受到这条动机的驱使，自愿加入到社会劳动之中，但是在此之前，并未有任何一个社会完全接受过这个动机并做出回应。资本主义的根基是竞争和个人利润，通常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在苏联，追求利润的动机让位于社会动机。一位美国作家曾写道，苏联工

人正在意识到“只有相互依存，才能消除恐惧，免受欲望的影响”。对贫苦和不安全的深深恐惧沉重地压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心头，消除这种恐惧感就是一种巨大的成就。据说，人民心情放松之后，苏联的精神病问题几乎荡然无存了。

因此，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苏联各地都迎来了几乎各个方面的发展，尽管它的发展举步维艰，比例失调，但是城市数量大增，工业化得以实现，大型集体农庄和合作社不断涌现，贸易快速增长，人口数量在提高，文化、科技、学术水平也得到了提升。最为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内，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直到位于中亚的帕米尔高原（Pamir）和兴都库什山脉，在这片广袤的苏联大地上安居乐业的不同民族正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构成了统一的整体。

我很想继续写写苏联在教育、科技和文化方面的成就，但是我必须忍住，不能在继续写下去了。我就告诉你一些你可能会感兴趣的奇怪事实吧。即使是最为挑剔的专家也不得不承认，苏联的教育体系是目前全球最好最新的。文盲几乎完全消失了，最令人惊讶的进步发生在位于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之类的落后地区。

1913年，苏联版图上的中亚地区共有学校126所，学生人数6200名。1932年，学校数量猛增到6975所，学生总数飙升到70万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都是女孩。当地已经实施了全国义务教育体制。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进步。你应该记得，在不久前，这片土地上的女孩与世隔绝，她们不能出现在公共场合中。据说，拉丁字母表的使用推动了教育的飞速进步，因为使用不同的当地字母表会造成基础教育的混乱，而统一使用拉丁字母表就会使教育工作更容易开展。你应该记得我曾经讲到凯末尔帕夏推行拉丁文或字母表，替代了传统的阿拉伯文或字母表。他正是借鉴了苏联的文字改革经验，因为各国可以改变拉丁字母表，以适应本国语言发展的需要。1924年，外高加索地区各共和国纷纷废弃了阿拉伯文，开始大力推广拉丁文。这

种方式有效地扫除了文盲问题，苏联境内绝大多数民族都采用了拉丁文，如华人、蒙古人、突厥人、鞑靼人、布里亚特人（Buriats）、巴什基尔人（Bashkirs）、塔吉克人（Tajiks）等。他们仍然使用当地语言，只不过书写方式发生了改变。

你会有兴趣知道，三分之二以上的苏联在校学生都可以享受到热腾腾的午餐。当然，午餐是免费供应的，而且学费也是全免的，因为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国家必须如此。

随着教育的进步，人民受教育的程度提高了，阅读能力也增强了，因此苏联各种出版物的数量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这些书籍大多内容严肃，意义重大，绝非是其他国家喜闻乐见的通俗小说。苏联工人对工程和电力十分感兴趣，他们愿意阅读这类书籍，而非故事书。但是，儿童读物都是十分生动有趣的，甚至还包括童话故事，尽管我认为正统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是反对阅读童话故事的。

不论是在纯科学领域还是在各种科技应用领域，苏联都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各种科学分支以及实验站都已经大力发展成了许多大型的研究机构。在列宁格勒有一家规模庞大的植物产业研究所，其拥有的麦子品种就多达2.8万种。这家研究所一直在试验通过飞机播种稻谷的方法。

沙皇和沙俄贵族们的众多宫殿现在已经成了供苏联人民参观和使用的博物馆、休养别墅和疗养院。在列宁格勒附近有一座小城，过去称作“沙皇村”（Tsarkoe Selo），因为在这里坐落着两座沙俄帝国时期的宫殿，而沙皇们常常到此避暑度夏。现在，沙皇村已经更名为“儿童村”（Detskoe Selo）了，我猜想这些古老的宫殿现已成为少年儿童的活动场所了。现今少年儿童是苏联最受优待的群体，尽管其他人也许会缺衣少食，他们却能享用一切最好的东西。苏联这一代人辛苦搞建设的目的正是为了他们，因为他们将会是科学社会主义国家的继承者（如果到他们长大成人之时，科学社会主义的苏联已经建成

了的话）。在莫斯科有一所伟大的“母亲和儿童保护中央机构”（ Central Institute for the Protection of Mother and Child）。

苏联妇女也许比其他国家的妇女享有更多的自由，不仅如此，她们还受到国家的特殊保护。她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很多妇女都当上了工程师。世界上首位女性大使是很有资历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柯伦泰夫人（Madame Kollontai）。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Krupskaya）是苏联教育部分支机构的负责人。

苏联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令人感到眼花缭乱，精彩纷呈，其中尤以西伯利亚干草原和中亚落后的山谷地带为最。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人类社会不断发生着各种变化和进步，这两大地区却完全与世隔绝，不受任何影响，然而现在它们正在以飞一般的速度迎头赶上。为了让你基本了解它们究竟发生了多么迅速的变化，我就来讲一讲塔吉克斯坦的情况，这个共和国也许是苏联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了。

塔吉克斯坦位于奥克苏斯河（River of Oxus）以北帕米尔高原的山谷地带，东临中国突厥斯坦（新疆）、南界阿富汗(Afganistan)。在过去，沙皇的封臣布哈拉酋长一直统治着这个国家。1920年，布哈拉发生了地方革命，当地人民推翻酋长的统治，成立了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Bokhara People’s Soviet Republic）。不久之后，内战爆发，就在这个无比混乱的局势下，恩维尔帕夏死于非命，他曾是土耳其的一名深得人心的领袖。布哈拉共和国改名为乌兹别克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Uzbek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并加入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1925年，在乌兹别克境内，一个塔吉克自治共和国（Tadjik Republic）成立了。

1929年，塔吉克斯坦成了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共和国，并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七大成员国之一。塔吉克斯坦赢得了民族尊严，但是这个国家面积很小，发展落后，人口总数不足100万，交通

状况极为落后，通往外界的唯一道路就是骆驼走出来的小道。在新政权的领导下，这个国家迅速采取各种措施，改善道路状况，发展灌溉农业，促进工业进步，提高教育水平和医疗服务水平。大量机动车道得以修建，棉花种植发展迅速，成果显著，这些都归功于灌溉设施的改善。1931年中期，60%以上的棉花种植农场都实现了集体化，大片稻谷种植区域也加入了集体农庄的组织化管理。一家发电厂得以组建，还有8家棉纺厂和3家榨油厂也发展起来了。塔吉克斯坦还修建了一条铁路，这条铁路穿过了乌兹别克斯坦，连接到了苏联的铁路系统中。除此之外，它还与主要航线建立了联系，发展起了航空支线服务。

1929年，塔吉克斯坦仅有一家诊疗所。1932年，塔吉克斯坦拥有了61家医院和37家牙科诊所，病床总数为2125张，医生人数达到20名注。教育的进步可以用以下数据来评判：

1925年仅有6所现代学校

1926年末113所学校，2300名学生

1929年500所学校

1931年2000多所教育机构，学生人数超过12万

当然，当地政府也大幅度地增加了教育投入。1929年到1930年，教育预算为800万卢布（1卢布的票面价值大约相当于2先令，但是实际价值会有波动）；1930至1931年，这笔预算猛增到2800万卢布。除了普通学校之外，政府还开设了幼儿园、培训学校、图书馆和阅读室。当时，人们极度渴望获得知识。

在这种局势之下，已经很难继续要求妇女用面纱遮面、与世隔绝了，因此这种习俗很快就消失了。

听上去这一切都太不可思议了。这些信息和数据是来自一位可信的美国观察家的报告，他曾在1932年初来到塔吉克斯坦进行了实地考察。也许在此之后，塔吉克斯坦还发生了许多其他变化。

似乎苏联向这个年轻的塔吉克共和国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帮助它发展教育和其他领域，因为苏联制定了相关政策，全力支持落后地区赶上其他地区的发展步伐。但是，这个国家矿产资源十分丰富，早已发现了金矿、原油和煤矿，甚至还认定黄金储量应该是极其巨大的。很久以前，直到成吉思汗统治时期，这些金矿都一直在开采，但很显然，从那以后就没再继续开采。

1931年，塔吉克斯坦境内爆发了反革命叛乱。当年，许多有钱的地主阶级纷纷逃离塔吉克斯坦，进入了阿富汗，现在他们组织起军队，开始入侵塔吉克斯坦。由于没有农民的支持，这场叛乱很快就失败了。

这封信的确篇幅有点长，内容也很繁杂。但是我必须继续讲述苏联在国际范围内的活动。你已经知道，苏联签署了《凯洛格公约》，这份公约的目的是要让战争非法化。1929年，苏联还与邻国签订了《李维诺夫公约》。为了稳定和平的局面，苏联继续与许多其他国家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日本是唯一拒绝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邻国。1932年11月，苏联和法国最终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是世界政治的一件大事，因为苏联从此被纳入了西欧政治事务的轨道。

在很长时期内，中国一直与苏联暗斗不断，两国之间并未建立外交关系，但是现在，面对日本在满洲里对其施加的强大压力，它转而重新接受了苏联政府。苏联与日本一直都进行着正常的外交接触，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糟糕。在亚洲大陆上，对于一直企图扩张势力的日本，苏联正是一个强大的扼制力量，而两国也会经常发生边

境冲突。日本政府经常挑衅苏联，战争传言不断出现，但是苏联甚至宁愿忍受日本的侮辱，也不想被拖入战争之中。

英俄摩擦一直都是国家政治事务中永恒不变的特点。1933年4月，英国工程师在莫斯科受审，从而引发了两国之间的报复与反报复行动，但是这场风暴来得急去得也快，它们很快又重新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是英国保守党政府十分厌恶苏联，因此两国关系通常都是很紧张的。美国对苏联的态度越来越友好，罗斯福总统（President Roosevelt）正在与苏联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美苏利益在世界任何角落都极少发生冲突。

但是，纳粹政府在德国崛起后，苏联就不得不面对这个穷凶极恶的新敌人。尽管目前纳粹德国对苏联还不能造成直接伤害，但是它在将来一定会是一大祸害。在欧洲，纳粹势力正在日益膨胀。

苏联在国际上一直表现出十分满足现状的姿态，它尽力避免一切麻烦，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和平局面。过去，苏联执行的是革命政策，力图在其他国家挑起革命，但是现在与过去截然相反了。目前苏联的国家政策是要在一国之内建设社会主义，并要避免外界的一切复杂局面。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势必要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达成妥协。但是苏联经济继续保持其最为本质的社会主义基础，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成功，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最强有力的支持了。

这就是苏联在1933年7月所坚持的立场。那时，世界经济大会（World Economic Conference）在伦敦召开，苏联借此机会与其他邻国，如阿富汗、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斯、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以及立陶宛，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日本还是一如既往地选择了断然拒绝。

---

1. 原文如此。这里医生的数量可能有误。——译者注

182 ——科学向前发展

在这封信之前，我长篇累牍地描述了政治事件，简明扼要地提到战后全球发生的经济变化。在这封信中，我想要写写其他方面的问题，尤其是科学以及科学带来的影响。

但是在我谈到科学之前，我想再次提醒你，让你意识到世界大战之后妇女地位发生的非常巨大的变化。在19世纪，大型工业诞生了，它们开始雇用女性，那些走向社会的女性开始奋力挣脱法律、社会以及习俗上的枷锁，所谓的“妇女解放运动”从此揭开了序幕。这场运动进展极慢，随后在战争局势之下，它的进程迅速加快，战争结束后几乎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今天，甚至是塔吉克斯坦都有了女医生、女教师和女工程师了。在上一封信中，我讲到过这个国家，就在不久前，这个国家的女性还是完全与世隔绝的。你们这一代人也许会认为女性理所当然能有这样的地位。但是，在当时，不仅是在亚洲，在欧洲也一样，女性解放还是一个新奇的事情。1840年，距现在不到100年，首届“世界反奴隶制大会”在伦敦召开。美国的妇女作为代表前来参加了会议。美国仍然存在黑人奴隶制，这让许多人感到非常愤怒。但是，大会拒绝这些“女性代表”参会，理由是女性参与公共集会的行为不合时宜，是对性别的贬损！

现在让我们回到科学这个话题上。我告诉过你，苏联将科学精神应用于社会事务之中，以此来推进本国五年计划的实施。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尽管科学精神只是发挥了部分作用，但它的确支撑了西方文明在过去约150年内的发展。随着科学影响力的不断提高，那些无理性、神奇以及迷信的思想遭到完全摒弃，人们对一切非科学方法和程序都坚决反对。这并非意味着科学精神已经彻底战胜了非理性、神奇

以及迷信思想，事实上它还远未成功。但毋庸置疑的是，科学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科学的发展在19世纪已经取得了许多巨大成就。

之前我已经提到过，科技在工业和人类生活方面的应用给19世纪的世界带来了惊人的变化。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欧和北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变化远远超过了之前数千年内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单是19世纪欧洲出现的人口剧增现象，就足以让人惊叹不已了。1800年，欧洲总人口数为1.8亿。欧洲人口数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缓慢地增长着，而到了1914年，欧洲人口数量竟然达到了4.6亿。在这段时间内还有无数的欧洲人移民到了其他大陆，尤其是美洲，我们估计移民人口总数可能在4000万左右。因此，在100多年的时间内，欧洲的人口总量就从1.8亿飙升到了大约5亿。在欧洲工业国家，人口的增长尤为显著。英国在18世纪之初仅有500万人，它还是西欧地区最贫困的国家，随后它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人口数量上升到4000万。

人口增长，财富增加，这都得益于人们能更好地控制或者更深地理解大自然，然而没有科学知识，一切皆为枉然。知识的增长十分显著，但是不要以为这必然意味着人类智慧的提高。在还未清楚认识到生活目标究竟是什么之前，人类就开始控制并开发大自然的力量了。一辆功能强大的汽车用处很大，也是人人想要拥有的东西，但是使用者必须知道汽车的工作原理。如果操作者没能很好地把握住方向盘，汽车就可能会跌下悬崖，万劫不复。英国科学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of Science）主席最近提出：“在人类知道如何控制自己之前，就已经获得了控制大自然的能力。”

大多数人心安理得地使用着无数科学的产物，如铁路、飞机、电力、无线电等，但他们从未思考过这些先进事物的由来。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是我们的正当权利一样。我们为自己处于这个进步的时代而感到无比自豪，顺带也自我感觉自己也是很“先进”的。毫无疑问，我们所处的时代与之前的时代是截然不同的，我

认为，说它远比以前发达也是极为正确的。但是，这可不是说我们这代人或者群体更加先进。如果说因为一名火车司机可以开动发动机，而柏拉图或苏格拉底做不到，就能得出前者比后者更先进或更高级的结论，这无疑是荒谬绝伦的。但是，如果说发动机驱动的火车是比柏拉图的马车更为先进的交通方式，这种提法就非常正确了。

今天我们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但是我恐怕得说绝大多数思想都十分愚蠢肤浅。很久以前，人们阅读量很少，但是他们所读的书都是十分精辟的，而且他们深刻地理解了书本想要传达的精神。斯宾诺莎（Spinoza）是一位伟大的欧洲哲学家，生活在17世纪时的阿姆斯特丹，学识渊博、饱含智慧。据说，他的图书馆藏书还不到60卷。

因此，我们有必要认识到，世界上的知识虽然大幅度增加了，我们却不一定能变得更好或者更明智。我们必须知道如何正确地运用知识，才能够从中获益。在驾着我们的好车绝尘而去之前，我们必须清楚自己将要前进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自己的生活目的或目标有清楚的认识。今天，许多人都没有这种概念，也从不对此感到忧虑。他们处在科学的时代，但是支配他们的行动和生活的思想依然老旧不堪。很自然，困难和矛盾必然会出现。一只聪明的猴子也许能学会开车，但它绝不会是一名可靠的司机。

现代科学错综复杂，影响极为深远。成千上万的研究者都在不断地努力工作，在各自的研究场所做着各种科学实验，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进行深入钻研，一点点地为知识的殿堂添砖加瓦。知识的领域浩如烟海，每一位研究者都只能了解自己研究的领域。通常他对其他领域的知识并不了解，因此，尽管他通晓某些科学分支的知识，但是他对很多其他知识一无所知。他很难全面而睿智地看待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人。当然，也有一些人已经超越了狭隘的领域，他们不仅是自己研究领域的专家，还能以广阔的视角来看待整个世界。这些人并未遭遇战争险阻，也未受到人类麻烦的困扰，

他们专心致志地投身于科学研究，并在过去的15年左右的时间里为知识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现今最伟大的科学家应该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是犹太裔德国人，后来却被希特勒纳粹政府驱赶出了德国，因为这个政府厌恶犹太人。

爱因斯坦通过十分复杂的数学运算，发现了影响宇宙的全新的基本物理定律，从而改变了牛顿提出的一些定律，而这些定律在过去的200年里从未遭到过世人的质疑。爱因斯坦的理论通过最为有趣的方式，得到了确认。根据他的理论，光会表现出一种特性，在日食发生时可以验证这个理论预测。当日食发生时，人们发现光线的确会表现出这种特性，因此按照数学推理得出的结论，便在真实的实验中得到了证实。

我不会向你解释这套理论，因为它实在太深奥了。它被科学界称作相对论。在研究宇宙的过程中，爱因斯坦发现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观点是不恰当的。因此他摒弃了这些旧观点，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时间和空间必须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时空”的概念。

爱因斯坦研究了宇宙问题。同时，科学家们也研究了无穷小的问题。让我们用针尖为例吧，人类的裸眼只能看到这么小的东西了。科学方法证明，针尖在某个方面就像是宇宙本身。在它的内部，无数分子挤得水泄不通。每个分子都是由许多原子构成，这些原子不停地绕来绕去，却又互不接触。而每个原子又是由大量带电微粒或电荷构成的，或者说是质子和电子，它们也在不停地飞速运动着。还有更小的正电子、中子和介子。据估计，正电子的平均寿命非常短，仅为一秒的十亿分之一！这些无穷小的物质就像那些在空间里面不停转动的各种星体。要知道就算用最先进的显微镜都很难看到分子的存在。至于原子、质子以及电子，去想象它们的存在都很困难。可是，凭借如此先进的科学手段，科学家们收集到了关于质子和电子的大量信息，最近科学家成功分裂了原子。

一想到这些最新的科学理论就会让人晕头转向，让人很难去欣赏、领会它们。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些更加精彩绝伦的事情吧。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的地球看似很大，但是它仅仅是围绕着太阳转动的一颗小行星，本身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整个太阳系也不过是浩瀚宇宙中的沧海一粟而已。宇宙漫无边际，要从宇宙某处来到地球，那需要跨越数千或者数百万光年的距离。因此，夜空中的星星并非是它们本身，那只是我们正好能够看到了它在漫长的行程中留下的光线痕迹，它们也许经过了数百或者数千光年的长途跋涉才被我们看到。对于人们对时空的认知来说，这是相当令人困惑的，因此爱因斯坦的时空理论更有助于人们思考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抛开空间，仅仅考虑时间，过去和现在就会完全混淆了。虽然星星是我们现在看见的，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星星的过去。我们必须认识到，也许在它发射出光线之后，它就已经不存在了。

之前我就说过，太阳是一颗无足轻重的小恒星。还有大约10万颗类似于太阳的恒星，它们一起构成了人们所说的银河系。我们在夜晚看到的绝大多数星星都是银河系中的成员。但是我们只能通过裸眼看到极少数的星星。强大的天文望远镜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更多的星星。据天文学家估算，宇宙是由大约10万个如银河系一般大小的星系组成的！

还有另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有人说，宇宙是不断膨胀的。数学家詹姆斯·金斯爵士（Sir James Jeans）将宇宙比作一个不断膨胀的肥皂泡，而宇宙就是肥皂泡的表面。这个泡泡状的宇宙非常巨大，如果要从它的一头到另一头，则必须要穿越无数光年的距离才能走完这段漫长的旅程。

如果你还能保持冷静，没有被那么多令人惊叹的发现搅浑大脑，那么我再告诉你一些关于这个精彩绝伦的宇宙的奥妙吧。著名的英国剑桥天文学家亚瑟·艾丁顿爵士（Sir Arthur Eddington）告诉我

们，我们的宇宙正在分裂，就像是一座快要停顿的时钟，除非有什么办法重新将它上紧发条，否则宇宙必将会彻底崩溃。当然这是数百万年之后的事情了，我们现在不必担心这个问题。

物理和化学是19世纪的领先科学领域。它们能帮助人类支配自然或者外部世界。在此之后，科学家们开始研究人体的内部结构，认真了解人类的情况。生物学也变得重要起来，它是一门研究人类、动物以及植物的生命科学。生物学已经取得了非凡的进步。生物学家表示，不久之后，通过注射或者用其他方式就可能改变个体的性格或者气质。因此，懦夫也有可能被改变成勇者，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政府可以用这种方式降低批评者和反对者的抵抗力，从而解决他们给政府造成的麻烦。

在生物学之后，哲学也得到了发展，这门学科主要解释与人类思想、动机、恐惧和欲望相关的问题。从此科学跨进了新的领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自己，从而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掌控自身。优生学也是生物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任务是改善种族素质。

对某些动物的研究是如何促进科学发展的呢？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可怜的青蛙被大卸八块，就是为了找出神经和肌肉的工作模式。小苍蝇们常常叮在熟透了的香蕉上，因此得名为香蕉苍蝇，正是这种毫不起眼的小生物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遗传问题。通过对这种小苍蝇的细致观察，科学家发现了生物特征是如何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的。在一定程度上，这有助于科学家了解遗传是如何在人类身上发生的。蝗虫是另一种让我们获益良多的看似更为荒唐的动物。美国观察者们对蝗虫进行了长期而细致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显示了人类和动物性别确定的方式。现在我们已经充分了解了卵子在其生命的开始阶段究竟是如何变成雄性或者雌性的，并逐渐成长为小小的雄性或雌性动物，或者是男宝宝或者是女宝宝的。

第四个例子是关于普通家犬的。当代著名的俄国科学家巴普洛夫（Pavlov）仔细观察了犬类的活动，他尤为注意的是，它们面对食物时，什么时候会分泌唾液呢？他确实测量了狗嘴中的唾液。狗一看到食物就分泌唾液，这是一种自发性行为，又称为“非条件反射”。就像是一个婴儿天生就会打喷嚏、打呵欠或者伸懒腰一样。

随后巴普洛夫尝试要让犬类形成条件反射。在喂食前，他都会先发出一种特别的信号，让狗学会听到信号就期待食物。这项实验的结果是，在狗的意识中，这个信号就与食物产生了关联，就算它没有得到食物吃，这个信号也能产生食物所能带来的相同效果（狗照样会流口水）。

犬类唾液实验奠定了人类心理学的基础。这些实验显示，人类在婴儿时期就具有许多非条件反射，随着婴儿一天一天长大，他就会具备越来越多的条件反射。事实上，我们所学的一切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就是这样，我们才养成了习惯，学习了语言等等。我们的行为受到条件反射的控制，当然既有令人愉快的条件反射，也有令人难受的条件反射。比如我们都有恐惧条件反射。假如我们发现身边窜出一条蛇，甚至只是出现一根像蛇一样的绳子时，就算对巴普洛夫的实验一无所知，我们也会以无比迅捷的速度逃走。

巴普洛夫的实验给心理学这门学科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有些实验真的很有意思，但是我不能再过多地讲述这个话题了。不过，我必须要补充说明，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几个重要的心理学探究方法。

在这里我举了这几个例子，就是想要让你对科学工作的方法有一定了解。形而上学的老办法是用玄妙空幻又无从捉摸的话来描述解释那些很难甚至不可能完全分析和理解的大问题。人们非常热烈地争论这些问题，但是由于缺乏印证真理或者论理的科学测试方法，所以这些问题就一直悬而未决。他们总是忙于争论抽象世界的问题，哪有时间屈尊俯就来观察人类世界的普通事务。科学方法与之截然相反。科

学家们会细致地观察那些看似琐碎的小事，而恰恰就是这些微不足道的事实才让人们获得了重要的研究结果。随后这些研究结果构架了科学理论，而这些科学理论又会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和实验来反复检测其合理性。

这并非意味着科学就不会错。科学也常常犯错，科学也经常按原路返回，重来一次。但是，科学方法似乎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今天的科学已经完全褪去了在19世纪大为盛行的傲慢态度和自负表现。它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深感自豪，但是它也是无比谦逊的，因为它明白，知识的海洋是那么浩瀚无边，未知的领域仍有待进一步探索。智者总是认为自己所学甚少，而傻瓜才会臆想自己无所不知。科学也是一样。科学越是发达，越不会鲁莽、武断，对于任何问题，它的回答都会更加谨慎和踟蹰。艾丁顿说：“科学的进步不是以我们能回答多少问题而是我们能问出多少问题来衡量的。”这也许是非常正确的吧，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问题有了答案，也让人类了解了生命，因此，只要我们能够利用好它，就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为有价值的人生目标而奋斗。它照亮了生命的黑暗角落，让我们能够直面现实，而不是纠结在含混不清的非理性之中。

183 ——科学是把双刃剑

在上一封信中通过我的讲述，你已经窥见了科技最新发展所带来的绝妙景象。我也不知道，这种短暂的感受是否引起了你的兴趣，是否成功地将你引入科学思想与成就领域中去了。但是要记住，人类思想的发展永不停歇，它总是在不断地解决并试图彻底领会自然和宇宙的各种深奥问题。今天我所告诉你的一切也许在明天就成了不完善甚至彻底过时的知识。对我来说，人类思想的挑战行为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人类思想插上了翅膀，翱翔到宇宙的边缘，试图要解开宇宙的秘密，敢于抓住并衡量无穷大以及无穷小的物质，这一切都让我非常着迷。这就是“纯”科学，它对人类生活没有直接或者立竿见影的影响。显而易见，相对论、时空理论或者宇宙的大小这类问题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直接关系。大多数此类理论都有赖于高等数学，而这些极为复杂的数学高等领域就是所谓的纯科学。大多数人都对纯理论毫无兴趣，他们自然会被科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所吸引。在过去的150年里给人类生活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正是这种应用科学。的确，今天的生活完全受到了科学之产物的影响和控制。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它们我们该如何生存下来。人们常常谈起美好的过去，回忆那早已一去不复返的黄金时代。有些历史时期的确让人心驰神往，甚至在某些方面它们的确远远胜过我们所处的时代。但是，也许更多的是因为它们早已远去，在人们脑海里留下朦胧的美好意象，才让人们如此向往。我们往往会因为某个时代出现了某些标志性的历史伟人，就认为那个时代也是极不平凡的。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普通人的命运还是很悲惨的。科学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从沉重的历史负担中解放了出来。

四处看看，你就会发现，你目光所及的大多数事物或多或少都与科学有关。

应用科学为我们创造出了出行以及联络的办法，而食物的生产与运输通常也有赖于应用科学的帮助。如果不是应用科学所带来的改变，就不会有报纸或者书本供我们阅读，而写字用的纸张和笔也不会存在。卫生状况的改善、人类的健康以及对疾病的控制，都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没有应用科学，现代社会的人们将会寸步难行。最具决定性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全世界的人就不能得到足够的食物，一半以上的人将会死于饥饿。之前我就告诉过你，世界人口总量在过去的100年里大幅度增加了。如果没有科学的帮助，就不能生产出足够多的食物，也无法将食物进行远距离运输，那么如此庞大的人口就不可能生存下来。

随着科学的发展，大型机器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从此之后，人们便开始锲而不舍地提升这些机器的性能。每年甚至每月，人们都会对机器进行无数次细微的改进，进一步提升了它们的工作效率并减少了对人力的依赖。在20世纪的前30年里，技术的改进和科技的进步呈现出迅猛的势头。近年来，这种变化尤其迅猛，当然变化从未停止过，它给工业和生产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就像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一样。生产用电量不断增加，成了这场新的革命的主要根源。因此，在20世纪，一场伟大的电气革命登上了历史舞台，尤其是对美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为人类创造了全新的生活条件。18世纪的工业革命让世界步入了机械时代，而电气革命现在则带领人类社会进入了能源时代。电力在工业生产、铁路运输以及许多其他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素有远见的列宁会决定在全苏联范围内兴建大量水电站的原因。

电力在工业中的应用以及其他进步常常带来巨大的变化，却只耗费低廉的成本。因此，只需要稍微重新调整一下电动机器的配置，就能让生产率翻倍。这主要是因为工厂逐步淘汰了行动缓慢又容易出错的工人。因此，随着各种机器性能的不断改进，工厂雇用的工人数量也在逐步减少。现在，一个操作员只需动动操作杆、按按开关就可以完全控制大型机器了。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工业品的生产率，同时还让许多工人成了过剩的生产力。不仅如此，由于技术的进步非常迅速，因此工厂中新机器刚安装投产就已经有些过时了，这是因为这些机器又有了新的改良。

当然，机器取代人力的过程在使用机器的早期就已经发生了。我想我曾经告诉过你，在那个时期内，不断有冲突暴乱发生，愤怒的工人砸毁了新机器，试图破坏生产。但是，有人发现，机器的使用最终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工人在机器的帮助下能够生产出数量远超过去的产品，所以他的工资增加了，而产品的价格反而下降了。于是工人和普通百姓就能够购买更多产品。他们的生活标准提高了，对工业品的需求也增加了。所带来的结果是，更多的工厂建立起来了，随即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即使在每个工厂中，机器的确取代了人工，但是，由于新建工厂不断增加，受雇用的工人数量实际上大大增加了。

这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尽管工业国家对远方落后国家市场的盘剥对这个过程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过去的数年间，这个过程似乎已经停止了。也许在当前的资本主义体制下，不可能再出现进一步的扩张了，而这个体系也有必要进行一些改变。现代工业一味追求“大规模生产”，但是只有在大众能够消化这些批量生产的商品时，“大规模生产”才能够进行下去。如果大众一贫如洗，或者失去工作，那么他们是不可能买得起这些商品的。

不管怎样，技术仍然在不断地进步，其结果是机器取代了人力，失业情况进一步加剧。自1929年以来，全球贸易遭遇了寒冰，但是即便如此，也未能困住技术前进的步伐。据说，自1929年以来，技术进步在美国尤为显著。虽然在1929年生产仍然保持了上升势头，但是无数工人还是失去了工作，工人几乎没有重新就业的可能。

这就是造成全球尤其是发达工业国家严重失业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因为新式机器提高了生产率，这就意味着，也理应意味着国家财富的增加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现实情况完全颠倒了。真正的结果是人民生活贫苦，遭受的痛苦和磨难越来越多。人们原以为用科学来解决问题并非难事。也许是不难，但是当人们试图采用科学理性的办法解决问题时，真正的困难就浮出了水面。因为，这么做的后果是许多既得利益团体受到了影响，而他们却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控制政府，保护自身利益。而且技术进步导致的失业从本质上来讲是全球性的问题，然而现今国家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它们完全不能团结起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苏联采用科学方法处理了类似的问题，但是由于它孤立无援，资本主义势力将其团团围住，虎视眈眈，蠢蠢欲动，因此它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困难险阻，本来它是不必如此辛苦的。现今的世界从本质上来说是超越国界的，尽管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严重滞后，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也极为盛行。

由于社会主义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并最终发展成为国际性社会主义。时间是不会倒退的，今天的国际格局，尽管还不完善，其发展进程却也不会因为国家的孤立主义而受到压制。加强民族主义趋势的企图，如纳粹分子在某些国家中的做法，最后必定会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它与今天世界经济的根本国际性特征是背道而驰的。当然，也许在它失败的同时，它会拉着世界陪葬，并将现代文明拖入一场灾难之中。

这场可怕的灾难绝不是遥不可及或者难以置信的。我们已经看到，科学的进步为我们带来了层出不穷的好处，但是它也极大地增加了战争的恐怖程度。国家与政府常常忽略许多科学领域的发展，不论它们是纯理论的还是应用类的。但是，它们从来不会忘记科学还可以为军事战争所用的一面，因此它们都在充分利用最新科学技术来武装自己的军队，加强本国的军事实力。说到底，大多数国家都建基于武力之上，而科学技术让它们变得更加强大了，于是它们才能不顾后果地对人民施以暴政。在过去，比如在伟大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全国人民会团结一致，奋起反抗专制政府的暴政，他们在城市道路上设置路障，与政府军队展开巷战，但是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就算是全副武装的群众也是不可能与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政府军抗衡的，更不要说手无寸铁的情况了。政府军队可能会掉转枪口反抗政府，俄国革命时期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若非如此，政府军是无法靠武力战胜的。因此，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民就有必要采取其他方式，通过和平的群众运动来达到目的。

因此，科学让国家沦入了集团统治或者寡头政治的境地，个人自由遭到破坏，而曾经照亮了19世纪的民主思想也化为了泡影。在不同的国家里，这些寡头执政集团粉墨登场，有时它们在表面上颂扬民主原则，但又常常公开反对民主原则。不同国家的寡头集团冲突不断，于是它们控制下的国家常常被卷入战争。在现今或者将来，如此大型的战争也许不仅能毁灭这些寡头集团，还会拉着世界文明一起下地狱。或者，就像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设想的那样，国际性社会主义秩序也许会在战争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

战争的后果无比恐怖，让人不堪细想。正因为如此，这一可怕的现实才会用无数的花言巧语、激扬士气的战歌以及鲜亮挺括的军装来掩饰自己丑陋的嘴脸。但是我们有必要了解今天的战争到底意味着什么。上一场战争，即世界大战，让人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恐怖。然而据说，比起下一场战争，这一场战争简直算不了什么。如果在过

去的数年内，如果工业技术进步了十倍的话，那么军事科学必定提高了上百倍。战争不再是步兵冲锋和骑兵扫荡这么简单了，传统战争中的步兵和骑兵现在就像弓箭那样，已经毫无用处了。在今天的战争中，机械化坦克（就像靠履带在地面上快速移动的战车）、飞机和炮弹唱起了主角，尤其是飞机和炮弹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今天的飞机，无论是速度还是性能，都在与日俱增。

战争一旦爆发，交战国就有可能立即遭到敌方飞机的袭击。在宣战声明发布之后，这些飞机就会立马出击，它们甚至可能早已飞抵敌国上空，以抢占先机，向敌国的大城市和重要工厂投掷大量烈性炸弹。来袭的部分飞机也许会被击落，但是剩余的空中力量已经足够炸毁一座城市了。飞机投掷的炸弹中还会冒出毒气，而这些毒气会迅速蔓延并且笼罩整个区域，使这个区域内的所有生灵都窒息而死。这是一种惨绝人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会造成大批平民痛苦地死去，带来无法忍受的痛苦和精神折磨。毒气袭击事件也许会在两个交战国的大城市同时发生。如果欧洲爆发战争，也许只用短短几天或者几周时间，伦敦、巴黎以及柏林就会沦为一堆冒着青烟的残垣断壁。

更糟糕的是，飞机扔下的炸弹中可能含有各种恐怖的传染病细菌，这些细菌可能会在整座城市里快速地蔓延开来。这种“细菌战”还会以其他形式展开：污染水源以及食物，或者放出携带病菌的动物，例如携带瘟疫病毒的老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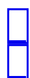
这一切真是骇人听闻，让人难以置信。就连恶魔都不会干出这种事来。但是，在人们殊死搏斗、惊恐万分之时，他们就会做出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任何一个国家都害怕敌对国会抢先采用这种不公的可怕手段，因此都想要抢占先机。因为这种武器实在太过恐怖，抢先使用的国家就会在战争中取得极大的优势。“恐惧有双大眼睛！”

的确，毒气在上一次战争中已经开始广泛使用了。众所周知，目前所有的强国都开办了工厂，大力生产这种毒气，以备战争之需。有

趣的结果便是，在下一次大战中，虽然各国军队在前线阵地可能会深挖战壕，修筑工事，严阵以待，但是真正的战斗不会发生在那里，而是会转向后方，危及平民百姓所居住的城市与家园。甚至战时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前线，因为部队有严密的保护，能躲过空袭、毒气以及传染病的伤害！但是，后方的人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就没有这样的保护。

这一切后果会是什么呢？全盘毁灭？又或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努力构建的文化与文明的良好格局将会完全崩溃？

没人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们不可能掀开未来的神秘面纱。我们看到，两种相互竞争、相互矛盾的进程正在当今的世界上演。其一是合作和理性的进步，以及文明格局的建立；其二则是毁灭的过程，毁灭一切，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倾向。这两个过程发展得越来越快，它们都用科学武器和策略将自己武装起来。到底谁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第八卷
新的战争风云

184 ——大萧条和世界危机

人们越深入思考科学给予人类的巨大力量以及人类对这些力量的具体使用，人们就会愈加疑惑不解。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目前所面临的困境的确让人很惊诧。随着科学的发展，收音机出现了，我们的声音可以传播到遥远的地方，而无线电话的出现则让我们可以和地球另一端的人相互交谈，很快我们就能够在电视上看到他们的影像了。科学手段无比高超，它能够大量地制造出人类所需的一切，让世界永远摆脱贫困这一古老的诅咒。从人类历史的最早期开始，人类就一直在尝试从日夜辛苦的劳作中寻找安慰。现实生活中，辛苦劳作并未带来什么回报，他们感到喘不过气来；他们梦想找到黄金国度，在这片富庶的土地上，到处流淌着洁白的牛奶和金黄色的蜜糖，物产丰富，各种物品应有尽有。他们一边幻想着早已逝去的黄金时代，一边展望着未来的人间天堂，在那里，他们最终将会得到安宁和快乐。随后科学到来了，它赋予了人们创造丰富物产的方法，但是，正当人类社会物资丰富之时，绝大多数人仍然穷困潦倒，苦不堪言。这难道不是惊人的自相矛盾吗？

科学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的馈赠，却让现今的人类社会陷入了困境。科学和社会是不可调和的，资本主义社会、最新科学技术以及生产方式之间是相互矛盾的。人类社会学会了如何生产，但不知道该如何分配产品。

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让我们重新把目光转向欧洲和美国。我之前就说过，这两个地区在大战结束后的头十年内遭遇了各种麻烦和困境。战败国，如德国和中欧小国，在战后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它们的国内状况十分糟糕，货币体系崩溃了，中产阶级也破产了。欧洲的战

胜国和债权国情况也不甚乐观。它们都欠下了美国大笔的债务，同时还身负巨额战争国债，这两大债务压得它们喘不过气来，国家已经难以为继。它们把希望寄托在德国身上，指望德国的战争赔款至少可以用来偿还外国债务。这种希望并不切合实际，因为德国连起码的债务偿还能力都没有。但是，美国愿意借款给德国，这就解决了当前的问题，德国就可以向英法等国偿还战争赔款了，而英法等国又可以将这笔款项用于偿还美国的外债。

在这十年间，美国是唯一一个经济繁荣的国家。美国似乎肥得流油，钱多得花都花不完，因此这种极其繁荣昌盛的表象让许多人都深深地沉溺于证券和股票的投机活动中，希望能够一夜暴富。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大众普遍认为这场经济危机将会像以前数次经济衰退一样很快过去，而世界经济局势将会逐渐平稳下来，过渡到下一个繁荣期。的确如此，在资本主义存续过程中，繁荣和危机似乎总是在不断地交替出现。很久以前就有人指出，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无计划的，也缺乏科学性。工业的繁荣促使经济快速发展，由此每一个人都想尽可能生产出更多可以利用的产品。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生产过剩，也就是说，制造出的产品多于市场需求。商品积压日益严重，危机便出现了，工业发展再次缓慢下来。在经济停滞期间，堆积成山的商品被慢慢处理掉了，随后工业再次焕发出生机，下一个繁荣期很快就到来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周而复始的循环，大多数人都在期待，经济的繁荣景象总有一天会恢复的。

但是，在1929年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当时的形势进一步恶化了。美国不再借款给德国和南美诸国，因此借款和债务偿还再也不能通过纸面协定来进行了。显然，美国的资本家们不会永无休止地借钱，因为这只会增加债权人的债务，让他们不可能收回这些债务。他们之所以会一直提供借款，仅仅是因为他们手头资金过多，已经不知道该用这些钱做什么了。闲钱过剩还带来了另一种后果：这些

人将大笔资金投入证券交易的投机活动中去。美国社会掀起了一股豪赌的热潮，每个人都梦想着能够一夜暴富。

美国中断了对德国的借款，立即引发了一场危机，数家德国银行相继宣告破产。通过战争赔款来偿还美国债务的循环逐渐停顿了。南美洲许多政府和其他小国开始拖欠债款。美国总统胡佛（Hoover）惊恐地发现，信用体系正在崩溃，因此他在1931年7月宣布给予债务国一年的延缓偿付期。这就意味着，所有政府间的债务和赔偿支付可以暂停一年，以减轻所有债务国的压力。

与此同时，美国在1929年10月发生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大事件。人们将全部家当都投入证券交易所，大肆豪赌和投机，将股票价格推到顶峰，又突然一下暴跌到谷底。纽约金融界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危机，从那一天开始，美国的繁荣期就结束了。美国也陷入了经济衰退的困境。贸易和工业的衰退现在已经演变成了席卷全球的大萧条。不要以为是证券交易所的豪赌或者纽约的金融危机造成了美国的衰落或者萧条。这仅仅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真正的原因要深层得多。

全球贸易开始萎缩，产品价格，尤其是农产品价格，急速暴跌。据说几乎所有的产品都生产过剩了，这实际上意味着人们没有钱来购买生产出来的产品。这就是消费压制的情况。由于产品卖不出去，就慢慢积压下来，而生产厂家自然而然就只能倒闭关门。它们不可能一直生产那些卖不掉的产品。这就导致欧洲、美国以及其他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失业潮。所有工业国家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那些向全球市场输送食品或者工业原材料的农业国家也没能幸免。

因此，印度工业也遭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农产品价格下跌给农业阶层造成了更大的苦难。通常食品价格下跌应该会让大众享受到巨大的福利，因为他们可以用便宜的价格购买食品。但是这可是一个混乱的资本主义世界，这个福利最终变成了一场灾难。农民必须用现金向

地主支付地租或者向政府缴纳税赋，因此他们必须卖出农产品才能筹集到资金。农产品价格跌到了谷底，因此他们有时根本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就算是他们卖出了自己生产的所有产品，也都无济于事。最终他们会失去土地，被赶出破旧的小泥屋，甚至连他们仅剩的一点家用物品都会被拍卖，所得费用用来偿还租金。就是这样，即使食品价格非常便宜，这些生产食品的人却饥寒交迫，流离失所。

正是因为世界各国是相互依存的，因此这场贸易大萧条才波及了全球各地。

我想，也许只有像中国西藏这种与世隔绝的地方才会免受其难吧。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场贸易萧条逐渐扩散开来，贸易也衰落了。大萧条就好比慢慢侵蚀身体的瘫痪病症，让整个社会结构完全陷入了瘫痪状态。了解经济衰退的最好办法，也许就是分析国际联盟公布的全球贸易实际数据。以下数据以一百万金本位的美元为单位，对每年第一季度的贸易情况做了准确的记录：

年份（第一季度）	进口值（百万美元）	出口值（百万美元）	进出口总值（百万美元）
1929 年	7972	7317	15289
1930 年	7364	6520	13884
1931 年	5154	4531	9685
1932 年	3434	3027	6461
1933 年	2829	2552	5381

这些数据反映了全球贸易逐渐衰落的趋势，在1933年的第一季度，进出口总额仅仅相当于四年前的35%，或者大约相当于它的三分之一。

这些贸易方面的抽象数据，究竟要告诉我们哪些与人类相关的问题呢？这些数据告诉我们，广大的平民百姓生活在贫苦之中，没有钱

来购买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数据还告诉我们，无数工人失去了工作，虽然他们竭尽所能、费尽周折，也无法重新就业。仅欧洲和美国这两大地区就有3000万名失业工人，其中英国的失业工人总数高达300万，而美国则有1300万名失业工人。究竟印度或者亚洲其他国家有多少失业工人，这就无人可知了。也许仅印度一国的失业人数就远远超过了欧洲和美国失业人口的总和。想一想全球广大失业工人以及靠他们过活的家庭，你就会大致了解这场贸易萧条究竟给人类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在许多欧洲国家里，国家保险体系为那些登记在册的失业工人提供了维持生计的失业津贴。在美国，失业工人可以领到慈善机构分发的救济品。但是这些津贴和救济涉及的面非常有限，许多人甚至分文未得，只能忍饥挨饿。在中欧和东欧部分地区，状况也非常糟糕。

在所有发达工业国家中，美国是最后一个遭受贸易萧条打击的国家，但是这场萧条在美国引发了远超其他任何地区的激烈反应。美国人民完全无法适应这种旷日持久的贸易萧条和经济危机。以拥有惊人财富而自傲的美国，面对这次打击完全乱了阵脚；失业人数在以成百万的速度大幅增加，在美国随处可见忍受着漫长饥饿折磨的人，美利坚民族的精神开始垮塌了。美国人民对银行和投资的信心动摇了，他们从银行中取出存款，开始囤积现金。银行赖以生存的基础正是信心和信用，如果信心消失了，银行也会随之消亡。在美国，成千上万的银行纷纷倒闭，每一次银行倒闭都进一步加深了这场经济危机，事态变得愈加恶化了。

大批失去工作的男男女女四处游荡，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希望能够重新找到工作。他们沿着公路步行，向过路的汽车司机询问可否搭车，他们也常常吊住慢速运货列车的脚踏板，跟着货车到达下一个目的地。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许多少年，甚至包括孩子，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要么独自游荡，要么结成小队四处流浪。与此同时，无数成年壮劳力终日闲坐，无所事事，等待着工作机会的降临，

大批模范工厂也关门倒闭了。但是，在这个非常时期，黑暗肮脏的血汗工厂蜂拥而上，将资本主义的罪恶本质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了。这些工厂雇用那些12岁到16岁的童工，这些孩子每天必须工作10到12个小时，工资收入却少得可怜。一些雇用者利用失业问题对这些少年造成的巨大压力，迫使他们在磨坊和工厂中闷头苦干。从此，这场大萧条让美国的童工问题又死灰复燃了，那些严令禁止使用童工以及禁止其他虐待行为的劳动法遭到了公然的漠视。

要知道，无论是美国还是世界其他地区，粮食或者制成品都非常充足。引起抱怨的问题是生产过剩，物资过多。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亨利·斯特拉科施爵士（Sir Henry Strakosch）在1931年7月（贸易大萧条发生的第二年）指出，全球市场有充足的物资，在两年三个月的时间内，足以维持世界人民早就习以为常的生活标准。他认为，在这段时间内，各国政府完全没有作为。然而，在这段时间内，世界人民物资匮乏，忍饥挨饿，其严重程度在现代工业世界中可谓前所未有。在人民缺衣少食的同时，世界各国都发生了大量销毁食品的行为。庄稼无人收割，直接烂在地里，果实挂在树枝上无人采摘，许多物品遭到彻底销毁。我给你举个例子：从1931年6月到1933年2月，巴西全境销毁了1400多万包咖啡。每一包中装有132磅咖啡，因此销毁总量达到了18.48亿磅。即使是分给全世界每一个人1磅咖啡，这些被销毁的咖啡都还有大量的剩余。我们知道，那些渴望得到咖啡的无数人民是买不起咖啡的。

除咖啡之外，小麦、棉花以及很多其他农产品也被销毁了。各国也采取了相关措施，限制棉花、橡胶、茶叶等作物的种植，以减少将来的产量。这些销毁以及限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农产品短缺可能就会刺激需求，推高价格。毫无疑问，这会给售卖农产品的农民带来可观的利润，但是这给消费者带了什么呢？我们的世界真是奇怪。在生产不足的情况下，产品价格十分高昂，大多数人无力购买，自然会产生物资匮乏的现象。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产

品价格一路走低，使得工农业都难以为继，由此就会产生失业问题。失业工人们没有收入来源，他们怎么可能买得起产品呢？在任何情况下，不论是物资匮乏还是物资盈余，人民大众都是一无所有。

我之前就说过，在大萧条期间，美国或者其他国家都有充足的物资。农民们手上有大量无法处理掉的农产品，而城市的工人们却有大量卖不出去的制成品。但是，他们都想要得到对方手上的产品。由于双方都没有钱，因此交换过程难以进行下去。在此之后，在高度工业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许多人采用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方法，这种办法早在货币产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数百家物物交换组织在美国发展起来了。由于缺少现金，资本主义的交易体系崩溃了，人们开始弃用货币，直接交换产品和服务。交换组织不断出现，通过发放执照来协助物物交换行为。让我告诉你一个有趣的例子吧，一名奶制品加工工人向一所大学提供牛奶、黄油和鸡蛋，作为他的孩子们在此接受教育的学费。

在其他国家，物物交换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由于国际交易的复杂体系崩溃了，因此国家之间也发生了许多物物交换的交易行为。英国用煤炭交换斯堪的纳维亚的木材，而加拿大用铝来换取苏联的石油，美国则用小麦来换取巴西的咖啡。

这场经济衰退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农民，他们无法偿还他们以自家农场为抵押向银行借来的贷款。于是银行就想要拍卖这些农场，从而收回欠款。但是农民们决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因此他们自发组织了行动委员会，阻止银行拍卖他们的农场。最后，没人敢在拍卖会上竞标这些农民的产业，而银行就被迫同意农民提出的条件。在美国中西部农业地区，农民的反抗活动四处蔓延。他们的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明显反映出这场经济危机变得愈加严重了，它迫使这些作为美国中坚力量的保守的美国农民显露出霸道而革命的一面。美国的农民运动是美国独特的现象，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毫无瓜葛。在

这场经济危机中，这些拥有产业的中产阶级农场主正在沦为贫困的农民，他们失去了产业，几乎是一无所有，只能终日在土里刨食。

我花了相当长的篇幅来介绍美国的状况，因为美国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它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像欧洲和亚洲那样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因此在这里，变革的发生总是十分快速。其他国家对人民的贫困问题更加习以为常了，而在美国这却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其规模如此巨大，让美国人民瞠目结舌，难以置信。你可以用我提到的美国的情况来判断大萧条时期其他国家的状况。一些国家情况更为糟糕，而另一些则稍好一点。总的来说，和发达的工业国家相比，落后的农业国家并未遭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它们的落后面貌在一定程度上让它们免除了伤害。它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产品价格暴跌，这就让其国内的农民阶级陷入了困境之中。澳大利亚总体来说是一个农业国家，它无力偿还英国银行的债务，农产品价格的暴跌把它推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它不得不接受英国银行家们提出的苛刻条件，以此挽救处于危机中的自己。在这场大萧条中，银行家们是唯一获益的阶层，而其他所有阶层都只能受制于他们。

在南美洲，由于美国停止了借款，再加上大萧条所产生的影响，南美各个共和国政府，或是统治某些国家的独裁者们，都得面对另一场危机。革命之火燃遍整个南美洲，其中包括南美三大国，即阿根廷、巴西以及智利，即“ABC三国”。这些革命运动和以前的差不多，并无新意，都是一些宫廷政变，仅仅推翻了处于顶层的独裁者和政府而已。那些控制了军队和警察的个人或者组织统治了国家。所有南美各国政府均负债累累，绝大多数都在拖欠债务，完全丧失了偿还能力。

185 ——引发危机的原因

这次大萧条掐住了世界的喉咙，彻底抑制或者极大地减缓了几乎所有的活动。在世界许多地区，工业巨轮停止了转动。那些过去产量颇丰的土地现在完全荒废了，看不到农夫耕作的身影；橡胶汩汩地从橡胶树中流出，但无人前来收集；在过去，山坡上遍布着精心栽培的茶树丛，而现在已经杂草丛生，没有茶农来照管它们了。过去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现在已经加入了失业的大军当中，焦心地等待着重新就业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遥遥无期；他们是那么无助，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只能任由自己陷入饥饿和贫苦的绝境。在许多国家，自杀者的数量在不断上升。

我曾说过，所有的产业都笼罩在这场大萧条的阴影之下。但是，有一个产业仍然欣欣向荣，它就是军工业。这个产业是为各个国家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提供武器装备以及战争物资的。军备贸易一片繁荣景象，为军工企业的股东带来了丰厚的红利。它完全没有受到大萧条的影响，因为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在这场危机之下越演越烈，极大地促进了军备贸易的发展。

这场大萧条，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几乎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与世界大战一样的可怕后果。那么造成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它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危机，因为这个规模庞大又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机器在这场危机之下发生了严重的故障。为什么资本主义的行为模式是这样的呢？究竟这只是一场资本主义能够幸免于难的短暂危机，还是它已经奏响了资本主义末日哀歌的前奏，预示着这个曾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雄踞全球的伟大体制，已经走到了命运的终点呢？许多类似的问题被接连不断地提了出来，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因

为人类的未来就取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偶尔也取决于我们自己。1932年12月，英国政府向美国政府递交了一份短讯，恳求美国政府免除英国的战争债务。在这份短讯中，英国人指出，之前一直尝试的补救措施恶化了他们的现状。他们提到：“在所有地方，税收都无情地增加了，开支也大幅地削减了，可是意图补救问题的控制限令只是让问题更加恶化了。”他们进一步指出：“人民的损失和困难并不是自然的吝啬所造成的。自然科学不断取得重大进展，生产实际财富的潜力十分巨大，完全未受到任何损害。”问题的症结不在于自然，而在于人类自身以及他所创造的这个体制。

我们很难正确地诊断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病症，也很难为它开出补救的药方。经济学家们本应无所不知，但是现在对此意见不一，众说纷纭，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解释，也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补救建议。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似乎是对这个问题保持清楚认识的唯一人群了。他们在这场资本主义崩溃的事件中为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资本主义的专家们坦率地表示，他们对此感到困惑不解。蒙塔古·诺曼（Montague Norman）时任英格兰银行行长，是英国能力最为卓越的金融家之一。他曾在一次盛大的公共集会中讲道：

> 这个经济问题对我来说太难了。这些困难涉及面太广，太过新奇，完全没有先例可循，我在面对整个问题时，我只能承认自己的无知，只能表现出极为谦逊谨慎的态度。这完全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希望将来我们也许能够看到黑暗隧道尽头的那道光亮，而一些睿智的人已经发现了这道亮光，并给我们指了出来。

但是这道光亮就像磷火那样，只是迷人心智的幻象而已，它重新激起了我们内心的希望，却只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失望。著名英国政治家奥克兰·格迪斯爵士（Sir Auckland Geddes）曾说过：“有识之士

都认为社会已经开始解体了。在欧洲，我们知道一个时代正在消亡。”

德国人过去一直认为造成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战争赔款。许多其他国家认为战争债务引发了这场贸易萧条，这些外国战争债务和国内战争债务太过庞大，让负债国不堪重负，从而对整个工业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人们因此认为，战争应对全球重大问题负主要责任。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货币的奇怪行为以及价格暴跌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这是由于黄金不足所造成的，而黄金不足的部分原因在于金矿并未产出满足世界需求的黄金，但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各国政府都在大量囤积黄金。还有人说，所有的问题都应归因于经济民族主义以及阻碍国际贸易发展的沉重关税和税收。除此之外，还有人提出，科学技术和工艺的进步减少了工业对人力的依赖，因此工厂必需的工人数量下降了，失业问题愈发严重起来，从而引发了经济危机。

人们提出了各种可能的原因，说上几天几夜都说不完，也许全球经济混乱的状况是这些可能的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要把这场危机归咎于其中一种或者所有可能的原因，是完全不对的，也是不合理的。的确，许多所谓的原因却是这场危机的结果，尽管它们进一步加剧了这场危机。根本问题应该是更深层次的。它不能归咎于战争的失败，因为战胜国自己也深陷这场危机中。它也不是源于国内贫困问题，因为美国这个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也同样遭受了十分沉重的打击。毫无疑问，世界大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加速了这场危机的到来，不仅因为它给参战国造成了十分沉重的债务负担，同时债权国之间财富分配方式也成了一个大问题。还有一个原因：战争中以及战争后，商品价格在人为作用下虚高不下，因此必定会彻底崩溃。但是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这个问题吧。

据称，生产过剩正是问题的所在。“生产过剩”是一个令人误解的词，因为在无数人最基本生存资料匮乏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存在生

产过剩问题的。无数印度人民缺衣少食，但是我们听说了印度布厂和土布商店积压了大量的库存，印度布匹生产过剩了。对这种现象的合理解释是印度人民太穷了，根本买不起布料，绝不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布料。印度人民大众都很缺钱。人民缺钱并不意味着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而是意味着全球金钱分配方式发生了改变，而且还在不停地发生着改变。换言之，这表明财富的分配是不公平的。一方面，富人的钱多得用不完，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财富，只能把这些钱存入银行，不断地增加自己银行账户中的数额。这些钱并没有用于购买商品。另一方面，有人却一贫如洗，他们甚至没有钱来购买生活必需品。

这似乎是间接地告诉人们，这个世界上的确存在着贫富两极分化。这可是极为明显的事实，完全毋庸置疑。有史以来就存在着贫富并存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他们应该为现在的经济危机负责呢？我想，我已经在之前的几封信中告诉过你，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大趋势本来就会加剧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在封建制度之下，人的地位几乎是固定不变的，或者说变化极为缓慢。然而资本主义却拥有庞大的政治机器和全球市场，因此它充满了变数，随着个人和团体的财富越积越多，它也不断地快速变化着。财富分配不均越演越烈，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就导致了工业国家中出现了劳动力与资本家之间的新斗争。这些国家中的资本家向工人做出各种让步，例如提高工资，改善生活条件等，以此来缓和紧张的关系，但是这是以落后殖民国家遭受剥削为代价的。正是如此，亚洲、非洲、南美洲以及中欧受到了残酷剥削，让西欧和北美发达工业国家得以积累巨额财富，而这些国家中的工人也只享受到极少的好处。新的市场不断涌现，新的产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了，传统产业的规模也更加壮大。帝国主义采取强制手段，霸道地发掘新市场和掠夺原材料，工业强国之间也为此不断地进行竞争，从而引起了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全世界都完全沦为资本主义剥削的对象时，扩张的进程就会难以为继，帝国主义强国无法找到新的市场，因此它们的利益争夺就会演变成战争。

我早就告诉过你这所有的一切，但是我不厌其烦地反复提及，就是为了让你更容易理解这场世界性的危机。在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帝国主义越发壮大的这段时期，西方世界出现了许多危机，这是贫富差距不断加剧造成的。但是，由于资本家手头的闲钱流向了落后地区，并在此大力开发和剥削，从而创造出新的市场，提高了商品的消费量，因此西方世界出现的危机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帝国主义被称作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通常在全世界都实现工业化之前，剥削行为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各种困难险阻不断涌现，最大的困难在于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它们都想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另一个困难在于，由于殖民国家中新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民族工业的发展，民族工业生产出的商品开始涌入本国市场，以供本国人民使用。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发展进程都会导致战争的爆发。但是战争并未解决，也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所面临的一切困境。苏联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彻底脱离了资本主义世界，拒绝成为它们肆意剥削的市场。

在东方，民族主义变得更加激进，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科学技术在战时和战后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财富分配因此变得更为不均，而失业问题就此产生。战争债务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战争债务的数额十分巨大，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并非是任何形式的实体财富（solid wealth）。如果某个国家靠借款来修建铁路、灌溉工程或者其他对国家有利的工程，虽然这笔借款消耗殆尽了，但是也换来了实体财富。的确，这些工程也许会创造出比造价更为丰厚的财富，因此它们被称作“生产力工程”（productive works）。在战争期间，借款并未用作此种目的。它不仅没有促进生产力，反而还带来了破坏性。战争消耗了无数的资金，却留下了一片残垣断壁。因此战争债务完全就是彻头彻尾的负担。它们主要分为三类：战败国被迫同意偿还的战争赔款；协约国政府之间相互欠下的债务，尤其是欠美国政府的债务；每个国家向其公民筹借的国债。

任何一类债务的数额都十分巨大，但是对所有国家来说，最沉重的债务应该是国债。战后，英国国债竟然高达65亿英镑，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额。对英国来说，仅是支付这笔国债的利息就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也意味着它会大大加重国内税收。德国通过通货膨胀的办法将庞大的国债一笔勾销，虽然通货膨胀结束了旧马克的使命，牺牲了那些借款给国家的公民的利益，但是也让德国彻底摆脱了这个沉重的负担。法国也采用了通货膨胀的办法，但是它并没有做到德国那种程度。法国法郎贬值到过去价值的五分之一左右，从而一举将本国国债缩减了80%。但是，在涉及他国的外债时（如战争赔款或者政府间债务），它们就不可能玩弄同样的把戏了。这些外债必须得用真金白银来偿还。

政府间债务偿还意味着负债国需要付出大笔资金来偿还这笔债务，负债国的经济会因此变得更为紧张。但是偿还国内债务则不会对这个国家造成任何影响，因为不论怎样，国内资金总量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可是它的确会造成严重的影响。所有公民不论贫富，都会被国家征收税赋，用以筹集资金偿还国债。曾经借款给国家的国债持有人都是比较富有的，因此政府征税还债的结果是富人和穷人都得缴纳税赋，用以偿还富人的借款。富人们拿到了政府征收的税赋，实际上他们得到的远不止于此，然而穷人们却是只出不进，一无所获。富人们变得更加富有，而穷人们则变得更加贫困。

如果欧洲债务国还清了美国借出的部分款项，那么，所有的款项都会落入大银行家和金融家之手。因此，战争债务使得本就糟糕的局势雪上加霜，更多的资金涌入富人的囊中，简直到了钱多为患的地步，而这一切都是以牺牲穷人利益为代价的。富人们想把多余的钱用于投资，作为商人，他们可不想把资金闲置起来。他们把过多的资金都投入到新兴工厂、机械设备以及其他资本支出之中，然而他们的做法与当时广大人民所处的贫困状况完全格格不入。他们还一哄而上，在证券交易市场开始投机买卖。他们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商品生产活

动，但是如果大众没钱购买，那么这样做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生产过剩出现了，大量商品无人问津，各大产业纷纷亏损，而许多工厂纷纷倒闭。面对巨大的亏损，商人们惊慌失措，他们想急切地保全自己的资金，不再继续投资工业，宁可把钱存在银行里闲置起来。于是失业问题变得普遍起来，而贸易萧条也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

我已经分别讨论过造成危机的几种可能的原因了，但是这场危机应该是这些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而让这次贸易萧条变得前所未有地严重。最本质的原因应该是资本主义生产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分配不均。换言之，人民大众的收入很低，买不起他们所生产的商品。商品的价格高于他们的总收入。如果人民大众拥有那笔过剩的资金，他们一定会用来购买商品，但是这笔钱都集中到了非常富有的极少数人手中，而这些人完全不知道该把这笔钱用于何处。这笔过剩的资金以贷款的形式从美国流入德国、中欧以及南美。正是这笔外国借款，才让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以及资本主义机器维持了数年的正常运转，但这也是这场危机的根源。外国借款中断后，欧洲经济终于轰然倒塌了。

如果我对这场资本主义危机的诊断是正确的话，那么唯一的补救措施只能是让收入均衡，或者至少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要彻底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施社会主义，但是若非情势所逼，资本主义者是绝不可能这样做的。人们高谈阔论计划资本主义，或者联合剥削落后地区，但是在这些谈论背后，国家竞争以及帝国主义强国争夺国际市场的活动越演越烈。为什么而计划呢？为了获取利润，不惜牺牲另一方的利益？资本主义的动机是获取个人利润，竞争是它的口号。然而，竞争和计划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不光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甚至连许多有识之士都已经开始质疑资本主义在现有局势下的效用了。有一些人提出了令人震惊的补救建议，认为不仅要废除现有的利润制度，还应该废除价格制度本身，在这个制度之下，每件商品都有标价，必须用钱才能买到。这些

建议都太过复杂，在这里不好深入介绍，其中有一些甚至可谓是荒诞了。我提及它们的目的，是要让你知道这场危机已经完全动摇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而那些与革命毫无瓜葛的人却在努力提出许多革命性的建议。

最近，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简称ILO）建议简单地把工人的工作时间限定在每周40小时以内，以此来迅速减少失业问题。这项建议一旦实施，就会有无数工人能够重新就业，从而极大地降低失业率。所有工人代表对此都表示热烈欢迎，但是英国政府则坚决反对。在德国和日本的支持下，英国政府试图把这份提案束之高阁。在战后，英国在国际劳工组织中的形象一直都是十分反动的。

这场经济危机和贸易萧条都是世界性的，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到补救措施也必须是面向世界各国的。不同的国家都已经做出各种努力，尝试进行合作，解决危机，但是迄今为止都没有取得成功。那些极度渴望解决这个全球性问题的国家已经在尝试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做法来补救国内的危机了。有人提出，如果全球贸易还在萎缩的话，我们至少要保护国内贸易，不让外国商品进入国内市场。出口贸易变得难以预测，变化不定，因此每个国家都在集中精力封锁国内市场。各国纷纷开始提高关税，将外国商品逼出本国市场，它们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同样，它们也成功地损害了国际贸易，这是因为各国为国际贸易设置了非常高的关税壁垒。欧洲和美洲到处都是高不可攀的关税屏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亚洲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况。高关税还导致了生活成本攀升，因为受到关税保护的食品等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提高了。高关税催生出了国内垄断，它完全阻挡了外来的竞争，即使未能完全阻挡，也让外来商品很难参与国内市场的竞争。在垄断之下，价格必然会上涨。受到关税保护的特定产业，或者说这个产业的所有者，也许会从这种关税保护中获得极高的利益，但是这主要是建立在牺牲购买者利益的基础上的，因为购买者需要支付更多的

钱来购买商品。因此，关税壁垒减轻了部分阶级的压力，从而滋生了一大批既得利益集团，因为那些从关税保护中获益的产业都希望继续保持这种关税制度。印度织布业受到了严密的关税保护，以抵制日本织布业所带来的竞争。印度的织布厂厂主提高了布匹价格，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利润，如果没有关税保护政策，他们是完全无法与日本织布业抗衡的。印度的制糖业也受到了关税保护，从此大批制糖厂应运而生，它们大多集中在联合省以及比哈尔邦。一个既得利益集团随即诞生了，如果制糖业关税一经取消，这个利益集团就会遭到沉重的打击，而许多新兴的制糖厂就会随之倒闭。

两种类型的垄断发展起来了，即国家通过设置关税所进行的外部垄断，以及大企业鲸吞小产业的内部垄断。当然，垄断的发展不是什么新兴事物，甚至在世界大战发生前，它就早已登上了历史舞台，现在更是在迅猛地发展。同样，许多国家也一直实行着关税制度。在此之前，大英帝国从未设置过关税，是依赖自由贸易来发展国力的。但是现在，它不得不背离这个古老的传统，效仿其他国家，对外国商品强征高额关税。这种做法立即缓解了其国内某些产业面临压力。

尽管这种做法暂时缓解了某个特定地区所面临的压力，但实际上导致了更加糟糕的国际局势。它不仅造成国际贸易进一步萎缩，而且还继续维持并加强了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在这种做法之下，各个国家相互竞争，不断发生摩擦，它们都纷纷提高进口关税，以此作为打压对方的手段，这种做法被它们称为“关税战争”。全球市场的数量不断下降，即使仍然存在，也受到了关税的保护，因此世界各国都在苦苦争夺着这些市场，而雇主们则被迫削减工人工资，以此来保持自家产品对外国商品的竞争优势。于是贸易萧条愈演愈烈，失业队伍日益壮大。工人的工资越被削减，工人的购买力越下降。

186 ——美英世界领导权之争

我已经告诉过你，全球贸易在大萧条期间大幅萎缩，仅仅只剩下原有贸易规模的三分之一。由于人民购买力大不如从前，国内贸易的规模也缩小了。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如何安置如此巨大的失业工人队伍已经让各国政府压力重重，不堪重负。尽管政府征收了极高的税赋，但是多国政府还是感到入不敷出，很难平衡国内开支。财政收入每况愈下。尽管政府在极力节约开支，也削减了工作人员的工资，但是政府的开销仍然居高不下。因为政府开支中绝大部分是用于海陆空三军的军费开支以及国债和外债的偿还。国内预算出现赤字，也就是说，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这些财政赤字只能通过获取更多借款或者从其他储备金中挪用资金来解决，但是这也削弱了相关国家的金融地位。

与此同时，因为人民没钱消费，因此大量商品滞销，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过剩”的食品以及其他物品都遭到了销毁，而其他地区的人民又极其需要这些商品。经济危机和经济崩溃成了全球性的现象（苏联除外），但是世界各国并未能进行国际合作来结束这个局面。为了改变这个局面，每个国家都在努力改变自身，也曾试图压制其他国家的发展，甚至还想利用他国困境从中渔利。这种个体自私行为以及实施的其他片面补救措施，只会让局势进一步恶化。除了贸易萧条之外，世界事务中还出现了两大主要情况或者趋势，它们对贸易萧条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它们分别是资本主义世界与苏联的对抗，以及英美之间的竞争。

这场资本主义危机削弱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力，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困厄，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战争发生的概

率。每个国家都忙于自扫门前雪，没有多余的资金用于全球扩张活动。说起来又有点矛盾，但是这场危机的确增加了战争的风险，因为各国政府已经快被它逼疯了，绝望的人往往都会孤注一掷，想要通过发动海外战争来解决国内困境。当一个国家是由独裁者或者少数人组成的寡头集团当政时，更容易采用这种铤而走险的做法。为了不失去统治权，他会把整个国家拖入战争之中，从而把国内人民的注意力从国内矛盾上转移到战争上。因此资本主义世界常常可能组织起反苏联和共产主义的讨伐行动，因为它希望这能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团结到一起。我曾告诉过你，苏联并未受到这场资本主义危机的直接影响。它正埋头实施五年计划，发展本国国力，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卷入任何战争。

战后，英美两国的竞争势必不可避免。它们是实力最为强大的两个世界大国，都想要主导世界事务。在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是无可争议的世界霸主。但是这场世界大战让美国成了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从这以后，美国人自然而然就想要赢得他们认为应得的合理地位，也就是说，世界领袖地位。他们不可能任由英国继续领导一切。英国也完全意识到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也努力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以此来适应这种新的形势。为了取悦美国，英国甚至不惜放弃英日同盟关系，不仅如此，它还做出了一系列积极举动来安抚美国。但是英国并未准备要放弃它的特殊利益和地位，尤其是它的金融领导权，因为这与大英帝国的霸权地位休戚相关。但是美国想要夺取的正是这个金融领导权。因此两国之间势必会发生各种摩擦。两国银行家表面上言辞友好，相谈甚欢，但是他们都在各自政府的支持下暗自展开激烈竞争，争夺着金融和工业领域的世界领导权这一丰硕的奖品。在这场竞争中，美国似乎握住了绝大多数的王牌，拥有了绝对的优势，但是英国阅历丰富，手段高明，所以最终花落谁家还不得而知。

战争债务加深了两国之间业已激烈的矛盾，英国人大肆咒骂美国，将之比作“逼迫割肉还债的夏洛克”。事实上，英国政府欠下的

美国外债是来自战时美国私人银行家的借款或者预付信贷。美国政府仅仅只是这笔债务的担保方。因此，这笔债务能否一笔勾销，完全不是美国政府可以决定的问题。如果英国得以免除这笔债务，作为担保方的美国政府就必须代为偿还。美国国会找不出任何理由来代替英国承担这一额外的责任，尤其是在这个经济危机的时期，连美国都已经自顾不暇了。

因此，英美两国的经济利益完全南辕北辙，而经济利益的驱动力又强于一切。两国人民具有很多共性，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又不可避免，在英美两国的争斗中，不论是从国力还是从资源的角度来说，美国都占尽优势。两国矛盾也许会导致更加激烈的争斗，或者以另一种比较缓慢的方式，把英国所享有的特权和主导地位持续不断地移交到美国人的手中。对英国人来说，放弃他们所珍视的一切，失去古老的荣誉以及帝国主义剥削所带来的利益，退回到世界二流国家的地位，依从美国的意志行事，哪怕只是想想这样的局面都会让他们烦躁不安，因此他们是绝不可能轻易屈服的。这就是英国目前所处地位所带来的悲剧。以前英国国力强盛之时所遗留下来的资源正在消耗殆尽，它似乎正在无可救药地走向衰落。但是，数百年以来，英国人民一直都是大国国民，他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所以完全无法接受目前的命运，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他们都会英勇地与这个不争的命运进行抗争。

我已经向你指出了当今世界的两大主要对抗局势，因为它们能够解释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当然，这个世界上远不止这两种竞争。要知道，整个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都建立在竞争和对抗基础之上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大萧条之下事态发展的话题上来。1930年6日，法国从莱茵兰地区撤军，这让德国如释重负。但是这次撤军行动来得太迟了，已经没人把它当作善意的表现了，因为大萧条的阴影已经笼罩

了全球。贸易情况日渐恶化，债务国资金缺乏情况更加严重，它们已经很难甚至不可能偿还战争赔款和债务了。为了缓解目前的困境，胡佛总统签署了暂缓还款令，宣布延迟还款一年时间。各国呼吁重新讨论战争债务问题，但是美国国会拒绝把这个问题再次提上议程。法国政府在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上也表现出了极为苛刻的态度。英国政府既是债权国，也是债务国，它完全支持将战争赔款和债务一笔勾销，重新开始。每个国家都只为自己考虑，因此就不可能采取一致行动。1931年年中，德国的金融体系完全崩溃了，各大银行纷纷破产倒闭，从而引发了英国的国内危机；英国也没钱履行还债的责任了。英国也到了濒临金融崩溃的边缘。面对这一威胁，工党领袖麦克唐纳与保守党重新组织了“联合政府”，推翻了工党政府，并出任新政府的首相。但是就连这个国民政府也不能拯救疲软的英镑了。大约就在这段时间里，大西洋舰队的英国海军不满工资锐减，发动了起义。这次和平起义对英国和欧洲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俄国革命以及海军水兵哗变的记忆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脑海中，让他们开始害怕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到来。英国资本家决定在灾难来临之前保存自己的资本，他们于是把大量资金输送到了其他国家。在面对个人财产以及既得利益可能遭受损害的压力时，富有阶级的爱国主义精神简直不堪一击。

英国资本大量流失，英镑继续贬值，最后，在1931年9月23日那天，英国宣布放弃金本位，这就意味着它为了保证黄金储备，不得不将英镑和黄金脱钩。从此以后，使用英镑的人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声称是用黄金在进行交易了。从大英帝国以及其全球地位的角度来看，英镑贬值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这至少意味着它暂时放弃了自己的金融领袖地位，没有这个地位，伦敦就不再是世界金融事务的中心了。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英国曾在1925年重新恢复金本位，为此它甚至牺牲了本国工业的利益，还不得不面对失业增加以及煤炭工人罢工等问题。但是它的努力完全没有成效，其他国家采取各种行动迫使英镑再次与黄金脱钩。这似乎标志着大英帝国走向末路，而全世界都

是这样理解的。1931年9月23日被定格在了历史之中，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但是英国绝不言败，继续顽强地与不利的局势抗争着，它还有一个依附于它而且毫无帮助可言的帝国可以依赖。取自英国两大殖民地印度和埃及的巨额黄金让它从这场危机中恢复了过来，英镑贬值也让英国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其产品因此在海外市场可以卖出更便宜的价格。英国恢复的速度相当令人称奇。

战争赔款以及战争债务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德国明显已经无力偿还战争赔款了，而且它的确已经明确表示拒绝赔付。最后，1932年的洛桑会议同意将战争赔款降至很小的数目，与会国都希望美国也能随之减少战争债务。但是美国政府拒绝将战争债务与战争赔款混为一谈，也不同意免除战争债务。计划再次被打乱，欧洲人民对美国愤怒不已。

1932年12月，美国债务分期偿还的时间又来临了，美国坚持要求债务国按期支付，不论英法等国代表如何极力说服与恳切请求都无济于事。反复唇枪舌剑之后，英国支付了这次分期还款，但是声明再也没有下一次了。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拒绝支付，索性拖欠不还了。在此之后，各国再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解决方案，很快时间就到了1933年6月，债务国又该偿还下一期欠款了。法国再次拒绝支付，而美国这次对英国表现出了慷慨的态度，只让英国象征性地支付了极少量的赔款，将更重要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注

当英法等富有的资本主义大国都按照自己的标准和体系，奋力摆脱他们所欠下的债务时，它们却对苏联否认沙俄时期债务的举动提出了强烈的谴责，它们在债务问题上所持的双重标准真是可笑之极。在关于印度对英国的欠款问题上，国会代表提出应该交由公正的仲裁法庭重新审查，闻此提议，政界顿时发出一片惊恐的哀呼。爱尔兰和英

国之间同样也存在债务偿还问题，这个问题引发了两国之间严重的摩擦和贸易战争。时至今日，这场战争仍未停止。

在上文中，我反复提到了数个话题，包括英美两国争夺金融领导权、银行危机以及多国财政崩溃等。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可能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怀疑你不太能够理解。也许你对这个话题完全不感兴趣。但是既然我已经说了那么多，我觉得我必须更加深入地解释这些问题。不管我们对此是否感兴趣，这些金融事件都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个人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也应该了解到底是什么造就了我们的现在和未来。资本主义金融体系运作方式高深莫测，让人印象深刻，因此许多人都对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充满了敬畏感。在他们看来，这套体系似乎太过错综复杂、盘根错节，他们甚至都不愿意尝试着去了解它，因而就任由经济专家和银行家等相关人士来全权处理。毫无疑问，它的确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复杂并不是什么优点，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对它有所了解，否则我们是不可能了解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的。我不会向你解释关于这个体系的全部问题，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要知道，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仅仅是个学习者而已。我只会给你罗列一些事实，希望这些事实可以帮助你很好地理解报纸上报道的一些国际事件以及新闻。也许我会重复我之前讲述过的内容，但是如果这样做能够增进你的理解，我相信你一定不会介意的。切记，这是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个体系下，有发行股票的私人企业，有私有银行，还有那些进行股票买卖的证券交易所。而苏联的金融和工业体系却与之截然不同。苏联没有那样的私人企业，也没有私有银行，更没有证券交易所。几乎所有一切都属于国家，受到国家的控制，对外贸易从本质上来说是实物交换。

你应该知道，在一国范围内，商业交易几乎完全采用支票来结算，有时也会使用钞票，但是它的使用率并不高。但是，黄金和白银很少用于交易，除非是一些小宗买卖（的确很难得到黄金）。纸币代表信用，只要人民对发行纸币的国家政府或银行充满信心，那么纸币

就能充当现金来使用。但是由于各国货币各不相同，纸币在国际结算方面就毫无用处可言。因此，国际结算的基础还是黄金，黄金作为一种稀有金属，具有固有的价值。在国际结算中，既可以使用金币，也可以使用非金币形式的黄金（普遍称之为金条）。但是，如果每一笔国际结算都需要使用实体黄金来完成，那就会造成巨大的麻烦，而国际贸易也不可能得到发展。除此之外，全球实际拥有的黄金量势必会限制国际贸易量或者国际贸易值，因为一旦达到了这一限额，就不会再有多余的黄金来用于结算了。除非政府再次发放一些黄金，收回支付出去的黄金，对外贸易的各种交易才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1929年，世界黄金货币总值为1100亿美元。同年，对外贸易中商品总价值为3200亿美元。对外贷款额达到400亿，而其他跨国支付，如境外旅游消费、货运费以及移民寄给家人的汇款等大约为400亿美元。因此，国际支付总额达到了4000亿美元左右，这几乎是黄金货币总价值的4倍。

当时国际支付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显然不可能都是用黄金来支付的。辅助货币或信用证券（如支票和汇票）是最为常见的支付手段，商人们向国外发出这些证券，以此确认自己的债务。这笔业务常常是通过开展汇兑业务的银行来完成的。汇兑银行会与来自不同国家的买卖双方保持联系，在收到汇票之后，理算现金收支。无论何时，一旦银行发生汇票紧缺的情况，它就能使用知名的有价证券来完成支付，比如政府国债或者跨国企业的贷款或股票。这些股权可以通过电报售卖或者转让，因此就可以立即在另一端完成支付。

因此，国际贸易的实际支付是通过中央汇兑银行这一媒介，利用它们发行的商业证券（汇票等）以及金融证券（债券等）来完成。这些银行必须能够大量提供各种证券（如汇票和债券），以满足商业活动的日常需求。它们会每周公布报表，来显示它们收到多少黄金和此类境外证券。通常黄金从未被运送到国外来进行国际支付。但是，如

果运送黄金出境进行支付比任何其他支付方式更节约成本，那么银行家们铁定会用实体黄金来进行支付的。

在采用金本位制度的国家，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是由黄金来规定的，任何人都可以要求用黄金来进行支付。因此，由于货币可以兑现成黄金，所以货币的价值实际上是固定的，只能在本国国内才能发生变化。唯一可能出现的变数是跨国运输黄金所产生的费用，因为如果黄金在其国内价格更高，那么这个商人就可以轻易从另一个国家获得黄金。这就是那时的金本位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各国货币价值十分稳定，因此，国际贸易自18世纪以来，直到世界大战前，都得到了蓬勃发展。时至今日，这个制度已经轰然倒塌了，从此货币的行为变得十分奇怪，大多数国家货币的价值都常常发生波动。

一个国家的进出口量大致是能保持平衡的。换言之，一个国家用出口商品的价值来支付进口商品的价值。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无论如何，当进口总值超过出口总值时，通常都会出现少量收支差额，这被称为“贸易逆差”，这个国家就不得不追加资金来结清欠债。

各国之间的商品流向并没有规律可循。它频繁地发生变化，起伏不定。它的变化就会造成汇票供求的变化。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在某个时间段内，某国一种类型的汇票过剩，而又缺乏另一种类型的汇票。因此，法国手上也许有过量的德国马克汇票，却没有足够的美元汇票来结清欠款。法国就会希望卖出马克汇票，买进美元汇票。为了开展国际汇兑业务，就势必会出现一个中心票据市场。只有在拥有以下三大条件的国家才会出现这个市场。这三种条件分别为：

1. 其对外贸易活动必须十分普及且种类丰富，这样才能大量供应各种汇票。

2. 其国内必须有各种有价证券，也就是说，它必须是最大的资本市场。

3.其国内必须是最大的黄金交易市场。万一汇票和有价证券均数量不足，黄金也许能够比较容易地购买到。

纵观整个19世纪，英国是唯一满足以上三大条件的国家。当时，英国工业排名世界首位，它完全控制住了一个庞大的帝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对外贸易量。为了保持其国内工业发展，它牺牲了农业。英国商船从各港口装载了大量的商品货物和汇票。英国国内工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它自然而然就成了最大的资本市场，各种外国有价证券堆积如山。大英帝国可以供应全世界三分之二的黄金需求量，这些黄金来自大英帝国属下的南非、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度，这成了它的另一大助力。伦敦为各大金矿提供了成熟的交易市场，在这里，英格兰银行会以固定价格来购买它们开采出来的全部黄金。

因此，伦敦成了汇票、有价证券和黄金交易的中心市场，成了全球金融中心，那些想要结清欠款却又无法在本国国内盈利的政府或者银行家纷纷来到伦敦，在这里，他们可以获得任何种类的商业证券或金融证券以及黄金。英镑成了商业交易中的保证。如果丹麦或者瑞典想要从南美购买商品，那么合同上会用英镑标价，尽管这些商品从未到过伦敦。

对英国来说，这是一笔利润惊人的业务，因为全世界都要付出一些代价来换取它的服务。这些是直接的利润。除此之外，外国商号还在英国银行中保留存款余额和存单，以便于将来进行支付。英国银行将这些存款用于短期借贷，从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英国银行也了解了外国工业家的业务往来。它们从收取的汇票上可以看到德国或其他国家的商人对商品的标价，甚至还能找到外国客户的姓名。这些信息对英国工业用处极大，因为这可以帮助它取代外国竞争对手。

为了扩大和加强这笔国际业务，英国银行在全球设立了分支机构。这些银行不仅将其他国家全部纳入其控制范围，它们还开展了一项十分有利于英国的服务。它们询问知名地方企业和商业机构的信

息，并保留记录。因此，每当一家地方企业签发一份汇票，英国银行或者代理机构就会立即知道这份汇票的实际价值，它们会为安全的汇票提供担保。这被称为“承兑”，因为银行会在汇票上签下“可承兑”字样。一旦银行对此承担了担保义务，那么这张汇票就很容易出售或者转让，因为银行的信誉增强了它的可信度。如果没有银行提供担保或者接收，无名的外国企业签发的汇票在遥远的海外市场（如伦敦等地）是找不到买家的。因为这家公司籍籍无名，接收汇票的银行也承担着风险，但是它会等到其分支机构在当地完成彻底调研之后，才会接收这张汇票。“承兑”体系就是以这种方式促使汇票和业务交易的，同时还加强了伦敦对世界贸易的控制力。其他国家不可能如此大规模地开展这种“承兑”业务，因为它们在海外都没有那么多分支机构。

因此，在超过100年的时间里，伦敦一直都是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中心，掌握着所有国际金融和贸易事务。这座城市资金十分充裕，所以物价也相对更为便宜。这对银行家们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英格兰银行行长耳听八方，轻易地获取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贸和金融信息。他只需扫一眼各种文件和报告，就能告诉你任何国家的经济状况。的确，有时候他甚至比该国政府还要了解这个国家。英国只需略施妙计，操纵某国政府感兴趣的有价证券买卖，或者向其提供短期贷款，就能轻易地对该国政策施加压力。所谓的巨额融资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手中最有效的强制手段之一。

这就是世界大战之前的局势。伦敦代表着大英帝国的国力和兴盛。世界大战带来了许多变化，打乱了旧有的秩序。英国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也为这场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战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将在下一封信中再做阐述。

---

1. 从1933年到1938年的五年时间内，英国和法国再也没有向美国支付任何一笔分期还款，甚至连象征性的表示都不愿意，它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可以不理会、不偿还这笔

债务。

187 ——美元、英镑与卢比

世界大战把世界划分为了三大板块：两大敌对参战国集团和中立国。两个交战国区域互不往来，它们之间的贸易活动完全停顿，也未订立任何其他商业和约，仅仅剩下一些秘密的地下活动，以相互监视和窥探彼此的行动。国际贸易自然完全遭到了破坏。得益于其海上控制权，协约国集团才能和中立国和殖民地开展一些贸易活动，但是就连这些贸易活动都因为德国潜艇的攻击行动而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交战各国把国内所有资源都投入了战争之中，耗费了巨额资金。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内，英国和法国一直为国力更弱的其他协约国成员提供资金支持，它们不断向本国国民借款，还欠下了美国大笔债务。不久之后，法国精疲力尽，无力再帮助他国了。英国继续勉力维持了一年零三个月时间，终于也在1917年3月之时“弹尽粮绝”，难以为继了，就连它自己都无力偿还5000万英镑的美国外债了。让英法及其他协约国感到万分庆幸的是，美国在这个紧要关头宣布加入战争，加入协约国阵营，并向所有协约国提供了战争资金。美国通过发行“自由”和“胜利”贷款，从美国国民手中募集到数额巨大的资金，它在战争中大肆挥霍这笔资金，并将之借给各个协约国。这样做的结果是，美国在战后成了世界债权国，所有国家都欠下了美国外债，这是我早就告诉过你的。在战争之初，美国政府欠欧洲的外债总额为500亿美元，然而战争结束之时，欧洲却欠下了总共1000亿美元的美国外债。

美国在战争期间获得的经济利益远不止这些。美国对外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而德国和英国的对外贸易却大为萎缩，现在美国与英国

在贸易方面已经并驾齐驱了。美国还囤积了占世界总量三分之二的黄金以及大量的外国政府股票和债券。

从此美国拥有了至高无上的金融地位。他们只需向某债务国提出归还欠债的要求，就可以让它陷入破产的绝境。因此，他们自然会羡慕伦敦固有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并想要占据这一宝座。他们希望让世界最富有的城市纽约取代伦敦的地位，从此纽约和伦敦的各大银行家和金融家就在各自政府的支持之下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来自美国的压力动摇了英镑的价值。英格兰银行已经不能履行英镑与黄金自由兑换的承诺，而英国英镑（自此已经脱离了金本位）开始发生价值波动，一路贬值。法国法郎也贬值了。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美元成为唯一稳如磐石的坚挺货币。

在这种状况之下，有人也许会认为货币交易和黄金已经逃离了伦敦，而转向纽约了。但是，说来奇怪，这一切并未发生。外国汇票和金矿出产的黄金仍然源源不断地流入伦敦市场。这并非是因为人们拒绝美元，青睐英镑，而是因为美元并不那么容易获得。

你应该还记得我曾经在信中写到过英国银行通过其在世界各地开设的分支机构实行着“承兑”体系。美国银行并没有开设这类驻外分支机构，无法通过“接收”外国汇票来获得外汇，因此这些汇票自然就会通过英国银行大量流入伦敦市场。面对这个困境，美国银行家们立即开始在海外各国开设分支机构，一座座富丽堂皇的银行大楼在许多海外城市拔地而起。但是摆在美国银行家面前的还有另一个困难。只有那些训练有素的办事员才能承担“接收”工作，这些人必须对当地状况和商业非常了解。英国银行是在长达100年的发展时期内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服务体系的，因此在这个方面，任何国家都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轻易赶超它。

随后，美国人和一些法国、瑞士以及荷兰银行进行合作来对抗伦敦，但是成效并不显著。尽管法国十分富有，它也在向海外大量输出资本，但是从未想过要组建外汇交易的渠道。因此纽约和伦敦继续展开激烈的争夺，从整体上来说伦敦并未受到影响。1924年，一个有利于纽约的新情况出现了。德国马克在一场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结束后恢复了稳定，那些在通货膨胀期间大量出逃瑞士和荷兰的德国资本（资本在遭遇金融风险或者政治危险时常常出逃！）开始回流到德国银行中。德国一加入美国金融阵营，伦敦就立刻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压力。现在大量美国汇票可以不通过伦敦市场就能直接兑换成欧洲汇票。而在伦敦市场上，英国货币仍然没有稳定下来，也就是说，英镑并没有固定的黄金价值，完全脱离了金本位。

现在，伦敦金融家们大为惊恐，他们看到所有利润颇丰的国际汇兑业务都转入了纽约和其欧洲同盟手中，而伦敦却只能吃到一点残羹剩饭。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继续发生，英国首先必须再次让英镑和黄金挂钩，也就是说，要稳定英镑的价值。这么做将会再次把有利的汇兑业务吸引回伦敦市场。随即在1925年，英镑价值再次稳定下来，回到了原来的水平上。这对英国银行家和债权人来说是个巨大的胜利，因为英镑价值越高，就意味着他们能够获得的利益越大。但是，这对英国工业可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它抬高了英国商品在海外的价格，工业家们就很难与美国、德国以及其他工业国家在海外市场展开竞争了。英国有意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其工业以拯救它的银行体系，或者说是为了在国际汇兑市场上保持其金融霸权。英镑的信誉得以提升，但是你要记住，英国工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引发了英国的国内矛盾。从此，英国国内失业率上升，煤炭工人罢工和国内工人总罢工持续了很长时间。

英镑稳定下来了，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英国政府欠下了美国巨额债务，这是一笔流动负债，美国可以在任何时候向英国提出偿还要求。如果美国提出这个要求，英国就会立刻陷入非常困难的局面，英

镑也会随之再次贬值。因此，英国著名的政治家们（其中包括斯坦利·鲍德温）纷纷奔赴纽约，就分期偿还（这个过程被称为“借短贷长”现象）战争债务问题与美国达成了协议。欧洲各国都是美国的债务国，对它们来说，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坐下来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然后再向美国争取对它们最有利的条件。但是英国政府急于拯救英镑并保持伦敦的金融领导权，因此没有时间与法国或意大利协商，它只想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地与美国达成约定。它的确达到了目的，但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还接受了美国政府制定的苛刻条件。随后，法国和意大利却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了更为优惠的还款条件。

英国政府如此费时费力做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成功地拯救了绝境中的英镑和伦敦，但是它仍然继续在全球所有市场继续与纽约展开争夺。纽约拥有雄厚的资金，可以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因此很多国家（包括加拿大、南非和澳大利亚）都被吸引到了纽约，这些国家过去都是在伦敦货币市场借贷的。在提供长期贷款方面，伦敦完全无法与纽约竞争，于是它尝试向中欧各大银行提供短期贷款。在短期贷款方面，银行家的资历和信誉更加重要，因此伦敦占据了绝对优势。从此伦敦各大银行与维也纳的银行建立起紧密联系，通过它们与中欧和东南欧（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地区）的各大银行也建立起了联系。与此同时，纽约也继续在这些地区开展了一些业务。

在这段时间内，金融市场呈现出一片狂热的景象，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伦敦和纽约之间的激烈竞争。大量资金涌入欧洲，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地冒出来。这些人的行事方式十分简单。一些企业人士在这些国家中获得了修建铁路或其他公共设施的特许权，或者是诸如制造销售火柴这类的垄断经营。他们就会组建一家公司来保持这个特许权或者垄断权，而这家公司就可以发行股票或者证券。凭借这些股票或者证券，这家公司就可以从纽约或者伦敦的大银行得到借款。因此，金融家们可以以2分利息从纽约获得美元贷款，然后将这笔钱以6分利贷给柏林，而当维也纳得到这笔钱时，利息

已经上升到了8分。这些金融家的手段十分高明，他们将别人的钱挪来转去，借此大赚一笔，自己于是变成了富豪。其中最有名的人物是伊凡·克鲁格（Ivan Kreugar），这个瑞士人拥有火柴制造销售的垄断权，因而得名“火柴王”。克鲁格在某一时期声望极盛，但是后来他被证实是一名彻头彻尾的诈骗犯，而且还挪用了数额庞大的资金。就在他快要现出原形之时，他自杀了。当时，还有其他一些著名金融家也因为用可疑手段而陷入了麻烦之中。

在中欧和东欧地区的英美竞争也带来了一大好处。在1929年大萧条开始之前的这段时间内，涌入这些地区的巨额资金极大地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复苏。

与此同时，在1926年到1927年间，法国也经历了一场通货膨胀，法郎大幅贬值。有钱的法国人（每个法国小资产阶级都有存款）看到法郎下跌，十分担心会赔得血本无归，因此纷纷把钱换成了外汇。他们大量买进外国有价证券和汇票。1927年，法郎再次稳定下来，法郎价值与黄金重新挂钩，但是现有价值仅大约相当于之前价值的五分之一。那些持有外国有价证券的法国人现在都热衷于把手头的证券换成法郎。他们这笔生意真是做得好极了，因为他们之前拥有的法郎数量现在翻了五番，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如果他们一直坚持持有法郎的话，他们遭受的损失一定会十分惨重。法国政府决心利用这个时机大赚一笔，它用大量新印法郎纸币买下了其国民手中全部外国汇票或有价证券。从此，法国政府持有了大量的外国汇票和证券，突然变得非常富有了。事实上，它的外汇储备为彼时诸国之最。它完全没有想过要和英美竞争金融领导权，当然它也没有足够的资格与之竞争。但是它能够对英美两国造成极大的影响。

法国人素来谨慎，他们的政府也同样如此。他们宁愿稳扎稳打，赚点小钱，也不愿意冒着失去现有一切的风险去赢取巨大的利益。因此，法国政府十分谨慎地把多余的资金以极低的利息借给了信誉极好

的伦敦公司。他们只收取英国银行2分利息，而英国人转手将这笔钱贷给德国银行，收取5到6分利息。德国银行又把这笔钱以8到9分利借给维也纳的银行。最终，当这笔钱来到匈牙利或者巴尔干地区时，利息可能已经高达12分了！利率越高，风险越大，但是法兰西银行不愿意承受任何风险，所以选择了与安全度高的英国银行进行交易。这样，法国就把一笔数额极为惊人的资金（包括它购买的英镑外币汇票）存放到了伦敦，成了伦敦与纽约展开竞争的一大动力源泉。

与此同时，贸易危机加剧，经济更加萧条，农产品价格不断跌落。1930年秋天，小麦价格长期下滑，东欧国家的银行就无法从债务者那里收回贷款，因此它们也无法偿还从维也纳借来的英镑和美元贷款。这就引发了维也纳的银行业危机，维也纳最大的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Credit-Anstalt）破产倒闭了。在这场风波之下，德国银行摇摇欲坠，德国马克似乎马上就要崩溃了。这也许意味着英美在德国的资本也会遭遇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胡佛总统宣布延期偿付债务和战争赔款。如果美国坚持要求按时偿付战争债务，德国的金融体系就会彻底崩溃。实际上，就连延期偿付战争债务也完全不够了，德国甚至都不能偿还他国借款，因此只能再次同意它延期偿付所有的债务。

这就意味着英国借给德国的大量短期贷款都锁定在德国了，这种现象也被称为“冻结”。伦敦银行家的处境变得十分艰难，因为他们不得不偿付债务。他们一直指望能够从德国收回欠款。法国和美国向英国提供了1.3亿法郎的借款，但是它们的支援来得太迟了。恐惧情绪在伦敦金融圈中蔓延开来，每当出现大恐慌，人们都想要把钱从银行中取出来。1.3亿法郎很快就用完了。你必须记住，英镑实行金本位制，这就意味着每个拥有英镑的人都可以要求兑换黄金。

当时的英国政府是由工党执政的，这个政府希望能够从国外借到更多的资金来解决眼前的危急，它急切地向纽约和巴黎的银行家提出

借款请求。这些银行家似乎提出了一些借款的限制条件，其中一项是英国政府必须减少在工人事务、社会公共事业等方面的开支，他们可能还提出要英国政府削减工人工资。这完全是外国银行家对英国内政赤裸裸的干涉。这个局面完全被利用，目的是想推翻工党政府的统治，工党政府总理和首脑拉姆齐·麦克唐纳背叛了工党，在以保守党为主的力量支持下组建了新政府。这个新政府被称为“国民政府”，组建目的是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拉姆齐·麦克唐纳的背叛行径是最为臭名昭著的事件之一。

国民政府上台执政，开始挽救岌岌可危的英镑。来自英法的贷款如约而至，但是就连这笔贷款都无法帮助国民政府挽救英镑。1931年9月23日，英国政府被迫废除金本位制，英镑再次成为不稳定的货币。英镑迅速贬值，含金量降到仅148左右，相当于贬值前英镑价值的三分之二左右，这一天所发生的事件给整个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欧洲将之看作大英帝国即将分崩离析的征兆，因为这意味着伦敦不再主导世界货币市场了。但是它们的期望（欧洲和美国都讨厌大英帝国，更不要说亚洲了）有些为时过早了。

英镑贬值也动摇了许多国家的货币体系，这些国家还存有大量英镑纸币，似乎还把英镑当作可以随时兑换成黄金的货币。既然英镑已经不能兑换黄金了，而且它也已经贬值了30%，其他一些国家的货币也就随之贬值，英国将它们拖垮了，迫使它们也不得不舍弃了金本位。

法国现在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它所施行的谨慎政策让它受益匪浅。英美两国的贷款都在德国遭遇了冻结，英国的境况尤为严重，它们都急需资金帮助，而法国却储备了大量的外汇和金法郎。英美政府都向法国示好，用尽全力诱使它与自己一方结成同盟来对付另一方。但是法国太过谨慎了，拒绝加入任何谋划，因而就失去了这次讨价还价的绝好机会。

1931年末，英国举行了议会大选，国民政府在这场大选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事实上这就是保守党的胜利。工党几乎全军覆没。当时，有传闻称，工党政府可能会没收资产阶级的资产，这就让英国资产阶级人士惊慌失措。而大西洋舰队英国水手因工资锐减发动兵变，尽管这场哗变只持续了很短时间，但也让英国资产阶级感到恐慌。因此，英国资产阶级一拥而上，纷纷对以保守党为首的国民政府表示了支持。

尽管危急四伏，危险不断，在英镑贬值之后，英、美、法三大国却仍然不能合作解决问题。它们都喜欢单枪匹马独自行事，一心只想打压对方，为自己争取到更好的地位。它们本来可以团结起来，共同组建联合国际汇兑市场，而非为金融领导权争得头破血流。但是，它们宁愿各行其是。英格兰银行开始帮助伦敦重夺其失去的地位。让全世界都惊讶的是，尽管英镑并没有回归金本位，但是英格兰银行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达到了它的目的。当英国脱离金本位制之时，其他国家的国有银行（被称为中央银行）抛售了所有英镑汇票以换取黄金。它们一直储备着大量的英镑汇票，这是因为英镑汇票随时可以兑换成黄金，因此可以被看作黄金。大量英镑汇票突然遭到抛售，英镑就迅速贬值了30%。英镑贬值让欠下英镑债务的债务者们（包括一些政府和大企业）选择使用黄金来偿还债务，因为他们现在可以少还30%。因此，大量黄金流入了英国。

但是，真正流入英国的黄金是来自印度和埃及的。这些贫穷的英国殖民地被迫使用隐藏的资源来帮助富有的英国巩固其金融地位。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言权。在英国的需要面前，它们的愿望和利益完全一文不值。

从印度的角度来看，可怜的印度卢比的故事说来话长，令人痛心。印度卢比被迫不断地发生价值波动，以符合英国政府和金融家的利益。在这里我不会深入讨论货币问题，我只想告诉你，战后英国政

府在印度进行的一系列与货币问题相关的活动给印度带来了极为惨重的经济损失。1927年，印度国内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将卢比的价值固定下来，使其与英镑和黄金挂钩（当时英镑实行的是金本位制）。这场争论被称为“比率争论”，这是因为英国政府想把卢比价值固定为1先令6便士，但是印度人几乎一致要求将之固定为1先令4便士。(注)其实他们争论的问题由来已久，货币价值越高，银行家、债权人以及货币持有者就会获得更高的收益，海外商品进口也会增加，而货币价值降低，债务者的压力就会减轻，本国产业也会得以发展，出口量随之增加。当然，英国政府是不会理会印度的意见的，它执意把卢比的含金量定为1先令6便士。在很多人看来，卢比的价值遭到了高估，引发了轻微的通货紧缩。当时，唯有英国愿意选择通货紧缩，它在1925年使英镑回归金本位制，目的是为了保持它的世界金融领导地位，因此它甘愿为此做出巨大的牺牲。但是，法国、德国以及其他国家都选择采取通货膨胀的做法来缓解紧张的经济局势。

卢比价值提高了，这就意味着英国在印度的投资价值增长了。同时，由于印度商品的价格轻微上扬，这就给印度工业造成了额外的负担。总的说来，卢比价值的提高也增加了农民和地主的负担，因为他们都负债累累。卢比价值提高，他们的债务价值也会随之提高。18便士和16便士之间看似只有2便士之差，但是这个差额意味着卢比升值12.5%。假设印度的农业负债额为1000亿卢比，那么当卢比升值12.5%之后，这笔债务就会硬生生地增加125亿卢比，这个增幅是极为巨大的。

当然，从金钱的数目来说，债务总量并未发生变化。但是，从农产品价格而言，债务价值却提高了。货币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购买力，即它究竟能买到多少小麦、多少衣服或者多少商品。货币购买力下降就会造成货币贬值。要让人为抬高的货币价值固定下来，就必须人为地抬高货币的购买力，但是实际上它并不真正具备这种购买力。于是，农民们发现，他们的收入现在大多用于偿还自己的债务和利

息，能够余留下来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在这种方式之下，1先令6便士的兑换比率加重了印度的贸易萧条。

1931年9月，英镑被迫舍弃金本位，卢比也随之脱离了金本位，但是它仍然被迫与英镑紧紧地绑在一起。虽然1先令6便士的比率保持不变，但是印度卢比的含金量有所下降了。只要卢比仍然与英镑挂钩，英国资本可能就不会在印度遭受损失。如果英国政府任由印度自行决定比率，卢比可能就会贬值，就会给英镑资本带来损失。事实上，卢比含金量减少后，只有英国以外的如美国、日本等外国资本才蒙受损失。卢比与英镑挂钩还给英国带来了另外一大好处，就是让它可以用英国货币为本国工业购买印度的原材料。英镑区越广，英镑获得的利益就越大。

卢比跟随着英镑发生了贬值，印度国内的黄金价格自然也随之上涨了，换言之，黄金就可以换取更多的卢比。印度极其贫困，经济十分困难，这就使得印度人民卖掉了手头一切黄金饰品或物品，换取更多的卢比，用来偿还欠下的债务。各种小件黄金就像潺潺的溪流一样，源源不断地从全国各地汇入银行，而银行转手将这些黄金在伦敦市场上售卖，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印度的黄金就是以这种方式不断地流入英国的，数额大得惊人。这个过程仍然还在继续进行。正是来自印度以及埃及的黄金帮助了英格兰银行和英国财政渡过了难关，让他们获得了足够的黄金，用以偿还1931年9月向美国和法国的贷款。

现在，世界各国，包括最富有的国家，都在竭尽全力保有本国的黄金储备，并想尽办法增加黄金储备量，但是印度反其道而行之，这真是十分奇怪的现象。美国和法国政府在银行保险库中囤积了数量巨大的黄金。各国将黄金从金矿地底下开采出来，只为将这些黄金又藏进地底深处的银行保险库中，这个过程真是十分奇特。包括英国殖民地在内的众多国家都宣布黄金禁运，也就是说，不允许任何人将黄金

带到境外去。英国脱离金本位制的目的是为了保存黄金储备。但是印度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印度的金融政策受制于英国的利益所需。

常有传闻称，印度囤积了大量的黄金和白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只有极少数有钱人才拥有这些贵金属。然而印度的普通大众却一穷二白，一无所有。经济状况稍好的农户拥有零零星星的几件金饰，这就是他们所有的“积蓄”了。这里也没有银行设施。贸易萧条造成印度人民生活困难，而黄金价格上涨让他们愿意卖出手头的黄金小饰品，印度的黄金就逐渐地流出了国境。国家政府本应将这些黄金储备起来，因为黄金是唯一受到国际公认的支付手段。

让我们回到英镑与美元之争的话题上。通过这些方法和其他聪明的手段（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英格兰银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1932年初，由于美国资本同样也在德国遭到冻结，所以美国出现了银行业危机，英格兰银行这次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在这场银行业危机中，许多美国人卖出美元债券，购进英镑债券。有此英国政府得到了大量美元汇票，随后它用这批美元汇票在纽约的国有银行兑换成了黄金。由于美元实行金本位制，因此任何人都可以用美元来兑换黄金。就这样，英国的黄金储备大大增加了，英镑再未遇到任何问题，也未继续贬值，尽管它并没有回归金本位制，价值仍然在不断波动。在拥有了大量外国汇票和有价证券之后，伦敦再次成了伟大的国际兑换中心市场。我在之前写给你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到过，在美国严重的银行业危机中，数以千计的小银行遭遇了灭顶之灾。而这场银行业危机的发生，让纽约暂时在这场斗争中成了失败的一方。

---

1. 1英镑= 20先令，1先令= 12便士。——译者注

188 ——资本主义世界未能齐心协力

我向你讲述了一个多么冗长的故事，它的情节中充斥着各种金融竞争和谋划活动，恐怕你已经对我絮絮叨叨的讲述颇感厌烦了吧！这就是一张各国钩心斗角而织就的迷网，它纠缠不清，乱作一团，要把它理清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已经走入了这张迷网之中，就更难脱身而出了。我只是想要让你粗略地了解表面情况，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是从来没有浮出水面或是大白于天下的。

在现代世界中，银行家和金融家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甚至就连工业巨头的天下也早已成了过眼云烟。现在，只有大银行家才能够控制工业、农业、铁路、交通体系；的确如此，可以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万事万物的主宰，就连政府也不例外。因为，在工业和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它们需要大量的资金，而银行才能提供这笔巨额资金。在现代世界中，贷款已经成为大多数工作得以开展的基础，而只有大型银行才能增加、限制或者控制贷款。工业家和农场主们都需要向银行申请贷款，从而才能继续发展自己的产业。对银行家来说，借贷业务不仅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还逐渐加强了他们对工农业的控制。他们只用拒绝贷款或者要求借贷方在某个关键节点必须偿还债务，就能够以此扰乱借贷方的经营活动，或者迫使他接受某个条款。这种做法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均十分奏效，因为大型中央银行会贷款给不同国家的政府，从而可以对其施加压力。纽约的银行家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控制了许多中美和南美国家的政府。

不论经济形势好坏，这些大型银行仍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这就是它们的一大显著特征。在好光景里，它们享受到了商业发展所带来的普遍繁荣。大量资金涌入这些银行，而它们则以高息将这笔资金

借贷出去，以此获得丰厚的利润。而在贸易萧条和经济危机的困难时期，它们握紧手中的资金，不愿意冒任何风险（从而加重了贸易萧条，因为失去贷款支持的公司都陷入了经营困境之中），但是它们通过另一种方式来获取利益。在这段萧条期内，物价下跌，其中土地、工厂的售价也降低了，许多产业破产倒闭了。于是，银行赶紧买下了一切便宜的资产！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和萧条周期是符合银行家利益的。

在目前这场大萧条中，大型银行仍然继续运转良好，按时按量地支付利息。在美国，成千上万家银行的确破产倒闭了，奥地利和德国的数家大银行也未能逃脱厄运。破产的美国银行全部都是小型银行。美国的银行系统似乎出现了问题。但是，即便如此，纽约的大型银行仍然业绩辉煌。英国也没有出现银行破产的问题。

因此银行家们才是今日资本主义世界的真正主宰，我们这个时代被称为“金融时代”，而在此之前是纯粹的工业时代。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富庶之地美国，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出来，这些人也成为大众钦羡的对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清楚地认识到，“高级融资”的手段大多是见不得光的，这种手段和抢劫与欺诈的唯一区别在于其巨大的运作规模。巨型垄断公司碾轧了所有小型公司，而神秘的大型金融机构则榨取了那些可怜而轻信的投资者的钱。最近，欧洲和美国的一些最大的金融家遭到了曝光，而披露出来的一切让人深感不快。

我们已经看到，英美两国之间关于金融领导地位的争斗已经暂告一段落了，在这个回合之中，伦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这次胜利的奖品又是什么呢？尽管这场争夺持续了12年之久，但是胜利的果实已经逐渐化为了泡影。国际贸易慢慢萎缩了，金融领导地位所带来的利益也随之减少了。汇票变得少之又少，与此同时，有价证券贬值了，几乎没有发行新股和新证券。但是，对巨额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

的利息支付从未中断，债务国已经感到很难履行偿还义务了。国际支付的手段仅限于黄金，因此各国对黄金的需求大大增加。但是黄金不断地从贫困国家中流出，流到了那些货币相对稳定的富裕国家。

尽管美国囤积了大量黄金和财富，也具备最先进的工业技术，但是这一切都很难帮助它扭转日益加剧的贸易萧条形势。在过去，无数人不远万里来到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寻求发家致富的机会，然而现在这片土地上却充满着绝望的气息。那些曾经主宰着这个国家的大型企业已经彻底倒闭了，人们对金融和工业领袖的信心完全动摇了。胡佛总统一直与工业巨头关系紧密，但是现在他已经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在1932年11月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他败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

1933年初，美国遭到了另一场银行业危机的打击。在这场危机中，美国不得不放弃金本位制，允许美元贬值，尽管美国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多的黄金储备。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工农业的负担以及债务者的压力，虽然银行和债权者们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英国政府却完全不顾印度人民的一致反对，在印度采取了与美国截然相反的做法。

1933年6月，各国再次做出尝试，想要让资本主义世界团结起来，共同解决其面临的许多危及生存的严重问题。世界经济大会在伦敦举行，与会代表对这个“陷入恐慌的世界”议论纷纷，他们发出警告，指出“如果这次会议没能取得成功，那么整个资本主义格局将会支离破碎”。但是，尽管这些警告振聋发聩，各种危险迫在眉睫，超级大国们却不能展开合作，仍然试图各行其是。这次会议失败了，只能任由各国推行各自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

由于英国国内并未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所以它不可能自给自足，其本国工业所需要的原材料都是来自国外。因此英国政府试图在大英帝国范围内推行经济民族主义，想要把大英帝国变成一个基于英镑价

格的经济整体。为了实现这个想法，大英帝国经济会议（British Empire Conference）于1932年在渥太华（Otawa）召开了。但是，甚至在这次会议上，英国政府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因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并不准备为了英国的利益放弃本国的利益。最后英国只能做出让步，满足它们的需要。但是，印度被迫正式同意给予英国商品最优惠的待遇，尽管印度国内大多数人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后来发生的各种事件表明了《渥太华协定》（*Otawa Agreement*）并未取得成功，英国各自治领与英国以及印度和英国之间都为此发生了诸多摩擦。

与此同时，大英帝国的工业和市场陷入了新的恐慌之中。便宜的日本商品如潮水般涌入世界各地市场，这些商品价格非常低廉，就连高关税也无法将其拒之门外。由于日元贬值以及日本女工的低廉报酬，这些商品的价格也就低得令人咋舌。日本工业得益于日本政府提供的大量补助，而日本航运公司的货运收费也极为低廉。事实上，日本工业的生产效率很高，让许多老旧的英国产业望尘莫及。

由于关税无法阻止日本商品进入，因此各国政府要么完全禁止它们进入本国市场，要么推行配额体系，仅仅允许限量商品进入市场。如果日本商品从此完全被其他国家拒之门外，那么日本庞大的工业体系会面临什么情况呢？它的整个经济体系将会完全陷入混乱，它将会竭尽全力寻找出路，这就会导致经济报复行为，甚至引发战争。这就是资本主义破坏性竞争必然导致的发展轨迹。

同样，如果英国政府不允许欧洲其他国家的商品进入英国市场，这将意味着一些国家将会毁于一旦。由此，我们发现，各国为了眼前利益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将会伤害到其他国家以及国际贸易，并终将导致各种摩擦和矛盾。

189 ——西班牙革命

在前几封信中，我长篇大论地讲述了令人沮丧的贸易衰退与危机问题，现在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了，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最近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这两大事件为：西班牙革命和德国纳粹的胜利。

西班牙和葡萄牙占据了欧洲的西南端，它们历来在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们在殖民扩张的冒险中已经精疲力竭。在19世纪，西欧各国都在大力发展工业等领域，西班牙和葡萄牙却仍然保持着落后与迷信的面貌。民族主义西班牙战胜了拿破仑，但是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思想并未让它从中获益。当法国扫除封建制度并彻底变革土地制度之时，西班牙仍旧是一个半封建的国家，西班牙贵族们拥有面积广大的地产，还享受着各种特权。罗马天主教会占据着主导地位，不仅在宗教领域，在土地、贸易以及教育等领域也是如此。教会拥有最多的土地，并进行着大规模的贸易活动。它还完全控制了教育。

军队中的军官本身都是拥有特权的世袭贵族。在军队中，军官的比例非常高，每七个军人中就有一人是军官。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思想开明的进步人士。一场由工团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构成的工人运动正在日益高涨。但是真正的权力仍然掌握在教会、军队和贵族手中。西班牙北部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和巴斯克（Basque）地区掀起了争取自治权的大规模运动。

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政府基本上都是实行的君主专制政体，议会的力量十分薄弱。西班牙的议会被称为“Cortes”。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西班牙在很短的时间内曾建立起一个共和国，但是这个尝试以

失败而告终，国王卷土重来，恢复了君主专制统治。1898年，西班牙与美国之间爆发了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是西班牙几乎完全失去了它的殖民地。最终西班牙的属地中只剩下其邻国摩洛哥的部分地区。

葡萄牙仍然控制着大片非洲殖民地以及印度的小块土地，如印度果阿地区。1910年，葡萄牙国王被废黜，建立了共和国。在此之后，许多造反行动不断发生，保皇派想让国王重登王位，左翼分子又想赶走独裁者，推翻反动政府。但是，共和国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常常受到军事集团的控制。在世界大战中，它加入了协约国阵营，在战争结束后却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几乎让它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现任政府非常反动，成了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在果阿地区，一切公共活动都遭到了镇压，完全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可言。

在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保持了中立，从而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它向交战国双方提供商品，工业化程度得到了提高。战后，西班牙国内经济衰退，失业率高涨，社会动荡不安。与此同时，在1921年，摩洛哥里夫地区爆发了起义，在这场战争中，阿卜杜勒·克里姆彻底击败了西班牙军队。但是法国人随后侵入里夫地区，击败了阿卜杜勒·克里姆，帮助西班牙夺回了西属摩洛哥领地。在摩洛哥战争期间，普利莫·德·里维拉登上政坛，于1923年开始实施独裁统治，暂停了宪法。他的在位时间长达6年之久，但是他逐渐失去了军队的信任，在一场金融危机之后，他于1929年被迫卸任。与此同时，阿方索国王一直在位，他支持反动势力，竭力巩固自己的地位。

西班牙人民都有相当强烈的个人主义意识，他们的进步组织常常吵成一片。从巴枯宁时期开始，无政府主义思想就深深地吸引了新兴的工人阶级，英国或德国盛行的工会形式在西班牙从未流行开来。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组建了强大的组织，在加泰罗尼亚，他们的势力尤为巨大。其他进步组织包括开明民主党、社会主义者以及规模虽小但不断壮大的共产党组织。这些进步组织都支持建立共和国。在经历了普

利莫·德·里维拉的专制统治之后，这些共和组织紧密团结到了一起，开始相互合作起来。

1931年，它们在各地的市政选举中取得了胜利，随即共和力量的胜利席卷全国。这已经足以让国王（他既是波旁王室成员，也是哈布斯堡王室成员）胆战心惊了，他匆忙逃离了西班牙。西班牙共和国宣告成立，并于1931年4月14日组建了临时政府。这是一场和平的革命，并没有你死我活的拼杀。

西班牙革命与发生在1917年3月的第一次俄国革命惊人地相似。它那老掉牙的君主专制体制跟沙俄帝国一样，从内到外都已经彻底腐朽了，反对者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它土崩瓦解。在西班牙和俄国，贫困潦倒的农民阶级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主要是在他们的推动下，迟迟未来的革命终于爆发了，两国革命的目的都是要扫除封建制度以及变革土地制度。西班牙的情况比俄国更甚，在这里，教会的势力成了让人民憎恶的可怕负担。在两国的革命中，不同的阶层各行其是，各自为政，造成了不稳定的局面。右派和极端左派势力都不断地发起反抗活动。在俄国，不稳定的社会局势引发了“十一月革命”；在西班牙，社会仍动荡不安。

西班牙新宪法有一些有趣的特点。宪法规定西班牙只有一个议会，即上文提到的“Cortes”，全民均有权参与选举。最为独特的一点是，没有国际联盟的批准，总统不得对外宣战。在国际联盟记录中得到西班牙认可的所有国际公约立即成为西班牙的法律，这些国际公约甚至还能否定一切与之矛盾的法规，哪怕这些法规是有利于西班牙的。

新共和政府推行的左翼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略微带有社会主义的特点。共和国总理曼努埃·阿萨尼亚（Manuel Azana）是这个新政府中的铁腕人物。这个政府很快就得直面包括土地、教会以及军队这些棘手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西班牙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

法律法规，但是实际上这些法律条款大多形同虚设。于是法律规定，任何人或者家庭都不得占有面积超过25英亩的灌溉良田，如果分得土地之后却任由其荒芜，那么这些土地就会被政府收回。但是，事实上，还是有很多人占有大片土地，共和政府只没收了国王和少数反动贵族的土地。

西班牙议会规定要把教会财产收归国有，但是这项规定又未能得到实施。政府只在教育方面对教会施加了一定的限制，但是并未干预过它的自由。政府取消了军官们享受的部分特权，但是这些军官大多在退伍之后得到了一笔数额巨大的养老金。

1932年1月，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爆发了一场规模庞大的起义，随后遭到了政府的镇压。同年晚些时候，右翼力量又发动了起义，但是也很快失败了。

在共和国建立初期，尤其是在教育领域，这个新生共和国的各种举措都是值得称道的。它的确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来解决土地问题和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但是，土地改革的进展十分缓慢，这让农民阶级深感不满。与此同时，既得利益群体和反动势力过于顽固，时刻威胁着这个新生的共和国。而开明的政府却一直用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们。

说明（1939年11月）：1933年，西班牙的反动势力巩固了自己的势力，这个右派联盟在同年举行的大选中获得了绝大多数的席位。反动政府上台执政，从此农业改革戛然而止，教会势力大大增强，几乎完全恢复了以前政府的作风。为了拨乱反正，左翼组织渐渐紧密团结起来。1934年10月，西班牙全境暴乱频发，但都遭到了政府的镇压，左翼势力也就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左翼力量继续巩固自己的势力，组建了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将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团结了起来。1936年2月，人民阵线在西班牙议会选举中获胜，新政府得以组建起来。人们都认为这次新

政府将会大刀阔斧地解决土地问题，抑制教会的权力，并不再像前任自由民主政权那样对既得利益集团采取宽容的态度了。因此，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反动势力决定要绝地反击。他们向墨索里尼和纳粹德国寻求支持。

1936年7月，佛朗哥将军（General Franco）允诺，如果摩尔人的军队帮助他发动叛乱，他会在获胜之后承认西属摩洛哥的独立地位。因此，在摩尔人的军队支持下，他在西属摩洛哥发起了反政府战争。军官们和大多数士兵都支持佛朗哥，政府似乎毫无防守之力。于是政府号召手无寸铁的民众参与战斗。西班牙全国人民，尤其是马德里（Madrid）和巴塞罗那（Barcelona）的民众，积极响应了政府的号召，英勇地保卫民主政权。政府和共和国幸免于难，但是西班牙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落入佛朗哥之手。

从那以后，西班牙境内战事不断。意大利和德国派遣了大批军队、飞机和飞行员，并提供了大量军火，给予佛朗哥巨大的支持。无数外国志愿者奔赴西班牙，誓死保卫西班牙共和国，而与此同时，共和国政府也组建起一支强大的西班牙新军。英国和法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将不干涉西班牙内政，但是它们实际上沦为了佛朗哥的帮凶。

西班牙内战简直惨绝人寰，支援佛朗哥的意德两国飞机在毫无防卫的城镇上空投下大量炸弹，无数平民在轰炸中死于非命。现在，佛朗哥已经占领了西班牙领土的四分之三，但是共和国政权有效地阻挡住了他前进的脚步。从军事角度来说，共和国的力量十分强大，但是它面临的主要困难是食物匮乏。

西班牙内战已经远远超出了国内纷争的范围。它已经成为民主与法西斯之间斗争的标志，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同情。

190 ——纳粹在德国的胜利

西班牙革命让不少人大惊失色，但事实上它完全不足为奇。它的发生不过是遵循了事物的自然发展轨迹罢了，细致的观察者们清楚地认识到，这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封建王权与教会相互依存的旧格局早已腐朽不堪，完全失去了一切力量。这个旧格局已经基本跟不上现代形势的发展，它就像是一颗完全熟透的果子，只需轻轻一碰，就会掉到地上。印度也仍然保存着过去遗留下来的许多封建残余势力。如果没有外国势力的扶植，这些封建残余势力也许就会很快消亡殆尽。

但是，最近在德国发生的变化是完全不同的。毫无疑问，整个欧洲在这场变化中大受震动，许多人也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举止文雅、文明程度极高的德国人竟然也会任由自己沉溺在野蛮血腥的暴力行为中，仅此一点就足以让人大跌眼镜了。

希特勒和他手下的纳粹党人在德国取得了胜利。他们被称为法西斯党人，他们的胜利则是反革命的胜利，是对1918年德国革命及其后续事件所取得进步的彻底背弃。这全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你会看到，希特勒所宣扬的思想囊括了法西斯主义的一切要素，法西斯分子对一切自由元素，尤其是工人阶级，都表示了激烈的反对，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可是这已经远远不只是反对那么简单了，比起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来，德国法西斯涉及面更广，它煽动着民众的情绪，拥有更坚实的群众基础。这些被煽动起来的人并非来自工人阶级，他们本是中产阶级，却一无所有、忍饥挨饿，从而变得十分激进。

在之前一封关于意大利问题的信中，我对法西斯主义问题进行了讨论。我向你指出，法西斯主义是在一场经济危机中出现的，在这场

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国家遭到了社会革命的威胁。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发起一场以下层中产阶级为核心的人民运动，并利用具有误导性的反资本主义口号来吸引警惕性很低的农民和工人，以此试图保护自己。在夺取权力并控制国家政权之后，他们废除一切民主制度，镇压所有敌人，尤其是摧毁一切工人组织。因此他们的统治主要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的。新生政权为来自中产阶级的支持者们提供就业机会，常常还会推行一些国家控制工业的措施。

我们发现德国正在发生着一切，这些甚至都是在期待中发生的。但是，令人吃惊的还在于背后强大的推动力，以及数量庞大的希特勒追随者。纳粹反革命运动发生于1933年3月。我将带你回顾1933年以前的历史，了解一下这场运动早期的情况。

“1918年德国革命”这一说法是不真实的。实际上，它压根儿就不是一场革命。德国皇帝下台，共和国宣告成立，但是旧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根本没有改变。社会民主党人在几年内控制着共和国政府。他们十分害怕反动旧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总是试图向后者进行妥协。事实上，在他们身后有着无比强大的政党机器，各种工会也全力支持，他们不仅有无数的政党成员作为坚强的后盾，还得到了许多其他人士的同情。即便如此，面对反动分子的时候，他们却常常采用防御性政策，仅仅对本党内部极端左翼势力和共产党表现出了非常强硬的态度。他们的工作搞得一团糟，因此许多原本支持他们的人都转身离开了。那些弃他们而去的工人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成员数量达到了数百万人，从而实力大增，而来自中产阶级的支持者们也转投反动政党了。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一直斗争不断，双方实力由此遭到了削弱。

战后的数年里，德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德国工业家和大地主对此拍手称赞。那些地主负债累累，家中地产都用于抵押欠款了，因此他们很乐意使用几乎毫无价值的通胀货币还清欠款，从而得以收

回抵押的地产。大型工厂的老板改善了工厂设施，大型的垄断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德国商品变得非常便宜，立即占领了世界市场，失业问题随之烟消云散。在工会领导之下，工人阶级组织严密，即使德国马克大幅贬值，也成功地维持了原有的工资水平。中产阶级却遭到了这场通货膨胀的沉重打击，他们几乎失去一切，陷入了贫困潦倒的境地。正是这批在1923年到1924年间变得一贫如洗的中产阶级首先加入了希特勒的队伍。由于多家银行破产倒闭，失业率上升，贸易萧条逐渐蔓延到德国全境，从此更多的德国民众成了希特勒的拥护者。对现状不满的人认为希特勒能够庇护他们。希特勒还拉拢大批旧时军队中的军官加入了他的组织。这支旧军队依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在战争结束后立即解散了，数千名军官失去了军职，从此便无所事事。这批人纷纷流向了各个私人武装，其中包括著名的纳粹“冲锋队”（Storm Troops）以及支持德皇复位的保守民族主义分子的“钢盔队”(Steel Helmets)，这些私人武装都在不断地发展壮大。

阿道夫·希特勒何许人也？令人吃惊的是，在他大权在握一两年之前，他甚至都不是德国公民。他是一名应征入伍的德裔奥地利人，在战争期间表现并不突出。他参与了一场反对德国共和国的仓促叛乱，而这场叛乱并未成功。他被判入狱，但是当局对他进行了宽大处理。随后，他组织起一个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以此来对抗社会民主党人。“Nazi”（纳粹）一词正是来源于这个政党的名字：“Na”来自“National”（国家的），而“zi”则来自“Sozialist”（社会主义者）。尽管这个政党名为“社会主义者”政党，但是它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众所周知，希特勒从来都是与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个政党将“卐”这个符号作为政党党徽，但是这个标识在古代就已经是人们所熟知的了。你应该知道，这个标识在印度十分流行，人们认为它是吉兆的象征。纳粹也组建了一支战斗部队——“冲锋队”，军服为褐色衣衫。因此，纳粹分子常被称为“褐衫军”，正如人们把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称作“黑衫军”那样。

纳粹的纲领并不明确，也无积极意义可言。纳粹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强调德国和德国人的伟大，其他就是各种仇恨的大杂烩。它坚决反对《凡尔赛和约》，由于德国人将这项和约看作德国的耻辱，因此纳粹就得到了广泛的民意支持。它反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工会等一切类似组织。它敌视犹太人，因为它认为犹太人是异族，玷污了德国“雅利安”种族的纯正血统，拉低了德国国民的高素质标准。它似乎也反对资本主义，但是这仅限于对奸商和富人的咒骂。它非常轻率地主张实行国家控制，这是它唯一与社会主义相关的内容了。

法西斯背后的一切理论基础就是非比寻常的暴力哲学。他们不仅对暴力大加赞扬和鼓励，而且还将之看作人类最崇高的责任。德国著名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正是这种哲学的积极倡导者。他提出：“人类是食肉的野兽，他们勇猛、狡诈，且十分残酷……理想即为懦弱……食肉兽是最高级的生物生命形式。”他还指出：“同情、妥协以及静默都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而憎恶才是食肉兽群中最为真实的族群情绪。”人类不能像温顺的奶牛那样，日日群居，受人驱赶，东游西荡，他们应当成为凶猛的狮子，独霸巢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对他们来说，战争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也是最有乐趣的。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是当时最为博学的人物之一，他的著作包罗万象，思想深刻，让世人惊叹莫名。尽管他的学识极为广博，但是他的思想令人震惊和厌恶。我之所以会引用他的话，是因为他让我们理解了希特勒主义（Hitlerism），并解释了纳粹政权暴虐残酷的原因。当然我们不能由此认为每个纳粹分子都是同一种想法。但是纳粹领袖以及那些最激进的纳粹分子无疑就是持这种想法，而他们正是开创新风气的人。也许更准确地说，普通的纳粹分子并没有任何想法。自身的悲惨遭遇以及民族耻辱（法国占领鲁尔工业区让德国民众群情激愤）让他振作起来，对一切事物都感到无比愤怒。希特勒口才绝

佳，善于雄辩，他利用德国广大民众的情绪，将一切负面事件的原因都归咎于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身上。法国或者其他国家对德国的不公待遇就会成为纳粹势力发展壮大的理由，因为纳粹将会保护德国的荣耀。而经济危机加剧，会吸引更多的民众，源源不断地加入纳粹阵营。

社会民主党人很快失去了对政府的控制，而天主教中央党（Catholic Centre Party）则在各大政党争权夺利的混战中赢得了主导权。没有任何政党能够强大到足以忽略国民议会中其他势力的地步，因此大选总是频繁地举行，而各种阴谋诡计、党派倾轧常有发生。纳粹势力日益发展壮大，这让社会民主党人深感恐惧，因此他们转而支持资本主义中央党（Centre Party），选举年事已高的冯·兴登堡将军担任总统职务。尽管纳粹势力大为增长，但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这两大工人政党仍然继续保持着强大的实力，自始至终都拥有着数百万支持者，但是它们的败笔都是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未能齐心协力。共产主义者心中一直保存着惨痛的记忆，时刻铭记着社会民主党人在1918年之后上台掌权以来对他们所施加的迫害，也从未忘却在每次危机到来之时，社会民主党人总是与反动势力狼狈为奸。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与第二国际中与之联系紧密的英国工党极为相似，这个政党组织财力雄厚，人员复杂，拥有大批愿意为之效劳的忠诚之士，它不愿意冒任何风险，不愿对自身的安全和地位造成一丝一毫的危害。它十分害怕做出任何违法的行径，也绝不肆意采取任何直接的行动。它几乎费尽了心力去打击共产党，但是这两个政党出自同源，都属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范畴。

从此，德国沦为了实力均衡的各大武装力量相互争斗的竞技场，各地暴动频繁发生，谋杀事件层出不穷，其中尤以纳粹分子杀害共产主义工人为甚。工人们不时也展开报复。希特勒极其成功地将一群乌合之众团结起来，尽管这些人形形色色，并无相似之处。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联盟，其中不仅有下层的中产阶级和大工业家，还有富有的

农民阶级。企业家支持希特勒，为他提供资金来源，因为希特勒憎恶社会主义，他似乎是能够阻止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继续发展壮大的唯一屏障。而反资本主义口号还吸引了贫困的中产阶级和农民，甚至还有一些工人受了它的蛊惑。

1933年1月30日，年迈的兴登堡总统（当时已是86岁高龄）将德国权力最大的行政职务交到希特勒手中，任命他为政府总理，这就相当于首相一职。纳粹和民族主义者结为同盟，但是很快纳粹显然完全控制了局面，开始独揽大权。由于纳粹与民族主义者的结盟，它在大选中赢得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中的绝大多数席位。就算他们不能赢得绝大多数席位，纳粹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因为他们逮捕了国民议会中的反对者，将这些人全都投入了监狱。国民议会中所有的共产党成员都遭到了清除，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随即议会大楼燃起熊熊大火。纳粹分子声称这完全是共产主义者的“杰作”，他们密谋想要破坏国家。共产主义者坚决予以否认。事实上，他们控诉纳粹领袖才是纵火的元凶，指出纳粹纵火的目的是为了找到攻击共产党的借口。

从此以后，纳粹恐怖统治或称“棕色恐怖”（Brown Terror）在全德国蔓延开来。首先，国民议会遭到解散（尽管纳粹分子占据了绝大多数席位），希特勒和他的内阁独揽了大权。他们可以制定法律，随心所欲做一切想做的事情。《魏玛共和国宪法》（*The Weimar Constitution of Republic*）遭到废除，民主也被公然摒弃。德国本来实行联邦制，但是现在这个制度也宣告终结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了柏林。德国各地都是独裁者执政，他们只需服从上一级独裁者的指挥。当然，希特勒是最大的独裁者。

各种变化正在不断发生。在这个过程中，纳粹的“冲锋队”在德国全境肆意妄为，进行着暴力恐怖统治，各种做法都极为野蛮和血腥。纳粹恐怖统治完全不同于以前。以前也有过恐怖统治，比如“红

色恐怖”和“白色恐怖”，但是这类恐怖统治通常发生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集团在内战中为生存而战的时期。恐怖统治是对可怕的危险和持续的恐惧所做的反应。但是纳粹不用面对任何危险，也没有理由感到恐惧。他们一手把持政府，没有任何武装力量能够反对或者抵抗他们的统治。因此，“棕色恐怖”并非是激情和恐惧造成的结果，它完全是纳粹分子为排除异己而采取的冷酷无情且极为残酷的蓄意镇压。

自纳粹掌权以来，他们在德国公然犯下了种种暴行，现在仍然在背地里倒行逆施，将这些暴行一一罗列是毫无意义的。暴力殴打、酷刑折磨以及枪击谋杀在德国几乎变成了家常便饭；德国民众，无论男女，都沦为了纳粹恐怖统治的牺牲品。无数民众身陷囹圄，在监狱或集中营里苦苦挣扎着，据说还遭受了非常残酷的对待。纳粹对共产主义的攻击是最为猛烈的，但是更为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子也并不好过。纳粹对犹太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除此之外，和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工会会员以及国际主义者也未能幸免。纳粹声称，他们发动了一场战争，将要彻底消灭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要灭绝一切左翼分子。犹太人也必须从各种岗位和职务上彻底消失。成千上万的犹太裔教授、教师、音乐家、律师、法官、医生以及护士都被撵走了。犹太裔商店店主们遭到了联合抵制，而大量犹太工人也被工厂辞退了。纳粹大规模销毁他们所列的禁书，常常进行公开焚书的行动。只要报纸上出现一丁点儿不同的言论或者批评之声，这家报社就一定会受到无情的打压。纳粹不允许刊登任何一条关于恐怖统治的新闻，即使是私下讨论也会招致严厉的惩罚。

除纳粹党之外的任何组织和政党当然都已经遭到了镇压。在这些遭到镇压的政党和组织中，共产党首当其冲，其次是社会民主党，再者是天主教中央党深受其害，最后甚至就连身为纳粹同盟的民族社会主义党也未能幸免。伟大的德国工会是数代德国工人辛苦劳作、勤俭节约和牺牲奉献的象征，但是它们也已经毁于一旦，全部资金和财产

都遭到查抄。最终仅有一个政党、一个组织得以保留，它就是纳粹党。

每个德国人都被强行灌输了这种怪异的纳粹理论，纳粹的恐怖统治让他们害怕得头都抬不起来。德国的一切，包括教育、戏剧、艺术和科学，都打上了纳粹的烙印。希特勒手下要员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说过这样一句话："真正的德国人是用血统说话的。"还有另外一名纳粹高官也说过："纯理性和无偏见科学的时代结束了。"纳粹还对儿童灌输了一套思想，让他们相信希特勒就是耶稣再世，却比耶稣更为强大。纳粹政府不赞成让民众接受太多的教育，尤其反对女性接受教育。的确，在希特勒追随者（Hitlerites）的眼中，妇女就应该待在家里，在厨房里面准备一日三餐，其主要责任就是生儿育女，让儿女成长为为国家战斗献身的力量。纳粹要员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博士是纳粹时期德国国民教育和宣传部（Public Enlightenment and Propaganda）部长，他曾说过："妇女的位置就在家庭里。她的任务是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生儿育女，这对她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女性解放对国家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她绝不能争夺属于男人的东西。"这位戈培尔博士告诉我们，他教导国民的方法是："我的目的就是像弹奏钢琴那样摆弄舆论。"

在德国，中产阶级失去了一切，他们贫困潦倒，忍饥挨饿，这才是一切野蛮行径、残暴做法和杀戮、纵火行为的根源所在。实际上，这是一场攸关生存的战斗。犹太裔医生、律师、教师、护士等遭到驱逐，这是因为"雅利安"德国人没有能力与他们竞争，却对他们的成就垂涎三尺，想要把他们的工作据为己有。犹太人的商店遭到强行关闭，因为他们是十分有力的竞争对手。许多并非由犹太人经营的商店也关门大吉了，而且店主遭到了纳粹的逮捕，这是因为纳粹怀疑他们哄抬物价，牟取暴利。支持纳粹的农民一直眼巴巴地望着东普鲁士的大片土地，他们希望能够将这片土地瓜分过来，收入私囊。

早期纳粹的纲领提出要设置工资收入的限额，规定年薪最高不得超过1.2万马克，这个数值相当于每月8000或者666意大利里拉，这真是很有意思。我不知道这个提议实施到哪个地步了。现今总理的年薪是2.6万马克（即每月1440卢比）。根据那份提议，只要私有企业接受政府补贴，那么该企业管理者或所有者的年薪都不得高于1.8万马克。要知道，这些人在过去通常都是身价不菲的。让我们拿这些数值来对比一下贫穷的印度支付给官员的巨额工资吧。国会在卡拉奇市提议将月薪限额设置为500美元。

我们绝不能以为纳粹运动的本质只是暴虐和恐怖，尽管这两大特点是如此显著。毫无疑问，除开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大批德国人狂热地崇拜并追随着希特勒。上一次大选的数据可以告诉我们，52%的德国人都坚决支持希特勒，而这52%正在对剩下的48%或者其中一部分实施着恐怖统治。希特勒拥有52%的德国民众支持者，也许现在他的支持者更多了，他是很受人民欢迎的。去过德国的人都提到德国弥漫着一股奇特的精神氛围，就仿佛是一场宗教复兴运动。《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带来了极大的屈辱和压抑，而德国人认为，这段漫长的岁月已经成了过去，他们终于可以再次自由地呼吸了。

但是另外一半左右的德国人感受全然不同。德国工人阶级内心充满了强烈的仇恨和愤怒，但是他们默默地将之埋在心底，因为害怕纳粹恐怖的报复而压抑着心中的情绪。他们完全屈从于纳粹的暴力和恐怖统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竭尽全力、牺牲自我而建设起来的一切毁于一旦，并为此深感痛心和绝望。过去数月在德国发生的所有事件中，最令人惊讶的就是伟大的社会民主党不做丝毫抵抗，顺从地接受了彻底崩塌的命运。这可是全欧洲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为庞大、组织最为严密的工人阶级政党啊，而且它还是第二国际的支柱。可是，它乖乖地屈服了。尽管抗议是完全没有用处的，然而在面对每一次凌辱之时，它竟然一声不吭，甚至在最后走到了灭亡的地步，它也逆来顺受了。就是这样，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一步一步地向纳粹屈服了，

他们总是期盼着他们的屈服和受羞辱也许能够挽救他们。但是，屈服化为了伤害自己的利器，纳粹借此向工人们指出，当濒临危险的时刻，他们的领袖就是这样卑鄙地抛弃了他们。在欧洲工人阶级斗争的漫长历史中，失败屡有发生，而成功也并不少见，但是还从未有过任何政党完全放弃抵抗，极不光彩地向敌人投降，彻底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伟大事业。共产党试图发起抵抗，号召工人们发动一次大罢工。但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并不支持这种行为，因此这场罢工就不了了之了。尽管工人运动破产了，但是它并未消失，因为还有一个秘密组织支持着它，而且这个组织似乎分布还比较广泛。尽管纳粹间谍系统十分周密，有一些地下报纸应该还有不下数十万份的发行量。一些出逃德国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也在通过秘密的途径在境外组织着宣传攻势。

迄今为止，工人阶级是这场“棕色恐怖”最大的受害者。但是，国际舆论在为犹太人的遭遇而深感不安。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欧洲对于阶级纷争习以为常了，同情与阶级总是如影随形。但是，对犹太人的攻击属于种族迫害，类似的行为常常在中世纪发生，然而近来在沙俄这类落后国家里，这样的做法也并不少见，只不过都不会明目张胆地进行。纳粹德国对一个种族公然进行迫害，这样的行为让欧洲和美国大为震惊。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德国犹太人中还有许多闻名于世的大人物，杰出的科学家、医生、律师、音乐家和作家不胜枚举，其中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个名字简直如雷贯耳。这些著名的人物都把德国认作祖国，而且无论在何处，他们都被认定是德国人。只要能够拥有他们，任何国家都会感到无上光荣，但是纳粹十分疯狂，始终在执迷不悟地仇视犹太民族，要将他们赶出德国，这就引发了世界范围内规模浩大的强烈抗议。随后纳粹禁止犹太人开店，不允许他们就业，但是非常奇怪的是，纳粹下令禁止他们离开德国。这个政策的唯一结果必然是困死犹太人，让他们走投无路。由于全世界都对此发出了强烈的抗议，纳粹德国才被迫缓和了对付犹太人的公开手段，但是这并非意味着纳粹德国改变了政策。

尽管犹太人散落在世界各处，也没有自己的归属，但是他们可不是无助之辈，也并不缺乏报复的能力。他们控制了大量商业和金融业务，悄无声息且毫不费力地宣布抵制德国商品。他们所做的还不止于此。1933年5月，在纽约举行的会议上还宣布通过了一项决议。他们决定将“抵制在德国生产或加工的一切商品、材料以及制成品，或者其零部件；抵制一切德国航运、货运和交通服务，以及所有德国医疗、娱乐和其他休闲服务。总而言之，不做任何可能会给德国现政权带来物质支持的任何行为”。

这就是德国境外对希特勒主义的一种反抗行为，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反抗活动带来了更加深远的影响。一直以来，纳粹都在谴责《凡尔赛和约》，强烈要求对其进行重新修改，尤其是和约中关于德国东部边境的部分。在东部边境，通往但泽的波兰走廊将德国的一小片领土与德国本土大部分隔开来，这种安排的确是十分荒谬的。纳粹还大肆叫嚣，要求在军备上完全平等。（你也许记得，根据和约，德国几乎裁掉了全部军队。）希特勒到处发表极有煽动性的演说，威胁将要重整军备，这让全欧洲陷入了焦虑不安的局面，因为欧洲是最害怕德国强大起来的。在一段时间内，欧洲似乎已经到了濒临战争的边缘。出于对纳粹的恐惧，欧洲列强突然又重新结盟了，法国开始对苏联表现出了友好的姿态。那些由《凡尔赛和约》造就的或者是受益于该和约的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以及罗马尼亚）害怕和约遭到重新修改，它们立即团结起来，在同一时间紧紧靠拢苏联，向它寻求庇护。在奥地利也出现了相当惊人的局面。牢牢掌控奥地利的陶尔斐斯（Dolfuss）总理是一名法西斯分子，但是他的法西斯主张不同于希特勒。尽管纳粹势力在奥地利十分强大，但是陶尔斐斯站到了它的对立面。意大利对希特勒的胜利表示欢迎，但是并不全然赞同希特勒的野心计划。虽然英国长期以来都在支持德国，但是英国人民抵制德国，甚至又开始谈论野蛮残忍的“匈人”了。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在欧洲遭到了孤立。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战争爆发了，没有武装的德国将会被强大的法国军队彻底碾轧。因此，希特勒改变了他的

策略，开始谈论起和平，而墨索里尼则提议英、法、德、意四国签订《四国条约》，以此帮助希特勒摆脱困境。

最后，在1933年6月，四国签订了这份协议，尽管法国之前一直犹豫不决。这份协议措辞十分温和，仅仅要求四国在特定的国际事务问题上，尤其是关于《凡尔赛和约》的修改提议问题上，进行相互协商。但是这份协议被看作组建反苏阵营的企图。法国明显是极不情愿签署这份协议的。1933年7月1日，苏联和它的邻国们在伦敦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以此回应《四国条约》，也许这也是这份协议所造成的结果。很有意思的是，法国对苏联等国签订的协议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认可。

希特勒制定的基本行动计划也是德国资本主义的行动计划，它的目标是要让德国成为欧洲的捍卫者来对抗苏联的力量。想要开疆拓土的德国只能在东欧身上打主意，或是从苏联那里虎口拔牙，但是要想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它就必须重整军备，因此就必须按照这个意思重新修改《凡尔赛和约》，或者至少能够确定不会有其他国家干涉它的行动。希特勒希望得到意大利的支持。如果他还能赢取英国的支持，那么事情就会变得十分容易，因此也许他希望，在《四国条约》之下的任何讨论中，法国的反对之声会失去一切效力。

因此希特勒一直努力地争取英国的支持。为此，他甚至还公开表示，如果英国对印度的控制遭到削弱的话，必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希特勒的反苏立场本身就受到英国政府的青睐，因为英帝国主义最为憎恶的对象恰恰是苏联，这也是我早就告诉过你的事实了。但是英国国民对纳粹深感厌恶，因此要让他们对任何支持希特勒主义的提议表示赞成，这一点还暂时难以做到。

从此纳粹德国成了欧洲的风暴中心，引发了更大的恐慌，让这个本就惊惧莫名的世界雪上加霜。德国国内会发生什么事呢？纳粹政权将会持续下去吗？德国国内对纳粹也有不少厌恶情绪和反对之声，但

是所有有组织的反抗活动显然全都遭到了镇压。在德国，政党或者组织已经全部消失，纳粹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纳粹内部似乎划分为了两个党派：其一，是由资本主义分子和商界人士组成的右翼；其二，是由纳粹党内绝大多数普通党徒组成的左翼，它最近还吸引了大批工人加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在加入德国纳粹运动的人员中，有相当多的革命激进分子，这些人都是极端反对资本主义的，他们随后还接收了大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加入。在纳粹运动中，左翼和右翼力量完全背道而驰。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完全在于他能够将冲突的二者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且还能挑动它们彼此相斗。这种做法奏效的前提是二者都面对着共同的敌人。既然它们共同的敌人已经遭到镇压或者吞并，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冲突必将越演越烈。

隆隆的雷声早就响起了。左翼纳粹分子提出，既然第一次革命已经圆满地完成了，那么第二次革命现在应当启动了，这场革命将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地主所有制等。但是，希特勒发出警告，威胁说将要无情地镇压第二次革命。因此他明确地站到了资本主义右翼这边。希特勒手下主要军官现在绝大多数都身处高位，他们对现状十分满意，完全不想看到任何改变。

这篇关于希特勒主义的记述篇幅虽然很长，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对欧洲乃至全世界而言，纳粹的胜利以及发展都是无比重要的，必将带来影响深远的后果。毫无疑问，德国纳粹正在推行法西斯主义，而希特勒自己也是典型的法西斯分子。但是，纳粹运动比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影响更为深远，行动也更为极端。究竟这些极端因素会发挥什么作用，或只是遭到粉碎，尚有待继续观察。

纳粹运动的发展从一定程度上扰乱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唯一真正的革命阶级是工人阶级，这个阶级在经济状况恶化之时将会团结中产阶级中失去一切、不满现状的底层

人士，最终必将发起一场工人革命。事实上，在德国发生的一切确实是迥然不同的。在危机到来之时，工人们完全没有任何革命性可言，组成新生的革命阶级的却主要是一无所有的底层中产阶级以及其他不满现状的人士。这种情况完全不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教条、教义或者宗教，它并非是一锤定音的宗教权威。它是历史的哲学，是看待历史的方法，能够用来解释多种事物并找到关联，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或社会平等的一种行动方法。根据时代和国家情况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具有不同的应用方式。

说明（1938年11月）：这封信是我在五年零三个月之前写的，自我撰写这封信以来，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德国实力不断增强，名声日隆，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无可比拟的重要事件。希特勒控制了今日之欧洲，那些过去曾不可一世的大国在他的面前卑躬屈膝，他的任何威胁都能让它们颤抖不已。20年前，德国一败涂地，地位一落千丈。然而现在，希特勒不费战争之力，就成功地实现了德国的崛起，而《凡尔赛和约》早被他抛诸脑后，遭到了彻底的摒弃。

希特勒夺权之后，他首先做的就是专心地镇压反对者，并巩固纳粹政党的统治。在实现“纳粹一统”德国之后，他决定要剪除党内的左翼势力，因为纳粹左翼一直都期盼展开一场反资本主义的第二次革命。希特勒解散了“褐衫军”，并于1934年6月30日下令枪杀了其领袖人物。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人员遭到屠杀，其中包括曾经出任总理的冯·施莱谢尔（von Schleicher）将军。

1934年8月，冯·兴登堡总统过世，希特勒接任他的位置，将总统和总理大权集于一身。从那以后他在德国说一不二，成了德国人民的元首。当时，德国人民普遍十分痛苦，纳粹政权几乎强制性地命令个人设立大量的慈善机构，来减轻人民的痛苦。政府还开办了强制性的劳工营，将失业人员送去工作。大量犹太人被迫放弃工作，让位于德

国人。德国的经济状况并未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但是失业问题完全消失了。与此同时，纳粹德国还在秘密重整军备，欧洲对德国的恐慌情绪开始滋长。

1935年初，萨尔（Saar）盆地全民投票，以压倒性多数赞成加入德国。同年5月，希特勒公然撕毁《凡尔赛和约》中的裁军条款，下令德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德国继而启动了一项庞大的军备重整计划。国际联盟成员国什么也没做，它们都吓破了胆，尤其是法国。法国和苏联结成了同盟，而英国政府却选择和纳粹德国联合起来，并与之在1935年6月签订了《英德海军协定》。

这一系列做法造成了奇特的影响。法国认为英国抛弃了它，转头向意大利示好，而墨索里尼则认为大好时机已经来临，从而发动了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

1938年，希特勒率大军进入奥地利，宣布德奥两国合并。国际联盟再次妥协了。纳粹分子在奥地利发动了一场极为激烈和残酷的反犹太人运动。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沦为了纳粹扩张的下一个目标，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苏台德地区（Sudeten）德国人问题让整个欧洲都陷入了焦躁不安之中。英国的政策极大地帮助了纳粹德国，而法国则不敢唱反调。最终，法国迫于德国立即对其开战的威胁，不得不放弃捷克斯洛伐克这个盟国，而英国则是这次背叛行为的帮凶。根据英、法、德、意四国签订的《慕尼黑协定》（*Pact of Munich*），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就此被定格在了1938年9月29日。德国占领了苏台德以及周边地区，而波兰和匈牙利则利用这个机会，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地区。

在欧洲，势力划分的新格局就此形成，法国和英国沦为了二流强国，而希特勒治下的纳粹德国则不可一世，成了欧洲大陆的新霸主。

191 ——裁军

我曾经在信中提到，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大会以失败而告终。这场会议已经闭会，与会人员都已经打道回府了，他们都真心实意地希望能够在更加有利的情况下再次召集开会。

世界各国寻求合作的努力还遭遇了另一次巨大的失败，这次失败则是发生在裁军会议之上。裁军会议是《国际联盟盟约》的结果。《凡尔赛和约》决定德国（以及其他战败国，如奥地利和匈牙利）必须裁军。裁军国家不得保留海军或者空军部队，也必须控制陆军规模。除此之外，他们还进一步提议其他国家也应当随之逐渐裁军，从而或许能够将军备减少到足以保护本国安全的最低水平。裁军计划的第一部分，即德国裁军，立即生效并得以执行。然而，计划的第二部分，即所有国家普遍限制军备，从过去到现在仍然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正是为了实现裁军计划第二个部分的目标，才会在《凡尔赛和约》签订13年之后开始召集这次裁军会议。但是，在这次会议正式召开之前，筹备委员会已经花了数年时间对整个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

最终，世界裁军会议在1932年初召开了。这次会议旷日持久，会上的争辩没完没了，而与会代表们思考了许多提案，而这些提案最终都没有被采纳，还阅读了无数的报告。它简直就不像是一场裁军会议，反而几乎变成了军备会议了。这次会议没能达成任何协议，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准备从国际大局出发来考虑裁军问题，还因为每个国家都认为，裁军的意思是指在自己保存军事实力的同时，其他国家必须裁军或者减少军备。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持十分自私的态度，但是日本和大英帝国尤为过分，这两个国家都想方设法地设置各种巨大障碍，以阻止达成任何裁军协议。在裁军会议召开期间，日本公然蔑视

国际联盟，在满洲里发动了一场极为血腥的侵略战争，南美洲的两个共和国也正在忙着征战，而英国则继续派遣空军轰炸印度西北边境的部落。尽管美国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但是英国一直和日本交好，这一态度几乎完全抵消了美国的反对之声。

在众多提案中，苏联、美国以及法国的提案是最为重要的三大提案。苏联提出，全世界总军备量应当减少一半。美国提议，总军备量减少三分之一。但是英国对两大提案都表示反对，坚持认为英国绝不能削减军队，尤其是英国海军，因为这些军队都只是用于维持国内治安的。法国永远铭记着德国侵略所带来的伤痛，因此它一直强调“安全保障”，即就算不能够完全制止侵略行为，也应该做出一些安排，增加侵略行为实施的难度。它建议建立一支由国际联盟指挥的国际军队，在侵略发生时可以打击侵略者，而每个国家仅仅保留装备简单的小规模部队，空军也必须置于国际联盟的控制之下。但是这项提案同样遭到了反对，反对的理由是那些主导国际联盟的大国就会获得无上的权力，而实际上法国就将会借此称霸欧洲了。

谁是侵略者呢？这是个很难界定的问题，因为每个侵略者都惯常声称自己采取的行动是自我防卫行动。侵略满洲里的日本以及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意大利都不承认自己是侵略者。在世界大战期间，每个国家都把敌人称为侵略者。因此，如果要对侵略者采取行动的话，就必须清楚准确地定义“侵略者”这个概念。苏联提出了一种定义方式，根据它的定义，只要某个国家派军跨过边界进入他国，或者封锁了他国的海岸，这个国家就是“侵略者”。罗斯福总统以及国际联盟委员会也提出了相似的定义。在苏联和其邻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中采用了苏联对侵略者的定义。绝大多数国家，包括法国，都对这一定义表示赞同。当然，这一定义让日本感到十分窘迫，而英国则拒绝予以认可，它希望这个问题继续含糊不清。意大利则完全支持英国的态度。

英国也对裁军提出了建议，它的根本观点是英国不必削减军备，而其他国家必须削减军备。关于空中轰炸问题，各国都赞成完全禁止这一行为，但是英国增加了一条附加条件：“除了在偏远地区为了治安目的的行为之外。”这就意味着它可以随心所欲在大英帝国范围内进行轰炸了。其他国家不能接受这个附加条件，因此废除空中轰炸的提案未能通过。

德国很自然会要求和其他国家一样得到公平的对待，即要么必须允许它重整军备，达到其他国家保留军备的最低限度，要么其他国家必须削减军备，与德国裁军标准保持一致。这个争议却是永无答案的。难道《国际联盟盟约》没有说过德国裁军是普遍裁军的序曲吗？裁军谈判进行期间，纳粹在德国夺取了权力，他们的挑衅态度让法国害怕不已，也让它和其他国家坚定了立场。德国提出的选择方案都没有获得同意。

在幕后还有许多阴谋诡计在不断地上演着，尤其是那些武器生产企业支付高薪雇用的代理人手段百出，这就进一步加大了裁军的难度。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里，武器和毁灭性工具制造业是最红火的产业之一。这些武器生产企业为不同国家政府生产武器，因为一般来说只有政府才会发动战争，可是有趣的是，生产武器的企业都是私营的。这些企业所有者的富有程度简直让人难以想象，他们通常都和政府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之前的一封信中，我提到过巴西尔·扎哈洛夫爵士，他就是一位著名的军火商。军火企业的股份能够带来高额的回报，因此也成了众人追捧争夺的对象，许多社会名人都是这些企业的股东。

对这些军火企业来说，战争和战争筹备意味着丰厚的利润。它们所做的交易会造成巨大的死伤，它们没有任何政治倾向，只要付钱它们就会将杀伤性武器卖给买家。就在国际联盟对日本侵华表示强烈谴责之时，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兵工企业却不受任何限制，继续向日本

和中国双方售卖各种武器。显然，一旦动了真格要裁军，就会对这些兵工企业造成巨大的打击。它们的武器贸易就会停顿。因此，它们竭尽全力要阻止这场在它们看来是巨大灾难的事情发生。的确，它们所做的还不止这些。国际联盟专门指派了一个委员会去调查私人武器制造问题，这个委员会最终得出了结论；结论指出，这些企业一直都在积极地挑起战争恐慌情绪，并游说本国政府采用类似战争的政策。该委员会还发现，这些企业四处散播虚假报告，刻意夸大各国军备支出，从而诱使其他国家增加军备开支。它们试图挑起各国相互争斗，以推动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它们贿赂政府官员，买断报纸，以此影响舆论走向。它们还组建国际垄断组织以提高武器售卖价格等。委员会建议应当取缔私营的武器制造企业。裁军会议上也提出了这一建议，但还是再次遭到英国政府锲而不舍的反对。

各国的兵工企业相互之间联系密切。它们以爱国主义为幌子，总是铤而走险，但是它们自身的运作遍布全球，从而被称为“秘密国际组织”。这些利益所得者自然会强烈反对裁军，它们也的确在尽全力阻止任何协议的达成。它们的代理人进入了最高的外交圈子和政治圈子，这些邪恶人物显然已经抵达了日内瓦，正试图从幕后操纵整个局面。

各国的情报部门或者秘密组织通常与这个“秘密国际组织”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各国政府都雇用特工从他国窃取秘密情报。这些特工有时会失手被捕，而本国政府却会迅速撇清和他们的关系。1927年5月，亚瑟·庞森比（Arthur Ponsonby，几年前，他曾是英国外务部副外长，现在成了庞森比勋爵）曾在众议院的一次发言中提到了这些特工组织。他说道：“当我们满口仁义道德、盛气逼人时，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伪造、偷窃、欺骗、贿赂以及腐败却是任何外交部门以及各国外交大臣无法避免的行为……我想说，按照世界公认的道德准则，如果我们在海外的外交代表在他国档案中没有翻查出秘密，那么他们就是玩忽职守了。”

因为这些秘密机构都是秘密地工作，因此它们很难控制。它们能够对各自国家的外交政策造成巨大的影响。它们都是势力庞大、权力惊人的组织。现今英国的情报机构也许是最为强大的，所造成的影响也是最为深远的。比如，根据记载，一位有名的英国间谍竟然成了苏联的高官。塞缪尔·霍尔爵士（Sir Samuel Hoare）是英国内阁大臣，战时他是英国情报与特工部门在苏联的最高负责人。最近他骄傲地公开表示，他一手打造的情报获取体系十分先进，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地获知了拉斯普廷遭谋杀的消息。

裁军会议面临的真正困难在于，与会各国分属两大阵营，即心满意足的国家和不满现状的国家，赢得控制权的国家和受到压制的国家，或者希望维持现状的国家和那些寻求改变的国家。两者相互对立，因而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均衡局面，就像统治阶级和压迫阶级无法和平共处，社会局面不可能真正稳定下来一样。国际联盟总体上代表的是赢得控制权的国家，因此它尽力维持现状。安保协议以及定义“侵略者”的努力都是为了维持现有局面。不论发生任何事情，也许国际联盟都绝不会斥责任何一个控制它的国家是侵略者的。它总是会玩弄手腕，将另外一方称之为“侵略者”。

和平主义者和希望避免战争的人对这些安保协议表示欢迎，因此他们无形中帮助维持了不公平的现状。如果在欧洲是如此的话，亚洲和非洲的情形就会更加严重。在非洲，帝国主义国家吞并了大片土地，因此继续维持亚非地区的现状就意味着要它们继续处于帝国主义的剥削之下。

至今为止，美国在欧洲既没有加入任何联盟，也未做出任何承诺，来帮助维持当前的现状。

没有什么比裁军努力的失败更能证明国际政治的不真实和虚假歪曲了。每个人都大谈特谈和平，但是又在为战争做着准备。《凯洛格-

白里安公约》规定战争为非法行为，但是现在还有谁还记得或者关心这些呢？

说明：在裁军会议之前，德国的提案就遭到了拒绝。1933年10月，德国退出裁军会议，也退出了国际联盟。从那之后，它不再是国际联盟成员国了。日本也因满洲里问题退出了国际联盟，意大利也因国际联盟对其入侵阿比西尼亚的事件表示谴责而退出了国际联盟。从此三大强国都退出了国际联盟。在这种情况之下，国际社会几乎不可能在国际联盟支持之下就裁军问题达成决议了。的确如此，在裁军会议结束后不久，各国都开始大规模地重整军备。德国开始建立起一支庞大的陆军和空军，而英国、法国、美国和其他国家都纷纷增加军备投入。

192 ——罗斯福总统走马上任，收拾残局

我想让你再看看美国的情况，然后这段故事就该收尾了（我不能再拖沓下去了）。美国现在正在实施一场精彩绝伦的伟大社会试验，引起了全世界的密切关注，这是因为这场试验的结果将会决定未来资本主义体制的走向。请允许我再次重申，美国是迄今为止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最强，国库最为充盈，其工业技术也是遥遥领先于他国。它只有国债，却没有外债。它的对外贸易规模相当庞大，并且还在不断增长，但是比起巨大的国内贸易而言，对外贸易仅仅占很小的份额（仅相当于国内贸易的15%）。它的国土面积几乎与整个欧洲大陆一般大，但是两者之间千差万别。欧洲大陆上小国林立，它们都在边界线上设置了很高的关税限制，而在美国广袤的领土上却没有这样的贸易壁垒。因此，美国比欧洲更容易发展巨大的国内贸易。与欧洲大陆上那些经济困难、债务缠身的国家相比，美国占尽了优势。它拥有充足的黄金储备、大量的资金以及丰富的商品。

对美国来说，形势一片大好，可是资本主义危机缠上了它，击溃了它所有的骄傲。生机勃勃、精力充沛的美利坚民族陷入了阴暗的宿命之中。这个国家总体上仍然十分富有，金钱并未消失，但是集中到了极少数人的手中。纽约的富有程度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大银行家J. 皮尔庞特·摩根（J. Pierpont Morgan）仍然得意地炫耀着他的私人豪华游艇，有报道称这艘游艇总共耗资600万英镑。但是，近来纽约被描述成了“饥饿镇”（Hunger Town）。实际上芝加哥这类超大城市已经破产了，完全没有能力向当地员工支付工资。然而，正是这个濒临

破产边缘的芝加哥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的会展，而这场“世界博览会”的主题还是“进步的世纪”。

这种强烈的反差不仅仅出现在美国，在伦敦各处（当然不包括贫民窟），你可以轻易地发现，英国上层社会仍旧富得流油，生活极度奢靡。然而，在兰开夏郡，在英国北部、中部以及威尔士和苏格兰的部分地区，你也会看到大批失业人员排起了长队，他们面容消瘦，非常憔悴，生活极为痛苦。

近年来，美国社会的一大显著特点就是犯罪率在上升，尤其是“黑帮”活动。这些暴徒拉帮结派，常常把碍事之人枪杀了事。据说，自从美国通过一项禁止销售致醉饮品的法律以来，犯罪率便飞快地飙升了。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这个所谓的“禁酒令”就正式生效了，一方面是因为大企业主们希望工人们不要饮酒，要专心生产。但是，有钱人自己无视这条法律，继续非法从国外获取酒精饮料。巨大的酒精饮料非法贸易就此慢慢地发展起来了。这种交易被称为“贩卖制造违禁饮品”，它既包括从国外走私葡萄酒和烈性酒，也包括酿制私酒。比起酿酒厂的产品，这些秘密酿造的私酒口感极差，对健康的影响更甚。高价销售私酒之处被称作“轻松聊天”（Speak-easy），在美国各大城市中，这些地下酒吧就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出来。当然，这些都是非法行为。有的警察和政客会接受贿赂，沦为这些非法交易的保护伞，而他们有时还会遭到胁迫，不得不睁只眼闭只眼。在美国，很多人并不尊重法律，由此黑帮势力日益猖獗。一方面，禁酒令是对工人和农民有益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巨大的“贩卖制造违禁饮品”利益集团就此发展起来了。这场禁酒运动把美国分成了“干的”和“湿的”两大阵营，前者支持禁酒令，而后者则反对禁酒令。

最恶名昭著的黑帮犯罪事件是他们绑架富人家的孩子，索要高额赎金，这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动。最开始的时候，林德伯格家

的婴儿就遭到绑架，并遭到了残酷杀害，这次事件令人发指，也让国际社会惊恐不已。

美国贸易陷入萧条，社会动荡不安，许多政府高官和大企业家日益腐败，能力欠缺，这一切的一切都触动着美国人脆弱的神经，让他们心烦意乱。1932年12月，美国举行总统大选，这一次美国国民大多将选票投给了罗斯福，希望他能够给他们带来曙光。罗斯福是属于“湿的”阵营，也是一位民主党人，然而在美国历史上，极少有总统是出自民主党的。

对比不同国家的情况，牢记它们各自的显著特点，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也是极为有益的。因此，我们很容易就会把美国最近发生的事情与德国和英国的情况进行对比。美国和德国更加相近，因为这两个国家工业程度都很高，农业人口也很庞大。德国的农业人口占其总人口的25%，而美国则是40%。两国的农民阶级都影响着其国家政策的制定。但是，英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在英国，农业人口数量较少，几乎被忽略不计，尽管现在也在努力振兴他们的力量。

战后德国纳粹运动兴起，造成这种情况的一大显著原因，就是越来越多的下层中产阶级失去了一切，尤其是通货膨胀加快了他们贫困潦倒的进程。在德国，正是这个阶级具有了革命性。而现在在美国，不断发展壮大的阶级恰好正是下层中产阶级。这个阶级被称为“白领无产阶级”，以区别于工人无产阶级，而这个阶级却从未享受到白领的生活。

其他可比较之处包括货币危机，马克、英镑和美元脱离金本位，通货膨胀以及银行倒闭。英国并未出现银行倒闭现象，这是因为其国内小银行寥寥无几，而数家大型银行控制了英国的银行业。就其他方面而言，在这三个国家中，事态的发展轨迹十分相似。德国最先遭遇危机，其次是英国，最后轮到美国。基本就是同一个阶级在德国支持着纳粹，在英国的1931年大选中支持了英国联合政府，而在1932年11

月的美国大选中，他们投票支持了罗斯福总统上台执政。这个阶级正是下层中产阶级，他们中许多人曾经是支持其他政党的。但是，我们绝不能更深入地进行比较，不仅因为国家差别，还因为英国和美国的形势还并未发展到德国那般严重。但是，重要的问题是，对这三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造成巨大影响的经济因素非常相似，因而其所造成的结果也可能会无甚差别。法国（或者其他国家）却并非如此，因为法国的工业不够发达，它更多的是一个农业国。

1933年3月初，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随即面临着巨大的银行业危机以及远未消退的大萧条。数周后，在他就任的一场演说中，他描述了美国当前的局势，指出这个国家正在“逐渐消亡”。

罗斯福立即果断地行动起来，向美国国会申请获得处理银行、工业以及农业问题的权力。国会已经被这场危机搞得心慌意乱，再加上美国民众大力支持罗斯福的行动，因此国会同意给予他这些权力。他简直就是一个集大权于一身的独裁者了（不过他可是民主人士呢），每个人都指望他能够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措施，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他的行动就像闪电般迅猛，所采取的各种举措在数周内就彻底改变了整个美国，也让美国人民对他更有信心了。

罗斯福新政的大体内容包括：

1. 下令放弃金本位，允许美元贬值，以减轻债务者的负担。这实际上是通货膨胀的做法。

2. 给农户发放经济补贴，减轻他们的压力，并向农业提供一笔高达20亿美元的巨额贷款，缓解农业问题。

3. 立即招募25万名工人从事植树造林以及防治水患等建设工作。这一举措稍微缓解了失业问题。

4. 要求国会拨款8亿美元用作失业救济，国会对此予以了同意。

5. 留出一笔高达30亿美元的借款用于公共事业建设，以此解决工人就业问题。

6. 立即废除禁酒令。

这些资金是从美国富人那里借来的。罗斯福总统的全部政策过去是，现在也是要提高美国人民的购买力。人民有钱就会消费，那么贸易萧条问题自然会减轻。考虑到这个目标，他才会大量开展公共事业大型项目，让失业工人能够重新就业并领取工资。也正是因为这个目标，他才会一直努力提高工人收入，并减少他们的劳动时间。工人工作时间的缩短就意味着企业需要雇用更多的工人。

这种态度与危机和萧条时期工厂主通常的做法完全相反。这些工厂主几乎总是会削减工资并延长工作时间，以此来降低生产成本。但是，罗斯福说，如果我们想要重新恢复大规模生产，那么我们必须要大幅提高工人工资，增强他们的购买力。

罗斯福政府也向苏联提供了一笔贷款，是为了让苏联有能力购买美国的棉花。两国政府也正在商讨着美苏两国大规模实物交易的可能性。

美国从来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国家，支持竞争，不设任何限制，正是一个所谓的强调“个人主义”的国度。罗斯福的新政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商业进行了各种干涉。因此，尽管说法不同，实际上他却把国家调控的众多手段都引入了资本主义制度中。这的确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措施，政府对劳动时间和条件进行调整，对工业大加控制，并制止恶性竞争。他将这种手段称为“制定并监督计划实施的协作手段”。

罗斯福正以美国人所特有的矢志决心和蓬勃精力推动着这项工作的进行。童工已经完全废除（即不得雇用年龄低于16岁的孩子进行劳

作）。喊出的口号是“更高的工资”、“提高收入，减少工作时间”。这场运动被称为“推动繁荣运动”（Prosperity Push）。据报道，在美国全境，这项运动的动员攻势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整个美国就像一幅巨大的宣传海报。空中滑翔机在四处盘旋，向雇主等发出呼吁。每个大型产业都被劝说，要求制定“规章”、确定提高工人工资等条例，并承诺要贯彻实施。如果它未能制定适当的规章，那么政府就会客气地威胁要代替它来完成这项任务。政府也要求个体雇主签订保证书，承诺将会提高工人工资并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政府会为那些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雇主颁发荣誉徽章，并且会在每个城镇的邮政局保留一份荣誉榜，以此让那些逃避责任之人感到羞耻。

在这些举措得以实施之后，产品价格得以回升，而贸易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真正的改变是商业信心和士气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美国人的挫败感几乎完全消失，美国大众，尤其是中产阶级，都对罗斯福总统充满了信心。人们已经将他和美国的历史伟人林肯总统相提并论了，后者也是在美国内战这一重大危急关头就职美国总统的。

甚至在欧洲，罗斯福总统也开始成为许多人心中崇拜的对象，他们期望他能够领导世界走出大萧条的阴霾。但是，在世界经济大会上，他引起了多国代表的不满，这是因为他要求美国代表拒绝美元和黄金挂钩的要求，也不接受任何可能干扰他在美国实行新政的事情。

罗斯福的政策无疑是经济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他一心想要改变美国的局面。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对此深表不满，尤其是银行家们更是满心怨怼。英国政府并不赞同罗斯福的进步团体，他们更喜欢大财团。

但是罗斯福比他的前任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去。在裁军问题以及其他国家问题上，他态度明确，具有前瞻性，远远胜过了英国。他言辞有礼地向希特勒发出警告，希特勒也因此稍微收敛了自己的行为。他也与苏联建立起了联系。

今天的美国，甚至世界其他地区所面临的重大疑问是：罗斯福会成功吗？他做出了勇敢的尝试，想要恢复资本主义的活力。但是他的成功意味着大财团将会被赶下神坛，而这些大财团绝不可能乖乖地任人宰割。美国的大财团被公认为是现代社会势力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它绝不可能仅凭罗斯福总统一声号令就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力或特权。在目前的局面下，罗斯福总统呼声极高，深得民意，大财团迫于压力不得不保持沉默。但是它一直都在静等机会。如果在几个月内，罗斯福的新政并未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改变，民众就有可能会反对罗斯福，而大财团就会顺势而上，给他当头一击。

许多优秀的观察者都认为，摆在罗斯福总统面前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绝不可能获得成功。他的失败将会让大财团重新回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还会得到比过去更大的权势。这是因为，罗斯福所施行的国家社会主义机制会随即被利用，沦为大财团牟取私利的工具。美国的工人运动力量薄弱，是很容易遭到镇压的。

说明：在克服危机、促使资本主义适应新形势方面，罗斯福总统的伟大尝试取得了部分成功，尽管他并未带来根本性的改变。糟糕的局势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实际上，他的改革是基于两点的：其一，是通过政府推行大型救济项目；其二，是规劝雇主提高工资并缩短劳动时间，以此让工人们能够享受到少量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利润。以福特公司为首的众多雇主对此坚决抵抗，它们认为这是对它们自由的干涉。《工农业法案》（*The Codes for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难以推行，美国各地罢工活动频发。但是美国工人增强了力量，产生了阶级意识，具有了新的精神。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工会。

美国经济逐渐复苏，大财团变得气势汹汹，极力阻挠罗斯福总统的行动。最高法院宣布，在罗斯福总统提出的两大法案《国家工业复兴法案》（*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和《农业调整法

案》（*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中，绝大多数有效条款都是违背美国宪法的，应为无效法案。从此罗斯福的新政遭到了破坏。

1936年，罗斯福以压倒性多数选票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他与大财团的斗争仍在继续。国会已经不在他的控制之下，国会在许多问题上都与罗斯福产生了严重分歧。

193 ——议会的衰落

我们已经较为细致地审视了近年来发生的诸多大事，认真思考了正在塑造着当今这个多变世界的各种力量和趋势。在那些十分明显的事实中，有两个现象是我早就提到过的，但是还有待进一步讨论。这两个现象是：战后工人阶级和旧式社会主义的失败，以及议会的失败或者衰落。

我早就告诉过你，在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之时，组织严密的工人运动是如何遭到失败的以及第二国际是如何分崩离析的。战争突然爆发，各国大受震动，激烈的民族情绪被点燃了，各民族都短暂地陷入了疯狂之中，这一切都足以成为充分的理由。在过去的四年里发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更加发人深省。在这四年里，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衰退，使工人阶级越来越深地陷入了苦难之中，可是，世界各国，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工人大众并未因此产生真正的革命情绪。

陈旧的资本主义制度显然正在不断地崩溃。客观地说，就外部因素而言，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变的条件似乎已经完全成熟了。但是，那些本应最渴望迎接这场变革的人，即工人阶级，完全没有革命的意愿，就连保守的美国农民都比他们更具有革命情绪。我也曾经反复告诉过你，在绝大多数国家中，下层中产阶级比工人阶级更加激进，这在德国尤为明显。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地区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尽管程度要低于德国。这种程度上的差异是由国家的不同特点以及它们处在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而造成的。

为什么那些在战后初期曾经表现得非常激进和革命的工人阶级，现在却变得如此沉默，甘愿屈从于未来可能会面对的命运呢？为什么德国社会民主党未做任何反抗，任由纳粹势力将之彻底消灭呢？为什么英国工人如此温和保守，而美国工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呢？工人领袖常常因为其能力低下以及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背叛而饱受诟病。他们中很多人无疑活该挨骂，看到这些人最后投敌变节，把工人运动当作满足个人野心的踏脚石，实在是让人痛心不已。虽然不是什么令人高兴的事，但是机会主义始终存在于人类活动的各个范围。但是，利用无数饱受蹂躏和苦痛之人的希望、理想和牺牲来牟取个人私利，这样的机会主义行为是最可怕的人类悲剧。

领袖也许应该受到谴责，但是他们毕竟是现有局势催生出来的产物。一个国家通常得到它真正需要的统治者，而一场运动的领袖最终证实的确代表着这场运动真正的目的。事实上，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领袖和他们的追随者并未把社会主义当作生活信条，他们都不认为这是必须马上追求的目标。他们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纠缠太深，与之简直密不可分。他们从对殖民国家的剥削中分得一杯羹，期望资本主义制度能够继续存续，让他们享受到更高的生活标准。社会主义是太过遥远的理想，是人们梦想中的天堂，是未来而非现在。正如过去对天堂的认识一样，它也成了资本的仆人。

正是如此，各国工党、工会、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以及所有类似的组织对变革之事毫不关心，偶尔小打小闹，浪费了大好时机，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毫发无损。理想已然弃它们而去，它们完全沦为了臃肿的官僚机构，没有了灵魂，失去了真正的力量。

新生的共产党在一个全新的地方诞生了。它向工人阶级传递出信息，展示了其蓬勃的生机和非凡的吸引力，而在它的身后矗立着强大的苏联，让人不由得心驰神往。即便如此，它取得的成效也是少之又少。它未能成功地鼓动欧美劳工大众参与革命。在英国和美国，它的

力量尤为薄弱。在德国和法国，它得到了一些力量，但是我们发现它并未从中获益，在德国尤为如此。在这段漫长的时期，贸易萎靡不振，危机反复发生，工资低得可怜，而失业则是司空见惯，那么为什么共产党还会无所作为呢？这实在难以解释。

有些人说，共产党采用的策略太过低劣，工作方法出了差错。又有一些人提出，共产党与苏联政府牵扯过甚，因此它执行的政策不像是国际政策，更像是苏联的国策，本来它采取的政策应该是具有国际性的。也许这就是导致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吧，但是这个解释根本无法让人满意。

这个共产党未能发动工人阶级，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共产主义思想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无论在何处，甚至在那些坚决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里，人们既心生恐惧，却也满怀期待，认为这场危机也许会无可避免地催生共产主义。人们普遍认为，旧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快要走到穷途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下，人们牟取私利，贪得无厌，发展没有规划，生产铺张浪费，冲突与矛盾不断发生，这样的经济必会消失。而某种计划性的社会经济或者合作经济必会建立起来，将其取而代之。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工人阶级的胜利，因为国家也能采取半社会主义的方针来组织社会经济，为统治阶级谋取更大的利益。国家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只是一回事而已。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是谁？从中获益的又是谁？有产阶级的群体是哪个阶级？

知识分子们争论不休，而西方工业国家中的下层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则采取了行动。这些阶级隐约感到他们遭到了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剥削，因此对后者感到相当憎恶。但是他们更害怕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会夺取统治地位。资本家常常和法西斯势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认为唯有法西斯才能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慢慢地，几乎每个恐惧共产主义的人都投靠了法西斯主义。就是这样，只要在某个国家中，

资本主义遭遇危机，受到或者可能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法西斯主义就会迅速发展起来，尽管这种情况在不同的国家中程度各有不同。夹在这两者之间的议会制政府崩溃了。

我们看到了我在本封信开篇就提及的第二个显著现象，即议会的失败或衰落。在前面的多封信中，我已经向你大量描述了许多国家的独裁统治以及旧式民主制度的衰亡。这在俄国、意大利、中欧各国以及现今的德国已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在德国，议会制政府甚至在纳粹掌权之前就已经崩塌了。在美国，国会已经赋予了罗斯福总统绝对的权力。甚至在法国和英国，这个过程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在这两个欧洲大国里，民主传统历时最久，也最为稳固。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下英国的情况。

英国的行事方式与欧洲大陆诸国截然不同。通常，他们都会努力保持原有的面貌，因此变化总是不怎么显著。在一个普通的观察者眼中，英国议会一如往昔，但是事实上，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下议院直接行使权力，每个议员都有决定权。现在唯有内阁或者政府才能就大事件做决策，而下议院只能对这个决策表示赞同或者反对。当然下议院可以反对，以此推翻政府，但是他们极少会采取这种极端的行为，因为这会造成很大的麻烦，还得重新进行大选。因此，如果政府取得下议院中绝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它就能够自由行事，并让下议院认可，从而将其定为法律。因而从过去到现在，权力逐渐从立法层面转移到了行政层面。

不过，现在议会的工作也相当多。当今世界问题错综复杂，因此议会逐渐只能决定各种措施或法律的一般原则，而这些措施或法律的具体实施则交给政府或者具体的政府部门来进行，这也已经成了国家运作的普遍惯例。正是这样，行政层面则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可以在紧急状态下自由行事。而议会的身影则从国家重要事务中慢慢淡去了。现在，它的主要功能正在缩减，只能批评政府措施、质询以及最

终批准政府的基本政策。哈罗德·J.拉斯基（Harold J. Laski）曾说过：“我们的政府已经得到了行政独裁权，出于对议会反抗的恐惧，才略微收敛了自己的独裁行为。”

1931年8月，工党政府突然解散，这一事件的发生十分奇特，显示出议会已经遭到了排挤。通常，如果英国的执政政府解散了，其原因必定是遭到下议院的彻底反对。但是，在1931年，下议院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它对当前事件一无所知，甚至就连大多数内阁成员也是如此。拉姆齐·麦克唐纳总理与其他政党领袖进行了秘密的谈话。他们参见了国王，随后旧内阁突然消失，而报纸即刻宣布新的内阁成立了！旧内阁的一些成员还是从报纸上才知道了这个消息的。这个程序太过不同寻常，是完全不民主的，就算最终下议院批准了这个既成事实也无法改变这点。这完全就是独裁的办法。

一夜之间就改朝换代了，工党政府垮台，而联合政府上位了。在这个新政府中，保守党占据了主要地位，少数自由党党人和工党党人的存在只是为了给这个政府披上一层“联合”的外衣。拉姆齐·麦克唐纳继续任总理，尽管他受到了工党的强烈谴责，并遭到了该党的彻底除名。由于保守党害怕社会主义变革影响过大，也许会动摇统治阶级的地位，或者给他们带来过大的压力，因此联合政府就应运而生了。这次事件发生在1931年8月，当时英国遭受了巨大的经济危机，随后导致英镑脱离了金本位。其后果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力量得到了加强。联合政府宣称，如果工党继续执政，中产阶级的毕生积蓄就难以保住。它利用中产阶级的恐惧心理，让绝大多数惊恐不安的小资产阶级转而对它表示支持。麦克唐纳和他的支持者称，除了联合政府之外，仅有一条道路可选，那就是共产主义。

因此，在英国，旧式的民主制度也已经崩溃了，议会正在逐渐走向衰落。一旦国家不得不面对那些左右民众情绪的关键问题时，如宗教冲突、民族或种族矛盾（纯正雅利安血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

矛盾）或者根本性的经济矛盾（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民主制度就会遭到舍弃。你应该还记得，1914年，在爱尔兰，阿尔斯特与其他地区爆发了宗教民族冲突，但英国保守党竟然拒绝了议会的决定，甚至还怂恿它们打内战。因此，只要貌似民主的程序符合统治阶级的目的，他们就会加以充分利用，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如果这一程序阻碍了他们的行动，危及他们的特权和利益，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舍弃民主，转而开始实施独裁。保不准将来英国议会中绝大多数议员都会支持进行全面彻底的社会变革。如果触碰到了既得利益，这些利益所得者可能会抛弃议会，甚至还会重复他们在1914年阿尔斯特事件的做法，鼓动反抗议会的决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议会和民主有助于维持现状，统治阶级才会需要它们。当然，这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只不过是利用民主的思想来达到违背民主的目的而已。真正的民主不可能有机会存在至今，因为在本质上，资本主义体系和民主是相互矛盾的。如果民主真正意味什么的话，那么民主就意味着平等。它不仅是指人人都有平等的投票权，还意味着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平等。资本主义却与之截然相反，它意味着少数人拥有经济权力，并利用这一权力牟取私利。他们制定法律，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地位，他们规定任何违犯法律的人都是法律和秩序的破坏者，必须受到社会的惩罚。因此，在资本主义体系之下从未有平等可言，自由必须受到保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法律的严格限制。

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之间的矛盾是与生俱来、永不停息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常常进行误导性宣传，采用如议会这样的外在民主形式，并向其他阶级施以小恩小惠，让他们多少能够满足于现状，这些行为蒙蔽了人们的双眼，将这个矛盾深深地隐藏了起来。当统治阶级已经没有恩惠可施，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决战的时刻就会到来，因为他们争夺的是国家的经济大权，这才是真正关键的东西。当事情走到那一步时，分属不同政

党的资本主义制度支持者们将会紧紧联合起来，共同反击触及他们既得利益的威胁。自由主义者和类似的团体就会彻底消失，而民主的形式也会被抛到一边。现在欧洲和美国已经走到了这一阶段，而在大多数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法西斯主义则代表着这一特定的阶段。在世界各地，工人阶级已经处于守势，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抗再次发展壮大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可是，非常奇怪的是，资本主义体系自己却摇摇欲坠，难以适应这个崭新的世界了。看上去十分确定的是，即使资本主义制度幸存下来，也必然会改头换面，表现出更加冷酷无情的一面。当然，这将会是这场漫长的斗争中的下一个阶段。因为，在任何一种资本主义形式之下，现代工业和现代生活都会是激烈的战场，总有不同阵营在永无休止地相互厮杀。

一些人认为，如果各国政府的当权者是少数明智的人，那么所有的问题、冲突和苦难都能避免了，目前的种种都是那些政客的愚蠢和无赖行为造成的。他们认为，如果有道德之士能够团结在一起，他们就能够对邪恶之人进行道德规劝，指出他们行为的错误，让他们改邪归正。这是一种误导性的想法，因为这不是个人的错误，而是整个体系的问题。只要这个体系仍然存在，那么个人就必然会这样做。那些占据主要地位或者特权地位的集团，要么是统治他国的外国民族组织，要么是国内的经济集团，通过迷人的自欺和虚伪狡诈的伎俩，让他们自己相信，这些特权都是他们应得的报答。他们把那些想要挑战他们地位的人看作恶棍，看作现有稳定局面的扰乱者。我们不可能说服统治阶级，让他们相信自己的特权是不公正的，更不可能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特权。也许有时我们可以说服个人，当然这也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们永远不可能说服群体。因此，摩擦、冲突、革命以及无限的苦难和不幸，终将是不可避免的。

194 ——对世界的最后审视

对我而言，只要能够源源不断地向我提供纸和笔，我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写下去。我们的世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成人和儿童时而快乐，时而悲痛，时而充满爱心，时而满心憎恶，人类彼此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因此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记录是永无止境的。在我们生活的当下，生活的步伐似乎更为迅速，远胜往昔，而生活的节奏也更为紧迫，变化则是一个接着一个，让人目不暇接。甚至就连我现在所写的事情都在发生变化，我今天所写的也许已无新意可言，而到了明天也许就会完全不合时宜了。生命的河流永不停息，缓缓地流淌着，有时，正如当下，会翻起惊涛骇浪，无情地向前奔流着，完全不顾我们微小的愿望，对着我们这些渺小的存在发出残酷的嘲笑，肆意摆弄我们，弃之如湍急水流中打转的稻草。它不断地向前奔腾，无人知晓它将流往何方，也许会流到悬崖峭壁之上，最后倾泻而下，化为万千细流，又或是汇入那浩瀚而神秘、壮观而平静、变化多端却又始终如一的大海。

我当初并没有打算要写这么多信，这已经超出了我必须要做的范围。我完全停不下来了。在经历了多年的迷惘恍惚之后，我们终于走完了最后这个漫长的阶段。我们已经走过了今日，站在了明日的门槛上，好奇地思考着当明日变为今日之后世界又会是什么样子。让我们停下脚步，再看看我们生活的世界吧。时间是如何来到1933年8月17日这一天的呢？

在印度，圣雄甘地再次被捕入狱，关押在耶拉伏达监狱之中。众多革命者重新展开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尽管这次运动采取的是极为克制的方式，但是我们的同志还是为此再次锒铛入狱了。25年前，我

初到剑桥时，结识了贾廷德拉·莫汉·森古普塔（Jatindra Mohan Sen-Gupta），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这位勇敢而可敬的同志已经离开了我们，在英国政府的监狱中走完了人生的历程。虽然生命在逐渐地消逝，但是让印度人民的人生更具意义的伟大事业永远不会停止。无数印度的英雄儿女被投进了监狱或者收容所，这些革命者精力充沛，大多天资聪颖，他们耗尽青春，穷尽力量，奋力反抗着这个奴役着印度的现行体系。也许在建设的过程中，生命和力量已然消逝，这个世界还有许多未竟的事业。但是，建造之前必然会有毁灭，去扫清一切障碍，让新建筑顺利拔地而起。我们是不可能在残垣断壁之上建起一栋辉煌的大厦的。我们可以从印度孟加拉邦某些地区的情况窥见当今印度的全貌，在这些地区，就连穿衣打扮都要严格遵循政府的命令，不按规定就会被捕入狱。在吉大港，甚至就连12周岁及以上的小男孩（也许还有小女孩）都必须随身携带身份证以备查验。我不知道世界其他地区是否也曾实施过这种非同一般的法令，纳粹横行的德国有过吗？那些遭到敌军占领的战区有过吗？在英国的统治之下，今日之印度的确已经沦为手持假释许可证的囚徒。穿过印度的西北边境，英国的飞机正在大肆轰炸我们的邻国。

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得不到任何尊重，其他国家从不欢迎他们。这完全不足为奇，试问：在国内都得不到尊重的人，如何能在国外得到尊重呢？虽然这些印度人在南非出生并成长，虽然他们辛勤地建设了某些地区，尤其是纳塔尔（Natal），但是他们遭到了无情的驱逐。肤色偏见、种族憎恨以及经济矛盾等种种因素让这些印度人成了南非的遗弃者，他们没有家园，也找不到避难所。他们必须被装船送离，要么去英属圭亚那，要么回印度，或者去其他地区，没人理会他们是否会饿死；按照南非联邦政府的说法是：只要他们能永远从南非土地上滚开就行。

在东非，印度人在肯尼亚（Kenya）和周边地区的建设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在那里也是不受欢迎的，不仅是因为非洲

人民的反对，还因为当地一小撮欧洲种植园主不希望他们待在那里。最好的地区，如高地，都是为这些种植园主保留的，不论是非洲当地人还是印度人，可能都无法拥有那里的土地。可怜的非洲人民生活更为艰难。原本他们拥有全部土地，土地也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然而大片土地被收归政府所有，而政府又无偿地把这些土地分给来自欧洲的移民。现在这些移民或种植园主成了当地的大地主。他们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其他的税赋也根本不用缴纳。税赋的重担几乎全部落在贫困潦倒、饱受蹂躏的非洲人民身上。让非洲人民缴税并不容易，因为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因此，他们生活的必需品，如面粉和衣服，都附加了税费，只要他们购买这些商品，就会间接缴税了。但是最不同寻常的税赋则是对所有年满16周岁的男性非洲人和他的赡养人（包括女性）直接征收住房税和人头税。税收的原则是人们得为他们所赚取或者所拥有的东西缴纳税费。非洲人民实际上一贫如洗，就连他们的身体都成了缴税的对象！如果他一文不名，那么他该如何支付每年每人12先令的人头税呢？这就是这一税赋的狡猾之处，因为它迫使非洲人民不得不为欧洲种植园主劳作，以换取缴纳人头税的钱。这不仅是剥削的手段，更是为种植园带来廉价劳力的花招。因此，为了挣到足够缴纳人头税的工资，这些不幸的非洲人民有时还得长途跋涉，从离种植园700到800英里之遥的内陆地区来到位于海岸线上的种植园（内陆地区没有铁路，海岸附近也少有火车）。

这些受尽压榨的非洲人民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向外界发出自己的呼声，关于他们我还可以讲述很多悲惨的故事。他们的苦难遭遇简直罄竹难书，但是他们默默地承受了。那些欧洲移民无偿地获得了原本属于非洲人民的肥沃土地，这些可怜的人民被赶出家园，最终沦为了欧洲人的佃户。这些欧洲移民成了半封建地主，他们无情地镇压了一切他们讨厌的活动。非洲人不能结社，更别说支持改革了，因为任何募集资金的活动都受到严令禁止。甚至还有一项法令禁止跳舞，就是因为非洲人偶尔会在唱歌跳舞中模仿取笑欧洲人的行为方式！一贫如

洗的非洲农民既不能种植茶叶，也不能种植咖啡，因为这会对欧洲种植园主造成竞争。

三年前，英国政府庄严地宣布他们托管非洲，保证非洲人民将来不会失去自己的土地。去年肯尼亚发现了黄金，不幸就此降临到非洲人民的身上。神圣的诺言瞬间被抛诸脑后，无数欧洲种植园主争相涌入这片土地，驱离非洲农民，开始到处挖掘黄金。英国的承诺也就到此为止了。他们又称，目前的一切行动最终都是为了非洲人民的利益，这些人民是很乐意失去土地的！

开采金矿的资本主义做法极为奇特。淘金者都会分到一块划定的区域，只能在这片区域中寻找黄金。在这小块地上，淘得多少黄金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运气。这完全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做法。显然，开采金矿的最好办法似乎应该是国家政府控制金矿并进行作业，应该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着想。苏联就是这样处理塔吉克斯坦和其他地区的金矿开采问题的。

在我们最后的调查中，我提到了肯尼亚的一些情况，这是因为在之前的信件中我们完全忽略了非洲。要知道，自几百年以前以来，这片非洲各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广袤大陆就开始遭到外来者的残酷压榨，直到现今也未曾摆脱这种悲惨的命运。非洲人民极为落后，这是因为他们一直受到压制，没有机会向前发展。最近，非洲西海岸成立了一所大学，他们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取得了极其令人瞩目的进步。

关于西亚诸国，我已经说了很多了。它们和埃及一直在为本国的自由而斗争，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所处的阶段也各有不同。在东南亚、印度支那与印度尼西亚，如暹罗、印度支那半岛、爪哇、苏门答腊岛以及菲律宾群岛，情况也是如此。在这片区域中，除独立的暹罗外，斗争都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反对外国统治；二是饱受蹂躏的阶级强烈要求社会平等，或者至少能够改善经济状况。

在远东地区，中国巨龙伏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无助地哀号，内部的纷争让它支离破碎。它一边受到共产主义的深深吸引，一边又受到猛烈的拉扯，阻止它倒向共产主义。与此同时，日军已然长驱直入，其势头几乎锐不可当，牢牢地将中国的大片领土控制在手。但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扛过了无数次可怕的侵略和危机，它无疑必能战胜日本侵略者。

日本帝国主义仍是半封建制国家，深受军国主义思想的支配，工业高度发达。在封建色彩浓重却又十分现代先进的奇特国度里，滋生出了建立大日本帝国的疯狂野心。虽然日本的梦想很宏大，但是背后的现实十分残酷。日本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崩溃，其岛内人口极度膨胀，生活却悲惨困苦，但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无人居住区拒绝接收日本移民。现代国家中最强大的美国非常敌视日本，这也极大地阻碍了日本实现自己的梦想。在亚洲，苏联强有力地遏制了日本侵略扩张的步伐。在满洲里，越过深邃的太平洋，许多目光敏锐的观察者已经能够看到大战的阴影正在不断地逼近。

整个北亚地区都属于苏联的疆域，它也正在专心致志地计划和建设新的世界秩序和社会秩序。十分奇怪的是，这些曾经被文明进程远远抛下的落后地区，这些封建势力还大行其道的落后地区，却可以一举实现跨越，甚至将西方的发达国家都甩到了身后。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至今仍然极大地威胁着摇摇欲坠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世界中，贸易衰退萧条，经济萎靡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危机不断重现，资本主义制度陷入了瘫痪状态，旧秩序正在苟延残喘；然而此时，在苏联的大地上，苏联人民正非常积极地投身于社会秩序的建设事业之中，到处都充满了希望，一派生机盎然、激情洋溢的景象。苏联政权的蓬勃活力以及取得的成就是如此令人赞叹，吸引着世界各地有识之士的目光。

另一片广阔的国度美国却代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面对着巨大的困境、危机、罢工以及空前严重的失业问题，它做出了勇敢的尝试，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正在努力挽救资本主义体系。这场伟大试验的成效还有待观察。虽然遭遇了危机，但是美国优势明显，它的国土广袤，物质资源丰富，技术水平也极高，远远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它的人民技术娴熟、训练有素，不管可能会发生任何事情，它所拥有的一切优势都是无法夺走的。美国和苏联都必定会在将来的世界事务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还有广袤的南美大陆，分布在这片大陆之上的拉丁语系国家呈现出与北美完全不同的风貌。与北美截然不同的是，南美洲没有种族歧视，成为多种民族的大熔炉，南欧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黑人以及美洲大陆原住民红印第安人等都融洽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在加拿大和美国，红印第安人几乎完全消失了，但是在南美大陆，尤其是委内瑞拉（Venezuela），这个种族的数量仍然相当惊人，他们大多居住在远离大城市的地区。一些南美城市，如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以及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不仅规模十分庞大，而且景色十分宜人，城内还有许多宽阔的林荫大道，你也许会对此感到很惊讶。布宜诺斯艾利斯是阿根廷的首都，人口250万；里约热内卢是巴西的首都，人口接近200万。

尽管南美洲是民族大熔炉，但是这里的统治阶级仍然是白人贵族。国家通常是由那些把持着军队和警察队伍的派系或者集团在统治；我也告诉过你，南美国家的上层经常发生各种革命政变。南美国家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因而可能都会十分富有。但是与此同时，它们深陷债务的泥潭。四年前，美国停止向它们提供贷款，它们的经济状况立马糟糕得一塌糊涂，拉美各国国内纷纷爆发革命。南美三大国（所谓的“ABC三国”），即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也遭遇了严重的财务困难，从而也不可避免地涌现出了革命的浪潮。

自1932年夏天以来，南美洲发生了两场小型战争，但是就像日本对满洲里发动的战争一样，它们的官方说法都不会是“战争”。自从《国际联盟盟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以及其他一系列公约签订之后，战争几乎就很少发生了。一个国家侵略他国、屠杀他国公民的行为被称为“冲突”，那些公约是不禁止“冲突”的，这样每个人都会满意这种情况！这些小型战争没有什么国际影响，比如满洲里战争，但是它们可以证明那些被大肆称赞的世界和平机器，无论是国际联盟还是无数的公约和协议，是多么软弱无力。当国际联盟的某个成员国入侵另一个成员国时，国际联盟要么眼睁睁地看着，要么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努力，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其中，为了争夺一块名为查科（Chaco）的丛林，玻利维亚和巴拉圭（Paraguay）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或者称“冲突”。一位法国智者曾经说过：“玻利维亚和巴拉圭抢夺查科丛林的争斗让我不禁想到两个秃子为了一把梳子大打出手的故事。”这场争斗确实很愚蠢，但还不至于愚昧到这个程度。这片广阔的丛林牵扯着石油利益问题，而且流经这片丛林的巴拉圭河（River Paraguay）将玻利维亚和大西洋连接到了一起。这两个国家都拒绝妥协，因而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

另一场冲突是哥伦比亚和秘鲁为争夺一个遭到秘鲁非法侵占的莱蒂西亚（Leticia）村庄所爆发的战争。我认为，国际联盟曾对秘鲁的行为提出过严厉的批评。拉丁美洲（这里也包括墨西哥）信奉天主教。在墨西哥，国家政权和天主教牧师之间发生了多次冲突。与西班牙一样，墨西哥政府想要限制罗马教廷在包括教育等几乎所有领域中的强大权力。

南美洲的语言是西班牙语，巴西除外，因为巴西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繁荣发展起来了，至今仍是世界最主要的语言之一。这门语言音调优美，铿锵有力，为世界贡献了

瑰丽的现代文学宝藏。而现在由于南美洲广泛大量地使用西班牙语，西班牙语也由此成了极其重要的商业用语。

195 ——战争的阴云

在前一封信中我们快速概览了亚洲、非洲和美洲大陆。我们还剩下欧洲没有讲。尽管欧洲麻烦不断，争斗不休，但是它也拥有许多优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英国都是最主要的世界强国，但是它现在早已丧失了传统霸权，正在竭尽全力维持现状。在过去，海上霸权曾给它带来了国家安全和主导地位，让它能够借此建立起庞大的大英帝国，但是现在已经不复旧时的荣光了。就在不久前，英国海军的规模和实力都远超其他两大强国。但是，时至今日，它也仅仅只能说和美国海军实力持平，一旦有必要，美国可以驱动国内资源，迅速扩大其海军规模，将英国远远地抛在身后。现今空军实力比海军力量更为重要，在这个方面英国仍然处于弱势。有好几个国家都拥有比英国更多的战斗机。英国的贸易霸权早已成为历史，完全没有恢复原状的希望了，英国庞大的出口贸易也正在逐渐衰退。英国试图通过设置高关税和贸易优先权，为自己的商品保留了大英帝国范围内的市场。这种做法本身就意味着它放弃了发展帝国之外全球贸易的夙愿。即便它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获得了成功，也不可能重新夺回传统的霸权地位了。它的霸权已经永远消失了，甚至就连它在帝国内部所取得的有限成功，也不知道能达到什么程度或者还能持续多长时间。

在英国与美国激烈的决战之后，英国仍旧保留了其世界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伦敦城仍是金融汇兑的中心市场。但是，由于世界贸易大幅萎缩，进而呈现出消失的迹象，这个胜利的果实正在失去一切光彩和价值。英国和其他国家竞相实施经济民族主义、关税壁垒等一系列政策，为这场世界贸易萎缩的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

即便庞大的世界贸易得以继续，并且现有的资本主义体系能够保存下来，纽约无疑最终也会取代伦敦，获得全球金融领导权。但是在这个结果出现之前，资本主义体系很有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

英国素来十分善于适应各种变化，但是这个前提条件是它的社会基础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并且它的统治阶级也能够维持自己的特权地位。它的适应能力究竟能否让它顺利地度过这次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仍然还有待继续观察。这场变革的发生绝无可能是悄无声息、毫无冲突的。那些实权和特权阶层不可能自愿放弃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与此同时，英国已经很难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了，只能逐渐地收缩自己的实力，重新回到帝国之内，而它不得不同意对格局进行重大变革，以此来维持大英帝国的存续。英国的自治领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尽管它们在许多方面都与英国的金融体系紧紧地拴在了一起。为了向日益壮大的自治领示好，英国只得牺牲许多利益，但是它们之间也出现了许多矛盾和冲突。澳大利亚与英格兰银行彻底地捆绑到一起，出于对日本侵略的恐惧，它更加紧密地依靠着英国。加拿大的工业不断发展壮大，具有了与英国一些产业竞争的实力，它拒绝做出任何让步。与此同时，它与其强大的邻邦美国也进行了频繁的往来。南非对大英帝国并不感冒，尽管它也早已忘却了过去的伤痛。爱尔兰坚持维护自己的利益，与英国之间的贸易战仍在持续。英国对爱尔兰的商品课以重税，本意是想要恐吓爱尔兰，迫使它屈服，却完全没想到这种行为适得其反。英国给爱尔兰的工农业施加了沉重的压力，却让后者基本上成了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国家。大量新建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野草蔓生的荒地再次变成了种植粮食的土地。过去常常出口英国的食品现在全部用来供应本国居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德·瓦勒拉成功地证实他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今日的爱尔兰十分激进和大胆，完全不遵从《渥太华协定》，让推行帝国政策的英国感到十分头痛。因此，英国很有可能并未从与其自治领的贸易联系中获得很多利益。它能从印度那里得到很多利益，因为印度

仍然是一个广阔的市场。但是印度的政治状况以及经济困境对英国的贸易来说都不是有利的条件。把人民投入监狱的做法并不能迫使他们购买英国商品。斯坦利·鲍德温先生最近在曼彻斯特指出：

> 我们命令印度并要求它在何时何地购买商品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善意是贸易的保证。我们绝不可能采用武力恫吓的办法向印度强卖商品。

除了印度的内部问题之外，在印度、亚洲其他地区以及一些自治领中，英国还不得不面对着来自日本的激烈竞争。

因此，英国正在努力将大英帝国变为一个经济整体，并把那些与之达成协议的小国（如丹麦以及斯堪的纳维亚诸国）都纳入其中，以此来维持目前的状态。它必须采用这样的政策，已经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便是要在战争时期保护自己，它也必须得更多地实现自给自足。因此，它现在也在大力发展农业。现在没人敢说这种经济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能够获得成效。我已经提出过许多会阻碍成功的困难。如果这个政策失败了，大英帝国的整个格局必然会彻底崩溃，而英国人民则将不得不接受生活水平降低的现实，除非他们能够转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但是，就算这个政策取得了成功，它也会带来万分危险的局面，它也许会造成许多欧洲国家经济崩溃，这是因为它们的贸易找不到足够的市场来消化。然而，英国的债务国一旦破产，也会转而危害到英国的地位。

英国也必定会与日本和美国发生经济冲突。它与美国在许多领域都在激烈地竞争，而在当今世界，各国力量一定是此消彼长的，拥有庞大资源的美国必然会趁着英国衰退之机奋力向前发展。这个过程的结果只能是英国默默地接受失败，或者它做出最后的努力，想要通过战争来保护它曾经拥有的一切。但是，它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来对抗它的竞争者了。

英国的另一大对手是苏联。它们实施着完全相反的政策，相互怒目而视，在欧洲和亚洲大陆上钩心斗角。这两个大国也许会暂时相安无事，但是它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们代表着全然不同的理想。

英国是满足于现状的，因为它已经得到了一切想要的东西。它害怕会失去这一切，这一恐惧当然事出有因。它利用国际联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努力维持现状，从而保护现有的地位。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英国或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扭转的。今日之英国无疑十分强盛，但是这个帝国主义强国的确也在日益衰落。我们都清楚地看到，这个伟大的帝国已然日薄西山了。

跨过英吉利海峡我们来到了位于欧洲大陆之上的法国。法国同样也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它在非洲和亚洲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就军事而言，它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注]它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同时一些国家也唯法国马首是瞻，这些国家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可是法国对德国的军国主义精神深感恐惧，尤其是在希特勒夺取德国统治大权之后。希特勒的确促使资本主义的法国和苏联之间的感情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们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因此变得相当友善起来。

在德国，纳粹恐怖统治仍在继续，每天都有大量关于纳粹暴行的新报道。很难说这种残暴的统治还会持续多长时间。它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并且也没有显现出任何减弱的迹象。这种镇压的手段绝不是一个稳定政府得以建立的标志。如果德国已经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那么欧洲早就已经爆发了一场战争了。这场战争也许迟早会出现。希特勒很爱说他是抵御共产主义的最后一道屏障，这也许是千真万确的，因为目前在德国，除了希特勒主义之外，共产主义就是唯一可选的道路了。

墨索里尼控制下的意大利对国际政治事务的态度十分冷酷、现实和自私，它从来不像其他国家那样热衷于伪善地宣扬和平和善意。它竭力备战，因为它确信战争不久之后就将打响，同时它也采取各种举措，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作为一个法西斯国家，它对德国法西斯表示欢迎，并与希特勒党徒们保持着友好关系。但是它反对德国政策中德奥合体的野心。如果德国和奥地利合二为一，德国就会直接与意大利接壤，墨索里尼是不希望看到意大利与纳粹兄弟德国隔得那么近的。注

中欧地区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小国，这些国家都深陷经济衰退的困局之中，饱受世界大战后遗症的影响，而现今还在希特勒以及纳粹分子的威胁之下感到惶恐不安。在这些中欧国家中，尤其是在奥地利这类拥有大量德裔国民的国家中，纳粹组织正在不断地发展势力。但是反纳粹情绪也在不断产生，所造成的结果必然是矛盾冲突。目前，奥地利正是这场争斗的主要战场。

我想应该是在1932年，当时那些位于多瑙河流域的三大亲法中欧国家，即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以及南斯拉夫，结成了同盟。这三个国家都在战后解决争端的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利益，它们都一心想要维持当前的状况。因此它们团结到一起，缔结了一个事实上的战争联盟。这就是所谓的“小协约国集团”（Litle Entente）。由这三个国家组成的小协约国集团实际上形成了欧洲的一大新势力，而这个力量是亲法反德的，并对意大利的政策表示反对。

纳粹在德国的胜利对小协约国集团和波兰发出了危险的信号，因为纳粹不仅想要重新修订《凡尔赛和约》（这是每个德国人的愿望），而且还满口鼓动开战的言论。为了修改和约，纳粹的言论和策略十分激进和暴力，甚至让奥地利和匈牙利这些国家都深感恐惧。出于对希特勒主义的恐惧，那些曾经相互憎恨的中东欧国家开始慢慢地联合到一起，比如小协约国集团、波兰、奥地利、匈牙利以及巴尔干

地区各国。它们甚至还讨论过共同建立经济同盟的事情。自从纳粹势力在德国日益猖獗以来，这些国家，尤其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对苏联表现出更加友好的姿态。因此，数周之前，它们和苏联签订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

之前我就说过了，西班牙最近爆发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难以平息，它似乎在另一场变革的边缘彷徨。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欧洲就是一盘诡谲的棋局，民族之间冲突不断、憎恨不休，而国家之间则是相互竞争和仇视。关于裁军的谈判还在没完没了地进行，可是世界各国都在继续武装自己，大批可怕的杀伤性新型武器正在不断问世。国际合作的谈判数量多得惊人，召开的会议也是数不胜数。但是都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国际联盟本身就是可怜的失败者，世界经济大会这一团结全球力量的最后努力也没有取得任何成效。有人建议欧洲各国或者是除了苏联的欧洲应该共同组建“欧洲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Europe）。这个所谓的“泛欧洲”运动实际上是要形成一个反苏阵营，以及解决因为小国林立而带来的无数困难和混乱。但是，由于民族憎恶太过强烈，所以没人重视这个提议。

事实上，国家之间渐行渐远。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快了，因为贸易萧条和世界危机迫使所有国家都走上了经济民族主义的道路。每个国家都躲藏在高额关税壁垒之后，尽可能将一切外国商品赶出本国市场。当然不可能把所有外国商品都赶出去，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地自给自足，或者说，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生产一切所需的产品。但是各国都准备要种植或者制造一切所需的东西，这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趋势。由于气候原因，有些国家也许不能生产出部分必需品。例如，英国就不能种植棉花、黄麻、茶叶、咖啡等许多需要在更加温和的气候中生长的植物。这就意味着贸易将会基本局限于气候状况不同的国家之间，从而可以种植和生产不同的物品。制造同种物品的国家

将很少使用对方的商品。因此南北贸易将会大行其道，而东西贸易则会消失，因为南北之间才会出现气候差别。热带国家可能会与温带或者寒带国家进行贸易，但是两个热带国家或者温带国家则不会进行贸易。当然也许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因素，比如矿产资源。但是总体来说，南北气候差异将会是国际贸易中主要考虑的因素。而其他所有的贸易将会遭到关税壁垒的阻断。

现在全球似乎出现了一个必然的趋势，正在向着所谓的工业革命最后阶段前进。而在这个时期，世界各国都已经充分实现了工业化。亚洲和非洲的确还远未实现工业化。非洲太过落后和贫困了，完全不能消化任何工业制品。可能继续消化外国商品的三大区域分别是印度、中国和西伯利亚。外国工业国家都眼巴巴地望着这三个广阔的潜在市场。它们都已经被赶出了原先占有的许多市场，因而纷纷思考要“进军亚洲”，在亚洲卖掉本国的剩余商品，从而继续支撑起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体系。但是现在剥削亚洲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了，一方面是因为亚洲各国也在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竞争也日益激烈。英国想要让印度成为英国商品的销售市场，但是日本、美国和德国也想从中分得一杯羹。中国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而且，中国国内局势十分混乱，恰当的通讯手段相当匮乏，这进一步加剧了贸易的难度。只要给予苏联贷款并不要求它立即偿还，苏联也愿意向国外购买大量的工业制品。但是很快苏联也会自己生产几乎一切它所需要的物品。

国家之间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国际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这一直是过去全球发展的总趋势。尽管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仍旧存在，但是一个规模庞大、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与贸易格局发展起来了。这个过程不断地发展，到后来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发生了抵触。下一个必然的步骤将是发展国际社会主义格局。辉煌一时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走到了最后阶段，它应该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社会主义制度了。但可惜的是，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心甘情愿地主动退出的。

由于遭受了危机和崩溃的威胁，资本主义已经缩回到保护壳里，试图扭转过去的趋势，打破相互依存的发展进程。经济民族主义从此浮出水面。但是经济民族主义会成功吗？即使成功了，又能持续多久呢？

这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各国之间相互争斗，相互戒备，形势纷繁复杂、纠缠不清，新的趋势接踵而来，而冲突之源也在不断增加。在每个大陆之上，在每个国家之中，弱者和被压迫者都希望能够分享他们参与创造的一切生命中的美好事物。他们要求偿还他们的债务，这笔债务是他们早就应该收回的。在某些地区，他们采取了十分激进的做法；而在其他地区，他们的做法则相对温和。在长期遭受不公的对待和残酷的剥削之后，如果这些悲愤的人做出了一系列令我们讨厌的举动，难道我们还能责怪他们吗？他们被忽略和蔑视，没有人会自找麻烦来教会他们基本的礼仪。

弱者和被压迫者发起的动乱让统治阶级感到无比恐惧。全世界的统治阶级串通一气，想要镇压这场巨变。因此法西斯主义蔓延开来，而帝国主义镇压了所有的反对势力。关于民主、人民福祉以及托管的动听言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统治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开始进行赤裸裸的独裁统治，而这种做法在许多地区似乎都取得了胜利。一个更加残酷的时代出现了。在这个时代里，铁腕人物频频涌现，暴力统治横行，因为无论何处，新旧秩序都在展开着生与死的较量。纵观全球，无论是在欧洲、美国还是在印度，风险都在增大，而旧政权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尽管当前它看起来似乎还很坚固。一旦整个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体系的根基开始动摇，甚至已经不能履行任何责任或者达到任何要求，不彻底的改革是不可能解决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的。

无数的政治、经济和种族矛盾让当今世界阴云密布，上空一直笼罩着战争的阴霾。据说，最根本的矛盾是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绝对没有妥协的余地。

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如此多的主义！在它们身后，机会主义也是如影随形！但是也有许多心怀理想主义的人。他们并非是凭空幻想，天马行空，而是想要为伟大的人类目标而奋斗，想要实现人类社会的伟大理想。萧伯纳曾经在某本书上写道：

> 人生真正的快乐，在于你自认有一个伟大的生活目标；在于被扔进垃圾堆之前完全发挥了自己的力量；在于自己是自然界的力量之一，而不是无病呻吟、自怨自艾，只懂得埋怨世界，怪它没有倾尽一切让你感到愉快。

通过对历史的探究，我们知道了世界是如何变得越来越紧凑的，世界各部分是如何联系在一起而且互为依存的。当今世界的确已经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现代历史不再是散乱的国家历史了，我们早已超越了那个阶段。如果要让我们书写的世界历史有意义，就必须将其作为唯一的主线，将所有国家串联到一起，并力图找到推动国家发展的真正力量。

甚至在过去，即使国家与国家之间因为地理等许多屏障被隔离开来，它们也受到了共同的国际和洲际力量的深刻影响。伟人总能留名史册，这是因为人为因素在任何命运的危急时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比个人力量更为强大的是那些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巨大力量，它们几乎毫无目的地、有时又是冷酷无情地在向前迈进，在伟大力量的驱使之下，渺小的人类只能随波逐流。

这就是我们生存的当今世界。巨大的力量影响着万千人类，它们就像地震或者其他自然巨变那样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论我们如何努力，我们也不可能阻挡住它们前进的步伐，也许在我们的小天地里，我们可能对它们产生细微的影响，让它们放慢步伐，或者改变它们前进的方向。在遭遇这些力量时，不同性格的人有着不同的反应：

一些人深感恐惧，而其他人则对此表示热烈欢迎；一些人试图与之斗争，而另一些人则无助地屈从于命运的摆弄；还有一些人想要迎风破浪，略微控制这些力量，为它们指引方向；这些人甘愿自冒风险，享受积极参与这一伟大进程的无上乐趣。

对我们而言，20世纪是个动荡不安的世纪，没有和平可言；20世纪已经逝去的三分之一时间满是战争和革命。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曾说：“这是一个革命的世界，历史事件本身就是推动我们向前的巨大力量，就像难以平息的意志。”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也警告我们不要妄想和平和安逸的生活，他说：“显然，20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动荡不安的世纪。那些一心想要追求和平安逸生活的同代人，压根儿就不应该出生在这个时代。”

这个世界正在经历阵痛，而战争和革命的阴云沉重地压在人们头上。如果我们不能摆脱我们的宿命，我们又应该如何面对它呢？要像遇到危险的鸵鸟一样消极逃避吗？还是干脆勇敢地参与到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面对一切可能面对的风险和困境，享受投入一场伟大冒险活动的乐趣，感受“我们与历史的步伐一致”的自豪呢？

我们，或者至少是在思考的人，都在满怀期盼地展望未来，看着未来逐渐展开在我们的面前，变成了现在的一切。一些人满怀希望，等待着结果，而另一些人则惊恐不安。这会是一个更加公平和快乐的世界吗？在这个世界里，生命中的美好事物是否都不再仅仅属于少数人，而是让大众都能够自由享受呢？抑或这个世界还会比当今世界更为严酷，而世界文明发展所带来的许多舒适便利在残酷的毁灭战争之后就会彻底消失呢？这是两种极端情况，两种情况都可能会发生，似乎不可能有折中的路线。

我们在等待和观望的时候，也在为我们所期望的世界而努力奋斗着。人类之所以能够从野蛮阶段进化到文明社会，是因为人类从不会

无助地屈服于自然法则，常常会奋力反抗，渴望控制自然，让它为人类的利益服务。

这就是现在。创造明天是你和你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全世界无数孩子正在成长，也正在努力学习，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明天。

---

1. 法国在德国重整军备之后就不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了。在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法国几乎沦为了二流强国。它在中欧的联盟也已经完全破裂。

2. 1938年3月，德国入侵并吞并了奥地利。墨索里尼迫于形势对此表示认可，但是意大利对这个变化表示强烈反对。

196 ——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我们就讲到这里吧，漫长的历史故事结束了。我不用继续往下写了，但是我想要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所以我忍不住再次提笔写了一封信，就是这最后一封信。

我的两年监狱生涯就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也该停笔了。从今天算起，还有33天我就要获释了。如果我不那么快出狱，狱卒有时就会拿不让出狱威胁我。两年的时光还没有走完，但是我获得了三个半月的减刑，这是一切表现良好的囚犯都会得到的待遇。我应该被当作表现良好的犯人吧，事实上我可什么都没做，怎么就得到了这样的名声？我的第六次刑期结束了，我又将回到广阔的天地中，但是去做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绝大多数朋友和同志都还困在狱中，而这个国家似乎就是最大的囚笼。

我写好的信件简直堆积成山了！我用掉大量印度自产的墨水，在印度自产的纸张之上洋洋洒洒地写个不停。我想知道，这值得吗？这些纸张和墨水所传达的信息是否能引起你的兴趣呢？当然，你肯定会说：“会的！”因为你认为否定的回答会伤害我的感情，而你是那么爱我，是不会愿意冒这种风险的。但是不管你是否对它们有兴趣，你也不会让我舍弃写作所带来的乐趣，我可是在这两年漫长的铁窗生涯中每天都在孜孜不倦地伏案写作呢。我入狱的那天已是冬季。冬去春来到，春日却又太匆匆，夏日热浪袭来，抹杀掉了春日的一切痕迹。土地晒得焦干，人和动物都热得透不过气来，季风季节终于到来了，天空哗啦啦地降下新鲜而冷凝的雨水，带走了夏日的焦躁。随后，秋天来了，秋日的天空清澈蔚蓝，天高云淡，秋日的午后是那么惬意舒畅。一年的季节更迭已经结束了，它又再次开始循环往复：冬去，春

来，夏至，还有雨季。我默默地坐在狱中，写信给你，心中对你万分思念，我看着四季更迭，光阴流逝，静听着雨滴打到我囚室屋顶所发出的噼啪声——

> 啊，这雨声多凄清，
>
> 敲打地面和屋顶！
>
> 对于烦恼的心灵，
>
> 雨之歌多么凄清！注

19世纪英国杰出的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曾写道：“有些遭流放和囚禁的人，就算他们得以幸存，也会感到悲苦绝望；而文学家们也许就会把这段日子看作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写到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这位17世纪著名的荷兰法学家及哲学家被判了终身监禁，但是他在两年后成功地越狱了。在狱中的两年时间里，他潜心撰写哲学和文学著作。除了他之外，还有许多有名的文学家沦为了囚犯，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堂吉诃德》的作者、西班牙人塞万提斯以及《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的作者、英国人约翰·班扬（John Bunyan）。

我不是文学家，我也不想说我的监狱岁月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是我必须承认，阅读和写作让我能够愉快地度过这些漫长的日子。我不是文人，也不是历史学家，那么我究竟是什么人呢？我发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很多事情上我都不够专注。我大学时先学的理科，随后又转而学习法律，再后来我的兴趣变得十分广泛，最终竟随了印度社会的大流，锒铛入狱，但这可是在印度最司空见惯的职业了！

你绝不能把我在信中所写的内容看作任何问题的最终结论。政治家想要在任何问题上都有发言权，他常常装作洞悉一切的样子，但实际上远非如此。他必须要接受密切的审视！我所写的信件不过就是由一根薄弱主线贯穿起来的肤浅梗概罢了。我在信中东拉西扯，跳过了许多世纪，略过了无数重要事件，最终停留在我感兴趣的方面，搭起炉灶，细火慢炖地写了起来。你应该注意到了，我的喜恶是非常明显的，当然有时还会夹杂着我在狱中的情绪。我不想让你轻信信中的一切，因为我的记述中也许的确有许多谬误。监狱可不会备有图书馆或者参考书，这个地方可不是进行历史题材写作的最佳场所。我的写作依靠的基本上是大量的笔记，这些笔记是12年前我首次入狱以来慢慢收集起来的。我也曾带了许多书进监狱，但是这些书不能长久地留在我身边，我不可能在这里建一个图书馆。我还厚着脸皮抄袭了这些书中列举的史实和提出的思想，所以我所写的没有任何的原创性。也许偶尔你会发现很难理解我信中的描述。直接跳过去，不要纠结。有时我也会灵光闪现，忍不住写起这些本不该由我来写的历史。

我给你提供的只不过是最简单的概述而已。这不是历史，它们不过是对过去漫长历史的快速一瞥。如果你对历史感兴趣，如果你感受到了历史的奇妙，你就会自愿地大量阅读书籍，解开联系各个时代的线索。但是只读书还不够。如果你想了解过去，你就必须带着同情和理解来看待过去。要了解一位历史人物，你就得深入理解他所处的环境，即他的生活状况以及他的思想。那种用现在的情况和思想来判断历史人物的做法是十分荒谬的。比如，在当今世界，奴隶制度受到彻底的反对，但是伟大的柏拉图则认为奴隶制度是极其必要的。近些年来，无数人拼命地想要保留美国的奴隶制度。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待历史，这是每个人都愿意承认的。但是没人认为使用过去的标准来评判现在也是同样荒谬的做法。尤其是各种宗教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将传统信仰和习俗完全固定了下来，这也许在其诞生的特定年代和国度中产生了某些积极作用，但是对当今时代则极其不合时宜了。

如果你能带着同情的眼光来看待过去的历史，你就会发现枯燥的历史也会变得无比生动丰富起来。你会看到，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之中，无数人（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走在自己特定的历史轨迹之上，他们不同于我们，但又与我们极为相似，都拥有同样的人类美德和弱点。历史不是一场魔术表演，但会给那些洞察历史的人带来不可思议的魔力。

来自历史艺术长廊中的无数画面纷纷涌入我们的脑海。埃及——巴比伦——尼尼微——古印度文明——雅利安人来到印度并散布到整个欧亚大陆——中国的灿烂文化——克诺索斯和希腊——罗马帝国和拜占庭——阿拉伯人成功地穿越了两个大陆——印度文化的复兴以及衰落——鲜为人知的美洲玛雅文明以及阿兹特克文明——蒙古铁蹄横扫世界——欧洲中世纪以及那些美轮美奂的哥特式大教堂——伊斯兰教传到印度，莫卧儿王朝开始其统治——西欧文艺复兴——发现美洲大陆以及开拓东方航线——西方列强开始侵略东方——大型机械问世，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工业化进程加快，欧洲获得世界主导权，帝国主义猖獗横行——现代世界的科学奇迹。

这些伟大的帝国崛起又陨落，遭到后人的彻底遗忘，直到它们的遗迹被孜孜不倦的探索者从深深的沙土中挖掘出来，才再次回到人们的视线里。这些帝国早已烟消云散，但是许多奇思妙想流传至今，仍然生机勃勃，带来了更加深远的影响。

Egypt’s might is tumbled down

Down a-down the deeps of though;

Greece is fallen and Troy town,

Glorious Rome hath lost her crown,

Venice’pride is nought.

But the dreams their children dreamed

Fleeting, unsubstantial, vain,

Shadowy as the shadows seemed,

Airy nothing, as they deemed,

Tese remain.

权势滔天的埃及摇摇欲坠，

慢慢地跌入了人们记忆的深渊；

希腊陨落了，特洛伊之城化为了废墟，

辉煌的罗马已经失去了头上的桂冠，

威尼斯的骄傲已然荡然无存。

但是这些城市中的孩子们的梦，

虽然被认为是虚无缥缈、难以捉摸、毫无用处，

好比地上的阴影，一文不值，

却流传至今。

玛丽·柯勒律治（Mary Coleridge）如此吟唱着。

过去给予了我们大量丰厚的馈赠。的确，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如文化、文明、科学以及对部分真理的了解，都是从古到今的历史给予我们的馈赠。我们的确对过去负有义务。但是我们的责任或者义务并非只限于过去，我们也对未来负有责任，也许这个责任还要比对过去的责任更加重要。因为过去已然过去，早已成为定局，是我们无力扭转的。而未来还在路上，我们也许还能稍微对它产生一丝影响。如果我们在过去已经得到了部分真理，那么还有许多真理隐藏在

未来，我们还得一一寻找。但是，过去总是那么顽固，它将我们紧紧地攥在手心，对未来怀着深深的忌恨。我们必须与过去斗争，奋力挣脱它的束缚，跌跌撞撞地向着未来前行。

有人说，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学到许多教训；也有人说，历史绝不会重复。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如果我们只是盲目地模仿，或者眼巴巴地盼着它重复发生、一成不变的话，我们是什么都学不到的。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探寻，努力去发现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我们就一定能够从中受益。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可能得到直接的答案。卡尔·马克思说过："历史不会提供过去问题的答案，它只会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

在过去，人们心怀信仰，盲目地相信这一切，从未产生过任何疑问。如果以前的建筑师、建设者和人民大众没有拥有如此虔诚的信仰，他们就不可能为后世留下如此宏伟的寺庙、清真寺以及大教堂。他们恭恭敬敬地将一块一块的石头堆积起来，在上面雕刻出美丽的图案，他们的虔诚由此可见一般。古老寺庙的尖塔、清真寺的细长光塔以及直指上苍的哥特式大教堂，带着万般虔诚，似乎每一块石头都饱含着对上苍恭敬的祈祷，这些建筑体现出古人心中深深的信仰，虽然我们现在缺乏这样的信仰，但是也会对它们产生无限的景仰之情。但是信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石头的魔力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许多寺庙、清真寺和大教堂仍在继续修建，但是它们已经失去了中世纪时期使其具有无限生机的精神了。它们就像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商业大楼一样，体现的是时代的精神。

我们的时代与之全然不同。这是一个精神幻灭、充满困惑和迟疑的时代。我们已经抛弃了许多古代的信仰和习俗。无论是在亚洲、欧洲还是在美洲，都已经没有了信仰。因此我们找寻着新的途径，新的、与我们所处环境融合在一起的真理。我们相互质疑，不断争论，提出了无数的"主义"和哲学。就像在苏格拉底时代，当今时代的人

们也怀疑一切，但是这种怀疑已不再局限于雅典这样的一座城市了，现在这已经成了全球的普遍现象。

有时，这个世界缺乏正义，充满痛苦、野蛮残暴，让我们深感压抑，满心绝望，看不到任何出路。像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不到任何希望，我们只能做到真诚以对。

哦，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真诚！
因为这个世界，这个似乎
如梦境般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
这个如此多彩、美丽而新鲜的世界，
其实并没有欢乐、光明和爱，
也没有确信、安宁和对苦难的拯救；
我们在世，犹如在一片昏暗的荒原，
纷争和溃逃的惊恐在荒原上交织，
愚昧的军队于昏暗中在荒原上争斗。注

但是如果我们深陷于如此阴郁的想法，我们就不可能从人生或历史中获得有用的教训。因为历史能让我们了解发展、进步以及人类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人生是多姿多彩的，尽管它也会沼泽遍布、泥泞不堪，但是我们还能看到大海、高山、白雪、冰川、美妙的星空（尤其是在监狱里！），享受来自家人和朋友的关爱、投身于共同大业的同志之情、优美的音乐、精彩的书本以及伟大的思想。我们也许会如此感叹：

上帝啊，虽然我居住在地球之上，是地球的孩子，但是我也是浩瀚星空之子。注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赞叹宇宙的瑰丽，愉快地生活在这个充满思想和想象的世界里。但是如果我们沉溺于安逸的生活，逃避他人的痛苦，罔顾他们的遭遇，那么这就没有一点同情鼓励之举了。想要证实自己的合理性，就必然会转化为行动。“行动是思想的结果。”我们的朋友罗曼·罗兰（Roman Rolland）如是说，“任何不付诸行动的思想都是背叛，都是枉然。如果我们是思想的奴仆，那么我们必须也是行动的奴仆。”

人们逃避行动，常常是因为他们害怕行动所带来的后果，因为行动意味着风险和威胁。远远看去，危险是那么可怕，但是如果走近一观，看起来就不那么恐怖了。它还是会令人感到愉悦的伴侣，给人生带来激情和乐趣。如果按部就班地生活着，就会时常感觉枯燥，我们将太多东西看得过于平常，不能从中获得任何快乐。可是，如果我们暂时失去了它们，我们又会再次感受到人生之中这些再普通不过的事物究竟有多么珍贵！许多人喜欢攀登高峰，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体验征服险峰、克服苦难所带来的喜悦与豪情。由于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感触危险，因此他们的感官就变得更加敏锐，那种命悬一线的生活所带来的快感则会更加强烈。

我们都可以自由选择，要么为了人身的安全，选择居住在浓雾弥漫的山谷之中，要么勇敢攀登高峰，与危险相伴，但能呼吸高处纯净的空气，远眺美景，并迎接新升的太阳。

在这封信中，我大量引用了名言和诗句。在信件的末尾处，我还想要引用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诗句。下面的诗句或者祷告出自泰戈尔的《吉檀迦利》（*Gitanjali*）：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

进入那自由的天国，

我的父呵，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罢。[注]

亲爱的，我们已经讲完了，最后一封信完结了。

最后一封信！

当然不是。我将会继续写下去。但是这个系列已经结束了，就这样吧。

---

1. 译文引自阿尔图尔·兰波诗作《泪洒落在我心底》，郑克鲁译。——译者注
2. 译文引自《多佛海滩》，曹明伦译。——译者注
3. 这是亨利·纽波特爵士（Sir Henry Newbolt）所写《最后的谜》（The Final Mystery）的一句。——译者注
4. 译文引自《吉檀迦利》，冰心译。——译者注

致英迪拉

英迪拉：

岁月并不是什么很吸引人的东西。然而，岁月却将万事万物放在了恰当的位置上，这样一来，我们或许就可以在头脑里对这些事物进行排序了。一份长长的时间清单一定会让人很沮丧。在后面你会看到，我用不同的形式对一些重要的日子进行了排列。世界的不同部分是由不同专栏呈现的，当你看到某个特定阶段或日子时，你就能对那个时候世界的样子有一个粗略的了解。当然，这种了解将非常非常粗略。这张世界史年表只适合做参考。完成了这张年表后，现在我觉得我本来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但是，我目前将继续使用这张年表，因为它代表了我几天的辛苦工作。

爸爸

台拉登监狱

1933年8月22日

世界史年表

对于人类历史最早期的阶段，有时是纯粹的猜测，有时是非常难以确定的，千百年来甚至专家们的看法都不尽相同。迄今发现的最早期的人类文化遗迹是公元前5000多年的，也就是大约7000年前的。埃及历史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开端，也是石器时代的结束。此后，埃及被分裂成若干小的城邦。考古学家们在迦勒底或埃兰（美索不达米亚）还发现了一处早期的文明遗迹，大约是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它的首都是苏萨。大部分考古发现都是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因为大部分的挖掘工作都是在这两个地方进行的。可能某个时期的类似发现也会出现在其他国家。另一批考古学家发现了大约是公元前3500年的遗迹，正好印证了这个观点。这些发现带领我们穿越了整个亚洲：从埃及——迦勒底——波斯东部——印度河流域——西土耳其斯坦（Western Turkestan），一直到中国的黄河流域。这些地区的发现，都处于一个共同的发展阶段：石器时代的结束，青铜器开始出现。农业、家禽、同类工具、美丽的金银珠宝和设计相似的彩陶，都相继出现了。文字也已经出现了。似乎在5500年前的这个时期，从埃及到北印度再到中国，出现了共同的文明。由于出现了共同的陶器，这个时期也被称为“彩陶文明”。这个文明异常先进，文化艺术特别发达，因此它的文化发展延续了数千年。在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出现了精美的房屋街道，艺术也得到了发展。在埃及神王法老的统治下，分裂的城邦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国家。在迦勒底，此时出现了两个有着高度文明的强大国家——苏美尔和阿卡德。在幼发拉底河河岸矗立着一座著名的城市乌尔城——在《圣经》里被称为“迦勒底的吾珥”（Ur of the Chaldees）。从共同的彩陶文明中衍生出了四大东方文明——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包括了波斯文明或伊朗文明）、印度文

明和中国文明，这四大文明都是按照各自的规律独立发展的。因此，我们可以制作出一张图表：

表一

日期（公元前）	埃及	迦勒底或埃兰（美索不达米亚）	印度	中国
3500 年	共同的彩陶文明			
3300 年	在法老的统治下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	两个强大国家苏美尔和阿卡德乌尔城。	在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公元前 3300—前 2700 年，在三个城市中，其中一个城市凌驾于另一个之上）。	在黄河流域定居。

也许是在彩陶文明出现在东方的同时，在地中海东部、希腊群岛和小亚细亚西海岸也出现了类似的文明。早期的地中海文明产生了高度发达的米诺斯文明，出现在约公元前2000——前1500年的克诺索斯地区，随后又逐渐衰退，在约公元前1600——前1100年期间，形成了迈锡尼文明（Mycenaean）或（希腊群岛的）爱琴海文明（Aegean）。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古代西方世界的伟大商人闪米特族的腓尼基人（Semitic Phoenicians）脱颖而出，沿着地中海沿岸的定居点越来越多。其中，位于小亚细亚的城市蒂尔（Tyre）是最重要的定居点。大约也在这个时期，雅利安人遍布了整个欧洲。公元前12世纪，这些雅利安希腊人和古希腊人围攻了特洛伊。古希腊文明逐渐发展，古希腊的殖民地遍布小亚细亚、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和法国南部。公元前11世纪，荷马创作完成了他的伟大史诗。

同时，在东方的古老文明中心也发生了诸多事情。在埃及和迦勒底，帝国繁荣之后，又衰退了。在印度，雅利安人在北部定居，并向南扩张。他们似乎在来印度之前，早就出现在了希腊。他们发现文明且有教养的达罗毗荼人早就在此定居了，于是他们把达罗毗荼人赶到了印度的南部。《吠陀经》写于雅利安人入侵的初期，不久之后就成

了史诗。在中国，集权正在形成，一个伟大的国家正在蓬勃发展。丝绸文化已经广为人知。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张图表（表二至表十八）。但是，你要记住，文明和历史时期（例如米诺斯文明、迈锡尼文明、爱琴海文明等）的不同名字一定不能视为相互排斥或用来指示明确的时期。这些时期是不精确的，是现今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用来区分时常重叠交叉的不同文明和不同时期的。还要记住，根据比例，不可能在图表中给出日期，即把相同长度的时间给予相同的空间。目前的比例更好更准确，因为这给出了一个更加正确的历史观。但是，这张图表会变得非常长，我们不得不涉及数千年的历史早期阶段；当然了，史前时期更长。所以，我们最终放弃了大比例的图表。有时，1英寸将代表1000年或更长的时间，而在图表的另一处，它也许只代表了10年或更短的时间。

表二

美索不达米亚 希腊海岸— 迦太基—罗马	埃及	日期 （公元前）	西亚 迦勒底王国— 巴勒斯坦— 波斯	印度	中国、朝鲜 和日本
	孟斐斯帝国（公元前2800—前2300年）；胡夫等修建了伟大的金字塔；吉萨的狮身人面像。	2800年		西北部的印度河流域文明。	
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2300年			公元前2356年，皇帝尧。
	希克索斯人入侵埃及。底比斯第一帝国（公元前2160—前1660年）。			达罗毗荼人居住在印度绝大部分地区。	公元前205年，夏朝开始（至公元前1765年）丝绸文化。
	拉美西斯二世修建了卡纳克神庙和卢克索神庙。	2100年	公元前2100年汉谟拉比建立巴比伦王国。巴比伦城。		
克诺索斯的米诺斯文明（约公元前2000—前1500年）。		2000年		一波接一波的雅利安人从西北方进入印度，并在北部定居。	
			公元前1925年赫梯人倾覆了巴比伦王国。	吠陀时期。	
		1700年			公元前1765年商或殷朝（至公元前1122年）。

迈锡尼文明（约公元前1600—前1100年）。	公元前1580年底比斯第二帝国（至公元前1100年）。			史诗时期——《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但是这两本书是在很久以后才写出的）。	
		1500年		南印度的雅利安化。	
			亚述人的兴起—亚述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提格拉特·帕拉沙尔王朝。		
腓尼基人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蒂尔城，位于小亚细亚。雅利安人在欧洲扩张。公元前1184年，希腊人围攻特洛伊。		1300年			
					公元前1122年周朝（至公元前255年）。
约公元前1000年荷马写下了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1100年	在巴勒斯坦，以色列王国的扫罗王；大卫王，约前1000年；所罗门王，公元前977—前937年。	古代印度的村落共和国	公元前1122年，朝鲜。箕子建立了朝鲜王国（至公元前193年）。
在小亚细亚、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和法国南部的希腊殖民地。					

公元前800年，腓尼基人在北非建立了迦太基。希腊城邦：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科林斯等。		800年			
公元前776年，希腊创建了奥林匹克运动会。					
公元前753年，罗马建立。			公元前728年，亚述人征服巴比伦，建立了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		
		700年	约公元前700年（或更早）琐罗亚斯德。	帕尼尼，伟大的语法学家。	
					公元前660年，日本；小的大和国。传说中的第一个皇帝神武天皇。
			公元前612年，雅利安米堤亚人占领尼尼微，亚述帝国覆灭。		
约公元前600年，莱斯博斯岛的伟大女诗人萨福。		600年			

大约在这个时期，即公元前6世纪，墨西哥、中美洲和秘鲁出现了古代美洲文明的开端。

表三

希腊、罗马和迦太基	埃及	西亚的波斯
迦太基，伟大的贸易中心——地中海的主要力量。		
约公元前570—前504年，萨摩斯岛的毕达哥拉斯。		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二世俘虏犹太人，史称“巴比伦之囚”。
		公元前550年，居鲁士（波斯雅利安人）征服米堤亚人。
	公元前525年，波斯国王冈比西斯征服埃及。	打败了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伟大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开始了。帝国疆域从赫勒斯滂到印度。
约公元前500年，罗马共和国开始了。马拉松战役——希腊人击退了波斯人。		大流士和薛西斯试图征服希腊，但未能成功。
公元前480年，温泉关和萨拉米斯战役。		大城市波斯波利斯。
希腊的黄金时代：苏格拉底、欧里庇得斯、伯里克利、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柏拉图、品达、阿里斯托芬和菲狄亚斯。公元前404年，斯巴达摧毁了雅典。公元前359年，马其顿的国王腓力。		
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大帝。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在埃及。希腊人托勒密统治了埃及。	亚历山大大帝打败大流士三世，结束了阿契美尼德的波斯帝国。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卒于巴比伦，他的帝国四分五裂了。
	亚历山大港——希腊文化的伟大中心。	塞琉古在西亚的统治。希腊化的塞琉古王朝。
公元前264（至公元前241）第一次布匿战争——罗马对迦太基。		公元前250年，伊朗的帕提亚人摆脱了塞琉古王朝的控制，建立了安息王朝（至公元224年）。
公元前219年（至公元前202年），第二次布匿战争。汉尼拔。罗马扩张到西班牙、希腊和小亚细亚。		

公元前 149 年第三次布匿战争。迦太基被毁。		
公元前 91 年，罗马内战。		
公元前 73 年，斯巴达克斯领导了在罗马的奴隶起义。尤利乌斯·恺撒征服了高卢和英国，庞培征服了东部领土。		罗马征服小亚细亚等地区。公元前 53 年，帕提亚人在卡尔莱打败了罗马人。
公元前 48 年，恺撒在法尔萨鲁斯打败了庞培。公元前 44 年，恺撒在罗马被杀害。	克利奥帕特拉是最后的托勒密统治者。公元前 30 年，埃及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	

表四

日期	印度（和中亚）	中南半岛、马来群岛等	中国（和朝鲜、日本）
公元前	约公元前 620—前 540 年，释迦牟尼。		公元前 605—前 531 年，老子。
600 年			
			公元前 551—前 429 年，孔子。
	摩诃毗罗（卒于约公元前 467 年或更早）。		
500 年			
400 年	帕拉瓦人统治了印度最南端。	帕拉瓦的商人和航海者来到了马来西亚的港口。	约公元前 400 年，丝绸出口到了欧洲。
	公元前 326 年，亚历山大入侵北印度。公元前 321 年，旃陀罗笈多—考底利耶—孔雀王朝开始—《政事论》。公元前 303 年，塞琉古被打败了。		
300 年	巴连弗邑是伟大的首都城市，塔克西拉—乌贾因—马图拉。	中国人在中南半岛定居。	
	公元前 268 年，阿育王（至公元前 226 年）的伟大帝国统治了几乎整个印度和部分中亚地区。佛教教徒使节团被派到国外。	早期的帕拉瓦人定居点——中南半岛、东部岛屿等。	公元前 255 年，秦朝。
200 年	公元前 220 年，南部的安得拉帝国的强盛。伟大的南部帝		公元前 249—前 209 年，始皇帝。焚书。长城于公元前 204

200 年	国延续到公元前 3 世纪。帕拉瓦人在最南端。		年建成。公元前 202 年，汉朝（至公元前 221 年）。
	印度斯基泰人从西北方而来，定居在旁遮普—拉杰普塔纳—卡提瓦半岛。约公元前 150 年，帕坦伽利。		（朝鲜：公元前 193 年，箕子王朝结束了。）
100 年	贵霜帝国统治了北印度和中亚——从贝拿勒斯到莎车。佛教教徒突厥王朝。	首都白沙瓦（布路沙布逻）——至公元前 3 世纪。与南印度的安得拉帝国处于同一时期。中国人征服和吞并了安南。	公元前 140—前 86 年，汉武帝。与日本和罗马的交流。公元前 108 年，中国人征服了朝鲜的北部。
	印度与希腊化罗马世界、中亚的紧密联系。		（日本：大和国仍是一个小国家。）中国开始实行科举制度，持续了 2000 年。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表五

罗马帝国	西亚	日期
		公元前 100 年
公元前 27 年，屋大维・恺撒成了第一公民、元老和最高统帅。罗马帝国开始。		
	耶稣出生在巴勒斯坦的拿撒勒。	公元前后
公元 14—180 年，皇帝依次是：提比略、卡利古拉、克劳狄、尼禄、韦斯巴芗、提图斯、图密善、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马可・奥勒留。		
(公元 2 世纪，美洲的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发展了。管理极为有序的诸多国家，许多城市—艺术—建筑等。)		公元 100 年
	公元 224 年波斯的萨珊王朝开始了。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伊朗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至公元 652 年）。	公元 200 年
	公元 272 年，阿拉伯人的沙漠国家帕尔米拉结束了。季诺碧亚女王。	公元 300 年
公元 306 年，君士坦丁大帝。首都迁至拜占庭，后来成了君士坦丁堡。基督教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罗马帝国分裂成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		
约公元 400 年，蛮族进攻罗马。公元 410 年，阿拉里克领导下的哥特人攻占并洗劫了罗马。公元 450 年，阿提拉领导下的匈人侵袭了高卢和意大利，最后在公元 451 年兵败于法国的沙隆战役。公元 455 年，盖塞里克领导下的汪达尔人洗劫了罗马。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在意大利的哥特人狄奥多里克国王。其他的哥特人国王。公元 481 年，法国的克洛维。		公元 400 年
都城为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虽然遭到了蛮族和匈人的不断进攻，国力遭到极大削弱，但是它仍一直维持着统治。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得到了复苏，公元 527—565 年。		公元 500 年

表六

印度	中南半岛、马来群岛等	中国	日本和朝鲜
佛教出现了大分裂——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			
帕拉瓦人有组织地进行远征，在马来群岛和东部岛屿建立了殖民地。海上贸易得到了发展。	建立了重要的印度（帕拉瓦人）殖民地，尤其是在柬埔寨、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还有马来南部、爪哇岛中部、婆罗洲岛东部。		
		佛教传入中国。后来，汉朝皇帝把鞑靼人赶往了西方。（鞑靼人随后前往了欧洲和印度等地，被称为匈人。）	
		公元221年，汉朝亡。	
		三国时期。	
公元320年，北印度的笈多帝国开始了民族主义复兴——文艺复兴。首都是阿约提亚。梵文的黄金时代。公元320年，旃陀罗笈多一世。			
公元336年沙摩陀罗笈多。大范围的扩张征服。			约公元350年，大和国得到发展并进行扩张。
公元380年，旃陀罗笈多二世时期的诗人迦梨陀娑。中国的朝圣者法显来到印度。			
约公元450年，匈人侵略印度。			
公元495年，匈人头罗曼统治了北印度。			
公元510—528年，匈人摩酰逻矩罗。公元525年，印度佛教长老菩提达摩离开印度，定居中国。	在中南半岛的印度教国家。	菩提达摩到达广州。	

表七

西欧	东欧	西亚	中亚
	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和萨珊帝国（波斯人）长期交战，双方都逐渐遭到削弱。		
		公元 570 年，穆罕默德在麦加出生（公元 632 年卒）。萨珊王朝扩张到了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公元 619 年，波斯帝国的统治者库思老二世。	中亚出现了混合的印度 - 中国 - 波斯文化。佛教在突厥人和其他民族中广泛传播。
		公元 622 年穆罕默德圣迁，迁徙到麦地那。公元 632 年艾布・伯克尔哈里发。公元 634 年奥马尔哈里发。	
	拜占庭帝国被阿拉伯人打败，但是它的统治一直在继续。	公元 632—670 年，阿拉伯人打败拜占庭帝国，征服了波斯、埃及、北非和中亚部分地区。首都大马士革。倭马亚哈里发（阿拉伯人征服者结束了萨珊王朝）。	中国唐朝在北方扩张，直到里海。阿拉伯人在中亚的征服。
公元 711 年，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从北非而来，入侵法国。公元 732 年，法国的图尔战役。查理・马特打败了阿拉伯人，阻止了阿拉伯人的入侵。			
公元 750 年，在西班牙科尔多瓦的阿拉伯人王国。闻名遐迩的城市和大学。		公元 750 年倭马亚哈里发被推翻，开始了阿拔斯哈里发的统治。西班牙在倭马亚人的统治下成了独立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帝国分裂缩小了，但仍然稳固。都城迁到了巴格达。	阿拉伯帝国。

		公元 786 年（至公元 809 年）哈伦·拉希德哈里发。光辉灿烂的统治时期。派遣使节到中国。查理曼大帝。	
公元 800 年，查理曼成为西罗马帝国的皇帝。神圣罗马帝国开始了。	东罗马（拜占庭）帝国虽然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但是仍在逐步缩小的疆域范围内继续维持着统治。		
		公元 850 年，阿拔斯王朝和阿拉伯帝国衰落了。独立的伊斯兰教国家形成并得到发展。	中亚出现了河中地区和其他独立的伊斯兰教国家。
		西亚的塞尔柱突厥人。	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的王朝。
公元 962 年，德国的奥托大帝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公元 969 年，埃及处于独立的法蒂玛王朝统治时期，有了单独的哈里发一职。	
		塞尔柱突厥人统治了西亚。	
公元 987 年，法国国王雨果·卡佩。			加兹尼的马哈茂德。

表八

日期（公元）	印度	中南半岛、马来群岛等	中国	日本和朝鲜
560 年	约公元 550 年遮娄其帝国统治了南印度。普拉凯辛。			佛教经由朝鲜传入了日本。公元 552 年，佛教成了皇家宗教。
600 年	北印度的曷利沙·伐弹那的帝国，都城是曲女城。（曷利沙卒于公元 648 年）。约公元 630 年，中国朝圣者玄奘来到了印度。伟大的数学家婆罗摩笈多第一个完善发展了十进制。	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佛教国家。	公元 618 年，唐朝开始统治中国（直到公元 907 年）。著名的都城长安。	中国人征服了朝鲜。
			公元 635 年，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传入了中国。	
	阿拉伯人来到了俾路支斯坦。	安南和柬埔寨向中国唐朝纳贡。		公元 650 年，日本与中国建立了直接的交流和联系。
			唐朝把突厥人赶往了西方；唐朝帝国的版图扩大到了里海；遭遇了前进的阿拉伯人；海上贸易和国外贸易得到了发展。	
700 年	公元 710 年，阿拉伯人征服了信德。			
	在南部，罗湿陀罗拘陀王朝结束了遮娄其王国的统治，控制了西海岸和中部地区（马拉地人居住的地方）直到公元 10 世纪末期（公元 973 年）罗湿陀罗拘陀王朝又夺回了统治权。		中国人向阿拉伯人传授了造纸术（后来，阿拉伯人把造纸术传给了欧洲人）。	大和国更名为日本。

800 年	埃洛拉石窟：凯拉萨神庙开始建造。商羯罗（卒于约公元 828 年）。			公元 794 年，京都成了日本的首都。
	约公元 850 年，（南印度）泰米尔地区的朱罗帝国。帕拉瓦王朝黯然失色。	阇耶跋摩建立了柬埔寨帝国（在中南半岛），持续了 400 年，直到公元 13 世纪。著名城市吴哥。吴哥窟。大型建筑物群——雕刻。		约公元 850 年，藤原家族在日本处于领导地位。
900 年				
	苏克拉恰利亚的《政术精华》。遍及印度的半独立的村务委员会。		公元 907 年，唐朝结束。	
	朱罗帝国扩张。		公元 960 年，宋朝开始。	
985 年	罗阇罗阇。			

表九

西欧（和美洲）	东欧	西亚 小亚细亚—巴勒斯坦—伊拉克—波斯	中亚	日期（公元）
(中美洲。乌斯马尔城形成并得到发展：约公元1000年，三个中美洲国家形成了一个联盟——玛雅潘联盟)。			加兹尼的马哈茂德(公元1030年卒)。菲尔多西——阿尔贝鲁尼。	1000年
		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约公元1040—约1123年)。	公元1037年，布哈拉的伟大医生伊本·西拿或阿维森纳去世。	
公元1066年，诺曼底的威廉征服了英格兰。公元1073年，希尔得布兰德成了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七世。		公元1071年，塞尔柱突厥人在阿尔普·阿尔斯兰的领导下取得了曼齐克特之战的胜利，打败了拜占庭帝国，征服了整个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直至君士坦丁堡。		
		穆斯林力量的苏醒使欧洲惊恐不已。		
公元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大量的人们遭到屠杀。公元11—12世纪西欧出现了哥特式建筑。	十字军在东欧进行了粗鲁野蛮的洗劫。	公元1099年，布永的戈弗雷领导下的十字军攻占了耶路撒冷。可怕的大屠杀。		1100年
公元1147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公元1147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公元1147年，葡萄牙打败了科尔多瓦的伊斯兰教国家，建立了一个基督教国家。				

公元1152年，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腓特烈·巴巴罗萨。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公元1169年，埃及统治者萨拉丁。他于公元1187年夺回了耶路撒冷。		
公元1189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英格兰狮心王理查一世（中美洲：约公元1190年，玛雅潘灭亡）。		公元1189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以失败告终。		1200年
公元1202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进攻了东罗马帝国（拜占庭）。	公元1204年，十字军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开始了以拉丁人为帝的统治（直到公元1261年）。	花剌子模帝国征服了波斯和中亚。	花剌子模帝国。	
		设拉子城的谢赫·萨迪——伟大的波斯诗人（约公元1184—1282年）。贾拉鲁丁·鲁米——伟大的波斯神秘主义者（公元1207—1273年）。		
公元1212年，儿童十字军东征。公元1215年，英格兰国王约翰签署了《大宪章》				
公元1221年，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公元1228年，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腓特烈二世领导第六次十字军东征，虽然他被教皇驱逐出了教会。公元1233年，西班牙建立了宗教法庭。	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人入侵了俄国南部地区。	公元1221年。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公元1228年，通过与苏丹协商，腓特烈二世占领了耶路撒冷。	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入侵中亚，灭掉了花剌子模。大城市如布哈拉、撒马尔罕、大夏等完全被摧毁。中亚几乎成了一片沙漠。	

	公元1240年，蒙古人入侵俄国、波兰等。俄国向蒙古人纳贡。公元1241年，蒙古人在西里西亚取得了利格尼茨战役的胜利。	公元1244年，埃及苏丹重新夺回了耶路撒冷。		1250年
公元1250年，腓特烈二世驾崩。霍亨斯陶芬王朝结束。公元1250年，西班牙的科尔多瓦王国结束了——在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纳达，阿拉伯小国开始了统治。				
		公元1258年，旭烈兀领导下的蒙古人入侵西亚，毁掉了巴格达，粉碎了塞尔柱突厥人的政权。最后遭到埃及苏丹拜伯尔斯的阻击。公元1259年，蒙古人的伊儿汗国统治了波斯、伊拉克等。		
但丁出生于公元1265年。公元1273年，哈布斯堡王朝的鲁道夫影响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公元13—14世纪，欧洲城市得到了发展：威尼斯共和国一热那亚、佛罗伦萨、博洛尼亚、比萨、米兰、那不勒斯。	公元1261年，希腊人从拉丁人手中重新夺回了君士坦丁堡。			
巴黎一安特卫普一汉堡一法兰克福，科隆，慕尼黑等。	蒙古人占据了俄国绝大部分地区，建立了金帐汗国。			1300年

表十

印度	中南半岛、马来群岛等	中国和蒙古	日本和朝鲜
马哈茂德多次突袭南印度、马图拉、索姆纳特等。大批财宝被掠夺。旁遮普被他吞并。			
南部的朱罗帝国在拉金德拉的统治下逐渐发展，（公元 1013—1044 年）征服了锡兰、高尔（孟加拉）和缅甸。海上贸易。	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佛教帝国处于发展的顶峰。它统治了所有的东部岛屿（除了东爪哇）。海上强国，贸易和造船业。		
			公元 1072 年，太上法皇（日本）。
罗摩奴阇生活在南印度。			
	暹罗的开端。	公元 1127 年，女真族在中国北部定居。	
	东爪哇的印度教国家一直是独立的国家，也是三佛齐的贸易竞争对手。在爪哇岛上建立了伟大的婆罗浮屠寺庙。	公元 1127—1260 年，宋人统治了中国南部，被称为南宋。	
		约公元 1155 年，成吉思汗出生于蒙古。	
公元 1192 年，希哈卜丁打败了普利特维拉吉。穆斯林开始统治印度（至公元 1333 年）。			公元 1192 年，源赖朝开启了镰仓幕府时代。
公元 1206 年，古特伯乌德丁——奴隶王——德里帝国。修建了古特伯高塔。		公元 1206 年，成吉思汗在蒙古哈拉和林被推选为可汗或大可汗。蒙古人征服了中国、中亚和俄国南部。	

		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驾崩。窝阔台成了大可汗。蒙古人第二次侵略欧洲。	
		公元1251年，窝阔台驾崩，蒙哥成了大可汗。	
		公元1260年，忽必烈成了大可汗。都城从哈拉和林迁到了北京。	
南部的朱罗王朝衰落了。马可·波罗来到了南印度——潘地亚人领导了泰米尔人政权。公元1296年，德里的阿拉丁苏丹。	缅甸、安南等并入了中国的蒙古人帝国。	元朝开始（至公元1368年）——征服了缅甸、安南等。马可·波罗来到中国。	
蒙古人在北部的袭击被击退了。	吴哥城被毁于河流的淤塞。柬埔寨帝国结束。	中国人与欧洲的交流联系。	

表十一

西欧（和美洲）	东欧	西亚 小亚细亚—叙利亚—伊拉克—波斯（和埃及）	中亚
（中美洲和墨西哥：约公元1325年，阿兹特克人征服了玛雅国。建立了大城市特诺奇提特兰。）		伊本·白图泰的旅行，从非洲（摩洛哥）到小亚细亚、俄国南部、中亚、印度和中国。公元1336年，蒙古人的伊儿汗国结束。哈菲兹—伟大的波斯诗人（公元1320—1389年）。	公元1336年，帖木儿出生。
约公元1348年，大瘟疫—黑死病—在欧洲、北非和亚洲部分地区肆虐。所有受影响的国家的人口都大幅减少。	俄国南部的大瘟疫。	大瘟疫在小亚细亚—埃及等地蔓延。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实力增强了。	大瘟疫。
	公元13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来到欧洲，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地区，定都阿德里安堡。拜占庭帝国仍然在君士坦丁堡继续它的统治。		
公元1378年，西方基督教出现了大分裂。出现了两个教皇，一个在罗马，另一个在法国的阿维尼翁。公元1417年，通过妥协让步，大分裂结束了。			
			帖木儿征服了中亚。
		约公元1396年，帖木儿征服了波斯，结束了王朝—打败了在安哥拉的奥斯曼苏丹巴耶塞特一世。莫斯科大公赶走了金帐汗国的蒙古人后，俄国实现了独立；莫斯科大公成了俄国的沙皇。	

公元 1430 年，圣女贞德在鲁昂被英国人烧死。			公元 1405 年，帖木儿驾崩。帖木儿帝国一沙阿哈鲁。出现了艺术等方面的帖木儿文艺复兴。
	公元 1453 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结束了东罗马帝国的统治。		
公元 1473 年，哥白尼诞生。			
公元 1486 年，迪亚士绕过了好望角。			比扎德一赫拉特的著名画家(后来的大不里士)。
公元 1492 年，格拉纳达的阿拉伯人王国结束了。摩尔人被赶出了西班牙。	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东南部进行扩张。		
公元 1492 年，哥伦布穿越大西洋抵达美洲。			
瓦斯科・达・伽马经好望角抵达印度。			
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开始了：莱昂纳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		公元 1502 年，波斯人的萨法维王朝开始（至公元 1736 年），阿巴斯大帝。	
公元 1519 年，麦哲伦环游世界。			
公元 1519 年，科尔蒂斯征服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	公元 1520 年，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大帝扩张到了匈牙利和整个巴尔干半岛。	奥斯曼帝国覆盖了巴格达的西亚和埃及（奥斯曼帝国的东部属于波斯萨法维王朝的领地）。	
公元 1530 年，皮萨罗征服秘鲁的印加。西班牙的美洲帝国正在发展。			
公元 1530 年，哈布斯堡查理五世是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国王，尼德兰，美洲领地的皇帝。			

表十二

日期	印度	中南半岛、马来群岛等	中国	日本和朝鲜
1300 年				
	伊本·白图泰访问印度。			1333 年，室町幕府在日本建立。
			大瘟疫。	
1350 年	1350 年，菲罗兹沙阿（至 1388 年）。			
		1377 年，东爪哇的满者伯夷印度教王国发展了海上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毁掉了其贸易竞争对手，满者伯夷的苏门答腊帝国的三佛齐。1380 年，马六甲建立。	1368 年，明朝建立。蒙古帝国瓦解。中国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的伟大时期（明朝灭亡于 1644 年）。	日本幕府将军承认中国明朝皇帝的宗主权地位。
	1388 年，菲罗兹沙阿死后，德里帝国瓦解：加尔（孟加拉）、江布尔、库尔巴加、艾哈迈德讷格尔和古吉拉特王国。			
1400 年	帖木儿的进攻——大屠杀并摧毁了德里。			1392 年朝鲜：蒙古的影响衰退，李成桂开始统治朝鲜。他的王朝持续了 600 多年（直到 1910 年日本将其吞并）——汉城为首都。
		1405—1433 年，郑和远征。满者伯夷帝国衰落。	1405 年，中国将军郑和的海军远征队足迹遍及东方所有海岛。	

1450年				1467—1567年日本内战。
		1478年，来自马六甲的穆斯林阿拉伯人夺取了满者伯夷。马六甲帝国。		
	南印度的比贾布尔和维贾亚纳加尔帝国。			
	瓦斯科·达·伽马抵达卡利卡特。			
1500年	1500年，北方的那纳克古鲁，孟加拉地区的柴坦尼亚。			
		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建立了辽阔的东方帝国，控制了东方贸易。	1516年，葡萄牙人到达广州。他们行为不端，并使用武力手段。被中国人赶了出去。	
	1526年，巴布尔赢得了帕尼帕特之战。莫卧儿帝国在印度建立。			

表十三

北美和南美	西欧	东欧	日期
	马丁・路德（1546 年去世）宗教改革。新教在西北欧兴起。		1500 年
	1558 年（至 1603 年），伊丽莎白统治英国。		1550 年
	1564 年，莎士比亚诞生。		
	1567 年，尼德兰反抗西班牙的暴动。		
1577 年，弗朗西斯・德雷克环球航行。			
		约 1581 年，俄罗斯匪徒叶玛克带着哥萨克人穿过乌拉尔山脉走向东方。奥斯曼帝国占领巴尔干半岛、匈牙利等。	
	1600 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成立。		1600 年
	160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		
1620 年，五月花号把清教教徒早期开拓者从英国带到了北美洲。			
		1636 年，俄罗斯在东方大举推进，到达太平洋。	
	1642 年，法国路易十四大君主开始了长达 72 年之久的统治。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荷兰和瑞士被承认为独立国家。		
	1649 年，英国爆发内战——议会战胜了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英国共和国至 1660 年。奥利弗・克伦威尔。		1650 年

	1688 年，英国革命。	1683 年，奥斯曼帝国在维也纳国门前被击退。	
		俄罗斯彼得大帝。在位时间 1689—1725 年。	
		与中国的条约。使节被派往中国。	
欧洲人在北美洲的殖民地逐渐扩大。西班牙帝国占据了除巴西以外的整个南美洲。南美洲由葡萄牙统治。		彼得结束了俄罗斯的妇女隐居生活（深闺制度）。1730 年，俄罗斯-土耳其战争（18—19 世纪发生了很多次）。	1700 年

表十四

西亚	印度	中南半岛、马来群岛等	中国（和西伯利亚）	日本
	舍尔汗击败了胡马雍。			1542 年，葡萄牙人来了，基督教被带了进来。
	1556 年，莫卧儿王国复辟。阿克巴的统治开始。征服德干高原。			
	1564 年，比贾布尔打败并洗劫了维贾亚纳加尔。			
		1571 年，西班牙开始统治菲律宾。		
		传教士王国。岛屿被孤立。马尼拉的西班牙大帆船。	1581 年，叶玛克和他的哥萨克征服了位于北亚的西伯利亚小王国（西伯利亚由此得名）。	
奥斯曼帝国疆域遍及阿拉伯、叙利亚、小亚细亚、伊拉克和埃及。				1596 年，反基督教政策。家康（1616 年卒）。
波斯的萨法维王朝，文艺复兴等。		荷兰和英国在整个东方水域进攻葡萄牙人。		
	1605 年，阿克巴去世——贾汗季，莫卧儿皇帝。			1603 年，德川幕府开始。
	1627 年，西瓦吉出生。	1623 年，“安汶岛大屠杀”中，荷兰总督以阴谋罪处死了在安汶岛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全体职员。从此，英国人从东印度群岛撤出。	1636 年，俄国人到达太平洋，中华帝国的北方。	

	1628 年，沙阿贾汗，莫卧儿皇帝。泰姬陵建于阿格拉。	1641 年，荷兰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马六甲。葡萄牙人的东方帝国基本终结。		1641 年，200 多年来，日本对所有外国人关闭了国门（直到1853年）。
			1644 年，满族征服中国，明朝终结。清朝结束于 1912 年。	
		荷兰在东印度群岛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爪哇、苏门答腊等）。控制了贸易。没有了对手。		
	1658 年，奥朗则布——莫卧儿帝国最后一位皇帝。1680 年，西瓦吉去世。		1661 年，清帝康熙统治世界上版图最大、人口最多的帝国 61 年（直到 1722 年）。强大的国家。	
			1689 年，中俄签署《尼布楚条约》。	
	1707 年，奥朗则布辞世——莫卧儿帝国瓦解。			
约 1732 年，纳迪尔沙阿控制波斯。	锡克教古鲁戈文德·辛格去世（第十任也是最后一任古鲁）。		1728 年，白令穿越西伯利亚抵达阿拉斯加。俄罗斯在北亚继续东进。	

表十五

北美和南美	西欧	东欧	西亚
整个18世纪，欧洲国家都在进行非洲奴隶贸易，18世纪末到达高潮。利物浦和纽约是奴隶贸易的中心。		奥斯曼帝国衰弱。俄罗斯受到君士坦丁堡的诱惑而来。不断发生战争。	
	1740年，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开始执政。伏尔泰（1694—1778年）。		波斯内战。
1763年，法国把加拿大割让给英国。	1756—1763年，波及整个世界的英法之间为争夺领地而爆发的“七年战争”，以英国的胜利而结束。		
1775年，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发生战争。	歌德（1749—1832年）。	1774年，俄罗斯从土耳其手中夺取克里米亚，并抵达黑海。	
1776年美国革命。《独立宣言》。乔治·华盛顿。	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1770—1827年）。		
		1782年，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	
	1789年，巴黎巴士底监狱风暴。法国大革命开始。		
	1792年，法国成为共和国。		
	1799年，拿破仑·波拿巴。第一执政官。	俄罗斯边境向君士坦丁堡推进，土耳其后退。	1798年，拿破仑在埃及。
	1804年，拿破仑皇帝。		

南美革命。建立独立的共和国。	1806 年，神圣罗马帝国正式终结。		
	1815 年，滑铁卢之战。《维也纳条约》。		
西蒙·玻利瓦尔。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美洲帝国终结。	英国工业革命（从 18 世纪末开始）。		
	1825 年，第一条铁路（在英国）。		奥斯曼帝国继续统治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叙利亚、阿拉伯和伊拉克。但埃及是半独立的，在穆罕默德·阿里（1849 年卒）统治之下。
非洲奴隶贸易被大多数国家禁止，但是非法贸易仍很猖獗。黑人被带到美国的南部各州。	1830 年，欧洲革命。路易·菲利普成为法国国王。比利时独立。1832 年，英国《改革法案》。	1829 年，希腊摆脱奥斯曼统治，获得独立。	
美国向西扩张。获得加利福尼亚。	1848 年，欧洲革命之年。法国建立共和国。		
	1852 年，法国第二共和国结束。法国拿破仑三世皇帝。	1854—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英国和法国帮助土耳其与俄罗斯作战。	1856 年，英国与波斯的战争。
	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 年）。		
	卡尔·马克思（1818—1883 年）。	1860 年，俄罗斯帝国抵达太平洋。	

表十六

日期	印度	中南半岛马来群岛	中国	日本
1700年				
	1737年，马拉地人控制着印度的中部和南部。在德里的大门口。1739年，纳迪尔沙阿袭击印度北部。		1736年，乾隆皇帝统治中国60年（至1796年）。	
	法英为争夺印度的战争（1737—1757年），以法国失败而结束。——迪普莱——克莱武。			
1750年	1757年，普拉西之战。英国成为统治力量。			
	锡克教力量在旁遮普邦壮大。1790—1799年，英国人与海德尔·阿里和提普苏丹的迈索尔战争。	1782年，新的暹罗王朝开始——拉玛一世（这个王朝的统治还在继续）。	乾隆帝国的疆域为中国历史上最广阔的，包括满洲、蒙古、西藏和中亚；还有臣属国：朝鲜、安南、暹罗、缅甸。中国也进攻了尼泊尔，使之成了进贡国。	
1800年		179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终结。尼德兰政府直接接管荷属东印度群岛。	英国特使前往中国（1792年和1816年）。1800年，中国政府禁止鸦片。外国人继续走私鸦片，尤其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1814年，英国和尼泊尔发生战争。			
	1819年，兰吉特·辛格，在旁遮普邦和克什米尔的锡克教王国的统治者（1839年去世）。	1819年，英国人占领新加坡，英国势力已扩张至马来半岛。		
		新加坡吸引了所有的贸易，重创了马六甲的荷兰海港。		

	1824 年，英国对缅甸发起战争，阿萨姆邦被兼并。	1824 年，第一次缅甸战争。		
			1840 年，鸦片战争，即英中战争。	
	1839 年，英国 - 阿富汗战争。英国人担心俄罗斯通过中亚进攻印度。		1842 年，第一个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签署。香港被割让给了英国。五个港口向外国开放。额外的领土权等（《南京条约》）。	
	1845 年和 1848 年，英国和锡克教教徒的战争。旁遮普邦被英国人吞并。		1850 年，伟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开始。——持续到 1864 年。	1853 年，培里率领美国海军中队访问日本。日本在 200 多年之后，又一次向外国等敞开了大门。
1850 年	1856 年，英国第二次缅甸战争，更多的兼并。	1856 年，第二次英国 - 缅甸战争。	1858 年，第二次中国战争——英法联军进攻中国。	
	1857 年，在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印度兵变和大暴动。		1860—1868 年， 中国与俄罗斯签署条约，割让东西伯利亚的大片领土给俄罗斯。于是，俄罗斯帝国抵达了太平洋。	
	1858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终结，英国议会直接统治。		1860 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	

表十七

南北美洲	西欧	东欧	西亚和埃及	时间
1861—1865 年，美国内战。黑奴解放。亚伯拉罕・林肯总统。	1861 年，意大利统一、独立。马志尼—加里波第—加富尔。		1869 年，苏伊士运河开通。	1850 年
整个 19 世纪，北美洲和欧洲西北部，以及其他部分地区，科学大发展、工业及机械化运输增长。民主—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		巴尔干半岛国家盛行民族主义——受土耳其统治的国家逐渐获得独立。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宣告成立。俾斯麦。法国建立共和国。短暂的巴黎公社。		1883 年，英国占领埃及。	
	1878 年，俄土战争后签订《柏林条约》。工人运动，特别是欧洲西北部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会组织——社会主义国际工人组织。卡尔・马克思。	1876 年，苏丹承诺制定土耳其宪法，然后暂缓实施。1877 年，俄土战争。1878 年，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以及黑山脱离土耳其统治，获得了自由。		
1898 年，西班牙-美国战争——美国夺取菲律宾。古巴独立。	19 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争夺非洲。1899—1902 年，南非发生英波战争。		波斯议会沙阿批准 1906 年宪法。英俄对波斯的侵略。	1900 年
		1905 年，日本击败俄国，导致俄国发生了一次失败的革命。国家杜马成立。		
		1908 年，土耳其革命；1876 年，宪法恢复；统一与进步委员会。		

		1911年，意大利与土耳其就的黎波里问题爆发战争；1912年，巴尔干战争；土耳其几乎被赶出了欧洲。		
	1914—1918年，世界大战。	世界大战。	世界大战。	
1917年，美国加入世界大战。	1918年，德国、奥地利等爆发革命。帝国覆灭，共和国建立。	1917年，两场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俄国和西伯利亚发生内战和外国干涉战争。	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崩溃；民族主义运动在西亚和埃及蔓延开来；1919年，埃及起义；萨德·柴鲁尔帕夏。	
1919—1929年，美国进入十年经济繁荣期。	1919年，《凡尔赛和约》；欧洲出现了许多小国；战争赔款——托管——国际联盟；劳工问题——财政困难——货币体系崩溃——许多国际会议。			
	1920—1922年，英爱战争；新芬党—爱尔兰自由邦建立。			
	1922年，法西斯在意大利取得胜利：贝尼托·墨索里尼。欧洲许多国家都开始进行独裁统治。			
		1923年，社会主义与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成立。		
			1922年，土耳其战胜希腊。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	

			1922 年，苏丹制遭到废除，土耳其共和国建立。	
	1926 年，英国爆发大罢工。		1924 年，基拉法特遭到废除，礼萨汗成为波斯的沙阿。	
1929 年，贸易大萧条与经济危机；1930 年南美爆发革命——阿根廷、巴西、智利等；政府不履行职责。	1929 年，全球贸易大萧条——价格下跌——政府不履行职责，银行破产。国际贸易中断（1933 年大萧条仍在继续）；1931 年，西班牙发生革命，共和国成立。	1929 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快速实现工业化。	1925 年，叙利亚起义，反抗法国托管。大马士革部分地区遭到法国的毁灭。1926 年，伊本·沙特成为汉志国王。	
1933 年，美国国会授予罗斯福总统独裁权力以应对危机；启动提高工资收入的大运动；国家控制工业。	1933 年，纳粹在德国大获全胜；阿道夫·希特勒。共和国遭到镇压；劳工和犹太人遭到迫害；纳粹势力在欧洲许多国家日益猖獗。	1933 年，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进行。	巴勒斯坦——英国托管之下的外约旦。伊拉克名义上自由，实际上受到英国的操纵。	1933 年

表十八

印度	印度支那、马来西亚等	中国	日本
		1912年，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大清帝国覆灭；孙中山；袁世凯。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憎恨。	1914年，日本参与世界大战，加入协约国。
		1917年，中国加入协约国，参与世界大战。	
1919年，第三次英阿战争—阿富汗于1919年独立。阿姆利则发生札连瓦拉园大屠杀；旁遮普邦戒严。	荷属东印度群岛、菲律宾、法属印度支那半岛等出现民族主义运动。	督军崛起—内战。	
1920年，甘地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大规模的民族斗争继续进行。		1922年，华盛顿会议宣布尊重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	
	1927年，爪哇民族起义遭到镇压。	1926年，国民党取得胜利，随即国民党分裂。	
		中国四分五裂。	
1930年，国民议会宣布印度独立。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于1931年暂停。1932—1933年恢复进行。		1929年，共产党在内地成立。*	
	1932年，暹罗爆发和平革命，制定宪法。	1932—1933年，满洲里和中国北部遭到日军侵略。	入侵中国。遭到国际联盟谴责，为此退出国际联盟。

* 实际是1921年成立。——译者注

后记：1938年，新的疑云

五年零三个月之前，我在台拉登地区监狱的囚室里写完了该系列的最后一封信。我两年的刑期正在接近尾声，我把在这漫长孤寂生活中（但是在我脑海之中总有你相伴）写给你的那一大堆信件放到了一边，开始重整思绪，思考出狱之后要参与的各种运动和行动。很快我就刑满释放了，但是五个月之后，我又被判决入狱两年，不得不再次回到了监狱之中。于是，我再次提笔记事，而这一次的故事则与我自己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了。

我再次出狱，我们都感到十分悲伤，从此以后我都未能走出这个人生的阴霾。但是，个人的不幸在这个冲突不断的悲惨世界中是无足轻重的，我们必须拼尽全力进行斗争，给这个世界带来剧烈的改变。随后我们挥手告别，你走上了一条求学之路，受尽一切呵护，而我则投身于混战之中，远离了平静的人生。

五年多的光阴逝去了，沉重的战争和苦难也随之化为了历史的画面，现实世界与梦想世界也越隔越远。有时，希望就像溺水之人那样想要努力地大口呼吸，却被身后追逐的恶魔一把掐住了脖子。在我奋笔疾书之时，我眼前的阿拉伯海波澜壮阔、无际无边，如此美不胜收，寂静如甜蜜的梦乡，在银色的月光之下闪动着粼粼波光。

在这篇后记中，我想要向你讲述这五年中所发生的事件，因为这些信件将会整理成册，成为新书出版，而我的出版商则要求信件的内容必须得与时俱进。这个任务十分艰难，因为这段时间内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如果我有时间提笔进行写作，我就会超过限额写出另一本书来。就算是略略记录每件大事都会是相当冗长累赘的。因此我只能概

要地介绍历史事件。在我早已完成的信件中，我又加上了一些注释，为你提供更多的史实。好了，现在我们可以来简要地回顾过去的五年了。

在最后的几封信中，我提到了现代世界的巨大矛盾和竞争，指出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发展以及战争的阴影，希望引起你的关注。在这五年里，这些竞争和冲突大为加剧了，尽管新的世界大战至今并未发生，但是在非洲、欧洲以及远东地区，都发生了许多惨绝人寰的大型战争。每年甚至每个月，都会发生侵略战争和恐怖行为。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杂乱无章，国际关系也没有任何秩序可言，国际联盟等为国际合作所做出的努力全都惨淡收场。裁军早就成了历史，现在每个国家都拼尽了全力，疯狂地加强军备。恐惧紧紧地攥住了这个世界。在不可一世、咄咄逼人的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攻击之下，整个欧洲大陆都在瑟瑟发抖，它的情况以极快的速度恶化，走上了野蛮暴力之路。

在之前的信件中，我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引发1914年至1918年世界大战的各种原因、这场大战的产物《凡尔赛和约》以及《国际联盟盟约》。但是，固有的问题还未得以解决，而许多新问题又不断涌现：战争赔款、战争债务、裁军、集体安全、经济危机以及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在和平问题背后仍然还有许多曾经破坏了世界平衡的重要社会问题。在苏联，新的社会力量已经获得了胜利，他们不畏巨大的困难和外界的压力，正在努力建设一个新的世界。在其他地区，深刻的社会变革也在不断进行，但是找不到任何突破口，最终还是遭到了现有政治经济体系的控制。世界的物质大为丰富，生产力得到了巨大提高，无数代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但是，早已习惯束缚的奴隶会害怕自由的来临，愚蠢的人类早已对物资稀缺习以为常，他们很难摆脱这种定式思维。因此，新的财富受到极大的限制，遭到刻意的抛弃，然而事实上，这个世界的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而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痛苦。

各种会议在不断地召开，世界各国代表常常聚集在一起，想要解决这个惊人的矛盾，并确保和平不受影响。战后的确签订了许多协议和条约，也建立了许多联盟，如《华盛顿条约》、《洛迦诺公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以及《互不侵犯条约》，但是这些条约并未触及最根本的问题，只要触及残酷的现实，这些条约或者协议就会立即失效，任由赤裸裸的武力来裁决欧洲的命运。《凡尔赛和约》已经名存实亡，欧洲的版图再次发生了改变，世界正在划分新的格局。战争债务已经不再是问题了，那些最富有的国家已经决定放弃偿还了。

因此，我们又倒退回到1914年大战爆发之前的局面，所有的问题和矛盾依然存在，只不过比当初严重了上百倍。资本主义制度正在不断衰退，经济民族主义因而得以不断蔓延，大型垄断组织也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它变得十分激进和暴力，甚至都不能容忍议会民主制的存在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应运而生，它们公然实施暴力血腥行为，将战争作为它们政策的最终目标。与此同时，一个伟大的新兴大国在苏联大地上崛起，它将会一直挑战旧秩序，并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起到强大的遏制作用。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这场革命自1914年大战爆发之后就开始了，它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从未停止，让整个世界都陷入了矛盾冲突的剧痛之中。150年之前的法国大革命逐渐开创了一个政治平等的时代，但是当今时代已经不同往日了，仅此政治平等已是孤掌难鸣。现在，民主的界限必须拓宽，要将经济平等也纳入其中。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的革命，这场革命才能确保经济平等，从而使民主具有完整的意义，并让我们能够与科技发展的步伐保持一致。

这种平等是与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背道而驰的，因为这两种主义都建立在不平等以及对他国或者某个阶级的剥削基础之上。因此，那些受益于这种剥削的人将会极力抗拒这种平等。一旦它们之间的矛盾加剧，甚至就连政治平等和议会民主的概念都会遭到彻底否定。这就

是法西斯主义，它的做法几乎再现了那个落后的中世纪。它极力宣扬种族优越，虽然不再尊奉皇帝，却将一位领袖推上了神坛，让他得到了无上的权力。在过去的五年里，法西斯主义的势力极大地增强了，它不断地攻击一切民主原则以及自由文明的概念，这就使如何保护民主成了今日世界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当今世界，最根本的矛盾并不在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而在于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因此，所有真正的民主力量联合在了一起，共同反对法西斯主义。今日的西班牙完全就是一个典范。

但是在民主政治的背后不可避免地隐藏着更进一步的民主观点。正是因为害怕这点，世界各国的反动分子虽然满口民主的漂亮话，却对法西斯主义表示赞同和拥护。法西斯国家的角色十分明显了，它们的目标或政策已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最关键的因素是那些所谓民主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英国。在亚洲、非洲以及欧洲，英国政府从头到尾都非常反动，它大力支持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发展。奇怪的是，它甚至不惜危及大英帝国的安全，也要纵容法西斯和纳粹主义的行为，由此可见它多害怕真正民主的发展，对法西斯领袖表达了非常多的阶级同情。如果法西斯主义足以强大到统治全世界的话，英国政府可是“功不可没”啊。美国则对民主更在意，不止一次提议要与其他国家联合压制法西斯的侵略行为，但是英国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法国由于太过依赖伦敦城以及英国的对外政策，所以完全不敢单独行动。

在劳工问题上，英国也一直反对国际劳工大会（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1937年6月，国际劳工大会委员会批准了一项公约，规定纺织行业的工作时间为一周40小时。它顶住了英国的极力反对，通过了这项约定。就连英国的各大自治领都反对英国，转而支持美国。当然，英国政府指派的印度代表还是站在了英国一边。美国代表团成员（其中包括企业主和政府代表）评论道：“来到日内瓦之

前，没人知道英国政府有这么反动。”其中一个人还补充道：“英国就是最反动的势力。”

尽管国际联盟有各种不足，但是它仍然是国际共识的象征，《国际联盟盟约》也对侵略行为制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在日本入侵满洲里时，它只是指派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前往调查，随后对此侵略行为屡次表示了谴责，但是除此之外，并未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英国政府实际上完全支持日本的冒险行为，从此以后，除了偶有偏差之外，它就始终贯彻着无视和削弱国际联盟的政策方针。纳粹主义崛起，公然推行着对外侵犯的政策，直接对国际联盟发起了挑战，但是英国和法国姑息了这种行为，任由国际联盟慢慢衰落。法西斯国家一个个都退出了国际联盟，德国在1933年10月退出了，而日本和意大利也紧随其后。1934年9月，苏联的加入为国际联盟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出于对纳粹德国的恐惧，法国选择与苏联结为同盟，但是英国不顾《国际联盟盟约》，拒绝与苏联合作，宁愿与纳粹德国结为盟友。法西斯国家的每次侵略都得逞了，这就让它们更加肆无忌惮，也让它们确信它们可以明目张胆地反抗国际联盟，却又不用遭受任何惩罚，因为它们清楚地知道英国政府是不会表示反对的。

正是因为英国政府和法西斯国家不断勾结，才能够解释中国、阿比西尼亚、西班牙和中欧所发生的一切。我们终于明白，代表着和平愿望和人类进步的光荣国际联盟为什么今日却会如此衰败不堪。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日本在满洲里大获全胜，并在那里建立起了一个傀儡政权——“满洲国”，公然反抗了国际联盟，也彻底蔑视了国际社会。尽管它的确发动了军事入侵，但是没有宣战。日本在当地挑起内部争斗，以此作为派军干涉的借口。意大利和德国随后对这种新的手段大加改进，它们在海外发起规模空前的虚假宣传，使这种手段更加完善。现在不会有任何国家宣战，宣战是过去的历史了。1937年，希特勒在纽伦堡发表讲话，他指出：“如果我想要攻击我的

敌人，我是不会与之协商，并耗费数月做好战备，我只会采用我一贯的做法：像暗夜划过的闪电那样，快速地扑倒我的敌人。”

1935年1月，在全民公投的支持下，德国占领了萨尔盆地。同年5月，希特勒最终撕毁了《凡尔赛和约》中的裁军条款，下令德国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德国公然单方面撕毁和约的行为让法国大为恐慌。然而英国却默许了，而英国更过分的行为还在后面。一个月后，英国与德国秘密签订了《海军条约》。这个条约本身就违背了《凡尔赛和约》，因此英国自己也在无视这个和约。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英德签订该条约的时候，德国正在大规模地重整军备，威胁到整个欧洲的安全；英国在没有通知自己的老盟友法国的情况下，就做出了此等行为。在法国看来，英国的行为完全是背信弃义，这让法国十分恐惧，于是它赶紧与墨索里尼达成了协议，以尽可能减少来自意法边境的威胁。

阿比西尼亚——墨索里尼终于等到了他一直苦苦等待的机会。很多年前，他就打算要入侵阿比西尼亚，但是他一直不确定英国和法国的态度，所以他总是犹豫不决。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局势始终很紧张。1934年10月，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与法国外长路易·巴尔都（Louis Barthou）在马赛遭到刺杀，这很明显是意大利特工所为。现在，墨索里尼确信法国和英国都难以有效地反对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的行为了。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而当时国际联盟正在举行会议。阿比西尼亚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整个世界都对其遭到侵略而感到十分震惊。国际联盟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很久之后才慢吞吞地对它进行经济制裁，也就是说，禁止任何国际联盟成员国与它发生商品交易。但是最重要的军需品，如石油、钢铁、煤炭，并不在禁止交易商品之列。英伊石油公司（Anglo-Iranian Oil Co.）加班加点地努力生产，以保证对意大利的石油供应。经济制裁让意大利颇感不便，但是没有给它的行动带来严重困难。美国建议禁运石油，但是遭到了英国的强烈反对。

英国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与法国部长拉瓦尔先生（Monsieur Laval）达成一致意见，同意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的大片土地，但是这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愤慨，塞缪尔·霍尔爵士为此被迫辞职。在这种情况下，阿比西尼亚民众同仇敌忾，英勇反抗，但是在意大利近地飞机的大面积轰炸面前，他们的力量实在太过弱小了。意大利使用了大量的燃烧弹和毒气弹来攻击平民、救护车和医院，连妇女和儿童都不放过，实为史上最为血腥残暴的屠杀。1936年5月，意大利军队进入阿比西尼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随后占领了该国大部分地区。两年半之后，阿比西尼亚民众仍在边远地区进行各种抵抗行动。即使英国和法国现在已经承认了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控制，但是要占领阿比西尼亚还为时尚早。

国际联盟诸国背叛了阿比西尼亚，让其陷入悲剧之中，这让全世界都清楚地认识到，国际联盟已形同虚设。希特勒现在可以毫不畏惧地蔑视国际联盟了。1936年3月，他指挥大军进入非军事区莱茵兰地区，从而再一次撕毁了《凡尔赛和约》。

西班牙——1936年，法西斯势力再次发起攻势，想要将欧洲控制在自己手中。这场斗争势必将会是一场维护民主和自由的生死之战。我们早已了解，反动势力妄图想要夺取西班牙的控制权，而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则与教会和半封建反动势力展开了殊死搏斗。最后，进步组织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并于1936年2月建立了人民阵线。在此之前，法国早已建立了一个人民阵线来对抗日益强大的法西斯势力，这个法西斯势力公然威胁法兰西共和国，甚至还组织起一场并未成功的起义。当时法国民众热情高涨，法国人民阵线借此势头取得了大选的胜利，随后组建政府，通过了许多救济工人的法律。

西班牙人民阵线也在西班牙议会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并组建了政府。它承诺将会实施各种遭到长期拖延的改革，并抑制教会的权力。反动势力十分害怕改革，他们马上勾结在一起，决意进行反击。他们

向意大利和德国寻求援助，还对西班牙的摩尔人军队许下重诺。1936年7月18日，佛朗哥将军发动叛乱。他不仅得到了军队的支持，还得到了两大强国的援助。共和国似乎已然摇摇欲坠了，但是就在濒临绝境的关头，号召西班牙民众保卫自由，并给他们分发了武器。普通民众积极响应号召，几乎赤手空拳地对抗着拥有枪炮和飞机的佛朗哥叛军。他们竟然成功地拖住了佛朗哥前进的步伐。海外志愿者大批涌入西班牙为民主而战，他们组建了国际纵队（International Brigade），在共和国最急需帮助的时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但是，来到西班牙的不仅仅只是志愿者，还有大批的意大利常规军，他们成了佛朗哥的有力支持者，随之而来的还有意大利和德国提供的飞机、飞行员、武器以及技术人员。支持佛朗哥的是来自德意两大强国经验丰富的参谋人员，而支撑着共和国的却是热情、勇气以及牺牲精神。1936年11月，叛军已经行进到了马德里郊外，但是共和国的人民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使叛军停步于此，难以向前继续迈进。“禁止通行！”是人民发出的呐喊。马德里日夜忍受着飞机和大炮的轰炸，城内辉煌的建筑完全沦为了一片废墟，敌人发射的燃烧弹让这座城市经常陷入火海之中，最英勇的共和国儿女为了保卫国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这座伟大的城市却始终不可征服，也无法战胜。两年过去了，叛军还是被困在马德里郊外，始终不能向前一步。“禁止通行”的呼声响彻云霄，满目疮痍的悲情马德里一直高高地昂起自由的头颅，它已经成了西班牙人民不屈不挠、自尊自强精神的象征。

我们必须理解这场西班牙战争，因为它远非地方战争或者国内斗争。一开始西班牙的反动势力就发起了一场叛乱，想要推翻经过民主选举而组建起来的议会。他们提出共产主义已经威胁到西班牙，而宗教也正处于危险之中，极尽危险耸听之能事，但是事实上在人民阵线代表中，共产主义者屈指可数，绝大多数都是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至于宗教，来自巴斯克地区的天主教教徒一直都是共和国最勇猛的斗士。共和国保证人民享有宗教自由，这与德国希特勒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但它是坚决反对教会在土地和教育方面的既得利益的。当

时，反动分子十分害怕民主会打击并彻底终结封建土地制度，于是发起了叛乱以反对民主。我以前就说过，一旦民主威胁到反动势力的根本利益，后者是既不会遵守民主形式，也不会尝试让全体选民改弦易辙的，这对他们来说是多此一举的做法。他们只会付诸武力，通过暴力和恐怖手段将反动意志强加给人民大众。

意大利和德国两大法西斯国家自愿与参与叛乱的西班牙军事和宗教集团结为同盟，因为它们想要操纵西班牙，进而控制地中海地区，并在那里修建海军基地。它们也想要得到西班牙的矿产资源。因此，西班牙战争不是内战，实际上是一场欧陆战争，是一场企图击溃法国、削弱英国从而构建法西斯主义在欧洲主导地位的权力的政治角逐。德国和意大利的利益并不一致，但是眼下它们勾结在了一起。

如果西班牙也成为法西斯国家，法国就会遭受致命的打击，而英国通过地中海飞往好望角和东方的航线也会处于威胁之中。直布罗陀海峡从此就会毫无用处，而苏伊士运河也会一文不值。因此，就算不是出于对民主的热爱，仅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英国和法国都应该向西班牙政府提供各种正当援助，以彻底镇压西班牙国内的叛乱。但是我们发现，阶级利益又一次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操纵了政府的一举一动。英国政府制定了“不干涉计划”，而这个计划完全就是我们时代最可笑的闹剧。德国和意大利都是不干涉委员会（Non-intervention Commitee）的成员，但是它们公然支持西班牙叛军，并承认叛军政府为合法政府。它们还派遣本国军队援助佛朗哥，它们的飞机飞临西班牙城镇上空大肆轰炸。“不干涉”从此就意味着唯有叛军才能获得援助。英国政府还怂恿法国政府关闭位于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的法西边境，禁止任何援助流向西班牙共和国。

佛朗哥的飞机或舰船炸沉了向共和国运送粮食的英国船只，然而英国首相张伯伦先生（Mr. Chamberlain）却为佛朗哥的行为强辩。英国政府做出如此表态，是因为它害怕民主的影响日益扩大。几天之

前，它与意大利签订了一份条约，进一步认可了佛朗哥的地位，让意大利更加肆无忌惮地干涉西班牙内务。如果西班牙共和国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英法两国身上并依照它们的意见行事的话，那么它现在早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不论英法两国采用何种政策，西班牙人民都拒绝向法西斯主义投降。对他们而言，这是一场西班牙民族反抗外国侵略者、维护本国独立的民族战争，必将流芳百世、永载史册。他们以非凡的勇气和忍耐力创造了无数的奇迹，让世界为之侧目。在这场战争中，最惨无人道的是支持佛朗哥的意德两国飞机对西班牙城镇和平民的无差别轰炸。

在过去的两年里，共和国已经建立了一支战斗力惊人的军队，而最近他们已经将所有外国志愿者都送出了国境。

尽管佛朗哥占领了西班牙近75%的土地，也断绝了马德里和瓦伦西亚（Valencia）与加泰罗尼亚的联系，新生的共和国军队现在却死死地拖住了他前进的步伐。后来，埃布罗河战役（Batle of Ebro）爆发，这场惨烈的战役持续不断地打了几个月，新生的共和军队则在这场战争中充分地证明了自己的作战能力。显然，除非佛朗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否则他是无法打败这支共和国军队的。

现在，共和国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食品短缺，尤其是在冬季这段时间内。因为共和国不仅需要供应军粮，还必须为其控制范围内的普通居民提供食品。除此之外，它还得为那些从佛朗哥军队占领区逃到共和国区域内的无数难民提供食品。

中国——西班牙的悲剧就到此为止吧，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悲惨的中国。

日本仍在继续侵略满洲里，我曾经告诉过你，英国公然对此表示支持。美国曾向英国提出共同合作，抵制日本侵略，但是英国断然拒绝了。为什么英国会如此支持日本的侵略行为，放任这个竞争对手日

益强大呢？从20世纪早期开始，英国几乎一直在为日本保驾护航，帮助它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一开始英国的目的是想要扶持日本对抗沙俄。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的两大竞争对手则是美国和苏联，因此，即便日本威胁到了它的重要利益，它仍然一直沿用了传统的亲日政策，至今也未曾改变。美国在1933年承认了苏联政府，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它与日本之间的激烈竞争。

从1933年以来，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多政权：其一，是获得列强认可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其二，是同样声称秉承国民党意志的南方广东国民政府；其三，是控制中国内地大片土地的苏维埃政权；其四，是内地为数众多的半独立军阀统治政府。在北平以北，日本正在不断地蚕食着中国的土地。蒋介石并未抵抗日本的侵略，他集中全部力量，年复一年派遣国民党军队远征中国内地，意图彻底镇压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这些远征行动大多遭到了失败，即便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苏维埃地区，中国的苏维埃红军也会成功逃离，进入更偏远的内地再次建立他们的政权。中国红军在朱德的领导下进行了跨越中国的8000英里长征[注]，这个惊心动魄的行动已经成了军事史上的经典。

尽管中国苏维埃政权向蒋介石提议合作，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但是这两大政权之间的冲突仍然从未消停。1937年，日本大举进攻中国，终于促使混战之中的各大势力实现联合，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中国进一步向苏联靠拢，1937年11月，中苏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日本遭遇了激烈的抵抗。日本派遣飞机轰炸中国城镇，采取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暴行，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妄图击溃中国的反抗。但是中华民族在这场残酷的考验中实现了新生，长久以来的麻木不仁从中国人民身上完全褪尽了。众多伟大的城市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中化为了灰烬，无数的中国人民死于非命。然而，日本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它的金融和经济体系已经显现出崩溃的迹象。印度人民自然

会无比同情中国人民以及西班牙共和国。在印度、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都发起了抵制日货的大规模行动。

强大的日本军事机器仍在横扫中国大地，而中国人民则采用了游击战术来骚扰日本军队，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日本占领了上海和南京后，继续向广州和汉口进发，但是中国人宁愿烧毁这两座繁华的城市，也不愿将之拱手让与日本人。即使日本军队占领了这些城市，他们所得到的也不过是已经化作焦炭的废墟，就像拿破仑当年占领莫斯科一样。但是，中国人民的反抗是不会被日本人击垮的，每一次新的危难只会让他们更加顽强，更加勇猛。

奥地利——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欧洲，看看奥地利是如何迎来如此悲惨的结局的。这个小共和国经济破产，国家分裂，受到两面夹击：一面是蠢蠢欲动的纳粹德国，而另一面则是虎视眈眈的意大利法西斯。尽管维也纳市政当局是由进步的社会主义者在控制，但是整个奥地利是在陶尔斐斯（Dollfuss）总理的教权法西斯主义（clerical fascism）的统治之下，这个独裁者投靠墨索里尼，以此来避免纳粹的侵略。意大利违背《凡尔赛和约》，派遣军队支持陶尔斐斯，墨索里尼还建议他镇压奥地利国内的社会主义者。陶尔斐斯决定解除维也纳社会主义工人的武装，进而发动了1934年2月的反革命运动。维也纳的战斗持续了四天，许多著名的工人住所遭到炮轰，部分遭到彻底破坏。陶尔斐斯取得了胜利，但是也颠覆了其国内唯一有能力抵抗外来侵略的组织。

与此同时，纳粹也在继续玩弄阴谋诡计。1934年6月，陶尔斐斯在维也纳遭到纳粹分子的暗杀。原本这场政变之后德国纳粹马上就会入侵奥地利。希特勒正要派遣纳粹军队穿过德奥边境时，墨索里尼却发出警告，威胁将要派遣意大利军队保卫奥地利，对抗德国军队，这就让希特勒不得不停止侵略行动。墨索里尼不想看到德国吞并奥地利，

进而与意大利紧紧毗邻。1935年，希特勒正式宣布，他不会兼并奥地利，或者寻求德奥合并。

但是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削弱了它的力量，再加上它与英法之间的摩擦加剧，墨索里尼只好与希特勒达成协议。现在，希特勒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奥地利问题了，纳粹活动随机越发猖獗起来。1938年初，英国首相张伯伦明确表示英国不会插手奥地利事务。随后，事态发展更为迅速。奥地利舒施尼格（Schuschnigg）总理决定举行公民投票，但是遭到希特勒的坚决反对。1938年3月，德军入侵奥地利。这个历经帝国沧桑的古老国度走到了终点，从此奥地利从欧洲版图上消失了。奥地利末任总理舒施尼格沦为了德国人的阶下囚，由于他不肯完全妥协，纳粹德国威胁将会对他进行审判。现在他还处于纳粹分子的囚禁之中。

纳粹德国进入奥地利后，纳粹分子更加疯狂地对奥地利人民实施恐怖统治，其手段之残暴，远胜德国纳粹早期在德国实施的恐怖统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犹太人都遭受了极大的痛苦，而在维也纳城内，野蛮暴力大行其道，恐怖手段层出不穷，这座城市已经不复往日的美丽和文明。

捷克斯洛伐克——纳粹在奥地利的胜利让欧洲大为震惊，捷克斯洛伐克的恐惧最为强烈，因为它现在已经遭到纳粹德国的三面包围。许多人都认为纳粹德国会马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在此之前，纳粹分子已经开始采用惯常的手段，玩弄各种阴谋诡计，试图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地区挑起内部矛盾。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即古老的波希米亚地区，聚居人口均为讲德语的居民，这些人曾经是奥匈帝国的主体民族。他们并不接受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了许多合法的抱怨，他们希望得到自治权。他们也不想加入德国，他们中有不少德裔是全然反对纳粹政权的。波希米亚以前从来都不是德国的一部分。奥地利消失之后，希特勒很可

能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想到这点，许多人就感到十分害怕，因此他们纷纷加入当地纳粹政党，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捷克斯洛伐克拥有十分稳固的国际地位。它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国家组织严密，军队实力强大，作战效率极高。它与法国和苏联都缔结了同盟，而英国也理应在发生冲突之时站到它这一边。作为中欧地区硕果仅存的民主国家，它得到了世界各国（包括美国）所有民主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一旦战争爆发，只要民主力量能够团结一致，纳粹势力无疑将会一败涂地。

苏台德地区少数民族问题再次被提起，当然他们的痛苦的确应尽力抚平。但事实上，捷克斯洛伐克少数民族的待遇远比中欧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好得多。真正的问题并非是这个少数民族的问题，而是希特勒想要夺取东南欧地区的控制权以及通过暴力和恐吓强加其意志的欲望。

捷克政府尽最大的努力来解决这个少数民族问题，它几乎同意了纳粹的全部要求。但是只要捷克政府退让一步，对方就会再进一步，提出更加过分的要求，最后就会威胁到这个国家的存亡。显然，希特勒的目的是要扫除这个给他的行动造成莫大障碍的民主国家。英国的政策名义上是要采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助长了希特勒的侵略行为。英国政府将朗西曼勋爵（Lord Runciman）派到布拉格进行调停，但是英国的调停工作实际上是不断地对捷克政府施压，让它屈从于纳粹的要求。

最后捷克人接受了朗西曼勋爵的提议，尽管这本来就会对捷克的形势造成深远的影响，但是现在纳粹分子变得更加贪婪，他们为了强迫执行其要求，开始调动德国军队做出进攻的姿态。于是张伯伦先生亲自插手这次事件，他前往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与希特勒会晤，在那里接受了希特勒的最后通牒，同意将大片捷克土地割让给德国。随后英国和法国也对它们的盟友捷克斯洛伐克发出了最后通

牒，逼迫它立即接受希特勒的条件，并威胁如果它不照办就完全将之抛弃。面对盟国的背叛，捷克人民都惊愕不已，最终捷克政府在悲痛和绝望中屈从了。张伯伦先生来到莱茵河畔的哥德斯堡（Godesberg），与希特勒再次会晤，他发现希特勒再次狮子大开口。这次就连张伯伦都无法妥协。1938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世界战争就像黑沉沉的阴影一样在欧洲上空弥散开来。人们赶紧寻找防毒面具，在公园和花园里努力挖掘壕沟，以躲避德军的空中轰炸。张伯伦急匆匆赶往慕尼黑，这一次就连法国总统达拉第先生（Monsieur Daladier）和墨索里尼先生也赶来了，与希特勒一起展开会谈。苏联虽然是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国，却并未收到邀请。尽管这次会谈将会决定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但是会谈四方完全没有与同为盟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商量之意。希特勒提出了会给欧洲带来深远影响的新要求，还威胁说将会立即发动侵略战争，因此其他三方全盘接受了希特勒的要求。9月29日，会谈四国签订了包括希特勒上述要求在内的《慕尼黑协定》。

战争得以暂时避免，欧洲各国人民顿时松了一口气。但是欧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英法两国无耻透顶，丢尽了脸面，欧洲的民主制度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捷克斯洛伐克四分五裂，作为和平工具的国际联盟荡然无存，而纳粹则在中欧和东南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场无耻交易所得来的和平却不过只是暂时休战而已，在这段时间内，欧洲各国都在疯狂地整顿军备，厉兵秣马，为即将爆发的战争做好一切准备。

《慕尼黑协定》是欧洲乃至世界史上的转折点。欧洲再次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英国和法国政府竟然公然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站到了一起。英国忙不迭地批准了《英意条约》，承认了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并任由意大利插手西班牙内务。英、法、德、意四国协定开始逐渐成形，它们组成了联合阵线，共同对抗苏联以及西班牙等地区的民主力量。

苏联——尽管这些年来，这些超级大国总是玩弄各种阴谋诡计，不断违背神圣的誓言，苏联却一直严格地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维护和平，反对侵略，直至最后也从未置盟国捷克斯洛伐克于不顾，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但是，英国和法国完全无视它，转而对侵略者示好，而遭受英法背叛的捷克斯洛伐克也走上了纳粹的道路，从而终止了它与苏联的联盟关系。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四分五裂，而匈牙利和波兰却趁火打劫，贪婪地从中捞取好处。捷克斯洛伐克内部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斯洛伐克（Slovakia）也宣布实行自治。该国仅存的部分现在几乎沦为了德国的殖民地。

因此苏联的外交政策严重受挫。但是，现在的苏联十分强大，也是欧亚地区法西斯主义和反民主势力扩张之路上的唯一障碍。尽管英法两国近来无视苏联，但是它仍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总体上的成功，尽管它在细节方面失败了，尤其是并未能提高产品的质量。苏联的机械技师都没有接受过训练，国内交通状况也大部分没有得到改善。集中全力发展重工业的后果是消费品紧缺以及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但是这项计划使苏联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以及农业的集约化，为将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把中心从重工业转移到了轻工业上，目的在于摆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缺陷，大力生产消费品。这个计划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而且还在不断地提高。无论是在文化教育方面，还是在许多其他领域，苏联社会所取得的进步都是令人瞩目的。苏联极力想要保持发展势头，巩固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因此它始终在国际事务中贯彻执行和平的政策。在国际联盟中，它支持大规模裁军、集体安全以及共同反对侵略。它尽力改变自己，以适应资本主义大国的要求，因此共产党设法与其他进步政党联合在一起，建立了“人民阵线”或“联合阵线”。

从整体上看，苏联的进步十分显著，社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但是它在这段时间内也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内部危机。在前面某一封信

中，我已经讲到过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许多对现有政权深感不满的人逐渐聚集在一起，据说其中一些人甚至里通外国，勾结法西斯国家密谋造反。据称就连苏联情报机关国家政治管理局（GPU）的首领雅戈达（Yagoda）也与这群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34年12月，苏联政府高官基洛夫（Kirov）遭到谋杀。政府随即就对反对者采取了十分严酷的手段，从1937年开始，政府对无数牵涉其中的显要人士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审查和公审，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极大的争议。那些遭到审判的人包括所谓的托洛茨基派、右倾领袖[莱科夫（Rykov）、托姆斯基（Tomsky）与布哈林（Bukharin）]以及军队将领[其中最显要的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Marshal Tuchachevsky）]。

我也不太清楚审判内容或者让他们遭受厄运的具体事件，因为事情实在太过复杂含糊了。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审查让许多人都惊恐不安，甚至就连苏联的朋友都深受影响，进而加深了外界对苏联的偏见。了解内情的人相信，的确有人策划了惊天阴谋，妄图推翻斯大林政权，而审查都是正当的。似乎可以确定的是，这场阴谋并未得到广泛的支持，而苏联人民肯定是反对斯大林的敌人的。尽管如此，苏联国内的镇压活动波及范围极广，程度极高，也许伤害到了许多无辜的人，但这也显示苏联整体政治局势并不平稳，而且这场残酷的镇压也极大地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地位。

经济复苏——自1930年起，全球贸易出现大幅下滑的趋势，经济走入低谷，资本主义世界在数年时间内一蹶不振。终于它显示出了复苏的迹象。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形势都有了部分好转，其中英国的复苏情况最为显著。英国受益于英镑贬值、高额关税以及对大英帝国自治领市场和资源的盘剥。英国设置关税壁垒，为国内产业提供政府补贴，进行农业改革，并有效组织生产商以减少国内竞争，这一系列举措让其国内市场得以复苏。它尝试着对生产和国内分配进行计划。它也对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它们购买英国商品。

虽然经济大为复苏了，但是国际贸易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因此，这只不过是相对而言，也绝不能称之为完全复苏。真正的复苏取决于国际贸易的振兴。必须注意的是，英国并未偿还，也并不打算偿还它所欠下的美国外债。各国纷纷进行大规模的军备重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复苏。但是这种复苏显然是既无保障也不稳定的。严重的失业问题仍然存在。

大英帝国——尽管英国暂时渡过了经济危机，但是大英帝国的情况仍极不乐观，各种意图瓦解它的政治经济势力比以往更为强大了。甚至就连帝国的统治者们都已经失去了信心和希望，不相信大英帝国还能继续存在。他们根本无法解决其内部问题。一心想要争取独立的印度也变得更加强大了，小小的巴勒斯坦也让他们心烦意乱。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英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一直在挑战英国的霸权。当英国政府倒向法西斯国家时，美国便进一步疏远了英国。苏联成功地建成了社会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德国和意大利则贪婪地望着大英帝国的丰厚财产。在慕尼黑，面对它们的威胁，英国一直唯唯诺诺，委曲求全，这就让它们更加轻视它，简直把它当成了一个二流国家，并用十分傲慢的语言把它呼来喝去。本来英国也许可以通过发展民主制度、坚持集体安全政策来巩固它的地位，但是它选择放弃一切，转而支持希特勒。现在，英国帝国主义陷入了慕尼黑政策所带来的无数矛盾之中，进退两难，已经无可救药了。

殖民地——现在德国提出了殖民地的要求，它就是“一无所有”和“不满现状”的国家。那些众多没有殖民地的小国又怎么样了呢？而那些真正“一无所有”的殖民地人民又该如何？整个争论是建立在帝国主义体系延续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满意与否取决于它所采取的经济政策，而在帝国主义之下，不满意的情况总会存在，这是因为不平等是帝国主义的常态。在俄国革命之前，据说沙俄就是一个不满现状、不断扩张的国家。现在的苏联虽然国土面积缩小了，但是对现

状“很满意”，这是因为它没有帝国主义野心，并且推行着不同的经济政策。

德国如此渴望得到殖民地，这并非是因为除此之外它就无法得到原材料（市场都是开放的，它想买就能买到），而是因为它想要盘剥殖民地的人民来牟取私利。它用早已贬值的德国货币，即所谓的被“冻结”的马克来支付给殖民地，继而强迫他们购买德国的商品。

我已经为你列举了过去五年内所发生的一些主要事件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影响。我都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停笔了，因为全球各地骚动不安，冲突不断，而变化也极为频繁，我们已经不可能仅从某地或者某国层面来思考全球问题，更不要说解决这些问题了。必须从世界整体层面上来解决这些问题。与此同时，世界形势愈加恶化，战争和暴力主导了整个世界。欧洲曾经无比自豪地引领着现代世界，但是现在已经在隆隆的炮火声中重新回到了野蛮时代。欧洲古老的统治阶级完全无能为力，无法找出一条突破重重难关的出路。

《慕尼黑协定》彻底打破了这个世界本就不稳定的平衡。东南欧开始向纳粹势力投降，纳粹的阴谋在每个国家中也愈演愈烈。称作“奥斯陆集团”（Oslo Group）的欧洲小国（丹麦、挪威、瑞典、芬兰、荷兰、比利时与卢森堡）意识到与英国的友好关系对它们毫无价值，它们于是宣布中立，拒绝承担任何集体安全责任。日本在远东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它占领了广东，进而与英国在香港的利益产生了矛盾冲突。巴勒斯坦的局势也在急速恶化。英美关系也降到了冰点。张伯伦先生与法西斯国家站到了一起，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却不断公开指责纳粹主义的意图和手段。出于对欧洲冲突以及英法对法西斯侵略之态度的厌恶，美国对此不予理会、置身于事外，同时也开始大规模地重整军备。苏联也是这样做的。它的结盟政策以及与西方国家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都没有取得成效，而它可能要遭到排挤，被迫陷入孤立的局面。但是美国和苏联都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

界里，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完全置身于事外或者保持中立，只要世界爆发冲突，它们都必然会被拖入其中。因此它们都在积极做好一切准备。

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美国内政遭遇了许多阻碍，最高法院以及反动势力都对他进行了诸多阻挠。在最近的几次选举中，罗斯福总统的对手共和党人在国会中的势力大为增强。但是罗斯福总统在美国人心中仍然享有极高的威望和地位。

罗斯福总统遵循着要与南美政府发展友好关系的政策。在墨西哥，政府和英美石油利益集团一直矛盾不断。在墨西哥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确立了墨西哥人民的国家权力。教会以及那些在石油与土地方面拥有既得利益的团体失去了许多特权，因此它们都对这些变革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土耳其——在这个冲突不断的世界里，土耳其没有任何外来的敌人，看上去似乎格外地平静祥和。它早已解决了与希腊和巴尔干国家之间由来已久的仇恨。它与苏联以及英国的关系都相当不错。它与法国就亚历山大勒塔的归属问题发生了冲突。你应该还记得，法国政府曾经把它的托管地叙利亚分割成为五个小国，亚历山大勒塔就是其中之一。亚历山大勒塔的主要居民为土耳其人，最终法国接受了土耳其的意见，将这个地区设成了自治州。

土耳其在睿智的凯末尔·阿塔土克的领导下，摆脱了种族等问题，全心全意投身于国内建设发展之中。阿塔土克一生都在为土耳其人民服务。他于1938年11月10日过世，在此之前，他有幸得知他的努力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最后，他的老战友伊斯麦特·伊诺努(Ismet Ineunu)将军接替了他的职位，出任土耳其总统一职。

伊斯兰教——凯末尔·阿塔土克让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教重新焕发了活力。伊斯兰教摆脱了中世纪观念，从而跟上了当今世界变革的步

伐。阿塔土克的做法给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教国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它们建立现代国家，奉行民族主义，而不再以宗教作为治国根本了。但是，由于印度的穆斯林们遭到帝国主义的控制，因此印度所受到的影响并不像其他伊斯兰教国家那样显著。

冲突不断的世界——欧洲和太平洋是当今世界两大战场。在这两个区域中，气势汹汹的纳粹主义试图摧毁民主和自由，统治整个世界。国际纳粹主义联盟已经形成，它不仅公然发动战争（虽然并未宣战），而且还在各个国家玩弄阴谋诡计，挑起矛盾冲突，从而创造插手干涉的机会。它大肆颂扬战争和暴力，并展开规模空前的虚假宣传。尽管国际共产主义早已偃旗息鼓，多年以来始终支持着世界和平和民主，但是它仍然叫嚣着反共产主义的口号，用以掩盖其帝国主义的野心和图谋。在美国，纳粹分子多次密谋生事。1937年12月，法国发现了一起颠覆共和国的阴谋。卡古拉德分子（Cagoulard），即所谓的“戴帽子的人”，是这次阴谋的组织策划者，德国和意大利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武器援助，他们就借此大肆展开爆炸袭击和谋杀行动。在英国，拥有极大影响力的团队则促使英国的外交政策朝着纳粹路线转变。

国际纳粹主义不仅仅只是最为极端的帝国主义，还制造了许多宗教和种族矛盾，重演了中世纪的场面。在德国，天主教会和新教都遭到了镇压。德国还大肆宣扬种族优越论，而意大利随后也如法炮制。从此，犹太人，甚至犹太人的后裔，都遭到了无情的杀戮，纳粹分子采用了科学的手段无情地施展暴行，其冷酷血腥程度简直世所罕见、前所未有。纳粹对犹太种族的残酷迫害彻底激怒了一位年轻的波兰籍犹太男子。1938年11月初，他在巴黎刺杀了一名德国大使。这本是个人行为，但是德国政府迅速地对全部犹太人展开了有组织的恐怖镇压。德国境内所有犹太教堂都被烧毁了，犹太人的商店遭到大规模的抢劫，损害十分严重。无数犹太人在大街上和自己家中遭到了野蛮的

袭击。在纳粹领袖的眼中，这些行为都是正当的。除此之外，他们还将8000万英镑的罚款强加在德国犹太人身上。

这个自古以来就背负着伤痛的犹太民族悲痛万分，他们脆弱无助、无家可归，要么绝望地自杀，要么大批地逃离，他们开始源源不断地踏上了征途，但是又能去向何方呢？当今世界简直是难民遍布，犹太人、苏台德地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从佛朗哥占领的土地上逃出来的西班牙农民、中国人、阿比西人，多得简直数不胜数。这就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造成的恶果。整个世界都惊慌失措，许多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帮助这些难民。但是英法这两个所谓的民主政府奉行与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保持友好合作关系的政策，因此它们都是造成法西斯恐怖蔓延以及文明礼仪毁灭的帮凶，而无数的人沦为难民，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如果这就是纳粹国家所代表的，就像圣雄甘地所说的那样，“毫无疑问，德国是不会得到盟友的。一个自称代表正义和民主的国家怎么会与公然反对正义和民主的国家结为同盟呢？或者英国的意图就是想进行军事独裁统治吧？”

如果英法两国已经沦为了法西斯国家的卫道士，那么中欧和东南欧小国会完全倒向法西斯怀抱就完全不足为奇了。事实上，它们正在快速地沦为法西斯主义的奴隶。只有纳粹德国才是它们的主宰。德国还是比意大利技高一筹，意大利现在已经不能与之平起平坐，它在法西斯联盟中已然退居次席了。德国和意大利都想要扩张殖民地范围，但是德国的真正梦想是向东推进，占领乌克兰和苏联。英国和法国可能会支持德国的行动，它们天真地认为，这或许能够帮助它们保护现有的一切。

美苏两个大国挺身而出，它们是现代世界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其广阔的国土让它们几乎能够自给自足，它们几乎是不可战胜的。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它们都反对法西斯和纳粹。在欧洲，苏联是唯一可以抵抗法西斯的屏障。如果它也遭到毁灭，那么欧洲的民主制度就彻

底终结了，英国和法国必然也不会幸免。美国远离欧洲大陆，它不会轻易地介入欧洲事务，也不想牵涉其中。但是一旦美国插手欧洲或者太平洋的事务，它必定会让世界真切地体会到它的强大力量。

在印度和东方国家，自由和民主相伴而来，英国的一些自治领甚至远比英国政府更加进步。民主和自由在今天陷入了巨大的危险之中，这场危机尤为严峻，正是因为那些假装支持民主自由之友的无耻背叛。但是西班牙和中国为我们树立了绝佳的榜样，展现了真正的民主精神，鼓舞了整个世界。这两个国家都挺过了残酷的战火，正在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民族，而它们国家生活的多个领域都开始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1935年，阿比西尼亚遭到侵略；1936年，西班牙受到攻击；1937年，中国再次遭到侵略；1938年，奥地利遭到纳粹德国侵略，并从地图上彻底消失了，捷克斯洛伐克四分五裂，沦为了德国的附属。每年世界都那么多灾多难。1939年我们又会迎来什么呢？它会给我们以及世界带来什么呢？

1938年1 1月14日，阿拉伯海

---

1. 中国称之为“万里长征”。——译者注

译后记

耗时一年有余、由我们五人通力协作翻译的《爸爸尼赫鲁写给我的世界史》一书很快就要出版了。在这里补上一份译后记，一来感谢孙匀、杨婷婷、梁爽、熊笛四位老师的鼎力参与，为此书的翻译工作付出了很多辛劳；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妻子李天云，我整日整夜地翻译，无暇顾及家里，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的事情就落在了她一人肩上，她毫无怨言；更应该感谢的是出版社的编辑老师，在翻译过程中他们给予了大量的建议和鼓励，为整个翻译工作增添了强劲动力。最感内疚的是我自己，因为忙于此书的翻译，我几乎没有时间陪家人，未能尽到应尽的责任。不过，这确实是一本值得细细研读的好书，若能让读者朋友们受益，就算是我们辛苦翻译的最大回报了。

历史从来都不是客观公允的，尤其是世界历史；历史的书写者们都会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个人喜好、阶级利益以及民族情感融入其中，《爸爸尼赫鲁写给我的世界史》也是带着作者的个人情怀的。这部世界史书从印度这个第三世界国家的视角审视了整个人类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印度在古代历史上的辉煌以及在近现代历史上所受的屈辱，和中国极为相似；此书审视历史的视角，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中国看待世界历史的态度，因而非常接近中国读者的价值理念。

本书绝非一般的世界史书，它展现的不仅仅是尼赫鲁对世界历史的独特认识，更多体现的是一位伟大父亲，在面临艰难险阻时所体现出的坚韧与乐观，以及对女儿在成长过程中的悉心呵护。身陷囹圄的尼赫鲁，克服了难以想象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困难，以书信的方式，为监狱之外、年纪尚幼的女儿梳理了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实现了爸爸对女儿的历史教育。言语之间满是厚重的父爱与责任，以及对

苦难印度的深深爱恋，本书也因此带有了浓浓的温情。可以说，《爸爸尼赫鲁写给我的世界史》既是一本有别于西方话语的世界史，也是一本浸染了父爱、责任、爱国之情的心灵读物。

尼赫鲁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理，对世界格局和秩序曾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尼赫鲁学识渊博，在印度被尊称为“博学尼赫鲁”。要翻译这本尼赫鲁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撰写的皇皇巨著，其难度可想而知。而在译文中最大限度地呈现书中所饱含的诸多情感，让中文译本晓畅易懂，则是翻译过程中的最大难点。本书的翻译团队以高度的专业素养，凭借丰富的人文历史翻译经验，历时一年有余，最终完成了本书的翻译。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重庆第二师范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梁本彬2016年1月